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

张国刚 主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

张国刚 主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雄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张国刚　主编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37.75印张　1插页　945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09-1774-9

K·47　定价：47.00元（平）

50.00元（精）

本书编著者

顾　问　　杨志玖

主　编　　张国刚　**副主编**　傅玫

绪　论　　张国刚

第一章　　李晓路　胡　戟

第二章　　牟发松　胡沧泽

第三章　　李锦绣　程衍德

第四章　　张国刚　李红旗

第五章　　陆庆夫（一至五节）　那　炎等（六至九节）
　　　　　傅　玫（十至十一节）

第六章　　荣新江　廉湘民

第七章　　谢重光（第一节）　傅玫（第二节）
　　　　　乔治忠（第三节）、萧占鹏　孟昭连（第四节）

第八章　　张昌倬

第九章　　刘进宝

第十章　　叶振华

附　录　　傅　玫　张国刚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

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和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既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序言

杨志玖

隋唐五代起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581),终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显德七年(公元960),历时379年。

开皇九年(公元589)隋灭陈,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统一了中国。隋朝虽然历时不长(581—618),但她"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卷1《论君道》),为继起的唐朝奠定下强盛的基础。隋唐是继秦汉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强盛国家。唐朝从建立(公元618)到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一百三十多年间,是她的兴盛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鼎盛期。她国势强大,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成就辉煌。国内各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亚洲各国到唐朝来通好、经商、进行文化交流。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为封建社会政治清明的典范。

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此后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转入后期。安史之乱虽然削弱了唐朝的国势,但唐朝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继续有所发展,对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未间断。

隋唐五代也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时期。北方的突厥、回纥,东

北的渤海、契丹，西南的吐蕃、南诏先后建立了国家。他们和唐朝虽有时发生摩擦甚至以兵戎相见，但和平相处、经济往来仍是主流。有的和唐王朝和亲，有的帮助唐朝平定内乱，在友好往来中促进了各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开发我国边疆地区方面，各民族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军提出的“平均”旗号却为宋代农民军“均贫富”的要求开了先导，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的一个特点。大起义为藩镇军阀所镇压，唐朝不久也为藩镇军阀朱温所代替，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

五代（公元907—960）历时短暂，朝代更迭频仍，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但在纷乱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到后周时，经过郭威（周太祖）和柴荣（周世宗）两代对经济和军政的改革整顿，已具备了统一南北的条件和能力，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对本时期历史轮廓的最简单的勾划。下面，就有关隋唐史的几个一般性问题，概述一二。

一、隋唐社会繁荣昌盛的原因

隋唐，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她国势强盛，疆域辽阔，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有一定特点和相当高的成就。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卷十二《馆舍》条说：“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则弥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朝气象的宏伟。

这一繁盛局面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使中国继秦汉之后，又出现了统一的隋唐帝国。在此以前，南方和北方

的经济已都相当发展，统一以后，南北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大运河的开凿适应了南北经济联系的需要，更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联系和交流。从隋朝的建立到唐代安史之乱（755 年）以前的一百七十多年间，除了隋末几年战乱外，社会秩序基本上是稳定的，这就给了劳动人民一个休养生息、辛勤劳作、发展生产的机会，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开元盛世”。

其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族匈奴人刘渊、刘聪、刘曜等灭了西晋，此后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在北方先后建立王朝，最后为鲜卑族的拓跋部所统一。这期间是少数族和汉族以及各少数族间矛盾斗争激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的时期。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血液，扫除了暮气，增加了活力。隋唐继承了这一成果。隋唐的王室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其子杨广即是胡汉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氏，和杨坚的皇后是姊妹。李渊妻窦氏是窦毅之女，窦毅托言东汉窦章之后，东汉末章子亡奔匈奴，为部落大人，实际上是匈奴人，最低也是匈奴化的汉人。窦毅妻宇文氏系出匈奴，因此窦氏是匈奴，她所生的李世民自然也有胡人血统。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是她所生。因此，唐初三个皇帝都有少数族人血统。至于隋唐的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族的人更不可以数计。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303 页）这是很有见地的话。

最后，是唐朝统治者采取的开放政策。如上所述，在隋唐以前的民族融合的基本上，加上唐朝前期统治者与少数族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民族关系上，他们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唐太宗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毕依朕如父母。”（《通鉴》卷 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唐

太宗这一思想不能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特质，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对与唐为邻的外国如东方的朝鲜、日本，西域的中亚各国（昭武九姓、波斯、阿拉伯、东罗马）以及南亚各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唐政府和这些国家不仅有政治上的使节往来，和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朝的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带来了本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方面更具特色，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由开放局面引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唐朝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也和唐朝国势强盛、不怕外来势力（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冲击有关。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无疑是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居于首列的国家。许多国家或为谋取政治、经济上的利益，或为文化上的交流、宗教上的传播，都派人到中国来，与中国结好、通商和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这都增加了唐朝的声威，因而受到容许和欢迎。

二、隋唐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过渡时期。

从封建社会的基础土地制度看，隋及唐前期因袭的北魏以来的均田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盛行以及国有土地的枯竭，已逐渐破坏，所谓“虽有此制，开元之际，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通典》卷 2《田制》）均田制虽不是平均分配土地，但对土地占有和土地买卖还有所限制，也就是封建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控制。均田制破坏后，土地买卖和土地

兼并现象愈来愈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或地主田庄制遂代替了带有一定国有性质的均田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与此相应的是两税制代替了租庸调制。租庸调是均田制时期的赋税制度，它以身丁为本，是一种以丁口为纳税对象的制度，意味着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两税法以资产为本，它以土地及其它资产为纳税对象，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削弱了。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随之破坏而为募兵制所代替。从征调到召募，也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虽然在某些时期，农民还不免为统治者强拉硬抓去充军士，像杜甫在《石壕吏》诗中描述的那样，但那已不是制度所规定的了。

阶段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农民（自耕农除外）是地主的荫户、佃客和部曲，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谓“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处于依附奴役地位。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特权已不存在；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地主田庄上作为佃耕的客户，这种租佃关系下的农民，其身份是国家的良民，其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大为松弛。唐末王仙芝起义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朦胧地表现出对财富分配平均的要求，这和前代以反暴政、反徭役为主要目标的农民起义口号已不相同，反映出土地兼并的激烈和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它不是直接的而是曲折的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化。如官制上隋及唐初的三省六部制自武后起逐渐为使职差遣制所代替，安史乱后，使职更为盛行，科举取士也于此时为盛；军事上的藩镇割据现象；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的兴起，近体诗（律诗）的普及，词的兴起；哲学思想上韩愈的建立儒家统治地位的道统学说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形成和逐渐发展的。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继魏晋南北朝的余绪，

开宋元明清的先河，因而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代。前辈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的结语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金明馆丛稿初编》296 页)可谓精辟的概括。

三、唐史的分期

如上所述，把唐代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这在学术界已是一致看法。但要确定两期的分界线，即具体规定以哪一年为分期断限，却不容易，学术界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变动变化是相当长时期矛盾酝酿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不妨提出两个年代来作为标记：一个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的安史之乱；一个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780)两税法的颁布。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两税法的颁布宣告了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彻底废除，此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基本上沿袭两税法的模式而有所发展变化，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基本面貌，其影响至为巨大，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措施。

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孤立的产物，因此也很难说哪一件更重要。只能说，一件的重要性在政治方面，一件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妨把这 25 年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变时期看待。

以上的分期，是就唐代政治社会面貌的变化标准划分的，也是当今唐史学界的公认的看法。这一分期法可称为二分法。此外，还有四分法和三分法，也流行一时。介绍如下：

四分法是把唐朝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这是元人杨士宏所著《唐音》一书中的划分法。这是一部唐诗选集，作者把唐代诗人的诗按其生年分别纳入这四个时期（李白、杜甫、韩愈三家诗未选入）。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也这样分。现代进唐代文学特别是讲唐诗的也是这样。因此，这一分期法应当知道。

三分法可举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的说法为代表。其中前期是唐高祖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618—741）；中期自玄宗天宝元年至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742—820）；后期自穆宗长庆元年至昭宣帝（即哀帝）天祐四年（公元821—807）。其划分法是以“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为依据。前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强盛状态。”中期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后期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这种划分法对于分析唐代政治史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史也有一定便利之处。

*　　*　　*　　*

隋唐五代历史内容丰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一大批青年学子希望跨入学术殿堂；治唐代文学的学者也希望尽快获取唐史研究的成果与得失；一些文化学术界、新闻出版界的同仁

也常常碰到自己未作深入研究的唐史领域,他们都需要一本学术史性质的备览或参考书。如今,张国刚等同志组织唐史学界的专家、同仁编写了这一部煌煌数十万言的大书,将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按图索骥”之便。不断地总结学术研究的得失,是推动学术繁荣的重要途径,本书虽然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廿世纪唐史研究史,但无疑地会为人们总结近百年的唐史研究,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它的作者们。

1989 年 10 月初稿

1996 年 8 月补写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事件与人物 …………………………………… 10

一、隋文帝评价……………………………………………… 11

(一)对隋文帝的总体评价 ………………………………… 12

(二)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原因何在 ………………………… 13

(三)对隋文帝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开皇之治的评价 ………………………………… 14

(四)对隋文帝其它各项政绩的分析 ……………………… 14

(五)关于隋文帝的历史教训 ……………………………… 15

二、隋炀帝评价及隋亡原因分析…………………………… 16

(一)隋亡的原因 …………………………………………… 16

(二)对隋炀帝的整体评价 ………………………………… 18

(三)怎样看待隋炀帝的"暴政" ………………………… 19

(四)隋炀帝为何营建东都 ………………………………… 19

三、隋末农民起义…………………………………………… 20

(一)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 21

(二)关于李密的评价 ……………………………………… 22

(三)对隋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评价 …………………… 23

四、李渊、李建成评价与玄武门之变 ……………………… 25

(一)晋阳首谋者是谁 ……………………………………… 25

(二)玄武门之变的性质 …………………………………… 26

(三)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 27
五、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29
六、武则天评价…………………………………………………… 30
(一)武则天的政治倾向 ………………………………… 31
(二)武则天的历史作用 ………………………………… 33
(三)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 ………………………… 34
七、唐玄宗与开天盛世…………………………………………… 35
(一)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 36
(二)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原因 …………………… 37
(三)对唐玄宗的评价 …………………………………… 38
八、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39
(一)安史之乱 …………………………………………… 39
(二)藩镇割据 …………………………………………… 41
九、牛李党争……………………………………………………… 46
(一)党争的发端时间 …………………………………… 48
(二)牛李党争的焦点 …………………………………… 48
(三)牛李党争的社会基础及其评价 …………………… 49
十、唐末农民战争………………………………………………… 50
(一)唐末农民起义提出“平均”口号的内容 ………… 51
(二)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 ……………………………… 52
(三)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受敌“诱降”、
“乞降”问题的争论 …………………………… 53
(四)其它一些问题及观点 ……………………………… 53
十一、其他历史人物与事件……………………………………… 54
(一)唐代的历史事件及人物 …………………………… 55
(二)五代史上的事件及人物 …………………………… 59
第二章 典章制度 ………………………………………………… 64
一、概括性论著…………………………………………………… 64

二、职官制度……………………………………………… 67
(一)通论 ……………………………………………… 67
(二)中央职官 ………………………………………… 68
(三)地方职官 ………………………………………… 83
(四)使职、藩镇体制和宦官………………………… 91
(五)选举及学校……………………………………… 100
(六)监察、考课、俸禄与封爵品阶………………… 110
三、法律制度 ……………………………………………… 118
(一)通论……………………………………………… 119
(二)律令法典体系…………………………………… 119
(三)隋律……………………………………………… 120
(四)唐律……………………………………………… 121
(五)唐令、格、式、出土法律文书及
六典施行问题……………………………………… 125
(六)法制……………………………………………… 129
四、军事 …………………………………………………… 131
(一)府兵制…………………………………………… 131
(二)唐中后期兵制的变化…………………………… 138
(三)神策、禁军、监军与边防(骑兵)……………… 139
(四)出土军制文书研究……………………………… 143
第三章　经济……………………………………………… 145
一、经济 …………………………………………………… 145
(一)通论……………………………………………… 145
(二)农业……………………………………………… 152
(三)手工业…………………………………………… 158
(四)商业……………………………………………… 161
(五)交通运输………………………………………… 177
二、财政 …………………………………………………… 181

(一)通论…………………………………………………… 181
(二)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 187
(三)财政收入…………………………………………………… 195
(四)财政支出…………………………………………………… 212
三、人口与徭役 …………………………………………………… 218
(一)人口…………………………………………………… 219
(二)徭役…………………………………………………… 233
四、土地 …………………………………………………… 237
(一)均田制…………………………………………………… 238
(二)庄园制…………………………………………………… 256
(三)屯田和营田…………………………………………… 257
(四)职田及其它…………………………………………… 258
(五)租佃制…………………………………………………… 260
第四章　社会生活…………………………………………………… 264
一、社会结构与等级身份 ……………………………………… 265
(一)社会结构总论………………………………………… 265
(二)各种等级身分的研究………………………………… 267
二、社会群体与社区 …………………………………………… 291
(一)家庭与婚姻…………………………………………… 291
(二)社会组织与社区……………………………………… 299
三、人口问题与社会救济 ……………………………………… 317
(一)人口问题……………………………………………… 317
(二)人口类别——妇女与外侨…………………………… 326
(三)社会救济及慈善事业………………………………… 332
四、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 ……………………………………… 335
(一)物质生活习尚………………………………………… 335
(二)丧葬礼俗与时令节日………………………………… 347
第五章　民族…………………………………………………… 357

一、对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研究 …………………………… 357
(一)民族政策…………………………………………… 357
(二)民族关系…………………………………………… 362
二、突厥史的研究 ……………………………………… 365
(一)突厥族源…………………………………………… 365
(二)突厥社会…………………………………………… 367
(三)西突厥政权………………………………………… 368
三、回纥、铁勒及于阗史………………………………… 370
(一)回纥族源…………………………………………… 371
(二)回纥汗国的社会性质、制度与发展 ……………… 372
(三)回鹘的迁徙及以后的回鹘政权…………………… 373
(四)关于铁勒的研究…………………………………… 379
(五)关于于阗史研究…………………………………… 380
四、吐谷浑和党项史的研究 …………………………… 382
(一)关于吐谷浑史……………………………………… 382
(二)关于党项…………………………………………… 385
五、吐蕃史的研究 ……………………………………… 386
(一)吐蕃史料的考订…………………………………… 386
(二)吐蕃的族源………………………………………… 387
(三)吐蕃的社会性质与制度…………………………… 389
(四)吐蕃的向外扩张…………………………………… 391
六、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 ……………………………… 394
(一)渤海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 ………………… 395
(二)渤海政权与周边各族关系………………………… 397
(三)渤海政治制度与文化、宗教 ……………………… 399
(四)渤海经济…………………………………………… 403
(五)渤海社会性质……………………………………… 404
(六)渤海历史地理与内外交通………………………… 404

（七）渤海文献…………………………………………… 405
七、契丹族早期历史 ……………………………………… 407
（一）契丹族名…………………………………………… 407
（二）契丹族源…………………………………………… 408
（三）契丹早期宗教……………………………………… 409
（四）契丹与唐朝及其他民族关系……………………… 410
（五）其他方面的研究…………………………………… 410
八、奚族的研究 …………………………………………… 411
（一）奚族族源…………………………………………… 411
（二）奚族族称…………………………………………… 412
（三）奚族流向…………………………………………… 412
九、室韦族的研究 ………………………………………… 413
（一）室韦族源…………………………………………… 413
（二）室韦经济与社会性质……………………………… 414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415
十、南诏的研究 …………………………………………… 415
（一）南诏史料的考订…………………………………… 415
（二）南诏族属…………………………………………… 416
（三）南诏社会性质……………………………………… 422
（四）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424
（五）南诏德化碑的作者………………………………… 426
（六）从南诏灭亡到大理国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权更替 ……
…………………………………………………………… 427
十一、南方其他民族 ……………………………………… 428
（一）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南方少数民族
的综合介绍…………………………………………… 428
（二）茫蛮、黑齿、金齿等部落………………………… 429
（三）板楯蛮……………………………………………… 430

(四)西山诸羌…………………………………………………… 431
第六章　中外关系…………………………………………………… 432
一、通论 …………………………………………………………… 432
二、与东亚的关系 ……………………………………………… 437
(一)朝鲜………………………………………………………… 437
(二)日本………………………………………………………… 442
三、与中亚的关系 ……………………………………………… 449
(一)通论………………………………………………………… 450
(二)粟特地区…………………………………………………… 451
(三)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 453
四、与西亚的关系 ……………………………………………… 458
(一)波斯………………………………………………………… 458
(二)大食………………………………………………………… 462
(三)西亚宗教的传播………………………………………… 465
五、与南亚的关系 ……………………………………………… 478
六、与南海诸国的关系 ………………………………………… 484
第七章　宗教、文化 ……………………………………………… 486
一、宗教 …………………………………………………………… 486
(一)佛教………………………………………………………… 488
(二)道教………………………………………………………… 530
(三)摩尼教……………………………………………………… 537
(四)祆教………………………………………………………… 541
(五)景教………………………………………………………… 544
(六)伊斯兰教…………………………………………………… 547
(七)地方宗教、迷信与关于宗教的
一般论述…………………………………………………… 550
二、哲学 …………………………………………………………… 552
(一)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情况

及其历史地位…………………………………………………… 553
(二)关于隋唐五代时期著名思想家
及其学说……………………………………………………… 558
三、史学 ……………………………………………………… 586
(一)对于隋朝史学的研究………………………………… 586
(二)对于唐代史学的研究………………………………… 588
(三)对五代十国时期史学的研究………………………… 613
四、文学 ……………………………………………………… 615
(一)唐诗兴盛的原因……………………………………… 617
(二)科举与文学…………………………………………… 621
(三)唐代边塞诗…………………………………………… 626
(四)佛教与文学…………………………………………… 632
(五)唐代古文运动………………………………………… 638
(六)唐传奇………………………………………………… 643
(七)敦煌文学……………………………………………… 649
(八)断代文学史…………………………………………… 652
第八章 文物考古……………………………………………… 659
一、隋唐城址 ………………………………………………… 660
(一)隋唐大兴、长安城 ………………………………… 661
(二)隋唐东都洛阳城……………………………………… 665
(三)隋唐扬州城…………………………………………… 669
二、隋唐墓葬 ………………………………………………… 669
(一)陵墓…………………………………………………… 670
(二)墓葬的分区与分期…………………………………… 671
三、隋唐五代的手工业遗物与遗迹 ………………………… 676
(一)金银器………………………………………………… 676
(二)陶瓷器………………………………………………… 681
四、隋唐佛教遗迹遗物 ……………………………………… 688

(一)隋唐石窟寺……689
(二)隋唐舍利塔基……692
第九章　敦煌吐鲁番文书……695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及收藏情况……695
二、目录的刊布与敦煌吐鲁番目录学研究……697
三、资料的整理与刊布……700
四、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708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唐五代史研究……709
(二)经济……710
(三)政治……717
(四)西北地方史研究……723
五、台湾地区的敦煌学研究……749
六、法国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754
七、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756
(一)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756
(二)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758
(三)最近十多年的研究概况……760
第十章　史料、工具书与专著……763
一、史料……763
(一)基本史料……763
(二)一般史料……774
二、工具书……786
(一)索引、目录……787
(二)辞书及其他类……794
三、综合类论著……799
附录: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811
中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大陆地区)……811
中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台湾地区)……1007

日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 1068
西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 1117

绪 论

一

中国历史上后一个王朝为前朝撰修史书，研究利害得失，以为资治之殷鉴，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因此，也可以说，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宋代人就已做出了许多成绩。今天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籍《资治通鉴》及各断代正史都是当时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宋太祖、太宗惩唐末五代藩镇尾大不掉，而厉行收地方之权。宋真宗以本朝缺文武人才而与臣下讨论“唐贤比肩而出”的原因。① 宋人笔记多杂有前朝史事，也往往是有感于时人时事而发的。这种“资治性”研究一直沿至明清，明人李琎的《阅史郄视》、张大龄的《方镇指掌》等，以及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可以看作其代表作。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刊误纠谬之作，其著名者如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和元胡三省的《通鉴注》等。

清代以来考据之学大盛，对前朝史书史事进行考订修补蔚然成为风气，于隋唐五代史方面成绩彰著者，除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外，尚有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罗士琳的《旧唐书校勘记》、岑建功的《旧唐书逸文》等。清季以来又有万斯同所补唐书《将相大臣年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等。以上这些研究著作，

① 曹彦约《经幄管见》。

大都至今仍被学者们引证和参考使用。

本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的传入和现代研究分析方法的引进,给中国学术界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注入了新的研究内容,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例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唐朝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并力图总结出带规律性的意见。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摆脱了一般就事论事的治史方法。据统计,本世纪前50年(1900—49)中文唐史论文约1082篇,著作不下150种。约近千篇论文和绝大部分有价值的著作都是30、40年代发表的。虽然不乏岑仲勉、陈垣等人的实证性力作,但这时期唐史研究的主流乃是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当时在西方也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史料。不仅陈寅恪的著作如此,而且三十年代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等人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三、四十年代董家遵、陈鹏(鹍化)关于唐代法律、婚姻与家庭的研究,也都是带有新的治学特点的学术著作。

五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关于均田制的争论,唐宋庄园制形态的探讨,隋及唐初政权性质的讨论,农民战争及李密、隋炀帝等有关人物的评价,都基本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影响,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对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学术观点的批判等,就不能说是公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实用主义、影射史学作品充斥史坛,对武则天等的一些"研究",成为千古笑柄。五、六十年代最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了一批断代史著作。按出书年代先后计有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上海人民出版社),吴枫《隋唐五代史》(1957,人民出版社),岑仲勉《隋唐史》(1957),高等教育出版社),吕思勉《隋唐五代史》(1959,上海中华书局),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1961,三联书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一、二两册(1965年,人民出版社)。十几年间如此众多的断代史问

世，这在其它朝代的研究中还是少见的，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历十年浩劫的史学界遇到了生机。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由唐长孺、王仲荦、史念海发起，1980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唐史研究会（后改名"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唐长孺教授被推为首任会长。到1995年已经召开了六次年会。学会还举行了多次地区性、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和实地考察，出版了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与隋唐历史文化丛书。目前学会会员注册已达300多人。全国有30个左右大学或研究机构可以招收隋唐五代史研究生，七、八个单位招收博士生。这从制度上保证了隋唐史研究队伍的补充和壮大。

最近十七年（1978—1995）的唐史研究与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相比，有如下特点。首先是论文数量激增。文革前十七年，中文论文约1300余篇，平均每年80篇，近十七年来用中文发表论文近六千篇，平均每年350篇，其次是研究范围更加广泛，课题更加深入。文革前，土地制度、农民起义和少数历史人物评价，是唐史研究的三大热点。热烈的争论固然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也束缚了研究的深入，使许多讨论都浮泛在概念层面，沉潜的、细密的研究论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近十七年，学术界再也不为几朵"金花"所左右了。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文化史的别开生面，处处都显示出八十年代以来唐史学界的活跃局面。

敦煌吐鲁番学的勃兴，也是近十几年来促进唐史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敦煌学在本世纪初已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文革前已有《敦煌资料》（第一辑）之类的书出版。七十年代新疆吐鲁番文书出土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如今，唐长孺先生主编，朱雷、陈国灿等参加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已经刊布出版。敦煌文献的

整理与刊布，也为便利使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唐长孺等的军制文书研究，周一良、赵和平的书仪文书研究、王永兴的差科簿文书研究，姜伯勤的寺院文书及西域文化关系史文书研究、沙知的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宁可、郝春文的社邑文书研究，荣新江的归义军史文书的研究及写本流传史的调查，方广锠的佛经目录文书的研究，王素高昌史文书的研究，邓文宽天文历法文书的研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可以这样说，虽然唐史研究从来不曾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领风骚，不曾成为"显学"，但是由于敦煌吐鲁番学的推动，却使"唐史学"成为文革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和最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之一。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唐代研究的学术组织。除中国唐史学会和台湾地区的"唐代学会"(由 1984 年成立的"唐代学者联谊会"发展而来)外，日本早在 1971 年便成立了唐代史研究会，并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古代史学者的中坚组织。美国在 1981 年成立了唐代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自始至今都是一个以欧美学者为主的国际性学术团体。韩国也成立了魏晋隋唐史学术研究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唐代研究组织的建立，促进了各地唐史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内外唐史学者的合作与交往。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唐史学者的交往和唐史学术讨论会，都是十分罕见的。如今，各种全国性、地区性、国际性的唐代研讨会、学术年会，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者在日本、北美、欧洲。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美国年轻汉学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创立的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的工作。基金会 1992 年创建于美国芝加哥，其在中国地区的代表为罗新博士。1994 年开始基金会与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举办每年一度的学术年会，致力于鼓励和支持中国大陆学者的唐代研究。目前，高水平的《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研究》大型年刊(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相继问世，胡戟教授受学会委

托筹办的为期五年的唐史高级研讨班及其他学术项目，也因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而得以顺利进行。唐研究基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佳话，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唐代研究事业，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首先是理论武装不够。如何摆脱教条主义的从概念出发的图解式研究模式，同时也要避免见木不见林的眼光狭隘的研究模式，还是当前唐史学界一项艰巨的任务。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多读些理论书籍，吸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写出来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著作将会别有一番天地，取得更多的创获。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已有这方面的呼吁和尝试，但还需要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自觉和具体行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一番深厚的理论准备，而是临阵磨枪，随手拈来、贴标签式的研究，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的。这是今后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应加强的重要问题之一。

进一步加强史料工作是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之二。历史资料对于史学工作者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说隋唐五代史资料较之其他朝代为整齐，有所谓“不多不少”之称（较秦汉不少，较宋以降不为多），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利用。敦煌文书整理已列出一个庞大计划，如果能尽早出版，必将推动唐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其次是石刻史料。目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洛阳历代出土墓志》（中国社会科学，1991）、《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等，向学术界推出了一批唐人石刻，但是如何更好更方便地利用，还有一番资

料整理工作可做。资料整理方面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索引、目录等工具书的整理。傅璇琮等人的《唐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等，不仅仅是工具书，也是功力深厚的学术著作。唐五代和宋人的笔记史料中有价值的资料不少，但利用十分困难，如果有人在这方面做一些索引与资料整理工作，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应该加强纵向与横向的"打通"。所谓"纵向打通"，就是要上与魏晋南北朝，下与宋辽金相联系，把隋唐五代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去进行考察。就目前学术界的情况而言，向下打通更为必要。应该有更多的兼通宋史的专家来治唐史。这不仅因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间因革沿袭颇值得探究，而且对于加强唐代后期历史及五代史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横向打通"，就是治史者应该把这一断代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唐代盛世，社会繁荣，文化昌盛，丰富多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唐史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充分展现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丰采和全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以各专题的分别的研究作基础，更需要我们作更多的通贯的研究。唐史高级研讨班决定将唐代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从各个具体的专题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尝试。其实，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以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论隋唐制度渊源、论唐代党派的政治斗争，都能从政治、文化、种族、典制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而且天然浑成，决无凿饰之迹，如果不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贯通的史学识见，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炉火纯青地步的。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第四个问题是应该在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来。目前隋唐史研究已有一批断代史及专题史著作，许多问题的研究虽已展开，但进一步深化、提

高的系统专著并不多见。这是只有下决心沉下心来做细致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所成的。为此，我们寄厚望于已学有专长的中老年专家，把自己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写成专著；同时，我们更寄厚望于年轻的史学新人，埋下头来，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些问题，形成自己的学术特长与专门著作。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呼吁大家重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自觉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和著作不做损害学术声誉的事。我们已有一些学者在严格学术规范上开了头，但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做。

最后，开拓研究视野、进行学术交流也是今后应该加强的一个工作。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学术交往的机会较多，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选题重复，炒冷饭的现象仍不鲜见。这既取决于每一位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也涉及到我们应加强的情报信息工作。台湾学者一些研究成果如何介绍给大陆学者，加强两岸学术交往，也都有很多事情可做。目前不仅日本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唐代研究会，而且美国的唐代学会。也团结了一批欧美学者，研究隋唐五代史早就是世界性的学问。大体说来，欧美学者注重理论概括，日本学者擅长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如果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同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传之出去，这对于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多少年来，史学界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就滑向实用主义，甚至影射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就被指为“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认为这里实际上存在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两个问题。许多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不可避免要受到现实问题与现实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研究热点及社会问题的触发。譬如说，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史、城市史、人口史、社会史研究，难道没有一个社会需要的潜在作用？这就是说，史学研究的现实观照是正当的，甚至必然的，无可厚非。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当我们研究这些受现实触发、

启发的历史问题时，是按照某种先验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去图解历史呢，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作客观公正的研究，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学者，强调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又有什么值得非难的呢？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期望，今后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一些学者可以从自己固有的既定的研究范围"为研究而研究"下去，也可以有一些学者在现实环境与现实问题的触动下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把它当作一种学术事业去做。

三

二十世纪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七千多篇论文，六、七百部著作，如果加上海外的中、日、西文作品，其数目将且分别达到万篇、千部之巨。这其中当然良莠杂陈，精、粗互见，但却是我们的一份宝贵学术遗产。在踏向新世纪的门坎时，我们要继往开来，要推陈出新，就必须认真总结、消化它，科学地梳理、评价它。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力图把近百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介绍给读者，远远谈不上二十世纪唐史研究的总结。我们的初衷是要介绍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但在实际上由于图书资料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能都做到这一点。经济史部分对日文资料注意较多，中外关系史部分对西文资料广加罗列，典章制度及宗教史部分对台湾地区学者的成果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但大多数仍然局限大陆地区中文论著方面，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书后附录了中文、日文和西方论著索引，以供进一步了解学术行情的读者参考。

本书从动议到出版，历时八、九载。早在1988年我受命写这本书时，曾约请李晓路（华东师大）、牟发松（武汉大学）、程衍德（厦门大学）、陆庆夫（兰州大学）、傅玫（南开大学）、荣新江（北京大学）、谢重光（福建社科院）、张昌倬（《文物》月刊社）、叶振华（南开大学）诸先生写稿。他们都是某方面的专家，可以高屋建瓴地评点与概

述。1989年秋我赴欧留学，陆续寄来的稿子交给了傅玫先生。傅先生不负所托，经杨志玖教授审定，将编集的书稿送给了出版社。可是，由于人事的变动，此书搁浅，到我1994年秋从德国归来，清样仍然躺在编辑的抽屉里。五、六年过去，书稿非修订增补不可。

从1995年9月武汉的中国唐史学术年会开始，我陆续邀得胡戟（陕西师大）、胡沧泽（福建师大）、李锦绣（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刘进宝（西北师大）等先生加盟，使修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唐研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要感谢唐史学会会长郑学檬教授、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及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其他先生对本书的推介；要感谢基金会代表罗新博士和唐史学会秘书长马弛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天津教育出版社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吴恩扬先生、林雄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优厚的条件，王强先生、李敏女士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附录的中文目录，由各章节作者提供初稿后，傅玫先生整理、补充、修订后编制。日文目录也是她编制的。西文目录是我本人搜集整理的，在编译和校订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德国朋友柯维麟博士（Dr. Michael Quirin）、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女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历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刘一（Lewis Mayo）先生的热情帮助，我的研究生王文兵、孙桂荣等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志玖先生始终关注并指导了编写工作。我希望本书能为青年朋友提供一点信息，供学术文化界的人士参考备览之用。至于体例未精、取舍失当之处，应该由我负责，请读者不吝赐正。

张国刚

1996年8月24日于南开寓所

第一章　政治事件与人物

隋唐五代史研究，在涉及政治事件及人物方面（包括农民起义及农民战争），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较为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1995年，这方面的文章已逾千篇。专著最著名的是陈寅恪先生具开创性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①，半个世纪中，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近年有谢保成的《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②。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③。对政治史也有深入的论述。论文所论述的事件及人物大致包括：

隋平陈之役、开皇之治、仁寿宫之变、隋亡原因、隋末农民起义、晋阳之谋、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武周革命、五王政变、开元天宝盛世、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永贞革新、甘露之变、牛李党争、元和中兴、唐末农民战争及隋文帝、隋炀帝、独孤皇后、高熲、令狐熙、长孙晟、裴矩、翟让、李密、窦建德、刘黑闼、杜伏威、辅公祏、王薄、杨玄感、汪华、徐世勣、宇文化及、唐高祖、唐太宗、李建成、长孙皇后、文德皇后、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太平公主、杨贵妃、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十八学士、封德彝、虞世南、薛仁贵、狄仁杰、宋璟、姚崇、裴炎、戴胄、魏征、李林

---

①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甫、高力士、安禄山、史思明、刘晏、李固、陆贽、杨炎、张九龄、韦皋、张巡、哥舒翰、李泌、李德裕、王忠嗣、郭子仪、李晟、浑瑊、段秀实、戴叔伦、元稹、李愬、周世宗、钱镠、王建、李太后、冯道、石敬瑭等，涉及面十分广泛，而在各专论文章中牵涉及评价、分析到的事件与人物更是远远超出上述范围。

可以这样认为，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的研究，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始终是最热门的领域。但大部分有较高质量的文章，几乎均集中于某几个人物和某几桩事件上。本章重点介绍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概况。

一、隋文帝评价

隋文帝作为隋唐五代历史时期的开拓者，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前讨论的文章较少，代表性的观点，如吕思勉先生认为“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然实勤政爱民，尤有俭德。其与外国，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贻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① 而岑仲勉先生则认为隋文帝统治后期，由于在用人、立嫡等方面的失误及大兴土木，已播下了统治危机的种子，“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②。“文革”以后，对隋文帝的评论文章逐渐增多，讨论的问题也不断深入。大致说来，有关隋文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

① 《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1 页。

② 《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版第 37 页。

（一）对隋文帝的总体评价

对隋文帝的总体评价牵涉到对其内政外交具体政策的分析，评价的着重点各有不同，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

胡如雷认为：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起过显著进步作用的杰出皇帝，他对统一国家的重建、社会生产的发展、刑罚野蛮性的克服，都做出了贡献，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他的不足之处，只能归之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苛求①。沈庆生认为：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国家由衰转盛，政治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隋文帝适应时代的需要，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英雄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②。齐陈骏则认为：对于隋文帝杨坚，我们既要肯定他顺应历史发展在完成统一、巩固统一方面的贡献，也应当看到他剥削百姓、骄矜暴戾的另一方面。比较魏、齐、周、隋的租额，隋租最重，赞成学术界关于隋文帝实行"重租政策"的提法③。杨希义也认为：隋文帝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分裂割据达三百年之久的局面，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灭陈之后，由于他在经济建设、国家治理和确立继承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处置失当，又导致了隋朝后期的政治危机，以至在他死后第十三年，隋王朝就短命而亡，其罪过也是不可否认的④。

---

① 《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 2 期。

② 《论隋文帝》，《四川师院学报》1980 年 2 期。

③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史学月刊》1965 年第 9 期。

④ 《隋文帝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 4 期。

（二）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原因何在

五十年代，杨志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几个基本条件"隋文帝即位前北朝在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都胜于南朝，这就是隋文帝统一的凭借。隋文帝即位后又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如减轻人民徭役、统一货币度量衡、简化地方机构、减轻一部分农商税，和把豪族庇荫下的户口括归政府的办法，使经济更为发展，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在国力更为充实后向南方用兵，当然有把握取得胜利。"① 而胡如雷则进一步指出"隋朝统一集权的形势能否巩固下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地抑制、打击割据势力和豪强世族。"根据他的分析，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宣布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为科举制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措施打击了门阀世族，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他又采取了从经济上釜底抽薪地打击世族、豪强的措施，削弱了割据势力的经济力量②。而杨希义则认为，隋文帝在统一中国的事业中的巨大业绩主要表现在虚心纳谏、积极进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外交灵活、克敌制胜等方面。同时，杨希义不同意胡如雷将隋文帝打击豪强世族与隋文帝重建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联系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豪强世族的势力并没有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而受到有效的打击③。何德章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隋祚短促的问题，认为，隋文帝既不能收纳江南人士，又不能安抚江南豪族，没有有效地巩固统一，增加了江南豪族势力的离心倾向④。

---

① 《隋文帝凭些什么条件统一中国》，《历史教学》1954 年 6 期。
② 《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 2 期。
③ 《隋文帝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 4 期。
④ 《隋文帝对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西南师大学报》，1993 年 2 期。

（三）对隋文帝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开皇之治的评价

如何看待隋文帝的社会经济措施，如何估价开皇时期的经济发展，是评价隋文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文章都认为由于隋文帝采取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以及重视水利的修建及减轻人民的徭役，因而，开皇时期农业、手工业发展很快，社会呈现一派繁盛景象。甚至认为开皇之治几乎达到了盛唐的水平。而一部分文章则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过高估价了隋文帝的经济政策及对开皇之治有溢美之词。杨希义通过对“均田制”和“输籍定样”这两项隋文帝执行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分析，认为从其内容和实施效果来看，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善生产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也没有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些部分。同时，他认为从隋文帝开皇后期“盗贼”的不断增加，亦可看出社会经济的日益停滞与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杨希义并不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隋文帝及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以及豪强世族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①。齐陈骏则认为对开皇之治的过高评价，如果从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以及赋役负担的程度进行考察，是经不起检验的。他还对开皇时期户口、垦田数字的增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隋文帝统治二十多年里，增户实际是一百万户，而非旧说“成倍增长”，垦田增加数亦非旧说二倍多。所以，他认为开皇之治并不可信②。

（四）对隋文帝其它各项政绩的分析

1. **隋文帝的政治思想**。赵云旗撰文认为隋文帝的政治思想主

---

① 《隋文帝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4期。

②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4期。

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这种亦法亦儒的思想在治国方策中表现为尚法、崇权、强君、重术以及重视执政者的楷模“风化”的作用、强调“礼”在治国中的效用，以德化民等①。

2. **民族政策**。赵云旗在另一篇论述隋文帝民族政策的文章中提出隋文帝民族政策指导原则的核心是为了安定时局，制止战争，发展生产，其内容和措施分为战时政策和战后政策两个时期，其效果是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国家的安定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②。

3. **吏治与用人**。沙宪知在《隋文帝吏治述评》一文中提出隋文帝所以能统一中国，创建一个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的王朝，吏治的突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并从政权机构的改革、官吏的选调、督课考核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③。王士立则专文讨论了隋文帝在用人方面的得失，认为隋文帝在前期选用了不少贤能之士，到了后期，则颠倒忠奸，混淆贤愚，在用人上出现了许多失误④。

（五）关于隋文帝的历史教训

魏国忠《关于隋文帝的历史教训》指出隋文帝的过错有两点特别严重：一是立法毁法、酷刑滥杀；一是堵塞言路、个人独裁⑤。前引杨希义文则认为隋文帝的教训主要是制造冤狱、大杀功臣；听信谗言、重用奸佞；由俭变奢、好大喜功；暮年持法尤峻几个方面。但是，赵云旗《隋文帝评价中的问题商榷》则辨解说，隋文帝“不悦儒学”、“天性猜忌”，不符合事实；他只是晚年执法严峻，与前代比，仍

---

① 《隋文帝政治思想研究》，《天津师大学报》1984 年 4 期。

② 《隋文帝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1 期。

③ 《辽宁师大学报》1984 年 3 期。

④ 《评隋文帝之用人》，《历史教学》1984 年 3 期。

⑤ 《求是学刊》1980 年第 2 期。

不失为宽简①。

二、隋炀帝评价及隋亡原因分析

隋炀帝乃亡国之君，历史上又以暴君著称，所以评价隋炀帝与探讨隋亡原因的分析必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隋二世而亡，其原因何在？隋炀帝在此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隋炀帝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又应如何看待？是否暴政？这些问题构成了隋炀帝评价中的重点。

（一）隋亡的原因

1.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说**。这一派观点，主要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分析着眼。杨蒲林在《试论隋代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一文中认为隋亡的原因“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缘故。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剧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杨文主要从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之间势力的消长，隋中央政权为首的关陇地区地主集团与齐、陈旧境失势士族地主之间矛盾的尖锐以及炀帝即位以后加剧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②。王大华《论隋唐时期东西地主集团之关系》认为隋朝治国不公，关陇集团敌视关东集团，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③。韩昇则在《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一文中指出：隋是长期分裂之后完成统一的，且又是通过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取政权的，所以，确认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并未成为

---

① 《学术月刊》1991年4期。
② 《历史教学》1965年12期。
③ 《史学月刊》1991年6期。

社会群众的一般心理，尤其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少人认为隋朝是篡周而立的，当他们的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就相互勾结，反对隋政权。而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南人，引起北方权贵的不满和反抗，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南北朝臣的对立和斗争，则加速了隋朝的灭亡①。何德章也认为，原因在文帝和炀帝，都未能将政权向各方人士公正地开放，政治的统一没有建立在各方上层人物同心同德的基础上②。

2. **阶级矛盾主因说**。晏金铭认为隋祚之所以短暂，归根结蒂在于腐朽的门阀士族统治，尤其是杨广，为腐败势力的代表③。赵云旗在《论隋代速亡的原因》一文中提出"隋代由于没有经过农民大起义的冲刷洗涤，从建立起就存在许多待发已久的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隋文帝末年，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危亡之势业已出现。隋王朝已经走上了难以挽回的下坡路。""至隋炀帝时，其剥削奴役，严刑酷法又进一步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宣告了隋代的结束④。"

3. **国富导致速亡说**。魏承思在《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一文中就隋代的殷富与速亡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认为隋代启于文帝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实行了重征赋役、积粮于官、检括户口、输籍定样等措施，这些措施全然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尖锐化，其中尤以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阶级、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两大矛盾的夹击下，隋王朝的灭亡乃是必然的结局。所

① 《厦门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② 《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力》，《武汉大学学报》1994 年 1 期。
③ 《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论隋亡"起自高祖，成于炀帝"》，《学术月刊》1981 年 2 期。
④ 《晋阳学刊》1984 年 6 期。

以他认为，隋代经济政策既是致富之因，又是乱亡之源①。

4. **暴政破坏社会生产力说**。倪正太认为暴政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②。

5. **"用兵高丽致亡"说**。韩乐学认为隋炀帝三次用兵高丽，使全国骚动，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遍及京畿及关西、河北、山东、长江流域、岭南各地。这是炀帝的最大失策，也是隋王朝灭亡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③。

（二）对隋炀帝的整体评价

1959 年万绳楠从统一、巩固边防、开大运河、减轻农民负担、营建洛阳、创制我国封建时代最轻的法律大业律、创立科举考试制度、发展中外关系等多方面肯定隋炀帝④。这在当时曾引起不同看法。

80 年代后，不少人对隋炀帝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的研究逐渐重视了起来，形成了隋炀帝评价中的一种新潮流。如胡戟认为炀帝西巡等一系列国事活动，无不具有建设和发展统一国家的历史内容，他是个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⑤。韩乐学认为隋炀帝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他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不应全盘否定。他威令在己，令行禁止，不失为一代之雄。又笃学博识、多才多艺，乃绝世才子⑥。韩隆福在《论隋炀帝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则认为"他是一位同秦始皇、汉武帝一样的具有

---

① 《历史教学问题》，1985 年 3 期。

② 《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 1 期。

③ 《试评隋炀帝》，《西北师院学报》1985 年 4 期。

④ 《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 年 9 期。

⑤ 《炀帝西巡》，《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⑥ 《西北师院学报》1985 年 4 期。

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韩文并进一步分析了炀帝的所作所为，指出其即位后迅速把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极峰，顺应了历史潮流①。武伯纶也认为"隋炀帝的一生中，作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经济发展的事业，对促进历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当然，他也作了一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痛苦的事情。"②

（三）怎样看待隋炀帝的"暴政"

隋炀帝在位时期，用民力过度，又严刑待下，乃是不争的事实，旧史多斥之为暴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意见较为纷歧。韩乐学认为隋炀帝不恤民命，连年用兵，频兴大役，乃是"不能冷静从事"的结果，而这与他出身地位和文才武功又是联系着的③。黄惠贤在《略论隋炀帝之暴政》一文中则认为"炀帝之暴政为行非常之制的典型，而其颁布之常规赋役、明文法典，较之其父隋文帝却是更为轻缓。""炀帝之暴政，不在于常制、常典之轻重，而在于炀帝及其统治集团，蓄意破坏法制，强征非常之赋、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残害百姓④。"

（四）隋炀帝为何营建东都

营建东都，乃旧史所谓炀帝暴政之一。如何看待这件事，自然与评价隋炀帝有较大关系。韩隆福认为隋炀帝营建东都既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又繁荣了洛阳，同时，加强了对关东和江南的控制，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形成了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⑤。而

---

① 《安徽史学》1986年3期。
② 《略论隋炀帝及其葬地》，《文博》1992年5期。
③ 《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4期。
④ 《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4期。
⑤ 《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4期。

童毅之则从打击山东士族、维护隋王朝的统治这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为了更好地控制山东及江南地区以稳固隋王朝的统治基础，隋炀帝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下令在得土之中的洛阳建都，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①。伯岳从古都学的角度对东都的营建作了探讨，认为隋炀帝建东都洛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并具体分析了这种必然性的表现，指出这是经济重心南移但政治中心未随之南移，而隋炀帝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控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②。高敏则认为隋炀帝迁都洛阳一事，并非全出于荒淫逸乐，而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还对《隋书》、《元和郡县图志》及《通鉴·隋纪》三书有关炀帝迁都洛阳原因的记载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隋书》、《元和郡县图志》保留的原始材料比较符合实际，而司马光为了突出炀帝的荒淫暴虐，以野史《大业杂记》一家之说立论，把炀帝迷信谶纬作为其迁都的主要动因，“其取舍史实之不当和用意之偏颇，灼然可见”③。

近年面世的三本隋炀帝传记，有助于研究的深入④。

三、隋末农民起义

隋末农民起义的研究热潮，兴起于 1953 年以后，主要围绕王丹岑所著《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书有关隋末部分展开讨论。由于

---

① 《隋炀帝营建东都与山东士族》，《历史教学》1987 年 3 期。

② 《隋炀帝为何营建东都洛阳》，《西北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③ 《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魏晋隋唐史论集》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④ 韩隆福《隋炀帝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胡沧泽《隋炀帝传》，台湾国际文化社，1993 年版。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隋末农民起义的内容较为丰富且又十分复杂，所以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多次掀起讨论高潮。综括言之，其讨论的主要问题，大致集中在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李密评价等几个方面。

（一）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旧史多强调天灾与人祸，天灾者，水、旱之谓；人祸者，炀帝之暴。故邓之诚说隋末农民起义“为天灾人祸所迫，故揭竿而起。”① 解放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习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的基础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对隋末农民起义作了新的分析，在隋末农民战争起因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对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实际上是与隋亡原因的分析密切相关的。本章第二部分“隋炀帝评价与隋亡原因分析”中讨论隋亡原因的诸家之说，可以视为分析隋末农民起义原因的部分观点。讨论隋末农民起义原因的观点虽然较多，但认真分析起来，各种观点的砝码，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偏重。一种观点特别强调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演变与激化，以此作为触发阶级矛盾、触发隋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②。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并不同意前述观点，他们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引起隋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因而，他们也就十分重视对隋炀帝暴政的揭露，重视隋炀帝的暴政与阶级矛盾

---

① 《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3第72页。

② 参见陈国灿《隋代的社会阶级矛盾与隋末农民起义诸特点的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7月19日；高敏《关于隋末地主起兵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8月6日。

激化之间关系的研究①。由于这部分研究者并不认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们也就否认地主阶级内不同阶层或集团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的说法。王仲荦认为，在隋末，不但整个地主阶级是站在反对农民军的立场上；就是个别慑于农民军威力而暂时归附农民军的地主分子，他们也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瓦解农民军，作为新贵姿态来出现，并没有真正在想反隋。所以有人说隋末地主阶级也是站在农民军一边来反隋，这是不从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的方面看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②。正是在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上，引发出隋末农民起义研究中又一个颇为热闹的讨论课题，即李密的评价问题。

（二）关于李密的评价

李密出身世家大族，并以贵族身份参加杨玄感的起兵反隋，后又参加并领导了瓦岗军的反隋斗争，最终以失败降唐又叛唐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李密的出身及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末地主阶级与农民大起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也就成为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们热烈争论的一个人物。对李密的评价，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一，李密是否投机革命？其二，李密在参加农民起义之后，是出卖了起义的成果，成为革命的叛徒，还是对农民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李密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李密之所以参加农民起义军，是半路出家，动机不纯的，他是用欺骗手段钻入农民革命队伍的阴谋家，瓦岗军的被出卖与破坏，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因而否定了李密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将他斥之为"革命的

① 参见王仲荦《谈隋末农民战争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史哲》1963年4期；倪正泰《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② 《文史哲》1963年4期。

叛徒"、"投机分子"①。持肯定意见的人则认为"只看李密的出身、成份，不看李密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深刻的变化，这在方法论上说，完全是唯成份论的。因此，绝不能从李密的出身、成份，就忽视了他的实际活动，以至抹煞了他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②。臧嵘重点对李密投机瓦岗军的说法作了辩驳，他认为李密之所以能投身农民反隋武装斗争，一是他在杨玄感起兵失败后三年的流浪生活经历；二是隋王朝对杨玄感余党斩尽杀绝血腥政策的迫使③。胡如雷在分析李密率瓦岗军归顺李唐一事时指出"李密始终对瓦岗军没有二心，群众对他是拥戴的。李密提出西归李唐的主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同，既然此举没有违逆农民军的愿望，又非向素来的敌人屈膝，根本不牵涉气节问题，那就无法据此把李密说成叛徒。"④从对李密问题讨论的过程看，五、六十年代肯定李密与否定李密的观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一次讨论高潮掀起时，则肯定的观点占了上风。1969年卫河清淤时在浚县城关发现的《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君之墓铭》，与传世文献中李密墓志铭的文字有不少差异，引起研究者的关注⑤，汤开建介绍了《壶关录》对研究李密的重要价值⑥。

（三）对隋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评价

隋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评价，牵涉到如何看待唐初经济繁

---

①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年版；孙达人《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思想战线》1978年2期；段文渊《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

② 方若生《论李密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教学》1954年第3期。

③ 《李密投机瓦岗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3期。

④ 《略论李密》，《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4期。

⑤ 《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⑥ 《唐韩筀〈壶关录〉之史料价值》，《暨南学报》1992年3期。

荣的原因，如何看待贞观之治的出现等问题，实际上是同"让步政策"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上构成了如下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

1. 隋末农民起义局部改善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陈国灿认为，从此徭役地租的剥削形态不再在封建剥削中占重要地位①。翁大草认为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的唐初的均田制事实上和隋末的均田制大有区别，主要的是狭乡和宽乡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了，而且通过参军、起义、离散、逃亡，贵族、地主、富豪所占有的大量奴婢，等到安定下来都恢复了农民身份。这就是隋末农民起义局部地改善了隋末的生产关系，促使贞观以后的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内容，所以我们说"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起义的结果②。朱伯康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造成了生产关系的新变动，农民享受战争后所带来的一些利益，增加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③。

2. 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说。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直接作用是推翻隋炀帝的统治，打击士族势力，部分改造了陈腐的生产关系，间接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暂时减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④。

3. 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通过让步政策而体现说。倪正泰认为让步政策是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在统治阶级政策上的折现，唐太宗亲见隋的灭亡，取为前车之鉴，这是他能够对农民实行

---

① 《隋代的社会矛盾与隋末农民起义诸特点的关系》，《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② 《论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起义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2期。

③ 《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④ 《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4期。

一些让步并最终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既然唐初"让步政策"是隋末农民战争的直接结果，那么，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①。

四、李渊、李建成评价与玄武门之变

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旧史历来采取贬低的态度，而近代史家在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牵涉到几个问题，如李渊、李建成在创立唐朝，统一全国中的作用；李渊、李建成的政治倾向及阶级属性；如何看待玄武门之变等等。

（一）晋阳首谋者是谁。

据两《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晋阳起兵由李世民一手策划，李渊被迫接受而坐享其成。后人多据此贬低李渊在创唐中的作用。如范文澜认为李渊在晋阳起兵前未曾有过反隋的想法，积极准备起兵者是李世民和刘文静②。吕思勉也认为李世民与刘文静等人才是晋阳起兵的暗中组织者，而李渊在谋举大事已决时尚"未之知"③，因而，对晋阳首谋者究竟是否即为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的研究，也就关系到对李渊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较早提出疑议的是汪籛。汪籛《唐太宗》一文中有一节专门研究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他认为旧史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成太宗的精心策划，高祖则处于被动地位，是完全不足为信的，这是贞观史臣为了证明唐太宗继位的合法性而修改国史的结果。汪籛认为李渊早有叛隋之心，晋

---

① 《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1期。

② 《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编第1册第92页。

③ 《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

阳起兵的前后过程都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而李世民只不过是在李渊的授意之下在组织起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①。八十年代后，不少研究者纷纷撰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多数意见基本上与汪篯的观点相同②。所以，李渊作为起兵反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个事实，已经无庸置疑，可以视为定论了。贺润坤则进一步肯定李渊重用隋旧官僚对建唐和巩固唐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认为仕唐隋旧官僚阶层腐朽，纯属误说③。

（二）玄武门之变的性质

玄武门之变究竟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之争的结果，还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士庶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个问题在研究者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吴泽、袁英光先生认为"玄武门之变表面看来，如历来的旧史家所说是李氏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实质上，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两大阶层势力的矛盾斗争，是两大阶层的官僚集团势力争夺国家政权的领导权的矛盾斗争。斗争结果，前者代表隋代以来新兴地主政权历史发展方向的李世民取得胜利，代表旧世族政权的李渊、李建成遭受了失败。"④ 韩国磐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唐高祖和李建成、李元吉比较保守，李世民比较勇于改革，因此，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⑤。总之，六十年代时期，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看成一场政治斗争的观点成为主流。然而，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较多地着眼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分析，认为这是一

① 汪篯《唐太宗》一文1961年曾在中央党校内印发过，后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公开发表。
② 参见本书本索引所附李秀平、徐连达、牛致功等人的文章。
③ 《青海大学学报》1992年3期。
④ 《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2期。
⑤ 《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册93页。

场宫廷政变。如汪篯在《唐太宗》一文中提出"玄武门事变完全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李世民在唐室进行的统一战争中树立了很大的功勋，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的支配下，他就免不了要产生夺取皇位的贪欲，这样他就必然要设法除掉李建成；纵使退一步说，他并不想杀建成，但是他不能没有'功高不赏'的顾虑，不能不害怕受到建成的疑忌而终于被杀。反过来，对于建成说，也有同样的情形。"八十年代以后，赞同这种观点的文章发表了许多，不少研究者在深入研究玄武门事变后，又提出许多看法，宋家钰认为玄武门之变与封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没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看不出什么民主思想、进步倾向战胜专制思想、腐朽倾向的必然性的历史趋势①。牛致功在肯定玄武门事变为宫廷政变同时，又指出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李渊暗中采取了支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太子地位的措施，"他的基本态度，是想让李世民代替李建成。不过，他又不愿让李世民借他之手去杀害李建成，而是放手地让双方互争高低，致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持和拥护"，而且认为玄武门之变以后唐高祖的让位"看来是消极的行动，实际上起了积极的作用"②。郑宝琦则认为事变是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矛盾的总爆发③。程宗才也认为政变的实质是向高祖夺权④。

（三）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

随着对唐初政治研究的深入，旧史贬低李渊、李建成的传统之论逐渐被抛弃，研究者们开始实事求是地评价李渊、李建成。如袁

---

① 《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62年10期。
② 牛致功《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析》，《人文杂志》1980年6期。
③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文史哲》1988年4期。
④ 《"玄武门之变"新探》，《人文杂志》1991年3期。

英光、王界云认为李渊不是平庸的胸无谋略之辈，而是一个办事干练、经验丰富的人①。徐连达、仲富兰也认为李渊是“一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早有四方之志的人物”②。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牛致功，他认为李渊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任人摆布者，而是既有政治本领，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③。此外如胡戟、胡乐认为“唐高祖为人深沉有谋，又是文武全才，他谨慎地抉择晋阳起兵时机，在群雄逐鹿中轻取天下，开国后又确立适用于整个唐前期的基本制度，为李世民的统治打下了基础”④。汪篯在《唐太宗》一文中则对李建成作了公允的评价，认为“从史料透露出来的情形看，李建成为人宽简，仁厚，很有政治才干，也有军事才能。他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巨大的作用，后宫、外廷和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拥护他的人。他收罗在自己的周围的东宫官属，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很有政治见解和政治才能，这些人在以后的‘贞观之治’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贺润坤也认为李建成参与太原起兵密谋，建唐军功大于李世民，武德年间以太子佐理政务参与决策功不可没⑤。简而言之，在对李渊、李建成的评价中，关键的问题是要摆脱唐太宗李世民头上神圣光环对他们的影响，清除旧史中的陈词滥调，从史料中发现新的材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

① 《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② 《复旦学报》1981年2期。

③ 《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试析玄武门之变的背景内幕》，《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论李建成在建唐中的历史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1期。

五、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贞观时期是封建社会有名的盛世。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研究，早在五代时期就开始了，宋明以来，迄未间断。但旧史家们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对唐太宗个人品质才干的评价和就事论事地评价贞观政事的得失上。50年代后，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进行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开拓了很多前人从未涉及的新方面，使之成为唐史研究领域中研究较多并取得一定进展的问题之一。

建国后对唐太宗的评价，不仅研究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作用，也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不仅有全面评价，也有对他的纳谏、用人、执法及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总的看来，史家对唐太宗的评价基本一致，都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其历史功绩应予肯定，也都指出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唐太宗也犯有一些罪过和错误，分歧只是出现在对他的功过估价程度以及某些具体问题上。对贞观之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形成的原因和取得的成就上。一般认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隋末农民战争直接调整了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再就是隋末农民战争推动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一些适应生产发展、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研究者们对这两方面的原因各有侧重，但基本都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只是在作用大小和有无让步政策上有一定的分歧。近年来，有的同志进一步提出：农民战争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而广大农民在战后努力参加生产才是创造贞观盛世的根本原因。至于贞观时期取得的

成就，史家意见基本一致，都取肯定态度[1]。具体意见如赵克尧、许道勋指出："贞观之治出现了一代守法之风，贞观君臣比较恰当地处理了皇权与法律以及人情干涉法律的矛盾。"[2]

近年来，有关唐太宗的传记著作，已出了袁英光、王界云的《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赵克尧、许道勋的《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黄永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 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五本，论文不下一百余篇。其研究概况及主要论点，除上述简要的综括外，涉及到贞观之治的成因，可参见本章第四部分；涉及晋阳首谋、玄武门之变的，可参见本章第五部分；其余涉及唐太宗及贞观之治评价的，因大多数观点大同小异，故不一一介绍，可参见书末所附索引中的文章及《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六、武则天评价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不仅是唐史学界研究、讨论的热门人物，也是中国史研究中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的论说，甚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旧史及旧小说中常将武则天描绘得"阴鸷好杀"、"残暴荒淫"，但也有不少史家对她的胆识、智慧多所赞誉。不过，旧史中的评价，总离不开封建的道德标准，多从个人品质着眼。二十世纪以来，对武则天的评价，开始注重将她的所作所为同她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唐代统治阶级内各集团间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将武则天研究逐渐深化了。陈寅

---

① 上述评说节录自《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前言"。

② 《贞观法制初探》，《史学月刊》1981 年 4 期。

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一说，并将武则天以周代唐视为唐代统治阶级内部山东代替关陇集团的斗争，而且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后，围绕武则天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掀起过一次讨论的热潮，特别是郭沫若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他所作的剧本《武则天》，为武则天全面翻案，使讨论达到了新的高潮。十年动乱时期，武则天被捧上了天，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在武则天的评价上又一次展开激烈争论。

（一）武则天的政治倾向

武则天代表什么政治势力，她上台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上台后的政治倾向又如何？这是武则天研究中纷争较多的一个问题。陈寅恪的观点是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之一。他认为武则天的上台“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武则天在山东集团的支持下夺取了统治权。陈寅恪又从婚姻关系的分析入手，指出“武后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之故，盖混合李武两家为一体”①。陈寅恪分析武则天的政治势力，着重于不同婚姻地域集团间的倾轧。黄永年的论文在分析武则天称帝至太平公主覆灭这段时间内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时，提出当时中央统治集团的特征是“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畸形政权”，并名之为“李武政权”②。

胡如雷在《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针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武则天代表了新兴的中小地主集团的利益，在与大官僚贵族集团斗争中掌握了政权，并严重打击了大官僚

---

① 《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 年 1 期。

② 《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 年 1 期。

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唐代李武集团的斗争，并不是不同地域婚姻集团间的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集团与大官僚贵族集团间的矛盾表现①。这种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斗争的角度分析武则天的政治势力的看法，经吴泽的论述，在五、六十年代成为有影响的又一派观点。吴泽认为武则天的上台，是唐太宗、唐高宗以来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反旧贵族官僚集团斗争的继续。武则天上台后，在“许敬宗、李义府等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势力的支持下，一面积极发展科举制度，并用员外同正官等办法，援引大量新兴地主参加政权，扩大新政权的基础；一面先后贬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柳奭等元老勋贵，并‘大义灭亲’，废杀了走旧贵族道路的皇太子李忠、李贤，给元老勋贵官僚集团以沉重的打击。”② 李彦国在《武周的社会基础研究》中则提出了又一种看法，他认为“武周政权，并不纯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之中，还包含着商人集团及城市劳动者的政治内容，虽然后者的地位远逊于前者，但作为一种政治实力来讲，它毕竟露出了自己峥嵘的头角。”③

上述诸家观点，无论他们具体分析有何不同，但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把武则天看成唐新兴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她所打击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然而，到了1978年时，熊德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全盘否认了已有之说，将武则天划为士族政治势力的代表。他在《武则天的真面目》一文中认为，“武则天及其建立的集团也只是唐初的士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她的理由是从家族出身看，武则天的家庭成份已不是庶族寒门，而是士族中的新门

---

① 《历史研究》1955年1期。

② 《论唐代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阶级斗争》，《新建设》1962年1期。

③ 《唐史‘武周革命’试探》，《人文杂志》1958年1期。

了；从阶级立场和思想倾向看，她也是士族高门的典型，门阀观念极浓，因而对庶族寒门竭力压制；她之所以登上女皇宝座，主要是依靠了士族地主作为社会基础，并依靠宫廷奸党达到了目的，而这个宫廷奸党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士族高门，少数鹰犬虽出身庶族但思想也倾向于士族高门①。魏良弢也著文赞同熊德基的观点②。这样，就形成了与通行看法相对立的另一派观点。

（二）武则天的历史作用

建国以后，对武则天历史作用的评价，持肯定意见的占多数，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尚钺、杨志玖、吴枫、韩国磐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武则天的历史作用都作了肯定的评价。也有少数人持全盘否定的观点。如吕思勉、岑仲勉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即对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作了否定的评价。

持肯定意见者如吴泽认为“武则天当政时，继续坚持太宗的政治道路，对旧贵族官僚集团势力进行猛烈的斗争，获得巨大胜利，稳固并发展了贞观以来的新兴地主政权。武则天称帝后，仍然继承太宗、高宗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劝农桑、薄赋徭、缩小战争范围，防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恶化，对唐代社会经济起着积极作用；为其后玄宗‘开元之治’的新兴地主政权奠定了基础。武则天在唐代社会历史中所起的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武则天是我国唐代前期一位杰出的封建女政治家”③。

持否定意见者如熊德基、魏良弢则认为武则天在位期间在政治上任人唯亲，纵容奸党贪污卖官，使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由于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人民大量流亡，均田制破坏加速，如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② 《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1～2期。

③ 《新建设》1962年1期。

封禅、建明堂、铸九鼎、造天枢、广建佛寺、修造佛像等，加以对民族矛盾处理失当造成连年征战，军事费用和远道转运耗费了人民大量的血汗，造成财政危机；思想上利用宗教迷信愚弄人民，大力发展佛教，因而，在她统治的五十多年中，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正因为如此，唐朝全盛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三五十年①。陆庆夫特别强调武则天放手招官造成官制混乱，开启了冗官政治的先河②。

还有一种意见则是对武则天作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武则天这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可以肯定的东西，同时也有应该否定的东西"，认为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沿着贞观以来的趋势前进的，但其速度不及贞观和稍后的开元。这是和她的种种倒行逆施分不开的。阶级矛盾有所发展，但总的情况看并非斗争高潮。所以"对武则天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③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武则天"上法下道"，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实行法家的严刑重罚路线，对下层社会和普通百姓基本上实行"无为"政治④。

（三）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

武则天出生地问题，也是武则天研究中争论十分热烈而迄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至今有三种影响较大的说法：

1. 山西文水说。持此说者有罗元贞⑤，吕振羽等人⑥。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创刊号；《新疆大学学报》1979 年 1～2 期。
② 《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兰州大学学报》1990 年 3 期。
③ 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 年 8 期。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 1 期。
⑤ 《武则天批判》，《光明日报》1951 年 9 月 22 日。
⑥ 《关于武则天、《史论集》，三联书店，1960 年版。

2. 四川广元说。持此说者主要为郭沫若①。

3. 陕西长安说。持此说者有汪籛等人②。

武则天的出生地之所以会引起较大的争论，除了史料记载确有歧义外，还因为当初在讨论武则天的政治倾向中，不恰当地将其出生地与其社会基础、政治倾向联系了起来，似乎武则天出生于西南地区就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有关武则天的研究，近年有多本传记面世，可以参看③。

七、唐玄宗与开天盛世

唐玄宗是唐史上有名的一代君主，开元、天宝时期也是唐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然而，过去专门研究和讨论唐玄宗与开天之治的文章并不算多，研究的成果较少，与唐史学界在唐太宗、武则天研究方面的成果相较，显得较为单薄，因而，成为唐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一。近几年来，这一局面正得到逐步的改变。尤其是袁英光、王界云合著的《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阎守诚、吴宗国的《唐玄宗》(三秦出版社，1989 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0 年)、田廷柱《唐明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和乌廷玉《唐玄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的出版，为唐玄宗研究的深入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

① 《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 年 9 月 26 日。

② 《武则天》，《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 年版。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郁贤皓、方义兵《女皇帝武则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何磊《武则天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杨剑虹《武则天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 年版。

（一）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唐玄宗即位不久，改年号为“开元”，在他统治的前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明显的发展，被史家誉为“开元之治”，或将天宝年间也扩大进来，艳称为“开天盛世”。这段时期，的确是唐代社会发展的高峰阶段。为什么在经过武周政权的强烈震荡和一系列宫庭政变的刀光剑影以后，唐代历史会很快地进入了它的强盛期？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从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角度对此问题作了基本的解释。他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封建经济和文化的确是发达和繁荣的。但这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成果，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发展所积累的成果，绝对不是唐玄宗君臣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自然，这里并非否定当时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改革。”① 也有一些学者对唐玄宗在位初期的一系列改革作了分析，较为注重这些改革与开元之治的关系。如乌廷玉认为唐玄宗即位前，由于武周末期和中、睿宗时期的腐朽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经过唐玄宗的一系改革，各种矛盾得以缓解，生产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才出现了开元之治②。袁英光、王界云则认为“唐初近百年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勃兴的势头，在神龙前后动荡的局面下，被阻扼了，历史面临着倒退的危险。唐玄宗击败腐朽势力，重建李家王朝的成功之举，以及随之而实行的开元改革，使动荡不安的社会，重新恢复了平静，而政治上的安定局面，保证了经济、文化勃兴的势头，使其得以充分发展。”③ 谭英华则认为开元之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继武、韦统治时期的动乱后，民心思定、

---

① 见该书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8 页。

②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1 期。

③ 《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唐史学会论文集》。

民心思治。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适应时代需要，推行安定政局，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方针，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从而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了唐王朝的第二个盛世①。

（二）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原因

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原因，显然是一更为复杂和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重视不够。这里介绍李必忠与徐连达、乌廷玉等人的观点。

李必忠在分析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时，着重分析了唐玄宗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情况，他认为阶级矛盾更趋严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扩大实酝酿于玄宗在位时期。假如没有这些矛盾的发展，单纯一次安史之乱是不会造成唐王朝骤然由盛而衰的。因而，上述三种社会矛盾的发展，是引起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他并且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间的影响，指出在这三种矛盾中，对唐王朝由盛而衰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理由是"因为当时影响唐朝国力转弱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在中央朝廷，主要是宦官的专权和依附于宦官中不同派系的外廷官僚集团的党争；但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在地方则是藩镇割据势力的发展，特别是河北藩镇的骄横跋扈。宦官与方镇二者又互相勾结，遂使唐朝的中央集权的力量江河日下。"② 徐连达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将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原因归结为四条：第一，官僚机构庞大，官俸日高；第二，军队人数众多，军费增加；第三，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艰苦；

---

① 《论开元之治》，《社会科学研究》1980 年 3 期。

② 《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唐史论丛》第 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第四，唐玄宗后期的昏庸①。乌廷玉则着重指出了唐玄宗时期小农经济的破坏在唐朝由盛转衰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唐朝由兴盛走向衰败，主要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基础——小农经济破坏的结果。当然，唐玄宗晚年政治腐败，放弃政治改革，也使唐朝陷于贫弱②。

此外，胡如雷用三段论更具体地说明开元之治与玄宗用人的关系，认为开元初期君子当权，小人失势；中期奸邪、忠贤并存；末期直臣失权而奸佞猖獗，"开元之治"在开元二十四年寿终正寝③。

（三）对唐玄宗的评价

近代史家对唐玄宗的评价，大体上是有毁有誉的。有些人强调他腐败的地方多一些，如吕思勉认为玄宗不能拨乱反正，"彼其放纵淫乱之习，一切无异于前人，特即位之初，承极乱之后，不得不稍事整顿耳。积习既深，终难自拔，则阅时不久，复蹈前人之覆辙矣"④。大多数评价则毁誉参半，如范文澜认为"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施行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的昏君。"⑤ 李必忠认为"唐玄宗在前期是一个较好的皇帝，能够'留心理道，革去弊讹'，后期'欲高居无为'，以致政事荒

---

① 《开元天宝时期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文汇报》1980 年 10 月 20 日。
②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1 期。
③ 《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 年 1 期。
④ 《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上册第 174 页。
⑤ 《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 122 页。

息，豪奢腐朽。"① 袁英光、王界云也认为"唐明皇的时代正处于封建盛世，他个人又有文韬武略，因而建立了功业，出现了所谓'开元之治'和'开天盛世'。但是，随着天下太平，府库丰盈，加上在位岁久，年事渐高，使得这位'明皇不明，日益骄惰'，尤其是晚年又得爱妃杨玉环，更使他无论在物质上、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不再励精图治了。"② 乌廷玉则对唐玄宗作了基本的肯定。他认为唐玄宗即位后，拔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为宰相，励行法治、赏罚严明、裁抑兼并、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改革的结果，挽救了财政危机，巩固了边区，收复了失地，促进全国统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唐玄宗主要的历史功绩。唐玄宗是有作为的政治家③。

八、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一)安史之乱

唐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较为分歧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的乱因方面的研究。安史之乱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经济背景，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玄宗朝盛转衰的原因；一是引发安史之乱的直接因素。这里所讨论的乱因，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乱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历来受史家的重视，虽然专文论述安史之乱起因的文章并不多见，但在各种著述中分析和提到安史之乱乱因的文字却不少，而且观点也很多，大致说来，传统的观点提到的乱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① 《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唐史学会论文集》。
② 《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前言"。
③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1 期。

(1)唐玄宗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酿成了安史之乱；

(2)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引起了安史之乱，这种斗争表现在设立藩镇、重用蕃将、溺惑宠嬖等方面。

(3)唐玄宗对藩镇势力过于信任，毫无警惕，招致大祸。

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有一些新观点的出现，如高世瑜认为，这场战乱既不是民族矛盾尖锐的结果，也不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所致，是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朝廷虚弱，又给安提供了叛乱的可乘之机①。阎守诚赞成这一强调战乱突发性的解释，并进而分析安禄山为什么能手握重兵，认为是军事体制变革的结果，边防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和重用，导致安禄山造反的野心②。唐华全则认为安禄山是在李林甫拉拢和指使下势力膨胀，企图在唐玄宗死后以武力推翻太子李亨的一个配角③。吴宗国著文对已往讨论安史之乱的乱因时将责任推卸到权相李林甫、杨国忠身上的提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唐玄宗之所以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完全是由于他们能积极执行唐玄宗的加强对农民剥削和扩大对各族战争的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使得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了起来，终于导致安禄山的叛乱。因而，吴宗国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完全是由于“置相非其人”的结果，根源在于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没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制定正确的方针④。黄新亚则对“昏君奸相”的陈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误解了唐廷与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他对玄宗的削藩措施作了分析，认为面对崛起的强藩，

① 《西安访古话玄宗》，《晋秦豫访古》。

② 《唐玄宗与开天盛世》，《晋阳学刊》1990年4期。

③ 《试论安禄山势力的发展壮大》，《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

④ 《“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1期。

玄宗并非毫无顾忌，对安禄山也不能说毫无警惕，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他只能用传统的御臣之术驾驭边将，再通过各镇蕃将控制各地的镇军。因而，无力制止必然到来的灾难的发生①。曹旅宁认为安史之乱用河朔胡化为原因解释不通，著文分析陈寅恪论点的未谛之处②。芮传明则以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提出这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表现③。朱迪光著文《论安史叛军对唐西北的争夺》，分析叛军在西北方向上千方百计的努力未能成功，以致覆亡④。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以后出现的藩镇割据，是中古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少文章。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三省堂，1946）是较早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述性著作。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用丰富的图表与统计资料研究了唐代藩镇对中央的关系。近年来有张国刚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综观研究的基本情况，大致说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

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如果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上探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是第一位的，有人则认为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以经济原因为主的代表如韩国磐认为形成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方面，首先是藩镇节度使为了保持和巩固本镇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利

---

①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 年 3 期。
②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系辩证》，《青海社会科学》1990 年 3 期。
③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 年 3 期。
④ 《青海社会科学》1993 年 2 期。

益，其次是藩帅独占本镇的财富，加上安史乱前节度使的权力日重，安史乱后莫不竞拥重兵，使得割据之局既成后，还日甚一日。其次才是军事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府兵制破坏后，节度使所统率者，悉皆召募的职业兵，将得以专兵；安史乱后，节度使多拥有强大兵力，以牙兵最著[①]。傅玫不同意上述观点，她认为把藩镇割据的出现归结到均田制破坏以后庄园制度的发展上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她认为藩镇割据是在唐中央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全面削弱的情况下，以府兵制的破坏和边兵之重的形成为起点，由地方权力的扩大造成的。政治和军事的因素对藩镇割据的形成起了决定的作用[②]。在探讨藩镇形成的具体原因时，岑仲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肃、代昏暗，辅导无谋"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的直接原因。如河朔三镇的怙恶，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表现在宰相无谋、将帅失策、计臣短视、宦官误事等方面[③]。近年来随着对藩镇问题研究热的兴起，对藩镇割据局面的成因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张国刚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诚然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其时唐王朝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重心的转移、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保持地方军阀之间势力平衡的需要等实际因素也未可忽视。他认为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让位于它与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廷与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它在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这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河朔藩镇割据和天下藩镇林

① 《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历史教学》1958 年 8 期。

②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历史教学》1965 年 2 期。

③ 《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版第 263～272 页。

立局面形成有重大的意义①。方积六则以河朔三镇长期割据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典型，探讨了河朔三镇能够长期割据的原因。他从军事、经济、政治、历史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入手，指出河朔三镇兵多马壮，共同作战，多次打败唐军进攻，是能够坚持长期割据的关键。此外河朔三镇能够长期割据的经济原因是唐后期该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能够满足地方政权实现割据的物资需要；政治原因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重削弱了本身的力量；河朔三镇官僚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强的统治；坚决要求维护他们的政治特权。此外，河朔地区历史悠久的习武风尚及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融洽，增强了它的政治、军事势力，有利于分裂割据者进行反抗唐王朝的斗争②。

2. **藩镇割据的基础**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传统的观点可以韩国磐的意见为代表，他认为藩镇割据的基础是封建大土地所有者，而节度使及其僚属部将就是大庄园主或田庄主，也即大土地所有者。为了维护本镇庄园主的利益，他们割据一方，对抗中央政府③。近年来，随着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袁英光除了赞同韩国磐的观点外，还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藩镇割据者之所以出现，除了有其可以凭借的经济条件外(如河北地区物产的丰富等)，还必须有其它条件的配合。其主要条件是大地主经济与军阀势力的结合。袁英光将大地主经济与军阀势力的结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节度使本身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另一种情况是大地主分子与藩镇势力相结合，为藩镇势力服

---

① 《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南开学报》1982年6期。

② 《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

③ 《隋唐五代史纲》第268页。

务。他认为大地主势力与军阀势力相结合，遂成为藩镇割据的阶级基础①。杨志玖、张国刚著文认为不能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那些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并指出这主要是从割据现象本身的社会属性，从它能为哪些人带来经济实惠因而受到这些人支持来进行考察的②。黄新亚则认为藩镇割据的基础既非大土地所有者，又非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而是在地方军阀指挥下由东北少数民族任主力的军士③。除上述三说以外，还有两种观点也是近年来出现而值得重视的。一种观点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提出看法，认为唐代藩镇割据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之上的，氏族残余在藩镇割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藩镇的兴衰存变与唐代民族融合过程是一致的④。另一种观点则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看法，认为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势力大大增强，政府奉行抑商政策，始终拒绝满足商人的政治要求。而割据势力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人的利益，使商人的政治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都把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因此，当中央和地方发生矛盾冲突时，商人必然支持对中央政府的反叛，成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⑤。

在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上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显然与藩镇的类型较为复杂有关，所以，难以用某一种说法解释所有藩镇。

---

①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 年 6 期；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学术月刊》1982 年 6 期。

③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青海师院学报》1983 年 2 期。

④ 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 年 6 期。

⑤ 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学术月刊》1983 年 5 期。

3. 藩镇的类型及作用

长期以来，对唐代藩镇的研究，总是将唐代所有藩镇视为一体，均作为分裂割据的力量对待。近年来，不少研究者纷纷对此提出新的见解，并对藩镇的历史作用作了新的评价。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以唐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为核心，考察自唐睿宗景云二年至唐亡期间，每一时期每一地区的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及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作者对大量史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与统计之后，发现一般人印象中的藩镇跋扈实际上应指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唐僖宗以后）和特定地区（如河北三镇）的藩镇，而大部时间和地区的藩镇对中央保持恭顺的态度。唐末的强藩跋扈固然是衰唐、亡唐的原因，许多祸乱亦因藩镇引起，但唐末以前恭顺藩镇对平定祸乱，维持李唐王朝亦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注重统计、图表丰富为该书一大特征，特别是占该书篇幅之半长达五百余页的《唐代藩镇总表》，多处补正了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张国刚在他的论著中，将唐代藩镇分成了四种类型，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他认为在四种类型中除河朔型以外，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同时，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各类藩镇的特点及其在整个藩镇形势中的地位，认为纵观唐代后期的藩镇史，可以发现，表现得最突出最普遍而又最引人注目的主要并不是因为闹割据而反抗中央政府的斗争，而是频繁、激烈的藩镇动乱。他将藩镇动乱划为四种情形，即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并对动乱及其原因作了定量性的分析。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相统一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概视为割据；而河朔区域的割据又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割据绝对化①。在对藩镇作用的分析上，张国刚

---

① 《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4期。

则认为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从武力上巩固关中，而中原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河朔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镇与边疆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镇、东南镇与中原镇在武力与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密切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①。程志则进一步肯定了中唐藩镇对维系唐王朝生命的积极意义，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它听从或基本听从唐廷指挥，执行中央政令。它的存在，对于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安史乱后，李唐王朝正是通过藩镇实现其对地方的控制，保障中央王朝生存，维持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当然，藩镇又具有破坏中央集权的离心力，但在唐末农民战争以前，这种离心力不是藩镇的主导方面②。王援朝《唐代藩镇分类刍议》提出藩镇应该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等五种，并从多方面讨论了其形成原因③。

综观藩镇研究的概况，最近十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地深入了，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唐史研究中收获最多的领域之一。

九、牛李党争

自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以“党派分野”来分析和评论牛李党争后，唐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在众

---

①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文史知识》1986年9月。

②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

③ 《唐史论丛》5，三秦出版社，1990年。

多观点中，除岑仲勉等少数学者力主牛李党争之李非指李德裕外，其余大多数人在肯定牛李之争为牛僧孺、李宗闵之党与李德裕之党的斗争的前提下，在牛李之争的发端时间、斗争的焦点、社会基础以及评价等多方面各有所论，意见极不一致。下面首先介绍岑仲勉的观点。

岑仲勉在其著作中，曾专文力主李德裕无党的观点①。他认为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牛李之李原指李宗闵而非指李德裕，此"五代时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义，无如牛党之文人，好为谰言，施移花接木之计，把'李'字属之德裕，形成'牛'、'李'对立，藉以减少僧孺之过恶。后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岑仲勉并研究了元和三年对策案，认为当时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策文的矛头指向的不是宰相李吉甫，而是内官。故元和三年对策案不能构成牛李党争的重要公案。以此进一步证明李德裕无党的观点正确无误。唐长孺的《〈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指出皇甫湜与牛僧孺的策文主要不是以李吉甫为攻击对象②。赞同岑仲勉观点的文章还有如王炎平的《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③，但如卞孝萱，仍论证了李德裕有党④。

自陈寅恪提出"党派分野"为牛李之争的实质的观点后，韩国磐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论述，他认为牛指以牛僧孺为首的进士科出身的、代表庶族地主阶层的势力；李指以李德裕为首的依靠门第的、代表着士族门阀的势力。这一斗争，既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有改革的要求，而且首先由要求改革发生的。它的开端，起于元和三年的制科考试，而这次考试的去取，就表现了改革和保守的

---

①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年版，卷下唐史第 45 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

② 《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③ 《四川大学学报》1992 年 2 期。

④ 《"牛李党争"正名》，《中国史研究》1993 年 3 期。

斗争。至宣宗即位后，牛党胜利，李党完全失败，前后经过三十多年①。韩国磐将牛李之争解释成唐代中后期科举与门阀之争、庶族与士族之争、改革与保守之争的总结，这一观点在五、六十年代是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的。到了七十年代末，胡如雷著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遂又引发起一场研究牛李党争的热潮。这场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争的发端时间

牛李党争的发端，传统观点大多以为起于元和三年的对策案，近年来依然有人坚持此说②。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观点提出疑问，并提出了新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牛李党争起于元和十年，由李逢吉反削藩引起党争，而李逢吉实为牛党的第一个党魁，此点过去一直为人们所忽略③。另一种看法认为党争的发端起于长庆元年④。无论是持元和十年说，还是持长庆元年说的，在对元和三年案的看法上，都与前面所提及的岑仲勉的看法相同。

（二）牛李党争的焦点

传统的看法，党争的焦点在对待科举制的态度上。胡如雷则认为由于两党成员的身份、出身极其复杂，用双方对进士科的不同政策划分两党成员是非常牵强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认为两党争执的焦点是对藩镇叛乱持不同的态度；对于父死子继，以下叛上的藩帅，李党历来主张坚决打击，无情镇压；牛党则一贯

---

① 《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修订本，第 363～367 页。

② 见王西平《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1985 年 4 期。

③ 王炎平《牛李党争始因辨析》，《四川大学学报》1985 年 3 期；刘智亭《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1985 年 4 期。

④ 周建国《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3 年 6 期，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南开学报》1984 年 3 期。

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①。周建国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同意以科举制作为划分两党的标准的观点，也不同意以对待藩镇的态度作为划分两党标准的看法。他认为从政治主张上看，无论牛党或李党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纲领，在具体的施政措施上，两党内部也不是很一致的，往往夹杂着个人意气及人事纠葛。

（三）牛李党争的社会基础及其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牛党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官僚庶族地主阶级，李党的社会基础是士族地主阶级，因而往往扬牛抑李。胡如雷认为不然。他认为根据唐代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阶层是不妥当的，应当划分为如下三个阶层：公卿显宦集团，地主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李党则是公卿显宦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公卿显宦集团与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牛党的社会基础则是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这一阶层也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对牛党和李党的评价，也就基于他们对藩镇的态度。所以，李党的政策具有进步性，牛党的政策多具反动性。周建国则认为牛李两党的要人大率为公卿显宦，李党人数较少，一般是公卿中较为持正者，牛党人员众多，上自公卿显宦下至低级官吏色色皆有，成份比较复杂，不能说他们仅仅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所以，牛李党争既不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斗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三个阶层之间的斗争。在具体的施政措施上，虽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都毫无例外一致代表着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很少反映庶族地主的愿望。王西平认为牛党代表庶族地主是新兴势力，李党代表士族地主是没落势力的意见，是惑于某些表面现象，围绕进士科举利弊的争论，实与士庶

---

① 《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6期。

之争无关①。侯愚、吕增良也认为历代文人大多数把李德裕说成是代表反动势力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敢苟同。从其一生经历来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②。而王西平则坚持认为牛党大致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李党则代表了朝廷上层的保守思想③。

综观近年牛李党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尤其是在扬李抑牛的看法上许多人都有较一致的认识，与传统的曲李直牛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 年)以资料扎实、考订精审、见解精辟著称，其中对牛李党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炎平的新著《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则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见解，是近年研究牛李党争的重要成果。

十、唐末农民战争

唐末农民战争的研究，是解放以后唐史研究领域中一个较为热门的课题。在建国后出版的一些通史著作及几本隋唐五代史的专史著作中，都有不少篇幅论述唐末农民战争。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在不少问题上各家意见趋于一致，存有分歧的，主要集中在唐末农民战争均平口号的内容、王仙芝、黄巢乞降、伪降问题、黄巢之死等几个问题上。七、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外，从总体上看，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下面分几个方面介绍一下有关的研究概况。

---

① 《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② 《李德裕思想研究》，《河北师大学报》1987 年 2 期。

③ 《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1987 年 4 期。

（一）唐末农民起义提出“均平”口号的内容

五、六十年代一般认为王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黄巢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反映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平均主义的口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他们提出“均平”的含义，则是以均田为主要内容的。如侯外庐认为均平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农民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实质上是农民对所有权的普遍化的理想①。赖家度则认为黄巢军“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②，韩国磐认为“均平”等口号是在庄园发达、土地愈益集中下农民对均田均产的要求③。孙达人则认为唐末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均平”原则和土地、财产的分配之间一定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黄巢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它财产④。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均平”的内容提出了新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尽相合。王大华认为对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均平”不能人为的拔高，它带着苛税不均的时代烙印，实质上尚未脱离晏子均税思想的影响。其经济内容实为以夺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均产品分配权，对内是平等分配财产，对外是均贫富，并未涉及土地问题⑤。宋家钰认为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称号，主要反映了农民要求在贫富间真正按资产平均征收赋税、差发徭役的愿望，对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

---

① 《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 年 4 期。

② 《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 年 9 期。

③ 《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 年修订本第 407 页。

④ 《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光明日报》1961 年 4 月 12 日。

⑤ 《论平均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 2 期。

"均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均平占有土地的愿望,只不过这一点表现得比较模糊,不如平均赋役的要求明确。宋家钰还对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称号作了考证,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史颠倒、错讹、虚拟,因而这一称号乃是作者凭空杜撰的①。唐森认为体现于黄巢"均平"称号的平均主义,确实把广大破产流亡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了。然而平均主义在政治上拿不出新建树,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囷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在军事上的表现是流寇主义②。

(二)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

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一般认为从起义军内部自身分析,主要有三条原因:一是骄傲自满;二是流寇主义、流动作战;三是叛徒的出卖。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张道贵、顾吉辰认为流动作战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黄巢主观意愿的产物;流动作战是黄巢起义的胜利之本,流动作战使广大农民争相参加起义军,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乎能够推翻李唐封建王朝,而黄巢在长安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最后酿成了失败③。王大华认为大齐政权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政权建立后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铸成了本身的悲剧:大搞平均运动,结果适得其反,严重缺粮,难以施展流动作战的长处,陷入硬拼死打固守的绝境。而黄巢基本没犯大错,应澄清对他的误解与责备④。

---

① 《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1期。

③ 《流动作战不是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4期。

④ 《论大齐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4期。

（三）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受敌“诱降”、“乞降”问题的争论

1. 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

旧史中多有王仙芝受敌诱降的记载，今人著述中也有不少人采用了这一说法。六十年代初吴泽、袁英光以及徐德麟等人著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王仙芝进军蕲州时，黄巢并不在场，所谓反对王仙芝受降，纯属虚构。尚君长等人亦非受降使者，所谓王仙芝受降事并不存在①。

2. 黄巢“乞降”问题

一般认为黄巢曾多次向唐朝“乞降”。吴泽、袁英光则认为旧史中所载黄巢多次“乞降”问题，错综矛盾，存在很多问题，从考证的结果看，所谓黄巢“乞降”，或为误释、或为误植、或为诬构、或为伪降，并无真正乞降的迹象。之所以会留下黄巢多次“乞降”的记载，完全是封建史臣为诬蔑农民革命和其领袖而编造的谎言②。

对于否认王仙芝受敌“诱降”和黄巢“乞降”的说法，也有人提出了反驳的意见，认为从史实的考订及具体事例的研究上看，不能否认“诱降”、“乞降”的客观事实③。

（四）其它一些问题及观点

近年来，在唐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如卫文选针对旧说黄巢反儒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知识分子与黄巢起义的关系作了考辨。他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声势浩

---

① 吴泽、袁英光《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实探》，《文汇报》1961年5月12日；徐德麟《关于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同上1961年6月23日。

② 吴泽、袁英光《黄巢‘乞降’问题考辨》，《学术月刊》1961年5期。

③ 宁可《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光明日报》1962年7月18日；杨善群《黄巢乞降经过考辨》，《求是学刊》1990年4期。

大，如果没有大量受过儒家教育的支持起义军的知识分子的参加，并且积极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组织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因之，说黄巢起义军反儒是缺乏根据的，黄巢爱护儒生才是历史的真相①。

对于唐末农民起义的战略研究，过去一直甚少有人注意。诸葛计对此作了研究，填补了过去的空白。他认为唐末农民战争是一次具有防御、进攻、相持、退却等各个战略阶段的战争。从大起义爆发到进入岭南，是战略防御阶段；从岭南发起北伐到攻克李唐首都长安，是战略进攻阶段；从义军第二次退出长安到起义失败，是战略退却阶段。上述每两个战略阶段之间，又分别间有一个战略转折阶段和一个战略相持阶段②。

隋唐五代时期的农民起义与当时流行的宗教和儒家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李斌城对此做了探讨。他统计了这一时期约 420 次的农民起义，发现其中利用宗教（包括佛、道、摩尼等教）而发动的起义约 30 次，与儒家有关系的起义有 40 次，占全部起义的 20%。他认为隋唐五代农民起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宗教及儒家有或多或少的瓜葛，并使农民的革命斗争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③。

十一、其他历史人物与事件

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及人物研究概况已如上述。还有一些属于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在此选择其中部分作一简单的介绍。

---

① 《黄巢爱儒考辨》，《学术月刊》1981 年 10 期。

② 《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略论》，《中国史研究》1980 年 2 期。

③ 《隋唐五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及儒家的关系》，《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一)唐代的历史事件及人物

1. **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与地域特征**。隋唐五代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结构关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动。如何看待这种变动,传统的观点是从士庶之变着手加以解释。而汪征鲁则不囿于陈说,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封建地主阶级发展到门阀士族阶段已病入膏肓,生机殆尽,而至隋唐时期,它的领导阶层却出现了一种生机勃勃、富有作为的新面目。这种变化说明了地主阶级发生了局部更新。引起更新的原因与动力最主要的便是当时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①。任爽则分析了唐五代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认为表现在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矛盾冲突的特色是鲜明的南北之争。他认为唐宋之际南北地主阶级不仅存在着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深刻冲突,而且在集团性格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在分析南北地主阶级的集团特征时提到北方地主阶级(包括庶族地主在内)在自我意识上有强烈的优越感,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而南方地主阶级极少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较少保守的特点。他认为唐宋之际的南北之争其端绪起于永贞革新,五代时的南北之争以南唐党争最为典型②。

2. **宦官研究**。宦官问题是唐史研究中颇受人重视的课题。传统的观点多将宦官擅权与唐亡联系起来,认为宦官在中唐以后的历史中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近年来,齐陈骏、陆庆夫著文重申并展开了上述观点。他们将唐代宦官专权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宦官权力已凌驾皇帝之上。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宦官为虐、政治黑暗,是一个重要原因。齐陈骏、陆庆夫在历数宦官的种种劣迹

---

① 《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历史研究》1983 年 1 期。

② 《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历史研究》1987 年 5 期。

后指出，由于宦官长期窃国弄权，加速了唐代国家政权的崩溃，是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①。冯辉也认为宦官对唐中后期政治产生较坏的作用，宦官专权不仅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激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唐王朝即在此两种矛盾中灭亡②。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者不同意将宦官一概否定。尤其不同意将唐亡原因归之于宦官专权的观点。黄永年认为将唐后期的皇帝称作宦官傀儡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宦官与皇帝只是家奴与主子的关系。宦官参与皇室纷争，只是家奴在参与皇室内部的纠纷，好比旧社会大家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大到可以反掉整个大家族。将唐亡原因归之宦官擅权是不妥的，宦官也做了不少有益于李唐皇室的事③。马良怀也认为唐宦官与皇帝同属一个利益集团，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二者之间是主仆关系④。牛志平则认为中唐以后吐蕃侵扰，连年不断；藩镇动乱，百数十年，然终未致唐于死地，它赖以生存的全部军事力量，便是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和监军控制的地方藩镇。宦官以枢密使、宣徽使及中使身份参与决策，宣传诏旨，出纳王命，不仅加强了对文臣武将的监督控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唐宦官虽有种种劣迹，但它在维护中唐以后中央权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⑤。

3. **马嵬驿事变与杨贵妃之死**。杨贵妃死于马嵬驿之变，旧史及传统看法均认定为禁军士兵因饥疲而自发的行动，且看起来不过是安史之乱中玄宗外逃时的一个小插曲，似无深究的必要。但经过唐史研究者的深入探讨，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在这场事变的背后，笼罩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之争。黄永年在《说马嵬驿杨贵妃

① 《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
② 《论唐代的宦官政治》，《求是学刊》1987年4期。
③ 《唐代的宦官》，《文史知识》1987年4期。
④ 《唐代宦官与皇帝关系考论》，《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5期。
⑤ 《略论唐代宦官》，《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1期。

之死的真相》一文中，认为马嵬驿事变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指挥这次事变的，是禁军最高长官陈玄礼，而他的后台，非肃宗，应为高力士。黄永年认为高力士蓄意要杀杨国忠由来已久，他的行为，实际上开了后来"宦官"专权的恶例①。而胡戟咸的看法却与黄永年截然不同。他认为马嵬驿事变与陈玄礼并无关系，实际上是李亨、李辅国等策划和发动的。他认为李亨的太子地位始终不稳，长期受李林甫、杨国忠的迫害，安史之乱发生后，他利用人们对杨国忠专权的痛恨，乘机除掉杨国忠、杨贵妃，把杨氏势力消灭干净，夺取了政权，这才是马嵬驿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胡戟咸并认为唐代朝廷落入宦官之手，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李辅国发动马嵬驿事变和劝李亨自立为帝②。陆沉也认为马嵬事变的幕后指挥者决非大将军陈玄礼或宦官高力士，而是善于伪装的太子李亨。事变是天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③。弄清马嵬驿事变的真相，有助于了解中唐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脉络，显然这一研究还应展开。

4. **泾原兵变的研究**。德宗时发生的泾原兵变曾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后历时七年，是为安史之乱平定后又一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过去很少有人作专门研究。近年来彭铁翔、黄永年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探讨。彭铁翔不同意传统观点认为泾原兵变属镇兵哗变性质。他认为"泾原之变是唐王朝带有一定强制性程度召募来的士兵，对其所处现状不满而激发的一次军士暴动，从引起这次暴动的深刻原因，参与起事主要群众的阶级内容，反饥饿、反剥削的斗争表现，剥削阶级对之不调和的态度以及战斗所起的

---

① 《学林漫录》第5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马嵬驿事迹的真相》，《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4期。

③ 《新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7期。

历史作用等方面看，它具有农民起义的性质。”① 黄永年则通过大量勾稽史料，排比史实，考证了泾原兵变的人数、叛乱的原因、叛军何以拥立朱泚为帝的原因、德宗采取的平乱战略等问题，并认为德宗在七年讨叛战争中并非失败者，也不是昏君，而是乘此机会消灭了泾原、凤翔的隐患，解决了中央长期不放心的朔方军问题，并将嫡系主力神策军的兵权收归比较可靠的皇帝家奴宦官来掌握。这些只能说是成功而不能说失败。可见德宗实在不昏②。

5. **论李林甫**。李林甫是唐代有名的权相。论者一般将其斥为奸臣。然其奸何在，尚少专文研究。李哲夫、李广福在《略论李林甫》一文中对李林甫奸诈的一面作了论述。作者将李林甫的仕宦生涯分为两个阶段：开始是爬；及至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后，就转而为保。作者分析了李林甫专宠固位的手法，以固其宠、成其奸、保其位、张其势等作了概括，并认为在李林甫专权下的十几年中，李唐王朝政治上日益黑暗，不但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且使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开元盛世急剧转变为天宝末年的经济、政治危机③。袁英光、王界云认为李林甫长期专权“仅以李林甫之奸佞险诈或唐玄宗的沉溺后宫为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唐玄宗要找一位能善于领会自己政治意图的人来担任宰相，来继续执行自己已往所定的大政方针，以便巩固发展开元以来的成果，“李林甫正是他所需要的合适人选。”④ 阎守诚、吴宗国在《唐玄宗》一书中，也对李林甫控制政局的能力给予相当的肯定。唐华全认为李林甫扶持安禄山，是为准备反叛，在玄宗死

---

① 《唐代建中时期的“泾原兵变”性质考辨》，《武汉师院学报》1982 年 6 期。

② 《“泾师之变”发微》，《唐史论丛》第 2 辑。

③ 《人文杂志》1982 年 4 期。

④ 《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90 年 3 期。

后推翻太子亨时，当他的配角①。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剖析还可以深入下去，它将有助于对中唐政治大变动的认识。

6. **重评高力士**。对高力士这个人物，虽少专文研究，但提及者多全盘否定。葛承雍认为学术界历来将高力士定为劣迹昭彰的反面阉贵，这个结论似欠公允，有必要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他认为综观高力士一生表现，对他的消极面固无须掩饰，但也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首先，在开元时期高力士辅佐唐玄宗整肃纪纲，在天宝时期敢于提出针痼除弊的直谏，其积极作用是肯定的。其次为人处事谨慎节制，绝不象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炙手可热、倚势凌人，他有"事君之忠"和明哲保身的双重特点②。

7. **韦皋镇蜀对唐室中兴的作用**。陇蜀地区在中唐以后的重要地位，过去虽有人加以注意，但专文论述此一问题的尚少见。段飏在他的文章中，依据对韦皋镇蜀二十余年的考察，分析了陇蜀地区对唐室中兴的作用。他认为从唐玄宗、德宗、僖宗三次出奔都以陇蜀为避难所中可以证明陇蜀是唐室最后的保命线。而韦皋以二十余年居于重要藩镇之位，忠心耿耿听命于朝，为朝廷之屏障与支柱，及时舒缓了朝廷的喘息，减轻乃至及时解救了吐蕃对关中的危险。同时，韦皋在蜀忠实执行了朝廷的战略方针：联合云南，共攻吐蕃，给唐室中兴带来了希望③。安史之乱后唐室多次渡过险关，有时还出现再兴的转机，其中原因复杂，对韦皋镇蜀作用的分析，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进步。

（二）五代史上的事件与人物

五代史在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

---

① 《试论安禄山势力的发展壮大》，《中国史研究》1991 年 3 期。

② 《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 年 1 期。

③ 《论韦皋镇蜀对唐室中兴的作用》，《华东师大学报》1982 年 1 期。

研究者们逐渐开始重视五代史的研究。但文章的数量依旧较少。近年出版的几本五代史方面的著作,如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沈起炜的《五代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年版)、陶懋炳的《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和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对五代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下面择要介绍有关五代史上政治事件与人物评价的重要观点。

1. 石敬瑭评价

对石敬瑭的评价,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而郑学檬在《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针对人们指责石敬瑭投靠契丹自称“儿皇帝”及割弃燕云十六州这两个主要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在评价石敬瑭时,有必要分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在考察历史上民族关系中诸如儿皇帝等问题时,是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与习俗观念去分析,还是用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去对待;到底国内民族矛盾与国外民族矛盾的界限如何区别;一个历史人物过大于功时,其功应否肯定等等。根据他的分析,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应据当时契丹社会的制度与习俗作分析,不能苛求;割让燕云十六州虽对汉族地区有严重影响,但仍属国内民族间的疆界问题,不能指为出卖行为;而且对于加速民族融合有进步意义。郑学檬还分析了石敬瑭在改善政治、减轻剥削、恢复生产方面的不少积极措施,认为,“象石敬瑭这样的历史人物,尽管投靠契丹做了很不光彩的事(虽然事出有因),但他在内政上颇有值得肯定之处,还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① 针对郑学檬的观

① 《厦门大学学报》1983 年 1 期。

点，谭其骧及孙祚民先后发表了反驳的文章①。在石敬瑭评价上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论，有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关于石敬瑭的族属，芮传明认为源出粟特石姓②。

2. **冯道评价**

冯道乃五代史上又一个为历代史家所不齿的人物。斥之者以为冯道在其仕宦生涯中，前后历仕唐、晋、汉、周四朝，侍奉过十个君主，久叨禄位达三十余年，毫无“气节”可言，因而，冯道也就成为贰臣的代名词。近年来有些研究者重新对冯道作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任崇岳、陈忠信分别著文认为以封建伦理纲常来全盘否定冯道是不足为训的。他们都肯定了冯道为官清廉，不以富贵骄人；荐贤举能，延纳后进；有时谏诤、贤于辅弼；倡印经书，泽被后世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他存在着缺陷与失误的一面。任崇岳认为，冯道有功有过，过大于功，“是一个瑕不掩瑜的政治家③。”陈忠信则肯定冯道为官清廉、时行善举、保存文化典籍的一面，说他是割据时代的产物，割据结束必为时代所弃④。

3. **周世宗评价**

对周世宗的研究，在五代史人物研究中，相对说较受人们重视。尤其是对他的改革，评价一直较高。早在1956年，韩国磐的《柴荣》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对这个人物作了全面评述。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在沿袭过去观点的基础上，对周世宗及其改革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唐兆梅在《简论周世宗》一文中认为周世宗久有统一天下之志，为此着手整饬军纪、整顿军队，纠正唐五代以来“兵

① 参见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5期；孙祚民《石敬瑭的评价及有关民族关系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4期。

②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3期。

③ 《略论冯道》，《史学月刊》，1985年5期。

④ 《论五代的冯道》，《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1期。

骄将悍"的不正之风和"战胜则挟主"、"战败则投敌"的传统陋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他十分留意吏治，减轻民困，发展经济，致力于百姓们的休养生息。他的成功经验是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用心持平、勤于政事、善于纳谏、不尚奢华，是继唐太宗之后又一个取得治国治军突出成就的人①。徐德明则重点研究了周世宗的改革，从政治、军事、经济、刑法四个方面分析了周世宗改革的具体措施，并评价了改革的意义。他认为周世宗的改革安定了社会，稳定了生产，为统一全国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力量，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军事基础。所以，周世宗的改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十世纪中叶由分裂割据趋向统一和安定的符号与象征②。方积六肯定周世宗旨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谋略，五年半间对北汉、契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收复十九州的胜利③。孙继民考周世宗出身邢州富商，所以后来比较注重商业④。

4．五代的削藩制置

中唐兴起的藩镇，至五代时其演变过程如何，这是一个事关宋代统一全国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极少有人研究的问题。李昌宪通过对五代方镇衰弱的历史过程及五代各朝削弱方镇制置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五代各朝虽年促祚短，但在削弱方镇上，都程度不同地作出了贡献。除了以军事力量成功地镇压叛乱的方镇外，还采取了多项措施，逐渐剥夺方镇赖以生存的条件，限制、削弱了方镇割据力量。这些措施包括军队屯戍、选募骁勇、移易方镇、分割方镇地盘与支郡"直属郡"、隳城隍、拆防城之具、征收两税、收回财权以及在举荐用人、州县行政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李

① 《文史哲》1984 年 3 期。

② 《论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杭州大学学报》1983 年 1 期。

③ 《周世宗南征北战的军事谋略》，《湖北大学学报》1991 年 1 期。

④ 《后周世宗柴荣出身商人考》，《河北师院学报》1992 年 4 期。

昌宪认为方镇割据势力经过唐末兼并战争和五代各朝的打击，到后周时，除夏州外，在不同程度上为中朝所控制乃至消灭。从方镇得镇的缘由、割据地盘的大小、在镇时间的长短、兵将结合的程度、方镇叛乱的原因及心理状态等方面考察，五代方镇已大不同于唐代方镇①。

5. **南唐党争研究。**

任爽在《南唐党争试探》一文中，对过去鲜有研究的南唐党争做了考察。他分析了南唐党争的规模、内容及性质。他认为南唐党争是不同地域地主集团围绕各种利益而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从两党在某些政治、经济方针上的对立及两党人物在阶级成份上所具有的区别中，还可以看出这场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当地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力争政治地位的含义（表现为土著与侨寓的斗争）。他认为党争造成极大恶果，对南唐的灭亡起了加速的作用②。近年他出版了《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 年把南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① 《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 年 3 期。

② 《求是学刊》，1985 年 5 期。

第二章　典章制度

一、概括性论著

在通论隋唐政治制度的专著中，当首推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①。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隋唐各种制度自汉魏以来的渊源流变，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新说。以往史家多认为承自西魏北周的隋唐政权在典章制度上也沿袭北周，陈氏首次指出，隋唐制度本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其中以北魏北齐一源最为重要。而北魏北齐一源又经历了迂回曲折的演变过程，它是汉魏以降传统的华夏文化，经由三途至北魏孝文、宣武两朝熔冶为一。三途之一为残存于中原的汉魏制度；其二为东晋至南齐间对汉、魏、西晋典章文物的继承与发展；其三为永嘉之乱以后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的中原文化。三途文化融汇为一的契机是魏晋南北朝的家学，残存于中原的汉魏制度在崔浩、高允等士家大族手中，他们为道武、太武两朝制定制度，传至孝文、宣武；自东晋至南齐承袭并发展的汉魏以还的华夏文化，经由刘芳、王肃等人传至北魏；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之中原文化，亦经由李冲、常景等人传至北魏；北魏孝文、宣武两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即集

① 中华书局，1945 年重庆版，1963 年北京新一版。

上述三途文化之大成，取精用宏，合而为一。北齐沿袭孝文、宣武制度，隋唐又继承北齐，从而使汉魏以来的学术文化一脉相传并发扬光大。所谓梁陈一源，陈氏指出，隋高祖仁寿二年(602)参加修定五礼的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就其家世及学业而论，均属梁陈系统。至于西魏北周一源，系指关陇地区所保存的汉魏以来的华夏文化，为适应六镇鲜卑贵族的政治统治而产生出的一种胡汉杂揉的混和制度，"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三源之中以西魏北周一源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

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流变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他提出和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或迄未解决的问题，标志着隋唐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研究隋唐制度必读的里程碑式著作。

六十年代以来，台湾先后出版了两部概述隋唐政治制度的专书，一是杨树藩的《唐代政制史》①，一是沈任远的《隋唐政治制度》②。杨著共分三编，第一编为中央制度，分别讨论作为统治主体的皇帝，作为政务机关的三监，业务机关的九寺，以及监察机关的御史台等等。第二编为地方制度，考察了都府州县的行政机构及其地方的军事、监察系统。第三编为文官制度，举凡品阶、勋爵、服赐、考选、俸禄及休假致仕诸制皆包括其中。该书条理清晰，资料丰富，对于唐代政治制度尤其是职官体系的了解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沈氏《隋唐政治制度》与杨著体例略同，第一章总论之外，另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文官制度三章，在内容上以宰相和科举制度为重点。沈氏指出隋唐两代虽无宰相官名，却有多人行使宰相职权，众相共掌政务，互相制衡，使皇帝之下，无一人总揽朝权，统率百僚，以避免权臣专政，危及皇祚。又指出科举制始于隋，盛于唐，

① 台北正中书局，1987 年版。

②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但二者微有不同，隋系考用合一，即考即用，唐则考用分离，科举中式，再经吏部铨选始可得官。本书问世之前，作者已先后出版秦汉、魏晋及明清等断代的政治制度专著，因而叙述隋唐制度多能与前后代联系贯通，来龙去脉分明。

在概括性论著中，还应提到一些隋唐五代断代史著作中的政治制度史部分。如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①，其下册专论制度，其中政治制度一章凡十节十余万言，虽然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但搜集了十分零散的资料，经过考订排比，分门别类，极便查考。而且强调独见，注重会通，如关于唐代中央官制的演变，地方长官权势因久握兵柄兼理军民而坐大，以及中唐制度变化的历史意义等，皆能从平实有据的立论中体现作者的通博与独到。岑仲勉的《隋唐史》② 汇集了作者多年来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在叙述典章制度时均能溯源探流，考证异同，剖析诸说，立一家之言。如关于隋代地方体制的变革和边防配置，关于府兵制的起源与演变，都针对各家意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的一些考证性注释尤见功力。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③ 论述了隋唐中央和地方的职官设置、府兵制度、科举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由于隋朝的统治很短促，许多措施还没有完成，到唐朝才底定，唐朝的制度大体继承隋朝而来，不过不是抄袭，而是有所改变，并详细分析各项制度的渊源流变和利弊得失。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④ 亦专章考察了唐代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资料宏富，体例得宜，概要叙述与注释举证相结合为本书一大特点，是适合的研究入门著作。港台方面傅乐成

---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新一版。

② 中华书局，1982 年新一版。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 年修订版。

④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的《隋唐五代史》，①章群的《唐史》②以及王寿南的《隋唐史》③等，均融合了当时的学术新观点和作者的独创之见，对政治制度有专门论考。

也许是怕流于浮泛，从总体上探讨本期政治制度的论文为数不多，即便是通论，也往往具体到政治制度的某一方面。筑山治三郎的《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④ 一书，也是汇集分别探讨职官、选举、考课等多方面内容的论文而成。这些留待下面分专题时介绍。最后还要提到的，是一些通论中国政治制度的专史，如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⑤，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⑥ 等，都对隋唐政治制度着墨甚多，可资参考。近年出版的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⑦尤其具有特色，该书广泛吸收历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及民族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有关专家集思广益、分工合作而写成。该书的隋唐部分深入探讨唐代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并以此为轴心铺叙各单项政治制度，在整体结构上使人耳目一新，在具体论述上也有很多新的突破。

二、职官制度

（一）通论

官制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主体，故上列通论隋唐政治制度的专

---

① 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香港龙门书店，1978 年修订版。
③ 台湾三民书局，1986 年版。
④ 日本大阪创元社，1967 年版。
⑤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⑥ 南方印书馆，1943 年版。
⑦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著均以职官制度为基本内容。八十年代中出版的张国刚的《唐代官制》[1]，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官吏的设置、职能、选拔、管理、俸禄、考核及退休等制度及其变化，展现了唐代官制的总体轮廓。该书不仅条理清晰，便于查考，而且尽量利用最新研究成果，有便于了解本专题的研究动向。从总体上概述本期官制的论文有杨志玖、张国刚《发展变化中的隋唐五代官制》[2]，韩国磐《有轨迹可循的唐代职官制度》[3]，筑山治三郎《隋唐的官僚制》[4] 等，均包含了作者多年研究官制的心得。池田温《律令官制的形成》[5] 则从律令制体系的角度考察唐代官制的整体状况。李光霁《隋唐职官制度渊源小议》[6] 对陈寅恪关于隋唐官制承袭北齐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隋文帝虽废除北周六官，却未必全依北齐之制，如隋唐六部制即受到北周六官的直接影响和《周礼》六官的某些间接影响。此外，上揭岑仲勉《隋唐史》[7]、牟润孙《从初唐政制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8]，均对陈寅恪的隋唐官制渊源说提出批评或有所修正。

（二）中央职官

1. 皇帝　宰相

皇帝是封建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上揭杨树藩《唐代政制史》对唐代皇帝制度辟有专章探讨。王超《唐朝皇帝制度的发展与完备》[9] 论述了这一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臻于完备的发展过程。王

---

① 三秦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文史知识》1985 年 1 期。
③ 《江西社会科学》1988 年 6 期。
④ 日本《历史教育》，1964 年第 12 卷第 5 期。
⑤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日本岩波书店，1970 年版。
⑥ 《中国史研究》1985 年 1 期。
⑦ 岑仲勉《隋唐史》第 220 页，第 564 页等。
⑧ 台湾《民主评论》1960 年第 11 卷第 4 期。
⑨ 《南京大学学报》1985 年 4 期。

超认为，唐代皇权无所不包，皇权至重。可是皇权行使的方式却有自己的特点。唐朝政府的一切最高命令，均由中书省发出。一般的情况是由中书省拟定正式诏书，皇帝阅后如果表示同意即画一“敕”字，然后下达到门下省。皇帝的一切重要政令，必须有门下省副署，并盖上“中书门下之印”才能正式生效。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机构与活动》①对唐代中央决策集团、决策层次与方式的变化，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达渠道，以及决策的局限性和特点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的另一篇《唐代御前决策会议初探》②专门探讨唐代的御前决策会议，认为唐代的御前决策，从唐初的朔望朝参会议，发展到仗下后会议，再到中唐时延英会议和学士召对会议，决策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总的来说，是由固定向灵活、由规模较大向规模较小、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这些变化是中央决策核心逐步多元化和适应日益复杂社会矛盾的反映。近年出版的谢元鲁专著《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③全面深入研究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体制和运行机制，指出在唐代中央内部，形成了多层次的决策机构与不同的决策机制。最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御前决策会议，其次是中书门下的决策会议，政事堂宰相会议，扩大参与的百官会议等，并对决策层次与方式在唐王朝各个时期的变化进行分析论述。对于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达渠道，作者认为有地方情况上报制度，出使监察制度，求言和上书制度，信息渠道能否畅通关系到整个唐王朝的兴盛和生死存亡。作者还对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为保持效率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及其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我们全面了解唐代的中央决策很有帮助。

---

① 《文献》1988年4期。

② 《中国史研究》1988年4期。

③ 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延英奏对，即皇帝召宰相大臣于禁内延英殿议决军国大事，是唐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朝议制度。袁刚《延英奏对制度初探》① 指出，该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为从高宗武后置延英殿到安史之乱后肃代之际，是发端和发展期，第二期为肃代以后，是成熟期，宰相在延英议政已经常化，在朝议决策中取代政事堂会议而居主导地位。松本保宣《唐代后半期延英殿的机能》②论述了以大明宫延英殿为中心，召对、次对官、中射等皇帝接见制度逐渐整备的过程，阐明延英殿在唐后半期的重要性。

新近出版的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演进》③一书以讨论隋唐之间的权力与制度的演变为主。探讨其人事结构的内涵和变化，政权和治权关系的互动，并研究其决策系统、行政部门、监察司法、人事制度与国防军事体制等重大制度的设计、变化以及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关于皇位继承制度，王超在上揭文中认为，唐代继承了自汉代以来确立的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唐代册立太子仪式隆重，皇太子有专门的官署“东宫”。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稳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自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之后，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连续不断，有唐一代，凡二十一君，按制度即位者仅二君，权臣立者有五帝，宦官所立者九帝，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三帝，稳定政权有功而立者一帝，为大臣争立者二帝，因母后干政立者二帝，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一帝。总观唐代皇位继承制度，考察太子地位不稳的原因，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为人君的亲疏爱憎自我挠之；中唐以后则多受宦官专权的影响。王超在该文中还指出，唐代

---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 5 期。

② 《立命馆文学》五一六，1991 年。

③ 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版。

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强盛的朝代，而它的皇位继承的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唐任伍《唐代皇位的继承方式对国势兴衰的影响》① 一文似乎是要回答王超的疑问。唐文认为，唐代前朝6帝由武力竞争夺取皇位，唐前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与这批英明君主治理分不开；中期6帝以年长和平继位，德才平平，导致国势衰微；后期7帝多由宦官拥立，成为傀儡，个别人天资英武也无力回天，国势危殆，在所难免，可见，唐代皇位继承方式的演变，是唐国势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危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跟皇帝制度有关的如后宫、宫殿、陵寝、家庙等制度也有一些论著进行探讨。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② 认为，唐代后宫制度，大抵沿袭汉代以来的制度，宫中有官爵分明的一套组织，也是皇帝之下的一个内职机构。唐朝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后宫制度有很大发展，达到了完备的地步。唐制，皇帝纳皇后，临轩册命皇后，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并且载入煌煌法典《大唐开元礼》。皇后之下，还有等级分明的两个内官系统，一是夫人系统，一是内侍省系统。甘怀真探讨了唐代的家庙礼制和皇帝制度的关系，他的《唐代家庙礼制研究》③一书探讨皇帝制度藉礼制得到统治的正当性。

隋唐并无法定的宰相名称，但对掌握相权的官员，公私仍以宰相名之。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④，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⑤，均对隋唐宰相制度作过详考。上揭沈著《隋唐政治制度》，岑著《隋唐史》等，亦专章考论了唐代宰相的组成、职权以及宰相制度的演

① 《史学月刊》1995年5期。
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④ 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⑤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4年版。

变。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刘希为的《唐代宰相制度初探》①，杨际平的《隋唐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②等。刘文认为唐朝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成熟，加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为历史上所仅见。杨文指出，隋唐宰相制度的诸多变化，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皇权，而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薛贻康《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③ 则从唐代宰相的人数和任期、选任和罢免、名号和品位入手，对完整、系统而缜密的宰相制度作了论证，认为宰相多出自具有一定品级的三省官、翰林学士、科举出身尤以进士出身为主的人员中。王双怀的《武周宰相数目考》④ 则根据正史、野史及金石材料反复勘验，详细考证出自弘道元年十二月至神龙元年正月间入选的宰相姓名及作相时间。刘健明《隋代宰相制度述评》⑤认为隋初三省长官俱为宰相，平陈以后仆射地位日高，《通典》以隋内史、纳言为真宰相的说法有误。

2. **三省六部卿监(政事堂)**

隋至唐初三省长官例为当然宰相，尽管此后多以他官为相，但为相者仍例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号，因此讨论隋唐宰相不能不涉及三省制的发展演变。综合探讨三省制度的专著有王素的《三省制略论》⑥。著者认为，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魏晋南北朝是此制的酝酿时期，隋的统一及其改制有力促进了三省制的建立。逮及唐初，三省省长集体议政于政事堂，都是当然宰相，三省省长制成

---

① 《中国史研究》1984 年 3 期。
② 《浙江学刊》1988 年 3 期。
③ 《山东师大学报》1990 年 3 期。
④ 《唐史论丛》(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0 年出版。
⑤ 《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 年。
⑥ 齐鲁书社，1986 年版。

熟；三省借门下政事堂平衡地位，内亲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从而三省制遂正式建立。但建立不久的三省制旋即在唐五代遭到破坏。本书结构严谨，考证精详。有关三省制的论文颇丰，较早的有内藤乾吉的《唐朝的三省》①，该文与1979年发表的砺波护的《唐代的三省六部》②都利用了敦煌出土的有关文书，通过皇帝诏敕与臣下所上奏抄的出纳，来考察各省的职能。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③通过对汉唐间三省六部制形成过程的考察，指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级官吏转变为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刘健明的《隋唐三省制度发展之研究》④认为隋代三省制因君主疑忌臣下而未充分发挥其效力。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⑤论述了贞观年间仆射职掌的减轻及门下省作用的加强、政事堂群相议政制度的确立、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主行政事务到政事堂兼管行政事务等诸多问题。黄利平《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⑥指出三省制以尚书省为首，尚书令的缺职是因为不见容于当时的集体权制，而不是因为某皇帝个人的因素。刘磐修《唐贞观阙置尚书令辨析》⑦也不同意过去所谓因李世民曾任尚书令因而臣下避不敢居的观点，认为唐贞观阙置尚书令是唐前期最高统治者为削弱尚书省权力而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政治变动，目的是使三省权力均衡。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

---

① 《史林》1930年第15卷第4号。
② 《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日本汲古书院，1979年版。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3期。
④ 香港《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1980年5期。
⑤ 《历史研究》1992年2期。
⑥ 《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荷泽师专学报》1991年1期。

其在唐代的变化》① 及吴枫等《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②都认为三省制的破坏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结果，同时又加速了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③详考了唐代三省制的实质与盛衰，指出三省制中君主虽为领袖，但决策实系于中书门下政事堂。特威彻特(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3卷(隋唐)《导论》也认为宰相及其立法议政所在的中书门下二省拥有广泛的权力。上揭内藤乾吉《唐朝的三省》则认为唐门下省是代表贵族的审议机关，皇帝的意志亦须经门下认可才能生效。总之都对中书门下限制皇权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价，王素认为这种估计失之于过高④。袁刚《隋唐三省体制析论》⑤ 则通过对隋唐三省的职能性质、运作程序和衙署建置的分析，对"三省并重"、"三权分立"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三省分权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中书、门下两者共同行使的辅助决策事权与尚书省行使的行政管理事权的分立；第二层是在此基础上，决策又一分为二，中书主草诏制令，门下主审复封驳，成为辅助决策的两道程序。他在近年出版的专著《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⑥中继续重申他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中唐以后，一个由翰林、枢密、中书门下共同组成的新中枢完全取代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的旧中枢，三省虽有名号，却唯剩躯壳，实际上已不发挥作用。

关于唐代宰相集体议政所在之政事堂，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论文不少，但对此制的源起意见不一。据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

① 《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1期。
② 《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3期。
③ 香港《新亚学报》，1957年，第3卷第1期。
④ 见前揭王素《三省制略论》第213页。
⑤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
⑥ 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

探》① 考证，政事堂始置于贞观年间，它的出现与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有关。高宗永淳年间裴炎将政事堂由门下迁入中书，意味着由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到玄宗时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遂成为中书令独揽大权的机构，唐朝政治亦走向腐败。王超《政事堂制度辩证》②不同意姚文关于政事堂创于贞观年间的说法，认为至迟始于高祖武德年间，甚至北朝隋代即已有之，并考述了政事堂由议政发展到最高决策机构的三个阶段，从职权、组织、参加人员等方面探讨了政事堂的制度内容。陈振《〈政事堂制度辩证〉质疑》③针对王超文指出政事堂制度形成于贞观十六年前后，宰相议政门下始于武德年间而不是北朝或隋。魏向东《也谈政事堂的创设时间》④则从宰相集议制和门下政事堂设置两方面，论证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创始于贞观初年，否定了武德年间及贞观中叶说。刘健明《唐代政事堂制度的建立》⑤从隋及唐初宰相议政的实况及太宗时他官参政的出现，也说明政事堂制度应建立于贞观初年。以上诸家都对政事堂在唐代中央决策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严耕望《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之关系》以及后来将此文内容囊括于内的《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是专论唐代尚书省制度的力作⑥。严氏分前后期详尽考论了唐初，尚书令仆为宰相正官，六部分曹，共行国政，故尚书省为宰相机关兼行政机关；神龙以降至于盛唐，仆射虽被排斥于宰相之外，然尚书省上承君相，下行百

---

① 《中国史研究》1982 年 3 期。
② 《中国史研究》1983 年 4 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5 年 1 期。
④ 《苏州大学学报》1987 年 4 期。
⑤ 《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唐代学者联谊会出版，1989 年。
⑥ 分别载台湾《大陆杂志》1951 年第 2 卷 11 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3 年第 24 册。后一篇收入《唐史研究丛稿》时复有补订，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年版。

司，仍不失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安史之乱以后，尚书省各部职权普遍被剥夺、分割与转移，如吏部所掌铨选之权上为君相侵夺，下为诸司诸使道州府所分割，户部所掌财政权为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分割与转移，等等。使尚书省徒存躯壳，不复为国家政事枢纽。尚书省内部则事权下移，仆尚位尊而无职事，丞郎代行省务。上述种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尚书省的行政体制固有之弊端在乱时充分暴露，不改张无法应付时局。

严氏还以详确的史料和缜密的论证，首次揭开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关系之谜，明确了二者的下行上承关系，即尚书六部上承君相旨命，制为政令，下颁寺监，促其施行；寺监则上承六部政令，具体落实执行，复以成果申于六部。故六部为上级机关，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关，主事务。

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①认为，残卷所录诸式为进一步探究尚书省内部机制提供了新的前提。北宋元丰后，尚书都省与门下、中书合为一体，演成尚书"六部应承三省"之局，而残卷诸式实已透露出此一变局的端倪。他的另一篇《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②从尚书省——寺监体制着眼，对尚书省总管全国政务的职能做了检讨。他认为寺监长官由皇帝宰相任免而下属安排却取决于尚书省，这种人事关系反映到行政过程中，便呈现出政务逐级、隔级处理并存的状态。它表明各机关的相互牵制和配合已在行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固然有利于强化专制集权，却也难免办事繁琐之弊。俞钢《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③比较全面地考察唐后期六部侍郎平章事的授受、迁转及使职情况，认

---

① 《敦煌学辑刊》1987年2期。

② 《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2期。

③ 《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3期。

为，后期六部侍郎进加平章事的授受较前期更为频繁、广泛，已成为宰相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六部侍郎平章事以使职活跃于政坛，省官、相职和使务三位一体，使“中书门下”与尚书诸司之间联系更密，从而影响着三省六部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关于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组织结构，周道济分别撰有专文论述①。毛汉光《论唐代的封驳》② 则专论门下省给事中的封驳权与运作。郭锋《唐代尚书都省简论》③，考察了唐尚书都省的流变、机构组成和职能作用等问题。他认为唐尚书都省因承隋制，渊源可上溯至东汉以来的尚书左右丞都台制。唐代的都省，由都堂和左右司三部分组成，实际长官为左右丞。唐尚书都省职能同于前代，大致可分为省内库用、文案管理和纲辖尚书省诸司三个方面，后两者对唐国家行政有着重要影响。张连成《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④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割草诏权的角度，分两个阶段对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的变化进行论证。

孙国栋关于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制度的一组论文，研究角度和结论都很新颖，如《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时间与任期的探讨》，依据正史统计出初唐、晚唐升官所需年数比中唐少，而任期则愈晚愈短。《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唐二十六司郎中员外郎地位高低及迁转途径考释》等文，则通过研究官员迁转，探讨中央政府组织的变迁与职权的转移⑤。铃木虎雄《中国的诏敕文及其

---

① 周道济《唐代尚书省的组织》、《唐代门下省的组织》、《唐代中书省的组织》，分别载台湾《民主宪政》1960 年第 18 卷第 3 期，第 6 期，第 5 期。

② 台湾《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 3～1，1992～10。

③ 《中国史研究》1989 年 3 期。

④ 《文献》1992 年 2 期

⑤ 分别载香港《新亚学院学术年刊》1974 年第 16 期；《钱穆八十岁纪念论文集》，1974 年；《新亚学院学术年刊》1975 年第 17 期。

起草者》① 认为唐中书舍人可以把天子宰相的意见用“封还词头”或者“搁置词头”的方式实际驳回。砺波护在《唐代的制诰》② 一文中力驳其说。中村裕一《唐代的制书式》③、吴枫等《封驳制度与唐初政治》④ 等文亦讨论了唐代诏敕的起草与审议。近年，中村裕一有《唐代制敕研究》和《唐代官文书研究》两部新著问世。两书主要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唐代公文书研究的修改稿，书序和某些部分为新作。序章介绍了研究的意义、公文书的种类和研究史等问题。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通过对唐公式令的王言制等公文的书写格式以及包括石刻、古文书在内的传世文献所见事例的综合调查和研究，进而涉及到唐朝整个制度的研究，试图说明唐制度的实际形态，很有意义⑤。

研究唐代中枢职官，严耕望的《唐代仆尚丞郎表》⑥ 和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⑦。是经常要查阅的参考书。严书首列《述制》一卷，概叙尚书省职权地位，仆尚丞郎地位、职权之消长，以及仆尚丞郎官名员秩演变与六部位次等。其次为通表三卷，以时间为经，官职为纬，将仆尚丞郎任职者姓名及在任时间表而列之，凡1116 人，2680 余任。再次为辑考十八卷，对表中所录逐条进行考证，极便读者稽核。传世唐碑记题名《尚书省郎官石记》出自唐人之手，向为治唐史者所重。岑仲勉早年有考证文章《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⑧，《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为其姊妹篇。岑氏在清朝学者的

---

① 日本《东方学报》1938 年第 9 期。
② 日本《东洋史研究》1975 年第 34 卷第 3 期。
③ 《史学杂志》1982 年第 91 篇第 9 期。
④ 《历史教学》1982 年 11 期。
⑤ 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 年版；《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 年版。
⑥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⑧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 年第 8 卷第 1 期。

研究基础上，广泛利用各种文献资料、碑铭拓版及新出土的材料，对《尚书省郎官石记》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勘核、考订及注补。本书着力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证定原题名之顺序，各归其本，还当日题名之本来面目；一是订正各司名下任官事迹；从而提高了《郎官石记》的利用价值。

关于五代十国的中央官制，郑学檬在《五代十国史研究》① 一书中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唐朝，但也有若干重要的变化，如中枢要职枢密使职权的扩大，端明殿学士之设，三司使之设，都是有影响的大事。五代十国时的枢密使实际已成为朝官，它掌握军权后就成为宋代枢密使的滥觞。从总的倾向看，五代十国是顾问系统、宦官内侍系统权力膨胀，侵蚀了宰相的权力，使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失去合理的平衡，因此造成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董恩林《五代政治体制考略》②认为，五代在中央形成了枢密院、中书门下，三司分掌军事、政治、财政的权力体系，其中枢密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财政管理机关经过改革，取得独立而显赫的地位。杜文玉《论五代枢密使》③ 认为，后唐同光元年至天成元年间，枢密院成为中央决策机关。枢密院兼有内外朝机构的双重性质，但以外朝职能为主。枢密使集国家政、军、财、司法大权于一身，限制和削弱了皇权。枢密使之所以权重，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动荡，典制混乱。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④ 详考了五代历任的枢密使，并讨论了枢密之外的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等设官及职事。认为五代枢密院地位、权力等的变迁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缩影，是封建帝王与将相近臣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 4 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8 年 1 期。

④ 《文献》1989 年 2 期。

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

3. 翰林学士(集贤院及谏官、医官、僧官等)

翰林学士在唐后期中枢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翰林学士院的形成和发展，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①、矢野主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②，均有系统的考述。上揭王素《三省制略论》则从翰林学士分割中书出令权从而破坏三省制的角度，探讨了翰林学士院如何由"天子私人"的宫官秘书机构向朝官出令机构转化③。向井润《唐代的翰林学士——以其职制为中心》④亦认为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职务分工。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⑤认为，翰林学士院独立于三省之外，不受三省的约束和管辖而又具有三省的某些重要的职权，这是翰林制的第一个特征。此外，翰林制还具有是一种差遣制度、没有规定员额等特征。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⑥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康《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⑦指出，翰林学士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之"字形路线，唐开国之初是一个特殊的御用机构，贞观以后被科举制度所取代，安史之乱后重整旗鼓，翰林学士从皇帝私臣演变为"内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牛致功《唐代的学士》⑧概说了有关前期弘文馆、文学馆、崇文馆学士以及北门学士、集贤院学士、翰林院学士的设置情况，认为学士产生于政治上的需要，学士与唐代文化关系密切，肯定了这些学士

---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 年第 11 本。

② 日本《史学研究》1953 年第 2 期。

③ 见王素《三省制略论》第 239～251 页。

④ 日本《东洋史苑》1983 年第 21 期。

⑤ 《厦门大学学报》1985 年 3 期。

⑥ 《文史哲》1985 年 6 期。

⑦ 《学术月刊》1986 年 10 期。

⑧ 《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 1 期。

在唐代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刘健明《论北门学士》①分析北门学士设置的时间、所起的历史作用及其权限。指出，北门学士在上元中至武则天临朝期间，曾协助武则天在禁中决策，以抗衡外朝大臣的反对势力。一旦反对势力被清除，武则天大权独揽，北门学士便失去作用，退出历史舞台。

集贤院是隶属中书省的图书文化机构，郑伟章的《唐集贤院考》② 考察了集贤书院建立的经过，校书与写书活动，设置地点及其图书庋藏状况等。赵永东《唐代集贤院殿书院考论》③ 将集贤院的发展分为孕育（贞观三年至开元三年）、初创（开元三年至八年）、发展（开元八年至十年）、鼎盛（开元十年至天宝末）四个时期，认为它始终未超出一个学术文化机构的性质。刘健明《论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④，通过玄宗朝政治发展、尤其是张说、张九龄的任免宰相，剖析了集贤院兴衰原因。作者指出：集贤院前身本为编修宫内书籍机关，张说和张九龄出掌该院，致力提高其地位，使之成为君臣讲学论道机关，实现人臣以德化君、致君尧舜理想。但李林甫等掌集贤院时无此理想，使它再次转为纯粹编书机关。唐玄宗另建翰林学士院以取代集贤院从前功能，可见集贤院职能转变与当时政局有不可分割关系。相关论文还有池田温《盛唐的集贤院》⑤等。唐代秘书省兼有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性质，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⑥ 是考察秘书省制度的专论。

关于唐代的谏官制度，八十年代以来有蒲坚的《唐代的谏官制

---

①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② 《文史》1983 年第 19 辑。
③ 《南开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④ 《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⑤ 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71 年第 19 期。
⑥ 《文献》1987 年第 1 期。

度》①、姚澄宇的《唐朝的谏官制度》② 相继发表，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内容与特点。友永植的《唐五代三班使臣考》③，是作者关于宋代武班官僚的系列研究之一，论述了唐代作为令外的内廷杂掌中产生的三班官，到了五代成为从皇帝家产官僚中提拔组成的外廷亲信组织，并影响到宋朝的体制。

关于唐代的医疗制度，任育才《唐代的医疗组织与医学教育》④叙述了中央与地方的医疗组织，医疗救济，对庸医的惩治，以及医学教育师资、学生与课程的设置等。山本德子《唐代的翰林医官》⑤ 指出尚药局、太医署之外还有作为皇帝私人医生的翰林医官。

僧官制度是对佛教教团的管理制度，也是职官制度的一个特殊部分，谢重光《晋——唐僧官制度考略》⑥ 对之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后又在《中国僧官制度史》⑦一书中加以补充和完善。此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僧官制度的历史动态面貌和全过程。其第四、第五两章论述隋唐五代的僧官制度，具体阐明隋代的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五众主；唐初的十大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设立的教授、法律、判官、寺卿，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区域的特殊僧官。在此基础上对隋唐五代僧官制度的发展特点作出如下的归纳：僧官制度自晋、十六国初创，至唐、五代走完了产生、发展、全盛、衰败、变质的过程。其中中央僧官制度隋文帝时达到全盛，其后中央僧官权力

---

① 《人民日报》1981 年 10 月 12 日。

② 《南京师大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③ 《宋代的社会和文化》，日本汲古书院，1983 年版。

④ 《中兴文史学报》1981 年第 6 期。

⑤ 日本《立命馆文学·三田村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1980 年第 418～421 期。

⑥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⑦ 《中国僧官制度史》，谢重光、白文固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该书五代以前部分为谢重光所撰。

屡被削弱，逐渐成为俗官的附庸，有时甚至被取消；但地方僧官制度的发展趋势与中央僧官制度有所不同。自安史之乱后，地方僧官的机构完备，分工细密，比以前更加严密健全。但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僧官的权力仍是相对缩小，以至彻底沦为官府操纵、控制佛教的工具。僧官制度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三）地方职官

1. 通论　道府

综论隋唐地方行政制度的较早论者有萨师炯《隋代的地方制度》，黄绶《唐代的地方行政史》，晚近发表的概括性论述有严耕望《谈唐代地方行政区划》，筑山治三郎《唐代的地方行政与地方官》等①。

隋初和唐初一度在并、洛、扬、益等重要地区设置尚书台，以亲王临统。青山公亮《历代行台考》②分别立专节讨论了隋、唐的行台制度。另有专考隋行台制度的山崎宏《隋代行台考》③，山崎宏又有《隋代总管考》，与严耕望的《隋代总管府考》，同是系统探讨这一制度的力作④。杜文玉在《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对隋唐时期的行台省展开多方面的论证⑤，包括行台省设置数量、名称、置废时间、内部结构、官员职能权限以及行台省设置的原因、作用和特点。

---

① 萨文见《东方杂志》1945 年第 41 卷第 22 期；黄绶《唐代地方行政史》，北平永华印刷局，1927 年版。严文见香港《新亚生活双周刊》1965 年第 8 卷第 9 期；筑山治三郎文见日本《古代文化》1977 年第 28 卷第 8 期。

② 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1935 年第 2 辑。

③ 日本《史潮》1958 年第 64～65 期。

④ 山崎宏文见《镰田博士还历记念历史学论丛》，1969 年版；严文见台湾《中国学志》1972 年第 6 期。

⑤ 《渭南师专学报》1993 年第 2 期。

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及其性质》[1]分析了天宝以前作为地理区域名称的道，怎样逐步演变为州郡之一的监察区。指出当时唐中央严格限制诸道长官对辖区的权力，道只是监察区，与天宝以后诸道节度观察使的道不同，后者乃是军事区和行政区的结合（对之留待藩镇体制一节介绍）。

都护府是唐设置在边区用以统辖羁縻地区的军政机构，邝平章《唐代都护府之设置及其变迁》是关于这一制度的较早研究。唐启淮《唐代都护府述略》探讨了八个都护府的建置、辖区、机构职能及其历史作用。综考羁縻州府的有程志的《唐代羁縻州府简论》[2]。谢重光在所著《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3]一书中，根据漳州乃由武则天时地方首领陈元光附唐平定蛮乱所建，建立之后一百年间漳州刺史又由陈氏家族世袭，州县僚佐亦由陈氏在"部曲子弟"中自辟等特点，提出漳州初建时期实行的是羁縻州制度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格局和特点很有启发。

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在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的基础上，根据《括地志序略》推考出贞观十三年唐代地方行政组织的总体轮廓，当时全国凡360州，置都督府44个，诸府管州270余，不隶府之九十余州大抵分布在京畿和少数较远地区。严氏详考了各都督府管州的具体情况[4]。

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5]。一书探讨唐初的政区划分和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旧唐书·地理

---

① 《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邝文见《禹贡》1936年第5卷第10期；唐文见《西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程文见《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③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④ 严文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岑文见《史学专刊》1935年第1卷第1期。

⑤ 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

志》为主，结合其他史籍，发微钩沉，纠谬证实，设法将失佚已久的旧志所谈贞观十三年大簿加以复原。将大簿所记载的三百五十八州、一千五百五十一县逐一加以考订，落实了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属县，在此基础上考订了各州县的户口，并对各州人口密度作了估算。为了解唐初各政区及人口情况提供了便利，书末并附有唐初十道各政区州县分布图。

2. **州县　乡里邻保(胥吏)**

岑仲勉《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按州列刺史郡守姓名，颇便检索。八十年代中出版的郁贤皓《唐刺史考》从各种文献典籍、石刻拓版中广泛收集资料，进行排比校核，以考证唐代各州历任刺史(包括府尹郡守)。按所能考知的刺史在职先后次序排列，以州为单位，先列刺史姓名，后列任职年代，下注所据史料，为唐代地方行政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①。给《唐刺史考》作补遗、订正的有郁贤皓本人《〈唐刺史考〉补遗·订正》，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则利用出土文书补正了《唐刺史考》②。

许正文《论隋代州郡政区的整顿改革》认为，隋代对行政区划整顿改革最为典型：③ 一是罢州置郡，以郡统县，减少地方行政层次；二是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压缩各级行政区数字；三是裁减了约10万官吏，改变过去"清干良才，百分无一"状况。这种整顿改革既理顺了地方行政区域合理划分，节约行政经费开支，又调动了地方官吏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对以后各朝行政区域划分影响深远。张创新《唐朝地方政府行政编制论要》论述唐代的地方政府行政编制④，他首先谈到盛唐地方政府的等级

---

① 岑文见《史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3期；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郁文见《文教资料》1990年第3期；荣文见《文献》1990年第2期。
③ 《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④ 《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

结构，指出盛唐地方政府行政建制是州县两级。与州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府。府、州是编制不同、称谓各异的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二者之所以编制不同，是因为其等级的差异。同一层级而等级有别，是盛唐地方政府建制的一大特色。他还认为，"职有常守"、"位有常员"，根据州县等级各有差异地定员定编是盛唐地方政府行政建制的主体思想，官少吏多，以州县等定品位是盛唐地方政府行政编制的根本措施。

长部悦弘的《唐代州刺史研究》①，根据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将从京官迁转为州刺史的例子分为顺迁和左迁后进行了统计处理。作者提出，唐后半期这种迁转例有所增加并有向重要地区赴任的趋势，是由于唐后半期改变了前半期轻视外官的风气。张荣芳的专著《唐代京兆尹研究》是一本力作，他另有《唐代京兆少尹研究》、《唐代京兆府僚佐之分析》等论文②。

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通过对唐前后期州县等级的划分和变化总结出一系列新的历史现象③，如洛阳和长江流域的地位日益重要；划分等级的标准有所变化，后期不仅考虑政治、军事标准，而且也考虑到地区民户数量、政府税收等社会经济因素；后期河北道望县大量增多等。辻正博《唐代贬官考》将唐代的贬官者作成一览表④，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刺史、别驾、长史、司马、司户参军、县尉等作为贬官职务的各种地方官的实际情况、变化及其原因，该文通过贬官的实况充分说明了唐朝地方统治的政策。清木场东《五代的知州》，严耕望《通判不始于宋说》，均是关于五代州级行

---

① 日本《奈良史学》九，1991 年。

② 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7 年版。张氏其他两篇论文分别见《第一届唐代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出版，1989 年；台湾《东海学报》30，1989～6。

③ 《北京师院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④ 日本《东方学报》，京都六三，1991 年。

政的专论①。

关于南方州县的建置，胡沧泽《唐朝前期对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提出②，南方的福建原是个蛮荒之地，但到唐代，福建却新置了很多州县，这是由于北方包括逃户在内的广大人民南移和南方土著居民共同开发南方的结果，也与唐朝前期政府改变对逃户的严厉制裁，而代之较宽舒的政策有关。

滨口重国《所谓隋之废止乡官》揭示了隋废乡官的真实内容以及中央同时收回州刺史的兵权与属佐选任权的意义③。严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是研究唐代特别是唐中后期地方组织机构的力作④。前两篇指出唐前期府州僚佐皆中央任命之品官，即所谓"州院"，其中录事参军虽位望次于长史、司马等上佐，但职务居要。中唐后上佐位闲员省，录事参军品位骤升，成为府州僚佐组织核心，总掌州院，又增置军事判官、推官等军事僚佐，即所谓"军院系统"，其势力趋于强大，唯因州政以民事为主，故行政核心尚在"州院"。后一篇考论了方镇使府之文武二系统，特别是方镇使府的军将组织即武职系统，《通典》、两《唐书》官志均未触及，严氏勾稽史传碑刻资料，考证再现了方镇使府僚佐组织之全貌。李志生《关于唐代晚期府州上佐（上史、司马、别驾）的几点意见》⑤，对严耕望认为唐晚期中下州没有上佐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晚唐中下州中司马长史仍大量存在，别驾则可存疑，并指出唐政府屡次废置上佐的原因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

---

① 清木场东文见日本《东方学》1973 年第 45 期；严文见香港《新亚生活双周刊》1969 年第 12 卷第 12 期。

② 《福建师大学报》1992 年第 1 期。

③ 《秦汉隋唐史研究》下册，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 年。

④ 《唐代府州上佐及录事参军》见台湾《清华学报》1970 年第 8 卷第 1～2 期，其余两篇均收载于上揭《唐史研究丛稿》。

⑤ 《河北学刊》1991 年第 4 期。

要。

关于县级组织，较重要的论文有王寿南《论唐代的县令》、砺波护《唐代的县尉》、张荣芳《唐代京兆府领京畿县令之分析》等①。论文通过所搜131人次京县令、230人次畿县令任者，分析其迁转途径与过程，职掌与选任，观察地方制度的运作。他认为，京畿县令位处京师，职繁务多，虽动辄得咎，然倍受重视，升迁较易。其迁转常是中央尚书省郎官与之互换，或是地方官系统的擢升。尤其在中唐，以京畿县令为中心的内外迁转相当正常，说明在唐代普遍存在的"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中，京畿县令一职仍是唐代仕宦者争取的目标之一。尽管他们的职权与升迁转降会受到中央政局变动的影响，但对多数人而言，依任期与治绩而擢升，依常轨而运作，仍是唐代地方行政制度运作的实际。

日本学者对隋唐的乡里村坊制度作过大量研究。论文集有岩波书店一九七七年版的《中国村落制度史的研究》，专著有清水盛光《中国乡村社会论》等②。专题论文中，关于隋的乡里制，有气贺泽保规《隋代乡里制的考察》，唐代乡里制则有中村治兵卫《唐代的乡——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见》、《再论唐代的乡》等。上述论著都对隋唐乡里制作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③。中村治兵卫近年又发表《律令制与乡村制》，广泛利用正史、裨说、金石碑刻、敦煌文书等，论述了唐律令条文中里正、坊正、村正的现实活动机制，对唐前期的乡

---

① 王文见台湾《政治大学学报》1972年第25期。砺波护文见日本《史林》1974年第57卷5期，又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张文见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

② 清水盛光《中国乡村社会论》，日本岩波书店，1951年。

③ 气贺泽保规文见日本《史林》1975年第58卷第4期。中村治兵卫文分别见《铃木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64年；《史渊》1966年第96期。

里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①]。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②]，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了唐代乡政权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乡长官的选任是由县令根据各乡上报的老人名籍考核检选而定，其地位与州政府的属吏相当，构成乡政权的主要成员有乡长和两名佐史。唐代乡长官逐渐成为一个在乡区贯彻县府各项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其职权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有：主管该乡籍帐的编制和申报；处理均田土地的收授等事宜；督促征敛赋税、差科、义仓粟；协助司法，调解民事纠纷；荐留官吏、协办乡学等。杨志玖等的《乡官制》对唐代的乡官制度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论述[③]。

论述里正的职掌及其存在形态的论文有船越泰次《唐代均田制下的佐史、里正》。石田勇作《唐和五代的村落统治的变容》考论了唐代里正的实际状况及其与村落中成长着的地主阶层的联系，进而分析了唐末以降地方村落在地主阶层的领导下组织自卫及其与之相应的五代王朝重新编制村落的情形[④]。曾我部静雄《都市里坊制的成立过程》则是关于城市里坊制的专文[⑤]。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利用吐鲁番·敦煌文书，对唐代里正的职责、作用、人选及其在乡里政权中的地位进行了系统考察[⑥]。他认为，唐代前期里正比较严格地履行着唐王朝规定的有关职能，虽然只是一里的管理者，其工作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

---

① 载日本唐史研究会编《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汲古书院，1986年版。

② 《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 《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④ 船越泰次文见日本《文化》1986年第31卷第3期；石田勇作文载日本宋代史会编《宋代的社会与文化》，汲古书院，1983年版。

⑤ 日本《史学杂志》1949年第58卷第6期。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里正的工作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他还认为，在唐代，尤其在唐前期，里正由中小地主和富裕的农户充当，可能还要受县司的审核挑选，既是乡官，又是色役。里正是乡里基层政权的实际管理者，县以下建置以里为主。

关于村落组织中的邻保制，日本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颇有不同意见。其中志田不动麿的《唐代乡党制的研究》，仁井田升的《唐代的邻保制度》，那波利贞的《唐代邻保制度释疑》，宫崎市定的《四家为邻》，松本善海《以邻保组织为中心的唐代政权》，以及山根清志《唐代前半期的邻保及其机能》等可视为代表性论文。中川学的《八、九世纪中国之邻保组织》则试图对以往邻保研究中的成果和不同意见进行总结、整理，同时提出新的问题①。

在唐代职官体系中，存在着诸如地方州县录事、佐史、里正村正等外职掌人，及中央官府系列的下级职员即所谓内职掌人，这些总谓之诸色职掌人的下级胥吏地位不高，有的甚至带有徭役性质。筑山治三郎的《唐代的胥吏》是研究唐代胥吏的概括性论文②。张广达《论唐代的吏》考察了包括地方上的胥吏在内的唐代吏的构成、地位、作用等问题③。他指出，唐人对吏或胥吏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吏包括流外和杂任，狭义的吏似仅指判任的流外行署，流外非行署，流外番官。唐代官少吏多，二者比例悬殊，地位差

---

① 志田不动麿文见日本《社会经济史学》1936年第5卷第11期；仁井田升文见日本《历史学研究》1936年第6卷第10期；那波利贞文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年；宫崎市定文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50年第11卷第1期；松本善海文载上揭《中国村落制度研究》；山根清志文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82年第41卷第2期；中川学文载日本《一桥论丛》1980年第83卷第3期。

② 载所著《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日本大阪创元社，1967年版。

③ 《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别很大，流外出身颇受歧视。唐代地方上的胥吏多不入流外，但他们又多是地方豪强、勋官等有势力人物。他们在品官、流外和庶民百姓间起桥梁作用，对后世职役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四）使职、藩镇体制和宦官

1. 使职

矢野主税《“使”职的发生》是较早注意使职问题的专论。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是使职研究方面最系统的论文①。陈文总结出唐代使职差遣制的三个特征，进而论述了此制的发展过程：大抵萌芽于唐初至高宗初，形成于高宗晚年至玄宗时，定型于肃宗以后。安史之乱后形成了三大使职系统，即以节度观察使为中心的地方军政制度中的使职系统，以三司为中心的财政部门中的使职系统，以神策中尉、枢密使为中心的宦官使职系统。当时法定宰相已成为虚名，而代之以差遣性质的同平章事，从而唐朝行政制度的运行完全依赖于各种系统的使职。陈文最后还分析了唐代使职出现的三个原因。砺波护《三司使的成立——唐宋变革与使职》、《唐代使院的僚佐与辟召制》等两篇论文，前者分析了唐代财政使职“三司”的设置、内容及其意义；后者对使职自行选任僚佐的使府辟召制进行了考论，提出了使职与唐宋变革，使府群召制与新兴庶民阶层步入官界等有意义的问题②。

近年来，何汝泉致力于唐代使职研究，先后发表《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考》、《武则天时期的使职与唐代官制的变化》等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唐代转运使初探》，体现了唐代使职研究正在向

---

① 矢野主税文见日本《史学研究》，1940 年第 12 卷第 2 期；陈氏论文见《武汉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

② 分别载日本《史林》1961 年第 44 卷 4 期，《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973 年第 2 期。

纵深和专题化发展①。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专门探讨了唐代的财政使职系统②。薛明扬《论唐代使职的功能与作用》,论证了使职事权专一,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使职制度有力弥补了唐代行政体制中决策过程繁复等严重不足。君主利其便,百僚贪其权,宦官窥其隙,促成使职的地位日见提高。使职久置不废,渐成固定,对地方行政制度势必产生较大的冲击③。

关于使职的本官与封爵,有松岛才次郎《唐代"使"的本官》与《唐代"使"的封爵》。室永芳三《三司使考补说——五代后梁的建昌宫使与租庸使》、《五代租庸使的成立及其性质》则是讨论五代使职的论文④。至于节度使、枢密使方面的研究,将同藩镇官吏一起介绍。

2. **藩镇体制**

安史之乱以后,全国普设节度观察使,领统数州,兼理军民,号为藩镇。罗香林《藩镇制度沿革考》考论了诸军节度与藩镇起源,节度使与藩镇设置,藩镇职权及组织演变等问题,是关于藩镇体制较早而且比较系统的研究⑤。具体考察节度使的论著有吴诩寅的《唐节度使建置分并考》,岩佐精一郎的《节度使的起源》,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二的有关论述,以及高风林的《略谈唐代的节度使制

---

① 分别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上揭《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③ 《复旦学报》1990年第1期。

④ 松岛才次郎文分别见《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68年第19期,1969年第20期。室永芳三文分别见日本《史渊》1960年第82期,《东洋学报》1971年第53卷第3～4期。

⑤ 《社会科学丛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度》等①。

王寿南专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专门研究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②。王氏认为，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常依其本身凭藉、时势、本质、中央、政策等因素，配合藩镇个人权力欲望与自保心理之动机而决。书后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并补充其他文献资料而编成《唐代藩镇总表》，收录有唐一代藩镇姓名、到镇时间、前任后任官职、受镇去镇时间，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很有用处。王氏《唐代藩镇与宦官》、《论唐代河北三镇之独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二文③，指出中央为加强对亲中央系藩镇的控制，必须慎选藩帅，但因中央由宦官柄政，常常选用非人；而地方若为叛逆盘据，则藩帅连上任都成问题。王氏近期的《论仆固怀恩之叛》一文则分析仆固怀恩因受逼而叛④。张国刚专著《唐代藩镇研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唐代的藩镇⑤。该书认为，要把藩镇和"割据"区分开来，并把唐代藩镇分为四个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认为割据一方的只是河北三镇为代表的"河朔割据型"，在类型上，它只占四分之一，在绝对数上，它只占六分之一强，澄清了过去对藩镇割据的笼统看法。该书还认真研究了唐廷在藩镇设立的监军院和各镇在长安朝廷设置的进奏院，认为监军院和进奏院不仅是唐廷与藩镇联系的桥梁，而且也是唐廷在割据地区行使统治和藩镇在政治上奉事朝廷的象征，唐王朝通过监军得以了解方镇情况，监视地方行政，清弥兵乱，代表中央奏请和授与藩镇以旌节，因此

---

① 吴文见《华国》1975年第2卷第9期；岩佐精一郎文载《岩佐精一郎遗稿》，自家版，1936年；唐长孺《唐书兵制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高文见《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

② 王寿南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嘉新水泥，1969年。

③ 二文见台湾《思与言》7～1，1969～5；《中山集刊》1，1968～3。

④ 台湾《政大历史学报》9，1992～1。

⑤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监军普遍受到重视和礼遇。进奏院则担负了中央和藩帅转达文件、传递信息、办理杂务、提供住宿等任务，沟通了中央和藩镇的联系。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反映了唐代的割据藩镇具有游离性和依附性并存的双重特点。该书还研究了唐代的藩镇动乱，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分析其原因。对河朔三镇为什么能长期割据、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等问题也都作了有益的探讨。

李晓路《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认为①，对于唐代方镇的出现，应从地方行政体制着手分析，其原因在于唐朝前期地方两级行政体制的缺陷，道与都督府的建立为方镇的出现做了准备，唐代的藩镇乃改造都督府而成。余衍福专著《唐代藩镇之乱》对唐代藩镇也作了专门研究②。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指出③，各藩镇内部的统兵体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和州下各县的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小的军区。他在另一篇《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对唐代藩镇军将职级做了探讨④，指出，唐代藩镇主兵军将大约可划分为都头（都知兵马使）、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侯、十将、副将等职级。兵马使之下有十将，都虞侯大约与副兵马使同级，最低者为副将。散兵马使、散十将、都虞侯、皆不统兵。同兵马使、同散兵马使、同十将军，具有阶官性质。王赛时《论唐代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指出藩镇军队由兵将帅三级构成⑤。兵是军队的主体、基础，将为骨干、支柱，二者构成决定性力量，作为帅的节度观察使虽有最高统军权，却不能完全违背将士利

---

① 《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余衍福著《唐代藩镇之乱》，联邦，1980。
③ 《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
④ 《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
⑤ 《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

益，三者相互依靠又充满矛盾，故藩镇军队长期不稳。

矢野主税《藩镇亲卫军的组织与性质》与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构造》，探讨了藩镇亲卫军的构成及其与节度使的关系①。对于节度使与家兵之间的义父子关系，日本学者很注意，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认为这种假父子关系有集团型与个人型之分，唐代藩镇家兵集体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到五代，节度使与普通镇将之间也分别结为假父子关系，反映这一时期私人乃至家父长关系的深化。谷川道雄《河北三镇节度使权力的性质》不主张从私人、个人关系来理解藩镇体制，认为只有节度使的公正态度才能保证兵士生存的条件，军队哗变正是对节度使私权化倾向的批判②。

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论这一现象的。王育民《论唐末五代的义兵》指出牙兵起源于少数民族养子制和汉族武装部曲制的影响。牙兵在唐末守卫牙城，保护主帅，在五代随主帅进行兼并战争，并支持、协助主帅谋夺王位。基本特点是凶悍、骄横、作乱原因则为追求荣华富贵与赏赐，或眷恋家园不愿远戍。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认为私兵募佣制对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起着为虎作伥的作用，亲军义儿则是这一制度的伴生物，至北周时代方始消亡③。王赛时《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指出中唐以后军队由府兵而方

---

① 矢野主税文见《长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1951 年第 1 期；堀敏一文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20 册，1959 年 11 月，又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 年。

② 栗原益男氏论文见日本《史学杂志》1953 年第 62 卷第 6 期；谷川道雄氏论文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78 年第 74 期。

③ 傅文见《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1981 年增刊；王文见《北京师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谷文见《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镇，由征兵而召募的演变，使军队成分结构发生变化，从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品官子弟、富户变成市井无赖与亡命之徒等复杂成分组成的结合体，兵将关系及军人生活来源也发生若干变化，从而导致骄兵悍将的出现①。

关于藩镇的组织结构，前文“地方职官”部分提到的严耕望的《唐代方镇府僚佐考》是基础性的系统研究。砺波护《唐代使院的僚佐及辟召制》分析了节度使职亲自选择僚佐的情形及其意义。杨志玖、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认为此判有利有弊，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因其有利于调整唐王朝的用人政策，弥补科举制的种种不足，常能使一些抱器之士脱颖而出②。张国刚《唐代进奏院考略》，以丰富的文献材料考证了唐代藩镇在长安所置进奏院的建置与职能③。

渡边孝《唐・五代的衙前称号》、《唐・五代藩镇的押衙（上）》二文④，作为藩镇体制的基础研究探讨了衙前称号、押衙职号的变迁。他认为，押衙起源于行军制下牙旗押领的职务，在藩镇体制下其他地位是比较高的，及至九世纪后半期，它的地位下降了，还出现了参与庶务、吏职事务的人员。钱伯泉《〈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研究》一文⑤，通过对在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文书的释读和研究，探讨了唐代藩镇孔目官的设置及其职掌。

除了对藩镇作整体研究，一些论文继续对藩镇作区域研究。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一文⑥，分析了魏博镇在地理上的重要性，

---

① 《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
② 砺波护文见《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973年第2期；杨志玖等论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③ 《文史》1983年第18辑。
④ 分别见日本《社会文化史学》二八，1991年；《东洋史论》六，1988年。
⑤ 《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⑥ 《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指出宪宗得之，遂成中兴之业；朱全忠得之，遂压倒李克用，成篡唐之势。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则认为[①]，由于五代各朝加强对中央禁军的建设，改变了唐后期内轻外重的现象，魏博镇由此衰落。吴光华《唐代卢龙镇初期之政局》及《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二文[②]，主要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形成幽州的地域主义，并以昌平政权为核心，探讨卢龙镇的政治。谷川道雄《关于河朔三镇藩帅的继承》一文[③]，认为藩帅的选任主要由军人决定，藩帅与军人不是主从关系，而是“伙伴集团”，在河北三镇，藩帅想脱离这个集团，就很容易发生废立之事。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对亲中央的藩镇作个案研究[④]，分析位于洛阳附近的忠武军在中晚唐的发展，以观察地方藩镇武力与唐代后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黄利年《唐京西北藩镇述略》则专门研究了唐京西北藩镇[⑤]，认为这一藩镇恢复了唐初在关中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布局，改变了内轻外重的状况，使得唐王朝能在安史之乱以后继续维持统一局面百余年。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认为[⑥]，平卢节度使南迁齐鲁地区，是唐朝国力衰落的结果，该节度使仍保留“押渤海”，经略边疆的某些重任，对海疆及海上经营与开拓做了很多工作。

3. **宦官**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唐中后期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内廷宦官勾结外廷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外朝士大夫朋

---

① 《魏晋南北朝清唐史资料》第11辑。

② 分别见《史原》11，1981～12；《晚唐社会与文化》。

③ 见《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年。

④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3。

⑤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⑥ 《北方文物》1994年第4期。

党之动态即内廷阉氏党派之反影"，"内廷宦官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宦官决定党争的结局。"①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认为宦官诸职制和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长久持续的原因②。程宗才《论唐前期内朝对相权的分割及影响》认为，内朝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皇帝欲以内朝心腹来分割外朝宰相的权力，终于导致内朝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促成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③。

关于宦官的职制，矢野主税有《唐代枢密使制的发展》与《唐代监军使职的确立》等论文④。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专门对宦官担任枢密使进行考察⑤。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则考察了宦官担任的宣徽使，认为宣徽使不但是通管北衙诸司、地位高于诸司使的宦官首领，而且它还利用亲近皇帝之便参与机密，成为中晚唐内廷中枢决策的主要成员，对于中晚唐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⑥。李郁《唐末士人枢密使和后梁崇政使的设置及其影响》一文，叙述了朱全忠诛杀宦官后士人枢密使的出现及其对五代宋初中枢官职的影响⑦。关于宦官的军权留待兵制一节介绍。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指出，唐代皇帝专横不仅表现为中尉掌握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还表现在有一个宦官指挥的分部细密组织庞大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这一点尤为历代所罕见。唐文勾稽资料对北衙首领中尉、枢密使、宣徽使及其所统内诸司使的设

---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1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新 1 版。

② 日本《史学杂志》1954 年第 63 卷第 10 期。

③ 《山东社会科学》1992 年第 1 期。

④ 分别见《长崎大学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1953 年第 3 期；《西日本史学》1954 年第 4 期。

⑤ 《唐史论丛》第 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⑥ 《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⑦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 年版。

置、职掌进行了探讨，进而分析了内诸司使在五代至宋初的演变①。唐氏在新著的《山居存稿》一书中还有一篇《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②。

赵雨乐《唐代内诸司使的构造》也论述了唐代的内诸司使，他在另一篇《唐代的飞龙厩和飞龙使》中，探讨了唐代内诸司使之一的飞龙使及其管辖下的飞龙厩的建立过程、内部结构及作用等问题③。室永芳三《唐代内侍省的宦官组织》探讨了内侍省宦官组织中"高品、品官、白身"的形成及其三者在身分和职官地位上的不同。他在另一篇《唐末内侍者内养小论》指出，被称为内养的宦官身分存在着高品、品官、白身等各个不同的身分阶层，其特点是与皇帝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④。加藤繁《内庄宅使考》从庄园角度考察了内庄宅使，引证甚详⑤。

齐陈骏等《唐代宦官述论》认为司马光关于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的说法大体正确，宦官专权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⑥。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认为，唐朝中后期，宦官掌握兵权，并逐渐形成制度，这是唐朝宦官专权的一个重要特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是唐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其中宦官专权又起了主要的作用。宦官在处理藩镇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上，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⑦。牛志平《略论唐代

---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3年第5期，1984年第6期。

② 唐长孺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分别见《东洋史研究》，1992年第五〇卷第四号；《史林》七四一四，1991年。

④ 分别见《日野开三郎颂寿纪念论集》，日本中国书店，1987年版；《社会科学论丛》，长崎大学教育系，四三，1991年。

⑤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⑥ 齐陈骏等论文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⑦ 《求是学刊》1987年第4期。

宦官》则认为对唐代宦官的作用不宜全面否定，宦官专权根源于封建的皇权体制。宦官对调整君臣关系、控制地方藩镇维护中央集权起了积极作用[①]。马良怀《唐代宦官考述》认为，宪宗时枢密使制的确立，既标志着新中枢体制的完全形成，也说明宦官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唐代中后期在其方镇林立的局势之下，如果不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中枢体制，唐王朝将难以顽强地生存一百多年，而宦官作为唐代中后期新中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唐王朝的生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②]。宋衍申《唐代的宦官与皇权》不同意将宦官专权原因归之于封建体制的观点，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皇帝的昏弱[③]。何灿浩《试论唐代中后期君主对宦官之策的特点及其原因》认为唐代中后期君主所构建的基本上是一个内廷外相相制的二元体制，宦官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君主对宦官之策实质上是在维护二元体制前提下对该体制的改善，因此具有不易宦官权力的特点[④]。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重点剖析了几个典型宦官世家，指出其形成的原因在于宦官养子，财产继承及士大夫仕宦世家的影响[⑤]。综论宦官的论著有王寿南的《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⑥]。该书分析考察了唐代内侍省组织与职掌，宦官权势的获得及其维持、演变，认为唐代宦官得势对政治有害无利，是唐朝衰亡的重要祸源。

(五)选举及学校

1. 科举

---

① 《陕西师大学报》1985 年第 1 期。
② 《厦门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③ 《东北师大学报》1985 年第 5 期。
④ 《宁波师院学报》1992 年第 1 期。
⑤ 《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⑥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71 年版。

科举制是隋唐之际新兴起来的一种选官制度，最早对此制进行较全面的考察的论文，当推陈东原《隋唐的科举》①。陈文包括隋置进士科考，唐科举为平民而设，唐之科目，考试情况，登第之荣，科举流弊及时人的批评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他综述性论文有曾资生《唐五代的岁贡科举》，王亚南《支持官僚制度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任育才《唐代科举制度述论》，以及乌廷玉《唐代的科举制度》等②。近年出版的新著有吴宗国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③。

一般认为，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建立。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根据房玄龄举进士年龄及其享年，推测开皇时已出现了进士科。岑仲勉认为开皇中即或有进士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进士科，进士科还是始于隋炀帝改制。陈直通过考证，将进士科的始年明确定于隋炀帝大业元年④。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否认进士科首创于隋，认为隋虽摒弃九品中正制，但除新增一些取士科目外，只能重新恢复汉代征召察举制。科举制形成应具备三个特征，这些特征在隋代仅有个别方面萌芽，科举制的正式形成应在唐代。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对何文否认隋置进士科的两条理由进行了分析，指出把"投牒自进"作为科举制与荐举制的最根本区别不妥。周东平《关于科举制度起源的几点意见》也论证进士科非创自唐，而

① 《学风》1932 年第 2 卷第 8 期。

② 曾文见《东方杂志》1944 年第 40 卷第 8 期；王文见《时与文》1947 年第 2 卷第 14 期；任文见香港《文史学报》1977 年第 6 期；乌氏论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1 期。

③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④ 韩文载所著《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岑意见见所著《隋唐史》第 195 页，中华书局，1982 年新一版；陈直《古籍述闻》，见《文史》1963 年第 3 辑。

创置于隋，科举制的特点应是科目众多，分科举人，对何文所举三个特征提出质疑①。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否定科举始于隋或唐，认为科举应始于汉代，汉唐科举一脉相承。在科举体系、组织步骤、考试环节三大要素上，汉代察举与唐代科举基本一致，唐代科举只是在怀牒自投，举、选相分，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等技术环节上有重大发展。汉代实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②。

张荣芳《隋唐秀才科存废问题之探讨》，根据文献、石刻史料反驳了过去认为秀才科停废于高宗永徽二年的说法③。刘海峰《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则主要通过对"秀才"名目演变的考察，指出永徽二年后，并无一名秀才及第者，秀才科名存实亡，所谓"举秀才"只是"进士"及第的美称④。关于科举考试的科目、录取、放榜方面的论文很多，如陈森《唐代的考试制度》，赵明义《唐代科举考试述评》，吴宗国《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等⑤。大野仁《唐代进士试的考试时间》认为，进士考试原则上是昼试，但在唐代后期，由知贡举裁度，有时有夜试，即把时间延长到第二天清晨⑥。

关于进士科的地位，韩国磐认为，进士科经过唐初的发展，渐渐重要起来，高宗以后各科中唯进士科独尊，成为封建士大夫的重要入仕途径。卓遵宪亦认为，进士科大抵至贞观、永徽之际始盛，武

---

① 何文见《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金、周文均见《历史研究》1984 年第 6 期。

② 《历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

③ 台湾《食货月刊》1981 年第 3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⑤ 陈文见《世界月刊》1948 年第 3 卷第 3 期；赵文见台湾《复兴冈学报》1978 年第 18 期；吴文见《历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傅文见《文史》1986 年第 23 辑。

⑥ 见《布目潮沨博士古稀记念论集・東アジアの法ヒ社会》，汲古书院，1990 年 5 月刊。

后起进士成为士人出仕之唯一正途，这种情势到玄宗时乃成定制，中晚唐进士几乎垄断政权①。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官吏的选拔》、乌廷玉《唐朝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等文认为，唐前期进士科取士日渐重要，但尚未成为一般地主子弟仕宦的唯一途径，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直到贞元、元和间此科方居独重地位，及第进士大量进入中高级官僚行列。宪宗以后，进士在宰相和高级官僚中占居绝对优势②。吴宗国《进士科与唐代后期的官僚世袭》指出唐太和年间停止制科，从而使进士科在唐代后期成为高官垄断高位世任高官的工具③。

陈寅恪在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武后时之祟尚进士文词之科及其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的崛起，促成了关中本位政策的破坏与关陇集团的分崩。陈氏进而认为进士科主文词为高宗武后以来的新学，明经科专经术为两晋南北朝的旧学，中唐后之牛李党争即以进士科为分野，牛党藉进士科进身，为新兴统治阶级，李党依凭门第，重经术旧学，为山东旧士族阶级。在陈氏的研究基础上，许多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论证。如韩国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科举制和衣冠户》，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等④。也有不少人对陈氏观点提出质疑，岑仲勉就对进士科代表新兴阶级之说表示保留，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是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问题，以进士科划分牛李

①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阜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第155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

② 吴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乌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③ 见《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④ 韩文均收藏所著《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张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

二党不足以科学解明二党的社会基础[1]。毛汉光《唐代士大夫的进士第》一文，运用计量方法，对唐代十八家大士族任官为相的门第因素和科举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在唐后期的一百年中，十八家大士族子孙纯以门第因素为相者仅占16%，带进士第为相者则高达82%，作为李党代表的赵郡李氏之为相者，也是带进士第的居多，因而此间发生的牛李党争不可视为新进寒素进士与旧门之间的斗争。毛文又指出即使在同一高门的兄弟之间，带进士第与否亦成为仕途畅达与否的关键，因此，进士第成为大士族藉以振兴或延续其家族势力的重要因素[2]。上揭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全面论述了进士科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并附有大量图表及参考书目。

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指出，唐代选举制度适应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急剧转变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创造性、进步性和变动性，唐代科举制度作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成为支持官僚政治的有力杠杆，改变了隋以前由门阀世族把持朝政的格局，扩大了参政范围，调整更新了官僚机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3]。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则分析了科举制度的消极面，指出科举制度的推行使盛唐知识阶层与封建专制政治彻底合流，知识阶层从此不再作为专制统治者的异己势力而存在，为君主集权的急剧发展铺平了道路。知识阶层自身发生蜕变并染上官僚集团的全部恶习，价值观念蜕变，而考试的教条化导致学风颓坏，禁锢了知识阶层的思维和创造力，影响了整个阶层的素质[4]。赵守俨《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对科举制的作用、影

---

① 岑意见见上揭岑著《隋唐史》第18节。胡文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②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载台北《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辑1978年。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④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响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丰富[1]。

唐代进士与文化的关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有代表性的论著[2]。

对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举科目进行考察论述的有盛奇秀的《唐代明经科考述》、《唐代明书科考述》等[3]。

2. **制举　吏部举　南选（荫任等）**

关于唐代的制举，刘恩惠《唐代制举初探》认为，制举始置于贞观，盛于永徽至天宝，大中六年后不行。此制虽不常行，录取数量不多，但能破格拔人，地位比进士科高[4]。槻木正《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的实施》推定此二科的设置是为了补救选举中"循资格"的弊端，以提拔贤能。并对二科的实施、意义、创始者及其创始时间进行了考证[5]。

松本明《唐代选举制诸问题》特别就科举及第者接受吏部选作了论述，讨论吏部铨选的论文还有任育才《唐代铨选缺席论述》，筑山治三郎《唐代官僚与吏部选举》以及高风林《略谈唐朝的铨选制度》等[6]。黄正建《唐代吏部科目选》认为，吏部科目选是唐为补充吏部常选不足所设的加速人才升进的铨选方式，并以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科为重点，探讨有关两科设置的情况和其他科目选及吏部科目选的特点和意义[7]。吴宗国专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也专门谈到科目选，认为科目选是开元中从制科中分离出来的，宏词科、

---

① 《历史论丛》第3辑，齐鲁出版社，1983年。

②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分别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2期；《文史哲》1987年第2期。

④ 《松辽学刊》1984年第3期。

⑤ 载日本关西大学《法学论集》1987年第37卷第4期。

⑥ 松本明文载《铃木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1975年版；任文载《唐史研究论集》，台湾鼎文书局，1975年版；筑山治三郎文见日本《史林》1960年第72期；高文见《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⑦ 《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拔萃科是科目选最重要的内容。拔萃科由制举发展为科目选在开元十年，博学宏词科则在开元十九年。由于开元中年后，玄宗不再通过制举选拔政治人才，但因选拔才能之士的实际需要和朝野的压力，唐王朝在铨选中设置科目选，让那些选限未至的才能之士得以不拘选限而授职。唐代后期，科目选的地位更是日益显得重要。文宗大和二年制科停止后科目选就成为通过考试从贡举及第人和低级官吏中选拔政治人才的唯一途径①。

宁欣《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指出，从唐初到开元年间是铨选制度的完善阶段，并分析了与铨制度完善的同时产生的流弊及其原因②。刘海峰《唐后期铨选制度的演进》认为，唐后期的铨选制度并非已废坏到"无可道"的地步，而是还有演进发展，表现为三铨注唱程序的沿用，辟署奏官盛行，南选扩展及变化，小选的恢复及科目选的发展等诸多方面③。

张泽咸《唐代的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指出，南选是唐朝在江淮以南新设置铨选制度，武德贞观之际即已存在，江淮南选未成定制，黔中岭外的南选终唐之世未变。此制与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关④。

黄留珠新著《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探讨了包括隋唐的科举和铨选在内的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规程，指出，隋唐的科举制是通过考试选官，择优录用。这种制度直接为统治机构吸引、凝聚人才，对于民族心理基本倾向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科举制是一种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的较完备的选官制度⑤。

---

① 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② 《北京师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④ 《文史》1984 年第 22 辑。
⑤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除了科举之外，唐代还有荐举等形式，刘太祥《论唐代荐举制度》认为唐代有四种荐举形式，即对隐逸之士、茂异之才的荐举；对应科举人的保荐；对官吏任用及改转升迁的荐举；皇帝派遣到地方的使臣荐举官吏①。

关于荫任入仕制度，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对之进行了详考。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也探讨了这个问题②。田廷柱《唐代门荫制度考论》论述了唐代门荫制对官员用荫的权限与范围、受荫者出身、叙防的官品等次、入仕的途径等各项明确、具体和较严格的规定，说明荫子制到唐代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较汉魏、南北朝更趋于完备③。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认为，隋唐五代时期的门荫制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在唐前期的诸种选官形式中，门荫入仕者虽仍占较大优势，但从入仕起点及升迁极限看，门荫入仕群体在选官体系中的整体层次呈明显下降趋势，在唐后期，这种下降速度更为加快，而且门荫特权享有者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加④。黄正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以斋郎和挽郎为重点探讨了唐代门荫入仕的问题⑤。

郭峰《唐代流外官试探》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代流外官制度的来源及其范围、铨选、考课、转迁、俸禄、作用等问题。认为流外官是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他们的办事才能和效率直接对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发生影响。流外官由以前的品官下降为胥吏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

① 《许昌师专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② 毛文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4 年第 55 本第 3 分册；爱宕元文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76 年第 35 卷第 2 期。

③ 《历史教学》1986 年第 3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3 年第 4 期。

⑤ 《史学月刊》1989 年第 1 期。

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1]。王永兴《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在对《通典》所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中流外官部分的评细校勘的基础上，并结合其他材料，对唐代流外官进行研究。认为流外官的迁转依品秩高低顺序进行，并经过铨试。流外官入流限制严格，至少需经过六考，而且要分清浊。并从四等官制和勾检制的角度研究了流外官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2]。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针对流外官、胥吏、杂任、职掌人的概念和相互关系，指出流外官一般可称为胥吏或吏，流外官不是杂任，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无官品，流外官和杂任属于职掌人，但不是说职掌人就是流外官或杂任[3]。

关于散官制度的论文有马小红的《试论唐代散官制度》、黄正建的《唐代散官初论》和王德权的《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试论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过程》等[4]。

3. **学校教育**

与科举相关的学校教育制度，台湾学者高明士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如讨论官私学制的有《唐代的官学行政》、《唐代私学的发展》；讨论庙学制度的有《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分论隋唐五代学校的有《隋代的教育与贡举》、《隋唐的学官——以国子监为

---

[1] 《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2] 《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 《唐史论丛》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出版。

[4] 马文见《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黄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王文分别见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1，1989～7；《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例》;《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五代的教育》等①。

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之研究》是总论唐代学校、教育的专著②。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揭示了唐人习业应试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特点,并论及书院制度的起源③。相关的论文还有夏雨《隋代的学校教育考述》、刘海峰《试论唐代教育的开放性》等④。

刘海峰新著《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将唐代的教育、科举、铨选三种制度作为一个以人才的培养、选拔到任用的整体进行综合的全面考察,先从客观上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分别对三个制度选取几个专题进行微观剖析,并着力探讨这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科举出身和铨选入仕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贯穿于唐代教育、科举和铨选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展开较为专门的讨论,揭示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的发展规律,总结其利弊与经验教训⑤。

赵文润主编的《隋唐文化史》有"学校与科举"一章,专门论述隋唐时期的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和知识分子的入仕途径诸问题⑥。

---

① 分别见台湾《大陆杂志》1968 年第 37 卷第 11 期;《文史哲学报》1971 年第 20 期;《台大历史系学报》1982 年第 6 期。《台大文史哲学报》1993 年第 6 期;《大陆杂志》1984 年第 69 卷第 4～5 期;《台大历史系学报》1990 年第 12 期;《台大历史系学报》1977 年第 4 期;《大陆杂志》1971 年第 43 卷第 6 期。

② 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之研究》,日本不昧堂书店,1953 年版。

③ 载上揭严著《唐史研究丛稿》。

④ 夏文见《教育丛刊》1986 年第 3～4 期;刘文见《福建论丛》1987 年第 5 期。

⑤ 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文津出版社,1991 年版。

⑥ 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 年出版。

(六)监察、考课、俸禄与封爵品阶

1. 监察

全面考察唐代官吏监察制度的有徐连达等的《唐代监察制度述论》①。徐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发展到唐代臻于健全,御史台已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监察机构,御史分察六部、分巡京畿内外、分按各道州县兼知馆驿仓库的制度,在开天时代全面建立、完备。此后监察机构削弱,御史地位下降,地方监察区演变为军事、行政区,唐朝也从此走向衰落。李福登《唐代监察制度》,任育才《唐代监察制度之研究》,也是综考监察制的系统论著②。

张国刚专著《唐代官制》中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唐代的御史台。书中详细探讨了御史台的机构和职权,御史台官吏御史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自具体的职掌、选任及其变化。认为:唐代是御史监察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的时代,魏晋以来因事而设,职权不清的御史更进一步系统化、条理化,监察机关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益显著的作用③。他在另一篇与杨志玖合作的《"制临百司,纠绝不法"——唐代的监察机关》中进一步指出,唐代以御史纠弹百官,同时,御史纠弹正确与否则又受到尚书省左右仆射和左右丞的制约,这是唐代监察机构完备成熟的表现④。胡沧泽《唐代御史大夫考论》探讨了唐代御史台主要长官御史大夫的职能、地位、设置及其变化。认为御史大夫的职掌主要为弹劾百官、推鞫狱讼和监察礼仪。御史大夫地位尊崇,其选任往往由皇帝直接决定。唐前期,御

---

① 《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

② 李福登《唐代监察制度》,台湾私立台南家政专科学校,1977 年版;任文收载上揭《唐史研究论集》。

③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第四章"监察机关——御史台",三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④ 《文史知识》1985 年第 8 期。

史台虽屡经变革，但御史大夫依然是御史台的主要长官，位高权重，威权显赫。肃、代时期，御史大夫并非“官不常置”，而是年年都有御史大夫在任。德宗建中、兴元年间，也是年年都有御史大夫在任。德宗贞元以后，由于藩镇的发展、宦官的专权，加上德宗皇帝本人的好猜忌等性格，导致了御史大夫不常置，而实际以中丞为宪台之长。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唐末①。八重津洋平的《唐代的御史制度》也论述了唐代的御史制度。

胡沧泽新著《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全面、系统论述唐代御史制度。作者将唐代御史制度置于整个唐代政治统治体系中进行探讨，认为唐代御史台自成一个系统，机构完整。御史台职能广泛，不仅具有监察权、而且取得了部分的司法审判权，对财政经济工作也建立了监督权，形成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司法无所不察的局面。御史台在行使权力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御史台长官可以自荐御史、对皇帝的诏命有时可以拒受等很多方面。御史台在履行职责中与其他职官产生一定的关系，在各种的矛盾运动中，皇帝的权力总是起决定的作用，御史台和中枢机构的分立和制约，从全局上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该书附录部分搜集各种史料、索隐勾沉，制成唐代御史大夫表、御史中丞表、侍御史表、殿中侍御史表、监察御史表五个表，各表按年代为序，列出各年的官吏名单，材料出处，并作了考证，对唐代御史制度的研究很有价值②。

对于御史台的具体职掌及其变化，也有一些专文论述。张碧珠的《唐代御史台组织与职权的研究》论述了御史台的各种具体职权③。胡沧泽《唐代御史台的弹劾权》对御史台的主要职权弹劾官吏权进行了探讨，对弹劾的提出、对象、依据、程序和仪式、效果和

---

①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② 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 年出版。

③ 台湾《社会科学杂志》1975 年第 23 期。

作用，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文章在分析唐代的历次弹劾事件后认为：弹劾效率的高低，与朝政吏治好坏的总趋势，与中央权力升降均有密切关系①。他的另一篇《唐代御史台司法审判权的获得》探讨了唐代御史台的另一重要职权司法审判权，认为：御史台是通过推鞫狱讼、创设台狱、首创"三司推事"、建立"三司受事"等多种方式而获得司法审判权的。御史台既是中央监察机关，又是三大司法机关之一，其职权无疑是扩大了②。

对唐代御史台的作用，李俊恒《唐代御史制度浅论》将它归结为四点：1. 加强君主专制，维护封建等级统治；2. 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3. 保障封建法律的顺利贯彻和执行；4. 打击贪官污吏，促进政治清明③。关于唐代的地方监察，谢元鲁《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指出，唐代先后出现御史台、临时使臣、宦官三种地方监察系统，三者互为补充，成为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在唐代的出使监察制度中，御史台是最早建立的，也是最为正规的系统，御史出巡制度的建立，对于自下而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使中央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各地的情况④。何汝泉《唐代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考察了唐代前期地方监察制度的由来和发展，指出唐代前期不仅继承了前代御史监州等制度，而且设置了更具权威的地方监察使职。唐前期由监察御史和监察使臣并存成为地方监察官。监察御史按处的是有预定目标的已经暴露的案件，使臣的巡行则旨在发现问题。监察御史的派遣有严格的规定，而使臣则机动性较大，有利于行使职能⑤。

在史料的整理挖掘方面，池田温《韩琬的〈御史台记〉》收集了

---

①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报》总第7号，1994年5月。
② 《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许昌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④ 《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3期。
⑤ 《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有关唐代御史台的重要史料《御史台记》的佚文，试图复原其原型，这对于深入研究御史台有很大价值[1]。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唐《御史台精舍碑》是记载御史台情况的珍贵文物，胡留元、冯卓慧《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认为，唐《御史台精舍碑》是件难得的法制史文物，它以石刻史料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为研究唐代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狱政措施以及立法状况与法制思想，尤其是宗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表明，唐朝在其封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中，不仅设置台狱，而且于台狱之内又置精舍（佛舍），这一重要的狱政措施，反映了佛教思想对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2]。关于御史台置狱，王素《唐代的御史台狱》研究了御史台狱的置废时间、设置原因、构成规模、职掌权力等，认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御史台，其狱的作用不同于国家正规执法机关中的狱[3]。

王永兴在《试论勾官》、《再论唐代勾检制》等文中，以大量翔实的材料，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在唐代内外官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勾官的设置，从而形成了一种行政监察性质的勾检制度，主要包括尚书都省为首的一般行政勾检与尚书比部为首的一般财政勾检[4]。在此基础上，王永兴发表了专著《唐勾检制研究》，详细而全面地论述唐勾检制及其实行的实际情况，指出唐代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行政办事效率较高较快，这两者都和官制中的勾检系统密切关联[5]。

---

① 《布目潮沨博士古稀记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5月刊。

② 《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

③ 上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④ 分别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⑤ 王永兴著《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 **考课(甲库)**

高世瑜《唐代的考课制度》系统考察了唐代官吏考课的权属、方式、定考标准、黜陟办法及其对于改善唐代吏治的作用,还叙述了唐代历朝进行考课的实际情况①。曾一民《唐代考课制度研究》是全面研究这一制度的专著②。相关论文还有张金鉴《唐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筑山治三郎《唐代的考课》等③。与官吏铨选、考课相关的唐代甲库制度近些年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左虹《唐代甲库评述》,葛承雍《唐代的甲库考察》均认为甲库是唐朝的国家官吏人事档案库,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管理制度④。

3. **俸禄**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从元、白诗中有关俸料的内容出发,参征其他史料,对唐代官俸制度是行了考察,并提出内外官俸料随着中唐前后内外官地位的彼此升降而发生厚薄变化,从而为尔后的唐代官俸研究提供了思路和门径⑤。清木场东《隋唐俸禄制的研究》全面研究了俸禄制度,对正官以外的员外官、散官、内外诸司品直、致仕官以及解官充侍等官吏的俸禄问题亦作了阐述⑥。

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唐代官俸的研究趋于活跃。阎守诚《唐代官吏的俸料钱》认为仪凤三年(678)诏书应为户税用于官俸的最早文字材料,开元十八年(730)以后官吏俸钱来源全靠户税,不再用公廨本钱。刘海峰《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认为唐代以户

---

① 《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

② 曾一民《唐代考课制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③ 张文见台湾《考铨月刊》1952年第16~17期。筑山治三郎文见日本《史潮》1961年第25期。

④ 左文见《成都档案》1986年第4期;葛文见《人文杂志》1987年第1期。

⑤ 《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

⑥ 日本《产业经济研究》1985年第26卷第2期。

税充官俸的年代上限当为乾封元年(666),开元十八年后也未完全以户税为俸料来源,直到唐后期仍有一些地区以公廨本钱充官俸。王珠文《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的几点意见》,认为刘海峰文根据不够充分,天宝时外官俸料来源即是户税而非公廨本钱。刘海峰针对王文的批评,又《再析唐代官员俸料钱的财政来源》进行商榷,重申己见①。针对学界对唐代官员俸料钱来源的不同看法,陈明光《试论唐前朝官员俸料钱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认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来源与国家的财政赋税状况密切相关,对该问题的理解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唐代财政活动状况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他指出,唐代官员俸料钱来源经历了一个由国家年度预算外支出转为预算内支出的演变过程,京官与外官演变时间的差异是辨析以往歧见的关键所在②。

葛承雍所著《唐代国库制度》一书也专门谈到俸钱,指出俸钱是国库支出的重要项目,是构成国库的基本职能之一,认为唐代国库支出俸钱制度比较复杂,有京官和州县地方官的分配差异,粟帛支付逐步向货币发放的演变,前期与后期俸料的递增起伏等,作者还对京官俸钱、外官俸钱、以及俸钱支出的具体状况和变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③。

过去一般认为唐代内外官俸料钱的厚薄变化始于安史乱后,刘海峰《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认为早在开天之际,外官俸料钱已出现超过京官的迹象,安史之乱后更普遍高于京官,唐后期轻内职重外官的原因很多,俸禄厚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④。王

---

① 阎文见《晋阳学刊》1983 年第 2 期;刘文分别见《晋阳学刊》1984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王文见《晋阳学刊》1985 年第 4 期。

② 《史林》1992 年第 1 期。

③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 年版。

④ 《厦门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

振芳《唐安史兵兴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指出，安史乱后，官吏俸制陷入混乱，一方面给俸困难，另一方面，不少要员又大发国难财，中饱私囊，大历十二年制定俸制，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因无力剥夺各级官吏攫取的高额收入，只能承认现实，采取妥协政策，致使官员的俸料钱较开元俸制大幅度增长，并开创了唐后期不按官品定俸的新俸制。后来的贞元制俸、会昌制俸都是因袭大历制俸而有所改动的①。从其他角度探讨俸禄制的论文有陈贻麟《隋代的俸制和吏治》，横山裕男《唐代月俸制的成立》，马长林《唐代官吏的罚俸制度》等②。

4. **封爵　勋品　左迁致仕（告身）**

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与食封制》是较早注意封爵制度的论文③。韩国磐《唐代的食封制度》考察了唐代食封制的渊源变迁，认为两汉的封邑制到曹魏时出现虚实之分，唐代的食封制由虚封发展而来，到唐后期，食封形同俸赐，已非封邑原义，及至唐末五代"罢食封之给"，实封遂成虚名④。徐连达《隋唐的封爵制度》认为重建大一统的隋唐，封爵制逐步健全、规制内容比两汉更趋成熟，本身也经历不断变化，对后世封爵影响重大⑤。

山根清志《关于唐代前半叶的食实封制》认为唐初不存在封家封户离开国家而直接发生关系的情形。砺波护《唐代食实封制再考》讨论了唐代亲王公主的食实封问题，指出过去有人将"以三丁为限"、"七丁为限"的"丁"字理解成"千"字是不妥的，确认仍以

① 《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陈文见台湾《大陆杂志》1958年第16卷第6期；横山裕男文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68年第27卷第3期；马文见《历史教学》1984年第6期。
③ 日本《东方学报》1939年第10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⑤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丁"字为宜。黄正建《关于唐代封户交纳封物的几个问题》是探讨封户负担的专论①。

杨志玖等《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概述了这一制度的内容、特点。松永雅生《唐代的勋官》论述了唐代勋官制度的演变，提出了勋官的"色役人生"问题②。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和勋官》认为，从西魏到唐初，散官勋官经历的演变过程中的主要线索是争夺"本阶"或"本品"的地位，主要背景是新兴的关陇贵族同山东旧士族的门第之争。唐初再度降低勋官品秩，继而明确规定以散官为本品，其目的是迎合山东社会的传统心理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削弱旧士族的社会影响③。有关论文还有金毓黻《敦煌写本天宝官品令考释》，西村元佑《唐前期勋官相对价值的增长与绝对价值》，根本诚《唐代衔的发展》等④。日本学者还发表了一些对日唐封爵品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如时野谷滋《唐的官品令与我国的官位令》、曾我部静雄《中国的品阶制度与我国的位阶制度》等⑤。

研究官员的左迁、辞职、致仕、休假等制度的论文有筑山治三郎《唐代官僚的免官与除名》、《唐代官僚的辞职及被拒绝》，根本诚

---

① 山根清志文见日本《历史学研究》1982 年第 505 期；砺波护文载《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日本汲古书院，1986 年版；黄文见《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② 杨等论文见《文史知识》1985 年第 12 期；松永雅生文见日本《西日本史学》1952 年第 12 期。

③ 《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④ 金文见《说文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10 期；西村元佑文见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纪要》1979 年第 8 期；根本诚文见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963 年第 9 期。

⑤ 时野谷滋文收载《律令封禄制度史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馆 1977 年版；曾我部静雄文载《以律令为中心的日中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8 年版。

《唐代官僚的旬假》,平冈武夫《七十致仕——白居易的情形》等[1]、李翔《唐代致仕制度初探》论述了致仕条件、致仕程序和致仕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唐代致仕制度对于保证官员正常更替和前后衔接,稳定文官队伍并保证较高的行政效率起了积极作用[2]。岛善高《唐代量移考》,探讨了左贬官量移的渊源、原由、效果及其实施状况等[3]。夏晓臻《唐朝辍朝制度考述》考察了唐朝政府为要人的死亡而停止办公,以示悼念的辍朝制度,认为唐代辍朝始于贞观年间,文宗太和年间是辍朝制度重要改革时期,以此为界,唐代对文武大臣辍朝资格的规定前宽后严,前松后紧。辍朝制度是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法意识的体现,是封建帝王控制朝臣,维护皇权和实施教化的政治工具[4]。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促进了唐代告身的研究。白化文等《唐代的告身》,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大庭修《唐告身文书学的研究》、王诗伦《唐代告身中的官人自称形式》等文,都利用出土文书,证以其他文献资料,对唐代告身制度的内容、流变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5]。

三、法律制度

---

① 筑山治三郎文分别见日本《园田学园女子大学论文集》1968年第3期;《山崎退官纪念东洋史论丛》1967年版。根本诚文见日本《史观》1960年第59期。

② 《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岛田正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1987年版。

④ 《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⑤ 白等论文见《文物》1977年第11期;朱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大庭修文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日本法藏馆,1959年版;王文见《大陆杂志》87~2,1993~8。

(一)通论

程树德二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六十年代相继问世的仁井田升的多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以及近年出版的韩国磐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等法制史著作中,都对隋唐法律制度作了重点论述①。由于日本古代法制直接取法于隋唐律令体系,因此法制史研究在日本的隋唐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如日本唐史研究会已出版的七部学术报告、论文集中,以隋唐律令制为中心论题的即有三部,即《中国律令制及其发展——其对周边诸国的影响》,刀水书房,1979 年版;《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刀水书房,1984 年版;《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汲古书院,1986 年版。这些论著代表了日本隋唐法制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收论文内容广泛,涉及到法制史的各个方面。

(二)律令法典体系

关于隋唐国家的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中田薰的《法制史论集》第四卷系统论述了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陈仲安的《律令格式》则是关于这一法典体系精当而得要领的短论②。

---

① 程树德《中国法律史》,商务印书馆,1928 年版;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刑法卷,1959 年;土地、交易法卷,1960 年;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卷,1962 年;法与习惯、法与道德卷,1964 年;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中田薰《法制史论集》,日本岩波书店,1966 年版;陈文见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2 年第 4 期。

律令法典体系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亚洲古代各国法律体系的深远影响，上面提到的通论性著作均有详细的论考。杨廷福《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及《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指出《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承上启下，影响深远，成为五代、宋、元、明、清各代编制、解释律例的蓝本，而且对亚洲各国影响至巨，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立法，大半从摹仿《唐律》而来，从而使这种影响在当时具有世界意义①。桑原陟藏《王朝的律令与唐的律令》亦认为唐朝为东亚法律的中心②。有关论文还有徐道邻《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及东亚诸国之价值》、仁井田升《隋唐法律及其对周围亚洲诸国的影响》等③。

(三)隋律

韩国磐《略论隋朝的法律》探讨了隋律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历史渊源，隋律的内容与执行情况等④。倪正茂《隋律研究》是一部全面考论隋律的专著，对隋律的制定背景、内容、阶级本质、地位影响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思想，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新见。如关于隋律的渊源问题，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张隋律"因北齐而不袭北周"，上揭韩国磐文亦认为隋律"直接继承北齐律而来"，倪著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隋律虽多采后齐之制，但也对北周律有所承袭⑤。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八为《隋律考》⑥。程氏从浩繁的文献中索隐探迹，排比整理，对业已亡佚的开皇、大业

---

① 均载所著《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日本《历史与地理》1917年第6卷第5期。

③ 徐文见《图书月刊》，1944年第3卷第2期；仁井田升文载《中国法、社会与思想》，岩波书店，1967年版。

④ 《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

⑤ 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⑥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

二律之定律年月，修律诸人，以及二律佚文、篇目等，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考证，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唐律

1. 综论著作

杨廷福《唐律初撰》结集了作者从各方面研究唐律的七篇论文，内容包括《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本质，唐律的渊源、内容，以及唐律对中国法制史乃至亚洲古代各国法典体系的影响等，虽各自成篇，每篇又互联系，形成一个较系统的整体，大体上反映了《唐律》的基本面貌，提出了不少有影响的论点。后来又有乔伟的《唐律研究》相继出版。乔著分上下编，上编是总论，对唐律的产生和形成，唐律五刑、十恶、八议的立法原则做了研究。下编为分论，分别探讨了各项犯罪的种类、本质、特点及诉讼程序的规定①。概论唐律的论著还有戴炎辉的《唐律通论》②。

2.《唐律疏议》制作年代

《唐律疏议》是长孙无忌等奉诏为《永徽律》所修撰的律疏，永徽四年(653)书成上进，从来史无异说。一九三一年，日本学者仁井田升与牧野巽合著长达十四万言的《〈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上下篇，对于《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作者和内容提出新的见解，考定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③。此说一时轰动国际史界，日本学界从此奉为定论。一九七八年杨廷福发表《〈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对仁井田升氏论文所持七条主要论据分别进行辨析，并从文献著录，敦煌写本《律疏残卷》，《唐律疏议》

---

① 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编译馆，1964年版。

③ 日本《东方学报》1931年第1～2期。

的刊本与长孙无忌的《唐律疏议》的避讳与地名、职官,《唐律疏议》刊本讹夺和掺杂后人注释,以及《唐律疏议》的律条等七个方面,考定《唐律疏议》仍即《永徽律疏》①。本文的日译者冈野诚一方面认可杨说关于唐律疏议的编撰仅在永徽年间,同时又本于仁井田升说认为开元年间修订本即为现行《唐律疏议》的蓝本②。刘俊文在《〈唐律疏议〉点校说明》中认为,"《唐律疏议》撰于永徽,其所疏释的律条基本上定于贞观,而律疏的部分内容和文字又是永徽以后直至开元间多次修改的产物。"因此把《唐律疏议》只看作"永徽律疏"或"开元律疏",都是各执一偏③。

3. **唐律渊源**

关于唐律的历史渊源,前揭程树德《九朝律考》立论强调中国法律的南北分野,认为北朝律学"自魏而齐而隋而唐,寻流溯源,自成一系。"南朝律系,"则与陈氏之亡而俱斩"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以程说为然,但也认为北魏、北齐、隋、唐律系一脉相承。杨廷福《〈唐律〉历史渊源略论稿》认为唐律无论从篇章形式还是律文内容、实质,都是综合继承和总结汉、魏、晋、南北朝的律文的⑤。胡咏超《唐代户婚律溯源》指出唐户律婚律均应溯至南朝而非北朝,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陈寅恪说⑥。刘俊文《唐律渊源辨》指出,在学界关于唐律渊源的不同意见中,以程树德、陈寅恪、杨廷福三家之说最具代表性,而三说的分歧又集中在北魏律渊源和隋

① 《文史》1978年第5辑。

② 冈野诚的意见见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隋唐研究史(二)律令制部分,日本山川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刘俊文《〈唐律疏议〉点校说明》载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首,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九朝律考》卷四《南朝诸律考序》。

⑤ 《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8期。

⑥ 香港《新亚学院学术年刊》1961年第3期。

开皇律渊源这两个焦点上。关于北魏之源，程、杨二家为汉律说，陈主三源(中原、河西、江左)说，刘俊文认为源于晋律。关于隋开皇律之源，程认为本于北齐律，与北周南朝无涉；陈谓近承北齐，远祖后魏，亦含江左(宋、齐为主)因子；杨主张继承南北朝所有律。而刘俊文认为以北齐为底本，兼采梁律和北周律而成①。堀敏一《魏晋南北朝律令体系的形成过程》也论述了隋唐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与南北朝法律的继承关系②。

4. **唐律原则 内容**

小野精一郎《唐律刑法总则的规定》与杨崇森《唐律刑法总则之规定》等论文考察了刑律运用的一般原则③。杨廷福《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本质》指出唐律是隋末阶级斗争的产物，维护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个体经济基础④。张梓太、俞心慧《略论〈唐律〉的"中"、"平"性》讨论了《唐律》的适中平允性，认为科条简要、繁简适中以及宽严得平、刑罚适中是其主要表现⑤。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认为整个唐律正是礼所规定的封建宗法等级思想和制度的法律体现，并借助法律的强力使礼的原则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实现⑥。菊池英夫《关于律令法系的性质、形成过程——礼、法和刑》也论述了唐律与礼的关系⑦。王永兴《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认为，永徽四年十月后《唐律疏议》有三处内容受礼变动的影响而作过修改。钱大群《谈〈唐律疏议〉三条律疏的修改

---

① 《历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

② 《中国律令制及其发展——其对周边诸国的影响》。

③ 日本《国家学会杂志》1938 年第 54 卷第 2 期；台湾《法学丛刊》1958 年第 10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⑤ 《南京社会科学》1992 年第 3 期。

⑥ 《北京大学学报》1983 年第 5 期。

⑦ 见上揭《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

问题》对此提出商榷，认为三条中有两条并未修改，即：律疏关于舅对甥的反报并未从"缌麻"改成"小功"，《贼盗律》内并未把毒药药人由流刑改为死刑[1]。姜永琳《〈唐律〉"诸法合体"说质疑》对《唐律》"诸法合体"说提出质疑，认为作为一部刑法典，《唐律》规定的只有刑事法律规范，不存在所谓的将民事、婚姻、行政、诉讼等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这种内容范围及形式结构方面的落后性[2]。唐鸿儒《论〈唐律〉与吏治》分析研究了《唐律》中的吏治制度，涉及法制史、行政法、立法决策学等领域，试图以新方法探索开拓法学的新途径[3]。

戴炎辉曾在台湾《法学丛刊》上连续发表二十余篇研究唐律的内容的论文，分别考察了卫禁、职制、户婚、厩库、盗、贼、斗、讼、杂及诈伪、逋亡、断狱诸律条[4]。关于刑罚的专论，有奥村郁三《唐律的刑罚》、筑山治三郎《唐代官僚的犯赃与刑罚》等[5]。审判制度的专论，较早的有刘陆民的《唐代审判制度考》，论述了唐代审判的通则，审判开始的缘由，以及审判的方式、标准、技术、程限、平反责任等。另有奥村郁三《唐代裁判承续法》、《关于断狱律依告状鞫狱条》等[6]。关于《唐律》所体现的家族主义，较早的论文有中田薰的《唐宋时代的家族共产制》。仁井田升的《支那身分法史》与滋贺秀

---

① 《文史》第八辑。

② 《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③ 《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④ 台湾《法学丛刊》1960年至1964年诸期。

⑤ 奥村郁三文见日本《法学杂志》1961年第8卷第2期；筑山治三郎文见日本《社会文化史学》1977年第14期。

⑥ 刘文见《法学月刊》1947年第2期。奥村郁三文分别见日本《法制史研究》1959年第10期；《法学杂志》1961年第11卷第2期。

三《中国家族法的原理》亦有系统的考述①。潘维和《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是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他指出唐律中的家族主义之所以十分浓厚，乃有着心理的、教育的、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多方面的思想渊源②。王志刚《唐代民事法规缀要》从权力能力、时间立法例及婚姻继承法规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唐代民事法规较之前代的发展③。

（五）唐令、格、式、出土法律文书及六典施行问题

1. 令

唐令在中国早已散佚不全。由于日本现存以唐令为本的《养老令》凡十卷三十编九百余条，因而存在着《养老令》为基础复原部分唐令的可能。这种尝试始于中田薰的《唐令与日本令的比较》，而集大成于仁井田升的《唐令拾遗》④。仁井田升从64种汉文史籍、11种日文史籍凡数千卷文献中，辑录出有唐一代的各种法令，经排比考核，纂辑成书。全书复原唐令33种715条，唐前令140条，唐后令128条，皆能上溯其渊源，下探其流变，揭示了唐代重要法令形成、发展的线索。

《唐令拾遗》的巨大成就并不意味着复原唐令工作的完成，仁井田升生前即已着手继续增补并取得部分成果，菊池英夫《唐令复

---

① 中田薰文见日本《国家学会杂志》1926年第40卷第7～8期；仁井田升《支那身分法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之原理》，日本创文社，1967年版。

② 潘维和《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5年版。

③ 《西北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④ 中田薰文见《国家学会杂志》1904年第18卷第212～214期。1964年版；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初版为东方文化学院，1933年版；中文译本《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共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

原研究序说》在仁井田升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甄别、补订唐令的方法。中村裕一《关于〈太平御览〉所引唐令特别是卤簿令的问题》，从《御览》中辑出祠令、杂令、卤簿令等二十余条，并将其中的卤簿令与两唐志、《通典》、《六典》等文献的记载进行比照，确认了其史料价值。从而显示出复原唐卤簿令的可能①。池田温《〈唐令拾遗补〉之编纂》，栗原益男《关于从逸文见令之若干考察》，以及冈野诚《唐永徽职员令的复原》，都是关于唐令复原的研究成果②。

中村裕一《敦煌发现唐公式令残卷的制作年代》，根据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过所》对仁井田升等人研究的《公式令》残卷（P二八一九背）进一步确认了开元七年令说，但也不排除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可能性。他的另一篇《敦煌发现的唐〈公式令〉残卷的错字和漏字》对敦煌发现唐公式令残卷的告身式、符式同实例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其中的错误和漏字，试图复原其原形③。秋月观瑛《僧尼令杂考（一）》研究了《僧尼令》的第二、第十、第十一条，指出各个条款的问题所在④。此外，古濑奈津子对职员令和仪式，丸山裕美子对医疾令和假宁令，大隅清阳对仪制令，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⑤。

2. 格　式　出土法律文书

关于唐代法律中的格、式，滋贺秀三《汉唐间法典的二、三考证》论及了这一问题。泷川政次郎《唐日本格式与日本格式》举例论

---

① 菊池英夫文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73年第31卷第4期；中村裕一文载上揭《中国律令制及其发展——其对周边诸国的影响》。

② 池田温、栗原益男二文均载上揭《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冈野诚文见《岛田正郎颂寿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7年版。

③ 分别见《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1990年；《汲古》一九，1991年。

④ 《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学，四。

⑤ 池田温《日本的唐史研究——近年的动向》，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述了日唐格、式的区别和联系①。上揭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指出武德格制定于武德九年六月。庄昭《武德新格并非制作于武德九年》认为武德新格创制于武德六年②。唐代格、式今已散佚残缺，唯敦煌发现的唐《散颁刑部格》及唐《水部式》略存局部原貌。仁井田升《唐律令及格的新资料——斯坦因敦煌文献》、《敦煌发现唐水部式的研究》及大谷胜真《敦煌出土散颁刑部格残卷》等论文，对之进行了研究③。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提出，格不是与律、令、式平行的法典，而是律、令、式的追加法，不但有与律、令、式近似的内容，而且可以修改、补充和变通律、令、式的规定，具有比律更高的权威性④。韩国磐《传世文献中所见唐式辑存》一文，鉴于唐式多已失传，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式又很少，便从传世史籍中辑录出二十一篇的四十来条唐代式文，并加上按语或与其它书作比较，认为唐式的篇数应如《唐六典》、《旧唐书》所言为三十三篇，三十三篇为大的篇名，其下又有小篇名，式与令的关系密切⑤。霍存福《唐式性质考论》认为，《唐六典》取令、式相类，较贴切地揭示了唐式的性质，《新唐书》取格、式相类，将格与式生硬地拼凑在一起下定义，不准确。唐式是以行政法为主，间有军事法、民事法、诉讼法规范的综合法律形式，其非刑律性规范性质可拟类为今天所说的行政法规⑥。

---

① 滋贺秀三文见日本《东方学》1958年第17期；泷川政次郎文载《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5年版。

② 《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

③ 仁井田升文分别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7年第3期；《服部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1936年版。大谷胜真文见日本《法律论丛》1977年第50卷第4期。

④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⑥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2年第6期。

池田温等《敦煌吐鲁番所发现的法制文献》全面介绍了这些文献的出土经过及研究史，还制作了这些文献的一览表，附有详细解说和研究文献目录①。泷川政次郎《律令的研究》一书所收论文多为研究出土法律文书之作②。仁井田升《最近发表的敦煌发现唐律令断简》，内藤乾吉《敦煌发现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唐长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刘俊文《吐鲁番新发现唐写本律疏残卷研究》等论文，均是研究出土法律文书的力作③。冈野诚《唐律研究之现阶段——敦煌吐鲁番发现唐律律疏断卷之再研讨》就三件有关唐律律疏断卷的再研讨，介绍了近年唐代法典研究倾向的情况。认为唐名例律残片为八世纪后半叶以前书写的，职制律断卷虽属唐律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名例律疏断卷为开元名例律疏官抄本，写于颁布开元律疏后不久，无法赞同《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称该断卷为《唐律疏议》④。池田温《最近发现的唐代法制史资料介绍》，总结介绍了近年来中日学者根据文书卷子整理研究唐律令的成果⑤。

3.《唐六典》的施行

《唐六典》是唐代的重要行政法典，它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反映了唐代政制的实际，又是否切实贯彻施行，历来众说纷纭。内藤乾吉《关于〈唐六典〉的实施》，总结分析了前人的议论，提出了自己的

---

① 日本《法制史研究》1977 年第 27 期。

② 泷川政次郎《律令的研究》，刀江书院，1966 年版。

③ 仁井田升文见日本《历史学研究》1938 年第 8 卷第 4 期；内藤乾吉文收藏《中国法制史考证》，日本有斐阁，1963 年版；唐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64 年第 5 期；刘文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④ 冈野诚文见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⑤ 载《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日本刀水书房，1984 年版。

看法，认为当时讨论典制多引据六典，可见其具有现行法令效力，但又未必事事遵行①。陈寅恪、岑仲勉基本同意内藤氏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修正②。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的行用问题》认为六典不只是开元一代政制，而是中唐前各种制度的综合，虽从未正式颁行，但又曾行用，带国家法典性质。王超《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论述了唐六典的编纂背景、体系、内容及其法律地位③。韩国磐在《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对《唐六典》的施行问题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历史上的许多法令，多未能完全或彻底执行过，《唐六典》是将当时的行政机构即封建政府各官司及职权法典化，而其写法就是将"令式入六司"，这一点至为重要。因系将当时唐朝令、式写入书中，令、式是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所以书成后只须公开"宣示中外"，至于再次"明诏"施行，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二是唐朝人确实是将《唐六典》作为行政法典或政府组织法规来看待的④。讨论六典施行问题的文章还有严耕望《略论〈唐六典〉的性质与施行问题》、张弓《试论〈唐六典〉的施行问题》等⑤。

（六）法制

刘陆民《唐代司法组织系统考》分别考述了中央、京畿和地方的司法组织机构，以及司法机关的外部与内部组织⑥。王宏治《唐

---

① 日本《东方学报》1936年第7期。

② 陈观点见所著《元白诗笺证稿》第184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岑观点见所著《隋唐史》第5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1版。

③ 韩文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王文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④ 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严文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3年第24期。张文见《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

⑥ 《法学月刊》1947年第3卷第4期。

代司法中的“三司”》对唐司法组织中名同实异的两种“三司”作了考察。认为由御史台和中书、门下二省组成的三司，是唐初就以法律形式肯定的常设受表机构，主要处置冤滞案件；而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组成的三司在唐初并不存在，开元后仍只是临性的专案组织，没有常设机构。在唐代出现由三法司组成的三司，是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在司法发展上的体现①。宋家钰《略说唐初的“立法”与“守法”》、马长林《唐律实施问题辨析》，讨论了唐代法律的实施情况②。赵克尧等的《贞观法制初探》与王永兴的《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都肯定唐代前期的法制比较健全③。张中秋等《试论唐朝司法审判的法律依据》，探讨了唐代法律依据有律、令、格、式、敕令、司俗、比附、法理解释等形式，具有体系完备的特点。认为唐代司法审判原则，是兼有“罪行法定主义”或“罪行擅断主义”的某些特征，可概括为君权主义④。黄清连《说“保辜”——谈唐代法制史料札记之一》，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残卷”的研究，论述了唐代的法制⑤。张荣芳《唐代长安刑场试析》和《唐代中央的武器管制措施》，分别从法制的理论与实际探讨唐代的法制状况。刘俊文《论唐后期法制的变化》指出唐后期法制既是前期的继续，又有所创革，呈现出一种过渡的形态，“敕”已成为唐后期法律的主要成分而取代了律令格式体系。而且法出多门，日趋混乱，终于使五代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杜文玉等《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则认为五代时

---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② 宋文见《光明日报》1978 年 10 月 24 日。马文见《学术月刊》1985 年第 5 期。

③ 赵氏等论文见《史学月刊》1981 年第 4 期；王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④ 《史林》1987 年第 4 期。

⑤ 《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 年。

期在封建立法方面所作的贡献不可忽视。五代司法上承唐朝，下启宋代，在中国法制史上居有一定的地位。唐代制定的皇帝亲录制度得到较大发展，地方讼案须由各级地方长官当面录问，至宋成为定制①。

齐涛《论唐代流放制度》总结了唐代流放制度的特点。认为唐代流放制度的应用，相对集中了影响皇帝与王朝统治利益和统治秩序的犯罪，涉及谋反、言论、军事、礼教、治安、吏治等众多方面。与秦汉以来流放旨在实边与惩戒的目的不同，唐代流放的目的是预防与惩戒并重，流放多运用于政治斗争，流放者身分有所提高，流放地多集中在比较安定的南方边郡②。

四、军事

唐长孺《唐书兵制笺正》③是对唐代兵制史料的重要研究成果。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④收入研究唐代兵制的论文十余篇。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⑤。与张其凡《五代禁军制度研究》⑥是近年的重要兵制研究成果。

(一)府兵制

1. 综合论考

隋和唐前期，府兵是国家基本的军事力量。关于这一制度的渊

① 刘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杜等论文见《思想战线》1986 年第 4 期。
② 《人文杂志》1990 年第 3 期。
③ 科学出版社，1955，北京
④ 文津出版社，1994，台北
⑤ 同上，1995 年
⑥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源流变，陈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有精湛的论述[1]。此文后来成为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第六部分——《兵制》。杜洽《唐代府兵考》比较系统地考释了唐代府兵制的渊源、性质、建置，以及折冲府的始称、数量、等级和兵数，是关于唐代府兵制较早的专论[2]。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在日本史界被推为研究唐代府兵的古典式大作，该论文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3]。继五十年代末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问世，一九六二年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又相继出版[4]。谷书是迄今有关府兵制度最为系统的专著，作者根据翔实的史料，考证了府兵和魏晋以来的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兵制的渊源继承关系，对府兵制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唐折冲府数量，《邺侯家传》的可信性等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谷著认为隋代是府兵制的完成化阶段，唐初是府兵制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高宗武后以后趋于破坏，至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此间形式上虽仍维持府兵，实质上业已败坏，乃至天宝八载，府兵形式上的上番也难维持，府兵制终于废止。本书对府兵制度的内容、性质及其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对府兵制形成以至破坏的整个过程，均有精详的考证和独到的见解，并力图从中国封建政治社会史的全局来剖析府兵制度。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不仅是关于府兵制度而且是关于整个唐代兵制的基础性研究[5]。该书针对《新唐书·兵志》的缺失，集中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笺其所出，找出《兵志》所根据的史源，勘

---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 年第 7 卷第 3 期。

② 《史学年报》1939 年第 3 卷第 1 期。

③ 日本《史学杂志》1930 年第 41 卷第 11～12 期。

④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⑤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对其差异；一是正其所误，根据考证过的原始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讹，并补其不足。全书引征丰富，考订精当，笺正过程中间有论证，提出作者对唐代军制的见解。

2. **折冲府**

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是关于折冲府制的重要著作①。谷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广泛利用文献资料和新出土文书，对唐代折冲府的数量、分布、名称进行了考核和增补。继谷氏研究，岑仲勉在上揭《府兵制度研究》中，将历史记载中不同的折冲府数字分为两组，认为是时期先后不同的两组统计，推定其中的633府一组是唐府兵全盛时期的折冲府数，594府是衰败时即开元天宝之际的府数，并对谷霁光关于唐折冲府随时代推移逐步增多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谷霁光在上揭《府兵制度考释》中修正了旧说，并对折冲府数重作考证，指出折冲府数达到最高额(633府)的开元初年并不是府兵的全盛时期而是其衰败之时，乃至开元末天宝初的594府时，府兵制业已名存实亡。王仲荦则倾向594府是唐初(贞观十年)的折冲府数，633府是开元末年的折冲府数。不过王仲荦与滨口重国的观点一样，认为折冲府数系随时增益或减撤，未可太拘限于一定的数目②。李方《唐折冲府增考》利用出土资料等增补了三十个未见著录的唐折冲府，从而使已知折冲府数达到660个③。

菊池英夫《唐折冲府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关于唐代折冲府分布问题的解释》，分别探讨了折冲府的职能与分布特点④。唐

① 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收载《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7年版。

② 王仲荦说见所著《隋唐五代史》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滨口重国说见前揭《从府兵制到新兵制》。

③ 《文史》第36辑，1992年。

④ 分别见日本《史渊》1953年第58期；《东洋史研究》1968年第27卷第2期。

长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川府兵》系统探讨了西州折冲府的建立、简点、卫士的征镇防戍之役等问题①。白须净真《唐代折冲府等级与西州折冲府等级的记录(一)、(二)、(三)》利用出土文书对垂拱年间以前是否存在等级和前庭府、岸头府的等级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②。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分析了折冲府时代府兵的番役种类、分派、算番、上番给粮等问题,提出了折冲府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到中央宿卫,而是在地方上服役的推断③。

3. **府兵性质**

关于府兵制度的性质,诸家往往就兵农是否合一发生分歧。何兹全曾在《魏晋南北朝的兵制》中认为隋唐兵制是普遍征兵制。杨志玖《隋文帝时的府兵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制度》明确指出府兵制在隋文帝下诏后开始发生变化,即兵役逐渐普遍化,以招募变为征集,到唐时成为兵农合一制,一般农民都有当兵的义务,而一切军士也要兼务农业④。岑仲勉认为隋文帝的诏令并未改变府兵的性质,直至唐代府兵仍不是普遍的征兵,而是企图从品官富室中拣点,既非农民身分,又不一定务农,故不能说府兵制是兵农合一。隋唐的府兵在原则上都是世兵的征兵制,即府兵世代从军,并带有游牧社会落后兵制的烙印⑤。谷霁光则认为隋文帝开皇十年下诏后,府兵固然仍未成为普遍征兵制,但也已不是世兵制,此后府兵总的趋向是兵农合一,但唐初部分军府常要随军征战,就谈不上兵农合

---

①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 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六七、六八、六九,1991年。

③ 《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④ 何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6本;杨文见《历史教学》1954年第11期,并参杨著《隋唐五代史纲要》有关章节,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⑤ 岑著《府兵制度研究》,并参岑著《隋唐史》第215～220页。

一①。王仲荦的观点近似于谷氏，认为唐代府兵一般都是均田户，当了府兵以后并不收回份地，原则上在集中训练和宿卫上番之余，仍在自己的份地上务农，因此府兵没有脱离农民的身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兵农合一。但事实上府兵长年征戍在外，高、武之后尤其如此，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谈不上兵农合一②。

菊池英夫《府兵制的发展》认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府兵制，乃指自隋开皇十年，准确说是从大业元年实行鹰扬府制以后，到天宝八年军府职能废止，实际上是至开元十三年禁卫军向犷骑转变之际，由三个统属于中央兵部而又自成系统的要素，即负责京师皇城警备的十二卫六率府的中央军，防备边境的镇戍组织，既是兵力来源又是地方治安中心的地方军府，所组成的军事体系和以地方军府掌握的土著民丁轮番服役为特色的兵役制度③。谷川道雄《西魏、北周、隋、唐政权与府兵制》和《府兵制国家与府兵制》，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评价了府兵制度。他把府兵制视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政权的起点，这些政权都是从府兵军团的统帅府、霸府产生的，而且这些政权的递嬗也取决于府兵制。府兵是支持皇权的军队，与皇帝一起创建了王朝，与府兵相对应的各地乡望成为皇帝统治的基础，于是谷川氏称为“新贵族”的新统治集团由之产生④。

4. **卫士负担**

布目潮沨《唐代卫士番上的负担》、《再论唐代卫士番上的负

---

① 谷著《府兵制度考释》。

② 王著《隋唐五代史》第495～496页。

③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版。

④ 分别载《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日本刀水书房，一九八四年版；《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汲古书院，1986年版。

担》,是关于府兵番上负担的专论①。前者以《新唐书·兵志》关于府兵番上负担的记载比照《六典》的有关记载,确认新志的记载是合理的,而不是象以往认为的那样全是错误的。继而根据《兵志》的记载对卫士上番的负担重新进行了考察,认为过去关于府兵制崩溃原因的分析值得商榷。后一篇论文是针对石田勇作《从律令看唐府兵负担考》一文的②。对石田勇作在计算卫士番上负担时否定新书《兵志》所载的规定进行了批评。曾我部静雄《唐均田法时代兵士的身分与特权》与日野开三郎《唐代翊卫考》,探讨了府兵的徭役性质等问题③。陈仲安《唐府兵随身七事辨》,气贺泽保规《有关隋炀帝纪的府兵制的一个考察》,均是针对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阐明作者的意见④。

5. **府兵制下的非府兵兵种**

在府兵制盛行的唐代前期,府兵也不是唯一的兵种。玉井是博的《唐代防丁考》讨论了边境上与府兵并存的防丁和土镇⑤。张国刚《唐代防丁考述》论述了作为力役基础的防丁制度在安史乱后的瓦解⑥。日野开三郎《大唐府兵制时代的团结兵》是最早系统考察团结兵的论文。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对团结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唐六典》所载团结兵人数可信、城傍子弟应是蕃兵,对团练使是团结兵的长官以及团结兵广泛设置的观点提出了

---

① 分别见《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版;《三田村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集》,1980年版。

② 日本《上智史学》1979年第24期。

③ 曾我部静雄文见日本《历史教育》1960年第8卷第6期;日野开三郎文见日本《东洋史学》1965年第28期。

④ 陈文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气贺泽保规氏论文载上揭《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⑤ 《池田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40年版。

⑥ 台湾《大陆杂志》83~2,1991~8。

质疑，并指出唐后期有各种类型的团结兵①。

孙继民《行军在唐代军事力量体制中的地位》，探讨了行军与府兵制、行军与禁军、镇戍、镇军的关系等问题，确定了行军的性质，认为行军是唐代前期尤其是镇军形成之前执行战略机动的野战军团。他在另一篇《唐代的行军统帅》中指出，行军统帅有行军元帅、行军大总管和行军总管等称号，有时由于政治原因或军事策略的需要，某些军队出征以安抚使统领，实即行军统帅②。宁志新《唐代行军总管考略》则专门考察了行军总管产生的渊源、存在时间、设置特点及消亡原因等问题③。

菊池英夫《唐代兵募的性质及其名称》论述了与行军制相关的兵募（募人、募士、州兵）问题④。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考证了兵募一词的含义，兵募的性质、任务、选取原则、召集差发、作用，以及由兵募向长征健儿的转变等。唐氏还指出，讨论唐代前期兵制只讲府兵是很片面的，府兵和募兵都是主要军队⑤。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指出，兵募制作为一种既不同于前期府兵制又有异于后期募兵的独立兵制，尚存在许多有待解明的疑点。认为兵募的对象是一般民丁，其调集需经中央、州县、乡里等各级政权机构。兵募执行任务时以州为单位组成“行军”，其服役方式主要分征、镇两种。兵募的军械衣食由所在官府或军镇供给。唐代的兵募名为招募，实系强征⑥。秦川《武则天时期的边防及其与兵募的

---

① 日野开三郎文见日本《法制史研究》1955 年第 5 期；方文见《文史》1986 年第 25 辑。

② 分别见《河北师院学报》，1994 年第 4 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1 期，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③ 《河北师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④ 日本《史渊》1956 年第 67～68 期。

⑤ 《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

⑥ 《南开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关系》认为，兵募实质上是在国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条件下，以兵役形式向国家提供的劳役地租。承担兵役者是广大佃农，兵募强行征发，负担沉重。武则天时期随着均田制瓦解，人身依附关系减轻，军士及佃客大量逃亡，促成兵募制的瓦解①。

（二）唐中后期兵制的变化

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指出，唐代兵制的演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征兵变为募兵，一是由内重外轻变为边防兵盛而中央军衰。唐文论述了军区设置的原因和长征健儿与应戍的问题，还就军区设置与变征兵为募兵的关联进行了分析②。

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府兵制度的破坏。开元十三年随着当番卫士的逃亡，施行了从府兵以及白丁中简募强壮兵员以确保京师警卫的彍骑制。栗原益男的《关于彍骑》探讨了这一制度，他指出过去将彍骑制当成募兵制从而认为卫士制废止了的观点值得商榷。彍骑制并非募兵制，而是有利于府兵的另一种征兵制③。栗氏《长征健儿制成立的前提》在上一篇论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奉开元二十五年诏成立的长征健儿制，乃是为了确保兵员而在全体边军中以召募代替以往的征兵制。长征健儿的兵源来自诸色征行人与客户丁壮中的情愿者。在考察征兵制向长征健儿制（募兵制）的转变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到诸色征行人的负担与待遇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力图从中唐以后政治社会的变动高度来把握兵制的变化。栗原益男的另一篇论文《府兵制的崩坏与新兵种》，研讨了府兵制的崩溃及其向兵募、防丁、健儿、团练、城傍等新兵种的转变，分析了征兵制崩溃的原因和表现，同时也涉

---

① 《社会科学》1989 年第 4 期。

②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 年第 9 卷第 1 期。

③ 日本《上智史学》1965 年第 10 期。

及到唐朝前半期统治体系的崩溃问题①。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通过对早期的健儿、长行官健、健儿的待遇与家口粮三个课题展开讨论，认为安史之乱以前，健儿主要是分番服役，安史之乱以后，长行官则成为终身职业雇佣兵。长行官使是长役无番，不分闲剧常年在军中服役，他们本人及家属的生活待遇都仰赖官府负担，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寄生军人阶层②。

关于唐代的募兵制，杨鸿年《唐募兵制度》认为此制虽不始于张说，却因其建议而大行。尽管此后召募是主要兵源，却不是唯一兵源，还有许多得兵办法。募兵制的特点表现为"募须资财"，"募有条件"，"募系自愿"，"募无地区限制"等。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在杨文的基础上对募兵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前期征兵制的破坏及募兵制的确立；二是唐后期募兵制的内容，即召募、家属随军、常额衣资、赏赐、拣放与优恤诸制；三是对唐代募兵制的评价，认为不宜一味否定③。

（三）神策　禁军　监军与边防（骑兵）

关于神策军的系统论文有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与《神策军的发展》。日野开三郎《神策禁军的发展》也是这方面的力作④。齐勇锋《说神策军》对神策军的起源、发展、布防、职能、兵力与特点等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神策军具有中央禁军和直属作战部

---

① 栗原益男氏论文分别见《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2 年版；《史学杂志》1964 年第 73 编第 2～3 期。

② 《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③ 杨文见《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方氏论文见《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④ 小畑龙雄文分别见日本《东洋史研究》1959 年第 18 卷第 2 期；《田村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8 年版。日野开三郎氏论文载《东洋史学论集》，日本三一书房，1980 年版。

队的双重性质[1]。贾宪保《神策中尉与神策军》认为，神策中尉制的建立是对玄宗以来抑制武将政策的总结，其实质是不许武将担任中央军队的统帅，以保证皇帝有一个可靠、强大、稳定的亲军[2]。何永成《唐代神策军之建置与发展》论述神策军的建置与发展。何永成的专著《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全面论述神策军的建置发展、组织结构和兵源职任，并对永贞内禅事件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神策军在中晚唐的历史地位[3]。

关于禁军，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考察了唐朝初年"元从禁军"这支中央禁军的组建时间、成分及演化，认为"元从禁军"的组建时间应为武德七年三、四月间，成分为李渊旧部、被收编的农民义军、召募兵士三部分，待遇远在府兵之上，人数为三万人。后来由于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的产生，在龙朔二年终于为左右羽林军所取代[4]。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认为，唐前期的北衙禁军在安史乱中丧失殆尽。唐后期的中央宿卫体制仍然是南、北衙分治，北衙除神策军外，主要是北衙六军和飞龙兵，南衙为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经过肃、代两朝的恢复和宪宗朝的整顿，确立了中央禁军的格局[5]。齐勇锋的另一篇论文《五代禁军初探》认为，五代禁军上承晚唐藩镇兵制余绪，下开宋代禁军先河，是唐代军制向宋代军制转变的中介环节，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解五代政治局势变化的关键[6]。张其凡《五代后梁禁军探微》指出后梁禁军分六军与侍卫军两部分，没有统一的统帅，均直隶于

---

① 《陕西师大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② 贾文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 5 辑，三秦出版社，1990 年版。

③ 何文见《史学集刊》15，1983～5；何永成专著《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

④ 《河北师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

⑤ 《河北学刊》1989 年第 2 期。

⑥ 《唐史论丛》第 3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皇帝而自成系统。他的另一篇《五代后周禁军考述》认为，后周禁军的显著变化，是殿前军的兴起，周世宗时，殿前军开始与侍卫亲军并驾齐驱，并逐渐显露出凌驾侍卫亲军之势①。齐勇锋《后周的军制改革》指出，后周军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改革禁军指挥体制，加强皇权对禁军的控制，实行"拣选"以加强禁军实力，重视立法以削弱藩镇军事势力②。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认为唐初特别是武后时，御史监军已出现制度化的倾向，宦官出任监军创自玄宗。监军不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组织，还有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监军制度曾在压抑方镇割据中发挥过显著作用。有关论文还有巴新生的《唐代禁军组织的演变与宦官典军制度》③。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防秋兵和防冬兵》考定秋季防吐番者为防秋兵，冬季防南诏者为防冬兵，防秋兵的征集地是属于京西一带的朔方、泾原、陇右和河东诸节度使管辖之下的。齐勇锋《中晚唐的防秋制度初探》认为这种制度在政治军事上对唐中央起了强有力的支持与稳定作用④。

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的守捉、城、镇等的成立过程》针对以往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参据新出土文书对这三种边防机关分别进行了考证，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⑤。仁井田升《唐代军防令与烽燧制度》曾就遗存下来的唐代军防令资料对烽燧制度进行了探考⑥。

---

① 分别见《安徽师大学报》1988 年第 3 期；1989 年第 3 期。

② 《文史哲》1989 年第 5 期。

③ 张文见《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巴文见《天津师专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④ 曾我部静雄文见日本《集刊东洋学》1980 年第 42～43 期；齐文见《青海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

⑤ 日本《东洋史学》1964 年第 27 期。

⑥ 日本《法制史研究》1953 年第 4 期。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大量唐前期烽铺文书为探讨唐代烽堠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近年来程喜霖据之进行研究，连续发表了《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一》、《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二——唐代烽铺的管理》、《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斸田》系列论文，指出唐代烽铺制度虽渊源于汉，但较之汉朝有许多新的特点，在制度上更加完善。程文还具体考证了烽铺的建置、管理及烽铺斸田等问题，填补了唐代烽铺研究的不少空白。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程喜霖撰写成专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该书吸收了以往学者利用汉简进行研究的成果，广泛收集解放以来新发现的残遗文件，利用大量出土文书，对烽堠制度进行全面探讨。该书详细阐述了烽堠的建置、布局、器械、物资、人员配备、管理、烽火种类等各方面的规定，全面考察了烽堠制度的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认为汉唐时期是烽堠制度由发生到日趋完善的阶段，以后各朝，大体上只是沿袭唐制。该书附录部分还详列了西北一些州县的烽塞、烽铺、烽堠示意图，对了解当时的烽堠情况和军事形势很有帮助①。

汪籛《唐初之骑兵》是一篇立意新颖的论文，作者从隋末唐室在扫荡北方群雄的历次战争中如何发挥精骑的作用出发，考察了唐初的骑兵及其与之相关的战术运用②。马俊民《论唐代马政与边防的关系》则认为，唐太宗时期在西北边防建立的军旗、监牧、屯田密切配合的三位一体的边防体制，是唐前期边防巩固的重要条件。

---

① 程氏三篇论文分别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武汉大学学报》1983 年第 5 期；《武汉大学学报》1985 年第 6 期；程氏专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简明本），三秦出版社，1990 年版；《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全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版。

② 载《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文章考察了唐代马政盛衰历史的全过程及其对唐代边防的影响①。马俊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论述了唐代在马政方面的积极措施以及对骑兵建设的意义②。清水场东《唐代天宝时期的边军兵马数》对照《通典》和其他三种有关记载的数目字，探讨天宝时期各节度使的军队和守捉等的兵马数目③。

（四）出土军制文书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军事制度的材料，菊池英夫在《西域出土文书中的唐代军制史料》一文中作过介绍④。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研究唐代兵制的论文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如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的研究》、菊池英夫《由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府兵制的运用》（上、下）等论文，即利用出土文献深入研究了蒲昌府等边境折冲府的活动情况，补正了史籍之不足⑤。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指出，文书中反映的差兵及于杂任，体现了唐初军事制度的变化迹象。以往论唐前期兵制多言府兵少及差兵（兵募），此跋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⑥。杨德炳《关于唐代对患病兵士的处理与程粮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根据出土文书对兵募“去给行赐，还给程粮”的制度作出了新的诠释和实例论证，从另一个侧面推进了兵募的研究⑦。吴丽娱《唐高宗永隆元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的研究》，对

---

① 《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③ 日本《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三一～三二，1990年。
④ 日本《史学杂志》1961年第70卷第12期。
⑤ 日比野丈夫文见日本《东方学报》1963年第23期。菊池英夫文见日本《东洋学报》1969年第52卷第3～4期。
⑥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39～454页。
⑦ 同上。

吐鲁番出土的高宗时期的府兵卫士简点文书进行了研究，对府兵简点制度及文书出现的“籤符”、“样人”作了有益的探索[1]。菊池英夫《对敦煌发现〈算书〉中所记载的军制模式的考察研究》认为，P二六六七《算书》断简中有关兵马数的例题中记载的军队编制，符合北周至隋初的有关制度规定[2]。有关论文还有菊池英夫的《吐鲁番新出唐代军制文书试释——开元三年四月西州营诸队火别请受马料帐》，那波利贞《唐天宝时河西道边防军的经济史料》等。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台北，1995年）大量运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代前期出征制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①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菊池英夫文见日本《纪要》，中央大学文学系，史学三五，1990年。

第三章　经济、财政

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经济文书，以及全国各地发掘出的许多墓葬和文物，使本阶段社会经济的研究走出了单纯依靠历史文献的狭隘道路，带来了新的局面。近几十年来，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显著，西方汉学的唐史研究也出现了加强经济史研究的趋势，以下分经济、财政、人口与徭役、土地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经济

（一）通论

1. 综合研究

陶希圣、鞠清远著《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唐以前的经济背景、唐田制与农业、交通与都市、工商业及财政制度等，论述系统、材料充实；书中提出新见的庄田、草市、行会、色役与资课、盐铁漕运与东南财库、客户、商客与邸店、柜坊与飞钱等问题，一直成为此后学界论述的重点，该书为治经济史者的必读之作。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1976）

收入"中古自然经济"、"唐代物价的变动"、"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唐宋帝国与运河"、"唐宋时代扬州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等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推崇的有关唐代经济论文多篇，全氏论文为唐宋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里程碑。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中华书局，1962)为作者中国古代经济史系列论著之一，分析了隋唐继承北朝遗制后，在生产、商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发展及田制、赋税制度等，指出唐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失调，开天前已贫富悬绝，安史之乱，两税以整理财政为目的，苟简应付的政策，使崩溃因素益增。玉井是博(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42)收录有关唐代土地、流民客户、商人、贱民制度及防丁等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及关于敦煌户籍、契约等经济文书考证等论文多篇，是最早利用敦煌文书研究经济史的论著之一。加藤繁(日)《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东洋文库，1952，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收录作者有关唐庄园、都市、草市及特殊商业组织等论文 12 篇，加藤氏研究奠定了日本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西嶋定生(日)《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冯佐哲、邱茂、黎潮合译，农业出版社，1984)分农业、土地及棉业史三部，论述了唐代水稻发展、碾硙与农业、均田制等。该书与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洋史研究会，1968)、周藤吉之《唐宋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皆使用大谷探险队携来的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土地制度等，较玉井氏更进一步。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通论田制、地主经济、中国历史上大经济波动、城市、行、货币及商业政策等，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阶段及脉络。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认为隋唐五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随着均田制的最终破坏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向新的时期发展，出现许多新事物(如两税法、王仙芝"平均"的口号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某些历史现象的萌芽。谷霁光

《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论述了唐"一丁百亩"的土地规定及赋役制度等。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新文丰,1994)分户籍文书、田制文书、差科簿和徭役文书、财务文书四部分介绍并研究了相关的敦煌吐鲁番文书。除陶希圣、李剑农等书外,其它诸种经济史皆为作者的论文结集,虽各具特色,但不足以囊括唐代经济全貌。近年来经济史各领域内成果丰富,研究日渐深入,完整而深入的唐代经济史尚有待于治史者共同努力完成。

概述性的论文有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史概论》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本期社会经济的构成、演变及其剥削关系,叶企荪②、白乐日③(法)也全面论述了唐代经济史中的问题。

2. **隋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原因**

关于隋朝经济发展的原因,韩国磐以为当时财富的充实完全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创造出来的④。严耕望(港)从支出减少的角度立论,认为隋一改南北朝官多吏繁兵众的积弊,地方政治化繁为简,各方面之全部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南北朝四分之一,故隋代国库之富呈空前绝后之状⑤。王仲荦指出南北统一、国内各少数民族混斗局面的结束对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⑥。傅筑夫则强调统治阶级的安民政策以及中央政府所发挥的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职能所起的作用⑦。

关于唐朝,特别是唐前期经济发展的原因,有的强调阶级斗争

---

①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2～4,1935。
② 《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4,6,1934。
③ 《唐代经济史论》,《东方语言学讨论会通告》,柏林,34～36,1931～1933。
④ 《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
⑤ 《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新亚学报》4～1,1959。
⑥ 《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⑦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

的推动，如汪籛认为阶级斗争基本冲垮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均田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唐初达到高峰，是主要原因①。韩国磐也指出：夺取部分地主土地，扫除奴隶制残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的依附关系，是农业发展从而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②。有的强调国家的职能、方针政策和统治者的作用，如吴枫指出唐玄宗时代的方针、政策、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③。潘镛则具体论述了括户、重农、减免赋税、抑制豪强与开元盛世的关系④。有的则强调生产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如徐连达认为唐初农民希望通过生产改变自身地位，因而勤于耕稼，这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⑤。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之原因，论者分别指出了唐末农民战争的作用、南方小国的保境息民政策、封建政治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等种种因素。

3. **隋唐五代经济发展的特点**

金宝祥认为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乃是在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商品货币的繁盛，它和春秋战国之际村社解体，自耕小农大批涌现条件下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繁盛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封建经济的范围⑥。傅筑夫则认为，在战国西汉年间一度发展、而后长期中断的商品货币经济，到唐代又达到高潮，并且汉代以后长期中断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唐代又有所复苏，它表现在一些手工工场内部实行技术分工，并对雇佣工

---

① 《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② 《隋唐五代史纲》。

③ 《开元天宝盛世新探》，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1979年。

④ 《唐玄宗的经济政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

⑤ 《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86年5期。

⑥ 《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2期。

人实行具有近代意义的工资制度①。对此有人持有异议，如郑学檬认为，这类手工业内部分工还不发展，而其雇工还不是自由劳动者，故不能认为已是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②。

日本的东京派学者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奴隶制经济结构向封建地主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中，而京都派学者则认为唐宋之际是处于中世纪经济结构向近代型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中，从各自不同的观点出发，两派学者也都阐述了对唐代经济发展特点的看法。

4. **隋唐五代的区域经济**

史念海对自然经济区的研究成果显著，他从历史地理演变入手，对黄河流域农业、蚕桑事业、长江下游农业、黄河上中游农牧业、河北道北部农牧业区的分布及经济状况③、隋唐时期农耕区、半农半牧区与游牧地区的界限及变迁④ 等做了深入研究，是必读之作。长江三游的三种论集《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及《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1989)汇集了有关长江区域经济的多篇论文，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总体水平。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为重要论著，该书分导论，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发展，农业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草市、交通及都会，经济开发与社会——人口政区变动及文化发展，结论六章，全面论述了这一区域的经济文

---

①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343～346 页。

② 《简明中国经济通史》204～205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③ 《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研究的总的发展》、《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均见《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2，198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区的分布》，《唐史论丛》3，1987。

④ 《隋唐时期农牧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化开发，将长江中游分为湖北、湖南、江西三大区，考察了三区开发的特点及规律，探讨了该区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及封建社会演进中的意义。郑学檬论述了唐五代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开发向丘陵、山区深入，构成平原和丘陵山区协调发展的趋势，并指出其农业经济商品化倾向加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向①。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研究了唐剑南东西道、山南东西道及黔中道等相当于今四川省部分的区域经济地理、农业、土地所有制、赋役、纺织业、盐业、茶业和糖业、造纸印刷和造船、商业、交通运输等生产经济，指出四川是与江淮并列的唐中叶以后形成的两大经济中心，四川经济有独自特点，并关系到唐兴衰存变。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在"唐代扬州的农业"、"唐代扬州的手工业"、"唐代扬州的商业"、"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唐代江淮地区的赋税"诸章论述了扬州经济。史念海探讨了唐代扬州的繁荣与长江下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关系②。

韩国磐从户口数量、物产、贡赋几个方面论证了唐宣歙镇的富庶状况及形成的原因③。区域经济比较方面，谢元鲁论述了唐扬州和成都的盛衰，在广阔的背景下比较了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④。周殿杰考察了唐代前期河北、河南与江淮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实力对比⑤。其他论文中，有以地理单元如太湖流域、江汉平原，有以行政区划如湖南道、江西道，有以割据政权管辖区域如南唐、前后蜀，为其研究对象的，此外对边远地区如河陇、福

---

① 《五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历史研究》1985～6；《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厦门大学学报》1987～1。

② 《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2。

③ 《唐代宣歙镇之雄富》，《江海学刊》1992～3。

④ 《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3。

⑤ 《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学术月刊》1982～9。

建，少数民族地区如渤海、奚、回鹘、室韦，也都有专文探讨，呈方兴未艾之势，区域的划分越来越细，论述也趋于深入。但探索地区经济不等于将史籍中有关该地区资料简单整理列举，如何在把握隋唐五代整个经济发展特色的基础上研究小区域的特色，如何在了解该地区在唐代前后经济状况而突出唐代的发展，如何在加强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基本功的同时，更广泛搜集材料研究历史问题，易言之，即注意把握整体与局部、时间与空间等，更深入探讨区域开发及其原因，将是这一领域研究取得较大成就与否的关键。

5. **隋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的转移。**

史学界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及其标准素有分歧。周殿杰认为其标志应是南方开发扩大到闽江、珠江流域；长江下游三角洲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南方人口比重压倒北方，而唐前期南方并未达到这些标准①。郑学檬、陈衍德则认为其标准是南方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发展对其他地区持续占有优势；封建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倚重它，而且在政治上有所反映。以此衡量，唐后期南方亦未取得经济重心的地位②。董咸明考察了南北自然环境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所起的作用，认为唐代北方森林的破坏导致其农业、手工业优势地位的丧失，而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统一乃是决定经济重心所在的根本因素③。桑原骘藏（日）论述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北至南的转移。他从西汉西晋唐宋明南北人物分布及户数比率分析，认为东晋以后至北宋末期为中国文化中枢转移的过渡期④。杨远（台）《西汉至北宋中

---

① 《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学术月刊》1982年9期。
②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
③ 《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6期。
④ 《由历史上观察南北中国》，《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25。

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上下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书从疆域变迁、南北县邑增减、各朝户口南北户数的消长、各朝正史人物南北比率、经济文化盛衰、转移及发展成果诸方面详细考定,具体比较分析,指出至迟到北宋中期末,神宗朝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南方快速发展,是东晋南渡后至隋代复归的301年间、隋开凿东南向三条运河,对后世南方经济文化开发贡献较大。唐代为主要过渡期,至迟到北宋中期为南方经济文化超过北方的定型期。

(二)农业

1. 垦田与水利

汪籛经过估算,认为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唐亩)之间[1]。史念海论述了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农牧业地区的消长[2],指出隋唐时期耕地的扩展在许多地方,尤其是黄土高原,是以水土流失、生态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3]。陈庆隆(台)阐述了突厥族由雏型游牧农耕发展为典型农耕的过程。[4]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侍鳌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将中国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两大经济区,认为政府在基本经济区这一特定地区发展水利工程,以此作为征服与统治附属地区所需的基地。他统计了地方志中唐治水活动数字,指出唐朝南方终于赶上北方,南北地位的改变标志着中国基本经济区已从黄河流域移入长江流域。杨联升(美)也论述了

---

① 《唐代实际耕地面积》,《汪籛隋唐史论稿》。

② 《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业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1987年。

③ 《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 《突厥族的农耕》,《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

唐代水利工程的作用等①。黄耀能(台)考察了唐代水利事业的分布、种类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②。屈弓统计见于唐宋正史及各类史志的水利工程 325 项,载于清代省志及部分宋元明方志而为唐宋史志遗漏者 82 项③。傅筑夫对唐代水利事业有不同看法,认为政府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保护旧渠;地方小渠其利不溥,对农业无足轻重④。

考古资料及出土文书使长安、沙州、西州水利分布的研究更为深入。郭声波论述了隋唐时期长安的水利设施、城市给水和排水、漕运及农田水利,指出它基本解决了城市给水及漕运,多少有利于农副业生产,但水利资源不十分优越⑤。仁井田升(日)⑥、陶希圣等⑦ 最早介绍了伯二五〇七水部式等文书。那波利贞(日)指出敦煌地区为了将鸣沙山的水引来,开凿了许多水渠和支渠,还修筑了许多大堰,并根据渠堰地势高低及所种麦豆等制定了详细规章,春夏秋季调节灌流用水,由渠人(水利公会)掌管行水。崔瑞德(英)也研究了水部式文书⑧ 佐藤武敏(日)的系列文章广泛研究了《新唐书·地理志》水部式及佃人文书、差科簿、渠人转贴文书中反映的

---

① 《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在统一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969。

② 《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83～11。

③ 《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

④ 《隋唐长安的水利》,《唐史论丛》4,1988。

⑤ 《唐宋时代的水利权》,《史学杂志》43～7,1932;《敦煌发现唐水部式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4。

⑥ 《唐式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7,1936。

⑦ 《关于唐代农田水利的规章》,《史学杂志》54～1,2,3,1943。

⑧ 《敦煌发现的唐水部式残卷》,《大亚细亚》6～1,1957。

水利资料①。李并成研究了唐代敦煌绿洲的水系，指出它由大小十支渠道九十余条，泉湖陂泽近二十处统一组成②。宁欣具体分析了伯三五六〇沙州用水章程文书，指出敦煌地区以甘泉水为源，以马圈口堰为总枢纽、以七大水系为骨干，形成整体水利网，用水中实行“自下始”与“均普”原则③。孙晓林利用吐鲁番文书所提供的渠名及位置，研究了以高昌城为中心的水利灌溉渠网，指出从引水主干渠到干渠、支渠、子渠的人工灌溉渠道更加系统化，并绘制了示意图，同时也论述了灌溉时以次取水及各方面人员共同整修的制度④。

2. **耕作技术**

李剑农认为由农器(包括耕犁)上观察唐人之农业技术，似无何种新进展⑤。宋兆麟通过分析唐代曲辕犁各部件的创新和改进以及操作的便利，反驳了否定其历史地位的观点⑥。鲁才全也研究了汉唐间的农具及农耕技术⑦。渡部武(日)以耒耜经和犁耕图为资料考察中国犁耕技术，认为曲辕犁为今日犁的源流，曲辕技术是唐初在华北将古代长江流域使用的直辕长床犁改良而成的⑧。

关于北方农业，史念海认为隋唐时期北方旱地采用的是相沿

---

①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农田水利记事》;《敦煌发现唐水部式残卷译注》;《唐代地方水利设施的管理》,《中国水利史研究》1,2,3,1965,1967,1967。

② 《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7～1。

③ 《唐代敦煌地区农业水利问题初探》,《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1986。

④ 《唐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

⑤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90～191页,中华书局,1963。

⑥ 《唐代曲辕犁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79～1。

⑦ 《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武汉大学学报》1980～6。

⑧ 《唐陆龟蒙耒耜经和曲辕犁的成立》,《东洋史研究》48～3,1989。

已久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1]。天野元之助(日)推测至迟到唐宋间，由于当时大土地所有者，豪族和军官们拥有多数耕畜和大农具，推动了两年三作的农业经营[2]。西嶋定生通过对碾硙作用及政府从毁碾到过多拥有政策变化的分析，指出唐代中期华北出现了不同于均田制时代的新形势，从农业技术方面而言，增加种植小麦的结果使谷物和麦田相结合，产生了两年三作的轮作形式[3]。大泽正昭(日)指出，在唐代华北旱田轮作体系中已出现了对保持地力很重要的豆类栽培与普及，同时用肥料和休闲法来维持地力[4]。

关于南方的农业技术、西嶋定生指出，南方至唐始于大范围内对稻作技术进行改革，废除休闲实行连作；废除直播实行移植。由于采用苗圃育秧技术，双季稻连作和稻麦复种才有了可能[5]。牟发松认为唐代南方稻作在犁耕工具、排灌工具和农作方式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它是对六朝以来南方突破火耕水耨而初步形成的新稻作方式的总结与完善，特别是中唐江东犁的普及，龙骨车的推广和稻麦复种的出现，南方稻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6]。北田英人(日)具体研究了八世纪在江南低田地带形成的潮汐灌溉[7]。大泽正昭将视野从生产力先进地域转向采用落后的火耕田方式的地区，考察了唐宋时期畲田的实体、地理分布、相关连的民族问题、耕作技术等[8]。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日)编《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

---

① 《河山集·三集》147页。

② 《中国耒耜的发展》,《东方学报》26,1956。

③ 《碾硙寻踪》,《中国经济史研究》。

④ 《唐代华北的主要谷物生产与经营》,《史林》64～2。

⑤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162～166页。

⑥ 《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47页。

⑦ 《唐代江南的自然与开发》,《历史中的自然》,岩波书店,1989;《中国江南的潮汐灌溉》,《史朋》24,1991。

⑧ 《唐宋畲田考》,《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的诸问题》,中国书店,1987,以后简称《诸问题》。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汇集了研究中国稻作史的学术性成果。

3. **粮食生产**。

张泽咸详论了汉唐间水稻生产不断进步的情况①。林立平认为唐代各种粮食作物栽种次序日趋紧凑，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率有明显提高②。胡戟认为唐代平均亩产量通常不少于一石，新开荒地和贫瘠土地亩产要少一、二斗；较好的收成可达亩二石，最高为亩一钟(六石四斗)③。吴章铨(台)考得永泰、大历间京兆府麦田产量约为七斗上下④。李伯重认为唐代江南水稻亩产量一般为三石；在稻麦复种制下，稻、麦合计每亩可达四石⑤。李氏在《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中更全面地论述了水稻生产产量等问题。于德源以农业人口密度为依据，考察唐代幽、妫、檀三州农田开发水平，指出三州农作物以粟为主，小麦亦占一定比重，水源充足地带有较集中的稻作区⑥。华林甫探讨了唐水稻生产布局状况、变迁及原因，指出其分布于幽—并—绛—同—京兆府—陇—渭—兰州—线以南⑦。

4. **经济作物**

严耕望考察了唐代丝、麻、毛、棉、草织品的分布区域⑧。汪篯指出玄宗时产丝者为关东、巴蜀、吴越三个区域⑨。王永兴对唐前后期上述三个产丝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关辅产丝织

---

① 《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第18辑。

② 《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暨南学报》1984年1期。

③ 《唐代粮食亩产量》，《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3期。

④ 《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

⑤ 《唐代江南地区粮食亩产量与农户耕田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

⑥ 《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中国农史》1992～2。

⑦ 《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2。

⑧ 《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大陆杂志》13～11。

⑨ 《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汪篯隋唐史论稿》。

品很少①。徐庆全认为关中寡蚕桑的原因是土地不足及对麻布大量需求②。史念海则认为据唐诗可以看到，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桑株蔽野，绝不是寡蚕桑的地方③。杨希义也认为关中的蚕桑与纺织业生产并未中断，所谓关辅"既寡蚕桑"，不能说明它在此地已绝迹，"京邑无土绢"可能受价值规律的影响④。赵丰运用诗文及出土文书，对唐代蚕桑业地理分布做了更进一步的考察。他还研究了唐代的栽桑、养蚕技术⑤。日野开三郎（日）考察了唐西州、岭南、蜀、湖南、福建及东海诸岛的木棉生产状态，并分析了其传播的三大路径，指出木棉生产量虽地区广泛，但产量与麻、紵等布及绢是无法比的，其主要用途为衣料，在国家财政中占比重极微⑥。东野冶之（日）认为《隋书南蛮传》等记载的"朝霞锦"就是棉布⑦。

张泽咸指出人工栽培茶树之法始于唐，并列举了唐五代时期的产茶地区共69个州⑧。王洪军则指出晚唐五代时产茶州已达98个，比中唐增加一倍以上⑨。郑学檬通过对《状江南》组诗的分析，论述了江南湖南江浦的野生植物、果树、水产资源等，指出水稻生产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⑩。

5. **渔业**

---

① 《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2，1983。
② 《唐代关中地区寡蚕桑的原因试探》，《辽宁大学学报》1989～2。
③ 《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集》。
④ 《唐代关中无丝绢说质疑》，《人文杂志》1987～4。
⑤ 《唐代蚕桑事业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2，《唐代的蚕桑生产技术》，《中国农史》1991～4。
⑥ 《唐代的木棉生产》，《佐贺龙谷学会纪要》18，19，1973，收入《日野三郎东洋史论集》9，三一书房，1984。
⑦ 《朝霞锦考》，《遣唐使与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
⑧ 《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11。
⑨ 《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6。
⑩ 《从〈状江南〉组诗看唐代江南生态环境》，《唐研究》1，1995。

中村治兵卫(日)研究了唐代渔业政策及鱼类流通,并根据《太平广记》及陆龟蒙、皮日休的渔具诗,从鱼法、渔具方面进行了考察①。陈明伟指出唐代已经出现了渔业生产专业化的萌芽,他还考察了唐末时期捕鱼方法技术及淡水养鱼业②。

(三)手工业

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分"研究的动机范围与态度"、"官工业的组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的行会"及"结论"七章,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工业经营形式、内部分工、对外关系、对经济界的影响、工人的组织及演化程度等,是具有开创性的高水平论著。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分手工业、商业两编,上编改变了长期以来手工业研究零碎不集中的状况,以工业种类区分,全面论述了采掘与冶炼、铸铜、铁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银制造、建筑、造船、纺织与印染、陶瓷、制茶、制盐、粮食加工、漆器、制纸与印刷业的生产,在说明官府工业的规模时,注意搜集私手工业及全民所需产品资料,同时探索源流,展示唐手工业发展的全貌。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③ 论述了这一时期工匠从轮番到纳资代役的转变及和市和雇制度的发展过程。认为这体现了手工业者对官府作场的封建隶属性的削弱。冻国栋《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④ 列举分析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木、缝、铁、竿、泥、石、皮、

---

① 《唐代的渔业政策和鱼类流通》,《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20,1975;《唐代的渔法和渔具》,《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 1975。

② 《唐宋时期的渔业生产》,《农业考古》,1991～3。

③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

④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

画、油、杀猪、连甲、装潢、韦、景等工匠，指出私营工匠与官工匠一样，以州县为团，自备作具，被官府强制征发。

在诸种手工业的研究中，杨远《唐代的矿产》（学生书局，1982年）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统计了金、银、铜、铁、锡、铅、盐、水银、朱砂九种矿产的产地和地理分布，这是继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① 之后，唐代矿冶业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陈国灿对唐代海盐、池盐、井盐的生产状况进行了详细研究②。陈衍德指出唐代制盐技术、产地数目和分布范围、食盐产量均超过前代③。这一观点在其与杨权合著《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一书中得到进一步论述。古贺登（日）考证了有争议的唐代盐井数目，认为《新唐书·食货志》的有关记载是作者根据北宋前期的情况类推而写成的④。吴天颖不同意此说，他论证了上述记载的可信性，认为它反映了唐末的情况⑤。

纺织业领域成果也很集中。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上、中编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唐丝绸产量、产量格局、生产形式、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科技艺术史和文物研究角度探讨唐丝绸技术体系、品种工艺等，广泛集中了唐代丝绸有关史料、实物、文献，论述系统且富有创见，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卢华语《唐代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1995）分丝绸产地分布特点、蚕桑丝绸业发展、丝绸特点、丝绸作用四部分，主要探求丝绸的

---

① 《禹贡》1 卷 11 期，1934 年。

② 《唐代的盐户》，《中国古代史论丛》第 3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盐业史研究》1988 年 4 期。

④ 《唐代井盐考》，《续唐代井盐考》，《史观》53，1958；57，58，1959。中译见《井盐史通讯》1980 年 1 期；1981 年 1 期。

⑤ 《〈新唐书·食货志〉有关井盐记载释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 4 期。

艺术特色及丰富的文化传统内涵。王进玉《敦煌遗书中的丝织物》一文[①]集中了敦煌文书中的丝织资料。里布夫人(法)《敦煌丝绸》(巴黎,1970)分析了伯希和带走的敦煌丝绸。王仲荦根据高昌市场上纺织品的种类和价格,研究了唐代纺织业新品种增加的情况[②]。武敏认为唐丝织物印花方法可分直接印花法、拨染印花法和防染印花法[③]。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的传播》[④]认为纺织手工业技术起高昌、经过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传播到了波斯。姜伯勤论述了敦煌吐鲁番的胡锦、粟特锦,指出敦煌8世纪开始流行的番锦与粟特锦有关,9世纪后流行的胡锦,除了包括粟特锦,也包括拜占庭锦,因粟特锦中拜占庭影响增强,“胡锦”一词被“波斯锦”替代,粟特人不仅把中国丝绢自敦煌吐鲁番运出,也把粟特锦(胡锦)销行到吐鲁番[⑤]。这一论述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陈国灿分析了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布帛印染技艺的配役[⑥]。

关于饮食加工业,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发展史》(台湾学生书局,1995)足资参考,该书分唐宋饮食结构变化、美食特色、观念心理、器具形质、饮食疗法、食业兴盛、屠宰加工、酿酒工艺、食糖生产、茶业发展、食品贮存诸章,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饮食加工的发展情形。季羡林《一件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⑦]是研究制糖业史的重要文章,该文考察了伯三三〇三文书所关涉的甘蔗写法与种类、造糖法与糖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

---

① 《丝绸史研究》1987～1,2。

② 《隋唐五代史》(上册)386～390页。

③ 《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印染》,《文物》1973～10。

④ 《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

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206～226页,文物出版社,1994。

⑥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122～13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⑦ 《历史研究》1982～1。

令的差别、甘蔗酿酒、甘蔗栽种法等问题，指出史籍有唐官方向印度学习制糖的记载，但这件文书是民间学习印度制糖的记录，在中印科技文化交流史上更有意义。郑炳林、高伟充利用敦煌资料，研讨了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的酿酒业和管理、官营及私营酒业的发展状况①。刘铭恕指出敦煌研究院藏酒帐记载的羊、牛、羔子、貉子皮酒不是以动物皮为原料而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浑脱酒，即将牛羊皮制成口袋，就中酿酒。唐宋时代敦煌有少数族分据四周，学得了浑脱酒技术②。李华瑞认为唐宋时中国已有烧酒③，王赛时不同意此说，指出唐宋时烧酒非蒸馏酒，唐史籍记载的烧酒只是用加热方法命名的发酵米酒，红酒指用红曲酿成的酒④。

关于其它诸业，李知宴论述了隋瓷的造型特点、装饰、工艺技术；指出唐代瓷器已从陶器生产中分化出来，自成部门⑤。任荣兴利用内外陶瓷考古发现及史籍记载，分析了唐五代瓷业成就及外销背景、品种、路线等⑥。郑学檬以造船技术（主要是桅杆）、航运（包括内河与海运）的进步为中心，论述唐五代航运业的发展趋势，揭示其对经济重心南移的某些影响⑦。

（四）商业

1. 通论

---

① 《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西北史地》1994～1。

② 《敦煌遗书丛识之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③ 《中国烧酒起源探微》，《历史研究》1993～5。

④ 《中国烧酒名实考辨》，《历史研究》1994～6。

⑤ 《隋代瓷器的发展》，《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分期》，《文物》1977～2，1972～3。

⑥ 《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及生产》，《史林》1994～3。

⑦ 《技术进步：唐五代航运业发展的动力），《纪念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是第一部综合研究唐代商业的专著。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包括商品市场的扩展、市场繁荣和商品种类变化所反映的商品发展、商品流向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发展的限度及其原因等部分；下篇论述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分农业领域、私人手工业、商人部门及官营工商业、官府对国内工商业、货币、边地民族贸易、中外国际贸易的管理诸部分，指出唐商品经济作为与自然经济对立的经济形态，虽受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权的束缚，但仍沿着自身的经济曲线向前发展，同时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那个时代颇为周密的制度或办法。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从国内商业、边境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三部分详细论述了唐代的商业发展。

2. **城乡商品交换与流通**

对隋唐五代商业发展水平有三种不同的估计。李文海认为政府垄断经营部分商品、农民被迫与市场联系、奢侈品销售的增多造成了唐代商业的虚假繁荣①。郑学檬认为唐五代商业的繁荣是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商业发展的局限也不容忽视②。傅筑夫认为唐代商业开始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商品构成由以奢侈品为主变为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唐代已有相当发达的国内外商业，并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唐代封建经济结构中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③。秦晖认为唐商品经济

---

① 《唐代的商业与商品生产》、《历史教学》1956 年 4 期。

② 《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③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379～463 页;《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397～411 页;《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陕西师大学报》1979～1。

水平逊于汉[1]，薛平拴不同意此说，指出唐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深度与广度及农民经济的商品程度化均明显超过汉代[2]。

关于商人问题，郑学檬认为唐代商人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他们已形成专业性商帮、结成同业组织[3]。傅筑夫也深入研究了唐代工商业行会。姜伯勤指出敦煌文书中的"行人"为行会中人[4]。畑地正宪（日）考察了河北藩镇幽州"行"成立的背景及藩镇与行的关系[5]。张邻论述了中唐以后商贾地位的上升和势力的膨胀[6]。崔瑞德（英）认为唐中叶商人界摆脱了政府的严格限制，开始缓慢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个富有的自觉的城市中等阶级[7]。傅安华指出唐官僚地主与商人勾结，或自己作商人，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商人化[8]。姜伯勤认为唐将商贾登录于市籍，市籍远役等打有汉代市籍制传统的烙印，但唐市籍制呈松弛和衰落的趋势[9]。小林高四郎（日）[10]、张弓[11] 论述了唐宋时期商场中的牙人。

关于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加藤繁最早研究唐代的市、草市、行、居停及柜坊等[12]，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开拓工作。陶希圣分析了市的管理制度[13]。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续唐代邸店研究》

---

① 《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91～3。
② 《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陕西师大学报》1992～2。
③ 同前页②
④ 《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中国中研究》1979～2。
⑤ 《唐代河北藩镇下的商业发展》，《冈崎论集》，1987。
⑥ 《论唐代中期以后商贾势力的膨胀》，《学术月刊》1985年1期。
⑦ 《晚唐时期商人、贸易和政府》，《小亚细亚》1964年1期；《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剑桥大学出版社。
⑧ 《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6，1935。
⑨ 《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
⑩ 《唐牙人考》，《唐宋牙人考补正》，《史学》8～1，3，1929。
⑪ 《唐五代时期的牙人》，《魏晋隋唐史论集》1，1981。
⑫ 《中国经济史考证》。
⑬ 《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8，1936。

(自费出版,1968,1970)论述了肆铺和邸店,邸店的经营业务及发展,州县城邑的邸店、草市的发展与店、邸店的权力等,以邸店为中心分析研究了唐代商业。崔瑞德从官市制度及其废弛、农村市场、地方集市等方面研究了唐代市场的情况①。苏联学者认为,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产生于唐代,那里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山区和村镇也都有集市②。郭正忠认为唐代镇市是新型经济都市,它们以工商业为主,规模与人口不逊于州县城,而多数已蜕去作为城市外壳的城墙③。此外,四川的蚕市④、岭南的墟市⑤,也都有专文论述。

有关城市的研究也成果较多。陶希圣论述了唐末残破后南方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复兴及北方商人的作用⑥。张泽咸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开始出现,在商人日趋得势的唐中叶正式出现"坊郭户",五代草市居民被列入坊郭户,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⑦。郭正忠也考察了城市居民结构,重点在于说明政治城市、军事城堡、综合型城市及雏形经济都市在居民人口数量、社会成分、职业结构等方面的特点与差异⑧。林立平认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结构发生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重心南移,江淮城市网络成为市场机制最突出的商品集散地⑨。爱宕元

---

① 《唐代市场制度》,《亚洲研究》12卷,1966年。
② 《世界通史》第三卷,莫斯科,1957年;《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莫斯科,1974年。
③ 《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2期。
④ 鞠清远《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6,1936。
⑤ 何格恩:《唐代岭南的墟市》,《食货》5～2,1937。
⑥ 《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
⑦ 《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
⑧ 《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2。
⑨ 《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

（日）整理了《元和郡县图志》的州县城郭记事，从政治都市、军事要塞的侧面展示唐州县城郭的面貌①。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研究》（刀水书房，1988）收入有关唐一城二县制、长安、太原、幽州、西州、沙州等城市研究论文多篇，该书反映了日本学界唐代城市（首都与地方）研究日渐深入的总体水平。

首都长安是城市研究的核心区域。宿白根据考古发掘对隋唐城址进行分类，探讨了长安、洛阳城的布局②，奠定了城市布局研究的基础。妹尾达彦的系列论著广泛利用文学资料论述长安城内的具体构造及居民的日常生活③，形成都市史研究的一个新气象。史念海研究了长安外城郭街道及里坊的布局变化④。更值得一提的是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考古发现及实地考察研究长安、洛阳两京城坊宫阙建置，考证翔实，多有新见，可谓徐氏功臣。

扬州的经济都会地位一直受到重视，除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外，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⑤从国内外贸易、工业、金融、运输等方面探讨了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爱宕元利用考古学成果对唐代扬州城及其郊区进行了复原工作，认为地

---

① 《唐代州县城郭的规模和构造》，《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1989。

② 《隋唐城址的类型》，《考古学论考》10，1984；《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6。

③ 《唐代长安的街西》，《史说》25，1984；《唐长安的热闹场所》，《史流》27，30，1986，1989；《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诸问题》，1987；《唐代长安店铺选择地点与街西的致富潭》，《布目潮沨博士古稀记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

④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

⑤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1，1944。

形变化是其衰落的原因①。此外，砺波护（日）比较了苏州、杭州，并分析了白居易诗文中反映的苏州状况②。伊原弘（日）考察了唐宋时代浙江城市及江南都市形态的变迁③。李孝聪分析了唐后期华北平原北部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定、恒（镇）、魏州的形成、演变历史背景及自然地理条件④。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⑤是这一领域的总结性论作，该文论述了都城长安、各陪都、扬益二州、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十万户州郡治所及赴域外道路、沿边沿海的都会。史氏还有《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⑥，也是综合之作。

3. **货币与物价**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译本，和记印书局，1944）分“绪言”、“唐宋金银货币的用途”、“唐宋时代之金银钱”、“唐宋时代之金银器饰”、“唐宋时代之金银价格”、“唐宋时代之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出与输入”、“唐宋时代之金银铺”、“金时代之银”、“隋以前元以后的金银”、“结论”十二章，指出唐结束了魏晋以来的动乱状态，社会稳定，都市繁荣，工商业交通发达，导致了金银器货币作用的发达。但唐金银货币之用仅限于上层，至宋才有全社会使用的趋势。该书材料丰富，是必读著作。《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5（三一书房，1983）名为“唐五代的货币与金融”，主要内容包括便钱及汇

---

① 《唐代的扬州城及其郊区》，中国近代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6。

② 《唐宋时代的苏州》，同上。

③ 《唐宋时代的浙江都市变迁》，《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24，1979；《江南都市形态的变迁》，《宋代的社会与文化》，汲古书院，1983。

④ 《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1992～2。

⑤ 《唐史论丛》6，1995。

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4。

兑制、寄附铺和柜坊、波斯钱、回纥钱、闭籴与禁钱、岭南金银流通等，为作者有关货币与汇兑制论文的结集。有关唐代铜钱的论述有桑原骘藏（日）《唐宋时代的铜钱》①，曾我部静雄《开元通宝钱文物的读法》②。陈源、姚世铎、蒋其祥编《隋唐五代货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为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二千余件藏品图集，尚有专文论述其特色。林梅村研究了突骑施钱，认为突骑施钱第一类铭文 nbw 可能是汉语开元的讹译，突骑施钱是仿开元钱，其采用唐货币形式，与汉文化西传碎叶关系密切③。

铜钱的交易过程中有除陌问题，宫泽知之（日）认为唐宋时代普遍实行的短陌并非由于铜钱的不足而产生，而是在铜钱经济下，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行会操纵铜钱的什数单位陌、规制货币而产生的④。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⑤为一篇重要文章，指出唐除陌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内涵，一为交易税，天宝年间每贯 20 文，建中四年增至 50 文；二为中央对中外给用钱的抽贯，始于赵赞，其后由 20 增至 100 文，仍有额外量抽；三为铜币在流通中准许每贯垫除若干。仍旧充 1 贯使用，形成一种新的货币流通方式。杜来梭对此提出商榷，认为京畿贸易除陌法创于建中四年，中外给用除陌则早已存在⑥。陈明光再次指出，天宝九载除陌钱每贯 20 文为交易除陌，其间国家财政富裕，不可能产生对中外给用钱除陌的非常节支措施⑦。

关于唐后期及五代币制，崔瑞德指出：唐后期币制变化的重要

---

① 《东洋文明史论丛》，弘文堂，1934，收入《桑原全集》2。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③ 《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文物》1993～5。
④ 《唐宋时代的短陌和货币经济的特质》，《史林》71～2，1988。
⑤ 《中国史研究》1984～4。
⑥ 《唐代除陌商探》，《中国史研究》1992～2。
⑦ 《再论唐代的除陌》，《中国史研究》1992～2。

内容之一是银逐渐代替绢作为交易媒介[①]。戴振华指出，五代币制混乱，货币种类多，有铅铁币、铜币、廛泥币、金银与绢帛等，并论述了五代时铁币取代铜币以及政府维持铜币之政策[②]。

唐代货币的重要特征为铜钱与绢帛同为流通手段，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③]从唐以前货币史的发展、唐代铜钱流通分析、唐代行用绢帛原因等方面论述了这一现象。与之盘根错节相连的是唐代的估法，王永兴指出铸钱原料铜的缺乏及佛教盛行，造成了中晚唐铜钱的缺少，但开天以来铜钱使用渐趋发达，两税法不可能改变以钱谷为额，只能在收入支出上折用一部分匹段，这样产生了虚估实估的估法[④]。刘淑珍探讨了估法与两税、盐利、供军、俸料、进奉、物价等的关系[⑤]。赵和平分析了唐代钱重物轻问题与估法的出现，指出其原因有法弊与时弊[⑥]。卢向前《唐前期估法研究》[⑦]考察了时估的制定，认为估法对民间交易有约束作用，是官方买卖的价格依据，收付他物的折算依据，平赃定罪的法律依据。估法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唐以铜钱为价值尺度而以铜钱、布帛为流通手段的矛盾解决方法。这一认识对研究唐代估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李锦绣论述了唐后期与估法相关的虚实钱，指出虚实钱源于虚实估，指充当流通手段具有两种估价的绢帛布等，这是旧的货币形式（铜钱、实物）行将退出流通领域，新的货币形式（银、纸币）大量出现之前产生的混乱现象。虚估是唐力图将实物货币挽留

---

① 《剑桥中国史》第3卷《导论》。
② 《五代货币制度》，《食货》2～1，1935。
③ 《历史研究》1961～1。
④ 《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2，1949。
⑤ 《中晚唐之估法》，《史学集刊》1950～6。
⑥ 《中晚唐钱重物轻问题和估法》，《北京师院学报》1985～4。
⑦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于流通领域的措施①。魏道明不同意史界认为虚钱指乾元重宝和重棱钱，实钱指开元通宝钱的说法，认为虚实钱起因于恶币的出现，大钱的发行使虚实钱完全公开，合法化②。对唐后期出现的钱荒问题，金井之忠(日)认为唐从南朝引入了发达的货币经济，而从北朝继承了布帛为通货的国家政策，这二者如何调和的问题是唐代钱货问题的中心点③。薛平拴指出"钱重物轻"现象与两税法密切相关，它是货币供需矛盾引起的，而不是社会发展、产品增加的结果④。

吐鲁番考古发现促进了高昌货币研究的深入。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⑤ 分析了本世纪从吐鲁番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银钱，判断其属于四至七世纪萨珊王朝的波斯银币。冈崎敬(日)继之研究了银币东传，并将其名为白银之路⑥。姜伯勤补充了吐鲁番文书资料，认为吐鲁番长期保持银本位制，完全是为了适应国际丝路贸易⑦。敦媛指出六七世纪吐鲁番地区银钱已具有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交换经济中占据十分显赫地位，波斯银币东传及胡商特别是粟特商人的活动导致吐鲁番地区使用银钱⑧。林友华认为高昌广泛使用的银币不是外来而是自铸，这种自铸钱初步命名

---

① 《唐代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9～2。

② 《略论唐朝的虚钱和实钱》，《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2。

③ 《唐代的钱货问题》，《文化》4～3，1937。

④ 《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陕西师大学报》1995～3。

⑤ 《考古学报》1957～2，收入《考古学论文集》。

⑥ 《萨珊波斯银币及其东传》，《东南亚研究》14，1965；《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 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东西交涉考古学》，平凡社，1973。

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29～36 页。

⑧ 《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4。

为"高昌吉利"钱①。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② 根据吐鲁番文书，依其自身发展演变特点，将四百年货币发展分为纺织品(367～560)、银钱(560～680)、铜钱(680～763)本位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分若干时期，探索了演变的原因，是有关吐鲁番货币研究的总结之作。

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唐代物价的变动》③，是研究唐代物价的两篇重要文字。前者从魏晋南北朝时货币论起，指出安史乱前后为自然经济衰落，货币经济兴起时期。后者纵观唐代物价起伏状态，指出唐代物价有唐初、武周前后、安史乱后，唐末四次上涨，太宗高宗、开天及两税法实行后三次下落的变动，并分析了上涨与下降的原因及影响。梁仲勋认为唐政府建立了商情网络机构，通过仓储、常平仓等办法平抑粮食等商品的市场价格④。傅筑夫探讨了粮价变动与唐朝盛衰的关系⑤。仁井田升首先研究了天宝价格文书，认为价格表中物价不是上级制定，是经过研究实际交易价格后规定的。具有监督交易价格和取缔暴利的意义⑥。池田温进一步考察了大谷物价文书，判明其为天宝二年秋交河郡市估案，认为其总的说来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属于盛唐价格体系，并从市估案推察当时流通经济的状况及货币经济向全国性物资交流和农牧业的渗透⑦。王仲荦《唐西陲物价考》⑧汇集考定了敦煌、高昌和于阗文书中有关生活用品等物价。张勋燎、朱雷还研究了敦煌奴婢马匹价目

---

① 《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式初探》，《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② 《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③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0，1941；11，1943。

④ 《唐代物价与物价管理》，《西北大学学报》1988～3。

⑤ 《由唐代的物价波动看唐王朝的兴衰》，《唐史论丛》3。

⑥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西域文化研究》3，1957。

⑦ 《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史学杂志》77～1，2，1968。

⑧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2。

文书①，朱雷将文书定名为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②。

对唐后期出现的“飞钱”制度，宫崎道三郎(日)最早论述③。除上引《日野论集》5 外，尚有侯家驹《唐代飞钱考》④。该文探讨了飞钱的产生及制度，指出肃代时因钱币处理不当引起钱荒而禁钱出境，为飞钱出现的主要原因，元和初建立了便换制度，飞钱为当时民间的俗称，经《新唐书》后，史籍多以飞钱代替便换。飞钱为雏型的汇兑制度，委托汇兑者为到京师贸易的商人，受托者包括官办私营(诸道军使驻京办事处)、私办私营(富家)两类，后来三司加入其中。飞钱无汇费，受托者以之进献或充高利贷本而获利。幸彻考察了唐宋钱兑票便换的出现、展开、衰退及南北间流通不均衡与便换、便钱、交钞等⑤。李家寿指出无论文字还是实物资料，均不能证明唐代飞钱曾进入过流通领域，在商品交换中起过货币流通手段职能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与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比较了飞钱与引钞两者在成因、性质、手续称谓方面的共性，认为引钞制起源于飞钱。吴丽娱认为飞钱在唐代主要用于汇兑，与用来折博茶盐的引钞毕竟不同⑦。

此外，还须提及的是与货币物价密切相关的度量衡制。郭正忠

---

① 《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78～3。

② 《敦煌所出的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③ 《日本・中国古代的汇兑制度》；《唐代的茶商和飞钱》，《宫崎先生法制史论集》，岩波书店，1929。

④ 《幼狮学志》19～3，1987。

⑤ 《唐宋时代南北经济交通及南下兑票类》，《九洲大学教养部历史学地理学年报》11，1987；《唐宋时南北商业流通和证券类》，川胜守编《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书店，1993。

⑥ 《关于唐代飞钱的性质问题》，《财经研究》，1994～3。

⑦ 《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详细论述了汉魏至唐宋尺斗秤等器物。计量单位、计量制度、度量衡的管理与器制量值等,与唐有关者包括"隋唐五代时期的权衡器物"、"隋唐宋元时期的斤制与特殊衡名"、"隋唐宋元权衡中的精细计量制度"、"出土钱物与唐斤两的轻重"、"隋唐宋元之际的尺度与亩数"、"隋唐时期的容量器制"等章节,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4. **借贷与高利贷**

仁井田升据敦煌文献,论述唐代借据中出现的保证制度,指出这一制度在中国自唐后一直保留到宋元时代的法律中①。杨联升也论及债务人家族的连带责任②。刘兴唐分析了唐代存在的民营、寺院及官府三种高利贷③。横山裕男探讨了唐代的捉钱户④。陶希圣研究了诸司诸色本钱及利率、私人的贷借及利息率、公私贷借利息限制法等⑤。黄向阳指出唐法定官私借贷月利率"分"为百分率而不是十分率,史籍中"收赢十分之七"、"十之六"等为后人记叙,不一定准确⑥。李锦绣《唐前期公廨本钱的管理制度》⑦从《唐六典》的错简谈起,指出比部与内外诸司勾官形成对公廨本钱的管理体系,公廨本钱由比部而不是户部掌管,是儒家思想指导下唐君臣力图取销公廨本钱的理想与官营高利贷不断膨胀的现实之间矛盾的产物。敦煌博物馆第五八号地志文书中有各郡县公廨本钱数的

① 《唐宋时代的保证和抵押制度》,《中国法制史研究》2。
② 《唐宋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食货》1～5,1935。
③ 《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10,1935。
④ 《论唐代的捉钱户》,《东洋史研究》17～2,1958。
⑤ 《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食货复刊》7～11,1978。
⑥ 《关于唐宋借贷利率的计算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
⑦ 《文献》1991～4。

详细记载，薛英群①、吴震②、马世长分别撰文研究，尤以马文对地志记载及唐公廨本钱制度考证最详③。

陈国灿根据吐鲁番新出土的近三十件私人借贷文书，提出唐代的民间借贷可分为生息举取借贷，物、力偿付借贷，质押借贷和无息借贷四种类型。他还论述了吐鲁番出土的唐长安新昌坊内或邻近一带的某质库帐历，并考察了唐质库经营及“质钱帖子”，认为唐质库制度是作为封建制度的一种补充物而出现的④。唐耕耦利用出土文书探讨了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⑤。卢开万研究了唐前期西州地区以高利贷为手段的土地兼并，以及均田农民在高利贷盘剥下分化的过程⑥。仁井田升（日）《唐宋法律文书的研究》一书以专章论述了借贷文书，分析了唐代的消费借贷、使用借贷等文书。楚古耶夫斯基（苏）《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也研究了唐代的粮食借贷文书。堀敏一⑦、池田温⑧、石田勇作⑨探讨了消费借贷文书、便谷历、出举钱契等。沙知整理研读了伯四〇五三背文书，指出它是敦煌文书中最早的契约，由于文书是道观借贷，暗示了各地道观

---

① 《略谈敦煌地志中的公廨本钱》，《兰州大学学报》1980～2。

② 《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异跋》，《文史》13，14，1982。

③ 《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

④ 《唐代的民间借贷》；《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⑤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学辑刊》1986年1期。

⑥ 《唐前期西州地区高利贷盘剥下均田百姓的分化》，《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

⑦ 《唐宋间消费文书之我见》，《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

⑧ 《敦煌的便谷历》，《诸问题》。

⑨ 《吐鲁番出土举钱契杂考》，《骏台史学》78，1990。

没有象寺院一样在社会经济生产中产生重要影响①。

5. **对外贸易**

丝绸之路是唐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中外学者对丝路研究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有关唐丝路贸易研究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该书分"拜占庭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路上的突厥人"、"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法宝之路"、"敦煌吐鲁番与丝路上粟特人"五章，取出土文书与其它考古文物相参证、地下出土与史籍相参证、中西史相参证的方法，从金融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观察丝绸之路，探讨了与"东西贸易承担者"(粟特)有关的丝路实况，包括拜占庭与波斯在丝路贸易上的利益冲突，粟特人与草原民族西突厥人、铁勒人、突骑施人在丝路利益上的相互依傍，旁及白银之路及香药之路，立论及分析问题的方法角度，均令人耳目一新。《日野论集》5有关唐回纥、波斯钱的论述，指出唐后期从西域和南海来的回纥阿拉伯商人，不但对商业贸易，而且对金融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刘铭恕论述了与丝路贸易有关的唐代归化人罗好心、称为兴生胡的西域商人及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等②。程喜霖分析了记载兴胡商队在西州请过所的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请过所文书，说明由长安起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主要干道，西州为枢纽③。

对丝绸之路的探源也是近来学界的热点。洛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汇集了多篇研究汉唐间洛阳与丝路贸易关系的论文。中国西南经东

---

① 《跋天宝十三载便麦契》，《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② 《丝绸掇琐》，《敦煌学辑刊》1984～2。

③ 《〈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1991。

亚、南亚到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道路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陈炎最早提出此说①。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系统地研究了西南丝路的开通、走向、贸易、地位等，指出唐西南丝路虽有发展，但无论形式规模，都与广州、长安有很大差距。

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是较早有关海路贸易的论文结集。其中“市舶司及市舶”是对藤田丰八《宋代的市舶司和市舶条例》② 的商榷文章；“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对《新唐书》夏腊城、提罗卢和国、由《新唐书》至印度河口 Bahdad 途径、中国南部无钉船等提出新解；“广府问题及其陷落年代”考察东西史料，认为广府陷落应在乾符五年；“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认为《道程及郡国志》所记中国四贸易港为交州(龙编)、广州、扬州、泉州。此前日本研究海外贸易者尚有石桥五郎③、中村久四郎④ 等。

国内的海外贸易研究。岑仲勉探讨了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的唐人航线⑤。韩振华从海上国际贸易之繁盛、贸易之国家、商船及航程、贸易政策、贸易机关职务、贸易港口六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南海贸易⑥。李东华(台)论述了唐末泉州港的兴起及其背景，并综述了南海交通、贸易圈的形成⑦。沈福伟不同意泉州在唐代作为外

---

① 《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东方研究》1980～1。

② 《东洋学报》7～2，1917。

③ 《论唐宋时代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口》，《史学杂志》12～8，9，11，1901。

④ 《唐代的广东》，《史学杂志》28～3，4，5，6，1927；《广东——商胡和沟通广东长安的水路航运交道》；《东洋学报》10～2，1920。

⑤ 《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的唐人航线》，《东方杂志》41 卷 18 期，1915 年。

⑥ 《唐代南海贸易志》，《福建文化》2 卷 3 期，1942 年。

⑦ 《唐末泉州的兴起及其背景》，《台大历史学系学报》1982 年 12 月。

贸大港的说法，认为唐代四大外贸大港乃是广州、交州、明州和扬州[1]。樊文礼研究了登州港[2]。

关于唐与日本、新罗等贸易，日野开三郎论述了新罗时代、三国鼎立时代与中国的海舶往来、交通贸易及港浦航路，贸易品等及新罗渤海国绢织物向中国等的输出贸易关系[3]。榎木淳一认为唐后半期唐物品大量进入日本，两国朝贡衰退而贸易发展，影响了日本文化[4]。韩国磐条列了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经济交往[5]。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6]视点与论述方法均很独特，他通过李延寿出身渤海而日本文献称"大唐商人"这一现象指出：出身渤海新罗的人，为顺利与日本民间贸易，冒称唐人，大唐商人在九世纪成为新罗渤海等多国政权商人合作的经营组织。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为唐后期重要事件。陈寅恪据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诗，指出回纥以劣马市易，唐亦以短截疏织之绢付之，彼此俱以贪诈行之，无益可笑[7]。松田寿男(日)认为自古以来就有中国绢与游牧族马的交易[8]。根本诚(日)指出这场绢马交易，是伴随着国家政治力量强弱的强制交换[9]。土肥义和将斯坦因携来敦煌文献中唐回鹘两国交易的断简复原三片，认为它们是在

---

① 《论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第2期，1986年。

② 《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4～2。

③ 《新罗末年三国鼎立和对大陆海上交通贸易》，《朝鲜学报》16，17，18，19，20，1960，1961；《国际交流史上所见的满鲜织物》，《朝鲜学报》48，63，82，1968，1972，1977，《日野论集》9，1984。

④ 《"国风文化"与中国文化》，《唐与日本》，1992。

⑤ 《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2。

⑥ 《历史研究》1993～4。

⑦ 《元白诗笺证稿》，2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⑧ 《关于绢与马交易的史料》，《内陆亚洲史论集》1，1964。

⑨ 《新乐府所见唐与回鹘的关系》，同上。

890—900 年代在唐直属皇帝的使职内文思使管辖下做成的，是内文思使和天睦可汗在位时的甘州回鹘国交易相关的中国方面的决算文书①。李德龙继续研究这组文书，他据文书用纸"内文思使之印"及"天睦可汗"，将文书定于 894—904 年之间，名为"唐文思院所收回鹘贡品及回赐物口簿"，并分析了文书中反映的唐与回鹘朝贡贸易细节，认为交易中明显带有一种唐向回鹘"赠予"的性质②。

（五）交通运输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是研究唐代交通的巨著，该书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综结十卷，前五卷已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83 于 1985 年出版，该书"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每篇考论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凡例），采用纲目体写法，大字纲文叙述结论，小字目文考证原委；每篇考证结果皆绘成地图，附于篇末，各卷末附纲文古地名引得，既详征史料，精辨细析，又方便阅读使用，为治史者座右必备。青山定雄（日）《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也是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分交通及地志地图两篇，前篇包括唐代的陆路、宋代的陆路、唐代的驿和邮及进奏院，唐五代的关津和商税、宋代递铺的发达、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宋代漕运的发达九部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唐代交通中的重大问题，被日本学界称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精心巨著"。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也是立意新颖、考证精详的著作。该书充分论述了

---

① 《敦煌发现唐回鹘间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断简考》，《粟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88。

② 《敦煌遗书 S8444 号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

唐高宗以后、开天极盛时、安史乱后中衰时、宪宗中兴及帝国崩溃时运河的状况及作用，认为运河联系政治中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南方，因之使国家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运河畅通与否关系着唐帝国国运的盛衰。近年来，全氏在《略论大唐帝国与运河》[1]中再次阐明了运河与大唐帝国盛衰隆替的密切关系。汇集了多篇考察报告及研究论文的《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将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把唐代运河的研究引向新的深度。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一书论述了隋唐运河的渊源、开发利用及其历史作用，并驳正了以往运河漕运研究中的许多讹误之处。刘希为《隋唐交通》(台湾新文丰，1992)通论了隋唐交通干线、交通工具、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兼及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国文化圈等问题。

青山定雄(日)《唐宋汴河考》[2] 指出《通鉴》记载先入泗水，再入淮河的运河是隋以前者，通济渠则如《隋书·炀帝纪》所谓由黄河直接流入淮河，比隋以前水道更短、更直接。张崑河论述了隋代几条主要运河的开凿时间、经过地区及其发挥的作用[3]。外山军治(日)研究了唐漕运事业发达的由来，裴耀卿及刘晏改革前后的漕运，探讨其利弊及对江淮百姓的负担[4]。杨希义指出：唐代漕运路线可分为东南运河道、江淮汉沔道、嘉陵故水道、大庾灵渠道和黄河汾水道[5]。严耕望论述了唐代的馆驿制度以及国内陆、水、海运的情况，并探讨了都市兴起与交通发达的关系[6]。他还在《隋唐通

---

① 《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

② 《东方学报》(东京)2，1931。

③ 《隋运河考》，《禹贡》7～1，2，3，1936。

④ 《唐代的漕运》，《史林》22～2，1937。

⑤ 《略论唐代的漕运》，《中国史研究》1981～3。

⑥ 《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

济渠在交通上之功能》[1] 中论述了通济渠的舟船载量与舟航日速、渠道吞吐之地理幅员、官漕物资之品种数量、商贸行旅与舟航之盛，指出一般学者着眼于南粮北运，但实际政府漕运在高宗武后时代，已不限于粮食。中叶后，仰给南方物资供应更多，其负荷当以超过当时漕粮北运之十倍，此外民间中外商旅行旅极众，与漕粮外的其它物资一样不可忽视。王力平论述了唐后期平藩增设的淮颖水运[2]。清木场东(日)对转运问题有一系列深入论述，《唐代的输送法》[3] 详论了公式令中的行程法，考察了一天输送距离；《唐代的东南漕路(一)》、《(二)黄河渭水》[4] 考察了物资主要输送路扬州—洛阳—长安间水路里程；《唐代的水陆运费》[5] 整理分析唐代脚法，并举出实例探讨了唐代运费的实际情况。此外尚有《首都长安食粮调达中的陆运》[6]、《唐宋的陆运》[7] 等。荒川正晴(日)《唐代对西域运输布帛与客商的活动》[8] 根据吐鲁番文书论述唐对西域运输方式的变化，指出唐对西域布帛等军需补给，从 7 世纪的传马坊、长行坊制转化为 8 世纪客商雇佣体制。

关于馆驿制，坂本太郎研究日本律令时代驿制的同时，研究比较了唐代驿制[9]。陈源远《唐代驿制考》[10] 全面论述了唐前期馆驿制度。青山定雄《唐代的驿和邮》[11] 指出驿是广泛官用交通通信设

---

①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990

② 《唐后期淮颖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

③ 《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29～2，1988。

④ 同上 29～3，1988；30～1，1989。

⑤ 《东洋史研究》50～3，1991。

⑥ 《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

⑦ 《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书店，1993。

⑧ 《东洋学报》73～3，4，1992。

⑨ 《古代驿制的研究》，至文堂，1928。

⑩ 《史学年报》1～5，1933。

⑪ 《史学杂志》55～6，7，1944。

施，玄宗时代进行了驿制改革，唐末驿驰废，成为宋马递铺的先驱。大庭修以大谷北馆文书为基础补充了唐史籍记载较少的馆制①。孙晓林考证了西州所设北、中、蒲昌等20馆的位置及作用，也分析了馆的组织及经费、任务，并推测了西州馆驿的关系②。鲁才全③、王宏治④也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更具体深入地研究了馆驿诸制。

史籍中驿常与传并称，传的具体情形如何？它是否为与驿并行的交通制度呢？青山定雄认为驿设驿马、传马，因利用者的目的及往来官员的品级不同而在使用上有区别。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传马坊文书研究》⑤分析了唐总章二年八、九月沙州敦煌县传马坊文书所体现的指挥系统、两种传送方式、程限制度、马驴服役的注记覆剩制度及传马传驴的差别等具体问题。王冀青认为长行马就是传马⑥。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的传马坊和长行坊》⑦指出西北传马坊与驿不同，是掌交通运输的州的附属机关，长行坊不同于传马坊，是驿传制之外的制度，但与驻留镇守军制相应的长行坊制8世纪初有代替河西传马坊的趋势。他的《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⑧详论唐代传制，认为它与驿共同构成唐代的交通系统，传在承担日常公用交通、运输中作用更大。黄正建《唐代的

---

① 《吐鲁番出土北馆文书》，《西域文化研究》2，法藏馆，1959。

② 《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1991。

③ 《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④ 《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1986。

⑤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

⑥ 《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2。

⑦ 《东洋学报》70～3，4，1989。

⑧ 《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79～83。

"传"与"递"》① 指出，唐传不是独立于驿的一个实体，唐前期传指传舍、传符、传送马驴，前二者后来分别为馆、纸券替代，后者合并到驿马中，玄宗以后传实质上已不存在。该文也论及递的发展，认为递在唐后期首先出现在度支系统、普及后发展为递铺。藤枝晃②、孔祥星③、孙晓林④ 论述了长行坊制，三文的撰写次第依次反映了掌握文书资料的不断增多，以孙文最全面。

二、财政

(一)通论

1. 综合研究

唐财政史研究成果卓著。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为开山之作。该书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租庸调、户税地税、天宝建中间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盐铁、酒、茶)、官业收入与商税(铸钱、屯田、税商与借商)、特种收支(色役资课、职田公廨田及其地租、公廨本钱与其息利)、财务行政(机关、诸使、预算收支系统、审计、转运、国计簿)六章，自创体例，考释谨严，长期为治史者必读，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二十年后，崔瑞德所撰《唐代财政》(剑桥大学，1963)也是重要著作，该书分土地分配制度、直接税务(租庸调、两税法)、徭役、国家垄断及商税(榷盐、酒、茶)、货币与信贷、漕运与交通、财政(中央、地方)，较全面地论述了唐经济、财政制度，注解详细，图表丰富，学界评价颇高，尤以财政一章为最。

---

① 《中国史研究》1994～4。

② 《长行马文书》，《墨美》60，1956。

③ 《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3。

④ 《试论唐代前期长行坊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卷名为"行政与财政"(三一书房,1989),第二部为税财制,包括唐赋役令中的岭南税米、唐代庸调的布绢课征额和匹端制、唐朝租庸调时代食封制财政史的考察、武韦两后时代税役避免伪度的盛行和玄宗的肃清、唐代租庸调制下的三疾、侍丁,关于唐《户婚律》中增减年状的考察,安史乱后两税法前税收财政的钱额经理,五代的沿征、耗、监征军将等多篇论文,日野氏的经济、财政史论著,也是必须参照的。蔡次薛《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为概述性著作。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是一部从总体上把握唐代财政、揭示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著。该书分唐前期、肃代时期及后期三编,具体、动态地描述了有唐一代的预算制度及其发展变化,将唐代的多种收支、财政现象及改革等镶嵌于预算体系中,从新的角度重新构架了唐代财政史,布局独特且富于新见,尤以对唐后期中央地方税额及支出等论述,使史籍中模糊零散的唐后期财政面貌清晰起来。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分财务行政及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编,并以之分册,第一编分三章:唐前期的财务行政(支度国用、财政立法、征收赋税、经营公产公业、管理市场、控制物价、财政勾检)、唐前期财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唐前期财政机构的渊源,第二编包括赋税收入(租庸调、户税地税、资课、附加税、各种杂税、轻税)、特种收入(贡献、勾征、回残剩利、赃赎罚没入)、公产公业收入(田产、高利贷及庸赁、采造)三章,三编亦分供国(官吏待遇、祭祀朝会宾客等礼仪支出、交通运输、行政、赈恤兴利等、教育、宗教费用)、供御、供军三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前期财政史的面貌,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运用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使论述更加深入具体。金荣济(韩)《唐宋财政史》(图书出版新书苑,1995)论述了唐五代的两税、唐宋盐专卖、茶矾香药铜钱酒专卖、唐宋上供增大过程等唐宋赋税问题。

2. 财政制度、政策及其变化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指出,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有南朝化、西北化二事。唐代国家财制本为北朝系统,而北朝社会经济落后于南朝,当唐社会经济发展超过北朝旧日的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日之历程时,其财政遂取用旧日保存于南朝地区一隅的制度而实行,如折租造布等。唐和籴为足兵足食之法,其渊源在西北边隅,玄宗时牛仙客彭果因之推行于关中,此即西北化,这二事转变枢纽皆在武则天及唐玄宗二代①。这种高屋建瓴的论述概括了唐财政制度发展的渊源脉络,具有重要意义。杨联升《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②指出唐后期两税法后杂征众敛繁兴,为复杂税制,它具有与南朝税制相似的以资产定税,多取诸农业之外工商诸业等特点。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从田制、兵制、赋役制、科举制、学术风尚变化等方面发展补充了"南朝化"说,指出唐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这些变化中的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体现在财政经济上,均田制废弃,庄园制发展,按丁征发课役的租庸调最终变为按户资与按税亩征发的两税制,折纳、商税及钱重物轻,和雇纳资等出现及普遍,均上承南朝③。

黄谷仙分析了安史乱后财政政策的变化及当时的经济农村观,认为当时以节俭及紧缩财政为主④。崔瑞德认为玄宗时财政方面出现了和统一行政思想背道而驰的变化,这些破坏了从过去继承的简单的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⑤。吴枫论述了安史乱后财政危

---

① 141～157 页。
② 《清华学报》12～3,1937。
③ 486～491 页。
④ 《天宝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10,1935。
⑤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第七章《玄宗》。

机的背景下唐政府所采取的确保财源的措施；对财政主管机构的调整；建立新的财政制度等一系列问题①。吴丽娱比较了使职理财与唐前期户部理财的不同及后期财政官职的变化，指出开元中后期，社会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财政思想上守成之道让位于经营之道，后期整个国家财政对商品经济的仰赖越来越大，财政重心南移与漕运盐铁专卖互为因果，藩镇的出现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一体关系，新的财政制度及机构等应运而生②。

3.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鞠清远认为唐代财政史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除附加税外还未看到确切属于地方的税赋，地方只能与中央分剖在中央规定之下征收得的税赋③。崔瑞德分析了两税法制订前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动，认为两税法的关键在于中央为征取诸道两税的一定比例额，给予了诸道以征税方法和经费使用上的自由④。张国刚认为两税法主要的财政意义之一是在保证中央收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限制地方滥征赋税，但是两税法实行后，始于安史之乱的地方财政相对独立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⑤。陈明光通过对唐前后期制税权、赋税使用权与放免权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实施两税法所包含的重建中央与地方分割赋税新方式的目的⑥。他还论述了实施两税法之际，唐中央采取以支定收的原则，核定州、使两级地方预算的收支项目及数量界限，同时确立中央的

---

① 《中唐的财政危机及其对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② 《中唐后财政官制变革刍议》，《中国史研究》1989～4。
③ 《唐代财政史》150～152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④ 《唐后期藩镇与中央财政》，《亚洲研究》11卷2期，1965年。
⑤ 《唐代藩镇研究》，200～20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⑥ 《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

两税受益数量，从而形成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的格局①。日野开三郎也论述了中央地方的税额。分收元额、地方财制与分收的变化、州税三分等②。松井秀一（日）认为裴垍的税制改革将州税三分制改为二分制，缩小藩镇规模而削弱了其巡属支配能力，但不同意日野认为元和十四年乌重胤上奏的军政改革为上供不变，留使激减，留州著增的主张③。崔瑞德从盐铁使兼江淮节度使的独立倾向这一问题入手，分析了唐后期中央与南方的财权关系，指出此种一身二任者的巨大财政势力对中央的潜在威胁胜于河北藩镇的军事威胁④。他也探讨了事实上已从长安独立的河北山东对唐中央财政的影响及中央的对策，指出政府虽对其强行采用财政货币政策，但结果却是政府丧失了精神进行基本工业生产⑤。他还从地方财政机构与地方税收来源两个方面，论述了唐前期地方财政的具体情况⑥。陈衍德考察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情况，指出地方势力的增长导致中央所得不断被侵夺，但专卖经营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其收入在大部分时空范围内仍旧属中央⑦。渡边信一郎分别考察了唐后期中央地方财政，《唐后半期的中央财政》⑧ 分析了开元天宝至唐末以户部曹为中心的中央财政运营的

---

① 《唐明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

② 《杨炎两税法的税额问题》，《东洋学报》38～4，1956；《唐代两税的分收制》，《东洋学报》16，17，1956；《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史学杂志》65～7，1956，收入《日野论集》4。

③ 《裴垍的税制改革》，《史学杂志》76～7，1967。

④ 《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唐代社会论文集》，荷兰，1976年。

⑤ 《唐末的藩镇和中央财政》，《史学杂志》74～8，1965。

⑥ 《唐前期地方财政机构》，《亚洲研究》15卷1期，1969年。

⑦ 《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

⑧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40，1988。

变化。唐朝控制农民再分配过程和中央经费的内容，指出军事费用的增大倾向，反映了八、九世纪以降兵农分工的背景。《唐后半期的地方财政》①以州财政和京兆府财政为中心，探讨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实况，指出中央政府指挥权渗透到地方及南北朝以来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地方财政被中央所吸收。大津透《唐日律令地方财政管见》②通过复原北馆文书考察馆驿制度，探索唐律令制的地方财政构造，指出其特色为从中央派遣的流内州县官，对官署运营的会计、公廨的支配、地方出身的府史佐史以下胥吏的选用，与户等相应征发力役及征户税等，均有自行处理权，地方财政的细节律令制并未规定，大部分委任刺史县令下的地方官，律令制是以中央流内官及租庸调等中央财政为主要对象的法，而下层则属于律令法外的胥吏世界。

4. **财政重心的转移。**

周殿杰论述了安史乱起后朝廷对江淮的财政需求与江淮承担能力之间失去平衡，导致了大历财政改革，改革的成功为朝廷奠定了江淮这一可靠的财源基地③。袁光英、李晓路认为唐代财政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藩镇割据使中央失去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控制，长江流域因而在中央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其已具备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财政重心的南移遂将两税法产生与南方经济发展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④。岑仲勉指出：《元和国计簿》除言明北方 71 州不申户口，中央岁入赖江南 49 州外，未提及其余 175 州的岁入归属问题，而此笔收入当不菲，

① 《中国专制国家和社会的统合》，京都，文理阁，1990。

② 《笹山晴先生还历记念日本律令制论集》（上卷），吉川弘文馆，1993。

③ 《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④ 《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 年 3 期。

并部分供唐廷开支①。齐勇锋认为剑南、山南、岭南等道岁入元和初多留镇供军，加上李吉甫意欲强调江南财赋的重要性，故仅一般地言及此数道的户籍数目，未提及其赋税上供，以此为据来概括中晚唐财政状况是不妥当的②。

（二）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

1. 财务行政

大津透研究了一组年代为仪凤三年、四年的出土文书，认为它们是基于赋役令所作的上奏，并记有下一年度调庸等收支，相当度支的奏抄以及金部旨符，并探明了唐前期国家财政、特别是度支编造预算的手续及内容③。李锦绣在大津氏论考的基础上，继续论述了唐前期预算的内容、特色及与长行旨、量入为出原则的关系等④。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庸调布上，可以看到墨书题款，写明年月、地区、布帛的性质、纳布人名数量等，并钤有州县及府司印鉴，仁井田升最早研究了出土的庸调布与租布⑤。王炳华在更多发掘的基础上研究了唐庸调的征收实况⑥。百姓纳税后，官府给以完税凭证—纳税抄。关尾史郎（日）将吐鲁番、库车、和阗出土的领抄文书按书写年代进行了整理归纳⑦。孔祥星据史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说明里正负有收手实造籍书、调查和申报本里户口变动等情况及参

---

① 《隋唐史》下册，377～378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② 《中晚唐赋入"止于江南八道"说辨疑》，《唐史论丛》第2辑。

③ 《唐律令国家的预算》，《史学杂志》95～12，1986。

④ 《唐前期支度国用计划的编制及实施（上下）》，《北京大学学报》1991～2，1993～2。

⑤ 《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庸调布与租布》，《东方学报》（东京）11～1，1940。

⑥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1。

⑦ 《中亚出土唐代领抄文书一览》，《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报》71。

与均田还授、督促本里农业生产的责任，里正还有一重要任务是征敛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催驱徭役①。

仓库管理为财务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5)一书对仓储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该书依次探讨了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的渊源、沿革、职能、作用，并对各种仓储作了综合论述，指出赋税主要形态的实物化而非货币化，使唐朝为受纳、储运、分配谷物和织物而设置遍布各地的仓廪，因而成为财政收支运转的重要一环。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1)则是一部系统研究国库制度的专著。该书分唐代国库的组织、收支、管理、正库与专库储备等制度、经济法制、唐代国库与财政六章，从国家预算、统计、会计、审计、收支和钱帛财物调拨管理等方面，阐述了唐国库的机构、职能、沿革等，指出唐国库各部门相互维系环节健全，一些辅助专业库出现，分工明确，且预算编制、出入复核、会计帐簿等业务管理呈制度化、科学化、系统化气象，唐国库制成熟、完善。他尚有《唐代的左藏、右藏与内藏》② 一文，认为左右藏库制天宝前时有松驰，中唐与内藏相混杂，晚唐时被内藏代替，左右藏与内藏的递变，标志着唐代财赋储存的兴衰和行政结构的演化。含嘉仓遗址的发掘使唐仓廪制度研究呈现出新局面，邹逸麟论述了含嘉仓发掘的意义，并概述了隋唐时代的漕运及隋代的六大官仓③。宫园和禧(日)以含嘉仓为中心，分析了唐仓廪的管理制度及运营情况④。砺波护考察了含嘉仓与太仓砖铭的内容，认为隋唐时代的太仓应置于吕大防《唐长安

---

① 《唐代里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
② 《人文杂志》1990～5。
③ 《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1～2。
④ 《唐代前期仓的管理和运营》，《九州共立大学纪要》8～2，9～1，1974。

图》所记的太极宫西、掖庭宫北①。清木场东对唐仓廪也有一系列论考,《唐水部式中心的北太仓》②怀疑《通典》卷12所记六仓之一的北仓为东渭桥仓之说,《水部式》中有北太仓、子苑等词,可能北仓是太仓城内北部的诸仓院,即水部式中的北太仓;《唐含嘉仓砖的分类》③从书式及出土层将砖分为新旧二类;《唐含嘉仓的构造》④分析了仓的构造、仓门街渠、窖区等;《唐仓砖的机能》④指出谷物运出窖的确认、欠损调查及赔偿责任等;《从砖铭探讨唐太仓的构造》⑤通过对太仓砖铭的分析,提出太仓平面模型图。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⑥认为隋唐义仓远师《周官》,近受北齐富人仓影响,义仓的作用包括赈给米粟、贷给粮种及兼常平的均平谷价之职三种。今掘诚二认为唐元和元年将常平义仓合并设常平仓,主要发挥义仓的作用⑦。爱宕元论述了唐代的东渭桥仓⑧。

完善的审计制度是唐财务行政的一大特色。鞠清远指出比部与御史台的御史掌全国赋税之收入与支出的审计,被称为"勾覆"⑨。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后半部论述财务勾检制,指出比部是财务勾检系统的中央领导机构,它勾检中央及地方的财务行政,制定勾检原则,颁布全国,并分析了敦煌吐鲁番帐簿文书中的朱书批语,认为它们是勾帐式的应用实行。日野开三郎指出课户所纳庸调布绢有"折估渍损"的现象,政府对其

---

① 《东方学报》52,1980。
② 《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30~3,1989。
③ 《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29~3,1988。
④ 同上刊,30~3,1989。
⑤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90。
⑥ 《食货》2~6,1935。
⑦ 《宋代常平仓的研究》,《史学杂志》56~10,1946。
⑧ 《唐代的东渭桥和东渭仓》,《东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2,1986。
⑨ 《唐代财政史》152页。

质量与数量的短缺要行重征[①]。薄小莹、马小红根据伯二九七九号郿县尉判集，对勾征领导机构，勾征时限、范围和对象等进行了具体分析[②]。李锦绣将财务勾检分为勾检效率及收支两类，认为收支勾检可分自勾、他勾，并据出土文书分析了唐勾帐、勾历、勾征帐等[③]。

2. **财政机构**

唐前期的财政机构因《唐六典》及两《唐志》等记叙较详，史界论述较少，崔瑞德分析了初唐及开天时期的中央地方财政机构及使职的最初出现等[④]。何汝泉《唐代度支职能由简变繁论略》[⑤]认为唐前期度支事简是与户部职事相对而言，开元年间国家用费迅猛增长，度支供军供御职重，职事开始变繁，安史乱后度支权户部之职，才真正变繁，这是唐财务行政制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变化的反映。杨淑洪概述了唐前期财政机构及职能[⑥]。李锦绣从财政机构之间关系的角度，全面比较分析了中央及地方各机构的职能、运作等[⑦]。

唐后期财政机构及诸使的演变等，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陈仲安较早地研究了财政使职的形式和演变[⑧]。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⑨]是一篇重要文字，它论述

---

① 《唐代租庸调制下的勾征》，《东洋学报》45～2，1962。
② 《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尉判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③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225～60 页。
④ 《唐代财政》97～109 页。
⑤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⑥ 《论唐代前期财政组织及其运作(上下)》，《大陆杂志》86～3，4，1993。
⑦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290～380 页。
⑧ 《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1。
⑨ 《中华文史论丛》1986～1。

了财政使职制度在开天时期产生、安史乱后代替户部尚书、确立为户部度支盐转三使、实行财赋分掌、元和初逐渐形成统一财政三司体系的过程，指出使职与领导这一机构的宰相职权发生的尖锐冲突和矛盾贯穿其中，元和时发展为在宰相领导下步调协调、分工合理、财赋统一而又自成体系的新的财政系统。陈丽菲①、杨倩描②、董恩林③ 也论及唐五代财政体制。

鞠清远概论了开元后转运、租庸、盐铁、度支、常平、铸钱、青苗、两税等诸使职④。崔瑞德《安史乱后盐的掌管者》⑤论述了第五琦后盐专卖机构的发展变化，及度支使与盐铁使分掌盐利制的形成。砺波护《三司使的成立》⑥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章，它研究了唐中期使职的成立、玄宗以前财政机构、度支使的成立、盐专卖与盐铁使、度支转运分掌财利、五代宋三司使等，将安史乱后财政改革进程中度支盐铁转运使的作用职权特征等明确展现出来，并指出三司使五代开始出现，到宋形成定型的财政统辖官厅。日野开三郎根据砺波护的论著，指出乾元前没有作为国法的榷盐法，《通鉴》记载有误⑦。他的《两税法成立期的财务行政制度》⑧ 详论了大历末以前的租庸使、度支使、肃代二朝的漕运及转运使，展示了开天以后两税法前财政机构变化的历程及细节、规律等，与砺波护论著可互为补充。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北，1956，中华书局影印，1986)卷 11 至 14 考证了唐代历任户尚、户侍及度支、盐运使，精细

---

① 《唐代财政三司历史作用初探》，《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② 《唐宋三司体制述论》，《河北师院学报》1990～4。

③ 《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湖北大学学报》1986～2。

④ 《唐代财政史》142～7 页。

⑤ 《亚洲研究》4～1，1954。

⑥ 《史林》44～4，1961，收入《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

⑦ 《再论第五琦就任盐铁使和榷盐的开始》，《东洋史学》26，1963，《日野论集》3，三一书房，1981。

⑧ 《日野论集》3，18～177 页。

的论考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齐勇锋认为史籍文集中多将地方长官支度使误作中央财政长官度支使①。铃木正弘论述了德宗至武宗朝盐运使的政治、人际关系和事绩等②。何汝泉《唐代度支盐运二使关系试析》③分三阶段考察了二使的关系，指出唐后期财务行政经历了户部长官一元化体制消失，新的一元化体制建立的过程。吴丽娱《唐后期的户部司与户部钱》④是一篇填补空白之作，该文论述了史籍记载零散的唐后期户部司机构的形成、户部钱的收支等，指出户部钱为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并随时调动的别贮，后期对其仰赖有增大趋势。杜梭认为户部使司既不是原户部司也非由户部司演变而来，二者同时存在、区别显著⑤。陈明光认为杜文证据不够⑥。何汝泉分析了《唐会要》卷 59 所载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支持陈文不能据此证明同时存在两个户部司和度支司的观点⑦。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⑧ 论述了唐代转运使的出现、职掌及变化等，认为唐末转运使不能控制江淮以来的漕运是发运使设置的主要原因。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分上下二编综合论述转运使诸制及历任转运使，认为裴耀卿的节级取便运输法为唐中后期漕运的基本程式，但安史乱前，转运使具有临时性，刘晏时才成为固定职官，唐转运使一般治所在京师，地方官充使者在润州 15 年、扬州 13 年，因此不

① 《唐度支使与支度使》，《历史研究》1983～5。
② 《唐代盐铁转运使中使职的继承》，《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5，1992。
③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
④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
⑤ 《唐代户部使司与原户部司异同辨》，《历史研究》1990～2。
⑥ 《唐代后期并存着两个户部司吗?》，《历史研究》1992～6。
⑦ 《从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看唐后期户部的使职差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2。
⑧ 《史学杂志》44～9，1933，收入《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

能说治所在扬州。徐庆全对何氏转运使设置的时间提出商榷意见[①]。室永芳三(日)研究了五代的租庸使、节度使府粮料使及北面转运使等[②],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五代财政使职的头绪。

度支盐运使下设巡院于盐产地或交通要地,高桥继男对巡院制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深入细致研究,《关于巡院的设立》[③] 指出刘晏任财政使职期间,以广德二年修复汴河为契机,在大历元年前后,将东南部地区的江淮以北诸道租庸盐铁转运使改组为巡院组织,其长官多称留后,继承了租庸盐转使的业务,成为中央直属的设于地方的管辖道内与财政相关诸业务的中心。《唐代后期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系统的巡院设置》[④] 考察了度支盐转使分掌制和巡院制,分析了史料中所见的38个巡院并说明其设置点和原因。《唐代的地方盐政机构》[⑤] 研究了史籍中的盐监、监院、榷盐院、盐院等与巡院的关系。《唐代后半期巡院的地方行政监察业务》[⑥]指出,广置诸道的巡院,具有监察包括税财政在内的全部地方行政职能,藩镇行政机构更是巡院监察的重点,唐政府因之维持集权支配,在超越藩道的更广阔领域实行财政政策。《唐后半期的巡院和漕运》[⑦] 指出巡院自派船团运两税虽不过是一时,但巡院负责运行在国家财政中占较大比重的江淮盐利,扬子、河阴院掌税物的收贮发遣,其它漕路上的巡院也掌漕路的监视、管理、漕粮贮藏仓的管辖,对漕吏的严格监督等。《唐后半期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系统巡院名增补

① 《关于唐代转运使设置的年代》,《社会科学辑刊》1992～4。
② 《五代租庸使的成立及其性质》,《东洋学报》53～3,4,1971;《三司使考补说》,《史渊》82,1960;《五代节度使府的粮料使》,《东方学》21,1961;《五代的北面转运使》,《史渊》89,1962。
③ 《集刊东洋学》28,1972。
④ 《集刊东洋学》30,1972。
⑤ 《历史》49,1976。
⑥ 《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1978。
⑦ 《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6～8,1982。

考》[1] 主要据出土石刻墓志，补充了16个巡院。《唐代后期的解府君和殷府君墓志》[2]分析了分别出土的殷彪和解少卿墓志，指出二志反映了度支盐转等财政使下已形成类似节帅元从的随从官吏。《唐后半期官界中知院官的位置》[3]认为知院官担任者主要为贞元月料中的中等(10至16级)，其地位在文官幕僚之下，在县令上、刺史下，低于宋转运使。小西高弘(日)[4]、贾宪保[5]、齐涛[6]也论述了巡院制度。

鞠清远《刘晏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将盐政组织分为留后、监与院、场三级。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7]论述了盐、酒、茶专卖机构的使院场铺等隶属关系及其与地方的关系等。王怡辰(台)《唐代后期盐务组织及其崩坏》[8]研究了东西部财赋区盐务官僚组织、官署运作及池、海、井盐区盐务组织在僖、昭二朝的瓦解过程。

卢建荣从理财官员的历任分析唐财政官员的选拔标准及理财意识等，《唐代后期户侍人物的任官分析》指出唐170位人物任户侍，专业率只有三成，唐代是个倾向通才型官僚体系，财经官在唐人思想观念中无专业认识。《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9] 认为危机时代探求财经专才；出身寒微又无正途功名的人走财经官路线以求上达，是唐代财政史上的突出现象。《唐代前期财政决断权的转移

---

[1] 《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9～，1986。
[2]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
[3] 《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1995。
[4] 《唐代中期巡院和盐政的考察》，《福纲大学经济学论丛》16～2，3，4，1972。
[5] 《唐代巡院试探》，《人文杂志》1984～3。
[6] 《巡院与唐宋政体的转化》，《文史哲》1991～5。
[7]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
[8] 《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学生书局，1990。
[9]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4～2，1983；54～4，1983。

及户尚选拔问题》① 指出唐前期户尚属元老重臣官职迁转途中的一个接站，财政决策权在宰相，但开元末年户部权力逐渐增长，快速向获得全面财经决断权迈进。

（三）财政收入

1. 税收

（1）通论

吉田虎雄（日）《唐代租税的研究》（汲古书院，1973）为其撰写中国税制史的第三卷，分租庸调（附税草）、地税、户税、色役及资课、青苗钱及夏秋税、两税、矿税、关税、茶税、专卖（盐酒）、杂税（率贷及借商、间架税、除陌税、埭程）十一节，全面论述了唐租税的内容、特点及演变等，该书在1942、1943年脱稿，未能反映出版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搜集史料广泛，论证扎实，不乏参考作用。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分赋税（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买常平仓义仓）、徭役和兵役（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复除和民困三编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时期诸种赋役形态，且每叙一制，则上溯其秦汉之源，下探其在宋代之发展流变，材料充实，论述全面。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论述了三代以下至民国时期的赋役制度，隋唐五代部分分布于第一编第五章（杨际平撰）、第二编第一章（郑学檬撰）。隋唐前期内容包括唐朝的户籍与户等制度、租调力役制向租庸调制的转化、户税与地税、杂徭、色役、资课、兵役负担、工商税、土贡与进奉、复除制度与蠲免制度，唐后期五代包括两税法的成立与实施、工商杂税和和市、和籴、进奉、役法和徭役（力役、杂徭、色役、兵役）几部分，吸取了近人研究成果并时有创

①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6～2，1985。

见，足资参考。全汉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①考察了唐从天宝至宣宗年间的国家财政收入，指出天宝中岁入绝大多数是谷粟布帛等实物，自中叶后，岁入额虽较前减少，但钱币部分却大为增多，这反映了货币经济抬头的信息。

（2）租庸调

隋代租额如何？胡戟从度量衡计算入手，指出隋租额不比北周重，而是相反，将隋富裕归结为杨坚重租政策的说法不确②。罗忠嗣认为隋田租剥削量比北魏、北齐、北周和唐都重③。竺培升认为隋文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积极性提高，反而增加了财政收入④。王士立仍坚持隋重租政策说，认为其财赋的充裕是向农民征收高额租粟和调绢的结果⑤。

关于租庸调所代表的劳动量的量化分析，宫崎市定（日）对唐赋役制提出新解，认为租庸调可换算成正役50日，夫徭100日，唐赋役制的根本精神在于徭役劳动⑥。铃木俊（日）则阐明了武德七年令和开元七年令中关于调及庸载为“布加五分之一”，而开元二十五年令中却载为“布则二丈五尺”、“布则三尺七寸五分”这前后两种规定的数量关系，并把唐代的租、庸、调折合成日数、绢（布）、粟来考察这三者的相互关系⑦。古贺登指出过去的计算即庸绢45尺＝调绢20尺（加绵3两）的矛盾，并提出了新的计算即正役15天＝绢15尺＝粟3.825石，这个数目约等于租调的一倍，若以庸

①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20上，1948。
② 《北周与隋代的租额》，《兰州大学学报》1984～3。
③ 《重评隋朝短祚而亡的原因》，《青海师大学报》1984～4。
④ 《略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
⑤ 《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5～9。
⑥ 《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东洋史研究》14～4，1956。
⑦ 《均田租庸调制的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0年。

交纳正役负担，则是留役的一倍①。他还指出，租庸调杂徭均能换算成劳役，若将白丁的负担换算为劳动日数，则租 15 日、调 15 日、役 40 日、杂徭 50 日，共计 120 日②。李伯重认为唐律令中的“日绢三尺”的实质是一个丁男一日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的价值，而非全部价值。他计算出农民、工匠的五口之家一年中衣、粮、盐三项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约等于 23 匹绢，平均每日 2.6 尺绢，若加上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的平均数，当略大于此数，总计约在 3 尺上下。因此，3 尺绢的价值确乎近于一日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价值③。李晓路考察了《通典》有关天宝中租庸调总收入的记载，对照当时物价，认为庸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超过 55%，亦即农民在免除部分徭役的同时，实物负担却大大加重了④。

关于租庸调法与均田制的关系，邓广铭认为二者之间并无任何连带关系⑤。韩国磐⑥、岑仲勉⑦认为租调庸是建基于均田制之上的。张泽咸则认为租庸调和均田令具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⑧。邢铁认为应将租调与庸区分开来，租调为一类，庸是另一类，租调主要出自永业田、庸与均田制各个部分没有直接关系⑨。

关于租庸调的性质，韩国磐认为唐代的租庸调是一种以力役

---

① 《唐代赋役制度再探讨备忘录》，《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刀水书房，1984 年。

② 《唐代赋役制度的再探讨》，《诸问题》。

③ 《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唐史论丛》第 2 辑。

④ 《唐代财政史两题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 1 册。

⑤ 《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 年 4 期。

⑥ 《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1955 年 5 期。

⑦ 《租庸调与均田制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 年 5 期。

⑧ 《唐五代赋役史草》5～9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⑨ 《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辨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2。

地租为主，逐渐加强了实物地租比重的封建剥削形态①。对此张泽咸持不同看法，他指出在唐代法定免役的官员很少，地主阶级中的多数人均须交纳租调，若视租庸调为地租，无异于说封建国家是在剥削地主阶级，这在理论上讲不通，因此租庸调只能是国家的正式赋税。再者唐代每年大量服徭役、兵役的人长期劳役在外，亦不见其家普免租税的实例，还有唐代继续征收由来已久的实物税的大量事实，都说明把租庸调看作力役地租是不妥的②。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租庸调是一种客体担负各种物品的税。堀敏一《均田制研究》认为它是均等人头税。崔瑞德《唐代财政》则称它为复杂人头税。

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的研究》（汲古书院，1974～1977年）是一本研究租调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六篇：色额、课输（包括资课、税、征）、科配、户口、收支、崩溃。分为三卷，第一卷主要是研究有关租庸调的色额，即纳税物的种类及其税额；第二卷论述了租庸调的征纳问题（以课输为主体）；第三卷的内容包括力役、差科、免役、采邑等。铃木俊《均田租庸调制的研究》（刀水书房，1980）也论述了从户调向租庸调的发展，隋唐租庸调制内容、均田和租庸调制的关系、均田租调制的矛盾及崩坏过程等。

以庸代役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大进步。唐代庸制始于何时？冯尔康认为李渊受隋末农民战争影响，于武德二年制定全面的以庸代役政策，完成了庸的制度化③。李春润也认为唐庸制始确立于武德二年④。邢铁认为《册府元龟》等书记武德二年赋“绢二匹”不确，

---

① 《隋唐五代史纲》314页；《隋唐五代史论集》196页。

② 《唐五代赋役史草》59～65页。

③ 《租庸调法的“庸”之制度化在何时？》，《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④ 《武德二年租调令是否包括庸？》，《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

"匹"为"丈"之误,武德二年颁布的为租调法,不包括庸①。李锦绣认为唐庸的普遍化需要一个过程②。

租庸调与户等的关系,邓广铭认为租庸调按丁征收,不问户等高下③。与之相反,韩国磐④、岑仲勉⑤ 均认为可按户等高下有所增减。堀敏一在《均田制度研究》中指出户等的作用一般是在定额均等课税的原则下调节贫富差别,而不是破坏定额均等这一原则。唐耕耦不同意韩、岑意见,认为每丁纳租庸调额一律,并不因户等高低而有增减,从这意义讲,它与户等无关;但租庸调实物送达地点因户等高低而不同⑥。张泽咸认为租调按资产高下区分没有具体事实作有力依据,但又不否认江南折租造布、政府按户等减免田租及岭南税米三种情况与户等有关⑦。

(3)户税地税

鞠清远《唐代的户税》⑧论述了户税的名称(税户、税钱等)、税率、用途和意义,指出户税不是租庸调破坏以后才发生的,大概与唐初定户等第同时存在,户税最早记载为永徽元年。丰崎卓(日)认为户税自唐初就有⑨。铃木俊⑩、曾我部静雄⑪ 指出唐设置户税与废公廨本钱有密切关系,户税是永徽年间代替公廨本钱为官吏俸

---

① 《唐代庸制刍论》,《思想战线》1986~3。

②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416~424 页。

③ 《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4。

④ 《隋唐均田制度》7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⑤ 《租庸调与均田制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5。

⑥ 《论唐代前期的户等与租庸调的关系》,《魏晋隋唐史论集》1。

⑦ 《唐五代赋役史草》12~3 页。

⑧ 《食货》1~8,1935。

⑨ 《论唐代的税制》,《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4,1954。

⑩ 《论唐代的户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0;《唐代的户税与均田制》,《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1,1955。

⑪ 《唐代的户税地头钱和青苗钱的本质》,《文化》19~1,1955。

禄而设立的。松永雅生认为完整形式的户税，始于仪凤二年[1]。周藤吉之《唐中期户税的研究》[2] 以“周氏一族文书”为中心考察户税，指出永徽至乾封元年设立的户税，不但征收税钱，亦收柴，用作官吏俸料和馆驿之用，开元中期以后，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又征别税，户税由县典、里正、堰头等官吏征收。王珠文论述了大小税别税及折纳等，指出户税早在天宝元年已实行了两税制，并已有“两税”这一专用语，两税法夏秋两征，应源于唐前期户税两征制度[3]。他还探讨了征“大税”的年份及开元、天宝、至德、大历年间户税税额、税率的变化[4]。日野开三郎指出：唐前期岭南户税米制并非国税，而是用于州县经费的地方税，并推测全国都有作为地方税的户税[5]。古贺登认为《通典》所载天宝某载户税数字的相关记事难以理解，推测平均户税 250 文误，八、九等户的税额为实征者[6]。卢开万认为唐户税继承了隋代以户税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制度，户税在永徽元年后不久设置，他还考证了大小税等[7]。李锦绣认为应将大小税与别税区分开来，前者在武德六、七年三等定户时已出现；后者开元年间广泛实施，并影响了户税分两次的征收方法[8]。

滨口重国(日)的两篇大文[9]《唐代的地税》、《唐玄宗朝的江淮

---

① 《均田制下唐代户等意义》，《东洋史学》12，1955。

② 《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

③ 《关于唐代户税的几点意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1。

④ 《关于唐中期户税的税额税率和计征》，同刊 1985～1。

⑤ 《论唐代赋役令中的岭南税米》，《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寿纪念论集律令制的诸问题》，1984；辛德勇译，《唐史论丛》3，1987。

⑥ 《〈通典〉所载天宝某载户税收入的再探讨》，《东方学会创立四十周年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1987。

⑦ 《唐代户税若干具体问题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⑧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 469～83 页。

⑨ 《东洋学报》20～1，1932；《史学杂志》45～1，2，1934，均收入《秦汉隋唐史研究》下卷，东京大学出版，1966。

上供米和地税的关系》是地税研究的基础之作，前者辨明地税由义仓米发展而来；后者通过对《通典》天宝中国库收支记载的分析，考证出应中央边境的需要，江南租折布，而地税充当了上供米。古贺登《唐地税的展开》①据吐鲁番文书指出狭乡的青苗簿不是为了征地税，而充水旱虫灾减免租税时使用。杨际平也考察了西州青苗簿，认为它是狭乡征地税的依据，租佃田地的地税由佃人承担，并推测贞观年间义仓税已分夏秋二次征收②。此外，朱睿根③、赵文润④、游翔⑤ 也论述了从义仓到地税的发展演变。

（4）资课

陶希圣、鞠清远最早论述了色役与资课，指出资课为代役钱，交纳者上及贵族子孙下及官户杂户，范围较广。安史乱后，资课一部分归于消灭⑥。松永雅生《两税法前的唐代资课》⑦ 指出资与课在开元前为两个不同税目，资是不负担正役杂徭而需从事特殊力役者不役而纳的税，纳资者身份复杂；课为丁中男因需从事还役杂徭之外的色役劳动提供的代价，纳入方式具有与个人契约相似的任意性。唐耕耦论述了资课的性质、出现的原因及意义等⑧。李春润对资课含义提出新解，认为开元前纳资是服役前非课口而有官资的人代纳色役；纳课是服役前原属课口而无官资的人纳钱代役，资课因交纳人身份不同而有区别。他还研究了唐后期资课不同于

---

① 《东方学创立 35 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1972。
②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新疆社会科学》1989～1。
③ 《隋唐时期的义仓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2。
④ 《唐代义仓的赋税化》，《陕西师大学报》1987～4。
⑤ 《试论唐代地税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国农史》1993～1。
⑥ 《唐代经济史》168 页。
⑦ 《东方学》14，1957。
⑧ 《唐代的资课》，《中国史研究》1980～3。

前期的特色[1]。李锦绣则指出，纳资是区别于庸的先进制度，纳课是对南北朝给官人干力制的继承和发展，资与课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不同用途[2]。黄惠贤《唐代前期仗身制的考察》[3]分析了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仗身纳课制。唐刚卯《唐代长安的纳课户》[4]指出纳课户是以长安商人等坊市百姓为主要成份的、以纳资为途径，隶属于禁军及其它中央政权机构，逃避地方政权管辖的人户，他们唐中叶以后在长安城内形成一股特殊势力，德宗奉天之难与之有直接关系。

(5)两税法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卷 3、4(三一书房，1981、1982)分别为"唐代两税法的研究前篇"、"本篇"，前篇包括大历以前诸使，两税法成立及两税法前的专卖、商税、榷盐法三部分；本篇集中论述了两税法的诸原则、运营和效果，指出两税法具有单税、征收两次、量出制入、与资产对应等原则，杨炎两税法中又有见居原则及钱数、钱纳原则，两税采用分收制，同时也分析了分收用途、三分原则及变化、两税和物价、中间的虚实估问题等，是对两税法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船越泰次《两税法研究史(一)(二)》[5]对八十年代中国两税法研究现状，包括两税法的成立、大历税制改革、征收内容、课税体系、两税和役的关系、纳钱问题、唐宋间的推移、户等制等进行了综合整理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是研究这一领域的必读之作。

关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以杨炎倡言的"量

---

① 《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3；《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2。

②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 542 页。

③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讨二编》。

④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

⑤ 《山形大学史学论集》3，9，1983，1989。

出以制入"为原则的。陈明光在分析了建中元年唐朝确立各州两税三分法的分额，以及各州两税定额基本稳定的特征之后，得出否定的结论，指出量出制入之不能成为两税法的制税原则，一是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二是有悖于限制方镇财权的现实目的；三是有损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四是没有必要将具有明显消极政治影响的这一原则明文规定下来①。吴丽娱对此提出商榷意见，指出杨炎两税法虽然没有做到先根据国家的支出作出支出，再制相应征收额，但毕竟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前提，考虑基点是出，以入服从于出，可以说是量出为入的，并分析了产生这一原则的政治、财政及经济原因②。

关于两税的内容，由于唐代文献未留下明确记载，遂成为争论的热点。解放前至解放初，对此的见解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鞠清远为代表，他认为两税的内容是户税和地税，而户税是其主体③。一派以岑仲勉为代表，他认为两税的内容依然是租庸调的正供，只因敛以夏秋，故名两税，与户税地税并无关系④。

随着讨论的深入，各种观点不断发展。倾向于鞠氏的束世澂认为户税即是两税(一年交两次税)，两税不包括田租，田地是一个独立的征税系统⑤。同样倾向于鞠氏的金宝祥指出，两税法中所规定的两税，是指"按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的两税，亦即户税。至于田租，因为夏秋两征，虽亦可泛称两税，却不是规定中的两税，文献中对此往往指明宅和土地的关系，或以"斛斗"、"粟

---

① 《"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历史研究》1986～1。

② 《也谈两税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

③ 《唐代经济史》152、15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唐代财政史》37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④ 《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2卷5、6期，1951年。

⑤ 《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2期。

米"见称[①]。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两税既包括户税也包括地税。如王仲荦指出尽管户税在两税法出现之时还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是以排斥地税使之不包括在两税之内；尽管当时之人有时用两税来专指户税钱，但两税法实则包括户税、地税两种税目[②]。黄永年支持了王的说法，并补充了其论据，指出唐后期黜陟使会同观察使、刺史定两税的内容，乃是"当州府应税都数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此处的"斛斗"即是地税，足证两税兼包户税与地税[③]。张泽咸进一步指出：田亩税不仅包括在两税之中，而且在两税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论述了新田亩税始征于肃宗时，夏秋税之名始于代宗时的田亩税，户税敛以夏秋晚于田亩税等问题[④]。李晓路估算了占课户绝大部分的八、九等户所纳地税、户税的比例，指出其每年所纳地税约合钱1880文，大大超过其所纳500～700文的户税。再从大历时八、九等户户税、地税率的提高来看，前者提高55%和125%，而后者提高约300%，地税收入远非户税可企及。因此两税不仅不可能将地税排斥在外，而且还是以地税为主[⑤]。有人则认为：唐代两税不仅仅就是户税，也不是户税和地税的简单承袭，更不是租庸调的转化，而是由户税、地税、租庸调及各种杂税综合发展演变而来[⑥]。郑学檬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了两税法的成立[⑦]。

国外学者也就两税内容进行了讨论。铃木俊认为两税由以青

---

① 《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

② 《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

③ 《唐代两税法杂考》，《历史研究》，1981年1期。

④ 《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⑤ 《唐财政史两题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册。

⑥ 《唐代两税法征收内容辨析》，《河南师大学报》1984～1。

⑦ 《唐代德西朝党争和两税法》，《历史研究》1992～4。

苗地头钱为附加税的户税发展而来，夏秋税是京兆府实行的税，与两税法无关①。曾我部静雄认为两税和户税不是一回事，户税作为官人俸禄料钱在两税法后仍持续②。古贺登认为夏秋两税起源于地税③。日野开三郎认为两税法下的正税按课税的主要资产来划分，有三个系列：乡村的田税；郭内的屋税与地税；商税。他也指出夏秋两税曾在全国实行，是两税法的早期形态④。船越泰次认为唐代的两税课税是由田亩税和课户的两税钱赋课组成的⑤。崔瑞德指出：两税制不仅按纳税人的授田课税，而且还按其他产业课税⑥。古贺登《建中初年的年支两税和两税斛斗、两税钱》⑦继续探讨两税法的内容，认为两税不是两税斛斗与两税钱二体构成的税，而是与根据家产及家内劳动力定户等相对应的纳钱的单税，年支两税（两税课额）中军粮等必不可缺的谷物折纳构成两税斛斗，从年支两税中除去两税斛斗则剩下两税钱。小西高弘论述了两税法成立的过程，他否定了两税法诸原则中基本资产内容为谷田、桑

---

① 《唐户税和青苗钱的关系》，《池内论丛》1940；《唐的夏税秋税》，《加藤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

② 《唐的户税和地头钱、青苗钱的本质》，《文化》19～1，1955；《论两税法与户税地税的关系》，《集刊东洋学》2，1959。

③ 《夏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19～3，1960。

④ 《唐代两税法下的对象资产与赋税系列》，《东洋学报》41～4，1959，《日野论集》4；《从户税一词看大历的夏秋税法和两税的关系》，《东方学》25，1963；《从地税一词看大历的夏秋税和两税的关系》，同上27，1964；《两税法成立的由来和大历的夏秋税》，《九洲大学文学部创立40周年纪念论文集》，1966，均收入《日野论集》3。

⑤ 《唐宋两税法的课税体系—以其变迁为中心》，《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1984。

⑥ 《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

⑦ 《粟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88。

田、纳钱原则和量出制入原则①。船越泰次译注了元稹《同州奏均田状》，并论述了元稹的田税改革和两税法课税的实情②。

关于五代的两税。郑学檬分析了五代时期两税内容的变化，指出后唐时期的变化有：规定两税以本色输纳，禁止折纳；调整交纳期限，按各地区节候早晚制订不同的输纳期限；一度废除省耗；规定有力户出剩田苗补贫下户欠租额。后周时期的变化有：推行均税法；统一夏秋税起征时间；革除会钞制度的弊病。他还探讨了南方诸国计亩钱的问题③。

（6）其他税收

唐耕耦考察了皇帝巡行时、军事需要时及其他临时别差科，认为临时科敛与以法赋敛是整个赋役制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④。张泽咸论述了唐代杂税，包括间架税、屋税、除陌钱、丁口税—丁身钱米、沿征（杂变）、其他杂税等⑤。郑学檬研究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诸种杂税⑥。李锦绣考证了唐前期的主要附加税——税草、脚钱、仓窖、裹束、加耗等的内容、征收标准及性质，最后统计天宝中附加税收入占租庸调收入的40%。她还研究了唐前期对内附外族部落所采取的不同于华夏税收的"轻税"——诸国蕃胡内附者税银羊、岭南诸州夷獠之户半输税米制度，并指出《唐六典》关于夷獠半输记载中的错简⑦。

---

① 《唐代两税成立的诸问题》，《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32～3，4，1988；《唐代两税法的考察》，同上33～3，4，1989。
② 《元稹"同州奏均田状"浅释》，《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5，1992。
③ 《五代两税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4。
④ 《唐前期临时别差科问题的提出》，《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3。
⑤ 《唐五代赋役史草》222～33页。
⑥ 《五代十国的杂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⑦ 《唐前期的附加税》，《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唐前期"轻税"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

关于安史乱后实行的青苗钱，鞠清远①、金井之忠②认为是地税的附加税。铃木俊③、曾我部静雄④指出青苗钱为户税的附加税，曾我还进一步指出户税、青苗钱、地头钱均为杂徭的变种。日野开三郎倾向于青苗钱、地头钱与户税、地税均没有直接关系⑤。游翔指出两税法中的地税包括了从前的青苗、地头钱⑥。对青苗、地头钱性质的争论，是两税内容众说纷纭的反映和继续。

2. **商税与专卖**

加藤繁将商税分为通过税、入市税、市籍租三类，指出从秦汉至唐中叶，对有市籍人所课租税，是商人对公家负担最主要部分。唐中叶后，产生了在诸道津要地方对于通过税物课租的制度，并对它们的买卖也加以课税⑦。日野开三郎从商税的起源与制度、唐朝的抑藩振朝政策与商税、唐末大混乱与商税、商税的称呼四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商税制度，指出商税发展期在安史乱后，征收过程中呈复杂状态，交织着中央与藩镇的抗争⑧。张邻、周殿杰认为商税分狭（商品通过税和交易税，即关市）、广（山林梁泽税）两类，山林梁泽在建中以前就受唐政府日益重视，商税制度在唐代尚处萌芽阶段⑨。李智、李茜指出，单纯商业税与东南盐税同时崛起、市籍租衰

① 《唐代财政史》32 页。

② 《唐代青苗地头钱》;《安史之乱后税制的变化》,《文化》9～7,11～2,1942,1944。

③ 《论唐代的户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论丛》,1940;《青苗钱和夏税秋税》,《古代学》6～4,1958。

④ 《唐的户税和地头钱、青苗钱的本质》,《文化》19～1,1955。

⑤ 《两税以前青苗钱和地头钱试探》,《东洋史学》20,21,1958,1959。

⑥ 《试论唐代地税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国农史》1993～1。

⑦ 《宋代商税考》;《中国经济史考证》上。

⑧ 《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

⑨ 《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1。

微、征税多门、多资军用等为唐代征商制度的特点①。日野开三郎论述了唐代埭程②。

郑学檬考察了五代的商人贸易过境税、营业税及临时加征③。金井之忠(日)研究了唐代盐酒、茶专卖。④妹尾达彦(日)订正了唐代盐法的内容,认为对盐商给予了免除通过税和征用船的特权,而这些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州县的独立机关实现的⑤。他分析了以统一价格、纳钱以及高价为原则的唐代江淮海盐的专卖能够实行的原因;运河开凿整顿使江淮经济发展,从而使同质盐的价格均等成为可能;专卖机构发挥了连结盐户和盐商的国营机关的作用,具备形成盐的市场价格的能力⑥。他认为唐代河东盐税机关设于产盐地,在确保盐产量的同时控制了与大消费点直接连结的骨干流通渠道中的主要流通量,划定行盐区,而将消费市场上的盐的流通委托给盐商,使政府无须直接介入地方的市场组织就能确保专卖收益⑦。陈衍德以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唐代盐、酒、茶等项专卖收入,指出了它们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⑧。他与杨权合著的《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分盐业生产、前期盐政、后期盐政、盐业经营管理、盐政与社会矛盾五章,系统论述了唐产盐区、生产

---

① 《浅谈唐代征商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经济问题》1987～3。

② 《唐代埭程考》,《史渊》100,1968,《日野论集》12。

③ 《五代十国的杂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4期。

④ 《唐的盐法》,《唐的榷酤》,《唐的茶法》,《文化》5卷5期;5卷8期;7卷6期。

⑤ 《唐代盐专卖法的规定内容及其效果》,《立命馆文学》418～421期,1980年。

⑥ 《唐后期江淮盐税机关的地点选定与机能》,《史学杂志》91卷2期,1982年。

⑦ 《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史林》65卷6期,1982年。

⑧ 《唐五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1;《唐代的茶法考略》,同上,1987～2。

制度、税收、专卖法收入及与藩镇、宦官的关系、唐盐政的影响等。张荣芳(台)总结整理了中外学者几十年来对茶税始年、征收、性质等的争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足资参考①。吴丽娱近年有系列论文研究唐五代盐政,《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② 指出飞钱是盐茶作为商品刺激货币制发生变化的结果,折博更多地体现了唐宋社会变革之际政府将食盐用于均输、某些时候甚至是取代货币而使用的特殊意义;《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其对五代盐政之影响》③。通过对《册府元龟》所载大中元年闰三月奏文的分析,指出大中盐法渊源于贞元,史牟是严酷两池盐法的始作俑者,大中盐法的严厉为五代所继承;《五代的屋税蚕盐》④ 考证了屋税盐的起源与实行时间,认为屋税盐就是城镇地区的蚕盐,城镇屋税盐与农村蚕盐在实行中的差别反映了五代政府城乡食盐政策的不同,也体现了俵配制与场销在五代同时并存的必要性。郭正忠对五代蚕盐制的发展及其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⑤。郑学檬指出五代盐税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且带有土地、资产税的附加税的性质⑥。

3. **其他收入**

鞠清远指出唐政府特定的钱物、田地或人丁指配与官吏或机关,使之自己管辖或经营取利以供支出,它们往往不在政府的总收支系统中,并常与特定支出相联系,其名目有色役、訾课、职田、公廨田、公廨本钱等⑦。王永兴论述了唐代土贡制度的特点⑧。宫菌

---

① 《唐代茶税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东海学报》26,1985。
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③ 《唐研究》1,1995。
④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
⑤ 《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
⑥ 《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 1 期。
⑦ 《唐代财政史》102 页。
⑧ 《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北京大学学报》1982 年 4 期。

和禧（日）研究了唐代贡品的分布①。杨志玖、张国刚研究了藩镇进奉，指出唐后期中央财政一直处于粗充常入之数，不堪余倍支出的境地，在两税三分的死定额下，进奉为活源头②。陈明光指出进奉是除陌之外，唐中央向方镇争夺财力的另一种非常手段③。

俞大纲首先研究了《高力士外传》记载的"变造"、"和籴制"④。铃木正（日）指出和籴的目的主要是供军粮⑤。菊野恭子认为和籴是满足国家对超出租税范围之外谷物需要而行的一般籴买⑥。陈寅恪指出开元中盛行于关中的和籴原存于西北一隅，牛仙客因彭果而推广至关内⑦。岑仲勉认为唐前期西北并无和籴，开天之际用兵频繁，乃将中原和籴法推行于河西⑧。卢开万认为唐前期中原推行了和籴法，西北地区也同样推行，唐承魏制，全面行和籴。文中也反驳了徐寿坤安史乱前和籴双方自愿⑨的观点，指出唐前期和籴具有强制性⑩。杨际平反驳说，唐前期和籴基本上不带强制性，和籴价高于时价⑪。他还认为唐后期和籴仍不应一概否定，其目的主要是供军国之需，通常是事在必然，不可不为⑫。赵文润也认为不

---

① 《唐代贡品的分布情况Ⅰ、Ⅱ》，《纪要》九州共立大学，17卷，1、2期。

② 《唐代藩镇进奉试析》，《文史》28。

③ 《论唐代方镇进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

④ 《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1，1935。

⑤ 《论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77、78，1940。

⑥ 《唐代和籴》，《御茶水史学》1，1958。

⑦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48～154页。

⑧ 《隋唐史》369～70页。

⑨ 《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历史教学》1957～2。

⑩ 《唐代和籴制度新探》，《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⑪ 《从敦煌文书看唐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

⑫ 《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

能对和籴持否定态度①。卢向前继续陈寅恪之说，指出开元 24 年以前，和籴主要行于西北，25 年后才成为中央政策，开元以前西北和籴与常平义仓的布局有关，开元 25 年和籴政策的转变与裴耀卿漕运改革不成功有关，和籴变造之法使牛仙客入相、李林甫专任、兴利之臣继起，从而影响了开天政局②。他还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论述了唐和籴的特征、作用等③。黄永年继续论述和籴渊源问题，他认为和籴以济京师之事不始于盛唐。北魏已有运河北诸州和籴粟的记载，东魏后仍继续，且不启自河西，唐诏敕中多次提及诸道和籴、江淮和籴等④。王永兴将和籴与交籴区分开来⑤。杨际平也探讨了和籴与交籴的关系，指出交籴是整个国家和籴计划的一部分，并对唐代是否存在付本取利的交籴提出怀疑⑥。袁一堂认为中唐时期市籴变为官府系统和籴和民间消费系统平籴两类⑦。

吴丽娱研究了唐后期户部钱的组成及收入⑧。何汝泉指出至迟在建中三年以后户部司掌有具体钱物，并考证出贞元四年以前所掌钱物为常平义仓、阙官俸料职田钱物等⑨。

---

① 《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5，1990。

② 《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0。

④ 《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考释》，《新史学》4～2，1993。

⑤ 《籴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⑥ 《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

⑦ 《论中唐以后官府粮食的市籴》，《中国史研究》1994～2。

⑧ 《唐后期的户部司与户部钱》，《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

⑨ 《贞元四年以前户部钱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1。

(四)财政支出

1. 总论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将唐前期支出分为预算内(军费、俸禄、赈恤、皇室费用、交通行政费用)、预算外(公廨本、食堂与“别借食本”、职田等田地及常平仓等)两部分,并探讨了武德至玄宗时财政平衡状态的阶段性,同时也论述了唐后期中央、诸使及地方对两税的支出。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将唐前期支出分供国、供御、供军三部分,指出前期支出可分每年常支与临时别支两类,供给方式又可分一次性及储备性支出。供国不完全仰赖赋税,支出来源多方面,赋税供给与国家经营公产、高利贷供给相结合,又有百姓当事人因时因事交纳为补充;供御主要来自庸调及诸种贡献;供军为支出中最重要者,绝大部分田租庸调供给。同时也具体考证了每项支出数量、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等。清木场东系统研究了天宝中支出制度,《唐天宝中的财政收支》力图把握天宝时代财政统计中度支、军费、诸仓粮统计及钱物、谷类、岁入、岁出相互关系,同时改正了统计中的相违之处;《唐开元、天宝中的转运米额》①以开天时在京粟支出额来研究国初以来转运米额的增加趋势及推移;《唐律令时代的钱物支出体制》② 详论了开天时的钱物支出制度。

2. 军费

那波利贞(日)集中介绍并分析了有关和籴、郡仓纳谷、兵士资装等文书,虽引录的文书不全是天宝年间或与边军有关者,但奠定了利用文书研究边军费用的基础③。末田修一(日)研究了唐后期

---

① 《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27～4,28～1,1987,1988。

② 《久留米大学产业与经济研究》28～2,1988。

③ 《有关唐天宝时代河西边防军的经济史料》,《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1,1952。

的出界粮制，指出这一制度在德宗建中年间两税法制定前后开始，中央度支对藩镇兵出界作战供给食粮，它在联系中央与节度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地方节度使势力的发展，上供断绝，中央财源枯竭，出界粮制因之而废，唐也随之灭亡。文中还分析了出界粮的财政来源及其与营田的关系等。唐耕耦认为开元时以长征健儿代替兵募为镇兵，其装备全由唐廷承担，朝廷还要负责兵士及家属的生活费用，军费支出大增，造成财政困难①。郭绍林则认为唐玄宗的军制改革对经济、财政状况的改善起了促进作用②。张国刚考证了唐后期每个兵士所需经费的数额，并在统计各方镇兵力的基础上，估算了它们的军费开支。他以数学方法对西川军费进行个案分析，计算出其军费为 120 万贯，相当于西川两税钱额的三分之二，认为这大体符合当时供军费用在全国经费中的比例③。他还论述了募兵"去给行赐，还给程粮"的待遇④。杨鸿年认为唐代募兵的特点是兵由国养，而用于养兵的每份衣粮并无划一标准⑤。唐长孺分析了防丁的资装来源等⑥。胡宝华比较了天宝前后军费的变化及府兵、募兵、长征健儿时期的军费开支。从军队的设置数量及其在全国课口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指出天宝前后社会承担压力的大小⑦。孙继民详细论述了唐府兵马匹、器仗、资装的组成、来源等⑧。大津透考察了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中有关军事的条文，认为唐

---

① 《唐代前期的兵募》，《历史研究》1981 年 4 期。

② 《论盛唐军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史学月刊》1987 年 4 期。

③ 《唐代藩镇研究》214～219 页。

④ 《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1。

⑤ 《唐代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 年 3 期。

⑥ 《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⑦ 《唐代天宝年间军费开支蠡测》，《文史》33。

⑧ 《敦煌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西域军费及监牧费是把一部分庸调直接送纳秦、凉二州，推测这笔军事费用应占全国庸调的十分之一二①。黄正建考证了斯九六四、伯三二七四兵士衣装文书、性质、时间、供给兵士对象等，估算了唐兵士衣装用料尺寸，认为士兵衣装消费为绢 11.7 匹，与《太白阴经》记载军士一年支绢匹 12 匹大致相当②。王永兴探讨了从贞观到开天百余年的兵赐(给衣及赐物)制③。清木场东具体考证了《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关于衣赐军粮的资料，订正了《通典》中的错误数字，并试图解释诸书数字不同的原因④。

3. **俸禄**

横山裕男(日)认为唐月俸制开元 24 年形成，并用附表形式，研究了其后加减的各类分数⑤。筑山治三郎(日)全面论述了官员的俸禄制度⑥。清木场东关于正员官、员外官俸禄、《通典》等诸书所记载俸料制系年等有一系列具体考证⑦。他还综合研究了唐前后期给俸制，将之分为俸料(开元前)、月俸(开元 20 年后)、月料(贞元后)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其间的钱数规定、财源支给体制等原则⑧。阎守诚认为唐代以户税充官俸的年代上限为仪凤三年，以

---

① 《大谷吐鲁番文书复原二题》，《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补旨符补考》，《东洋史研究》49～2，1990。

② 《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资装》，《敦煌学辑刊》1993～1。

③ 《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国学研究》1，1993。

④ 《唐天宝初期的边军资料(四)》，《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34～3，1992。

⑤ 《唐代月俸制的成立》，《东洋史研究》27～3，1968。

⑥ 《官僚的俸禄和生活》，《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风间书房，1967。

⑦ 《隋唐禄俸制研究(一)(二)(三)(四)》，《产业经济研究》26～1，2，3，27～1，1985，1986。

⑧ 《唐代俸料制的诸原则》，《东方学》72。

公廨本钱充官俸时间下限为开元18年①。刘海峰认为乾元元年即以户税充官俸，开元18年以后还曾以公廨本钱充官俸，唐后期有些地区仍如此②。他还指出递增性是唐代俸料制的特点，地方官按公廨本钱多少实行浮动分俸是唐前期的独特方法③。陈明光详细探讨了唐前期俸料钱的供给演变等复杂过程，认为乾封元年，京官俸的支出完成了由预算外向预算内的转化，确定了稳定的级差定额供给制。外官俸供给几经演变，在开元末确定下来，列入预算内分配计划，开元18年置本收利制并未维持多久④。李锦绣认为应将俸、料、课、杂钱四者的供给分别研究，并分析了唐前期内外官俸料制的演变⑤。

陈寅恪首先注意到唐后期俸料钱的差异问题，他分析了白居易诗文中所记俸料钱数，发现地方官吏实际所得比史籍记载为多，并根据当时同时同官俸料互异的现象，说明肃代后不仅内外官轻重有别，外官又有厚薄之别，同时也指出《〈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有误⑥。刘海峰认为唐内外官俸料钱厚薄变化始于玄宗；唐前期重内官轻外职主要是政治原因，后期则多为企求丰厚的俸钱⑦。张国刚指出唐后期地方官月俸虽有定额，但因地方财政包干，有些方镇和州县官员俸钱远超过定额，而一些边远地区则无俸钱可充，其法定俸入与实际收入往往差别甚大⑧。古贺登考察了《新唐书·食货

① 《唐代官吏的俸料钱》，《晋阳学刊》1982～2。
② 《唐代官吏俸料钱的来源问题》，《晋阳学刊》1984～5。
③ 《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2。
④ 《试论唐前期京官俸料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史林》1992～1，《唐代财政史新编》78～86页。
⑤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830～850页。
⑥ 《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清华学报》10～4，1935，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⑦ 《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5～2。
⑧ 《唐代官制》，174页，三秦出版社，1987。

志》所记内外官禄、月俸的记载等①。杜梭研究了唐后期京官俸的支给，指出户部司开支京官俸时限为从贞元 4 年 2 月至中和 3 年②。王振芳高度评价了大历俸制，认为其确定了不按品计数的原则，贞元会昌皆因之而有所改动③。

清木场东考察了唐代给禄的诸种规定、财源支给体制及给禄变化与经济财政变动的关系④。高原认为贞观《禄令》的颁布时间在贞观 11 年，开元时禄给总量极限为 900 万石，在唐前期处最高地位，天宝、贞观、武德依次次之；唐后期元和年间至大中三年禄给数量呈增长趋势，周期由岁给变为月给⑤。李燕捷指出官员给禄标准与俸料钱一样，也有一个由按本品转为依职事品给的变化过程⑥。他还指出武德元年以地亩代外官禄，不能说明外官经济待遇低，贞观重定禄制，外官降京官一等因外官职田高京官一等，唐前期不是京官禄厚外官禄薄，而是外官禄高于京官⑦。

在官吏待遇中尚有常食料等诸种食料供给，小西高弘将之与料钱联系起来，认为常食料包含在俸料中⑧。清木场东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食料钱最早是从常食料中派生出来的钱物支给制，但开元时与常食料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支出，常食料则是具有现物支给、膳食支给、四等身份。月分日分诸原则的制度，唐后期发展为给

---

① 《〈新唐书·食货志〉内外官禄，月俸记事辨正》，《中国正史的基础研究》，早稻田，1985。

② 《唐代户部使司开支京官俸料时限考》，《晋阳学刊》1989～3。

③ 《唐安史兵兴后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0～3。

④ 《隋唐禄高考》，《法制史研究》37，1986。

⑤ 《唐代官禄制度考略》，《晋阳学刊》1993～4。

⑥ 《唐代给禄的依据》，《历史教学》1994～8。

⑦ 《唐代禄制与内外官之轻重》，《河北学刊》1994～5。

⑧ 《唐前期料钱的调达》，《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19～2，3，1974。

厨本官府经营[1]。李锦绣认为常食料与食料钱无关，它是在食料之外按本品对百官月季的实物供给，官员每日厨食供给的是小食料，午时粥食料。她还研究了设食料、设会料、外官食料等[2]。

4. **其他支出**

仁井田升详细研究了唐食封制度对社会的影响[3]。今堀诚二（日）对仁井氏论述做了一些补遗，认为史籍中"以七丁为限"应是以七千为限[4]。砺波护检讨了武后至中、睿宗食封激增及当时政界的议论和政策，认为太府给封物诏敕发布于开元20年，史籍中应是以七丁为限，并进而指出有食封制的存在，很难得将唐前期单纯看作用律令来实施中央集权、或将个人的人身统治贯彻到底的时代[5]。日野开三郎全面探讨了食封制，认为玄宗开元3年已行州县送封、封户于京师领取的改革，因之而使食封制作为古代封建遗制的色采消失，变为每年给与封物的年金制，这表明作为国家贵族的封家地位的降低[6]。松岛才次郎（日）研究了爵位与食封时间的关系，认为没有一定的比率[7]。山根清志不同意仁井、砺波之说，认为应以七千为限[8]。他还指出高宗朝封户和一般百姓从本质上没有

---

① 《唐律令制时代的常食料制》，《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和国家》，汲古书院，1986。

②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850～872页。

③ 《唐代的封爵制及食封制》，《东方学报》（东京）10～1，1937。

④ 《唐代封爵制拾遗》，《社会经济史学》12～4，1942。

⑤ 《隋的貌阅与唐初食封》，《东方学报》37，1966，收入《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

⑥ 《唐朝租庸调时代食封制的财政史考察》，《东洋学报》49～2，1966，收入《唐代租调庸的研究》Ⅱ。

⑦ 《唐代的食封》，《信州大学教育部纪要》21，1969。

⑧ 《唐代食封制中的所谓七丁封户问题》，《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上卷，汲古书院，1980。

差别，封家无论如何恣意收取封物，也未形成独立的地域身份关系[①]。砺波护否定了山根“七千”说，并对封户是否庄园化、食封地域限制及堂封等，补充了此前的论考[②]。

韩国磐研究了唐五代食封制度，认为两汉的封邑制至曹魏出现了虚封与实封，唐代实封制度是由虚封发展而成，至唐后期实封形成俸赐，已非封邑原义[③]。黄正建认为封户所纳除租调外，仍包括庸[④]。马俊民总结了韩、黄两文关于封户交纳内容的争议[⑤]。阎守诚认为食封制度之下，封家对封物的征收既是国家赋入的分割，又是对国家税权的分割，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影响，玄宗收回了封家向封户征收封物的权力，把食封完全纳入国家赋税制度和财政收支之中，有利于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⑥]。

卢建荣《唐代前期非常支出的筹措及其回响》[⑦] 指出，唐代低税政策，无力应付突如其来的国防经费，往往采用重复课税形式，向地方摊派，此外盐课关市之征也是供临时筹措的。曾一民[⑧]、张学锋[⑨]、陈明光[⑩] 等也论及唐赈恤及蠲免。

三、人口与徭役

---

① 《唐朝前半期的食封制》，《历史学研究》505，1982。
② 《唐代食封制再考》，《律令制》。
③ 《唐代的食封制度》，《中国史研究》1982 年 4 期。
④ 《关于唐代封户交纳封物的几个问题》，同上 1983～4。
⑤ 《唐朝的“食封家”与“封户”》，《天津师大学报》1986～3。
⑥ 《论唐玄宗对食封制度的改革》，《北京师院学报》1983 年 3 期。
⑦ 《史语所集刊》56～1，1985。
⑧ 《唐代之赈恤政策》，《唐宋史研究》。
⑨ 《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1。
⑩ 《略论唐朝的赋税“捐免”》，《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

(一)人口

1. 通论

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人口》是作者唐户口研究的姊妹篇,前者主要探讨了贞观13年行政区划及人口分布,将贞观13年大簿所载300余州及1500余县逐一落实,并将各州府户口数字考订出来,该书分三部分:1. 计帐制度、贞观13年大簿、《括地志》及《旧唐书·地理志》有关问题的探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2. 贞观13年各道领州县、户口考订;3. 州县户口及各道州县户口统计表。后者继《唐初》之后,对天宝12载户部计帐的主要内容加以恢复,整理和考订了唐鼎盛时期政区人口分布的状况,该书内容包括:唐朝鼎盛政区人口确定的原因,贞观13年至天宝12载州县建置、户口数量及分布,全国人口密度的变化,天宝12载各道郡县、户口考订,各道领郡县、户口统计表,各道贞观13年与天宝12载户口数比较表等。两书同时还附有贞观13年与天宝12载各道政区、人口示意图,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他还有《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湾新文丰,1995),为论文汇编。内容包括人口资料系年及计帐制度,人口分布迁徙及职业构成,区域经济、政权机构的运作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几类,为作者十几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1卷(三一书房,1989)为"户口问题和籴买法",户口部分收录作者《唐天宝以前的户口统计》、《大唐天宝元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唐贞观十三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等多篇关于户口统计的论文。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是一部综合研究之作,该书分唐有关地志户口数字系年及其史料价值分析、魏晋南北朝至隋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概况、唐代人口的升降状况、唐代人口分布、唐代人口迁移、唐代人口结构六章,注重唐以前及中唐后人口变化、探讨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间的关

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察人口结构等，为本书的主要特点。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汇集了历代人口统计资料，可供参考。

2. **人口系年及人口数量**

梁启超最早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人口①。那波利贞始介绍敦煌户籍，注意到每户口数的增大问题，并据此对正史户口统计平均户数 5～6 人提出疑问②。接下来，易曼晖也论述了唐代人口问题③。

关于《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及户口数系年，马伯乐(法)将之定为八世纪初期④，白乐日认为旧领户数为贞观 13 年⑤，白伦斯坦(瑞典)考证旧领县年代在贞观 8 至 17 年之间⑥。岑仲勉指出《旧志》多本吴兢及韦述所撰之旧稿，而吴韦又撮录《括地志》而成，主张旧领县属贞观 13 年⑦。日野开三郎认为旧领县户数为贞观 13 年⑧。蒲立本⑨、梁方仲⑩、胡道修⑪，均将旧领户置于贞观 13 年。黄约瑟继续详为讨论，再次肯定了贞观 13 年说，并对州县分道户口等作了校勘考订⑫。翁俊雄认为贞观 13 年大簿主要保存于《旧志》中，可据之将贞观 13 年的 358 州和 1551 县全部查找出来，并

---

① 《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新民从报》46～7、8，1903。

② 《正史记载的唐天宝时代户数口数的关系》，《历史与地理》，33～1、2、2、4，1933。

③ 《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

④ 《安南历史研究》，《法国东方学公报》16，1916。

⑤ 《唐代经济史论》，《东方语言学讨论会公告》34，1931。

⑥ 《中国 2～742 年间的人口统计》，《远东古代博物馆公报》19，1947。

⑦ 《〈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史语所集刊》20 上，1948。

⑧ 《唐贞观十三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东洋史学》24，1961。

⑨ 《中国隋唐时代的人口登记》，《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杂志》1961～4。

⑩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⑪ 《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

⑫ 《〈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户口考》，《东方文化》24～2，1986。

指出《括地志·序略》和有关贞观13年户口论著中存在的问题①。

关于《通典·州郡典》的州郡户口，平冈武夫、市原亨吉（日）《唐代行政地理》（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指出，《通典》州县的记叙，多为天宝初年。翁俊雄推测所载州县建置为天宝元年，户口数为开元29年，所以未用天宝元年户口数者因该年岭南户口缺漏过多②。刘海峰不同意翁说，认为《通典》数字根据天宝元年计帐而来③。冻国栋亦主天宝元年说④。

关于《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开元户，羽田亨认为是从开元28年计帐而来⑤。翁俊雄主张是开元20年左右，下限为开元23年⑥。冻国栋认为出自开元20年前后的户部统计资料。

关于两《唐书·地理志》天宝户口数的记载，严耕望《中国历史地理·唐代篇》（中国文化大学，1983）认为《新志》所记为开元28年户数。平冈武夫、市原亨吉主《旧志》户数为天宝11载说，刘海峰对比开天户口升降，也将《新志》户数系于天宝11载，汪籛⑦、胡道修、青山定雄⑧、日野开三郎⑨、前田正名⑩分别将新、旧志系于天

---

① 《唐〈贞观十三年大簿〉研究》，《平淮学刊》5辑上，1989。

② 《〈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历史研究》1986～4。

③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厦门大学学报》1987～3。

④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5页，10页。

⑤ 《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万斯年译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

⑥ 《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和系年校勘》，《北京师院学报》1987～3。

⑦ 《汪籛隋唐史论稿》66页。

⑧ 《隋唐宋三代户数的地域考察》，《历史学研究》30，31，1936。

⑨ 《大唐天宝元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史林》42～4，1959。

⑩ 《隋唐河西诸州户口数的分析》，胡戟、兰君中译，《西北历史资料》1983～1。

宝元年。翁俊雄[1]整理了地志的源流，认为《旧志》天宝旧领为天宝12载，《新志》抄《旧志》，也为天宝12载，并参考不同版本，对两志数字进行勘误，文章还指出，《新志》抄《旧志》，有将旧领、今领、天宝后领误作天宝领者，《旧志》有些户口数字脱漏，赖《新志》得以保存。《太平寰宇记》开元户首抄《元和志》，无者抄《旧志》，并以《通典》补充。所载户数纪年混乱，但保存了淮南、江南开元8或10年左右的户数，并加进了独有的数字，还记载了若干州的长庆户(有的抄自《通典》)。冻国栋也认为《新志》是《旧志》改写而成，将两志户口数字置于天宝11载。翁俊雄不同意冻书的有些意见，指出《旧志》作者虽抄录天宝12载簿的一些数字，严格说来，反映的是11载情况，但由于它是官府正式文书，其各项数字仍应视为12载[2]。他还指出《元和国计簿》为元和2年以前，《旧书》卷16元和15年长庆元年天下户并未对元和4年以来民户增加情况作出反映，而是简单抄录元和初年记载，《元和志》补充了8至14年的变化[3]。卞孝萱对比了两唐志天宝户口相同、不同及户口各自异同等[4]。

有关隋初户口数量，史界说法不一，汪籛指出《通典》所记北周末年只有390万户的数字未可信赖，开皇前期户数已达六、七百万，推断周末隋初户数在450万左右[5]。唐长孺从"民田不赡"的土地状况，补正了汪说[6]。李德清认为北周民户90多万[7]，王育民指出《通典》记大象户三百为一百之误(不含北齐旧境户)[8]，冻国栋

---

① 同上页注⑤。
② 《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26～29页。
③ 《元和国计簿考补》，《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
④ 《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2。
⑤ 《隋代户数的增长》，《光明日报》1962～6～6，收入《汪籛隋唐史论稿》。
⑥ 《读〈隋书〉札记》，《山居存稿》。
⑦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10。
⑧ 《十六国北朝户口考察》，《历史研究》1987～2。

推论三百为五百之误(含北齐旧境户)①。洪廷彦指出《隋志》记北方户数较为属实,南方陈旧境户数可能少120～130万,隋盛世户口应有1030～40万户②。陶文牛考察隋代户口极盛时文帝末年的户口数量及南北分布,估计实有户800万,南北合计1230万,北方占65%,实际人口超过6千万③。他也考察了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④。李燕捷⑤、藤泽之⑥ 也研究了隋人口增长问题。

杨远具体计算了唐代户口数字,并考察了总户数及南北比例⑦。黄盛璋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和地区差异分析,认为唐代户口的的特点是数量变化大、变化时间快、地区变动显著⑧。王育民指出唐人口呈马鞍型发展趋势,天宝年间实际户数在1300～400万,天宝元年户平均5.75口,人口共8050万。他还论述了南北人口升降的曲折过程⑨。陶文牛探索了唐后期户口数量及分布,指出元和长庆之际南方在籍户比北方多出100万以上,全国实有户数多于天宝末年的在籍户数,接近其时的实有户数1300～400万⑩。古贺登利用电子计算机把新旧《唐书》、《通典》、《元和志》按州府编户数与各资料之间的增减加以地图化⑪。冻国栋将唐代人口分布特征概括为不平衡、人口地区间的分布在相对稳定的同时,又起伏巨大,

---

① 《隋代人口若干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1988。
② 《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初步分析》,《中国史研究》1987～3。
③ 《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2。
④ 《隋开皇大业间户口盛衰考实》,《北京师院学报》1992～4。
⑤ 《隋代户数增长情况分析》,《河北师院学报》1989～3。
⑥ 《隋朝人口增长考异》,《人口研究》1988～3。
⑦ 《唐代的人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2,1979。
⑧ 《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6。
⑨ 《唐代人口考》,《论唐代南北方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3,1992～4。
⑩ 《唐元和长庆年间户口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3。
⑪ 《唐代编户移动图》,《中国的都市和农村》,1992。

有时甚至变动剧烈[①]。杜文玉分析五代人口数字及分布密度等，认为人口减少以黄河下游最大，淮河以南次之[②]。

3. **人口结构**

郑学檬利用敦煌户籍资料探讨敦煌县人口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男女比例、劳力与非劳力比例不合理，复杂的、不利于人口自然增长的家庭组合也造成人口增长缓慢[③]。仁井田升[④]、铃木俊[⑤]、日野开三郎[⑥] 均分析了敦煌户籍中女口比例过多的现象，认为是逃避公课，申报时弄虚作假所致。古贺登认为天宝时敦煌是东西贸易的商业基地，男子多逃籍群趋城市，从事商队贸易活动，从而出现一男十女的情况[⑦]。堀敏一在未婚女子较多上，同意古贺之说，但认为中小男逃籍，应是经商离村、出家、逃避课役等[⑧]。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 1982）中列举了在籍女口的疑点，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籍帐的伪滥。王永兴认为青年男子服土镇兵役者很多，长期戍边不还，造成了户籍中青壮女子很多[⑨]。杨际平指出出家女口双重挂籍，这些为尼的中女未象僧一样从本乡贯除籍，故而造成天宝年间敦煌户籍女多男少，众多大女适龄不嫁者[⑩]。敦煌户籍反映人口构成的另一特点为每

---

①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228～230 页。
② 《五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2。
③ 《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敦煌学辑刊》1984～1。
④ 《敦煌等处发现唐宋户籍的研究》，《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⑤ 《关于唐代户籍与税制的关系》，《东亚》7～9。
⑥ 《关于以玄宗时代为中心所见的唐代北方禾田地域之八九等户》，《社会经济史学》21～5，6，1955。
⑦ 《关于敦煌户籍的一男十女》，《古代史》12～3，1966。
⑧ 《均田制研究》，岩波书店，206～7 页。
⑨ 《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历史研究》1957～12。
⑩ 《关于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研究》。

户平均口数较正史记载多。那波利贞认为每户10口的比例是实际存在的[①]。池田温也试图从各户家族构成及其关系、漏附情况、户等及官吏考课等方面加以考察每户口数增多的原因。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中指出除了因时代不同而起伏较大外，沙州户数与内地比可能差别不大，五口之家居多；女口激增可能与战争调发、男丁“没落”及伪籍有关；自武后至玄宗时男丁减少，大历时与女口老小的逃死相对而言比例有所上升但课丁数量并未增加。该书也考察了西州人口构成，认为西州家庭类型结构十分复杂，残破家庭与单身家庭普遍存在，复合、简单、不完全家庭也占有一定比重。翁俊雄考察了唐前后期人口职业构成，认为因后期官吏、工兵、僧道、奴婢、工商业者等非农业人口都比以前增多，所以民户数字与天宝年间相差很多[②]。张泽咸探讨了唐后期形成的特殊户——衣冠户及形势户[③]。

4. **人口移动与貌阅、括户**

大索貌阅是隋检括户口的重要举措。曾我部静雄指出隋代在开皇3年和大业5年两次实行貌阅，《通鉴》将第一次与大业5年相混而误记为开皇5年[④]。志田不动麿[⑤]和砺波护[⑥]认为隋只实行了大业5年一次貌阅，砺波护还指出《隋书·食货志》开皇3年与裴蕴传大业5年具体内容及所记增丁口数中，其下几位数字完全相同，应是同一事件。大业5年正是隋极盛期，接下来转衰，隋的貌阅未取得太大效果。金井之忠认为开皇年间发表貌阅之法，也承

---

① 《正史记载的唐天宝时代户数口数的关系》，《历史与地理》33～1，2，3，4。

② 《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

③ 《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3。

④ 《貌阅考》，《东洋史研究》1～3，1945。

⑤ 《北朝时代的乡党制》，《史渊》5～2，1935。

⑥ 《隋的貌阅与唐初食封》，《东方学报》37，1966。

认开皇年间整顿籍帐取得了效果。汪籛认为貌阅输籍法施行年代不得早于开皇3年晚于9年,《通鉴》系于开皇5年,与事实相差不远①。唐长孺持大索貌阅只大业5年一次说,认为开皇年间在故齐境内进行检括户口屡见不鲜,以致与大业5年大索貌阅相混②。冻国栋认为开皇年间曾大规模地有针对性、系统性地推行过貌阅括户和输籍之法,而且是经常性的措施,这是隋代户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开皇仁寿之际,户口隐漏又严重起来,炀帝大业5年裴蕴又继续推行貌阅和相纠之科,隋两次貌阅,针对性与侧重点不同③。

傅安华首先综合论述了唐前期逃户的原因、所归之处、客户负担及玄宗以前制止逃亡政策等,指出逃户逃亡渐盛于武后、中宗,至玄宗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④。黄谷仙从移民、流徙、战争的影响、逃亡就食四方面论述了人口流动⑤。冻国栋认为唐朝对人民自发的迁移严加限制,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推行移民措施,真正大规模的迁移主要是官府移民之外人民自发的迁移⑥。谢元鲁⑦、胡沧泽⑧ 探讨了移民逃户在四川、福建的作用。

宇文融括户是唐大规模检索逃户隐田的举动,中外学者论述较多。冈崎文夫(日)指出李峤建议的禁令、恩德、权衡、限制政策为宇文融检括逃户的基础⑨。铃木俊详细分析了有关宇文融括户的史料,认为其分别在开元11、12年取得了归首百万、获80万客户

---

① 《隋代户数的增长》,《光明日报》1962～6～6。

② 《读〈隋书〉札记》,《山居存稿》

③ 《隋代人口的若干问题管见》。

④ 《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4,1935。

⑤ 《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7,1935。

⑥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组织的移民》,《河北学刊》1992～1。

⑦ 《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

⑧ 《唐前期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福建师大学报》1992～1。

⑨ 《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中国学》2～5,1922。

田土等的业绩，其括户对限制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维护均田制具有重要意义①。砺波护认为均田制作为一种实态并不存在，宇文融括户的前提是府兵制的矛盾，他分析指出，从开元 9 至 11 年，宇文融检括内容基本沿袭了李峤建议的四项原则，派遣各道的租庸覆囚判官对浮逃户采取按户籍征租庸地税的方针，开元 12 年宇文融为劝农使后，政策改变，对新归顺的客户只征轻税，而促使这一根本改变的契机，则是 11 年从征兵向募兵制的变化②。唐长孺研究了逃户政策的转变，指出武周长安 3 年括浮逃已准许逃户在一定条件下就地附籍，而重点在于勒还本贯；开元 9 至 12 年循武周旧章，但重点在于就地附籍，其总目标在于使浮客归于编户；天宝 11 载诏默认了贵族豪强"潜停客户"，显示了以人丁为本赋役制度行将改变的趋势③。这与中川学系列论著④所指出的从武周至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发生了将逃户遣回原籍到允许附籍寄寓地的根本转变，两税法后出现了允许合法居住客户的观点相近。朱雷从《燕子赋》的两种写本指出武周至开元逃户处置从归贯到就地附籍的变化⑤，颇具匠心。松永雅生从课丁析出的角度评价了玄宗时的户口政策⑥。翁俊雄将开天之际逃户解释为唐农业经营结构向大地主

---

① 《宇文融的括户》，《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均田租庸调制度的研究》。

② 《唐朝的律令制与宇文融括户》，《东方学报》41，1970，《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

③ 《关于武周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6，《唐代的客户》，《山居存稿》。

④ 《唐代均田法租庸调法的反复公布和括户政策》，《一桥研究》9，1962；《关于唐代逃户、浮客和客户的备忘录》，《一桥论丛》50～3，1963；《关于唐宋客户的研究》，同 46～2，1963；《唐代实行括户方式的变化》，《中国古代史研究》2，吉川弘文馆，1965。

⑤ 《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⑥ 《大唐玄宗的户口充实与课丁析出》，《史渊》73，1957。

田庄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中间环节①。榊良(日)研究了逃户政策的另一方面影响②,他指出剑南、山南西道地区的盗贼集团(光火)是与唐逃户检括再编举动相对抗的乡里没落农民所结成的组织。

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存稿》)是一篇总结之作,文章指出,开元后浮客在州县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另有"保簿"登记浮客姓名户口,地方官据之掌握管内客户数字;两税法后土客户区分为土著与外来户的区分,新附客户在籍帐上不固定,寄户中除少数寄庄寄住户外,基本上为无资无地户,他们多数是地主土地上的佃农或佣耕,唐中叶至宋,北方佃农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明显削弱。翁俊雄认为两税法后民户大迁移使客户含义发生变化,长庆元年后据地造籍据地出税,将税资产改为税土地,客户从原来的与入户籍的土户相对到与有土地的主户相对,向宋代有地为主户无地为客户发展③。他还指出安史乱后仕家南移是形成辟署制的一个重要原因④。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⑤也是重要文章,他指出行客有别于脱籍逃赋的浮客,而是不著土户之籍但作为公验持有者登录于特定税簿、按章纳税者,可称为游客,作为"权时寄住户暂时滞留一地,则可称寄客;根据出土文书,行客包括商客、兵客、园子作客诸色,在建中前已负担户税兵役和杂徭;行客中有相当一部分远行商客,西北户籍中不以土客而以百姓行客对举,反映了丝路贸易的活跃。"

---

① 《开元天宝之际的逃户》,《历史研究》1991～4。

② 《唐代剑南道山南西道的光火》,《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1988。

③ 《唐后期民户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3;《唐后期"户帐"户数非实有户数说》,《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

④ 《安史乱后"仕家"的南徙》,《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

⑤ 《出土文献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

关于客户负担，中川学《从租庸调到两税法转换期制度上客户的租税负担》① 对从宇文融括户到两税法成立时期进行了详细探讨。砺波护《两税法制定以前客户的税负担》②补正了中川之说，认为宇文融括户的开元12年客户只纳轻税无差科、《广德二年南郊赦》未规定客户纳税。中川接受了砺波护的补正③，他还论述了逃户放弃的耕地如何再耕、客户的实际形态等④。张泽咸也论述了唐客户问题⑤。

5. **户籍、计帐、手实等**

池田温（日）《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序章、录文）》⑥ 一书从各地出土文书中集录了户籍、计帐、差科簿等78件；有关的官文书与寺院文书238件。在《序章》中，作者论述了隋代籍帐的完备；唐代的造籍；开元检括户口；天宝户籍伪滥；差科簿的变迁；安史乱后籍帐的荒废等问题，汇集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一书深入地研究了寺户这一特别身份户籍。该书分章论述了敦煌寺户制的历史前提；吐蕃时期的寺户制；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等问题，反映了唐五代户籍制度的一个侧面。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分户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唐朝户籍法的基本内容、户口土地的调查——手实制度与手实文书、户口土地的登记——户籍的编造与户籍文书、户口赋役的统计——计

---

① 《一桥研究》10，1966。

② 《东洋学报》43，1972。

③ 《走进中国客民的世界》，《一桥论丛》73～4，1975。

④ 《唐代客户逃弃田的保留》、《一桥论丛》53～1，1965；《论唐代的流庸》，《东洋史研究》26～2，1967；《唐末梁初华南的客户和客家卢氏》，《社会经济史学》23～5，1967。

⑤ 《唐代的客户》，《历史论丛》1，1964。

⑥ 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序章）中华书局，1984年。

帐制度与计帐文书、手实户籍计帐的区别与相互关系——唐户籍计帐制度比较六章，全面论述了唐户籍制度。

王国维《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① 是对唐户籍研究的真正开始。玉井是博②、仁井田升③、山本达郎④ 更广泛地搜集敦煌户籍文书并加以分类研究。铃木俊探讨了唐户籍的制作年代，认为丑辰年造籍定制从天授3年至大足元年成立，开元后瓦解，天宝后不是造籍标准年⑤。池田温与之意见相左，认为据西州户籍，可知从武德6年至开元年代严格执行了三年一造籍制，造籍年在开元20年发生变化。他又进一步研究籍帐制度，解释了"转前籍"中的年龄推算，指出武周开元初籍帐松驰，反映了当时逃户增多的现实，开元10年沙州籍与4年以前的倾向不同，可以看出宇文融括户后重新加强户口控制的成就⑥。土肥义和考察了各时期手实籍帐的书写格式、书式细节、传写过程等⑦。佐竹靖彦也归纳了户籍的标准形式、中晚唐后户籍类文书格式，指出两税后敦煌户籍文书变化不大⑧。唐长孺根据17件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诸乡户口残帐，分析了涉及籍帐制度的12个问题⑨。荣新江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① 《观堂集林》17，1922，又见《沙州文录补遗》。

② 《敦煌户籍残简》，《东洋学报》16～2，1927；《再论敦煌户籍残卷》，同24～4，1937，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③ 《敦煌等地发现唐宋户籍的研究》，《国家学会杂志》48～7，1934。

④ 《敦煌发现户制田制关系文书十五种》，《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1956。

⑤ 《户籍制作年代与唐令》，《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9，1957。

⑥ 《现存开元年间籍帐之考察》，《东洋史研究》35～1，1976。

⑦ 《从唐令看现存户籍的基础性研究》，《东洋学报》52～1，2，1969。

⑧ 《唐末宋初敦煌地区户籍制度的演变》，《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30，1970。

⑨ 《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开元29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户籍文书①。

关于户籍计帐的编造，池田温联系唐朝与日本两国计帐，提出“计帐手实”与“计帐历名”两个概念，认为《新志》中的“乡帐”为手实计帐。宋家钰考察了唐代手实、计帐、户籍三者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手实是民户申报自家人口、年纪及田亩的文书；户籍是政府登录民户人口与土地的簿籍；计帐是下一年度课役征调的预算文书。三者的关系是据手实以编户籍，据户籍以造计帐；户籍由户口籍与土地籍两部分组成，而计帐具有户籍的部分内容②。堀敏一（日）的看法是：户籍是在唐初编制的，以此为基础编制了计帐；唐代户籍和计帐是分离的，名册形式的计帐是记录户口数目，而户籍则由手实和计帐构成③。樋口知志（日）指出唐代地方政府户口名帐编造体制由以里正为中心每年一造计帐及以县司为中心三年一造户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作为乡阶段计帐的手实是实际的帐，供地方政府利用；户籍则是更基本的保存记录向中央政府提供户口资料，该文还否定了宋家钰、堀敏一的手实—户籍—计帐制造说，修正了池田温手实（于乡）→计帐→户籍说，提出手实（于乡）＝计帐（于县）→户籍说④。

唐计帐文书形式如何？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三年一造的户籍而无计帐，日本学界深感奇怪，仁井田升、铃木俊⑤ 怀疑在户籍文书中有赋税记载的就是计帐，山本达郎肯定了大足元年敦煌县户籍

---

①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户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1。

② 《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6期；《唐代手实初探》，《魏晋隋唐史论集》1。

③ 《我对计帐和户籍的看法》，《中国律令制》1984年。

④ 《唐代籍帐制度试考》，《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年报》20，1987。

⑤ 《关于唐代的户籍和税制的关系》，《关于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东亚》7～9，8～4，1934，1935。

中载有赋税的实例，否定了这一怀疑[1]。翁俊雄叙述了中日学者对户籍计帐与斯六一三背文书的研究，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户口帐文书与西魏大统13年瓜州效谷郡文书户口统计部分类似，与天宝13载户部计帐相同处很多，应是乡计帐[2]。

6. **户等**

日野开三郎[3]、松永雅生[4]研究了户等与租庸调及均田制的关系。唐耕耦[5]、王珠文[6]据蒲昌县九等定簿文书，认为评定户等时，土地是被排除在资产之外的，土地与户等并无直接关系。杨际平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时期，据以定户的资产都包括田产在内，并以田产为主；赋役负担轻重与户等高低、田产多寡关系密切[7]。李晓路也认为，蒲昌县九等定簿上粮食赀产的记载，正是民户拥有土地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反映，不能据此否认土地与户等有关[8]。船越泰次（日）认为唐民户大部分为九等户，而两税法是规定等第后课税的，若依原户等制将会成为均等赋课，因此两税法所谓的规定等第，乃是不改变原户等制，重新依据资产制定税钱赋课的标准[9]。他还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全面论述了户等和已受田额、丁中数的关连、户的资产评价方式、自田的存在、户等制和两

---

① 《敦煌发现的大足元年籍和〈汉书·刑法志〉》，《铃木俊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

② 《唐代计帐制度探索》，《北京师院学报》1988～3。

③ 《租庸调与户等》，《东洋史学》11，1954。

④ 《均田制下唐代户等的意义》，《东洋史学》12，1955。

⑤ 《唐代前期的户等与租庸调的关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

⑥ 《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几个问题的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83～2。

⑦ 《唐代户等与田产》，《历史研究》1985年3期。

⑧ 《唐代定户等赀中包括土地》，《历史研究》1985年3期。

⑨ 《北朝隋唐的户等制》，《中国律令制》，1984年。

税法的关系等①。稍后，他集中分析吐鲁番户籍、田地力役关系、税收文书中有关户等的资料，认为吐鲁番民户有九等，与敦煌仅可从文书中发现下层四等民户不同，但占压倒多数的仍是八、九等户②。邢铁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隋到五代户等的制度、作用及变化趋势等，总结了史界有关户等的争议，提出唐前期定户等包括土地、不考虑人丁，租庸调与户等有关，开元25年后地税也与户等发生了间接关系，两税指地税户税等观点，分析了两税法前后户等的变化，指出此前为九等户，以资产为凭，主要针对户税兼及地税徭役；此后向五等转化，加入了人丁因素，主要针对两税，并在唐末五代开始向徭役方面转化③。

(二)徭役

王永兴对五件登载唐代敦煌数乡男子姓名、职务、徭役的文书残卷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其定名为"差科簿"，指出它们是反映唐前期色役制度的典型材料，认为唐前期色役制度的特点是不同种类的徭役由不同种类的人来负担，而把人们划分成类(色)，去担负各种徭役，则是唐前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④。他还研究了另外四件敦煌文书，解释了遮收、平水、傔这三个名词，进一步提出了色役制的特点是身份性、分番上役、不服役者纳资或纳课。此外还讨论了土镇兵役沉重与中女等问题⑤。曾我部静雄也是较早将文书定名为差科簿的学者之一，惟其认为课指杂徭(包括杂役或色役、户役、

① 《唐代户等制杂考》,《诸问题》。

② 《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等文书备忘录》,《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

③ 《隋唐五代户等制度研究》,《文史》40,1994。

④ 《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

⑤ 《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职役、府兵制下的兵役等)①,引起仁井田升②、滋贺秀三③、松永雅生④、滨口重国⑤ 等论辨。日野开三郎也分析了这组差科簿文书,考证其年限在天宝6载,但称其为户籍或丁中籍⑥。西村元佑继续整理这组文书,同意文书是差科簿,但认为差科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且因时而不同,安史乱前,差科广义指赋役、狭义指徭役、杂徭,反驳了松永雅生两税法前差科不指杂徭、色役、番役、正役中任何一种而指税物⑦ 的观点⑧。杨际平再考了寿昌城主、寿昌平水、勋官卫官荫子、翊卫的出身、终服、遮收、兵役负担等问题⑨。程喜霖⑩、吴丽娱⑪ 论述了唐高宗永隆元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并解释了其中的"签符"、"样人"等。

对赋役体系的认识,滨口重国关于杂徭的一系列论述确立了

---

① 《西魏的户籍与唐差科簿之间的关系和课之意义的变化》,《东洋史研究》17-4,1958;《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讲谈社,1953。

② 《唐律令上的课役制度》,《中国法制史研究》2。

③ 《课役的意义及沿革》,《国家学会杂志》63,1949。

④ 《论唐代的课》,《史渊》55,1953。

⑤ 《关于唐律令中课役一词》,《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1974。

⑥ 《大唐府兵制时代团结兵的称呼及其普及地》,《史渊》61,1954。

⑦ 《两税法以前唐代的差科》,《重松先生古稀记念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1957。

⑧ 《唐代敦煌差科簿研究》。《西域文化研究》3,《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洋史研究会,1968。

⑨ 《关于唐代差科簿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6。

⑩ 《吐鲁番出土赵须章等名籍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

⑪ 《唐高宗永隆元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的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唐高宗永隆元年文书中的"签符"、"样人"问题再探》,《敦煌学辑刊》1991~1。

杂徭与租庸调并列的地位，将徭役分为役、杂徭、杂役等多种①。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将徭役分为力役、兵役两类，其中力役包括庸和岁役、杂徭和色役，指出均田制下赋役体系包括一律均课的赋役和轻重有别的徭役，徭役比赋役更沉重②。日野开三郎也认为租庸调时期的课输制度是把丁男的服役和按身份服役两种原则结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③。大津透认为唐赋役令包括课役、差科两种负担，课役指租庸调，不包括杂徭，是21至59岁成丁男子的均等赋课，为定额人头税；差科指从色役到职掌人、杂徭的种种力役，征科原则以户为单位，类似财产税。前者为古代的，后者为中世的，唐律令制的租税体系为这二重构造，宫崎市定等完全将租税负担向力役换算的说法应再考虑④。大津氏的论述可以看作日本学界对差科、课役争论的总结。

色役与杂任役、杂徭等关系如何？西村元佑认为色役在律令上的用语是杂任⑤。滨口重国认为白直类不包含在杂任中，门夫烽子称呼为夫，但并不是杂徭，而是其变形变役⑥。善峰宪雄（日）认为番役杂徭都称“夫”，两者无本质区别⑦。松永雅生认为色役番役据户等、户内丁多少差发，称为差役，它是在杂徭之外的⑧。大津透上引文认为色役同于杂任，杂任下有杂徭，杂徭上部为门夫烽子。唐

---

① 《唐两税法以前的徭役劳动》，《东洋学报》20～4，21～1，1933；《唐杂徭的开始年龄》，同23～1，1935；《唐杂徭的义务年限》，《历史学研究》8～5，1938，均收入《秦汉隋唐史研究》上卷，东京大学，1966。

② 《唐代徭役制度考》，《西域文化研究》3。

③ 《唐代租调庸的研究》Ⅱ。

④ 《唐律令制下的力役研究》，《东洋文化》68，1988；《课役制和差科制》，《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东方书店，1992。

⑤ 《唐律令中杂任役和色役资课相关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⑥ 《唐的白直及杂徭和各种特定的役务》，《史学杂志》78～2，1969。

⑦ 《唐代的杂徭和番役》，《龙谷大学论集》404，1974。

⑧ 《唐代差役考》，《东洋史学》15，1956。

长孺总结了杂徭、正役、色役、杂任等关系，指出广义的杂徭包括正役以外的各种劳役，色役包括介于吏和役的杂任或职掌和单纯的徭役（一部分为杂徭或正役，一部分为专业性的特殊人户）；色役中部分由杂徭转化而来，其纯系劳役的部分也有由正役转变而来的。安史乱后色役内容发生变化，与差役、差科互称，指现役，不具有不役纳资的特征①。张泽咸指出对“夫役”一词应具体分析，汉魏六朝的夫役记载和《唐律》规定丁是正役、夫是杂徭的解说颇有异同，唐以前的夫役包括力役与杂徭，唐史籍中关于夫役的记事也有的是色役，有的是杂徭，不应一律归为杂徭②。

杂徭的役使天数，曾我部静雄认为是 40 天③，宫崎市定指出为 39 天④，滨口重国推测应为 50 天⑤。吉田孝指出杂徭并不是与租庸调一样的必须负担的义务，而是一种有无课赋都要征发的临时性的徭役。堀敏一同意吉田之说⑥。李春润、朱淑瑶考察了唐代中男的徭役负担问题，指出正役之外的充夫、杂使等，除征调丁男外，也征调中男，并具体阐述了中男的徭役量⑦。程喜霖考察了高昌官田役作制，指出它是地方官府掌管的杂徭，被征者主要或全部为八、九等户的丁中（包括手工工匠），役期一般是五日⑧。杨际平

---

① 《唐代色役管见》，《山居存稿》。

② 《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4。

③ 《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

④ 《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东洋史研究》14～4。

⑤ 《唐代杂徭的义务天数》，《秦汉隋唐史研究》下。

⑥ 《日唐律令中杂徭的比较》，《历史学研究》26～4，1962；《日本所继承的唐赋役令》，《中国律令制及其发展——包括对周边诸国的影响》，1979；《杂徭制的展开过程》，《律令国家和古代社会》，岩波书店，1983。

⑦ 《略谈唐代中男的徭役负担》，《广西师院学报》，1981 年 4 期。

⑧ 《对吐鲁番所出四角萄役夫文书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6 年 1 期。

继续探讨杂徭的天数问题，认为中男充夫 10 天，仅相当于正役的 1/4，杂徭的特点是小、轻，丁男充夫 40 天，等于正役 20 天，丁男充夫与服正役是替代而不是兼纳关系；夫役不是户役，它按丁、中征调；中央政权对杂徭的征敛有许多明文规定，并非全由地方政府随意科派役使；唐代色役是正役杂徭的一种使用形式，而不是独立于正役杂徭之外的另一种徭役；唐后期色役一词，既可用以表示百姓科派的力役，又可以作为服役于诸司的某些力役使用形式的泛称①。

唐后期的徭役，陈明光提出，两税法对改革徭役制度的立法精神，在于征收代役金之后，以彻底的雇役形式全面取代旧的无偿调役形式，然而由于改革意图与确定两税额的具体程序脱节，“据旧征税数”而定的两税额却未将杂徭的代役金包括在内，地方政府必需的杂徭便仍以力役的自然形态延续下去，唐后期文献上的“差役”即属前期杂徭的发展形态，而非前期丁役的再生形态②。张泽咸指出：两税法时期的力役征发和过去相比，其差别在于：力役征调在法制上缺乏明确依据；地方各自为政严重；力役征发与差役、差科、杂徭互混，难于区分；较多地任用士兵就役③。他还指出：唐后期至五代有关徭役名称使用的混淆，实际上是代表着杂徭与力役逐渐趋向合流的表现④。

四、土地

---

①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历史研究》1994～3。

② 《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方对“差役”的分割》，《社会科学家》1986～2；《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3。

③ 《唐代的力役》，《魏晋隋唐史论集》1 辑。

④ 《关于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一)均田制

1. 通论

均田制一直是史界论争的重点,这一领域成果最为丰富。曾我部静雄《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系统介绍了均田制的起源、实行及发展等。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三联书店,1962)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对均田制所有制性质、与租庸调的关系、产生的背景等激烈讨论的代表性成果。韩国磐《隋唐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探讨了这一时期均田制实行的条件、均田办法、租调力役制、实行的情况、作用及唐代均田制的破坏等,为中国学者最早全面论述均田制的专著。1984 年,作者又扩充修订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增加了北魏前后的土地制度及均田制的实行状况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1964)也是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论著。铃木俊《均田租庸调制度的研究》是数十年研讨成果的结集,包括占田课田和均田制,隋的均田制,从户调向租庸调的转化、均田制和敦煌户籍,均田租庸调制的关系、矛盾及崩坏过程六章,是用敦煌文书研究唐田制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汇集了作者研究吐鲁番田制等文书的论文,展示了利用新资料的整理分析使均田制研究更进一层的成果。堀敏一《均田制研究》(岩波书店,1975,韩升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研究均田制的沿革、内容、意义及崩坏过程,综合了日本学界关于古代社会、身份制、均田及税役制的讨论,书末附有参考文献目录并加以简要解说,是有关均田制最完全的论文论著目录,可供参考。姜镇庆等编《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翻译了日本学者铃木俊、山本达郎、池田温、西川正夫、

佐竹靖彦、土肥义和、杉山佳男等有代表性的论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日人研究均田制的概貌。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认为户籍法是均田令施行的重要条件，前半部分详加探讨，后半部分主要利用吐鲁番手实及其它文书，考察了田令内容、均田制的实施及性质、永业口分田的性质和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等问题。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重点在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施行状况，考察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土地还授施行状况，西州两种授田制度等，也论述了均田制渊源及在魏齐周隋的实施状况，分析细致，具有较高水平。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从理论及较宏观的角度，把均田制作为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史的一个环节进行研究，论述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进程及背景等。

综括而言，均田制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刊布的阶段性是一致的。敦煌、大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利用，使均田制研究呈阶段性并形成三个高潮。现今文书资料的刊布几近完全，如何充分利用大谷吐鲁番文书及分藏于各国的敦煌文书，在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向更深的方向进展，汇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形成第四阶段的高潮，可能是今后史界最难也最需着意思考的问题之一。

2. **均田制的施行。**

邓广铭认为唐初颁布的所谓均田令，自始就不曾认真推行过，只是把民户私有土地更换名称而已。他指出敦煌文书所载民户已受田与应受田相差甚多，田亩的零散表明土地是购买所得而非授自政府①。傅筑夫认为唐代的均田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因为在人口增多和土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均田制的条件是不存在

① 《唐代租调庸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4期。

的[1]。杨志玖从北魏均田令的解释和其它文献记载中支持邓广铭的论点[2]。林天蔚(台)从户籍卷中指出均田制在唐代是有名无实的[3]。多数学者认为唐代均田制确实是实行过的。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一书以大量传世文献和户籍残卷的记载为据,详论了隋唐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岑仲勉、胡如雷[4]、乌廷玉[5]、李必忠[6] 等也指出: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上都明确标志着口分、永业、买田的不同,还有退田、回收、还公、转行给授的记载,可与唐均田令互证;残卷中土地的零散,除受自然环境影响外,是由于土地不断还授和不触动私有土地及土地买卖所造成;受田不足只能说明均田制实行很不彻底,不能证明它未曾实行。铃木俊评论了邓广铭与岑仲勉等的论争[7]。

日本学者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玉井是博最早提出唐代并未按均田制规定授田,而是便宜授田的见解[8]。铃木俊也认为户籍上登记的土地不过是农民现有土地的登记,永业、口分田的区分不过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9]。金井之忠也指出均田制的意义与其

---

①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224～225 页。

② 《关于北魏均田制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 年 4 期。《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历史教学》1962 年 4 期。

③ 《敦煌户籍卷中所见唐代田制之新探》,《珠海学报》1980～11。

④ 《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5。

⑤ 《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大学学报》1955～1。

⑥ 《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2。

⑦ 《唐令所见均田租庸调的关系》,《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

⑧ 《论敦煌户籍残简》,《东洋学报》16 卷 2 期,1927 年。

⑨ 《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与均田制》,《史学杂志》47～7,1936。

说是土地还受不如说是田土登记①。池田温②、日野开三郎③、西川正夫④ 均持还授否定论。大谷文书的刊布使均田制实施肯定说又占上峰。西嶋定生、西村元佑公布了大谷文书中有关唐西州均田的文书资料，展示了当地官府对民户实行土地还授的实际情况，并根据文书的性质、用途和土地还授的程序，将其分类、定名，认为西州确曾实施均田，并认为它具有普遍意义⑤。宫崎市定不同意此说，认为每丁平均 10 亩的标准不是来自均田而源于屯田法，大谷文书中的欠、退、给田等文书是屯田文书⑥。

池田温的看法是：西州实行的均田制带有很深的地区的自然历史特点，具有许多与唐田令的规定不同的因素。但他也不同意将西州民田视为屯田，认为二者有明确的区别⑦。

以后日本学者的讨论继续深入。杉山佳男则认为四至改写部分是因户内继承之故，不能仅据此即断定均田制已实施⑧。日野开三郎认为敦煌户籍所反映的据资产以定户等，对农户来说全都是根据已受田，户籍上的应受、未受田额完全没有现实性，这说明均田制未施行，所谓已受田实为私有田，只不过以均田令用语来表述

---

① 《唐均田论》，《文化》10～5，1943。

② 《论敦煌发现的大历四年手实残卷》（上，下）《东洋学报》40～2，3，1957。

③ 《大唐租调惑疑》，《东洋史学》9，1954；《关于以玄宗时代为中心所见的唐代北方禾田地域之八九等户》，《社会经济史学》21～5，6，1955。

④ 《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简所见的“自田”》，《史学杂志》64～10，1955。

⑤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唐代吐鲁番实行均田制的意义》，《西域文化研究》之二，1959 年。

⑥ 《论吐鲁番出现的田土文书的性质》，《史林》43～3，1960。

⑦ 《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史学杂志》69 卷 8 期，1900 年。

⑧ 《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均田制实施状况》，《骏台史学》44 号，1978 年。

而已。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一书认为，虽然不能说均田制①在全国统一施行过，但显然至少在局部地区实行过土地还授；从吐鲁番独特的土地还授标准来看，可推测当地实行过土地还授；从吐鲁番独特的土地还授标准来看，可推测当地实行了与均田令的规定不同的形式，因此应看到均田制的实施一般是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铃木俊重申他过去的观点，认为唐均田令中一丁百亩的规定是占地最高限额；敦煌地区土地还授仅是个别情况。但他也承认过去关于均田制几乎未实施的说法是讲过了头②。关尾史郎分析了大谷退、给田文书，仍不主张吐鲁番存在均田制③。

均田制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各地是否相同？学界也存在不同意见。冈崎文夫认为均田制与府兵制关系密切，因而在府兵制实行的中心陕西、河南西部实行④。宫崎市定指出岭南未行均田制⑤。武仙卿认为均田制的实施只限于一部分官地⑥。日野开三郎主张均田制的实施因地不同，在岭南未行⑦。古贺登从租和地额推定认为江淮间租税按户等征收，重点放在地税上，虽同处均田制下，此地区据南朝资产税征税，均田制未彻底实行⑧。陈登原认为均田制只是在新开垦土地实施⑨。铃木俊分析了岭南、江淮制度，认为岭南税米制源于晋户调式，对岭南地区做了特别规定，唐在江南与华北一样努力行均田制，但没有取得充分成就，均田租调思想

---

① 《唐代租庸调研究》Ⅱ《课输篇上》。
② 《均田租庸调制的研究》。
③ 《吐鲁番携来唐代田制文书的理解》，《集刊东洋学》61，1989。
④ 《唐的卫府制和均田租庸调法之我见》，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编《十周年记念史学文学论集》，岩波书店，1935。
⑤ 《论晋武帝户调式》，《东亚经济研究》19～4，1935。
⑥ 《唐代土地问题概况》，《食货》5～4，1937。
⑦ 《大唐租调惑疑》，《东洋史学》9，1954。
⑧ 《唐代均田制的地域性》，《史观》46，1956。
⑨ 《唐代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历史研究》1958～3。

原则是贯彻到全国的，只是因地区而采取了特别措施①。翁俊雄指出，不论京畿狭乡还是两河宽乡，唐初均实行均田制，中原地区宽乡逐步狭乡化，而从敦煌户籍看，各宽乡都有狭乡化的过程②。

3."自田"与四至的改写

户籍中田土四至有"自田"一词，西川正夫加以统计分析，认为天宝6载中，有许多民户在已受田之外还有自田，均田范围之外的自田作为均田制内含的一种矛盾现象，导致均田制解体时性质的变化。西嶋定生否定西川说，认为自田即自至，户籍田籍部分的四至记载不一定能反映实际情况，已受田四至中载有自田时，大部分不表示它属于该户的已受田，而是属于已前退回者，用自田来判定已受田外存在土地，无意义。山本达郎也集中研究了"自田"，他从敦煌发现的天宝6载籍和此前籍帐中选出各户已受田地段记载完整的史料，分析四至记载自田之间的组合关系，认为自田不是均田法之内的土地。接着，他又从另一角度探讨自田，拿地段四至记载该地段所属户主姓名出现在同一史料的其他户的地段四至上的记载加以对照，研究其中有无结合的可能性，指出无论从已受田地段的组合情况或从已受田地段人名看，均应承认存在均田法之外的土地，自田包括已受田内外两种田，意味着与法律性质无关的"自己的土地"的存在③。其后，山本氏继续论述敦煌很多民户在已受田之外还有被承认的土地，指出大足元年、天宝21载手实计帐都足以证明这一点④。杉山佳男同意西嶋说，认为均田制外存在自田与均田政策的意义不符，山本氏自田存在主要依据一户四至记载

---

① 《均田租庸调制度的研究》。

② 《唐初中原地区均田制实行情况初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6。

③ 《敦煌发现籍帐中的自田》，《续篇》，《东方学》53，56，1977，1978。

④ 《敦煌发现大历四年手实中所见地段记载》；《敦煌地方均田制范围以外田土的存在》，《东方学》60，65，1980，1983。

不对应，但如考虑剩退、退田时重新登记四至及不规则形状田地等，四至不对应的实例可减少。

国内学者也对自田性质多有争论。韩国磐指出自田既写在四至中，就不是政府不知道的田地，自田很难说是均田制以外各户私田①。侯绍庄不同意此说，认为自田并不指各段受田彼此间的关系，而是指均田制外归各户所有的私田②。张维训则认为出土文书中的“自田”包括均田土地和私田；籍外田至少有一部分已为官府所认可；“自田”的增多反映了籍外私田的日趋发展③。胡如雷认为不论四至相符否，“自田”均为均田制外的私田；“自田”在每户田籍上出现的至数，虽不能准确反映该户私田多少，但各不同时期“自田”至数增减，可大体反映其私田数量的变化④。杨际平认为私田在各户中世代相传，绝大多数农户均有私田；由于分家析籍，私田又逐步分散，由于逃亡等原因，私田亦可能收归政府，故私田不会过多⑤。杜绍顺指出自田有的在均田制以内的土地，有的是以外的私有土地，它是受田户受田地段四至中的某种写法，有时表示各段受田之间相邻关系，有时也表示受田与本户均田外私田的相邻关系，西魏大统13年侯老人户即已如此，同时还指出，四至中的常田、口分、易田、部田等也不一定确指本户受田⑥。

---

① 《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4，收入《隋唐五代史论集》。

② 《“自田”考释》，《社会科学》（甘肃）1981～2。

③ 《唐代敦煌地区户籍和手实中的“自田”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

④ 《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均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

⑤ 《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4期。

⑥ 《唐代均田地段四至辨析》，《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与自田相关联的是四至的改写问题，对此，山本达郎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均田制末期敦煌地区土地四至记载的考察（一）》① 将开元10年籍草案和大历4年手实进行比较，指出前件文书15个人名在后件出现，且10笔地段没有改写四至，原封不动作为其他户主的土地由后件继承，值得注意。《考察（二）》②探讨户籍四至记载中如何会出现现在户主姓名及在这之前户主人名的问题，指出新旧户主出现在四至中为均田制崩溃过程中并不矛盾的现象，此时国家统治力量达不到基层，改写四至少，同时大量土地落入新的所有者手中，又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写四至。这两篇文章从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大历4年均田制即将崩溃时的户籍制造状况，不仅对理解均田制的瓦解，而且对理解安史乱后的社会变革及由租庸调向两税的转变等均有意义。

四至是何时改写呢？西嶋定生以退田文书中存在四至完全相同的地段为线索，主张四至在退回时重新登载。山本达郎《考察（三）》③指出还授时四至的改写在受田与退田时不一样，四至的改写发生在给田时。杉山佳男则强调承户析户时也重新登记四至。总之对四至的改写顺序推测成份较多，尚乏直接的证据。

4. **常田与部田**

吐鲁番文书记载田土有"常田"、"部田"的区分。宫崎市定据大谷退田、给田文书，指出部田不是土地瘠薄，就是因土地上有某种限制，是次等地，部田中易田多④。西村元佑沿袭宫崎之说，认为常田为优质地，部田为劣等地。马雍指出"倍""部"二字古音相通，可以假借，常田就是常年耕种、不需轮休之田，部田为与常田相对的

① 《东方学会创立25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1972。

② 《东方学》46，1973。

③ 《东方学》48，1974。

④ 《论吐鲁番发现田土文书的性质》，《史林》43～3。

需要轮休之田[①]。杨际平提出新解，认为部田之部即部内之部，其含义为辖区，部田是属于某州某县或某一机构的田地。吐鲁番文书上的部田与屯田关系密切，常田指民田[②]。赵吕甫在杨际平部指部内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部田是乡一级官吏所经管而又分布于各“里”的农田，常田为各“里”里正所管当里的正田[③]，此说推论较多。黄永年认为常、部田标志土地质量或种植作物，常田是质量好的种植谷物的耕地，实际上是文献中所说的良田、美田；部田是质量不好的土地，“簿田”写成“部田”乃因“簿”、“部”通读互用，籍帐等文书所以要写常、部等标志土地质量的名词，是因为编造籍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计算赀财、以定户等第，然后向户主征税，而不是为了受田[④]。孔祥星也从土地质量解释常部田，认为前者一年两熟，后者一年耕一季，有田需要休耕[⑤]。大金富雄(日)观点与之相类，认为西州行给田地目内，常田与旧有的希望能种二种谷物的生产性高的耕地相应，部田是新开发的一年一作的产量低的耕地[⑥]。池田温指出常、部田不仅表示土地性质，而且是所有田土的分类，它大体对应于高昌国之厚、薄田，用常部田表示土地仅限于高昌城下，而外部则残存高昌时代旧称[⑦]。卢向前从水利角度研究常部田，认为新兴谷水系不足以浇灌所有土地，人们遂把土地分为常部两类，对常田，一般保证用水，对部田则按年按片或按年按渠供水，使高昌县部田数处分授、零星分布[⑧]。

---

① 《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文物》1972～12。

② 《试论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1。

③ 《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中国史研究》1984～4。

④ 《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文史》19，1983。

⑤ 《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与部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1986。

⑥ 《唐西州的地目》，《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⑦ 《唐代西州给田制之特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⑧ 《唐初西州土地管理方式》，《唐研究》1，1995。

5. **均田制实施细则**

中外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均田制实施的细则及实行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永兴《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① 将大谷给田文书中县令元宪批语补充为"给欠地丁充"，确定冬季授田主要给欠地丁，依据之一为欠田簿，并考证冬季授田过程为在欠田簿上的欠地丁按照制度规定提出申请，上给县司请地或请射地牒辞，由县司批示，这些牒辞连成请地簿，县司据之授田。欠地丁绝大多数是八九等户。土肥义和《唐代敦煌的居住园宅》②分析了敦煌文书中居住园宅的班给及分布情况，指出园宅应每户都有，有的未记载或未记四至，可能因为居住园宅小于亩，也可能是不与耕地连接而与其他户园宅地一起构成聚落，或在城里等等。他的《唐代敦煌均田制的田土给授文书》③ 通过北图蕙字73号背文书，考察敦煌地区田土给授实施的情况，与西州比较，认为二者有各自不同的给田标准。山本达郎《敦煌地方均田制末期已受田地段间的距离》④ 根据对敦煌县退田簿等按户别记载的复数的已受田间距离大小的检讨，指出官给田的存在及其衰退。土肥义和考察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藏S8387、9487号敦煌县受田簿断片，认为它们是由县将各户给田文书类进一步整理后的文书，受田廿、廿三亩是敦煌县授给均田农民的给田额⑤。池田温《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⑥ 在土肥整理文书基础上，与列宁格勒藏三片敦煌文书

---

① 《中国史研究》1986～1。

② 《国学院杂志》77～3，1976。

③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

④ 《东方学会创立40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

⑤ 《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坂本太郎博士颂寿记念日本史论集》，吉川弘文馆，1983；《关于唐代均田制下敦煌地方的田土还授》，《中国律令制》。

⑥ 《敦煌学辑刊》1986～2。

拼接，认为它是将已受田额在标准之下的小户挑出为准备给田而制作的户别授田亩数簿，文书反映了天宝后期退田给田这种县官对田土的支配只留下一个外壳，暗示了八世纪中叶唐朝对西边统治的衰退，同时也指出西州、敦煌均实行了远隔地给田相应的措施，敦煌吐鲁番田制有共性，应订正将两地田地作为性质相当不同而严加区分的偏差。他还分析了点籍样文书，据其记载的户口检讨已受田额，认为已受田相当普遍地颁给，它是神龙初年吐鲁番盆地给田有效实行的证明，但它并没有证明当年行新给田①。杨际平也比较了受田簿与点籍样，认为各户仅记丁中及"合已受田"，而不记家口及应未受田，可见其编制在于控制丁中，而不在于均田②。宋家钰指出，永业、口分田只在户籍上才严格区分，不是实际土地类别的划分，其目的是便于审核土地继承转让是否合乎法令③。韩国磐根据出土唐籍帐残卷所载各年代的籍帐，强调了唐政府对户籍的积极整理，进而指出户籍土地和租庸调制互为因果，唐前期编造籍帐之勤，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实施均田制的努力④。

利用吐鲁番文书研究西州均田制日渐深入。贞观14年唐灭高昌，9月安苦咖延手实中既已出现了"合应受田八十亩"字样，土肥义和最早对这件手实残片进行分析，认为手实表明了从申报到给田这一均田制实施过程中申报阶段的情况，是唐均田制下的产物，在与高昌现实之间，唐也做了某些必要的妥协⑤。唐长孺据更多文

---

① 《关于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② 《均田制新探》271～3页。

③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永业、口分田的区别及其性质》，《中国史研究》1986～1。

④ 《唐籍帐残卷证明了唐代造籍均田之勤》，《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

⑤ 《关于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咖延手实》，《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

书，不同意土肥合受田80亩符合唐令之说，认为其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中男的年限为10至16岁，也是如此，推测唐置西州后，未推行本朝制度，而暂时沿用麴氏高昌旧制，这也构成了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①。在《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②中，他又补充了西州受田制几乎立刻改从唐制，丁中旧制大概延续了10年或更晚一些的观点。池田温《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见》③对80亩田额及丁中制的看法与唐氏同，并指出受田差异很大，且合受田不包括园宅，"合受田"不是与均田制"应受田"相同的制度，而是当时权宜之计；西州真正实行没官田的给授，在贞观16年正月巡抚高昌诏发布之后，每丁常田4亩、部田2亩为新定的给田标准，其后有增大迹象；这种以常部田相统一的给田，为继承了高昌时代吐鲁番盆地独特的田土分配法，从而否定了西州均田制的普遍性。土肥义和则力图展示均田制实施中有实际的给田标准，他在西嶋定生、西村元佑研究的基础上，按居住园宅、永业田顺序详细探讨，指出西州下下户居住园宅40步，高于下下户者70步，永业田给田标准应从与应受田者关系上看，西州对于丁男中男20亩的标准，最初打算充足其中10亩，然后再充足余额，但这种企图并未实现，他又从各户实际受田额差异的原因，同时也考证了老男、笃疾残疾、寡妻妾的给田基准，并批评铃木俊将百姓田分口分、永业田登在户籍上的说法，没有反映均田法的实情④。韩国磐《再论唐朝西州的田制》⑤ 指出

---

① 《贞观十四年和实中的"合受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1980

②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③ 《史滴》5，1984。

④ 《唐代均田制给田标准考》，《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79。

⑤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从田令规定外，西州仍有丁常田4亩、部田2亩共6亩，应授田5亩及丁常田4亩、部田6亩共10亩三种授田额，其中5亩额为高昌旧制。陈国灿《高昌国的占田制度》① 也从高昌旧制角度解释唐授田额，指出西州官府将高昌国田制现状套唐田令框架，实际上唐西州均田制沿袭了高昌延寿间丁口占田6亩的事实。杨际平强调西州存在两种授田制，他不同意西嶋定生、西村元佑关于欠退给田的分析，认为这些文书属官授田制，其应授田标准、应授田对象、土地还授手续、各乡田土分布等不符合唐田令规定，很难说它们是均田制的土地还授文书②。池田温《唐代西州给田制之特征》承认西州给田制内容与田令不同点很多，但不赞成杨氏的官田授田制说，指出西州田分官、寺观及百姓田诸种，给田诸制有关土地属百姓田，给田与屯田为两种性质土地，欠退田等文书为收授民田所制，因此可称西州田制为均田制。其后池田温又将注意力转向阿斯塔那42号墓发现的西州高昌县授田簿，他论述了文簿出土状况、外形、书式、推补残欠、统计授田簿退田给田地段，地段所在田地种类及四至的记载，并将其与开耀欠田、开元末给田簿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初唐西州实施给田的状况③。卢向前《〈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整理与断代》④ 也分析了该田簿，调整了文书的编次顺序，将文书定为贞观16、17年间。然后《唐初西州土地管理方式》据之考察西州田制，指出授田簿成文前，原农户所有地被重新承认与官府分授土地给无田少田农户这两种方法并行不悖，成文之后，罕见有超过常田4亩、部田6亩的情况。部田授受一分为三，零星分布，此现

---

①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② 《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补正》，《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

③ 《初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考》，《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④ 《学人》9，1996。

象经武周至唐玄宗末，一直存在，文中也探讨了这种现象与唐令、土质、水利的关系。

关于隋均田制，铃木俊从唐田令形成过程的角度解释隋田令①。翁俊雄认为隋不但颁布过新的田令，而且内容比较丰富，并分析了《隋书·食货志》隋田令过于简略的原因、遗漏和隋均田制的执行情况②。赵云旗探讨了隋均田制实施的步骤、范围、宽狭乡的分布和实受田程度等③。

6. **均田制的渊源和性质**

关于均田制产生的渊源，唐长孺认为应从北方民族公社社会封建化的角度来理解④，这一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古贺登指出5世纪因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牛的使用而编成的共同体，是均田制实行的背景⑤。杨际平认为均田制的提出是北魏鲜卑拓跋政权经济，政治政策长期演变的结果，同时又受汉族有关井田传说思想的深刻影响⑥。

韩国磐认为均田是由封建国家将土田授予官吏和农民，这些人从封建国家那里请田或受田，最明白不过的说明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因此均田制是封建土地国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⑦。杨志玖认为均田制只是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国有土地，它并未触动原来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而是以各种名称将土地划分了

---

① 《隋的均田制度》，《和田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1。
② 《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4。
③ 《隋代均田制实施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3。
④ 《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6。
⑤ 《均田法和犁共同体》，《早稻田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7，1972。
⑥ 《均田制新探》。
⑦ 《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5期。

一下，表示其为政府掌握而已，因此其实质仍是私有土地[①]。金宝祥认为均田制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均田土地实为私田，君主权力对它的支配仅在于限制兼并[②]。马持盈(台)认为唐朝均田制并非打破土地私有制而代之以土地平均分配，它是土地私有制度遭受破坏时所施行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③]崔瑞德把均田制看成一种国家控制下的份地制[④]。王永兴指出：封建国家既要给贵族品官多占土地的特权，又要保持自耕农小块土地，于是采用按品级高下可占顷亩不同的私田管理制度——均田制，对私田管理主要表现在限制、检括、收、授[⑤]。宋家钰指出：均田制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所区别，它主要是有关官府和官民等土地占有的法规，均田令包括的民户土地范围基本上是民户占有的全部土地，民户土地很复杂，其土地所有制性质似难一概而论[⑥]。

7. 土地政策及吐蕃归义军时敦煌田制

田令是考察均田制的重要资料，对唐田令的最早整理始于中田薰(日)，他的《唐令和日本令的比较研究》[⑦] 为复原唐令做了开拓性工作。其后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开明堂，1933)复原田令 39 条。铃木俊《均田法和唐令的关系》[⑧] 对田令进行补充并解释其疑

---

①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三联书店，1962 年。

② 《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 年 3 期。

③ 《中国经济史》第四册，315～318 页，台湾商务印务馆，1962 年。

④ 《唐宋的土地占有制和社会制度》，1961 年。

⑤ 《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⑥ 《有关唐朝均田制内容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 年 3 月 20 日。

⑦ 《法制史论集》，1926。

⑧ 《东亚》7～4，1934。

点。菊池英夫《唐令复原研究序说》① 探讨了仁井田升等复原的户令、田令，强调田土与官品身份相应，是唐田令的基本点。王永兴《唐田令研究》②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补遗10条，验证唐田令条文者3条，可资商榷者3条，指出唐田令中包括永业口分田制、贵族官吏受永业田制、职分田制、公廨田制、屯田制、驿封田制、僧尼道士给田制、工商给田制，并探讨了唐田令渊源。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也对部分重复条文的复原，提出了补充和修订意见，并探求了田令内容及包括的土地范围。卢向前《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③统计了敦煌天宝大历年间户籍，认为贞元前，六品以下散官职事官均无受永业田之法令，《新唐书·食货志》"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可能定于两税法实施后而实际上未执行，或为欧阳修之错简。赵云旗论述了隋田令的内容、分期等④。

均田制下田土买卖如何？小口彦太（日）注意到唐买田契发现极少的现象，认为唐灭高昌后推行了均田制度，禁止土地自由买卖⑤。池田温则认为买地契券具有半永久性，不能在短期内废弃，因而唐初古墓中极少发现作为废纸被二次使用的买田契卷，另外土地买卖在户籍上有反映，从大谷三件买田契卷中可以看到，禁止土地买卖表面上还有遵守，但实际上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却没有统一限制，到八世纪开始盛行预付田租的租佃制度，均田制进一步

---

① 《东洋史研究》31～4，1973。

② 《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1981。

③ 《文史》34，1992。

④ 《论隋代均田令诸问题》，《中国史研究》1993～4；《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学术月刊》1993～10。

⑤ 《中国土地所有史序说》，《早稻田大学比较法学》9～1，1974。

崩溃了[1]。山根清志指出唐田令中可以卖永业、口分田，"乐迁就宽乡者，其宗旨不是承认百姓自发迁移和卖掉土地，百姓不能够自由处理个人所有土地"[2]。

武周时期，浮逃户及田土隐漏严重，政府组织了勘田检籍活动。王永兴考释了八件吐鲁番文书，将其定为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文书，考释了"旧主"、"入"等含义，并分析了检括田户的具体情形[3]。陈国灿也考证了这组文书，指出它们基本上展现了武周时期在田与籍关系上的不平衡和问题，而文书中反映的以旧主田为主线，将田籍关系分为四类的四分法是唐均田制下长期检勘田籍工作总结出来的办法[4]。陈氏用更多笔墨探讨了吐鲁番所出敦煌武周圣历年间勘田及长安年间检籍文书，认为这次勘田括户是全国性的活动，其规模之大为初唐以来未曾有过，勘田带来了部分剩田及无主无籍土地的重新分配，但检括户籍成果有限。

玄宗天宝11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是有关唐均田制变化的重要史料，高敏详细分析了这一诏令，指出从勋荫占地、客户及买地处理方法看，此诏已构成对《户婚律》口分永业田有条件买卖典贴的否定，说明天宝11载后，均田制实际上已完全破坏，此诏的发布，为划分唐前后期的时间界限[5]。牟发松《唐玄宗朝土地关系的矛盾及其调整略论》[6]围绕玄宗土地关系的矛盾、政府调整

---

① 《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券的一考察》，《西嶋定生博士还历记念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

② 《唐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中国的都市和农村》。

③ 《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文书考释》，《出土文献续集》。

④ 《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籍簿考释》；《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⑤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试析》，《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3。

⑥ 《武汉大学学报》1992～3。

对策及其效果、影响等，揭示了中唐土地赋税制度发生变革的深层原因，并探寻封建土地关系演变的趋势、规律等。池田温《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一考察》① 研究了北图周字 69 号原定名为“开元田赋”的文书，将其定为开元新格户部残卷，考察了格中职田定租价、岭南禁断置庄、禁卖口分永业田等敕令，将其与太极敕与天宝诏令相比较，认为应重视李林甫为代表的宰相在开元后期坚持实行均田制的努力。

姜伯勤《突地考》② 是研究吐蕃时期敦煌土地制度的重要文字，指出吐蕃在沙州地区也曾进行过地亩清查或登记，并适应汉人地区情况将一“dor”(突)换算为唐 10 亩，突地就是以“突”(10 亩)为单位的注籍土地，包括耕地、突地等，突地的注籍与征税有关，同时也考证了突田、突税、突课等。杨际平认为吐蕃在敦煌一带实行带有土地国有性质的计口授田，按各户家口异动情况重新分配土地，以后这些田土都变成私产③。杨铭也指出计口授田制是吐蕃在敦煌原有土地占有基础上施行的一种土地调整制度，由于家族寺院官吏兼并土地，此制施行范围、延续时间有限。吐蕃对原土地关系的调整十分有限④。冷鹏飞运用敦煌文书，证明归义军张氏政权初期曾进行过户口和田地重新登记，并对农户土地进行新的调整⑤。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⑥列举了寺户成为百姓者、欠田者及逃户归还者因请地而受田之例，分析了归义军时期请地制的

---

① 《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1995。

② 《敦煌学辑刊》1984～1。

③ 《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社会科学》(甘肃)1983～2；《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④ 《吐蕃在敦煌计口授田的几个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3～5。

⑤ 《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1。

⑥ 《敦煌学辑刊》1985～2。

实态。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①] 辨别了成为请射对象的田地、绝户地、必负担公课的田地和官荒地等，认为应重视官荒地请射制度。池田温《敦煌土地税役制》[②] 是对吐蕃及归义军时代土地税役的总结之作。

（二）庄园制

唐代的庄园仅仅是个名称还是有实质性内容？陶希圣、鞠清远认为它仅仅是一分一处的田地或者一些地段[③]。韩国磐不同意此说，指出唐代虽有不少很简单的小庄，但也存在不少规模很大或较大的具有一定设备内容的庄园[④]。加藤繁（日）论述了包括庄院、田园、客坊三部分的唐宋庄园的完全形式[⑤]。周藤吉之认为唐宋庄园除那种以山水为界的一元化的大耕地外，也有的是由几块分散地段构成的，庄园一般组成聚落或村落[⑥]。这代表了日本东京学派的看法。京都学派则认为唐宋之际大面积的庄园几乎不可能形成，这时期的庄园不过是对分散在各处的零细土地的一个观念上的称呼。唐代庄园制下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韩国磐指出：庄园内部直接生产者对土地有完全的使用权并发展到带有占有的性质[⑦]。大泽正昭指出：在庄园经营内部出现了庄客从庄园主的隶属中独立出来的倾向[⑧]。庄园的综合研究方面，日野开三郎《唐代先进地区的庄园》（汲古书院，1986 年）一书详论了庄园的设置地区、

---

① 《敦煌学辑刊》1988～1，2。

②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

③ 《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 年。

④ 《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下。

⑤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 年。

⑥ 《唐宋五代的庄园制》，《东洋文化》12 号，1953 年。

⑦ 《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

⑧ 《唐代华北的主要谷物生产与经营》，《史林》64 卷 2 期，1981 年。

资产、人员构成、税役负担、收支经营、劳务关系、土著庄主和非土著庄主之不同及其历史意义等问题。

(三)屯田和营田

郑学檬认为隋唐屯田在持续时间和规模上都超过前代;屯田不论是军事性质或非军事性质都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营田与屯田的目的都在于解决军粮供应和安置流民,一般所说的营田可认为就是屯田,但唐中叶以后营田的私有性加强,表现在其管理制度、经营方式和生产者的地位都有别于屯田①。乌廷玉对郑学檬关于屯田中央专门机构管理、营田由节度使兼领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除河朔三镇外,各地营田均由户部设置的营田务管理②。黄正建论述了唐前期屯田的分布、规模、管理机构、经营方式和作用,他也认为屯、营田在唐代,特别是前期,指的是同一件事。他还论述了唐后期屯田制度的变化,指出这时期屯田在内地旋兴旋废,大多设在战区附近或运输线上,在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减少军费开支方面起了一定作用③。崔瑞德研究了唐代屯田、营田、军田④。

学界关于屯田上的劳动者及经营方式论述较多。青山定雄《唐代的屯田和营田》⑤研究了屯田经营方式的变迁,指出屯田由兵士耕种,均田制时代驱使人民义务耕种的现象很普遍,安史乱后出现了雇佣农民耕种。日野开三郎指出屯营田在开元25年左右由直接

---

① 《试论隋唐的屯田和营田》,《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3期。

② 《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64年2期。

③ 《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杂志》1985年3期;《唐代后期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4期。

④ 《唐代的官田》,《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2～2,3,1959。

⑤ 《史学杂志》63～1,1954。

经营转为租佃经营[①]。王永兴《唐田令研究》列举唐前期屯田经营方式有军卒营种、租佃、屯丁、户奴及丁夫 4 种；后期有军卒、和雇、租佃及营田务等，推测河西支度营田使给粮文书反映的是徙边罪人充营田户。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②]也分析了这件文书，揭示了它所反映的河西营田由镇戍兵屯田转变为用僦募方式招农民强户营田这一历史转折。杨际平对文书也提出新解，认为它可能是 9 世纪初即吐鲁番占领敦煌 20 年后一般平民户贷粮清册，同时也研究了沙州"营田"的实际状况[③]。陈国灿根据吐鲁番文书指出，西州三大屯官有官营，采用"输丁助屯"的方式直接指挥运营，与官有民佃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④]。

（四）职田及其它

谷川道雄《唐代的职田及其克服》[⑤]从不断动摇的职田制及与官僚制矛盾关系的角度探索职田，也论及职田租佃，认为均田农民耕种职田，采取交纳一定收成形式来进行，具有一般徭役劳动的性质，佃耕职田见于宋朝以后。李文澜认为两晋南北朝的禄田、北魏的职公田、隋代职分田是唐职田渊源，职田不是均田制的组成部分，但与唐赖以强盛的均田制相适应，唐后期原有职田被兼并后，职田并未因之而消亡，唐前期京官职田两度置废，贞观 11 年职田官收[⑥]。这与大崎正次《唐代京官职田考》[⑦] 关于京官职田废置的

---

① 《租粟与军粮》，《东洋史学》5，1962；《天宝以前唐的军粮》，《东洋史研究》21～1，1962。

②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1983。

③ 《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2。

④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91～109 页。

⑤ 《东洋史研究》12～5，1952。

⑥ 《唐代职田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国古代史论丛》3，1982。

⑦ 《史潮》12～3，4，1943。

意见不同。李锦绣认为唐代职田存在于以本品计禄的大背景下，有不同于前代禄田的特色，史籍所记贞观10至18年废置职田，贞观为开元之误。唐前期官收职田只有开元10至18年一次，她还论及了唐前期阙官职田的管理制度[①]。翁俊雄论述了职田渊源、设置变动、分布数量、地租及瓦解等，认为职田与官人永业田相较，比较落实，因此地位重要[②]。齐陈骏[③]、陈国灿[④] 也分析了出土文书中的职田资料，前者考察了职田土地不足、分布零散及耕作、收获物分配、租额等；后者整理拼接了阿斯塔那出土及藏于日本、英国的22件有关天山县主簿高元桢职田案卷，认为高元桢以职田名义侵夺还公田、逃户田、死绝田，反映了武周时期严密法令下的土地兼并情况。

公廨田、宴设田、驿田、长行坊田、馆田等也是官田的组成部分，其设置、作用及收入等，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中有较详细论述[⑤]。小西高弘总结研究了唐前期职田、公廨田[⑥]。鹿野亮(日)也探讨了公廨田的设置、用途等[⑦]。陈仲安、王素研究了汉唐间公廨田的形成及演变，指出公廨田和职田均为取代公廨钱而置[⑧]。孙晓林论述了馆田[⑨]。程喜霖探讨了唐代屯田之外的烽铺斸

---

①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818～829页。

② 《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北京师院学报》1990～4。

③ 《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中国史研究》1986～1。

④ 《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元桢职田案卷的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⑤ 该书693～715页。

⑥ 《唐前期的公田》，《福冈大学研究所报》28。

⑦ 《隋唐时代的公廨田、公廨钱及其用途的考察》，《早稻田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4。

⑧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376～84页，中华书局，1993。

⑨ 《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田[1]。

（五）租佃制

西嶋定生整理大谷文书时注意到租佃土地与自耕地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指出高昌县已受田所在地分散而不能直接耕种，产生了租佃关系，它不同于唐末以后佃户关系，地主往往是租佃人，限制了两者身份上的隶属关系。周藤吉之通过对佃人文书上乡名的分析，指出西嶋氏地远无法耕种说有疑点，认为租佃发达因为受田少、生活困难的缘故。西州官田比例大，百姓依靠租佃官田来补救生活穷困[2]。仁井田升将租佃文书分为两类，一类规定借贷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二类只是严厉追究借方违犯义务的责任，前者体现了均田农民彼此利用对方土地的循环关系[3]。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4]中他又指出，唐代土地租借契约里没有发现后世那种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人身统治关系。孙达人对仁井田升的分类提出补充，认为一种为租佃人预付租价者，田主为穷人，租佃人是财力雄厚的地主，另一种为租佃人在收成后向田主纳租价，租佃人为贫民，田主是地主[5]。奴隶是否可以独立租佃？周藤吉之据佃人文书中的奴聚集等，认为他们是奴隶身份的佃人[6]。宫崎市定[7]认为奴聚集、奴典保是姓奴者，奴隶可能性小。周藤吉之在《补考》中坚持认为奴聚集为奴仆，并指出唐没有得到土地的奴隶也依

---

①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铺制度之三》，《武汉大学学报》1985～6。

② 《佃人文书研究补考》，《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

③ 《吐鲁番发现的唐代租佃文书的二种形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3，1961。

④ 《西域文化研究》3。

⑤ 《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6。

⑥ 《论在吐鲁番发现的田土文书的性质》，《史林》43～3。

⑦ 《龙谷大学所藏西域文书和唐代的均田制》，《史林》45～5，1962。

靠独立地租种官田或百姓田为生，这种佃人就是佃奴。韩国磐研究了敦煌吐鲁番租佃文书后认为，唐代这两个地方除无地农民租种官私土地外，还有贫苦农民因种种原因而出租土地，亦即典租的。在前一种情况中，官田出租者比私田多①。沙知不同意此说，他对大多数佃人文书进行了分类统计，认为私田出租远多于官田出租，他反对把二者都视为一般地主，认为私田出租大抵是自耕小农，与官田出租性质不同②。

随着吐鲁番文书整理刊布，租佃制的研究又掀起了第二个高潮。吴震《近年出土高昌租佃契约研究》③将吐鲁番租佃契约分为：一，地主贷付土地以收纳谷物；二，佃人向地主提供货币谷物获得土地使用权；三，田地的质、贷借，并探讨了其中的剥削关系。孔祥星也认为唐前期西州土地租佃契约的立契双方主要是小土地占有者，其目的是以交错出租土地的方式达到更好地进行生产④。堀敏一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论述了田主和租佃人之间，以及从租佃到典地之中产生的各种变化，否定了把它作为反映阶级对立的说法⑤。伊藤正彦（日）认为吐鲁番的田主是脱离农耕的农民，他们为了从事商业活动，使借贷关系长期化，田主因而丧失了耕作权和所有权，因此并不过渡到后代的地主佃户关系⑥。葛金芳认为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和部曲庄园经济是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

---

① 《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 年 4 期。
② 《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 1 期。
③ 《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④ 《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 年 4 期。
⑤ 《唐代田土的租赁契约同抵押、典当的关系》，《东洋史研究》39 卷 3 期，1980 年
⑥ 《七、八世纪吐鲁番的田主和佃人的关系》，《中岛论集》（上），1980 年。

具体表现，而这一变革乃是由建中两税法发其端①。唐耕耦探讨了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及地租的形式、数量等②。韩国磐从吐鲁番盆地的自然历史条件、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及兵役负担重、丁壮不足等方面探讨了租佃的流行③。杨际平集中分析了吐鲁番官田、寺观田、百姓田的货币地租、实物地租形态，认为租价有预付后付的差异，同时也修正了西州给田的分散导致租佃制之说④。池田温的系列文章《中国古代的租佃契(上)、(中)、(下)》⑤ 为集大成之作，(上)汇集22件租佃契，探讨了文书内容，概括为地主型、麦主钱主型及舍佃型三类，指出到7世纪末地主型为主，8世纪麦主钱主型集中。(中)补充了吐鲁番契，指出吐鲁番盆地租佃非常普及，并探讨了均田制时代田地的抵当、典地、租佃及均田制的影响、界限等。(下)又增加了86件租佃契，并全面论述了租佃契约诸项条件(如契名、立契年月、当事人、土地、租价、契约种类特点、附加条件及契约类型等)，同时比较了敦煌吐鲁番租佃制的差异。

综括言之，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成果显著，各领域均有总结性论著出现，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近年来，随着对史料整理的不断深入及电脑的应用，历史研究方法日趋科学化，学人多就某一领域进行数十年长时间的研究，象以前吸引大多数研究者投入的类似均田制、租庸调、两税法等的讨论已十分少见了。如何在科学化的手段上提高史识，如何在各自为战的局面中再次提出经济史领域

---

① 《中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3期。

② 《关于唐代租佃制的若干问题》，《历史论丛》5，1985。

③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夏田券契来谈高昌租佃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④ 《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同上。

⑤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60，65，117，1973，1975，1992。

的焦点问题，如何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几近完全、石刻资料不断丰富的时机，在经济史领域继续开拓新领域，并在旧有的研究成果上更上一层，当是今后研究中的主要课题。

第四章　社会生活

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阶段。它一方面继承汉末以来南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当时世界其他文明的丰富营养，从而为这时期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隋唐五代的断代史著作中，注重社会等级身份及社会生活内容的，首推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新版)。王寿南的《隋唐史》于第十七章"社会与宗教"也有相当篇幅，概述了隋唐时代的户口、社会风气、生活习惯、风俗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许多社会史专史性著作，也毫无例外地包括隋唐五代的断代史内容，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1 年)，陈东厚《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 年)，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9 年)，陶希圣《中国社会史》(文风书局，1944 年)，董家遵《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等。

就研究论文的情况而论，以对社会等级身份的研究最为充分。大体说来五十年代以前它是社会经济史的一部分，五十年代以后，它是阶级关系或阶级分析的一部分。人口问题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前总是与赋役及户口统计联系在一起，近十年来，才逐渐成为一个

社会史的课题。

一、社会结构与等级身份

（一）社会结构总论

总论隋唐五代社会结构的著作，主要有黄现璠的《唐代社会概略》① 一书和韩国磐的《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② 一文。黄书首列“阶级”一章，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诸阶级，反映了三十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文则是从阶级划分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认为皇室、贵族、士族、各级官僚、宦官、藩镇、以及庶族地主、地方恶霸等，构成了地主阶级。其中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士族、庶族地主构成了地主阶级的三大等级。持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包括均田户）、依附于官府和私家的杂户、官户、庄客、客户、屯兵和佃民、部曲和客女，以及佣工等，则系农民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官私奴婢身份极低，虽然有别于奴隶社会的奴隶，实质上还是奴隶制的残余。豪商富贾勾结官僚贵族，仍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小贩和个体农民差不多。还有一些官私工匠，如师父、徒弟、巧儿、匠人等，师父兼为店东，当为剥削者，余为被剥削者。至于乐户、太常音声人等，则专为官府所奴役。僧道中也区分为僧侣地主和劳动僧众。

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③第四卷上册第一章，有一节专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及唐代等级制度的再编制，不仅提出了对其时社会等级结构的看法，而且探讨了

---

① 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

② 《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

③ 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其间的变化，也是值得一读的。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①论唐末的阶级阶层关系，包括大地主、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骄兵等，作者分析了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有助于我们对唐末社会结构的了解。吕思勉、杨志玖、岑仲勉、韩国磐、吴枫等在其断代史著作中对此问题也都有论述。

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社会史研究力作。这部约70万字的大书，有20万字的长篇绪言，纵论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其对秦至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宗族和家族、社会组织都有十分精到的论述。其上编由傅玫执笔的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剖析唐代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补充了以往这方面系统论述之不足，其下编三章分别论述"秦以后封建王朝的皇族"、"科举制下士的社会结构和组织"、"隋唐至明清间士兵的构成与社会地位"，其间涉及隋唐五代的社会阶层与等级的探讨，颇有新意。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专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在研究其它问题时涉及到的。具体情况有以下几种：一是在研究农民战争时，涉及到人们社会身分的变化问题，如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等。二是研究各种贱民等级的时候，涉及到其身分的变动，如奴婢放良等。三是研究学校科举、门荫制度时，涉及到人们地位升降问题。如黄富三《科举制度与唐代的社会流动》②、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③、侯力《从士庶分野到士庶合流》④等。四是研究各阶级内部状态社会变迁时，涉及到社会流动问题，如汪征鲁《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内部更新》、葛金芳《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⑤。

---

① 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东方杂志》复刊20卷2期。
③ 《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④ 《湘潭师专学报》1984年2期。
⑤ 均见《历史研究》1983年1期。

张泽咸的新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总结性地全面讨论了唐代社会阶级及各种等级身份。

(二)各种等级身份的研究

1. 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其经济关系,更涉及到其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是隋唐社会结构研究中论述最多分歧也最大的一个问题。讨论的首要内容是士族的内涵与范围。看法大致有五种:

(1)唐代的士族主要是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山东士族指魏晋以后,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定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姓氏等级以后的山东士族,即《新唐书》卷99中柳芳所说的山东郡姓①。

(2)构成唐代士族主体的有两个部分:一是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渤海高氏等北朝高门;一是关中郡姓士族和少数民族显贵所组成的代北"虏姓"②。

(3)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残余③。

(4)唐代士族既是魏晋以来南北各地区士族的延续和遗存,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成分④。

(5)唐代士族的内涵与魏晋南北朝大不相同,它可以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也可以是出身寒贱的兵卒,还可以是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而不再是拥有世袭做官特权,讲究经学、门风礼法的旧门阀。

---

① 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田廷柱《关于唐代门阀士消长问题的考察》,同上书。

③ 闫守诚、赵和平整理《唐代士族庶族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1期。

④ 闫守诚、赵和平整理《唐代士族庶族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1期。

唐代士族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现实政治状况决定的。随着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地权力再分配，社会地位也就相应地发生新的排列组合。士族队伍也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连少数民族首领都包括了进去①。

关于唐代士族的特点，学者们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

(1)唐代士族是世官世禄的身分性地主；士庶不通婚的状况较前有所松弛，然界限仍然很严；士族标榜名教礼法，重儒家经典，反对科举；经济上拥有大量劳动人手和土地②。

(2)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已经不是具有特权的身分性地主。他们在入仕途径上与庶族一样，主要依靠科举考试而不是依靠门第；在婚姻关系方面打破了身分内婚制的束缚；在经济上丧失了荫客的特权；在政治上已无重大的影响力③。

(3)唐代士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不再享有特权，科举制的兴盛为山东旧士族，以及整个唐代士族开辟了一条入仕、猎取官位的新途径。在这方面，士庶已经没有社会等级的显著差别。但他们还保持着身分内婚制的传统，以为维护士族势力社会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④。

对唐代士族政治势力的总体估价，李斌城曾将诸家看法概括

---

① 邓文宽《唐代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 乌廷玉《唐代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④ 李光霁《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为九种，即：衰落论、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论、不存在论、确实存在论、不能低估唐代士族政治及经济势力论、一定影响论、很大势力论、唐中后期士族活跃论、士族政权论①。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们对士族的衰落及其消亡过程看法也有所不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汪篯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到了唐初，关东的大族豪强地主已经没落了，至于关中的部曲佃客制，约在武则天统治时也完全衰落了②。张泽咸则认为，唐武宗时期出现的衣冠户已取代了过去的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这标志着魏晋以后几百年来的士族门第至此业已无可挽回地垮台了③。瞿林东认为，经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士族势力有所衰落，唐太宗修《氏族志》开了士庶合流的滥觞。高宗武则天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大批庶族进入士流，进一步促进了士庶合流。经过唐初近百年的变化，士庶斗争日趋缓和，界限日益缩小④。何灿浩认为唐士族外虽荣而内实虚，它的某些发展、复兴是回光返照，最终消亡于唐末。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门阀制已衰亡；同元明清相较，则士族仍存而未泯，体现了它的过渡性质⑤。林立平则将唐代士族的衰亡过程划分为四个段落：从隋末农民战争到武则天统治时期为第一阶段；武周时期到天宝末年为第二阶段；安史之乱至黄巢起义为第三阶段；唐末五代之际为第四阶段。他认为在这四个阶段中，士族地主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各不相同，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其中安史之乱前后士族势力的变化

---

①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3 辑。

④ 《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 1 期。

⑤ 《关于唐代士族问题的管见》，《宁波师院学报》1987 年 1 期。

是比较显著的[1]。韩国磐认为统治者修定《氏族志》和《姓氏录》，旨在抑制旧士族，"崇重今朝冠冕"，稳定发展唐朝所定的新士族势力，但《氏族志》、《姓氏录》扩大了士族阶层，进入士族阶层的人越多，造成士族的地位日趋平凡，此后科举制的兴起，衣冠户的出现，士庶通婚、合谱，军阀的残杀，农民起义的打击，造成大族地位日益低落乃至最终消亡[2]。

关于庶族问题，在论述士族的文章中多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此外，唐代后期有所谓衣冠户、形势户与寄庄户，这是不同于士族与庶族的地主阶级新户别。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有韩国磐《科举制与衣冠户》[3]、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4]、《唐代的寄庄户》[5]等。韩文认为衣冠户是唐高宗武后以来，特别是玄宗以后，在进士科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以进士科出身为主的士人所形成的户等。他们享有不出差科的特权，是宋代官户的前身。张文认为，与衣冠户出现的同时或稍早出现了形势户，包括诸色杂有职掌的吏职和各地有权势的有力人户，他们本身虽然没有免除差役的特权，但实际并不出差科，是宋代形势户的前身，关于寄庄户，张泽咸指出，一些地主官僚在外地购置田产，称为寄庄，他们自己便成为寄庄户，借以逃避税役负担，这种情况自初唐迄于唐末一直存在。

近几年一些学者还把士庶问题与衣冠户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张泽咸在《"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说，唐代旧门阀士族处于衰颓中，但也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至于唐后

---

① 《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几件敦煌谱书的启示》，《北京师大学报》1987 年 1 期。

② 《关于汉唐时士庶的几个问题》，《隋唐史论集》，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香港大学研究中心 1994。

③ 《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④ 《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 3 期。

⑤ 《文史》第五辑，1978 年。

期旧士族还有一定的实力，应从衣冠户的登场这一角度加以解释①。韩国磐在前引文之第三节“唐后期的衣冠户”中，除进一步对唐代衣冠户“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的含义进行考释外，还指出由于进士出身华贵而进士及第又是成为衣冠户的必备条件，吸引着士、庶的竞逐，衣冠户因而成为士庶混杂的熔炉。

此外关于这一领域的论文还有：高光晶《关于武则天“打击士族”的性质问题》认为武周集团是唐前期士族家庭出身的官僚集团，武则天“打击士族”的观点不能成立②。李晓路《唐代“孤寒”释》指出唐代所谓“孤寒”主要应是指祖上有过显赫门第或历任清要官职而家道中衰的士族子弟，李德裕一方面重视提拔公卿子弟，另一方面又为“寒进”开路，初看矛盾，实则统一③。

3. 自耕农与客户

隋唐五代时期的农民问题，三十年代的一些学者在唐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曾有所涉及，五六十年代的农民战争讨论中也论及农民阶级的状况、地位问题。但专门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等级或职业类别来讨论的文章至今仍是十分罕见的。

胡如雷在《唐末农民战争》一书中把农民分为自耕农与佃农。他认为，唐前期实行均田制，完全以私有土地为基础的自耕农很少，大多数是当时受田农民。中唐以后均田制破坏，自耕农就先后纷纷破产了，流民集团的主要成员是自耕农。关于均田制破坏后的自耕农，胡如雷认为，两税法并没有使自耕农地位有任何改善，他们不仅因拥有土地和户等比佃农高而承受两税负担，而且往往成为产去税存的替罪羊，在唐末农民战争以前，自耕农已经寥若晨星了。

---

①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三秦出版社。

② 《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9年1期。

关于唐代自耕农的性质，国内外学者存在很大分歧，并由此导致对唐代社会性质认识的差异。宋家钰《关于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与唐代自耕农的性质》指出唐代自耕农既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村社农民，也不是总体奴隶制或国家奴隶制下的奴隶，也不是国家佃农。他们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在人身上依附国家，但却具有独立的小经济和受法律维护的良人身分，不同于贱民。作者认为唐代自耕农的社会性质应依据国家的性质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确定。掌握唐代国家政权的是剥削佃雇农的贵族、官僚和地主，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尽管自耕农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经济上却受封建经济规律的支配，在政治上受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这些自耕农的小生产只能是封建性的，并构成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不能把他们看做是前封建经济成分的残余或地主经济的附庸①。

关于唐代自耕农所受剥削问题，李文澜《论唐代职田经营及官吏对自耕农的地租剥削》认为唐代职田采取租佃制的剥削方式，职田上的劳动者主要是被抑配的自耕农，这表明封建社会的自耕农并没有免去地租剥削，在唐代至少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受着职田一类地租的剥削。从唐代的职田经营中，可以看到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及其剥削方式（租佃制）支配制约着其他土地形式。而唐代自耕农被抑配佃种职田以及官田等，正是宋代以后大土地所有制长足发展，自耕农大量佃农化的先声②。

对于这一时期客户的讨论也是五十年代以来才逐渐受到重视的，而且史学界的意见很不一致。金宝祥认为唐代的客户是佃食客户，中唐以后既是依托豪强以为私属的客户，也是法定的两税承担

①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年。
② 《江汉论坛》1988年7月。

者[1]。张泽咸《唐代的客户》、《再论唐代的客户》[2]认为唐代客户除农民外还有很多非客籍人户，如地主官僚寄庄户及小商贩和无业游民。唐五代三百年间客户含义变化甚大，最初指客籍户，不是佃户，至武周以后才有不少破产浮逃客户沦为佃客，和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佃农逐渐合流，但唐末五代仍有不少客户并非佃农。唐长孺《唐代的客户》[3] 则把客户主要限定在"客籍户"的范围内，他认为1. 唐代前期逃户现象严重，统治者采取括客等措施，力图使逃户复归于编户，使承担国家赋役；2. 唐代客户虽不在居住地正式户籍上登记，但地方官另有"保簿"，基本上掌握了客户的户口等情况；3. 实行两税法后，附籍客户被称为新附客户，(若无资产，即属不支济户，照例免除两税)他们在帐籍上是不固定的，在下一次造籍帐时即应转入旧户。唐代客户不论附籍与否，基本上都是无资即无地户，大多在地主土地当佃家、庸耕；4. 两税法施行后，他们又成为地主庄园上的直接劳动者。关于两税法后土、客户的区别，唐长孺认为客户中虽然绝大多数为无资户，但由于新附客固定，他们在下一次造籍帐时入旧户，即成为土户，如此则无资产就不限于客户，所以土客之分仍是外来与土著的区别而不是有资与无资或承担两税与否之别。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4] 则有不同的理解，认为长庆元年两税法的原则由"税资产"改为"税土地"，这样就把浮寄客户从正式户籍上切下，改变了有唐以来土客户的含义。土、客本来对称，客户由浮寄变成"无地之户"，相应地，土户(地著之户)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此后，唐人将"主客"对称，主户的含义也就由"土著"改为有土地之户了。

---

① 《论唐代的两税法》、《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分别见《甘肃师大学报》1962 年 3 期，1978 年 3 期。

② 《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古史论丛》第三辑 1982 年。

③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

④ 《历史研究》1994 年 3 期。

3. **商人及工商业劳动者**

关于唐代的工商业者，本世纪前半叶人们在研究唐代商业与手工业制度时就曾论及，如日本的加藤繁，中国的傅安华、陶希圣就有论文（译文）在《食货》等杂志上发表。五十年代李文海《唐代的商业与商品》（《历史教学》1956 年 4 期）、施玉红《唐代的商业与商业资本》（《厦门大学学报》1957 年 3 期）也都是在讨论商业问题时涉及商人问题。集中讨论商人的论文大多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现。1980 年，郑学檬发表《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一文（《厦门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对唐代商人和商帮进行了分析，认为商人由于其行为不同，形成许多商帮，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盐商、茶商、米商、木材商、珠宝商、对外贸易商、丝织品商、金融商、南北杂货商。

郑学檬对唐代商人问题的研究在当时起到开拓作用，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唐代商人的地位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张剑光、邹国慰《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上海师大学报》1989 年 2 期）认为，唐中期以后商人地位提高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划分开始松动，扶商政策出现，民间对商人态度转变，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或出钱买官，在日常生活方面与庶民平等。张邻《论唐代中期以后商贾势力的膨胀》（《学术月刊》1985 年 1 期）、薛平拴《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人文杂志》1991 年 6 期）、王灵善《论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山西大学学报》1992 年 4 期）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商人地位提高的问题。另外，一些学者认识到唐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 年 1 期）认为唐中叶后商人热衷政治正说明他们对政治的依附性，表明商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进并没有超越

封建时代，只不过是封建时代商人社会地位由前期向后期的转折。理绥《试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也指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轻商思想在社会上仍居于主要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商人与当时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关系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张邻《唐代封建政府对商贾的政策及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1辑)、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6期)、王林善《论唐后期的官商合流》(《晋阳学刊》1989年3期)都对唐代商人势力与封建官府的关系进行探讨。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与割据势力的关系》则强调商人与唐五代军阀势力的密切关系，有的还直接参加割据政权①。唐刚卯《唐代的纳课户》则对唐代长安与禁军有密切关系的纳课户进行探讨，指出纳课户的主要成份是唐代长安的商贾等坊市百姓，为唐代禁军或中央政权机构的影庇人户，而主要集中于禁军。他们在唐中叶后尤其是奉天之难中显示出已成为一股特殊的势力②。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唐代商人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研究唐代商人的日常经营活动，如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4期)、薛平拴《论唐代商人经营内容的特点》(《唐史论丛》第六辑)等，这样就有助于改变以往过分集中于研究唐代商人身份地位的状况，进而深入到唐代商人的社会领域。

牙人是沟通商品交换双方的中介人。张弓《唐五代时期的牙人》分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互市牙郎；(2)京市牙人；(3)马牙、女侩、庄宅牙人；(4)商人兼牙；(5)牙行、官牙人。文章说，唐初交易中介人情况不详。玄宗时北部边地出现了名为"互市牙郎"的交易

---

① 《学术月刊》1984年5期。

②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91年)》，三秦出版社

人。德宗以后京市牙人的活动增多。唐末五代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出现了马牙、女侩、庄宅牙人等专业牙人。其活动范围也从两京诸市跨进民间，商人与牙人互兼的现象更为明显。官牙人和牙行始见于后周广顺二年。牙行是牙人的同业组织，官府加强了对牙行的控制，官牙人就是官方颁发牙帖认可的牙人[1]。

关于隋唐时期工商业中劳动者的身分，唐长孺在《魏晋至隋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中做了研究，他指出到了唐代，过去手工工匠所特有的“百工”、“伎作”等表示卑微身分的名称已不存在，常常丁匠联称，手工工匠的地位与均田农民相同。唐初工匠的番役制、职业固定及世袭制、征发制都是沿袭过去，并出现了种种新的制度，即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一般是非巧手工匠在不须使用时可纳资，后来巧手工匠亦可纳资代役。和雇在唐代普遍化了。长上匠经常在职，有固定报酬，他们可能是短番留用者。明资匠则完全出于雇佣，可能是短期雇佣。那些巧儿、绫匠当属于这种工匠。长上、明资匠都有定额，人数不会太多。最多的是短工和雇。他们大多是农民或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2]。

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变化》侧重于对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唐代官府工匠身份较一般农民及私工匠为低下，其职业固定，政府对其严格控制，所受剥削也较为沉重，但在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封建商品经济的繁盛，导致官府工匠的身份有了显著提高，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官私工匠、农民与工匠之间身份的差别只保留在形式上，在实际生活中已失去意义[3]。冻国栋《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

---

①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
② 《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究，探讨唐代前期工匠的征发形式和配役办法，指出唐代前期民间私营手工业工匠和当时的官府工匠一样受到封建官府的强制征发，这种征发适用于手工业者本人及其有劳动能力的家属；工匠以州县为团，征发工匠由官府直接下帖于团头，团头则督率其团内匠人应时入作。从文书的匠人名籍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州工匠中有大量汉人，也有部分昭武九姓胡。工匠上役不一定从事本行劳作，而是根据官府需要随时支派去服各色杂役，这种"匠役"使广大手工业者处于困苦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此外，作者还对文书《名籍》中画匠、杀猪匠、笮匠、连甲匠、吐蕡匠、韦匠、景匠等名目进行了考释①。

唐代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有所增长，一些文章论述到城市市民问题。杨德泉《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指出市民等级并没有一个单纯统一的阶层，简略地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富商大贾、大企业主、高利贷者，拥有经济实力并参加封建政权。中层包括握有一定资本的工商业主和居于城市中的小商品生产者。他们大体可分为贩运商人、城市坐商、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贩三类。下层包括佣工自资的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雇佣劳动者及各式各样的流氓无赖。文章还对唐代市民等级的特点及其上层与封建政权的密切结合等作了分析②。

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认为唐代城市居民构成包括诸色官吏、地主、军人、知识界、宗教徒、贫民、浮客、艺人、妓女及工商业者等。关于唐代市民中工商业者的实际处境，张泽咸指出虽然唐朝存在不少工商低贱的令条，但工商业者可按田令授田并且田令允许人们出卖永业田、口分田，有刺激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工商业者只要依法纳税，就可受到法令的保护。唐代中叶，还正式出现了

①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扬州师院学报》1959年3期。

"坊郭户"的名称，它与乡村户对称，表明全国城乡已有了法定的明确区分。五代时期，草市居民也被列入坊郭户，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坊郭户的登场，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①。

4. **部曲、杂户、官户和奴婢**

关于隋唐五代的部曲，主要是唐代的部曲，也是较受注目的一个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较为早期的一种意见认为部曲与佃客都是典型的农奴。如韩国磐认为，隋唐五代的部曲主要是家仆，安史之乱后，武人多拥兵自重，差不多成为私人武装，故亦称部曲。作为家仆的部曲，是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农奴，人身很不自由，非经放免，世代相承仍为部曲客女，不是良人。其身分地位比奴婢高些，但低于客户。他们或由前代相承而来，或由奴婢放免，或被掠卖抑勒而来②。

南炳文、汤纲《南北朝以后部曲的含义和身份》③认为，北周武帝关于兵制改革的诏书，标志着部曲含义缩小到专指私兵，其法律地位也降低了。此后一直到唐朝前期，一般官僚军阀地主专门从事生产或杂使的部曲在法律和实际上都处于农奴地位。其时部曲来源由招募变为放奴。开元天宝以后，部曲统指一般部队，其实际身分也逐渐提高。

张泽咸在前引《"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之第二部分"唐代部曲与佃农"中则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指出唐代的部曲几乎不和农业生产发生具体的联系，而唐代的佃客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田客，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不是贱口，权利和义务在名义上与庶民地主是一致的，因此不能把唐代的部曲、佃客称为农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2期。
② 《隋唐五代史论集》73页。
③ 《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4、5合期。

奴。

张泽咸《唐代的部曲》① 引证文献资料和晚近出土唐代文书，说明唐律中有关部曲、客女的记载不仅仅是简单总结了周隋以来的律条，也适应了唐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作者认为中唐以后部曲在现实生活中未消失，即使在唐五代责任地时，部曲客女在社会上仍有一定数量。

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②探讨了唐代前后期部曲的变化。他认为《唐律疏议》中关于部曲的规定反映前期社会上部曲的实际法律地位。其时部曲是一种法定的贱人称呼，但主人也不能杀死他们。永徽以后，《唐律疏议》对部曲身分的规定已成具文。初唐承南北朝余绪，以部曲进行生产的事理当有之，但安史之乱以后，这种部曲则根本见不到了。这时的部曲主要是作战或将帅的武装扈从，与社会生产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李伯重的另一篇文章《唐代部曲、奴婢身分浅析》③ 也是主要依据《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文，研讨部曲、奴婢的主要等级特征，部曲、奴婢等级内部，部曲、奴婢与工户、乐户、官户、杂户、官奴婢以及随身、太常音声人等的差异，并分析他们与凡人等级、应议请减赎当免人等级、皇帝等级的关系。

近年来专门研究杂户的文章有张维训《略论杂户的形成和演变》④、《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⑤。在后一篇文章里，作者论述了杂户贱民身分的消亡过程，认为隋唐时代由于轮番服役和纳资代役的普遍推行，杂户的贱民身分趋于消亡，其具体时间当在唐中期以后。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5 年 4 期。
② 《厦门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
③ 《文史》第 32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④ 《中国史研究》1983 年 1 期。
⑤ 《江西社会科学》1982 年 4 期。

杨中一《唐代的贱民》[1] 重点考察了官户的地位，指出他们是没有籍贯而隶属于司农的配役人户，长期服役则同于官奴婢，赐给衣粮，婚嫁时当色为婚。杨文不同意鞠清远关于官户分为官奴婢、番户、杂户三级的看法[2]，认为官户地位高于奴婢，大约与部曲相同，不同的是官户属司农，部曲随主属贯。而杂户地位又高于官户，太常音声人的地位也同于杂户，而工乐则与官户地位相等。

关于唐五代的奴婢，韩国磐认为是奴隶制的残余[3]。翁俊雄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在《关于隋唐五代奴婢的性质问题》[4] 一文中提出奴婢是地主阶级的养子，是隋唐五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当时为地主服役有三类：第一类是代主人经管田庄、高利贷和经商；第二类是担任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任务；第三类也是最主要的服务，是为地主阶级干家务劳动。对奴婢的这一服务应如何估计，是对隋唐五代奴婢作用估计的关键所在。作者还指出隋唐五代社会上奴婢日益增多，其来源是农民。他不同意韩国磐关于其时奴婢日益减少的观点。关于奴婢的地位，作者认为不仅低于农民，也低于杂户、番户，奴婢是主人的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经一定手续放免，但不能任意屠杀，又认为隋唐五代时奴婢的性质近似农奴。

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5] 对唐代奴婢的估计与翁文有所不同。他认为与前代相比，唐代奴婢大量减少，至于个别官僚家有数个家僮，家僮其名，党羽其实，不能以奴婢视之。关于奴婢的来源，唐代以战争俘虏为奴婢的为数已经不多了，农民破产而沦为奴婢者也很稀少，而俘虏和买卖人口又被严加禁止，因而中原地区的奴婢来源便枯竭了。孟文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落后民族入侵，社

---

① 《食货》1卷4期1935年。
② 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第22页，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
③ 《隋唐五代史论集》前揭文。
④ 《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4期。
⑤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会上奴婢数量日渐增加，但唐代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社会上奴婢日渐减少，并且在向佣仆过渡，而达官权势的奴仆则成为统治阶级的鹰犬。

李季平的《唐代奴婢制度》①。是近年来新出版的有关唐代奴婢制度的专著。作者在书中对唐代奴婢的类别、名色、役使情况以及地位待遇等做了系统介绍，并指出唐代奴婢制度是古代奴隶制残余与唐代封建等级制度结合的产物，唐代社会尽管存在名色繁多和数量巨大的官私奴婢，其性质只能是遗留在封建社会中的，并且已经局部地封建化了的奴隶制度残余形态。在《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分地位》②一文中，李季平还指出，随着唐代租佃制、雇佣制经济的发展，居于贱民最低层的奴婢数量减少，依附性渐弱，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和作用逐步降低，奴婢出现分化，一些人开始具有私产。另外，统治阶级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也为少数奴婢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

赵云旗在《论隋唐时期的奴婢及其变化》③中说，奴婢内部还有阶层，属于官僚和剥削阶层的人数较少，中等阶层比重也不大，多数仍是下层奴婢，成为隋唐奴婢的主要成分。奴婢还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转化：向官僚、剥削阶层发展，脱离生产领域而转为服务领域，向佣工方向转化，向典身发展，开始转向佃农。这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新面貌。

李天石《唐代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侧重探讨唐代良贱制中的官奴婢制度，指出罪犯籍没、战俘、地方贡献及官府掠买是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官奴婢部分归内侍省掖庭局，有伎艺者从其能配诸司，无能者咸隶司农，都由尚书省刑部的都官曹管理。唐代官奴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齐鲁学刊》1987 年 1 期。
③ 《学术月刊》1986 年 5 期。

婢制度详密而完备，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秦汉以来官奴婢制度的总结，但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变革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显露出衰落的端倪，官奴婢来源减少，身份地位提高，制度本身也开始瓦解①。

关于唐代前期奴婢数量明显减少的原因，廖国强《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认为前朝遗留给唐代的奴婢数量大为减少，唐前期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并扩大这一成果导致唐前期奴婢较少。同时作者指出，唐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混乱使大批破产农民及战俘沦为奴婢，因此唐代奴婢数量经历了一个驼峰型的变化轨迹，前期下降，中期以后又逐渐回升②。卢开万《贞观以后唐政府在北方的限奴措施》专门对唐政府的限奴措施进行研究，认为唐前期政府为稳定和增加均田制下自耕农数量，以保证田租、力役和兵士来源的可靠性，在北方采取了减少对官僚贵族地主赏赐奴婢数额等一系列限奴措施③。

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李天石《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④，及《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⑤。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唐中叶商品经济活跃，雇佣关系进一步发展，雇佣关系向奴婢制度渗透的结果，典身性质的演变，典雇奴婢的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集中反映。

唐代文献及出土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作人”其身份地位如何，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李鸿宾《唐代“作人”考释》认为唐代作人的渊源直接承续着魏晋南北朝的奴仆制度，并与高昌时期的作人具有密切关系。作人身份低贱如奴婢，其来源有来自和雇，有官

① 《兰州学刊》1988年第3期。
②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③ 《唐史论丛》第4辑。
④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年)，三秦出版社。
⑤ 《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府役征，也有类似家奴转化而成，还有从东部内部自为的作人。随着雇佣关系的兴盛，作人这一卑贱阶层的地位有了缓慢提高，由高昌时期的纯粹买卖，开元时期的契约券验，发展到唐后期的受雇与人和纳资代役①。程喜霖《唐代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认为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是唐代雇工的专称，与雇主保持雇佣关系。他们分两类：一是逃亡农民组成的，因而是非法的；二是贫苦著籍农民，他们充当雇佣是合法的，其中很多人没有脱离农业，只在一定季节或特殊情况下充当临时性的雇工；也有全年受雇的，可能是农户中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唐代也存在以"佣雇为生"的贫民，也分非法与合法的两类②。林立平《试论唐代的私人雇佣关系——兼评唐代资本主义萌芽说》则从整体上评估唐代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地位，认为除了部分家庭佣仆和农业佃作者身分低于自由民，大多数雇佣劳动者的身分是自由民③。

优伶与乐工、乐户属于隋唐五代时期的贱民等级，他们法律地位低下，在许多方面有别于一般士庶，受到人们的歧视。戴显群《唐五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的问题》④，及卢开万《隋唐五代的乐工乐户》⑤对这两个阶层进行研究。戴文认为唐五代宫廷中优伶的实际地位和待遇有所提高，并探讨其中的历史根源。另外，作者还指出唐五代优伶阶级包括男优、女优，女优中的宫妓、官妓、家妓和娼妓阶级存在较大的区别，不能同日而语。卢文则指出唐代各地方乐工、乐户所承担的义务，一是定期上番到京城接受的音乐培训，二是临时征调上番服役，另外还要服差科。他们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农业，受田权力与其他均田农民一样，服役也有优复照顾。

---

① 《河北学刊》1989 年第 2 期。
②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③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 年)，三秦出版社。
④ 《福建师大学报》1993 年 2 期。
⑤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二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5. 寺观依附人户

寺观依附人户是隋唐时期寺院和道观的主要劳作人。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① 一文在探讨大族寺院庄园形态时，就曾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身分。1938年，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发表了《梁户考》② 一文，首次对敦煌出土的唐代寺户文书进行了研究。1956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又写成《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③ 一书，书中指出敦煌寺户是一种奴隶式的居民，与昙曜所设立的僧祇户相仿。英国学者杜希德不同意谢和耐的看法，认为寺户是一种附着于寺院地产的"佃农"，与庄客、庄户同类。50年代末，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又发表了《唐末五代的敦煌寺院佃户关系文书——关于限制佃户人格自由的规定》④一文，以寺户借贷契文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寺户不是寺院的奴隶，奴隶不会与寺院保持一种借贷关系。此后竺沙雅章也发表了《论敦煌寺户》⑤一文，文中肯定了寺户的农奴性质，并指出硙户、梁户等身分不同于寺户。

近年来我国学者姜伯勤、张弓等也撰文探讨了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家人、常住百姓、梁户、牧羊人等的身份问题。姜伯勤先后发表了《唐西州寺院家人、奴婢的放良》⑥、《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⑦ 等文，并于1987年出版了《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⑧ 一书。此书对敦煌寺户的历史前提、吐蕃管辖时期敦煌寺户制的具

---

① 《食货》3卷4期，1936年。
② 《支那佛教史学》2卷1、2、4期，1938年。
③ 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中译本见《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 《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2年版。
⑥ 《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⑦ 《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
⑧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体情况，以及归义军时期寺户向“常住百姓”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者地位的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并认为寺户是有少量家资农具和一定劳动兴趣的半自由人，他们对寺院封建主保持有人身依附、土地依附和法律依附，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农奴式人口。寺户制度则是从印度传来的内律中的“净人”制度与中国晋唐间田客荫户部曲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北魏僧祇户的余绪。作者还认为，归义军时期的“常住百姓”已与寺户有所不同，他们小有家资，已不是终年长役的奴婢或雇农，而是有个体经营的一种人户。但“常住百姓”对寺院封建主仍然具有人身依附、土地依附和法律依附的关系。这种制度是以往寺户制度的延伸或遗留，它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寺户制度的没落。

张弓在《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① 一文中指出，以寺观户为标志的封建依附关系，其产生、发展和蜕变的全过程是同世俗社会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基本适应的，但两者的荣枯并非同步。张弓还指出，寺观部曲的显著存在是唐朝前期比较突出的一个社会现象。中唐以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户阶层衰落，大批良口依附人户——“枝附”人户日渐充斥寺院，人虽同所投寺观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他们只是脱籍避役，并未附籍寺观。这种寺观“枝附”户是在晚唐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又一种寺观依附人户。

张弓的另一篇文章《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②，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放羊契券”，探讨了寺院牧羊人的不同身份和雇佣关系。他指出羊只放牧在敦煌的寺院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专司羊群放牧的寺院劳动者，较常见的是“牧羊人”、“牧子”、“牧羊厮儿”、“常住牧羊人”等，他们的阶级地位及其等级身份又是有差别的。文

---

① 《中国史研究》1984年2期。
② 《兰州学刊》1984年2期。

章还就雇佣关系及牧羊寺奴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探讨。

谢重光《净人新探》[1]全面探讨净人的身份地位，役作内容及发展演变的过程。认为佛教经、律中所见净人的来源一是世俗的施舍，二是寺奴婢转充净人；净人的作用是“为僧作净，免僧有过’，即从事僧人不愿干或按经、律规定不许干的各种作务，范围相当广泛，大至耕种、贩卖、交易、放高利贷，小至僧尼日常衣食都须净人料理；净人的身份、地位应与唐律中确定的部曲、客女阶层相近，不过由于净人来源、作务有别，其内部还略有高下不同，或更接近于奴婢，或更接近于良人，但总的说这些差别还是限于半良半贱的范围里，并没有跨到奴婢阶层里去。至于晋——唐中叶寺院中实际生活中的净人，其身份地位及役作的内容大体不失经、律所论净人的原意，寺院中其他各种名目的寺院人户，若从“供给比丘”，“为僧作净”的意义出发，则除奴婢外，家人、寺户、养女、白徒、佛图户、僧祇户、部曲家户等大多可视为净人。

谢文还指出，唐中叶后净人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在净人数量逐渐减少(消)，内含渐次改变(蜕)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唐中叶后契约租佃制在一国范围内取代了部曲、佃客制成为生产关系的主流，在此影响下，寺院经济中净人制逐渐为契约租佃制所取代，净人数量逐渐减少。寺院所需部分净人，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下，难以靠原有方法获取，不得不改用招募，净人的内含发生变化。此外，由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发展，僧徒的实际中国化教规，彻底否定印度旧规中“净”与“不净”的观念，寺院劳动者的劳作，失去了“为僧作净”的意义，无所谓“净人”“不净人”；佛教用语也中国化，家人、家客、养女、佣保等概念流行，促使“净人”之类的洋概念消逝[2]。

在敦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博士”这一称呼，蒋礼鸿在《敦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2期。
② 同上。

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中考释指出这是对有技艺人的俗称，姜伯勤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更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名目众多的博士考察，并确定寺院中博士的身份是雇匠。郝春文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一文中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指出，从敦煌寺院入破历中可发现，只有部分给寺院做工的博士领取了手工价，还有部分博士仅有酒食供应，并未领取手工价，这表明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并不是雇匠的俗称，它包括雇匠和为寺院执役的工匠两种，前者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其身份是自由人，后者是依附于寺院的手工业者，其身份先是寺户，后是常住百姓，二者虽都名为博士，都具有某种技艺，但身份不同，不可混为一谈①。

6. 士人

隋唐时代既是一个开放、繁荣，文化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又是科举制度初创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士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以往人们对于隋唐知识分子问题，大多是在研究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时涉及到的，真正把隋唐士人做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整个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士人问题成为不少学者所着力探讨的课题，出现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有些学者致力于探讨此时期士人的精神状态与思想观念。葛承雍《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②，探讨在当时国家强盛恢宏气势的影响下，文禁松弛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参政观、仕途观、学问观、忧患观、本末观、从军观、秩序观、华夷观、门第观和宗教观的改变。孙昌武《唐代文人的维摩信仰》主要通过六朝与唐代的比较来揭示存在于唐代文人中的维摩信仰，六朝时期维摩高高在上，唐

---

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2期。

② 《人文杂志》1988年6期。

代的维摩却混同于凡人，逐步世俗化，但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崇高，更被重视，中唐以后，维摩成为当时士大夫实践的榜样，安身立命的依据，成为一部分文人的自我写照和化身①。

科举制的实行，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认为科举制度对知识阶层是弊大于利，它给知识阶层带来的一方面是政治地位的法律确认与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地位的实际下降与社会参与能力的萎缩。知识阶层原来有限的独立换得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彻底合流，导致盛唐知识阶层价值观念与士风学风急剧颓变，进而影响到整个知识阶层的素质，这在当时就引起不少有识有志之士的批判与反思②。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文人的从政情况，王永平等人进行了探讨。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全面考述隋文帝、隋炀帝对江南士人的政策及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指出经过六朝以来数百年的发展，江南世族豪强已成为统一国家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隋代江南士人的崛起成为中国政治史的一大变局。隋文帝从其关陇本位出发，无视这一巨大变化，对江南采取高压政策，导致江南士人的反抗，危害了统一国家的稳定。隋炀帝改变高压政策，大力提携江南士人，对江南文化表现出尊崇与宽容，契合了中国政治地理变迁的趋势，形成历史性的转变，而炀帝本人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全力回报③。此外杨国宜、陈慧群《唐代文人入幕成风的原因》④、程遂营《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⑤也对士人从政问题进行了研究。

---

① 《唐研究》，北大出版社，1995年。
②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③ 《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④ 《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⑤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隐士是中国古代既特殊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唐代隐士阶层个体人格的扭曲与退隐观念的颓化，大批隐士入仕；但并未导致隐士现象的消亡，隐士的行为模式向多元化发展①。齐涛《唐代隐士略论》②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具体研究隋唐五代时期士人社会生活的有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该文分析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类型、特点、影响与作用③；王毅《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认为中唐以后传统文化日渐衰颓，士大夫阶层在大大收缩的天地内实行空前的精美、高度完善和致密的同时也自觉丧失走出"壶中天地"的可能④。

近几年，郑学檬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文人群体进行研究，他在《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中，着力探讨唐代江南所存在的几个文士群体；在《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民风习俗"一节中对"风流才子"这一群体进行研究，指出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现了一批讲究物质享受、精通琴棋书画的文士。他们在行事上与皓首穷经的士子不同，善于交游，风雅不羁，才华出众，是宋以后风流才子的前身。

7. **僧尼及其他**

唐代佛、道二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僧道在当时总人口中的比重也相当可观，但对唐代僧道社会生活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仅有不多的几篇论文。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特点》(《敦煌吐番学研究论文集》)通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指出唐后期五代宋初

---

①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② 《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③ 《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④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沙州僧尼的情况与全国同时期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其一是沙州的僧尼除小部分因职责和生活方面的原因住在寺中，大部分不“出家”，不住寺，许多在寺外占有庄园田地、房舍等资产，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与世俗百姓差别不大，就是那些因职责原因而住在寺中的僧尼，如寺主、上座、维那、执事僧等，在寺外大都有家，有财产，任职时住在寺内，解职时回到家中。沙州僧尼不“出家”、不住寺成为合法现象始于吐蕃统治敦煌地区，到归义军时期已成为一种风气，而唐后期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不住寺不出家的僧尼始终未取得合法地位，更未能形成风气。其二，沙州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时僧尼人数很多，有时甚至达到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远远超过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沙州僧尼虽多，但他们大部分没有脱离生产，和世俗百姓一样要向政府纳税，并未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未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得到沙州世俗政权的大力扶植、保护。在这一时期，沙州僧尼与世俗百姓的重要区别在于僧尼既有僧籍，又入民籍。因此，沙州僧尼既要向世俗政权纳税，又要承担寺院沉重的劳役，受到双重的奴役和剥削（寺院对僧尼的剥削，主要是对广大中下层僧尼而言），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免除世俗政权基于人身的税役的经济特权。此外，对唐代僧道进行研究的还有施光明《论唐代艺僧》（《唐学刊》1988 年 4 期）、张菁《唐代僧侣的游方与文化》（《江海学刊》1993 年 4 期）、龚杰《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及其影响》（《西北大学学报》1993 年 3 期）等。

在唐代，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译语人职业，他们即专门的翻译，在当时中外与各民族间交往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 年 2 期）结合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大谷、斯坦因文书，指出西州译语人既为官府工作，就应有正式的编制，他们大多为少数民族，其中以昭武九姓胡、突厥人为主。西州的译语人都是本州人，他们的工作范围很广，不仅参加军事行动和商品交易，也参加涉及少数民族案件的审理工作，但在审案中充当

证人或保人则不属于其工作范围。此前论及“译语人”的还有王欣《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译语人”》(《新疆文物》1993年1期)。

二、社会群体与社区

(一)家庭与婚姻

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家庭内部形态的具体研究,本世纪以来所发表的论著不多。较为系统的论述当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的“婚制”、“族制”两节。关于家庭内部关系,陈鲲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①一文做了较详细的叙述。该文认为唐代凡五世同居要表彰门闾,称为“义夫”,则四世以下之同居者为民间所习见。长幼之间同居共财不仅是当时社会的通例,也为法律所强制。关于家族共产亲的范围,文章说始于亲子之间同居共财,其后上溯高祖、曾祖,下迄曾孙、玄孙,及伯叔、从兄弟间,纵横拥抱,成为亘至数代的大家族共产制。关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作为共产管理人的家长(尊长)对于直系亲属子孙有绝对之死令权,对共产的管理有任意处置的自由,子孙不得致问。反之,若傍系尊长,则只有共产管理权,不得任意处分。若侵害卑幼的利益,卑幼可以诉告之。虽然同居卑幼与尊长共享家财所有权,但未得家长许诺,卑幼不得擅自盗卖或质举其家财。

与家族共产问题相关,陈鹏《唐律继承法研究》② 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继承及养子问题。文章从“宗祧继承人之顺位”、“代位继承”、“单纯财产继承”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收养异姓为子问题,文章根据唐律条文认为一般是禁止的,但收养三岁以下遗弃者不

① 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1月。

② 《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

在禁限，听从本姓。邢铁连续发表《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年5期)和《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3期)从两方面探讨唐代继产问题，文章指出唐代继产遗嘱的订立，一要经过族人的同意，二要经官府盖印；遗嘱的具体形式主要有口头(含代书)、自书、家训三种方式，内容范围也不完全一样，但核心内容则是财产处分。受世俗社会的影响，僧尼在传继自有财产时也使用遗嘱继产的方式。立嗣继产方式早已有之，至唐宋时期方臻于完善和定型，立嗣时原则上由立嗣人即无子之家的家长自主选择被立嗣人，但在习惯上，选择时并非由小家庭完全自主，而是必须经过族人同意，这样一般不能选立毫无干系之人，或选立本家族中昭穆相当之人，或选立外甥或外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收养毫无血缘关系之人。同时唐宋律令还特别限定只能立平民良人，不得立有奴隶身份的人及其子孙。立嗣的方式和手段，也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律令规定，户绝之家的家长一般在无生育能力且年老体弱时考虑立嗣，选定立嗣人后大都要立字为证，订立继嗣文书，亦称过继单。文书中写明原委，被立嗣人的权力和义务，并由族中近亲、舅舅等以监证人的身份一同签字。唐宋政府对立嗣继产问题也较重视，已形成一套周密的规定。作者认为无论是遗嘱继产还是立嗣继产，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家产的传继，而是为了继绝即继立户绝之家的门户，这主要是传统的家庭观念所使然。研究同类问题的还有郑联芳《唐律家庭主义之研究》、杨莲生《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①。

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② 中指出，人口少构成简单的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而多世同居的复合家庭在唐代社

---

① 分别见《法律评论》24卷5期，1958年5月；《食货》1卷5期，1935年。

② 《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2期。

会并不普遍，主要存在于一部分大官僚大地主家庭。作为剥削单位、消费单位的地主家庭主观上要求累世同居，客观上也总是难以长久保持这种家庭结构。在《略述家族主义对唐朝官制的影响》①。一文中，魏承思还指出，唐代官制深受家族主义影响，具体表现在"孝"、"睦"等家庭伦理道德成为任免官吏的标准；官员进退取决于家族政治上的沉浮，又反过来制约着家族的政治特权等方面。

关于隋唐时期的家庭结构，冻国栋在《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六章《唐代的人口结构》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关于唐代家庭规模结构，冻国栋与魏承思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唐代一般民户家庭绝大多数以小户为主，与前代一样多在5口上下；累世同居，户至百口的大家庭固然存在，却为数极少，这一特点与封建社会的生产条件及赋役制度密切相关；官僚、士大夫家庭规模结构以大家庭为主，每户平均约20口，内部成员以血亲为主，也包括众多奴婢、僮仆，但大家庭并非当时官僚、士大夫家庭规模结构的唯一形式，由于财产继承，土地兼并的影响，某些官僚之家别籍同居的事例同样存在。此外，围绕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冻国栋分别对唐前期西州地区，唐代沙州地区的人口结构及相关问题进行重点研究，指出唐前期西州的家庭规模与一般州郡民户相近，大体以户均口数4—5人居多的小家庭为主；复合家庭、简单家庭、不完全家庭、单身家庭在唐前期西州地区的家庭类型中都占有一定比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残破家庭、单身家庭的普遍存在，这无疑与赋役的沉重有关；某些家庭成员中包括若干非直系的旁亲在内，大抵是某些女口失去丈夫和其他亲人后与其得以依托的亲属合籍，表明当时家庭有赡养义务，唐初西州家庭中还有一定比例的贱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的趋向是数量逐渐减少。西州地区男女性比例结构在太宗、高宗朝大体匀衡，男性稍多，武宗、中宗、玄宗时代存在女多男

---

① 《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1期。

少的现象，男、女比例不像敦煌户籍中所见"一男十女"那样严重，各乡间也存在差异，在西州籍帐中，存在多例男性单身，又有许多适婚未嫁的大龄女子，大致与逃避赋役有关。唐前期西州人口增长与课丁数增加并不一致，从太宗到玄宗时期该地区课丁比例占总口数的比例不断下降，这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唐前期西州地区男女的初婚年龄普遍偏低，早婚原因除传统习俗影响外，与统治阶级婚姻政策也有关，早婚早育带来人口高出生率，籍帐表明平均生育 2—3 胎居多，但实际应远高于此，与人口高出生率相对应的是人口高死亡率，并影响人口的平均寿命，其中男性的寿命更低。关于唐代沙州地区的人口结构，冻国栋围绕敦煌籍帐文书并采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沙州地区家庭结构、男女比例、男丁比例等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沙州户均口数与内地诸州相比可能差别不大，一般以 5 口之家居多，自武后至开元前期男女性比例失衡已见端倪，尤其是天宝敦煌籍中女口激增，反映了大批男丁在战争中死而不返或者"没落"，但也与伪籍密不可分，自武后至玄宗时期男丁减少是一个基本趋向，大历手实中所见男丁比例上升乃是女口、老小大量逃死相对而言，并不表明课丁数量的增加。

唐末五代收养义子成风。义子又称义儿、假子、养子等。他们与一般收养嗣子不同，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研究此问题的文章有林瑞翰《五代豪侈暴虐义养之风气》(上、下)①、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②、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③、戴显群《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④ 等。

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婚姻问题，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涉及婚姻

---

① 《大陆杂志》30 卷 3 期，1965 年 2 月。

② 《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1981 增刊。

③ 《历史研究》1984 年 4 期。

④ 《人文杂志》1989 年 6 期。

礼俗、婚姻制度、婚姻形态等几个方面。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门论述我国婚姻问题的著作,书中隋唐五代部分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婚姻形态中政治与婚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等,并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历代婚姻中的婚礼,定婚、结婚、离婚、媵妾、赘婿与养媳等有关问题。臧嵘、王宏凯所著《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列有"隋唐五代婚俗"的专章。

研究唐代婚姻的论文较多,涉及的问题也较广。关于婚姻的礼俗,以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1]为代表作。赵文从通婚书到嫁娶时在女家和男家的各种仪节都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周文则进一步论述了婚礼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特别要提出的是,周文指出了唐代有"不亲迎入室、就妇家成礼",男子居住妇家的婚姻礼俗。

关于婚姻制度,杨廷福指出《唐律》明文规定婚姻的缔结必须有主婚人,有一定仪节,具有"婚书"和"聘财",婚姻关系才算成立。但个别子女未征得父母家长同意已成立事实婚姻者,法律上仍然有效,若尊长不承认它是合法婚姻,也是违律的行为。此外对于重婚和婚姻范围也都有规定。在离婚方面则有协议离婚、仲裁离婚和强制离婚的不同规定[2]。

董家遵根据文献材料发表了多篇研究婚姻的论文。在《论汉唐时代的离婚》[3]中曾专列《离婚与政治》一节,指出汉唐间因政治原因而离婚的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政治上的嫌疑而离婚;二是迫于掌权者的命令而离婚;三是为高攀贵族富戚而离婚。在《协议离婚与强迫离婚》一节里,文章取汉唐间的零星史实,指出一般穷人家可

---

① 《文史》第三辑,1963年;《文物》1985年7期。

② 《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③ 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1卷1期,1935年。

行协议离婚，而士大夫集团的妇女则无此种权力，当然也有在父权压迫下逼使女儿与其夫离婚的。

在另一篇《汉唐"七出"研究》[①]中，董家遵指出，"七出"是我国数千年来离婚的规律，要知道离婚制度的沿革，不可不研究"七出"的由来及其影响。七出旧称七去、七弃，唐代以后才称七出。它的目的并不是保障婚姻的持久，也不是专给男子以离婚的便利，而是站在宗法主义的基础上来维持家族的利益。文章还列举汉唐间有关七出的实例作了评述。

此外探讨唐人离婚问题的还有金眉《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②]、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刍议》[③]。金文指出"七出三不去"虽是唐代一项严格的离婚制度，但在实际实施中往往受到地方和民间的礼俗习惯影响乃至左右。牛文则从《唐律》中有关"离婚"的条文出发，探讨唐人因政治原因及因背弃人伦或夫妻不和两种情形下的离婚状况，强调唐人在"离婚"问题上的制度化倾向已非常明显。

在古代婚姻中有叔嫂婚、兄弟妇婚和父死妻其后母等习俗，这叫做收继婚。董家遵《我国收继婚的沿革》[④]将汉唐时少数族收继婚俗列成"汉唐时代采行收继婚的四夷表"，认为收继婚与游牧民族密切相关，它起初盛行于西北部民族，后来逐渐传入东南部。文章还对隋代突厥可汗娶隋公主实行收继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于古人结婚年龄，董家遵《论古代结婚的年龄》[⑤]认为汉晋时倡行早婚，唐宋以降，性的分隔愈严，早婚制度也愈普遍化。自汉以后一般都采用先秦的主张男十六、女十四为结婚年龄，但唐宋以

---

① 中山大学《文史汇刊》1卷1期，1935年。
② 《史学月刊》1993年2期。
③ 《学术界》1994年2期。
④ 《社会研究季刊》1卷2期，1936年。
⑤ 《社会研究季刊》1卷2期，1936年。

后却发生许多老夫少妻的畸形现象。论述到其时结婚年龄的还有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傅乐成《唐人的生活》[①]等。傅文论述了唐代前后婚姻年龄的变化及穷人与富人间的婚龄差别。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代，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婚姻道德观念和行为却出现了显著的“裂变”。渠长根、贺艳秋《唐代传统婚姻道德裂变溯源》认为主要表现在青年婚姻有了一定的选择自由；贞节观念淡漠，离婚、再婚比较容易；夫妻不相禁忌，人格独立增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此外还有妇女“妒悍”，妇强夫弱，男子惧内等现象。其中的根源何在？作者指出民族融合的加强和胡族道德风尚的传播渗透提供了强劲的外来冲击力和全新的借鉴物；儒教的式微和世族门阀势力的角度消沉，削弱了对婚姻道德更新的舆论压力和陈腐势力的抵抗；法律的有关规定成为婚姻道德超越前代的有力社会保障，而宽容、博雍的开放型社会结构更为唐代婚姻道德的裂变造就了一个雄阔深邃的客观环境。

此外，许多文章还对皇室婚姻、士族婚姻、宦官婚姻、和亲婚姻等进行了研究。其中以对唐代公主婚姻研究最具特色。王寿南《唐代公主之婚姻》[②]统计了唐代二百一十位公主的婚姻（包括未婚及不详者）状况，对其婚姻对象功勋大臣及其子弟、侄甥皇室姻亲与士族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婚姻带有浓厚的政治作用。文章还分析了唐代公主再嫁问题、公主婚姻中的家族辈分问题和公主结婚难的问题。认为由于实际环境、公主品德之不良、家族礼仪、驸马在家中之地位，驸马之仕途等因素，常造成唐代公主婚姻的困难。

牛志平近年来致力于对唐代婚姻问题中的某些特殊现象进行研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力图发掘唐代婚姻现象中的深层次社会

---

① 《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② 《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册（台）1982年8月。

内涵。他在《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①中认为，唐代婚姻带有开放性的浓厚特色。这种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其次，婚姻关系中离婚再嫁颇显容易，贞节观念较为淡薄；第三，夫妻关系中具有不相禁忌和刚柔倒置的现象；最后，还表现在夷夏观念不甚分明，民族通婚相当频繁上。牛志平认为，其形成原因，首推各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其次与李唐王室的"胡化"色彩有关；再次，唐初统治者压抑、排斥山东旧士族的作用，也值得重视；另武则天等人的作为对此也不无影响。这种开放风气只是与封建社会其它时期封闭、禁锢的婚姻相比较而言，它并非违背封建婚姻的大前提。在《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剖析唐代统治阶级与劳苦阶级婚姻心理上的差异，指出前者的婚姻虽也有"继后世"、"求内助"之意，但更重要在于满足淫乐，择偶标准注重门第、资财功名以及姿色、才艺；后者的婚姻除了传宗接代外，主要注重劳动上的协助，择偶标准则注重情爱与品德。至于男女两性婚后心理，作者认为喜新厌旧、随意弃妻，以妻为私产，任意处置，是许多男性的心理；而恪守贞节，从一而终，宁守贫贱不愿丈夫离家是许多女性的心态。另外，作者还指出，唐人还存在种种变态的婚姻心理，诸如姻缘天定、妇女妒忌和男子惧内，不愿与皇家结亲的心理等，这是唐代既"封建"又"开放"的社会情势下的产物。

此外，牛志平在《唐代妒妇述论》②、《说唐代"惧内"之风》③对唐代社会中妒妇现象、"惧内"之风的情状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作了考察，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宗法观念，而唐代妒性格外炽烈、惧内之风盛行，则与当时社会较为开放，妇女地位相对提高的特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在《唐代婚姻

① 《历史研究》1987年4期。
② 《人文杂志》1987年3期。
③ 《史学月刊》1988年2期。

的天命观》① 中，牛志平认为唐人十分流行姻缘天定思想，并指出这与唐代各种宗教盛行、唐代既“开放”又“传统”的特点以及魏晋以来喜好神怪的风气和荒诞神奇的志怪小说盛行有着密切关系。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各民族间以及中外间交流十分频繁，由此导致民族间通婚及涉外婚姻大量出现，民族混血十分普遍，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汤勤福、傅永聚《唐代的民族混血及其社会功能》② 认为唐代社会中汉胡、胡汉、胡胡及中外民族间的通婚、混血大量存在，一方面促进了人口增殖，改变了某一民族的体态特征、素质和构成，使不同的民族在“根”上得到融合；另一方面又使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互相交融，从而产生一种复合型文化，对改变社会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傅永聚《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③ 及《唐代的涉外婚姻》④ 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⑤根据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砖、碑志及文书等资料，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高昌汉族大姓的婚姻状况，以此来探求高昌国的兴衰过程，颇具参考价值。

(二)社会组织与社区

1. 庄园

庄园有的论著又称田庄、庄田、田园等，是曾经引起学术界辩论的一个问题。尚钺《中国历史纲要》⑥。认为庄园制是封建经济下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

---

①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 2 期。
② 《北方论丛》1994 年 3 期。
③ 《山东大学学报》1992 年 3 期。
④ 《人文杂志》1994 年 3 期。
⑤ 《中国史研究》1994 年 2 期。
⑥ 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庄园之分。大多数庄园除庄宅及其附近的田地外,还包括有果园、菜园、碾硙、店铺、茶园、盐畦、车坊以及山泽森林。这些生产资料均归庄园主所有。一般都有庄院或别墅及佃客所居客坊。庄园主是庄园的直接统治者。郭士浩《唐代的庄园》①、邓广铭《唐宋庄园制质疑》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第一,庄园不是一种土地占有形态,更不存在什么庄园制度;第二,庄园一般指土地、田园,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吴泰的《唐宋文献中的庄园》③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

2. **社邑**

社邑很早即在中国产生,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僧人和佛教信徒按社邑的形式组成佛社,同时传统社邑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新的内容。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竺沙雅章,我国学者宁可都曾对社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宁可《述"社邑"》④对其历史演变作了简括的探讨。他认为到了唐五代,前代所有的里社虽然还具有基础政权的辅助组织机能,但这方面的记载已不多,而私社大为盛行。私社随自己的主要活动和社人成分而有专名,如亲情社、官品社、女人社、坊巷社、法社、香火社、燃灯社等等。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如营窟、造像、修寺、斋会、写经等,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就是寺院和僧团的外围组织,僧人参加或领导的也不在少数。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营办丧葬,也有的还兼营社人婚嫁、立庄造舍的操办襄助,以及困难的周济、疾病的慰问、宴集娱乐、远行、回归的慰劳等。有些社则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

---

① 《中国封建经济的若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② 《历史研究》1963年6期。

③ 《历史学》1979年4期。

④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1期。

而传统的社祭往往仍是这些私社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农民集资买牛的牛社、士兵集资买马的马社，及管理灌溉工程的渠社等。但两晋南北朝出现的宗社由于门阀制度的衰落，已逐渐淹没不彰。

关于私社的内部组织，宁可说，它们虽按地域组成，但只是部分居民自愿与自由结合。也有不少打破了地域界限按性别、阶级、职业结合。社的首领通常为社长、社官、录事等，总称三官，由社人推举。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社的活动开支除临事由社众缴纳外，还留有若干公共积累。社的宗旨、职能及社人的权利义务已非纯依习惯和传说，而是采用社条、社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封建政府对私社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近年来，宁可、郝春文二人对社邑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社邑情况的了解。大体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从社邑的组织情况及社邑的活动情况两方面进行的。在前一方面的研究中，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认为从敦煌遗书的女人社社条中反映出，唐五代时期的女人社较北朝时期发生若干变化：女人社已很少有佛教色彩，具有明显的结义互助性质，社的主要活动不再是佛教活动，而是帮助社人营葬；此时期女人社成员比北朝由女人组成的佛社人数减少，但组织相对稳定，社的首领与北朝不同，有社官、社长、社老、录事、虞侯等名目，社的成员不再称邑母邑子，而称为社人；社的组织更加紧密：立社要有类似章程的社条，入社、出社都要有一定的手续、规定，社的成员不按时或不参加活动，在活动中撒野闹事都要受处罚。同时也出现了按阶级、阶层结社的现象。作者指出北朝至隋唐间女子以独立的身份结成女性群众团体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不无关系①。

隋唐五代时期的社邑无论是传统私社还是佛社，都与寺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郝春文连续发表《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

---

①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系》与《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①，分别对此加以探讨。在前文中，郝春文认为这时期佛社与寺院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既受地方僧官的控制，又与某一寺院有密切联系，这种佛社可以敦煌地区的行像社、燃灯社为代表。其二是与某一寺院或僧人有密切联系，在寺院或僧人的指导、控制之下，这种佛社数量较大，尤其在内地，流传较广。其三是那些为兴建、修理某些佛教建筑，或建某种功德而临时组成的佛社，这种社所从事的是一次性的佛教活动，数量不会太大。隋唐五代宋初的佛社，实际上是佛教僧团的外围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佛教僧官与寺院组织控制佛社的目的常常是为了解决经济与劳动力的来源问题。寺院控制大量佛社，既能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又能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但对佛社成员却是沉重的负担，他们或出资或出役，在自愿的名义下被僧官、寺院无偿占有。关于此时期佛社中是否存在类似南北朝佛社中"邑师"的问题，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及法国学者谢和耐均持肯定态度。郝春文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指出这时期敦煌部分佛社存在僧人，但他们均是社中普通的一员并不是作为社的指导者、说法师身份的邑师。至于敦煌文书中出现的社僧、社子僧，那波利贞认为社子僧是社人中的一员，社僧则是社的指导者，相当于南北朝邑师，郝春文则认为敦煌文书中有关社僧的记载极少，从中很难看出社僧在社中的身份是指导者、说法师，社子僧与社僧的区别在无确证的情况下，不宜轻下结论。

在后文中作者指出，佛教寺院为将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的私社纳入自己的轨道，以达到改造、利用、直至控制的目的，采取了种种手段，如从佛教信仰角度对传统私社进行劝化，利用宗教特权和社会势力迫使传统私社和它们发生联系，寺院僧人加入

---

① 《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传统私社，利用强大的经济势力施加影响等。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更加强了对传统私社的改造。至迟到唐后期，相当一部分传统私社已为寺院所控制。作者还特别指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寺院经济的发达，与寺院控制与剥削各类私社密切相关，寺院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它们自身的力量和主观努力之外，离不开封建统治者的放任、支持。

郝春文在另一篇论文《中古时期儒佛文化对民间结社的影响及其变化》中认为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取得了与儒道并立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佛教寺院、僧人为适应传统文化，对私社所从事的传统活动采取宽容、参与的态度，导致接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传统私社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佛社日益增多。到晚唐五代宋初，除部分传统私社、佛社外，多数私社在其社条活动中已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调合起来，而其中又以传统文化的影响居主导地位。作者指出隋唐时期，形成以儒为主体，儒释道并立的意识形态结构，只有在此背景下，佛教寺院、僧人才能完成对中国传统社会团体的改造，反映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层民众是上层统治阶级的附庸①。此外，郝春文《敦煌私社的“义聚”》②及《敦煌的渠人与渠社》③两文也对这一时期敦煌社邑的组织情况进行探讨。郭锋《吐鲁番文书〈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与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动》，认为唐代西州地区确实存在着民间结社活动，起码在妇女当中，和内地与敦煌等地的结社相似，充满汉文化的传统色彩。唐前期西州地区结社在功能上还不象以后敦煌结社那样划分细密、单一，而是融佛事和俗事为一体的④。

---

①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③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
④ 《西域研究》1991 年第 3 期。

隋唐五代时社邑的活动相当繁多，有佛教活动，也有经济和生活方面的互助活动，在后一方面中，丧葬互助又是最主要的内容。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1]在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竺沙雅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社邑文书，考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文中指出，在当时厚葬风习浸被下，丧葬所需费用巨大，一般民户甚至中小官吏、地主若非"息利自办"，就只有"结社相资"，具体办法是：社人家人有凶丧，即报告社司，由社司发转帖通知全体社人，携纳赠物品按规定的时间、地点集合缴纳，并确定某些具体做法，营葬互助活动的具体内容是或纳粟、麦、面、饼、油、酒等食品及柴，或是食品外再加布褐麻、绫绢绣等丝织物，或在赠纳物品外还送葬，无论纳物还是送葬，都有不同等级或类型，若不符合标准，还有必要的惩罚措施。除以上营葬互助活动，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还有一种"立三驮目举名请赠"的办法，大致是社人可向社邑请求"立三驮名目"，列名登记在案，缴纳三驮（粮食之类）之后，再请"上驮局座"，宴请社众一次，便取得了"请赠"的权利，死亡时，社众按规定纳赠物品（可能还帮助营葬），立三驮名目，举名请赠的社人丧葬之时，社众赠物应比其他未立三驮名目的社人丰盛，葬仪亦较隆重，但这种办法，只有利于入社的富户、官僚、军将而不利一般劳动者，一般平民难以缴纳三驮，而一社之内，立三驮名目者死亡时可享受远较三驮为丰的纳赠及隆重葬仪，而未立三驮名目的社人则只有厚赠助葬的义务而无请赠的资格，实质上是入社的富户、官僚、军将对贫苦社人的变相剥削。此外，文中对社人纳赠的具体情况如社人纳赠物品的地点，纳赠物品的数额、品种及最后处理也有所介绍。

在敦煌社邑的活动中，除了丧葬互助活动外，春座、秋座局席活动也比较重要。关于春秋座局席的活动内容，日本学者那波利贞

---

[1] 《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认为是社人参加、支援寺院的俗讲。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1] 认为那波利贞的说法缺乏实证，因为敦煌遗书中有关春秋座局席活动的转帖表明，社邑这类活动的地点大部分不在寺院，时间也与寺院开俗讲的时间（正、五、九月）很少相符。至于一些社邑在寺院内举行的春秋座局席活动，主要是由于一些私社有僧人参加，社邑与寺院关系密切，加之敦煌僧人具有极强世俗性所致，活动的具体内容也与俗讲无关。关于社邑春秋座局席活动的内容，郝春文认为其一是春秋二社活动，即在春二月，秋八月进行春秋二社祭社、欢聚饮宴的传统习俗活动。举行活动之前由社首领录事发转帖通知社人活动在何时、何地由何人主办，并令社人按规定品种、数量把物品送到局席置办者处，活动开始，先祭社，后饮，若有失礼度者要受到责罚。其二是座社活动，或两月一次，或一月一次，由全体社人轮值，虽然有些局席并不在二、八两月，但人们出于习惯，也把这些新增加的局席称为春座或秋座局席。

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论文，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家庭理论，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及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从家庭变迁的角度探讨唐中后期社邑盛行的原因，认为从敦煌籍帐中反映出天宝六载至大历四年，敦煌家庭结构经历着一场变迁，由于社会动荡，出现了大量残破家庭，致使家庭中的经济功能受到很大削弱，生育、感情、保障及教育功能不能顺利完成乃至消失，许多家庭面临着或组织扩大式家庭或组织社邑的选择，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扩大式家庭也自身难保，而社邑作为群众自发组织，除承担经济互助的义务外，还经营一定的感情功能，承担宗教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家庭变迁的社会问题，这是导致社邑出现或增多的重要动因[2]。

---

①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② 《敦煌研究》，1991 年第 3 期。

3. **城市、行会、市镇**

隋唐五代时期的城市上承秦汉，下启两宋，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从整体上研究此时期城市的论著主要有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唐史论丛》第六辑)，该文系统地考察隋唐两代政治都会：都城长安、陪都洛阳、太原、河中、凤翔、江陵，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年间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之地理及交通情况，兼及十万户州和沿边沿海的都会，大致勾勒出隋唐时代城市的概貌。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 2 期)总论唐代城市发展的特点，认为隋唐时代除长安、洛阳仍占据优势地位外，同时出现了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唐代全国大中城市受农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分布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唐代城市内部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到唐中叶，坊市制已难维持，草市、夜市纷纷出现，反映出唐代商业市场和城市观念在时空上有了新的突破，城市布局发生重大的变化。

对隋唐五代城市的研究，以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为最多。近几十年来对这些城市遗址所进行的发掘工作，更促使了这项工作的深入，有关情况我们将在考古章中进行介绍。这里仅重点介绍一下依据文献资料对城市进行研究的成果。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一书不仅介绍了隋唐都城长安的地理形势，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庭内部结构，还介绍了街道的走向、里坊的布局、市场、人口、城市供水、风景区及皇家禁苑等。由于马著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具体有关社区人民生活的论述不多。

宋肃《唐代长安之研究》一书(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 年)以典籍为主，辅以考古发掘报告，介绍长安历史沿革、唐长安城的兴建、外郭城、皇宫内苑及皇城、各坊区的布局特色，并兼及唐代关中的离宫与陵寝，唐长安城对后世宋元明清的都城，对同时代日本和渤

海国都城的影响。作者还在探讨唐长安市民生活时，概括出三个特色即：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婚丧之铺张方面的竞奢现象普遍；政治上热衷于功名权势的重功利之风盛行；女性在社会上受约束减少，受教育机会较多，生活方式也相对自由等妇女生活的开放风气出现。此外，对唐代长安进行专题性探讨的专著尚有张永禄所著《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中国古代城市史包括唐代长安的研究中成果卓著，可惜一般中国读者很难读到。

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① 不仅是一篇罕见的城市郊区研究论文，而且还考述了当时郊区各行各业人民生活状况。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长安、万年两县的乡里研究。在题为“庄园管窥”的第二部分里论述了长安城郊庄园的五种类型：即供游赏饮宴的山池园亭；供个人优游逸居的别墅别业；作为一个家族产业而置备的庄或别业；寺院的庄园；坟墓的下帐和洒扫田。专门论述城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是第三部分，作者逐一叙述了从事农业、烧炭业、砖瓦业、果树莱圃业、渔猎业和开设小店铺的郊区人民的艰辛劳作和日常生活状况，对与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用水问题也作了考述。

除此之外，专论唐代长安社会生活的论文尚有不少，如史念海《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郭绍林《唐代京师长安的治安问题》（《人文杂志》1994 年 3 期）、徐君峰《唐都长安的人文景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 3 期）等。而马得志、马洪路合著《唐代长安宫廷史话》（新华出版社，1994 年）则结合对宫廷形制与布局的研究，介绍了许多宫禁生活的轶事秘闻。

研究扬州城市的除一些散篇论文外，《南京博物院集刊》1981

---

① 《文史》第三辑，1963 年。

年第三辑是扬州文物考古专辑。一些文章论述到唐代扬州的城市建设、手工作坊、河道水系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廷先的《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分十二个专题对唐代扬州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有考证,也有论述,尤以资料丰富见长,是李先生多年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总结。

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复刊号第 13 卷 5—6 期合刊)论述到唐代都市及集市市场问题。文章认为,唐代的城市人口较前集中,大城市数目增多,主要是反映了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农民的余粮增加,在一个不太大的地区内就能采集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大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文章说,唐代在城市之外,还有选择方便地点,每隔若干日举行的定期集市贸易。这是战国秦汉以来县城以外定期市集的传统形态,唐代政府并未严加干涉。这类的乡村集市,唐时北方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文章还以长安为例,论述了唐代严格的城市管理规则,如商业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住宅区称坊,每坊用墙垣围起,四面开门;只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宅第才可临街开门,享有自行出入的特权;各坊之门暮闭晨启,启闭均以击鼓为号;宵禁犯夜者要受处罚。

研究唐代集市的还有鞠清远《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①、何格恩《唐代岭南的墟市》②等。鞠氏指出唐代成都及其附近的蚕市,有一种是由崇拜圣地而构成的季节性市场,往往以庙会作中心,类似于近代的庙会。另一种则毫无宗教意义,只是季节性市场。成都蚕市主要在春季举行,货物主要是农桑之具及各种药材。何文指出,岭南墟市在唐以前就有,可惜史文阙载。唐代岭南各州县都有墟市组织,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集,其地点不限于州县治所,村落也有。墟市里除酒、米、鲑、肉和普通货物以外,还有人口的贩卖。唐

① 《食货》3 卷 6 期,1936 年。

② 《食货》5 卷 2 期,1937 年。

代宦官多来自岭南，而岭南墟市是人口交易场所，这可能和宦官来源有很大关系。

张邻《唐代的夜市》[1]着重论述了坊市界限打破以后兴起的夜市、集市问题。指出唐前期坊市区别严格，夜间燃烛张灯也受限制。中唐以后在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及农村集市中，夜间营业广泛出现，以南方地区尤为突出。作者列举了扬州、成都、汴州、楚州、苏州、杭州、金陵、梓州、象州、湖州、蔡州、夔州及乡村集市中的有关夜市的诸多记载，指出夜市上有绢帛、茶、药、菱藕、菜蔬果品等商品交易买卖，有娼楼、酒肆的喧哗。反映了当时城乡生活的密切广泛联系。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其城市生活很有特色。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从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两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画卷，指出唐代衣食住行诸方面无不表现出城市生活的典型性；居民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性、广泛性，体现了一种新的城市风貌，唐代城市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尽管平民只是城市文化的接受者而非创造者。而这一切又表明唐代的城市经济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盛唐的繁荣存在密切的联系[2]。林立平《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认为中唐以后城市生活已发生历史性转折，皇室贵族、官吏的生活均与世俗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中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大大增加，职业结构更为完善，生活轻灵活泼，丰富多彩，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这表明唐中叶以后城市生活越加超离乡村，迈进城市化的新阶段[3]。

---

①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1期。

② 《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③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年)，三秦出版社。

唐宋之际城市性生活气息越来越浓郁，城市租赁业也日益活泼，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租赁业初探》认为伴随城市工商业的兴旺繁荣，促进城市租赁业在城市生活各领域全面展开，房宅店铺、交通工具、婚丧嫁娶、游赏宴饮等大多有租赁业提供服务，租赁业与城市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在城市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①。

蕃坊是古代外国侨民在华的聚居区和居留地，主要分布在沿海外贸口岸，始于唐代。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认为唐代蕃坊的出现，得益于唐王朝强盛的经济基础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唐政府对蕃坊拥有完整的主权，而在具体事务中外国侨民在自己首领蕃长领导下，在蕃坊内有一定的侨民自治权。唐代蕃坊主要从事商业、宗教、司法、风俗、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虽处于初创时期，却初步建立了基本框架结构，为宋元时期的全盛打下了基础②。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③是研究唐代集市的力作，作者认为唐代人的草市概念，原则上概指相对于官方正式市场的所有民间交易场所，但主要指其中初具市镇规模的市场。关于唐代长江中游草市的发展，作者认为它们或兴起于州县城郊，或出现于非州县之所的津渡船埠，或演自传统的定期乡村市集，种类很多，有茶市、橘市、蚕市、药市、菜市、矿市、木材市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自然形成的，是社会分工发展，商品交换经济相对活跃的产物，因而在布局上呈现出开放散漫、缺乏统一规划的特点，内部人口也以工商业者为主，居民的日常生活也与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密切相关。草市的兴盛冲击了束缚商品生产

---

① 《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的坊市制度，但其发展却受到封建经济发展水平及封建政权的严重阻碍。唐政府运用置吏、设镇场、立县治等手段，逐步使草市走向官市化，被纳入封建体制之内，从而丧失了原来经济活动的自由，其原有侵蚀自然经济结构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意义也随之减退。

谢重光《唐代的庙市》① 则介绍了庙市这一特殊的集市类型，认为最早产生于开元年间，或是寺院处于经济、文化发源地，因寺院中的宗教、文化活动吸引人众，商人趁机前来贩鬻交易，形成庙市；或是适应农村交易的需要，由官府倡导，同时设立市集与寺院，借寺院特有的宗教凝聚力和文化娱乐活动的吸引力来维持市集的稳定和繁荣，因而形成庙市。

行会是隋唐时代形成的同行工商业者的社会组织。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有全汉升《我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②、王永兴《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上的表现》③、朱淑瑶《略论唐代行会的形成》④。朱文对行会的形成与内部形态作了探讨。认为隋代有“行”，但只是同类工商业店肆集中的地方，没有形成行会。唐代前期，“行”遍布于各城市与州县治所，行有行首，负责一行事务，有共同的宗教事务和为进行宗教事务的“行社”。可见“行”已不单纯是工商业者集中进行贸易的地方，而是同业人员的封建性联合组织，行会已初步产生。唐代后期行进一步发展，行会的职能明显化。各行不仅有共同的宗教活动，还产生了一些共同议定的行规。如无一定技术不得入行，非本地人不能入行，本行技术不得外传等。同行者有共同语言，即后人所谓“行话”，这些话别人无法理解，起保密作用。行会的组织结构有行首、师傅、徒工之分。行首又称行头，一

---

① 《文史知识》1988 年 4 期。

② 《现代史学》2 卷 1、2 期，1934 年 5 月。

③ 《光明日报》1956 年 2 月 16 日。

④ 《广西师院学报》1983 年 9 期。

般只能由作坊主或店老板担任。他对内组织宗教祭祀，督促行人执行政府命令，对外代表一行负责与官府联络、交涉，维护本行人利益。师傅是有一定技术和经验的工匠，其中极少数人同时也是行首，但大多数是生产者。徒工，包括手工作坊里的学徒、商店里的伙计，是依附于行首的主要生产者。

近年来，在利用新发现的史料来研究行会起源方面取得新进展，魏承思《中国行会源于唐代"行社"说》根据房山石经题记及敦煌写本等资料，认为中国古代工商业行会组织"行"，存在着社——行社——行的演变过程，行社是其重要一环。唐代坊市制度废弛后，同业街区的工商业者为了避免竞争，维护同业行人在原有经营规模上的共同生存，采用行社这样互助互济的组织，到唐后期行社逐渐失去"社"的特征，演变为一个经济组织，终于形成为真正的工商业行会组织"行"①。魏明孔《略论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与行会》认为民间作坊生产目的是积累财富，本身形成了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一定腐蚀力量，封建政府不遗余力地对私作坊给予限制，而行会正是适应这一社会要求才产生的②。

4. **寺院**

寺院是一种宗教性社会组织，隋唐五代是佛、道二教大发展的时代，对寺院形态的探讨也为人们所重视。较早的论文有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③。论证了其时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何兹全后来写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④ 论述了佛教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寺院财产称三宝物，即属于佛的佛物（佛像、殿堂、香花、幡盖等）、属于法的法物（经卷、纸

---

① 《华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

② 《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③ 《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82年1期。

笔、箱函等）、属于僧的僧物（田宅、园林、衣钵、谷物等）。文章对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及僧尼饭食的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

张永言《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①介绍了唐代寺院里流行的一种分卖衣物的制度。认为分卖的东西主要是施主的某些布施品及亡殁僧人的遗物。因为在分卖的时候要唱出所卖物品的名目，而所卖的物品主要是衣着之类，所以叫"唱衣"。敦煌文书材料证明，寺院通过不同途径，使用各种手段聚敛来的财物，被纳入"常住库"、"无尽藏"、"长生库"等寺库。其中一部分物品即用来唱卖牟利，这种唱衣的帐目就是"唱衣历"。文章说，过去一直把唱衣历看作是僧人唱曲所得财物帐目，是一种误解。

隋唐五代的寺院兼具有经济、文化方面功能。谢重光《中古佛教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认为中古时代寺院做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不仅是文化活动中心、学术论坛、教育阵地，而且还是当时文化交流的桥梁，发明创造的温床，佛教神权的代表，精神统治的中心②。宋大川《略论唐代佛寺的儒学教育》则着重探讨佛寺所具有的教育职能，认为佛寺实行儒学教育，是唐代私学教育机制的特殊表现形式。通过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作者着重考察敦煌地区佛寺的儒学教育，指出敦煌地区有70%的僧寺从事儒学教育。敦煌的寺学兴盛于晚唐五代，在沙州地区的童蒙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系统地推行童蒙教育，其教育形式是由佛寺招收弟子与唐朝私学相结合而演化形成的。作者认为在唐朝内地许多寺院也进行儒家教育，寺学的教授内容及教材均与敦煌地区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内地佛门由于中国化程度较为彻底，再加上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故而其实施儒学教育的程度也较高。对于唐代佛寺实行儒学教育

---

① 《文物》1975年5期。

②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年。

的影响，作者也有所阐述，认为佛教僧侣进行儒学教育的同时，连同佛教意识一起灌输给儿童及书生士子的思想深处，在发展儒学的同时也由于潜意识的作用而宏扬了佛法，使佛教这一外来文化通过寺学，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教育阵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逐渐浸透、融合①。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寺院的经济力量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五代时期寺院经济已相当发达，经营各种不同的行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谢重光《晋唐寺院的商业和借贷业》及《晋——唐寺院的园圃种植业》② 探讨这一时期寺院内部的经济活动。在前文中作者概括了寺院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社会作用，指出寺院经营的有寺院田园、畜牧出产、药物、珠宝、服玩等奢侈品，经、像等宗教用品，还有庙市以及借贷业和存钱业。寺院经商、借贷的资本很大部分来自信徒的布施，具有很大的欺诈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寺院商业活动对于佛教内部增强了寺院的经济实力，但也加强了世俗化、庸俗化。对于社会，寺院一部分与生产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促进商业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但其欺诈性行为，也是使社会生产停滞、萎缩的原因之一。卞孝萱《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从鉴真东渡的经济来源的特定角度探讨晋唐之间寺院经济的发展情况，认为鉴真东渡所需财物虽不可能直接取之于扬州佛寺，但无疑与唐代寺院经济的发达存在密切的关系③。

张弓《唐代的寺庄》重点探讨唐代寺院的庄园经济，认为唐代的寺庄发展大致以开元天宝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前期主要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③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韩国，1995 年。

是旧型寺庄的复苏，各地寺院普遍拥有不同形式的以寺田为主的寺产，各地寺田多实行庄园式经营，显示出寺院经济臻于成熟。后期新型寺庄普遍兴起，寺庄内部生产关系发生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的主体由农奴式庄客制向半农奴式庄佃制转变，在“恣人相吞，无复畔限”的社会背景下，世俗的与寺院的大土地制均得到迅速膨胀。寺院经济消泯了唐前期地域间的樊篱，整合为统一的大寺院经济圈，以庄佃制为基础的新式寺庄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格局，并终于皈向世俗化①。

雷学华、段晴等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寺院经济进行了研究。雷学华《唐代敦煌的寺院经济》认为唐代敦煌地区寺院的地产和寺户大多来自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颁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庄园经济，庄园经济包括农业、牧业、酿酒业、碾硙业、榨油业，高利贷等内容，按照封建世俗地主的方式进行经营，其性质为寺院占有制，即寺院全体僧众的共同所有制，或称集体所有制②。

段晴《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书析释》以出土的于阗某佛寺帐册残页为基础，结合护国寺文书及其它历史资料特别是出土文书考察了寺院经济活动的轨迹，指出从文书中反映出于阗汉寺的组织和规章制度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寺院不仅注意宏扬佛法，更注重传播中原文化，对远在西域的汉族军政人员起维系精神支柱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唐廷对西域的统辖。在经济生活方面，寺院拥有大量地产，采用租佃经营，寺院中常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出现以及寺院生活资料部分自产，部分购自市场，反映寺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已受到社会交换经济的有力冲击。寺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密切，但也要向政府缴纳巨额赋税。除寺院的常住财产外，僧人也有自己的私产，他们占有于阗城郊的肥美之地，成

---

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②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寺院地主①。

寺院经济做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张弓《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认为中古时期在寺院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寺院本身逐渐具备人格化地主的身份，但由于其没有独立的教权，在政治、经济上都须依附于皇权与世俗地主，因而具有非自主发展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前期（魏孝文——唐玄宗时期），寺院逐步确立人格化地主身份，寺院经济臻于畸型繁荣；中期（肃宗一僖宗）寺院地主由依附皇室、世族地主转向地方官府和乡豪地主，禅林地主兴起，统一的寺院经济网形成；后期（昭宗——后周世宗）寺院地主与地方官吏、乡豪地主互相勾结、利用，寺院经济的运营基本纳入统一的封建经济运动轨道，寺院地主逐渐与世俗地主趋同、融合②。李德龙《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认为从敦煌遗书反映出唐后期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令寺院据地纳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表明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的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③。

佛教内律与封建王朝律令本不允许僧侣个人蓄财，但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僧尼私蓄资财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样便产生僧尼财产传承的问题。张弓《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指出唐初随着新的僧侣地主阶级的产生，形成了以内律原则为基础的僧尼私财法缘传承制，唐后期禅林兴起后，对这一方式加以发展④。李德龙在前引文中指出唐后期随着寺院常住财产的削弱及僧尼私有财产的增长，引起僧尼遗产处理上的变化，改变了按佛教

---

① 《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3期。
③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④ 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1991年。

戒律所规定之僧尼财产处理权应属寺院的方式，出现亡僧财产由官府处理，并收其财产归官，及亡僧亲属争相继承遗产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唐后期僧尼大量蓄有私财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僧尼经济与世俗经济难以区分，两者已融为一体。

三、人口问题与社会救济

（一）人口问题

隋唐五代的人口问题除了户口的研究所涉及的人口问题外，近年来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扩展到人口统计、分布及人口流移等课题，还出现了人口结构及人口年寿等新领域。即使在那些传统课题中，所取得的成果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都有长足的进展。

1. 人口统计与分布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人口发生较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有关这一时期的户口资料相当丰富，从而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中共有隋唐五代户口统计表八幅，除总户口数、各州郡户口数、每县户口数、户口升降百分数等表和唐代各道人口密度表外，还对贞观、开元、天宝、元和时期的户口数作了列表统计①。

隋代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在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隋代的人口统计情况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李燕捷《隋代户数增长情况分析》②指出隋代户数的增长幅度远非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自然增殖所能企及，且增长时间集中于开皇八年前，地区集中于隋平陈前旧境，因此，隋代户数的增长主要是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括户、析籍、免三道逆人为编户、放乐人为编户、军人编入民籍、坐(杨)谅流配减及平林邑等。经过与唐代户数自然增长率的比较，作者估算隋代户数自然增长率大业二年前为0.73%，大业2—5年为0.60%。隋代户口何时臻于极盛，极盛时的隋代实有户数多少，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陶文牛《隋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考实》及《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①，认为史籍所称大业五年(609)“隋氏之盛，极于此也”是指隋疆域之极盛，而非其户口之极盛，而《隋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县数、户数也非极盛时，而是各该郡初置时的数额。隋代户口极盛当在文帝末年，当时北方实有户数800万户左右，南方实有户数430万户以上，南北合计1,230万户以上，实际人口远远超过6000万，是继两汉之后人口发展的又一新高峰。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易曼晖发表《唐代的人口》一文，除列表论述了唐代户口盛衰与分布外，还着重讨论了唐初的人口政策、唐中期人口流亡与天宝以后人口南移等问题。文章说唐初实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规定凡已过结婚年龄的男女，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令其婚配，鳏夫六十以上，寡妇五十以上不在此限。无力婚嫁者，仰其亲邻富室资济。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地方官进考，否则殿罚②。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爬梳旧有史料，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及《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两书，主要工作是整理考订《旧唐书·地理志》中所保存的贞观十三年(639年)及天宝十二载(753年)上户部计帐的主要内容，并加以复原。两书分别考

---

① 《北京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

② 《食货》第3卷6期，1936年

订出贞观十三年及天宝十二载的政区及人口分布情况，并将两者加以对照，揭示出唐前期百余年间在州县建置和人口分布方面出现的变化。对于唐初及天宝年间的人口密度，作者也有精密的计算。翁俊雄另一部专著《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之第一部分汇集了作者多年来有关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多篇论文，主要对唐代户口计帐制度，人口迁徙及人口的职业构成等几个方面加以研究，其中的重要成果将在以下的相关部分中加以介绍。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一书是近几年唯一一部全面论述唐代人口问题的专著，该书从唐代人口升降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及人口结构等几方面基本上勾勒出唐代人口问题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唐一代，人口升降极为剧烈。冻国栋、王育民从总体上概括整个唐代的人口升降状况：唐初锐减，贞观中期后则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达到最高峰，安史之乱后剧减，唐后期则有所回升(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三章《唐代人口的升降情况》；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大学报》1989 年 3 期)。许多学者认为在唐代的户口统计中，著籍户数与实有户数存在着重大差异，王育民指出唐代存在的大量客户、逃户、非编户及边境都护府人户，导致唐代的户口统计极不完整，杜佑估计天宝年间的实有户数至少在一千三、四百万户是可信的，若平均每户 5.75 口，则应有 8,050 万口。冻国栋认为户口严重脱漏(包括户口逃亡，现有户籍不予录名及户口隐漏两种情况)，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浮逃人口和土户隐漏按最保守的估计应占著籍总户口数的半数以上；其次还有丁口虚挂的现象，即丁口逃、死不存，而户版不予剔除，照旧登录，这种现象的产生大致与唐代地方官的考课标准有关，它加剧了户口不实和籍帐的伪滥；加之相沿已久特殊户口不入州县户籍的旧规，进一步扩大了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的差异。陶文牛《唐元和

长庆年间户口考》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及其他资料，也认为元和长庆之际，全国在籍户数虽仅有390万户，其中南方比北方多100万户以上；但当时各级官府所控制的浮寄户和形形色色的逃户总数大大高于在籍户数，因此，元和长庆之际的实有户数要高于天宝末年的在籍户数，接近当时的实有户数①。

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变乱，各政权户口数多有缺失，因此，对这一时期户口统计的研究一向付之阙如。杜文玉、高长天《五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一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作者根据史籍所载宋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全国户数、后周末年户数及各国入宋时的户数，推算出当时户口年增长率为0.4299%，进而推知五代末年(960年)全国户口为3,189,589户。不过，作者也指出，这只是各国在籍户口的反映，另外还存在大量不入籍的僧侣、贱民、浮寄户、军队与逃亡户等②。

专门研究城市人口的有赵冈、陈仲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③。此文认为研究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很难按职业来划分，只能按集居点的人口数作一大略估计。该文依2000人为划分点，估算出唐代天宝年间城市人口1099万人，其中长安60万人，洛阳30万人，每州治2万人，每县治5千人。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演变的时期，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由北方逐渐移向南方，从而形成新的人口分布格局。而开皇天宝之间近二百年又是这一新的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④通过对大业、贞观、开元天宝三个时期各地区人口分布的考察与对比，研

---

① 《首都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② 《延安大学学报》1989年2期。

③ 《食货》复刊号第13卷3、4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84年4期。

究了各个时期的人口密度及人口重心的变迁。文章第一节论述了开皇天宝之间人口呈驼峰形的升降变化，开皇大业间人口平均每年递增千分之十三，隋末至贞观初是人口大跌落阶段。贞观天宝时人口又以年平均千分之十的速度上升。第二节计算了隋代户口分布密度。人口密度最大的河南诸郡，平均每平方公里9.06户，最疏的地区是陇右诸郡，每平方公里仅0.2户。文章通过列表分析得出结论说，隋代北方人口占总人口的3/4。每平方公里六户以上的人口稠密区东达泰山、渤海，东南至淮水，南部汉水中游、秦岭，西极陇山，北到五台山麓、巨马河畔，正是当时的主要农业区。文章第三节论述了贞观中的户口，分析了其时北方人口的普遍减少和南方部分地区人口的显著增加，以及人口的大幅度徙动和分布区域的明显变化。第四节论述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时，通过列表分析贞观天宝时全国十五道的户口增减率与人口密度，指出当时全国人口稠密区有三，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成都平原及邻近地区，一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及浙江地区。当时北方七道的户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4户、14.5口，南方八道为2.2户、11.4口，虽然北方对南方仍微占优势，但已不是开皇大业时那种压倒的优势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参看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四章《唐代人口分布》。他认为新的人口分布格局始于天宝末年，在中晚唐基本完成。唐代人口分布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人口主要集中于大河流域的平原、河谷地带，但由于地区开发的差异，人口相对稠密的诸水流域平原、河谷地带彼此间也有很大不同，而山地、丘陵间人口分布的差异更大；唐代东部人口稠密，西部稀疏；各个道州县均户数相差悬殊；人口地区间分布在相对稳定的同时，又起伏较大，有时变动甚至很剧烈。关于影响唐代人口分布的诸因素，冻国栋重点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及由政治、军事等因素引起的人口迁徙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值得参考的论

文还有黄盛璋《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①、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② 等。

关于隋唐人口问题的论文，还有洪廷彦的《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初步分析》③、翁俊雄的《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渊源系年和校勘》④、刘海峰的《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⑤，以及刘进宝的《隋末唐初户口税减的原因试探》⑥ 等文。洪文主要指出《隋书、地理志》所记北方户数比较属实，南方陈旧境户数则可能少了120—130万户。隋盛世全国户数大约有1030—1040万户左右。

2. **人口流移**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人口迁徙规模巨大，这对于改变当时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南方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较早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三十年代黄谷仙的《唐代人口的流转》⑦。该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及"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了当时的人口流动情况，认为人口流动方向差不多都是流向南方。大抵老百姓自动迁徙多向江淮以南，政府强迫流徙的多向岭南以南。前举易曼晖《唐代的人口》一文还论及城乡流民的生活。认为城市流民除少数经商、做工及当兵外，大多飘泊无依；农村流民则降为佃雇、沦为奴隶，或遁入空门，逃避山林。最近系统论述唐

---

① 《历史研究》1980年6期。
② 《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4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
④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
⑤ 《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3期。
⑥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3期。
⑦ 《食货》2卷7期1935年。

代人口南迁的论文有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①。文章指出：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兼并激烈和社会动乱，安史之乱以后掀起了人口南徙的浪潮。文章并列举材料论述了南下人口主要分布地区是苏南、皖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和湖北南部、四川、两广等地区。文章还列表分析了唐十道地区在隋大业五年、唐天宝元年、北宋太平兴国时的户数变化特征，然后又分析了隋大业五年、唐天宝元年和元和时期十道人口密度的变化状况。其结论是，开元天宝期间南北人口大体平衡，经过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我国古代人口分布的重心便由黄河流域移到了江南。

冻国栋在前举《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五章《唐代人口迁徙》及《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② 中，详细讨论了唐代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各种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唐政府对于人民的自发迁移予以严格限制，重点在于畿内、有军府州和边州的人户，其目的在于保证赋役征发有充分的来源，至开元年间，这种禁令逐渐宽弛，反映了唐政府对全国范围内逃亡问题的日趋严重、人口流动频繁的现状的默认和无能为力。在唐政府严格限制人民自发迁移的同时，也实行了若干移民措施，如移狭就宽、募民戍边、募民屯垦、配流谪边、移民就食等。唐代官府所组织的移民规模有限，真正大规模的迁移主要是官府移民之外的人民自发迁移，包括唐代士族、官僚士大夫的迁移，与一般民户的迁移。就士族、官僚及士大夫的迁移而言，唐代前期，由于两京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吸引力，流动人口大量流入两京一带，当然也存在由京师流往外地州县的现象；安史之乱后，官僚士大夫在战乱背景下的迁移最为突出，其流向主要从两京移往江南、剑南、荆南和岭南

① 《江淮论坛》1983 年 9 期。

② 《河北学刊》1992 年 1 期。

地区，同时也存在士大夫以讲经习业为特征的自发迁移和官僚士人以寄住为特征的变相迁移。就一般民户迁移而言，他们或是由于战乱和灾荒而迁移，或是在封建赋役迫压下的逃亡，这两种逃亡形式唐代前后期都有存在，但唐代后期的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民户逃移的流向主要是邻近州县、落后山区、寺院、城市等。翁俊雄连续发表一系列有关唐代人口流移的论文：《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问题》、《开元、天宝之际的逃户》、《唐后期民户迁徙及两税法》、《安史乱后"仕家"的南徙——兼论"辟署"制度的形成》及《两税法后仕家的南徙》①，探讨唐代前期的徙民、逃户现象以及唐代后期民户及仕家的迁徙等问题。在《唐后期民户迁徙及两税法》一文中作者认为唐安史之乱后及两税法实行后发生的两次民户大迁徙，都与两税法密切相关，前一次民户迁徙是由于均田农民处境恶化及躲避战乱引起的，直接导致了两税法的实行；后一次民户迁徙则是由于两税法实行后赋税负担不均引起的。这两次民户迁徙的去向基本一致，都迁往自然条件优异、地力有余、赋役较轻的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及岭南地区。迁徙的结果造成国家编户大幅度减少，浮寄客户大量增多，从事工商业者日众。

一些论文还研究了这时期少数民族的移民问题。如方国瑜《唐宋时期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②、艾尚连《回纥南迁新探》③、邵文实《唐代后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其后果》④、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⑤、崔明德《论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特点和移动的主要趋向》⑥ 等。

---

① 均见《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

② 《人文科学杂志》1957 年 1 期。

③ 《民族研究》1982 年 4 期。

④ 《敦煌学辑刊》1992 年 1、2 期。

⑤ 《暨南学报》1994 年 1 期。

⑥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 2 期。

3. 人口年寿及职业构成

以往学者们对于隋唐五代人口问题的认识，偏重于对人口统计、分布及人口流移等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所兴起的对唐人年寿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作者在大量正史、文集、碑刻资料的基础上，较好地采用了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如抽样统计法，求出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并利用平均死亡年龄与平均寿命之间量的关系，推算出唐人的大致平均寿命水平，以此为基础，对唐人的性别平均寿命，唐人寿命的阶层差别、时代差别、性格差别及唐人死亡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确切考证出唐人生卒年代对研究唐人年寿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作者在书中第二章精心制成唐人年寿总表，并在第九章对唐代 84 个人物的生卒年代进行辑考，从而为整个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唐人寿命总表出发，作者采用抽样统计，个例考察以及通过史料相关记载进行验证的方法，同时参照天津市和江苏江阴县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出唐代皇室人口平均寿命为二十七岁多，一般人则不超过二十七岁。至于影响唐人寿命水平的因素，作者归结于医疗卫生水平、战乱、自然灾害、征戍与暴敛，政治斗争的残酷等。

唐人寿命中的性别、阶层、时代、性格差异以及唐人死亡原因是全书论述的重点。作者认为唐代各阶层平均寿命高低依次为僧、道、高、中级官僚、平民及下级官僚，这与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由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不同，唐前期人口的平均寿命要稍高于唐后期，整个唐代人口的寿命水平则高于南北朝时期两三岁左右，但与现代人口的寿命水平相差悬殊，通过对男女两性寿命水平的对比考察，可以发现唐代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高出女性人口两岁左右，女性人口短寿者多于男性，这是由于产妇死亡率较高的缘故，同时女性长寿者也多于男性，这与唐代社会中女性的体力、心力消耗均小于男性，因而高血压冠心病等发病率低于

男性有关。关于唐人寿命与性格差别的关系，书中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比李勣与褚遂良，郭子仪与李光弼，韩愈与白居易之间性格的差别对寿命的影响，认为性格稳重宽厚，乐观豁达，恬退无竞，隐居不仕，放情山水，爱好释老者较得高寿；关于唐代人口死亡原因，作者通过对样本人口死亡原因的统计，认为人为死亡，脑血管病，传染病，疮病及服长生药为唐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李燕捷另一篇论《唐代人口死亡原因初探》① 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此外，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也注重运用人口学、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注意量化及定量分析，为此，制有大量图表，计有图九幅，表二十三幅，这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卢华语《唐代统治阶级年寿刍议》② 及李燕捷《唐代皇室人口平均寿命研究》③，也是研究唐人年寿问题的较有价值的文章。

唐代人口统计中，还涉及到人口的职业构成问题。翁俊雄《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一文指出，唐代除占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外，官吏、士兵、工商业者、僧道和奴婢占很大比例。唐前期上述非农业人口合计约有二百万人，唐后期非农业人口数量则大为增多，总计约有四百余万人，这是由于唐后期生产力较前有了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口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从事各行各业。

(二)人口类别——妇女与外侨

各类人口研究中，以对妇女的研究最多。老年、青年、儿童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当然有些文章也涉及到老年、青年、儿童问题。如李春润《略论唐代中男的赋役负担》④考证了贞观手实中所见中男

① 《河北师院学报》1994 年 3 期。

② 《贵州师大学报》1992 年 3 期。

③ 《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④ 《广西师院学报》1981 年 4 期。

的下限当在十岁或十一岁，也涉及当时农村少年的受田与课役负担问题。还有些论述学校的文章涉及到青年学生问题，论述赋役负担的文章涉及到老年免役问题。此处仅重点介绍一下对妇女与外侨问题的研究情况。

1. **妇女**

首先是关于唐代妇女地位的研究。杨廷福《唐律初探》指出，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在室未出嫁的和已出嫁的有所区别。在室未出嫁的女子，固然听命于父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较同辈男子为卑逊，但长幼的名分则不可逾越，并不因男女有异。兄与姊并列，在法律地位上与弟妹有等级之差，就是在五服之内的本宗亲属和外姻兄姊弟妹，也享有“长幼”名分。女子一经出嫁，便从族权、父权压迫下，转移到夫家族权的压迫之下，而以夫为纲了。但是《唐律》关于妇女的法律规定，还是斟酌当时人体情况和妇女生理特点的，如孕妇犯罪得以缓刑，妇女犯流罪的不独流，“留住决杖居作”；妇女的封爵称命可与男子享有同样待遇，并能独受邑号，不以夫为尊卑（相对的政治权利）；在户绝无男子的条件下，妇女还可以获得相当的财产继承权。

在有关妇女问题研究中，妓女的研究占相当比重。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把当时的娼妓分为家妓和公妓两种。作者说，唐代皇亲懿戚、公卿百官，以及骚人墨客，莫不蓄养家妓，其身分介于婢、妾之间，且兼优伶性质。公妓为官厅所设，属公家之物，长官可随意使用。公妓分供天子娱乐的宫妓，供官吏娱乐的官妓和供军士娱乐的营妓。唐代公妓有妓馆，在长安者称某里，如平康里、北里。里内分为某曲，如南曲、中曲之类。其中妓女多为出资购买，亦有以欺骗手段得之。妓女在馆中行动不自由，受鸨母监视压迫。宫妓所居为“坊”，又有“苑”或“院”等。坊中妓女因气味相投，多结拜成兄弟姊

妹。高世瑜在《唐代的官妓》①中又进一步指出，官妓制度在唐代空前兴盛，当时两京、各大府州，甚至县级政府都设有官妓。名隶各地府州的地方官妓由官府供粮，身受严格限制，官奴婢味道很浓。长安官妓虽也名隶官府，但相对自由，地位稍高，靠自行开业谋生，类似后世娼妓。唐代对妓女并不以姿色为主要评价标准，而更重才艺。与其他众多妓女相比，有更接近艺术、人格相对独立的一面。

关书敏《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②指出教坊妇女地位并不平等。处于中等地位的是云韶院的"宫人"，其中色艺俱佳者入宜春院，叫"内人"，内人完成难度较大的歌舞，每月家中女性亲属一人可去禁中探视一次。宫人则无此待遇。内人晋升一级称为"十家"，其地位最低下的是"两院杂妇女"。教坊妇女被放出宫禁，大概有不少作了商人妇。

妇女从天足到缠足也是妇女地位变化的侧面反映。贾伸《中华妇女缠足考》③在列举了缠足起始的八种说法之后，指出缠足当始于隋唐之间，并据清马扬、盛绳祖《卫藏图识》载西藏灯具状如弓鞋，认为是贞观时文成公主嫁吐蕃时留下的遗品，又说其时仅宫中偶一为之，还不能成为一种风尚，五代至宋熙丰以后才渐多。近人的研究，多数主张缠足始于五代。张宗立《历史上第一个裹足的妇女》④，具体介绍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宠妃窅娘第一个缠足的经由。

隋唐时期妇女地位与两宋以后有所不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⑤中，认为武则天之所以能上台称帝，除了她本人的杰出才能、政治手腕之外，还与当时社会习俗有关，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机会，成

---

① 《史学月刊》1987年5期。
②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4期。
③ 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
④ 《历史知识》1986年3期。
⑤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为一时社会风气。一些武则天研究者在考察了唐代女性的社会面貌后，也指出唐代女子社会地位较高，女性普遍读书习文，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交活动。唐代女子还具有雄健强悍的性格，婚姻关系也较自由，这些都是武则天成功的因素①。

许多文章对隋唐时代的其他一些杰出女子进行了研究，如平阳公主、长孙皇后、文成公主及陈硕真、薛涛、鱼玄机、花蕊夫人等。

高世瑜的《唐代妇女》②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社会的专著。作者在书中以丰富的资料对唐代妇女中各个阶层的状况，以及她们在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做出的业绩，她们的婚姻、娱乐和妆饰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揭示了唐代妇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风貌。

近几年，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妇女问题的研究论文不多，仅有罗春雄《论唐代的妇女参政》③、苏者聪《论唐代妓女的才华、情操、命运》④、尚民杰《唐代妇女的艺术形象》⑤ 等短文，再有就是对一些著名女性如武则天、薛涛的研究。

2. 外侨

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封建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发达，许多外国人来华或经商、或奉使、或传教，有些就定居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如何？高树林《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⑥对此作了探讨。文章说，唐宋时在中国的外国人，一般理解为原居外国、后到中国居住，不属中国血统的一切外国人。唐代留居长安的外国人数以千计，留居扬州的大食、波斯商人也不下

---

① 程志、牛志平《武则天讨论会综述》、《陕西师大学报》，1986 年 1 期。

② 三秦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江汉论坛》1989 年 5 期。

④ 《唐都学刊》1992 年 2 期。

⑤ 《文博》1992 年 6 期。

⑥ 《吉林大学学报》1978 年 5－6 期。

数千，而广州的外国人（他们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火袄教、景教或犹太教）更多达十几万（按：有人不同意这一估计）。这些外国人当中有世界各国，如日本、新罗、真腊、骠国、波斯、大食、天竺、康国、石国、拂菻等国派来的使者，有在中国避难的外国贵族及其随从人员，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求法僧、商人、乐工、舞者、杂技人以及被掠来的外国奴仆。文章还指出，唐宋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基本采取的是欢迎、重用和优待的态度，即“招徕”政策。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居住权、受教育权、政治权、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婚姻权、诉讼权等。

全面深入研究外侨在中国生活地位的还有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①一书。全书分四编介绍了“蕃胡”在唐代各地的分布，及影响这种分布的三大要素；“蕃胡”在唐代的生活情形；李唐政府对“蕃胡”的管理以及由“蕃胡”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蕃胡”对唐代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等。应该指出的是，该书题目虽然是《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实际上其所谓“蕃胡”除了日本、新罗、高丽、大食、波斯等外，还包括了薛延陀、铁勒、突厥、回纥、吐蕃、奚、契丹、室韦、靺鞨、渤海、吐谷浑、南诏等国内少数民族。

近年全面介绍唐代外国人在华情况的有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他把唐代来华与留居的外国人分为使臣、入质或入卫的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战败国归化者，僧侣、商胡六类，认为他们在唐代并未受到排斥、歧视，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经济待遇，同唐人一样可以做官为将，参加科举考试，置产娶妻，经济权益不受侵犯②。介永强《唐代外商》则主要揭示众多外国商人在华贸易与生活情况，指出唐代外商有官方商使和民间商人两种，前者与唐王朝从事“进贡”与“馈赠”

---

①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1 期。

形式下的国家贸易，后者在唐代中后期随海外交通的发展而逐渐壮大，主要从事贩卖珠宝，举质取利，做卖胡食，开设酒肆等。外商在华主要集中于长安、洛阳两京及广州、扬州、泉州三大港市，他们一般拥有自己的店肆，胡汉通婚，财产豪富，接受汉学，宗教活动较为自由，并受法律保护，违法而受惩处也得到一定照顾①。

唐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之唐代社会开放，因而有大量的朝鲜半岛侨民在华生活，他们在华的状况如何？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认为当时在华的三国侨民有因战争被迫迁居唐土者，因奉使或宿卫来唐者，留学生及求法僧人，生活在唐境内的新罗平民，对这四种人在唐朝处境与活动，文中也分别进行了探讨②。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考察新罗人留居唐境的分布情况及社会活动，指出新罗侨民散居于唐境七道，十九个州府，而以两京地区，今山东半岛沿海，淮河下游，长江入海口地区较为集中，聚集着大量新罗人的侨民村落、场、所馆院。新罗人留居唐境人数最多，阶层最为复杂，所从事的职业也最为广泛，既有使节、留学生、僧人，从军从政者，也有充当私人译语职业，奴婢、商人③。

粟特人在唐代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他们是在唐外侨的重要组成部分。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认为从有关墓志、经幢、碑铭等石刻史料中反映出在华粟特人与汉族大量混居、通婚，逐渐汉化，其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发生转变，葬俗由多采用火葬到接受中国习俗，采用土葬，有棺椁，且出现夫妇合祔；宗教信仰则由奉祆教、景教到大量信奉佛教，无一不反映出入华粟特人与汉族

---

① 《晋阳学刊》1995 年第 1 期。

②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韩国，1995 年。

③ 《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的同化过程[1]。其余研究粟特人的论文还有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2]，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和政治活动》[3] 等。

在外国侨民中，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生、学问僧占有一定比重，这方面的论文也较多；中亚、阿拉伯地区穆斯林、商人也有相当比例。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王仁波《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与日本留学僧》(《文博》1989 年 6 期)、穆宝修《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与留居》(《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 5 期)、赖存理《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史学月刊》1988 年 2 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具体的探讨，可以参看。

(三)社会救济及慈善事业

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4]是较早地专门研究当时社会慈善事业的文章。他认为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济贫救灾，这一点何兹全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中已有论述，全汉升进一步认为其救济物资除寺院种种收入外，还有政府给予、佛教徒工作所得、僧祇粟三项。第二项慈善事业是治病。由于要给人们治病，佛教寺院对医术的研究颇为高明，并将医术传授给佛教徒和俗众。就材料所及来看，他们治疗眼疾、脚疾、头风伤寒、难产等病最为拿手。当社会上传染病(瘟疫)流行时，佛教徒还游行乡里治病。第三项慈善事业是戒残杀。最后一项是广泛宣传慈善事业，宣传作善事的好处。

---

① 《史学月刊》1994 年第 1 期。

② 《历史教学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③ 《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关于粟特人的研究参见程越《国内粟特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 年第 9 期。

④ 《食货》1 卷 4 期，1935 年。

义仓是隋唐时代民间用以自救备荒的。朱睿根《隋唐时代的义仓及其演变》[1]指出，这种性质的义仓始于隋开皇五年度支尚书长孙平的上书。起初是由乡村基层组织社司管理，开皇十五年转归州仓曹管理。这时赈给百姓的粮食仅是杂种及远年粟。义仓的交纳也由自愿变成了强制，从不拘成数变成了按户等高低征收固定额。唐代义仓在隋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王公以下亩纳二升外，商人也须交纳。义仓粮的用途除荒年赈济外，还借贷给农民作种子。武后以后义仓粮被大量动用，至玄宗时又恢复了义仓按亩征税和赈贷制度。但不久义仓粟便完全被政府占用。元和时义仓与常平仓结合为常平义仓，主要是在青黄不接时进行粮种的借贷，已很少有无偿赈给的。义仓向百姓所征粮食，也只有在连年饥荒时才可暂停，容至半年填纳。这种义仓完全成了官办的贷借机构，失去了民间备荒自救的性质。

有唐一代，水害严重，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系统揭示唐代的水害情况及其影响，指出唐代水害成因既有降雨、河决、海啸等自然因素，也有战乱、采伐等社会因素的作用，唐代统治者的水害对策是重在预防，及时救助，恢复生产。受儒家学说中"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观的影响，唐代君臣在水害发生时震于"天谴"而检讨政策得失，导致人事更迭，以及对朝政与刑政的改革[2]。

中国古代的救荒活动到唐代已臻于成熟，在实际中发挥很大的成效。潘孝伟《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概括唐代救荒措施具有系统化、制度化及务实性的特点，表现在救荒措施上既有灾前预防、临灾抗御、灾民救济、灾后恢复等四大环节，又有义仓、常平仓、水利、赈济、蠲复等相关制度，而这一切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务实精

---

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 2 期。

② 《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7 期。

神①。

乞丐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唐代是采用设立病坊的形式对其加以救济。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首先探讨唐代乞丐的生活状况，指出乞丐行讨形式多种多样，或利用脚书绝技，或利用怪胎动物，或利用歌唱行艺，或利用占卜预言等等。他们人生沦落，生活贫困，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怜悯同情，同时儒学在中唐重振儒家伦理道德，“爱人”精神得到发展，乞丐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章第二部分利用敦煌文书等有关材料，探讨唐代官府设病坊安置乞丐的真实状况，指出唐代病坊也称“普救病坊”，收容乞丐、老疾孤寡贫，兼收容院、养老院、孤儿院等诸种功能于一身。病坊由官府设置管理，指定寺院代管负责，并划拨一定数量土地（称“悲田”）。唐代统治者对悲田病坊都很重视，发布过不少有关诏敕，武则天时曾设悲田养病坊置专门管理。敦煌文书表明，唐代敦煌郡病坊由官府拨给本钱，放贷收利，供给贫丐，存在着一套严密地支拨本钱、获取利息、调集物品及保管使用制度。唐代病坊在实际生活中起到粉饰太平、稳定社会及收揽人心的作用，也符合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精神，尽管不能根本解决乞丐问题，但却有其独特作用②。另外，唐代社会中的侍老制度也颇有特色，陈明光《唐朝的侍老制度》指出唐朝的侍老制度涉及徭役、服刑、任官、版授、颁赐等诸方面内容，其立法意图侧重于“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相关的措施兼顾情与理两面，堪称中国古代敬老、养老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③。

---

① 《安庆师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② 《人文杂志》1992 年第 6 期。

③ 《文史知识》1991 年第 11 期。

四、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的研究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范围得到拓宽，深度有所加大。在系统全面地描述这一时期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方面，一些学者也做了有益的尝试。1987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茶具及大批金银器具，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唐代茶文化及金银器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所问世的一批有关唐代的影视作品，引起社会上对这一时期生活方式与风俗习尚包括服饰、饮食、住行、游艺等诸多方面的浓厚兴趣，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推动，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一领域研究蓬勃发展的现状与前景。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从整体上来说并不高，存在着许多学者们尚未涉及的空白，从已有成果来看，以介绍叙述性质的居多，如何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待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一）物质生活与风俗习尚

较为全面地论述这方面情况的，主要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的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乐成的《唐人的生活》①。这两篇著作都从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方面对这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习俗做了系统的论述。近年来关于这一领域全面系统性的论著有臧嵘、王宏凯所著《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该书从节令、服饰、饮食、住行、婚姻丧葬、游艺、民族等方面多层次地描述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俗，并把这一时期的习俗归结为开创性、开放性、兼容性。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九章《风俗习惯》也从饮食、服饰、居室、婚丧等几方面对隋唐时期的风俗进行简明

① 《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

扼要的介绍。万建中在《隋唐风俗的时代特征》(《文史知识》1995年6期)则把这一阶段的风俗特征总结为开放、奢靡、胡化、务实四个方面。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从婚丧、迷信、解梦、医疗、占卜、妆扮、饮食、建筑、行旅、娱乐等各方面探讨了敦煌地区的民风习俗,可称力作。

1. **服饰、化妆**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和上海戏剧学校编的《中国历代服饰史》(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中,有关隋唐时代的服饰都是图文并茂,十分翔实具体。日本学者原田淑人的《唐代的服饰》(东洋文库,1970年)一书是论述服饰的专著。周峰所著《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是一部隋唐五代时期服装资料专著,该书把隋唐五代时期的服装风格特点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重点介绍不同时期男女服装、巾帽佩饰的样式及流行情况;三、四两章则是这一时期的服装参考图录及说明,书中选取众多绘画、壁画、石刻、出土俑中的各类服装样式,并附有准确扼要的说明。此外书中还摘抄《隋书·礼仪志》、《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中有关服饰部分的内容,并有隋唐五代时期服装杂志类钞。段文杰运用敦煌壁画的形象化资料,在《形象的历史》、《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均见《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诸文中用较长篇幅探讨隋唐五代妇女服饰妆扮的演变,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其他还有一些散篇论文,如孙机的《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4期)、武内和子的《唐代服饰及美的意识》(《帝冢山短期大学纪要》1967年4期)、薛天纬的《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第六辑,1982年)、杨如鹏的《中国古代妇女面饰琐谈》(《学林漫录》第六辑)、尚衍斌的《唐代西域服饰考略》(《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1期)、武敏的《吐鲁番考古资料所见唐代妇女时

装》(《西域研究》1992 年 1 期)、李蓉的《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 年 1 期)等。

傅乐成在《唐人的生活》第二节中首先指出,以服装的颜色来区别身分是唐代服制的重要特点,但又指出虽然唐代服制规定甚为详细,但并未严格执行。然后,作者又分别介绍了唐代男子和妇女服装的特点:唐人男士通常着袍,此外上衣有衫、襦、袄等,下衣为袴。书学、算学、州县学生虽皆男士但也着白裙。奴婢则服襕衫。衣料有丝、绢、绫、罗锦、绣、纱、绡、纫、素、缯縠、缣、白紵布等。妇女的服装则有襦、衫、裤、裙、半臂、披帛、袍、袄、带等,五光十色,名目繁多。同时作者还指出,唐人服装深受胡风的影响,直到宪宗元和以后,胡风才趋衰落。但中唐以后妇女盛行袒胸之习,仍可能是受天竺佛教文化的影响。

傅文还对唐人的冠帽和鞋袜进行了考述,认为唐代冠帽之制名目繁多,主要目的仍是在区别官阶,此外男子通常戴巾子和幞头。唐初女子戴皂罗,亦称幞头,同时又有席帽(又称帷帽),男女适和。胡帽也很流行,足服则有靴、鞋、履、屐、舄等,妇女还著罗袜或锦袜。

此外,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① 第四节《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中,还提到了从唐初到开元妇女帽装的变化。隋及唐初,宫人骑马多著幂䍦。永徽以后皆用帷帽。开元初又有胡帽,民间因之相习成风。向达还指出幂䍦本亦西域服装,可以障蔽全身。

后世一般以乌纱为官帽的代称。薛天纬《乌纱帽小考》认为乌纱帽起源于南朝刘宋时,开始并不是官帽,而为天子及士庶所通用。帽子曾用白纱或杂色纱制成,形状亦无定准。唐乌纱帽曾为天子及太子所专用。但太宗以后,又诏为官民所通用,它与"白接䍦"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乌纱帽之言官帽是唐以后的事情。

---

① 三联出版社,1957 年。

冠服礼俗是隋唐五代服饰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以下简称《习俗史》)认为隋唐的冠服制度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隋唐不同时期对冠服制度都有不同的损益,隋文帝采用东齐的冠服制度,并确定按用途区别帝王冠服服色;炀帝时制订新的冠服制度,帝王冠冕加金博山装饰成为天子冠饰特征;唐高祖时制定了此后最系统、完备的冠服制度,确立赤黄色为帝王专用服色;太宗创制了翼善冠,并制定百官"品色服",此后成为定制;武则天时创制"武家诸王样"头巾以及绣以铭文纹饰的"铭袍",确定在官服上绣以图案以区别官阶的作法,为后世沿用,至明清形成补服制度。

《习俗史》也认为隋唐服饰文化最突出的特色便是"胡服"盛行,主要表现在胡服、胡帽、回鹘装、幂䍦、帷帽的流行及女著装的习俗。关于唐代妇女盛行袒露装的问题,傅乐成认为这可能是受天竺佛教文化的影响,《习俗史》认为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受礼教束缚少的体现,还与唐代妇女穿裙子束腰极高有关。当时穿短衫襦、长裙是妇女们追求的时尚,一般的裙腰束到胸前,使胸部半袒露出来,由于袒露装能充分体现出女子的形体美,所以盛唐时期颇为时髦,除宫中乐舞伎、宫女外,也受贵族妇女喜爱。

关于唐代冠帽中的胡帽样式,引起学者间的争议。沈从文认为胡帽大致指浑脱帽;向达认为是一种卷檐上锐的帽子;日本学者原因淑人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出土俑考证认为"有骑马女子俑戴笠状物,或者即为胡帽"。《习俗史》据唐诗考证,认为胡腾舞帽为卷檐尖顶,上缀珠玉,柘枝舞帽为卷檐虚顶,上缀珠玉,且帽上施以金铃。至于隋唐五代时期男子通常所戴的幞头,《习俗史》认为隋至盛唐的幞头多用柔软的绢罗制成,两脚自然下垂,被称为"软脚幞头",总的发展趋势是巾子渐渐加高,有"平头小样"、"武家诸王样"、"内样巾子"、"英王踣样"及"开元内样"等多种样式。中唐后巾子渐渐直立,两脚也渐为平直或上翘,被称为"朝天幞头"或"朝天巾",五

代时则发展成为两脚平伸的“硬脚幞头”。

关于唐代妇女的化妆，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列有专节，介绍了“髫鬟”、“额黄”、“雷云眉”、“朱粉”、“口脂”、“花钿”、“壮靥”等化妆方法。杨如鹏《中国古代妇女面饰琐谈》则对“贴花”等化妆术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傅乐成在《唐人的生活》中，还从面饰、发饰、颈饰、臂饰、指饰五个方面谈了唐代妇女的装饰。

《习俗史》介绍当时妇女佩戴首饰习俗的几个特色，即插梳篦之风极盛；流行簪花；戴臂钏，臂钏起初多套在手臂上，至隋唐年间，位置逐渐下移，最后成为一种腕饰；极少戴耳环、耳坠；中亚首饰已传入中国。

2. 饮食、茶酒

关于唐人的饮食，傅乐成《唐人的生活》中也列专节做了论述。他特别提到当时官员的食料例由政府供给，按官职高低分配其多寡。肉类以猪、羊、鱼为主，粮食以米、粟、面粉为主，菜蔬以葱、蒜、姜、瓜、葵、小豆为主，甜食以蜜、酥、梨、干枣为主，佐料以油、盐、豉、酱为主。作者还特别指出唐人好胡食，此种风气以开元时为最盛。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并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几种胡食，如胡饼、䭔䬿、饆饠、三勒浆等进行了考证。

《习俗史》系统地介绍隋唐五代时期的宴会、名菜佳肴、胡风饮食及饮茶、饮酒之风等饮食习俗，指出隋唐五代饮食文化兴旺发达，人们在饮食方面不断创新、花色品种增多，饮食行业繁盛，中外饮食广泛交流。此外，从总体上探讨这一时期饮食的散篇论文还有姚伟钧《唐代的饮食文化》①，陈伟明《唐宋饮食观念与心理试探》②，其中姚文的观点与《习俗史》基本相同；也强调饮食行业发达，饮食品种的丰富，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独具一格的饮食风俗

---

① 《华中师大学报》1990 年 3 期。

② 《未定稿》1989 年 8 期。

是当时饮食文化的特色。陈文指出唐宋时期的饮食观念讲究火候，本味为上，追求蔬食，饮食有节，把烹饪、饮食、养生三者有机联系，饮食的目的已从果腹升华到益寿，在把饮食做为生理需要的同时还发展到做为心理享受。唐宋饮食心理中的美学特色也很突出，对饮食美感的追求不仅包括食物的自然美与食物加工的艺术美，对饮食环境的意境美也有较高的要求。

关于隋唐五代具体的饮食方式，《习俗史》指出当时菜肴的烹饪方法增多，制法精美，品种丰富，风味多样，在隋谢讽的《食经》、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以及其他文献中就记载了包括热菜、凉菜、花点在内的几十种名菜。这一时期以羊、牛、猪、狗、马等畜类为菜肴的主要原料，其中以羊肉为肉食之首，同时以鸡、鸭、鹅等禽类制成的名菜也很多，山珍海味这时也进入筵席，著名的有“八珍”，除热菜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凉菜，特别是花色冷盘，著名的有“五生盘”、“八仙盘”及“辋川小样”。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主食部分)》结合敦煌文书及有关史料，除对唐五代北方地区所流行的胡饼、粥、馎饦、饆饠等16种主食进行研究外，还分析当时北方地区的主食原料、消费量、主食结构及饮食者层次等问题，认为北方地区的主食原料主要是麦粟，稻米较少，消费量为成年男子每日3升，当时人们的主食结构为早上一般吃粥、馎饦等稀食，也有吃糕饼，尤以长安城为多，午饭多吃干食，种类较杂，如胡饼、粟米饭等，晚饭吃汤饼、煎饼，尤以后者为多。通过对贵族官僚；举人、城市平民、旅人、士卒；村民、工匠、役夫、贫贱者；僧人四个饮食层次的研究，认为从一般饮食看，胡饼的食用面广，但层次较低，饆饠等食物的层次就较高，当时有许多食品是在食店里制作出售的，反映了唐五代饮食业之发达[1]。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

---

① 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活》从主食、副食、饮料三方面重点研究长安居民的饮食生活①。

隋唐五代时期筵宴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习俗史》按等级、规模的区别，分别讨论了当时宫廷宴、官宦宴、文人宴及著名的曲江宴的盛况。一些学者注意到宴会的社会职能，黄正建《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②认为唐代官员宴会，无论是（皇帝）赐宴，（官员）会食，还是一般宴饮，其社会职能都是一种为调剂人事关系，从事人际交往而采取的手段，共同目的都是要达到人事关系的“和”，以符合儒家“和为贵”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社会政治思想。拜根兴在指出唐代官场的饮食活动有调和矛盾，维系国家机制运行的同时，更侧重于指出其负面作用，认为官场上的各种饮食活动如献食、赐食、廊下食、地方公厨食等毒化社会风气，使官场在竞吃滥饮中愈加腐败，助长奢化，有碍政治清明，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对唐代社会衰竭及唐末农民战争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③。

古代的饮料主要是酒、茶和饧。傅乐成指出，唐代名人多患风疾（高血压）与纵酒不无关系。饮茶之风兴起于开元。唐代以后，国人酗酒之风减弱，或与饮茶有关。论述饮茶风气的还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④、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⑤。等。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⑥。研究了其时茶具与酒具的形制风格。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⑦。通过敦煌酒帐文书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府在各种场合下的饮酒情

---

① 《唐史论丛》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

③ 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1期。

④ 《文物》1963年1期。

⑤ 《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6期。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4期，1982年。

⑦ 《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况。1987年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一整套唐代茶具，为人们了解唐代上层社会的饮茶习俗提供了实物依据。1994年11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所提交的论文汇编成《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论文的学术主题大体包括六个方面，唐代茶道、茶道精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茶文化与文学艺术等，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海内外茶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被认为是继《茶经》以来又一次唐代茶文化历史性“结集”。另外，对唐代茶文化及饮茶习俗进行研究的散篇论文还相当多，如郭泮溪《唐代饮茶习俗与中国茶文化之始》①、暨远志《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二》②、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唐代茶业史研究》③、韩金科、梁子《从法门寺出土文物看茶文化与佛教》④。以及《习俗史》中关于饮茶风气的有关部分。总的看来，以上论文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的：饮茶习俗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统一；饮茶习俗与茶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对当时名水、名茶、茶具、煎茶、饮茶方式的研究与介绍等。

关于当时纵酒狂饮的饮酒之风，《习俗史》除对当时文人嗜酒之风、名酒及酒具进行介绍外，还重点谈了隋唐五代时期的酒令，指出唐代酒令极多，史料所载即有20余种，归纳起来，不外乎律令、骰盘和抛打三种基本形式。所谓律令，产生于初唐，是指依次按规定行令的酒令，一般包括文辞类、言语类酒令，如急口令，筹令；骰盘令，也叫“头盘令”、“投充”，产生于初唐，利用抛采决定饮酒次序的一种形式；抛打令，是一种歌舞化的酒令，约在盛唐时出现，是

① 《东南文化》1989年3期。
② 《敦煌研究》1991年2期。
③ 《中国农史》1989年4期。
④ 《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93年。

由豁拳、抵拳、弄手势等发展而来的，常用香球、花盏。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6）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了唐人的酒令，内容广博而深刻，是一部力作。

3. **居室、陈设与交通**

关于唐代居室建筑的论述，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和傅乐成《唐人的生活》之外，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① 中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傅乐成重点介绍唐代居室以贵贱为等差的定制，及其在天宝以后破坏的情况。肖默《唐代建筑风貌——从敦煌壁画看到的和想到的》② 一文，则根据莫高窟晚唐第85窟中的一所地主宅院为代表，指出唐代住宅与清代四合院颇为相近。

总的来说，论述佛寺建筑的文章要多于居室方面的。主要有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建筑》③、曾一民《唐慈恩寺塔院之建筑与文化习尚》④，以及前举肖默的文章等。

《习俗史》有关住行风俗一章认为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市建筑体现了规模宏大，规划整齐，为我国古代都市建筑的典范；在住宅建筑上也形成了许多住宅风俗，据敦煌卷子伯三八六五《宅经》反映要考虑居室布局的"五虚"和"五实"，建房过程中有建宅文、上梁文、饼钱抛梁的习俗，以及存在镇宅文、石敢当、符咒等禁忌习俗。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风水术在建筑习俗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葛承雍《唐代芳香建筑的文化透视》对唐皇家建筑和

---

① 中国建筑工业出发社，1980年版。

② 《文艺研究》1983年4期。

③ 分别见《文物参考资》，1951年5期；以及《现代佛学》5期，1963年10月。

④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7卷8期，1976年5月。

达官贵人住宅府邸大量使用香料做为建筑材料的现象进行探讨①。

雷巧玲《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② 及《唐代租宅初探》③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唐人的居住情况，前文认为唐代作为孝悌表现形式的同居、居庐及庐墓盛行，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虽然在佛教的冲击及赋役制度影响下导致了一些分居，但由于法令的限制，传统的孝悌观念及统治阶级提倡等因素，同室共居和守丧居庐的居住方式一直占着上风。后文指出由于当时住宅相对紧张，人口增多及考官、科举制等因素，唐代长安等城市出现大规模的租宅现象，租宅社会阶层广泛，有官吏、进士、僧道、处士，也有贫寒者、商人、妓女及一些身份不明者。租宅来源有官舍、私宅寺院，实现赁宅也要有一定程度等。

有关居室陈设的论述不多。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都介绍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具。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还介绍了灯檠和漆器用具。易水《漫话屏风》④、李振甫《敦煌画中的唐代供器》⑤ 等分别探讨了唐代的一些生活用具。李知晏《唐三彩生活用具》⑥ 根据考古出土的三彩器研究了唐代的生活用具。他把三彩器分为三类，一是属于贮盛器具类，如尊、罐、镀、瓶、壶、樽等；二是属于饮食用具类，如碗、盘、杯、钵等；三是属于卧室书斋的器物，如粉盒、砚台、唾盂等等。文章认为唐三彩生活用具具有博采众长、气势雄伟、规整统一、富于变化、造型多样、题材广泛等特点。

---

①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陕西师大学报》1993 年 3 期。
③ 《晋阳学刊》1993 年 3 期。
④ 《文物》1979 年 11 期。
⑤ 《飞天》1982 年 12 期。
⑥ 《文物》1986 年 6 期。

隋唐五代是我国室内陈设与家具形式大变革的时期。《习俗史》认为这一时期处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转变的时期，与此相适应，桌、椅凳、胡床、床榻等高足家具在盛唐以后迅速推广流行，形成这一时期家具的新风尚，此外，屏风的使用十分普遍，以书画屏风最为盛行，屏风样式最普遍的是矩形屏面以多扇横联的折叠式，多为六扇，少数有八扇。

在唐代器物中，金银器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唐后期，金银器的使用较为普遍，成为当时社会奢靡风气的一个代表。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荟萃了建国后历次重大发现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更汇集了部分欧美日本诸国珍藏的中国唐代金银器，是国内目前能见到的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有关唐代金银器纹饰的资料，该书的图版部分，共有分类汇编线图 36 种，器物线图 327 幅。为了便于研究，还对每件器物重新定名，并对其形制、制法、纹样，收藏地点作了简要说明。在此基础上，还对唐代制造金银器的目的及部门，装饰图案的题材、构图及其特点，唐代金银器的分期及图案的演变等问题予以简述。此外，还有一些散篇论文也谈到了唐代金银器问题，韩伟《唐代金银器拾零》①、冉万里《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及其特征》②，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③ 等。

关于唐代的交通，除吕著《隋唐五代史》外，章群的《唐史》④论述了当时出入关津的公验（身分证明书）和过所（旅行证件）以及关津制度、驿制与交通路线。傅乐成论述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与街道。指出唐代交通工具不外舆、马、舟、车等。黄现璠重点论述唐代的驿

① 《文博》1991 年 6 期。
② 《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 4 期。
③ 《考古学报》1994 年 2 期。
④ 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

传制度，包括驿事行政、驿传组织、驿递工具和驿舍的设备等。孔祥星通过新疆出土文书，研究了唐代西州的交通组织长行坊①。对唐代最常用的交通工具马进行研究的论文有李树桐的《唐代的马与交通》②、《唐代马的装备与装饰》③ 和孙机的《唐代的马具与马饰》④、王青《唐代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⑤ 等等。

近年来，关于隋唐时代交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习俗史》从交通工具及行旅观念两部分来介绍隋唐五代的交通情况。认为当时盛行骑乘之风，马、骡、驴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乘车之俗限于妇女；运输物资主要用牛，但也用驴、骆驼、马；肩舆流行，无论帝王、贵族官僚，还是民间妇人、僧侣无不喜乘；造船业发达，船的使用更为广泛，海船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在当时存在着畏远行的观念，这在敦煌变文及曲子词中都有反映；同时还存在一套由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组成的拜别送行程式。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探讨唐代交通通信组织"馆、译"之外的"传"、"递"的发展情况，指出唐代"传"虽不象驿那样是一个组织实体，"传制"在法律上也无系统规定，但"传"在唐前期仍然存在，随着"传"的三种用法"传舍"为"馆"所替代，"传符"为"纸卷"所替代，传送马驴的职责合并到驿马中，到唐玄宗以后"传"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而唐代的"递"则是唐代宗时刘晏所设置的，它是独立于驿之外以传递公文或以通信为主的组织，"递"首先在度支系统普及，后可能经历了由度支系统向州县管理的转变，这样"递"就转

---

① 《唐人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期，1981 年。

② 台湾《历史学报》(师大)第 5 期，1977 年 4 月。

③ 《大陆杂志》43 卷 2 期，1971 年 8 月。

④ 《文物》1981 年 10 期。

⑤ 《敦煌学辑刊》总第 8 辑，1985 年。

变成为“递铺”①。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在日本学者藤枝晃，我国学者孔祥星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石室遗书及吐鲁番古墓葬文书，探讨了唐西州长行坊的设置，长行坊牲畜种类、数量及管理制度，牲畜饲料、经费的使用与来源，长行坊的组织系统，长行坊及其牲畜的任务等方面情况②。王力平《唐代运纲研究》考察了唐代前后两期运纲制度的发展变化，并对运纲组织中的雇佣劳动、运纲管理、运纲制度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探讨③。此外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程喜霖的《护照与签证功能合一的过所》(《文史知识》1992年8期)、《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1期)、朱天舒《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主要畜力交通工具》(《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1995年)等。

(二)丧葬礼俗与时令节日

1. 丧葬礼制

研究唐代丧葬问题的有游寿《唐人卜葬邙洛之风俗》④、邱文《唐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⑤及“提要”⑥、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⑦等。其中周文着重论述了丧礼仪制方面的问题，如认为当时死者入棺之前不拜是普遍的风俗，大约是希望死者还有复生之可能。又如对吊丧时的吊词与答词及依死者年龄不同的称谓规定也作了详细叙述。文章还论述了唐代出殡时的仪节，并推测道，唐代佛教盛行，人死后七七和小祥、大祥等场合都要营

---

① 《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
②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中国古代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 《中央日报》1947年1月11、12日。
⑤ 自印，1979年。
⑥ 《华学月刊》102期，1980年6月。
⑦ 《文物》1985年7期。

斋延僧，殡葬恐亦有僧道参加仪式。傅乐成《唐人的生活》指出唐代丧祭多循古礼，有发哀、出孝等礼节，伴葬的“明器”有规定数目，归葬时并有“路祭”，他还着重介绍了“路祭”的情况，并指出安史乱后，路祭的花样更多。

研究唐代死者覆面织物的论文有武伯纶《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① 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② 黄永年《释敦煌写本“杂抄”中的“面衣”》③。论及唐代墓葬明器的有王去非《四神、巾子、高髻》④，文章说四神做明器在唐代很盛行，它们当即是墓室入口处的两只镇墓兽和其后的两只镇墓俑，被称做“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开元后，十二时(生肖)俑的葬俗也逐渐盛行。

《习俗史》第七章《隋唐五代丧俗》对这一时期厚葬之风丧葬礼仪、墓前树碑制，墓前石刻明器之宝、墓室壁画、阴宅风水学、火塔与塔葬、冥婚和冥钱、七七斋等丧俗进行全面的介绍，力图突出隋唐丧葬习俗中制度化、开创性的一面。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也对唐代盛行的厚葬风习进行剖析，从考察包括墓葬形制、陵寝形制、墓内陈设、地面设施等内容的墓葬制度入手，撷取送葬的凶具准备、卜择建墓和当冲设祭等丧葬仪式来了解唐代厚葬的情况，把厚葬陋习盛行归结为当时“事死如生”、“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及皇权强盛、经济实力丰厚等因素⑤。

唐代帝陵陪葬为当时陵寝制度的一大特色，具有明显的制度化倾向和政治色彩，突出反映了唐代上层葬礼文化诸多特点，但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把唐代帝陵陪葬制度分为初创期(献陵陪葬墓)、鼎盛期(昭陵陪葬

---

① 《文物》1961 年 6 期。
② 《文物》1962 年 7—8 期。
③ 《敦煌学辑刊》1983 年总 3 期。
④ 《考古通讯》1956 年 5 期。
⑤ 《文博》1993 年 5 期。

墓），由盛转衰期（乾陵以后），并指出自乾陵开始，陵园形制模式基本已确定，神道石刻代替了陪葬墓对陵区的装饰作用及地位等级的表现。关于自乾陵以后陪葬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文中归结为唐中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对陪葬制度的破坏作用①。任士英《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对唐帝陵陪葬前期繁盛，后期衰微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体现了唐代前期尚武，后期尚文的社会风尚，唐帝陵陪葬墓的盛衰与唐代尚武之风的盛衰几乎是一致的②。

研究隋唐五代时期葬俗的论文还有陈安利《西安、吐鲁番唐墓制葬俗比较》（《文博》1991 年 1 期，汉唐丝绸之路专号）、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 年 4 期）。一些学者还对这一时期舍利的瘗埋制度进行探讨，如戴俊英《中国古代舍利的瘗埋制度》（《人文杂志》1993 年增刊）、韩金科、王焯《法门寺唐塔地宫及中国舍利瘗埋制度》（《文博》1993 年 4 期，法门寺研究专号）等。

2. **节日习俗**

中国古代节日丰富多彩，足以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瞿宣颖纂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③ 有"唐代令节"一节。其他论及唐代节令的有林达祖《唐宋时代元宵看灯的盛况》④、党军《唐代长安春节景象》⑤、陈祚龙《李唐至德以前西京上元灯节景象》⑥等，而以赵和平《唐人节日略说》⑦较为详尽。赵文主要根据敦煌遗

---

① 《考古与文物》1994 年 6 期。
② 《烟台师院学报》1990 年 4 期。
③ 上海书店 1985 年影印本。
④ 《论语》第 106 期，1937 年 2 月。
⑤ 《人民日报》1962 年 2 月 6 日。
⑥ 台湾《夏声》142 期，1976 年 9 月。
⑦ 《百科知识》1986 年 1 期。

书斯坦因6537号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序》及有关史籍，论述了唐代元日、寒食与清明、端午、七夕、重阳、腊日等节日概况。

傅乐成《唐人的生活》还言及庆寿的风俗。他说，庆寿的风俗起于南朝齐梁之际。相沿至唐，自皇帝下至平民，莫不重视生日，竭力崇饰。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玄宗诞辰，宰相上表建议以是日为“千秋节”，是以生日建节的开始。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有叶德禄《唐帝诞辰祝贺考》① 及附表等。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还介绍了唐代玄宗及其以前诸帝于节庆或大赦、改元时赐酺(会食)、纵酒作乐的习俗。

《习俗史》介绍唐代节日习俗的新内容主要有：出现门神钟馗及最早的春联；形成晦日送穷及寒食、清明节期间赐水，扫墓之俗；设置中和节、千秋节与帝王生日等。另外，书中还列表简要总结隋唐五代时期23个节日的活动，对于其中一些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竞渡、重阳登高、赏菊等节日盛况则进行重点介绍。对这一时期节俗进行全面介绍的还有张泽咸的《唐代的节日》，张文以诗文为证系统地探讨唐代诞节、佛日、道日、元日、中和、端午、中秋、除夕等17个节日的活动情况，力图从一个侧面窥知唐代民情风俗复杂多变的新气象②。张泽咸另一篇论文《唐代的诞节》除重点对唐五代皇帝的诞节进行研究外，还附带对唐政府为佛、道二教创始人所建置的佛诞、道诞日一并加以讨论③。

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一文通过考察敦煌春月四节即孟春的大岁日，燃灯节，仲春的行像日和寒食节的行事特点来探寻唐五代时期传统节俗与外域节俗交融互补的机制与方式，以及在敦煌

---

① 《辅仁学志》9卷1期1940年6月。

② 《文史》第37辑。

③ 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

春月节俗中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内涵，认为这一时期对外域节俗文化有限却成功的吸收与借鉴，使中华民俗文化的品类更加丰富，文化内蕴愈见深致，展示了中华民俗文化体系博大的包容精神和灵活的变通机制，具体到敦煌春月节俗则体现了当时人们求憩、劝农、祈神的至思情节。在《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历史研究》1991年1期)一文中，张弓认为唐朝是中古盂兰盆节汉化衍变的最重要时期。由于李唐王朝崇佛兼尊道，盂兰盆节和中元节均为朝野所重，同时道教中元节也吸收盆节的主旨，遂形成盆节与中元节并行、盆节为主的格局，终唐之世，也没有根本变化。

3. **其他风气习俗**

除节日风俗外，一般统论隋唐民风习俗、社会心理的论文也不少。如姚薇元《隋代之民风》(《文讯》5卷1期，1944年7月)、钱穆《记唐人干谒》(《责善》半月刊2卷19期，1941年12月)、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本下册，1959年10月)、刘翔飞《论唐代的隐逸风气》(《书目季刊》12卷4期，1959年10月)、刘伯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社会风气》(《陕西文献》40期，1980年1月)、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3辑)等。日本学者也有不少此类论述，如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年)、《唐代风俗史抄》(《艺林闲步》1947年1卷1—4、6期)、守屋美都雄的《隋唐风俗志》(《桃源》1946年创刊号，1947年2卷1期)等。

1987年出版的牛志平、姚兆女的《唐人称谓》① 共收集唐代皇帝、后妃、皇室、官吏、百姓、亲族、夫妻、朋友等称谓八百多条，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社会风貌和习俗。

这时期的社会风俗受道教、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甚大。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专门研究这方面情况的力作。该

---

① 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文首述流寓长安之西域人的情况；然后专门介绍了西市的胡店与胡姬；并进一步又从建筑、服饰、饮食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论述了开元前后长安所受胡风之影响。贺梓城《唐代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①指出唐代男女佛教信徒多有一个佛名，以表示与世俗人有所不同，甚至小孩也有一个绰号。但是，其佛名前并不叫“释”字，这表示他们虽然信仰佛教，却与一般僧徒出家者不同。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对于隋唐时期社会风气、观念及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就更加全面、深入了，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或是从论文所涉及的范围上看，均是前一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如郭绍林《论隋唐时期庆生辰》（《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3期）、《乌鸦喜鹊与唐代的吉祥观念》（《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3期）、《唐代的著作权现象》（《人文杂志》1991年5期）、贾宪保《唐咸通时代奢侈风气述论》（《河北学刊》1988年5期）、刘桂秋《唐代的“送穷”习俗》（《文史知识》1988年12期）、葛承雍《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文博》1988年4期）、《论唐代社会中的赌博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4期）、《论唐人梦幻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1期）、王政《审美交互作用与唐代长安风俗》（《唐都学刊》1991年4期）、陈衍德《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有些论文涉及到唐代民间信仰宗教观念与民风民俗问题，如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3期），段塔丽《唐代狐狸精迷信盛行原因初探》（《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1期），徐连达《唐人礼法、习俗中的避讳行为及其社会效应》（《史林》1993年4期），谭蝉雪《敦煌祈赛风俗》（《敦煌研究》1993年4期），黄约瑟《读〈前定录〉札记——唐代社会思想一瞥》（《隋唐史论集》），牛志平《唐代孝道研究》（《隋唐史论集》）、《唐代民俗中的鬼——读〈太平广记·鬼类〉札记》，任大英《唐代尚

---

① 《文博》1984年2期。

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刘后滨《传奇小说反映的唐中后期民间因果报因及其与佛教净土信仰之关系》（以上均见《唐文化研究论文集》），田志明、张剑光《唐代的牡丹欣赏热》（《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 3 期），张艳《唐代长安的重牡丹风气》（《唐都学刊》1995 年 5 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1995 年 5 期）等。以上论文反映了近年来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情况，其中不乏填补空白之作。

4. **文娱生活**

文娱生活反映了人们闲暇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盛阶段，文娱生活极其丰富，相应地研究论著也较多。

近年来对唐代文娱生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当首推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该书指出，所谓游艺即是通过一定的活动或手段，能够满足人们视听和身心需求，以达到愉心悦目的所有一切精神文化活动，其范围应限定为非宫廷化、非宗教信仰化的世俗的、非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的，同时还必须是健康的、有意义的、富有进取精神的社会各阶层的游艺活动。简言之，该书所研究的唐代游艺，是以当时流行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喜闻乐见或自发参与的文娱活动为标志的。据此标准，作者广泛搜罗，全面介绍了唐代游艺中的 12 个方面内容，即口头文学、乐舞、戏剧、杂技、球戏、角抵戏及拔河、武术、博奕、赌胜及宴集游戏，游赏与节日游艺活动。对于与唐代游艺相关的其他方面，如唐代游艺发展的背景，游艺的管理，游艺与寺庙的关系，游艺与各国的交流，游艺的特点及影响等，书中也有非常精湛的论述。对于那些久已失传的游艺活动，《唐代游艺》一书通过大量史料的钩沉，又把它们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活动主要有唐代口头文学中的三种说书形式：小说、讲史、合生，猜谜语活动；戏剧中的三大歌舞戏——大面、拨头、踏摇娘，参军戏，傀儡戏，杂剧；杂技中的竿伎、马戏、绳伎、幻术；赌胜游戏中的斗百草；宴集游戏中的抛球戏、投壶等等，对于以

上这些游艺活动的发掘整理，不仅仅是填补了研究上的空白，而且使人们更加深了对唐人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及社会风尚的认识及了解。

关于唐代游艺的其他相关问题，作者指出，唐政府非常重视游艺活动的开展和管理，设有专门机构如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加以管理，并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此外翰林、两军供奉及内坊也有部分管理责任。唐朝由于是宗教大发展的时期，宗教不可避免地对游艺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节日逐渐与中国固有的节令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唐代节令游艺活动，宗教又为游艺活动提供了活动场所，俗讲、僧讲、尼讲、道讲影响了唐代说话艺术的蓬勃开展，宗教人士积极参加游艺活动也推动了这一活动的发展。唐代的游艺活动，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朝鲜、南亚、东南亚、中亚诸国都有交流，尤其是对日本，唐代的乐舞、球戏、围棋、双陆、射礼、投壶等都传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日本对唐也有游艺上的"逆输出"。唐代是游艺活动发展的黄金时期，活动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入和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在各民族间得到很好的交流，此外唐代妇女游艺活动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唐代的游艺活动的开展，对当时的国防建设、文化艺术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唐代的游艺活动也是东亚文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臧嵘、王宏凯所著《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第八章《隋唐五代游艺风尚》主要介绍了此时期游艺活动中国棋、博戏、马球、节令游戏、斗鸡之风等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他有关唐代文娱生活论著，就其研究内容来看，可分如下几类：

一是体育、百戏类。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叙述其时打球、拔河的情况，岑仲勉《隋唐史》列举了唐代八项百戏项目，即黄龙变、夏育扛鼎、戴竿、绳技、拔河、打球(蹴踘)、波罗球、乞寒。一些论文从宏观上探讨唐代体育活动及其影响，如黄中安《论唐代的体育活

动》(《人文杂志》1990 年 5 期)、黄伟《唐代体育与唐代社会开放风气》(《晋阳学刊》1991 年 6 期)、郭绍林《唐代的体育活动与政治》(《史学月刊》1993 年 4 期)。一些论文则对具体的体育、百戏项目进行了专门研究。如向达《长安打球小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唐代波罗球戏》(中山大学《史学专刊》1 卷 1 期,1935 年)、王赛时《唐代马球综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 年》)、暨远志《唐代打马球——张议潮出行图研究之三》(《敦煌研究》1993 年 2 期)。其中向文探讨波罗球的源流及打球技术;罗文专列"波罗球戏之入华"、"波罗球戏之规则"、"唐代君臣之打球"、"唐代波罗球之分布"等节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王文则考证了马球运动的起源以及马、球、球杖、球场、球门、队员、球衣等情况,基本上探索出唐代马球的规则及运动方法;暨文从出行图上打马球的服饰入手,对马球与蹴鞠的区别,马球的要求、规则作了研究,勾勒出唐代沙州地区马球的风行情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还有汝吉《从唐诗看唐代的体育活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81 年 1 期)、赵康民《唐代打马球小考》(《人文杂志》1983 年 3 期)、陈志学《隋唐时代的围棋》(《四川文物》1988 年 5 期)、王永平《论唐代的游乐文化》(《山西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潘孝伟《试论唐代专业运动团体出现的背景与意义》(《学术界》1994 年 4 期)、王赛时《唐代的节令游乐》(《唐都学刊》1994 年 2 期)等。潘孝伟还有《唐代体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的专著,对唐代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体育项目,组织形态作了细致的梳理,并分析了体育活动风靡唐代的原因,唐代体育的特点和与世界的交流情况。

二是乐舞方面,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较多,但其中不少专业性较强,主要从艺术的角度加以探讨,如王克芬《隋唐五代的舞蹈》(《舞蹈艺术》1982 年 4 期)、董锡玖《杨贵妃和〈霓裳羽衣舞〉》(《北京艺术》1982 年)、李尤白《唐代梨园遗址考》(《戏剧学习》1983 年 2 期)、刘嫣嫣《试论唐代九部乐、十部乐与坐部伎、立部伎之间的关

系》(《齐鲁艺苑》1988年2期)、江东《兼容并蓄大唐舞风(《舞蹈研究》1989年4期)、晏新志《试论唐代舞蹈的分期》(《文博》1989年4期)、章群《唐代大酺宴乐》、姜伯勤《沙州傩礼考》(以上两文均见《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韩国,1995年)等。

傅乐成《唐人的生活》认为南北朝时代,音乐多采胡乐,唐仍因之。玄宗时,西域的乐谱,大量输入;著名的乐工,多为胡人或胡裔,所以唐代音乐大体仍是西域化的。西域音乐多与舞相配,唐代乐舞的流行,自然也是受西域的影响。中唐以前,朝廷著名的乐舞、舞人多为男性,中唐以后,乐舞渐偏重女性。文章介绍唐代著名的男舞有七舞、九功舞、上元舞、大定舞、圣寿舞、光圣舞、燕乐舞、长寿舞、龙池舞、师子舞、景云舞、文舞、武舞、字舞(花舞)、坐舞、八佾舞等。著名的女舞有叹百年舞、倾杯舞、霓裳羽衣舞等。胡舞是非官方正式颁制的舞,但非常流行,主要有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浑脱舞等。

三是变文、俗讲等说唱艺术。对唐代变文早期有王国维、罗振玉、向达等进行过研究,变文的名称是郑振铎提出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变文汇校本。高国藩《论敦煌民间变文》(《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认为其中还夹杂着讲经文其他民间俗文学,且有许多变文并未收入。他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盛行的一种叫转变的民间文艺体裁的底本,后来才为和尚们所利用。敦煌变文包括民间故事变文,历史故事变文、佛教故事变文三类。

俗讲是讲经文的底本。王文才《俗讲仪式考》(《敦煌学论集》)根据敦煌文书等材料,对唐代俗讲仪式进行了诠释,其中包括礼佛、登座;赞吹;说押座;开题;正说;迴向发愿;解座等具体细节。李骞《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①]研究了这两种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

---

① 《敦煌学辑刊》1985年2期。

第五章 民 族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出现了以汉族为主体、其他各民族（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南诏、靺鞨、契丹等）竞相登场，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壮观场面；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政策亦颇具特色，它引起了广大民族史研究者的重视。

一、对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研究

（一）民族政策

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最引人瞩目的是和亲政策和羁縻政策。对于和亲政策，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加以研究，王桐龄《汉唐的和亲政策》①一文对汉唐两大王朝的和亲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论列。邝平章《唐代公主和亲考》② 则专就有唐一代的和亲史迹作了考述。这段时间发表的这类文章数量不多，写法上往往限于排比史料，缺少分析，并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解放后，对和亲政策的研究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乃至方法上都有很大变化。有研究中

---

① 《史学年报》1929 年第 1 期。

② 《史学年报》1935 年第 2 期。

原王朝对某一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的，如马元《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① 王有德《唐与回纥和亲研究》② 等；有研究一个朝代的和亲政策的，如任崇岳、罗贤佑《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③。前两篇分别对唐与吐蕃、回纥的和亲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后者则通过唐与汉朝的和亲政策的比较研究，指出汉、唐和亲各有特点，后者在各方面远超前者。有唐一代和亲并非一个模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唐朝前期和亲政策效果较好；中、后期由于国势衰弱，用人不当，故和亲无成就。近年来出版的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④一书通过对汉唐和亲的比较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朝代和亲的异同及原因，从客观上对汉唐和亲政策的观点及作用进行了评价。其书资料翔实，考证细微，史论结合，颇多新意，是这些年在和亲历史研究方面较有特色的一部著作。

羁縻政策，是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自治性较大的开明统治办法，即所谓“荒遐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册府元龟》卷 147《帝王部》)。这一影响深远的民族政策，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法国人沙畹，我国的冯承钧、岑仲勉等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对唐代的羁縻政策作过研究，对羁縻府州的数目、地望有过考证⑤。1961 年汪篯在有关唐太宗的一次报告里指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主要就是羁縻政策，这种政策是把对内统治的经验推广到边疆各族。这种政策的实行是由唐代边疆各族都已进入阶级社会，大部分都已建立国家，经济、人

① 《民族研究》1960 年第 3 期。

②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③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

④ 《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⑤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241 页；冯承钧《史地丛考》第 57 页；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 139、142 页。

口都有较大发展这一客观原因决定的①。近些年来,研究羁縻政策的文章多起来。唐启淮《试论唐代的羁縻州府》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唐代羁縻州府的创立情况、组织结构、存在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③一文指出唐朝立国之初就在西南、东北诸沿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但是,大规模地设立羁縻府州则是在贞观四年平东突厥之后。唐朝通过羁縻府州较好地处理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开拓并稳定了边疆,建立起了一个超过前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④一文考证了唐朝在西域建立羁縻府州的时间,都督刺史的任免以及俸禄、权限、贡赋等。指出唐对羁縻府州的统治尽管在形式上与内地不尽相同,但却有效地对边疆地区实行了管辖,对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篇长文《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⑤从考察安西都护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入手,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都护府在几个不同时期的任务与特征,指出安西都护府的废置与突厥、吐蕃、突骑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盛衰有直接关系。

当然,政策是多样性的,和亲与羁縻并不是民族政策的全部。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⑥一文从另一角度指出,从隋唐民族关系的总体格局来看,"以夷攻(攻打)夷"、"以夷制(牵制)夷"、"以夷治(治理)夷"同样是隋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无论从实施范围,持续时间还是实施效果看,这三种方式与战争、和亲、抚慰相比,均不逊色。"

---

① 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6 页。
② 《湘潭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③ 《思想战线》1985 年第 5 期。
④ 《新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
⑤ 《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⑥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学者们除了对某一民族政策开展专题研究外，还就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有关民族政策加以剖析。如高凯军《从隋文帝的民族政策看隋初的经济繁荣》① 一文认为隋文帝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是从大一统的总原则出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文德与武功并用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成功是使隋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赵云旗《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② 指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是在文帝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对于推动隋代与诸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民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民族融合的深入起了积极作用。

唐代前期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高潮时期。唐太宗则被称作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高出前人的一位皇帝。他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的开明思想历来为人们所称颂。故对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研究，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近些年更是如此。这里仅举其中几篇加以介绍。魏国忠《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③对李世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中采取的各种措施、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的民族政策的特点作了较为全面讨论。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④ 一文则将唐初的民族政策归纳成十项，概括为"怀柔政策"，高度评价这种政策"激发了各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大国，而且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奇异的光辉。"面对史学界对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一片赞扬声，胡如雷发表了题为《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⑤一文，提出对唐太宗应全面地评论，不能有意回避民族矛盾，如他"处理民

① 《北方论丛》1983 年第 1 期。
②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③ 《北方论丛》1979 年第 5 期。
④ 《历史研究》1982 年第 6 期。
⑤ 《历史研究》1982 年第 6 期。

族关系的原则之一，是尽量分化一个民族，使之从内部分裂，产生矛盾，以达到抵消其力量，减少唐朝边患的目的。”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应予指出。针对这一观点，熊德基在他的《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①一文中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对唐太宗离间分化一些民族的事例，必须从战略上全面分析，如果矛盾将发展到战争时，那么离间、分化的手段都是势所必然产生的。这是战争本身所具有的规律，不是唐太宗个人的局限性。他重申“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进步的，是符合历史的要求的。”“不应以抽象的局限性，用今天的尺度去‘平衡’他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熊文发表后，孙祚民以《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②为题，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指出：把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说成是对各民族“爱之如一”是一种美化拔高的提法；认为唐太宗深知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恶果，故不仅在政治上“爱之如一”，经济上优待少数民族，是唐太宗绝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的明显标志，这在史实和理论上都是不正确的；对唐太宗进行的战争不区别性质，把客观历史作用与战争性质划等号，用客观的进步历史作用代替或改变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显然是错误的；对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应当全面评价，在肯定其主导方面的时候，既不回避他的局限性，也不对其主导方面作超越历史的和阶级限度的美化和拔高。胡如雷《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兼答熊德基先生》③ 一文则指出，“阶级的局限性普遍存在于同一阶级的一切人身上，只不过各人程度不同而已”；“认为唐太宗的某些政策可以没有阶级的局限性，显然是错误的”，“把唐朝民族政策概括为‘怀柔’二字，是用玫瑰色涂抹历史，然而却改变不了史实是一个多面体”；

①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9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和亲并不完全是牧歌式的事情","并不是完全出于善良的愿望和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高尚动机。和亲狂想曲中实际上伴有不和谐的杂音,史学工作者想闭目塞听是办不到的。"同期《中国史研究》还刊登了熊德基《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文章进一步申述了他的观点,并辨正了有关史实。

(二)民族关系

民族政策反映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早在三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就曾对唐代开放的社会和开明的民族关系加以揭示。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①] 指出:"唐代国威传播极远,亚洲各国莫不受其羁縻……殊方既皆宾服,异族必多同化"。他从外来传教士、乐师、商人和军队里的胡族成分等几个方面论列了大量胡人华化的史实,还对唐朝各少数民族作了考证。向达《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②]则仅举开元、天宝时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论述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影响的盛况。1957 年,陈寅恪写《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③] 一文,对唐朝境内外各民族将士在唐代军队中大量存在及其在武功方面的重大作用作了精辟论证。指出蕃将与唐之关系"至深且巨,"是"与李唐一代三百年相始终者"。此论视野开阔,给人殊多启迪。此后,不少学者专就蕃将问题开展研究,硕果累累。如港台学者章群积三十年之功,写成洋洋数十万言的宏篇巨制《唐代蕃将研究》和《唐代蕃将研究》(续编)[④]。此书资料丰富,体例别致,思想活跃,新论叠出,并附有篇幅

---

① 《东方杂志》1930 年第 27 卷 17 期。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41 页。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4 页。

④ 《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1990 年版。

较多的图表，令人耳目一新。随后成书的马驰《唐代蕃将》① 一书，虽不足二十万字，然而却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从较高的视角对唐代蕃将的含义、分类、蕃将的产生、使用制度、历史作用及其汉化等分前后不同时段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叙述严谨，立论周密。如解释蕃将的含义，见解独到，避免了章书同一问题上的前后牴牾；对蕃将的分类仅用“入朝”与“在蕃”两个概念，比章书所分七类(即1、参与战争；2、军中推立或藩镇世袭；3、羁縻州府刺史都督；4、国王或首领来朝来降；5、入卫宿卫者；6、放还蕃者；7、其他)来，显得简明科学；在关于蕃将演变的问题上，马书从蕃将类型，历史活动及文化心理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则又避免了章书解决同一问题的琐细。章群“续编”对马驰的质疑提出了答辩。对于大量蕃胡移徙唐朝与境内各族融混渗透的历史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是“华化”，有的学者认为是“胡化”。傅永聚《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② 一文在论述汉胡民族关系时则强调，唐代民族是由汉族和胡族共同构成的，二者之间在成员上相互融入，在族属上经常改变，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互动互补性。这种互动互补的民族关系特征，构成了华胡一体化的唐人，给唐代社会结构，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等都带来了既深且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学者们不仅从总体上描述了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还从某一少数民族或某一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来揭示民族友好关系，如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③、程溯洛《回纥的兴起及其和唐朝的关系》④、陈国灿《西突厥

① 《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山东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③ 《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

④ 《历史教学》1979 年第 7 期。

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①]等文都以丰富的资料，从一个侧面深入论述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②]一文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仅有四行的“思结请粮文书”的研究，考证了铁勒部族之一的思结慕义归唐的史迹，认为这是唐朝国力强大，四裔宾服，民族交融的一个生动例证。

然而，民族关系并不都是一团和气，一片光明，也存在矛盾冲突和阴暗面。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前揭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分歧》一文不同意“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而不是民族压迫”的提法，认为把民族友好交往与民族矛盾和压迫进行比较，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交往”这一概念并无严格的科学规定性，只能反映民族关系的现象。对民族关系中的阴暗面，他不同意“避讳”的作法，因为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赞同胡如雷的观点，即揭示一些民族关系中的阴暗面，这样做会有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起到忆苦思甜的效果。胡如雷在《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中指出，古代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是：“矛盾中有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和睦相处时期也存在酝酿新的斗争，交往中还存在纵横捭阖，即此中存彼，彼中有此。忽略了民族关系中的局限性，不但抹杀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彻底改造民族关系的伟大意义，而且也无法说明古代民族关系的客观发展规律，实际上就使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事。”“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谈这种局限性；或谈多谈少，关键是以什么态度对待客观上存在的历史实际。”近年来发表一些论文已经开始注意对民族关系中阴暗面的探讨。如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

① 《历史教学》1981年第7期。
② 《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康待宾之乱"》①即指出"康待宾之乱"的性质"是唐朝统治下的六胡州突厥降后反抗唐朝压迫和剥削的正义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初的民族关系以及唐初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马大正《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② 一文通过对唐蕃之间的争斗,和亲与会盟的述论,指出封建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发生争斗是绝对的,友好相处是相对的;唐蕃双方频繁的争斗,是双方关系发展史的重要主题,唐蕃频繁的会盟是双方争斗的补充与继续;对唐蕃和亲之作用地位亦应予以客观评述。

五代时期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在关于石敬瑭问题的讨论中,孙祚民不同意郑学檬《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③一文提出的关于辽与石晋"统治区的变动,不存在领土被'出卖'问题,只能说是内部的归属问题";"辽的南扰,毕竟是国内民族矛盾问题"等观点,他指出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没弄清"作为中国史讲述对象的空间范围"与"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两个不同性质问题的区别,而采用简单的"上溯法"来处理两者的结果。事实是辽与后唐,石晋及周边各国都各有各的土地、人民和主权,互为敌国。判断石敬瑭是否向辽出卖土地,"不能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范围为标准,而只能以当时辽与各国的实际关系为标准。"④

二、突厥史的研究

(一)突厥族源

突厥兴起于六世纪中叶,史籍关于突厥族源之记载,颇不一

---

① 《民族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民族研究》1989 年第 6 期。
③ 《厦门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④ 《北方论丛》1987 年第 4 期。

致。有载其为“匈奴之别种”者(《周书.突厥传》),有言其为“平凉杂胡”者(《隋书.突厥传》),有说其为“匈奴北部”者(《新唐书.突厥传》),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史料记载的歧异,造成研究者的看法亦不尽同。王日蔚《畏吾儿民族古代史》① 最早提出突厥祖先为汉代丁零,丁零与匈奴同族。丁零在魏晋称高车,在南北朝称敕勒,至隋称铁勒,此皆为匈奴之裔,属突厥族系。这种看在国内学者中有一定影响。如马长寿在其《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一书中即写道:“突厥人原是丁零人或铁勒人之一种,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是突厥诸语族中之一族。”铁勒是“广义的突厥”②。这与上述看法就比较近同。然而也有不赞同此说者,如周连宽的《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③一文就不同意丁零即是铁勒,铁勒是突厥种的说法。认为丁零与突厥各有各的发祥地,各有各的发展史,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1958 年,岑仲勉出版了他的大著《突厥集史》,本书分上、下册,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下册为史籍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倾注了作者的研究心得及血汗。其中谈到突厥起源时指出:“突厥崛起时,住地在金山之阳,斯为近于信史者矣。”④他不同意史书关于突厥为匈奴之别种或平凉杂胡的说法。以为古人用“别种”一词往往同“别部”同义,其语甚泛,不可作种族同源说加以引用。又,五胡入主中原后,北方少数民族相次南迁,史书却从突厥发源关陇,后面北迁,恐不可信。近年来,薛宗正曾先后发表《突厥初世史探幽》、《突厥始祖传说发微》等一系列论文⑤,他依据

---

① 《天山月刊》1935 年第 6 期。

②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 页,第 83 页。

③ 《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

④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963 页。

⑤ 《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4 期、1983 年第 1 期;1987 年第 1 期。

诸书记，对突厥族源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突厥阿史那氏远祖出于西海（即里海）塞种，后东迁至漠北，汉魏时称呼揭、呼得，曾因亡国而沦为匈奴赀虏。及匈奴势弱，又向南徙，遂为十六国时期之平凉杂胡。至奔金山，始以“突厥”为号。金山周围多为铁勒部众，于是突厥遂铁勒化。突厥族最后的形成，是阿史那氏与高车、铁勒结为一体的产物。故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出现于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在本质上就是铁勒化的塞种人建立的。

（二）突厥社会

对突厥的社会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一，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马长寿在其《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一书和《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①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认为六世纪中叶建立的突厥汗国处在奴隶社会，到七世纪后期建立的后突厥政权则是封建社会。西突厥汗国没有经过奴隶制，其“封建制度乃是西域各国生产力发展的结果。”② 蔡鸿生《突厥法初探》③ 在探讨突厥的“地分”与“畜印”，“奴”与“臣”，“家庭和婚姻”等问题时也指出突厥曾经存在过奴隶制。第二种观点认为突厥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它从六世纪至八世纪始终处在一种初期的封建社会中。这种看法最早由苏联人伯恩斯坦提出，国内张之毅曾以《游牧的封建社会》为题介绍过他的主要论点。④ 这一观点在国内也有赞同者，如侯尚智《试论突厥汗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兼与马长寿先生商榷》⑤、张广志《突厥与奴隶制》⑥ 等皆持此说。第三种观点认为突厥社会不

---

① 《历史研究》1958 年第 3、4 期。
②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 103 页。
③ 《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
④ 《科学通报》1950 年 8 期。
⑤ 《兰州大学学报》1959 年第 1 期。
⑥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论东突厥、后突厥或西突厥都始终处在奴隶制，不曾发展为封建制。林干在他的《突厥社会制度初探》[①] 一文提出并论证了这一观点。此外，他还在《匈奴史》、《蒙古族简史》二书里，就突厥等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作过探讨，认为游牧民族的奴隶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家内奴隶，而是从事生产劳动的生产奴隶，这是游牧民族的生产特点决定的。因此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应是经过奴隶制的[②]。除了探讨突厥的社会性质外，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③]、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④]、及《突厥事史考》[⑤]、林干的《突厥的习俗和宗教》[⑥]、薛宗正《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⑦]、吴景山《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⑧]、《突厥人的体育及音乐歌舞》[⑨] 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突厥社会的各种制度及文化习俗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三）西突厥政权

本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首先收集我国文献记载与西文有关资料编纂成《西突厥史料》一书，1932 年该书由冯承钧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此书的一些遗漏和错误，岑仲勉曾写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一书，195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外学者对西突厥历史从事专门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研究西突厥历史必

---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3 期。
② 林幹:《近六十余年国内突厥史研究述评》，载《民族研究》1985 年第 6 期。
③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 年第 1 号。
④ 《学术研究》1963 年第 5 期。
⑤ 《中亚学刊》第一辑 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⑥ 《民族研究》1981 年第 6 期。
⑦ 《新疆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 期。
⑧ 《兰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⑨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备的参考书。

有关西突厥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近些年。胡菊英、赵永复的《论西突厥》① 一文，重点论述了西突厥的勃兴及东西突厥的分裂，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西突厥政权的灭亡，唐朝统辖西突厥地区的诸项措施等，是较早研究西突厥历史的一篇文章。林干《试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②进一步论述了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的原因；西突厥的部族构成；西突厥的疆域及其属国；唐朝在西突厥的行政设施。杨建新《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有关问题》③则重点讨论了西突厥出现的时间、部落组成、汗位继承和疆域范围等问题。王谡发表的《阿波可汗是西突厥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④ 一文对于西突厥和西突厥汗国的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很快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接着，林干、段连勤、薛宗正等先后在《新疆社会科学》上著文，对王文提出不同看法。林干认为王文推测过多，论据不足。他在《西突厥纪事》⑤ 一文就西突厥史实详加铺叙，以作为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段连勤的《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谡同志商榷》⑥ 一文指出达头可汗无论是在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过程中，还是在为巩固西突厥汗国的独立而同东突厥汗国展开的斗争中，都比阿波可汗及其继承人泥利可汗起了大得多的作用，他才是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和正宗。把阿波可汗说成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是不符合历史事

① 《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 1 辑。
③ 《西北史地》1984 年第 4 期。
④ 《历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⑤ 《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
⑥ 《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3 期。

实的。薛宗正在《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谡说》①一文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既不是倡乱者阿波，也不是叛乱首脑达头，其创业君主应为泥利可汗。他还指出，在西突厥历史的研究中，所以会出现诸多分歧，症结在于历史地、准确地理解史料。

1988年，林干出版了他的专著《突厥史》②此书内容丰富，观点稳妥，特别是对西突厥，多有独到见解，是继马长寿先生《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之后，又一本有份量的突厥史专著③。突骑施为西突厥别种，八世纪中叶当西突厥衰微时，突骑施汗国崛起中亚，成为唐朝下属的一个边疆自治政权。对突骑施的研究，以前是空白点。薛正宗的重头文章《突骑施汗国的兴亡》④对突骑施汗国兴起的历史条件、建立与衰亡过程，作了详细论述。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⑤一文利用张九龄的文集补正史书的缺载，揭示了突骑施与唐朝及其它民族的关系。钱伯泉《从〈张无价告身〉论高仙芝征讨石国和突骑施》⑥则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张无价告身》的考证，探讨了高仙芝征讨突骑施、石国，杀石国王及突骑施可汗，大掠中亚胡族所引来的恶果，论证了怛罗斯战役与高仙芝征讨中亚胡族的关系及其客观影响。

三、回纥、铁勒及于阗史

---

①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② 《突厥史》，内蒙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周伟洲《近年来国内隋唐民族史研究述评（1981－1988）》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④ 《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⑤ 《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⑥ 《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一)回纥族源

回纥在八世纪后期曾改称"回鹘"(见《旧唐书·回鹘传》),即今日新疆维吾尔族祖先。关于回纥族源,学术界说法很多。一种是《北史》、《魏书》、《隋书》、两《唐书》等正史的观点,认为"回纥其先匈奴也"(《新唐书·回鹘传》)。许多外国学者,如前苏联的伯恩斯坦,法国的勒缪塞,日本的白鸟库吉等都同意这种说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回纥是"突厥诸族的一支","属东支突厥族"①。有的外国学者也主张:"回鹘为突厥之一部"②。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的是范文澜的看法。他认为回纥源于公元三世纪贝加尔湖以南称作"丁零"的联合体,丁零在元魏时又叫高车部,高车部有狄历、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零同是一个名词的音译。参加这一联合体的有袁纥等十五部,袁纥有乌护、乌纥、韦纥等名称,唐代称作回纥。回纥是铁勒部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匈奴、铁勒与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③ 进入八十年代,谷苞发表了《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④一文,指出前苏联出版的一些著作认为回纥西迁出现了三支势力,这是维吾尔族唯一的或主要的族源。这一观点在国内流传很广。事实上公元三世纪新疆北部就已经有了大量维吾尔(西丁零)人,特别是五世纪以后,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有了大量维吾尔(丁零、铁勒)人。他不同意只在回纥中找维吾尔族族源。认为不仅丁零、铁勒和回纥是维吾尔的重要族源,而且被维吾尔族融合了的原来居住南疆的各农业民族也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部分。谷文

---

① 冯家升等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民族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 页。

②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8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6 期。

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秦波《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1]一文认为一个民族的族源主要是指它最早的来源，谷文是把族源问题和维吾尔族形成问题混而为一了。1981年第4期的《中国社会科学》还发表了《关于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综述》，报道了新疆一些学者围绕维吾尔族族源问题开展争鸣的不同观点。苏北海《从车师到高昌回鹘》[2] 一文的观点是：从两汉时期就居住在吐鲁番和天山以北地区的车师是维吾尔族的族源。他指出车师族人因普遍善于使用高轮大车而被称呼为车师。车师人与匈奴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与蒙古草原上的铁勒族融合一起，被称作高车族。从历史事实看，车师，高车，铁勒，都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的先祖。

（二）回纥汗国的社会性质、制度与发展

范文澜在谈到回纥汗国的社会性质时指出，回纥在吐迷度称汗以前，还没有形成阶级，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吐迷度建立汗国，正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由于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度的条件，来自唐朝封建社会的影响又特别强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发展起来"[3]。林干《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4]则认为，回纥当时的社会与突厥一样，还没有产生封建的经济因素，出现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其社会性质是奴隶制。

早在本世纪初叶，王国维就作《九性回鹘可汗碑跋》，依据史籍，对照碑文，对回鹘社会的职官制度进行研究，指出其可汗曾归服唐朝，拜为怀化将军，瀚海军都督，"然私自号可汗，其官吏一似

---

① 《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

②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③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6页。

④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1期。

突厥。"① 冯家升等人认为,"回纥的官制属二重体系,一方面用唐官号,一方面沿用突厥制度"②。林干《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的看法是:回纥政权组织主要是沿用突厥制度,又因受中原影响,采用了唐朝的某些官制。秦卫星《关于漠北回鹘汗国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则认为,"尽管唐朝设府立州册封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等职,并不妨碍回鹘在漠北设立的各种官吏的存在和行使职权"。"唐朝不可能牢固地控制他们和通过他们在漠北行使有效的管辖权",其册封官职可视作"名誉称号"③。

关于回纥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看法认为,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因与唐和平贸易增加财富;二因掌握东西交通线,利用"胡商"贸迁有无。并指出:"回纥人以马市绢,常怨唐绢尺寸不够而质料又坏;唐人则怨回纥市马太多,而瘦弱不可用。这是当日两方面贸易上的一重要问题"④。林干《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认为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受到唐朝酬谢,但回鹘统治者贪得无厌,以售马为名,用瘦马换取丝绢,"这种马、绢的贸易带有勒索的性质。"马俊民《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⑤一文却通过对马价及"瘦马""劣绢"问题的客观分析,从政治、经济角度权衡利弊,指出尽管互市过程中存在一些局部性问题,若从当时全局上看,还不失为相互有利的贸易。从而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三)回鹘的迁徙及以后的回鹘政权

1. **回鹘的迁徙** 公元840年,黠戛斯大举南向,攻袭回鹘,回鹘汗国亡,部众四散迁徙。对于这次迁徙,一般看法是分三支向西:

---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局局1984年版,第992页。

②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23页。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④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26页。

⑤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迁①。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对此表示异议。他引两《唐书·回鹘传》的记载,指出回鹘迁徙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十三部南来附汉,其余“残众入吐蕃、安西”。后者只是两小支,实际上西迁者只是一支。近年,林干、高自厚发表《关于回鹘西迁若干问题的辨正》② 一文,就回鹘西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回鹘汗国亡后的一段时间应称作“流亡阶段”,而不称作“西迁时期”。此时回鹘并非举族西迁或南下,其中如在 840 年以前就驻牧于楚河流域的回鹘部众、天山南北以及河西走廊的回鹘部众就没有因回鹘汗国的灭亡而迁徙。认为《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西奔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并不合乎历史真实。因为以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为中心的西迁十五部仅仅是四散逃亡的回鹘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是三支。《旧唐书》所记略去了几十年逃亡流散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仅对后来业已形成的三大回鹘政权把它说成一开始就分成三支,致有误会,应予辨正。对于回鹘西迁本事,学者也有评论。孟凡人《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③一文对回鹘西迁的原因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分析,指出其所以最后能在北庭取胜是由于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樊保良《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④通过对回鹘如何从绝境之下而后兴的论述,高度评价了回鹘西迁的历史意义。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⑤ 一文则对人们很少论及的南迁附汉的十三部回鹘的史实作了探讨,并论述了其在唐末五代历史上的政治作用。

2. **河西回鹘** 迁往河西一带的回鹘部众,初附于吐蕃而被“散处之”(《新五代史·回鹘传》),可知其分布很广。其中驻牧甘州

---

①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 39 页。

② 《民族研究》1992 年第 5 期。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

④ 《西北史地》1985 年第 2 期。

⑤ 《民族研究》1982 年 4 期。

一带最强的一支被称作“甘州回鹘”。关于甘州回鹘的疆域，林干《河西回鹘略论》①、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②，都认为包括整个河西走廊。汤开建等《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③、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④，以当时河西一带几个割据政权并存的史实，驳斥了上述看法⑤。

关于甘州回鹘的可汗世系，王日蔚《唐后回鹘考》⑥ 最早作过排列，冯家升等人《维吾尔族史料简编》⑦一书中的排列更为详细，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⑧一文对前表中的错误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苏北海等则在吸收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甘州回鹘世系进行了考证⑨。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关于西迁回鹘的原始资料。许多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开展对河西回鹘历史的研究，多有创获。早在三十年代孙楷第就曾发表《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⑩、《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⑪，对变文中涉及的吐蕃退浑，特别是回鹘部族的史事进行考证，提出不少重要见解。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⑫一文则将其于国外所得一组关于张承奉金山国的敦煌资料加以探讨，其

---

① 《社会科学》(甘肃)1981 年 3 期。

② 《西北大学学报》1978 年第 4 期。

③ 《敦煌学辑刊》1983 年创刊号。

④ 《西北史地》1983 年第 3 期。

⑤ 关于河西回鹘的论著较多，可参考杨富学《近年国内河西回鹘研究综述》，《敦煌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⑥ 《史学集刊》1936 年第 6 期。

⑦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 47 页。

⑧ 《西北史地》1983 年第 1 期。

⑨ 《敦煌学辑刊》1987 年第 2 期。

⑩ 《图书季刊》1936 年第 3 卷第 3 期。

⑪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 年第 7 本第 3。

⑫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 年第 9 卷第 6 号，收入《敦煌遗书论文集》。

中也涉及归义军与甘州回鹘间的关系问题。进入五十年代，法国学者哈密顿著成《五代回鹘史料》[①] 一书，书中对敦煌文书所见甘州回鹘史料进行了研究，见解独到。近些年来，有更多的敦煌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关甘州回鹘的论文。较有份量的如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②]、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③]、郑炳林《张淮深变文研究》[④] 等，分别就敦煌变文记录的张淮深征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⑤]，荣新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⑥]《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⑦]，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⑧] 等文通过对大量敦煌文献资料的考订，论述了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以及中原王朝之间的多维关系。

利用敦煌资料，还有助于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关于甘州回鹘首任可汗，以往的看法或认为是庞特勤[⑨]，或认为是仁美[⑩]，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在《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⑪] 一文通过对S・8444 号文书的研究，提出甘州回鹘首任可汗应是光化年初向唐廷朝贡的天睦可汗。荣新江在《甘

---

① 《五代回鹘史料》，耿升、穆根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5 期。

③ 《历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④ 《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⑤ 《中华文史论丛》1962 年第 1 辑。

⑥ 《敦煌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⑦ 《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⑧ 《文献》1989 年第 4 期。

⑨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 47 页，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 年第 1 期。

⑩ 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辨》，《敦煌学辑刊》1987 年第 2 期；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⑪ 《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州回鹘成立史论》中则认为首任可汗应是写于中和四年(884)的S·389号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回鹘王"。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①一文通过敦煌文书之辨正,认为甘州回鹘政权当产生在乾宁元年(894)之后;从甘州回鹘政权与唐朝廷建立关系的时间考虑,把天睦可汗看作首任可汗较为可取;这当然不排除S·389号文书中出现的"回鹘王"有可能就是后来被册封的天睦可汗。此文还通过排比传世文献与敦煌资料,考证顺化可汗与奉化可汗是前后两任可汗,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是一个人;P.2155号敦煌文书中被曹元忠称作"兄可汗天子"的不是日本学者藤枝晃、梅村坦等人认为的"顺化可汗"②,而是顺化可汗之子景琼。

十一世纪初,西夏元昊兴兵攻袭河西,甘州回鹘、曹氏归义军相继败亡。与此前后,瓜沙地区却出现了"沙州回鹘"(《宋史·回鹘传》)、"沙州镇国王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沙州北亭可汗"(《宋会要辑稿·蕃夷五》)活动的记载。这支沙州回鹘自何而来,存在不存在一个以沙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长时间以来一直说不清楚。近年来,钱伯泉、杨富学、李正宇等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③。杨富学认为沙州回鹘从十世纪开始就逐步壮大起来,并进而控制了沙州。大约在1036年建国,至六十年代末灭亡。他不同意钱伯泉认为的沙州回鹘就是龟兹回鹘的说法。杨富学还与牛汝极合作整理翻译了敦煌所出回鹘文文献,编写出版了《沙州回鹘及其文献》④一书。

---

① 《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② 《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民族译丛》1982年第5、6期。

③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沙州回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载入《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一书。

④ 《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跻身敦煌文献与河西史地的研究，可以想见，在河西回鹘这一专题上必将有较大突破。

3. **高昌回鹘与喀喇汗王朝** 九世纪中叶，迁往西域的回鹘与早就居住那里的先祖高车，同族乌护，近族葛逻禄、样磨等汇合一起，其一支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另一支则在今新疆南部地区和中亚一带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这两个政权存在时间较长，在维吾尔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程溯洛在《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① 一文中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喀喇汗王朝的历史，耿世民《哈拉汗王朝历史简述》②、魏良弢《把喀喇汗王朝写进中国通史》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④ 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

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回鹘的专书，值得重视的有两部：一是林干主编的《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⑤，此书收入 1981 年以前国内学者从事突厥、回鹘研究有代表性的论文数十篇，并附有编者所加的评论，可看作是对前一阶段突厥、回鹘历史研究水平的一个总结；一是程溯洛个人的论文集《唐宋回鹘史论集》⑥，该书收入论文三十余篇，内容涉及回鹘族源、住地、回鹘汗国兴衰及与唐宋各朝关系，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部倾注了作者一生心血的力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将会对突厥回鹘史的深入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

① 《西北史地》1984 年第 4 期。
② 《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
③ 《百科知识》1982 年第 1 期。
④ 《历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⑤ 《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⑥ 《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四）关于铁勒的研究

隋唐时期，铁勒是分布在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广大地域的游牧部落，《隋书》载其种姓有契苾、薛延陀、仆骨、同罗、思结等四十余部。国内学者过去对铁勒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许多学者利用吐鲁番文书中的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开展对铁勒历史的研究。姜伯勤《高昌文书中所见的铁勒人》① 较早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传供食帐》加以探讨，结合史书考证了文书新见"阿都"、"浑"、"婆瓠"、"鸡弊零"、"栈头"等。揭示了活跃在天山北部的铁勒诸部及其与高昌王朝的关系。钱伯泉《铁勒国史钩沉》② 一文也从考证吐鲁番《传供食帐》入手，对其中一些部族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看法。同时，作者还对铁勒汗国历史作了探索。指出在麴氏高昌王朝后期的天山以北地区，游牧着众多的铁勒部落，他们是后来创建铁勒汗国的主体民众。铁勒汗国前后共有十多年时间（605—620），国中实行双王制，大可汗为契苾部歌楞，小可汗为薛延陀部的乙咥。铁勒汗国立国虽短，意义却十分深远。它将分散的铁勒各部凝聚在一起，从而避免了突厥的奴役和同化。当铁勒汗国衰落，东迁的薛延陀建立了薛延陀汗国；拔悉密建立了拔悉密汗国；回鹘人更建立了强大的回鹘汗国。从而使铁勒人得以代替突厥人在北方草原叱咤风云。正是铁勒汗国起到了奠基和演习作用。当回鹘汗国崩溃，大量回鹘人西迁，建立了高昌回鹘，龟兹回鹘王国及喀喇汗王朝，实现了与那里的铁勒部的融合，遂为维吾尔族族先，亦即今天新疆的主体民族。薛宗正的《丁零、铁勒的西迁及其所建西域政权》③ 一文则指出，丁零，铁勒乃同族异译，公元4—

---

① 《文物》1986年第12期。

② 《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③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5世纪自东西伯利亚跨阿尔泰山进入天山北麓，再西徙中亚，远至里海，前后曾建立了两个西域铁勒政权，一为高车丁零汗国（副伏罗汗国487—562），一为契苾铁勒汗国（605—619）。由于双王制的实行，使契苾、薛延陀二部矛盾日益加深，又加上西突厥的离间，终于导致分裂，使契苾铁勒汗国瓦解。除论文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专著有段连勤的《丁零，高车和铁勒》[1]，书中以丰富的资料较为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铁勒各部及其与隋唐的关系。

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约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曾多次率领铁勒诸部发动反抗突厥奴隶贵族统治的斗争，对隋朝西部边疆的扩展，唐代民族政策在漠北各族的推行，都起过积极作用。学术界以前很少对薛延陀进行专门研究。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2]一书对薛延陀的族源族属、形成发展、社会制度、内政外交、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地位等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另外，钱伯泉的《从吐鲁番文书看薛延陀前期的历史》[3]一文，利用吐鲁番文书中的珍贵资料，对薛延陀早期的历史，作了有益的探讨。

（五）关于于阗史研究

今和田地区的居民在古代——直至十一世纪初——还是操塞语的塞种（Saka）人。关于这一时期的于阗国史及其民族，由于材料匮乏，以前研究者甚少。王国维先生曾据所见敦煌出地藏菩萨画像上题记，"故大朝大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考证于阗史事及其同曹氏归义军之关系。[4] 近年来，随着敦煌、新疆等地所出于阗

① 《丁零、高车和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9页。

文书及有关于阗史的古藏文文书的译释解读，学者们对于阗史的研究发生了较大兴趣，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其中主要有王尧等《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译解》[①]《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正》[②]、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止年代研究》[③]、殷晴《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④]、《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会经济状况》[⑤]、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⑥]、《敦煌于阗文P.2741、choo296、P2790号文书疏证》[⑦]、《关于沙州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⑧] 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⑨]、《归义军及其周边民族关系初探》[⑩] 等。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张广达、荣新江两位，以敦煌汉文文书为基础，参照欧美学者研究于阗文的成果，连续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内容除对有关于阗史文献进行考订外，还包括于阗国世系、国号及年号，于阗国的政治制度、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后集成《于阗史丛考》[⑪]。此书资料收集详赡，观点阐发允当，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载有著名敦煌学家饶宗颐所作序言——《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提出他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如"胡"字的涵义与演变，允姓戎与塞种之关系，于阗与月氏之关系等等，本身也是一篇见地很高的关于古代西北民族的论文。

---

① 《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② 《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④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⑤ 《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
⑥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⑦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⑧ 《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⑨ 《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⑩ 《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⑪ 《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版。

四、吐谷浑和党项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谷浑史

本世纪初，甘肃武威南青嘴喇嘛湾曾经出土一批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对吐谷浑史的研究兴趣。吐谷浑是十六国时期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立国三百多年，进入隋唐时期，正值其由衰落走向灭亡。学术界对这一阶段吐谷浑史的研究情况，大致上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①。

1. **隋炀帝击灭吐谷浑** 吐谷浑政权到了隋朝已经趋向败落，而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击灭吐谷浑，则是吐谷浑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是吐谷浑史上的重大事件。涉及这一事件的论著颇多，对隋炀帝打吐谷浑的看法也不相同。王民信《隋唐对吐谷浑之经营》② 对炀帝此举持完全否定意见，认为这是炀帝"好大喜功与乎好战狂表现之一端。"胡戟《炀帝西巡》③ 指出"西陲不安，丝路不畅，是炀帝西巡的背景"。他评价此举一度解决了吐谷浑寇边和干扰丝路的问题，是我国疆域史和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陆庆夫《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④ 认为吐谷浑长期居间丝路，骚扰边境，加之国中内乱不已，其百姓渴望归化隋廷，这是隋炀帝出兵吐谷浑的原因，也是他取得胜利的条件，是继离间突厥之后又一个开通丝路的步骤。周传洲在他近年来出版的系统介绍吐谷浑历史的《吐谷浑史》一书中对炀帝西巡的原因、路线、意义都有详细论述。他评价隋炀

① 关于吐谷浑史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周伟洲《吐谷浑史入门》一书，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大陆杂志》1969 年第 6—7 期。

③ 《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兰州大学学报》(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1983 年 1 月。

帝此举"实行征服少数民族的掠夺政策，必然使吐谷浑人民饱受掠夺战争的苦难和民族压迫"，"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既不能把炀帝的西巡，完全看做是穷奢极欲、征服掠夺少数民族，而全盘否定；也不能一味加以颂扬，看不到他对吐谷浑族的血腥征服和民族压迫"①。

2. **吐谷浑的分裂** 隋末，吐谷浑乘隋朝大乱之机，尽复故地。唐贞观九年，李靖率军灭吐谷浑国。据王忠、范文澜的说法，吐谷浑在唐初曾分裂为两部分，其西部首领为达延芒波结，驻鄯善；东部首领为诺曷钵，驻伏俟城②，这一观点，在国内较为流行。对此，周传洲在《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③一文里提出异议。他指出，达延芒波结是吐蕃大相，并非吐谷浑王子；鄯善乃吐谷浑西陲重镇，可汗子自北魏就驻守该地，并不从唐初始。由此可见上述观点难以成立。胡小鹏《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④一文重点从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之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吐谷浑当时不可能分裂为两部。他提出贞观十年松赞干布率羊同击吐谷浑后，乌海之南为吐蕃支持下的吐谷浑首领达延莽布支统治，乌海以北为唐朝支持下的诺曷钵统治，到这时吐谷浑才分裂为两部。钱伯泉《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⑤一文第二部分着重对分裂后的西部吐谷浑作了考察，指出西部吐谷浑原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咸亨元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罢安西四镇，西部吐谷浑为吐蕃据有。吐蕃在此设"且末东岱"，又迁大批吐蕃、萨毗至罗布泊与吐谷浑同住，对吐谷浑进

---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②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5页。

③ 《青海民族学院报》1983年第4期。

④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⑤ 《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行统治。长寿元年，唐朝收复西域失地，重设四镇，此处吐谷浑归唐。唐于此地设羁縻都督府，以吐谷浑王子弟为都督。武威所出吐谷浑王族墓志有“检校阇甄府都督”，此阇甄即“车尔臣”，且末，若羌县境有车尔臣河，可证阇甄都督府是唐廷设立的以吐谷浑人为都督的羁縻都督府。安史乱后，吐蕃乘虚进犯，西部吐谷浑再次沦为蕃境。吐谷浑人因不堪吐蕃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遂扩散至天山南北焉耆等地。以后融入回鹘中。另外，日本人山口瑞凤通过对敦煌 V01・89，tol・84 号残文书的研究，提出早在公元 635—643 年，就存在臣服于吐蕃的吐谷浑可汗，即残卷中的“莫贺吐浑可汗”，他的母亲墀邦则是更早嫁入吐谷浑的吐蕃公主。他根据这一结论推断，约在公元 616—618 年间，吐谷浑可汗向唐朝给次子求婚不果，则娶吐蕃公主墀邦。伏允死，墀邦子即位。另方面，唐朝立慕容顺子诺曷钵为可汗，于是吐谷浑分为两部①。山口瑞凤的看法，当然也不是无懈可击。匈牙利藏学家乌瑞等后来就曾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总之，众说纷纭，关于吐谷浑何时分裂为二部的看法，迄未统一。

3. **亡国后的吐谷浑部族**　吐谷浑国亡后，其部族一部分以诺曷钵为首，徙入唐朝境内为唐朝所统治；留在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则为吐蕃统治。对诺曷钵一支的活动，史籍记载很少，武威、同心等地吐谷浑墓志的发现，给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②一文详细考释了出土墓志，并据以整理出诺曷钵一支的大事记，补充了史籍记载的缺失。周传洲《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③ 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墓志作了补考，并据墓志和史籍列出吐谷浑在唐代的世系表。在《吐

---

① 山口瑞凤：《古代西藏史考异》，载《东洋学报》，1966 年第 3 期。

② 《历史语言所集刊》1948 年第 20 本。

③ 《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谷浑史》一书中，他又利用墓志列表说明吐谷浑与唐室联姻情况。王民信《吐谷浑余绪考》①对安史之乱以后吐谷浑部众下落作了考察，指出其滞留于朔方者称河西吐浑，于河东者称河东吐浑。关于吐谷浑资料除史书记载外，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也有反映，这引起一些敦煌吐鲁番学者的研究兴趣。如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中，钤有"豆卢军经略使之印"的一组涉及吐谷浑百姓十万人欲往瓜州墨离川投唐文书，就有不少学者对之研究考证。王素《吐鲁番所出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史实考证》②一文通过引证史书，进行了周严的分析，认为这十万吐谷浑是圣历二年秋诺曷钵之孙宣超从灵州率之奔往青海故地复国的那批部人，但因未能摆脱吐蕃控制，遂又归唐。王文言之在理，持之有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关于吐谷浑裔民的下落，也有文章论及，如李文实《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③就是对吐谷浑国亡后，其后裔的下落及其经济、风俗、宗教、语言等特征作了探讨，指出内附的吐谷浑在亡国后还以各种形式在内地活动了一百多年，最后被融合同化于汉民族之中；被并入吐蕃的广大吐谷浑至吐蕃衰微，逐渐被融合同化于吐蕃族，成为今日藏族的一部分；而在青海安多地区和四川昌都地区尚有未被同化的吐谷浑后裔，则是今日的土族。

（二）关于党项

党项族曾经以建立西夏政权和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党项早期的历史主要经历了隋唐五代时期。日本人冈崎精郎曾致力于党项早期历史的研究，写过《唐代党项的

① 《大陆杂志》1958年第16卷第7、8期。
② 《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
③ 《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发展》① 等文章，后来还出版了《党项古代史研究》② 一书。国内学术界过去对西夏建国史研究较多，而对党项早期历史研究却不够重视。1983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一书，为党项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1988 年，周伟洲《唐代党项》③ 一书问世，该书对早期党项的族源与族属、分布与迁徙、社会组织与习俗、与吐谷浑和隋唐王朝之关系、党项拓拔部的崛起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关于党项的族源问题，从唐以来，各种文献记载就不一致，这就引起学者们对此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长期争执不下。比较集中的一种观点认为党项源于羌族，对此，周伟洲《唐代党项》一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党项与北魏拓跋氏同源于鲜卑。持此观点者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④，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⑤ 等。关于唐代党项的迁徙问题，周伟洲《唐代党项》一书作过论述。最近汤开建发表《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⑥，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详尽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不同看法。

五、吐蕃史的研究

（一）吐蕃史料的考订

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缺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 1923 年

---

① 《东方史论丛》1947 年 7 月，第 1 辑。
② 《东洋史研究丛刊》第 27 册，1972 年。
③ 《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西北史地》，1986 年第 1 期。
⑤ 《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⑥ 《暨南学报》，1994 年第 1 期

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①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② 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秦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十三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此外，还有陈燮章等编辑的《藏族史料集》，苏晋仁辑录的《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黄颢译注的《贤者喜宴》、《新纪史》，陈庆英译《汉藏史集》，郭和卿译《清史》、《西藏王臣史》以及耿升译法国敦煌学著作《吐蕃僧诤记》、《敦煌译丛》等。这些著作，或为翻译，或为辑校，或为考释，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大大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二）吐蕃的族源

各史书对吐蕃族源的记载不一，有言吐蕃源于南凉秃发氏，秃发讹谓"吐蕃"（《旧唐书·吐蕃传》）；有称吐蕃源于西羌之发羌，"蕃"、"发"声近，故曰"吐蕃"（《新唐书·吐蕃传》）；而西藏有关史料咸谓其族源于印度。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第106页。

② 同上。

姚薇元《藏族考源》① 一文主张藏族源于“发羌”。其说认为“吐”在藏语含有崇高之意，实即汉语“大”字，“吐蕃”即“大发”，古羌人种落繁多，发羌统一诸羌建立大国，故自尊为“大发”，犹唐朝自称“大唐”。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② 则从地望和音韵学角度，指出吐蕃所居，正是汉代发羌之地，古读“发”如“拨”，吐蕃为发羌对音，以此证明吐蕃源于发羌。翦伯赞《吐蕃种族考源》③对史籍关于吐蕃族源的不同说法均提出异议。他指出，古人因不了解吐蕃种族渊源，见秃发族有自青海西徙者，而秃发与吐蕃声又极近，故谓吐蕃即秃发之音讹，谓吐蕃即秃发。若按此说，则直到东晋，西藏高原始有人类，而在短短的二百年即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吐蕃，岂非历史的一个奇迹？事实上秃发乃鲜卑语之被称谓，而吐蕃则藏语之译音，二者毫不相干。对吐蕃源于发羌，吐蕃为发羌对音之说法，他认为，吐蕃乃藏语“TO—PO”之直译，并非发羌之对音。此外，他还批驳了藏族源于印度或缅甸的说法。其结论是“吐蕃源于史前以迄秦汉时代南徙诸羌之汇合”。近年来，关于族源问题又有新观点出现。韦刚《藏族族源探索》④一文不同意藏族源于羌族说，也不同意源于印度释迦王系说，认为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兴起之民族，较为符合历史事实。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⑤一文提出“从北匈奴西迁后鲜卑占有匈奴故地，自辽东到河西部落星布而论，说吐蕃出于鲜卑，似有更充足的理由。”他据《通典》中“招抚群羌”的记载(《通典》卷一九0边防典·吐蕃条)，推断“吐蕃是以鲜卑为主、羌族为辅的一个集合体”。主张吐蕃源自鲜卑说者

① 《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0期。
②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38年第8册。
③ 《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
④ 《西藏研究》1982年3期。
⑤ 《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还有唐嘉弘《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探》①、《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② 等文章。

(三)吐蕃的社会性质与制度

对吐蕃社会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是奴隶制。王静如《关于吐蕃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③从吐蕃社会本身奴隶的大量存在；掠夺大量唐人为生产奴隶；其平民具有奴隶社会自由民特征；吐蕃社会的贵族豪富是大奴隶主等方面论证了这一性质，这一观点为较多人接受。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封建社会。李有义《今日的西藏》一书提出自松赞干布统一诸部，即在吐蕃全面推行封建制度。对此说汪钦表示异议，他的《评李有义先生研究西藏的论著中有关历史部分》④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仍是奴隶制社会，直到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由于同唐和亲，多次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又因占领河陇地区，受到先进生产方式影响，其生产迅速发展，出现了纯粹封建经济，具有农奴制的雏型。此外，还有范文澜的观点，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是一个奴隶数量不大的奴隶制社会。自从禄东赞划定田界，“吐蕃也就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⑤

对吐蕃制度的研究，本世纪前期文章极少，仅有邹文海《西藏官制考略》⑥等。进入本世纪后期，随着敦煌吐蕃资料的翻译公布，学者们对吐蕃的社会制度有了较多的研究。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⑦通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典籍对至今犹存的唐蕃会盟碑进行

---

① 《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中国藏学》1988 年第 2 期。

③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五集，中央民族学院编印。

④ 《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

⑤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 457 页。

⑥ 《国闻月报》1929 年第 6 卷第 5 期。

⑦ 《历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

研究，揭示了吐蕃官制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陈庆英《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①指出赞普是吐蕃名符其实的君主，并对吐蕃官制作了介绍。研究吐蕃官制较有份量的作品还有汶江的《吐蕃官制考》②、陈楠的《吐蕃告身制度初探》③、《吐蕃尚与论》④等。姜伯勤《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⑤通过对敦煌写本中"行人"、"行人部落"等名称的研究，指出其含义为加入行会的工商人户，进而认为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有着相当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行人部落》⑥不同意此说。本文从飞鸟使职能对吐蕃的驿传制度作了论述，并指出"行人"藏文本意为"探马"、"细作"，转释为"使者"，把行人部落与吐蕃担当刺探军情、巡逻卡哨、传递讯息乃至供应驿骑的任务联系起来，可以接近当时实际情况。安应民《吐蕃初期建制考释》⑦综合多种资料，对松赞干布时期的行政区划、职官制度、法律制度、盟会制度和军事制度一一作了简述。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⑧则以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为范围讨论了吐蕃在这里建置部落的名称、时间、次数与作用。姜伯勤《突地考》⑨一文从解释"突地"入手，考证了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⑩应用敦煌吐蕃时期的官私文书，对吐蕃统治河西时的田制、税制及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

①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③ 《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中国民族历史文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⑤ 《中国中研究》1979年第3期。
⑥ 《敦煌吐鲁蕃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7页。
⑦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⑧ 《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⑨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⑩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此外，王尧的《吐蕃饮馔与服饰》①、黄颢的《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②等文章运用大量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壁画资料对唐蕃文化之交流作了极有价值的研究。

在国外，日本学者对吐蕃社会史的研究比较重视，1959年，京都大学出版了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一书，此书对古代西藏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军事组织、社会形态等都进行了详细考证与讨论，是一本水平较高的专著。1983年，出版了山口瑞凤的《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一书，它以913页的篇幅全面涉及到吐蕃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作者多年从事吐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藤枝晃、竹沙雅章、长泽和俊等人也都从事吐蕃史研究，多有论著发表。

（四）吐蕃的向外扩张

对这一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全面的论述③。近些年，又有一些学者发表文章，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④，一文论述了吐蕃与吐谷浑、党项乃至高丽的关系，从而将吐蕃与唐朝在西域河陇地区的战争放到一个更大的氛围中，即北方草原军事部落联盟谋求抵制中原王朝军事势力的扩充，而形成的一股暗中勾结、东西呼应的弧形伏流加以分析，指出吐蕃对唐战争，所以胜多败少，是因为以军事民主为原则的部落联盟组织的存在，而封建专制主义的唐朝的兵募制度则恰恰助长了这一组织的优势发挥。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对唐、蕃在西域地区的争夺史实有较详细的论述。郭锋《唐

① 《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

② 《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③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455页。

④ 《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安西四镇的弃置》①通过对唐蕃在西域争夺史实的考述，论证了唐朝弃置四镇的时间，从而对学术界关于弃置四镇的种种不同说法（“三弃三置”、“四弃四置”、“五弃五置”）提出了异议。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② 指出唐在咸亨元年弃四镇只是撤去驻兵及机构，并不是吐蕃已经在这时占领四镇，更没有控制南疆。吐蕃控制南疆的时间只有从调露到长寿之间的十多年。此后近一百年间，西域基本是在唐朝控制之下。即便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占领河陇地区，而西域仍在唐朝官兵掌握中。张云《唐代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③ 一文利用新疆出土藏文简牍材料，对吐蕃统治西域的军事、经济、社会组织与法律制度、驿传制度等作了全面探讨，认为吐蕃在西域统治百余年之久，所行各项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其对西域各族人民的统治，保障了社会的安定与西域文明的存在发展，也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天山南部两大地区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此外，一些敦煌学者，如苏莹辉、饶宗颐、史苇湘、陈国灿等，还利用敦煌资料与史籍相印证，对吐蕃攻陷敦煌的时间问题进行了辨析④。吐蕃长期统治河西并推行一系列强制同化政策，使河西地区的汉人及其他民族出现了吐蕃化倾向，这一时期的河西部族变得极其复杂。此即敦煌文书所谓：“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P.2762）。利用敦煌文献丰富的原始资料，学者们写出了一大批研究河西部族的论文。其中如周伟洲《嗢末

① 《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1 期。
② 《西北史地》1987 年第 1 期。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④ 《唐朝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1 期。

考》①、杨铭《通颊考》②、荣新江《通颊考》③、黄盛璋《论璐微与仲云》④、《郭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问题》⑤、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⑥等。吐蕃奴隶主对河西各族百姓的奴役与暴行不断激起反抗，起义不断发生。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⑦通过对S·1438号一组"书仪"写本的研究，钩沉索隐，再现了吐蕃奴隶主统治下爆发的一起因不堪奴役而抗争的沙州社会底层的驿户反民族压迫的起义事件。齐陈骏《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⑧则简述了吐蕃奴隶主攻陷河陇的经过及其对河西人民的残暴统治，歌颂了张议潮领导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剥削与奴役的英勇斗争精神。

吐蕃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不断涌现。1989年，安应民出版了一部名为《吐蕃史》的专著⑨。此书共分七章，较为全面地探讨论述了藏族的族源与远古社会的发展，吐蕃奴隶制政权的建立，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社会及唐蕃甥舅关系，噶氏家族的专权与唐蕃战争的开展，墀德祖丹的亲政与唐蕃第二次通婚，墀松德赞时期的吐蕃社会和唐蕃关系的曲折发展，吐蕃政权的衰落与崩溃，唐蕃长庆会盟等。书后附有吐蕃赞普世系、吐蕃史大事记及长庆会盟碑碑文，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藏族历史的专著。1990年，陈小

---

① 《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
② 《敦煌学辑刊》1987第1期。
③ 《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⑤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1期。
⑥ 《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⑦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
⑧ 《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
⑨ 《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平出版《唐蕃古道》①一书，作者曾参加唐蕃古道实地考察，本书则是考察所得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对唐蕃古道的走向、路线及唐蕃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作了极有意义的论述，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

六、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

靺鞨族与渤海史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在新中国成立前的40余年间，靺鞨族与渤海史的研究中心在日本，这一时期的许多日本学者如岛居龙藏、池内宏、三上次男、关野贞、外山军治等研究了这一课题，大约发表50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亦很广。此是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老一辈史学工作者开始对靺鞨族与渤海史的研究。金毓黼除早在1931年就写出《渤海国志长编》外，于50年代又撰有关论文数篇。金是我国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主要贡献在文献学方面。至70年代末，大陆与海外的中国学者共撰写有关论文30余篇，主要成就体现在对渤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方面，为渤海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地下史料。这一时期，日本的研究仍然活跃，以日野三开郎、岛山喜一、斋藤优等人为代表，发表论文计30余篇，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基本持平。此外，苏联、朝鲜和南朝鲜等国的一些学者对靺鞨族及渤海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阿穆尔河(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大量的靺鞨、渤海遗存的发现，为苏联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苏联的A·П·奥克拉尼科夫、B·B·沙弗库诺夫、E·N·杰列维扬科、E·N·克恰诺夫和南朝鲜的李龙范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此为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的第二阶段。

---

① 《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8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对渤海国历史的研究达到鼎盛，成就斐然。论文、专著相继问世，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以往。特别是1982、1983二年，堪称渤海史研究年，无论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前两阶段都是无法比拟的。1984年，王承礼的《渤海简史》出版，为建国后第一部渤海史专著。此后，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李殿福、孙玉良的《渤海国》相继问世。近年来，又有王承礼、刘振华主编的《渤海历史与文化》、孙玉良的《渤海史料全编》等出版。此外，近年问世的一些民族史著作如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均对渤海史做了专题研究。在已发的论文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提出了新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与此同时，东北亚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学者对靺鞨族与渤海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随着渤海考古工作的广泛和深入，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文献和考古双重资料进行研究。进入90年代，更有学者认为渤海史研究具有国际性①，提出设立“渤海学”学科体系②。此是靺鞨族与渤海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一）渤海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

国内外史学界对渤海的族源、族属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说，即靺鞨说与高句丽说。靺鞨说的提出由来已

---

① 张高《渤海国历史研究的国际性》，《牡丹江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张高《渤海学刍议》，《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久，史学界绝大多数人赞同此说，如金毓黻①、游寿②、傅朗云、杨旸③，王承礼④等。姜守鹏发表的《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一文⑤，援引中外古籍记载，再次肯定了渤海国的主体和建国者是靺鞨人，并逐条剖析了“高丽说”所依据史料的真伪。朱国忱、张泰湘的《渤海国的族属问题》⑥，刘振华的《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⑦，也肯定了渤海的族属系靺鞨，进一步剖析了“高句丽说”利用文献的错误。张甫白也对史书所载“高丽别种”进行平议，认为渤海族出自粟末靺鞨，而非高句丽⑧。孙显昌还从“渤海靺鞨”一词考证入手，认为“渤海靺鞨”系指属靺鞨族粟末部的大祚荣族系⑨。1982年，孙进己等的《渤海的族源》一文⑩，虽然肯定“渤海族的主源是粟末靺鞨”，但却指出，渤海的粟末靺鞨不是勿吉——女真系统，而是觉涉貊系。1989年，董万仑发表《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⑪。除支持“靺鞨说”外，且对粟末靺鞨属涉貊系的观点进行了商确。何光岳则再考证粟末靺鞨系来自中原山东、河南一带，本源于涉貊族⑫。之后，李德山从“靺鞨”族名、“震国”之号、“渤海”

①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版，“汉族复兴时代”。

② 游寿《靺鞨命名与歌舞服色》，《哈尔学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③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④ 王承礼《渤海简史》。

⑤ 《求是学刊》1980年第三期。

⑥ 《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

⑦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⑧ 《渤海族属平议》，《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⑨ 《渤海靺鞨考》，《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4期。

⑩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

⑪ 《黑河学刊》1989年第1期。

⑫ 《渤海大氏的来源和迁徙》，《求索》1990年第2期。

封号、渤海王族姓氏以及渤海国山水名称含义等几大方面考证认为渤海王国的民族渊源于太皞伏羲氏——炎帝神农氏族系，也就是东夷族系，原本起源于山东地区①。他进一步认定东北地区的古民族是东夷的后代，其族源绝大多数的东北古代民族都可追溯到东夷系②。

“渤海民族”的概念由金毓黻在30年代提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至1979年，崔绍熹发表《渤海族的兴起与消亡》一文③，论述了渤海族的形成问题。认为自公元5世纪末，靺鞨中的粟末一支役属于渤海，至大祚荣建国约有200年之久，这一时期，粟末靺鞨与部分高句丽人住在一起，导致二者血统混杂。1982年，孙秀仁、于志耿发表《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④。指出：以粟末靺鞨为主，吸收靺鞨其他余部，并挹娄、夫余、涉貊、沃沮故地原住民及部分高句丽遗民等成分，经长久发展最后形成渤海族。董万仑亦有这样的见解，他在《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更加全面地论证了这个问题。金香则对渤海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渤海族”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渤海是国名并非民族名，作为民族名称是不存在的⑤。她还认为，“渤海人”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无论广、狭的渤海人，当为渤海国人或粟末靺鞨人，而非渤海族人⑥。

（二）渤海政权与周边各族关系

渤海国虽是唐朝管辖下一地方政权，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有机

---

① 《渤海王国渊源丛考》，《民族研究》1993第1期。
② 《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③ 《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
⑤ 《关于渤海国的若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⑥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

组成部分，但由于它地处东北亚中心，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它与周边各族及邻国有较密切的接触。因此，中外学术界较重视渤海与周边各族关系的研究。

渤海与唐朝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在史学界已无人表示异议。但这种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准确地给予揭示，史学界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渤海是“唐代中国”的“地方封建政权”；亦有人主张其“相当于今天的民族自治”；还有人认为渤海是“隶属于唐的区域性民族政权”。1982 年，姜守鹏发表《渤海隶属于唐朝》①，认为渤海受唐册封，遵藩臣义务，唐政府在渤海设州府，及当时新罗、日本都承认渤海与唐朝的隶属关系，故渤海是唐帝国的一部分。1982 年，魏国忠的《渤海都督府长史小考》一文②，考证出渤海长史与黑水都督府长史一样，俱为中央政府派驻，代表中央对地方民族政权司监督与控制之责。从而为说明渤海与唐朝关系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证据。佟柱臣《〈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一文③，据张氏墓志证实了《新唐书》中“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的记载。张高还从国家产生的形式角度进行探讨，认为靺鞨人国家的产生有其特点，既不是在根本无国家的地区建立的国家，也不是在原有国家基础上所建立的新国家，而是在唐帝国大国内建立的一个小国④。林树山的《唐朝对渤海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则探讨了唐朝的民族自治政策，认为该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上都较为宽松，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⑤。

对渤海与周边邻族关系的探讨以宋德胤、王海鹏的《略论渤海

---

① 《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4 期。
② 《北方论丛》1982 年第 2 期。
③ 《黑龙江文物丛刊》创刊号。
④ 《靺鞨人国家产生的形式》，《黑河学刊》1990 年第 2 期。
⑤ 《黑河学刊》1991 年第 4 期。

与邻族的关系》一文最为全面[①]，该文论述了渤海和突厥、回纥、室韦、契丹、黑水靺鞨诸部及新罗等的关系。宋玉祥的《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则探讨了渤海与契丹的关系，表述了对两者“世仇”之谜的认识[②]。

渤海与国外关系的研究，以对渤日关系的探讨为主，先有徐琳《甘滋芳润羁情——从渤海日本诗人唱和谈中日友好》[③]，及王侠《沧波织路，义洽情深》[④] 等文，高度评介了渤海在传播盛唐文明，增进中日友谊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进入九十年代，有学者对渤日交流分期进行研究，如邓鹏的《关于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初期交往》一文[⑤]，认为渤日之间的初期交往是受当时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影响，具有结成军事同盟的目的。孟东风的《古代渤海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则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期以政治交流为主，中期以经贸活动为主，晚期以文化交流为主[⑥]。此外还有徐琳、董振兴的《论渤海与日本的使臣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⑦]，认为渤海与日本的交往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如酒寄雅志的《渤海通事研究》(一、续)[⑧]，通过对由日本人承担的与渤海使沟通意愿的渤海通事的研究考查了日渤关系。

(三)渤海政治制度与文化、宗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进入 80 年

---

①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 年第 1 期。
② 《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
③ 《中日关系史研究》第 1 辑
④ 《天津师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⑤ 《大庆师专学报》1990 年第 1 期。
⑥ 《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⑦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⑧ 《黑河学刊》1991 年第 1、2 期。

代，情况大有改观。魏国忠、朱国忱的《渤海国政治制度述略》一文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渤海国政治制度与唐朝的渊源关系和隶属关系。王承礼的《渤海的政治制度》②、王成国的《唐代渤海国官制概述》③等文，也都对渤海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日本学者还探讨了渤海王权的构造、王位继承及与其相结合的东宫制④。认为渤海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职官制度基本袭用唐朝的，但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适应多民族的特点，作了一点变通。从而说明唐代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完备的上层建筑，强烈地影响了渤海地方政权。

渤海国向有"海东盛国"之称，久负盛名的"海东文化"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1980 年，朱国忱、张泰湘、吴文衔、魏国忠的《关于唐代渤海国的文学艺术》一文⑤，对渤海的文字、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考证。1981 年，李殿福的《从考古学上看唐代渤海文化》⑥指出，"把渤海文化称为独立的文化，或受别的民族文化的影响，说是某某文化的继续等说法都是错误的。"而认为渤海文化是唐文化的一部分。徐达音还有专文论渤海乐⑦。近年对渤海文化的研究似有新的角度，如魏存成的《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一文⑧，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高句丽与渤海历史与文化之发展，认为两者各具渊源，自成序列，但渤海初期仍有高句丽文化特征存在，随着渤海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唐

---

① 《求是学刊》1981 年第 3 期。

② 《博物馆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③ 《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5 期。

④ 酒寄雅志《渤海王权考察之——以东宫制为中心》，《博物馆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⑤ 《求是学刊》1980 年第 3 期。

⑥ 《学习与探索》1981 年第 4 期。

⑦ 《渤海乐古今探微》，《满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⑧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对渤海的影响很快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张高则着重探讨了作为渤海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上京文化，提出了一系列上京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认为上京文化所代表的渤海文化是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①。此外，孙进己② 张碧波③ 等还对渤海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特别是张碧波还尝试总结了渤海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1982 年，李强发表《论渤海文字》④，作者参以考古资料，论证了渤海没有发明文字的结论。

贞孝公主墓的发现，为研究渤海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对其绘画等艺术的研究，大有裨益。王承礼⑤、孙玉良⑥、池升元⑦等人纷纷撰文，或以公主墓志订正史实，或以公主墓室壁画研究其绘画艺术，与唐朝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使渤海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90 年代以来，开始有学者探讨渤海的民俗。赵长胜的《渤海的礼俗》一文⑧，考查了渤海的礼仪、生活习俗、婚俗及丧葬习俗等，认为渤海的礼俗有显著的民族特色，也有吸收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成份。方学凤则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渤海的多人葬

---

① 《关于渤海上京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牡丹江师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② 《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③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④ 《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5 期。

⑤ 《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

⑥ 《渤海纪年补订》，《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

⑦ 《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浅析》，1981 年吉林省考古学年会讨论稿。

⑧ 《牡丹江师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制，认为渤海多人葬是家族葬而不是殉葬①。1995年，王海鹏又专文探讨渤海婚俗文化，认为渤海上层社会的婚俗文化受儒家礼教的影响较深，而民间则更多地保留本民族固有的婚俗文化②。

对渤海儒学的研究，近年有方学凤的《试谈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③一文，认为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由于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基础、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及高度发展的盛唐封建儒教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迅速发展为渤海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儒教的广为发展又对渤海的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渤海宗教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渐加强。由于舍利函等佛教遗物的发现及佛教遗迹的清理，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李殿福的《从考古学上看唐代渤海文化》、朱国忱的《关于渤海佛教和佛教遗迹》④、王承礼的《渤海的儒学和佛教》⑤等文，较系统地研究了渤海佛教发生、发展的源流及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并指出渤海积极汲取内地的封建文化，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儒学，弘扬佛教，兴建寺院，成为渤海学习、输入唐朝封建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朱文，细致地考证出佛教传入靺鞨的时间及有关情况。关颖也认为渤海国的佛教与唐代佛教一脉相承，是渤海统治者由唐朝引进的思想统治工具，并分析了佛教对渤海社会所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⑥。

---

① 《试谈"渤海多人葬"》，《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② 《渤海婚俗考》，《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2期。

③ 《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④ 1980年黑龙江省文博学会讨论稿。

⑤ 《学术研究丛刊》1983年第二期。

⑥ 《关于佛教在渤海国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探讨》，《牡丹江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四）渤海经济

海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必有坚强的经济作后盾，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渤海的经济研究尚显薄弱。自80年代以来，这类文章出现较多，涉及面也较广，诸如朱国忱等人的《论渤海经济》①、陈显昌的《渤海国经济试探》②、方学凤的《略谈渤海的农业生产发展》③等文，利用考古资料并参证文献记载，对渤海的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肯定了渤海国开发祖国的东北的伟大功绩。再如张泰湘的《论唐代渤海地区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④及王侠的《我国东北古代民族的海上活动》⑤ 等文章，也涉及到渤海与日本开展贸易、经济交流等情况，从而探讨了渤海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90年代，有学者专门探讨渤海的货币经济，如刘晓东、郝思德、杨志军的《渤海国货币经济初探》⑥、王桂珠的《谈谈有关渤海货币的几个问题》⑦ 等。刘、郝、杨一文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探讨尤为全面、深入，认为渤海国盛行物币制，所使用的铸币除少量日币外绝大多数为唐币，其货币经济大体实行物币制与铸币制并存的双轨制，渤海的货币经济反映出与中原唐朝货币经济的一致性。此外，方学凤还对度量衡进行了讨论，认为渤海国在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生活等方面一直实行过度量衡制，其单位量、进位制大体与唐制相同⑧。

---

① 《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
② 《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
③ 1981年吉林省考古学年会讨论稿。
④ 《黑龙江日报》1978年10月29日。
⑤ 《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⑥ 《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⑦ 《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2期。
⑧ 方学凤《试谈"渤海多人葬"》,《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五）渤海社会性质

概括地说，目前学术界对渤海的社会性质有以下4种看法，即原始社会末期说；前期奴隶制、后期封建社会说；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主前期奴隶制、后期封建社会说的是张博泉、程妮娜二人①。主封建社会说的是陈显昌②。两说的主要根据是：一，渤海的封建制改革并不是自身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而是从外部输入的，主要是汉族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二，渤海封建制改革是从上层建筑入手，照搬唐朝的封建典章制度，对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而完成的。1988年，蓝永喜撰《关于渤海国社会性质的商榷意见》一文③，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参以中外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一般特点，联系渤海国的实际情况，诸如存在大量的"家僮"（奴隶）等，驳议了渤海国前期奴隶制、后期封建社会说和封建社会说。由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一书④ 也主张渤海的社会形态为封建制，原因在于高句丽在东汉末和三国时就已完成封建化过程，而渤海郡国是联合部分高丽人所建的。有关渤海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将继续进行，这无疑是渤海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六）渤海历史地理与内外交通

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在第一阶段较受日本学者的重视，他们发表了十数篇论文，对渤海五京的位置、上京的街坊、东京城的发掘等问题均有考述。我国学者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也对有关问

---

① 张博泉、程妮娜《论渤海国的社会性质》，《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

② 陈显昌《渤海国史概要》，《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牡丹江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民族出版社，1990年。

题进行了详切的考证。解放后，随着大量渤海遗址的发现，学者们愈加掌握了确凿的依据，因此对前代学者的舛误多有补正。1982年，李健才、陈相伟发表《渤海的中京和朝贡道》①，论证了今吉林省和龙西古城子就是渤海中京显德府治所；刘忠义的《东牟山在哪里》② 指出，今吉林省敦化敖东城西南20余里的城山子山城就是东牟山。90年代，除有日本学者对东京府进行考证外③，还有学者专注于渤海上京的研究，如刘晓东的《渤海上京城附郭县再考》④，刘晓东、魏存成的《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⑤，方学凤的《比较：渤海上京城与唐长安城》⑥等。此外，张昌熙还考证了大祚荣立国的基地⑦。另外，学者们对渤海的"朝贡道"、"营州道"、"日本道"、"渤海道"等均有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看法。近年还有学者据考古资料对契丹道进行了推断研究⑧。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渤海国地理、疆域和内外交通的深入研究。

（七）渤海文献

渤海文献研究的创始人是金毓黻，但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金氏的《渤海国志长编》已满足不了渤海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孙玉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日本古籍中渤海史料汇编》，凡10万余字。1981年，刘振华写了《渤海史事识微》⑨；1982

---

① 《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②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
③ 驹井和爱《渤海东京龙原府宫城址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④ 《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⑤ 《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⑥ 《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⑦ 《大祚荣立国之地考辨》，《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⑧ 马德谦《渤海契丹道吉林市以东区段假说》，《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3期。
⑨ 1981年吉林省考古学年会讨论稿。

年，孙玉良发表《车书本一家——订正一则有关唐代渤海史料的传讹》一文[①]。他们对一些文献记载中的舛误进行了辨证，为渤海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刘晓东的《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一文[②]，认为《渤海记》可能分为风俗、宫殿、官品3卷。宋德胤、王海鹏的《渤海"国书"价值论》[③] 则考察了渤海"国书"中所显示的民族精神，认为国书不仅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价值，还显示了民族精神。1992年，孙进己又编著出版了《渤海史料全编》，收集了中国、日本、朝鲜古籍中的渤海史料及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题辑录，类聚成编，更加系统、全面。

再有，1986年由张志立汇编、张璇如、孙进己审编的《中国北方八省市考古论著汇编》出版，其中的隋唐五代分编，收录了建国以来有关渤海的考古发掘报告；1987年，孙进己、冯季昌主编的《渤海史论著汇编》出版，书中收录了中、朝、苏、日等国的渤海史研究论文。1991年，王承礼、刘振华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出版，该书收选了48篇1986年底以前发表的论作，分类编排。此外，杨雨舒收集整理了"渤海史论著索引"，收录了中国(含台湾、香港)、日本、朝鲜(含南朝鲜)、苏联等国作者1986年以前发表的有关渤海史的著作、论文及资料，附录于《渤海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他还收录了1987—1993年间发表的有关著作、论文和资料，辑成《渤海及东丹史研究论著资料索引》[④]，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综观渤海史三个阶段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很可观。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在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揭示出渤海国建立、发展、壮大、消亡的客观规律。

---

① 《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 《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③ 《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④ 《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七、契丹族早期历史

契丹族名，始见于《魏书·契丹传》，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一支强劲民族。它随着唐朝的结束，崛起于唐朝版图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五代、北宋相始终，成为又一个"北朝"。自本世纪初，中外史学界开始全面研究契丹史，截止 80 年代末，契丹史专著约有十几部之多，论文几达 200 篇。特别是陈述的《契丹政治史稿》、舒焚的《辽史稿》、张正明的《契丹史略》、杨树森的《辽史简编》等专著，堪称契丹史研究的集大成者。限于本书的讨论范围，本小节不能对契丹史研究之全貌给予全面描述，仅能就其早期历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若干问题，作一简单概述。

（一）契丹族名

据《金史》："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金史》的这一记载，得到了冯家升、张正明等人的肯定。冯氏认为，契丹一词，意为"镔铁"①。张正明亦指出，契丹这个族号的涵义，是镔铁或刀剑的意思②。舒焚亦倾向于这一结论③。但郑英德认为，契丹是"奚东"的转音，他提出 6 条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结论④。如此，则契丹的涵义就是"奚的东面"的意思。两说何者为是，尚需再提出更坚强的证据。另外，日本学者爱岩松男认为，契丹一词系由"奚契丹"或"奚丹"演变而来，汉译为"小刀"⑤。此说与冯家升等人的观点大同小

---

① 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1933 年第 13 期。

②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 页。

③ 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 页。

④ 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1980 年版。

⑤ 爱岩松男《契丹古代史的研究》第 163－167 页。

异，在此一并介绍，以期有利于契丹一词的释义早日取得一致意见。最近有学者对“契丹”一名的释义提出异议，认为在没有明确直接释义的文献记载条件下，对译名含义的确切解释是不可行的。对契丹一名的训释，应等到契丹文字资料的发现和解读①。

（二）契丹族源

契丹源出东胡系鲜卑族宇文氏，这是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如冯家升、金毓黻②、张正明、景爱、③、舒焚、于志耿④、孙进已⑤等，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古文献记载，再证以风俗、地域、语言及考古发掘等。但傅朗云、杨暘认为，契丹族源神话中记其有三位始祖，显见契丹的族源很复杂，族人成分亦很复杂。《辽史·世表》在追述契丹族源时，将其联系到炎帝的后裔葛乌菟，因此，契丹为炎黄子孙亦有可能⑥。这是一个很新颖、诱人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重视。朱泓则通过分析内蒙东部辽墓出土的十几具契丹人遗体所显示的高颅特征，确认契丹人与鲜卑同属一个族类，而不同于先秦时代东北地区低颅的土著居民⑦。

---

① 张久和《东胡系各族族名研究及其存在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②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1980 年翻印版，第 302 页。

③ 景爱《契丹的族源与族属》，《史学集刊》1984 年第 2 期。

④ 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8 页。

⑤ 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4－55 页。

⑥ 傅朗云、杨暘《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6－77 页。

⑦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三）契丹早期宗教

契丹族除建立辽政权后族人普遍崇佛外，尚有他们的原始宗教。但长期以来，对契丹族早期宗教的研究并没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世纪 30 年代，徐世勤发表《契丹先世的神话及其发生之时代》一文[①]，较全面研究了契丹族神话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问题。1988 年，张国庆发表《辽代契丹贵族的天灵信仰与祭天习俗》[②]，详细地研究了契丹原始宗教中的“天灵信仰”和“祭天”的实质，并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充斥着浓郁的政治功利意义，反映了契丹族信仰习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1989 年，李德山发表《“奇首可汗”小考》论文[③]，根据文献中的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的情况，参以宗教史理论和当代中外民族志，认为“奇首可汗”是一具骷髅，以此证明契丹族早期曾有“骷髅崇拜”现象。1990 年王承礼发表《契丹祭黑山的考察》[④]，对契丹人祭黑山做了综合的历史考察，指出祭山是契丹人的原始信仰，蕴含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内容。契丹建国后，祭山又成了封建礼制。席岫峰、宋志发还研究了契丹人的祭祖活动[⑤]，认为契丹人的祭祖活动大都通过祭山和祭天地的形式体现出来。

应该看到，契丹的原始宗教比较复杂，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较有代表性的宗教之一，也是我国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现在仅是开始，除研究的深度不够外，研究人员的力量亦尚显不足，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

①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5 年第 36 期。

② 《北方文物》1988 年第 4 期。

③ 《博物馆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2 期。

⑤ 《试析契丹族人的祖先崇拜活动》，《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 3 期。

（四）契丹与唐朝及其他民族关系

唐朝实行较为平等的、开放性的民族政策，因此，唐与契丹的关系总的看来友好的时间长于交恶的时间。近年有崔明德的《唐与契丹战争起因新探》①，认为唐与契丹交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朝民族政策的失误。王成国的《小议唐对契丹的政策》② 一方面肯定了唐对契丹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指出唐朝政治的腐败、对民族政策的违背导致了契丹与唐的关系紧张。契丹作为唐朝中央政府统辖下之民族，为开发祖国东北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学者们的眼光已不局限于此，1988 年崔明德发表《唐与契丹、奚和亲公主述考》一文③，这大概是另辟蹊径研究契丹与唐朝关系的开始。此后，他还发表了《契丹、新罗与唐朝关系之比较研究》④，探讨契丹与新罗对唐关系之不同及原因。1993 年，张国庆发表《南唐、契丹之聘使及其目的》⑤，探讨契丹与南唐的交往。另外，契丹与奚族的关系尚需作更深层次的研究。

（五）其他方面的研究

契丹初期的势力并不强大，甚至要比奚族落后和弱小，因此，研究、揭示契丹早期社会发展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契丹族如何消化、吸收汉文化，并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化；五代时期契丹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通等问题，虽有中外学者的多方面研究，但仍将是今后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重要论题。近些年来，对契丹文化的研究有所加强，但大多数学者都限于辽代的契丹文化，对此早有

---

① 《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
② 《社会科学辑刊》1992 年第 2 期。
③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④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⑤ 《江海学刊》1993 年第 2 期。

学者指出契丹史并不等于辽代的契丹族史[1]，在研究上应注意区分。

八、奚族的研究

奚族曾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隋唐时期势力达到鼎盛，对其周边各族具有一定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奚族的历史研究尚很不足，这可能与史料中对其记述不多有关。所以，加强奚族史的研究是唐代民族史研究中需加强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世纪 30 年代，日人岛田好发表了《奚、霫、白霫民族考》一文[2]，是为奚族史研究的滥觞。70 年代，台湾学者赵振绩的《大奚成立与消失考》[3]、林恩显的《唐朝对奚与契丹的和亲政策》[4]，阐述了奚王萧干建立的“大奚”民族政权的成立与灭亡过程，及唐朝对奚、契丹和亲政策的分析。赵、林两人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尽管大陆史学界对奚族的专门研究晚于日本和台湾，但就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一）奚族族源

由于史籍中对奚族族源的记载纷歧，所以现今的研究者们意见不一。归纳起来，王玲、冯继钦认为奚出于鲜卑[5]，主要根据是

---

① 孙进己《开创契丹史研究的新阶段》，《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满洲学报》1936 年第 4 期。

③ 《幼狮学志》1970 年第 9 卷。

④ 《人文学报》1975 年第 1 期。

⑤ 《满洲学报》1936 年第 4 期。

《通典》中"东部鲜卑之别种"的记载；孙进己认为奚源于乌桓①，主要根据是《新唐书·奚传》的记载；傅朗云、杨暘认为，奚族来源于三代时期，与后来的山戎有族源关系②。李德山则主张奚族起源于商代的奚隶，其先世可上溯到黄帝十二姓中任姓所建立的奚国③，主要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及青铜礼器的铭文和文献记载，这样，就将奚族的历史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推了1千余年。可以预见，对奚族族源的探讨现在仅是开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奚族族源的认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奚族族称

我国的古民族，其族称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大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因此，研究族称，对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无疑会大有裨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在研究民族史时，对族称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李德山在《奚族增考》中根据文字学，并参以前辈学者的考证，认为奚族族称的含义是"梳辫子的人"。这一说法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讨论、认定。

（三）奚族流向

有辽一代，奚族沦为契丹人的部族奴隶。金灭辽，对奚族采取逐渐分迁的政策。迁入关内者，融入汉族中，这是学术界都认同的事实。争论较大的是居于关外的流向。孙进己认为这部分奚人最后大部入蒙古族中④；杨若薇则主张多入女真族中⑤，李德山也认

---

① 《幼狮学志》1970年第9卷。
② 《人文学报》1975年第1期。
③ 王玲《辽代奚族考略》，《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冯继钦《有关奚族起源的两个问题》，《求是学刊》1984年第1期。
④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⑤ 杨若薇《奚族及其历史发展》，《历史教学》1983年第2期。

为奚族最终大部分融合于女真族中，一部分融合于契丹（最终亦融合于女真）和汉族中①。显然，对奚族流向的研究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这是令人鼓舞的，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此外，对奚族文化研究也已开始，冯继钦的《奚族文化刍议》一文②，首次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系统地论述了奚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为奚文化除有自身的传承性外，还有接受外族文化的变异性。

九、室韦族的研究

室韦族名始见于北魏，隋唐以后势力渐大，在东北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室韦史的研究，较东北其他古民族的研究而言，尚显薄弱，与其在东北史中的地位很不相称。所以，加强室韦史的研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一件重要事情。

（一）室韦族源

有关室韦族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目前较流行的约有5说。金毓黻、方壮猷等老一辈史家，据两《唐书》记载，及室韦与鲜卑族名的关系，认为室韦的族源是鲜卑③。郑英德同意这一观点，并归纳出3条论据，论证了室韦与鲜卑的源流关系④；林惠祥、冯君实认为

---

① 《北魏以后的奚族》，《北方民族》1991年第2期。

②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

③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版，卷1—3；方壮猷《室韦考》，《辅仁学志》第2卷，第2—3期。

④ 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源》，《1980年蒙古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室韦源于肃慎，主要根据《新唐书·室韦传》："其语言，靺鞨也。"[①]赵展又从生活习惯及语言上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论证了室韦属通古斯族系[②]；《新唐书·室韦传》载："室韦，丁零之苗裔。"故吕光天、古清尧认为室韦起源于丁零[③]；郑英德上引文又据地域、文献记载、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的考证，认为室韦出于乌桓；孙进己则认为室韦自成一系，其主要根据是对室韦地域、经济、习俗、语言的考查，并联系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逐一驳议了前4说的缺欠，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④]。论述此问题的还有王德厚《室韦族源问题之管见》[⑤]。以上诸说，各有所据，一时难以定论，这对室韦史研究，尤其是室韦族源这一重要问题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简单地说，多说并存的观点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前提和理论营养。

（二）室韦经济与社会性质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太深入。自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逐步有改观。1985年，孙秀仁、孙进己、郑英德、冯继钦、于志耿等人的《室韦史研究》一书问世，书中专辟一章研究了北魏至唐室韦的经济和社会性质问题。指出北魏时室韦已进入野蛮时期中级阶段和父系社会早期；唐代室韦在"不同程度上向野蛮高级阶段及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过渡"。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等于最后的结论，但却表明，史学工作者们已不仅仅局限于室韦史中的几个少数专题的研究。这种勇于探索，努力拓宽室韦史研究领域的创新精神和铺路精神，会大大有利于室韦史的全面研究。

---

①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8页；冯君实《鄂伦春族探源》，《吉林师大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2期。

② 赵展《对蒙兀室韦说的质疑》，《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

③ 吕光天、古清尧《论陶鬲向北方的延布》，《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④ 《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9～93页。

⑤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4期。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室韦史研究的展开，有关室韦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室韦族与同时期各族的关系、室韦的地理位置等课题，均有不同程度的专题研究成果。除上述《室韦史研究》外，张久和考证了隋朝时期和唐朝初期的室韦地域情况①。高荣盛的《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探寻了阴山地区室韦人在近三个世纪中演变、聚合的踪迹②。王德厚的《东魏至唐时期室韦与中原皇朝及毗邻民族的关系》一文则探讨了室韦与中原王朝及突厥、薛延陀、回鹘等邻族的关系③。冯继钦还从语言、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讨论了室韦文化④，认为室韦文化是由多族系形成的多源文化，不属单一文化类型。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室韦史的研究定会后来居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十、南诏的研究

（一）南诏史料的考订

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向达和方国瑜。向达从1939年起，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为唐人樊绰的《蛮书》做了较注。这部校注引书繁富，参考价值大，而且书末附有关文献，尤便省览。与此同时，向达还写了《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⑤一文，对《太平御览》和

---

① 《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地域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② 《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③ 《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
④ 董国尧、张碧波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通鉴考异》等书中所引唐人关于南诏的著作进行了略考。1954年向达在《南诏史略论》① 中又介绍了一些来自云南的古代民族历史传说资料。方国瑜也先后发表了《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②、《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③、《樊绰〈云南志〉考说》④ 等文章，对有关南诏及大理史的各种资料做了详细介绍。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工作，也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在南诏史料的考订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有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版）、徐嘉瑞、汪宁生、李霖灿、张增祺、李惠铨、王军等人对《南诏图传·文字卷》的研究⑤ 以及林超民对《通典》中所载《西洱河风土记》⑥ 的研究。

（二）南诏族属

关于南诏族属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

1. **南诏为泰族所建**。持这种看法的多为外国学者。最初提出此观点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歹哈威·歹·圣登尼（DHervey·de Saine-Denys）。其后德国人洛显（E. Rocher）、邦德里（P. L. Poutalis）、英国人巴克尔（E. H. Parker）、戴维斯（H. H. Davies）、柯

---

①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② 《历史研究》1962年6期。

③ 《思想战线》1981年4、5期。

④ 《思想战线》1981年1期。

⑤ 见下列书籍和文章：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宁生《〈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考释》，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2期；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张增祺《〈中兴图卷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载《思想战线》1984年2期；李惠铨、王军《〈南诏图传·文字卷〉初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6期。

⑥ 《〈西洱河风土记〉及其史料价值》、《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3期。

克兰(W. W. Cochrane)、拉古柏里(Lacouperie)、吴迪(W. A. R. Wood)、美国人杜德(W. clfton Dodd)、德国人克勒纳(w. Credner)、日本人铃木俊①,以及1957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所编《世界通史》第三卷下册和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泰族》,泰国丹隆亲王的《暹罗古代史》,姆·马尼奇·琼赛的《老挝史》(1971年),隆·塞耶玛南的《泰国史》等书也都重复了此说。他们的基本理由有二:第一,哀牢夷是泰族而南诏自称为哀牢夷之后;第二,南诏的"诏"是傣族的语言,所以南诏及其民众都是傣族。

但这种说法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便遭到了我国许多学者的反对。1938年,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发表了《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②,接着,方国瑜又于1939年发表了《南诏是否泰族建立的国家》和《僰人与白子》两文③。他们以确凿的史实、缜密的考证证明南诏国、大理国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1944年,语言学家罗常培发

---

① 洛显《中国的云南省》(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和《云南王史》(Histoie des princes du Yun-nan et de leurs relations avec la China d' apres documents chinois,1895);邦德里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raison Thaie en ludu-chine,1897),此文原载《通报》第一编第八卷和第一编第十卷(1897.1909);巴克尔《古代的中国》(The Ealy laos and China 1890);戴维斯的《云南》(Yun-nan Liuk between lndia and Yang-tse,1909;柯克兰的《掸族》(The Shans,Vol. I);拉古柏里的《掸族的起源》(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吴迪的《暹罗史》(The History of Siam 1926),此书有陈礼颂的汉译本,1947年商务版;杜德《傣族》(Tho tai Race 1923);克勒纳的《南诏故都考民》(culural and Geographical Obsevation made in The Tali Region ith pecial regard to The nan-chao Problem)1934年曼谷版;铃木俊《以南诏为中心的云南诸蛮族》(世界历史大系)。

② 《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1938年。

③ 两文分别载于《新动向》3卷6期,1939年12月和《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

表《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①]，根据《南诏野史》所引《白古记》上南诏先世世系采用父子连名制，而车里宣慰史的傣族宗谱则无此记载，也论证了南诏国是藏缅系并非泰族所建。1947年，许云樵在新加坡《南洋学报》上发表的《南诏非泰族故国考》[②]，叙述了南诏泰王国说的由来，并从语文、习俗、宗教、分布地域等方面，较为全面地驳斥了南诏泰族王国说。1959年，江应梁也发表《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③] 一文，运用大量中国史料，并充分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哀牢不是傣族的先民，南诏不是傣—泰族建立的国家，并首次指出元灭大理并没有引起傣族大迁移。1981年江应梁又发表了《傣族史涉及东汉掸国的商榷》[④] 一文。该文追溯了傣族的历史，并通过许多史料进一步证实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政权。宋蜀华的《唐宋时期傣族的政治发展及其和南诏大理国政权的关系》[⑤]一文则指出，唐宋时期傣族的分布已和今天的分布基本一致，南诏大理统治中心的洱海地区不是傣族分布区，也从无傣族地方性政权的建立。唐代傣族同南诏的关系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而不是傣族建立了南诏政权，南诏政权的统治集团特别是王族并非傣族。此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也收录有陈吕范的《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一文，从历史、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泰国著名考古学家索·让威曾在泰国的《首都人》月刊1979年11月号上发表文章[⑥]，指出四千多年

---

① 《边疆人文》第1卷3—4期，1944。

② 《南洋学报》4卷2辑，新加坡1947年版。

③ 《云南大学学报》1959年1期。

④ 《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2期。

⑤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

⑥ 参见朱振明《泰国史学界对泰族族源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10期。

以来，泰人就一直生活在泰国这块土地上，并非是从中国南部迁徙来的南诏人建立的。1982年另一位泰国学者素察·蒲媚波里叨在《探索泰国的历史》①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专攻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库恩在剑桥大学1982年出版的《南诏国和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一书第二章《南诏国的形成》中，也认为无论南诏的统治集团或是它的广大居民都不可能是泰族。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的贺圣达《"南诏泰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一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做了系统论述和总结。此文可说是对这个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划上了一个句号。

2. **南诏的王室出于乌蛮，即今日的彝族。**较早提出此说的是凌纯声②。1954年刘尧汉通过对云南哀牢山脉一带的彝族进行社会调查，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如父子连名的彝族家谱和巫画等，论证了南诏蒙氏家族与彝族有着不可分的亲属关系。后来刘尧汉又进一步指出，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诏磨弥、罗仵及仲牟由等是彝族的主要源流③。

同意此说的还有向达、徐嘉瑞、江应梁、马长寿、尤中、黄惠焜、李绍明、余宏模、肖秋、黄德荣等人。但持此观点的人在乌蛮的族源问题上看法又有所不同。徐嘉瑞认为乌蛮的前身是古代的羌族，蒙氏的祖先原来生活在西昌，其后南入蒙化，又由蒙化入大理立南诏国，与哀牢夷无关④。向达也基本同意此说。马长寿则认为，

---

① 泰国为人生作品出版社1982年版。陈健民中译本，198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1938年。

③ 《南诏统治者蒙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考》，《历史研究》1954年2期；《彝族的主要源流—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诏磨弥、罗仵及仲牟由》，《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5期。

④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

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迁徙史来看，彝族和羌族都没有什么关系。彝族早在原始公社时代就从藏缅语系的共同部落中分出，分布在滇东滇北附近了。“公元前三世纪初四川西北部的郭族、羌族和云南滇池附近的彝族，是在不同地区发展他们不同的文化。”① 马长寿还认为，唐代的乌蛮即古代的叟，它包括今日的彝族、么些、傈僳等族。黄惠焜又认为，南诏的先民亦即今天彝语各族的先民是哀牢夷②。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刘远东、张增祺等。

必须指出的是，在主张南诏王族为乌蛮（彝族）的学者中，不少人又认为白蛮在南诏国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马长寿、尤中、王忠、杨卿、肖秋、黄德荣等。王忠说：“南诏统治集团除蒙氏外，主要为洱河地区的白蛮大姓。”尤中说，南诏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李、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来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至南诏政权崩溃后，继之而起的长和国、义宁国、大理国都是白蛮贵族们先后交替充当国王③。肖秋和黄德荣更明确指出，南诏国是一个以彝族和白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④ 近几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文章和专著，如陈吕范的《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⑤、韩军的《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⑥等也都是持这种观点。目前这种观点已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赞成。

3. **南诏统治者为白蛮，即今日的白族**。持此说者主要有静寰、

---

①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② 《哀牢彝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思想战线》1976 年 6 期。
③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 年；《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④ 《略谈南诏的族属问题》，《文物》1978 年 10 期。
⑤ 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⑥ 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 1 期。

李一夫、王元甫、杨永新、赵寅松等。李一夫在《南诏王室初探》[①]一文中，引用了与南诏同时代的藏文文献《墀都松墀德宿藏传略》，以及明朝洪武年间曾任云南布政使司的张紞所写的《荡山寺记》，推断南诏是白蛮，亦即今天的白族建立的，南诏的王族本身就是白蛮。杨永新、赵寅松从南诏的地名来源以及本主信仰等方面为李一夫的观点做了补充[②]。王元甫则在对南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进行分析后，指出南诏的通用语言是白蛮语（白语），使用的文字是汉文和白文，宗教信仰也与白族有着承袭关系，生活习俗也和白族先民一致，因此南诏应为白蛮而不是乌蛮[③]。关于白蛮的族源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白蛮是由僰人发展而来。但具体说法又有所不同。如李绍明认为白蛮是以汉代分布在滇池四周一带的僰人为主，融合濮人发展而来的。尤中认为白蛮是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吸收汉族人口和文化形成的[④]。第二种意见是以向达和徐嘉瑞为代表，认为白蛮源于氐族[⑤]。张增祺虽然也认为白蛮出于僰人，但又认为僰人是南迁了的氐人，比氐人汉化程度更深[⑥]。第三种意见是以杨永新、赵寅松为代表，他们认为白蛮自古以来就是以洱海地区为其主要活动区域的土著民族，早在蜀汉时就已建立了白子国，但其源出是哀牢夷[⑦]。

4. **普通称谓**。方国瑜认为“乌蛮”和“白蛮”只是两个普通的称

---

① 《大理文化》1981 年 2 期。

② 《试论南诏主室的族属问题》，《民族研究》1984 年 3 期。

③ 《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南诏史论丛》，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1986 年。

④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⑤ 《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 年 2 期；《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⑥ 《僰说》，《云南社会科学》1987 年 4 期。

⑦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民族研究》1984 年 2 期。

谓，不是族别名称，与后来所发展的族系也并没有重要关系，如后来滇东的彝族包括有东西爨的“乌蛮”和“白蛮”，滇西的白族包括有洱海区的“乌蛮”和“白蛮”。方国瑜并指出，如果从民族融合来看问题，并不能以某一家族的子孙融合于彝族就说他们的祖先确属彝族。南诏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但哀牢不是彝族，因此也不能说蒙氏确属于彝族①。

（三）南诏社会性质

我国大多数研究南诏史的学者如方国瑜、马长寿、王忠、杨毓才、尤中、周嘉佩、范传贤等都认为南诏是以奴隶制为主的社会。较详细地论证这种观点的著作，有方国瑜1954年在云南大学编写的《云南民族史》讲义，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及杨毓才的《略论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南诏大理国的社会性质》②，尤中的《南诏社会性质质疑》③，周嘉珮的《南诏村社农民和‘佃人’析》④，范传贤的《南诏社会性质的考察》⑤等。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奴隶所有制是南诏国内各种生产关系的主流；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是南诏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史书中所记载的“佃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经常发动掠夺战争，是南诏奴隶的主要来源。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

---

① 参见《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5期。

④ 《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4期。

⑤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1期。

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彝族史》等也都采用了此说。

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有不少又认为南诏社会也同时存在其它社会制度。如尤中曾说,南诏是个部族部落集合体的国家,在它的境内,各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洱海区的白蛮中,可能从南诏建国初期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封建生产关系,而其它的一些部落,可能还处在奴隶社会以前的阶段①。周嘉珮又认为,南诏存在着村社农民的个体经济和奴隶主经济两种经济,其中村社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奴隶主经济是影响和制约其它的"普照的光"②。

1957年,杨堃在《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③一文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南诏的社会性质很可能是由原始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直接形成的,它是带有原始社会成分的早期封建社会。其理由是,南诏的主要生产是农业,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是农村公社,"大凡农村公社存在的地方,全是没有发达的奴隶制的,而农村公社的演变也是容易演变为领主或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而不容易演变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1962年,李家瑞在《试论南诏的社会性质》④一文中,也提出了南诏为封建社会的看法。他首先对《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一些材料重新进行了解释,并据此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商业贸易、政权组织、文化等方面做了分析。以后,张广志、杨卿、苏松林等人也曾先后撰写文章,重申了南诏为封建社会的看

---

①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西南民族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南诏村社农民"佃人"析》,《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4期。

③ 《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 《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3期。

法。张广志认为，南诏虽有奴隶存在，但居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生产关系，其理由主要是：南诏在战争中所得到的俘虏并没有全部沦为奴隶；南诏虽曾大规模地移民，但这些移民大都保留着自己的家族组织形式和自己的经济，也不是奴隶；文献中所记载的"佃人"不仅有家口，其劳动产品除供官的以外也有自留部分，即自己的经济，因此也不是奴隶①。杨卿主要是认为，南诏境内各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虽然极不平衡，但其主体民族白蛮所在的洱河地区无疑已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些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对自由民(即自耕农)的分土受田制和对佃农的劳役制。他还认为南诏的"佃人制"恰是封建租佃关系的证明。同时杨卿还指出，南诏政权的政治制度也是把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和云南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一套完整制度，它的基础是封建经济制度②。

(四)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林超民在《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③ 一文的三、四部分中，重点阐述了唐朝前期与南诏的关系。他指出当时吐蕃势力兴盛，并南下洱海区域。唐朝为了镇遏吐蕃，迫切需要在洱海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地方政权，而南诏要称雄洱海地区也非有唐朝支持不可。

一些学者还就天宝后期唐朝与南诏之间的两次战争进行了研究。赵文润认为，这两次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杨国忠为了获得边功，无故骚扰南诏逼其叛变。而南诏统治者随着本身力量的加强，不断同唐朝加强摩擦，阁罗凤继位后，又积极向滇东两爨扩展势力，也应对战争的爆发负一定责任。战争的导火线则是云南太守张虔陀

---

① 《南诏与奴隶制》，载《青海师院学报》1984 年 1 期。

② 《南诏政治制度及其特质》，《云南师大学报》1986 年 6 期。

③ 《思想战线》1984 年 3 期。

积极推行杨国忠集团的政策，迅速激化了南诏与唐之间的矛盾①。徐兴祥则认为，对于南诏和唐的这两次战争必须从战略目标着眼来进行分析。战前唐的目标是对付吐蕃，采取支持南诏统一洱海诸部的方针。从南诏方面看，其志不在洱海一隅，抓住唐与吐蕃矛盾可以利用，才敢于采取与唐对抗的方针②。方国瑜、木芹还认为，唐与南诏之间的这两次战争诱发了安史之乱③。赵鸿昌则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西洱河之战虽然为野心家称兵作乱提供了一个有利因素，但与安史之乱没有多少必然联系④。

余和祥的《论唐末南诏战争之起因》⑤一文则专门探讨了咸通年间南诏与唐朝战争的起因。他认为，对于这次战争不能只从两个政权问题考虑，也不能仅在咸通年间去寻求，而是应从唐代各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交往中，从这次战争的前期后期中去寻找答案。他又进一步指出，导致唐末南诏战争的深隐层次的因素，既有吐蕃的衰败，也有南诏的强大，还有唐朝国力的衰弱；表层次的因素则主要是从唐玄宗起双方关系的日益恶化。

此外，杨丽明、单文、苏建灵等人还分别著文论述了公元八世纪末南诏和唐的关系再度归好的原因⑥。

关于唐朝与南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已

---

① 《天宝后期唐朝与南诏之间的两次战争》，《史学集刊》1984年4期。

②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4期。

③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木芹《云南地方史讲义》中册。

④ 《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2期。

⑤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1993年3期。

⑥ 参见杨丽明《异牟寻与点山地盟》，载《民族文化》1983年4期；单文《南诏归唐原因之探讨》，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1期；苏建灵《南诏主异牟寻与员元年间的南诏、唐朝和盟》，载《思想战线》1991年3期。

的见解。如王忠在《南诏与唐朝的关系》①一文中指出，南诏不仅接受了唐朝封建社会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采用了唐朝的某些制度如授田制，以及与授田制并行的兵制等。方素梅在《南诏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②一文中指出，中原文化在南诏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烙印，而南诏文化之影响也及于唐朝。

（五）《南诏德化碑》的作者

《南诏德化碑》是赞扬唐代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的碑刻，对于南诏史和唐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曾对此碑进行了考证，认为碑的作者是阁罗凤时的清平官郑回（郑蛮利）。此后学者们便基本沿袭此说。1978 年王叔武发表了《〈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一文③，对郑回制碑的说法提出异议。他的根据主要是：(1)该碑表达的内容与郑回从政的事迹不合；(2)作者在碑中自述其姓名为王蛮盛，与郑回在南诏更名为“郑蛮利”不合。

1985 年，王宏道又对王叔武的看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王蛮盛并不是姓王的后代；郑回也不是王叔武所说的异牟寻时的清平官，而是阁罗凤时的清平官，从而认为郭松年的说法仍是正确的。④

1986 年和 1987 年，王叔武和王宏道又分别发表了《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⑤、《〈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⑥就此问题继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此后虽未有更多的学者参加此项讨论，但王叔武的看法已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

① 《历史教学》1985 年 6 期。
② 《民族文化》1985 年 6 期。
③ 《思想战线》1978 年 2 期。
④ 《南诏德化碑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 4、5 期。
⑤ 《思想战线》1986 年 3 期。
⑥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 1 期。

除上述几方面问题外，还有一些学者就南诏本身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情况进行了研究。张锡禄《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略》①、管彦波的《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②、禹弛的《南诏文化特征》③、陆韧的《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④、管彦波的《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⑤、潘京京的《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与大理民俗》⑥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仲录、张福三、张楠三人主编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此书收集了近年来我国南诏文化研究者的三十八篇研究成果，反映了当前我国南诏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发展趋势。

（六）从南诏灭亡到大理国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权更替

公元 902 年（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灭亡，公元 937 年白族贵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本缕清了其间由白族贵族郑、赵、扬、段诸氏所建立的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等政权的王统继承和年号。反映这一成果的主要著作有尤中的《大理国史略》⑦、木芹的《南诏大理史论》⑧，以及台湾学者林旅芝的《南诏大理国史》（上、下册）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对从南诏灭亡到大理政权建立，这短短三十六年中出现如此频繁的政权更替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尤中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反映了白族封建主在推翻南诏奴隶主

---

① 《云南社会科学》1990 年 1 期。
② 《民族研究》1993 年 2 期。
③ 《云南社会科学》1990 年 3 期。
④ 《思想战线》1995 年 2 期。
⑤ 《思想战线》1995 年 1 期
⑥ 《思想战线》1992 年 2 期。
⑦ 《西南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 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 年 2 期。
⑨ 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 1981 年，1984 年版。

政权以后，在寻找发展和巩固白族中的封建制和如何统一南诏以来的各民族地区的方法道路。木芹则认为，这些王权交替俱属宫廷政变性质。蒙、郑、赵、杨、段诸氏均为一个阶级属性。政权更替过程中，其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员更换，但制度相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南诏史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早在1902年，太田保一郎就曾在《国学院杂志》8卷7期上发表了《南诏王国的制度及与唐的关系》一文。以后，铃木俊、曾我部静雄、白乌芳郎、牧野巽、牧野修二、藤泽义美等人都曾从事过南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大体与我国相同。其中成就最大的是藤泽义美。他所发表的有关专著和文章已有三十余种，1969年3月由东京大安书店出版的《西南中国民族南诏国史的研究》是集其多年研究成果的大著。

十一、南方其他民族

（一）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南方少数民族的综合介绍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永章的《隋代南方诸族概说》①、尤中的《中国古代西南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永章的文章按地区与族类分别介绍了隋代巴蜀地区的獠与獽蜒蛮、賨，两湖地区的蛮，以及岭南越人、云南爨人的情况。尤中的书中除了对白蛮、乌蛮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外，还介绍了从南北朝时就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和蛮、徒莫祇蛮、么些蛮、濮、僚等族，以及唐代新出现的施蛮、顺蛮、长裈蛮、锅锉蛮、寻传蛮（阿昌）、裸形蛮、金齿、茫齿、白衣、棠魔蛮、扑子蛮、望蛮以及苗族等，并对这些民族的族源和后来的归属做了说明。

---

①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2期。

（二）茫蛮、黑齿、金齿等部落

1. **族属**。关于茫蛮的族属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傣族先民，另一种则认为是崩龙族先民。后者以桑维华为代表，他认为根据《元史·地理志》、《蛮书》、万历《云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所谓"开南杂种"的民族成分是"濮"、"和泥"、"洛"，做为傣族先民的金齿白夷是后来才迁徙到这些地方的。因此茫蛮部落不是傣族部落。其中居住在"茫盛恐"的是佤族先民，茫施蛮则是崩龙族先民。桑维华还认为"茫"也不是傣族特有的称谓，以"茫"冠于地名之前是古崩龙人、波勒人的习俗①。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第一种说法，即茫蛮为傣族先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9年编写的《傣族简史》中说："唐以来史籍中的'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等族称，主要是指傣族茫蛮中之一部分，也可能是傣族，'白衣'则全是傣族，宋沿称'金齿'，'白衣'。它在族源上则与古代的越人有密切关系。"刘稚在《浅谈茫蛮部落的族属》②中，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做了论述，指出早在南诏建立以前，百越族系的傣族先民就已居住在开南地区。作者并从风俗习惯、茫蛮部落的分布和傣族的关系，以及茫家傣语中特有的"地方"、"村镇"之意等进行了分析，认为茫蛮部落是今西双版纳傣族和临沧、思茅、德宏等傣族的祖先。尤中在《中国古代的西南各族》和《唐宋时期的傣族》③中说，汉晋时期的"鸠僚"，隋唐以后被称为"金齿"、"茫蛮"、"白衣"等，"棠魔"则是他们的自称，即"傣勐"的对音。说明唐朝时期傣族已经自称为傣。尤中还认为，金齿、银齿、白

---

① 《茫施蛮并非傣族先民》，《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79年3期，及《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同前1980年1期。

② 《思想战线》1982年1期。

③ 《民族文化》1983年2期。

衣与茫蛮，实际上是同一民族中存在着差别的三个部分。唐宋时他们各有主要聚居区而又互相交错。此外，胡绍华还就唐代傣族和佤、布朗等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情况做了比较研究，以证茫蛮部落为傣族而不是别族的先民①。江应梁的《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一书所持观点也基本属于这一种。

2. **社会情况**。论述唐代傣族(即黑齿、金齿、茫蛮等部)社会情况的文章，近年来主要有宋蜀华的《从樊绰〈云南志〉论唐代傣族社会》、《唐宋时期傣族的政治发展及其和南诏大理政权的关系》②，以及尤中《唐宋时期的傣族》等。他们都认为当时的傣族已跨过了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发展了种水田的犁耕农业经济，力畜既用象也用牛，而且已有了相应的水利灌溉设施。手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宋蜀华还明确指出："唐代傣族已在西双版纳建立了茫乃政权"。王军在《从〈帕萨坦〉看西双版纳茫乃政权》③ 一文中还对茫乃政权的建立、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作了初步探索。

(三)板楯蛮

彭武一曾发表了《唐宋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④ 和《论板楯蛮》⑤ 二文，指出板楯蛮即土家族的先人，原是古代巴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賨人为主体，以彭人为内核，并有卢、濮等其他民族参加的联合体，唐宋年间仍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大片领域之内。

---

① 《从唐代傣族的社会经济看茫蛮部落的族属》,《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 4 期。

② 见《思想战线》1978 年 6 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3 期。

③ 《思想战线》1984 年 1 期。

④ 《江汉论坛》1983 年 5 期。

⑤ 《南充师院学报》1987 年 2 期。

（四）西山诸羌

李绍明在《唐代西山诸羌考略》① 一文中，对唐代生活在今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治州境内之岷山山脉的羌人部落集团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东女国、附国进行了研究。格勒也就同一问题发表了《隋唐时期的西山诸羌和康巴藏族的形成》②，格勒指出史书上所记载的“西山八国”是唐以前在康藏高原上由诸羌建立的地方政权，后来随着吐蕃的崛起陆续被融合于藏族之中，这就是闻名的康巴藏族。

除以上所述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生活在南方地区的越族进行了研究。比较集中的课题是对六世纪时越族的杰出领袖冼夫人的评价，主要著述有陈凤贤《试论六世纪越族杰出的政治领袖冼夫人）》③、黄君萍《关于冼夫人若干问题的考察》④、万利生《试论冼夫人促进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⑤、许宁《开发岭南的先驱（六世纪岭南越族的杰出领袖—冼夫人）》⑥ 等。此外，容观琼还对唐代广东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⑦。

---

① 《四川大学学报》1980 年 1 期。

② 《民族文化》1985 年 1 期。

③ 《民族研究》1980 年 3 期。

④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 1 期。

⑤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 2 期。

⑥ 《学术研究》1985 年 4 期。

⑦ 《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 4 期。

第六章　中外关系

隋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特别是唐朝，在政治文化上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并加以总结凝聚提高，又接受了南北王朝民族融合、疆域开扩的新局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系统。唐朝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把势力扩张到中原王朝前所未至的地区；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东西方各种文明的营养。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使得唐文化绚丽多彩，经过整合的唐朝制度文化又强烈地影响着周边各国。以唐朝为中心自此时开始形成东亚文明的特征，影响深远，以至于今。

中外关系史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由于史料缺乏，涉及的语言种族不一，相对而言，研究的难度较大，其成果也不能与其他领域相比。以下择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因条件限制，国外研究论著有些未得寓目，只好俟诸将来再补。

一、通　论

在中外关系史的通史类著作中，都有关于隋唐五代的篇幅，多少不等。但这类包含东西方各国的通论著作却不多见。早年，向达著有《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但篇幅不大。陈佳荣著《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张广达与王小甫合著《天涯若比

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都有关于唐朝的一些章节,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概貌。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集体著作,按国别和地区分成若干篇,由各方面的专家执笔,概要叙述中国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交往、交通路线等。其中涉及隋唐五代的篇章轻重不一。以下还会提到几篇有份量的论文。薛爱华(E. H. Schafer,一译谢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吴玉贵汉译本题《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收集了大量汉文正史、政书、类书、诗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分成各种身份的人、家畜、野兽、飞禽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书籍等十八类,来研究唐朝的外来文明,通过对具体的外来物品的讨论,来说明舶来品对唐朝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是一部全面探讨唐代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包括了波斯粟特等伊朗系文化的东传,而作者所谓的"撒马尔干的金桃",不过是舶来品的象征而已。

专门研究隋唐时期外国侨民的论著,有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他讨论了蕃人在唐朝的分布及生活情形,唐朝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和入唐蕃人对唐朝文化生活的影响。谢氏又有《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于诗歌材料收罗颇富。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则以研究入唐蕃将为主,虽所论以唐史本身为主,但书后列有详细的《唐代蕃将表》,颇便省览。马弛《唐代蕃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对蕃将在唐朝的作用论述更为系统。他还撰有《试论蕃人仕唐之盛及其姓名之汉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此外,苏庆彬《两

汉迄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氏族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流传不广,未得其详。

作为工具书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考古学、宗教等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994),有不少出自专家手笔的相关条目,极富参考价值。另外,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也可用为一般性参考书。

比较而言,有关中西交通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相对多一些,其论述范围包括中亚、西亚、欧洲,有些还有南洋与非洲,是不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通论性著作。近代以来,用社会科学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先驱者,应当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汉学家。在一系列中西交通史料的整理著作中,尤以玉尔(H. Yule)原著、考狄(一作高迪爱,H. Cordier)增补的《契丹纪程录丛》(又译作契丹路程、古代中国闻见录等,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4 vols. ,London 1013-1916)收集的史料最为丰富。与之相媲美的,是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辅仁大学,1930)。此书自中国古籍中辑录出大量史料,并依据玉尔、考狄书,译出相关的外文史料,分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印度五部分编排,可以说是一部集中西交通史料之大成的著作。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杰勤对此书的校订本,于原书有增有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校订本所增补的资料不多,此书应当有包含更为广泛的续编。

有关中西交通的通史类著作,主要有方豪《中西交通史》(五册,台北华冈出版公司,1977年;上下册,岳麓书社,198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两种,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综述。仅从唐五代部分来看,方书较沈著更为全面深入。最近出版的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每一时代都由三部分组成:概述、年表、条目解说,以总结各时代中西关系史重大史事及其特征的概述为纲,以大

事年表为主体，以百科全书式的条目为辅，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版、插图、地图和索引。全书体裁新颖，各部分组合严密，浑然一体，是一部多功能的中西关系史工具书。书中的概述由主编撰写，隋唐部分的年表和词条则主要由卢向前编写，在吸收欧美学者的成果方面，略显不足。

以人为中心来收集史料加以论述的著作，颇具规模者首推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1926年收入《桑原骘藏全集》2，东京，1968；何健民汉译本题《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书局，1939）也属同类著作，但现在看来，均嫌简略。

以地域为中心来收集史料加以论述的著作，首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2，1933；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此书除收集了大量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材料外，还论述了西域文明对唐朝都城的商业、生活、艺术、娱乐、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名著。关于长安，还有武伯伦与武复兴合撰《国际交往与长安的繁荣》（《理论导刊》1991—3）。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对洛阳在隋唐时期中外交流方面的作用多有陈述，但出于众手，水准不一。

文物考古资料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学科也越分越细，而新的考古材料从出土到发表总要有一个认识和研究的过程，治史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考古学资料，上述历史著作有些尽管在这方面有所努力，但相对于丰富的新出土文物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以及近年创刊的许多地方文物考古期刊中，陆续发表了许多涉及中外关系史的材料，其中陕西出版的《文博》、《考古与文物》和河南出的《中原文物》，颇多有关隋唐两京的出土资料，可以说层出不穷。但这些材料散在四方，收集十分不易，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

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1995),按地区概述了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外国输入的材料,并注明出处,便于查找。这些材料,以隋唐五代时期的居多,也反映了隋唐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性。贺梓成《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文博》1,1984),主要是依墓志材料写成,唯取材不广。

对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尤其是对文化交往的综合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理论的思考要建立在对唐朝的世界地位的判定上。罗香林《唐代文化的新认识》(《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通过对国际关系、法律体系、学术思想等方面的考察,高度评价了唐代文化的开创性、适应性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性。牛致功《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唐史论丛》3,1987),从先进的社会制度、东方文化的渊源、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等方面,说明这一问题。方亚光《从中外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0—1),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唐代的地位。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86—3;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唐代达到了它的高度发展阶段,原因在于它既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继承了汉魏南北朝以来由民族纷扰和社会动乱而流散到江南、河西等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使其对中国文化起补阙增色的作用。唐朝具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典章制度,因而外来的宗教、艺术等文化因素只是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唐代文化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同时,出现了保守的倾向,这种倾向助长了后代封建社会的强化,把社会秩序和伦理准则过分绝对化的儒教约束了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利作用。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和汇聚的最重要地区之一西域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西域既受

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同时也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和西域的传统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相应成分，文化的交流过程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所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并不等于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甚至有所取舍。他还在《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通的影响》(《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中指出，隋唐五代时期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依然主要通过陆路，即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进行。欧亚内陆山脉、沙漠对人类文化的汇聚、贸易的开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汇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民族斗争或政治斗争形势，不同民族的不同阶级往往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某些成分，并在吸取过程中加以综合改造，用以丰富自身的固有特色的文化。自然条件的影响往往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地理环境支配人类的交往，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支配人类克服地理环境的障碍，寻求接触和交往。草原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利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与东亚的关系

(一)朝鲜

朝鲜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从很早起就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分为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它们和隋唐王朝都有着相当多的联系。

近年来，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形成热潮，中韩建交更加促进了学术的交往，产生了不少论著。徐荣洙《四至七世纪韩中朝贡关系

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分析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史料有关朝贡记载的虚伪性,指出具有实质性的真正朝贡关系是隋唐帝国成立时才出现的。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2),详细罗列了往来使者年表,并就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略加论述。

隋代与唐代初期,三韩的政治发展和相互间的军事斗争,与隋唐两朝关系至为密切,隋唐两朝的历史发展也受到与三韩关系的对立或友善的强烈影响,探讨这一时段的政治关系史,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隋朝曾倾注全力征讨高句丽,费尽国力,结果却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学者们对隋征高丽的背景、原因、目的和后果发表了许多看法。早在1948年,韩国磐就撰有《隋征高丽之目的及其失败之原因》(《读书通讯》145),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近年,韩昇《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刘健明《隋文帝征讨高丽的因由》(《春史卞麟锡教授还记念唐史论丛》,汉城,1995)和《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唐研究》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从更广阔的东亚历史的背景,深入分析了隋朝征高句丽的多种原因,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隋朝力图通过征高句丽的胜利,来确立以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重建世界性帝国。但隋朝进军的战略战术运用不当,导致了多次失败而还,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黄约瑟《试论隋与新罗的"佛教外交"》(《韩国学报》10,1991),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隋与新罗的关系,指出隋朝利用僧人,来使隋与新罗的关系更加紧密。

在唐朝初年与三韩的关系史上,不论是外交斗争,还是兵戎相见,都有了日本的参与。就此,日、韩、中三国学者发表的论著,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夏应元《论唐代初期的中·日·韩关系》(《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1995),就日本645年大化革新之前唐是否曾让日本出兵支援新罗、645年以后东亚是否存在过"日

本新罗唐朝三国联合体制”、日本白雉年间(650—654)“日唐罗三国联合体制崩溃”等三个问题，反驳了韩国学者金铉球《大和政权对外关系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中提出的观点。韩昇《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分析了唐朝力图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出兵征伐高句丽的种种原因。他又在《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1，1995)中，全面阐述了唐朝介入朝鲜，攻高句丽，联合新罗，灭掉百济，以及此后白村江大败日军的史事，理清七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脉络，指出唐朝对东亚的强烈影响，以及各国间激烈的征战，都深刻地促使各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百济平后新罗与唐朝的矛盾，则有古畑彻《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新罗与唐的关系》(《朝鲜学报》107)一文的研究。此外，还有黄约瑟《没有兵戎相见的战争——公元七世纪朝鲜半岛几次战争的前奏》(Unfought Korean Wars: pelude to the Korean war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Far Eastern History, 22, 1980;《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1—11)。

武则天的登基，改变了唐朝对朝鲜的政策。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认为武后是用以夷制夷的方式对抗外敌，一度带来和平，结束了对高句丽的统治，也使中国与新罗的关系再度密切起来。安史之乱前的情形，池田温《论天宝后期的唐·罗·日关系》(《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1995)，探讨了 752 年新罗王子金泰廉入贡于日，同年日使藤原清河等遣唐使出发，翌年在唐朝含元殿，大伴古麻吕为新罗与日本席次先后而抗争，以及此后招聘唐朝文士萧颖士的是日本还是新罗等问题，对日韩一些学者之间对后两个问题的争议做了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古麻吕抗议事件的不同说法，可以卞麟锡《中国唐代与新罗的关系——兼论续日本纪所载的“古麻吕抗议”》(《大陆杂志》32—9，1966)、《从唐代外国使之争长事例再论古麻吕抗议——以批判〈续日本纪〉相关史料为主》(《第一届国际唐

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和石井正敏《关于大伴古麻吕奏言——虚构说的介绍及其问题点》（《法政史学》35，1983）为代表。至于萧颖士的招聘去向，池田温在此先已发表的专论《招聘萧颖士的是新罗还是日本》（《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汲古书院，1988）中，详细分析了唐朝国史等唐人史料记载，认为招聘者是新罗而不是日本。萧颖士的被招聘是在新罗广泛吸收唐朝汉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新罗对唐朝的儒家、道家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学制、选举制都有所吸收，萧颖士的被招聘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除了外交往来和军事斗争外，隋唐中朝关系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汉文化对朝鲜半岛，特别是新罗的影响。新罗向唐朝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和佛教僧徒，来汉地学习唐朝制度文化，他们对唐朝文化的东传朝鲜起了巨大的作用。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系统地收集了唐代来华的新罗留学生和求法僧的传记资料，对留学生在华的学习、入仕、生活等方面做了考察，对僧侣，则区分了他们各自所属的宗派，确定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把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此文是迄今为止研究这一课题时必须参考的论文。荣新江《从〈海州大云寺禅院碑〉谈起——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特刊）、探讨了海州在唐与新罗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并通过大云寺僧惠藏的佛学系统，考察了禅宗的东传朝鲜问题。章群《论新罗入唐之宿卫与质子——兼论唐代宿卫与质子之性质》（《韩国学报》6，1986），讨论新罗入唐的蕃将与质子。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春史卞麟锡还历记念唐史论丛》，1995），则分别论述了战俘、使节、质子、留学生、僧人和谋生的百姓。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因为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保存了大量新罗人在唐情况的记载而备受重视。金文经《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叙述了《行记》所记新

罗人村落的分布状况和他们的职业，进而说明他们究竟享有什么样的治外法权。卞麟锡《试论九世纪唐朝新罗坊的性质》(《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也是利用《行记》来分析这些新罗坊的设置时期、规模及其性质问题。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1994)，所论大部分与金文相同，唯讨论了新罗人和唐人，日本人的关系问题。

敦煌文书为研究朝鲜人在唐朝地方上的情形提供了又一组材料。那波利贞《唐代流寓敦煌地区的朝鲜人》(《文化史学》8、9、10，1954—1956)，收集分析了这类文书。土肥义和《敦煌发现的汉文文书所见有关韩国的纪事》(《大东文化研究》23，1989)，探讨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斋文》中的渤海高公、九世纪后期《社司转帖》中的末堨龙以及金维那与金法律等朝鲜人史料。

唐朝科举取士，有专门优待外国人的宾贡一科，登第者以新罗人和后来的高丽人最多。高明士先后撰《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生之道》(《唐史论丛》6，1995)，探讨了在此制度下，东亚人士特别是新罗人在唐入仕的情况。在入唐新罗人中，以崔致远最有名。梁基善著《孤云崔致远研究》(汉城，1995)，对韩中史料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朝鲜诸国在制度上也大量吸收了隋唐的文化。井上秀雄《吸收隋唐文化影响的朝鲜诸国文化》，做了较全面的论述。高明士围绕东亚教育制度的一系列研究，使人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就此发表有《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史的一侧面》(国立编译馆，1984)，主要论证庙学制在朝鲜等东亚地区的建立；《略论高丽科举制度中的隋唐诸要素》(《韩国学报》5，1985)，指出高丽朝(918—1392)的科举制度是采自五代、宋元而源于隋唐。龚延明《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关于唐宋官制对高丽官

制影响的研究之一》(《韩国研究》1,1994),考察了官制采用唐宋制度的演变过程。

研究中国人到朝鲜去的情况相对较少,黄约瑟《仕高丽朝的后周官人双翼》(《韩国学报》12,1993),对这位随册封使至高丽未归而留任的中国官人的事迹做了考述,说明他在高丽推行科举制、公服制的贡献。

(二)日本

历史上中日交往有两个高潮,一是隋唐时期,以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为主;一是本世纪初叶,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近代西方文化。长期以来,隋唐中日关系史一直是两国学者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日本学术发达,有关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在隋唐中外关系史诸方面中可谓首屈一指,远比更为重要的一些方面要多得多。限于条件,我们无法见到所有研究文献,特别是日本方面的书刊,以下介绍力图简明扼要。

通史类著作有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东京富山房,1955;胡锡年汉译本题《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陈水逢《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台北嘉新水泥公司,1966)、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东海大学出版会,1977;张俊彦、卞立强汉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都对隋唐中日关系史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中,藤家礼之助书介绍了学术界在中日交流研究领域各个课题上的不同观点,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如《隋书·倭国传》中所记阿角多利思比孤指谁、隋炀帝时的非礼国书事件、遣隋使和遣唐使等等问题。池田温编《唐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参看黄约瑟书评,《中国史研究》1994—1)是一本关于隋唐与日本关系史的通俗读物,但学术性极强,内容涉及隋唐与日本交往、隋唐东亚国际关系、遣唐使和唐朝律令、礼制、都城

制、节日风俗、佛教、文物等方面对日本的影响。徐先尧《二王尺牍与日本书纪所载国书之研究——隋唐朝中日关系史一章》(华世出版社,1979),以文献学的方法,考证二王尺牍东传日本的时间及其与编纂《日本书纪》的关系,论证《"东天皇"国书》是《书纪》编者的伪托,反驳日本学者的对等外交论。高明士《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事件——兼释隋代的天下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论文集》,淡江大学历史系,1993),也是批判日本的"皇国史观"的。

在中日关系史上,对两国尤其是日本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是663年的白村江之战,对此《旧唐书·刘仁轨传》和日本史书中都有肯定的记载。余又荪《白江口之战》(《大陆杂志》15—10,1957)有概说。鬼头清明《白村江》(教育社,1981)对此战前因后果和经过做了详细的考察。此书的贡献,可参看黄约瑟《试论唐倭之役与八世纪的东亚——评〈白村江〉》(《食货月刊》复刊12—4,1982)。严佑之《唐代中日白村江之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1),认为白村江之战是唐日两国统治者为扩大各自的势力而在邻国领土上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百济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也使大化革新带来的社会进步出现停滞。此后,由于双方政府能够正视现实,特别是日本及时修正了错误的对外政策,才使两国关系迅速得以弥合修好。黄约瑟《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对武周时期中日关系做了研究,他否定了张守节《史记正义》中两处提到的武后改倭国为日本的说法,认为武则天以遣送学生、僧人及释放战俘的方法向倭国示好,对倭国采取一种"怀远人"的政策,目的在于争取外邦支持,借以直接或间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武则天一再单独委托新罗送倭人回国,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姿态,委托新罗代办对倭外交,等于默认了新罗在朝鲜半岛并吞百济旧地与吸收高句丽旧族二事不再成为唐罗间的政治问题。他认为武则天凭外交技巧处理对日关系,欠缺文化和其他吸引手段。

隋唐中日关系和中日互派往来的使者是密切相联的，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和学问僧来中国学习、访问，把中国文化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同样，唐朝也有使者和僧人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发达的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有关日本遣唐使研究，一直是中日关系史中的重要课题。中日两国学者对遣唐使的来唐次数、路线、在华生活、活动和学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55)有历次遣唐使的概述。茂在寅男等编《遣唐使研究与史料》(东海大学出版会，1987)，对遣唐使有关的一些问题加以考证，而书中刊登的田中健夫与石井正敏合编《古代日中关系编年史料稿——推古天皇八年(600)至天平十一年(739)》长文，以编年体罗列相关史料，并附考证，极便学人，唯不及天平十二年以后。可以作为补充的有田岛公编《日本·中国·朝鲜对外交流史年表——大宝元年至文治元年》(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贸易陶磁——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磁》，京都同朋舍，1993)，提供了697—1185年间日本与中国、朝鲜之间交往史年表兼资料综览。增村忍《遣唐使之研究》(同朋舍，1988)，对涉及遣唐使的中文史料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中国方面也出版了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除一般叙述外，对有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阿倍仲麻吕(晁衡)可以说是遣唐使中的代表人物，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育芳社，1940)、今枝二郎《唐代文化之考察1——阿倍仲麻吕研究》(高文堂，1979)，引证了大量中日文学文献，对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的活动及其与唐朝文人的交往情况，做了细致的考察。另外，杉本直治郎《真如亲王传研究》(吉川弘文馆，1965)、福井康顺编《慈觉大师研究》(天台学会，1964)，都是这方面重要的研究论著。至于留学生，黄约瑟《日本留唐学生橘逸势事迹考》(《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1993)，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个案。九世纪来华的日本僧人圆仁，留下了一本可以与《马可波罗游记》相提并论的著名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用汉文记录了圆仁在开成三年(838)至大中元年(847)间入唐求法的历程。此书不仅提供给我们难得的唐代地方社会生活史料和对会昌法难的目击记载，而且详细地告诉我们日本僧人在华学习、求法的具体情形，是一般史书所不具备的。赖肖尔(E. O. Reischauer)《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T'ang in Search of the Law，New York 1955)，将此书译成英文；他同时撰写了《圆仁的唐朝旅行》(Ennin's Travel in T'ang China，New York 1955)，对圆仁的入唐求法做了研究。最详尽的整理译注是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四册，铃木学术财团，1963—1969)，他以十三世纪的一个古钞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抄本和印本，做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对书中提到的圆仁携归的唐朝文献和文物，参照原物或其他资料，一一加以说明。白化文等据小野书作了修订校注，编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是国内最便利用的本子。另外，佐伯有清《圆仁》(吉川弘文馆，1989)，是较为完备的一本圆仁传记。比圆仁稍晚于大中七至十二年(853—858)在唐朝学习的智证大师圆珍，其旅行日记只存有摘钞，日本一些寺庙中还保存了一些他当时所用的文书和写本。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的研究》(二册，法藏馆，1982—1983)，收集了这些材料，做了细致的复原，整理校注成书，大致恢复了圆珍在唐朝活动的经过。希望此书和小野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一样，能有人将其译成中文。周一良《入唐日僧圆珍与唐朝史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3/14，1989；《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于圆珍材料的价值有所论说。佐伯有清《最后的遣唐使》(东京讲谈社，1978)，利用圆仁的记载，考察了日本停废遣唐使的原因。

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长沙岳麓书社，1985)，是对中

日两国相关文献做综合考察的结果。其中《〈六国史〉中有关中日关系的纪事》认为,《六国史》关于中日关系的记载较中国正史的记载要详尽得多,原因是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有所不同。日本方面的资料除了可补中国史籍的不足外,还流露出日本人对文化母国中国的憧憬和爱慕之情。他还对《唐大和上东征传》、《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内容、钞本、版本和译本做了介绍。戴禾与张英莉《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唐事异同考》(《文史》20,198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5,1984),考察两国记载之不同,特别指出较中国史料更为详细的日本史料的情况。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流向日本,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乃至意识形态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1—12,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分析了唐朝文化对日本文明开发的作用,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之所以能被日本人接受,关键在于儒家经典输入日本后正好投合其固有的"万世一系"的君主政体,故日本受儒教感化最深。佛教的传入也因为投合日本神道思想,在日本扎下了根。这些为日本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文明传入日本在唐代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机,日本在奈良朝和平安朝初期,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思想、音乐、艺术等各方面都以中国文化为骨干。文章具体介绍了典章制度、儒教、文学、史书、书法、美术工艺等方面唐朝的影响,考察了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来华次数、路线,还探讨了将中国文化东传的另外三种人,即发愿东渡弘教的佛教徒、唐朝使臣和商人。对于后两类人,学界探讨的不够充分。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历史研究》1993—4),由李延孝事迹,来说明九世纪中日两国中止遣唐使后,勇于冒险的商人使得两国的交往没有中断。此外,还有杨辄《中国唐朝遣日使小考》(《北方论丛》1988—4)、韩昇《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

面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3—6)、丸山裕美子《关于唐国敕使韩朝彩的札记》(《续日本纪研究》290,1994)等。

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江上波夫等编《八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册,东京平凡社,1980),从文字、文学、都城制度、律令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的影响。池田温撰《隋唐律令与日本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1989—3)、《唐令与日本令》(《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中国令与日本令》(《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又编有《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论文集(东京东方书店,1992),依据对唐令与日本令的精心对比,来考察唐代制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点。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1986),探讨了两国学制上的关联。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1990),研究了中国传入日本的写信范本——书仪。认为奈良和平安前期日本流行中国的书仪,平安中期由于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情趣的文化,纯汉文的书仪才失其效用。但唐朝书仪中的个别用语和习惯却在日本尺牍文体中生根落户,如书札末尾的"谨空"二字和在来信上批注答复的习惯。平安中期后日本特有的书札范文也是在中国书仪影响下形成的。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把唐长安城和日本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古代京城的布局、建制做了比较,认为日本京城建设模仿了长安城。另外,他列举了西安何家村长安兴化坊内发现的日本"和同开"、日本发现的武德四年造"开元通宝"铜钱、高松冢古坟出土的海马葡萄镜和壁画、唐章怀太子墓礼宾图、京都东寺藏空海写给最澄的三封信、大宰府都城遗址、日本出土的瓷器和砚台等文物和遗址,来说明唐朝与日本间物质文明的交流和影响。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补充了新近的考古发掘材料,如日本僧

人曾驻锡的长安青龙寺、西明寺以及洛阳宝应寺、扶风法门寺的出土资料，结合正仓院所藏资料有所论说。关于高松冢古坟壁画之受唐朝画风、主题、技法等方面的影响问题，齐东方与张静合撰《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1，1995)，对此做了深入探讨。东野治之《遣唐使与正仓院》(东京岩波书店，1992)，利用现在仍然保存在奈良正仓院的唐朝文物，来研究遣唐使及其带回的各类文物和典籍材料，以及相关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与影响问题。大庭修《日本木简与中国典籍》(《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93)，据东野治之《正仓院文书和木简之研究》(东京书房，1979)和他本人的研究介绍了，除正仓院的传存品外，日本历年来在平城京等地发掘的木简中，也有一些汉籍抄本，以真实的文物反映了唐朝典籍的东传。

在文学方面，曹汾《唐朝时期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人文杂志》1980—3)，考察了奈良、平安朝贵族文坛上掀起的学习汉诗文的热潮。指出日本的汉文学随着当时唐朝文学的发展而变化，并且及时移植了唐朝文坛上的新体材。中国文学对日本诗歌、小说都有深刻影响，他还列举了中国艺术各方面向日本的传播。在史学方面，周一良《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重点介绍了八世纪出现的《日本书纪》及德川光圀及其所写的《大日本史》与围绕此书形成的“水户学”，指出《日本书纪》是一部有纪传体特点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有些现象说明当时对中国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吸收。作为汉字文化圈成员之一的日本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从最古的史书起，就大量运用了中国史书，不仅在体裁和名称上摹仿，而且在文字和内容上也都加以仿效。此外，在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一些论著涉及。

隋唐是佛教东传日本的最重要时期。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收入《中日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分析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向着建立以

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迈进，统治者利用佛教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日本朝廷把从中国输入的佛教置于重要的地位，僧人学成回国后在政治和社会公益上作用甚大。奈良和平安前期的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移植，与民众脱离。平安后期和镰仓时期，才进入日本佛教阶段。他还说明了佛教作为其他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此外，他还有《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9—1)、苏渊雷有《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学术月刊》1988—5)，王仁波有《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与日本留学僧》(《文博》1989—6)。鉴真东渡是学者们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1960)、藏中进《唐大和上东征传的研究》(樱枫社，1976)，对鉴真的传记和文献做了详细的研究。周一良《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9)，分析了鉴真东渡的背景，指出大化革新使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奈良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统治者的主观意图，都促成了当时中日文化交往的繁荣，航海技术的进步为鉴真东渡创造了条件。鉴真为日本创建了律宗，并在当地传授戒律和天台宗经典，他还带去了西域和南海的佛教艺术风格。另外，孙蔚民有《鉴真和尚东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最后还应当提到的是，周一良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1990)和胡如雷《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河北师范学院院报》1987—4；《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1987)，对唐代中日关系史作了有理论高度的分析。

三、与中亚的关系

(一)通论

隋唐时期中西交往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处于交通干线上的中亚地区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包括今天中国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广大领域，更是由于东西各种文化的汇聚以及和本地文明的融合，在文化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时，这里也是周边几个强大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控制的战略要地，不仅大唐帝国苦心经营，突厥、吐蕃、大食都曾先后在这一地区积极进取。因此，中亚地区堪称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汇的中心之一，西方文化经此地东传，有时便带上了中亚的风格；中国文化也以此为开放的门户，间接地西渐。

中亚各王国本身没有传存下来什么重要的相当于隋唐时期的典籍，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地区发现了大批古代文物和多种语言的写本，从而掀起了一个中亚史研究的高潮，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参加研讨，迄今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中亚地区气候干燥，文物古迹保存较好，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文物文书仍然层出不穷，研究也处在日益更新的进步中。

比较系统地讨论唐朝与中亚关系的著作有以下几种。沙畹(Ed.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收集了正史，《册府元龟》和僧人传记中以西突厥为中心的中亚史料，探讨了六至八世纪隋唐与西突厥及中亚的关系史。此书对东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迄今仍未失其学术价值。有冯承钧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但略有删节改订，应对照原文使用。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对沙畹书有所补充和订正。吉布(H. A. R. Gibb)《阿拉伯征服中亚史》(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23)，依据阿拉伯史料来探讨这一进程。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和伊濑仙太郎《中国西

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68),主要是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研究唐朝与突厥、吐蕃、大食争夺控制中亚的过程。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东京,1970)、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中亚学刊》2,1987),都对有关西域的汉文史料有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整理。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则对有关西突厥的唐朝、罗马、吐蕃史料作了新的分析。八十年代以来,森安孝夫发表长文《吐蕃的中亚进出》(《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4,1984)、白桂思(Ch. Beckwith)《吐蕃帝国在中亚》(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都比较系统地引入了有关中亚的藏文史料,而且特别强调了吐蕃在中亚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的重要地位。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参看荣新江书评,《北京大学学报》1994—1),利用了汉、藏、阿文文献材料和突厥碑铭、敦煌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等原始材料,对唐朝与中亚关系史中有争论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使读者对七、八世纪的葱岭东西、天山南北的政治形势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和王统世系及将相年表,便于查找相关史事和人物。以上有关中亚史的通论著作,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以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所以都可视为中国与中亚关系史来读,它们基本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的主要画面。

(二)粟特地区

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民族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与中亚等地区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的沟通者。因而,中文史料中有不少粟特地区的记载。白鸟库吉《粟特国考》(《西域史研究》下,岩波书店。1944)、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26,1986)、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1)、

《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2,1987)、《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3,1990),于隋唐时期的粟特史料有所考释。

粟特人东来是中国与粟特交往史的重要篇章,我们放在下面专门叙述,这里只就某些方面略做介绍,有些内容是与粟特人的东来相关联的,请读者参看。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31,1988),考察了九姓粟特胡入贡的路线,统计出从 624 年至 772 年共入贡 94 次,以玄宗朝最多,原因是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入侵。这些贡品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织物、器物、食物六种,其中有粟特土产,但转贩品更多,可以看出粟特人在中西贸易上起的作用。上述薛爱华《撒马尔干的金桃》一书,也涉及许多粟特的舶来品。

粟特地区与唐朝在文化上的交往也相当丰富多彩。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探讨了敦煌唐代壁画与八世纪粟特壁画的联系。最近,他又在《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话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1,1996)中,研究了隋代壁画受粟特影响的问题。至于来自粟特的联珠纹织锦,见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在过去考古学界笼统归于萨珊波斯的金银器中,实际有一批粟特出产的银器或其仿制品。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2),考证出内蒙古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一组银器,当来自粟特地区,年代为七世纪后半叶至八世纪中叶。他由此进而探讨了经北方草原到粟特地区的丝路走向,以及粟特人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另外,齐东方与张静合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2),系统地分析了粟特银器的类型,区分出现存的输入品和仿制品,把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与萨珊

系统、罗马—拜占廷系统相区别，鼎足而三。

粟特舞蹈对唐朝的影响早就是熟知的事实，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更为形象的材料。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3)、罗丰《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以新获宁夏盐池石门胡舞为中心》(《唐文化研究论文集》,1994)，介绍了宁夏粟特人墓室所发现的舞乐资料。

相对来讲，有关中国文化西传粟特地区的专门研究比较缺乏，然而从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的材料来看，唐代中国的艺术和技法显然对粟特地区有所影响。

（三）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

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北朝到隋唐，大批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中国，有的定居下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亚、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带给唐朝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更由于这些中亚侨民的遗物和文献也大量地在中国境内出土，使这一领域成为中外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

早年，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27—17. 1930，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1926;《桑原骘藏全集》2. 1968)，收集了传统史料中的九姓胡材料。在唐朝境内，粟特人的分布很广，两京及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城镇，都有他们的足迹。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的康居聚落》(Le Cha-tcheou ou tou fout' 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VII, 1916；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从七编》，中华书局，1957)，根据敦煌发现的唐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出蒲昌海(罗布泊)南有一粟特人聚落。他指出，七世纪上半叶，粟特首领康艳典率人到蒲昌海南築四城，定居下来。他还认为这里的粟特人对佛教的流传和景教的东渐都

起过作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2,193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对流寓长安的粟特人以及他们对唐朝文艺、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做了详细的研究。作者利用了出土墓志和唐人诗文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文也因此成为研究唐朝中西交通史的名篇。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内蒙古的粟特聚落》(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41,1952),考察了唐代六胡州的粟特聚落。他又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1955)一书中,研究了安禄山家族的来源,支持安禄山为粟特与突厥混血说,并分析了从粟特经突厥迁到营州的历程。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1,1965;辛德勇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9. 中华书局,1993),主要利用敦煌文书来研究敦煌的安城粟特人聚落,力图阐明这个粟特移民聚落的地位和内部结构。安城位于敦煌城东五百米处,是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所在地。该乡有三个里,750年时有户三百,口一千四百人,其中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姓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聚落大致是七世纪初形成的。在安城,有当地粟特人和汉人祭祀的祆祠,佛教也在粟特人中流行。八世纪初期,聚落成员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唐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不如对汉人严格。居民也有贫有富,由于和汉人通婚并定居农耕,几代以后,逐渐汉化。八世纪中叶,由于中亚地区唐朝与大食斗争激化,加之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聚落突然离散,一些人成为佛寺的农奴。到了八世纪末,除了留下祆祠外,聚落完全消失。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季刊东西交涉》5—1.2.3,1986;《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细心地区分出唐代西州登籍的粟特人和未登籍的粟特商胡,确定了西州崇化乡和沙州的从化乡一样,实为在籍粟特人组成的聚落。他进而比较了敦煌吐鲁番两地两种粟特人的状况。此外,他

还探讨了唐朝铜钱输入粟特地区的情况和粟特"番锦"、"胡锦"输入敦煌吐鲁番的过程。吉田丰、森安孝夫等解读刊布的《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隶买卖文书》(《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6,1988),也充分展现了粟特人在吐鲁番的具体情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2;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指出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在唐朝达到极盛,长安、洛阳、蒲昌海、播仙镇、西州、伊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蓝田、范阳、营州等地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但对唐朝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粟特聚落,首推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他利用新出土的《陆胡州大首领安菩墓志》等材料,分析了六胡州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唐与突厥斗争中的角色。周伟州《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3)、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5),于六胡州的粟特人活动有更进一步的研究。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论说了河西走廊粟特人的状况,特别留意于这些聚落与祆教流行的关联。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三秦出版社,1990),利用墓志材料考察两京的粟特人。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九姓诸国》(《河洛春秋》1993—9),也是依墓志材料补充洛阳粟特人的情况。他还有《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9)一文。李志敏则有《"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93—3)。在粟特人东来的西域地区,由于缺少汉文史料,以往人们对这里的九姓人活动情况不甚了然。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初稿载《西域研究》1993—2),利用当地出土的伊朗语文书材料,补充了于阗、楼兰、疏勒、据史德、温宿、拨换、龟兹、焉耆等地粟特人的情况。近年,固原南郊发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史氏墓地,出土史氏志七方,安姓一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六胡州粟特人及其来历的认识。但由于

这些考古材料是陆续发表的，有关其中史道德的族属问题，曾在学术界展开争论，见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11)、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6—12)、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文物1988—8)、马弛《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其后人》(《文物》1991—5)、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3)、又《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最近，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墓志考释》(《大陆杂志》90—5.6.1995)。发表了这一组史氏及安氏粟特人墓志，其他异说已没有再讨论的必要。有关五代时粟特人的情况，则有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3)、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1993)两文的研究。建立后唐、后晋的沙陀族中，混杂着许多粟特后裔，史称沙陀三部落之一的"萨葛"，即"粟特"的音转，又写作索葛、薛葛等。后晋皇帝石敬瑭可能就源出昭武九姓的石国，石敬瑭的曾祖、祖、父都取粟特女子为妻。

上述论文在考证入唐粟特人的聚落的同时，有些也探讨了他们的发展变化。粟特人在唐朝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做了专题研究。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中华文史论丛》1985—1)，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大学学报》1989--3)，综述了粟特人在丝路上的殖民和活动。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1992)，系统地条理出了入华粟特人家庭、婚姻、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十方面的胡俗。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1)，根据墓志、经幢、碑铭等石刻材料，讨论隋唐五代时期入居中国的粟特人迁徙和散居、婚姻、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及汉

化等问题。他又有《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1)和《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2)两文,论说了入华粟特人在商业和外交上的重要性。关于这两点,还可参看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辅仁学志》15—1.2,1947)、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2)等文。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如此活跃,使他们成为隋唐王朝与周边许多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外交使者,他们在进入隋唐本土的同时,也早就进入了北方的突厥和后来回鹘汗国的领地。外蒙发现了属于突厥汗国早期的布古特碑和属于回鹘汗国最盛期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前者用粟特文撰写,见克里雅施托尔内(S. G. Kljastornyj)与李夫什茨(V. A. Livsic)《布古特发现的粟特文碑铭新探》(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XXVI-1. 1972;龚方震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3. 1986)、护雅夫《有关粟特人在突厥帝国内部作用的一条资料——布古特碑文》(《史学杂志》81—2. 1972;收入《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Ⅱ,1992)、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2)等;后者是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镌刻,见韩森(O. Hansen)《喀噌巴尔嘎顺三体碑中的粟特铭文》(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abalgasun.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XLIV-3, 1930)、吉田丰《关于喀喇巴尔嘎顺碑文中的粟特文部分》(《西南亚细亚研究》28,1988)、《喀喇巴尔嘎顺碑中粟特铭文的一些新释读》(《中亚出土文书与档案论文集》,京都,1990),都说明了粟特人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中所承担的书记官作用。实际上,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支那学》3—5,1923;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1957),已经注意到突厥中的

康国人。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1975),据文献材料全面探讨了粟特人在突厥汗国中的情况。

粟特人的东来,不仅带来他们本身的粟特区的文化,而且,他们还是西亚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这在下面的有关部分加以论述。

四、与西亚的关系

(一)波斯

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和隋唐两朝,是丝绸之路东西两大文明的代表。以萨珊为中心的伊朗(又称伊兰)文化与以隋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交流,是中古世界历史的重要篇章。应当说明的是,在国际东方学界,有与印度学、汉学等并称的伊朗学,其所包含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古代的波斯和今天的伊朗,伊朗学所讲的伊朗文化范畴极为广泛,凡讲各种伊朗语的民族历史文化,都是伊朗学的研究对象,如上述粟特人、粟特语,都被看作是伊朗文化的一个方面。所以,国外学术著作中的伊朗概念,往往包含了中亚相当大的领域。以下介绍的一些西方和日本研究伊朗文化的著作,与现代汉语中的观念不同,为了方便读者,这里还是把它们放在中国与波斯关系史下,但其内容往往更加广泛。

古代波斯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载,早年,费琅(G. 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a l' Extre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Ie siecles. Paris 1913-14;耿升、穆根来汉译本,中华书局,1989),收罗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加以考释。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和波斯交往史的著作,是罗佛(B. Laufer,一译作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

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o 1919;林筠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其主要内容是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与伊朗之间栽培植物和产品的交流,尤重于中国对伊朗的输出。薛爱华《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也是以物质文明的交流为主。法籍伊朗人阿里·玛札海里(Aly Mazaheri)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La route de la Soie, Pais 1983;耿升汉译本,中华书局,1993),译注了有关波斯的波斯、中国、希腊罗马史料,并讨论了经丝路西传的中国谷子、高粱、樟脑、肉桂、麝香等植物材料,但其考证不够严密。

阎宗临《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2)、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7》)、威廉·沃森(W. Wason)《伊朗与中国》(Iran and China,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2), Cambridge 1983;马小鹤汉译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3,1986)、叶奕良《古代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略论》(《中外关系史论丛》4,1994;《中外文化交流史》,1993),对包括唐代的中波关系都做了全面的论说。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全面介绍了此前发现的波斯文物材料,并探讨了相关的问题。武伯伦《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收入《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介绍和研究了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反映唐代与波斯交往史的文物材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义宁坊的景教寺、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唐《李元谅碑》、昭陵六骏、乾陵石人和石狮、玻璃碗、银杯、镶金牛首玛瑙酒杯、壁画上的打马球图、驯豹图、猎犬图及陶俑中的骆驼俑和牵驼俑、波斯银币等,比较全面地利用了考古文物材料,来说明唐朝与波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其中,1955 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

（又译作巴利维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和波斯交往而遗留至今的重要双语文字材料。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9），确定此墓志在波斯文的东传和祆教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还对苏氏的左神策军散兵马使一职和其生卒年月做了诠释。但他认为这是婆罗钵文传布的最东界限一点，似乎已被后来日本发表的材料所否定。对于志文本身，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2），对两种文字都做了考释。他把此志与伊朗巴斯的一些墓志加以比较，发现二者风格一致，从而认为马氏和苏谅家的一员是萨珊波斯的遗民，并且是祆教的信徒。他推测这一家族的一员因穆斯林对波斯的进攻，由呼罗珊经毛韦拉·那尔（乌浒河外），特别是粟特地区来到东方，曾在唐初的安西都护府服过兵役。马氏卒于咸通十五年（874），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南续有宗德曼（W. Sundermann）与梯楼（T. Thilo）合撰《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墓志铭》（Zurmittelpersisch-chines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ur Orient-forschung. XI-3，1966）、哈玛塔（J. Harmata）《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合璧墓志铭与唐朝与萨珊的关系》（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La persia Nel medioevo，Roma 197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 1990—3）以及洪巴赫（H. Humbach）在王世平的帮助下所撰《西安发现的巴列维文汉文双语墓铭》（Die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Xi’an，Acta Iranica，28，1988）等文章，发表对该志的补充或修定意见，但有些词句的理解尚未获共识。

另一方比较重要的入唐波斯人墓志，是端方陶斋所藏的《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铭》，端方将之收录于《陶斋藏石记》并撰有跋文。羽田亨《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东洋学报》3—3，1913；收入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1958),对铭文所记阿罗憾的生平做了考释,但发明不多。罗香林《景教徒阿罗憾为武则天皇后营造颂德天枢考》(《清华学报》新 1-3,1958;收入《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判断阿罗憾是景教教徒,并就他在武后时参与主持造天枢一事做了详细的论述。最近,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学术集林》4,1995),也对阿罗憾的事迹做了论说。

除了两京之外,岭南的波斯人颇受瞩目。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1991),依据考古材料,讨论了南朝经南海丝路与东伊兰间的通商关系。王承文《唐代岭南的波斯人与波斯文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1.1992),则探讨了波斯佛教和景教徒在岭南的活动,以及波斯香药植物等在岭南种植的情形。其最后一点,还可以参看罗香林《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1964)。

研究唐朝某地与波斯关系史的,还有蒋华《杨州与波斯》(《江苏商专学报》1990—1)、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3)等。

对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是唐代中波关系史的又一个重点课题。夏鼐在一系列考释新发现的这种钱币的文章基础上,撰《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1),对截止到他撰文时所见到的材料做了系统的研究,对银币进行统计、分类,并分别考证出它们的铸造年代、地点、埋藏年代、用途及东传的历史背景。桑山正进《东方之萨珊式银币的再检讨》(《东方学报 54,1982),对这些萨珊钱的形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新材料也还不断出土,如罗丰《宁夏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述》(《故宫学术季刊》12—4,1995),介绍了固原南郊粟特人墓中出土的两枚萨珊银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至于其他考古资料,

以有关波斯萨珊金银器的讨论较多。如齐利万尼(A. S. M. -Chlirvani)撰《伊朗银器及其对唐代中国的影响》(Ianian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in T'ang China. Pottery and Metalwork in T'ang China. their chronolog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1,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6)、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齐东方与张静合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2)。另外,齐东方与张静还合撰有《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亚细亚研究》16. 1995)。

(二)大食

大食即七世纪在西亚地区兴起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和大唐帝国相提并论的强盛国家。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材料,其有关东方的许多资料见载于上引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中。在这些阿文著作中,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最为著称,其所保存的材料年代较早。宋岘将此书译出(中华书局,1991),并据之写有《唐代大食通中国之海道》(《中外关系史译丛》3,1986)。华涛《伊本忽尔答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地位》(In Khurdadhbah's Description about the Maritime Route to China and Its Poition in the Aab-Islamic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China 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该书关于大食中国间的海上丝路。

中文史料中留下的关于大食本身的记载不太多。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 1937)、桑田六郎《〈旧唐书·大食传〉考》(《岩井博士古稀记念典籍论集》,东京 1963),考释了正

史的记录。唐朝人杜环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却因此得以亲访阿拉伯世界，写下一部行记——《经行记》。此书早佚，片段保存在杜佑《通典》中，桑田六郎《校勘杜环〈经行记〉》（《和田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0），有初步的辑校。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做了比较详细的辑佚校注。此外，丁克家有《〈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

唐与大食最著名的直接接触是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的怛罗斯之战。自此以后，加之唐朝内部出现了安史之乱，唐朝势力渐次退出西域，大食东进，伊斯兰教也逐渐在中亚占统治地位。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怛罗斯之战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较早的一篇是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收入《中国伊寺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文章详细分析了高仙芝在石国的所作所为及其战败的过程，认为唐朝对西域霸权的没落在怛罗斯之战以前就有迹象显现，战后唐朝势力并未马上绝迹于西方，战争的结果改变了西域政治关系，使唐朝与大食在中亚霸权消长表面化。他认为这次战役对唐和大食国本身的关系影响并不显著。而且，这次战争带来了两个偶然的后果，即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和伊斯兰教教义开始有了中文记录。有关怛罗斯战役的具体考证，以前嶋信次《怛罗斯战考》（《史学》31—1.2.3.4.32—1.1958—1959；收入《东西文化交流的诸相》，同书刊行会，1971）为详。卢苇《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西域史论丛》2．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试图从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导出唐朝和大食在中亚地区关系转变的规律。他认为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的斗争经历了七世纪下半叶、八世纪上半叶和八世纪下半叶三个阶段，其发展脉络是矛盾冲突开始、激烈复杂到矛盾转移到大食与吐蕃的对抗，故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

八至十五世纪是中阿两地通过陆路、海路频繁往来，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明不断交流，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重大发明藉以西传的伟大时代。张广达《海船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首先考释了阿拉伯之被称作"大食"，是由于唐朝采用了中介语言即波斯语来指称阿拉伯的缘故。由于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悉底波并波悉林于713年前后在印度西部边境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所以在八世纪上半叶，唐朝、吐蕃、突骑施、大食在中亚地区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纠葛与冲突；商业的发达导致阿拉伯人在海外的势力增长。八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了海上优势；唐朝长安与阿拔斯朝的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文明中心。他还考述了一些唐代阿拉伯来华人物和中国去阿拉伯世界的人员的事迹。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西安市西窑头村晚唐墓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币，这是今天人们知道的中阿陆地往来的最早实物证据。夏鼐《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认为这三枚金币铭文属东方系统，大概铸造于大马士革，时间分别是702、719、746-747年。

阿拉伯势力的东进推动了伊斯兰教东渐，上引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已经讨论到伊斯兰教的传入问题。秦惠彬《大食同中国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世界宗教研究》1987—1)，通过对大食帝国同中国唐朝的几次重要的军事冲突以及其在唐朝的军事存在等史实的研究，揭示了伊斯兰教向我国西北渗透的一般特点，认为应该把在中国境内有中国人信仰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并据此提出唐肃宗至德二年传入说(757)，可作一家之言。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田坂兴道《回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弘通》(东洋文库，1964)做了详细的考查。张日铭《唐代中国之伊斯兰教徒》(Les musulmans sous la Chine des tang 618-905, Taipei; Cheng-wen

1980)，对此也有研究。他还用中文发表过《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食货月刊》复刊5-9.1975)。唐中叶以后，大批阿拉伯人从陆路和海路来中国，特别是随着阿拉伯势力在印度洋上占据优势，中国和阿拉伯间的海上航线通畅，更有大量阿拉伯人来到东南沿海，他们组成蕃坊，有一定的自主权，居民以商人为主，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见宋岘《唐代扬州的大食商人》(《中华文史论丛》1987-1)、穆宝修《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云南社会科学》1985-5)、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4)、赖存理《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史学月刊》1988-2)等等。

(三)西亚宗教的传播

隋唐时期，虽然儒释道三家仍然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国家开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都在此时传入中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1. 祆教

祆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是唐朝对流行于中亚和中原地区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呼。固然清末文廷式等人已经在读书笔记中谈到祆教在华的传播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篇系统的研究论文是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1，1923；1934年校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他根据正史有关西域诸国俗事天神的记录，认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北魏灵太后所祀之胡天神就是祆神。自波斯被大食所灭，祆教徒被迫东奔，唐朝以礼待之，因而两京和碛西各州设祆祠，最早的祆祠是西京布政坊西南的祆祠。他还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的异同，如对寺庙的称呼，景教、摩尼教称寺，祆教则称祠。祆教徒来中国并不传教，亦不译经，教徒只有胡人而没

有汉人。他考证了祆教在唐朝的流行和会昌时的灭绝情况，其结论影响极广。此后，神田喜一郎《祆教杂考》(《史学杂志》39－4，1928；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I，京都同朋舍，1986)、《祆教琐记》(《史林》18-1.1933；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I)和石田干之助《祆教丛考》(《史学杂志》39-6.1928；收入《东亚文化史丛考》，东京东洋文库，1973)，补充了一些唐宋笔记、行记、词曲中的材料，可以考见祆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又载《文辙》下，台湾学生书局，1991；《饶宗颐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指出唐宋诗词中的"穆护"即火祆教僧人，波斯文作 Mogu 或 Magi；《牧护歌》为祆教赛神曲。由此出发，对北朝至唐宋时期祆教在华的流行状况，做了进一步的论说。他涉及到了敦煌吐鲁番新出史料，较陈垣文更为广泛。附录有火祆祠见于史籍之地理分布记略，颇为明晰。

近年来，祆教问题重新引起热烈的讨论，主要原因还在于吐鲁番新史料的发现。1977 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合撰《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3)，提示了吐鲁番高昌国时代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以及安伽勒克古城发现的佛经题记中的"城南太后祠下胡天"，指的都是祆教祠。此后，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东方学报》京都 54.1982；收入《山居全稿》，中华书局，1989)，也重述了这一看法。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对这些吐鲁番新出土的材料做了通盘的解说。他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代(460—640)的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都解释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对此，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

究》1987-4；收入《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又 Lin Wushu A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ven-God in the Qoco Kingdom and the High Deity of Zoroastrianism，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23. 1992），把高昌帐历中所祀之天，解释为高昌地区对天体自然崇拜的传统信仰，他认为目前考古材料中没有发现火祆教经典、寺庙遗迹、文书记录等，因此正史所记高昌国所俗事的"天神"，也并非祆教。林悟殊所要强调的是，高昌国不是没有人信奉火祆教，而是没有普遍信奉这种宗教。针对此文，王素又发表《也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8—3），重申自己的天神指祆教的观点。对于高昌的"天神"，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 1988；收入《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又把高昌的"俗事天神"，指为当地普遍存在的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林悟殊、陈国灿两氏对传统所认为的"天神"即祆神或祆祠的看法提出质疑，如果他们的观点成立，则动摇了自陈垣以来所有关于祆教入华的论说。然而，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没有对涉及"天神"的史料做全盘的解说。因此，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史籍和吐鲁番文书中的"天神"、"天"、"胡天"等，解释为祆神或祆祠。特别是把高昌的祆教官职萨薄与天神结合起来考虑时，就更容易理解了。对此做出最为透彻解说的是最近发表的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又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他几乎涉猎了所有重要的与祆教有关的史料，论证高昌之萨薄即伊兰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高昌之天神，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吐鲁番供祀文书中的"阿摩"，即粟特文 Adbag"大神"的对音，系指祆教大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3，1995），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文书，论证祆教早在公元四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至于北朝隋唐文献和文书中的

"天神",则指祆神无疑。

祆教在唐朝流行的范围不如其他几种宗教,但影响却十分广泛。林悟殊《唐人火祆教考辨》(《文史》30,1988;《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对陈垣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火祆教译经虽未发现,但其徒众在中国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传教,唐代祆教拥有中国人信徒。他还写有《唐代长安火祆教大秦寺考辨》(《西北史地》1987-1;《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1995),考证长安的祆祠除一般所讲的布政坊、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靖恭坊四所外,还应补上醴泉坊(街南之东)为波斯王卑路斯所立之寺和崇化坊祆寺,而见于史籍的大秦寺只有义宁坊一所,他不同意陈垣把为卑路斯所置之寺看作大秦寺的观点。对于唐代长安等地波斯系统的祆祠、大秦寺、摩尼寺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更详细的探讨,是莱斯利(D. D. Leslie)《唐代的波斯胡寺》(persian temples in T'a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35, 1981-83)。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3),对洛阳等地祆教的流行有所阐述。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对祆教在河西的流行有系统的研究。西域的情形,可以参看周菁葆《西域祆教文明》(《西北民族研究》1991—1),但所述尚不全面。龚方震《西域宗教杂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2),所论范围较宽。比较而言,敦煌的材料最为丰富。魏礼(A. Waley)《有关敦煌地区伊朗神庙的几条记载》(Some References to Iranian Temples in the Tun-huang Region,《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 1956),揭示了敦煌文书所记当地祆祠和赛神的情况。刘铭恕《敦煌遗书杂记四篇》之一《敦煌遗书中所见之祆教》(《敦煌学论集》,兰州,1985),对此也有论列。而通盘的论说当推上引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他发现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活动当中,使人们认识到祆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他还比定刊布了一幅

原被当作佛画的祆教图像，撰写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Trois exemples d' influences mazdeennes dans la Chine des tang. Etudes chinoises. XIII-1/2，1994；汉文本将刊于《法国汉学研究》1，1996)，利用原苏联中亚地区出土的绘画材料，确定此图上的一神为祆教神谱中的女神娜娜(Nana)。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中的又一例证，是据粟特本土出土的骨瓮，来说明唐代太原所遗留的祆教徒葬俗。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1；《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则是用敦煌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图》上所绘的尸葬方式，来论证同一问题。上举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1992)，也谈到粟特人的祆教葬俗。

祆教的"祆"，古籍中常常与"袄"相混，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也难以避免。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2)，认为记载此次起义的《崔玄籍墓志》中的"祆"为"袄"字。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1)，据图版订正此字原为"祆"字无疑，而林文引此志时所删的"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两句，恰好证明陈硕真起义的道教色彩。他还对祆教在唐代流行状况做了估价。

2. **摩尼教**

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的另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传入中国较晚，武周延载元年(694)才正式入华，但此后传播较祆教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宋代以后与中国秘密会社结合，对下层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摩尼教在波斯本土受到迫害，早已灭绝。但由于该教从一开始就注意向外传教，所以在中国和非洲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近代以来不断出土，迄今不绝。1904 年，当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的

收集品运抵柏林后不久，缪勒(F. W. K. Müller)就发表《新疆吐鲁番出土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 APAW 1904; II, APAW 1904, Abh. 2)一文，对其中的一些摩尼教中古伊朗语文献做了初步解读。此文开辟了本世纪摩尼教研究的新纪元。此后，随着吐鲁番敦煌各种语言文字的摩尼教文献的不断出土，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研究摩尼教热潮。

蒋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1909)，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虽然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但他把史籍和敦煌文书的记载做了初步整理，功不可没。沙畹(Ed. Chavannes)与伯希和(Pelliot)合撰之《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Xeser., 18, 1911; XIeser., 1, 1913; 冯承钧译后一部分为《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单行本；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收集了大量汉文典籍中的材料，加上新发现的敦煌文书，是研究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奠基性著作。他们系统地考述了摩尼教在唐宋时代的中国的流行与遭际，其传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时间以及安史之乱后借助回鹘而在唐朝盛行的情形。大历三年(786)摩尼教在回鹘取得国教地位，唐人因依赖回鹘而重视摩尼教。会昌初年，由于回鹘败亡，唐朝对摩尼教徒也进行迫害，摩尼教转入民间，与秘密会社关系密切。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1. 1921；收入《观堂别集》1)，在沙畹和伯希和文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晚唐和宋元文献材料，把摩尼教首次入华的年代，定在《佛祖统纪》所记的武后延载元年。又提出会昌诏毁摩尼教后，福建等地仍有摩尼教徒，而且其来源是海上商胡的传播。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2. 1923；修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 1980)，也是系统收集汉文摩尼教史料的集大成之作。发表时沙畹和伯希和文尚未译成中文，因而在国内影响更

大。陈文的主要看法大多与沙畹与伯希和相类似，但在有关宋代福建摩尼教部分，利用了新发现的《闽书》的记载；修订本中又增入胡适提供的《崇寿宫记》一条，见《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重松俊章《唐宋时代的摩尼教与魔教问题》(《史渊》12，1936)，对延载元年摩尼教入华说提出质疑，认为民间的流传可能要早到六朝末期。又指出由于唐代以来泉州等南方港口外国人留居地治外法权较为宽大，故此摩尼教徒选择了这里作为传教之地。

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摩尼教研究，重点在于宋元明时期，特别是吃菜事魔和明教与摩尼教的关联问题。而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材料，为这些讨论注入了活力。八十年代以来，唐五代摩尼教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对唐代摩尼教有了新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对高昌回鹘摩尼教的研究有所突破。

关于前一方面，先后出版了刘南强(S. N. C. Lieu)《晚期罗马帝国和中古中国的摩尼教史概说》(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翁拙瑞(P. Byder)《摩尼教在中国的转变——汉文摩尼教术语研究》(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Sweden 1985)，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刘著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历史的概述发明不多，但他和翁拙瑞一样，都利用了西方学者解吐鲁番伊朗语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汉译摩尼教文献的术语提出新的解释。两人都认为，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佛教强烈影响的摩尼教词汇，实际上非常忠实地表达了伊朗摩尼教思想，因而对传统所说的摩尼教华化问题表示异议。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是一部迄今为止研究摩尼教入华历史的最为详备的专著，作者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大量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撰成此书，对摩尼教理论、传播、仪式、在华遗址、流传情况以及在回鹘人中的作用、变化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

讨，并介绍了本世纪以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附录了敦煌发现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的录文，即《摩尼教残经一》、《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以及摩尼教研究文献目录。书中所收相关的论文，《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和《早期摩尼教在中亚地区的成功传播》，认为摩尼教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自始至终贯穿着恶二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摩尼教中远比琐罗亚斯德教中彻底。由于摩尼的教义否定现存制度，对未来的光明抱有必胜的信念，因而适合了苦难农民的精神需要，得到许多人的信仰。摩尼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不仅由于其教徒自觉实践教主的世界宗教思想，而且也因为当时中亚城邦林立，摩尼教又有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切合了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认为，早在四世纪初，摩尼教已经进入中国，延载元年拂多诞来华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的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至于唐代流行的摩尼教的来源，应该是直接渊源于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中亚摩尼教团，并使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进一步加强。关于敦煌本《老子化胡经》，陈垣认为老子化摩尼的经文是天宝以后才有的，他把这段经文作为唐朝道家依托摩尼教的根据，以为“晋时佛法盛，故《化胡经》托于佛；唐时摩尼教盛，故《化胡经》复托于摩尼”。福井康顺《道教的基础研究》（东京，1958）认为，《老子化胡经》卷一的造作年代在开元年间，并认为是当时的摩尼教徒假托古来的《老子化胡经》伪造的。林悟殊《〈老子化胡经〉与摩尼教》认为并非如此，而是道家窃取摩尼教的思想材料，增加自己经典的力量。后来到了宋代，道教立于正统，摩尼教徒反过来又利用了《化胡经》。他指出，古代各种宗教思想互相渗透、吸收、混杂和相互利用是一普遍规律。关于回鹘奉摩尼教的时间，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一般认为在唐宝应元年（762）之后。至于回鹘为何选择摩尼教为国教，《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提出，原因在于回鹘依靠粟特人发展与东西方的贸易，以充实国库，因而在国家事务和宗教

信仰上也就不得不受粟特人的左右，粟特人在回鹘地位稳固时，摩尼教被立为国教，而粟特人受到排挤时，摩尼教的地位也相应降低。他还写了《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认为摩尼教徒在封建化过程中，行动上背离了摩尼古训，修改了经典，渐渐地世俗化了。《唐宋〈三际经〉质疑》一文，否定沙畹与伯希和关于中国摩尼教徒有《二宗经》和《三际经》两部汉文经典的论断，认为当时摩尼教流行的是《二宗三际经》，简称《二宗经》，并不存在《三际经》。敦煌写本P.3847中提到的《三际经》是景教经典。《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推断译出的时间不晚于会昌，应当在大历三年(768)和会昌二年(842)之间。关于最后一点，最近虞万里撰《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1，1996)．据避代宗讳字，考证此本写于代宗宝应二年以后。

林著在摩尼教华化的问题上显然与上述刘南强和翁拙瑞的看法相左，他最近出版的克里木凯特《古代摩尼教艺术》翻译增订本(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中，有《从福建明教遗物看波斯摩尼教之华化》一文，于此略有申论。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此点。但两人主要视点为明教，而非刘、翁所论之唐代摩尼教，因此，摩尼教的华化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帮助唐朝收复两京的回鹘牟羽可汗，在洛阳皈依了摩尼教，摩尼教由此传入漠北，借助粟特人的势力，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时而也受到忠于回鹘原始宗教的一派的强烈抵抗。田坂兴道《回纥的摩尼教迫害运动》(《东方学报》东京11，1940)，已对顿莫贺时期打击摩尼教徒的情况做了考证。关于摩尼教在回鹘的情形，除了上引林悟殊的论文外，尚有艾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西北史地》1981—1)、杨圣敏《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西北史地》1985—3)、陈俊谋《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学

院学报》1986—1)、杨富学与牛汝极合撰《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2)等文。

840年回鹘西迁天山东部地区，不久即以高昌(唐西州、今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亦称西州回鹘。原本已经是摩尼教流行区的吐鲁番，由于回鹘人的大量入居，一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盛的摩尼教中心。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吐鲁番地区发现大量的中古伊朗文和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荣新江《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1993)，对其中的伊朗语文献做了详细的介绍。但由于这类文献中世俗文书贫乏，所以，多年来有关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史的研究进步不大。

黄文弼在二十年代得自吐鲁番的一件重要的回鹘语文书，耿世民在《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4；修订收入《新疆考古十年》，乌鲁木齐，1983。又英文本为 Notes on an Ancient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Central Asiatic Journal，XXV-3/4，1991)中，做了全文转写和翻译。耿世民还与克林凯特(H.-J. Klimkeit)发表《吐鲁番摩尼教寺院的毁坏》(Zertorung manichaischer kloster in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18，1985)，合刊德藏 M.112 背面文书，其中记载了把摩尼教寺院改造为佛寺的情况。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经要》31/32.1991)。通过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保存的摩尼教洞窟遗迹和高昌故城等处出土的摩尼教文书的艺术、语言、历史等方面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对上述两件回鹘文摩尼教世俗文书的细致分析，比较完整地揭示了九至十一世纪初摩尼教在西州回鹘时期的兴盛与衰亡的过程。宗德曼(w. Sundermann)的《有关吐鲁番地区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献》(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A. Cadonna (ed.)，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

tions on the Silk Route, Firenze 1992)中，从吐鲁番出土伊朗语赞美诗、题记、供养人题名、书信、文书、词汇表等材料中，发掘出一些零星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摩尼教史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被作者看作是1007—1019年在位的回鹘可汗的资料，其某些看法与森安孝夫上引文不尽相同。另外，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8，1993)，初步报道了他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摩尼教洞窟的收获，据称，在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三大石窟群中，总共确定出三十多个摩尼教洞窟，这些洞窟分组连在一起，构成一所所摩尼教寺院，其形制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所记的寺宇仪完全相同。但由于这些摩尼教寺院或则塌毁严重，或则壁画被佛教壁画蒙住，要最终确定这些具有佛教摩尼教二重性的石窟变迁情况，尚有待于科学的考古发掘。

3. **景教**

位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代基督教流行中国的最好历史见证，自明末出土以来，受到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关注，近代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反复考证和研究。在此不可能将有关景教碑的百余种研究文献一一列举，只将东西方最为重要的和较新的研究成果表出。西文方面，以夏鸣雷(P. Havret)三卷本《西安府发现的基督教碑铭研究》(La Stele Chretienne de Si-Ngan-Fou, Changhai1895-1902)最为详赡。而佐伯好郎(P. Y. Saeki)《中国景教碑文研究》(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1916)因系英译，影响更为广泛。中文著作中，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1935)，汇集了清儒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有碑文校录和唐代景教史研究。较新的研究成果，有伯希和著、多维利埃(J. Dauvillier)编《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研究》第二卷第一分册《西安府碑》(T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 Extreme-Orient, II. 1: La Stele de Si-Ngan-Fou, Paris 1984)。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

1)，对碑中比较难解的叙利亚文字进行考释。他首先否定基督教传入中国年代的贞观九年(635)说，否定西方和日本学者主张的北周宣政元年(587)说，考察了景教东来的路线，认为景教由西向东，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年代要早于长安。同时，景教徒也从海上来到中国。他将碑上的全部叙利亚文字做了翻译和诠释，指出其含义，并对汉文、叙利亚文的各自特点做了比较。

景教因为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倍受关注，教内教外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目的不一的研究发表，就中以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0)一书，对有关景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收罗最广，其研究结果，基本上勾划出唐代景教在华传播的面貌。以后，他又著有《唐宋时代的中国基督教》(《支那基督教之研究》1，东京春秋社，1943)和英文本《中国的景教文献和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对东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系统研究唐代景教史乃至整个基督教入华史的著作，还有穆尔(a. C. Moule)《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Christians in China befo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郝镇华汉译本，中华书局，1984)、龚天民《唐代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卷一(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0)、江汶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朱廉之《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克晨木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通过这些论著，读者可以了解到从阿罗本贞观九年入朝到唐朝末年景教的发展史和地域分布等情况。在这些论著中，罗香林书是一部论文合集，其中包括《景教徒阿罗憾为武则天皇后营造天枢考》、《吕祖与景教之关系》、《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为何不祀祖的问题》、《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等，所论道教与景教的关系及景教流行于岭

南的情况等，超出前人研究范围，但有些是否与景教相关，尚无法肯定。

在唐代景教研究中，敦煌发现的景教写本也备受关注，伯希和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录入上述大部分著作。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3，1987），对比叙利亚文，逐句解释了这件重要文献。另外，流入日本的被称为敦煌景教写本的还有《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和所谓得自李盛铎旧藏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些散卷大多由羽田亨和佐伯好郎考释发表，收入《羽田士史学论文集》下（京都，1958）和《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一、四卷中，成为人们研究唐代景教的基本文献。但是，林悟殊与荣新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4—4，1992；收入《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都教》，1995），从敦煌学与景教教义两方面，判定上述最后两种写本不是唐代景教文献，而是近世书商的伪造。这一结论向前此利用这些文献所写的唐代景教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今后研究其他唐代景教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在吐鲁番葡萄沟的废寺中，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掘获大批伊朗文和突厥文景教文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粟特语文书中，也有景教文书。从两地文献的时间来看，唐末至宋初敦煌吐鲁番两地的景教徒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illiam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Firenze 1992），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文献，整理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但目前尚未有人把这批文献纳入唐五代景教流传中国史的研究当中。

五、与南亚的关系

印度和中国同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往来关系，到了隋唐时代，中印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论从往来路线的增加，人员数量的增多，种类的扩大，还是交流的内容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古代的印度又称天竺，范围较今天的印度国要大，有时包含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里所说的印度，是随时代不同而所指范围不同的历史概念。

对隋唐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对当时西行求法僧人及其著作的研究基础上的。从唐朝初年的玄奘到德宗贞元年间回国的悟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西行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充当了中印交往使者的角色。他们中有些留下了行记或其他著述，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印关系史的主要依据。由于从上个世纪开始，就陆续有整理这类书的著作发表，这里无法一一详细介绍，只按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1)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儒莲(S. Julien)《西域记》(Ta-T' ang Hsi-yu-chi. 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 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cais, Paris 1857-1958)。

比尔(S. beal)《西域记》(Si Yu Ki,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ld, London. 1884)。

瓦特斯(Th. Wates)《玄奘印度行记注》(On Yuan Chwang' s Travels in India(A. D. 629-645), London 1904-1905)。

堀谦德《解说西域记》(东京，1912)。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之研究》(东京，1942—1943)。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东京平凡

社，1971）

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

范祥雍《大唐西域记阙文考辨》（《文史》13，1982）。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桑山正进《大唐西域记》（《大乘佛典中国日本篇》4，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

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

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1990）。

其中以季羡林等校注本晚出最精，现为学界公认为最佳的本子。但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桑山正进译注本只有睹货逻故地到北印度部分，但于中亚考古学成果引述较为丰富。

（2）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儒莲《玄奘的生平及其 629—645 年印度之行》（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 l′ Inde depuis l′ an 629 jusqu′en 645，paris 1853）。

比尔《沙门慧立著玄奘传》（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london 1911）。

长泽和俊《慧立彦悰玄奘法师西域纪行》，东京桃源社，1965。

孙毓堂、谢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

此书新疆出土有回鹘文本，回鹘文专家有不少整理成果发表，于此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进一步整理极富参考价值。

（3）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沙畹《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memoire compose a l′ e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 angsur les religieux eminent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is 1894)。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东京岸波书店,1942)。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

(4)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

高楠顺次郎(Takakusu)《南海寄归内法传》(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chipelago. by I-Tsing, Oxford 1896)。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佚文辑考》(《清华汉学研究》1,1994)。

(5)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藤田丰八《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钱稻孙校印,北平,1931)。

福克司(W. Fuchs)《726年慧超往西北天竺与中亚的行记》(Huei-ch'ao'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ien und Zentral-Asien um 726,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30, 1938(1939))。

冉云华等(Yun-hua Jan, Han-Sung Yang, Sh. Iida & L. W. Preston)《慧超往五天竺国传》(The Hye Ch'o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 Bekeley/Seoul 1984)。

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文科学研究所,1992)。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

其中以桑山正进组织相关学者所作的校注本最为精密,参看王邦维对最后两书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1,1996)。

此外,范祥雍点校了道宣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

在上述西行求法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要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了,它对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史、中亚史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本前言,又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介绍了玄奘西行的时代背景、动机和效果。他指出,玄奘出身儒学世家,西行前于佛教诸宗已有深入研究,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思想混乱,学习在中国学不到的《瑜伽论》而决意西行。通过对玄奘印度求法和归国后活动的考察,认为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大唐西域记》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前言《义净和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指出义净的时代,正值中国佛教高度发展,印度佛教也正好达到它的顶峰,而且唐朝政治势力及影响远被西域,导致了义净的西行。但他和玄奘所不同的是,除了力图解决佛教界的思想混乱外,还想吸收印度的僧团制度、戒律规定,以整顿戒律,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大唐西域记》不同,它因人立传,是一部传记著作,由于它晚于《大唐西域记》,有许多地方可以补充玄奘的书。

隋唐时期,还有大批印度高僧来中国传教译经。相对来讲,关于他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周一良《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1945),研究了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他们把印度瑜伽密教传入中国,建立了中国密宗,在中晚唐影响至巨。富安敦(a. Forte)《迦湿蜜逻密宗大师宝思惟及其北印度合作者在中国的活动》(The Activities in China of the Tantric Master Manicintana (pao-ssu-wei:? -721A. D.) from Kashmir and of his Northern Indian Collaboraors. East and West,new series,34,1984),利用佛教史籍和敦煌文书,研究了武周至玄宗时期在华活动的迦湿弥罗(一作迦湿蜜逻,今克什米尔)高僧宝思惟以及罽宾的尸利难陀设、岚波国的李无谄和李无碍、天竺的室利末多,还有中国僧师利等人。

除了僧侣之外,最著名的中印交往使者是唐朝的王玄策,他在

唐朝初年曾三次出使印度，除完成外交使命外，还曾发诸国兵，扶立印度国王。可惜的是王玄策所著《中天竺行记》(或名《王玄策行传等》早已失佚。列维(S. Levi)《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汉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做了初步辑录。以后伯希和、冯承钧、岑仲勉都有补充，而以冯氏《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考证最详。以后又续有新材料被发现，李玉昆有《龙门石窟新发现王玄策造像题记》(《文物》1976—11)，霍巍有《〈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6，1994；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略同，载《考古》1994—7)，而尤以后者重要。讨论王玄策出使问题的文章，还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1)、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2)、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3)、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3)等。西藏吉隆新发现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留下的碑铭，使人们对中印交往的吐蕃道有了新的认识，基本确定了王玄策出使路线的具体走向。此前，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4)，详细考察过这条路的开通时间，以及它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多杰才旦《关于丝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线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4)，从更广的视野讨论了这条道路。

除了僧传和使臣行记外，中国载籍中保存了许多印度史料，有些是缺乏历史观念的印度本身所没有的。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分正史、别史、杂史、史料杂著四类，对汉文文献中有关南亚的史料做了考订、分类、阐述和评价。以她为主而由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则辑录了大量的史料原文，其中隋

唐五代共收33种文献。这两部书为我们研究中印交往提供了史料指南和部分原始文献,颇便学人。

隋唐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造纸术的传播,季羡林先后发表《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地点问题》、《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均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认为中国纸和造纸法先由内地传到西域,再从西域传到印度。他否定了伊斯兰教徒十二世纪左右才把纸带到印度的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纸至迟在七世纪末叶就已经到了印度。至于造纸法,则有可能是由阿拉伯人辗转传入。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1),认为纸和造纸法是在650—670年由吐蕃尼波罗道传入印度的,尼泊尔和印度的造纸法差不多和纸同时传入,最初传去的是桑皮造纸法。关于蚕丝输入印度问题,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考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四世纪,道路有南海、西域、西藏、缅甸、安南五条。关于印度制糖术入华问题,季羡林《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文献》1988—2.3),通过对历史背景和过程的详细考察,肯定了唐太宗时印度甘蔗制糖术传入中国的说法,但这是造沙糖还是造石蜜的技术,他认为尚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有《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1)等文章。

周济《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中华医学杂志》22—11/12,1936),详细叙述了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季羡林《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2,1994),进而讨论了与眼科相关的其它外来医术对唐朝中国的影响等问题。房定亚、耿引循、耿引曾合撰《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南亚研究》1984—2),也讨论了医学传播问题。姜伯勤《敦煌

吐鲁番与香药之路》(《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讨论了印度香药的传入问题。江晓原《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天学直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又见《汉学研究》10-2，1992)，介绍了唐代天文学中的"天竺三家"和《九执历》、符天术等问题。

除了佛教的传播和僧人行记外，学者们对一般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得似不够充分。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题为《中印文化交流简论》)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从这一角度做了全面的概说。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由于史料多少不等，研究的成果集中在唐代前期。实际上，晚唐五代中印之间的往来并未断绝，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1991)，利用敦煌文书，补充了过去中印交往史上的一段空白。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1960)，则依据地方史料，对通过南海的中印交往做了研究。饶宗颐《读罗香林先生新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兼论交广道佛教之传播问题》(《大陆杂志》21—7，1960)，对此有所补正。

隋唐时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上的尼波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地也有往来，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六、与南海诸国的关系

中国古代称东南亚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为南洋或西洋，隋唐时期虽然中外关系以陆路交往为主，但中晚唐五代通过南洋的海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五代不仅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广泛的政治和商业联系，而且与印度、西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加强了往来、章巽《我国航海史的光辉经历》(《章巽文集》，北京海洋

出版社，1986)，考察了唐代的对外交通，指出从八世纪中叶及以后大食势力日益巩固地立于中亚，西域原有的势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唐朝的对外交通受到阻碍，因而把重点转到海路上来。贾耽记述的两条远航海线，成为唐朝东西两方对外交通的生命线。唐开元二年(714)在广州就已有市舶司的设立，并非偶然。和田久德《唐代市舶使的创置》(《和田清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1)，考证其设置年代在开元二年前后。他的《唐代的南海遣使》(《东洋学报》33—1，1951)，研究了唐代与南海诸国的交往。徐玉虎《唐代与南海贸易原因之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3-8，1970)，否定唐代南海贸易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的说法，认为对外贸易的动力是唐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汶江《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交史研究》1988—2)，探讨海路兴盛起来的原因。高伟浓《唐宋时期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航路综考》(《海交史研究》1987—1)，对海上道路加以考证。此外，还有刘希为《略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三秦出版社，1993)。

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1987)，以国为单位，一一阐述了唐朝与南海各国的往来，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情况。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沿海城镇的兴起。而一些重要的港口，对唐代的海外贸易做出了贡献。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对此做了概要介绍。关于泉州，有《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苏基郎《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此外，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介绍了关于南海地区的有关史书。

隋唐五代时期与欧洲、非洲的交往不多，此处从略。

第七章　宗教、文化

一、宗教

隋唐五代是我国宗教活动活跃、宗教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一方面，两汉之际自天竺传来的佛教，以及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这时都已进入鼎盛阶段；另一方面，其他世界性宗教如摩尼教、火祆教、景教、伊斯兰教也于这一时期在我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宗教，在其所扎根的局部地区也都表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一时期宗教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有紧密的联系，其影响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以致于要了解隋唐五代的社会状况，不了解隋唐五代的宗教就无法达到目的；要开展隋唐五代各种专题史的研究，也无不与隋唐五代的宗教研究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个时期宗教的研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于隋唐五代宗教的研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曾对隋唐五代宗教的状况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或结合刚刚传入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于隋唐五代的宗教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研究。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敦煌石室遗书的发现，以及西域和全国各地宗教文物的大量出土，更激发了学

者们对隋唐五代宗教研究的热情。许多学界的耆宿，如我国的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陈垣、汤用彤、向达、白寿彝；日本的质山崎宏、道端良秀、矢吹庆辉、那波利贞、羽田亨、桑原骘藏；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谢和耐等人，都于隋唐五代的宗教研究殷勤致力，创获甚丰，在不少领域做了开辟、奠基的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二、三十年代隋唐五代宗教研究的阵容相当强大，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亦颇可观。这个时期，是隋唐五代宗教研究出现的第一个高峰。

四十年代，对于隋唐五代宗教的研究仍然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因战事和政局的影响，此时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不如前一个时期。五十年代之后，国内左倾思潮横行，宗教被人视若禁区，宗教研究鲜有人敢于问津，所以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国内的隋唐五代宗教研究比较寂寞；"文化革命"中，这一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才为之改观。可以说，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我国隋唐五代宗教研究的低谷时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禁区被打破，人们的思想较前大为解放，学术视野大为开阔，唐五代宗教研究这一大有可为的领域便迅速地吸引大批学人致力其间。不久后随着文化热的兴起，隋唐五代宗教研究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截至九五年上半年止，八、九十年代发表的隋唐五代宗教研究论文和出版的有关专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以前各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些前辈学者的力作重版或把散见的论文结集出版，还有一些前辈学者推出了有份量的新作；更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或在旧有研究领域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或不断地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在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隋唐五代宗教研究的园地繁花竞放，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气象。这是隋唐五代宗教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它预示着这一研究园地大面积丰收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

隋唐五代各种宗教的发展普及程度是不同的，学界对于各种宗教的研究也极不平衡。其中佛教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佛教的制度、典籍、派别、传播情况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复杂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学者们都做了广泛的探讨，发表了大量的论著。道教研究的成果远不能与佛教比，但仅次于佛教；对于其他各教的研究相形之下显得比较落后，有的还处于刚刚起步或开拓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宗教在隋唐五代传播的规模远较佛、道两教为小，留下的典籍也很稀少，要开展研究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但也与以前对这些宗教重视不够有关。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后起之秀对摩尼教、伊斯兰教、袄教和景教的研究做了极大的努力，在史料搜集、考订和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这些宗教研究落后的面貌正在逐步改变。下面，我们把隋唐五代佛教情况分成七个方面，其它各宗教的研究情况则不分类，每种宗教自立一目加以介绍。

（一）佛教

正如牟钟鉴同志指出的，"大凡一种重要宗教，都有四个层次，从内向外，一为宗教信仰（基本宗旨），二为宗教理论（教义、学说、戒律），三为宗教实体（宗教组织、设施、活动），四为宗教文化（在宗教推动和影响下形成的多层多向文化）。① 佛教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这四个层次中，传统的研究最重视第一、二层次，即对佛教信仰和佛教理论的研究；对第四层次即佛教文化亦颇多学人致力，相对来说，对第三层次即佛教实体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但在八十年代，人们对包括教团组织、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教团或僧侣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等内容的佛教实体的研究已有长足进步，对佛教的研究正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向纵深发展。下面的介绍，大体按照上述

---

① 牟钟鉴：《道教下中国传统文化》，载《文史知识》1987 年 5 期。

四个层次的顺序，但一、二层次关系密切，研究者往往兼而论之，我们把它合为一项，称作"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第三、第四层次涉及内容较多，我们再细分为几项加以说明。

1. 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自东汉末至晋，般若空宗的经典译出，因与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玄学相合而大为流行。两晋南北朝时，各种佛经继续大量译出，译人在译出经典后又聚徒传授，因而养成了讲习经论之风，此风在南朝尤为盛行。由于僧民所习经典不同，或者所习经典虽同而理解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从南朝末年开始，一些佛教学派渐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统治集团相依托，又与日益发展、巩固的寺院经济相结合，形成在教义和财产上排他的集团，学派遂演变为宗派。最早的佛教宗派肇自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因此，佛教宗派问题，乃是隋唐五代新起的问题，也是隋唐五代佛教史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我国佛教宗派到底有几家，各个宗派的承传情况和思想特点，学者们的观点却不尽一致。他们发表的论著，有综论各宗的，也有具体分析某一宗派的活动和思想学说的，分述如下。

(1)综论各宗及其思想、学说

从宏观上把握并论述隋唐佛学的思想特点和宗派情况的工作，由佛教史研究的老前辈汤用彤首开其端。他在西南联大的讲演《隋唐佛学之特点》，及六十年代初所著《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①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论著。郭朋的《隋唐佛教》②在第二章《隋代的佛教》，第四章《唐代的佛教》中，各立"概述"一节，置于章首，分别论述了隋代和唐代佛教宗派的发展概况；

---

① 以上三文均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齐鲁书社，1980 年版。

稍后石峻和方立天的《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①、《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②，对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隋唐佛学之特点》一文，对隋唐佛学按其历史发展作了“纵的叙述”，又就隋唐佛学进行全体的分析研究，作了“横的叙述”，提出隋唐佛教具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或独立性、系统化等特点。统一性指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佛教“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理论和修行并重，南北学风统一。国际性指当时中国成为亚洲佛学中心，隋唐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理论，求佛法者都到中国来。自主性或独立性是说这时佛学已不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分子，它已能自立门户，不再仰仗他力。系统化是说唐代佛学大师通过判教的办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别、互异的经典得到系统的组织，各给一个相当的地位。佛学的系统化是佛教学派演变为宗派的基础。各派大师使佛学系统化的过程中，不但建立起自己理论上的特点，而且还有浓厚的宗派意识，各认自己一派为正宗，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普及到一切方面。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对于佛教文献中的“宗”进行了辨证，指出并非所有的“宗”都指宗派而言，进而对日本和中国史料中所谓“八宗”、“十宗”、“十三宗”的说法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中国佛教之宗派，除天台宗外，有禅宗、华严、法相、真言、律宗五宗。至于三论宗，虽已形成，但传世甚短。三阶教隋唐盛行于民间，应可认为教派。至于净土，是否为一教派实有问题。在《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一文中，作者对于学派与教派的区别作了进一步申论，进而着重指出了宗派的形成与道德之争，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提倡、人民大众之信仰及寺院经济的发展之关系。作者强调，在宗派形成过程

---

① 《哲学研究》1981 年 2 期。

②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 年 4 期。

中，寺庙产业渐成为各宗派所有，佛教道统之争的激烈，是寺庙土地经济的反映，这种意见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郭朋的论述，比较注重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性。他在《隋代的佛教·概述》中说："大乘佛教，本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本来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大量僧侣出身高门大族这不仅突出了佛教僧侣的阶级成分，而且也更表明了佛教思想的阶级性"；即使那些并非出自高门的和尚"一经出家之后，特别是在他们成了所谓'高僧'之后，他们也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在《唐代的佛教·概述》中，作者除了继续论述了唐代僧侣地主的剥削阶级本质外，又着重指出了佛教宗派与封建宗法制度的内在联系，他说："宗派佛教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正是封建宗法制度，随着寺院的发展而反映到佛教里来的产物。"

石峻、方立天的《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唐佛教宗派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客观条件。文章指出，每一大的佛教宗派的建立，其实都各有自己的总后台，即依附于某一最高统治者或某一贵族集团势力。而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佛教宗派形成的经济基础。独立的寺院经济为大师们独立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宗教轨范制度，据有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一派佛教僧侣思想遗产和遗产世代相承的世袭制度，是形成佛教宗派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魏晋时代门阀制度在僧侣统治阶级中变相的复活。关于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思想条件，文章指出，它是自汉以来佛教理论长期发展的逻辑结果。由于长期的历史演变，已形成的佛教派别众多，经典浩繁，且多歧义。因此，要建立佛教宗派，从理论上来说，首先必须弥补和佛教不同时期各类经典乃至各派在理解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从而使本宗有一个似乎可以贯通的理论体系，这个办法就是"判教"。由于先后出现各种不同的判教，唐时代才有许多大的佛教宗派的

相继成立。作者认为,在唐佛教宗派形成的上述三种原因中,首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文章还提出隋唐佛教中宗派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思想方面独树一帜,也就是宗派的独创性;二是在组织方面自立门户,也就是与上述独创性紧密相联的排他性。

《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对于隋唐佛教有哪些宗派及各宗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律宗,因为戒律系各宗共同信奉,所以虽有宗名,从严格意义上讲实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宗派。至于净土宗和密宗则完全偏重于信仰,也都很难说有什么系统的宗教哲学理论",三论宗"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多新的创见,而且为时甚短,就为天台宗等所摄取、改造",所以"只有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是最富有宗教哲学理论色彩的,而且对尔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章的主体部分便是对此四宗思想特点的剖析,本文将在下面概述各宗情况时加以介绍。

任继愈《唐代三教中的佛教》① 一文也概括论述了佛教在唐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他认为唐代儒、佛、道三教中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教为弱。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副合,儒教为主,最后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

(2)天台宗

历来论述天台宗的论著很多,重要者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隋唐之宗派》② 之第二节《天台宗》;任继愈《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③;郭朋《隋唐佛教》第二章《隋代的佛教》④ 之第二节

① 《五台山研究》1990年2期。

② 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3版。

④ 齐鲁书社,1980年版。

《为统一的隋王朝服务的天台宗》；石峻、方立天《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的有关部分；潘桂明《天台宗的圆融哲学》①；赖永海《性具与性起——天台、华严二宗佛性思想比较研究》②；方立天《天台宗心性论述评》③；曾其海《天台宗的佛教哲学思想》④。

汤文原为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原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授课的讲义，是以科学观点论述天台宗的开山之作。此对天台宗的传承和教义发展脉络阐述特详，并指出了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颉"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其教行乃南北佛法之结晶，因而树立一特殊教派"。任文亦阐述了天台宗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了天台宗在判教时提出的"五时八教"，而着重在揭露天台宗宗教理论的思想实质，认为"天台宗力图抹煞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目的在于证明'真如'的永恒性、绝对性。""他们空物质世界，正是为了肯定他们的宗教的核心'真如'精神实体的不空。"郭文对于天台宗的分析，在政治上，揭露其鼓吹的种种功德，是对被压迫阶级的宗教欺骗，对压迫阶级则是为他们那种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在思想上，则论证其"真如缘起"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心三观"与"一念三千"是形而上学认识论，"止观"学说是僧侣主义的方法论。石峻、方立天的文章重点分析了天台宗的"方便法门"和"一心三观"，认为《法华经》第一卷的《方便品》，为天台宗适应全国统一的政治需要和佛教的发展趋势，折衷佛教各类经典和派别，乃至调和佛教以外的其他学说提供了方便，故被天台宗奉为宗经，天台宗亦因此称为方便法门；至于"一心三观"是天台宗在理论方面的新的主要论点，它后来由智颉发展为"三谛圆融"学说，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2期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2期

③ 《佛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12月。

④ 《东南文化》1990年6期《天台山文化专刊》。

包含了事物不是永在的观点，并且接触到从本体和现象相统一的角度认识事物的某些思想，在认识论上带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总体来看，“一心三观”是一种佛教神秘主义的直观。潘文也论述了天台宗的圆融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是宗教神秘主义，指出它的建立是中国佛学根据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而在思想理论上对印度佛学的创新，其宗旨在于调和现实的阶级矛盾。文章还指出性具善恶论是天台圆融哲学使佛学适应中国封建伦理观念的尝试，并评述了这种哲学对后期天台宗、禅宗和宋明理学的影响。赖文把天台宗与华严宗两家的心性说及其修行理论作了比较分析，论证了二者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认为天台宗佛性思想的最大特点在其一反佛性至善的传统说法，而主张佛性具恶。这种新颖的看法，必将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促进对佛性问题的深入讨论。方文对于天台宗心性论中“三法无差”、“三因互具”、““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等命题作了探讨，指出这些心性学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重视佛教实践主体的自觉体悟，重视主体心性的现证。曾文探讨了天台宗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来源，天台佛教哲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天台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论著，都有不少创见和新意。

(3)法相宗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是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游学印度归来后，搬用印度佛学的理论，按照印度教团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派，其学说繁复，含义精密，普通人不易明了，但却因此而引起学者浓厚研究兴趣。二、三十年代，汤用彤在大学讲授隋唐佛教时，立有法相宗专节，叙述法相宗的师承、经典、学说、盛衰，实开研究法相宗之先河，一时论者蜂起。六十年代初，任继愈作《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① 绍述和发展师说，着重分析了构成法相宗理论体系的“八

---

①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3 版。

识"、"真唯识量"和"种子"学说，阐明了法相宗对印度小乘佛教的继承和改造关系。郭朋在其《隋唐佛教》第四章《唯识宗》一节里，除了分析其阿赖耶识论和"种子"说外，还详尽地论述了其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四分"与"三自性"论，烦琐哲学的方法论——"五位百法"。石峻、方立天《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中"唯识宗的三性说和唯识说"一节，集中论述了唯识哲学的基础三性说和唯识说，认为三性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同时"三性"和"三无性"说的关系，也是沟通大乘佛教"空"、"有"两宗的桥梁。又指出玄奘论证唯识说的《真唯识量》的论证是错误的，但他所运用的逻辑推理形式，对于命题、论据、类比的分析，对论辩格式的推衍，以及对错误推理的揭示等，仍是对中国逻辑史的重要贡献。张春波《玄奘对唯识学说的发展》一文(《社会科学战线》81年1期)是研究玄奘唯识学说的专题论文，认为玄奘对唯识学说的发展有两点，一是"挟带说"，二是"真唯识量"。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①] 从"缘起论"、"中道观"和"因明学"三方面入手，着重阐明了玄奘这思想中深邃的辨证法因素。韩廷杰《玄奘对唯识学的发展》一文[②]，不同意认为玄奘照搬印度学说的观点，论证了玄奘对印度唯识学的重大发展。罗炤《吕才与玄师的论争》一文[③]，对于这一论争的逻辑和哲学意义做了简略说明。

对于法相宗的创始人玄奘的研究也很热烈，其中仅玄奘的年谱就有五、六种之多，重要者如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④]、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⑤]，对于玄奘生卒年和一生行事都做了细致的考订，提出了自

---

① 1986年版。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3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2期。

④ 《东方杂志》21卷7号。

⑤ 《东方杂志》21卷19号。

己的看法。搞清玄奘一生活动的准确时间，无疑有助于更准确更深入地研究法相宗的创立经过和思想特点。而杨廷福《玄奘论集》① 和《玄奘年谱》② 对于玄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其关于玄奘生卒年的考证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葛承雍的《唐玄奘晚年活动散论》③，则论述了玄奘自印度归国后不得不依附王权，曲与帝后显贵应酬的情形。

(4)华严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实际创始人是唐初的佛学大师法藏。因为法藏深受武则天赏识，被赐名为贤首，世称贤首大师，故华严宗又名贤首宗。研究华严宗的学者不乏其人，但重要者仍数汤用彤、任继愈、郭朋、石峻、方立天等。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之“华严宗”一节，具述华严宗的创宗始末、师资承传和著述、演变情况并指出华严之盛“一有法藏之大弘此教，二有《华严》之传译，三有武则天之提倡”，具有开拓、奠基之功。任继愈《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④则对华严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剖析，认为华严宗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其论证方法则有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特点，千方百计地抹煞事物的客观存在，混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但也承认，“总体来看，华严宗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流派中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涉及到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从认识论上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郭朋在《隋唐佛教》第四章关于华严宗的一节里，对华严宗史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华严宗的主要典籍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华严宗的基本思想——

---

① 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② 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版。

③ 《人文杂志》(西安)1994年2期。

④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法界缘起"论、"六相"与"十玄"也作了细致的剖析。郭文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尖锐地揭露了华严宗对武周政权的合作与效劳，认为华严宗是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教派。石峻、方立天在《唐佛宗派的思想特点》一文中论到华严宗时，着重分析了它在理论上的调和色彩，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论的核心是论证"事事无碍"，进而阐述"事事无碍"是一种肯定差别性，又片面夸大统一性的圆融无碍思想。这种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上的调和色彩愈来愈浓。它不仅调和原来佛教各宗各派，调和新形成的禅宗思想，而且还积极调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企图统一三教九流的倾向。方立天又著有《华严金师子章校释》①一书，通过对法藏的代表作《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评述，更加深入具体地探讨了华严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特点。书中所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对《金师子章》的组织结构和思辨逻辑，以及对作为华严宗思想核心的"六相"和"十玄"还有法藏的"判教"都深入进行了分析。文章在指出法藏学说的唯心主义思想本质（客观唯心主义而又兼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和为武周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本质的同时，对于华严宗在思辨逻辑和认识论上的贡献也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肯定。邱高兴《华严宗宗祖法藏的生平及其思想》②一文，通过华严宗的判教学说、法界缘起及圆融无碍等理论考察了法藏的思想。这是青年学者研究华严宗思想体系的可贵尝试。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华严思想的接受形态——中国、朝鲜、日本华严的特点》一文，③对华严思想在中国、朝鲜、日本传播的不同特点作了研究，他认为《华严经》由印度传到东亚，按各民族的需要发生变化，给各国的文化发展带来种种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扩

---

① 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

③ 此文由曹章祺翻译，载《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2期。

大了研究华严宗的领域，也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有重要意义。

(5)禅宗

禅宗始盛于唐中期，以后诸宗衰，禅宗独盛，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禅宗在中国思想史和佛教史上的影响最大，对禅宗的研究也就最充分，论著最多。

首先对禅宗史倾注了巨大热情的是胡适，他在1924年开始，写出了一系列研究禅宗史的论著，其中如《禅学古战争考》①、《神会传》② 等，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尽管胡适在其研究中贯彻了主观唯心论思想，不少论断属于主观臆断，但他在弄清禅宗史实方面不无贡献，他强调禅宗在哲学思想上的创新和革命作用，对后人也颇有启发。

汤用彤对于禅宗宗史的研究用功亦甚勤，其成果具见《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唐之宗派》第六节《禅宗》。此外对于禅宗史作较全面论述的有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③、郭朋《隋唐佛教》第四章第四节《中国佛教特产——禅宗》。任郭二人都比较注意把禅宗史放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禅宗具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在一定条件下起某些进步作用。但任文强调禅宗"以宗教麻痹人心，是它的主要方面，它和其他宗教一样，教导人们忍受苦难，把苦难看作无足轻重，甚至教人当作快乐迎接它，培养人们逆来顺受的奴化性格。"郭文强调禅宗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更简便更有奇效的自我陶醉和欺骗人民的工具，从而是引起封建士大夫阶层更大兴趣的一个佛教派别。

---

① 《新月》1卷6期，1928年8月。又见《胡适文存》三集。

② 《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

③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在台湾方面，印顺法师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禅宗史》①，对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禅学的中国化、牛头宗在中国禅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坛经》的成立与学、曹溪禅的开展及其发展和分化的过程等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很有见解富于启发意义的结论，因而是研究中国禅宗史特别是唐五代时期禅宗史的极有价值的著作。

自八十年代末叶开始，大陆学者也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②、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③、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④ 等。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外来佛教与传统哲学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并从佛教中国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禅宗的形成与分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例如，针对以往大多数学者片面强调禅宗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而对禅宗来自佛教本身的渊源的研究反而空疏的弊病，作者着重指出禅宗的思想核心及其立场、方法都没有超出佛教的范围，但它熔佛教各家学说于一炉，并大量摄取儒道等传统思想的内容与方法，因而禅宗本质上是"渊源于外来的佛教而形成于传统文化之中"。这样的观点新颖而有说服力。《中国禅宗通史》把禅宗的形成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其社会基础是失土地的农民——流民与失意的士大夫，在禅宗里，有农民和士大夫的投影。又指出禅守自叙的史籍多不可信，僧史、寺志、地方志要可靠一些，塔碑记文、正史、笔记的可靠性更胜一筹。此类观点，都有发聋振聩之效。

① 1971年在台湾出版，大陆把它收入《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研究禅宗的有创见的论文，例如邢东风《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无法之法》① 一文，把着重点放在南宗禅的宗教修行方法论上，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很值得一读。

禅宗的宗经是《坛经》，它是由慧能弟子所作慧能一生说法的记录，也是唯一一部中国僧人的著作而被奉为“经”者。因此，禅宗史家无不重视对于《坛经》的研究。胡适在其所作《坛经》考证中，根据《坛经》中杂有慧能弟子神会的思想和事迹，大胆地断定《坛经》乃神会的作品，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不能同意。近年郭朋对《坛经》作了系统研究，写出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其中《坛经校释》② 一书集其研究成果之大成。书中批驳了胡适的观点，认为慧能去世之后，《坛经》是慧能说法的记录，因而可据以研究慧能的思想；后人对于《坛经》的增删改窜则“正标志着慧能以后禅宗的发展和演变”。

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坛经》的研究又有新的重要成果出现，最突出的是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③ 的问世。本书利用1935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发现的“敦煌本”《坛经》，参校旧传敦煌本《坛经》，经四年修改补充而成，具有版本最新、资料丰富、研究精深的特点，为研究的人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成果。

与《坛经》问题相关联的是慧能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丁东风《略论神会及其佛教哲学思想》④一文，提出了慧能是禅宗南宗的倡导者，神会是禅宗南宗的宣传者和确立者，两人同为中国禅宗南宗的创始人的观点。对此，潘桂明撰写了《也谈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⑤ 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慧能是禅宗的

---

① 《哲学研究》1991年6期。

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④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3期。

⑤ 《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期。

实际创始人，地位远在神会之上，慧能、神会共创禅宗的说法不能成立。郭朋《神会思想简论》①根据敦煌写本《神会语录》，对神会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剖析，指出神会基本上是个"知解宗徒"，虽然为南宗争正统地位的斗争起了不少作用，但不应对他推崇过高。而乐九波的《论神会的佛学思想》②则认为神会的学说继承了慧能的根本精神，但更有敷扬显发，构成了彻底的唯心一元论体系。他所创立的荷泽宗虽只数传便告衰，但他的学说的生命却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延伸。

关于禅宗中南宗和北宗的关系，一般认为自菩提达摩以至弘忍，只能说是传统禅学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看做禅宗的预备阶段，也可称为禅宗的先驱。"到了神秀和智诜形成了禅宗的北派，"他们和印度的传统禅法还保持一定的联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禅宗，且"这一派唐中叶以后，即趋没落"③；或者说"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实为禅学"，并非禅宗，"真正的禅宗，毕竟是从慧能开始的"。④ 温玉成和罗炤的意见则不然。温玉成在《禅宗北宗初探》⑤中指出，北宗也是禅宗的一派，并认为唐代晚期以来由于南宗、北宗的教派斗争，致使北宗史实渐被歪曲、湮没，而宋代以来的禅史更是为南宗张目之作。但事实表明，北宗法脉自安史之乱后仍延续约百余年之久。罗炤在《禅宗述评》⑥ 中说，禅宗的大发展始于神秀，慧能则革新禅宗，但只是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中唐至五代为禅宗兴盛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完整形象；北宋以后进入蜕变和停滞阶段。任继愈根据近在敦煌发现的神秀著作，对他以前在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3 期。
③ 见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④ 见郭朋《隋唐佛教》。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2 期。
⑥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 3 期。

禅宗南北宗问题上的观点作了某些修正，所著《神秀北宗禅法》①认为，禅宗南北两宗的宗旨差别并不很大，南北之争实系政治地位之争。

关于禅宗在我国佛教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近年来的讨论亦甚为热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石峻、方立天指出，“从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禅宗的创立是一次特殊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复杂的思想影响。禅宗能在佛教宗派势力空前强盛，宗派思想严密控制的情况下，在宗教的限度内独立思索，大胆怀疑，勇于创新，尊重个人，相信自己，这对于广大佛教僧侣和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人们来说，实在是起到了精神解放作用，以致还启迪后来的某些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动他们怀疑传统，反对权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这都不完全是偶然的。”② 罗炤在前揭文中也认为禅宗的兴起是士族制度瓦解、地主庄园制确立这一历史转变在佛教中的反映，禅宗兴起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局部的思想解放运动。吴炎在《唐代禅宗对我国佛教的改革》③ 一文中，则强调了慧能的禅宗对我国佛教实行的一系列变革，并具体论述了改革的主要内容。

对于晚唐五代禅宗的发展演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潘桂明《临济宗思想初探》④ 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的思想特点，认为临济宗使禅宗的思想和实践继续朝着直捷、洒落的方向展开，引导后人从禅的意境上体验，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传统禅的思想和形式的束缚，成为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李富华的《宗密和他的禅学》⑤ 认为中国禅学思想的最早总结是由宗密完成的。宗密禅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显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 2 期。
② 《论隋唐佛教思想的特点》，《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 年 4 期。
③ 《社会科学》(上海)1984 年 2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3 期。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1 期。

顿悟资于渐修，证师说符于佛意”，包含着调和与会通两种倾向，调和是迎合禅门诸家所好，不论诸家之是非而一律予以肯定；会通是教禅一致的思想，较早地反映了三教融含、诸宗合流的趋势。文章还对宗密的师传进行了考证，否定了胡适在五十年代新提出的宗密为成都净相寺神会传人的新说。

方立天《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① 论述了马祖道一及其门徒百丈怀海、大珠慧海，怀海的门徒黄檗希运、沩山灵祐，以及灵祐门徒仰山慧寂等人的心性思想，说明了洪州宗重视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强调任运自然、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生活禅、世俗化倾向，也论述了此宗的修禅方法特征。周群《宗密禅教合一思想论述》② 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作为禅、教融合的手段；禅之三宗与三教是神韵相通、一一对应的。张春波、李曦《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实质》③ 则认为，宗密看到了禅宗言行对统治者的“危害”，其禅教一致的理论，对于唐武宗灭佛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而禅宗的思想，事实上为后来农民起义军作了舆论准备。

对于开启晚唐五代禅宗“五家七宗”之源的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两位重要禅师，青年学者何云先后撰写了《马祖道一评传》④ 和《石头希迁评传》⑤，对于这两大家的思想体系和修行特色作了概括。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⑥，研究了由石头希迁发展出来的曹洞宗的思想行点，认为曹洞宗主要表现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结合。曹洞宗之“偏正回至”说，其用意之一，就是要借理事圆融调和儒家思想，使之不相违背。

---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 2 期。
② 《南京师大学报》1991 年 4 期。
③ 《五台山研究》（太原）1991 年 1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⑤ 《佛学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学报）创刊号，1992 年。
⑥ 《安徽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

黄燕生的《唐代净众——保唐禅派概述》①对流行在四川成都一带的早期禅宗派别净众——保唐禅派作了研究，指出此派是兼有南北两宗特色的派系，同时分析了此派很快湮没的原因。

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代表作有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② 和任继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③。葛著对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作了通俗生动的说明，任文则对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承启作用作了精辟论证，指出禅宗的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哲学由本体论向心性论的发展，宋明理学可以说是接着禅宗的心性之学继续开拓的新领域，形成儒教。禅宗提出的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环节，是嫡系正宗而不是旁支别派。

不少文章还就禅宗人物、典籍、史迹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其中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④ 堪称最为上乘的精彩之作。本文对历来被人赞为绝妙好词的慧能传法偈，独能指出其"譬喻不当，意义不完"，又考究禅门故事，说明"南宗禅非独其教义宗风溯源于先代，即文词故实亦莫不掇拾前修之余绪。"如此分析，出人意料，发人深思。

(6)三论宗、三阶教、净土宗、密宗、律宗

此数宗或因流行时间短暂，或因注重信仰，缺乏宗教理论，国内学者论之者不多。但在日本，却有不少有关著述，重要者如镰田茂雄的《初唐的三论宗和道教》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⑥、塚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4 期。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 2 期。
④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⑤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6 号 1968 年。
⑥ 中译本分载于《海潮音》16 卷 2－6 期、8－12 期、17 卷 1 期 1935－1936 年。

本善隆《唐中期净土教》①、长部和雄《中国密教史研究》② 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日人的这些著述，在资料的搜集上用功甚勤，是其长处，但往往“叙述详赡而少能在大处综论”③，是其不足。

国内学者有关这几宗的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汤用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和《评〈唐中期净土教〉》④二文值得注意。前者揭出法相宗名宿曾共三阶教人校阅写经，后者论述净土信仰之发达不在南北朝而在唐代，与世运之推移相关，即唐代帝王公卿以及士人，出于死生之恐惧，为作来生之计，率发心弥陀，信仰净土。这两点皆为精辟之论。

至于比较全面地论述以上各宗，除汤用彤早年的讲稿《隋唐佛教史稿》立有“三论宗”，“戒律”，“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专节外，今所见唯郭朋《隋唐佛教》一书中有关章节的论述最为详赡。其于三论宗，详述了此宗的思想渊源，评价了创始人的生平和创教活动，并着重剖析了三论宗的基本思想：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切皆空”与“八不思想”；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二谛论；折衷主义的“中道思想”。其于三阶教，介绍了该教创始人信行的生平和著作，重点则在分析三阶教的社会意义。认为三阶教的“末法”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对社会的不满；三阶教遭受封建朝廷和正统的佛教上层的排斥，也说明了其思想主张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密宗”一节，则分析了密宗盛行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密宗的主要人物和主要经典，而特别剖析了密宗在信仰、仪轨和世界观方面的庞杂情况，揭露了密宗的纵欲主义。在“净

①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报告》第四册，1933 年 12 月。

② 《神户商大》1 卷 2、3 号，2 卷 1、2 号，3 卷 1、2 号，4 卷 1—4 号，5 卷 1、3、4 号，1965—1970 年。

③ 汤用彤《评〈唐中期净土教〉》，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④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土宗"一节，介绍了净土宗的奠基人道绰与善导的生平，净土宗的经典"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重点是分析"净土"思想的阶级实质。在"律宗"一节，作者论述了只有道宣才使律宗成为一宗。但所论只是说道宣对《四分律》作出了"定于一"的阐释以及关于传、受戒法制度的各种规定。据此是否就可成宗，还是有问题的。

关于净土宗创始人之一善导的卒年，传统说法为唐永隆年(681)攀柳树自投而死。郭著及孙浮生《论慧远昙鸾、善导三大师在净土宗的法迹》① 均持此说。李玉昆在《龙门续考》② 则提出了善导卒于龙朔二年(662)的新说。温玉成不同意此说，他在《关于善导禅师卒年问题》③ 一文中，列举史实，重新肯定了善导卒于永隆二年的说法，但认为善导并非为求往生而攀树自投而死，也否定了世传唐有二善导的谬误。

关于净土宗，还有龙晦《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④ 一文值得一读。作者分析了法照的词曲，释智严的《大十二时》，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无考，但据内容可断为净土宗的作品，揭示了净土宗重视民间演唱，讲求文学音乐的情况。

关于密宗，吕建福《论一行的佛学思想》⑤ 研究了密宗传人僧一行的思想，认为它的特点是融合显密不拘门户，强调各宗诸说的同一性。另有徐正英的《信行大师及其学说》⑥ 则是研究三阶教的新成果，值得一读。

2. 佛教与社会

---

① 《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文物》1983 年 6 期。
③ 《文物》1985 年 3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 3 期。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3 期。
⑥ 《殷都学刊》1992 年 1 期。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系统，要在中国社会站住脚跟，传播发展，必须取得统治者的支持，也要能为百姓接受，这就有了一个佛教与社会交流和适应的问题。政教关系，佛教与官僚士大夫的关系，佛教与下层民众及农民起义的关系，佛教的作用等等问题，都是"佛教与社会"这个大题目下的重要内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1）政教关系

唐代佛教的繁盛，颇得力历朝帝王的崇佛，但各个帝王崇佛的程度和内容各不相同。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① 探讨了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提出了唐太宗抑佛说。文章举出太宗抑佛表现有：检括僧尼，处罚名僧法琳，赞同傅奕反佛观点等。文章认为太宗所以抑佛之故，一在于崇文治，抑浮华；二在于自以为系李老君之后，故先道后佛。太宗作出的若干兴办佛事之举动，皆具有其政治作用。近年探讨唐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专论主要有施光明的《论唐代宗教政策》②、李瑾的《唐太宗与佛教》③、谢重光《唐代佛教政策简论》④。施文认为，唐代政府的宗教政策一方面扶持宗教，用以做为安宁社稷、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宗教的管理，防止对封建统治产生不利影响。这里虽不是专指唐太宗的佛教但其论断显然也适用于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李文也认为唐太宗一边限佛，一方面把佛教纳入封建纲常的轨道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李文中最新鲜见解是说唐太宗把佛教运用到战争和外交中，只是举证稍嫌牵强。谢文首列"唐太宗的佛教政策"一节，认为太宗对于佛教，既有严格加以限制的一面，又

---

① 《学衡》75 期，1931 年 7 月，又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② 《陕西师大学报》1985 年 1 期。
③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 1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3 期。

有多方加以利用的一面，限其政治、经济上蠹国害民之弊，崇其思想上的教化之功。此外李富华、董型武的《试论唐代的宗教政策》①也涉及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也是学者们深感兴趣的问题。陈寅恪《武曌与佛教》② 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之必然崇佛。文章还从东西文化政治伦理观之不同，说明武则天要革唐兴周，不能利用强调纲常伦理的儒家思想，只好转求于具有女主为王谶文的佛教经典。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③ 则认为武则天固然崇佛，然亦笃信道教，优礼道士，从其提倡读《道德经》，大写《一切道经》中可证。其登基所利用之符谶，固非专依佛教，并有道教。温玉成《武则天与龙门石窟》④ 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洛阳龙门所凿窟龛和造像的变化，论证了武则天对佛教利用多于信仰。另有贺世哲的《武则天与佛教》⑤、陈美林《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的关系——兼评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⑥ 两文，也论及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但其宗旨在于批驳“四人帮”在武则天评价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对于武则天的佛教信仰和佛教政策并未提出超越前人的资料和见解。另外，张乃翥《从龙门造像史迹看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之关系》⑦ 对武则天如何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作了具体分析。陈景富《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⑧ 认为武则天得势前把佛教作为精神依托的对象，后来在政治斗争中借佛威以壮帝威，晚年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3 期。

② 《史语所集刊》5 卷 2 期，1935 年 12 月，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③ 《光明日报》1962 年 11 月 21 日《史学》。

④ 《历史知识》1984 年 6 期。

⑤ 《甘肃师大学报》1978 年 2 期。

⑥ 《南京师院学报》1977 年 1 期。

⑦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⑧ 《五台山研究》1989 年 1 期。

推崇佛法主要是在于报恩还愿。赵云旗《武则天与唐代佛教》① 分析了武则天对发展佛教的贡献和由此给唐朝造成的隐患。

唐代帝王与佛教关系的另一热门话题是唐武宗会昌毁佛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都曾制造毁佛事件，佛教界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唐武宗的毁佛规模最大，措施最严厉，影响亦最深远。如何看待和评价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历来分歧很大。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特立《会昌法难》一节，于会昌毁佛的经过情形及其后果叙述极详。文中论述会昌毁佛原因，比较强调武宗与宰相李德裕不信佛教、深好道法；对于毁佛后果，文章批评武宗毁法未详为僧人谋生计，因而造成社会动乱，人民困乏，甚至认为不久后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山东江淮之民于短期间从之者数万，或亦与毁佛有关。解放后的多数论著不同意汤用彤的这种观点。论者多从朝廷与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来解释会昌毁佛的发动，从而对毁佛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田廷柱《李德裕和会昌禁佛》② 一文具有代表性，文章把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劳力，成为社会特权阶层，与朝廷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严重冲突作为毁佛的主因；对于毁佛的后果，则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其社会意义也比较深远。袁刚的《会昌毁佛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③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这次毁佛事件，认为毁佛是李德裕推行政治改革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对毁佛事件的高度评价。谢重光在《唐代佛教政策简论》④ 中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佛教是一种思想信仰，不可能用强制的手段加以铲除。特别是在唐代的历史条件下，佛教既然深深扎根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有那么广大的

---

① 《五台山研究》1989 年 4 期。
② 《辽宁大学学报》1980 年 5 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8 年 4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3 期。

群众基础，用暴力加以废除，适足以激化社会矛盾。而废佛之后再行兴佛，大动土木，靡费资财，到头来国家和人民不但没有从废毁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浪费了无数财富。会昌毁佛对文化的破坏更是难以估计。所以从社会效果来看，武宗的废佛，无疑是唐代佛教政策中最大的失败之举。

唐玄宗一般被认为是著名的崇道之君，马德《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①谈到唐玄宗也不放过对佛教的利用，为唐代帝王一般都是儒佛道并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

比较全面的论述唐代诸帝与佛教关系的论著，首推郭朋《隋唐佛教》一书，其第三章《唐王朝与佛教》专门论到这个问题，结论是“在唐朝二十个皇帝中，除了武宗李炎，最后反佛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佛教的（而且，多数都是非常佞佛的）。”李斌城《论唐代反佛》②一文则认为唐代不乏统治者反佛之举，并认为唐统治者反佛多为经济原因，也有出于一时的政治原因的。张弓的《“衰相现前”、崇敬人据——唐后期诸帝与佛教述论》一文，③论述了唐后期诸帝在内忧外患交逼情况下，对佛教崇也不是，禁也不是的两难处境。

（2）佛教与官僚士大夫

唐代士大夫多与佛教有密切的交往，成为一代风气。但在政治上，也有不少官僚士大夫大声疾呼排佛。对于个中真相，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加以探讨、阐述，讨论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两位文坛宗师与佛教的关系。王春庭《韩柳与佛老》④提出了韩愈一生辟佛而柳宗元一生佞佛的观点，认为韩愈以儒家思想为武器，继承傅奕的反佛传统兼及道教，排之不遗余力。柳宗元则始终主张和

---

① 《敦煌学辑刊》1983年3期。

② 《人文杂志》1981年1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92年4期。

④ 《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1期。

儒佛二家，其佞佛是一贯的，对佛教教义是笃信的。李传明不同意柳宗元佞佛的提法。他在《柳宗元与佛教》①一文中，分析了柳宗元涉及佛教的一些言行，关于柳宗元说的"求其道积三十年"，认为不能视作追求佛教信仰，而是要弄清佛道的底蕴；关于所谓柳"大量宣扬佛教的文章"，认为这些文章既有宣扬佛教教义和禅理，也有泛泛应酬之辞，还有对佛道提出疑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作者概括了柳宗元关于佛教的基本观点：1. 用儒家的政治伦理观解释佛教；2. 把佛教看作是百家学说之一，有利有弊；3. 利用佛教"以佐教化"。吴文治的《关于佛学对柳宗元的影响及其'禅理'诗的评价问题——与邓潭洲先生商榷》②一文则认为，柳宗元曾经受到一些佛教思想的影响，但他信奉佛实际上不过是他由于失败，想借此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有神的宗教论者，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这和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并不矛盾"。郭绍明、周桂钿《柳宗元佛论分析》③也再次肯定了柳宗元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哲学家，对佛学虽有所肯定，却与佛教徒信教不同。对于韩愈排佛的评价，学者们也有一些不同意见，郭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韩愈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反对佛教，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是"以儒家的破烂货来反对佛教的破烂货"；从思想上来说，"是以一种鬼神观念以对另一种鬼神观念"，因此，其反佛的勇气固然可嘉，评价却不宜过高。④

李斌城的《论唐代士大夫与佛教》⑤对于唐代士大夫佞佛的现象作了综合考察，认为"服世教，栖心空门，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就是唐代士大夫儒佛合二而一的风貌的概括写照。归根到底，

---

① 《文史哲》1984 年 6 期。
② 《文史哲》1981 年 6 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4 期。
④ 《隋唐佛教》第三章第六节《唐宪宗迎佛骨与韩愈谏迎佛骨》。
⑤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唐代士大夫的佞佛，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谢重光《晋至唐中叶门阀士族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从〈开业寺碑〉谈起》① 揭示了唐中叶以前门阀士族作为佛教寺院的社会基础的情形，说明了唐中叶前后僧侣地主和寺院经济的本质变化。

有的文章还对唐代帝王与士大夫的反佛思想作了理论上的归纳，陆华柏、徐宏林《唐代反佛理论》② 指出，唐代反佛斗争主要有如下几种理论作武器：1. 经济论，2. 忠孝观，3. 夷夏论，4. 旁门左道论，5. 经验论，6. 老先佛后论。李明友《〈广弘明集〉与隋唐初期的佛道儒论争》③ 则介绍了唐初佛教界对历代王臣兴废佛法的历史教训的总结。

(3)佛教与农民起义

佛教与下层群众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如何在下层群众中传播，下层群众如何信仰和支持佛教；二是下层群众如何识破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从而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反佛。不少论著涉及到这两个问题，但专论不多。姜伯勤的《隋末农民战争与反佛浪潮》④ 和杨讷的《评〈隋末农民战争与反佛浪潮〉》⑤ 是少数此类专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两者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姜文首先分析了隋代僧俗地主的关系，认为当时高僧与江河日下的士族有极其深广的社会联系，各寺院中形成的封建教阶制系统，是世俗士族门阀等级制在寺院内的缩写。佛教神权一方面执行巩固士族政权的牧师职能，另一方面充当了镇压农民军的帮凶

---

① 《北京师大学报》1991 年 4 期。

②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 2 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2 期。

④ 《历史研究》1978 年 2 期。

⑤ 《历史研究》1978 年 7 期。

或凶手，因此，打击士族必须打击僧侣；进而指出隋朝以佛教为正统国教，所以隋代出现的各种异教起义，具有明确的反封建、反士族的革命内容；接着文章举出隋末农民起义攻打僧侣庄堡，致使寺院庄园"通庄并溃"的事例，认为农民军把打击锋芒对准保存那个时代最落后、最反动的土地关系和奴役形式的寺庄，冲击了寺户制度；文章还比较了窦建德与刘黑闼的不同的佛教政策，认为窦建德不能抵制封建政教制度的影响，故尔不可避免要变质，要失败；刘黑闼坚持反佛政策，故尔能英勇斗争到底。杜伏威与辅公祏对待佛教态度的差异，也存在与窦、刘差异类似的情形。结论是，农民政权建立后，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对佛教势力的两种政策的矛盾，这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的阶级对抗在革命队伍的反映。同时，农民军也面临着反对为士族奴役服务的封建神权统治和终于不能最后战胜神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则植根于农民军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是农民战争局限性的表现。总的说来，姜伯勤认为隋末农民军掀起了反佛浪潮，有意识地把僧侣地主当作士族地主的同盟军加以打击，因而成为"佛寺僧侣的顽强的大敌"。杨文对此进行了批驳，认为"农民反佛浪潮"实际是不存在的。同前代一样，隋末佛教势力遭受的一定程度的破坏，来自战争及其引起的动乱，而不是来自革命农民对佛教的有意识的打击。杨文进而批评了姜文拔高人民对佛教神学的认识，以及让佛教神学决定某些起义队伍的"命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很不科学的"。

在一般涉及下层群众与佛教关系的论著中，李斌城的《论唐代反佛》① 较多地谈到下层群众（被统治阶级）的反佛情况。他认为，被统治阶级的反佛主要是农民起义毁佛寺、焚经典和镇压一些顽固反抗农民军的僧徒。但农民的反佛并非从思想上认识到佛教为统治者服务，其对于佛教的打击多为战乱所致。因此，被统治阶级

---

① 《人文杂志》1981 年 1 期。

的反佛也是不可能彻底的。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①和《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②对于佛教寺院与群众民间结社的种种关系有较深入的剖析。

(4)佛教的社会作用及其他

佛教在隋唐五代的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这时佛教社会作用的性质，却是众说纷纭，不易统一。范文澜的《〈唐代佛教〉引言》③对唐代佛教的社会作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把佛教完全看成是一种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的宗教迷信，具有多立寺庙、宣扬迷信；宗派要立、广播毒素；麻痹农民，阻碍起义的三大祸害，主张坚决地"辞而辟之"。但也有不少论著指出了佛教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全汉升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④，谈到中古(特指魏晋隋唐这一历史阶段下同)佛寺曾开展济贫赈灾、为民治病、劝戒残杀，宣传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严耕望在所著《唐代多读书山寺》⑤、《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⑥等文章中，阐述了唐代寺院在民间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对隋唐佛教的社会作用的讨论更加热烈起来，方立天在其近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⑦中，论述了佛教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作用，其中不乏积极的作用。例如他谈到隋唐佛教宗派对古代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隋唐佛学理论的内容涉及宇宙结构论、本体论、认识论、真理

---

① 《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

② 《敦煌学辑刊》1990年1期。

③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④ 《食货》1卷4期，1935年1月，见《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大陆杂志》2卷4期(台)1951年2月。

⑥ 《民主评论》5卷23(台)1954年12月。

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论、意识论、心性论等广泛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哲学思想；又论到唐代的佛教说唱文学"经变"和"俗讲"为我国的文学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而且开创了一代较为自由的新文风。如此等等，说明佛教对丰富我国思想、文化的宝库是有贡献的。谢重光在《中古寺院的社会功能》①一文中，认为中古时期，特别是隋唐时期，佛教寺院成为沟通社会联系的重要场所，犹如一座座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心，对象广泛的文化教育场所。在《中古时代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②中，谢重光进而提出中古寺院是社会文化中心的观点。

关于唐代佛教的一般论述，这里仅举出美国学者陈观胜的《中国佛教中的孝》③ 和谢重光的《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④ 略加介绍。前者考察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与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相协调，通过为佛经作注及伪造经典等办法，在教理中增入孝的观念的过程；后者考察了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特权确立、强大至衰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佛教特权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

3. 僧官制度与寺院组织

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⑤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既从纵的方面考察了佛教输入和寺院兴起、发展、强盛的历史，也从横的方面分析了寺院组织情况，财产制度以及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以及寺院堕落、衰败的情形。文章提出寺院不仅是宗教的组织，而且是政治的、经济的组织这一著名论点，对以后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何兹全还译出日本道端良秀的《唐代寺院的

① 《百科知识》1986 年 11 期。
② 《探索与争鸣》1988 年 3 期。
③ 赵红译，《敦煌学辑刊》1988 年 1、2 期合刊。
④ 《历史研究》1987 年 6 期。
⑤ 《中国经济》2 卷 9 期，1934 年 9 月。

统制组织》①，推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两大分支，一是专门研究寺院经济，对此本文将在下一节论列；一是专门研究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封建政权鉴于佛教发展、僧尼庞杂的状况，设立专官管理僧尼事务的一种制度，始创于东晋、十六国，中经南北朝而至于隋唐，其间情形多有变化。加之僧官一般由僧侣担任，既有代表官府管辖僧尼的性质，又有代表教团利益与官府交涉的一面。僧官性质的两面性和僧官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同时也使这一课题在佛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史学界的僧官制度研究蓬勃发展，有关隋唐五代僧官制度的论著如诸户立雄《论唐初的僧官十大德制》②、小田义久的《论唐初的十大德》③、滋野井恬《关于五代的功德使》④、山崎宏的《隋代僧官考》⑤、《论唐代的僧官》⑥、宝永芳三的《唐长安的左右街功德使和左右街功德巡院》⑦ 等，在史料的搜集、考订和阐释方面，都富有成果。

在中国史学界，隋唐五代僧官制度问题直到近年才受到一定的重视。白文固《南北朝隋唐僧官制度探究》⑧打破了多年的沉寂，对南北朝隋唐僧官制度作了概要的阐述，指出隋代僧官制度的新事物是改寺为道场，各置监、丞主管地方佛教事务；唐朝则撤消了中央到地方的僧务专设官署，纳僧籍管理权于中央政府，在僧务管

---

①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71－73期，1936年1月30日，2月6日，2月13日。

② 《秋大史学》16期(日)1968年12月。

③ 《鹰陵史学》5期(日)1979年9月。

④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8卷2号(日)1970年3月。

⑤ 《支那佛教史学》6卷1号(日)1942年。

⑥ 《史潮》9卷2号(日)1938年。

⑦ 《长崎大学教育化丛》30期(日)1981年。

⑧ 《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1期。

理上出现了俗官与僧官混存共管的情况。唐代又出现了管理一块特殊地区的僧官,如五台山的僧长。白文固还分析了这一阶段中央和地方僧官削弱和基层僧官强化的原因,认为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强化和隋唐佛教宗教分歧和对立所致。

谢重光的看法与白文固略有不同。他在《晋——唐僧官制度考略》①中指出,隋代的五众主,唐初的十大德都是当时的僧官。中唐以后,地方僧官僧统、僧正并行,地方僧官衙门都僧统司的僧职设置更加完备,所以地方僧官制自南北朝到隋唐不是削弱和废弛,而是加强和健全。中央僧官机构则确有削弱、废弛的趋势,但并非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强化和佛教内部宗派林立所致,根本原因在于僧侣地主阶级封建特权的削弱。

后来谢重光与白文固合作出版了《中国僧官制度史》② 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僧官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题通史。其中唐五代以前部分由谢重光撰写,对于隋唐时期和唐末五代敦煌的僧官制度的各种问题都有详细深入的论述。

4. **寺院经济**

国内学界对隋唐五代寺院经济的研究,肇自三十年代,殆至八十年代而盛,不但论著数量多,质量也越来越有提高,出现了可喜的发展趋势。回顾五十多年来这一研究园地的发展情况,拓荒之功当然仍是首推何兹全先生。他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对其时寺院已有论述,不久又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③ 对于中古(三国至中唐)寺院的生产关系作了探讨,认为其时寺院与世俗的大族一样,以种种方式分割国家的土地、劳力,组成封建庄园。寺院领民在经济上、人格上依附于寺院,与国家并无直接关系,这些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 3 期。

②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 版。

③ 《食货》3 卷 4 期 1936 年 1 月。

领民实质上就是农奴。近年来，姜伯勤、张弓、谢重光等人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寺院依附人口的研究论文，详情可参见本章第四节。

对于寺院特权的研究，是寺院经济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课题。多年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寺院与僧尼自魏晋时期取得免赋免役特权后，直至唐后期仍一成不变。(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力主此说，载《考古学报》1957 年 2 期)日本滋野井恬《唐代僧徒的税役负担》① 对此提出异议，但也只认为中叶后僧尼已有税役负担，寺院仍享有免除赋役特权。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②搜集僧俗文献和碑志中的有关资料，论证唐代寺院在两税法前须负担资课、户税、杂徭，至两税法实施后，寺院、僧尼均丧失了免纳正税的特权，仅存免役特权。在《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③一文中，谢重光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申论，补充了若干新的材料。这一新观点，已引起学界注意，有些学者在其新著中对唐代佛教经济特权问题已据此作了新的表述。

不少文章讨论了寺院的财产法和寺院经营的情形。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④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⑤本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论述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中财产关系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对于寺院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文章把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法的诸规定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指出僧尼生活在私有财产制的关系之中，必然由抗拒私有财产到堕入私有财产制的罗网。这种方法，为了解寺院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和特点提供了一把钥匙。谢重光

---

① 《大谷学报》56 卷 3 号(日)1976 年。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 1 期。

③ 1987 年 6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82 年 1 期。

⑤ 《北京师大学报》1982 年 6 期。

在《关于唐后期至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① 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沙州的僧尼私有经济，就是受到何兹全关于寺院财产法的论述的启发写出来的，同时，它也为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法的诸多规定提供了一个实例。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论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的碾硙经营》② 是最早论述寺院经营情形的一篇名作，文章注意到敦煌寺院使用硙户经营寺有的碾。姜伯勤的《敦煌寺院碾硙经营的两种形式》③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敦煌寺院的碾硙经营存在多种形式，雇工经营和出租经营都在碾硙经营中得到运用，从而把此项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唐耕耦的《伯二〇三二号甲辰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计会稿残卷试释》，④ 对于破裂分散的计会稿作了整理缀合工作，弄清了诸色入破历计会稿的编制顺序，从面对了解敦煌寺院的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

有些文章则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寺院的寺院经济情况作了分析。白文固《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⑤ 把唐前期的寺院经济视作一种宗教性的集体占有制经济形式，探讨了这种集体占有制经济不同于一般地主经济的若干特点。谢重光《麴氏高昌寺院经济试探》⑥ 则解剖了五至七世幻吐鲁番盆地寺院经济的实况，从寺院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寺院经营的门类和方式到寺院、僧尼的赋役负担，都作了阐述，还分析了该时该地寺院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为研究寺院经济的一般情况提供了一个例证。荆三林的《〈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所表现的晚唐寺院经济情况》⑦

---

①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东亚经济论丛》1 卷 3、4 号，1941 年；2 卷 2 号，1942 年(日)。
③ 《历史论丛》第三辑，齐鲁书社，1983 年版。
④ 《敦煌吐鲁番文集》，敦煌吐鲁番北京资料中心编，1988 年。
⑤ 《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 4 期。
⑥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 1 期。
⑦ 《学术研究》1980 年 3 期。

是目前仅见的一篇具体考察一个寺院兼并土地，构成庄园过程的文章。文章用具体的资料说明了两税法实施前后寺院兼并土地形式的不同，为研究两税法前后寺院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此外，白文固的《唐代僧尼道士受田问题的辨析》① 辨明了唐代均田令关于僧道受田令文的制定时间，以及这条令文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意义；谢重光《唐代的庙市》② 考述了唐代中期以后在一些中心寺院周围形成庙会和庙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交易活动情况，填补了中国庙市史研究的一段空白。这些都是寺院经济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新课题。张弓开拓了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他的《唐代禅林经济简论》③论述了唐后期开始对于南方山区的开发及其深远意义；《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④ 论述了中古(魏晋至五代时期)寺院地主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皇权及世俗地主阶级，具有非自主发展的特点，又将中古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分作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其特点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姜伯勤后来将其一系列关于敦煌寺院经济的论文发展为专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⑤，谢重光则将其一系列关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寺院经济和教团管理、政教关系的论文修订充实，结集为《汉唐佛教社会史论》⑥出版。这两部书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隋唐五代佛教寺院经济和相关问题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港、台地区的隋唐寺院经济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① 《社会科学》(甘肃)1982 年 3 期。
② 《文史知识》1988 年 4 期。
③ 《学术月刊》1987 年 9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 3 期。
⑤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⑥ 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绩。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①]博采众长，熔为一炉，是台湾隋唐寺院经济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从中可以窥知台湾学者的治学风格以及与大陆学者不同的学术视野。

5. **佛教的传播**

佛教向中国边疆地区的传播，是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但业已取得不少成绩。杨铭锐《唐代佛教密宗在云南的传播》[②]根据云南考古发现的佛教文物，证以有关文献资料，提出唐代云南佛教主要传自中国内地，兴起于晚唐的南诏后期，密宗是当时云南的主要佛教教派，传布范围限于羊苴咩(今大理)附近，兼及昆川(今昆明)地区。黄惠焜的《佛教中唐入滇考》(《云南社会科学》82年6期)则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应在中唐，传入路线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即今缅甸)，其佛教构成虽以密宗阿吒力派为主，但也有其他僧人活动，不限于密宗。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又有两篇研究成果发表，其一是侯冲《从张胜温画〈梵像卷〉看南诏大理佛教》[③]，认为佛教传入南诏有自中土、自印度和自西藏三条主要路线；南诏大理佛教是由阿比力教、禅宗和华严宗三个教派构成的。其二是美国学者约翰·马可瑞(John. R. McRae)的《论神会大师像：梵像与政治在南诏大理国》[④]讨论了《梵像卷》中神会大师像的来历及相关问题。研究佛教在新疆传播情况的论著主要有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⑤]耿文认为，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佛教就已传入南疆的和田地区，后来南疆盛行的佛教大小乘学派都有。孟文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九世纪晚期至十世纪初左右，佛

---

① 《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三十三，(台)1971年。

② 《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年1期。

③ 《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3期。

④ 谭乐山译文载《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3期。

⑤ 《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2期。

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并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中叶左右。高昌佛教文化深受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两者在信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其相近；但由于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高昌佛教还受到其他许多地区的影响。关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王尧《吐蕃佛教述略》① 是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认为在拉脱脱日年赞时（五世纪中叶），由于偶然的因素，有人把梵文佛经带到西藏，无人认得，被秘密收藏起来，未发生过任何影响；松赞干布时期（七世纪初·中叶）佛教通过两位妃子分别从唐朝和泥婆罗带到西藏，但未真正打开局面；真正开始佛教活动并且产生了影响，那是在赤松德赞普的时期（八世纪后期），因为，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才在西藏高原上修建了真正的佛教寺院，才有了藏人出家为僧，建立了僧团，才大规模而系统地翻译了佛教经典。阿沛·晋美《论赤松德赞时期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② 也认为汉地佛教在吐蕃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形成压倒其他佛教教派的形势，是在赤松德赞时期。但在赤松德赞后期，汉地佛教由盛而衰，主要原因是印度佛教比汉地佛教更适合吐蕃社会，当两教水火不容时，为择善而从，选择了印度佛教。此外还有昂巴的《浅谈佛教的入藏及社会作用》③，认为佛教入藏是吐蕃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大统一的结果，也适应了松赞干布巩固统治的需要。

佛教传播的问题，还包括某种特殊信仰传播的情况。杨曾文《观世音信仰的传入和流行》④即对在我国影响较大的观世音菩萨信仰的传入和流行作了系统的阐述，介绍了佛经中各种不同观世音的形象和神话，并考察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信徒祈求观世音拯救

---

① 《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4 期。

③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 2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 3 期。

的思想动机。其中论及进入隋唐以后，观世音信仰开始涂上密教的色彩，而观世音形象女性化开始于宋代，都是饶有兴味的。郭绍林的观点略有不同，他在《论唐代的观音崇拜》① 中说，观世音菩萨在唐代已经大致定型为女性，文章还分析了唐代观音崇拜的几种不同类型，以及观音与皇权的关系。

杨曾文又著有《唐宋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一文，② 论述唐宋时代在最高统治阶层支持下五台山成为全国和亚洲文殊信仰中心的情形。

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九华山地藏菩萨和峨嵋山普贤菩萨的研究又蓬勃开展起来。

6. **佛教文化艺术**

本题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成果也多，这里只能择要作一概述。

(1)佛教文学、音乐

为了加强传教布道的效果，天竺佛教很重视把通俗的文学和音乐形式运用到佛教活动中。在佛教东传的过程，天竺的以至西域的佛教通俗文学和音乐随之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文学、音乐内容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佛教文学和音乐。罗振玉、郑振铎等于此都作过研究，尤以向达的开拓之功为多。向达《唐代俗讲考》③分为叙言、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六节，于俗讲的内容、形式和源流论述至为详悉。向达又有《论唐代佛曲》④ 一文，钩稽唐代佛曲，考其来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3 期。

② 《五台山研究》1990 年 1 期。

③ 《国学季刊》6 卷 4 号，1950 年 1 月，又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④ 《小说月报》20 卷 10 号，1929 年 10 月，又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源，并申论佛曲与俗文、变文不同，纠正罗振玉等在这方面的错误认识。胡士莹《唐代民间、宫廷、寺院中的说话》①也论到俗讲，认为俗讲是三教论衡释家的一支，故其兴起当不会早于开元以前；俗讲受到歌唱方面传统的影响，因此有一定的仪式，音乐成份加强了；俗讲在中晚唐的盛行，甚至职业性的女艺人也从事讲唱，正反映了它的群众性和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阴法鲁《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②关于唐代寺院中音乐活动的论述，主要论及其内容包括器乐、歌唱、表演杂技和舞蹈，水平很高，可以引起官府艺人的对抗；又指出唐代寺院中宗教和音乐活动的开展，是和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的。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③，比较具体地考察了中国佛教音乐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共四节，涉及隋唐五代的为第三、四节。第三节论证南北朝之后至初唐，已有大批汉族艺僧的出现。他们的杰出伎艺，是佛教音乐华化、繁荣的基础，也是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四节分析了唐代佛教音乐充分繁荣的三个特征，指出中国佛教音乐全面华化的完成已基本实现。同时作者还结合史料与不同地区的几个谱例，提出唐代佛曲至今仍存在的设想。

肖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④，探讨了韩孟诗派在人生态度和诗歌思想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问题；前苏联学者叶马克的《论王琰的〈冥祥记〉和佛教短篇小说》，⑤ 以唐人王琰的《冥祥记》为例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此外，与本题相关的论文还有杜斗城的《地狱变相初探》⑥，金丹元的《禅意开悟与唐

① 《光明日报》1963年3月24日。

② 《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3期。

④ 《江海学刊》1992年4期。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3期。

⑥ 《敦煌学辑刊》（兰州大学）1989年2期。

宋神韵》,[1] 左剑虹《禅宗与中国古典山水诗画的发展》[2] 等等。

(2)佛教建筑、雕塑、绘画

这方面的出色之作当推梁思成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3]。本文通过对唐五台山佛光寺和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在建筑风格和技艺上的异同,说明了唐代佛教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日本建筑的巨大影响。论及隋唐佛教雕刻的则有常任侠《佛教与中国雕刻》,[4] 文中论龙门石刻造像的特点,认为除继承印度技法外,"更能融和传统的艺术,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可以说雕像艺术,最初吸收了印度的方法,到这时才完成了中国自己的风格。"并强调"魏以后隋唐的制作,愈益显示出优秀的民族作风。论佛教绘画的重要论文有常任侠的《佛教与中国绘画》和无住的《禅宗对我国绘画之影响》。[5] 常文认为,中国画坛上佛教艺术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文章取敦煌千佛洞保存的唐代壁画为例,论证了隋唐以来佛画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特点,认为这时佛画更多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技法,逐渐与印度传来的风格相远,表现了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和独具的作风;也通过一些故事性的情节,表达了生活中的欢乐与希望,爱情与苦难,表达了极大的忍耐、镇静、牺牲的种种精神生活。无文论王维受禅宗思想影响,作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为画家开一新境界,成为文人画的开创者。此文所论画家心灵上的修养,使绘画领域开拓、技术充实、理论系统化,都是禅宗昌盛的直接后果,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何劲松《禅与书法艺术》[6] 探讨了禅与书法

---

① 《上海文论》1990 年 6 期。

② 《社会科学家》1991 年 3 期。

③ 《现代佛学》1963 年 5 期。

④ 《佛教国文化》,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⑤ 两文同载《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⑥ 《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 1 期。

的密切关系，提出了"禅为书之体，是书法的创作源泉；书为禅之用，是禅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之一"的观点。

对于石窟寺的研究，研究石窟寺的建筑、雕塑、绘画是其重要的内容。敦煌研究院、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陕西凤翔法门寺等单位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其研究成果散见于《敦煌研究》等有关刊物，近年又有《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① 和《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集》② 等论著问世。其中《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一书，是目前论述中国石窟艺术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同时涉及隋唐五代的部分最多的一部专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佛教与史学、佛教教育、佛教通俗文化活动等问题，重要文章有牛致功《唐代史学与佛教》③、宋大川《略论唐代佛寺的儒学教育》④、张捷《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⑤ 罗华庆《9 至 11 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⑥ 等。

(3)佛经翻译与佛教文献研究

关于隋唐时期之译经，汤用彤的论述最为详悉精到。在《隋唐佛教史稿》第二章《隋唐传译之情形》中，总结了隋唐译经所以佳胜之四因：①人材优于前代；②原本完备于前代；③至隋专设译院，译场组织渐备；及至唐代，制度益臻完密；④翻译律例进步。对于隋唐时期著名的译经大师波颇、玄奘、义净、不空的业绩和特点，汤著亦多有论列。把译经与当时的政治乃至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讨论的则有任继愈《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此文比较了魏晋南北朝的译经和隋唐的译经，

---

① 温玉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编。

③ 《陕西学报》1991 年 4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4 期。

⑤ 《东北师大学报》1990 年 1 期。

⑥ 《敦煌研究》1988 年 4 期。

认为前者译经质量较差，但译本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后者翻译质量提高，影响反而差了，甚至没有什么影响，这说明了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魏晋南北朝的翻译是力求为它当时的基础服务的，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尽管译文有些蹩脚，还是起了不小的影响；隋唐译经只做到忠实于印度佛教的介绍，而没有做到密切配合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所译不可能有大影响。此外王亚荣《略论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①、曲军铮《玄奘在翻译上的贡献》② 也对唐代佛经翻译的有关情况作了总结和评述。

在佛教典籍的研究方面，论著亦多，成绩斐然。胡适《坛经考之一：曹溪大师别传》③是他考证禅宗典籍的系列著作之一，考出《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这一结论对于研究隋唐佛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汪向荣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考》，④ 对于该书的正式书名、撰者、刊本及资料来源考证详悉，为研究鉴真事迹及中日佛教的交流提供了方便。王尧、陈践的《蕃占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1001 藏文写卷试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2 期），通过对这一唐代藏文经典的译释，阐明了敦煌一地佛教繁荣昌盛的客观原因。郭朋的《坛经校释》⑤、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⑥ 是近年来佛典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后学者使用此种经过精心考释的本子，可免许多迷误。最近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⑦是《坛经》整理和研

---

① 《人文杂志》（陕西）1994 年 2 期

② 《光明日报》1994 年 7 月 11 日 3 版。

③ 《胡适论学近著》第 1 集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④ 《历史学》1979 年 2 期。

⑤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⑥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究的最新成果；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译注》①、印明仁岩的《〈金刚经惠能注〉和〈金刚经六祖口诀〉评析》②、陈士强《佛典精解》、③方广锠《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④王邦维《义净和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⑤ 都是佛典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

佛经目录是佛教典籍的一种专门文体，记述了佛典的渊源脉络，为译经史、撰述史的重要资料。陈士强《〈大藏经〉十五经录评议》⑥通过对《大藏经》中保存的自梁代至南唐十五家经录（除梁僧祐《出三藏记录》外，都是隋唐五代作品）的对比条析，考评它们的义例结构和得失因革，介绍了汉地佛教经录发展的崖略。

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成绩卓著，其中对于中国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杨曾文《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⑦对之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学者若欲寻究日本研究、整理中国禅宗文献的详情，此文实为有用的指南。

7. 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自天竺传入我国，又从我国传向新罗、日本等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文化多层多向的交流。方立天《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与融合》⑧对佛教和我国传统哲学的交流，即印度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交流情况作了概括的阐述。他认为，佛教传入，从汉到唐，大约八百年的漫长过程中，与中国传统

---

① 《法音》1990 年 7 期。
② 《浙江佛教》1995 年 1 期。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⑤ 《文献》1989 年 1 期。
⑥ 《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
⑦ 《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
⑧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1 期。

哲学既冲突又融合的错综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依附、抗衡和排击三个阶段，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传统哲学对外来佛教的影响、排击和吸收三个阶段。结果是佛教思想日益民族化、中国化，并大大推动了传统哲学的发展；传统哲学则吸收佛教哲学思想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形成宋明理学，从而实现了成功的文化交流。

汤用彤的《〈唐贤首国师墨宝〉跋》①则追述居人法藏与海东新罗人义湘同学于中国天水赵氏至相和尚之门，其后法藏在中国开创华严宗，义湘回新罗成为海东华严初祖的历史，揭示了唐代中国与新罗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段因缘。

贾正中《隋唐时期中日佛教艺术的交流》、②汪向荣《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③、卞孝萱《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④、武陵子《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空海》⑤、苏晋仁《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⑥、苏渊雷《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⑦、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⑧、杨曾文《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⑨、陈景富《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⑩ 等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了隋唐时期中日、中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筑、雕塑、

---

①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②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 3 期。
③ 《世界历史》1979 年 4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80 年 1 期。
⑤ 《人物》1985 年 1 期。
⑥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 5 期。
⑦ 《学术月刊》1988 年 5 期。
⑧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⑨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⑩ 《人文杂志》1994 年 2 期。

绘画、诗歌、散文、语言、文字、书法、医疗等文化成果都对日本和朝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在这一文化交流中，中、日、朝三国的僧侣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黎小明的《广州与古代僧人的海外往来》[1]对于隋唐时期僧人经广州进行海外往来的情况亦多所涉及。其中有中国人经海路向南亚、印度求法者，也有波斯、印度和南亚僧人经海路来华传教者。作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僧侣的媒介，中外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双向的交流。

（二）道教

相对于隋唐五代佛教的研究来说，隋唐五代的道教研究要薄弱得多。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改变隋唐五代道教研究的落后面貌，但也还只是一个开端，有关的论著仍然不够丰富。这里仅能将所见论著举其要者作一简括的介绍和评价。

说到道教研究，不能不提起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陈氏"病道书记载缺略，源流不彰"，留学德国时即捃集史料，汇辑长编。返国后又于极困难条件下，对于各种资料搜罗访录，续加补苴，撰成是书，"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版，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其功力之勤，搜讨之富，实前此未睹也。"[2]书中不但对唐代的道教典籍的撰述、收藏、流行、焚毁情况多所考敷发明，且有《道乐考略稿》一篇，于唐人《华夏赞》、《步虚词》二种之性质，及所有乐器之情形，详加阐述。故此书对一代道教的研究，亦有开拓奠基之功。

继陈氏大著之后，道教通史性质的著作已出版多种，其中都有

---

① 《海交史研究》(福建泉州)1986 年 1 期。

② 罗常培:《道藏源流考序》,载《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 年版。

相当篇幅论及隋唐五代的道教。如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①其第二卷即论述了隋唐五代北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及其与封建政治的关系,道教学者在唐宋时代的相继出现和道教理论的发展,隋唐五代北宋道教与儒佛的关系。任继愈主编、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诸同志合著的《中国道教史》②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隋唐五代的道教。

论述隋唐五代道教一般状况的论文,比较重要的有李斌城的《论唐代的道教》。③此文列举了唐代统治者崇道的种种措施,认为唐代道教所以兴盛,即在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唐统治者所以大力扶植道教的原因有四;①道教徒曾向李渊父子密告灭隋立唐符命;②唐皇室与太上老君联亲,利用道教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③统治者借道教求长生不老;④借道教求长生不老还论及唐代的佛道之争,认为二者形式不同,本质一样,其斗争是为了争权夺利,最后都受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

潘桂明《唐初佛道之争的实质和影响》④则是关于唐初佛道斗争的专论,认为这一时期"佛道之争实质上是在儒家思想(通过王权)支配下佛、道两教自觉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宗法体制的共同努力。"

学者们对于隋唐五代时期最高统治者与道教的关系给予较多的关注。李刚的《隋文帝与道教》⑤一文,认为隋文帝适当扶持道教主要是为了纠正前代宗教的偏颇,同时也利用道教符识为自己夺天下坐天下作神学证明。他的《唐太宗与道教》⑥一文,认为唐太宗

---

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山东师院学报》1978 年 6 期。

④ 《安徽师大学报》1990 年 1 期。

⑤ 《福建论坛》(文史版)1992 年 1 期。

⑥ 《晋阳学刊》1994 年 5 期。

利用道教“静”和“无为”的思想治天下，也利用认老子为祖宗提高皇室的门第和权威，当然也有平衡佛道、调和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此外，高世瑜的《唐玄宗崇道浅论》①对唐玄宗崇道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评述，认为玄宗即位前的佛、道活动，一半是由于处境造成，一半则是出于策略；即位后的崇道则是出自政治需要，即利用道教振兴屡遭蹉跌的李唐王朝。关于唐玄宗崇道的内容，认为前期除了借用道教旗号外，主要侧重利用道家思想治国；后期则把主要兴趣和精力完全转移到宗教迷信活动方面了。这种变化与他政治作为的前后变化是一致的。文章还对玄宗崇道心理和行事前后变化的深层原因作了分析，认为那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曲折反映。

李斌城的《敦煌写本唐玄宗〈道德经〉注疏残卷研究》②专门讨论了唐玄宗注《道德经》的问题，肯定敦煌文书伯 3725 号《道德经》注是唐玄宗亲注，注成年代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并认为此注有一定水平，其特点为对经义理解比较准确，处处从治国理民的政治角度加以概括。《道德经》疏伯 3592、伯 2823 和斯 4365，三写本源于同一底本，但非同一抄本，疏当是十卷，撰于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前。最后，文章分析了唐玄宗注疏《道德经》的目的，认为是出于治国理民的需要，但在开元末年以后，以其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朝政腐败，危机四伏，他多次将其亲自注疏的《道德经》颁行天下，则是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其统治。

陈智超对唐玄宗《道德经》注完成的时间及《道德经》注的标准本问题，不同意李斌城的看法，发表了《唐玄宗〈道德经〉注诸问题》③提出商榷。为此李又撰《读〈唐玄宗〈道德经〉注诸问题〉——

---

① 《历史研究》1985 年 4 期。
② 分见《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1988 年 3 期，1989 年 4 期。
③ 分见《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1988 年 3 期，1989 年 4 期。

答陈智超同志》,① 就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对于隋唐五代道教的理论，萧萐父《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②作了简要的概括。文章认为，汉代从民间兴起的符水道教，到逐步变为上层的金丹道教，均与老庄思想没有直接关系。到隋唐时期，道教面临理论化建设任务，因而产生了对老、庄玄言论的吸取和选择问题，标志着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理论建构中，既吸收了儒、佛，更依托道家，使道教从低层次的粗俗的宗教形态发展为高层次、有教养的系统理论形态。文章概括了隋唐道教进行理论化建设的三个方面：首先，道教开始占领老庄玄学阵地，大兴注老解庄之风；其次，着力融摄佛教的思辨成果；最后，道教理论化的后期发展，日益趋向于兼并包容在三教融合的思潮之中。

对于道教人物的研究，讨论最多的是唐代道教重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玄英。李刚《略论成玄英的重玄思想》③ 从分析成玄英思想的基本范畴入手，认为其思想体系主要是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的结构而成，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核心是人生哲学，是人的生命问题。日本学者中坞也评论分析了成玄英的“一中”思想，认为成玄英是从三教有关思想中吸取养料构建其道教教理的。④ 赵宗诚则着重分析了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在《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⑤一文中，指出“重玄之道”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虽有某些合理成份，但难放射应有光芒。其重玄思想基本是道家思想，对儒释有吸取也有贬抑。王志忠《成玄英的重玄之道与佛教中道观》一文则认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是道佛

---

① 分见《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1988 年 3 期，1989 年 4 期。

② 《海南大学学报》1991 年 1 期。

③ 《四川大学学报》1992 年 4 期。

④ 中坞隆藏《成玄英的“一中”思想及其背景(隋唐时期道中道观)》，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

⑤ 《中国哲学》第 11 辑。

融合产物，其"双遣两边，妙体一道，物我齐观，境智两忘"思辨方法，因道佛差异而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它的确丰富了道教哲学。

学者们还对李荣、张果、吕洞宾、陈抟、司马承祯、吴筠等著名道教人物作了研究。主要文章有黄海德的《李荣及其〈老子注〉考辨》① 和《李荣〈老子注〉重玄思想初探》②、孟乃昌《张果考》③、李裕民《吕洞宾的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④；马晓宏《吕洞宾神仙信仰溯源》⑤、卢国龙《吴筠生平事迹著作考》⑥、《司马承祯的自然人性论》⑦、冯可珠《司马承祯、吴筠及其道德思想》⑧、李远国《陈抟籍贯小考》⑨、羊华荣《关于陈抟的籍贯》⑩ 等。其中关于吕洞宾的研究最令人感兴趣。

吕洞宾是老百姓乐道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信仰在民间道教信仰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民间一般流传吕洞宾为唐代人。马晓宏《吕洞宾神仙信仰溯源》对吕洞宾其人出现的时代及其神仙故事的流传作了考察，叙述了吕洞宾信仰的形成过程以及对后来全真道南北宗的影响。作者认为，吕洞宾约为五代时人，其神仙传说在北宋时期越传越广，与钟离汉传说结合起来形成钟吕授受之说。文章推测其神仙故事的流传原因有三：一是把吕洞宾传说与唐代吕翁故事和吕仙信仰联系起来，遂成吕洞宾为唐代人之说；二是其神仙传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4 期。
② 《宗教学研究》1988 年 2—3 期。
③ 《宗教学研究》第 1 期。
④ 《山西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 3 期。
⑥ 《中国道教》1990 年 4 期。
⑦ 《东南文化》1994 年 2 期。
⑧ 《上海道教》1992 年 4 期。
⑨ 《中国史研究》1982 年 2 期。
⑩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2 期。

说日盛，有人遂假其名以骇俗；三是好道者为神化其人，把前代神仙传说附会于吕洞宾。李裕民的文章认为吕洞宾是五代宋初人，祖籍关中京兆，旧说是唐吕渭的孙子，河中永乐人，不合事实。《钟吕传道记》是金代道士伪作，托名唐人施肩吾。故此以往道教把吕洞宾列为著名领袖，把“钟吕金丹道”的形成作为唐五代出现的新教派，这样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改写。

龚杰《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及其影响》① 一文，则考察了唐代长安的道士群体，揭示了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学术的相互关系，说明道教对唐代的大一统和长安的学术界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道教经典作于或可能作于唐五代时期的有《无能子》和《道教义枢》等。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② 中，考证出《无能子》是唐末农民大起义上的一部特殊著作，作者属中间偏左隐者，是唐代三教以外特殊思想家。其哲学本质上与正宗封建统治思想相对立，其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带有很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朱越利《试论〈无能子〉》一文③ 则认为该书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剧烈转折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宇宙观、名教与自然观方面的思想矛盾，并带有三叠中的时代特征。关于《道教义枢》，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考定作者孟安排为武周时道士，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也肯定了孟安排为唐代人，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④认为“这部分很可能是唐初的作品”，他们都否定该书自称孟安排生于宋梁之间的说法。

道教方术和修炼方法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金正耀《唐

---

① 《西北大学学报》1993 年 3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1 期。
④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8 年版。

代道教补丹》[1] 一文认为，唐代奉《周易参同契》为圭臬，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烧炼金丹，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主要有：一、自然还丹之说，二、临炉炼丹火候掌握的直符理论，三、关于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文章又论述了唐代丹道主要流派，以及从外丹转向内丹探求的趋势和原因。此外不少文章以内外丹关系和内丹发展阶级，其中都有隋唐五代的内容。而卢国龙《试析张果内丹道的思想奥秘》[2]、牟钟鉴《道教内丹经典〈黄庭经〉》[3]则对有关的专人或专书作了研究。

关于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近年来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谈道教与文学关系的文章，论文有孔繁《李白和道教》[4]，认为道教的情致对于李白的诗歌艺术上的成就起了重要作用。李刚《李白与道士之交往》[5]，认为李白与道士交往，为其创作和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反映道教对文士创作的重要影响。专著方面，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6]也论述了道教对古典文学的影响，认为它主要表现在道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神奇谲诡瑰丽意象，并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述了道教与音乐、道教与绘画的关系，虽不专指隋唐五代而言，但对隋唐五代也是适用的。

研究道教传播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7] 文章用与典型道教符、咒比较的方法，肯定了1959年10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303墓内发现的符录确为道教符录；然后又将此件道教符录及其他有关的一些现象综合起来看，

---

① 《历史研究》1990年2期。
② 《中国道教》1989年4期。
③ 《百科知识》1986年6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4期。
⑤ 《宗教学研究》1988年2—3期。
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⑦ 《文物》1981年1期。

推断最晚在高昌麴朝时期，道教已在高昌地区流传。另有刘家琳《两件反映道教内容的邛窑瓷碗》①则以出土实物印证了文献关于唐代四川邛崃地区是道教势力强大地区的记载。

学者们还利用丰富的敦煌资料，对敦煌道教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其中重要的文章有姜伯勤的《〈本际经〉与敦煌道教》②，汪泛舟、徐相霖《古敦煌宗教考述》③，龙晦《论敦煌道教文学》④，孙其芳《〈云谣集〉概说》⑤、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⑥

（三）摩尼教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 Mani(216-277?)所创立的一个宗教，在古代中世纪的一千余年中，曾在中亚、小亚、北非、欧洲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地区流行。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唐初，经过曲折的传教活动，摩尼教在唐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摩尼教寺院被唐人视为三夷寺之一。本世纪中国学人最早详细介绍摩尼教教义的是许地山，而对该教入华传播史的研究，奠基性的著作是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⑦和冯承钧所译法国人沙畹伯希和撰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⑧八十年代，林悟殊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对于传统观点多所更新，他的《摩尼教及其东渐》⑨ 是他研究成果的总

---

① 《文物》1984 年 10 期。
② 《敦煌研究》1994 年 3 期。
③ 《宗教学研究》1989 年 1－2 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 3 期。
⑤ 《敦煌学辑刊》1988 年 1－2 期。
⑥ 《兰州大学学报》1982 年 1 期。
⑦ 《国学季刊》1 卷 2 期，1923 年，又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信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
⑨ 中华书局，1987 年版。

结，甚至也可视为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下面我们以述评的形式对本世纪以来摩尼教在唐五代的传播史研究作一回顾。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① 介绍了摩尼教的教义、教团生活和忏悔仪式。根据作者自述，“大部分是从欧美学者底著作撮译出来底。”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是全面研究摩尼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奠基之作，其开头几章考述了摩尼教在唐五代的传播情况，认为摩尼教入华始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天宝之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回鹘。回鹘为摩尼护法，至德后回鹘在中国得势，故摩尼教挟其势而迅速传播。由于摩尼在唐代有可慕之势，至道教依托摩尼教。唐末回鹘败于黠戛斯，摩尼教徒遂大受其影响。至会昌五年毁佛，摩尼教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林悟殊《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② 不但对摩尼的思想体系——二宗三际论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阐释，认为其核心是善恶二元论，而且探讨了摩尼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认为摩尼在创立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时，确实吸收了不少其他宗教的思想资料，只是他的体系毕竟是当时波斯社会的特定产物，因此，摩尼的二宗三际论有其一系列的特点，摩尼教也并不象传统看法那样，是一个多种宗教的混合物。

摩尼教在我国留下的经卷，有从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中捡出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卷，是研究摩尼教在我国早期传播情况的重要文献。这三部残卷均被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分别名为《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过去国内

---

① 《燕京学报》3期，1928年6月。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3期。

外学者曾加以校录和研究，但问题和疑点仍多。林悟殊亦据原件照片，参考前人成果，重新加以校录，并发表了研究论文。它们是《〈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①，否定了陈垣关于这可能是延载元年(694)波斯摩尼僧献给武后的《二宗经》的推测，而推断此经可能即摩尼八部经典中的第五部《钵迦摩帝夜部》，译云《证明过教经》；《〈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产生》②考定该经并非中亚摩尼教经的汉文译本，而是唐玄宗时代在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撰写的一个解释性文件；《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③ 判定《下部赞》是一篇译作，翻译年代上限为唐大历三年(768)，下限为会昌二年(842)，即《下部赞》是唐代后期译出的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诗。

新疆曾经是摩尼教盛行的地区，黄文弼在新疆考古时曾发现一份极为珍贵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书，时间为九——十一世纪。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④ 将此文书译成汉文，并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书反映了摩尼教寺院占有土地，享有种种特权，对寺院依附农户进行残酷剥削的情况。林悟殊也利用考古资料，对摩尼教在回鹘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⑤ 一文中，他对八、九世纪摩尼教在回鹘复兴并被奉为国教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八世纪中叶后回鹘社会急剧封建化，要求有一个较完善的宗教来加强其统治，摩尼教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同时，回鹘汗廷依靠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通商致富，因而在国政和宗教信仰上不得不受其左右。这两点是摩尼教所以成为回鹘国教的根本原因。在《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

---

① 《文史》21 辑，1983 年。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 3 期。

③ 《文史》22 辑，1984 年。

④ 《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

⑤ 《宗教研究》1984 年 1 期。

建化》①一文中，他认为摩尼教的封建化与它在高昌回鹘取得国教地位有关，更主要的是回鹘人到了高昌后，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下，过起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大大加速了高昌的封建化，也为当地摩尼教的封建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关于高昌摩尼教封建化的内容，作者提出，当时高昌的摩尼教寺院实际是经营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庄园。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使摩尼教演变为封建宗教，集中表现在教会组织上，把原来朴素的“五级仪”变成封建教阶制。英国学者刘南强的《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②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摩尼教于八世纪时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崇信和庇护，地位发生变化，从而放松了苦行主义，转而积极参与了社会和经济生活。

林悟殊又有《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③，《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④ 两文提出了在唐代以前，摩尼教已传入中国内地；唐代中国流行摩尼教，并非直接来自摩尼教的发祥地、古波斯巴比伦一带的摩尼教团，而是来自中亚摩尼教团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新观点。

摩尼教在唐代传播时如何与中国原有的佛、道二教发生关系，这也是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林悟殊在《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产生》一文中，已谈到摩尼教依托佛教的现象；在《〈老子化胡经〉与摩尼教》⑤一文中，他又推出“《老子化胡经》吸收了摩尼教的思想材料，后来又为摩尼教所利用，两者（笔者按：此指道教与摩尼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密切的联系”的新说，而不同意陈垣主张的因摩尼教有可慕之势，以致道教依托摩尼教的说法。

此后孙振玉、钟进文、杨富学、牛汝极、刘铭恕等人也加入了摩

---

① 《西北史地》1984年4期。
② 译见《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1期。
③ 《文史》18辑1983年。
④ 《文史》23辑1984年。
⑤ 《西北史地》1984年4期。

尼教研究的行列，壮大了摩尼教研究的队伍。孙振玉在《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对〈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一文① 中，考察了高昌回鹘摩尼教教会组织机构和寺院分布的一般状况及其寺院经济情况，认为随着高昌回鹘社会的封建化，摩尼教也已经封建化了。

杨富学、牛汝极对孙振玉上述论文的某些观点有不同意见，他们合写了《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②，主要就高昌回鹘摩尼教的组织机构，高昌有几个摩尼教寺院及高昌摩尼教寺院经济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看法。从孙振玉、杨富学、牛汝极等人的商讨文章中，我们看到对于唐五代摩尼教的研究，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利用有关回鹘文文献资料，而且一种坦诚争鸣的风气正在兴起。这两点，对于是摩尼教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钟进文《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一文③，着重论述了摩尼教的重商特性，认为甘州回鹘在摩尼教的旗帜下积极发展贸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刘铭恕《有关摩尼教的两个问题》一文④，提出了摩尼教白衣白冠习俗是效法回鹘，并新生回鹘而来的观点。钟、刘这两篇文章，把摩尼教研究的领域拓展到经济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层面，饶有意义。

（四）祆教

祆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源于波斯，也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外来宗教。国内学界对于隋唐祆教的研究还很寂寞。二

---

① 《西北史地》1988年3期。
② 《西北史地》1992年4期。
③ 《西北史地》1992年1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3期。

十年代陈垣的《火祆教入中国考》[1] 是国内火祆教研究的拓荒之作，其涉及隋唐者为：第四章，唐初祆字之创见；第五章，字书祆字之增入；第六章，唐时典籍称之略例；第八章，唐代火之尊崇；第九章，火与大秦摩尼之异同；第十章，唐宋人对火之识别；第十二章，唐季火祆之厄运并宋代之残存。主要观点有"唐代之尊崇火祆，颇有类于清人之尊崇黄教，建祠设官，岁时奉祀，实欲招来西域，并非出自本心。"又谓唐代火祆并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会昌废佛时，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与大秦，遂同被排斥。

近年王素在陈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高昌火祆教的流行情况进行了探索。在《高昌火祆教论稿》[2] 中，他认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已有火祆教流行，并有一批汉民教徒。及至高昌国时，效法中原王朝严禁汉民信奉火祆教，设置了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专职官"萨薄"，主要以汉人充任。原来的汉民火祆教徒被迫改奉佛教，但仍以"奣"或其他象征光明的字为名，表示自己本来信奉火祆教。史书所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就是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写照。

陈垣与王素的研究中，都把"高昌俗事天神"之天神理解为祆神，外国的权威研究者如日本的羽田亨亦同此说，见所著《天·祆·祁连》[3]，林悟殊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论高昌"俗事天神"》[4]一文中，从火祆主要习俗是天葬和火崇拜出发，根据至今迄无关于高昌存在天葬和火崇拜的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的事实，否定了"天神"为祆教之神的传统看法，认为高昌俗事的天神，很可能是对天

---

① 《国学季刊》1 卷 1 期 1923 年 1 月；又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② 《历史研究》1986 年 3 期。

③ 《史林》9 卷 1 号，1924 年 1 月。

④ 《历史研究》1987 年 4 期。

体的自然崇拜，是高昌地区的传统信仰；进而否定了高昌普遍信奉火祆教的传统观点。

林悟殊也不同意唐代祆教不传教，其教徒无唐人的说法。在《唐人奉火祆教考辨》①一文中，他提出译经并非传教的唯一方式，立祠、画象及举行各种仪式都是传教的有效形式；从这点认识出发，他网罗有关官方记载，敦煌发现的汉文火祆咒文及宋人文咏等资料，论证了唐代已有汉人信奉火祆教的观点。另外，林悟殊又著有《火祆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一文②，对火祆教徒的习俗作了具体研究。

张乃翥对祆教与粟特移民的关系作了探讨。他在《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③ 一文中，考察了中古时期（具体指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火祆教随粟特移民的迁徙而辗转传播的路线，揭示了火祆教徒接受，融合东方文化意识的情势，以及中国各封建王朝注重从政治角度与祆教上层人员发生关系的特点。林梅林则更加注重火祆教对民间的影响，他在《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④一文中，依据有关史传、笔记和墓志材料，论证唐代火祆教对民间有较大影响，并把唐代火祆教的流传情况概为如下三个特点：1. 传播范围从中国西北地区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发展；2. 崇祀者从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向民间普通百姓转化；3. 唐朝的祆教徒因历史原因空前增多，既有外国侨民，也有众多汉人。

关于祆教与粟特人的关系，近年来姜伯勤利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⑤

---

① 《文史》30 辑，1988 年。

② 《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 1 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3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93 年 2 期。

⑤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年版。

和《论高昌胡天和敦煌祆寺——兼论其与王朝祭礼的关系》①两篇长文，认为十六国至唐宋时期流传于中国的祆教，有别于萨珊王朝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而可称为比前者更加古老的马兹达教。其教不是直接由伊斯兰传来，而是经由中亚"间接传播"的。姜伯勤还研究了祆教传至中国后被纳入官府祭礼的问题，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统合力和辐射力。由于姜伯勤学术视野开阔，熟悉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也熟悉有关的外文资料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他所做的研究就比许多学者仅凭汉籍祆教资料所做的研究深入得多，澄清了许多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将隋唐祆教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由此也昭示学者，在研究外来宗教和中外文化关系时，掌握有关外文和有关外国研究成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五）景教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它在公元五世纪曾被罗马教会判为神学异端，但在东方却有很大的势力。景教正式传入我国是在唐贞观九年（635），但此前可能已有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个别地来过中国。景教在唐代活动了二百多年，在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时连带遭到禁毁，五代及宋不见有关于景教的任何记载。由于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加之流传下来的唐代景教文献又极少，故景教研究在学术界成为一个冷门。就国内而言，本世纪早期对景教的研究以陈垣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②亦搜集了不少有关资料；八十年代，江文汉对景教问题作了新的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推进。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③ 在叙述基督教入华史的第一期时，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 1 期。

② 中华书局，1978 年再版。

③ 《真理周刊》第 2 卷第 18 期，1924 年 7 月。

对唐代景教传入和活动情况作了概要的说明；其《基督教入华史》① 则立“唐代之景教”，对景教在唐的史实作了稍详的评述，略谓景教于贞观九年至中国长安，得名阿罗本，来华路线大约取海道。至唐建中二年(781)建有景教碑，至会昌毁佛而灭迹。唐时景教在华之盛，可由“寺满百城”、“法流十道”之语观其一斑；景教在唐留下的印象是善医、豪侈。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研究唐代景教的重要文物。中外学者都对它重视并做了研究。我国学者冯承钧于1928年汇集众说，参以已见，著《景教碑考》一书，于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佐伯好郎除著有《景教之研究》外，又于1916年以英文著《中国景教碑》(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其后又根据新发现的景教文物，扩充为《中国景教碑及遗存文物》(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d Relics in China)，于1937年在东京出版。本书正文及附录六百余页。除对景教碑文做详细研究外，还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汉文、叙利亚文景教经卷做了翻译和注释，对唐朝以后至元朝的景教遗物及有关记载也逐一收集和研究，是一部详赡的景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著作。

江文汉《景教》② 一文，广泛吸收了中外学者研究唐代景教的成果，论述比陈垣等前辈学者系统而深入。文中详述了景教入唐后受到唐太宗友好接待、准其传教，其后除武则天掌权的一段时期外，受到六代皇帝的保护和支持的情况；对于武宗毁佛后景教灭迹的说法，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引阿拉伯作家阿布·宰德(Abu Zayd)《东游记》为证，说明武宗毁佛后景教并未完全消灭。文章还引西方传教士总结出的景教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一是缺乏

① 《青年会季刊》2卷2期1930年6月，以上两文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② 收入《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鲜明的理论;二是传教时走上层路线,未注重在民间传播,并作了评论。这样的作法是饶有兴味的。文章对景教碑作了意译和注释,并详细介绍了对它的研究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唐代景教提供了很大方便。

九十年代,学界对唐代景教的研究向更深入具体的方向发展,主要成果有周祯祥《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①,李伯毅《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②,朱万源《唐朝景教的神学思想点滴》③,安希孟《景教在唐代衰落的原因》④,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⑤,段玉明《云南景教考》⑥和朱谦之遗著《中国景教》⑦。

安希孟在《景教在唐朝衰落原因》一文中认为,唐武宗毁佛兼及景、祆二教,主要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排外思想在起作用。景教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得以流行是一时的,灭亡是必然的。段玉明的《云南景教》一文,根据李德裕《李卫公集》中有一条材料记载唐文宗时南诏兵侵蜀,大掠成都而还,所掠有"医眼大秦僧一人",参以其他材料,推断南诏时代云南已有景教流传。这两篇文章的观点都很新颖,在唐代景教研究中具有拓宽领域、一新视听的作用。

朱谦之先生的大著《中国景教》完成于1968年,但至1992年才得以出版。全书共20余万字,分十一章。其中与唐代景教有关的内容有第一章,探讨了唐代景教的教派之属;第四章,阐述了中

---

① 《文博》1993年5期。
② 《文博》1994年4期。
③ 《金陵神学志》1994年1期。
④ 《社会科学报》(沪)1992年3月5日第3版。
⑤ 《西北史地》1994年3期。
⑥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
⑦ 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国景教产生的背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论述了景教传入中国的原因，指出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唐代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及景教徒的高超技术等促使景教能够在中国广为流传；第八章，解释景教碑有关的史地问题，碑文中有关人名的景教僧团的组织形式，景教教义与教规。全书材料极为丰富，既有国内外保存的原始文献，特别是敦煌新出土的资料，又概括了近百年来诸家研究的成果，因而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研究景教著述内容最全、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大的一部重要著作，仅就有关唐代景教的部分来说，也代表了唐代景教研究的最高水平。

（六）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又称回教、天方教、清真教，是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建的一个宗教，唐初传到中国。伊斯兰教与摩尼教、祆教、景教同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祆教传入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时间略早，但传入中国内地仍在隋唐时期），但因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势力保存至今，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显然比对上这三教的研究更受学界重视，参加研究的人数和成果也相对地多些、大些。不过，就对隋唐五代时伊斯兰教的研究来说，由于史料的分散、模糊，至今对隋唐五代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仍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1.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① 以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断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此说被不少伊斯兰教史研究者接受，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提出异议。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② 指出："大食朝贡使到中国来，是一件事；回教传入中国，

---

① 《东方杂志》25 卷 1 号，1928 年又见《陈垣学术论文集》一集。

② 《边政公论》1943 年，又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是又一件事。我们说，回教传入中国，与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贡有相当关系，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说回教传入中国，与某次朝贡使有关，是不可以的。”许宪隆更认为应以中国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的正式出现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他在《也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和时间》[1]论述了以此为标志的理由，并据此标志提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7世纪下半叶新说。除此之外，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尚有隋开皇年间说，唐武德年间说，但两者的论据都不够有力，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2.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路线。

一说由海路来，一说由陆路来。陈垣、白寿彝等文都强调了大食、波斯唐时来华海船之多，似主张伊斯兰教最早是由海路传来的，但他们也并未排斥陆路传入的可能性。朱江《伊斯兰教东渐扬州始末》[2] 兼采众说，提出了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由海、陆两途，“而不象是由一条通道传来的”的折中说法。

3. 关于伊斯兰教在唐代迅速传播的途径。

陈垣前引论文提出回教势力传播有四因：一是商贾之远下，二是兵力之所屈，三是本族之繁衍，四是客族之同化。他认为唐代回教之传播发展，主要靠一、二两点，另外又有两因：一是回教在中国不传教，二是回教不攻击儒教。故韩愈排佛不及回教，会昌毁佛独回教幸存。陈垣所说第一条原因，即通过商人活动传播伊斯兰教，继起的研究文章甚多，而以杨怀中《唐代的蕃客》所述为详；第二条原因指阿拉伯通过军事扩张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对此加以申论发挥的文章也不少。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3] 即详述了唐与大食（阿拉伯）怛罗斯战役对于传

①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期。

② 见《伊斯兰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禹贡》5卷11期1936年，又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播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秦惠彬《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① 则对兵力所届说作了更全面的论述，认为“伊斯兰教的传播，除了依靠宗教本身即精神的思想的力量以外，无疑，还要依赖物质的力量”，还认为协助唐廷镇压安史之乱的大食援兵在中国的留居，可以说是中国有伊斯兰教徒之始，亦即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之始。

除了以上几个讨论的焦点外，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阐述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礼仪及其在唐代的相关活动；秦惠彬《唐代伊斯兰教》②考述了唐代伊斯兰教徒在长安、广州、海南岛、川滇一带存在，论述了唐代伊斯兰教徒的政治、经济活动及其影响，他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伊斯兰教在五代时期的发展》，③以及王胞生《唐宋时期大理与波斯大食人关系浅说》，④则探讨了伊斯兰教在五代时期在我国传播的情形。羽离子《唐代穆护及其首次遭逢灭教》一文，⑤则提出了唐代文献中的“穆护”即指伊斯兰教的全新观点，并居此论述了伊斯兰教在唐代的活动、社会影响和会昌五年被毁灭的情形，还引用阿拉伯文献论述了会昌灭教之后伊斯兰教在唐代复苏的情况。高占福《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与伊斯兰教的关系》⑥，探讨了伊斯兰教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这些文章标志着唐五代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新进展。

外国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也很注意，写出不少论文和专著。这里仅介绍两本专著：一本是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鲁姆豪(Marshall Broomhall)著的《清真教》(原文称 Islam in China)，于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1 期。
② 《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 3 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1 期。
④ 《甘隶民族研究》1988 年 3、4 期。
⑤ 《海交史研究》(福建泉州)1992 年 1 期。
⑥ 《甘肃民族研究》1994 年 4 期。

1910年在伦敦和上海出版，另一本是日本学者田坂兴道著的《中国回教的传入和发展》(原文称"中国にぢける回教の传来とその弘通")。二书俱自唐至清，作为通史编写，后者更见功力。著者田坂氏一生致力于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论文。本书系著者博览中国载籍、参考西方著述并结合其在中国各地调查所得资料撰成。全书序论3章，本论6章，共32节，1726页，规模宏大，资料翔实，论证谨严，极有学术价值。于1964年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四十三号在东京出版。

(七)地方宗教、迷信与关于宗教的一般论述

隋唐五代时期各地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宗教和带有宗教色彩的迷信习俗，由于记载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还开展得很不够。现将所见比较重要的文章作一简介。

和志武《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①]根据多年考察研究，对我国纳西族所信仰的东巴教的产生、发展和以云南省中甸县白地为中心的东巴文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简要论述。在"东巴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节，作者论及东巴教是在唐代开始形成的，认为唐代的纳西族，处在强大的吐蕃与南诏之间，并曾受过吐蕃和南诏的统治，从而受到吐蕃和南诏文化的深刻影响；纳西族社会中的原有巫教，受到藏族本教的影响，逐渐形成为民族宗教——东巴教

台湾年轻学者张骏逸对吐蕃的原始宗教"蕃教"作了研究。他的《"蕃教"与吐蕃》认为蕃教是一种萨满教类型的万灵信仰，先佛教而存在于吐蕃地区。文章论述了自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把佛教带进吐蕃后，蕃教与佛教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起初因彼此教义、习俗不同而起，后来政治的内容却超过了教义的分歧。双方斗争的结果，由水火不容到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但因吐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1期。

蕃王室与贵族之间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最后佛教被驱逐，吐蕃也真正进入黑暗时期。

大陆学者张云《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①论证了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重要地位，认为这一时期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信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 解读》一文②，也论述了吐蕃古丧葬仪轨废弃过程中佛教与苯教之间又斗争又妥协，佛教对苯教既改造又吸收，从而推动了苯、佛二教互相融合的情形。苯教即张骏逸文中的"蕃教"。上述三篇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学者的论文，或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或各自的研究成果正好互为补充，乃是海峡两岸在唐代宗教研究工作方面的一段佳话。

王尧、陈践的《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 P·T·1047、1055 号译释》③，将这两号藏文文书译成汉文，予以介绍，并作了研究。文章认为，占卜是由前兆联想到前兆迷信的进一步系统化，是苯教巫师类宗教职业者的"杰作"，并成为他们争取信徒的重要手段。对藏文写卷占卜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吐蕃时代的人们是如何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的。

研究隋唐时期突厥宗教的有林斡的《突厥习俗和宗教》④和樊圃《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⑤。林文第二部分论及突厥人的宗教信仰很庞杂，有萨满教、祆教、景教和佛教。除萨满教原为氏族社会的遗留，故东、西突厥均仍流行外，祆教和景教则仅流行于西突厥，特别是散居于中亚地区的西突厥人。至于佛教，则在东西突厥的统治者中，多有皈依者，且其传入东突厥乃来自中原汉族传

---

①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 3 期。

② 《西藏研究》1990 年 1 期。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 3 期。

④ 《民族研究》1981 年 6 期。

⑤ 《文史》19 辑 1983 年。

入西突厥则与天竺和中亚诸国有关，但也不能说与中原毫无关系或完全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樊文实际是针对 V·Thomsen（汤姆森）的《蒙古之古突厥碑文导言》① 和羽亨的《突厥族与佛教》② 而发的。汤母森主张突厥信仰萨满教，未涉及佛教；羽田亨认为突厥佗钵可汗时的佛教信仰恐系一时的现象，并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作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在本文中，首先论证了突厥入居蒙古草原以前，居于其地的柔然人信巫，属于萨满教系统，突厥入居其地后，受传统影响，最初也信巫，即信奉萨满教。后来佗钵可汗之信佛，不仅是他个人的信仰，一些贵族或劳动人民也有对佛教发生信仰的；隋唐时期，因长期受汉人的影响，突厥人更有信佛的情况。到了突厥统叶护可汗时，佛教已经很盛，行无遮大斋、施舍、造寺已经成了突厥贵族的嗜好。

阎万钧《唐代昭武九姓宗教之东传》③ 研究了中亚昭武九姓地区宗教信仰的演变情况，认为其地在纪元前后一、二世纪中，佛教曾广为传播，但到公元四、五世纪以后，火袄教、景教、摩尼教传入到昭武九姓地区，渐渐排挤了佛教，使其势力向东、向南收缩。到唐代，昭武九姓诸国地区的佛教几乎达到销声匿迹的程度。

二、哲　学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本世纪初就不断有著作问世，但大量的工作是建国以后进行的。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对隋唐五代时期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进行了评价，并对一些著名思想家的学说进行了分析。下面分别介绍之。

---

① 《禹贡月刊》7 卷 1、2、3 期合刊，1937 年 2 月。

② 《羽田亨博士战争学论文集》下卷，1958 年。

③ 《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1 期。

(一)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地位

对于这个问题，本世纪初就已有学者发表了若干文章，如皕海的《唐人之哲学》①、黄侃的《汉唐学论》②、瞿公的《唐代哲学评述》③ 等。到 60 年代，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④ 第三册第五篇第一章中特别对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了概括。他认为在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形态方面，隋唐时期的唯物主义者仍然没有超过王充、范缜以来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阶段，但在个别问题上则比过去的唯物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唯物主义把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试图进行区别，并且从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宗教迷信思想所以发生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同时，任继愈还认为，这一时期的辩证法思想比过去的辩证法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李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力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先秦以来《孙子兵法》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孙叔平则认为，隋唐时代儒学恢复了正统，佛教泛滥，道教流行，哲学唯心主义显然占了风。唯物主义也在发展，还有突出的成就，但总起来讲，势孤力薄，抵抗不住宗教唯心主义的侵袭。如果与唐代文学相比，哲学上成就就不免相形见绌。但唐代哲学却为宋代哲学的发展作了准备⑤。

1988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通史》在介绍秦——唐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和表现形式时，则认为："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呈现了十分纷繁复杂的景象，出现了唯物主义者和佛教妥协，又反对唯心主义，也出

---

① 《进步杂志》4 卷 2 期，1913 年。

② 《哲学月刊》1 卷 6、7 期，1926、1927 年。

③ 《哲学月刊》1 卷 8 期 1927 年。

④ 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⑤ 《中国哲学史稿》第四篇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现了不同唯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是，最主要的是表现为唯物主义无神论和宗教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天命论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又回到天人关系问题上来。”

1994 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对隋唐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又与以上诸说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传统看法，以儒家为正脉嫡传”，“治哲学史者不惜以浓墨重彩介绍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几位大思想家。韩、柳等人不失为第一流人物，但完全靠他们来支撑唐朝的盛大局面，毕竟显得单薄。”如果“打破传统习惯，不抱儒家为正统的偏见，按历史实际情况考察隋唐哲学思潮，儒家以外还有佛、道两家。佛、道两家的社会影响及理论造诣均超过儒家，特别是佛教，在哲学理论上更有其独到处。”此书作者还指出：“汉代哲学致力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探索，魏晋玄学进而探索世界的本体。由本体论再进一步探索，即进入心性论的领域。隋唐佛教讨论的心性问题，其范围至广、钻研功力也极深。它涉及人类心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认识论（认识能力、认识限度、认识的真实性等）、社会观、本体论、宗教实践（修养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隋唐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心性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可以肯定，此书的这种观点，是站在比以往治哲学史的各家更高更广的视角上得出的。正是基于以上观点，该书的体例也不同于以前的隋唐哲学史，而是分成了儒教编、佛教编、道教编、会通编四大部分，先分别对三教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在此基础上再会通诸教，对一些有共性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介绍。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还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儒家哲学的发展情况①。如 1958 年尹协理曾写有《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一

---

① 由于本书专门设有宗教部分，故此处不再对佛教、道教哲学的研究做重复介绍。

文①，集中论述了隋唐儒家哲学的历史地位。他认为隋唐时期正是中国儒家哲学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渡阶段。旧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哲学形式受到了比较集中的批判；一个与旧哲学有较大差别的新哲学正在酝酿、萌芽之中；一批儒家哲学家为改造旧哲学、建立新哲学而探索和奋斗着。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有三方面：首先是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这一陈旧的形式的批判和抛弃；第二是援佛入儒思想的提出与实际尝试；第三是某些哲学范畴如道统、道学、性善性恶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道德修养等问题，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等被提出。说明隋唐儒家哲学改造、变迁的趋向正是向宋明理学演变。作者最后并得出结论：隋唐是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是理学的酝酿阶段。

李德勤的《隋代禁纬与焚纬》②、牟钟鉴的《隋与唐初经学》③、赵云旗的《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④、《隋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地位》⑤等文章具体探讨了隋和初唐时期儒学的情况。李德勤认为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和炀帝大业元年两次禁绝谶纬是自东汉以来风靡盛行的谶纬之学沦丧的捩转，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特别是有关经学史的研究之中，是引人注目的事件。赵云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从魏晋南北朝的衰颓中发展宏大起来，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隋文帝与儒学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赵云旗并指出，由于以隋文帝为首的大多数人都是主张以儒学为国策的，所以，隋代由此确立了由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以儒家之道为治国之策的根本方针。儒学在隋代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为三教之首。这种情况是佛道二教无法比拟的。

---

① 《哲学研究》1958年5期。

② 《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③ 《孔子研究》1988年3期。

④ 《孔子研究》1988年6期。

⑤ 《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3期。

牟钟鉴认为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本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推动。但是由于唐初经学的统一偏重于文字训诂，而没能建构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儒家哲学体系，使儒家文化缺乏了最高层面，呈不完整状态，无法与佛教哲学相抗衡。同时，由于经学服务于科举考试，功利压制了学术，经学很快就被冷落，走向衰败。这种危机引发了儒家有志之士的反抗，中唐以后遂出现打破僵化局面，开拓经学新路的风气。

谢保成还著文专门论述了中唐时期儒家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①。他指出，安史之乱后思想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佛教禅宗思想在中国生根开花，特别是迅速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中；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多元的趋势，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算历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经学的研究开始背离此前的章句之学，先前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思想，从此受到猛烈冲击。官方统治思想从此出现了危机。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们"集三传，释《春秋》，"创出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谢保成并指出，其学说虽然曾引起各方面的不同认识，但其"从宜救乱、因时黜陟"之旨，却为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而且由这一学派所提倡的《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及于其他四经，传统的"五经"到宋代都被重新解释。因此它是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的明显的转折点。而且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与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

① 《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杨荫楼的《唐代经学论略》[1] 一文认为，唐代经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唐初从经学的分立到统一的演变，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其标志。二是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以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等为首的一派，对两汉以来章句之学的批判与疑古思潮的产生。三是中唐以后啖助、赵匡、陆淳（即陆质）等人的舍传求经学派的形成。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中，也对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有专门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再赘述。此外，陈克明的《唐代〈易〉学的比较研究》[2]、也都是这一类的文章，它们在自己所论述的领域中都颇有见地。

关于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也是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三教争衡与唐代的学术发展》[3]、《唐宋间儒释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4]、《吕才与玄奘师徒的论争》[5]、《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6] 等。《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中也曾在多处讲到此问题。如该书的绪论中曾指出："三教鼎立，是唐代哲学界的总形势。三教的势力并不相等，三教中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大，其次是道教，儒教影响最小。""仅仅从哲学思想体系而论，三教中佛教最为完整，它提出了中国哲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但它是出世的世界观，不能直接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服务。因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要贯彻忠君原则，为适应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方式，要讲孝父母的原则。佛教在这一关键处输了一着。儒家如何吸取佛、道两教的长处（心性论），以充实自己的体系，从而引发出

---

① 《求是学创》1992 年 4 期。
② 《齐鲁学刊》1991 年第 3 期。
③ 《社会科学家》1994 年第 3 期。
④ 《学术交流》1990 年第 4 期。
⑤ 《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⑥ 《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宋代哲学。"《会通篇》中还指出，在这一时期，"'三教'间虽然仍继续互相论辨，互争高低，但调和融合的趋势日益发展。"张的《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一文，是以魏晋以来兴起的儒、释、道三教论议为主题，论述了隋唐时期这种论议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并指出隋唐时代的儒释道论议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由多元并立走向多元一统的发展轨迹，以及三教争竟和合流的新历程。

（二）关于隋唐五代时期著名思想家及其学说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思想家有王通、吕才、傅奕、王玄览、刘知几、李华、卢藏用、张果、孙思邈、刘禹锡、柳宗元、韩愈、李翱、无能子、谭峭等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择要介绍。

1. **对王通的研究**。王通是隋唐之际的一位思想家，死后被门人私谥为文中子，《中说》一书是集其思想之大成的代表作。宋以后一些人对王通的存在提出了怀疑，于是他的思想便很少有人研究。本世纪以来能够见到的这方面的文章只有很少几篇，如面海的《文中子书后》①、汪吟龙的《文中子读经义例考》②、逖公的《兴国学派导师文中子之讲学精神》③ 和李文通的《文中子》④ 等。

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王通的研究文章及著作才稍稍多了起来。一些哲学史方面的专著开始为王通立了专章。如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等。此外，由尹协理、魏明著述的第一部专门研究王通其人其事的专著《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① 《进步杂志》4 卷 2 期，1913 年。
② 《重华》1 卷，1931 年。
③ 《复兴月刊》2 卷 4 期 1933 年。
④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 9 期，1935 年。

1984 年版)也在 1984 年问世了。关于王通的研究文章,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短短的几年内,也已发表了十余篇。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关于王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思想以及历史评价等方面。

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对王通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王通在宇宙观上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仍是天命论者,有神论者;历史观上则主张维护三纲五常。他的学说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纲领。

尹协理和魏明的《王通论》所持观点则与孙叔平有所不同。他们在此书中首先通过细致的考证明确肯定了历史上王通其人的存在,详细叙述了王通的生平活动事迹,并全面剖析了王通的哲学思想及其实质。他们认为,王通的自然观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关系问题是其自然观的核心。他以“元气”解释天,以“元形”解释地,以“元识”解释人,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两汉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他的发展观则是以主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为主要内容。他所谓的“中道”既是仁义礼智信的统一,又是有无、动静、常变的统一。这种观点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有较大的突破和发展。他们还认为王通政治学说的中心是“王道”,他以“明王道”,实现“王道”作为自己终生活动的宗旨,主张发扬周公、孔子之道,推行仁政德治,反对暴政。王通还主张历史进化论和道德史观。他相信社会发展“来者胜昔”,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认为王者兴衰以人的道德为转移,并把人的识识纳入封建道德修养的轨道,以“行道”为行动原则,以“合道”为验证思想行为的标准。这些思想为理学的形成开了先河。除此书外,尹协理在《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①中还充分肯定了王通在儒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他认为王通是对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第一人,又是首先提出“援佛入

① 《哲学研究》1985 年 5 期。

儒"思想的人；王通还是第一个把"道"的地位提高，并且一生以"明道"为己任的人。此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以及道与欲、道与利、德与功的对立，并提出"正心"、"直尔心"以及"家道正而天下正"等道德修养问题的人也是王通。在《论王通的伦理思想》① 一文中，尹协理还依据《中论》对王通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索。

《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儒教编中，也专门列出了"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一节，对王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此书的观点与尹协理、魏明大同小异，但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除以上著述外，近年来发表的关于王通的文章，还有刘宽亮、卢庆芳的《论王通的思想特质》②、周庆义的《王通思想简论》③、杨明的《王通与中说》④、邓小军的《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⑤等。

《论王通的思想特质》一文，主要是针对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四册中的有关观点，提出了一些看法。作者主要认为王通的思想是以批判现实弊端为出发点，以解决现实矛盾为宗旨，以达到现实的和谐为归宿，充满了经世致用的特色和创新发展的气息。《王通思想简论》是根据《中说》对王通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王通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中道"，并指出了"中道"的六点具体含义。同时作者还阐述了王通对"天人之事"及"帝王之道"的看法。并指出王通还是一个教育家，在认识论、文学观、伦理思想等方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精辟论说。《王通与'中说'》一文研究的重点也是《中说》一书。该文的作者首先表示同意司马光的观

---

① 《浙江学刊》1986 年 3 期。
② 《晋阳学刊》1989 年 4 期。
③ 《齐鲁学刊》1992 年 6 期。
④ 《复旦学报》(社科)1989 年 5 期。
⑤ 《四川师大学报》1991 年 6 期。

点，认为《中说》确系出自王通，虽有后人窜改之处，但大体上仍反映了王通的思想观点。然后作者又分析了《中说》的具体内容，从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艺术，甚至审美观等方面对王通做了具体论述。《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一文，则是目前唯一一篇论述以王通为代表的河汾之学与唐初政治的关系的文章。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一、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在历史时间上的连续性、尤其在文化精神上的一致性，表明河汾之学乃是贞观之治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刻准备；二、河汾之学在思想资源和人材资源两方面为后来达成贞观之治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作用。该文最后认为，王通讲学传道于河汾，通过学术教育而扭转现实政治的文化理想和远大抱负是实现了。在我国历史上，一位大儒的思想，经与实践相结合，而如此迅速地大体实现，这是第一次。

此外，还有两篇专门论述王通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文章。其一是朱越利的《论王通对三教的主张》①。其二是刘宽亮的《管窥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②。刘文主要观点是，王通反对佛道二教在中国流行，但也清醒地意识到消灭佛、道是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慎重考虑，终于站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了圆融、调和三教的主张，即"三教可一"。但"三教可一"的本意并不是要把三教合为一教，而是"三教统一"、"三教联合"。而且在治理国家时，仍应以儒教为主，佛道为辅。作者并指出，王通这一思想的渊源是受两汉司马谈兼容十家九流的思想的影响，理论根据则是儒教的"中道"思想。朱文则认为，在《文中子》所辑录的王通全部言论中，找不到一句对佛、道教的赞颂之词，只有全盘否定的贬斥之语，他甚至于贬斥儒家，这种将儒、佛、道三教一起抨击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他不可能提出三教归一和三教合一的主张。作者还认为，王通只是

---

①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主张用权义并举的中和之道来对付三教。即将三教的某些内容融入周孔之道，但决不允许三教长期存在，而是主张三教自去。这种主张决不是同于三教归一或三教合一，只是客观效果上达到了三教融合。作者并认为，王通的这种主张是由他是一位复古的、保守的思想家这一点所决定的。

2. **对吕才的研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二章中，对吕才的思想进行了全面评述。他认为吕才是初唐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初唐的唯物主义阵营中的代表。侯外庐并指出，吕才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学术根柢方面，有广博的自然科学的"博物"知识；在继承并发展前人的传统方面，则是依据《易经》而进行着他自己的改造，同时也以广博的历史知识作为根据，开展论证。他以客观实际作为宇宙根源，以"无为"、"自然"做为运动的规律，打击了神学的命定论。吕才还把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起来，从而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二章中，也介绍了吕才对当时社会流行的迷信思想的批判。

关于吕才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罗炤的《吕才与玄奘师徒的论争》①一文。公元七世纪时，佛教的因明学传入中国，并在佛教徒间兴起一股因明研究热潮。唯物主义思想家吕才不仅也参加到这种研究之中，而且就因明学的若干问题向玄奘的门徒们发起挑战，掀起一场波涛汹涌的论争，成为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但这场论争的原始资料只有片断留存，论争的内容迄今尚未为人们充分了解。本文作者正是就此努力进行了发掘和探究，对这一论争的逻辑和哲学意义做出了简略说明。

3. **对柳宗元、刘禹锡的研究**。柳、刘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这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关于唐代哲

---

① 《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 2 期。

学和思想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1)对柳宗元哲学思想的研究及其评价。1957年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七章中，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柳宗元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其世界观是以自然为混沌存在的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他否认天意与天命的存在，坚决反对命定论，主张神灭，反对灵魂不死之说，并阐发了自然合乎规律运动的原理，并指出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根本上驳斥了一切有神论和唯心主义的虚构，有力地否定了唯心主义静止的自然观和宗教迷信所宣传的神和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说。侯外庐并认为，柳宗元的这些思想，“就其内容、体系和战斗性、科学性等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有其创造性的建树和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

侯外庐的这种观点颇为一些学者所赞同。赵纪彬、杨惠琴、吴文治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都表示了类似的看法①。70年代，章士钊在其《柳文旨要》(中华书局1971年)一书中也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作了全面肯定。他认为柳宗元“不引天以为高，不立异以为神，淫巫瞽史之言，无自虿于其胸，于庄子取‘自然’一语，认为准绳，一切从客观量物，而不主天与人有何交接，适与近代初步质素之唯物主义相合。”到80年代，又有一些学者从多方面对侯外庐的观点作了补充。如孙以楷在《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②中认为，柳宗元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的成果，还吸收了佛学本体论范畴及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把元气自然论提高到元

① 参见赵纪彬《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5期；杨惠琴《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江海学刊》1958年5期；吴文治《柳宗元无神论思想初探》，《新建设》1958年3期。

②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2期。

气整体论阶段，并以此为武器，对秦汉以来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做了清算。孙以楷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对柳宗元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阐述①，认为柳宗元把儒家传统的处理事物用中的方法论发展为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把笼统的执两用中"发展为以经（直道）为主导方面的经权统一论，把片面强调矛盾同一性改造成为承认转化的大中之道，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孙叔平说，柳宗元坚持了"元气"、"五行之气"产生天地万物的观点和"天人不相预"的观点，区别了自然规律和人的能动作用，并以对天和人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依据，坚决批判了各种传统的迷信，把古代无神论推进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在哲学上他是唐代第一人②。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中，通过对柳宗元的《天说》 《天对》、《时令论》、《断刑论》等著作的详尽分析指出，柳宗元所说的天是物质之天；他认为天地是本，元气阴阳是化，是对屈原《天问》中的"阴阳三合，何本何化？"的唯物主义回答；他对所谓天地开辟问题采取的重视经验事实，不肯轻信没有充分根据的揣测之辞，也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该书还指出，柳宗元还明确指出了天与人的分别，划清了天与人的界限，也就是自然和社会的界限，这一点说明他的自然观也是唯物主义的。

对于佛教的态度，是学者们评价柳宗元的主要分歧点。一些主张全面肯定柳宗元的学者对此作了各种解释。如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好佛"而不忘儒，且往往援佛以入儒"是为"督责其使归于一。"③吴文治认为，柳宗元好佛和迷信有神的宗教论者在本质上有区别，应当联系他的政治遭遇等多方面原因来考察。他之所以有取于浮

① 《论柳宗元的辩证法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84 年 2 期。

② 《中国哲学史稿》上第四篇第十章。

③ 《柳文旨要》（下）卷六《辟韩余论》，中华书局 1971 年版。

图，是因为他们不爱官，不争能，是同情他们对黑暗腐败势力的反抗①。魏宗禹则认为，柳宗元曾批判过佛教的“遗情以贵虚”，并指出过佛学所言的“空”、“虚”是错误的，对佛学中的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他还认为最重要的是，柳宗元没有简单对待佛学，而是认为佛教哲学思辩中含有辨证法思维因素。因此，他是将佛学作为“百宗”之一，以“诸子合观”的态度来看待佛学的，这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积极意义②。范阳也认为，佛教对柳宗元虽产生过深刻影响，但他始终以儒家正宗自居，在这个基础上兼收诸子百家之学，也包括了佛学在内。其目的是为了“统合儒释”、“以佛济儒”。佛教思想及其消极因素并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主流。③冯友兰则认为，在柳宗元看来，佛教和儒教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他们的中心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讲性善，都讲“人生而静”。从孔子以后，儒教衰败了，抵抗不住道教的干扰。幸而有佛教来了，这才把儒家的基本道理恢复过来。柳宗元还认为，佛教所讲的性，就是儒教所讲的气，也就是他所讲的元气。冯友兰并指出，柳宗元的这些比附是很粗糙的，但却是佛学向道学的过渡，柳宗元的最后意思是以儒教为主的三教合流④。王一民也认为，柳宗元是把佛学的心性学看作一门学问，可以佐教化，但佛学的这部分是与《易》、《论语》相合的，是儒学固有的，可以与儒学互相衬托，而不是佛教中的迷信。柳宗元并不认为利用佛学中有用部分佐教化是以神道设教，而只是一种启发心性、陶冶性情的方法，与儒学的格致、正心、诚意一样。可见柳宗元对儒佛关系是慎重的，保持了他唯物主义观点的一贯性、原则性⑤。刘光裕则说，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是和而不同，

---

① 《柳宗元哲学思想评述》，《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 年 2 期。

② 《略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山西大学学报》1984 年 2 期。

③ 《杰出的“元气”唯物论哲学家柳宗元》，《广西日报》1983 年 11 月。

④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

⑤ 《柳宗元不主张以神道设教》，《晋阳学刊》1989 年第 1 期。

以儒统佛①。柯利北也认为，柳宗元不排佛教并非就是潜心信仰，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派加以研究②。

汤一介也认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在他批判所及的范围内，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坚决的，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是反对的。但同时他又指出，柳宗元对于作为哲学的佛教唯心主义的实质，没有充分认识，因而没有进行批判，相反还有所肯定。因此，汤一介最后的结论是，首先应该肯定柳宗元是唐代的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但也应看到，他的唯物主义体系不很丰富，斗争的方面不很广阔，这些弱点限制了其斗争性的充分发挥③。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汤一介基本相同。他指出，柳宗元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并利用当时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对唯物主义有所丰富，但对佛教却没有进行斗争。由于他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很深，使他在当时思想斗争的重要战线上，主攻方向不明确，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的地位赶不上老子、荀子、王充、范缜等人那样重要。

冯禹则对任继愈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从中唐时期的天论着眼，认为这时期以韩、柳、刘为主开展关于"天"的讨论本身，是恢复儒家传统的概念范畴的一种努力，是要转移佛学在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柳宗元虽然给佛学理论以某种肯定，但其学说总的看来也还是以儒为主。他还认为，柳宗元等人所参加的这场天论，其意义不仅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及两汉的天人关系论，而且起着扭转当时的哲学思想的重大作用。它不是游离于中国哲学发展

---

① 《柳宗元与儒学革新》，《孔子研究》1994 年 3 期。

② 《柳宗元世界观辨——与丁宝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0 年第 3 期。

③ 《关于柳宗元哲学思想的评价》，《文汇报》1961 年 2 月 2 日。

主流之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尤其是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人关系论，大体上是直接继承了杨泉的思想，往后启发了宋代的张载等思想家。这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实在是不容低估的①。

范文澜则认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半截是唯物主义，半截是唯心主义。所谓“半截唯物”。是指柳宗元指出了天地是无知之物，对人不能有赏功罚罪这方面的观点而言；所谓“半截唯心”则是指柳宗元佞佛而言②。贾顺先在《从〈贞符〉看柳宗元哲学体系的矛盾》③一文中，所持看法与范文澜大致相同。他说，在柳宗元的哲学体系中，并存着唯物与唯心、否认天命和相信天国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当他在谈到天人关系、社会的形成、宇宙的本源、规律和无限性等问题时，他的主要方面是物主义的。当他在寻找人生的归宿、社会的治理方案和如何对待佛学时，他又迷信佛教，相信有一个极乐的天国存在，把天国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他的主要方面又是唯心的。所以柳宗元的哲学是一个并列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同时存在的矛盾体系。岑贤安、刘兴邦等人的看法也基本属于这一种④。

对柳宗元哲学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的是丁宝兰。他在《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⑤及《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⑥ 二文中认为，佛教神学唯心主义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

---

① 《中唐“天论”新探》，《中国哲学史》。

②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③ 《四川大学学报》1984 年 2 期。

④ 岑贤安《略论柳宗元世界观的矛盾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4 年 5 期；刘兴邦《柳宗元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86 年 4 期。

⑤ 《哲学研究》1979 年 2 期。

⑥ 《哲学研究》1980 年 11 期。

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只是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他的主要论据是，柳宗元的“元气”兼有物质本原和精神实体两重性格，这很难认为是唯物主义观点；柳宗元笃信佛教，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天命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他对唯心主义的东西，儒、佛、道兼收并蓄，而又认定儒为正宗，还把某些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也附会为儒家的传统思想，这样构成了他的世界观的主要方面。丁宝兰最后得出结论：柳宗元世界观的结构，就是这么一个以唯心主义为主导方面的杂烩式的世界观。同意这种观点的还有张铁夫，他认为无论是柳宗元的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还是他的圣人之道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佛教的真如观唯心主义思想为依归的①。

九十年代初，张铁夫又发表了《论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内容》②一文，认为在唐代有神无神之论，崇佛反佛之说，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命运往往是此消彼长，互为盛衰的。谁是谁非，孰进孰退，完全是由皇帝所决定。唐宪宗即位后，开始了以无神论为政治指导思想的历史时代。而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正是适应当时宪宗皇帝的无神论政治原则的需要而产生，并为其论证和宣传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政治特色。同时，又是与柳宗元当时处在被贬逐的政治环境中，希望立功赎罪，复为士列的心态相联系，带有浓厚的个人因素和感情色彩。但张铁夫在此文中也承认，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以建立宪宗的无神论《圣王之典》为目标，用生民史观和朴素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对古代各种有神论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已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代表了当时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关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朱光甫《浅析

---

① 《试论柳宗元世界观的宗教唯心主义实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4期。

② 《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1期。

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哲学贡献及其原因》[1]一文。在以往的柳宗元思想的研究中，还很少有人对其哲学思想分期地予以探讨。朱光甫认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即发端形成的长安时期，发展成熟的永州时期，付诸儒政实践的柳州时期。其中他在永州时期的哲学批判和理论创造，在其一生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柳宗元无论是在宇宙观、无神论抑或人性论、历史观诸侧面，均以其广度和深度而超了前人，为我国封建前期的哲学发展作出了理论的总结，并启迪了封建后期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标志着其在中国古哲学史上所据有的承上启下的地位。

(2)对柳宗元政治思想的研究。章士钊认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中有几点甚为突出：其一是反封建，主张"受命不于天于其民"，这是"民主"的萌芽；其二是主张"土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即士农工商四族要联盟、互助、合作，清除政出多门，民皆瘫痪之弊习；其三是主张防微杜渐；其四是"从汉儒掇拾'大中'一义，守而不渝，虽荣古而从不虐今，必使古为今用。凡无当于今者，古亦在所必弃。"而其尤为突出的是"主张民为至上，凡事之病于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章士钊还认为，柳宗元主张服于礼道，"不拘夷夏之分，如人而夷也，有才亦必用"等等[2]。侯外庐认为，柳宗元提出了一种"生人之意"的历史观。为了建立这种历史观，它首先驳斥了先验的主观教导，认为一部社会发展史，全然是一个自然史的发展过程，通贯此过程的便是"生人之意"的原则，其间毫无"赏功罚祸"的天意存在。柳宗元还依据这种"生人之意"的历史观，对于一切礼乐刑政制度，举凡借宗教迷信的掩饰，而违反"生人之意"者均加以批判，从而把无神论的原则进

---

[1] 《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15卷3期。

[2] 《柳文旨要》下，通要之部序。

一步贯穿到了历史领域。侯外庐还认为,柳宗元进一步把这种“生人之意”的观点提高到政治理论上来,而从社会历史中探求人类不平的根源,并对封建特权进行抨击,把人民的反抗行为说成是“生人之意”,从而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实际运用时变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侯外庐同时也指出,由于阶级的局限,柳宗元提不出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主张,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圣君贤相”实施法治方面,因而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①。孙叔平认为,柳宗元是历史进化论者,他反对法古、泥古,主张适时变革。他的思想中反映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没有达到的②。任继愈则认为,柳宗元社会历史观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重势”这一点上。柳宗元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有自己固有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即“势”。他还认为,社会制度的形成就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制度变革,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他并且开始觉察到历史的客观趋势与参加历史活动的个别人物的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同时,他还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出发,对历代有关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等神学史观和政权神授思想,给予了系统的批判。与此同时,任继愈又指出,柳宗元把国家的起源说成是由于“继曲直”的需要,这是一种文化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③。

冯友兰在分析柳宗元的《封建论》、《六道论》、《天爵论》等著作之后则指出,柳宗元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基本上是继承荀况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如他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势,而不是某一些大人物的意志;还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趋向,这个趋向就是公天下。他所谓的公天下,就是反对世袭制度,根据道德和才能来

---

①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七章,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② 《中国哲学史稿》上,第四篇第十章。

③ 《中国通史》第五篇第八章,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决定人的地位和权力；他还反对盲从“古训”，与复古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冯友兰并指出，柳宗元还批判了孟轲、韩愈的仁义礼智信是人性中本有的观点，从而也就批判了孟轲等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①。

王永兴在《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② 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所说的“道”，其内容仍未超过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思想的范畴。他的政治思想是“儒”“法”思想的揉合，法家思想更为突出。同时他的“道”还具有无神论的色彩。在这些方面，比韩愈更为进步。王永兴又指出，柳宗元还提出了贱应防贵的主张，以及职官唯才论。他反对姓族和门弟，反对藩镇势力，还主张根本肃清宦官势力，实行均税。这些都说明柳宗元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中小地主的思想观点，是极为明显的。

师道刚则通过对《封建论》的具体分析③提出了自己对柳宗元政治思想的看法。他认为，柳宗元在该文中的见解，正是代表着一个新兴阶层在发言。他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国家政权的起源，否定了“圣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谴责“危害方域”的藩镇，指出他们的反动性在于反历史的发展；他要求“善制兵，谨择守”的安定统一局面，反对“继世而理”的特权等级；他把秦变“封建”为“郡县”看作是“公天下”，是“势”之所趋。实际上正是肯定了均田制破坏后，“地主私有制”的合理性，最后把历史发展动力归之于“势”，把郡县优于“封建”归之于“势”，这些创造性的论点，是他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柳宗元的“道”和“德”、“生人之意”和“公天下”等概念，又都超越不出地主阶级的要

---

①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

② 《学术通讯》1963 年 5 期。

③ 《柳宗元的封建论》，《学术通讯》1963 年 6 期。

求。王秋实认为①，柳宗元在《封建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周失于制，秦失于政”的思想，批驳了藩镇割据势力鼓吹恢复分封制度的论点，阐述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令、政策与国家治乱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1)从国家政治制度和政令政策两方面来考察西周以来的政治理论问题，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对于考察国家的政治理论是极为重要的。(2)用发展进化的眼光分析“制”的起源、发展和沿革，注重了国家政治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郡县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克服了以往思想家只注重君主贤明和统治权术的运用，忽略国家制度作用的弱点，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以来神权政治思想。(3)指出在国家治理中政治制度和施政状况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国家政治的整体，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能治理好国家。王秋实认为，柳宗元的这些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郭绍明和周桂钿还专门研究了柳宗元的“民论”思想②。他们认为，在柳宗元的民论思想中，极为突出的方面是他比前人较为正确、深刻地回答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柳宗元之后的我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少有超过柳宗元的。

近年来张铁夫还就柳宗元思想中的“唐家正德受命于人”及“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两个重要观点，从原文的旨意、词义、语义以及语法结构、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等各方面进行了分析③。认为目前许多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和教材对这两个观

---

① 《略论柳宗元的“制”、“政”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2期。

② 《柳宗元民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③ 《对柳宗元两个哲学观点的辨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点的解释和阐述都有乖于柳氏原意，甚至误解了柳氏的思想。张铁夫又进而指出，柳氏这两句话主要是强调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和批判天命神权观念。

(3)柳宗元在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柳宗元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关系方面。尹协理在《柳宗元与理学关系探索》① 一文中认为，柳宗元也是理学先驱者之一。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学用最高范畴"理"取代"天"开辟了道路；(2)统合儒释的尝试是理学取佛与排佛并行政策的先声；(3)对汉唐符瑞迷信的批判，为理学天理史观的产生开辟了道路；(4)批判了分封世袭制和藩镇割据，既同农奴制残余势力作斗争，又为实行理学官僚政治从理论上扫除了障碍。张立文还认为，柳宗元对"周易"的重视，对宋明理学家亦有巨大影响。重要理学家不仅讲"易"，而且著"易"；易学几乎是他们思想体系中不可分的主要组成部分②。

孙以楷也说，柳宗元的道在气中的观点，是宋代理学理气关系这一基本命题的萌芽。他的自然人性论以及对人欲的充分肯定，是宋代理学斗争的另一个基本命题——理欲关系——唯物主义回答的理论先驱。他在中国古代哲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实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③。

尤骥的《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④ 一文认为，柳宗元和韩愈一样，不仅同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也同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由韩柳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

---

① 《南宁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②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学术论坛》1984 年第 2 期。

③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④ 《孔子研究》1994 年第 2 期。

运动，对北宋思想发生了巨大影响。北宋的新儒学运动正是“阶于此”，在此基础上，又酿酝产生了理学。但柳宗元所起的具体作用却与韩愈有所不同，韩愈主要是划清儒学与佛老以及其他学派的界限，维护儒学的根本精神。柳宗元则偏重于在不背离儒学的前提下，吸收佛老以及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此外，作者在充分肯定柳宗元在复兴儒学运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柳宗元的思想对理学产生的影响远不及韩愈。这是因为柳宗元所继承，发展的自然主义天道观，无法满足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学体系的需要。

刘光裕在《柳宗元与儒学革新》① 一文中认为，柳宗元在促进儒学变革方面所作的工作主要是：（一）抑周公而尊孔子，又崇及孟子；（二）宣传陆质春秋学，为经学蜕变开道；（三）倡导“大中之道”，以正儒学学风。刘光裕的最后结论是柳宗元是儒学的信奉者。同时又是儒学的革新者；称他是宋代儒学的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彭建、邢凤麟的《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②一文，也对柳宗元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因其基本观点与前述两文大体一致，此处不再赘述。乔长路的《柳宗元的儒学风范》③一文，则重点阐述了柳宗元的爱人、惜才、正直、求实等思想品格，认为这些品格是值得称道的儒家风范，表现了中国士阶层身上的高风亮节，说明儒家思想在缔造中华民族的善良品格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卓越贡献。

（4）对刘禹锡思想的研究。作为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与柳宗元基本一致。因此，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都是将刘柳相提并论。但不少人又认为，刘禹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水平又高于柳宗元。如黄钊在《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

---

① 《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③ 《孔子研究》1944年第1期。

天论》[1] 一文中曾说,《天论》以"极其辩"的思想锋芒和"尽天人之际"的真知灼见,深刻地补充和发挥了《天说》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对唯物主义天道观有所突破,划清了唯物主义天道观同唯心主义天道观的界限,得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结论,做到了把"天人相分"同"天人相合"结合起来,从而对《天说》的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王应常在《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2] 中则说,刘禹锡的《天论》从 6 个方面丰富发展并超越了《天说》:(1)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光辉命题,揭示了天人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辩证关系;(2)提出了自然进化观,进一步提供了人能够胜天的理论根据;(3)鲜明地提出了天人观上根本对立的两种观点;(4)探索了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认识根源与社会根源;(5)提出了对"空"、"无"的新见解,批判了释老的空老观;(6)看见了人作为社会的人的特殊本质,初步区分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指出,刘禹锡严格地区分了天和人的界限,由此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所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说"不仅补充了柳宗元的天说,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接触到矛盾统一的规律,从而具有辩证的意义。此外在认识和了解自然这一方面,刘禹锡还提出了"数"和"势"两个概念,并提出了"数存而势生"的原则,从而接触到哲学中关于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关于对待佛教的态度,冯友兰则认为,刘禹锡"事佛而佞",尊奉释迦牟尼达到谄媚的地步。但刘禹锡又认为儒教和佛教,它们之间虽有所不同,却可以起同样的作用,相互为用。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中的论述与上述观点则略有不同。他除了肯定刘禹锡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中所作的突出贡献外,还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如他的"理""数'"势"的观念不可避免地

---

①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② 《南充师院学报》1984 年 4 期。

带有宿命论的倾向。他虽然否定上帝或天命，但他提出的“数”和“势”，仍然包含有人类无法自己掌握的，冥冥中起支配作用的命运的因素。他把宗教有神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愚昧无知，而没有认识到宗教产生的阶级根源。而且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有相当严重的不彻底性。他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思想采取了容忍态度。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中，任继愈等人又进一步分析了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观点的不同之处。他们认为，表面上看，柳宗元与刘禹锡都坚持自然论，强调人为，反对天命论，但仔细分析起来，二人的主旨却不相同。柳宗元强调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差异的一面，通过论证自然与社会是平等并立的两个系统，说明天道不能干预人道，人只要掌握社会中的人道，就可以把社会治理好，而无需求助于社会以外的更高的权威。刘禹锡既赞成柳宗元的服从自然的态度，又想包容韩愈思想中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倾向，认为天道和人道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既有“交相胜”互相对立的关系，又有“还相用”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统一的世界中，天和人都一于“势”和“数”。它是人道存在的普遍性依据，是推行人道的最高原则。自觉地按照这个依据或原则去做，人类社会就可以顺利发展。任继愈等人最后又指出，刘禹锡所理解的世界本质本身只是世界本质的部分属性，不具有实体性，不足以赋予这些原则以至高无上的权威，无法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构成统一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兆华的《试论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①一文。该文指出，以往人们研究刘禹锡，多注意他在哲学方面的《天论》，文学方面的诗文，极少关注他的医学思想。因此作者以刘禹锡的《鉴药》等篇为例，从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

---

① 《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4. **对韩愈和李翱思想的研究**。韩愈作为唐古文运动的杰出领袖，及其所提出的道统观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这两点是学术界早已公认的。但对其思想的评价，却如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所说："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①]，分歧十分显著。陈寅恪的《论韩愈》就是"誉之者"的代表作之一。此文主要是从建立儒家学说的道统；扫除儒学中繁琐章句之积弊；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奖掖后学，期望学说之流传等六个方面论述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之地位。陈寅恪在此文中还特别强调指出了佛教禅宗对韩愈的影响。他说韩愈的"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于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学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固大矣。"并指出由韩愈所奠定的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实际上就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

其他一些对韩愈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多是从其对待佛老的态度以及对藩镇割据和永贞革新的态度等方面着眼的。如郭子卿在《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中认为，"在反佛方面像韩愈这样突出的，唐代以下，傅奕之后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反佛而又反老"这一点上，比傅奕还要突出一筹。他还认为，在政治方面，韩愈的基本立场是反藩镇反割据的。史苏苑在《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的问题》[③]一文中也指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虽然从其直接效果来看并不显著，但还是有所打击的，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启兴则认为，韩愈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有着改革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与王叔文集团的"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改革措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说他"支持俱文珍等宦官腐朽势力"是不符

---

① 《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年 2 期，或《金明馆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 年 3 期。

③ 《中原学刊》1982 年 1 期。

合历史事实的[①]。蒋凡在《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②] 和《韩愈原道〉篇新证》[③]两文中，也分别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对韩愈进行了肯定。他认为，从一生的政治实践来看，韩愈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进步的，他并没有实际卷入永贞事件。他的政治观点虽然与革新派有分歧，但对永贞改革没有全面对抗。从思想上看，比较全面地反映韩愈思想体系的《原道》篇，则充分展现了他反对佛老、抨击社会黑暗势力等方面的政治态度，及其继承和发扬古代儒家之道、赋予儒道以新内容、新生命给后世以启迪的历史进步性。蒋凡还认为，《原道》在辟佛老这方面虽然是以唯心论反对唯心论，但总的来看仍是以敏锐目光洞察了当代社会的重大矛盾，并力图提到思想理论上来加以自觉的总结。韩愈敢于面向现实，旗帜鲜明，言人之所欲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的战斗精神，大大鼓舞了当时人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中对韩愈的评价也比较高。他虽然说过韩愈的思想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但他又认为韩愈树立发扬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帜，同时期内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鲜明，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佛老作这样坚决的斗争。他还认为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之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弱它的重要意义。范文澜并指出，柳宗元在《天说》中所指出的天地是无知之物的观点，在韩愈也是有的，其根据即是韩愈在《孟东野失子诗》中所说的："天日天地人，由来不相

---

① 《为韩愈一辩》，《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 4 期。

② 《复旦大学学报》1980 年 4 期。

③ 《学术月刊》1985 年 8 期。

关"。

对韩愈思想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人，主要论点则是，韩愈在哲学上主张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保守；其反佛道的主张，本质上也是用唯心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如杨荣国认为，韩愈没有明显的哲学体系，但主张天命有莫大权威，人不应当用人力来改变天意，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①。侯外庐也认为，韩愈在政治上采取的态度是依违于庶族地主和豪地主二大集团之间，而实际则是依附于豪族地主集团，依附于以俱文珍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对二王刘柳革新集团充满了敌意；在哲学思想方面，为了排斥佛教，韩愈提出了道统说和性三品说，而其实质则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②。吕振羽则认为，韩愈的反佛是"建基于狭隘的阶层利益上，表现狭隘的种族观点和文化闭关主义思想。"③对韩愈斥之最甚的是章士钊。他在《柳文旨要》一书中曾多次提及韩愈。他认为，在好佛这一点上，韩愈"单纯而偏嗜，有甚于子厚"；在鬼神观上，子厚主无神，退之则依违其间；子厚反封禅，退之则上表请封禅；在政治观点上，韩愈一生"不解民与人之达诂，甚至"以民为仇"，特别是永贞革新后，韩愈不但不设法援助柳刘，反而"恨柳刘也滋甚"。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九章中则对韩愈的思想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他认为韩愈的政治立场与世界观有着一定的矛盾。他相信天命和鬼神；为了反对佛教重新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韩愈在文学上提倡古文运动，反对从南北朝长期遗留下来表现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绮丽柔靡的文学风气；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在宗教问题上坚决反对佛教。这三方面在当时都具有进步的意义，因此也不能认为

---

① 《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

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六章

③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下册，第二章。

他是保守分子。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新儒学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对韩愈的研究又兴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有关文章数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论韩愈》①、《读韩愈〈原道〉》②、《评韩愈三上宰相书的价值》③、《评张中丞传后叙〉》④、《韩愈与儒家道统》⑤、《韩愈的天说新论》⑥、《继承旧道统创立新儒学》⑦、《韩愈建立儒学的意义及现代启示》⑧、《理学本体——人性论的建立：韩愈人生思想研究》⑨、《中唐儒学的机遇与迷误：对韩柳思想的新观察》⑩、《论韩愈、李翱思想的历史位置》⑪等。其中邓小军的《唐代中国文化宣言——韩愈〈原道〉论考》一文，首先考证了《原道》的写作时间。作者不同意以往研究者关于《原道》是写于永贞元年(805)的说法，而认为《原道》应写于元和八年(813)至元和十二年(817)之间。作者认为，《原道》所针对的历史现实是元和时期佛教势力的膨胀；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不仅是佛教，而且是佞佛的君主；所要解决的最尖锐问题是依据中国文化的两大原则，即夷夏之辨和道统学说来正君。作者在文中并详细叙述了道统思想在韩愈之前的发展过程以及韩愈在《原道》中所阐述的道统学说的全部意义。张清华的《继承旧道统，创立新儒学》一文，主要是从韩

---

① 《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南开学报》1989年第1期。
③ 《锦州师院学报》1989第4期。
④ 《安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⑤ 《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⑥ 《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7期。
⑦ 《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
⑧ 《学习论坛》1994年第4期。
⑨ 《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
⑩ 《福建论坛》1993年第3期。
⑪ 《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以及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韩愈一生的全部活动无不是以儒学道统贯彻始终，做为他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他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他使儒学更加精致细密，有深刻的内涵；他所创立的儒学体系又为宋儒所继承丰富。因此可以说，韩愈在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历史价值不仅高于同时代人，而且在他前后约两百年的历史上也没有人可与之比肩。

上述张清华的这篇文章，最早是在 1992 年 4 月在韩愈故里孟县举行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这次会共有海内外学者一百四十余人参加，提交论文七十余篇，集中讨论了韩愈的历史评价、儒学思想、文学成就等方面的问题①。在对韩愈的历史评价方面，除张清华的意见外，任继愈先生的意见也十分引人注目。他是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上对韩愈进行评价的。他认为从秦汉至鸦片战争，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对矛盾协调得好，即是盛世，协调不好即是乱世。而要协调好这对矛盾就要有理论上的准备。汉儒讲五经，宋以后四书取代五经，叫新儒学。四书对协调这对矛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都有积极作用。从五经到四书有个过渡，韩愈及其弟了李翱推重《大学》、《中庸》和修、齐、治、平，启后之功甚大，故尤为宋儒所重，韩愈就是开启新时代的伟人之一。此外，龚道运、邓小军、李保霖、何法周、彭功智、汤贵仁等先生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韩愈做了肯定。但徐述修先生却对韩愈的儒学思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韩愈之辟老表明他思想迂阔，层面不高，

---

① 关于会议的报导，可参见《中州学刊》1992 年第 4 期。

道理不明，成见过深，参悟力有限。

除以上各家意见之外，冯禹在《中唐“天论”新探》一文中，还曾经对韩愈的“天之说”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把韩愈关于“天”的理论简单地说成是宗教唯心主义观点，是沿袭先秦宗教唯心主义的旧说，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1)韩愈的“天”是与“元气阴阳”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多少带有一些自然属性，与西周宗教观念中那种人格化的活龙活现的“天帝”有所区别。(2)韩愈所理解的“天”的意志，与以往任何思想家所理解的均不相同。他所认为的天的意志与人的意志是截然相反的，并指出这是因为天人利益相反的缘故。冯禹认为，韩愈的这个独特的结论中包括着一些合理因素，从客观上提示出人的无节制的生产活动，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的开发利用，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3)韩愈在确定了天人相反的观点之后，并没有陷入听天由命的宿命论的观点上，他并不因此而主张放弃人的道德修养。

关于李翱，杨荣国认为，他的思想体系与阶级立场基本与韩愈一致，但他的唯心主义比韩愈更为彻底，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在人性论上，他虽然也和韩一样，认为人性是自造的、选验的，情则是后天的，受环境影响的，但也并没有承袭韩愈的性三品说，而主张人性善，并由此得出了“重内省，贵直观”的结论①。侯外庐则认为李翱在学术思想上受韩愈的影响非常深，同时也受佛学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不很完整，他所着重论述的只限于人性论和修持方法的问题。他的代表作《复性书》一方面阐述学庸、继承思孟的唯心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输入禅学的内容，加深僧侣主义的色彩。从社会根源和学术源流上看，它是宋明道学、特别是二程理学的先声②。任继愈则认为，在人性论上，李翱修改了韩愈的基本观

---

① 《简明中国思想史》。

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六章。

点，发展了孟子提出的性善说，并为这学说奠定了比较巩固的理论基础；李翱和韩愈一样，也是反佛教的，但理论却比韩愈更细致些，他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僧侣地主阶级伦理观念上的对立，他和韩愈的反佛斗争，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后来唯物主义的反佛斗争的①。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中，任继愈对原来的观点又有进一步补充。他指出，李翱是把《大学》和《中庸》结合起来讲复性的。他特别是继承了《中庸》的天赋人性的说法，并反复使用了《中庸》中的诚的概念，把它做为贯通天人、使人性符合天道的一种手段。但是李翱却没有能把心性修养与儒家的宗法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教人如何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以体现超凡入圣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未能建立儒家自己完整的心性论，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李翱当了佛教的俘虏，陷入了佛教的佛性论而不自知。但任继愈也肯定了李翱的进步性。他指出，李翱不满意于刘禹锡和柳宗元直接借用佛教的心性论，也不满足于韩愈的心性理论，他要吸收佛教的心性论改造儒学。虽然显得生硬，但却是柳宗无提出的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主张的第一次真正实践，也是儒家在心性论方面的较大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李翱的复性说为后来宋儒的心性论做了铺垫。

5. **韩柳异同的比较研究**。章士钊的《柳文旨要》虽然是专门研究柳宗元的著作，但在许多方面都涉及这个问题。刘知渐则从哲学思想方面将二人作了比较。他认为，从天道观上来看，韩愈是相当含糊的，他遵守儒家传统，一般承认上天有知，但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柳宗元则是唯物主义的。不能将两者对立或等同起来，在鬼神问题上，韩愈也主要是继承儒家的看法，对神的态度是祭神如神在，但对鬼（即灵魂）的有无则是模棱两可，对人造偶像却采取极不

---

① 《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五篇第九章。

尊重的态度,并反对宗教。柳宗元则不相信天人感应说,但又承认灵魂的存在,并信仰佛教,也不是一个无鬼论者。在人性观方面,韩愈也继承了儒家学说,但还不及孔子说得朴素,而是继承了孟、荀。柳宗元的人性论则比较接近孔子,不仅比韩愈进步,也比孟子进步①。陈玄荣将韩柳二人所谓的圣人之道、世界观、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方面作了比较后认为,韩柳二人在哲学领域中观点根本对立,唯心唯物泾渭分明;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领域中也是异大于同,柳的思想是韩所不能望其项背的②。王春庭则专就对佛老的态度将韩柳二人做了比较,他认为韩愈反佛立场是坚定不渝的,而柳宗元一心想调合儒佛,说他佞佛也是恰如其分的③。

《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中的《韩、柳、刘、李的天道观与性情论》一章,也在天人关系、三教关系和性情修养诸问题上,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四人进行了比较。

6. **对谭峭的研究**。谭峭是五代时的思想家。有关他的思想研究,主要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十章以及近年来发表的几篇论文。

任继愈认为谭峭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主要表现为:他认为社会的变化和自然的变化是同一根源;他还继承了柳宗元注意势的社会发展观,认为社会的变化是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势力。同时谭峭还对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提出了指责,并以同情人民的立场一再阐发"官逼民反"的思想。在他的著作《化书》中还一再强调无剥削、无压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小农平均主义空想。但任继愈又认为,谭峭虽然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但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没有统一于物质,而是统一于精

---

① 《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 1 期。

② 《简论韩愈柳宗元思想的异同》,《学术月刊》1986 年 8 期。

③ 《韩柳与佛老》,《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 1 期。

神(虚),因此他的自然观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步近智在《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①]一中认为,谭峭把世界万物的本源都归于"虚",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但他又强调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把火、水、云、雪、虹等自然现象看作是动、静的两种物质相互磨荡而引起的,这又含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因素。高令仰、陈其芒的《谭峭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②] 一文中则指出,由于谭峭哲学杂揉了汉唐以来儒道佛的思想,为出入佛道的新儒学家——宋明理学家们从不同方面吸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此文作者还具体指出,谭峭的"虚"、"气"的概念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有深刻影响。他所提出的"化"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他以"虚"和化的世界观来观察社会问题提出的许多进步观点,对宋明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也有深刻的影响。

丁彦祯的《谭峭〈化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一文[③]也对谭峭的思想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作者指出,谭峭在〈化书〉中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表达了同情农民起义的态度,并探讨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主张用"均食"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了一幅君与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治理社会,直正做到"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的理想社会。在哲学领域方面,谭峭突出的是"虚化万物""一切皆化"的观点。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虚构的幻想,谭峭把这种观点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又构成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但他认为先有自然界然后才有社会这一点又是可取的。作者还指出,谭峭这种虚化万物的思想是在继承了《老子》、《庄子》佛教关于空、无、虚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这

① 《历史教学》1980 年 12 期。

② 《福建论坛》1984 年 4 期。

③ 《中国哲学史》1993 年 3 期。

种思想对北宋张载的思想也有明显影响。作者又指出，谭峭在论证他这种虚化万物、虚实相通的理论时，暴露了他明显的逻辑错误和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但他的认识论也有若干合理因素。《化书》虽然以虚为第一原理，但又突出了“化”字，其中所体现的体用不二，道化为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是谭峭哲学中的重要思想。

三、史学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古传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唐朝，国家的统一、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外国、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史学的兴旺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古代的所谓“二十四史”，唐代编纂成书的占八部，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五代的后晋时期又产生一部《旧唐书》。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更是古代不朽的史学名著。此外，还有难以数计的别史、杂史、实录、笔记、诏令等等，构成十分浩瀚的史籍的汪洋，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状况的研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于隋朝史学的研究

隋朝是一个短祚的朝代，但在史学上则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内容。迄今发表过的论文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研究王劭的史学，二是对整个隋代史学作出评价。

1946 年 5 月，傅振伦在《中国史学》第一期发表《隋代一大史家——王劭》一文，考述了王劭的家世世系和生平著述，认为他所撰的《隋书》为纪事本末体，提出“王劭不仅为隋代史家，且创为本末之体，有功史学，良非浅鲜”的见解，对王劭的评价很高。至八十

年代，傅玉璋《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一文[①] 重复傅振伦有关王劭创立纪事本末体的看法。按王劭的史著久佚不传，只能依间接的评述窥其大略，然唐代学者对王劭的史著褒贬不一，而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多称道王劭的《齐志》一书。上述论文皆承袭刘知几对王劭的评论，唯称王劭创纪事本末体史书乃是新的见解。

张孟伦《隋代史学》一文[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隋朝史学的社会政治条件及各个史家的活动，指出隋文帝以外戚身份夺取北周政权、隋炀帝荒淫纵乐，都不可能重视史学，而史书中如何记载隋朝皇帝的这些行为，也使当时的史官十分为难。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王劭主持纂修隋朝当代史，便依《尚书》的记言体撰成《隋书》，只汇集皇帝谕旨、口敕、政府文件，回避历史的善善恶恶问题。魏澹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以东魏为伪，乃是欲为隋朝争正统之渊源，柳䛒、诸葛颍等都写有一些对隋炀帝阿谀谄媚的史书，可见隋朝产生的史书多为仰承最高统治者的鼻息或回避惩恶劝善问题，是不足观采的。

谢保成《隋代史学浅议》一文[③]对隋朝史的发展状况作了更为全面、细致地考察。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 隋代在古籍搜求、整理和前代史纂修方面的情况，列举了隋初大开献书之路，聚集和校勘大量典籍；编写了多种书目，史注、史考一类著述如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王劭《读书记》等等皆受后世好评；前代史的编撰也有许善心《梁书》、魏澹《魏书》、王劭《齐志》等多种，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编年体通史著述即王通的《元经》。第二部分主要考析了王劭的《隋书》，指出《隋书》是一部记言史，在隋文帝禁止私修国

---

① 载《安徽史学》1984 年第二期。

② 载《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③ 载《晋阳学刊》1989 年第 2 期。

史后纂修，实际是一部官修史，不过由他一人“专典”而已。第三部分考述了隋代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以及各类杂史、杂传的情况。通过全面考察，作者认为隋代关于帝王活动和制度方面的史料虽不悉具，但也种类较多，“唯独人的传记严重短缺”，这是由于禁绝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造成的。本文最后辩驳了傅振伦、傅玉璋两先生关于王劭创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说法，认为《隋书》仅记言而不记事，根本算不上纪事本末。此外，谢保成在他的专著《隋唐五代史学》① 一书中，还把隋代史学与唐代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隋代由于统治时间短促，重大历史转折赋于史学上的影响未得充分展示，而为唐初大规模修史和总结史学发展奠定下基础。这实际上已给予隋代史学比较高的评价。

（二）对于唐代史学的研究。

唐代史学繁荣昌盛、内容丰富，官修史、私修史都出现了一些传世名著。近百年来对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略分以下几方面问题，分别介绍其研究状况。

1. **对唐代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唐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建立起完备史馆修史制度的朝代，在传统史学的发展上影响深远。对于唐代史馆的设立始末、组织状况、沿革演变等概况，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即有学者著文考述。例如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一文②认为：“唐代史馆，立制颇简”，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是从唐初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设监修于上，以宰相充之，其下执笔修史者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任；第二期则有了“史馆修撰”、“直史馆”等不同名号，史馆修撰仍以他官兼任，而初入为史官者谓之直史馆；元和六年（811）之后，登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未登朝官入史

①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2 月出版。

② 《说文月刊》3 卷 8 期，1942 年 9 月。

馆者称直馆，并以修撰一人为判馆事，实际主持修史，监修则已虚存名号而已。至于设起居舍人、起居郎以记载起居注，则为史馆之外的史官。本文还指出唐代史馆先是隶门下省，后改隶中书省，在史料征集方面有很健全的制度。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①、赵冈《唐代史馆考》②以及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史学史的专著、教科书，也都注重地叙 唐代确立史馆制度的问题，不少著述指出这是官方垄断史学的表现，但有利于征集与保存历史资料。赵俊《唐初修史机构辨》③ 一文指出：唐初史馆是常设的纂修国史的机构，隶于门下省，而修前代史则与史馆无关，乃是临时在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主持修纂，二者并非一个机构。这澄清了一个许多论著都含糊叙述的问题。除上述各文外，李宗邺《唐朝设馆修史制度的作用》④、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⑤，对唐代史馆制度作了一般性的评介，涉及到史馆撰史以儒术为纲纪的指导思想。孙永如《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⑥比较细致地考述了唐朝史馆的组织状况、修史制度的一些细节及官员设置情况，指出贞观三年设“秘书内省”又称“五代官局”，是修前五代史的馆局，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仍将史馆称“五代官局”。修五代之史是以他官兼任主修官，但参与者有不少官任著作郎者，反驳了金毓黻关于自贞观时起著作郎不参与修史的说法。文章考察出“秘书内省”有称为“修史学士”的史官，认为这是一些有一定史才、初入仕途且无其他官衔或职位卑微的人，在修史中起辅佐作用。而国史馆是另一种史馆，纂修当代史，史官建置已较健全，设有监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等不同级别的史

---

① 《说文月刊》4 卷，1944 年 6 月。
② 《文化先锋》8 卷 10 期，1948 年 5 月。
③ 《求索》1984 年第 6 期。
④ 沈阳师院《教学与研究集刊》1955 年 2 期。
⑤ 《人文杂志》1985 年第 1 期。
⑥ 《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

官，还有称为楷书、典书、亭长、掌固的其他官，并对其身份、职责、设置人数等作了考述。同类学术论文尚有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①。房鑫亮《唐代史馆建制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②一文，认为唐代史馆修书分三个阶段，唐太宗时期为第一阶段，成果最多，风气较正；唐高宗至宣宗时期为第二阶段，风气渐坏，江河日下；此后是第三阶段，官方虽力图重振史馆，终因政治和社会日趋衰败而徒劳无成。作者认为，唐代史馆的设立是利大于弊，馆修史书有许多优越性，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保证了史臣的物质生活，使史家有了切磋之所。史馆修史虽受到一些干预，但唐代史官却无杀身之祸，因此不应夸大皇帝和权臣对修史的干预程度，更不能否定史馆有利于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

2. **对唐代官修史书的研究**。关于唐初官方修成的前代史，学术界研究和评论较多的是《隋书》和《晋书》。瞿林东早在1979年即发表《略谈隋书的史论》③ 一文，指出：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撰述《隋书》，总结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隋书》的史论为魏征撰写，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唐太宗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隋书》史论能够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能够从经济上分析隋朝灭亡的原因，能提出“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即不把兴亡成败归结于一人一谋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其独到之处。文章分析了《隋书》史论对唐初政治的作用、对后世史论的影响，也批评了魏征历史观中的矛盾和史论的局限性。谢保成发表了《魏征与隋书的鉴戒思想》、《论魏征与隋书的进步历史观》等论文④，认为魏征对总结封建社会前

---

① 《山西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

② 《华东师大学报》1988 年第 6 期。

③ 《历史研究》1979 年第 8 期。

④ 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 年第 6 期、《华南师大学报》1986 年第 1 期。

期史学的发展，奠定鉴戒史学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使修史、取鉴和资治形成三位一体，史学作为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应当说是从魏征和《隋书》开始。魏征的鉴戒史学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这一点在我国封建史学发展中是不多见的，是后世许多官修正史所不可比拟的。作者认为：魏征具有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倾向，《隋书》对“神灵之天”持反对和批判态度，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人感应”历史观的影响，并具有历史进化的进步的历史观。牛致功《魏征的史学地位》① 一文同样分析了魏征的鉴戒史观、反对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和历史进化论思想，认为他的历史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对于《晋书》，早在唐朝当代，刘知几就在《史通》中批评其取材不当，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王鸣盛、俞正燮乃至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都贬斥《晋书》为好采笔记小说、褒贬失当、考据不精等等。这些评论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今人的一些论著之中，如王树民在《史部要籍解题》中除了指责《晋书》的某些荒诞内容之外，还认为“《晋书》更为严重的消极面在于散播反动的封建统治思想”。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晋书》的评价出现了评价渐高的趋势，不少著述肯定了《晋书》资料丰富、条理清楚、体例严谨并有所创新，而其缺点其实是大多数旧史书所共有的②。对于唐太宗下诏编修《晋书》和亲自为之撰写四篇史论的动机，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是要借修撰《晋书》炫耀自己武胜于古、文过于古③，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封建统治者“对史学加紧控制的表现④。李培栋在《晋书研

① 《史学月刊》198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仓修良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解题》等书。

③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第 150 页。

④ 邓瑞《略谈唐修晋书》，《光明日报》1982 年 9 月 27 日。

究》[1]长篇论文中作出了细致深入地分析，认为贞观十七年唐王朝爆发皇位继承问题的大变乱，涉及齐王李佑、太子李承乾和大批皇亲、重臣，这件事对唐太宗刺激极大。痛定思痛，后终于觉得必须从发生宗亲内乱的晋朝历史中总结教训，并且为自己辩护和开脱责任，使臣下从中汲取鉴戒，这是他暮年忽生重修《晋书》的主要动机，唐太宗亲撰晋武帝论就是为自己辩解的反映。在这场齐王李佑造反、太子承乾谋反的大变乱中，暴露出大臣们各找依傍和相互猜忌的问题，于是唐太宗要重温晋史，不仅批评晋武帝委任非人的错误以自我取鉴，还评论陆机兄弟"冒危履贵"终于灭族的行为，借以警告臣下。他撰写关于陆机的史论，不是为自炫风雅，因为他不允许臣下编辑御制文集，并非自炫文才之人，其用意完全在政治方面。唐太宗对历史记载他个人的行为始终有畏惧心理，玄武门兵变一事始终萦系心中，而重温晋史，使他觉得自己还是比晋朝得天下更光明正大，因此撰司马懿传论以自我安慰，并示世人，这都是促成唐太宗重修《晋书》和亲撰史论的原因。文章还清理了历代对《晋书》的评价，并得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晋书》的成就在于作出了按统一国家的立场来重编分裂时期历史的实践，创"载记"之体，体现"华夷一家"的思想。《晋书》把晋朝和十六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整理出来，反映出虽在政权分裂时期，每个称帝的政权都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皆不承认分裂是合理的、永久的，这很有意义。作者还考订了《晋书》的编纂时间是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至二十二年七月之间。对此，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2]一文也有同样的结论，这是各自独立研究而得出不谋而合的见解。王天顺《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一文[3]认为《晋书》校阅不细、大事漏载、义例考核不

① 连载于《上海师院学报》1984年第2、3期。
② 《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精，史事和史事发生的时间多有舛误，其文风也不佳，是对《晋书》主要持批评态度的论文，但文中也肯定《晋书》有保存一代史料和起“史鉴”作用。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①一文，主要通过分析《晋书》中《陶潜传》和《陆机传》批判《晋书》对历史的改编，指责唐太宗等不顾历史事实，强行改变历史人物面目的行为。

《梁书》和《陈书》虽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而修成，但在唐初时依靠了官方提供的修史条件，秉承了唐初统治者的意旨，也被视为官修史。赵俊《姚思廉的史学》② 一文认为《梁书》和《陈书》是按以史为鉴的目的编纂的，书中表现了姚思廉既承认天命，又注重人事的历史观。他的史学思想中还具有某些人民性的因素，对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表现出一定的同情。臧世俊的文章仅对《梁书》作出研究，认为其中表现出“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反佛思想”，坚持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以史为鉴的思想。文章指出：《梁书·范缜传》极为赞扬其《神灭论》，推崇范缜迎击众僧辩难的事迹，但对《梁书》因反佛倾向未为当时僧人立传表示遗憾③。赵俊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肯定《梁书》、《陈书》有史料价值较高、文风朴实、叙事简严等优点，也存在着某些曲笔、文饰和史事失载等不足之处④。

唐代实录是官方史学中的重要内容，但大多数久已佚失，今学术界大多从编修人、编修过程等方面进行考证和评析。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⑤就是一篇全面性的考述文章，作者探讨了实录这种史籍形式的起源，并以排列史料的方式叙述了唐代各朝实录的编

---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② 《辽宁大学学报 》1988年第4期。
③ 《梁书略论》，载《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4期。
④ 《梁书、陈书的编纂得失》，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⑤ 《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修人、编撰经过和其中的历史事件，列述了晚唐对唐实录修补的情况，指出唐实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皆多采用唐代实录中的历史资料。文章还对《顺宗实录》的详本、略本予以新的考订，认为今存之详本是韩愈所撰修的原本，略本是经过路随删改后而成。同类的论文还有赵吕甫《唐代的实录》①等，亦对唐实录编修情况、内容特点、史料价值和缺陷予以叙述。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② 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唐代的实录不是为修国史作准备，从篇帙上看，唐实录比国史简要，而唐初是修国史在先，第一部实录恰恰是国史的删节而成。唐代实录就其性质而言，乃是高于国史的"帝王之书"，一般情况下，唐朝君主在位时即已纂修本朝实录，君主逝世时往往要以本朝实录陪葬。文章将唐代实录与国史作了对比，指出作为"帝王之书"的实录比国史秘重，主要供帝王阅读，国史则流传较广，大臣可以家藏，实录的体裁也是杂取编年、纪传而为之。唐朝统治者对纂修实录极为重视，它的记述关涉到对帝王的褒贬，对重要臣僚以何种面目载入史册，关系到列祖列宗、子孙后代，其意义甚至超过个人的生命。因此，唐代发生多起围绕修实录问题上的政治斗争，而唐代每朝实录几乎都历经改撰，可见唐实录乃是正式撰定的、重于国史的帝王之书。

韩愈所修的唐《顺宗实录》是流传至今的唐代实录，成为不少学者注意研究的对象，涉及到编撰和修改的过程、今本《顺宗实录》是否为韩愈所撰以及对其评价等等问题。瞿林东《韩愈与顺宗实录》一文③ 认为韩愈编修《顺宗实录》是以韦处厚的《先帝实录》为基础的，但增补和改动很大；参与修撰的还有沈传师、宇文籍等人；

---

① 《南充师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

②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 年第 2 期。

③ 《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3 期。

纂修始于元和八年(813)十一月，终于元和十年夏，历时一年半左右。韩愈撰述实录的宗旨一是直书，二是精当，能如实记述“宫市”、“进献”、“杂役”等陋政，这是由韩愈有较进步的政见，有操行坚正的品格和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影响所决定的。文章辩驳了《旧唐书》等文献对韩愈史才的非难，指出唐文宗下令修改这部实录是因为宦官们讨厌其中多述“禁中事”且颇为切直，这引起了朝臣的反对，因而负责修改《顺宗实录》的路随也只依旨意略删其中“禁中事”以塞责，改动并不大。作者考订了韦处厚撰修《顺宗实录》三卷是在韩愈之前，指出《旧唐书》将之记载于后是错误的。卞孝萱《论顺宗实录的作者》① 意在反驳学术界怀疑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撰的说法，首先以列表的方式将见于《旧唐书》、《册府元龟》和韩愈文集中的《顺宗实录》文句一一对照，指出三者基本相合，否定对方提出的证据，论证了《顺宗实录》就是韩愈所撰，又将《顺宗实录》与韩愈《永贞行》对照，指出二者口吻如一，见解一致，认为今《顺宗实录》详本、略本皆为韩愈所撰，略本不过只删一些“禁中事”而已。但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意见仍未获一致，张国光在《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② 中仍称今之所见《顺宗实录》乃韦处厚所撰，韩愈之作已经亡佚，但仍可辑佚，并且实际进行了辑佚工作。这不仅在认识上否定今存本《顺宗实录》是韩愈所撰，而且依此认识而付诸了文献整理活动。

与官方史学和和史书密切相关的是唐代高层统治者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这对整个唐代的史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瞿林东《封建史学和封建政治》③一文将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史学思想概括为三点，第一是要以史为鉴，史书应提供前朝政治的得失成败的经

---

① 《南开史学》1984 年第 2 期。

② 《殷都学刊》1985 年第 3—4 期。

③ 《吉林大学学报》1978 年第 5、6 期。

验与教训；第二是史书要阐发封建的君臣关系准则，探究统治方术；第三要完备地记述当代君主的盛业鸿德，为最高统治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因此，唐代史学被统治者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唐代史学深深地打上了唐代政治的烙印”。作者认为这是唐代史学取得很高成就的原因，也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源。瞿林东在另一文中还具体地指出：唐初从唐高祖至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布三篇修史诏书，即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唐太宗《修晋书诏》、唐高宗《简择史官诏》，这三篇诏书体现出对史学的新认识，对唐初史学有很大作用，也是盛唐史学得以发展的政治保证，给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课题制订问题和史学人才选拔问题提出了基本原则①。赵俊、李晓明等分别撰文探讨了唐太宗在唐初史学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对史学采取的扶助措施②。赵俊《贞观年间史评探析》③一文认为“该时史学评论的重心集中于史学价值观问题”，即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作者叙述了唐太宗、魏征及其他一些人的史学价值观，指出这些史学评论者有史家和官吏、统治者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决定了从此官方修史占据优势。认为官方对史学扶持促进史学的发展，而史学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实现。而刘乃寅的文章则从另一角度探讨唐太宗对官方史学的作用，认为他开启了皇帝自观国史的先例，使古来独立的修史制度和传统降低到政治附庸的地位，皇家垄断史书修撰和宰相监修自此成为定制，史学被政治所愚弄，并降到婢女般任人打扮的地位。文章认为唐太宗自观国史造成恶劣影响，后世君主效仿影从，在索观国史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难以启齿、忐忑不安的恨史心理，进而

---

① 《论盛唐史学》，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 年 1 期。

② 赵俊《唐太宗和贞观史学》、李晓明《唐太宗与贞观史学》分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华中师院研究生学报》1985 年第 1 期。

③ 《社会科学家》1987 年第 4 期。

予以直接控制，信史的地位因此而一逝难返①。以上这些评论，实际触及到传统史学与政治结合的利弊问题，也涉及了对古代官方史学总体评价的问题，尚有很广阔的讨论余地。

3. **对刘知几史学成就的研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专著，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早在二十年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就高度评价了《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此后，吕思勉著有《史通评》②，以札记的方式阐释和讨论《史通》中的部分观点。傅振伦撰有《刘知几之史学》③一书，全面分析了刘知几的史学成就及《史通的特点。不少论文和专著将刘知几的生平、思想以及《史通》的取材、版本、源流等等进行了考证和阐述，为深入研究打好了基础。解放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下，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进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初几年，对刘知几和《史通》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至今仍经久不衰。其中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④ 中的《史通评议》以按语形式辨正史实，发挥议论。程千帆《史通笺记》⑤、张振珮《史通笺注》⑥，皆以注释的形式研究《史通》，有解释、有考证、有评论。三书均为研究《史通》的力作。总的看来，史学界对《史通》研究主要集中在刘知几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刘知几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刘知几的史学评论、刘知几编著《史通》的动机和经过、刘知几的学术渊源等方面，以下分别叙述之：

(1)关于刘知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大多数学者认为刘知几具有无神论思想和历史进化的观点，如白寿彝、侯外庐、卢南乔、任

---

① 《唐太宗自观国史初探》，载《固原师专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② 商务印书馆，1934 年出版。

③ 景山书社 1931 年出版。

④ 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

⑤ 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 版。

⑥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继愈等人在文章中皆持此论，主要根据是《史通》对董仲舒、班固等人将灾异附会人事的若干说法进行了批驳。白寿彝认为刘知几“在理论上达到了无神论并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并且指出刘知几反对符瑞之说是针对武则天、唐中宗等最高统治者的神学把戏，“通过文化批判折射出对政治的批判。”① 侯外庐认为刘知几“思想基本上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而反对董仲舒一流的神学和以神学世界观曲解的历史。”② 任继愈认为刘知几“反对神学的历史论著给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的历史观准备了理论前提。”③ 主张刘知几有无神论思想的学者，大多也注意到《史通》中不否认某些灾祥征验。对此，白寿彝解释为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是“无神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任继愈将之看作是刘知几有些迷信思想残余。说法虽微有差别，但都认为刘知几思想的主流是无神论，这种观点已被后来许多专著、教科书所采纳。

王玉哲的文章反对将刘知几说成无神论者，认为在《史通》中，“刘知几驳斥的不是灾异本身的不可信，而只是驳斥和揭露从董仲舒到班固那些汉儒们对灾异解释的不确。”文章认为：刘知几在原则上是相信鬼神灾异的，主张史书要“旌怪异”(《史通·书事》)，还说“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史通·汉书五行志杂驳》)，这哪里是无神论者呢？王玉哲的文章还提出了判断古代是否为无神论者的标准：“只要对鬼神灾异在理论原则上(不是在个别实在例子上)提出否定或怀疑，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无神论者。”④ 这样，王充、范缜的思想虽有局限性，仍不失为无神论者，而刘知几无一处在原则上怀疑、否定鬼神和灾异的灵验。这篇文章提

① 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② 侯外庐《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③ 任继愈《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
④ 王玉哲《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载《文史哲》1962年第4期。

出的问题还须作进一步探索，其意义和范围当不限于对刘知几一人的评论。

赵英在《史通新论》中认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他批评班固，并不是要人们不信天命，而是批评班固未能充分阐发神意。总之，刘在几的历史观是天命论与英雄史观的杂揉，他的重人事就是一只脚站在英雄史观的船上①。

对于刘知几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其他方面，史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大抵皆认为刘知几具有历史进化观点，不盲目崇拜古代和迷信圣人，主张史书应“直书”、“实录”等等。关于刘知几所提出的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杨翼骧指出：刘知几“史识”的内容之一是“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旧唐书・刘子玄传》），这就包括了史德的内容②。仓修良对此理解不同，认为“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已超出了“史识”的范围，史识不应包括史德的内容③。许凌云则将刘知几的史家必须具备“三长”的论述归结为史家主体意识，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④关于《史通》一书的主导精神，学者之间的看法存有差异，白寿彝、侯外庐认为“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即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哲学研寻的精神。陈光崇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刘知几并没有提出“通识”的概念，而且刘知几是不推重通史的⑤。卢山红《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⑥认为《史通》是主“通”的，但他的主“通”确有与司马迁之“通古今”不同的意义。《史通》中的“通”有两种形

---

①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② 《刘知几与〈史通〉》，载《历史教学》1963 年第 7—8 期。

③ 《“史德”“史识”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 3 期。

④ 《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载《孔子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⑤ 《史通札记三则》，《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5 期。

⑥ 《汕头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式，一是详始究终的纵通，二是网罗广大的横通，刘知几以“通识”作为评价史书的主旨，即要求史书应广博而能返约的融会贯通，纵贯而知变化，并能成一家之言。而卢南乔提出：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最基本方面在于对传统的、正统的史学作斗争。对于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局限性问题，杨翼骧指出：他虽有许多论点能够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终不能完全冲出封建名教观念的窠臼，例如他赞成为君亲隐讳史事等等①。代继华试图从经史分合的关系上探寻刘知几勇于“疑古”、“惑经”与其思想局限性之间矛盾的根源，认为刘知几是从“经史相分”出发，尽量把对《尚书》、《春秋》的评说限定在史学范围而巧妙地创作了《疑古》和《惑经》。但经史相分的同时是经学原则日益支配史学，这造成了刘知几在《惑经》的同时也有对儒学经典虚美赞颂的一面②。

江湄《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③ 一文，认为刘知几构筑了中国史学上第一个严密的伦理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深远。这种伦理主义史学抛弃了通古今之变的精神，伦理教义代替了历史意识。文章提出：“史以载道”是伦理主义史学的宗旨，这虽然日益显示出肤浅乏力，但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主流；“直笔”是史家以道自任主体意识的自觉体现具有理性特征；断代纪传体是伦理主义史学的最佳载体。

(2)关于刘知几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史学界普遍承认他对传统史学的发展、对传统历史学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杨翼骧在文章中从史料学、史书体例、史书记述内容、文与史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刘知几的主张进行了分析，指出刘氏“所提出的许多建议，都丰富了封建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起到了革除积弊、推动史学进步的

① 《刘知几与〈史通〉》，《历史教学》1963年第7、8期。

②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2期。

③ 《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作用。白寿彝分析了刘知几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主张，指出其见解都是跟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相联系的。其后历有论文专论刘知几某些方面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如专论刘知几在历史文学方面见解的有李成良、邱远应《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蔡国相《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韩盼山《刘知几史传文的写作观念》① 等等；专论刘知几在史书体例方面主张的有许凌云《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杨绪敏《论刘知几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和影响》等等②。诸如此类的文章大多能对刘知几的主张一分为二地分析，既肯定其合理部分，也指出其缺点。如许凌云的文章即批评了刘知几在史书体例上执论过死，把体例的整齐划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而他将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视为史书中必备的重要内容，也属于见识不高。

(3)关于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杨翼骧指出其特点一是评论有据，不徒托空言；二是兼指得失，有比较客观的态度；三是批判尖锐，语言泼辣；四是评论他人史著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史通》对前人著作的批评，"虽然有的不见得恰当，在文词上也有不少过激之处，但主要是表现了对史家的严格要求，无情地揭发了著作中的不良现象，对于提高后世著作的质量，促进史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③赵俊《史通方法论》④分析了刘知几进行史学评论的方法问题。许凌云著文分析了刘知几在评论纪传体史书时的许多失误，其中重要一点即贬抑司马迁而赞扬班固，将《汉书》的地位置

① 分别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1 期，《锦州师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河北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② 分别见《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徐州师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③ 《刘知几与〈史通〉》，《历史教学》1963 年第 7、8 期。

④ 《华东师大学报》1988 年第 6 期。

于《史记》之上[①]。对此，贾忠文不以为然，他认为《史通对《史记》、《汉书》同有批评和赞扬，明确地肯定过《史记》是纪传史之祖，因此无论在主观意图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都没有"抑马扬班"[②]。赵俊《史通中所见之史学批评范畴》[③]试图从分析刘知几在使用史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入手，揭示其思想本质和评价其影响。赵英则认为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乃以维护封建史学严肃性为目的，他把史学批评纳入正统史学的轨道，要求史书按封建正统思想惩恶劝善，褒贬人物依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后世封建史家在官修前代史中表彰为故国殉节的臣僚，即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影响[④]。吴荣政《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⑤] 虽仅对刘知几评述过的书籍予以统计条列，但极有助于全面认识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特点和成就。文章勾稽、统计、分类叙列《史通》全书评论中触及的作者和书籍，总数共340 种，其中经部 39 种，今存 22 种，有辑本者 14 种，已佚 3 种；史部 239 种，今存 36 种，有辑本 84 种，已佚 119 种；子部 46 种，今存 23 种，辑本 17 种，已佚 6 种；集部 16 种，今存 5 种，辑本 7 种，已佚 4 种。一一写出书名、作者及《史通》评及较多的篇数，并纠正了明代焦竑统计的疏漏、舛误以及其他学者的不准确估计。

(4)关于《史通》编写的动机、经过等问题。傅振伦提出：《史通》的编写动因应分远因与近因二种，远因是自幼读史，发现其中多有谬误，因而久有著书论史之志；近因是在史馆任职不能行其志，遂发愤著书。他认为《史通》开始编撰的时间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史通》外篇是内篇的底本，全书至唐玄宗开元初年尚未搁

---

① 《刘知几"抑马扬班"辨》，载《江汉论坛》1984 年第 11 期。

② 《史通抑马杨班再辨》，载《江汉论坛》1990 年第 10 期。

③ 《江汉论坛》1992 年第 8 期。

④ 《史通新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⑤ 《湘潭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笔,《史通·忤时》即成于开元年间①。程千帆提出"内外诸篇,互有后先,及其既成,始定谁属耳。"②乔治忠《〈史通〉编撰问题辩正》一文中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刘知几的学术目标有一个从对众史"刊正其失"到创明史学理论的转变过程,他撰写《史通》的动机有二,一是在史馆不能行其主张而退职发愤著书,二是感觉当时史官多不懂史书义例而欲创明史学理论。从《史通》中有些极易发现的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而未能改正来看,说明全书未经修改删润。本文认为《史通》始撰之年为神龙二年,反对始撰于长安二年的说法,并且提出外篇成书于内篇之后的观点,对外篇在史学见识方面比内篇有所进展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认识的逻辑规律上提出了论据③。

(5)关于刘知几的学术渊源。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冠三认为:《左传》、《论衡》、《文心雕龙》是刘知几建构实录史学的三大支点,《史通》各篇原是循此三者所启示的思路与纲领写成的④。谢保成认为《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写作有很大影响⑤。还有人认为《孟子》也是对刘知几有所启发的,其论证的方法大致是将《史通》的主张与前人的主张予以对照,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白寿彝注意到在唐代已经形成一个与刘知几主张相近、互有联系的学派,即《史通·自叙》特别提到的知己好友徐坚、朱敬则、吴兢等七人。他们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成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⑥。这实际上也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刘知几有一个思想和见解都相近的学派,那么其学术渊源是否应从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方面探

---

① 见傅振伦《刘知几之史学》第一、二章,景山书社 1931 年版。

② 程千帆《史通笺记》内篇按语,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③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大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

④ 《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 2 辑。

⑤ 《〈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⑥ 《刘知几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寻？赵俊《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①] 一文即试图从世族地主和新兴地主两个官僚集团在史学上的矛盾、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上分析刘知几见解的成因和《史通》在矛盾冲突上的立场。因为刘知几在这两大矛盾中均站在进步方面，所以《史通》能够获得超人的成就。

杨绪敏《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②] 一文认为，《史通》在整体结构上和文体上仿效了《文心雕龙》，在史学功用、为尊贤隐讳和反对曲笔等史学观点上也大体一致，但关于为皇后立纪问题上刘知几的见解较为进步，而《史通》的"惑经"是与《文心雕龙》的"宗经"对立的。作者认为不可忽视两书的联系，又不能简单地把《史通》说成《文心雕龙》的仿效物。许凌云则承袭学术界已有的观点，特别强调刘知几倾向于古文经学，继承孔子学说，深受司马迁、王充学术思想的影响[③]。

上文仅择要叙述了史学界对刘知几史学的研究概况，不可能将有关的论点和论据一一介绍。但仅从上文即可看出，对《史通》的研究一方面已经相当深入，一方面还存在不少必须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可以想见，在今后的研究中，《史通》还将有其显著的地位。

4. **对杜佑《通典》的研究**。杜佑的《通典》是唐朝中期一部杰出的历史名著，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创始了典章制度专题内容的通史，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一点受到史学界普遍的赞扬。李之勤撰文着重强调了杜佑的历史进化论思想，认为"杜佑在论述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时，实际上通过具体制度的变化，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的变化、进步、发展。"[④] 陈光崇具有同样

① 《江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② 《黄淮学刊》1989 年第 4 期。

③ 《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载《齐鲁学刊》1992 年第 1 期。

④ 《杜佑的历史进化论》，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的主张，还叙述《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上的卓越贡献，分析了杜佑将"食货"置于首位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①。葛兆光则从唐朝中期的社会背景、学术思潮上分析了《通典》产生的原因及历史地位，认为中唐在士大夫中有一种疾呼改革弊政、议论朝政得失的风气，史学也形成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潮，这个思潮分为"将施有政"为目的的一派和注意义理、褒贬的一派，《通典》为前一派的中心著作。王叔文改革失败之后，随着政治局势变化，史学也日益退步，重义理阐发和人物褒贬而不重历史沿革的一派占了上风。因此，《通典》是中唐史学的分水岭。本文分析了《通典》对前人和当代人思想的吸取，申明了杜佑的巨大史学贡献②。瞿林东从《通典》的逻辑体系上予以分析，认为《通典》史学方法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还指出《通典》的旨趣乃是经世致用之旨，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的先河，并分析了经世之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他从经济思想、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杜佑的经世致用主张③。瞿林东在另一文中提出：《通典》在历史编纂学上有三点创新，即主会通、立分门（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与重议论，以会通贯串古今，以分门囊括制度，以论议阐述原委、指陈得失，从而开拓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新域，意义极为深远④。论述杜佑《通典》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的还有王锦贵、廖晓晴、章见等人的文章⑤。多数论文皆认为《通典》是中国古代一部典章制度通史，但谢保成对此提出异议。

---

① 《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② 《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③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

④ 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 年 2 期。

⑤ 文章分见《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6 期、《吉林师院学报》1995 年第 7 期。

他在《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1] 一文中认为，杜佑著《通典》的目的"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并非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从其内容上看，《通典》是"一部完整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或者说，是一部反映古代体制变革的巨作。"从这种分析出发，文章认为许多论著指责《通典》在"礼"上内容繁冗，是未明了杜佑的著史旨趣。其实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重在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指出了上古三代的粗鄙落后，是杜佑"探政理"最有价值的一点。

与史学界大多数有关学者的看法不同，朱维铮《论三通》[2] 一文对杜佑的《通典》持基本否定和批判的见解，认为《通典》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成风，把"食货"置于全书之首位，在历史编纂上虽是首创，但从历史认识史上看不是杜佑的发明，中国古代早就有重视衣食、经济因素的论断，不值得对《通典》大加赞誉。文章认为杜佑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即主张《周礼》出现后的封建制度以相因为主，人们将《通典》称颂为"有用之学"，是将缺点说成了优点。剑光、国慰合写的文章虽未根本否定《通典》，但却专究杜佑思想的局限性。文章认为杜佑经济思想上向往井田、均田制度，反对农民经商并实际打击过商业，皆是严重的思想局限性。《通典》将食货置于首位，但杜佑还是主张礼仪、教化为治国之本。在历史观上虽主社会进化，但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3]。

关于《通典》的编撰问题，相沿已久的说法是杜佑参照了刘秩《政典》，或从中受到了启发。而李之勤的文章则提出："不论在政治观点上、学术思想上、编辑体例上、记事内容上、取材范围上和全书分量多寡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杜佑《通典》全然因袭

---

① 《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② 《复旦学报》1983 年第 5 期。

③ 《杜佑思想局限性述论》，载《思想战线》1994 年第 4 期。

《政典》,更不是攘窃①。关于《通典》成书时间,日本人玉井是博提出:杜佑于大历初年起稿,不出六年即已成书,后来直至贞元十七年才进书,这三十余年皆为补充、修定时期,而且进奏后仍有补笔②。

5. **对唐代其他史学问题及总体或分阶段的概括研究。**与唐代史家众多、史籍丰富的状况相应,对唐代史学的研究也呈现得丰富多采,研究对象十分广泛。除上述研究得比较集中的问题之外,还有不少分别论述其他史家和史著的学术文章,如对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研究,对《南史》、《北史》的研究,对吴兢及《贞观政要》的研究,对韦述、朱敬则、刘秩、许敬宗、柳宗元史学主张与史学著述的研究等均为唐代史学的内容。许多论文不是针对一人、一书加以评价,而是综合一类史学现象研究、评述,如关于唐代谱学问题、唐代历史地理学问题、唐代政书、唐代通史撰述问题等等。更有不少论文截取唐代一个阶段如盛唐、中唐以论述其史学发展的整体趋向,这与抽取同一类史学现象予以研究一样,具备更广的探索视角,容易触及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史学潮流问题。对史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更进一步,自然是对整个唐朝史学的评述,甚至是隋唐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或更长时期史学发展的考察,这些考察、研讨只要以唐代史学为核心内容,均可看作研究唐代史学的延伸和辐射。综上可知,在一些热门、重点史学研究对象之外,其余的个案性研究、归类性研究、阶段性及总体性研究点线杂陈、纵横交错,构成多采的唐代史学成就的图景,对于全面了解唐代史学发展与文化状态甚为重要,以下拟对这些研究成果择要而略述之。

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虽仅三卷,但较受学者重视,早在

---

① 《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② 《通典的撰述与流传》,《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

三十年代罗香林即对此书有过考述①。牛致功、李季平先后发表题目略同的《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论文②，评述了温大雅的事迹及其著述的内容，肯定其书的史料价值。但在成书年代上略有分歧，牛文认为温大雅是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李文认为是成书义宁、武德间。宋大川《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年代考》③ 对此作出了细致的考订，文章从温大雅任职经历入手，分析了他可能具有编撰此书的思想起始和获有余暇的时间，认为温大雅要在武德三年(620)初李唐政权形势好转，有可能统一全国之际，才会想到撰写此书。他作为李世民的属下，书中记述了李建成的不少功绩，且称其为"皇太子"，这应在武德八年底李世民与李建成斗争激化之前。因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就成书于武德三年至武德八年之间。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久列于"廿四史"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也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胡适、魏洪祯分别撰写过《读〈北史〉杂记》与《读〈南北史〉随录》④。瞿林东《南北史散论》是从史学史角度研究这两部史书的，文章认为李延寿虽改变了其父李大师原作编年体史书的计划，改撰为纪传史，但完全承继了李大师倾向于统一的思想，这表现于全书的结构和内容中⑤。高国抗《一部倾向统一的正史》⑥亦肯定李延寿倾向于统一的思想，认为《南史》和《北史》虽分为二书，但其中有许多互见之例，是一个整体，"这是李延寿倾向统一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的表现"。文章不承认其中按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载《史学集刊》2 期，1936 年 10 月。

② 分载《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文史哲》1984 年第 2 期。

③ 《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④ 分见《中国文学季刊》1 卷 1 期，1928 年 8 月；《责善半月刊》2 卷 23 期，1942 年 11 月。

⑤ 《南北史散论》，载《史学月刊》1981 年第 1 期。

⑥ 《暨南学报》1989 年第 1 期。

家世编次立传是缺点，认为这可使史文简洁，而李延寿并不隐讳世家大姓的没落，并没有门阀世族的意识。谢保成《倾向统一不是〈南史〉〈北史〉的主题》① 独出异论，认为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其父李大师的著史宗旨，倾向统一仅仅是李大师的思想，到李延寿时，统一已不是时代的中心议题。李大师原拟用编年体统载南北朝史事，这是有利于表现倾向统一思想的，而李延寿改用纪传史，是为了方便表现家世世族的关系，适应唐太宗晚年至唐高宗初年统治集团内部贵族、寒族斗争和关系调整的需要。《南史》、《北史》毕竟是二书，即使有互见的联系，也是承认和明示国分南北的现实，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在二书中重复立传，与倾向统一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李延寿与其父异趣，他自己都没有倾向统一的撰史宗旨，今人无必要将此加于其头上。

研讨《南北史》的还有《南北史之正统观》、《〈南史〉〈北史〉价值研究》等文②，前一文作者何德章认为李延寿是以北朝为正统，罗列了许多证据，并与清人王鸣盛的说法一致；后一文作者金家诗分门别类评析李延寿的著史宗旨，强调他是按儒家思想撰史，向统治者提供鉴戒。

另一部较受学术界注重的史书是吴兢的《贞观政要》，吴枫、瞿林东等多人曾撰文研讨。关于此书分类记述一朝政治史事的新颖体式，本书的史料价值及吴兢的史学贡献、编撰动机等等，学者间的意见基本一致，而在成书年代上则见解不同。瞿林东认为成书时间当在开元十七年(729)之后，即开元、天宝之际，否定吴枫依据宋人王应麟说法提出的开元八、九年之说③。谢保成认为吴兢自开元

---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② 分别载《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青岛师专学报》1993 年第 4 期。

③ 《吴兢与〈贞观政要〉》，《河南师大学报》1979 年第 6 期。

五年(717)开始编录《贞观政要》,开元八、九年间加紧撰写,开元十七年伺机进呈,却遭唐玄宗贬谪①。对此,尚有其他论者的不同意见,考订方法均为清理这一历史时期与吴兢有关的唐朝历史、涉及了许多官僚所任官职以及政治态度问题,文繁不录。

瞿林东《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②认为令狐德棻虽然没独立撰成大部帙的史著,但参与官方许多史学活动,唐初修前代史的建议也是他提出的,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唐代史学的开山"。瞿林东还对柳宗元的史论予以研究,在《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③一文中认为《贞符》、《封建论》等已是对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充满了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和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非国语》表现了史学评论上的批判精神,《与韩愈论史官书》强调了史家信念和职责。此外,如陈光崇《刘秩事辑考》、《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④、孙永如《刘肃〈大唐新语〉及其史料价值》⑤、瞿林东《韦述及其治史精神》⑥、牛致功《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⑦、许凌云、王洪军《朱敬则的史学思想》⑧等等论文,皆是对某一史家的具体研讨和评介。

对一类史学现象的研究展示着学者考察唐代史学的不同角度。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⑨认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组成部分,是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继续和发展。考述了谱学上的主要作者和主要著述,分析了谱学在唐代士、庶地主间斗争中的作用。史念海《唐

---

① 《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② 《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

③ 《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④ 分别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1984年第2期。

⑤ 《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⑥ 《历史知识》1981年第3期。

⑦ 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⑧ 《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⑨ 《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

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①勾稽唐代的有关著述，剖析了一些重要著述的内容特点，认为"唐人论述地理，却往往追溯前代，甚至是以古证今，说明由古迄今的演变"，具有历史地理学的特征。牛致功《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②，认为唐初史学家"抛开了南北朝史学家那种民族观与正统观的一致，走向了民族观与统一观的一致。"唐初史著没有了民族歧视，但仍将侵犯中原地区、破坏统一的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瞿林东《史学家和政治》③一文考察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观念等都表现着史家的政治情怀，经世致用更是其出发点和归宿。文章特别分析了唐代史学直接或间接影响及于重大政治决策的问题。牛致功《唐代的史学与佛教》④一文，认为唐代史学的特点之一是与佛教发生密切关系，有关佛教的史著增多，佛教的盛行丰富了史书内容，佛教也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观。瞿林东还对唐代的通史性著述予以探讨，考述了各类通史著述的基本内容，认为唐代在通史撰述上有发展和创新，中唐以后成果辉煌⑤。耿天勤《论唐代政书的崛兴》探讨了唐代政书兴起的原因和影响⑥。

张振佩《隋唐史学划时期的意义》⑦一文追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认为隋唐时已达到新的阶段，是在大一统条件下改革了过去的史学，而隋王通见解启其契机唐刘知几的论述为座标，不应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视为一个发展阶段。而瞿林东则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走向发展的时期，把这作为

---

① 《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② 《人文杂志》1988 年第 4 期。
③ 《史学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
④ 《陕西师大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⑤ 《北京师大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⑥ 《山东师大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⑦ 《贵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一整个阶段，考察了社会背景、史著及历史思想的基本状况①。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②一文，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史官制度等方面勾勒中国史学从魏晋南北朝向唐代发展的脉络轨迹。这些跨朝代的论述，其实也是以唐代史学为注重点的。另外，张旭光《唐代史学述要》③、瞿林东《论盛唐史学》④、王家平《唐代史籍的繁荣及其原因》⑤等文均叙述了唐朝史学兴旺发展的成就。

史学界对中唐史学的发展比较注意，前述葛兆光的文章在评析杜佑史学时，指出中唐出现经世一派和注重义例、褒贬一派的两股史学潮流。瞿林东对此亦发表见解，在《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⑥一文中，提出三个方面的新发展：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加强。关于"自我意识"问题，文章列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重新认识"良史"等内容，均为不时出现的史学理论上的论述。谢保成《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一文⑦ 认为：《春秋》学对中唐史学的影响，首先是形成"以史治心"即以史学进行伦理教化的史学功用观念，出现"空言义理"趋势。这又直接引起修史制度、撰史义例和修史思想的变化。中唐以后编年史的兴起以及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争论，也是《春秋》学的影响下出现的。历史笔记、一些奏议、诏令集的出现，也与《春秋》学影响有关。这就将史学的发展演变与经学联系起来，拓展了研究的思路。此文之前，谢保成曾发表《关于

---

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云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

③ 《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④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⑤ 《营口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⑥ 《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⑦ 《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

唐代史学地位的几个问题》①，文中对中唐兴起的编年史和通史，对历史笔记脱胎于小说家言等问题已予以注意，认为这展示了其后史学演变的趋势。同时，文章也论述了唐代在史学功用方面的认识。很显然，将这些视为《春秋》学影响下产生，是作者在原有认识上的进一步探讨。

三、对五代十国时期史学的研究

五代时期史学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唐代，但仍有可观的成就，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即产生于后晋一代。近年来，有不少著述对《旧唐书》的编纂过程进行了清理，对其中的内容作了史料上的校正考订，而从史学史角度的研究尚不多见。刘节遗稿《旧唐书的修订与研究》一文② 叙述了其书的编辑修订过程，认为是在公元 927 年至 945 年之间成书的。文章还叙述了版本源流，考察了修书时的材料来源，认为"凡是《旧唐书・经籍志》中所不著录的唐代史料，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作《旧唐书》时未经采用。"本文还介绍了自宋代开始的对《旧唐书》研究评论的史事。

谢保成《刘昫》③一文，实际内容是对《旧唐书》的研究，文章叙述了《旧唐书》的纂修经过，说明赵莹对纂修此书出力较多，但因已罢相而未能竟其业。《旧唐书》"纂修须按于旧章"，唐宪宗前主要依据唐代国史和实录，纪传史论中今仍多有唐代史官姓名。行文中多保有唐人语气，且多直录唐代实录之文。文章认为，这使《旧唐书》中多反映出唐代各时期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如比较注重"食货"，记述少数民族史较多等等。同时，文章也指出了它有着公开承认藩镇的某些政权的倾向，这是五代时期的思想意识。编次上粗疏

①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② 《中山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

③ 《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零乱也是其缺点。张高玉《旧唐书纪传编修体例考述》① 一文分三部分，第一考述了《旧唐书》依据的史料，第二考其本纪体例，第三考其列传体例。文章条列了收入本纪的内容范围，比较了前后内容的差别，指出了列传所收人物的标准。

朱仲玉《五代十国的史学》②综合叙述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史学概况，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史馆制度的延续及其成就；稗官野史为数众多；培育了大批史学人才，有较好的史料征集方法。本文作者还曾撰有《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一文③，分别对官修史、史评、典志体史书、方志、类书的撰述和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谢保成《谈五代十国的史学发展》④ 从《旧唐书》的修撰、官方修史制度、私人撰著等方面予以述评，特别指出此时史馆立有奖惩、出现了《史馆故事录》一书记述和总结史馆制度，很有意义。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史学发展异常繁荣，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不可能一一叙述。但了解其中基本的研究状况，对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极有裨益，史学乃是社会历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总的看来，对隋唐五代时期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于学术论文上。除关于刘知几《史通》的几种著述外，值得注意的学术著作目前有两种，即瞿林东的《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3 月出版)，这是作者历年发表论文的集结，题目有所修订，集中地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心得，涉及到唐代史学多方面的内容；另一种是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2 月出版)，为一部成体系的专著，但也同样融汇了作者历年发表论文中的见解。

---

① 《河北师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② 《史学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③ 《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5 期。

④ 《河南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这两种著述在研究对象上多有相合，学术观点固多近似之处，而不同见解亦很明显，读者对照研读，定有很多收益。

四、文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达到全面繁荣，尤其是诗歌，可以说是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仅有唐一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诗歌就有近万首，著名的诗人有五、六十人。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唐诗是中国人民的智慧与感情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另外，唐代的散文、小说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总的来说，唐代名家辈出，体裁齐备，名篇浩瀚，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兴盛局面，不但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文学既是古代发展的结晶，也对古代文学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对隋唐文学的研究，如果采取不严格的说法，可以说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当时的研究形式约有三种：一是选诗，二是品藻，三是述事。象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元结的《箧中集》就是比较著名的唐诗选本，而且有些选本结合选诗还展开简单的品赏和评论，概述其诗歌成就和风格特点。也有的通过记述作者的事迹和诗作的本事，对诗作或作者作出评论。这些最初的唐诗“研究”，一般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还缺乏总体性的论断。宋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不但编撰了几部重要诗文总集，象李昉等修撰的《文苑英华》，姚炫的《唐文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等，而且进行了大量的诗话创作。这种形式集记事与品评于一体，机动灵活，无施不可，所以在宋代风行一时。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引严维“柳堂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诸诗句，来说明诗家能事在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的道理。《潜溪诗话》、《石林诗话》对杜诗的评论，也有发人深思之处。尤其是到了南宋，以诗话对唐诗的研究正式上升到理论概括的阶段。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对两汉、魏晋及唐宋各代诗歌进行对比并作出的论断，严羽《沧浪诗话》对唐诗性质、特点、分期及历史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可以说将唐诗研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明代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高棅的《唐诗品汇》在严羽《沧浪诗话》的基础上，考辨更为细致具体，是一部体系严整的研究著作。继之而起的前后"七子"及公安竟陵诸文学流派，虽然文学观点不同，偏重点不同，但几乎都推崇唐代诗文，甚至把唐诗视为万古不变的诗歌楷模。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终结期，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不过，这个时期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整理出版了不少唐人诗作的全集、选本，并对唐诗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考笺工作。如汇纂出版了《全唐诗》、《唐诗三昧集》、《唐诗别裁集》，及《杜工部集笺注》、《杜诗详注》、《李太白集注》、《玉溪生诗集笺注》等，在诗人生平的考订，诗作系年，背景材料的挖掘，诗意的探索，文字典故的考校和训释方面，表现出比前人更为精审的功力，显示了有清一代朴学昌盛的业绩。

以上是古代对唐代文学研究的简单发展轨迹。下面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有关隋唐文学研究的概况。虽然这一段的时间不长，还不到百年，但由于新思想、新文化勃然而兴，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思维和新方法，使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自此唐代文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改变了传统的偏重微观研究和具体分析的方法，加强了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有系统的材料基础和理论归纳的专著。如"五四"之后许文玉《唐诗综论》、苏雪林《唐诗概论》，杨启高《唐代诗学》等断代文学概述。还有象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孙良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一类的专题论文。另一特点是注意到了文学的横向联系，如唐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间歌谣对文人创作的影响，西域文化对唐

代文学的影响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和陈寅恪两位。闻一多对唐代诗人和诗作作了大量考辨工作，其论唐初诗风的演变，能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联系入手，为唐诗的百年发展勾划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他所编的《唐诗大系》，选诗自出手眼，又结合诗作对诗人的材料作了订补。闻氏以诗人的敏感与哲人的胆识相结合，在方法论上颇多创新，直到今天仍可作为我们的借鉴。陈寅恪以史家身份研究唐诗，形成自己的特色。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习俗、科举制度、民间文艺、佛经文学等多种领域，展现了文学与人生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使唐诗研究的角度大大丰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他的《韦庄秦妇吟校注》诸篇，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也给唐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建国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首先在唐诗研究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了《全唐诗》及其《外编》，和许多重要作家的别集；为唐代诗文的几个大家作了新的校注及考订。另外出版了一批唐代诗文的选本，有学术性的，也有通俗读物。至于论文论著就更多了，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者，分类作一概括。下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唐代边塞诗，唐代古文运动，唐代传奇，敦煌变文及隋唐文学思想等。

（一）唐诗兴盛的原因

这是一个唐诗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建国以后，对此问题阐述最完备、影响最大的是先后问世的几部文学史专著。1958 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概述之后，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诗人地位的转移。唐前诗人多为达官贵族，唐代诗人大多出在民间，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对

社会现实有深切的体会。作者举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诸人为例，说明唐代诗人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另外“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对文学的普及与解放有促进作用。二是政治背景。唐代统治者如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实行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统治者的提倡，自然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和繁荣。三是文学的自身规律使然。六朝开始形成的七言古诗和新体诗，在形式、音律、词藻等方面均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唐诗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使命”。

北大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唐诗兴盛的原因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原因的作用：“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除此之外，该书还谈到以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文化艺术其他门类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诗歌自身发展规律。这些与刘大杰所论并无多少区别。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格外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指出经济的繁荣稳定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基础：“经济的繁荣是唐代国力强大的基础，也是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的基础。安史之乱严重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战后恢复的经济虽不如开元、天宝时代的繁荣，但也获得相对的稳定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

域和它以南的地区，因没有直接受到这次战祸的影响……农业、手工业既有所发展，商业更得到繁荣，为唐代中叶及其以后的文学的繁荣准备了物质的条件。”除此之外，该著还广泛涉及到哲学、宗教、文化政策及科举制度的作用。

出版于1963年的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唐诗的繁荣“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对唐代的社会历史条件，该书概括了三点：一是经济的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国力的强大和交通的发达；二是实行科举考试和采取开明的宗教文化政策，激发了出身中下地主阶级的文人在事业上进取心和思想上的活跃；三是国家空前统一，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开阔了作家的视野并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文学本身的发展变革，该著所论亦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二是唐代君主普遍重视诗歌，尤其将诗歌列为进士科考试的重要内容，促使一般文人都很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形式的掌握；三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另外还有几家文学史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侧重点不同，除刘大杰之外，大都将经济原因放在首位。

对此问题建国后学术界还发生过两次争论，是因为两种唐诗选本的《前言》引起的。一次是六十年代中期对马茂元《唐诗选·前言》① 的批评，另一次是七十年代末期由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前言》② 引起的。马茂元认为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不言法”，也就是不受创作方法的约束，而且把诗法称为“教条主义”。另外还强调唐代诗人继承优秀的诗歌传统并向民间文学学习，也是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两个重要原因。批评者认为不能将诗法看作教条主义，而且不同意这一点是唐诗繁荣的原因。但批评者并没提出正面见解。第二次讨论影响较大，持续了数年之久。文研所《唐诗选·前言》在进行全面分析的同时，强调经济基础及阶级基础的作用，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前言》认为“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唐诗思想内容“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梁超然就此观点发表《就唐诗繁荣原因提几个问题》① 一文，认为将唐诗的繁荣与经济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并且不同意将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基础及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作者还认为《前言》作者忽视了诗歌艺术发展的自身原因。紧接着又有皇甫煃《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原因》② 一文，针对《前言》中将以诗赋取士视“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皇甫文认为初唐诗歌的繁荣才影响和促进了以诗赋取士而不是相反，当然以诗赋取士成为制度后又反过来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但主要是前者。后来又有张碧波《略说唐诗繁荣的原因》③一文，意见与皇甫文一致。另外几篇参加讨论的文章是吴庚舜《漫谈唐诗的繁荣》④、廖仲安《唐代文学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⑤、毛治忠《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等，其中还包括《前言》作者之一的王水照发表答辩文章《再谈唐诗繁荣原因》一文。综观这次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并没有超出前述各家文学史论述范围。讨论的意义在于，经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在有的问题上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另一些问题上认识也有所深入或澄清。这次

---

① 《文学评论》1979 年第一期。
② 《南京师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
③ 《文艺百家》1979 年第 1 期。
④ 《甘肃文艺 1979 年第 1 期。
⑤ 《北京师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

讨论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还有一些论述其他问题的论文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如魏承思的《论唐代文化政策与文化繁荣的关系》①、尹占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②、孙昌武的《唐诗与文化的积淀》③ 等。

（二）科举与文学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采取的一种选官制度，始于隋代。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唐代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并从高宗开始以诗赋作为科试内容之一，这在中国的封建政治中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在唐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考试内容屡有变化，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则成为定制。关于科举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宋代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④但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如明人杨慎引胡唐说："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⑤

现代学者中，陈寅恪以史证诗，较早注意到科举与文学的关系。1935 年，陈寅恪在美国《哈佛亚洲学报》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探讨唐代科举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举《莺莺传》、《连昌宫词》、《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例说明当时文坛确实存在着追求文备众体的倾向，并从投献的"行卷"中分析作者的政治道德观念。

---

① 《学术月刊》1989 年第 4 期。
② 《青海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 期。
③ 《天津社会科学》1991 年第 1 期。
④ 《沧浪诗话・诗评》。
⑤ 《升庵诗话》卷四。

建国后出版的几本文学史在探讨唐代文学的繁荣兴盛时，几乎都谈到科举问题，认为这是促进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们注意到，过去在论证这个问题时，一般都是引用《全唐诗序》所说的“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引《唐会要》中“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暂更改，旋即仍旧。”近年来，随着唐诗繁荣原因问题讨论的深入，科举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一课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论者不满足于已有材料，更为细致地考证唐代的以诗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最后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诗取士，并非始于唐初，而是从开元年间才开始的。这样一来，把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归于以诗取士，就没有说服力了。当然，也有的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还有的论者认为，以诗赋取士，固然有利于养成写诗的风气和促进字句音律的推敲，但也有桎梏思想、拘限形式的不良作用，对诗歌创作的健康成长，反而是不利的。

1980年，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字数不多，只六万多字，但却是近年来研究这个问题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从更广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及文人生活的巨大影响。他认为，科举是强化封建政治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对文学发生直接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他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该书作者以丰赡的材料再现了唐代举子行卷的风尚，诸如主司与通榜，制科与常科，进士与明经，省卷与纳卷，试杂文与试诗赋，以及投献试卷的时间地点，卷轴的内容、编排、款式、数量，投卷的对象、避讳、衣着

和情态等，都有细密的考证。程千帆先生分析了省试诗与行卷的不同，及对唐代文学造成的不同影响，他指出："唐人以诗赋取士的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篇应考时当场作的省试诗和一卷或多卷绝大多数是经过举子们自己精心创作和编辑的省卷和行卷之作。""今存省试诗以及举子们拟作的同类作品看来，其题材的主题主要是颂圣、咏史、写景、赋物之类；而且无论做的是什么题目，都还有一条必须遵守的不成文规则，那就是不许骂题，不许做反面文章。而在形式上，虽然它还没有发展到象明、清时代的八股文章那样公式化，却也已经产生了一些清规戒律。"文学史实告诉我们，省试诗确实是唐诗中的糟粕，是进士科举制度给唐代文学带来的消极影响。"至于行卷，情况就不同了。程先生认为，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的创作才能和成绩的地方，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可以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的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的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他用了三章的篇幅细致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诗、唐代古文运动及唐代传奇的影响。程著不但论据充分而且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也能给人以启示，确是建国以来研究唐代文学的力作。

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的大会上，马积高提交了题为《唐代的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的论文，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细密的考证。马文认为，要探讨唐代的科举考试与诗歌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唐代进士考试的实况。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旧史的记载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马文认为程千帆先生的考证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有的史料他还没有注意到。所以马文又引用了《通志》、《唐摭言》、《登科记考》、《唐语林》等文献上的记载，得出结论说："唐进士科之试杂文，始于高宗末年，然未成定制；至中宗以后，才基本上定

下来。然所谓'杂文',开始并非专用诗、赋,在玄宗时,才逐渐定下来,但后来又两度停试。""如果仅从时间上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唐诗发展的高潮到来的时候,正是在进士考试诗赋的制度逐渐定下来的时候,二者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在考察其关系的时候,却不能看到其他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指,唐诗发展的高潮虽然在开元、天宝之际,但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酝酿期,且不说南北朝的诗歌创作已为唐人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仅初唐的诗人也为唐诗的创作高潮的到来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次是,开元、天宝以来的著名诗人象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李贺等,要么是没有或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要么是没有考中,唐代名诗人只有王维是中了状元的,所以大部分人是不善于作程式诗文的。天宝以后,虽常并试诗赋,而赋实较诗更受重视,往往只要赋作得好即可被举荐乃至擢第和夺魁。马文还从四个方面对唐代的科举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说,科举制度是唐代选拔官吏的根本制度,而读书做官又是当时士人的一条根本出路,它的每项具体措施都不能不对士人的生活道路有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当时的学风、文风有影响,对诗的发展有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每个诗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大致可以这么说,最杰出的诗人既受到这种制度所造成的风气的影响,又不受这种风气的束缚,李白、杜甫是最突出的例子。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建树的另一位学者是傅璇琮先生。1984年,他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一文,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也于 1986 年出版。文章首先对历史的材料进行了清理与辨析,考察了从贞观年间进士科试策一场到高宗后期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的变化过程及杂文的具体所指,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灿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时期。这样,作者就充分证明了进士科以诗

赋取士，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的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种促成了以诗赋取士。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是：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普及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考试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傅著《唐代科举与文学》是其文章的扩展，全书共十七章，除第一章和第二章外，其余十五章从"乡贡"到"吏部铨试与科举"，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唐代科举的全过程。作者把科举与文学结合在一起，从更广阔的领域去研究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况，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其后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仍然不断出现，如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①、陈飞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② 等。

关于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讨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有新的成果，但并不是已经解决了全部问题，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此外有些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尚欠细致。比如我们已经对行卷的社会风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论证了这种特殊的社会风尚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行卷之风究竟始于何时？它对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起的作用如何？也还值得讨论。

---

①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三）唐代边塞诗

关于唐代的边塞诗，也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边塞诗”和“边塞诗派”的概念至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中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的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关于边塞诗的评价曾引起过论争。因为解放后我们的国家也面临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它似乎变得不仅是个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评价问题，也具有了某种现实的政治的意义。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都对边塞诗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边塞诗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对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也都给予很高评价。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八十年代始，这个问题又被提起，以《文学评论》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短短几年内，研究边塞诗的文章有百余篇发表，近年仍然势头不减。

1、关于边塞诗的性质

边塞诗是以边塞上的民族战争为题材，对边塞诗的评价，明显与对战争性质的评价有密切关系。歌颂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边塞诗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所以这也涉及到史学问题。1957年，沈玉成等人在《文学遗产》（增刊三辑）发表《论边塞诗》，认为“唐初与外族战争偏重在防卫”，“唐初频繁的对外用兵，其原因乃在于彻底地解决外族掠夺的威胁”。沈文还认为，唐朝要“交通西域、印度，就要先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在封建制度下，唯一的办法只有诉诸武力”。唐初的对外战争“其间虽有着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的原因，但其主要意义却在于确保国家的安全，发展了交通，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

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高海夫在《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① 又补充说唐玄宗时“唐帝国交通西域的道路受到威胁”，“河西走廊一带的国境安全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在西部边塞发生的战争是正义的。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易朝志执笔的《试论边塞诗与战争诗的评价》②、秦绍培《也谈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③、刘志坚《唐代边塞诗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④、周圣伟《漫谈盛唐边塞诗》⑤ 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唐代的边塞战争基本上是非正义的战争。1980 年，吴家恒、王绶青的《边塞诗评价质疑》⑥ 首开衅端，认为开元、天宝间唐玄宗有“吞灭四夷之志”，“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以移之”，“制造民族仇杀与不和，使边地的烽火常年不熄”。作者具体分析了唐王朝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的战争，均予以否定，认为“历史的事实证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疑义的”。另外还有江裕斌看法与此接近，并补充说，这些战争除了满足最高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和边将以功邀宠的欲望外，没有为本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⑦。吴文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所以《文学评论》于 1981 年第 1 期开辟《关于边塞诗的讨论》的专栏，其他刊物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加争论。大部分文章不同意吴文的意见，提出对这个时期的边境战争不能笼统否定，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杨明的《盛唐边境战争与边塞诗歌》⑧ 认为开元中期以前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不能完全归咎于

---

① 1960 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② 1961 年 1 月 22 日《解放日报》。
③ 《新疆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④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4 期。
⑤ 《语文学习》1981 年第 12 期。
⑥ 《文学评论》1980 年第 3 期。
⑦ 《岑参和他的边塞诗之我见》，《唐代文学论丛》1982 年第 2 期。
⑧ 《研究生论文选集》。

唐。对南诏的战争，多数论者是否定的。对吐蕃的战争，刘先照的《评边塞诗》①、余正松《九曲之战与高适诗歌中的爱国主义》②、白坚《实事求是地评价唐代民族战争和边塞诗》③ 认为是正义的。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结束。1984 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大部分代表认为“不但初唐时期的边塞战争，应该说大部分是正义的，因为它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唐玄宗时期对西域的战争也应该肯定，因为它主要是与吐蕃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是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有小星《盛唐边塞诗浅论》④、熊笃《初盛唐时期的边境战争及边塞诗的评价问题》⑤、任文京《唐代边塞诗中的民族友好主题》⑥、邱国新《唐代边塞诗体现的国防观念》⑦ 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边塞战争的正义与否评价边塞诗是一种道义中心论，而非科学的历史观。周祖譔指出，有些战争从一个角度看，是正义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能是非正义的。他以武则天对契丹之战为例说明战争是复杂的，有时可能仅从正义非正义上很难区分。再说，不少边塞诗用的是乐府旧题，并非指某一次具体战争，根本无从判断其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研究边塞诗，不应该在思想上执迷于战争的道义性质，而应注重战争实际上起到的历史作用。大量边塞诗往往只是写出了典型化了的当时人们对边塞生活的感受，成为一代辉煌的艺术，所以应予高度评价。

2、**关于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

---

① 《文学评论》1981 年第 3 期。
② 《文学遗产》1981 年第 1 期。
③ 《甘肃社会科学》1982 年第 3 期。
④ 《延安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
⑤ 《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 期。
⑥ 《河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⑦ 《国防》1991 年第 3 期。

既然大部分论者对唐代的边塞战争是持肯定态度，认为是正义的战争，那么热情歌颂这些战争的诗歌作品自然是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沈玉成认为“边塞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最主要是因为它包含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北大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指出爱国主义和边塞诗的反战主题是统一的。吴家恒等的《质疑》一文既然否定了唐代边塞战争的正义性，自然也否定了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歌颂扩边战争的诗篇，这自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因为自周秦以来，我们的国家就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对此，吴庚舜在《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①驳斥说，当时吐蕃、回纥、南诏等虽都拥护唐王朝并接受它的册封和任命，但从各民族历史看，还是属于不同的国家，“我们谈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思想，是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边塞诗都看成反映了爱国思想的。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仅是边塞诗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结合作家的思想，把作品反映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事实弄清楚，才能肯定它们。”周祖譔也主张“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要根据诗歌内容确定”，并且认为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描写中又常加杂着报答朝廷知遇之恩与追求名利的思想，所以也不宜过分强调。许多论者认为不能把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简单理解为歌颂正义战争和歌颂保卫祖国、抗敌御侮上，它还应当包括热爱祖国的人民、乡土、山川风物乃至一草一木，热爱千百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热爱劳动生活。方达儿在《边塞诗派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否定吗？》②中说：“边塞诗人把塞外的飞雪、火山、热海、狂风的屯云积水……等奇壮的景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展示了祖国山河的壮

① 《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②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观，读来如临其境。因此，难道这些诗不是赞美着我们的祖国吗？难道这些赞美不是基于作者的爱国思想吗？"白坚还将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具体分为四个方面：一、"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反映"，"这是爱国主义道德感情的集中反映，是一切爱国行为的内在动力"。其直接表现就是"关于边塞生活的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二、对边塞山川的描绘，这种描绘增添了"对伟大祖国的光荣感和自豪感"。三、"对民族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纪述"。四、"对边塞军营矛盾的揭露和黩武开边政策的谴责"，"反对不义战争谴责黩武政策开边政策，正是爱国主义表现的一个方面。"

3、边塞诗的产生与繁荣原因

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论者争论不多，但解释时却各有偏重。大部分论者都首先注意到了文学繁荣的一般原因，如唐代国力的强大，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等，认为这也是唐代边塞诗繁荣的原因。除此之外，大家还探讨了边塞诗形成和繁荣的特殊原因，大体可归纳出以下几种意见：

(1)边塞诗的出现和繁荣与边塞战争直接相关，文人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参与或贴近了这些战争。沈玉成的文章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唐初以后在边境设都护府，增加了边庭的军事力量，不少诗人都曾经去过边塞，甚至长期居留在边塞"。"由于边塞是保卫祖国的前哨，边塞生活本身如此丰富而多样，除了去过边塞的诗人写下他们的生活感受外，还有为诗人普遍歌唱的价值和魅力"。"边塞生活成为诗歌中普遍的题材和诗歌整个发展的形势应当是分不开的"。吴家恒的《质疑》认为"扩边战争激发了他们的'志向'，边塞风光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长期的军旅生活也促使他们看到了严峻的现实，这就构成他们创作边塞诗的思想和生活基础"。杨明认为"开、天时期统治者为取得边境战争的胜利，竭力用爵禄赏赐对将帅士卒进行刺激"，"一些士人便热衷于从军入幕以求进身的道路"。王景琳则指出，奸相李林甫嫉贤妒能，压制有才之士，也促使

他们转向对边塞军功的追求与向往。

(2)有的论者强调了尚武的社会风气对边塞发生了重大影响。左云霖的《尚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及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从黄河流域居民民族成分的变化，唐玄宗大赏边功和汉民族的民族情绪几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尚武风气的形成及对边塞诗的影响。钟元凯指出，六朝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徙，不仅给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一股雄杰骠悍的风尚，“提供了这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从而发为一种普遍的歌唱。”①

(3)边塞诗的繁荣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陶道恕《边塞诗漫谈》② 说，边塞诗其实有悠久的传统，并非始于唐代，汉代的《匈奴歌》和北朝的乐府民歌，都可视为边塞诗。管汀《论南北朝诗中的边塞题材》③、胡大俊《岑参边塞诗艺术风格论述》④ 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蔡琰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六朝时描写边塞风光的《敕勒歌》更是典型的边塞诗。钟嵘《诗品序》“杀气雄边，负戈外戍。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正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风格。禹克坤《如何评价唐代的边塞诗》⑤也指出，边塞诗“与文学传统有一定关系，边塞诗多用乐府古题，这些古题一般属于乐府中杂曲、鼓吹曲、横吹曲，是‘马上之曲’，适于表现征战题材。唐代边塞诗人……都经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描写征战。”此后禹又有《唐代边塞诗与民族问题》⑥ 发表。

---

① 《唐诗中的任侠精神》,《北京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

② 《光明日报》1984 年 8 月 21 日。

③ 《光明日报》1984 年 8 月 28 日。

④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⑤ 《文学评论》1981 年第 3 期。

⑥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另外,研究者对具体边塞诗人也有评价,重点是对岑参与高适,如江裕斌的《岑参和他的边塞诗之我见》①、《岑参边塞诗艺术初探》(《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佘正松《高适南游荆襄臆说》②、房日晰《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之比较》③ 等。其他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也有涉及,但争议不多。

(四)佛教与文学

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和《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巨著的出版,这一课题的研究愈加深入,不但有近百篇论文问世,而且有多部专著出版。下面从佛教对唐代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两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作专题介绍,并附带对唐代诗僧的研究作一简括介绍。

1. 佛教对作家思想的影响④

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⑤是一部以探讨民族性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专著,从文化史角度对禅宗进行了深入细密的考察探索。其中涉及到禅宗对唐代文士思想、气质的影响,指出:贞观之治使整个社会氤氲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李白、杜甫、岑参等向往从军杀敌、建功立业的气概。文人们走南闯北,携妓交游,把世界看作自己的天地。他们只对现实世界感兴趣,而彼岸世界虚幻冷清,过于遥远。安史之乱使士人理想破灭,自信心崩溃,于是就往彼岸世界去寻求宁静与乐趣。这样,除韩愈等少数恪守传

---

① 《唐代文学论丛》第2辑。

② 《中文自学指导》1991年第5期。

③ 《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④ 关于佛教对柳宗元、韩愈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中佛教及哲学部分,本处不再赘述。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统外，多数士人为填补心灵空白而追求无生无死的佛教境界。中唐士大夫的人生观与生活情趣是南宗禅获胜的基础。

李白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学术界近年来注意较多的一个问题。葛景春《李白与佛教思想》① 在这方面论析较为深入。他指出，对于李白来讲，儒、道、佛思想对他都有影响。佛教思想作用于李白，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如对其为理想斗争的入世态度起着妥协消极作用；对其不与黑暗势力合作、洁身自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禅宗思想对李白诗歌的美学思想也有不小影响。禅宗的不立文字、不执于物，“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的意在言外的观点，和道家“无言之美”的美学观是一致的。禅宗的空灵之学，使得李白有些诗歌增添了玄远飘逸的神韵之美。作者还指出，李白深受佛教影响，既与他的身世密切相联，又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重要关系。

在盛唐作家中，王维被称作“诗佛”，他寄心禅门，斋居多年，是盛唐诗人中受佛学影响的代表人物。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王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唐代佛教的各个流派中，他信仰的是禅宗。禅学作为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他的人生态度和创作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王维诗中的禅意，便是禅宗思想的渗透②。

对于佛教思想对王维的影响的评价，马欣来的观点与上述论者不尽一致。他认为，在王维那里，“佛教只是他理想破灭后的废墟，是在无可奈何中把这废墟当作人生无可逃脱的归宿。”因而不同意范文澜《中国通史》中说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的提法，指出佛教并非王维的理想所在，他所接纳的佛教思想是既

---

① 《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九辑。

② 参见陈允吉《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文艺论丛》，1980 年 10 期。曲世川《王维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诗》，山东大学 1981 年《文科论文集》。孙昌武《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1 年 2 期。

混杂又不完整的①。

关于李贺的世界观，尤其是他诗歌创作的哲学基础，向来无人论析。最近陈允吉撰文指出，李贺《赠陈商》诗中"《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两句表明李贺与佛学经典《楞伽经》有思想关联。《楞伽经》在哲学理论上所讨论的主要命题，就是集中在解释世间万物的生灭变异和人的生死现象上面。而李贺创作的主要内容，也与生死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李贺的诗歌与《楞伽经》，一是诉诸塑造美感形象的文学作品，一是阐发宗教抽象哲理的哲学论著，但从思想本质上说，是一致的。这里正好显示出李贺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联系，说明他的艺术创作活动，有其一定的哲学基础②。

孙昌武《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与生活态度》③ 一文指出，仔细考察白居易与佛教的关系，一方面可以看到佛教对于他的世界观与创作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发现他对佛学的态度与理解有不少矛盾之处，促使他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生活作风，进而影响到他的创作。他把儒、佛、道三教调合起来，使之不与封建教化伦理相违背，又使宗教生活与闲适放达的世俗生活相统一，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由放达、知足保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创作的思想内容上，那种宗教的超世解脱意识往往转变为对仕宦利禄的否定，对封建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冲击。

2. 佛教对唐代作家审美理想、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方面的论述文章较多，论析也趋于深入，是唐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维诗中有禅意，古人方回、李梦阳、胡应麟等都曾一致指出

---

① 《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山西大学学报》1985 年。

② 《李贺与楞伽经》，《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过。近年来，袁行霈再度提出加以探讨。他认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王维的有些诗是禅学的枯燥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着禅意，集中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和无我境界①。孙昌武认为，禅宗思想对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诗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孙文还从三个方面对王维诗歌创作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②。曲世川指出，王维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这一美学观，本来就带有佛禅虚幻空灵的特色，又加之表现手法上的蕴而不露、含而不吐，便给他的山水诗蒙上了空灵的色彩③。陶林从王维受禅宗影响这一角度，论述了其禅宗美学观的最突出表现，是对空寂之美的追求与赞颂，这是“根植于现实和人世的心灵体悟到的空寂，是由含蕴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的空寂”，并由此导致其空灵美学风格的诞生④。李育仁则认为，王维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般若学的“中观”学说的影响，这不仅使他有消极的人生观，也使其诗产生了虚幻的境界⑤。

清末民初学者沈曾植曾指出，韩愈的诗歌创作受到过佛教密宗思想的浸染。陈允吉在《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⑥一文中对沈氏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陈文指出，号称排佛不遗余力的韩愈，是佛教壁画的爱好者。作者从三个方面对佛教壁画对韩诗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1)“奇踪异状”，受其影响，体现在诗歌意境

①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 2 期。
② 《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1 年 2 期。
③ 《王维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诗》，山东大学 1981 年《文科论文集刊》。
④ 《王维的禅宗美学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 3 期。
⑤ 《对王维诗中虚幻境界的思考》，《江汉论坛》1984 年 6 期。
⑥ 《复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上，使其诗蒙上了一层宗教性的想象。体现在诗的布局结构上，则“妥贴力排奡”，对每一局部细节进行严密安排和刻画。(2)“地狱变相”，影响于韩愈诗歌创作，使其成功地将不美之美和雄桀厉怖之美体现在诗歌领域。(3)“曼荼罗画”，韩诗《陆浑山火》，明显受到“曼荼罗画”影响，作为最能体现韩愈险怪风格特征的代表作，这首诗典型地体现了诗人的兴象与佛教壁画的景物间的感触相通的关系。诗人韩愈作为时代美学理想变迁的敏锐感受者，正是从寺庙壁画中吸取丰富养料，打破诗与画的界限，在开拓诗歌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

在佛教文学与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中，以往谈到其代表作《长恨歌》，论者仅举出“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以为出自《目连变文》。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① 一文论析《长恨歌》与变文的关系又有新的发现。作者指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密切关系，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和《目连变文》的影响，其渊源可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

《全唐诗》所收晚唐诗人许浑五百三十一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二百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二百五十一首，两者约占其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因而有人评其诗曰：“许浑千首湿。”② 罗时进注意到了这一文学现象与佛教的关系。他指出，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的形成有较大影响。许浑曾皈依禅宗南宗。水在佛教，尤其在禅宗被视为清净无瑕、湛然恒静的最高境界、普渡众生的圣物。许浑诗的意境是一种“禅意融化为诗意，禅趣提炼为诗趣

---

① 《复旦学报》1985 年 3 期。

②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 24，引《桐江诗话》。

的意境。"① 这一论断，填补了佛教思想与许浑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的空白。但学术界并未普遍接受这一论断。徐俊就此问题质疑说，"禅意融化为诗意"的意境的实现，必须是作者的超出于自然的天机的泄露，而没有作者主观理念的直接介入和知性逻辑的解说，许浑显然尚未达此境界。因而作者认为，不可过分夸大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作用②。

3. **诗僧**

唐代诗僧，现有姓名可考者百余人，《全唐诗》收一百零九家，共四十五卷余。诗僧兼佛教徒和诗人于一身，是唐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唐代诗僧寒山的生活时代与身份，胡适、余嘉锡、王运熙等都作过精详有力的考证，大家均认定，这位史籍中朦胧迷离的人物，本是中唐时期天台山的一个隐士③。孙昌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一些新材料，重新论定其生活时代应在大历到元和间。作者认为，寒山诗很难说是一人所作，它是中国俗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成就。寒山之所以在西方受到热烈欢迎，乃在于其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有着特殊的明晰与深刻的一方面，以及在表达上有独特的艺术力量④。孙昌武还撰有《唐五代的诗僧》⑤ 总论唐代的僧人诗。他认为，唐代诗僧大批出现的原因，乃在于(1)唐代僧侣地主阶层经济、政治势力的扩大，它本身培养出一批文化人，在诗坛的

---

①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学术月刊》，1983 年 5 期。

② 《试论"许浑千首湿"》、《文学遗产》，1989 年 1 期。

③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 20《寒山子诗集二卷附寒山拾得条》，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王运熙《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寒山传说与寒山诗》，《南开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⑤ 见《唐代佛教与文学》。

代表就是诗僧。(2)由于南宗禅的发展,佛教本身进一步变化,即僧侣的世俗化。(3)唐朝中叶以后,儒、佛、道三教调和思潮大盛,这就容许僧侣参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汤贵仁指出,除了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和佛教内部的原因,和尚与诗人的互相交往互相影响,也是唐代僧人诗世俗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徐庭筠则指出,诗僧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正是佛学兴盛与诗歌兴盛相汇合带来的。诗僧实为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之一。诗僧的诗,除了象世俗诗人一样反映社会生活之外,还用 哲理和思辩影响诗歌的意境和创作理论。

(五)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文学复古和文体革新的运动。相对于唐代诗歌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稍嫌冷落,但仍有许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近年来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填补了古文运动研究的空白。唐代古文运动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 唐代古文运动和复古的关系

任访秋在解放初期撰文较早涉及这一问题。他认为,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就是复古运动的成功。唐代中叶文坛上的"复古",不只是文学上的"复古",而且是思想上的"复古",是借"复古"的旗号,来进行文学上的革新①。季镇淮认为,韩愈的"复古"之所以发展于中唐贞元、元和之际,正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时期由稳定到中兴统一的要求而兴起的。这种复古主义思想的要求,既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的主观幻想,也反映着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起着进步的积极的作用的②。

---

① 《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新建设》1957 年 9 期。
② 《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文学研究》,1958 年 1 期。

与上述诸家肯定古文运动“复古”的积极进步意义的观点不同，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一问题传统的或流行的评价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徐寿凯认为：(1)不能把古文运动看成是单纯的文体改革运动，因为当时既有骈散的矛盾，也有文言和语体的矛盾。对前者而言，散文是进步；对后者而言，散文则是一个退步。(2)与文体有密切联系的是内容。而韩愈宣扬的“古道”，大致上是孔孟的老一套，所以旗号复古，内容上也复古。作用则是为年纪已有一千岁的封建制注强心针和滋补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绵延封建制度的作用。(3)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内，复古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复古思潮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有广泛影响。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内，这条复古之线是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还是往往拖了历史前进的后腿，这是不言而喻的。和“复古”相伴生的古文运动，之所以从西晋初年的夏侯湛到清代的桐城派延续了一千多年，主要在于“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崇古的传统”、“孔子反郑声和孟子辟异端”、“复古的文艺理论”等原因造成的①。

2. **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的关系**

论及唐代古文运动，一般都认为它与中唐的儒学复古运动相表里，特别强调它的辟佛内容与作用。近年来学术界有人提出异议。孙昌武认为，唐代的文体革新和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反佛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韩愈倡“古文”，明“古道”，以“古文”反佛，是古文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事情，是他和他那一派人的主张。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古文家并不反佛。就是韩愈本人，在思想上、文学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孙昌武还从艺术方面分析指出，从“古文”的表现技巧看，它受到佛经翻译文学的相当大的影响：(1)佛教译经提供了一种新文体，即“译经体”，其特点是质朴、通俗、骈散间行。(2)在表现方法上，如有很多文学性很强的寓言等。(3)在语言运用

---

① 《我国古文运动及其历史教训》，《艺谭》1980年试刊号。

方面，佛经输入了许多新的词语，丰富了汉字的语汇。从古文运动的发展看，上述诸端均为古文家们用资借鉴的历史材料之一①。刘国盈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佛教的传播对古文运动巨大推动作用，指出，佛教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和传统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造成了产生古文运动必要的和可能的条件。这一方面是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尽可能地采用通俗化的宣传方式的缘故②。

3. **唐代古文运动和唐传奇的关系**

郑振铎和刘大杰二人在其所著文学史中较早注意到唐代古文运动和唐传奇的关系。他们或以为，传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别支③，或以为，古文运动促进了传奇的写作，而传奇写作又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④。陈寅恪亦曾撰文探讨，认为古传奇的写作而成功。他指出，中国文学史中有一特殊现象，即唐代小说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同时。而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古文运动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是最适宜写作小说的⑤。以上三位都指出了古文运动与传奇写作的联系，但论析都很笼统。王运熙论证说，从时间顺序讲，唐传奇始于初唐，因此，中唐才兴起的古文运动，并不能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而兴起⑥。

4. **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与繁荣的原因**

---

① 《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1982年3期。
②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版。
④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⑤ 《韩愈与唐代小说》，《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卷1期。
⑥ 《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11月10日。

唐代古文运动产生和繁荣，许多论者认为，是“中兴”的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反映。刘国盈考察了唐大历到长庆年间几十年的历史，指出，韩愈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改革，即政治上的永贞革新；经济上的实行漕运法、榷盐法和两税法；文化上掀起了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永贞革新及漕运法、榷盐法的实施，都是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困境被逼得不得不改弦更张的结果，新乐府运动也是贞元以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当权者横征暴敛的产物。古文运动产生亦非“中兴”的唐代在文化上的反映，而是“中衰”的唐代在文化上的需求。正是李唐王朝的“中衰”，激起了文化上的普遍繁荣①。孙昌武则把唐代古文运动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作者认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变革精神与唐代经学密不可分。唐代的儒学即经学，正处在由墨守章句、严分家法的汉儒注疏之学向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宋儒性理之学的过渡中，尤其是中唐啖（助）、赵（匡）、陆（质）之“春秋学”的怀疑精神与现实品格对韩、柳等人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②。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文体和文风的改革。文体的改革，是去骈而散；文风的改革，是去绮靡而反质实，去消遣而主明道。从时间上看，文体文风的改革并不比诗风的改革晚。而何以文体文风的改革要迟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开了新局面，才取得了与诗歌相媲美的成就呢？罗宗强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三种原因：(1)与文学思想有关。散体文发展的文学指导思想，主要是功利主义文学思想；而骈体文的发展，则主要是非功利的文学思想。因而散体文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当的社会环境，韩、柳所处的政治改革的时代，正从这种文学思想所需的社会环境方面适应了其大发展的客观要求。(2)与古文运动先驱者们不是政治改革家有关。他们空言明道，脱离现实，缺乏感召

---

①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力。(3)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未能吸收骈文的成就,创作上缺乏艺术的独创性。而这些问题,韩、柳等人都解决得比较好。因而,散文到他们并世才得以繁荣有其必然性①。

5. **韩愈、柳宗元散文艺术成就的评价问题**

关于韩愈的散文成就,有人概括为"用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的文言文来从事写作","很少用典故","用形象的笔墨来写一般的应用文","句子的多样化"和"气势雄放"来说明韩愈散文的巨大成就②。他的散文的艺术风格,黄云眉指出是"化难为易",是在群众易于表现的形式上,也就是在"通衢广陌"上来表现他的技巧,和他的诗"化易为难"是相反的③。孙昌武论述韩愈散文艺术的专著《韩愈散文艺术论》④ 则深入细致地从各个方面论析韩愈的散文艺术成就:以"精辟而形象的议论"、"洗炼而生动的记叙"、"真切而细致的描写"、"质朴而热烈的抒情"、"立意"、"结构"、"讽刺"、"比喻"各方面阐说其写作技巧;以"形象性"、"主观性"、"形式美"、"提炼词语"各侧面分析其文学语言,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说。

关于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有人细致介绍了《封建论》、《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游黄溪记》诸文的写作技巧,指出其创作目的、态度,运用技巧和吸收前人艺术经验的见解,主张在他《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很好的阐说。⑤ 亦有人认为,柳宗元的美学理论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体现最明显,柳宗元谪居永州、柳州时内心世界的复杂决定了其审美心理的复杂。这种审美心理创造出的山水艺术美的形

---

① 《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唐代文学论丛》总第7辑。

② 任访秋《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新建设》1957年9期。

③ 《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韩愈柳宗元评价》,齐鲁书社1980版。

④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周振甫《柳宗元的散文》,《新闻战线》1959年19--20期。

态，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旷”与“奥”两种意境①。孙昌武在其《柳宗元传论》②一书中设专章探讨柳宗元的创作成就，从“杂文”、“山水游记”、“寓言文”等各种不同体裁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特色。

6. 唐代古文运动的其他成员和其他古文作家

刘忆萱《李白古赋的艺术特色》对李白八篇古赋进行了研究，指出“意境辽阔，气势奔放，语言洗炼、形象”为其艺术特色③。刘禹锡在古文理论建设上的不懈努力很少为人注意，刘国盈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肯定他对古文理论建设的积极贡献。刘国盈还着力探讨了晚唐古文家的创作。计有《杜牧和古文运动》、《皇甫湜和古文运动》、《李翱和古文运动》、《皮日休和古文运动》、《孙樵和古文运动》五篇，这些文章，展示了古文运动在晚唐的余波绮丽，和它走向衰落的大致风貌④。一般论者认为古文运动到孙樵便告一段落，孙昌武则认为晚唐小品文是古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杂文为什么在晚唐得以繁荣，一是现实社会的矛盾提供了土壤；二是统治者的压制言论。谈到晚唐骈文，一般以李商隐为代表，孙昌武则指出，李商隐创作的前期，实际上也是古文运动的一员。作者还指出罗隐等人也对古文运动作出贡献。

（六）唐传奇

唐代传奇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其中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对后来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明人胡应麟曾对唐传奇作出很高的评价，他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

---

① 周明《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美》，《文学评论》，1984年5期。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

④ 见《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端。"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述唐传奇时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其后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对唐传奇艺术成就都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一般都没有超出鲁迅先生的认识水平。建国后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常盛不衰,但唐传奇的研究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

1、关于"传奇"名称的由来

传统上认为,"传奇"一名源自晚唐裴铏所编的小说集,即《裴铏传奇》,后人借用"传奇"作为同类小说作品的代称。对此,金启华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南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八收《异闻集》中张生、莺莺的故事,篇名就已称"传奇",它的时间当早于裴。裴铏《传奇》原书已佚,于宋修《太平广记》中仅存部分内容,而《太平广记》的篇名常是纂者改动而成的,所以不能由此肯定"传奇"得名于晚唐裴铏的小说集,有可能更早。李剑国在自己的专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②的"代前言"中不同意崔张故事的原题是"传奇",认为这是宋人改动的结果。他说:"有人据而断言《莺莺传》的原题即为《传奇》,我以为不对,其实是宋人的改称。宋人很喜欢改称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改为《大槐宫记》,《虬髯客传》改为《扶余国主》就是例子。"他详细考证了"传奇"一词出现,以及是如何转化为唐代小说的代称的。李认为以"传奇"作为小说的统称应该是始于南宋谢采伯的《密斋笔记》:"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言,因未足追媲古作,要之无稗抵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这里将"传奇"与"志怪"对举,显然是统指小说。至元代,又用这个概念专指唐人小说。虞集《道园学古录》:"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

---

① 《少室山房笔丛》。

②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有“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自此以后，唐传奇之称终于大行于世了。

2、**唐传奇繁荣的原因**

关于唐传奇的出现与繁荣，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有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以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鲁迅先生同意此说，后来的多数论者便将传奇的出现与兴盛与温卷联系起来。

陈建勤对传奇起源于温卷不有同见解，他特别强调传奇小说的繁荣与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举例说明传奇小说的故事情节大抵来于民间流传的奇闻异事。陈还认为唐传奇的作者亦深受当时城市说话艺术的感染与熏陶，所以是介于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是一种民间文学文人化，文人文学民间化的新型故事(《论唐传奇的繁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华东师大学报》1982 年第 5 期)。王运熙、杨明则着重指出小说与诗歌互为影响的关系，如《莺莺传》与《莺莺歌》、《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李娃传》与《李娃歌》，诗歌与小说叙同一题材的故事；不少小说穿插着诗歌，如《游仙窟》、《步飞烟》、《莺莺传》等；还有的小说以诗人的传闻故事作为创作题材。

李剑国对此问题有较为全面的探讨。他认为前人谈到的原因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细细想来，常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不少说法似是而非。李认为所谓“行卷”说尤无道理，不同意程千帆先生的观点。李强调了两点，一是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二是民间说话对文人的影响。李认为，发轫于战国的古小说到南北朝时积累已

相当丰厚，一批有影响的小说家和百余种小说作品，在士人中造成了两种风气：在嗜奇心理或功利目的的支配下搜集传播故事的风气和把故事记录成书的风气。宗教家借以明鬼神，历史家借以补史阙，文学家借以呈才情。当唐人回顾过去的时候，固有的传统意识使他兴奋地迎接着小说传统的惯性冲撞。而且唐人由大一统帝国培养起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由融合南北文化、中外文化所形成的开放性的文化性格，使唐人比前辈更有着继承发扬一切文化传统的自觉和魄力。《大唐新语序》说，小说"虽为小学，抑有可观"，《酉阳杂俎序》说志怪小说有味，所以对之"役而不耻"。于是乎便有创作，一呼百应，彼此效仿，便形成风气。陆希声《北户录序》说："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委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说的就是唐代的普遍现象。另外，早在六朝时期文人中间就流行着"剧谈"、"戏谈"、"说话"的风气，这种风气造成了大量故事的产生、流传、扩散和集中，最后在文人手中完成向书面化的转化。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序》说他做夔州刺史刘禹锡幕僚时经常参加主人同宾客们的谈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语，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由谈到记，反映了《嘉话录》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它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唐代传奇创作的规律。如《冯燕传》、《异梦录》、《非烟传》、《长恨歌传》等，都经过了"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过程。

3、唐传奇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

从鲁迅先生开始，到解放后的几部文学史、小说史，对唐传奇的思想与艺术差不多都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如北大中文系著的《中国小说史》认为唐传奇中的许多爱情婚姻故事反映了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一些勇敢反抗强暴的妇女形象；一些涉及仕途、官场生活的作品，对于统治阶级及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封建文人，进行了尖锐辛辣的讽刺和批判；那些涉及政治与历史的题材，有的形象地揭露了藩镇割剧势力的专横残暴，有的评论了政治上

的得失，对读者是有认识价值的。另外对唐传奇在塑造人物、细节描写、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等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总结唐传奇艺术成就时，论者都注意到了其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色。徐士年《唐人小说的近代现实主义特色》①认为，唐传奇特色是“近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陈涌在《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② 中指出，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的唐传奇，浪漫主义精神是普遍的，在表现方法上是现实主义或倾向现实主义之作，也往往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作者进一步把这一类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代表的作品，具有浪漫精神，表达新鲜健康的理想，在表现方法上则倾向现实主义，可看作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另一种表现。另一种是以沈亚之《湘中怨》为代表的作品，不但在精神上是浪漫主义的，而且在艺术方法上也是浪漫主义的。师言也特别指出了唐传奇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③。

对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作用与地位，韩黎范在《我国短篇小说的先河》一文④指出，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小说创作已成为作家有意识的活动。与六朝志怪相比，唐传奇的根本变化是开始将小说的描写对象从神怪拉回到现实人生，广泛反映唐代的社会现实。唐传奇艺术技巧也日臻完善，传奇作者善于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唐传奇在结构、语言方面的独特贡献对后代的短篇小说也起了先导作用。周先慎《精魅的人化——谈〈任氏传〉在古小说发展中的意义》⑤ 指

---

① 《奔流》1957 年第 4 期。

② 《人民文学》1981 年第 10 期。

③ 《唐宋传奇选》前言，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④ 《语言学习》1982 年第 3 期。

⑤ 《文史知识》1982 年第 12 期。

出，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发生的根本变化，是文学观念逐渐代替了史的观念，小说已经从单纯的志怪发展到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

对唐传奇中的名篇研究向来是唐传奇研究的热点。如元稹与其名作《莺莺传》中的张生的关系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早在宋代，就有自寓一说。近代鲁迅、陈寅恪都颇为相信。但也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如刘明华《也说元稹的不白之冤》①、周承明《重新评价〈莺莺传〉的思想价值》②、吴伟斌《“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③ 及《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④ 二文，都对前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分析《莺莺传》人物形象及艺术成就的有宁宗一《性格就是命运——谈〈莺莺传〉中的崔莺莺》⑤。宁文认为崔莺莺是一个具有独特命运和性格的人物，元稹塑造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在于不是孤立地、静态地描写爱情生活，而是在感情的流程中去描写她的内心美，成功地写了一个人的命运，并写出了她的性格转变。《莺莺传》的客观意义，正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人格和精神美的问题。

用新的方法比如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唐传奇，是近年来的一个特色。如钱钟书先生将传奇情节与中外文学作品中的类似情节相比较，颇能新人耳目。还有人论述传奇与其他体裁的关系。董乃斌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⑥探讨了唐传奇的表现手法及在文体变革中的意义。

---

① 《读书》1988 年第 5 期。
② 《洛阳师专学报》1989 年第 3 期。
③ 《中州学刊》1987 年第 2 期。
④ 《贵州文史丛刊》1990 年第 2 期。
⑤ 《文史知识》1982 年第 4 期。
⑥ 《文学遗产》1991 年第 1 期。

（七）敦煌文学

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总数达两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随之产生了敦煌学。敦煌文学作为敦煌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敦煌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敦煌歌辞、敦煌诗歌、敦煌变文、敦煌话本小说和敦煌俗赋等文学样式。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小说、词曲的发展，以至民间文学同音乐、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关系，都可提供极其宝贵的依据。敦煌文学的研究，是我国古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下面依文学体式分别介绍敦煌文学的大体研究状况。

1. **变文**

（1）关于“变文”的涵义

1924 年，罗振玉在《敦煌拾零》中收入了中唐写本《维摩诘讲经文》和失题的另外两种以佛经为内容的讲唱作品，称之为“佛曲”三种。郑振铎则据《目连变》、《八相变》等作品在原卷标题中即有变文的名称这一情况，指出讲唱体的俗文学作品应统称为“变文”①。王重民等亦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名，指出，在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宣传佛教教义的“俗讲”，这种“俗讲”不同于探求佛教经义的正式讲经，而是多取佛经故事，加以泻染，以吸引听众，将这种“俗讲”加以笔录，就叫“变文”②。白化文专门撰文探讨“变文”这个术语的内涵和文体特点，试图把“变文”和“俗讲”与“俗讲文”区别开来。他指出，各种对“变文”的不同理解，都有一共通处，即“变文”与“变相”有关。他指出变文是说唱底本，表演时配合展示画卷，不仅作一般性的俗讲演出，而且也配合佛寺石窟的壁画、画幡等演出，同时变

① 《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

② 《敦煌变文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 2 期。

文的说唱还有提示过渡等特点①。周绍良在《唐代变文及其他》②中也对变文涵义进行探讨，他提出："变"应解释为"故事"之意，所谓故事画就是"变相"，故事文就是"变文"。从内容看，多数属于民间流传的故事，而宗教性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关于"变文"的渊源

冯宇指出，"变文"名称的来源与变文文体的来源，不可混为一谈。他给合唐代讲唱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的探讨，认为唐代"变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不是从印度输入的，而是生长在本民族土壤里的绚丽的奇葩。是在本民族固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衍化而成③。李骞指出，要把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弄清，必须从宏观上对唐代民间文学和寺庙俗讲作一全面考察和比较分析。他指出同样韵散合组的变文，与唱词有着不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变文是汉代刘向编辑传赞作品的图文结合、韵散结合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发展④。梁达胜则从思想内容、结构、情节、篇幅等方面分析了敦煌变文借鉴与发展佛经文学的情况，认为外来文化往往可以在异国文化中留下很深的印记，但毕竟被吸收被同化，不可能保持原状⑤。

2. **诗歌**

由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敦煌诗歌研究逐渐改变了小范围"辑佚"、"丛残"的作法，开始扩大辑佚范围，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王重民有《补全唐诗》和《〈补全唐诗〉拾遗》⑥，后者辑诗一百

① 《什么是变文》，《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又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文史知识》1985年12期，1986年1期。
③ 《论唐代变文的出现及其渊源》，《北方论丛》1981年6期。
④ 《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5年2辑。
⑤ 《论佛经文学对敦煌变文的影响》，《辽宁师大学报》1985年3期。
⑥ 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3期，1981年4期。

二十七首，是增补《全唐诗》工作的丰硕成果。

王梵志诗，虽已有前人整理过，但由于条件所限，挂漏仍多。赵保和、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①根据伯三二一一，二四一八及与之相同的伯三七二四、斯六０三二、五四四一等残卷，通过较为详细的比勘和简要注释，所录文字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项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②对《校注》稿内的失校、误注、误校及整理欠妥处，作了补正。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③就唐宋以来诗话、笔记小说和敦煌遗书范围内二十七种王梵志诗手抄写本钩沉辑佚，校其异同，辑录成书。但张锡厚的《校辑》，虽号称"全辑本"，却没有包括《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的内容，最近项楚又发表有《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校注》④填补了这项空白。

此外，吴企明撰有《敦煌伯氏2555号写卷是唐代边塞诗(文)选集的残卷》⑤一文，认为伯2555写卷中绝大多数诗篇，反映了一个半世纪内唐王朝极其广袤的边塞地区的生活，是一部唐代专选边塞诗的选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3. **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亦称"敦煌歌辞"或"俗曲"、"小曲"或"词"。任半塘《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⑥着重探讨了敦煌歌辞的定名问题，把歌辞与曲、词的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关于曲子词的源流及其艺术特质诸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吴肃森《论敦煌歌辞与词的源流》⑦探讨敦煌歌辞的范围及其

---

①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5、6期。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
③ 中华书局1983版。
④ 《南开文学研究》1987年号。
⑤ 《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⑥ 《文学遗产》1980年2期。
⑦ 《社会科学》1981年4期。

渊源，肯定其为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开辟了道路。高国藩《谈敦煌曲子词》[①] 对以往一些学者不承认敦煌曲子词是民间歌谣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它来自民间，具有民间歌谣的性质。梦初的《浅谈敦煌曲子词的艺术》[②] 则从多样化的风格特征、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新巧的艺术构思、独特的表现手法和精妙的修辞手段、灵活多样的体式和浓厚的民歌风味四个方面论述了曲子词的艺术特色。汪泛舟的《敦煌曲子词中民族、爱国词篇分析》[③] 则通过反映民族友好关系与涉及爱国题材的曲子词的分析，论述了民族团结与隔阂、爱国与忠君的关系。

(八)断代文学史

除了文学现象与文学种类的研究，断代文学史的撰写也是隋唐五代文学宏观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断代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共有三部，它们是：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王运熙、杨明照《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1.《**隋唐五代文学史**》

周祖譔撰，福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这是解放后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断代文学史。其创见与特色在于：

(1)描述作家的历史作用时较为客观公允。如论述陈子昂的理论贡献，指出："陈子昂在《修竹篇序》里这段话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他表示了反对齐梁文风，而在于指出了齐梁诗歌中所丧失了的东西——兴寄，并要求在诗歌中把它重新表现出来。"论述到古文运动内部的"难"、"易"之争，指出"韩愈的重要功绩就在解决了这一

---

① 《文学遗产》1984 年 3 期。

② 《甘肃社会科学》1985 年 2 期。

③ 《敦煌研究》第 2 期。

问题并用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他在《答刘正夫书》里说：'无难易，唯其是尔，如是而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大家争辩的所谓'难'、'易'问题，认为文章写得正确就好。"这就把问题推进了一步。这样实事求是地客观估价作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功绩，有其独到之见。

(2)将文学发展每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结合，从较为广阔的视野论述文学的发展衍化。如以为初唐文学发展的关键是四杰、陈子昂等反对齐梁文风的斗争，其所以能战胜齐梁文风，乃在于庶民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盛唐文学的特征在积极浪漫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与大帝国的昌盛繁荣密不可分。而边塞、田园两种题材之所以经常入诗，和当时的开边政策及均田制遭破坏和庄园制的发展有关。他特别强调了文人入幕风气与边塞诗的关系。还引崔融《谏税关市疏》，论及了商业与游侠的关系，对李白创作众多游侠题材的诗歌作出了新的解释。又如晚唐之出现绮丽诗风与都市的畸形繁荣、进士的放浪生活及李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样把经济、政治、社会风尚与文学现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论述，在当时文学史著作中尚属少见，为该书一大特色。

(3)多有创见。如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了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对"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又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评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指出："评价他的一些诗，不应该从它有无揭露社会矛盾或作者有无斗争性去理解，应该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带给读者的美的感受和体现在这些诗中的内容对于过滤读者脑海中的庸俗思想的作用来理解。"论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也时有新意。如杜甫的《石壕吏》，作者指出："诗人通过老妪的答话而刻画了一句话都没有说的'吏'的形象。……只要把老妪的话分三段来理解，依生活经验来补充老妪每一段话前'吏'所说的话，那么'吏'这个形象就很清楚了。"这样对文学作品的诠释，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体例上尚未超出一般文学史的写法，在总体研究方法和体系上亦无大的突破。

2.**《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开山之作。

(1)这部书的最主要的特色，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的建构。它不只是一部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非仅限于作家作品的序列研究，而是一部宏观的文学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引言"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综合考察，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考察文学思想的变迁，正是该书的研究方法上的特质。

(2)在文学思想发展的分期上，该书也颇具特色。作者不仅从理论高度概括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总的发展衍变，经历了一个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又复归绮艳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并且指出这个回旋并非简单的复归。作者将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链条上，把隋代以及唐天宝中至贞元中的文学发展作为两个过渡转折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思想发展嬗变的规律。描述过渡时期大历十才子诸人之创作，又指出其"盛唐遗响"与"战乱写实"的创作倾向，使之以写实的倾向将杜甫与白居易等人的写实倾向一脉连接，史的描述与精妙的理论概括相结合，显示出文学思想发展的缓慢衍生的过程。

(3)作者还充分注意到了文学思想间的衔接现象。如论及初唐文学思想的发展，将其时九十年的历史区间称之为盛唐文学繁荣的准备期，而此时期又分三个阶段衍进(每个阶段约三十年)，作者充分肯定了唐太宗及其重臣们对唐代文学繁荣所作出的贡献。指出了"四杰"在文学思想上的努力对其后的陈子昂"兴寄"、"风骨"

说提出的铺垫作用。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出版是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

3.《**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对唐代诗歌艺术的研究，向为学界热点，成果亦颇显著。相对来说，唐代小说的研究则较薄弱，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弱项。近年来这一状况虽有改变，但多数研究者的目光还是盯在唐传奇的思想艺术方面，而基础性的工作，如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发展源流的梳理等，因耗神费力，不易见到成果；再加上这类著作出版尤为困难，故少有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李剑国先生为我们献上厚厚两大册百万言巨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①，是颇出人意料之外的。对唐代小说的搜集整理，始自鲁迅。他校录的《唐宋传奇集》，除了收入唐宋两代单篇小说作品，还从古代典籍中辑录了有关作家作品的资料，注明出处，加以考订，为唐代传奇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鲁迅之后，又有汪辟疆氏编《唐人小说》，在体例上继承了鲁迅的做法，只是在资料与考证上更进了一步。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虽然借鉴了《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的体例，但舍去了小说的正文，加强了资料的丰富性及考证的严谨详尽。如果说前二者虽有资料与考证，但其基本性质仍属作品集的话，那么李著则变成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其学术上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前面两部作品。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资料的搜集、考辨，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不少研究课题的突破或进展，全赖新材料的发现。同时，资料收集工作又常常被人看作“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某些领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李剑国在古文言小说资料的搜集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已在数年前出版的

---

①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得以显示，他的这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仍然保持了治学严谨的学术特色，搜逸补阙，广征博引，材料丰富而详赡，使其成为目前唐代小说研究最为丰富的资料宝库。全书为之叙录的志怪传奇作品共二百余种，征引的历代典籍，竟多达八百余种，仅此便可见作者用力之勤，搜罗之富。以唐代早期传奇作品《游仙窟》为例，汪辟疆《唐人小说》只以新旧《唐书》的本传及《大唐新语》、《朝野佥载》等少数几种来考证作者生平，结果语焉不详；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除了上述几种，又引用《顺宗实录》、《桂林风土记》、《直斋书录解题》、《容斋笔记》等十数种典籍中的资料，相互比较印证，对张鷟的生平，画出了较为清晰的轮廓。至于本篇流传日本的经过及作品本事，李著运用的材料也远远超出了前人。另外，在资料的运用上，李著并不单纯以多取胜，而是又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证功夫，使立论更为科学准确。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虽以丰富的资料见称，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资料书，著者并不以搜逸捃残、挖掘资料为唯一目的。他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又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工作，对唐传奇的作者、著录、版本、流传、影响等广泛问题发明了自己的心得。如在《莺莺传》一篇中，即考证了作者的生平，又对此篇不同的篇名加以辨正，并补证了关于主题的“自寓说”，然后又对《莺莺传》传奇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广泛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可知见诸著录的以张生、莺莺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竟有数十种之多！再加上有关崔、张的诗词、小说及各种民间传说，使以《莺莺传》肇始的崔张故事，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另如对《异梦录》作者沈亚之的考证，尤见作者之功力。沈亚之是一位重要的唐代诗人与传奇作家，两《唐书》无传，只在《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序》中提及，云：“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宋人著《沈下贤文集序》中有沈亚之事略，其后《唐诗纪事》、《直斋书录解题》、《唐

才子传》，均据此而来。近人张全恭曾据沈亚之文集考证沈氏生平，然多有漏误，难称精审。李著又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已占有的大量资料，详加考辨，制订出沈亚之年谱，解决了沈亚之的里籍、娶妾、归吴省亲、数次入长安、交往、入仕、被贬等重要行迹，使人对沈亚之生平的了解更加详细，且很有说服力。比如沈氏里籍，历来多云为吴兴（湖州）。几部重要典籍《沈下贤文集序》、《唐才子传》、《李长吉歌诗》皆有此说，甚至沈氏也多次自称"吴兴沈亚之"、"余吴兴人"。但沈氏出生地并非吴兴。李著引用沈氏本集中的《别权武序》、《上寿州李大夫书》、《祭故室姚氏文》等材料认为，沈亚之的出生地应该是陇州。解决了这一问题，方可对沈来的某些行迹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在体例上的突破也是值得注意的。"叙录"一体始自汉代，基本上是书目提要式著作。李著虽名为"叙录"，但早已大大超出了前人的体例范围，成为一部集资料、考证、理论、历史于一体的"大全"式著作；而原有意义上的"叙录"性质却反而减少了。从全书的编排来看，著者将全书分为五卷，另有附卷专门考辨伪书。除第五卷为五代小说，前四卷均为唐代作品。五卷其实就是唐五代小说的五个发展时期，分别为：初兴期、兴盛前期、兴盛后期、低落期及继续低落期。为唐人小说分期，已经有人为之。由于对分期的标准及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认识有偏差，所以结果是颇不相同的。李著在对整个唐五代小说有了宏观的、总体性的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以作品的共同倾向与代表性作品的出现为着眼点，力图更准确地揭示唐五代小说的发展规律，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如初兴期定在武德初年至大历末，约一百六十余年的时间，其中又分前后两段。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作品数量较少，才四十余种。而在兴盛期的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有六十余种质量上乘的作品出现。初兴期作品数量少，说明它正处在起步与缓慢发展的阶段，但它又不是六朝志怪小说的自然延续，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融合了

传记、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等因素而发展为崭新的传奇小说，反映出把小说文章化亦即自觉创作意识的产生。可以说，李著的编排方式客观上就为我们勾划了唐五代小说的发展线索，条贯分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小说史的性质。就其每一篇来说，也改变了传统“叙录”仅作记述式的内容提要的写法，变得更为丰富广泛。著者干脆舍弃了作品内容的介绍，把笔墨集中在对作品、版本、流传等资料的钩稽、条疏源流、辨证真伪、发明得失上，几乎每一篇“叙录”都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考证论说文字。附卷“伪书辨证”专门考辨明代以来的驾名唐人的伪书，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者来说，实为大功德之事。事实上，现在仍有研究者在利用这些伪书进行小说“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书前有一篇长达八万余字的前言，集中体现了著者对唐代小说的理论认识，内容包括唐代的小说观念，唐代小说的分期，主题分类，艺术技巧等问题，颇多前人未发之见，相信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示。

第八章　文物考古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① 隋唐考古则是根据隋唐五代时期人们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如城址、古建筑、房屋基址、墓葬、陶瓷、壁画、金银器、丝绸、铜镜、文书、钱币、造像、石刻以及各种遗迹现象等，来研究隋唐五代历史的科学。与史前考古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主要手段略有区别，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由于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因而，隋唐五代考古，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主要的或辅助的手段。说它是主要的手段，指的是某些专门史，如城市史、钱币史、绘画史、工艺美术史、陶瓷史、建筑史、服饰史等。在这些以物质文化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史中，离开了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的资料，就将是无本之木。说它是辅助手段，主要指的是通史和某些专门史，如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在这些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史中，物质文化遗物和遗迹并不占研究资料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不重要的。考古发现的隋唐五代墓志，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以及大量通过考古学揭示的当时社会现象，都是研究上述专门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的资料。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 2 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

隋朝自公元581年建立后，统治者凭借强大的国力，开运河，筑大兴，建洛阳，接连搞了几项重大的工程。隋朝虽然在开国38年之后就被农民起义推翻，时间短暂，遗迹、遗物都不很多，但以上几件重大的工程，在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期，政治统一，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在当时世界上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李唐王朝共历20帝290年，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由于唐朝通过陆海交通与亚、非、欧三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同日本、朝鲜和中亚、南亚各国有频繁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因此，唐代考古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国际性的研究课题。

北汉、南平、楚、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的时期，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期。唐代考古学文化的许多特点在五代时消失，五代时新出现的一些文化因素却在北宋时发扬光大了。

在考古学上，一般将隋、唐、五代划为一个文化阶段进行研究，以唐代为中心，称为隋唐考古。秦浩《隋唐考古》① 分"城市遗址"、"墓葬"、"手工业"、"边疆地区遗迹及其他"四编概述这一时期的考古成就。

由于隋唐考古的研究专题很多，如壁画、铜镜、石窟寺、丝绸、陶瓷、金银器、钱币等，本文限于篇幅，仅介绍在隋唐考古中占主要地位的城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手工业部分选择发现、研究比较多的金银器和陶瓷器予以介绍。对于在隋唐生活中有重要地位的佛教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也将单列一节介绍。

一、隋唐城址

---

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一)隋唐大兴、长安城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六月,杨坚令宰相高熲、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等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上营造新都。第二年春三月,迁入新都,命名为大兴城。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城,仍然作为都城。唐代长安基本沿袭了隋代的大兴城,仅作了局部的扩充和修建。唐末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迫昭帝迁都洛阳,拆毁长安宫室,长安废毁。

隋唐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城市之一,不但在中国城市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历代研究者很多①。本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文六曾对长安城作了一些研究,著有《长安史迹考》。1957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长安城的范围、各城门的位置、兴庆宫、大明宫、曲江池、芙蓉园和长安城内水利工程渠道作了详细的勘察和探测②。这是首次以科学的方法对隋唐长安城所作的较大规模的勘探。在此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57年起,对长安城的郭城、皇城、宫城、坊、市、街道作了全面的勘察,并先后调查发掘了大明宫的麟德殿、含元殿、含光殿、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以及东市(部分)、西市、明德门、青龙寺、西明寺、皇城含光门等遗址③,对城市的平面布局、坊市的形制、宫殿的分布和基础结构等,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隋唐长安城平面为规整的长方形,由外郭城、皇城、宫城、街坊

---

① 主要史籍有:1. 唐·韦述《两京新记》;2. 北宋·宋敏求《长安志》;3. 元·李好文《长安图志》;4.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5. 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刻石残片。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③ 资料来源请参阅附录中的论著索引。长安城部分凡引用上述资料者不再加注。

和东西二市等构成，规模宏大，规划整齐，面积约 84 平方公里。

郭城又名罗城，东西长 9221 米，南北长 8651.7 米，夯土版筑，仅城门内外包以砖壁。城墙外有与墙平行的城壕。郭城每面 3 门，大多数城门已经探查清楚。除正南的明德门有 5 个门道外，其它均为 3 个门道。

宫城在郭城北部，南为皇城，北为禁苑。宫城平面也是长方形，东西宽 2820.3 米、南北长 1492.1 米。宫城南门正门隋时叫广阳门；唐改名为承天门；北门为玄武门。宫城中路是太极宫，正殿为太极殿（隋时名大兴宫、大兴殿）。太极宫东为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西为掖庭宫，为宫女居处。太宗贞观八年（634 年），于太极宫东北部城外禁苑龙首原高地上建大明宫，高宗龙朔二年（662 年）又经扩建，次年迁入大明宫听政。从此大明宫取代了太极宫的地位，成为唐代主要宫庭。

皇城在宫城之南，又名子城。平面也是规整的长方形。北无城墙，隔街即为宫城。东、西墙与宫城东、西墙相接，长 1843.6 米，东西宽与宫城相同。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 7 条，南北向街道 5 条。但因位于今西安市区，仅探出少部分街道。皇城是百官衙署所在地，正南大门为朱雀门。

朱雀门南为宽达 150～1555 米的朱雀大街，直通郭城的正南门明德门。郭城内有南北向街道 11 条（包括朱雀大街），东西向街道 14 条，将全城划为 110 个坊（有说 108 坊）。据探测，朱雀大街两侧、皇城正南的四列坊面积最小，南北 500～590 米、东西 558～700 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略大，南北 500～590 米、东西 1020～1125 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最大，南北长 838 米、东西宽 1115 米。坊外均有夯土坊墙。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因“在宫城直南，（隋文）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故“每坊但开东西二门”（《长安志》卷七）。坊内也仅有东西向横街一条。其余各坊内均为十字形街道，按方位称为东、西、南、北街（《两京新记》），坊墙开四门。各坊内分

布着居民住宅和寺观等。城北居民密集，城南稀疏。盛唐时，城内南部还是耕地，“率无居人第宅”（《长安志》卷七）。

隋初在皇城东南、西南设都会、利人两市，唐时称东市、西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设井字形街道，将市分成9个长方形市区，每区四面临街，店铺临街而设。史载“（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长安志》卷八），见于记载的有笔行、铁行、肉行、凶肆、绸缎行以及赁驴人、弹琵琶名手、杂戏等。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两京新记》卷三），见于文献记载的行业，远比东市要多。据宿白先生统计，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鱼店、酒肆、鞦辔行、卜者、卖药人、药行、油靛店、法烛店、蒸饼糊子店、秤行、柜坊、食店张家楼、贩粥者、帛肆、绢行、麸行、衣肆、凶肆、烧炭曝布商、收宝物的胡商、波斯邸等①。根据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临街的店铺鳞次栉比，从出土遗物可以推测出有饮食业、铁器店铺和石刻店铺、珠宝店、陶器店以及凶肆等，证实了文献记载②。

郭城内东部的兴庆坊，原是玄宗登极前的私邸。玄宗继位后，于开元二年（714年）置兴庆宫，十四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十六年竣工。天宝十三年（754年，《旧唐书》作天宝十二年）又筑兴庆宫城，并起城楼。兴庆宫内有龙池，池北为宫殿区，池南为园林区。发掘出土的琉璃瓦和大量莲花瓦当等，表明建筑相当奢华富丽。

另外，在郭城东南角依据高亢的地势建芙蓉园和曲江池，使之成为隋唐两代著名的风景区。

玄宗时，为方便皇帝出游，在北至大明宫、中连兴庆宫、南抵芙蓉园，与郭城东侧平行处筑夹城复道。夹城的遗迹已经勘查和发掘。

---

①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

此外，1973年发掘的唐长安城正南门——明德门，经复原研究，城门为五过道，城观为主体七间，两夹庑各二间、单层四式顶殿堂建筑①。

根据隋唐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可以看出：

1. 隋唐长安城的皇宫、百官衙署和平民住宅区有严格的区划，这一方面是为了显示森然的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宫城的保护和对居民的控制。

2. 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明德门、朱雀大街、朱雀门、承天门、太极宫。大明宫虽然位于城外东北部，也呈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从南至北依次为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太液池、玄武门、重玄门。这种对称布局形式对中国后代城市建筑，尤其是都城建筑有深远的影响。长安城内各坊的十字街道布局，不但是当时小城市设计的蓝本，也是唐以后1000多年来我国小城市的主要布局形式。

3. 与过去相比，尤其与汉长安城相比，唐长安城大大增加了居住区的面积和城市人口。这主要是隋唐封建统治者开国之初力图直接控制大量的人力，但也说明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已有能力管理和组织供应这样的大城市了。

长安的人口最多时达100万人②，供应这么多人的口粮，终究是个很大的负担。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江淮成为主要粮食产地。要将江淮地区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到洛阳，再逆黄河、溯渭水运到长安以供需求，花费的时间和劳力是很可观的。尤其黄河漕运，相当艰难。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位置较为偏西，不便于控制东

---

① 杨鸿勋：《唐长安城明德门复原探讨》，《文物》1996年第4期。

② 《中国史稿》第四册25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南地区。这成为营建东都洛阳的主要原因①。

(二)隋唐东都洛阳城

隋大业元年(605年)春三月,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于洛阳营建东京。据史载,被征调的劳动力,每月达200万人,督役严急,死者竟达十三四五(《隋书·食货志》)。东都洛阳城于大业二年(606年)春正月建成,五代时衰落。隋唐两代,洛阳一直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对隋唐洛阳城址的考古勘察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4年开始的,1959年重点探索了宫城、皇城及周围诸子城的平面布局②,1960~1965年继续勘察了街道、里坊及市场位置,同时发掘了宫城内部分地点③。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重点勘察发掘了含嘉仓城和夹城遗址④,初步了解了隋唐洛阳城的大体面貌。

隋唐洛阳城位于邙山和龙门之间,洛水东西横穿城内,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现洛阳市区。

隋唐洛阳郭城大体为方形,北垣长6188、东垣长7312、南垣长7290、西垣长6776米。郭城南、北、东三面共开8个城门,现已探出

---

①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13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④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洛阳博物馆:《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含嘉城198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3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4 个门址;城西为禁苑,郭城西垣无门。

宫城位于郭城西北部,平面近方形,北垣长 1400、东垣长 1275,南垣有向南凸出部分,长 1710,西垣长 1270 米。城垣夯筑,内外包砖,一般宽 15～16 米。已探出南面正中的应天门(隋名则天门)、应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名兴教门)和西边的长乐门(隋名光政门),北面正中的玄武门和西侧的嘉豫门。1988 年又发现了应天门之北的乾元门①。东宫自成一城,在宫城东部。宫城内中轴线上,从南到北有大片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大殿址。隋唐两代为营建宫室而专门建造的砖瓦窑群,也在应天门内右侧等地被发现②。

宫城北为曜仪、圆壁两小城。曜仪城长条形,东西长 2100,南北宽 120 米。圆壁城平面梯形,东西长 2110、东宽 590、西宽 460 米。

皇城围绕宫城之东、南、西三面,其东西二壁与宫城东西二壁间分别形成一段夹城。

东城在皇城之东,南北长 1270、东西宽 620 米。1991 年 7 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考古队在东城中部也发现了一处砖瓦窑遗址,其使用年代大约是贞观 4 年到开元 19 年间③。

东城之北、圆壁城东为含嘉仓城。

含嘉仓城址长方形,东西约 615、南北约 725 米。仓城中粮窖密集,已探出 259 个,发掘了其中的 6 个。仅 160 号一个窖内,发掘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 年 1 期。

② 洛阳博物馆:《洛阳唐城宫城内的烧瓦窑》,《考古》1974 年第 4 期;洛阳博物馆:《隋唐东都洛阳城发现的几处砖瓦窑群》,《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78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 12 期。

出的已炭化的谷子据推算原应有 25 万公斤左右[1]，由此大体可以想见含嘉仓储粮的规模。粮窖中出土了 8 块铭文砖，记载着时间、粮窖位置、租粮种类、来源、数量以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是研究唐代官仓制度、经济和漕运制度的重要资料。

皇城、宫城和诸小城之外的郭城内区域为居民区。洛河以南郭城内已探出南北向街 12 条、东西向街 6 条；洛河以北郭城内探出南北向街 4 条、东西向街 3 条。诸街道中，南通郭城定鼎门，北达皇城、宫城正南大门的定鼎街最宽，达 121 米；其余街道较窄。根据勘探出的街道推算，洛阳的城坊数量与《唐六典》、《旧唐书》所记 103 坊之数恰相符合。各坊与长安城坊一样外围坊墙，中有十字街，是封闭式的，但面积较小，呈方形，长宽约 500～580 米之间，布局也很规整。值得一提的是，1992 年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还在唐代东都外郭城的东南部，履道坊进行了发掘，初步搞清了白居易故居的大致布局和规模[2]。

洛阳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洛阳的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隋代在洛阳设丰都、通远、大同三市；唐代改名为南市、北市和西市，三市地点和大小也略有改变。据记载，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元河南志》卷一）。北市因靠近宫城，西北又有漕渠之利，成为洛阳最繁盛的地方[3]。隋唐洛阳三市的位置大体已可推知，但由于洛水冲刷，南市、西市已无遗迹可寻，北市被现代建筑所压，无法钻探。

隋唐洛阳城设计与长安城有显著不同。主要是：

---

①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 年第 3 期；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 年第 2 期；沧清：《略谈隋唐时期的官仓制度》，《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②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 6 期。

③ 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 年第 8 期。

1. 皇城和宫城不在郭城中轴线北部，而是偏于西北，比长安等级要低一等。

2. 宫城除南置皇城外，北置重城，西邻禁苑，东接东城。皇城、宫城本身又内外砌砖，皇城之西并界以洛河，戒备之坚固严密，远在长安之上。

3. 里坊面积缩小，是北魏洛阳城旧坊制的恢复①，对里坊居民的控制显然比长安更加强化。

4. 洛阳小于长安，但比长安却多了一个市，三个市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可推知洛阳的设计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②。

此外，洛阳挟洛河而建，漕运便利也应是重要特征之一③。

傅熹年先生通过对长安、洛阳两城的发掘平面图和测量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二城均以宫城之宽、深为模数规划全城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设计方法。同时，以宫城——家庭皇权的象征为模数，使都城中一些重要部分是它的倍数、分数或相似形，也反映了皇权至上，控御一切的思想。这种规划设计方法对日本平城京等城市的设计有直接影响，在国内则一直延续到明清④。

隋唐两京对地方城市、地方政权都城和一些邻近国家都城的设计兴建有深远的影响。如方正的里坊和坊内十字街的设置，不但是当时地方城市如幽州城、云州城、益州城等州城规划的蓝本，而且影响到葱岭以西今苏联中亚一带的唐碎叶镇城和唐怛逻斯城。

---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五："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

②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7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

唐代东北地方政权渤海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城遗城经勘查，了解到也大体或部分仿摩了长安或洛阳。日本的五京（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及一些地方城市，也是仿效了长安、洛阳两城的布署设计营建的①。

另外，中国隋唐时期的建筑风格、结构、技术，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对朝鲜、日本，有重大影响②。

（三）隋唐扬州城

隋唐扬州城原名吴州，隋开皇九年（590年）改名扬州。扬州地处大运河中段水陆交通要冲，又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是当时的重要城市。

隋唐扬州城的正式勘察发掘工作本世纪70年代才正式展开，经过十几年的工作，现已基本搞清了隋唐扬州城的规模与形制，证实隋唐扬州城受长安、洛阳影响，在形制上颇与洛阳城相似③。

隋唐扬州城分子城和罗城两部分，总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子城也称为衙城，建在蜀岗之上，是官署所在地，罗城即郭城，紧靠了城南部。在郭城内发现有金属冶铸、制骨、骨雕、蚌雕、贝雕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发现古河道、木船、桥梁等交通遗迹遗物，还发现许多佛像等宗教遗物和大量釉陶、瓷器和生活用品。

二、隋唐墓葬

---

①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

② 傅熹年：《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的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文物》1992年第10期。

③ 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报告》，分别载《考古》1990年第1期、1994年第5期。

(一)陵墓

隋唐五代帝王陵墓中，隋代仅文帝建有陵墓。80年代初期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曾对隋文帝陵祠作了勘察。

唐代18帝陵分布在关中的6个县，是隋唐考古研究的重点。自50年代初迄今，陕西省考古工作人员重点勘测了乾陵（高宗和武则天）、桥陵（睿宗）、建陵（肃宗），调查了贞陵等其他陵墓，并勘测了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

唐代陵墓中的14座陵墓是依山为陵，其余4陵因距山较远，也依土原为陵。这是唐代陵墓的一大特点。据调查，这种依山为陵的作法是从太宗的昭陵开始的，以后相沿成制。

与"依山为陵"制度形成同时，也出现了在陵园附近辟陪葬区，由皇族和文武勋臣陪葬的制度。这也是从太宗的昭陵开始的。昭陵东南的陪葬墓达167座，可以确知墓主姓名，身份及入葬时间的有57座。这些陪葬墓依据墓主生前与皇帝的亲疏关系和地位高低而分成不同的等级，体现在墓葬地点安排、封土尺寸、外形和墓葬形制等各方面，反映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①。

陵园的平面布局从高宗的乾陵开始形成制度。基本布局是陵园中心筑陵台，陵台南置献殿，周围筑内外两层平面方形陵垣，四面各开一门，四门外各有一对石狮，南门两重陵门之间神道两侧置各种石刻、石碑等。以乾陵为例，内外城南门之间中轴线两侧置华表1对、翼马1对、驼鸟1对、石马及牵马人5对，石人10对。

除乾陵外，按"天子之制"设陵现存比较完整的还有河南的恭陵。

恭陵是高宗与武后之子李弘的陵墓。李弘（碑文作宏）因与武后不和，被武后鸩死，时年24岁。李弘死后，高宗亲制《睿德碑记》，

---

① 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

刻石陵侧，陵墓规制“尽用天子之制”，号为“考敬皇帝”(《新唐书·列传第六》)。根据调查实测，恭陵除仅一重陵垣外，其余与乾陵布局大体相同①。

唐代18陵的石刻是唐代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品。诸如昭陵六骏、献陵石犀、乾陵翼马、桥陵石狮以及顺陵的独角兽等，都是唐代石雕艺术的精华。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的原唐代藩镇。称王称帝后，陵墓尽管大多沿用唐代依山为陵制度，但因财力不足等原因，规模、气势均不如唐陵远甚。从已经发掘的南唐二陵②、前蜀王建墓③、后蜀孟知祥夫妇墓④来看，南唐主李昪、李璟墓、前蜀主王建墓都是前中后三室，分别为砖石、砖和石结构；后蜀孟知祥夫妇墓比较特殊，为横三室穹窿顶圆形石室墓。南唐二陵出土了大量陶俑和哀册、谥册和谥宝等，王建墓后室还出土了墓主的石圆雕坐像。

(二)墓葬的分区与分期

在隋唐统治区域内都发现了隋唐墓葬，以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发现的最多，发掘的也最多。其他如山西太原、辽宁朝阳、新疆吐鲁番、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以及福建、广东、四川、河北、宁夏、江西、山东、浙江等地也是隋唐墓葬发掘较多的地区。

根据唐代墓葬情况，大体上可将唐墓依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两大区内还可划若干小区。

北区墓葬面貌比较统一，大体为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类。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形状的区别，又可分为西安及附近地区、辽

---

① 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

② 南京博物院编著:《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④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35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宁朝阳、新疆吐鲁番三个小区。南区唐墓地方性较鲜明，随葬品陶瓷器较多。有的学者认为，受材料限制，南区再详细划分区域是困难的①。

根据全国发现隋唐墓葬的现状，也有学者认为可划分为7个区域，即两京及附近、朝阳、湖北、湖南、扬州、广东和福建地区，吐鲁番、山西和甘肃等地唐墓虽各有特点，但整体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所以与两京划为一个大的区域②。

迄今已经发掘的比较重要的隋唐墓葬有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壁画墓，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汾阳北关隋梅渊墓，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陕西唐鲜于庭诲墓、李爽墓、高元珪墓、苏思监勗墓、韦泂墓、永泰公主墓、郑仁泰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李寿墓、阿史那忠墓、李贞墓、张士贵墓、尉迟敬德墓、安元寿夫妇墓、咸阳韦氏家族墓，河南唐安菩夫妇墓、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山西唐崔拏墓，辽宁唐韩贞墓、朝阳武德二年墓，湖北唐李欣墓、吴王妃杨氏墓、李徽闫婉合葬墓，宁夏唐史道德墓及史氏家族墓地，广东张九龄墓。另外，湖南长沙、江苏扬州、新疆吐鲁番等地区中小型唐墓发现集中，数量也较多。尤其吐鲁番等地唐墓，因自然地理条件，墓内遗物保存较好，出土大量文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第一手的重要文字资料。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向发现唐墓不多的北京和河北地区，近几年来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唐墓，为研究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可贵的实物材料。

由于西安地区隋唐墓发掘的数量相当多（近3000座），有不少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5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墓葬墓主清楚，有明确纪年，在中国隋唐墓葬研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对西安地区隋唐墓的研究也就最为充分。

宿白先生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将西安地区唐墓分为四型，认为此四型分别与皇室重臣、五品以上（其中三品以上又可分出一级）、五品以下、庶人的身份级别相对应，并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和有关考古资料，提出唐陵地宫应为前、中、后三室结构①。

1962年，有人曾将西安地区唐墓分作三期②。1966年，有的学者根据1955～1961年西安郊区发掘的175座隋唐墓资料，将三期分法更为详细地作了阐述，即：第一期，隋至初唐（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第二期，盛唐（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期）；第三期，中晚唐（8世纪中期至10世纪初期）③。这种看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隋唐墓葬分区与分期”条目所采用④。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建国以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收获》一文中，将这种意见表述为：第一期，隋至唐中宗神龙年间；第二期，睿宗景云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第三期，代宗大历年间至唐末⑤。

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作者将隋唐墓葬分为四期⑥。即：第一期，唐初至高宗时期；第二期，武则天至中宗时期；第三期，玄宗至代宗时期；第四期，德宗至唐末。

还有人根据西安地区百余座隋唐墓形制的变化，将其分为七期。即：第一期，隋；第二期，隋末至唐高宗初年；第三期，高宗初年

---

① 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③ 中国科学院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5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⑤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3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8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至中宗时期；第四期，玄宗时期；第五期，肃宗至德宗以前；第六期，德宗至宣宗以前；第七期，宣宗时期至唐亡①。

宿白先生根据西安地区唐墓材料，将西安地区唐墓壁画按布局与内容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高祖至太宗中期，壁画布局与内容沿袭北期、隋代旧制；第二阶段，高宗时期，唐墓壁画特征开始出现；第三阶段，武则天晚期至开元初期，唐墓壁画特征形成；第四阶段，天宝至德宗时期，二、三两阶段所形成的壁画特征在此阶段有了较大的改变；第五阶段，元和以后至唐亡，上一阶段的简化和衰落②。

李知宴同志根据唐代瓷窑和主要出自西安唐墓的陶瓷器，将唐代瓷器分为三期。即：第一期，高祖至武则天时期(7 世纪初至 8 世纪初)；第二期，中宗至代宗时期(8 世纪初至 8 世纪末)；第三期，德宗至哀帝时期(8 世纪末至 10 世纪初)③。

孔祥星同志主要根据西安地区隋唐墓出土铜镜材料，将隋唐铜镜作了类型的划分和分期。他分的三期是：第一期，隋至唐高宗时期；第二期，武则天至唐德宗以前，其中又可再分为两个阶段，以开元和天宝之间为界；第三期，唐德宗至晚唐④。

以上分期由于所据资料不同，看法并不一致。但无论哪种分期法，都认为隋唐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在 300 多年间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并且有鲜明的阶段性；对隋唐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外形演化的认识，也是基本相同的。例如：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82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③ 李知宴：《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 年第 2 期。

④ 孔祥星：《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 年)》，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从唐初到唐末，从较大墓葬盛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小龛，到墓道缩短，天井，小龛数减少，墓室构筑受到重视，再到斜坡墓道更短，逐渐流行竖井式墓道，天井减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

随葬器物的变化大体是由初唐的多仆侍俑，以牛车为仪仗俑主体，到武后时牛车渐变为立马，骆驼和牵驼俑增多，再到盛唐时盛行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和建筑模型，元和以后陶俑减少，金属俑增多，经常出现装饰繁缛的绢衣木身俑。

陶俑的艺术风格从唐初尚有北朝清瘦遗风，到盛唐时面颊丰腴，造型匀称，天宝后，人物俑渐渐肥胖臃肿，造型呆板，走向衰落。

三彩器作为一种随葬品在唐墓中盛行，大致在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以后逐渐消失。

另外，像陶瓷、铜镜等器物在唐朝各个不同阶段的主要种类及造型演变的具体看法，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其他地区隋唐墓葬各有地方特点，如朝阳地区唐墓墓室平面呈圆形，券成圆顶；江南唐墓随葬品多陶瓷器；扬州唐墓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两京地区三彩器中晚唐时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同时期墓中三彩器却流行起来。各地唐墓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形状的变化，大多也可以分期①。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较多，有纪年的五代墓数量很少，而且随葬品也很简陋。较重要的有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后周墓、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等。十国大多位于江南，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经济仍有发展，墓葬发现也较多。现已发现有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前蜀、后蜀、楚等国墓葬。这些墓葬大多数随葬白瓷、青瓷器。福建闽国墓多随各种陶俑和神怪俑。成都的后蜀孙汉韶墓则随葬有一组陶建筑模型，为同时期其他墓葬中所罕见。

---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还需要一提的是，北方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对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近几年多有辽早期的重要考古发现。1992年发掘清理的内蒙辽耶律羽之（公元890——941年）墓为砖石结构，石质墓门和主室门上彩绘精美的图案和武士像；主室四壁及顶部均以绿色琉璃瓦砌筑，铺地砖亦为有花卉和昆虫图案的绿色琉璃方砖，富丽堂皇；随葬品有做工精细的金银器，铜、瓷等生活用具以及大量丝织品等。出土的"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国墓志铭并序"所载史实颇丰①。1994年发掘的时代为唐末的赤峰宝山辽墓，则发现大量极精美的壁画。这些晚唐壁画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②。以上两项各被列入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三、隋唐五代的手工业遗物与遗迹

（一）金银器

自1949年以来，唐代金银器被大量发现，至今已达1000余件。主要出土于陕西、江苏、浙江、辽宁、河北、甘肃、内蒙等省区。其中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宗。

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窖藏银器19件，有碗、碟、盘、罐、杯、羽觞、盏托、匙、筷、曲圈等器种。据银碗底部刻"宣徽酒坊宇字号"和银碟底部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等铭文，知这批银器有唐"宣徽院"遗物，有盐铁使敬晦的贡品，埋葬年代应在大中四

①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② 材料待刊

年之后①。

1963年春，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唐代居住遗址出土银器15件，器种有熏球、碗、杯、盒、壶、盆，埋葬年代约在安史之乱以后②。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共1000余件，中有金银器270件。这批金银器种类很多，仅精美器物就有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鸾鸟六瓣银盘、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双桃型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蔓草鸳鸯纹银羽觞、漆花银盒、刻花涂金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镂空银熏球等多件③。八棱金杯中的一件纹饰用掐丝珐琅做出，填料已脱落，但仍不失为珍贵的掐丝珐琅作品，被认为是元明景泰蓝的前身④。由于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种类多样，器形、纹饰差别较大，据研究各器制作时间也有早晚之分。早的大约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晚的在代宗至德宗时期。埋藏时间约在德宗时期⑤。

1982年元旦，在江苏丹徒丁卯桥附近土地上，发现一个大型唐代银器窖藏。出土银器995件，计有酒瓮、龟负“玉烛”、酒令筹、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熏炉、锅、箸、匕、勺、镯、钗等，不乏精美之物。如龟负“玉烛”前所未见。据研究，这批银器大多为

---

①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

② 西安市文管会：《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

③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⑤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中唐末期当地产品。1980年12月，在距上述窖藏20米处发现银铤窖藏，出土20笏，达40公斤重①。

另外，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中出土33件银器，其中13件为冥器。水邱氏为晚唐吴越王钱镠之母，天复元年(901年)死后归葬临安②。

1987年2月至1988年4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扶风法门寺塔基及其外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在唐代地宫内出土大批文物，内有金银器121件(组)，主要为生活用具、供养器和法器三大类。部分金银器上刻铭内容注明打造机构、器物名称、时间、重量、监造官员等，可知主要是长安的文思院(专为皇室制作金银器皿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和以浙西为主的江南地区制造的。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文物是唐代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其中金银器代表了晚唐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数量大，等级高。许多金银器非常精美，如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盆、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鎏金鸿雁纹壶门座五环银香炉、鎏金双蜂团花纹镂空银香囊、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流金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鎏金银龟盒、鎏金人物画银锝子、六臂观音盝顶金函、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金筐宝钿珍珠装银宝函、鎏金阏伽银瓶、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伽陵频迦纹小金钵盂以及唐代高僧智慧轮于咸通十二年闰八月造的素面壶门座盝顶银函等。从器物造型、纹饰特征来看，大多数制造时间应在晚唐。根据出土器物的铭文和有关文献记载，可知法门寺塔地宫封闭于唐

① 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①。

对于唐代金银器的分期,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将唐代金银器分为四期。即第一期,初唐到高宗时期(618——683年);第二期,武则天到玄宗时期(684——755年);第三期,肃宗到宪宗时期(756——820年);第四期,穆宗到哀帝(821——907年)②。

另一种意见将唐代金银器分为两大期,包括五小期。即:前期第一期,唐初到武则天;第二期,中宗至玄宗;后期第三期,玄宗之后德宗以前;第四期,德宗至文宗时期;第五期,宣宗时期③。

两种不同分期意见的共同点是对唐代金银器的器种、造型、纹饰的演变过程的认识基本相同。即唐代武则天以前的金银器受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影响;玄宗之后,完成了金银器中国化的过程,出现了金银器工艺繁盛时期。不同点在于四期说选用了较晚发现的江南金银器,如丹徒丁卯桥和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中出土的银器作为研究标本,较多地注意到中、晚唐时期金银器工艺中心南移现象。而五期说主要选用了北方,特别是西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作为研究标本,分期较细,但缺乏中晚唐资料。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大量金银器的出土,对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分期无疑会有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作用。

唐代金银器纹饰在玄宗以前多为宝相花、忍冬、多瓣小团花及折枝花鸟、狩猎纹等;安史之乱后,团花、牡丹花、各种花鸟图案和摩羯纹等成为最流行的纹饰。

晚唐时期,北方制造的包括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文思院制的

---

①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② 韩伟、陆九皋:《唐代金银器概述》,《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9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一批金银器，与何家村盛唐时期的金银器相比，质量较差，也比较单薄，显然走下坡路了，远比不上同是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浙西的金花银盆①。

由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晚唐时期南方的手工业，包括金银器制造工艺获得很大发展，并很快超过了北方。由于南方官府控制较松，因而金银器生产的民间色彩浓厚，结果使金银器的艺术风格更加民族化，品种趋于世俗化，生产也开始商品化②。

据对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研究，认为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加工工艺是极为复杂精细的。器物成形以钣金和浇铸为主，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錾刻、镂空、捶打等工艺的使用已很普遍，仅焊就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几种工艺。在盘、盆、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子扣经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严密。各种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现象，可能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③。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 年)收集了建国后历次重大发现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以及部分欧美、日本诸国珍藏的唐代金银器，是很完备的有关唐代金银器纹饰的资料。

另外，学者们还对唐代的饮茶习俗与金银茶具，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唐代金银器、银铤与衡量制度，唐代丁课银铤，金银器铭文，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及其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等许多问题作了研究。

---

① 宿白：《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文物》1988 年第 10 期。

② 刘建国：《试论唐代南方金银工艺的兴起》，《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 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94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二）陶瓷器

在隋唐考古中，隋唐五代陶瓷研究有重要地位。这时期的陶瓷器，不但有色彩绚丽斑斓、风格富丽热烈的唐三彩器，而且瓷器生产也出现新的局面，南有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北有类银胜雪的邢窑白瓷。由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质量高、产量大，深受当时人们喜爱，越窑和邢窑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窑口。一般陶瓷研究者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征，但实际上，南方也烧白瓷，北方也生产青瓷，有些质量也很好。并且当时还生产黑瓷、黄瓷、花瓷和釉下彩瓷等，有很多是新出现的品种。

1. 主要窑址

迄今为止发现的隋唐五代窑址已达几十处，主要有河北邢窑、曲阳窑、贾壁村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安阳窑，浙江越窑、瓯窑、婺州窑，湖南湘阴窑、长沙铜官窑、岳州窑，陕西耀州窑，四川青羊宫窑、邛崃窑，江西洪州窑、五代景德镇白瓷诸窑以及福建、广东、山西、安徽等许多省区的隋唐五代窑址。这些窑口有一些到宋代仍有生产，如曲阳窑发展为著名的定窑。

1）邢窑

唐李肇《国史补》有“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一说，可知唐代白瓷以邢窑器最著名。但建国后30年来在内丘东磁窑沟一带的调查，一直没有发现唐代窑址，使有些人对邢窑是否存在产生怀疑。1980年3月、11月，新成立的“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在紧靠内丘县的临城县境内古窑址进行了调查，发现4处唐代窑址，并于1981年3月对临城祁村窑作了试掘，获得大量标本①。祁村窑的发现被认为“证实了唐代鼎鼎大名的邢窑的存在，

---

① 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解决了陶瓷史上的一个悬案"①。但是，由于祁村窑是在临城县境内，与文献所记邢窑在内丘县境内仍有差别，邢窑的秘密仍未最后揭开，陶瓷专家们盼望着能在内丘有新的发现。

1984年春，内丘县文物保管所在内丘县境内5个乡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古窑址28处，根据出土遗物分析，被确认为唐代邢窑遗址②。至此，邢窑主体才被发现，最终解决了陶瓷史上一大问题。

内丘邢窑采集的标本除去有薄如蛋壳的细白瓷外，还有粗白瓷、青瓷、黄釉瓷、黑釉瓷，酱釉瓷以及三彩釉陶等；主要器种有碗、盘、杯、瓶、罐等。窑具有支钉、垫圈和匣钵等。时代始于北朝，盛于中唐，衰于晚唐。五代后，邢窑北方的定窑以精湛的工艺迅速崛起，很快取代了邢窑的地位，成为最著名的白瓷窑口，邢窑衰落。

2)越窑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绍兴、上虞一带属越州，这一带烧制青瓷的各窑便被统称为越窑。唐陆羽《茶经》中将越州瓷碗列为第一，认为越瓷"类玉"，可知越州瓷器在当时的地位。

唐代越窑作坊分布极广，遍布今日浙江省东、北部，包括上虞、慈溪、余姚、宁波、绍兴、诸暨、镇海、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县市，形成庞大的瓷业系统，中心在上虞、余姚和慈溪等地③。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余姚上林湖越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共发现古窑址100余处④。越瓷窑场多，产量大，质量上乘，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

越瓷中的突出品种是所谓的"秘色瓷"。这个名称据宋赵德麟

---

① 《中国陶瓷史》20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③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④ 金祖明：《唐代越窑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讲："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宋赵德麟《候鲭录》）宋人周辉《清波杂志》、曾慥《高斋漫录》二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然而"秘色"瓷器一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当早于吴越。唐陆龟蒙《秘色越器》一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不但将"秘色"与越瓷相联，清楚地点明秘色瓷为越窑所产，而且讲明秘色瓷的颜色"千峰翠色"，是青瓷器。

过去浙江一带晚唐吴越国墓葬如钱宽墓、水邱氏墓、临安五代墓中出土的一些精美的青瓷器，被认为是"秘色瓷"，主要理由之一是："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①尽管浙江晚唐五代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可能就是秘色瓷器，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是文字证据，什么是秘色瓷这一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

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 14 件青瓷器，包括八棱净水瓶 1 件、碗 5 件、盘 6 件、漆平脱银扣碗 2 件。由于地宫内石制"物帐"明确注明上述青瓷器为秘色瓷器，名物相符，终于为解决什么是秘色瓷这一困扰了古陶瓷学界多年的问题找到了可靠的证据②。根据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来看，秘色瓷颜色为青绿色和青黄色两种。由于青黄釉不如青绿釉受人青睐，便常增加一些辅助性的装饰，如法门寺两件青黄釉大碗就加了漆平脱银扣，非常精致。这也说明了"金扣瓷器"、"金棱秘色瓷器"并不始于奢侈成风的钱氏君臣，而是从晚唐就已开始了。

2. 唐三彩与艺术瓷

唐代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白色粘土作胎，施绿、蓝、

---

① 《中国陶瓷史》195～196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0 期；冯先铭：《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李辉炳：《略谈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李知宴：《青瓷工艺成熟的标志》，《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文物》1988 年第 10 期。

黄、白、赭、褐等釉彩。一般来讲，仅施一种釉彩的称单彩器，施两种的称两彩器，施三种以上釉彩的称为三彩器。三彩器以唐代长安、洛阳两地出土数量最多，其次为江苏省扬州地区，其他如山西、甘肃、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不少发现。绝大多数三彩器都出于墓葬，用作明器，遗址中很少见到。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三彩器出自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李凤墓中①。玄宗时，三彩器达到最盛期，天宝之后两京地区三彩数量迅速减少，但扬州一带反而有所增加。

现已发现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有河南巩县窑、密县西关窑、登封典河窑、陕西耀州窑、河北邢窑等。由于两京地区出土的三彩器种类很多，有许多种不是以上各窑生产的，可以肯定还有许多三彩窑址尚未发现。扬州天宝之后三彩器增多，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也应该有三彩窑。

用作明器的三彩陶器种类极多，生活用器有瓶、壶、罐、钵、碗、杯、枕等 10 余种，每种又有许多式样；建筑物有假山、水榭、楼台亭阁；禽畜有马、骆驼、驴、牛、猪、羊、狗、鸡、鸭；人物有仕女、男女侍、胡人、文官、天王、武士、拉马人物等②。这些三彩器中许多艺术价值很高，尤其是为数不少的雕塑作品，和同时期的青、白瓷雕塑器一样，非常精美。还需要指出的是，唐代雕塑作品的成熟之作，多为唐三彩陶。许多三彩马、骆驼、仕女、天王、胡人、武士等成功的作品，形神俱佳，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大量仿制。前文提到的鲜于庭海墓出土的 1 件载乐舞队驼俑，骆驼头颈上昂，四肢强壮有力，站在长方形座板上。驼背中间为一舞俑，4 个乐俑分坐两侧。5 个乐舞俑中有 3 个俑为胡人形像。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0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② 《中国陶瓷史》215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1972年，陕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1件绞胎骑马狩猎俑。这件作品不仅由于马和人物形态逼真，静中有动，更主要的是采用了一种唐代新出现的工艺手法——绞胎。

绞胎是将两色瓷土重迭揉合后制坯，烧成后器表呈现出行云流水般如木纹或大理石纹一样流畅自然的纹理。现已发现的绞胎器有杯、碗、盘、钵、罐、注子、枕等，以枕最常见。李重润墓出土的这件绞胎骑马俑，人、马全是绞胎，是目前绝无仅有的1件绞胎瓷塑。它的制造工艺比盘、碗等圆器难度要大得多。

这种绞胎的意匠是怎样产生的？有人认为它是仿自一种称为"犀皮"的漆器工艺；有人认为绞胎意匠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孙机先生认为绞胎器的意匠与我国古代一种木器——瘿器有关①。

由于唐三彩色调明快、热烈，风格浪漫传神，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尽管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恶劣，唐三彩器还是同丝绸、瓷器一起，作为中国唐代出口商品传到世界许多地方。除日本发现比较多外，其他如前苏联中亚各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埃及、苏丹、意大利、朝鲜、印度尼西亚等10余国也有发现②。日本并且仿照唐三彩器，生产了奈良三彩。

3. 几个问题的讨论

1)有关青花瓷起源问题的研究

青花瓷器是以钴为着色剂的釉下彩瓷，是我国瓷器史上继青瓷、白瓷和宋代出现的影青瓷之后又一朵盛开的奇葩。它清新明丽，素雅大方，元代之后开始繁盛，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瓷器品种。但青花瓷创烧于何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青花瓷创烧于元代，是元代官窑为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源于景德镇；另一种意见认为青花瓷产生在宋代或更

---

① 孙机：《绞胎器与瘿器》，《文物》1988年第12期。

② 韩于西：《洛阳唐三彩纵横》，《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早，发展到元代在景德镇生产出了较为成熟的青花瓷器①。

现在发现和传世的青花瓷器，以明清两代器物最多，质量也最好。元代也有不少青花瓷器，大多是考古发现的。现已发现的元代最早的青花瓷器是杭州出土的至元十三年（1276 年）的 3 件青花观音塑像②。这些元青花的胎、釉、青花色泽都很精美，已很成熟，因而很多古陶瓷界学者认为在元代之前，必定会有一个创烧和发展阶段。

1957 年，在浙江龙泉金沙北宋太平兴国（977 年）塔基中发现 3 件青花碗残片，共 13 块，经测定青花为国产未经精选的钴料。1970 年秋，在浙江绍兴南宋咸淳元年（1265 年）翠环塔基中发现青花碗残片 1 块，胎釉与龙泉金沙塔所出相似③。江西吉州窑也发现过宋代的青花小碟④，这样，宋代已能生产青花瓷成为定论。

青花瓷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釉下彩瓷。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釉下彩产品是 1983 年在江苏南京雨花台长林村吴末晋初五号墓中出土的 1 件青瓷釉下彩盘口壶⑤。这种釉下彩产品在唐代的长沙铜官窑中已经成批生产，在许多地方的唐代遗址、墓葬中也经常发现铜官窑釉下彩瓷器，说明这种工艺在唐代已经成熟。第二，这种釉下彩应该采用钴为呈色剂。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的琉璃珠上，就有鲜艳的蓝彩，显然是钴的呈色，可是不能肯定这些琉璃珠是中国的产品。但唐代以钴为呈色剂已很普遍，例如唐三

---

①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0 期。

② 《本文发现元初瓷观音塑像》，《杭州日报》1979 年 7 月 25 日。

③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④ 唐昌朴：《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⑤ 易家胜：《南京出土的六期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文物》1988 年第 6 期。

彩上的蓝彩就是钴的呈色。这些说明唐代已确实具备了青花瓷器产生的技术条件。

1975 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1 件青花枕碎片，由于纹饰带有浓厚的波斯风格，且不能确定窑口，未能得到古陶瓷界的普遍承认①。另外，香港冯平山博物馆也收藏 1 件唐代白釉蓝彩三足鍑，据说 1948 年出土于河南巩县，胎釉特征与巩县窑白瓷近似②。由于是传世品，没有确实的地层学根据，且为孤例，尚不足以说明问题。

1983 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唐城遗址唐代地层中，采集到 10 余片青花残片，器种计有壶、碗、盘 3 种③。据研究，器物造型、胎釉特征都与河南巩县窑相似，大体可以认为是巩县窑产品。这 10 余片唐代青花瓷片的发现，使得青花瓷创烧于唐，发展于宋，成熟于元明的观点得到古陶瓷界大多数人的同意。当然，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说必须要找到烧制唐青花的窑址。

2)有关“官”“新官”款白瓷产地的讨论

在晚唐、五代、宋、辽的墓葬和塔基中，多次出土器底阴刻“官”或“新官”款的白瓷器，出土地点分布在浙江、河北、北京、辽宁、内蒙、湖南等省市区，总数约 70 件④。这类白瓷质地上乘，加工精致，多出土于纪年墓和塔基中，年代明确，是古陶瓷研究的重要对象，

---

① 顾风、徐良玉：《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文物》1985 年第 10 期。

② 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③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扬州博物馆：《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顾风、徐良玉：《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碗残片》，马富坤：《扬州新发现一件唐青花瓷片》，《文物》1985 年第 10 期。

④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这类白瓷的产地成为研究的主要课题。

对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大体有 7 种意见。1. 认为辽墓所出上述白瓷均是辽国官窑产品；2. 认为辽墓所出上述白瓷大部为定窑产品；3. 辽墓所出与定窑址出土的都是定窑产品；4. 湖南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一部分是定窑产品，一部分是湖南本地所产；5. 浙江晚唐钱宽墓出土白瓷，主要是"官""新官"款白瓷，可能是湖南生产的；6. 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发掘后，发掘者认为钱宽及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上述白瓷可能是浙江本地生产的；7. 除湖南地区个别"官"、"新官"款白瓷如粉盒可能产自湖南本地外，辽墓和浙江所出均为定窑产品①。

根据目前材料，除唐五代定窑窑址出土了"新官"款白瓷盘，可以肯定定窑确实烧制"官"、"新官"款白瓷器外，其他各地均尚未发现生产这样的精致白瓷的唐五代窑址。辽宁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窑址虽然出土"官"款匣钵，但出土的大量瓷片中没有 1 片有"官""新官"款，并且瓷器质量不高，远比不上定窑器精美，似不具备生产"官""新官"款白瓷器的条件。浙江、湖南尚未发现烧制此类白瓷的唐五代窑址。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尚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

四、隋唐佛教遗迹遗物

自汉代佛教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发展至鼎盛。佛寺从汉代星式散布，至唐已形成佛寺网络。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千余寺，二十余万僧尼，大约是唐王朝的社会生产力所能供养之佛寺僧尼的临界数。唐王朝也以此为充数，用以控制全国佛寺、僧尼的规模。标

---

① 参阅李辉炳：《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 年第 12 期。

志着佛教到隋唐时期已基本纳入中华帝国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有序轨道，成为中华社会精神文化的领域里普遍而稳定的存在①。

(一)隋唐石窟寺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②。石窟源于印度，我国石窟的开凿约始于公元 3 世纪，北魏至唐末达于全盛，16 世纪时是我国石窟开凿的下限。

我国的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这些石窟寺大多已被明清地方志和游记所记载，本世纪初，就有一些外国人根据以上记载对部分石窟寺作了调查。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始于本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研究中③，发掘了部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对已知的石窟群作了详略不等的测绘、编号、摄影、临摹等基础工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经过调查，还发现了许多湮灭已久的重要窟龛。

中国石窟一般可分为三个大的地区，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隋唐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隋唐窟龛的石窟寺有：新疆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十六国至唐）、库木土拉石窟（十六国至唐）、森木塞姆石窟（十六国至唐）、柏孜克里克石窟（唐宋），中原北方地区的敦煌石窟（十六国至元）、安西榆林窟（唐至清）、永靖炳灵寺石窟（十六国至明）、太原天龙山石窟（北朝、唐）、龙门石窟（北魏至唐宋）、响堂山石窟（北齐至隋唐）、山东济南附近的千佛崖、千佛山、佛慧山、玉函山石窟。南方地区以四川唐、五代窟最为

---

① 张弓：《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文物》1993 年第 10 期。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石窑寺考古”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宿白：《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文物》1951 年第 5 期。

丰富，在大足、广元、安岳、巴中、资中等县市多有分布，多为中唐以后刻凿。长江以南晚期石窟较多，不见唐窟。

新疆地区隋唐石窟较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石窟。50年代调查时已注意到各窟之间的时代差别，但未作细致的分期研究①。1961年，有人将克孜尔保存较好的74个窟分作四期②，其中第四期的时代约为唐宋。

敦煌石窟是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的总称，但一般指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莫高窟可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五个大的发展阶段③，其中以隋唐时期最为兴盛。现存隋唐洞窟300多个，占莫高窟洞窟总数60%以上。隋唐典型洞窟是平面方形的覆斗顶窟，盛行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或二力士的七身一铺和九身一铺的造像组合。壁画从北朝、隋代人物形像比较清瘦到唐代人物体态日益丰满，绘画技法从铁线描发展成兰叶描，内容从北朝、隋代多绘千佛、说法图、简单经变和佛本生故事发展到唐代的巨幅经变画，还出现了诸如如意轮观音等密宗题材壁画。晚唐的张义潮夫妇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开创了在佛龛绘制世俗人物事迹壁画的先例。

云冈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以北魏石窟为主，唐窟很少，在隋唐石窟研究中不占重要地位。

龙门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至北宋历代续有雕凿。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其中约2/3是唐代窟龛。著名的唐代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及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11尊雕像，是龙门石窟造像的突出代表。龙门唐代列

---

① 王子云：《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文物》1955年第2期。

②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敦煌石窟”条，马世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像窟主要是净土宗的遗迹，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太宗至高宗时期，这期洞窟多具前后室，造像列于后壁，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加二天王。第二期武则天时期，前后室洞窟，后壁凿出佛坛布列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这种九身一铺的组合是龙门唐代净土宗的基本形式。第三期为中宗至德宗时期，多方形平顶窟，多一铺九尊像。密宗造像在此期内盛行。造像的艺术性已较初盛唐大为逊色①。

盛唐以后，正当北方中原地区石窟如日过中天，渐显衰颓之际，四川石窟却异军突起，历经中晚唐、五代和两宋，四百余年昌盛不衰。现四川全省有50多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10个以上窟龛的就有120余处。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僖宗避难蜀中，带去大量画家高僧，四川社会也比较安定，文化较发达，故四川石窟多雕刻精品。

唐代佛教兴盛的标志之一是各种宗派的出现。这在石窟造像中有清楚的表现。对龙门石窟的研究表明，唐初流行于洛阳地区的佛教宗派，有净土宗（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是龙门列像窟的主体）、华严宗（有奉先寺），三阶教稍后出现，开元之后，禅宗（有看经寺）、密宗（有多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和擂鼓三洞）造像兴起②。

开元年间，密宗三大法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齐集长安，称为开元三大士，密宗大盛。大约此时密宗传入敦煌。安史乱后，密宗随唐室百官传入四川。武宗灭佛，密宗在中原一蹶不振，但在敦煌和四川却仍然流行。四川密宗造像受到中原北方，包括敦煌的影响，但川北、川中的一些造像，如孔雀明王、十圣观音、数珠手观音、大黑天神、毗卢佛和十二圆觉、摩利支天女等，则不见于中原北方，

---

① 同上。

②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似应追寻其另外的来源①。

（二）隋唐舍利塔基

隋唐舍利塔基到1988年底止已发现多处，主要有以下几处。

西安东郊长乐路隋开皇九年（589年）瘗埋于清禅寺的舍利佛骨8粒，周围砌简单的砖圹。

陕西耀县神德寺隋仁寿四年（604年）舍利塔基，舍利石函四周砌护石和砖墙，内用盝顶铜方盒盛舍利、圆铜盒装头发，还有净瓶七宝。

甘肃泾川大云寺唐延载元年塔基，出现平面方形单室地宫，有短甬道。地宫内舍利石函中依次套装鎏金铜函、银椁、金棺，棺内琉璃瓶中盛舍利。

陕西临潼庆山寺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塔基，仍为短甬道单室地宫。内置雕饰精美的石质宝帐，帐内依次为银椁、金棺、盛放舍利的玻璃瓶两只。地宫内围绕舍利葬具放置100余件包括金、银、三彩、玻璃等质料在内的供奉器。

1990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下地宫内发现唐舍利，盛具从外至内依次为：彩绘石函、鎏金铜函、木函、金函。尤以彩绘石函雕刻精美。

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塔基地宫，前中后三室，供奉佛指舍利4枚。一枚置于地宫后室八重宝函内，由外至内依次套装为：银棱盝顶黑漆宝函、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素面盝顶银函、鎏金如来坐佛盝顶银函、六臂观音盝顶金函、金筐宝钿珍珠装金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函、宝珠顶单檐四门金塔，舍利套在塔基正中银柱上。第二枚置于地宫中室汉白玉灵帐之中，内依次为盝顶铁函、丝绸包裹的鎏金双凤纹银棺，内放舍利。第三枚深藏

---

① 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谈》，《文物》1988年第8期。

后室秘龛内，依次为织金锦包铁函、鎏金造像盝顶银函、银包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椁、门座玉棺，玉棺内放佛指舍利。第四枚置于前室汉白玉阿育王塔内，塔内依次为铜浮屠、丝绸包裹的鎏金银棺，棺内置佛指舍利。围绕四枚舍利葬具，供奉大量精美器物，除前文已介绍过的金银器和秘色瓷外，还有琉璃器，丝绸、铜菩萨像和石刻等，是唐代文物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另外，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北宋元丰元年（1078 年）塔基地宫内，出土唐李德裕于太和三年（829 年）重瘞舍利时供献的金棺银椁。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大批唐代珍贵文物引起国内外关注。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地宫构成一个完整的曼荼罗①。罗炤仔细分析地宫的形制、陈设，对照密宗教理，认为此地宫不是曼荼罗，而是以帝陵墓室规格构建的佛塔地宫；地宫后室秘龛出土的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所示曼荼罗像②，是严格按照唐高僧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珈分别圣位修证法门》真传本的顺序和方位安排的③。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知道唐代已改变了北魏时舍利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隋代仅构筑简单砖石护墙的状况，出现了模拟墓室的地宫。法门寺地宫因系皇室所建，故采用三室的最高规格。盛放舍利的容器，也已从北魏时的玻璃瓶，经过隋代外加铜盒石函，发展到唐代的多重宝函和模仿人间葬具的金银棺椁。这些都表明唐代佛教的文物制度已改变了在印度次大陆时的原貌，出现了适合

---

① 法门寺塔地宫发掘简报及笔谈评述，均发表于《文物》1988 年第 10 期。

② 罗炤：《略述法门寺塔地宫藏品的宗教内涵》，《文物》1995 年第 6 期。

③ 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文物》1992 年第 8 期。

中国传统的新形式①。

对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琉璃器、丝绸和佛教文物中浓厚的密宗色彩等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或正在进行研究。

① 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文物》1988年第10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13——61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九章 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和吐鲁番是我国西北地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镇。这里不仅保存了许多以石窟寺和墓葬为主的古代文化遗迹，从19世纪末期以来还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书与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唐代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及收藏情况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在1900年5月。当时一个在莫高窟定居的道士王圆籙，无意中发现16窟甬道的北壁是空的。当他挖开墙壁后，便看到里面堆集着大批的古代经卷和文书，以及刺绣、幡画等文物。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一些正在我国西北地区活动的外国探险家的注意。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首先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去了大约7千多份经卷与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从王道士手中搞到了5千余卷手稿和刻本。次年，我国学者得知了这些情况，便要求清政府立即采取措施。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其悉数运往北京，但王道士却又偷偷隐藏了一部分。这样，1912年和1914年两次到敦煌的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来到敦煌的俄国人鄂登堡，以及同年再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又都分别劫走了一批文书。

外国探险家对吐鲁番文书的劫掠比对敦煌文书的劫掠还要

早。据透露，早在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兹就已经从吐鲁番地区的哈喇和卓墓地盗掘了一批汉文、梵文和其它文字书写的古代文卷写本和铭刻。1902年，德国人克伦威德尔在吐鲁番地区进行盗掘时也获得了一批文书。后来克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又先后三次到达吐鲁番，每次都劫走许多文书写本、经卷和其他文物。此外，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成员也曾在1902、1912、1913年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并劫取了大批文书写本。俄国人鄂登堡和英国人斯坦因也曾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过盗窃文书和文物的活动。

这样，从本世纪初期起，敦煌吐鲁番文书便流散到了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

目前收藏在英、法两国的，主要是敦煌文书。英国大约有1万1千余件，其中汉文部分保存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藏文部分保存在英联邦事务所。法国约有6千余件，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中。收藏在俄罗斯和日本的，既有敦煌文书也有吐鲁番文书。俄罗斯大约有1万2千余件，多数为敦煌文书，目前主要保存在列宁格勒的亚洲民族研究所。在日本的被称为大谷文书，约7千余件，目前主要保存在龙谷大学图书馆。在德国的只有吐鲁番文书，约1万4千余件，其中有6千件保存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古代史及考古中心研究所。

此外，在韩国、印度、瑞典、奥地利等国也都数目不同地收藏着一部分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

我国自己收藏的敦煌文书大多数是1910年由敦煌运往北京图书馆的，总数约在1万2千件以上。此外，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北京大学以及台北等地，也分别保存着数十卷到数百卷不等。收藏在我国的吐鲁番文书，除1928——1931年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所得的一部分外，主要为1959年到1975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掘所得，总数约2千余件，目

前主要保存在新疆博物馆。

二、目录的刊布与敦煌吐鲁番目录学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献发现后，即流散于世界各国，因此，早期敦煌吐鲁番学者都非常重视目录的编制，借以全面了解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及其所包含的方面。

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罗振玉于 1909 年 8 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①，可见，学者们对目录工作的重视。紧接着，罗福苌的《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②、《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③，李翊灼的《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④ 相继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1910 年敦煌劫余遗书运到北京后，交由京师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保存。1911～1912 年间，北京图书馆就将这些遗书编出了一个草目。1922 年，曾任北京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垣先生在俞泽箴先生协助下，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并详细记录了编目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料。1924 年陈垣先生仿宋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编成了《敦煌劫余录》⑤一书。该书共著录了 8679 个卷子的有关情况，详记每卷的起讫、纸数、行数和品次，在附记内还移录有题记和卷子的残缺情况。王重民先生曾评价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⑥。

---

① 《东方杂志》6 卷 10 期（1909 年）。
② 《国学季刊》1 卷 1 期（1923 年）。
③ 《国学季刊》1 卷 4 期（1923 年）、3 卷 4 期（1932 年）。
④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
⑤ 1931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本。
⑥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

1931年后(特别是解放后),北京图书馆又陆续收集了一些敦煌遗书,编成了《敦煌劫余录续编》一书。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全部收录进去,仍有很多敦煌汉文遗书没有反映出来,今后还需要再出三编。

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①,由《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和《敦煌遗书散录》组成。其中《敦煌遗书散录》由19个专题或专门目录组成。该书是我国开展敦煌文献研究以来,我国学者编著的较完全、较准确、较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它收录了北京、巴黎、伦敦及其他一些公私收藏的敦煌卷子目录,详记了每个卷子的标题、编号,在很多标题下,还记录了卷子的内容提要,有些还描述了卷子本身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前此六十年我国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中成绩的反映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王重民先生为此书写的后记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重要文章。当然,该书仍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对少数文献的性质以及标题的确定不大准确,甚至出现错误等等。

黄永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②一文,补充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部分遗漏,并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黄氏还为配合《敦煌宝藏》的刊布,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基础上,编写了《敦煌遗书最新目录》③,内容包括《英伦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北平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巴黎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目录》、《敦煌遗书散录》16种。增补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后公布的目录,更便于读者利用,尤其便于阅读《敦煌宝藏》时利用。

---

① 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② 《汉学研究》1986年4卷2期。
③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文革后，许多单位都公布了各自所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如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①、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②、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③、荣恩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④、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⑤、刘国展、李桂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⑥、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⑧等，都公布了各单位所藏的敦煌遗书目录，并作了简明的提要介绍。由于这些目录的编制者都是本单位的研究或资料人员，有条件接触、翻阅、查检敦煌写卷，因此编制的目录比较完整、详细，提要说明也比较准确，基本上反映了各单位的收藏情况，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论著目录方面，主要有刘进宝《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⑨、卢善焕、师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⑩和柳洪亮等编《吐鲁番学著作论文资料目录》⑪。另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都有每年的论著目录。这些目录虽然各有优劣，但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信息，避免

---

① 《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②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③ 《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④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⑤ 《敦煌研究》1986 年 2——3 期。
⑥ 《敦煌研究》1987 年 2 期。
⑦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⑧ 《敦煌研究》1993 年 1 期。
⑨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⑩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1985 年。
⑪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在敦煌学目录研究方面，首推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① 一书。该书由国内篇和国外篇两部分构成，其中国内篇对我国各个时期的敦煌目录工作进行了评述，重点讨论了《敦煌劫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编制。国外篇对英、法、俄、日各国的敦煌目录工作进行了探讨，并对国外所出藏文文书和艺术品目录作了简介。是目前唯一的一部敦煌学目录著作，是敦煌目录编制及其研究的一大成果。

另外，荣新江《〈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②，指出了敦煌学目录编制的缺点，即体例不一，收录不全，缺少考证，辨伪不精。因此建议立即着手编纂《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师勤《〈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宝藏〉校补》③，对两书进行了互校，是敦煌目录的基础性工作，对研究者很有参考价值。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④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和总结个人欧洲访书见闻，认为敦煌遗书的总数为47000余件。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⑤是了解北京图书馆藏卷的最新、最重要文章，向学界公布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重要情况，很值得一读。

三、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于敦煌吐鲁番学

---

①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2期。
③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1期。
④ 《敦煌学辑刊》1991年1期。
⑤ 《敦煌学辑刊》1991年2期。

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敦煌吐鲁番学者就非常重视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1909年，法人伯希和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此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一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介绍、刊布与研究的开始。随之，我国学者整理刊布的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与学术论文便相继问世，主要有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伯斧的《沙州文录》；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序跋。

由于敦煌遗书的大部分已流散国外，因此早期敦煌学者收集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去国外转录或拍摄有关遗书。三、四十年代，向达、王重民、刘复、姜亮夫、于道泉、王庆菽等学者相继去巴黎或伦敦转录和拍摄了许多敦煌文献，得到了大批敦煌资料，并逐渐将其整理和刊布，为我国早期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如《敦煌掇琐》一书，就收录了刘复在巴黎图书馆根据原卷抄录的敦煌文献104种，其“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

五十年代后，由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搜求资料的范围日益广泛，对敦煌资料的整理、刊布逐渐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①收词162首，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文献集，它将同类作品辑录在一起，加以校注，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任二北沿用这一体例，又编校了《敦煌曲校录》，收词545首，分为普通杂曲、定格联章和大曲三类，于1955年由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4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参加，在广泛摄、抄国内外收藏的变文资料的基础上，过录了187

① 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1956年修订再版。

个写本，作了认真的整理，选编 78 种，编成了《敦煌变文集》一书，于 1957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变文集》是当时我国学者对变文写卷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整理，也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变文总集，对推动变文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敦煌资料》① 第一辑，是一部综合性的敦煌文献集。它辑录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许多原卷录文，并采用了通行的价格低廉的排印本，因此它流通的范围比较广，为大部分敦煌文献研究者所喜爱，更成了敦煌经济文书和唐代经济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对推动我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编辑时间短促，在录文的准确性以及文献的时间、性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

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更重视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其特征是一方面继续向纵深的专门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总括性的大部头资料集不断问世，交相辉映，愈推愈密。如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②，校辑整理出王梵志诗 366 首，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是敦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可喜收获。在此基础上，项楚又搜集了一些新发现和公布的资料，并作了精细的校注，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③一书，使王梵志诗的整理、研究更趋完善；任半塘（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又不断搜集整理，编著了 100 多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于 198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辞 1300 余首，是目前所见收辞最多、品类最全、范围最广的歌辞总编，体现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歌辞的研究成果。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④，收录了《敦煌变文集》出版后新发现的变文 15

---

① 中华书局 1961 年出版。
② 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篇，既有录文，又有原件照片，后面还附有俗字表，是近年敦煌变文整理刊布的新成果；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①，是国内外关于敦煌莫高窟研究的最全面、最实用的权威性总录。它收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都比较合理，并编制有索引以备查检，使用方便。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②，收录了今人所见的所有汉文题记。它除了注明洞窟的时代外，还在不同时代的题记之前，详细说明每条题记的文体类别，所在位置、题写形式、地色、尺寸及资料来源等。书后列有别体字简表，并附有莫高窟供养人姓名索引。该书可视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姊妹篇。它们的出版，使莫高窟资料的整理逐渐趋于完备，是几十年来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刊布的重要成果。唐耕耦、陆宏基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③，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整理、刊布的集大成著作。编者从英、法、俄、日等国及我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将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辑出，按类编排，分成五辑，用原件的照片与录文对照，兼附前人研究原件的论著出处，图文并茂，极便于敦煌学者之利用。由有关专家学者编辑的《敦煌大藏经》④，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佛经写本为主，并补充英、法等国已公布的资料。全书按《开元释教录》的顺序，校勘记说明收录写本与《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的互见情况。全书共 6000 余万字，63 册。它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的珍贵文献，而且是唐代书法精品集。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早已流散在世界各地，其中北京、巴黎、伦敦、圣彼得堡为四大收藏中心。如何将其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敦煌学的故乡——中国影印出版，则是国际敦煌学界的一件大事。为

---

① 文物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②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一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出版 2——5 辑。

④ 台湾前景出版社出版。

此，中国学术界作了积极的努力，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两方四家，在伦敦议定合作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以下简称《文献》)。《文献》将收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敦煌汉文非佛教文书及敦煌绢纸绘画上的汉文题记的照片，分装 15 册(8 开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尤其是不列颠图书馆所藏 S. 6981 至 S. 13677 号文书所含数百件非佛教文书，为五十年代的缩微胶卷所未收；印度事务部所藏 40 余种汉文文书和英国博物馆所藏 40 余种汉文题记，也从未系统披露过。

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即将全部问世之际，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9 年 8 月中旬，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访问了前苏联，与前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就合作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的中国敦煌、吐鲁番与黑城文献进行了会谈。随后，前苏联有关方面与学者又到上海进行了访问商谈。1990 年夏，双方达成协议，合作影印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的全部敦煌、吐鲁番和黑城文献。目前，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的多年筹划合作，已于 1992 年底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该书包括俄藏文献的收集，收获历史和现状，精彩文献书影等约 50 幅彩色图版，以及%001——%042 号共约 800 余幅黑白图版。所余%043——366 号全部弗鲁格编号文献分作第二至五册于 1993 年出版。其他各册也正在出版之中。全部《俄藏敦煌文献》将编为 25 册，为 8 开大本，以进口胶版纸精印，计划于 1997 年出齐。

关于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已与法国方面达成协议，正在积极筹备出版之中。

为了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尽快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制定了规模宏大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出版规划。该《集成》既包括俄、法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也包括国内各单位及私人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已于1993年出版。此外，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也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原则和预期目标是：

第一，相对完备。尽力搜求、辑集，将敦煌、吐鲁番地区出现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艺术资料，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出来，使其成为一部总汇式的集成文献。

第二，力求存真。敦煌吐鲁番文献具有文献和文物两重价值，这就要求对文献的印制必须逼真，其大小、长短、形状、色彩、字迹、残损自不必说，即使是纸质、卷轴、包封等也不宜忽略。

第三，定名准确。

第四，编排合理。由于本集成是一套大型的资料性用书，中心目的是给学术界提供一份全面可信的原始资料，因而，文字部分如前言、凡例、目录、题解、索引等等，均需说明性质，意在方便使用；图版部分则按序排列，重在实用，兼及欣赏。做到图文结合，以发挥资料用书的最佳效果。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已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各册，在文献的定名、分类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如《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一书，其编纂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和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由于没有吸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专门研究者参加，其编纂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定名分类错误，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完全采用，有些已被近年的研究成果所否定的旧说也在文献中偶有出现。为了弥补以上失误，上海古籍出版社采纳学术界的意见，已吸收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专门研究者，参

加《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样，必将使《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更加完善，质量更加提高。

关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刊布，也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历程。陈国灿《中国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① 一文，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早于敦煌文书，其早期发现也是零散的。1899 年，王树楠任新疆布政使以来，就留意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古写本，他于 1911 年编纂出版的《新疆图志·古迹志》就介绍了一些吐鲁番文书。

1914 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将吐鲁番的大批文物运至日本，当时寓居日本的罗振玉参观后，对其石刻及时作了录文，编成了《西陲石刻后录》，并对部分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

1924 年，罗振玉之侄罗福葆编《沙州文录补》时，在"附录"中收录了几件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的吐鲁番文书，如《李慈艺授勋告身》、《孔目司公牍》、《举钱契》等。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对唐授勋程式、西域阵地及背景作了考察研究。

1928 年，在中国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建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展了中国学者对吐鲁番等地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于 1928、1930 年两次对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发掘。1930 年，黄文弼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2 卷 3 号上发表了《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1954 年，他又整理出版了《吐鲁番考古记》，叙述了他在吐鲁番的考察经过，刊布了部分吐鲁番文书。其后不久，又发表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

①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4 年 1 期。

1943年，金祖同发表了《唐西域文书佚存》①，介绍了流散到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的吐鲁番文书，接着金氏过录了诸件文书的录文编辑成《流沙遗珍》，并附有图版，中国学者由此始知一些吐鲁番文书的原貌。斯坦因第三次在华考察带走的大批文书，交给法国学者马伯乐整理，1949年，伦敦的《大亚细亚》杂志主编沈德勒，在其刊物上长篇介绍了马伯乐整理、等待付印的书稿内容，傅乐焕将其译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盗去我国文物简述》②加以发表，其中系统介绍了斯坦因带到伦敦的吐鲁番文书。马伯乐的这部专著于1953年在伦敦出版。

从1959年开始，为配合吐鲁番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国家的资助下，开始了对吐鲁番古墓葬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直到1975年，前后发掘13次，在所掘456座墓葬中，有203座出有文书，此外还有众多的墓表和其他文物。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前后费时十年，对文书进行整理、拼合、定题，标注，终于拼接成了1813件读可成文的文书，文物出版社于1981——1991年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0册。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直接、真实的文书原貌，在录文本整理结束后，又整理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图文本上图下文，将公布全部文书图版(包括未录文的细片)，计划出四卷，第一卷含录文本1——3册；第二卷含录文本4——5册；第三卷含录文本6——7册；第四卷含录文本8——10册。图文本第一、二卷已出版，第三、四卷正在出版之中。

除《吐鲁番出土文书》已公布的材料外，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

---

① 《说文月刊》1943年11月号。

②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5期。

分》[1]一书，整理刊布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400余件，其中包括部分吐鲁番文书。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2]，整理刊布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吐鲁番汉文文书。由于著者长期参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本录文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料价值。

1976——1986年，吐鲁番文管所配合地方建设又相继清理了10座古墓葬，获汉文文书数百片，目前正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进行整理。

另外，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于1979年出版。该书录文部分刊布文书316件，其中敦煌和吐鲁番文书大约各占一半，而且属大谷文书的部分均经池田温拼接整理。1984年，小田义久主编的《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出版，1990年又出版了第二卷，相继公布了大谷探险队携去的吐鲁番汉文文书二千余号。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3]一书，整理公布了许多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题记，极便于研究者使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方研究所，自五十年代以来，也陆续出版了《吐鲁番文集》十余集。其他国家也陆续整理公布了一些吐鲁番文书。各国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尤其是中、日学者对吐鲁番文书的系统整理及其成果的发表，给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资料基础。

四、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历史研究，尤其是魏晋南

---

①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②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③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

北朝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此，自敦煌吐鲁番文书发现以来，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大力研究。这除了其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唐五代史研究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乃至宋初，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部分残缺不全，但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府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初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① 指出，敦煌吐鲁番文献是研究唐史最重要的资料，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六典》、《通典》、《唐会要》、两《唐书》、《通鉴》等史籍以及有关唐史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已经使我们在唐史研究上取得了成绩，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首先，敦煌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唐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次，就一些重大研究课题而论，敦煌吐鲁番文书使这些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以均田制和勾检制研究为例作了具体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唐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制度，在西北边远地区也得到贯彻执行，因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田制文书以及户籍、手实、差科簿等等，不只是解决唐西边和西北边远地区有关问题的重要史料，也可以使用它们来解决关中地区、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相同或相类的问题。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② 一文，从文书

---

① 《文史知识》1985 年 6 期。

②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36 年 1 期。

给十六国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文书具体展现了高昌王国的历史、文书对唐代前期历史提出的新认识和文书填补了唐末五代河西地区历史的空白几个方面，探讨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关系，并由此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直接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的内容。如果将文书与史籍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钩沉发微，层层深入，由微观到宏观作出分析认识，必将会开创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也会给敦煌吐鲁番学带来的新的发展。刘进宝《敦煌遗书与历史研究》①认为，敦煌遗书中的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王素《吐鲁番文书与两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②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吐鲁番文书对研究魏晋隋唐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即高昌郡文书解决了东晋十六国历史研究的疑难；高昌国文书扩大了南北朝及隋历史研究的领域；西州文书丰富了唐朝历史研究的内容。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③，通过对吐鲁番文书中有关都护府、户籍、均田赋役、军事、契约、贸易等类文书的介绍，探讨了吐鲁番文书在唐史研究上的重大价值。并指出："如果将这些文书汇辑起来，作出综合性的研究；或者与其他地方，如敦煌等地出土文书作出比较研究，将会给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展示出许多新面貌，使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境地。"

（二）经济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五代社会经济是治唐史的重点。

---

① 《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
② 《文史知识》1992 年 8 期。
③ 《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年出版。

由于均田制是中国古代地土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唐史学界最关注的课题之一。尤其是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一批有关田制的实证材料，使均田制的研究更趋活跃。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①，该书侧重于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实证材料，同时也尽量发掘传世的文献资料，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对均田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实施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是近年来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的代表性成果，很值得史学界重视。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② 和武建国《均田制研究》③ 两部专著，也运用敦煌文书，对均田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自的独到见解。

除以上三部专著外，还发表了大批的论文，其中邓文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的关系，是一篇难得之佳作。杨际平《吐鲁番文书与均田制研究》⑤详细探讨了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均田制的记载，如按田令规定计算应、已受田的户籍、手实、与欠田、退田、给田有关的各种文书，带有户别田亩数的其他籍帐等，并指出，吐鲁番文书无疑大大丰富了均田制研究的内容，并为均田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宋家钰《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⑥，引用史籍记载结合敦煌资料，对唐代户籍登记土地的原因和作用，户籍所载土地的来源、公田和私田、永业田和口分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

---

①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②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③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④ 《中国文化》第二辑。
⑤ 《文史知识》1992 年 8 期。
⑥ 《中国史研究》1983 年 3 期。

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①指出，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制和百亩之田——应受田、已受田制都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两类私田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表现为，在每一户原有土地的基础上，封建国家收取退田和补给欠田。陈国灿在《高昌国的占田制度》②一文中，指出西州官府将高昌国田制的现状套进唐田令的框架，实际上，唐西州均田制沿袭了高昌延寿年间丁口占田六亩的事实。杨际平《列宁格勒所藏天宝年间敦煌田簿研究》③通过对俄藏有关田籍的探讨，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授并未正常进行。韩国磐《唐籍帐残卷证明唐代造籍均田之勤》④，论证了唐代前期施行均田制时编造籍帐之勤。指出唐代户籍、土地和租庸调制互为因果，唐前期编造籍帐之勤，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实行均田制的努力。王永兴《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户官府勘田文书考释》⑤ 和陈国灿《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⑥、《吐鲁番旧出武周检勘田籍簿考释》⑦二文，详细探讨了均田制下括田制度及括田的实行情况。卢向前《唐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籍勋职官受田分析》⑧ 一文，利用敦煌出土之籍帐手实，检索出具有职、散、勋官资格的 29 人户，对其受田加以分析，提出了唐代均田制下，勋官可得永业田而六品以下职、散官不得永业田的论点。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些独特的记载，与均田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敦煌户籍残卷中存在许多有关“自田”的记载，尤其是在各户分段登记土地的四至中，“东自田”、“西自田”、“北自田”、

---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②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期。

③ 《敦煌学辑刊》1989 年 1 期。

④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⑤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⑥ 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⑧ 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南自田”的记载更多。在这里，“自田”的含义是什么？日本学者较早的看法是：“自田”系指户主的另外一段受田，因二段受田相邻，故互为自田。自从五十年代西川正夫发表《关于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所见“自田”》①一文，提出“自田”是均田制范围以外本户户主的私有土地这一论点以后，争论就展开了。

韩国磐《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文件中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② 一文认为，这些“自田”的意义，可能即指自己另一段的已受田，因彼此挨邻，在登记国家受地时彼此得到反映。对此，侯绍庄《“自田”考释》③一文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为，唐代敦煌户籍残卷中的“自田”，并不指各段受田彼此间的关系，而是指的均田外的归各户所有的私田。这些私地只是由于同政府受地相邻，在乡里登记受地时得到反映，其他因与受地不相挨邻，而没有反映出来的，应该更多。所以，均田制的范围，并不包括这些属于个人所有的私地，仅仅是国家直接控制的那部分官田。这种归个人所有的社会私地，虽无法得知其具体数量，但比起国家掌握的官地肯定要多得多。杨际平《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④一文，通过对敦煌户籍资料所载各户田亩四至，各户相互间田亩相邻情况的考察，也得出了与侯绍庄相似的结论，认为敦煌户籍田亩四至中的所谓“自田”，多数表现为确有私田的存在。并认为均田制下存在独立于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唐代法律上也承认私田的存在。胡如雷《也说“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⑤一文，通过大量的敦煌资料和有关史籍，并以列表统计的方式，详细研究了敦煌户籍残卷上“自田”情况后指出，“自田”全是均田制范围以

---

① 《史学杂志》第 64 编第 10 号。

② 《历史研究》1962 年 4 期。

③ 《社会科学》(甘肃)1981 年 2 期。

④ 《厦门大学学报》1982 年 4 期。

⑤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 2 期

外的私田。

另如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和部田，黄永年在《唐代籍帐中的“常田”、“部田”诸词试释》① 中作了详细研究，认为常田是质量较好的耕地，即文献中所说的良田、美田，但在呈报官府的籍帐上，都不愿写“良田”、“美田”，而写寻常之田的“常田”。久之，常田就成为土地文书、民间契约使用的习惯语。部田则是质量较差的耕地。至于“薄田”写成“部田”，是因为“薄”、“部”通读互用的缘故。文书上用“常田、“部田”标志土地的优劣，是为了计算赀财，以定户等第，然后按户等高下向户主征税。韩国磐《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也对常田、部田进行了探讨，结论与黄文相似。赵吕甫《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试释》③，从另一角度研究了常田和部田。认为“部田”之“部”即“部内”之“部”，其含义为辖区。吐鲁番文书上的“部田”之“部”应该是指乡正所管辖的境域，“部田”则是指分布在“乡”所统属的各“里”，由“乡”直接掌管的某些农田，这些农田却又不是由里正直接处理的那一部分均田土地。当其乡正调剂这类耕地给各“里”的缺田户时，便在籍书上有关田段亩数字下注以“部田”二字。“常田”则是各“里”里正所掌管的当“里”的正田。部田和常田并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是两者所隶属的地方行政级别不同，部田为乡所有，常田为里所有，且两者均属于均田土地。杨际平《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 1 期)和《再谈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8 年 2 期)认为，所谓“部田”，它最初可能就是屯田。与之对称的“常田”即是民田。但因屯田时兴时废，“部田”、“常田”的归属关系也会经常

① 《文史》19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 2 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4 年 4 期。

发生变化。因而，在唐代，“部田”与“常田”，就只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名称，并不一定反映现实。从唐代西州户籍资料与退田、给田、屯田诸文书来看，大部分的“部田”、“常田”已无性质的差别。

在唐代财政方面，卢开万《唐代户税若干具体问题探讨》①，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前期户税的渊源、特色提出了新的见解。沙知《跋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②，通过对开元十六年金满县牒的分析，考证了唐前期的户税。杨际平《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③研究了租佃制下地税的交纳问题及青苗簿。认为唐代的地税实际上仍由佃人交纳，故对佃户甚为不利；而“率户出粟”，则对大土地所有者与佃户都比较有利，对少地农民则比较不利。卢向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④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和籴的特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王永兴《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⑤一文，通过对 P. 3348 背文书的细致考察，强调了和籴与交籴的区分。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的商品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⑥一文，对四川图书馆藏此页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时代、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说明，认为此纸应属盛唐时期，是市官在市场公布的均市价目表抄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法律的性质。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⑦一文，联系史籍、出土文书、石刻铭文等记载，对上述张勋燎介绍的奴婢马匹价目文书作了进一步考察，

---

①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期。
②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 1 期。
④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⑤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⑥ 《四川大学学报》1978 年 3 期。
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认为这件文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市”、“行”组织，以及奴婢、牲畜买卖的制度。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①]，通过对唐代估法问题的研究，指出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前期价值尺度的变化。李鸿宾《唐代西州市场商品初考——兼论西州市场的三种职能》[②]认为，西州市场既是内地商品西出的集散地，也承担着国外商品经此东传的重任，在唐代中西贸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另外它还为当地各族人民相互交流和相互贸易提供了一重要的场所。程喜霖《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考释》[③]利用过所案卷，考察了兴生胡商队在西州的商业贸易情况。

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④]、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⑤]、卢向前《论麴氏高昌臧钱》[⑥]和《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⑦]、宋杰《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⑧]、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麴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⑨]等文，研究了吐鲁番地区使用货币的有关问题，是近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可喜成绩。

在财政制度研究方面，杨际平《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⑩]一文，以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汉文卷子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会计史上由“入减出等余”的三柱结算法向“旧管、新收、支出、结余”四柱结算法发展演变

---

①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② 《敦煌学辑刊》1988 年 1——2 期。
③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 期。
④ 《中国史研究》1990 年 4 期。
⑤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⑥ ⑦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⑧ 《北京师院学报》1990 年 2 期。
⑨ 《西北史地》1992 年 3 期。
⑩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的情况，认为《吐蕃已年(公元789年)七月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是我国现存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韩国磐《也谈四柱结帐法》[①]主要研究了五代时期有关四柱结帐法的敦煌文书，与前述杨际平文互相补充。唐耕耦《乙巳年(公元945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残卷试释》[②] 指出，所谓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类似现在的收支决算报告，综合而又具体地记载了一年或二、三年的收入和支出以及现在数，是为了向有关部门报告而编制的收支决算书。唐耕耦《北图新一四四六号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③]拼合、校注，公布了北京图书馆新编1446号残卷，并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会计史上四柱结算法的有关情况。

(三)政治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五代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尤其是史籍文献中缺少记载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④]，根据史籍记载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手实、差科簿、定户等文书和核查户口文牒以及某些白话诗记载等资料，说明里正负有收手实，造籍书，调查和申报本里户口变动和上司规定的离本里外出人口的情况等任务；里正不仅具体参与均田的还授工作，而且也负有监督管理本里农业生产的责任；此外还担负着征敛租庸调、户税、地税等赋税和催驱徭役的职责。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⑤] 一文认为，唐代地方基层组织的"乡"，其职能是：主管当乡籍帐的编制和申报；处理均田土地收授等事宜；

---

①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③ 《九州学刊》5卷4期，1993年5月。
④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
⑤ 《中国史研究》1989年2期。

督促征敛赋税、差科、义仓粟；协助司法，调解民事纠纷；参加重大典礼，荐留官吏，协办乡学。

关于唐代的勾征制度，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研究——兼论唐代的勾征制》① 一文认为，唐代的勾征制度，是全国范围的财政制度，有一整套组织，一系列有关的格令和一批执行勾征的官吏。勾征虽有加重剥削农民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这一制度有稽查官吏的作用。当勾征制正常进行时，则能约束各级官吏，防其贪贿、滥征、肆意支用，从而保障封建国家经济活动较为顺利地进行。王永兴《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②，对唐代的勾检制和勾检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然后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唐勾检制研究》③一书，更全面地研究了唐代的勾检制度。作者认为，唐代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普遍设置了勾检官。勾检官主要分两个系统，一个是一般勾检和官文书的勾检系统，另一个是财务行政的勾检系统。尚书都省的左右丞是一般勾检官系统的领导机构，尚书省刑部的比部是财务行政勾检系统的领导机构。勾检官权力较大，但大多数的勾检官品秩不高，甚至偏低或很低，这样，就可以防止每一官府中的长官独断专行。其勾检内容是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办事、处理问题、办理文案、收发文书中的“稽”和“失”。由于勾检“稽”，督促和保证了官府办事较快、效率较高；由于勾检“失”，维护了封建国家的各种制度，特别是财政制度，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唐代勾检制和勾检官制的正常实行，是唐代前期繁荣富强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于唐代的籍帐、手实制度，宋家钰《唐代手实初探》④ 一文，

---

①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②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④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史籍文献，详细探讨了唐代手实的内容和特征，即手实均以户主名义呈报，其主要内容是家口、年纪和田地。户主在手实上要保证所报内容属实，出土手实文书的末尾大都有"若后虚妄，求受重罪"，"如后有人纠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一类的保证词。民户的手实，均是官府按户籍法规定的时期责令民户申报，由里正收集。申报时间，一般与造籍的年月一致，因为手实是为造户籍而报的。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①指出，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手实由各户户主申报，而里正等胥吏在制定过程中，也起很大作用，但手实并非由户主任意申报，而首先取决于"团貌"，"团貌"后制定"簿"，"以付手实"。

朱雷《唐"籍坊"考》②一文，在日本学者池田温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的"籍坊"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籍坊"是保存户籍的机构，同时还具有记载、调查、核对户籍等事项的职能。在《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③一文中，朱雷先生指出，"点籍"制度是唐代传统的、制度化的管理户籍办法之外的一种临时性的检籍措施，它可能始于武周圣历年间。并针对"点籍样"一名，详细论证了史籍中的"输籍定样"、"明堂图样"、"钱样"等例中的"样"，即式样、标准，"点"为"简点"及"检点"，乃检查，核对之意。点籍样为点籍之标准。并进而研究了点籍样与户籍之密切关系，认为"点籍样"应是对户籍进行简点之后所作出的定簿。陈国灿《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④和《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⑤两文，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武周期的勘田检籍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目的就在于检查各类籍外占田

---

①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5期。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5期。

③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④ ⑤《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和对客户田土的荫庇，使土地所出，利归官府，而不致流入私家。

社(社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但传世文献中有关社邑的记载很少，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数百件唐五代时期的社邑文书，为研究唐五代的社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早在1938年，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就发表了《关于唐代的社邑》① 一文，依据敦煌文书并结合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指出中晚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社邑：第一种以佛教信仰为中心，由在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仿教社团；第二种是从第一种派生出来的社邑，它以共同出钱崇佛造像发展为平时成员间的互助活动，从单纯组织每年二次的祭社发展为平时成员间互相教育，这就使它成为一种与佛教完全无关的由百姓自愿结成的民间互助团体；第三种社邑兼具第一、二种的特点，既从事祭社、互助活动，又从事佛教活动，但它仍是由佛教信徒组成的组织。

1939年，那波利贞又发表了《关于按照佛教信仰组织起来的中晚唐五代时期的社邑》② 一文，重点研究了社邑与寺院的关系，认为社邑通常是从属于某一寺院，接受寺院的指导和经济援助，同时它们又是寺院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劳动力的来源之一。

1956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③ 一书中，也对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结社作了考察，认为中国式的民间团体——从事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佛教的“社”。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研究》④ 认为，社邑的互助活动以丧葬互助最为重要，并对丧葬活动的具体过程作了考察。198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

---

① 《史林》第23卷2、3、4，1938年4——10月。

② 《史林》24卷3、4，1939年7——10月。

③ 中译本由耿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东方学报》京都35，1964年。

术会议”上，宁可、郝春文提交了《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① 一文，该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作了进一步考察。认为丧葬互助活动是从事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的社邑的最重要活动。其办法是：社人家内遇有凶丧，立即向社司报告，由社司发转帖通知全体社人，社人携纳赠物品按规定时间、地点集合缴纳，纳物不足、不按期或不纳，都要受到处罚。李德龙《敦煌写本〈社司纳赠历〉浅探》② 一文，对社人在丧葬互助中纳赠物品与内容进行了考察，指出这项活动加重了社人的负担。

郭锋《敦煌的“社”及其活动》③ 一文，认为敦煌的社是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社会组织，与中原结社有直接渊源关系。社邑文书反映的结社活动，基本是九至十一世纪归义军时期的情况。参加结社活动的主要是敦煌社会的中下层，较为常见的是同一地域的各阶层同处一社，但也存在按阶层结社的现象。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④ 一文，通过对春秋座局社司转帖的整理表明，这类转帖所记载的时间大部分不在寺院开俗讲的正、五、九月，地点也不在寺院。因此，春秋座局席活动不仅与俗讲无关，而且是与佛教活动无关的包括春秋二社、座社等社人欢聚、饮宴的活动。在《敦煌私社的“义聚”》⑤ 一文中，郝春文对“义聚”的内容、来源，用途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义聚”的内容包括面、麦、粟、黄麻等。这些资财是社人通过各种方式缴纳的，它的用途是社人遇到凶丧和急难时使用，包括帮助社人营葬，在民间节日前支付给社人节料，在春季乏粮时贷给社人粮、油、种子，以及从事佛教活动的支出等。从这些用途看，私社的“义聚”，对社人特别是贫穷社人具有积极意义，

---

①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 6 期。

② 《大庆师专学报》1990 年 2 期。

③ 《敦煌学辑刊》总 4 期，1983 年。

④ 《北京师院学报》1986 年 4 期。

⑤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 4 期。

减少了使他们破产的因素。郝春文《敦煌的渠人与渠社》①一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渠人是归义军时期承担“渠河口作”力役的百姓，其职责是防水、平水、修理渠堰、桥梁等。作为承担“渠河口作”百姓组织者的渠社，它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与监督，与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②，利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有关女人社的材料，对唐五代时期的女人社与北朝由女人结成的佛社作了比较。指出唐五代时期的女人社已很少有宗教色彩，具有明显的结义互助性质。与此相关，其主要活动也已不是佛教活动，而是丧葬互助。胡同庆《从敦煌结社探讨人的群体性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③ 一文，提出要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探究敦煌结社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认为敦煌社邑的特点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和和集体行动来维护成员的各种利益。这些社邑结社的目的与具体活动大致相同，主要为赈济互助，其次为办佛事和推行礼教，总之是出于结社者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这种结社活动，充分体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与社邑》④指出，从唐中期开始，由于社会逐渐动荡不安，敦煌的家庭结构便残破了。由于家庭结构的变迁，便出现了社邑。由社邑来承担家庭的功能，即经济互助作用、感情功能和宗教功能。

关于社邑与寺院的关系，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⑤ 和《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⑥ 两文作了系统研究，指出佛社与寺院的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既受地方僧

---

① 《北京师院学报》1990 年 1 期。
② 《北京师院学报》1990 年 5 期。
③ 《敦煌研究》1990 年 4 期。
④ 《敦煌研究》1991 年 3 期。
⑤ 《敦煌学辑刊》1990 年 1 期。
⑥ 《中国史研究》1991 年 2 期。

官控制，又与某一寺院有密切联系；二是与某一寺院或僧人有密切联系；三是与寺院关系不很稳定的仅为从事兴建、修理佛教建筑而临时组成的佛社。作为佛教僧团外围组织的佛社，不仅担负着供应寺院斋会等佛教活动的物资与劳役，而且还帮助寺院造窟、建寺等等，是佛教僧团经济与劳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佛社不仅是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且还为其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西北地方史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或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或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1. 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的统治

（1）唐初安西四镇的置废。由于传世文献记载不清，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以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四镇的始置年代是贞观二十三年（649）。1966——69年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汜德达告身”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一些学者据此又提出了新的见解。1975年，吴震在《从吐鲁番从土〈汜德达告身〉谈碎叶城》① 一文中首先指出，汜德达告身中所记载的授勋依据，补充了史书中阙载的垂拱二年（686）唐军破都历岑和拔四镇之事。并指出，调露元年（679），唐政府曾再次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王永兴、李志生在《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校释》② 中又进一步指出，唐政府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首置四镇的时间是在显庆三年（658）。到咸亨元年（670），由于吐蕃势力的发展，第一次废四镇，上元至调露年间再置，垂拱二年再废，长寿元年三置。黄惠贤通过对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县征镇名籍的研究，得出

---

① 《文物》1975年8期。

②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了与王永兴、李志生基本相同的结论①。此外，唐长孺在《唐西州差兵文书跋》②中又提到，被收入《流沙遗珍》一书中的一分唐代差兵文书，也是垂拱二年左右的文书。并指出，这一年为了安抚西突厥，曾有一次金牙道的行军，并曾设置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当时西州可能是受其节制的。这篇文章的观点也从侧面为王永兴等人的看法提供了证据。

园照撰、空海携去日本的《悟空入竺记》提供的有关安西四镇放弃前夕的史料，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郭锋《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③ 认为，唐自咸亨放弃四镇，仅在调露元年以碎叶为安西府临时治所，取代焉耆列为四镇之一，名义上仍然保持对全部西域地区的统辖，并没从实际上收复四镇。直到长寿元年，乘吐蕃内乱发起攻击，才克复四镇，迁安西府治于龟兹，从实际上重新确立了对四镇在内的全部西域地区的统治。

1991 年，王小甫在《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④ 一文中，对安西四镇的弃置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随后，又在其著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⑤一书的有关章节中，更加全面地研究了安西四镇的弃置问题。作者指出，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有三次：第一次，咸亨元年(670 年)罢弃，上元二年(675 年)复置。近年刊布的吐鲁番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等文书，不仅证明咸亨元年四月以后至咸亨二年唐朝的安西都护府是在西州，而且为这次罢弃四镇提供了若干细节。而《唐会要》卷 73 所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就是见于史文最早的四镇名称。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初置四镇

---

① ②《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③ 《敦煌学辑刊》1985 年 1 期。

④ 《历史研究》1991 年 4 期。

⑤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有焉耆而无碎叶；第二次，仪凤三年（678 年）吐蕃等攻陷四镇，调露元年（679 年）复置。仪凤二、三年间，唐朝一面以西州为基地派兵到龟兹附近与吐蕃争战，一面派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出兵青海策应。仪凤三年九月，李敬玄、刘审礼以 18 万唐兵败于论钦陵，吐蕃“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调露元年唐王朝收复了四镇，因此同年七月裴行俭波斯道行军到西州时，才能召来四镇诸胡酋长。《册府元龟》卷 967 年外臣部关于“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的记载，很明显，碎叶至此才取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第三次，垂拱二年（686 年）拔四镇，长寿元年（892 年）收复。这次唐朝政府下令拔四镇本身完全是唐军有计划的主动撤退，既非安抚西突厥，更非从吐蕃之请。

关于焉耆与碎叶的交替问题，王小甫认为，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实际上与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及西域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唐朝是从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开始经营西域的，所以最初设置四镇是散布镇抚而非集中防御。后来，由于吐蕃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连兵，隔断二蕃成为唐朝的主要战略目标，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碎叶、疏勒、于阗三镇一字排开，扼守着整个王俟斤路。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总其后，依靠焉耆以东的西州地区为基地，同吐蕃和西突厥余部的联盟展开激烈的争战。因为焉耆无论是否作为四镇之一，其战略地位都很重要，所以唐朝一直十分重视焉耆。

(2)吐蕃占领河西前夕，河西地区的形势及唐朝派往这里的长官姓名。唐长孺在《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① 一文中，根据《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的碑文、阿斯塔那 509 号唐墓出土的《建午月西州使衙》以及伯 2942 号文书，对天宝十四载后史籍中缺载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的姓名进行了探

① 《中国史研究》1980 年 3 期。

讨，指出乾元以后至大历元年杨休明任节度使以前，担任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的先后有杨预、杨志烈和周逸三人，并根据伯 2942 号卷子推断，杨志烈是被杀的。安家瑶在《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使判集研究》① 中则指出，伯 2942 号文书的时间应是公元 765——766 年。根据此文书可知，永泰元年(765)正月，在伊州、北庭之间的长泉，被伊西北庭节度使突厥杀死的，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此后河西巡抚使便到达了河西。凉州陷蕃后他选择了比较安定的沙州做为判案地，解决了当时河西地区急需解决的军队供给、官员调整、调查节度使被杀事件派人去四镇请求发兵等一系列问题。安家瑶并认为，这位河西巡抚使应是马璘。史苇湘也对伯 2942 号文书进行了研究。他在《河西节度使覆灭前夕——敦煌遗书 P2942 号残卷研究》②一文中首先指出，这件文书应是河西观察使判文的眷清录存，其时间在永泰元年至大历初。文书使人们对河西节度使后期，河西西部的军、政、民情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轮廓，并反映了凉州陷于吐蕃后河西地区的吏制，以及河西节度使与伊西北庭留后的关系。但史苇湘认为，写出这件判文的河西观察使应是周鼎而不是马璘。陈守忠在《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③一文中则认为，判文的作者既不是马璘又不是周鼎，而是河西节度使杨休明。马德《关于 P2942 写卷的几个问题》④ 一文认为，P2942 号文书应定名为《河西节度使公文集》，该文书中的“副元帅”、“尚书”和《杨公记德颂》碑中的“杨都督”为同一人，即杨休明。休明乾元年间任凉州长史，“宣慰四道”之后被提升为河西节度副使；永泰元年闰十月后又被任命为河

①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② 《敦煌研究》创刊号(总 3 期)

③ 《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④ 《敦煌学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1984 年 10 月。

西节度使、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河以西（河西、伊西庭等地）副元帅；大历元年驻节沙州后又兼任都督。而休明遇害的时间，当在大历元年（766 年）五月移镇沙州后不久，在他到管辖之内的伊西北庭巡视和征兵途中，被暗杀于西州到北庭之间的驿站长泉。

起草《河西节度使公文集》的官员，应是周鼎和宋衡。周鼎、宋衡和杨休明大概是同时接受朝廷任命的。大历元年五月河西节镇移至沙州后不久，因战事紧迫，休明便委托鼎、衡二人驻守沙州，自己去伊西北庭巡视、征兵，不料中途遇害身死。休明随从军将赶到沙州向鼎、衡二人陈述详情，鼎、衡二人随即以观察使和行军司马的名义起草牒文，追颂休明，声讨周逸，安抚军民，奏报朝廷。

2.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关于敦煌陷蕃年代，多年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其一是以《元和郡县志》为依据，认为是在建中二年（781）。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有孙楷第①、藤枝晃②、向达③、史苇湘④、陈守忠⑤等人。史苇湘还通过对 S1478《书仪》残卷的研究指出，由于沙州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当时沙州地区曾多次出现“陷落”、“降下”、“蕃和”的情况，而最初的一次政权易手只能是在建中二年。第二种意见是以罗振玉为代表。1914 年，他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中，根据大历十一年的《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推定，沙州陷蕃时间是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则在对 P4646

---

① 《敦煌写本张淮深度文跋》，载《敦煌学论文选》（上集）兰州大学 1983 年。

②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东方学报》（京都）卅一册。

③ 《〈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1957 年。

④ 《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研究》创刊号总 3 期，1983 年。

⑤ 《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号卷子《顿悟大乘政理决王锡序》的历史考证中认为，沙州陷蕃年代应是在贞元三年(787)。日本学者池田温、香港学者饶宗颐、苏莹辉等人也都同意此说。另一位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则认为应在786年。1985年陈国灿在《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① 中，通过多方考证也认为唐贞元二年(786)是沙州陷蕃年代。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1、2期合刊)一文中推论沙州陷蕃在贞元四年(788年)。马德则认为，沙州陷蕃年代应在大历十二年(777)②。

关于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状况，藤枝晃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③中曾作了较全面的的论述。此外，杨际平的《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④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杨际平认为，公元八世纪后期吐蕃占领敦煌后，吐蕃统治者于公元790年将当地农民按"将"与"部落"的形式进行编制。与此同时，吐蕃还在瓜沙等州实行了计口授田制和突税制，但此后不久，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即转化为私有。陈国灿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⑤中，对杨际平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按计口授田给突田的制度虽然在名称和具体规定上与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有很大不同，但在计口授田、据田收税、计身承役方面仍承袭了唐代的田亩租赋差役制度。同时，陈国灿还指出，吐蕃占领沙州后，寺院中的寺户数量有明显增加。寺户的生活水平低下、地位卑微。他们很可能是属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农奴。

杨铭的《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⑥ 中，对吐蕃时期敦煌部

---

① 《敦煌学辑刊》1995年1期。
② 《敦煌研究》1987年1期，《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几个问题》。
③ 《东方学报》(京都)卅一册。
④ 《社会科学》(兰州)1983年2期。
⑤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年1期。
⑥ 《西北史地》1987年2月。

落的设置及其内部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吐蕃在敦煌建置部落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791年左右。第二次在公元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部落编制应是非军事的。吐蕃统治中期,由于形势变化,又在敦煌地区先后编制了数个军事部落,把敦煌汉人及其它民族纳入其中,并以之取代了初期的部落。同时他还认为,这种部落制的内部组织与唐乡里制有相似之处,加之它的基层官吏多由汉人担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还起着唐朝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此外,涉及到吐蕃时期的部落制的文章,还有张广达的《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①和姜伯勤的《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②。姜文认为所谓行人部落是吐蕃攻陷沙州之后编组工商行会而成的部落。对此,张文持不同看法。张文在根据敦煌文书考察了吐蕃驿传制度后,指出当时在吐蕃,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同时行人部落很可能还负担供给写经生食用菜蔬的任务。此外,姜伯勤还写有《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一文③,专门对《沙州文录》中所载《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内提到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进行了解释。认为这是八世纪末吐蕃管理沙州后,由道士、女官及其有关内亲、外亲所组织的一个千户。它的建立是吐蕃著名宰相尚绮心儿在沙州所推行的政策的产物,表明了沙州道门源远流长的发展和汉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在沙州的地位。姜伯勤在《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④一文中还指出,吐蕃占领沙州之后的最初数年中,唐朝的河西支度营田使还存在着,这是因为用蕃制"千户"体制代替唐制有一个过程,在全面完成分部落之前,先保留河西支度

①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② 《中国史研究》1979年2期。

③ 《敦煌研究》1986年3期。

④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营田使一类的管理机构，对于保证军粮供给、税收及吐蕃官员的借支具有重要的价值。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 1 期)一文，从统治形式的改变，田赋制度的变化，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几个方面，探讨了吐蕃统治敦煌的一些具体问题。

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沙州地区便发生了玉关驿户汜国忠、张清的起义。对此，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中曾有论述。姜伯勤的《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①和史苇湘的《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②两文也都针对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姜文主要是对 S1438 号背面的“书仪”中有关玉关驿户起义的资料，结合唐代史籍进行了初步考察，指出这次起义一方面促成了吐蕃在政策上的转变，并容纳和保存了较多的唐制；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浓厚的反异族色彩和反奴役色彩影响了此后的张议潮起义和嗢末大起义。马德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几个问题》③ 中明确指出，汜国忠的起义发生在公元 786 年，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的统治，为此吐蕃当局向沙州委派了一个新的节儿论悉诺息接谟，他对敦煌实行了有效的控制，“是一个成绩卓著的官员，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敦煌历史上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人物。”

3. **归义军节度使的历史**

公元九世纪中叶，沙州张议潮领导河西民众起义，河西地区摆脱了吐蕃的统治，重新归属于唐，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张议潮家族及其后继者曹议金家族便成为河西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统治时间近两个世纪。但传世文献中对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情况记载甚略。敦煌遗书发现后，学者们才根据其中的材料对归

---

① 《中化文史论丛》1981 年第一辑。

② 《敦煌研究》创刊号。

③ 《敦煌研究》1987 年 1 期。

义军节度使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首先从事此项工作的是罗振玉。1913年他在敦煌写本《张延绶传》的跋中，就曾详考了张氏事迹，并于1914年重新修订。1915年他又发表了《瓜沙曹氏年表》一文，勾划出了张氏归义军政权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基本历史面貌。继罗振玉后，王重民又写了《金山国坠事零拾》，就敦煌发现的《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等卷子，对"上承张氏、下启曹家"的金山国历史做了考证①。此外，日本学者滨田耕作、那波利贞和法国的翟理斯也都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材料对归义军节度使的历史进行了研究。40年代，藤枝晃又在上述各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表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一、二、三、四)②。该文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多种材料，全面系统地综述了归义军节度使的历史，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又有许多学者就归义军历史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概况

①张议潮南收复瓜、沙、凉、甘等州的时间，罗振玉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中认为，张议潮收复沙州是在大中四年，收复凉州是在咸通二年。对此，孙楷第在《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木张淮深变文跋》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张议潮收复沙州是在大中五年而不是四年，收复凉州是在咸通四年而不是咸通二年。藤枝晃则认为，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是大中五年。其后十年，即咸通二年收复了凉州，向达在《〈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中，又认为张议潮

---

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12月；又见《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4月出版。

② 《东方学报》京都12册，3、4分册；13册，1、2分册。

收复沙州的时间应是大中二年，并指出史书中所以记为大中五年，是因为收复瓜、沙州后，张议潮派出的使节由于道路险远，直到大中四年末，甚或是五年初才到达长安，“史家据赐诏之年，遂谓议潮献表在五年耳”。至于收复凉州的时间，向达则同意罗振玉之说。齐陈骏在《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①一文中则主张张议潮收复沙州的时间是大中二年，至大中五年又先后收复了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州。咸通四年收复了凉州。

②张氏家族的郡望。罗振玉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中说张议潮为沙州人。藤枝晃在《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中则根据南阳张孝嵩刺七故事在沙州的流传，称张议潮为北庭都护节度使张孝嵩的后代，即“龙舌张氏”的后代。其郡望应为南阳，但他又未做最后肯定。苏莹辉则一方面认为“议潮诞生河西，望出南阳”②，另一方面又据《张淮深墓志铭》说淮深是敦煌信义人。③ 姜亮夫则据《通鉴》的说法，认为张议潮一家是敦煌一带的土豪，并没有什么郡望，只是为了抬高身价，才认张孝嵩为远祖，自称南阳张氏的④。荣新江在《敦煌卷子札记四则》中又进一步指出，张议潮时并没有自称为南阳人，直到张淮深时，所谓“南阳张氏”才大噪于世，不仅自称为南阳郡开国公，而且把张议潮和张议潭也都封为南阳郡开国公，此后南阳张氏便成了当地的望族⑤。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研究张氏归义军家族的“南阳”郡望和“南阳郡开国公”的封爵，以

---

① 《甘肃师大学报》1979 年 4 期。

② 《张议潮》，载《修订再版敦煌论集》，台北 1979 年。

③ 同上书，《补唐书张淮深传》。

④ 《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补唐书张议潮传〉订补》，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三辑。

⑤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集。

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唐末五代归义军时期几个大族的郡望是以姓氏资料为凭据的，而爵号又是以郡望为基础的，这些共同构成了有关各家族在敦煌地区享有崇高社会地位，互攀姻缘，以便结成政治同盟的精神支柱。

③张氏归义军政权的传递。罗振玉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中认为，张议潮之后，继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是其从子张淮深，淮深卒，弟淮氵□嗣。淮氵□卒，托孤于义潮婿、沙州刺史索勋，勋乃自为节度使。后议潮第十四女，凉州司马李明振妻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奉嗣为节度使。向达在《〈补唐书张议潮〉补正》中则进一步据莫高窟供养人像题名及石室遗文指出，张淮深之弟淮□是与张淮深一道被索勋杀死的。也就是说淮□并没有担任归义军节度使。向达并指出，索勋之后被推为节度使者即张承奉。张承奉至哀帝天祐二年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藤枝晃的看法与向达基本相同。1983年，王冀青在《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① 中，对上述这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又做出了新的解释。王文认为，张议潮女婿索勋以拥立张议潮后人为幌子发动政变，杀张淮深一家，立张议潮子张淮□为节度使，不久张淮□卒，索勋又借口扶持淮□子张承奉积极准备篡权。终于在景福元年(892)被唐朝廷任命为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掌握了河西兵权。王冀青又根据$\frac{\text{P165}}{\text{C155}}$窟的供养人题记的位置指出，当时张承奉、索勋及张议潮的二个李姓外孙共同统治着瓜沙地区，其中张氏空居尊位，索氏权最重，唯李氏力量可以与索氏匹敌。索氏的篡权又引起了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的不满，率其子弘愿、弘定、弘谏等发动政变，剿灭索氏，归权于张承奉。王冀青还认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是在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而不是王重民所说905年二月。孙修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

---

① 《敦煌学辑刊》1983年3期。

他在《张淮深之死再议》[1] 一文中认为，张淮深曾勾结田令孜、朱玫、李昌符，致使唐僖宗逃风翔、兴元，还派河西兵随王行端追僖宗、立李煴。因而僖宗回京后便决定处死他，处死的方法可能有二；一是被赐死或直接派兵镇压而死；另一是假手于其他方镇势力、军事集团，或者张淮深部下的叛逆者而杀死。孙修身还进一步推测，很可能是李茂贞于乾宁二年（895 年）以其将胡敬璋为节度使，派兵入河西，勾结淮深部下的叛将，里应外合，杀死张淮深及其六子的。陈守忠也认为孙修身的这个推断"合乎当时情势。"[2]

此外，李永宁又根据张景球所撰《张淮深墓志铭》中的"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推测，杀死张淮深一家者并非他人，而是张议潮之子张淮鼎。淮深死后。淮鼎执政两年便去世。李永宁又认为，张淮鼎也并非死于索勋之手或其它各种凶变，这样才有向索勋托孤之说。他之所以向索勋托孤，主要是因为索家为沙州望族，索勋一直执握瓜州军政大权，又为张、索、李三家独存的长辈。但索勋见淮鼎之子承奉年幼，有机可乘，便向中央请封节度使独揽大权。此事又引起了李氏不满，李氏便杀索勋，扶承奉为节度使，然而张承奉实际上是徒具虚名，大权全由李氏掌握。邓文宽在《也谈张淮深之死》[3]一文中又进一步对竖牛作孽这个典故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竖牛作孽"一事的特点之一是杀害兄弟，逼死父亲。特点之二是作乱之后自己并未继立，而是立了其父之庶子并辅佐之。张淮深之死很可能与这个典故中所讲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邓文宽指出，S5630《张淮深造窟记》中所提到的淮深之子延兴、延嗣二人，并不在《张淮深墓志铭》所载的、与张淮深一道遇害的六子之

---

① 《西北师院学报》，1982 年 2 期。

②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 4 期。

③ 《敦煌研究》1988 年 1 期。

列，从而推测"张延兴、张延嗣二人同其父张淮深及张延晖等六兄弟，还有张淮深夫人陈氏并非同一势力集团"，因而"不能排除张淮深等人死于延兴、延嗣之手的可能。"邓文宽还认为，张淮深死后继位的张淮鼎，"应是延兴、延嗣扶立起来的"，他可能是张淮深的异母兄弟，即张议潭之庶子。邓文宽最后并推定，张淮深之所以死于这种阋墙之争，很可能是嫡庶矛盾的结果。

关于这个问题钱伯泉也提出了一些看法①。他根据莫高窟第9窟中的供养人像及其题记，和P3556的张氏墓志铭推测，索勋没有篡权，也没有被李氏子弟所杀，而是在"假手托孤"，维护张氏的统治方面有过卓越的功绩，死后留下极大的政治影响。身为索氏之婿的曹议金，在张承奉绝嗣后所以能接替张氏为归义军留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索勋过去的威望。钱伯泉还认为，在唐僖宗两次因乱逃离长安的时侯，前往平定祸难的河西军很可能是由索勋带领的。由于他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代理归义军军务很快就被被朝廷正式任命了。钱伯泉又指出，索勋担任归义军节度使正是张氏归义军政权内忧外患较严重的时期。内扰是指归义军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外患是指甘州回鹘的进攻，"他力挽危局，使瓜沙地区得到了安全，甚至很可能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1988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荣新江提交了《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② 一文。该文通过对有关归义军史的基本文献的整理，对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称号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从而把归义军的研究放入到唐宋之际和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之中。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归义军的历史，而且有助于对一些没有年代的敦煌写本的断代工作。

---

① 《为索勋篡权翻案》，载《敦煌研究》1988年1期。

②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出版。修订稿载台北《敦煌学》19辑。

在《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① 一文中，荣新江对张、索、李之间错综复杂的传承关系进行了细致考察。张淮鼎于大顺元年二月杀害淮深夫妇及六子后，即成为归义军统治者，但他在位时间不长，至迟在景福元年（892 年）去世，死前托孤于索勋。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呢？这是因为淮鼎杀淮深之事极端隐秘，索、李两家似乎都未参与其事，但索勋并不一定赞成淮鼎之所为，所以他收养了淮深遗女。淮鼎去世时，承奉年幼，不能独掌政权，所以才有“托孤”之说。由于这时李明振已死，李氏家族除议潮十四女外，均为晚辈，而索家乃沙州望族，索勋一直握有瓜州军政大权，又是张、索、李三家独存的长辈，故而其地位优于李氏。因此，由索勋辅佐张承奉执政，也就为大家所接受。李氏三子则分占瓜沙军使、刺史之位，掌握实权，相互牵制。景福元年，索勋见承奉年幼，有机可乘，便向唐朝廷请封节度使。892 年秋天，朝廷即遣使沙州，正式授予索勋归义军节度使之职，独揽了归义军大权。

索勋掌有归义军政权后，即引起了李氏家族的不满与妒忌。894 年，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率张、李家族推翻了索勋的统治，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别任沙、瓜、甘州刺史，实际掌握了归义军实权，到了 895 年底，李氏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极盛，并排斥了张承奉而独揽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所做所为，必然引起瓜沙一些大族势力的反对，于是在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到了 896 年初，李氏的统治终于被瓜沙一些大族推翻，张承奉得以重新执政。

关于张氏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② 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

---

① 《文献》1989 年 3 期。

② 《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年。

系》[1] 两文作了系统研究。认为唐王朝授予张议潮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一州节度使和观察使，仅仅是个虚衔。因为大中五年时张议潮并没有有效地控制河陇十一州，这一点唐朝显然也是十分清楚的。十一州中没有包括河西重镇凉州，就透露了唐朝君臣的心计。我们知道，凉州是北朝，隋唐以来河西的重镇，唐朝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吐蕃统治时期，又是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中，张议潮对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的控制就是一句空话。

对于唐王朝来说，由于备受吐蕃和一些藩镇的侵逼，当然不希望新兴起的张议潮势力过分膨胀，更不愿意归义军变成能与唐朝廷抗衡的第二个吐蕃。大中七年，沙州刺史、张议潮之兄、张淮深之父张议潭入朝，实际上是去作人质，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唐朝对归义军的不信任。当张议潮真正攻占凉州之后，唐朝便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张议潮势力的增长。咸通八年，大概是因为张议潭去世，议潮本人也亲自入朝，一去不返，成了变相的人质。

张议潮入朝后，唐朝虽然“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但却没有随之把节度使衔给予张淮深。而张淮深自咸通八年议潮一入朝，就开始向唐朝请求授予节度使实职，但唐朝并未答应。很显然，唐王朝仍让张议潮遥领节度使之任，希图借议潮之手，间接控制归义军政权。

张议潮去世后，淮深为了加强其统治，多次派使赴唐朝廷请授旌节，但唐朝为了有效地控制归义军，不使其势力过分强大，便长期不授予淮深旌节。文德元年（888 年）三月，唐僖宗去世，昭宗即位。十月唐朝才派使节赴沙州，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一年多后的大顺元年（890 年）二月，淮深全家便遇害于沙州。

由此可见，张氏归义军时期，尤其是张淮深时期，与唐朝的关

---

① 《敦煌学辑刊》1990 年 2 期。

系比较冷淡，没有得到唐朝的有力支持，这种关系决定了张淮深的某些内政与外交政策，最终导致了张淮深的被杀。

对此，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① 一书认为，唐王朝之所以不将节度使旌节授予张淮深，而采取拖延策略，除了不愿归义军势力过强以外，还与他们当时对藩镇的态度有关。当时唐王朝对藩镇的控制权虽已很弱，但节度使的世袭并未普遍化。或者张议潮入朝后朝廷打算另派节度使，故而迟迟不批准张淮深的请求，以后则因循拖延，一直拖了二十年之久。

④金山国历史

在瓜沙归义军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个以敦煌为中心的西汉金山国。它上承张氏，下启曹家，“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是归义军时代的一个间断，具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然而，正史只有二十字的记载，《旧五代史·吐蕃传》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从这些简略记载中，很难窥见金山国的具体情况。可喜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十多卷有关金山国的材料，特别是《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的发现，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②

敦煌遗书发现后，王重民先生利用有关资料，撰写了《金山国坠事零拾》，基本搞清了金山国的轮廓，“千载坠史，一旦重逢，其快乐有不能言喻者。”近年来，随着敦煌文书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对金山国的有关问题愈益明确。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③ 一文，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金山国的有关情况。

---

①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②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 卷 6 号，1935 年。

③ 《西北史地》1987 年 2 期。

作者认为，金山国的全称是“西汉金山国”，“西”乃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国为座标的；“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

张承奉祖孙三代，都把精力倾注于统一河西，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安定之区。金山国的建立，就是在唐代末年中国战乱频仍，河西失控的形势下，归义军节度使重整河西之志的集中体现。它的建国，其矛头是对准回鹘、吐蕃、羌浑等周围民族的。“东取河兰广武郡，西取天山瀚海军，扫定燕然□岭镇，南尽戎羌逻莎平”，就是金山国战略宏图的概括反映。从《龙泉神剑歌》的多次强调“打却甘州坐五凉”。“兼拔瀚海与西州”的叙述看，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回鹘势力的。

西汉金山国，是作为中原王朝藩镇之一的瓜沙归义军自己建立的王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建立，是脱离中原王朝的分裂割据行动。但是，它的矛头并不是针对中原王朝的，而是在黄巢起义以来，中原王朝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顾及河西的安危，而任其日益混乱的局势下，张氏政权奋起自振的行动，它是张氏先人“破却吐蕃收旧国”，“赖得将军开旧路”之志的继续。

关于金山国的建国年月，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根据《白雀歌》卷末题写的“乙丑年二月”字样，认为此歌作于唐哀帝天祐二年（905 年），并由此得出结论，断定张承奉称白衣天子，建立金山国亦“当在献歌后甚暂，兹假定献歌之年之月为承奉建国之年之月，谅无大误”。王重民先生的结论，数十年来都为大多数学者遵从。1983 年，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① 一文，首先对王重民之说提出疑议，并将金山国的建国时间定在梁开平二年（908

① 《敦煌学辑刊》总 3 期，1983 年。

年)。1987年,李正宇在《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①]和《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考证了金山国的建国年月。作者指出,《白雀歌》尾的"乙丑年二月"杂写是后人补书的,它既不是《白雀歌》的抄写题年,也不是《白雀歌》的创作纪年。并根据敦煌文书中天祐和天复年号的变化情况,将金山国的建国之年定在天祐三年(906年)四月到十月间。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②]一文,通过对《龙泉神剑歌》写作时间的考证,推断出金山国立国当在开平四年(910年)七月初一日。荣新江《金山国史辩正》[③]一文,在卢向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上回鹘可汗状》当写于七月廿六日至七月底之间。大致同时成文的《神剑歌》也应作于七月末。并根据"一从登极未逾年",判断张承奉之建金山国当在梁开平四年(910年)七月末以后不久。

⑤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情况。罗振玉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中曾说,张议潮收复瓜沙之后,便"缮甲兵、耕且战"。土肥义和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④]中则讲到,张议潮收复敦煌后曾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如解放被吐蕃改为寺户的良人;调查户口和统计土地;通过收税、征役巩固节度使政权的财政基础;宣布保护一般民众和寺观的财产,并重新组织敦煌的佛教教团机构等等,使唐朝的各种制度得到了恢复。该文还指出,归义军统治时期瓜沙地区的政权中心是节度使衙门,下设州、县、乡三级的政权组织。官员的设置也与中原基本相同,州的长官由节度使最亲近的家族担任。此外在进入敦煌城的北道、西道和南道上,还设有游奕使,以探察其他民族的动态。作者并指出,中原的城郭制度也仍然在敦煌保存着。

---

① 《敦煌研究》1987年3期。

② 《敦煌学辑刊》1990年2期。

③ 《中华文史论丛》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 《敦煌研究》1986年4期,1987年1期。

孙修身在《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① 一文中，也曾涉及到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特别是张淮深时的社会经济等情况。他说张议潮入京之后，“张淮深遵议潮遗训，积极地维护祖国统一，并为李唐王朝屡立战功”，“除此之外，他还讨平了回鹘的叛乱，参加了镇压云南蛮的战争。在生产上，他又积极地兴修水利，大兴屯田，使河西的生产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就是当时李唐王朝，在经济和军事上，也要仰他几分。对于治下的各族人民，也能‘训以华风’，使他们‘咸会训良，轨俗一变’。总之，经过张淮深叔侄的一番经营，使河西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富裕、士马强盛，人民生活安定的富庶之区。”

冷鹏飞《唐末沙州归议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②一文，探讨了张议潮时期的户口、田地登记情况，并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土地税——官布、地子、柴草进行了初步探讨。这是目前所见国内第一篇研究归义军赋税制度的文章，但对 P3236《壬申年官布籍》的时代推断有误。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③一文，利用敦煌文书，对归义军时期的土地制度，尤其是请田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探讨，认为归义军时期凡乡管百姓都具有请地的资格。归义军时期的土地私有权是以承担赋税为前提的，如果不承担赋税，就可以由别人请求这块土地。日本学者堀敏一《中唐以后敦煌税法的变化》④，对归义军时期的主要税收——官布、地子和柴草的征收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地探讨。陈国灿《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⑤和唐耕耦《唐五

① 《社会科学》(甘肃)1983 年 5 期。
② 《敦煌学辑刊》1984 年 1 期。
③ 《敦煌学辑刊》1985 年 2 期。
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 1 期。
⑤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1]两文，利用大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归义军时期的民间借贷进行了详细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民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状况。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2]一书认为，为了使归义军政权在河西站稳脚跟，张议潮及其后继者张淮深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恢复旧制，重建唐代的州县乡里制。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归义军在乡一级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置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使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下降了。另外，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针对当时沙州荒田闲地较多的特点，归义军政权在对这类田地进行调查、登记以后，允许官民向官府申请耕种。对百姓之间自愿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官府一般也予以批准。归义军时期赋税的名称主要有官布、地子和柴草。这三项税额加在一起，虽比唐前期的租、调略重，但与吐蕃时期相比，却大大减轻了。

对于张淮深的作用，钱伯泉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尽相同[3]。他认为张淮深时期，特别是末期，归义军政权的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当时回鹘日益强盛，但“张淮深不是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而是采用阴谋的手段制造回鹘统治集团的分裂，调动仲之、黄头鞑靼、龙家、归义军自身力量，甚至向过去的死敌吐蕃借兵多次进攻回鹘，以致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甘州回鹘不但占据了原属归义军的甘州作为牙帐之地，而且占据了肃州，张淮深的地盘只剩瓜、沙、伊、西四州。”他还认为张淮深所采取的统治政策是错误的。他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加重压迫和剥削，用以支持战争和供其挥霍，使百

---

① 《敦煌学辑刊》1985 年 2 期。

②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③ 参见《为索勋篡权翻案》，载《敦煌研究》1988 年 1 期。

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归义军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逐渐达到表面化和白热化的地步。

⑥张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罗振玉、向达等人在《补唐书张议潮传》及《〈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文章中就已涉及到这些问题。罗振玉首先追述了吐蕃占领河西的历史情况，然后介绍了会昌二年以后吐蕃的内乱。指出张议潮正是乘此间隙收复瓜、沙等州，并于咸通二年收复凉州的。咸通七年，张议潮又“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尚恐热大战，擒斩之，传首京师”，致使吐蕃余部奔秦州，此后便衰绝。王重民在《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中则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张承奉与甘州回鹘的关系。据他的看法，张承奉曾在天祐三年秋以后的不长时间内，两次击败了甘州回鹘的入犯，并准备收复甘州。但到乾化元年(911 年)，甘州回鹘天可汗狄银又率兵逼沙州，张承奉迭遭败退，欲借吐蕃兵以抗回鹘，然百姓怨恨。遂在紧急的情势下派遣宰相大德僧人出城与回鹘议和，并结成父子之国。孙楷第在《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对当时吐蕃、回鹘及退浑三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张议潮时曾屡破蕃、浑及安西回鹘，张淮深嗣立为节度使后“亦屡摧安西回鹘之师”。邓文宽在《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① 一文中，则根据对《张淮深变文》以及 P2709、P4976、P4055、P3270、P4011、P3645 等卷子的考证指出，张淮深所平定的是甘州回鹘而不是安西回鹘，并指出了两次战斗的时间和原因等。藤枝晃在《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的上编中，也曾对张氏归义军时期河西各民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张氏归义军初期，正逢塔里木盆地的吐蕃势力尚未后退，而回鹘又进一步向安西及甘州迁移的时候。归义军对这些内外诸蕃的应接抗争极为频繁。引起这些战争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确保五凉交通贸易的通畅。

---

① 《北大学报》1986 年 5 期。

(2)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概况

①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藤枝晃在《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下编中，根据敦煌写本《曹良才画像赞》指出，曹氏为敦煌汉人，其先为亳州鼎族。张承奉时期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长史。姜亮夫在《瓜沙曹氏世谱》[1] 中则考证，曹议金是张氏女夫。孙修身在《谈与瓜沙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2] 一文中也认为，根据敦煌遗书和供养人题记，可知曹氏为敦煌著姓大族。曹议金兄弟二人，其兄曹良才也是一位颇具才华，文武兼备，握有重兵的将军。

1915 年，罗振玉曾根据当时他所看到的一些敦煌写本，经过考证编排出一个《瓜沙曹氏年表》[3]。根据此年表，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排列是：曹议金（贞明年间——天福五年二月，即公元915——940 年），→曹元德（议金之子，天福五年〈940〉—天福七年〈941〉）→曹元深（议金之子，天福七年〈942〉—开运三年〈946〉）→曹元忠（议金之子，开运三年〈946〉——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曹延禄（曹元忠之子，太平兴国五年〈980〉——端拱五年即淳化三年〈992〉）→曹宗寿（延禄族子，端拱五年〈992〉——景德七年，即大中祥符元年〈1010 年〉）→ 曹贤顺（宗寿之子，景德七年〈1010〉——？）。无疑，这份瓜沙曹氏年表首次勾划出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大致轮廓，为学者们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此后，又有许多学者对这份年表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如香港学者苏莹辉和北京图书馆唐耕耦都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创业者，亦即第一个接替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人，不是曹议金而是曹

---

① 《浙江学刊》，1983 年 1 期。

② 《社会科学》1983 年 5 期。

③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 年版，又见《敦煌学文选》1983 年版。

仁贵①。唐耕耦还通过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指出，曹仁贵原为张承奉时期归义军的长史。在推番索勋的事变中，他很可能是李明振妻的合谋者，甚至有可能是主谋。唐耕耦还认为，曹仁贵继替张承奉成为瓜沙地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时间，可能是在甲戌年(914)五月十四日与同年十月十八日之间，去位的时间应在贞明六年(920)与龙德二年(922)之间，曹仁贵去世后，曹议金便接替为归义军节度使。

1990年，贺世哲在《试论曹仁贵即曹议金》② 一文中，着重从张曹之代和曹议金开始节度瓜沙的年代入手，从时间上排除张承奉、曹议金之间尚有他人执政的可能性，从而把曹仁贵、曹议金解释为同一人。李正宇《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归奉后梁史探》③ 一文，运用了大量敦煌资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曹仁贵即曹议金。随后，荣新江《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④ 一文，利用在英伦所见未予刊布的敦煌文书，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曹仁贵和曹议金为同一人。目前，这一结论已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关于曹议金去世的时间，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罗振玉认为在后晋天福五年(940)二月，英国学者小翟理斯同此。但藤枝晃却根据敦煌文书和《册府元龟》卷92所载清泰二年(935)七月曹议金贡马等材料，推测是在清泰二年、三年间，唐长孺在《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⑤ 中，又根据S4291号卷子推断“议金之死至迟

---

① 参见苏莹辉《朱梁时曹仁贵继张氏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说》，载《大陆杂志》68卷1期，及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载《敦煌研究》1987年2期。

② 《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3期。

③ 《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中心1991年版。

④ 《敦煌研究》1993年2期。

⑤ 《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

不出天福二年(937)二月,或更早一、二年。姜亮夫则据同一份卷子推断曹议金去世"当在天福二、三年间。"孙修身、贺世哲在《〈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中,又据 P2701 号卷子以及 P3556 号卷子和《册库元龟》中的记载,认为曹议金死于 935 年秋冬。但他们在《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①] 一文中,又重新考订为清泰三年(936年)。土肥义和在《讲座敦煌》第二卷《敦煌历史》中,又将这个时间推测为 934 年,即清泰元年。匈牙利学者乌端则根据敦煌藏文官府文书,并参照汉文文献,把其年代定到了清泰二年(935 年)。1983年,荣新江在《敦煌卷子札记四则》中,又根据 S4291 号卷子和其它一些写本,把曹议金的卒期具体定在 935 年二月十日。

此外,关于曹元德、曹元深等人的卒年,学者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参见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以及孙修身、贺世哲的《〈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等文。1988 年《敦煌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谭蝉雪的《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一文中,作者根据 P2032 号卷子《净土寺帐目》考证出曹元德之死为天福四年(939),曹元深之死是开运二年(945 年)。这是近年来的新成果。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曹元忠之后,继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是曹延恭,最后是曹延禄。但他们对曹延恭与曹延禄在位的具体时间看法也不同,姜亮夫认为,曹延恭在位的时间是北宋开宝七年(974)至太平兴国五年(980),曹延禄在位的时间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至咸平五年(1002)。藤枝晃则认为曹延恭在任的时间是从开宝七年(974)二月或开宝八年(975)正月开始,其弟曹延禄在任的时间当在太平兴国五年以前(980)。孙修身、贺世哲又认为曹延恭的卒年是 976 年,同年曹延禄即位。1988 年,孙修身在《瓜沙曹氏卒立

① 《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世次考》① 一文又重复了这个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孙修身还将他历年来对曹氏世系的研究做了总结，列出了如下表格②：

①曹议金
911—933
- ②曹元德
  933—939
- ③曹元深
  939—945
- ④曹元忠
  945—974

⑤曹延恭
974—976
- ⑦曹宗寿
  1002—1014
  - ⑧曹贤顺
    1014—1036(?)
  - 曹贤惠
- 曹宗?

⑥曹延禄
976—1002

②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社会概况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罗振玉曾指出，当时归义军节度使只领瓜沙二州。姜亮夫则指出，当时曹氏有御侮保境之功，因此百姓多编歌颂之。孙修身、贺世哲在《〈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他们首先指出，曹议金即位后，立即去掉了张承奉所建帝号，奉中原正朔，用归义军节度使旧称。这种作法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曹氏政权巩固。同时，为了保持与中原王朝交通的畅达，曹议金还十分重视东面结好于甘州回鹘，西面结好于于阗，他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又将女儿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从而形成了安定局面，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曹元德时期继续执行了曹议金的政策，曹元忠时，曹氏政权便进入了鼎盛时期。孙修身和贺世哲还指出，曹氏

---

① 《郑州大学学报》1988 年 4 期。

② 关于归义军节度使世系表可参看荣新江《话说敦煌》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和胡戟、傅攻《敦煌史话》，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历届归义军节度使都十分佞佛，他们曾在敦煌开凿和重修了许多洞窟。藤枝晃则特别着重于分析曹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他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是当时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并且主要是依靠这种地位从中获利。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它和周围的民族，如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结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藤枝晃还分析了曹氏归义军政权对中原王朝和契丹的关系，他认为通常情况是在向契丹朝贡时，便中止与中原的关系；在和中原往来时，又断绝和契丹的关系；其态度又常常取决于周围的党项、甘州回鹘等政权的态度；而且归义军还常常和甘州回鹘、龟兹回鹘、于阗等一道组成使节团，共同朝贡，但曹氏归义军政权又从来只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另一位日本学者对安考夫在《回鹘与敦煌》一文中，也曾分析了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他指出曹氏归义军政权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敦煌国；从敦煌文书和正史中的记载来看，它曾几次与甘州回鹘结成人为的血缘关系，如通婚、结成盟兄弟等。到曹顺任归义军节度使时，由于曹氏门宗已混有回鹘血统，加以沙州有过回鹘集团居住的历史，便开始自称“沙州回鹘”了。荣新江在《归义军及其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① 一文中指出，由于河西和塔里木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作为吐蕃长期统治和回鹘人西迁的结果，围绕着几块大的绿洲逐渐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与立足未稳的归义军相抗衡。进入公元十世纪，凉州组成汉人和吐蕃人的联合政权，甘州为回鹘所据，肃州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其中以龙家和吐蕃人为主体。瓜沙虽是汉人领导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但境内的退浑、通颊、龙家、粟特人都占一定的比例。西北伊州一带纳入西迁回鹘主体的势力范围，楼兰、萨毗一带则先后以退浑、萨毗和仲云等民族为主流。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

① 《敦煌学辑刊》1986 年 2 期。

钱伯泉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8年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回鹘在敦煌的历史》一文，文中通过对敦煌写本的分析指出，在九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末期，回鹘对敦煌的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归义军割据政权统治敦煌时，无论是前期的张氏还是后期的曹氏……宗主国。

五、台、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

四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台港地区的敦煌学论文，除了主要在《敦煌学》上发表外，台北出版的《大陆杂志》也是刊载台港地区敦煌学论文的主要园地。另外，台港地区的其他刊物也发表有关敦煌学的文章。

在文献目录整理方面，首推潘重规、金荣华主编的《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该《目录提要》是在翟理斯、刘铭恕二目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编排体例依据《四库全书提要》，以写卷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佛经因卷帙浩繁，依佛教《大藏经》的目次，另成一类，置于最后。

其著录方式，首列书名、卷数、作者、斯氏编号；其次为翟目所录原卷之长度、纸色；再次标明写卷内容之完整或残缺。然后为卷中文字之起句、讫句及其卷子题记，并作必要的说明。如果同一卷中还有其他资料，也都一一注明。最后附有人名、地名、寺名、年号，非汉文卷子等索引，从各种角度提供了有关资料，以便学界利用。

另外，黄永武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一书也很有特色。该书以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基础，并补充了《总目索引》出版后的一些新发现，如补充了S6980号以后600号敦煌无名断片新标目和P5579号以后的新目录。此外还补充了苏联和日本的

敦煌写本目录。黄永武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①一文中说："孟列夫氏之目录二册，出版于西元 1963 及 1967 年，较王书为晚出，固非王氏所及见，今特译为中文，一并补入《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至于王书散录中所列中央图书馆藏卷目录，现"敦煌卷子"已印出，亦可覆实对勘。尚有日本大学所藏目录，亦已印成正续二册，与王书散录不同，均予校订，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中之缺憾，补正而完美。"

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初集》、《敦煌丛刊二集》、《敦煌学导论丛刊》的编辑出版。

《敦煌宝藏》从 1980 年开始编辑，由黄永武主编，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82——1986 年陆续出版。从黄永武教授的编辑例言可知，"本书编集之资料范围，是拟将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摄影图片约 20 万张，及画本、刺绣、壁画、塑像等图片千余帧，尽量收集，细心汇编成书。"为使所收资料真实，"凡摹本均不收列，损泐不清处，为保存原貌，不旁注，不校改。"其取材范围，"先以敦煌所藏汉文写本刻本为主，汉文写本间偶有非汉文资料，则一并附存。有关绘本，幢幡、壁画，塑像等美术品附载于各册之前，另行编号，以备参检。"该书的编排顺序，则"依搜集敦煌微卷之先后为序，英、法、中在前，其他各国列后，各卷子之次序，仍沿用斯坦因、伯希和之编号，此编号已为国际通用，故不归英重编。"至于北京所藏卷子，"则沿用《敦煌劫余录》所著录之体例，按经归类，按品次第，一仍旧贯，以便查检，其余则依所出版目录为顺序。"

《敦煌宝藏》共 140 册，每 10 册为一辑。其中第 1——55 册为斯坦因劫经录，即 S. 1～S. 7599 号；第 56——111 册为北京图书馆藏卷，即北图 1——8738 号；第 112——135 册为伯希和劫经录，即 P2001——P6038 号；第 136——137 册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

① 《汉学研究》4 卷 2 期。

编撰之散录，即散1——1608号；第138——140册亦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撰之欣赏篇，即P2005——P5007号，又苏联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藏0096——2784号。

《敦煌宝藏》工程浩大，收录齐全，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次最全面整理，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该书未收汉文以外的卷子。黄永武教授曾在序言中说"至于吐蕃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希伯莱文等资料，待汉文资料编成后，再斟酌辑印。"目前，汉文资料已出版10年了，还未见其他民族文字的写卷材料问世，我们希望尽快编印汉文以外的敦煌资料，以适应国际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

在《敦煌宝藏》编辑结束，正在陆续出版之际，黄永武教授在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又编辑了一套大型敦煌学研究丛书——《敦煌丛刊初集》，于1985年6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敦煌丛刊初集》的编辑缘起及目的，正如该书的出版说明所说："敦煌资料之研究，乃当今国际汉学界之显学，随着本公司《敦煌宝藏》之辑印，更掀起广泛研究之热潮。非仅各方学术会议恒以敦煌学为重点，而各大学之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尤为目下已蔚成之风尚。本公司为迎合潮流所趋，提供研究所需，促进文化复兴，特编辑民国以来中外重要之敦煌学工具书或经典之作，均为坊间绝版或难以购得之珍贵典籍，荟萃于一编，以利学术研讨之展开，兹先辑敦煌丛刊初集。"

《敦煌丛刊初集》共16册，即

第1册：翟理斯编《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附黄永武撰《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和《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

第2册：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附黄永武撰《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

第3、4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

第5册：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金祖同辑《流沙遗珍》；李证刚《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第6、7、8册：罗振玉辑《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

第9册：常钧《敦煌杂抄》、《敦煌随笔》；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存古学会编《石室秘宝》。

第10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

第11、12册：孟列夫主编《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

第13册：羽田亨辑《敦煌遗书》；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编》。

第14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第15册：刘复《敦煌掇琐》。

第16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为了促进敦煌学的发展，九十年代初，新文丰出版公司又邀请东吴大学林聪明教授主编《敦煌丛刊二集》。关于《二集》的主旨和内容，林聪明教授在序言中说："新文丰出版公司以宏扬敦煌学为己任，历年来不惜耗费巨资，大量编印相关资料。先后出版《敦煌宝藏》、《敦煌丛刊初集》等丛书，……为因应敦煌学研究日新月异的趋势，因委托余筹编《敦煌丛刊二集》，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专著或论文集，从客观的角度呈现研究成果，供学界参考，希望此类丛刊的辑印，能有助于敦煌学的发展。"

《敦煌丛刊二集》从1993年开始出版，现已出版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概论》、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等，其他各册也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为了给初治敦煌学者提供一套全面系统的入门书，林聪明教授还主编了《敦煌学导论丛刊》。该《丛刊》的编辑目的和主要内容，正如林聪明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新文丰出版公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致力宏扬中国文化，近数年来尤全力支持敦煌学的研究。……今

更不遗余力，欲大量出版当代敦煌学者的研究成果，供世人参考，俾有助于斯学的发展。余得知其用心，感佩其热诚，乃代为筹编《敦煌学导论丛刊》，邀请海内外中国学者，就其精研范围，以中文分类撰写导论，……本丛刊的问世，期能使初治敦煌学者得窥其门径，专研有成者亦可助于会通，从而促进敦煌学的普及与发达，此诚为全体作者共同的愿望”。

《敦煌学导论丛刊》从 1991 年开始出版，目前已出版 12 册，即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语研究导论》、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项楚《敦煌诗歌导论》、陈祚龙《敦煌文物散论》、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其他各册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1993 年 8 月，在香港召开了第 34 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其中“敦煌研究”组由饶宗颐教授主诗。乘此机会，由饶宗颐教授主持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诚明馆内宣告成立。

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虽然仍在草创阶段，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为饶宗颐教授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丛刊”，该丛刊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已出版了 4 种，即饶宗颐编《敦煌琵琶谱》、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饶宗颐主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第 5 种《敦煌学论丛——第 34 届亚洲与非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组论文专集》正在出版之中。

六、法国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几十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著作的出版以及敦煌学者的培养方面，都受到了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

从敦煌学史的角度考察，法国学者在敦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成就最为卓著。但由于本书范围之限，下面仅就汉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情况略作介绍。

伯希和于1909年返回法国后，即着手编写所获敦煌写本目录。1920年完成了目录初稿，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3511号、及从4500——4521号。

伯希和的这个目录，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该目录有三个缺点：第一，他的编目工作比较潦草，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第二，伯希和虽然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的，因此把一部分书名没有正确反映出来；第三，始终没有编出完整的目录。因此，王重民先生1934年到巴黎后，就开始编《伯希和劫经录》，该目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

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也有许多空缺处，并有许多笼统称之为"残佛经"、"残道经"之类的地方。1952——1955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谢和耐与吴其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写了2001——2500号汉文写本目录，这一工作于1957年获得了法国金石和古文学科学院的年度奖。但这卷目录在出版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拖了十多年才于1970年出版。其内容提要是经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隋丽玫、吉娜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魏普贤补充和修订的。该目录每卷著录书名，并记明纸数、高广幅度、

行款等，凡近代学者有关著述，亦附载于当卷之下。最后还附有索引多种及题记书影多帧。

《巴黎国立图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第二卷(2501——3000号)已由左景权和隋丽玫编写。由苏远鸣等人编写的第三卷(3001——3500号)已于1983年先于第二卷问世。由于这批写本编目太慢，已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不满，法国有关方面曾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快一些，估计全部编完要6卷。据法国方面透露，法藏敦煌汉文遗书约3900卷。

法国陆续出版了一套《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第一卷是吴其昱整理的《七世纪末未刊布过的道教经文(本际经)》，1960年出版；第二卷是饶宗颐与戴密微合作整理，编辑的《敦煌曲》，1971年出版；第三卷是哈密顿整理的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71年出版；第四卷是饶宗颐的《敦煌白画》，1981年出版；第五卷是由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等影印发表的《敦煌藏文文书集》；第六卷是哈密顿的博士论文《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1986年出版。

伯希和劫往法国的敦煌文物，曾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1卷——敦煌石窟》为名，于1920——1924年分为6卷出版，共收图376幅。1945年伯希和病逝后，由韩百诗主持其遗著的出版工作，拟出版伯希和新疆和敦煌考察所获文物27卷。1978年韩百诗逝世后，伯希和档案由旺迪埃——尼古拉负责出版。

在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方面，法国近年来最大的成绩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时，曾对石窟的外景、建筑风格、经变画及故事画的内容和史实，特别是当时尚能辨认出的洞中题识(包括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谜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以及历代游人的题记都作了详细抄录。八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伯希和当年记录下的许多壁画内容和题识已不复存在或辨认不清；另一方面，伯氏的记录是对敦煌石窟

所作的最早和最系统的记录，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如归义军张氏政权第二任统治者张淮深全家于公元890年暴死，其原因何在？继任者又为谁？长期以来不得其解。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1981年出版的《伯希和石窟笔记》第一卷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淮深为议谭子，淮鼎为议潮子，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兵变，杀死了淮深，并继任了归义军节度使。千载坠史，终于明了。

正因为伯希和笔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从1981年开始，法国方面便陆续刊布出版。全部笔记共出六卷，每卷包括三个部分，即经过整理后的笔记刊本、笔记手稿真迹图版和当时拍摄的图片。全套丛刊是作为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1卷而刊布的，由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负责，并由她们作序和前言。于1981——1990年出版。其中笔记刊本部分已由耿昇、唐健宾翻译，定名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①出版。

七、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八十多年来，日本一直比较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一）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

①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石室中的典籍》①为题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同时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当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虎次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函罗振玉加以证实,并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不久,罗振玉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大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文献的研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文书照片等材料。内藤湖南等人,还分别发表演讲,介绍对写本照片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日本的敦煌文献研究。1910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日本京都,从而更加促使了日本,尤其是京都敦煌吐鲁番热的上升。

1910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11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狩野、小川三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青陵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五人在北京逗留近二个月,11月2日返国。次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位先生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

北京访书归来后,内藤湖南等人认识到,要想扩展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必须对收藏于欧洲诸国的敦煌、新疆收集品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1912年,京大派狩野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西域写本,他抄回了许多珍贵资料;1924年,内藤湖南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前往巴黎、柏林等地调查伯希和收集品;矢吹庆辉也曾两次前往伦敦,拍摄了许多斯坦因劫去的古写经;1931年,那波利贞前往法、德两国留学,调查欧洲之敦煌吐鲁

① 载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出版。

番写本。他在欧洲二年,以巴黎为主并先后去过柏林和伦敦,调查敦煌、西域写本收藏及著录研究情况,抄写了大量有史料价值的文书,这对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敦煌吐鲁番研究者就是用这种"搜宝式"的方法搜集了许多敦煌吐鲁番资料,为此后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912年到1933年,日本学者大规模的欧洲访书活动,把日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敦煌学的兴起到二战结束前,是他们搜集资料和探索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初步成果。如在历史方面,羽田亨和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代社邑研究》《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碾硙经营》、《从敦煌发现文书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1974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田升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4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42年出版《中国身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只是时有零散的文章问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龙谷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长期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第二,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汉、藏文写本的缩微胶

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第三，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苏联孟列夫主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于是，在 1953 年 1 月，由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等人发起，在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8——1962 年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6 卷 7 册)，这一成果被誉为是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由文部省资助，铃木俊主持，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公文书》(1964 年)，土肥义和编的第二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寺院文书》(1967 年)，吉冈义丰编的第三卷《道教之部》(1969 年)和金冈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71 年)。这些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战后的日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如五十年代有仁井田升、山本达郎和冢本善隆等人；六十年代有藤枝晃、西村元佑、竺沙雅章和上山大俊等人。这一阶段，冢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牧田谛亮对中国伪经的研究，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的深入分析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隋五代史方面，以仁井田升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最为著名，该书出版于 1959——1964 年间，是他研究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结果，被称为“建筑在古文书研究上的顶峰”。除此之外，有关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西嶋定生、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

科等问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还集中收入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66年)、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1968年)、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三卷(1974—1977年)、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等著作中。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书中，找出了从行军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在西北史地方面，尤其是在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中，藤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州归义军节度史始末》(1941——1943年)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59年)、《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1961年)、《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年)、《敦煌历日谱》(1973年)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其中《敦煌的僧尼籍》一文，根据敦煌文书提出，敦煌是一个特殊的佛教都市，这种把佛教史同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倾向。另外，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晚唐以降敦煌佛教社会的真相，其成果已收入作者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年)。

（三）最近十多年的研究概况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再加上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北京、伦敦、巴黎藏卷及其他一些藏卷的全部公开，使得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大成的著作得以产生。在专精的研究方面，《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丛刊》可视为典范。该丛刊经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推荐，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一卷为《法制文书》，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

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二卷为《籍帐》，由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这是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的籍帐、户口田地簿及差科簿文书写本的集大成者；第三卷为《卷契》，由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第四卷为《社文书》。收入该丛刊的每一件文书，都有精心的录文和清晰的照片，并有详细的英文解说。每一卷前，有对这一类文书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研究论著，卷后还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由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继续发现及各收藏单位的陆续公布，该丛刊还不能说是对某一类文书的最终结集，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前人的整理研究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协会”和“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成立。1983年4月，日本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的五位对敦煌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即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武内绍人、古田丰，组成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他们五位虽然专攻方向不同，但在利用敦煌文献上却是一致的。再加上他们在英、法、美的留学研修，已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约定每月聚会一次，共同探讨上述各种语言所写文书的格式和一些双语文书、碑铭等问题，并准备合作刊布汉、藏、粟特、蒙文本《善恶因果经》。这种集体的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的发展方向。

同时，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也于1987年8月在龙谷大学成立。他们也由五位青年学者组成，即白须净真、关尾史郎、片山章雄、町田隆吉、荒川正晴。据称，该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以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资料为研究对象，围绕会员各自的研究课题，对文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讨。为了发表本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进相互之间，尤其是与中国同行的交流，研究会还创办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该《会报》具有“通讯”的性质，出版周期很短，是了解日本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要窗口。

从1980年开始编纂，由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讲座敦煌》，是一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的多卷本巨著。为编写此巨著，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邓建吾、吴其昱、左景权、周一良、陈祚龙也应邀参加撰写个别篇章。全套《讲座敦煌》由冢本善隆、榎一雄、入矢义高、秋山光和监修，金冈照光、池田温、福井文雅任编辑委员，各分卷还设有主编。原计划出版13卷，后由于各种原因，共出版了9卷，即《敦煌的自然与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汉文文献》、《敦煌佛典与中国佛教》、《敦煌佛典与禅》、《敦煌古民族语言文献》、《敦煌佛教与中国文化》、《敦煌的美术》。全套《讲座敦煌》9卷于1992年出齐。该书因为由众人执笔写成，有些篇章不免流于泛论，但大多数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既能增加人们关于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又标志着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还给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

第十章　史料、工具书与专著

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近400年，保存至今的史料相当丰富。自本世纪30、40年代以迄今日，又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有关工具书和专著。若要将这些一一介绍出来，需要一部专书。本章限于篇幅，只能择其要者加以叙述。

一、史　　料

“史料”包括一切历史遗存物，简单地说可将其划分为“实物”与“文献”两大部类。实物史料是客观历史的直接遗存，故其价值极高。无论专业史学工作者还是青年学子，都应对之有所了解，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它。但由于它过于浩繁和散乱，本节不能多加介绍。有兴趣者可参阅文物出版社于1961、1981、1984年先后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3部著作。至于80年代中期以后新发现者，则需随时留意《考古》、《文物》、《中国文物报》及其相关的书刊报纸。这里着重要谈的，是文献史料。

(一)基本史料

基本史料大体是指这样的史料：对专业工作者说来利用率较高，研究哪方面的问题一般也难以离开它们；对初学者来说，则一

般赖它们入门，为深入研究打基础。

《**隋书**》 85卷，唐初官修，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之一。隋人也曾编写过本朝史，如王劭的《隋书》、王胄的《大业起居注》等。唐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令狐德棻动议修撰唐以前的几代史，其中包括隋代史。武德四年(621)，唐高祖诏命封德彝等分头编纂，但久而未就。贞观三年(629)，太宗再下诏命，编纂北齐、北周、梁、陈、隋五代之史，其中隋史由魏征监修。贞观十年，五史的纪、传完成。其中《隋书》成纪5卷、传50卷。十五年，以各史无“志”，又命于志宁等人补修，高宗显庆元年(656)毕功，由长孙无忌领衔进呈。“志”这部分，通记五朝典章，分10篇，30卷，原单行，称《五代史志》。后因其记事以隋为主，遂附于《隋书》行世，故今本《隋书》为85卷。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状况，重大事件与人物大多编入。后唐人张大素、敬播等又撰著过隋史，但与隋人所撰者今俱亡佚。这样，《隋书》即成为研究隋史的主要资料。该书的不足是记载尚嫌简略，如《食货志》的篇幅仅及《五行志》的1/3，经济材料就显得较少。此外，对开创佛教天台宗的智𫖮、书法风格影响及于唐初的智永等人物只字未提均属失漏。该书最好的版本是1973年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较重要的考校补订之作有：清人章宗源、姚振宗各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章书13卷，仅考史部；姚书52卷，通考四部。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证》9卷、补遗1卷。以上三书收入《二十五史补编》。清李慈铭《隋书札记》1卷，1930年北京图书馆印行。近人罗振玉《隋书校议》1卷。见罗氏自刊《五史校议》。今人岑仲勉有《隋书求是》，1958年商务印书馆版。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合撰的《隋书经籍志详考》于1995年由汲古书院出版，亦可参阅。

《**旧唐书**》 200卷，二十四史之一，后晋官修。唐人编写的官私史书本来不少，武宗以前的“实录”、“国史”等更较完备，但经安史之乱与唐末兵火后颇多散佚。五代时梁、唐两朝虽曾尽力搜罗佚

逸，却未能编成一部完整的唐史。晋天福六年(941)，张昭远、贾纬等人受命撰著唐史，宰相赵莹监修。历时4年多，完成本纪20卷、志11篇30卷、列传150卷。成书时，赵莹调外任，新宰相刘昫领衔上奏，后来此书便题为刘氏所撰。书名原称《唐书》，后人为区别于宋人所撰同名书；故于原题前分冠“旧”、“新”二字。《旧唐书》在编纂技巧、排比史实方面颇受后人讥贬，认为它文字冗蔓、记事重复。但在保存较原始的资料方面却有其长处，如书中大量迻录唐代实录、国史的原文和君臣的诏令、奏疏等。另外，它对一些重要事件、制度的记载虽有缺误，但也不乏详明得体之处。其较好的版本为197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考订校补之作有，清人罗士琳等所撰《旧唐书校勘记》66卷、岑建功辑《旧唐书逸文》12卷，有道光28年杨州刊本。张道撰《旧唐书疑义》4卷，正觉楼丛刻本。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刊印龚向农所撰《旧唐书札迻》一书，笔者未见，姑附于此。

《新唐书》 225卷，北宋官修，亦列入二十四史。北宋统一后，有关唐史资料复出与新撰者日增，宋人又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①，庆历五年(1045)，仁宗乃诏命重新修撰一部新的唐代史，至嘉祐五年(1060)成书。预修者有宋祁、范镇、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欧阳修等。最后一任监修为曾公亮。但今本题欧阳修、宋祁二人撰，因二人实为主修。书前未署监修者名，实为24史中特例。全书本纪10卷、志13篇50卷。表4篇15卷、列传150卷。其中，表为《旧唐书》所无，志增《选举》、《兵》两篇，纪、传则有增有删，从史料角度讲，较旧书所增者自然有价值；所删则多不当，如删去一些重要人物(玄奘、一行等)。另，欧、宋二人均提倡散文，往往刊落、笔削一些重要的骈体文，也是个缺点。不过，它较旧书多作了些归纳，使“宗室宰相”、“藩镇”等成为类传，比

---

① 《进新唐书表》。

旧书条理化，这还是可取的。目前以1975年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最好。考订校补之作有：北宋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金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由于两部《唐书》各有其价值，还有人对它们加以比勘，较著者有清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是作者读此二书时的圈点、校勘及批语，极有价值。

《旧五代史》 150卷，北宋官修，二十四史之一。本书原称《五代史》，"旧"字系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而加的。它编于太祖开宝六年(973)至七年，监修者薛居正，参修者有卢多逊、扈蒙等多人。五代去宋未远，监修、编修都曾亲历，又有较完备的"实录"和相关资料(如范质的《五代通录》)可资参考，故成书较速。后因金章宗下诏废去此书，原本乃逐渐散佚，今本系清人邵晋涵等据《永乐大典》及一些宋人著作辑佚而成。虽非原书旧貌，却也保留了大部分内容。本书将五代人物分朝而记，各有纪、传。其中梁纪10卷、传14卷，唐纪24卷、传26卷，晋纪11卷、传13卷，汉纪5卷、传6卷，周纪、传各11卷，内容较详。而十国人物则分入《世袭》、《僭伪》二传，计5卷；又有《外国列传》2卷，记今朝鲜、越南等邻国和今属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之事。这部分内容过于简单。还有志10篇12卷，通记五代典制。由于编者草率从事，多编辑少刊削，因而使一些资料的原始原貌得以保存，这反倒成了它作为史料的优点，而作为著作则大为逊色了。目前，以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较通行。重要的校补之作有：北宋陶岳的《五代史补》5卷、王禹偁《五代史阙文》2卷，二书均有汲古阁刊本。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5卷，北京图书馆有抄本。今人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1卷、《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郭武雄有《五代史辑本证补》，1976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刊行。

《新五代史》 74卷，北宋欧阳修著，二十四史之一。该书约撰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至皇祐五年(1053)间[①]，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即志)2篇3卷、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采取五代通记的写法。本书编撰比《旧史》晚，可资参考者多，但作者重在阐扬"春秋大义"，于史实记载较疏阔，虽然比薛书增补了一些内容，但删削的更多，这就影响了它的史料价值。本书有"注"，系作者弟子徐无党所作。也重在说明其师的编撰旨趣，于史实无所增补，不足取。现通行版本是1974年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校补之作有：吴缜《五代史记纂误》辑本3卷，清吴兰庭《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均收入《丛收集成》；周寿昌《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有广雅书局本；吴光耀《五代史记纂误续补》6卷，有光绪年间刊本；杨陆荣《五代史志疑》4卷，见《杨潭西先生遗书》；徐炯《五代史记补考》24卷，见《适园丛书》。另外，彭元瑞、刘凤诰合撰《五代史记补注》74卷，以欧史为正文，兼采薛史及他书为"注"，堪称集五代史料大成之作，极便利用。有道光时刊本。又，清人陈鳣的《续唐书》纪传70卷，名为"续唐"，实记五代史事，亦可参读。有《丛书集成》本。

以上介绍的5种基本史料因均在"二十四史"之列，故清人、近人的一些通考正史之作中均有涉及，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张元济之《校史随笔》等等。此外，后人还为上述5史作了许多补志、补表，大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兹不备述。

《十国春秋》 116卷，纪传体，清吴任臣撰。作者感于《新五代史》记十国史迹"颇多遗漏"[②]，乃搜罗典籍，于康熙八年(1669)编成本书。它仿《旧五代史》分国记事之例记十国史事，其中吴14卷、南唐20卷、前蜀13卷、后蜀10卷、南汉9卷、楚10卷、吴越13

---

① 参阅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第106页。

② 《十国春秋·自序》。

卷、闽10卷、荆南4卷、北汉5卷，是为纪、传、世家部分；另有《纪元》、《世系》、《藩镇》、《百官》诸表各1卷，《地理表》2卷，又附《拾遗》、《备考》各1卷。本书取材极为广博，仅据其《凡例》所开列书名者即达158种之多，其中不少为五代及两宋人作品。作者颇具史才，正文之下还借小注形式补充史料以备异闻、辨谬误，为后人利用提供了方便。由于现在传世的有关十国史料或记事疏略（如两部《五代史》），或已非完璧（如《九国志》），或仅记某国（如两部《南唐书》），而本书汇众编于一帙，不仅研究者使用方便，初学者也易阅读。但书中所记事亦有遗漏、重复者，读者应注意。1983年，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后附有全书人名索引，是目前最完善的版本。

《资治通鉴》 294卷，编年体，北宋司马光等著。本书记事上起战国，下止五代，其中卷177以后为隋唐五代部分，占全书近一半篇幅。它始撰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历19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具体编修程序是，由刘恕、刘攽、范祖禹3位先辑录资料编成"丛目"，再稍事删汰而为"长编"，最后由司马光斟酌取舍、融铸润色，方为定本。其书取材至为丰富，"遍阅旧史，旁采小说"①，据有人统计引书达395种②，而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又半数左右"不见于他书"③。此外，作者又另编《考异》30卷，对记一事而歧异的史料说明取舍因由，堪称取材虽广而别择精严，故历来为人所重视。仅就史料之实而言，其价值超过某些原始资料。《通鉴》的缺点主要是记事详于政治而略于经济、文化，另外也存在误漏处。它成书后，不少人为之作注，其中以元人胡三省注最精。中华书局1956年的点校本据清胡克家翻刻胡注本将胡注与《通鉴考异》散附于《通鉴》正文之下，便于读者参览。另外，明末学者严衍在

---

① 《进资治通鉴表》。

② 陈光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③ 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205页。

弟子谈允厚的帮助下，费30年之力撰就《资治通鉴补》，为司马氏、胡氏纠补缺失，亦为名著。由于点校本未能充分吸收该书成果，故读者对其仍有参读的必要。但严《补》的光绪时旧刊本流传较稀，今人冯惠民乃辑录其中重要补文为《通鉴严补辑要》(1983年齐鲁书社版)，每条补文后注明与点校本对应的页码，极便读者。此外，岑仲勉著《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964，中华书局版)亦为一部重要的参读之作。

《唐六典》 30卷，唐代官修。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始命大臣编撰此书时，曾写下"理、教、礼、政、刑、事典六条，令以类相从"①，故旧题为"御撰"。实则以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四人先后监修，由韦述确定体例，又选徐坚等人参修，历16年而成书。它大约是为当时官吏明确职司规范之书，乃以事隶官。分为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及太子、诸王、公主属官与地方行政、军事官吏诸部。其正文记职司官佐、吏员品秩，而以机构沿革，职司事例入"注"。故它并非单记官制，往往还涉及其他，如卷2《尚书吏部》有官吏考核与贡举制度，卷3《尚书户部》有贡赋制度，卷7《秘书省》有国家图籍管理与分类等方面的内容，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光绪时广雅书局刊本颇流行，但内容不及日本1973年广池学园新刊本多，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仲夫点校本最善。

《通典》 200卷，唐杜佑著。玄宗时，刘秩曾搜罗资料，编过一部类记历代典制沿革的《政典》，书计35卷。受其启发，杜佑乃参究历代史志，增其类例，扩其内容，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十七年(801)，费时30余年编定此书。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8门(一说兵、刑分立，计9门)，门下又区分细类，将上

---

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6。

古至唐玄宗末年的典制政章之沿革流变详为记载①。有时还叙及肃、代、德宗三朝之事。它取材也极广博,仅据其注明出处者计已达248种②。书中所记唐代制度往往详于两《唐书》之“志”,如卷7记科举考试名目即较《新唐书选举志》内容丰富,这类史料价值尤高。书中偶有涉及宪宗元和时事,系后人增窜③。中华书局1988年的点校本系集数位学者之力精心校理而成的,分装5厚册,后面所附王文锦撰写的《通典考证核实》一文,颇具功力。另,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影印北宋版亦具参考价值。

《唐会要》 100卷,北宋王溥撰。唐德宗时,苏弁、苏冕兄弟类辑唐初至德宗时事编成《会要》49卷。武宗时,崔铉、杨绍复等又承其后为《续会要》40卷。王溥在前人基础上扩充史事至唐末,题为《新编唐会要》,于太祖建隆二年(961)进呈。“会要”内容也以记朝制典章为主.但类例与《通典》等有别;《通典》等贯通古今,除甄录材料外,还附及作者的评论见解;“会要”则断代为书,单纯类辑史料而不发议论,且分目详细。《唐会要》就有512目之多。它不仅续记了《通典》未能记的德宗以后之事,此前之事也有杜氏所未记者。这部分内容的史料价值尤高。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55年刊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点校本。

《五代会要》 30卷,王溥撰。本书据五代的历朝“实录”和其他载籍编辑而成,分279目,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进呈朝廷④。对王氏说来,《唐会要》为“近代史”,本书则为“当代史”,王溥曾历仕后汉、后周两朝,周时又曾监修“实录”,故此书所采多属较原始

---

① 旧史书将《通典》列于政书类,今人著作往往称为典志体,其分类标准与纪传、编年等不一致,若求统一,当作“类别体”,又不从俗,故不出其体例。

② 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中国史学史论丛》第66页。

③ 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209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玉海》卷51艺文部典故门同。

的材料，加之它成书于两部《五代史》之前，不少内容为二史不记或记而不详者，故价值更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印本。

《唐大诏令集》 130卷，北宋宋敏求编。编者之父宋绶从仁宗时即曾辑录唐代重要诏令，未及编次整理而卒。敏求据此旧稿，条别部居为13类，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成书。宋氏父子搜罗编次该书时去唐未远，资料尚多，敏求又具史才，熟悉唐事，故能继其父业。书中所收各类诏令，较多地反映唐代某些方面的情况，"政事"、"蕃夷"、"刑法"各类史料价值尤高。惜今存者非完本，缺卷14至24、卷87至98计23卷。有195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文苑英华》 1000卷，北宋官修。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命李昉、宋白等人"阅前代文集，撮其精华"[1]，编一部下继《昭明文选》的诗文总集。先后参预编修者有20余人，至雍熙三年(986)成书。真宗景德四年(1007)，有人对原抄本做过一次删补，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校勘过两次而成为现今面貌。本书收文上迄萧梁，下止五代，计收2000余人近2万篇作品。其中90%以上为隋唐五代时期之作。全书依文体分为赋、诗、碑、志、行状等38类，类下再分若干部。本书存在着遴选不精，引录误漏等缺点，但其所收之文还是有很多可补史传之缺的资料。南宋彭叔夏撰《文苑英华辨证》10卷、清劳格撰《文苑英华辨证拾遗》一文，为之纠谬刊误。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英华》将两者与新编的《作者索引》同附书末，极便读者。

《全隋文》 36卷，清严可均编。严氏以未得预编《全唐文》，乃发愤独力编辑唐以前的文章总集，经27年努力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全隋文》为其中之一部。它收录隋代168人的作品，由隋入唐人物的作品不收。是书取材以"正史"为主，兼及类书稗钞、释典道藏与碑铭法帖，虽残篇断简、片语只言亦所不

---

① 《纂修文苑英华事始》引宋代《三朝国史艺文志》。

弃，是研究隋代史的重要史料。对所收之文，严氏还注明辑自何书及撰述年代，其体例则依仿《全唐文》(见下)。另，书中存在着将某甲之文误纳某乙名下，错收、漏收非隋文等错误。1958年，中华书局据光绪刊本影印746卷书为4巨册，《全隋文》在第4册中。

《全唐文》 1000卷，清代官修。清内府藏有佚名所编《唐文》一部，嘉庆十二年(1807)曾为清仁宗披阅，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命人"重加厘定"①；第二年便设馆编修。由董诰等人领衔，集百余学者文士之力，至嘉庆十九年告成。编修时，内府书仅是参考，馆臣们从类书、丛书、各种文集中又重加采录，另订体例，故费时费人。全书共收唐、五代时3千余人的作品1万8千余篇，采取文系人后的编辑原则，馆臣另撰每位作者的小传附于其文之前。总体则依唐帝王、后妃、宗室诸王、公主、五代十国君主、臣工、释道、闺秀、宦官、四裔之序排列先后。有些文章"无可类从，附编卷末"②，作者入宋者不收其入宋后之作，而撰于五代十国时期者则录。编者将众多的唐五代文汇于一帙，其中有不少还属仅存之文，这是可贵的。但本书除存在着与《全隋文》同样的一些缺点外，更严重的是不注引录作品的原出处与撰述年代，这给研究带来许多不便。劳格、岑仲勉各撰《读全唐文札记》，为刊误之作；清人陆心源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为补缺之作。劳文见《读书杂识》卷8；岑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年新版《唐人行第录》；陆氏2书今附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全唐文》书末。另，《全唐文》编修之一陈鸿墀广搜资料，辑为《全唐文纪事》122卷，亦为重要参考读物。有1959年中华书局印本。1995年，三秦出版社又出版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亦为重要参读者。

《元和郡县图志》 34卷，唐李吉甫著。吉甫为宪宗时宰相，对

① 嘉庆帝《御制全唐文序》。

② 《全唐文凡例》。

藩镇割据不满，思有所整顿。他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①，因而编写了这部全国地理总志。它成于元和八年(813)。其中亦偶有记九年事者，可能是后来有所增补。本书以贞观十三年(639)所划的10道、47镇为纲，府、州、县为目，每镇之前附图一幅。府、州之下列其治所、等级、户数、乡数、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②、贡赋等等，县下则记等级、沿革、山川、物产、古迹等内容。不仅反映唐代的地理状况，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方面的素材。本书的不足一是记载沿革失之太简，二是考订间有疏漏。原书为42卷，但后有散佚，地图、目录2卷与正文的19、20、23、24、35、36诸卷完全失去，正文的1、9、18、33等卷亦有残缺，故今本虽称34卷，实不足此数。后人为之辑佚校补之作有：严观《元和郡县补志》9卷、《元和郡县志拾遗》2卷，有乾隆年间蒲卢学舍刊本。张驹贤《元和郡县志考证》34卷、《补目》1卷、《遗文》1卷，均附《畿辅丛书》所收周梦棠校本《元和郡县志》之后。缪荃孙《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3卷，今附于198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书末。此书后还附地名索引。

《**太平寰宇记**》 200卷，北宋乐史著。作者因唐代所修志、图过于简略，且不能反映至宋初时的变化，于是编撰本书。据研究，它最晚成书于太宗雍熙三年(986)。其体例大体依仿《元和郡县图志》，以道为纲，分府、州与县记载各项具体内容。不过，其内容项目与李书又不尽同，增加者有风俗、姓氏、人物、土产、艺文等等，删略者主要是贡赋。再一点就是本书不附地图。《寰宇记》取材相当广泛，不少材料又注明来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线索。尤其是这些材料中保存了一部分唐以前载籍的佚文，更为宝贵。本书时

---

① 《元和郡县图志序》。

② “八到”指各府(州)至长安、洛阳及其他八方府(州)的交通路线和里程。

间下限止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距北宋建国仅20余年,故涉及宋事者并不很多,倒是隋唐五代时期的内容比较丰富。本书的版本以《四库全书》本较好,但其中缺少了7卷(第113——119卷)。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得到5卷多宋残本,将其刻入《古逸丛书》,虽不能全部补足四库本之缺,倒也所差无多。另,清人陈运溶有《太平寰宇记拾遗》7卷、《辨伪》6卷,可以参看,见《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

(二)一般史料

这类史料难以数计,门类庞杂。不能象基本史料那样详述,只能再略归小类,举其大要。

1. **杂史传**

大致包括旧目录归于史部而在基本史料中未予介绍者的一部分。

《大唐创业起居注》 3卷,唐温大雅撰。作者随唐高祖起兵而掌文翰,据亲历亲见者撰为此书,记李渊父子自起兵晋阳至唐朝建立之事。内容与两《唐书》不尽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

《贞观政要》 10卷,唐吴兢撰。作者为著名史家,以直笔称。本书约撰成于玄宗开元时,分类记录唐太宗时的君臣如何励精图治之事,内多君臣讨论问答,计40类。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安禄山事迹》 3卷,唐姚汝能撰。作者事迹不详。仅知其曾为华阴县尉。本书记安禄山生平及安史之乱始末。有些内容不见于正史,也记了不少琐事,可补正史之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

《唐才子传》 10卷,元辛文房撰。作者为西域人,以能诗名。本书系唐代诗人的简略传记,计收人物398人。它"不仅为查考诗

人的仕历提供可靠的线索，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唐代科举史研究的不可缺少的材料”①。其版本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标点本。另，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本淳的《唐才子传校正》，对本书勘正、补缺处甚多。由傅璇琮主编，集唐文学研究部分专家之力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已由中华书局于1995年出至第五册。校笺本重在探索材料出处、纠正辛氏记事错误和补考原书未备之要事，实已在辛氏基础上成为一部新专著。

《东观奏记》 3卷，唐裴庭裕撰。作者为昭宗时人，曾参预唐末三朝实录修撰。本书据亲身见闻写成。记唐末事80余条，“颇具首尾”。《通鉴》“多采其说而不尽信之”②。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了田廷柱的校点本。

《唐律疏议》 30卷，唐官修。长孙无忌主其事，高宗永徽四年(653)成书。本书为唐代的法典，共收法律条文500余条，逐一为之诠解。由于解释法律涉及一些经济、政治问题，故不独对研究法律史有用。《四部丛刊》三编本后有张元济校勘记，为较好版本，1983年中华书局刘俊文点校本用力最勤，为当今最佳版本。唐代，与“律”并行的，还有“令”、“格”、“式”等名目，与法律相关。日本学者仁井田升辑录有关唐代的“令”编成《唐令拾遗》，1933年在日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俊文的校点本。1989年已由栗劲等人编译成中文，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蛮书》 10卷，唐樊绰撰。作者系懿宗时人，曾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蔡袭属吏。任职期间对南诏的历史、风俗进行调查，又参考前人著述，撰成本书。是书一名《云南志》，是研究唐代南诏史及唐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的《蛮书校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各有

①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前言》。

②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东观奏记》提要。

所长。

《**大唐西域记**》 12卷，唐玄奘述，辩机录。玄奘为唐初著名高僧、学者、翻译家。本书据其往天竺取经途中见闻口述，由其弟子辩机笔录成书。书中记载了“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的地理、风俗、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①。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系集10位专家之力，参考了众多的中外研究成果，又花了近6年的时间搞成的，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长安志**》 20卷，北宋宋敏求撰。作者以唐人韦述所撰《西京记》疏略，乃博采群籍而成是书。“凡（长安）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②。是研究唐代长安城的重要史料。另，元人李好问撰《长安图记》3卷，后人将其与《志》合刊，称《长安志图》。有经训堂本。

《**唐两京城坊考**》 5卷，清徐松撰。两京指长安和洛阳。作者在纂辑《全唐文》时，“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问之《长安图》”而作本书③。书中较详细地考订了两京的街坊里巷、宫阙寺观及唐士大夫第宅。书前附图数幅。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后又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提供的新绘《唐长安城复原图》、《唐大明宫图》、《隋唐洛阳城图》和清程鸿诏所撰《校补记》。另编有《地名索引》，亦附书后，为最好版本。

《**元和姓纂**》 10卷，唐林宝撰。作者为宪宗元和时太常博士，奉宰相李吉甫命而撰是书。条理唐人姓氏、郡望，首列皇姓李氏，余则依唐韵206部分编，各部以大姓居先，姓下著录姓氏之源及谱

---

① 《大唐西域记》敬播《序》。

②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长安志》提要。

③ 《唐两京城坊考序》。

系。是研究唐代谱牒及士庶变迁的重要史料。原书散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析为18卷。后洪莹与孙星衍重为校辑，编为10卷①。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对原辑本考订整理之功甚巨。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郁贤皓、陶敏的整理本，于原文后附上岑氏校记，并附姓氏、人名索引，为目前最佳版本。

《**登科记考**》 30卷，清徐松撰。是书搜罗唐五代时期有关科举制度的史料，依年编录，附以考订。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后附有《人名索引》及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一文，为最好版本。

《**九国志**》 12卷，北宋路振撰。作者为宋真宗时知制诰。本书原本列世家、列传两大类目，计50卷，记十国史事。原书久佚，邵晋涵自《永乐大典》中辑其佚文，得列传136篇，由周梦棠编定为12卷。有1937年万有文库本。近人缪荃孙有《九国志校》、《九国志逸文》各1卷，收入《艺风堂读书记》。

《**南唐书**》 同名者有2种，一为北宋马令撰，30卷；一为南宋陆游撰②，18卷，均记十国中南唐一朝史事，亦同为纪传体。马书有《建国谱》(相当于地理志)1卷，为陆书所无，但两书纪传各有详略，不可偏废。均收入《四部丛刊》(续编)。明末李清以陆书为正文，散附马书及其他资料于下，并加考订，为《南唐书合订》，惜被清廷禁毁，罕见刊本，据说有抄本流传。后周在浚仿李书之例撰《南唐书笺注》18卷；高醇、刘承干又先后为周书作补充，成《南唐书补注》，收入《嘉业堂丛书》。

---

① 按：《元和姓纂》一书，《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均入史部谱牒类，并著录为10卷；唯《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类书类；其《提要》云据《永乐大典》辑出，析为18类；《书目答问补正》著录同《新唐志》和《直斋解题》，并云由洪、孙重辑。

② 据今人考证，该书为北宋胡恢撰。详见《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卢苇菁文《〈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

《南汉书》 18 卷，清梁廷楠撰。作者是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史家。他广辑资料，悉心考订而写成这部纪传史，记十国中南汉的史事。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点校本。梁氏还撰有《南汉书考异》18 卷、《南汉文字略》4 卷及《南汉丛录》2 卷，与本书一并收入《藤花亭十七种》，有道光时刊本。另与梁氏约略同时的吴兰修另以编年体撰写《南汉纪》5 卷，又撰《南汉地理志》1 卷、《南汉金石志》2 卷，可相互参读。收入《岭南遗书》，有道光时刊本。

2. **类书、丛书**

摘抄经史百家中的词句段落重新排比、汇作新编者为类书；收聚多部较完整的著作另加刊刻、集为一套者称丛书。有些类书与丛书中都保存着不少隋唐五代时期的史料。

《初学记》 30 卷。本书是唐玄宗为方便诸皇子学习作文时检索事类而命徐坚等人编辑的类书，分 23 部（加上附部实为 26 部）313 个子目，每目依叙事、事对、诗文之序编排。其中颇有关于隋及初唐的史料而不见于正史者。如其卷 11、12《职官部》的内容若与《旧唐书·职官志》比勘，便互有异同详略；另象唐初魏王李泰等人编修的《括地志》今已散失，幸赖此书得保存部分佚文。有中华书局 1962 年点校本。

《太平广记》 500 卷。这是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在太平兴国二年（977）至三年中编成的一部专录逸闻奇事的类书。全书分为 92 部 150 余目。它卷帙既巨，取材亦丰，据统计其引书达 475 种①，大抵为汉至宋初的著作。其所收之事以唐代为多，有些内容虽涉荒诞，亦能于中略窥史实。如卷 27 录唐诗人张志和事，将其目为神仙中人。核之以《新唐书》本传，知其父即通《庄子》、《列子》，而志和本人又著有《玄真子》，则他信奉道家之说即可无疑。而其他方面的内容，更为治唐史者多所取资。本书有中华书局 1961 年点校本。

---

① 《太平广记·点校说明》。

《太平御览》 1000卷。本书亦为李昉等14人奉太宗之命编辑的类书。其始编约与《广记》同时，而至太平兴国六年才成书。初题为《太平总类》，后因太宗日读其3卷，故改称《御览》。它分作55部，取《周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说法以示包罗万象。部下分目至4558个，目中各条大体以朝代序次排列，先具出处，次录引文。据编辑者书前所附《引书目》说，它引书达1690种，尚不计诗赋等作品在内。不过，有些引文并非引自原著，而是自其他类书中转抄。另外，本书取材以经史为主，说部杂钞者流较少，保存着较多的唐五代时期的佚文，如其《州郡部》中屡引的《十道志》，即为已散失的唐人重要地理著作，赖本书以存。1960年，中华书局有影宋本出版。

《册府元龟》 1000卷。这也是北宋时编的一部大类书。宋真宗很羡慕其父统治时能以编纂出几部巨著，乃于景德二年(1005)诏命王钦若、杨亿等人编辑本书，且真宗自己对本书的体例、取材、编撰等方面也提出过意见并亲自审定，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告竣。全书内容以"君臣事迹"为主，取材则限于经史，不收杂书，按人物事类分为31部1104门，部前撰有总序，门前有小序。本书卷数虽与《太平御览》相同，而实际篇幅却几为其一倍。这样一部大书在很长一个时期不为治史者重视，主要是因为它取材范围不广，还有就是引文不注出处。实则它保存着大量有关唐五代史事，还是有价值的。如岑建功校勘《旧唐书》就曾利用过它；陈垣则利用其勘正了《旧五代史》辑本的不少错误，并对其价值做了充分的估计①。此后，治史者对之利用渐广。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影明本，并附有《类目索引》，颇便读者。另1989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影印宋刻残本，与影明本颇有异同，可参看。

《玉海》 200卷。这是南宋王应麟以己力编辑的一部类书。王

---

① 《册府元龟》影印明本《序》。

氏在有宋一代以渊博称，就连喜指摘别人疵病的清四库馆臣都对其盛赞不已①。本书共分 21 部 214 类，类下先存序，再按年代先后排列细目，细目之下引录材料，并加上自己的按语，按语有考订、有评论。由于全书宋代内容比重较大，一般的介绍都只讲它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②。实际上，书中还是有不少有关唐史的宝贵资料，例如选举部科举类中引及《唐会要》的材料时，往往与唐"实录"对举，其他部类中有时还直接引录唐实录。今日唐实录十不一存，故本书所引者十分宝贵。另外，像地理门户口类所记的唐开元户部帐及唐历代户口数等，也都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有《四库全书》本与 198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浙江书局刊本。

《说郛》 这是元代陶宗仪所辑的一部丛书。它现存两种版本：清康熙时宛委山堂本 120 卷，1927 年商务印书馆本 100 卷。两种本子辑录的著作不尽相同。这部丛书的重要，在于其中保存着大量的隋唐五代、主要是唐人的作品，也有不少涉及唐五代事的宋人作品。笔者据《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中所收该书 120 卷本的目录粗粗统计，这类作品在 250 种以上。它们的门类也较杂：既有一些正式的史学著作，如本节前面介绍过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九国志》；也有一些笔记杂录，如五代末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还有一些关于唐代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如张彦远的《名画记》、孙过庭的《书谱》等等，兹不悉述。总之，这些作品大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确实，有此书一部，"可省却不少翻检他书之劳"③。198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书的两种版本与《说郛续》（陶珽编，内中多为明代作品，与隋唐五代史无涉）汇编为《说郛三

---

① 参阅《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玉海提要》，子部杂家类《困学纪闻提要》。

② 朱天俊等《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5 页。

③ 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 231 页。

种》影印出版，并附有校勘记和书名索引，分装10册。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于1979年刊行《说郛考》一书，可以参看。

3. 其他

这部分主要介绍一些诗文集、碑志汇编和有关佛教道教的著作。

诗文集包括总集、别集两种，总集为汇编多数人作品在一起；别集一般指个人文集。流传至今的别集以唐人作品为多，五代较少，隋代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著录。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隋唐五代部分对唐人别集的介绍较为详细，可以参看，兹不赘。《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总集前文已叙，这里，介绍一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与《全唐诗》等。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 135卷，今人逯钦立辑。近人丁福保曾辑有《全汉三国南北朝诗》53卷，逯氏认为丁氏所辑尚有缺失误漏，乃辑为是书。书中《全隋诗》10卷，收隋代87人作品(不包括佚名者的作品)。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精装3册，隋诗在第3册中。

《全唐诗》 900卷，清初官修。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最繁盛之时。那时，上至皇帝王公，下至草野百姓，都能随口吟咏，更不消说那些著名的诗人了。他们留下的诗篇，不仅是研究唐代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料，而且有不少的诗中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独特风貌，故也是研究唐代其他方面历史的宝贵资料。唐人自己就曾编辑过诗总集。其后，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1333卷、清初季振宜的《唐诗》717卷，也是有影响的唐诗总集。不过，人们利用最多，也最享盛名的，却是本书。它始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成书于次年，参与其事者有彭定求、杨中讷等10人。它之所以成书较速，即是以胡、季二氏所编者为底本。是书收入唐五代2873人的作品49,403首，其编排则以帝王、后妃、宗室、公主、十国君主、大臣等为序。编辑这样一部大书并非易事，其中不免存在着一些错误，中华书局1985年的点校本已做了初步校勘。这个本子的后面还附有日人毛

河世宁所辑的《全唐诗逸》3卷，补充《全唐诗》漏收者。尽管如此，亦未能将遗世的唐五代诗全部收齐。今人王重民辑有《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辑有《全唐诗补遗》，童养年辑有《全唐诗续补遗》。以上4种，已由中华书局汇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另，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拾遗》一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中亦有《外编》所未收之诗52首。近年，陈尚君又倾注心力辑录、辨析、整理佚逸，对前人多有补正；并对王、孙、童等人的成果加以校补，由中华书局汇为《全唐诗补编》于1992年出版。岑仲勉的《读全唐诗札记》（收入《唐人行第录》）是阅读《全唐诗》的重要参读文献。另，南宋人计有功广辑资料，编为《唐诗纪事》81卷，不仅为阅读《全唐诗》的参考文献，本身也具有史料价值。

《全五代诗》 100卷，清李调元等辑。调元感于五代诗"向无辑本"，乃辑为此书，"意在备收，为五十二年典故之征"。初稿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道光年间，其从弟鼎元等再加辑校，成新本。今有何光清点校本，巴蜀书社1992年版。

《全唐五代词》 8卷，今人张璋、黄畬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唐诗》中即收有唐五代词，林大椿也曾编有《唐五代词》一书（有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本）。本书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再事搜求，编为是书，计收录170余位词作家（无名氏未计）的作品2500余首，远较前人所辑者为多，其中唐词3卷、五代词3卷、敦煌词1卷、无名氏与仙鬼词1卷。编者对之还加以校勘评点，书末又附录有《引用书目》、《唐五代词互见表》、《本编未收入各调备查表》、《作者索引》。作为资料，它不仅内容详细，也极便利用。

碑铭石刻。这类资料于研究艺术史者为实物，于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史者为文献。自宋人欧阳修、赵明诚先后编辑《集古录》、《金石录》后，以其足补史籍材料之缺而渐为治史者青睐。隋唐五代时期的碑铭，传世者颇多，后人遂仿前人之例把它们汇聚成编。在

这些碑铭集中，大都收录了相当数量的隋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其中，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160 卷（有 1921 年扫叶山房石印本）、陆耀遹的《金石续编》21 卷（有 1924 的校正补释本）、陆心源的《金石萃编补》200 卷等都较著名。这里，我们只介绍下列数种。

《八琼室金石补正》 130 卷，清陆增祥编。“八琼室”为作者的室名。陆氏少时曾从其父习篆籀书法与文字小学，渐对金石极为留心，他撰有多种关于金石学的著作，而以本书最为著名。它为补正《金石萃编》而作，收文上起东周，下迄宋金。其中，卷 24 至卷 29 为隋代之作；卷 30 至卷 78 为唐代之作；卷 79 至卷 81 为五代十国之作。而卷 129、卷 130 中还收录了一些有关南诏、朝鲜、越南、日本的碑文，虽为数不多，而颇有裨于治隋唐五代史者。有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的影印本。

《千唐志斋藏志》 “千唐志斋”是近代学者张钫（伯英）的斋名，在今河南省新安县内。清末以来，洛阳邙山地区有大量的碑铭墓志出土。张氏在郭玉堂等人协助下广事搜罗，自 1931 至 1935 年间得墓石千余件，乃建此斋收藏。郭氏则曾将藏石逐一墨拓。1965 年，郭氏家人将拓本献与国家，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阳地区文管处整理，又补以建斋后张氏所藏少量墓志拓本，于 1984 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即本书。书分上、下 2 册，内收拓片 1360 件。其中包括隋代 2 件、唐代 1209 件、五代 22 件。是研究隋唐五代，特别是唐史的宝贵史料①。

《曲石精庐藏唐墓志》 李希泌编。“曲石精庐”系编者之父李根源之室名，在苏州。根源于 1932 年在洛阳购得唐代墓石 93 通，运归该室收藏。编者对其加以整理，影印成书，由齐鲁书社于 1986 年出版。石数虽少，但多为有艺术、史料价值者。书中附有章太炎

---

① 参阅武志远等《千唐志斋概述》及《千唐志斋藏志·凡例》。

观览藏石后所撰跋文与藏石志所撰的志目①。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一部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碑志总集。计分9卷：①洛阳卷，陈长安主编，15册；②河南卷，郝本性主编，1册；③江苏、山东卷，王思礼等主编，1册；④河北卷，孟繁峰主编，1册；⑤山西卷，张希舜主编，1册；⑥北京（附辽宁）卷，张宁等主编，3册；⑦陕西卷，王仁波主编，4册；⑧新疆卷，穆舜英、王炳华主编，1册；以上8卷，于1991年出版。⑨北京大学卷，孙兰风、胡帆海主编，2册1992年出版。另有索引1册，由吴树平、吴宁欧编，1992年出版。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出版。此书在周绍良先生个人收集的唐人墓志的基础上，加上建国后公开发表的墓志及各地博物馆、图书馆藏品，整理、校点、编辑而成。其中个别志文已见于唐人总集或别集，若与出土墓志间有出入，亦被收录。全书依墓主落葬日期、按年号排列，墓志中所出现的人名，除墓主远祖及用典外，均编为人名索引附于全书之末。

隋唐五代时期是佛教在我国发展的高峰期，保存下来的有关史料不少。较重要者，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已多论列，这里介绍几种陈书未及者。另，道教在这一时期亦有所发展，故兼述道教史料。

《**国清百录**》 4卷，隋释智寂，释灌顶编。“国清”为佛教天台宗创始者智𫖮在天台山所建寺名。𫖮卒后，智寂搜集其事迹、笔札等为之编录，未成而卒，灌顶踵而成之。全书收录文札133件，有关于智𫖮整肃寺规及与陈、隋二朝皇帝、大臣的往来书信，多第一手

---

① 参阅《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前言》。

资料，极可珍贵。收入《大藏经》。

《**集古今佛道论衡**》 4卷，唐释道宣编，本书收录了佛教传入后至唐初关于佛教与道教争论的资料。收入《大藏经》。另有唐释智升所编《续集古今佛道论衡》1卷，亦收入《大藏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卷，唐释义净撰。记唐代前期至印度求法取经的僧徒60余人的事迹，包括义净自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除点校注释外，并附《求法僧一览表》、《义净生平编年》、《义净籍贯考辨》、《主要引用书目》、《中外文专名索引》及有关地图2幅，为最佳版本。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4卷，(日)释圆仁著。作者为日本天台宗高僧，日本明仁时期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元年，838)至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来唐求法。本书即在此10年间的日记，记事多为亲闻亲历者，不仅为研究唐代佛教史保留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如记"会昌灭佛"事；亦有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唐大和上东征传**》 1卷，(日)真人元开撰。作者为日本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学家，名淡海三船。年轻时曾出家，后还俗入仕。据有的学者研究，本书可能是作者受日本一位僧人思托的请求而撰①。主要记载了唐代东渡日本传法高僧鉴真的生平事迹，是一部研究唐代佛教史及中日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有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汪向荣校注本。这个本子除对原书认真校勘外，又附有对本书作者及版本简介和其他一些重要参考资料。

《**云笈七籤**》 122卷，北宋张君房编。这是一部道教类书。宋真宗时，张氏奉命领校道书，于天禧三年(1019)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后在此基础上辑其精要以成本书。"云笈"为道教的书箱、道书又分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

① 参阅本书所附《〈唐和上东征传〉作者及版本简介》。

一)、总称"七籤",故名。其内容相当庞杂,包括道教经旨、服食炼气之法、道教人物传记等。所录著作大抵起自汉代而至于宋初,其中有不少关于隋唐五代时的道教思想与信道人物的传记资料。如卷1的《开元皇帝道德经序》、卷5的《真子》、卷122的《道教灵验记》均为唐五代时所撰;再如卷112《神仙感遇传》中也记了不少唐代人物。这些资料,虽有浓厚的神仙怪异色彩,但经认真分析,还是可以利用的。有胡道静等人选编的《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最后,对本节的内容再作几点补充说明。首先,有些著作,如姚思廉的《梁书》与《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房玄龄《晋书》、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魏徵的《群书治要》、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刘知几的《史通》以及许嵩的《建康实录》等等,也都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史料。但通过它们只能研究该时期的史学史或某些学术史,对研究其他问题关涉较少,就不加介绍了。其次,有些经今人汇集整理过的专题史料,如王永兴的《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张泽咸的《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王永兴的《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吉联抗的《隋唐五代音乐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陈高华的《隋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年)和苏晋仁的《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等,亦不一一述及。另外,敦煌与吐鲁番的出土文书,亦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由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现已成为国际性的专门之学,在本书中已在前专门介绍,故不赘述。

二、工具书

本节介绍的工具书以有关隋唐五代史者为主,但有些通论性的书籍涉及这一时期,笔者认为较为重要者,亦约略叙述。关于日

本学者所编制的工具书，曾参考了冯蒸同志所撰《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版)，谨致谢意。

(一)索引目录

《隋书人名索引》 1册，邓经元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新旧唐书人名索引》 3册，张万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1册，张万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上3部索引系为检索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两《唐书》及两部《五代史》中所记人物之用。所收人名既包括隋唐五代时期，又包括此前者。总之，凡在上述5书出现的人名，悉行收入。另外，隋唐五代人名不论人物是否出现于本传，均注明其所出现处的卷数及页码。这3部索引以四角号码检索为主，另附人物姓名首字的笔划索引与之对照，为不熟悉四角号码者提供了方便。但因5书的点校本无论平装本或精装本均分为数册，索引只出卷数、页码而不出册数，仍不能称完备。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 1册，洪业等编，燕京哈佛学社1934年版。该索引为检索监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编，以中国字庋撷法检索，另附笔划索引与之对照。

《资治通鉴索引》 1册，〔日〕佐伯富编，昭和36年(1971)京都同朋舍版，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86年翻印。本索引将《资治通鉴》与胡三省《注》中出现的有关食货、职官、选举、兵制、地名、少数族、外国、姓氏、谥法、官殿、掌故、训诂等方面的名词列为检索条目，以四角号码和笔划两种方法检索。它虽主要是为检索日本刊印的《通鉴》山名本之用，但附有《主要版本对照表》，亦可用来转而检索我国的《四部备要》本与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

《唐会要索引》 1册，张忱石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该索引

据中华书局本《唐会要》编，以四角号码序排列，后附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1册，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包括《字号索引》、《姓名索引》两部分，利用它可检索出83种文献内的唐五代人物资料，是一部较完备的工具书。以四角号码与笔划两种方法检索。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 1册，方积六、吴冬秀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编者在查阅、利用《唐五代人物传记综合引得》后，感到有必要对其"作些补充"(本索引《后记》)，因成是编。它引据唐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47种，宋人记唐五代事迹的笔记2种、总集3种，所收录人名除生活于唐五代时期者外，还包括由隋入唐及由五代入宋者。按四角号码查阅。书前列引用书目表，书末附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极便利用。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1册，未注编者姓名，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1册，马绪传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以上两部索引系为检索中华书局版的两部影印本总集而编，体例完全相同。其《篇名目录》部分依原书次序著录篇名，注明该篇的总页码。《作者索引》部分以四角号码检索，另附笔划检字与之对照。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篇目索引》 1册，常振国、绛云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本书系为检索逯钦立所辑诗集而编，分《作者索引》、《篇名索引》两部分。以逯辑书分3册，两部分均注明册数、页码，以四角号码检索，另附笔划对照表。

《唐诗书录》 陈伯海、朱易安编，齐鲁书社1988年版。是书将自唐迄于1985年国内出版有关唐五代诗的总集，合集，别集、评论乃至资料书目一一著录其书名、作者、版本。后附书名索引，以笔画

和四角号码索引。

《全唐诗作者索引》 1册，张忱石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为检索该局出版的点校本《全唐诗》和《全唐诗外编》所用。它注明检索条目的册、卷、页数。因点校本又分平装与精装两种，卷、页虽同而册数却异。该索引在检索条目部分虽只出平装本的册数，但在《凡例》中又开列了精装本册页表，为检索精装本亦提供方便。这种编制索引的方法最可取。以四角号码检索，附笔划对照。

《全唐诗索引》 1册，史成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为检索该社出版的影印本《全唐诗》编。分《作者索引》、《篇名索引》两部分。索引条目均注明卷次、页码与栏别（因该版本每页中又分3栏），以四角号码检索，又附笔划检字。

《全唐诗索引》 这是由全唐诗索引编辑委员会主持编纂的一套大型索引，依全唐诗作者分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生成。索引正文以诗句中单字为目，下列诗句、标题、序言、注文及其异文。索引字依四角号码序排列，后附笔画检字，自1991年开始逐卷出版，现仍在出版中。

《全唐诗重篇索引》 1册，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索引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凡有重出作品的作家，均依次列入，以四角号码之序排列，末附笔画通检。

《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 1册，吴汝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编者认为唐五代诗人能在"正史"中立传者少，即或在"正史"或笔记中有零星记载者也有不少脱漏与失误处，而《全唐诗》中的交往诗实为"纪实性强"的第一手资料；另外通过对这些交往诗的研究，还可发现《全唐诗》编纂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乃编为此索引。索引收录唐五代人所有唱和、赠别、怀念、访问、宴集、谐谑、祝颂、哀挽、谣谚、酒令、应制、及述及这时期诗人的有关诗篇。有些诗题不类交往诗，但实具交往性质者，也予收录。另对一些有关的残篇断句亦收录。索引据中华书局1974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的两种《全唐诗》及相关著作编制，以人名立目，后列诗题、册、卷、页数。以四角号码序编列。书末附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颇便。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全书分上、下册，计正文 5 卷，后附 1 卷为《伪收辨证》。书中汇集唐五代传奇，一一著录书名、作者、存佚情况，并对其内容提要钩玄，详加考订，颇具功力。

《初学记索引》 1 册，许逸民编，中华书局 1980 年版。据该局 1962 年点校本编，分《事对索引》与《引书索引》，条目下注明卷次、页码，以四角号码检索，附笔划检字。

《太平广记索引》 1 册，罗锡厚、周雪瑛、马绪传等编，中华书局 1982 年版。据该局点校本而编，分《篇名索引》与《引书索引》，标示检索条目卷次、页码。以笔划顺序检索，另附四角号码表与之对照。另，哈佛燕京学社亦曾编有《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934 年版。

《太平御览引得》 1 册，聂崇歧等编，哈佛燕京学社 1934 年版。本书据清代鲍氏刻本编制，分《篇名引得》与《引书引得》，依中国字庋撷法排列，附有拼音、笔划检字。另，钱亚新编有《太平御览索引》，亦据此版本而编，仅索引"部名"和"篇名"，以四角号码检索，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册府元龟奉使部·外臣部索引》 1 册，(日)宇都宫清吉、内藤戊申编，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昭和十三年(1938)版。其检索内容包括这两部中所出现的人名、国名、地名、称号、官名、部族名、民族语及其他专有名词。依汉字笔划检索。

《唐律索引稿》 日本唐律研究会编，京都，1958 年(昭和二十三年)版，油印，检索内容不详，以日语"五十音图"与汉字四角号码检索。另有庄为斯编《唐律疏议引得》，1965 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这两部索引笔者均未寓目，此据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中国史

研究入门》(上)第398页。

《唐集叙录》 1册,万曼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是一部目录提要,著录唐人别集108家,对其版本流传、编次体例多所考订。

《唐代的行政地理》 (《唐代の行政地理》),(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版。这是对两《唐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唐六典》、《贞元十道录》等书中所载关于唐代府州郡县以及清人李兆洛所编《唐地理志韵编今释》的综合索引。书中还附《唐地理志府州图》和近人杨守敬《唐地理志图》的检索图。具体检索方式不详。按:这是由平冈武夫主编的一套大型索引之一,其中已有多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译为中文版,笔者所见者有《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李白歌诗索引》,均于1991年出版。

《六朝墓志检要》 1册,王壮弘、马成名编,上海书画社1985年版。这是一部墓志目录,依朝代先后著录东汉至隋朝的重要墓志的书体、型制、出土年代、地点和拓本存于何书等等。其中著录隋代墓志300余条。

《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1949—1989)》 荣丽华编辑,王世民校订,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著录内容包括盖称、首题、卒葬年月、志石尺寸、志文字数、撰书人、出土情况、资料来源、并注明是否发表照片或录文。

《碑帖叙录》 1册,杨震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一部碑帖目录,编者着眼于艺术,故著录上古迄宋元的碑帖近1400种。其中隋唐五代时期180余种。这些碑帖不仅有艺术价值,亦有史料价值——如褚遂良书《房玄龄碑》、颜真卿书《元结墓表等》等,故不仅是研究书法史必须参考的工具书,亦能于中检得有价值之史料。以笔划检索。

《善本碑帖录》 4卷1册,张彦生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著录秦汉至唐宋善本碑帖,其第2、3两卷收录隋唐五代者。

《**唐高僧传索引**》 3 册，(日)牧田谛亮、諏访义纯编，京都平乐寺书店 1973、1975、1976 年分别出版。有台北宗青图书公司 1986 年翻印本。本索引据日本《大正大藏经》中所收《唐高僧传》编制，上册为僧名、人名索引，中册为地名、寺名、书名索引，下册为其他专有名词(件名)索引，以日本“五十音图”检索，另附笔划检字。

《**宋高僧传索引**》 3 册，(日)牧田谛亮、藤善真澄编，平乐寺书店 1976、1977 年分别出版。有宗青图书公司 1986 年翻印本。亦据《大正经》所收本编制。上册为僧名、人名、寺名索引，中册为书名、职官名、地名索引，下册为其他专有名词索引。检索方法同上。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5 卷 1 册，陈垣撰，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是书对 35 部“考史所常用”①的佛教典籍的版本、作者、体制内容、特色及在史学上的利用诸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大都为隋唐五代人所撰或与此时期有关者。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1 册，杨殿珣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0 年版。年谱是个人的编年传记。对年谱编制者说，它应归入著作；对其他研究者来说，则可利用年谱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索引。《总录》计收 1829 人的年谱 3015 种，依谱主生年先后为序编录。作者亲见者列为正录，只见他书著录而未亲见原本者则入《待访年谱简目》。正录的第 65 页至 94 页、简目的第 435 页至 437 页为隋唐五代人物谱。全书后有《谱主姓名别名索引》，以笔划检索。80 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不少高水平的唐五代人年谱，如杨廷福的《玄奘年谱》(中华书局 1987 年版)、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 1984 年版)、卞孝萱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 1980 年版)、诸葛计的《南唐先主李昇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读者可利用《全国新书目》(月刊)进行检索。另，台湾华世出版社 1979 年版王德毅所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第 30 至 48 页亦为隋唐五代人

---

①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

物谱，内中收有些台湾学者所编之谱为《总录》未收者，如《王绩疑年录》。亦可两书参用。

《唐代史研究文献目录》 ［日］中谷英雄编，和歌山高等学校图书馆研究会昭和三十一年(1956)版。此录收录1911年至1956年中、日两国发表的关于唐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1700余种，按一般史、地理、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等18类分别排列。并附人名索引。编者于1957年又编了续目，发表于《桐荫高等学校纪要》(Ⅲ)上。

《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方积六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是自1900至1981年在中国(包括台、港)和日本所发表的有关论文和著作的目录，分总论、经济、政治、阶级关系和农民起义、民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人物、其他等10大类，大类下再分细目。每条目录注明作者(译者)、刊期等。书后附有著译者索引。

另，《中国历史年鉴》每本均有论著索引，可以配合使用。

《隋唐历史文献集释》 吴枫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本书从卷帙浩繁的隋唐史籍中选择约二百种历史文献，分九类加以题解：1. 纪传史书，2. 编年史书，3. 典制文献，4. 政法文献，5. 地理文献，6. 农杂文献，7. 佛教文献，8. 笔记小说，9. 综合类文献(史评、工具参考、类书)。对每类文献中书籍详述其撰修过程、史料来源、编纂方法、版本源流、相关著述及其价值等，颇具功力。正文附录《现存唐人著述简目》，网罗现存唐人经、史、子、集及宗教典籍等，颇有实用价值。

《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贾宪保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将有关唐代史料分为纪传、编年、典章制度、职官、仪注、法令、诏令、地理、谱牒及职官姓名、杂史、杂说、小说、诗文、类书、金石、书目、敦煌吐鲁番文书等15类，详加介绍，除内容、版本外，有些重要者还指出如何利用等。书后附书名索引，极便读者。

《〈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对两唐书的纂修过程及内容优、缺点公允评价。在《怎样读这部书》一节中，介绍了读书方法，并举出"玄武门之变"、"马嵬驿杨妃之死"二事为例，分析史料，揭出其内幕，指出其性质，极有创见。故本书篇幅虽小，却极有份量。对初学唐史者也是很好的入门之作。

（二）辞书及其他类

《**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是大百科中国历史卷断代条目选辑单行本。除了概述性条目"隋"、"唐"、"五代十国"外，另有分类条目三百多条，反映了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唐史研究水平。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周祖譔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收录作家不以卒年为据，而以《全唐诗》、《全唐文》、《全五代诗》等有关诗文总集曾收录其作品及史书传记所归属之朝代为准。条目内容包括作家生平履历、文学活动、文学成就之评价、作品佚存情况及主要资料来源五个方面。全书以姓氏笔画为序编排，书后有作者姓名、四角号码综合索引。另有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亦可参看。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 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该辞典收录国号、年号、人物、事件、地理（包括政区、山川等）、民族、官制、兵制、法制、教育、科举、铨选、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漕运、度量衡、土地、户籍等）、宗教、哲学、文学、史学、书法碑刻、绘画、音乐、舞蹈、文物古籍、典籍文献及中外交通等诸方面辞目7254条。以笔画检索。卷末附有《五代十国世系表》、《隋纪年表》、《唐纪年表》、《五代十国纪年表》、《唐代藩镇表》及《隋代全图》、《唐代全图》、《五代十国全图》。

《**通鉴地理注词典**》 1册，冯惠民等编，齐鲁书社1986年版。

该词典对《通鉴》胡三省《注》中所收地名(包括地区区域、郡国州县、山川关塞、桥梁津渡、乡戍聚邑、宫门殿阁等)列为词目。词条正文则抄录胡《注》原文,再经比较筛选,删汰重复而成,并注出引文在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册数、卷次与页码。书前是笔划检索表。实兼索引、辞书两种功能。

《唐前画家人名辞典》 1册,朱铸禹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唐宋画家人名辞典》 1册,朱铸禹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上述两部辞典正文介绍画家姓名、字号、斋名、生平、师友渊源及画法特征。以姓氏笔划检索。

《全唐诗典故词典》 2册,范之麟、吴庚舜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正文包括出典、释义、例句3部分,以笔划多少检索。另,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文学编撰的《唐诗典故辞典》1册,词目较范、吴二人主编者少,正文先引出典,再加解释和唐诗原句。以汉语拼音音序检索。

《诗词曲语辞汇释》 6卷2册,近人张相编,中华书局1953年版。收录唐宋元明时期的诗、词、曲中常用俗语辞800余个,每一语辞之下,先述今义,次列例证,略加考释。书末附笔划检索表。

《诗词曲语辞例释》 1册,王锳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作者认为张相所著尚有搜辞不备、释义不确之处,本书乃为张书"拾遗补阙"而编,收词412条,一仿张书体制。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 1册,王瑛著①,中华书局1990年版。作者感于以前诠释中古(大抵指魏晋以降至于清)俗语词多注意于韵文中语,而对散文著作中语辞缺乏研究,乃著本书。他从百余种唐宋人(包括少数六朝和金元人)的笔记等作品中选择语辞337

---

① 据《笔记汇释·前言》,本书与《例释》为同一作者。

条，为之诠解。体例亦同前两书。书中别附《备考录》，收录语义“略见端倪尚难确指”、“单词孤证而尚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可以帮助探讨说明语源”的语辞65条，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与线索。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1册，蒋礼鸿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专释敦煌变文中所见难解的俗语辞。全书依所释各辞条的义类，分为《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事为》、《释情貌》、《释虚字》6篇，计收语辞单位442个①，释词体制同前几书，但本书有笔划与四角号码两种检索系统。另有附录3种：《变文字义待质录》，汇列暂不能解之语；《敦煌变文集校记略录》和《敦煌曲子词集校议》，对王重民等人的敦煌文校释提出不同的意见。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4种关于俗语辞的著作，过去不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一般认为古代语词的难点在先秦，至多到两汉。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其实，隋唐而下的俗文学作品中的不少语词与今义已大相径庭。倘理解不确，在将其作为史料引用时也会出现不应有的错误。语言学界的专家们在这方面为史学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实应引起注意。除这里所介绍的几种外，有些训诂学著作，如郭在贻的《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也有不少有关隋唐五代史料书中语词的诠释，为读者排疑解难。兹不多举。

《敦煌文献语言词典》 蒋礼鸿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是书收辞目1526个，超过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且按汉语拼音编制目录。释义后列举敦煌文献中的用例，间或举他书资料为佐证。

《唐代的历》（《唐代の暦》）［日］平冈武夫编，昭和二十九年

---

① 每个语词单位内所包含的语词数不等，少的只释1个语词，多的至15个，但词义相近。

(195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这是一部唐代的历表，表分3栏，上栏分帝号、年号、年序、年干支、月序及大小月；中栏为日历，记日序及其干支；下栏为公元历，还包括定朔计算、日月食、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和即位改元。本书附录5种：a. 开元元年长安的日出、南中、日入时刻表；b. 长安气象；c. 年号索引；d. 年号索引检字；e. 干支编号表。是一部编纂十分精细的工具书。

《唐仆尚丞郎表》 22卷，严耕望著，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该书稿原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六，于1956年刊行。书分《通表》与《辑考》。表将唐代的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及侍郎一一列出；辑考则对任各职的一些人物的任期年限、资历等详为考订。中华本分装3册。

《唐刺史考》 47卷，喻贤皓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运用大量的资料钩沉索隐、推求分析，对有唐一代200余年的各州郡府的历任刺史(包括安史之乱时或以后藩镇自署者)的各种情况详为考订，依其任职先后之序排列。不仅将能以考出者一一著录，还纠正了旧史书中的不少错误。

《唐人行第录》 (外三种)1册，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唐人诗文中多有称呼他人以行第而不以名之例(亦有名前缀以行第者)，在当时为习惯，在后世则不知所称者为何人而致疑误。作者搜集大量唐人作品及有关唐代载籍中此类材料，以姓氏笔划为序加以编次说明。书前有笔划索引，书后有四角号码索引。本书还附有《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与《唐集质疑》3种专著，前2种已附介绍于第一节，后一种主要是作者读唐人文集时所写的考证性札记。

《史讳举例》 8卷，1册，陈垣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避讳"指"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利用其他方

法以避之"的情况①，为我国专制社会时期特有的习俗。不明此俗，往往在读古书时会闹出很大的错误。此俗虽为研究者之常识，但初学者与自学者未必全知。笔者撰写此节前曾参阅《学术指南丛书》中已出版的几部著作，均未论及此书，故介绍于此。该书前7卷71目讲避讳之通例，包括避讳方法、种类、注意事项等等，末卷11目则为各朝具体讳哪些字之例，第75至第77目为南北朝（包括隋）至五代之例。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内部发行）。本书除卷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外，隋代收图20幅，唐代25幅，五代十国12幅。每图标示古今地名，便于对照。书后附《地名索引》。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唐代の长安と洛阳》）[日]平冈武夫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分长安、洛阳两部分，收图47幅。

《唐人称谓》 牛志平、姚兆女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一部解释唐人称谓的工具书，计收词条800余个，按皇帝、后妃皇帝、官吏、百姓、亲族5类编排。每条先出例证，再加按语诠释。以书前目录检索。

《龙龛手鉴》 4卷，辽代释行均撰。这是作者为研读佛经而编的一部俗字典，又名《龙龛手镜》。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俗字"盛行，而唐代写本佛经中俗字尤多。这些俗字的字体字形与通行者差异较大，不易辨识。本书即收录写本经卷中大量的俗字与异体字，将其依偏旁部首归类分编，部首之序以平、上、去、入四声之序排列；而每部所收之字亦以此四声之序编排。每字之下，详列正体、俗体、古体、今字、异体等等，并加以简单的音义注释。因而，这是研究敦煌原始文献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现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两种

---

① 《史讳举例·序》

本子：一为1985年影印的高丽本；一为1988年出版的潘重规主编的《龙龛手鉴新编》，该本之后附有《索引》与《手鉴与敦煌写本字体相同表》，便于对照与检索。

《增订碑别字》 5卷，近人罗振鋆编辑、罗振玉校订。本书搜集自汉以来碑版上所见而字书上不载的异体字，依《佩文韵府》中的韵序编排起来。每字之下先出异体，再注出正体及异体之出处。内中多收隋唐五代时期碑文中的异体字。有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影印上虞罗氏刊本。

三、综合类论著

本节只介绍断代概述性著作、少数在学术史上曾经有过影响的有关著作。近年出版的中青年学者的力作甚多，其学术水平有的甚至已超过前辈学者，这些书除少数外一般也不在此介绍，请读者参考“著作目录”。

《隋唐五代史》 吕思勉著，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作者系老一辈学者，从20年代起即致力于中国通史研究，后逐渐转向断代。本书解放前已基本完成，但从其论黄巢题为《农民大起义》推测，解放后曾经修订过，初版时作者已去世两年。书分上、下2册，文言，其编纂结构带有明显的旧纪事本末与分类记述典制两种体例结合的意味。上册探讨政局变化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下册探讨社会组织、社会等级、经济、人民生活、政治制度与学术、宗教诸方面问题。全书取材出“正史”、《通鉴》者不多，但内容丰富、论述详细、时抒己见。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本。

《隋唐史》 岑仲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作者为隋唐史研究“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本书脱稿于1950年，系据其在中山大学授课讲义整理而成，亦为文言。书分上、下2卷(装为1册)。上卷19节讲隋史；下卷68节讲唐史。作者已力图运用唯物

史观分析历史，并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显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编纂结构与吕著不同，经济、政治、文化打成一片。注文考据史实，多精当。本书有中华书局 1982 年新版本。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著，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作者亦为隋唐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蜚声中外。本书于 1940 年脱稿，分为 8 章。首章叙论，综述全书基本观点和本书体制；末章附论，犹今之后记。中间 6 章，分别论证隋唐时期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及财政制度的“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①。其结构“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②，前章已论及者，后章不复详述，但前后实有关联。其行文则先敷陈材料，再加以自己的按释。其审核材料之眼光，推求方法之细密，别具特色。198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陈寅恪文集》之四再版，为目前最流行的版本。另，其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均为论文集，内中关于隋唐史问题者为数不少。三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0 年出版。后不详述其具体内容。

《隋唐五代史》 蓝文徵著，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作者为陈寅恪弟子。本书是作为当时的部定大学教材出版的，只出版了上编，上编分 5 章：第 1 章综论隋唐的年历、地理与民族；第 2 章论隋；第 3、4 章论唐；第 5 章论五代十国。偏重于讲政治事件。

《隋唐五代史纲要》 杨志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本书据作者在南开大学的授课讲义修订，1955 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初次出版。全书分 5 章；第 1 章论隋，第 2、3 章论唐，这 3 章内容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制度与对周边政权的关系；第 4 章专论唐代的科学文化；第 5 章论五代十国与契丹。该书特点是简明扼要、立论较为平实。作者还有一部《隋唐史通俗讲话》，通俗读

---

① 本书《附论》。

② 本书《叙论》。

物出版社 1957 年版。

《隋唐五代史》 吴枫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本书计分 6 章，将 400 余年的历史分作 4 个阶段加以论述：隋朝为第 1 阶段；公元 618 至 737 年为第 2 阶段；自 737 至唐亡为第 3 阶段；五代十国与契丹兴起为第 4 阶段。每一阶段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作综合探讨。书前绪论略谈全书要旨、简介有关文献史料，并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作了约略回顾。此外，作者与陈伯岩合著了另一部同名书，于 1984 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五代史纲》 韩国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本书据作者在厦门大学的授课讲义修订，1958 年脱稿。书的《引言》略述魏晋南北朝概况并探讨了隋统一的原因；第 1 编为隋统一至唐建国时期事；第 2、3 编为盛唐至懿宗时事；第 4 编为黄巢起义、五代十国与契丹事；末编为隋唐五代科学文化。内容较杨著、吴著为详。1977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杨著、吴著与韩著是 50 至 70 年代较有影响的几本书。

《隋唐史》 王寿南著，台湾三民书局 1986 年版。全书分 19 章；第 1、2 章为隋史；第 3 至第 12 章为唐史，侧重于政局变化的研究；第 13 至第 19 章论各项制度、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

《唐史》 章群著，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8 年第 4 版。书分 3 册，上册论唐论政治史；中册论职官、学校、科举、铨选制度；下册论经史、文学、书画、音乐、舞蹈、宗教、社会风俗、交通、中外关系等等。内容颇为详细。

《五代史略》 陶懋炳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全书分 6 章。前 4 章大体依时间脉络分阶段叙述五代十国及契丹等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第 5 章专论当时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第 6 章专论科学文化。这是自解放以来最详细的一部五代十国史专著。

《五代史话》 卞孝萱、郑学檬著，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全书

分为 6 章：首章介绍五代十国概况；以下 5 章较详细地论述政治、经济、阶级与民族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交往以及史学、文学、绘画等方面的状况。书末附有《世系表》与《大事年表》。

《唐代社会概略》 黄现璠著，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书分 4 章，论述了唐代贱民、娼妓、"劳动阶级"、"坐食阶级"的状况；又论述了唐人在舞蹈、女子化妆、戏剧、体育和婚姻方面的风俗；另外还论述了关于借贷、交通等问题。

《隋唐五代史论集》 韩国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本书收入作者自解放以来所撰写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 20 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

《汪篯隋唐史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汪篯是已故隋唐史专家，陈寅恪的弟子。本书由唐长孺、吴宗国等汇辑成编，收入汪篯关于隋唐史的论文 19 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方面。

《唐史论文集》 全宝祥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本书收入作者的 9 篇论文，其中两篇属历史理论方面，其余则是有关唐代经济、风俗等方面者。

《金石论丛》 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这是作者的遗稿，经陈达超整理后印行，共收录文章 21 篇。其中 15 篇与隋唐史相关，多为对这一时期碑刻的考校之作。

《唐史余渖》 岑仲勉著，中华书局 1960 年版。本书是对旧史书所记事考订纠误之作，计 4 卷，前 3 卷依帝王次序编排，末卷为"杂述"。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 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这也是作者的遗稿，由陈达超整理成而。书中包括 4 种作品：1.《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唐代的《尚书省郎官石记》上登录着唐代尚书省各部郎官的姓名，但它已残缺泐损。清代赵钺、劳格二人合作曾加以考订，岑氏在其基础上继续深入考校。依都省和吏、户、礼三部诸司排次（兵、工、刑三部未考）；各司之下，大体分

为阙文、备考、删补、存疑4项，各项之下考订郎官任职的时期，以其先后排列起来。2.《翰林学士壁记补注》。《重修翰林学士壁记》为唐代记载翰林学士姓名者，但向不受人重视。岑氏认为它实为治唐史之重要史源，乃考订所知翰林学士之仕履，起玄宗，止懿宗，每朝为一卷。后附相关文章3篇。3.《补唐代翰林两记》。此为补前书而作，分两卷。上卷为《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下卷系对元稹所撰《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之校补。4.《登科记考订补》。参见《史料》一节中关于《登科记考》的介绍。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本书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姊妹篇，全书分3篇。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着力论证"关中本位政策"与唐代前后期政局变化的关系；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则论证唐后期之党争源自是否科举出身或山东旧士族；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又综论周边各族兴衰与唐王朝周边政策是否成功之关系。要之，全书以"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贯穿始终。书中的基本观点对以后影响颇大。目前，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文集》之五本最为流行。另，该社于1988年出版了手稿影印本，题为《唐代政治史略稿》。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由"论魏晋时期的变化"、"论南北朝的差异"、"论唐代的变化"三部分组成。其论唐代的变化又分第一章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章门阀的衰弱和科举的兴起；第三章军事制度的变化；第四章唐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该书是唐先生积数十年研究心得之作，作者力图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形成及其在魏晋隋唐间的变化的视角，来观察中古历史运动的轨迹，成一家之言，并将对今后的魏晋隋唐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唐律初探**》 杨廷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书由7篇论文组成，内容包括对《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唐律》的社会

经济基础、阶级本质、历史渊源、自身内容及其对我国封建法律和亚洲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另外，还对如何从古代法制建设中取得某些借鉴提出了建议。

《府兵制度研究》 岑仲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书分 9 章：前三章论述府兵制的起源及西魏、东魏、北齐时期的府兵制；第 4、5 章论述隋唐时期的府兵；第 6 章系比较府兵制与契丹、蒙古兵制的异同并探讨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第 7 章论府兵制的崩溃；第 8、9 章除对府兵制进行总体评价外，又对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加以评述。

《府兵制度考释》 谷霁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书分 7 章，大体依年代之序对府兵制度从形成到衰亡的历史进行考释阐说。此外还对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与封建国家职能的关系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究。该书有 1978 年新印本。

《唐末农民战争》 胡如雷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书分 5 章：第 1 章介绍历史背景；第 2 章论裘甫、庞勋起义；第 3 章把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分作 3 个阶段加以论述；第 4 章探讨这次农民战争的游动战斗方式及其失败原因，末章论这次农民战争的意义作用。作者力图运用恩格斯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方法分析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 李剑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本书分 13 章，其中第 8 章论隋唐时期对南北朝时期经济条件、经济制度的继承，第 9 章论唐代的农业、手工业，第 10 章论唐代的商品货币关系，第 11 章论均田制的没落，第 12 章论唐代赋税，第 13 章论唐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崩溃。

《唐代经济史》 陶希圣、鞠清远著，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书分 8 章，较详细地论述了唐代田制、农业、水陆商道、都市、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财政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唐宋官私工业》 鞠清远著，新生命书店 1934 年版。本书是

作为《社会史丛书》的一种出版的，分为7章：第1章论本书的研究范围、动机与态度；第2章唐宋时期“官工业”的组织状况、劳动者及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等问题；第3章论“私工业”的组织状况；第4章论“私工业”的产品销售与“流动资本”情况；第5章综论工业的种类与生产地域；第6章论行会；第7章为全书小结。

《唐代财政史》 鞠清远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书分6章，侧重讨论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如赋税、专卖、官业税商、色役、赀课、职田与公廨田的地租收入等。另外还论述了财务行政制度。

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有蔡次群著**《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 贺昌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这部论文集共收入7篇论文，只有《汉唐间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均田制》一篇与隋唐史相关。它对隋唐时期土地制度的特点、均田制的实施条件、范围以及与其他制度（主要是府兵制）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还有一部《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一书，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是否即是本书再收入者不详。

《隋唐的均田制度》 韩国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全书分5节，论述了隋唐时期实施均田制的条件、办法、作者及其演变、破坏的过程。同时，对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也作了探讨。

《均田制的研究》 （日）崛敏一著，韩国磐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书是日本史学界研究均田制的代表作之一，完成于1957年。内容分为3篇，前两篇讨论了均田制从建立到崩溃的过程，同时涉及到赋役、租佃制度等相关问题；第3篇讨论了中国古代的身份制度与土地所有制问题。

《唐五代赋役史草》 张泽咸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是自

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探讨唐代赋役的专著。对赋税，作者除对租庸调制和两税法详加论述外，对地税、户税、资课、勾剥、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市及和买等亦一一叙及；对徭役，则将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的施行情况都作了具体的论述。作者注意将赋役问题与唐代社会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又注意对史实溯本求源，究其流变，给读者以立体感。

《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作者是当代法国权威的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本书是他在 1956 年所写的一篇博士论文，1973 年曾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文、印度经文、敦煌与其他西域文书的材料，分析了自南北朝直至五代时期中国寺院的经济状况。对于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硙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等等都作了探讨。法国学者将本书与作者的老师戴密微（P. Demieville）的《吐蕃僧诤记》并称为两大敦煌学名著。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姜伯勤著，中华书局 1987 年版。书分 5 章，较详细地探讨了敦煌寺户制度的源流演变、寺户的身份、经济地位等等。在《引言》中，还对中外学者对寺户研究的的历史进行了评述。

《隋唐五代文学史》 周祖譔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全书分 5 章，首章为绪论，其余 4 章，依隋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之序介绍各个阶段的时代特点并对作家作品分析论述。是解放后较早的一部断代文学史。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作者强调文学思想既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著作中，又从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中反映出来。只有将这两者综合起来进行总体分析，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性。据此，他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分作隋、初唐、盛唐、转折时期、中

唐、晚唐、五代等阶段，探讨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著。本书是作者“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之作，分作 6 章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作品加以笺释。其内容很少有一般的典故诠解与文句疏通，而是通过细密的考证，在论诗的过程中发掘一些重要史实。如在解说《长恨歌》及《琵琶行》的诗句时，考出古代某些宫室名号“疑皆从温汤疗疾之胡风辗转嬗蜕而来”、“吾国中古杰出之乐工亦多为胡种”等①，即关乎中西文化交流之大事。本书初版于 1950 年，但 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寅恪文集》之六，较初版本多出《校补记》多条，最善。

《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著，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作者认为，文学史著作再象“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的状况已不再适合于今日，企盼一种带有“史”的色彩的著作问世。本书便是在这一设想之下而进行的一部分基础工作，内收文 27 篇，考订了唐代 30 余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论及诗人们的创作和作品中“反映现实的某些方面”②。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孙昌武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书分 10 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理论主张及其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的主要贡献与经验。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行卷为一些应试文人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给某些有地位之人，请其向礼部侍郎推荐，以增加递卷者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本书分 9 个题目论述了行卷的风气由来、内容，行卷对唐诗、古文运动等的影响，举子与显贵对待行卷的态度以及行卷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另外，对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

---

① 《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第二章。

② 《唐代诗人丛考·前言》。

系的各种看法也进行了评论。

《**唐音佛教辨思录**》 陈允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书中收入作者“寻绎佛教唐音之交感影响，间涉梵华人文之递转形迹”方面的论文 15 篇，多精当之论。

《**李白传**》 安旗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年版。作者自己说：“这是一部文学性传记，而不是学术性传记，”因此，虽然记叙李白生平、介绍他的诗文等都是真实的，只是“某些细节则不一定实有其事”，但这又“不是任意编造，而是合理想象。”①

《**杜甫研究**》 萧涤非著，山东人民出版社版。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 1956 年，包括论文 9 篇，论述了诗人的时代、生活、思想、其作品的人民性、艺术性、体裁、影响，还有对胡适的杜诗研究之批评等等；下卷出版于 1957 年，为杜甫诗作的选注。

《**柳宗元传论**》 孙昌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书分 12 章，论述了柳宗元一生的经历、交游、政治与文学业绩。

《**杜牧传**》 缪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本书分 5 章，重在论述杜牧的“政治见解、思想情况、文学创作、交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作者文史兼精，曾撰有《杜牧年谱》，又对于如何写好人物传记有自己的见解，故这部传记很有特色。

《**唐代史学论稿**》 瞿林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本书收入作者近 10 年来研究唐代历史学的主要成果，分上、下 2 编。上篇所收论文均系总体考察唐代史学风貌者，下篇则多是对具体的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和某方面问题的论述。这部论文集不仅多处体现作者的独到见解，还填补了史学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点。

《**刘知几之史学**》 傅振伦著，北京景山书社 1931 年版。本书分为 10 章，分别讨论了刘知几撰述《史通》的动机与经过，《史通》的编次、内容、义例，后人对《史通》的评论，刘知几对待历史的精

---

① 《李白传·前言》。

神，他的史学编纂思想，以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位史学家的思想异同等等。书前还附有刘知几的生平。是一部内容详实的专著。

《史通评》 吕思勉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本书逐一评论《史通》各篇的主旨及其具体议论之得失，多精到之见。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学四种》又将其收入。

《史通平议》 张舜徽著，收入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史学三书平议》。对《史通》所论"补苴其罅漏，间自抒所见，以论列其是非"，对其中"实于后世史学有启牖之功者，则亦表而出之。"①

《史通笺记》 程千帆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作者采取"拾遗"、"订误"、"本证"、"旁征"、"穷源"、"竟委"6种方法，"贵近"、"崇实"两种态度②，对《史通》各篇详为考校。

《史通新校注》 赵吕甫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是书广泛吸收已有成果，详参现存《史通》诸版本，细为校勘，并加注释、说明以疏解《史通》诸篇，是目前整理《史通》的最新成果。

《刘知几的实录史学》 许冠三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分为8篇，讨论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渊源，在"史料学"、"撰述论"、"史评说"三方面的实录思想，又探究了"史通"对唐以后史学的影响，刘知几、章学诚的异同以及《史通》自身的矛盾等等。

《中国史学史论丛》 陈光崇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编收入论文23篇，其中有关唐五代史家、宋代以后所撰有关唐五代史籍者15篇，多有创见。

《唐代文史论丛》 卞孝萱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本书系作者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唐代小说研究的文章7篇，诗文考辨6篇、史志考校9篇，是作者30年来研究唐代文学与史学的心得所聚。

---

① 《史通平议序》。

② 《史通笺记凡例》。

《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作者为我国老一代宗教史、哲学史专家。本书系其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讲义，经汤一介整理后出版。全书计5章，论述了隋唐时期佛教势力的消长、佛经传译过程、佛教著作的编撰、佛教各宗派的创建发展以及佛教的传播等。书末附有《隋唐佛教大事年表》与《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本书的特点是资料丰富、立论平实。

《唐代佛教》 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本书系集作者一篇论文和《中国通史简编》中关于唐代佛教的章节而成，侧重于对佛教"内典"的分析批判。书中还附有张遵骝所编的一份相当详细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唐代舞蹈》 欧阳予倩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书分总论、分述2章，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论述了唐代舞蹈与舞乐的渊源及其兴衰变迁。

《唐宋帝国与运河》 全汉升著，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书分10章，考察了运河与唐宋帝国形势盛衰的关系。

《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 （日）桑原骘藏著、冯攸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桑原氏系20、30年代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本书原文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会编辑的《史学杂志》上陆续发表，1923年集为一帙。其内容系唐至元代中西交通史的史实考证。此书旧中华书局曾有陈裕菁译本，名《蒲寿庚考》(1929年版)。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作者为中西交通史专家，敦煌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本书收入他自1927至1954年间所发表过的论文23篇，其中14篇系有关唐代中西交流和敦煌学的文章。

附录：

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

中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大陆地区)

(一)著作目录

一、通论 …… 815
二、政治 …… 817
三、典章制度 …… 818
四、人物 …… 819
五、经济 …… 824
六、社会 …… 826
七、民族 …… 827
八、中外关系 …… 829
九、文化 …… 831
十、文物考古 …… 835
十一、敦煌学 …… 838

(二)论文目录

一、政治 …… 841
1. 隋的建立与隋朝政治 …… 841
2. 隋炀帝评价 …… 842
3. 隋末农民起义 …… 843

4. 唐的建立与初唐政治、唐高祖和唐太宗的评价 …………… 845
5. 武周政治及对武则天的评价 ………………………………… 850
6. 唐玄宗与开元之治 …………………………………………… 853
7. 安史之乱与藩镇形成 ………………………………………… 854
8. 宪宗、穆宗时代的政治和牛李党争 ………………………… 857
9. 唐代宦官 ……………………………………………………… 859
10. 晚唐政治和李德裕 ………………………………………… 860
11. 唐末农民起义 ……………………………………………… 861
12. 五代政治 …………………………………………………… 863
13. 唐五代西北地区的政治 …………………………………… 865
二、典章制度 ………………………………………………… 868
1. 官制 …………………………………………………………… 868
(1)中央官制 ……………………………………………………… 868
(2)地方官制 ……………………………………………………… 874
(3)选举制及其他 ………………………………………………… 875
2. 军事制度 ……………………………………………………… 878
3. 司法制度及律令格式 ………………………………………… 881
三、经济 ……………………………………………………… 884
1. 通论 …………………………………………………………… 884
2. 农业 …………………………………………………………… 886
3. 手工业 ………………………………………………………… 888
4. 商业 …………………………………………………………… 889
5. 交通 …………………………………………………………… 894
6. 财政 …………………………………………………………… 895
7. 人口、赋税 …………………………………………………… 902
8. 土地制度 ……………………………………………………… 905
四、社会生活 ………………………………………………… 911
1. 社会结构与等级身分 ………………………………………… 911

(1)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 911
(2)自耕农与客户 ………………………………………………… 913
(3)商人及工商业劳动者 ………………………………………… 913
(4)部曲、杂户、官户和奴婢 ……………………………………… 914
(5)士人 …………………………………………………………… 916
(6)寺观依附人户 ………………………………………………… 917
(7)其他 …………………………………………………………… 917
2. 家庭与婚姻 …………………………………………………… 918
3. 社会组织与社区 ……………………………………………… 920
(1)寺院 …………………………………………………………… 920
(2)社邑 …………………………………………………………… 920
4. 农村与城市 …………………………………………………… 921
5. 社会救济、慈善事业 ………………………………………… 922
6. 妇女 …………………………………………………………… 923
7. 风俗 …………………………………………………………… 923
(1)服饰 …………………………………………………………… 924
(2)饮食 …………………………………………………………… 925
(3)居住方式与家具 ……………………………………………… 926
(4)节日与风俗 …………………………………………………… 926
(5)丧葬制度 ……………………………………………………… 928
(6)民间信仰 ……………………………………………………… 929
8. 文娱体育活动 ………………………………………………… 929
(1)体育活动 ……………………………………………………… 929
(2)文娱活动 ……………………………………………………… 931
五、民族史、边疆史 ………………………………………………… 933
1. 总论 …………………………………………………………… 933
2. 高昌、丁零、铁勒 ……………………………………………… 936
3. 突厥 …………………………………………………………… 936

4. 吐谷浑 …… 938
5. 吐蕃 …… 939
6. 回鹘 …… 942
7. 于阗 …… 945
8. 渤海及东北地区各民族 …… 946
9. 南诏与南方各民族 …… 952
六、中外关系 …… 957
1. 总论 …… 957
2. 朝鲜 …… 958
3. 日本 …… 959
4. 中亚、西亚 …… 962
5. 南亚、东南亚 …… 965
七、文化史 …… 966
1. 总论 …… 966
2. 宗教 …… 967
(1)佛教 …… 967
(2)道教 …… 974
(3)西亚宗教 …… 975
3. 哲学 …… 979
4. 史学 …… 986
5. 文学(略) ……
八、文物考古 …… 989
1. 城址 …… 989
2. 墓葬 …… 992
3. 金银器 …… 997
4. 陶瓷器与窑址 …… 999
5. 其他器物 …… 1002
6. 石窑寺、造像 …… 1003

(一)著作目录

一、通　论

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　上海人民　1961年

隋唐五代史(上编)　蓝文征　国立编译馆　1964年　台湾商务重印本1970年

隋唐五代史纲要　杨志玖　上海人民　1955年

隋唐五代史(上、下)　吕思勉　上海古籍　1984年

隋唐五代史　吴枫　人民　1958年

隋唐五代史　吴枫　陈伯启　辽宁人民　1984年

隋唐五代史　唐长孺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卷断代单行本1988年

隋唐五代史(上、下)　王仲荦　上海人民　1988,1990年

隋唐史(上、下)　岑仲勉　高等教育　1957年

通鉴隋唐记比事质疑　岑仲勉　中华　1964年

剑桥中国隋唐史　(英)崔瑞德　中国杜科院历史所翻译　中国社科1991年

隋书斠议　罗振玉　五史斠议本　1903年

隋书史略　韩国磐　华东人民　1954年

《隋书》求是　岑仲勉　商务印书馆　1958年

隋史新探　金宝祥　兰州大学　1989年

新唐书斠议　罗振玉　吴兴周氏隐庐丛书本　1926年

唐代文献丛考　万斯年　开明书店　1947年

唐史余沈　岑仲勉　上海古籍　1960年

纷乱的五代十国　姚兆圣　马增祐　上海民众书店　1942年

五代史略　陶懋炳　人民　1985年

五代十国史研究　郑学檬　上海人民　1991年

南唐史　任爽　东北师大 1993 年

吴越史事编年　诸葛计　银玉珍　浙江古籍　1990 年

前蜀后蜀史　杨伟立　四川省社科　1986 年

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　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7 年

唐史研究丛稿　严耕望　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年

隋唐 五代史论集　韩国磐　三联　1979 年

寒柳堂集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 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 年

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 年

汪籛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等编　中国社科　1981 年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中国社科　1981 年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中国社科　1983 年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编　陕西人民　1983 年

唐史学会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编　陕西人民　1986 年

唐史论丛(1、2、3 辑)　史念海　陕西人民　1987 年

唐史论丛(4 辑)　史念海　三秦　1988 年

唐史论丛(5 辑)　史念海　三秦　1990 年

唐史论丛(6 辑)　史念海　三秦　1991 年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　1989 年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　1989 年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　上海古籍　1989 年

山居存稿　唐长孺　中华书局　1989 年

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台湾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　1989 年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编　三秦　1989 年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编　三秦　1991 年

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辑选　黄约瑟　三秦　1990 年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　中华　1990 年

汉唐史论稿　汪籛　北京大学　1993 年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选　严耕望　台湾联经　1991 年

唐代研究论集(第一辑)　中国唐代学会　台湾新文丰 1992 年

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　中国唐代学会　台湾新文丰　1992 年

隋唐史论集　黄约瑟　刘健明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年

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下)　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　台湾文津　1993年

汉唐史论集　赵克尧　复旦大学　1993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　武汉大学　1992年

唐研究(第一卷)　荣新江主编　北京大学　1995年

隋唐历史文献集释　吴枫　中州古籍　1987年

唐集叙录　万曼　中华 1980年

敦煌本唐集研究　张锡厚　台湾新文丰　1995年

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苏古籍　1985年

二、政　治

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　谢保成　人民　1993年

中国隋唐五代军事史　邵石　人民　1993年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年

唐代政教史　刘伯骥　台北　1954年

唐代政治史论集　王寿南　台湾商务　1977年

隋炀帝开运河　潘星南　上海民众　1942年

隋末农民起义　漆侠　华东人民　1954年

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王永兴　中华　1980年

李渊建唐史略　牛致功　陕西人民　1983年

玄武门之变　宋云彬　开明书店　1937年

贞观政要评注　叶光大等　四川人民　1987年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汪篯　求实　1987年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　陕西人民　1982年

贞观之治新探:唐太宗政绩兴与衰　陈志贵　辽宁人民　1991年

武则天时代　王涤非　厦门大学　1992年

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　王永兴　中国社科　1994年

唐代藩镇研究　张国刚　湖南教育　1987 年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张泽咸　中华(上海)　1979 年
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　李斌城　人民　1981 年
唐末农民战争　胡如雷　中华书局　1979 年
黄巢　赵国华　黑龙江人民　1982 年
黄巢起义考　方积六　中国社科　1983 年
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　谢重光　台湾文史哲　1994 年

三、典章制度

唐代官制　张国刚　三秦 1987
隋唐制度源渊略论稿　陈寅恪　中华　1977 年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　张国刚　台北文津　1994 年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二卷　罗振玉　上虞罗氏　七经堪丛刊本　1937 年
三省制略论　王素　齐鲁书社　1986 年
唐仆尚丞郎表　严耕望　中华　1986 年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岑仲勉　上海古籍　1984 年
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　孙国栋　香港龙门书店　1978 年
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　谢元鲁　台湾文津　1992 年
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袁刚　台湾文津　1994 年
汉唐职官制度之研究　陈仲安、王素　中华　1993 年
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　赵汝东　台湾文史哲　1992 年
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二)——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　赵汝东　台北文史哲　1994 年
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李治安主编　南开大学　1996 年
唐代地方行政史　黄绶　北京永华印书局　1927 年
唐代的科举制度　方瑜　中山大学　1933 年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吴宗国　辽宁大学　1992 年
唐代贡举制度　阎文儒　陕西人民　1989 年

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　刘海峰　台湾文津　1991 年
唐勾检制度研究　王永兴　上海古籍　1991 年
唐代御史制度研究　胡沧泽　台湾文津　1993 年
隋律研究　倪正茂　法律　1987 年
唐律通论　徐道邻　重庆中华　1944 年
唐律疏议　(唐)长孙无忌　刘俊文点校注释　中华　1983 年
唐律初探　杨廷福　天津人民　1985 年
唐律研究　乔伟　山东人民　1985 年
唐律译注　钱大群　江苏古籍　1988 年
唐律新探　王立民　上海社科　1993 年
唐代司法制度——唐六典选注　汪潜编注　法律　1988 年
唐令拾遗　仁井田升　栗劲、霍存福译　长春　1989 年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刘俊文　中华　1989 年
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　王震亚　赵荧　甘肃人民　1993 年
唐书兵制笺证　唐长孺　科学　1957 年
府兵制度研究　岑仲勉　上海人民　1957 年
府兵制度考释　谷霁光　上海人民　1962 年
唐方镇年表　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
唐方镇年表八卷　考证二卷　吴廷燮　二十五史补编本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　戴伟华　天津古籍　1994 年
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简明本)　程喜霖　三秦　1990 年
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全本)　程喜霖　台湾联经　1991 年
唐刺史考(1—5)　郁贤皓　江苏古籍　1987 年
唐代行军制度研究　孙继民　台北文津　1995 年
唐宋大典考　王国维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1940 年
中国僧官制度史　谢重光　白文固　青海人民　1990 年

四、人　物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傅璇琮等　中华书局　1982 年

隋唐人物　夏云川　上海人民　1987 年
隋唐人物述评　牛致功　赵文润　陕西师范大学　1989 年
唐宋名相传　匡继先　浙江教育　1992 年
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著　巴蜀书社　1987 年
唐代女诗人　陆晶清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年
隋炀帝　韩国磐　湖北人民　1957 年
隋炀帝　庄宏安　江西人民　1981 年
隋炀帝评传　韩隆福　武汉大学　1992 年
隋炀帝传　胡沧泽　台湾国际文化社　1993 年
隋炀帝新传　胡戟　上海人民　1995 年
唐太宗　张仲寰　刘逸青　中华　1936 年
李世民　李旭　重庆青年　1945 年
唐太宗　何天行　中华　1948 年
唐太宗新传　徐亮之　香港九龙自由出版社　1955 年
唐太宗传　袁英光　王界云　天津人民　1984 年
唐太宗传　赵克尧　许道勋　人民　1984 年
唐太宗李世民　黄永年　上海人民　1987 年
李世民传　胡如雷　中华　1984 年
高宗与武则天　廖彩深　陕西人民　1988 年
女皇武则天　徐素　香港中华　1988 年
论武则天　熊德基　吉林人民　1979 年
武则天传(二册)　(日)原百代著　伟君节译　陕西人民　1986 年
女皇武则天　吴枫　常万生　辽宁教育　1986 年
武则天本传　胡戟　三秦　1986 年
武则天与乾陵　张玉良　胡戟　三秦　1987 年
女皇帝武则天　郁贤皓　方义兵　上海人民　1987 年
武则天传　何磊　云南大学　1992 年
武则天新传　杨剑弘　武汉大学　1993 年
武则天评传　赵文润　王双怀　三秦　1993 年
武则天与洛阳　武则天研究会等　三秦　1988 年
武则天与文水　阎守诚主编　山西人民　1989 年

则天武后　(日)泽田端惠　李天送译　三秦　1989 年
唐玄宗　黄甄　香港中华　1959 年
唐明皇传　袁英光　王界云　天津人民　1987 年
唐玄宗　阎守诚　吴宗国　三秦　1991 年
唐明皇　田廷柱　辽宁人民　1992 年
唐玄宗传　许道勋　赵克尧　人民　1993 年
唐宪宗　赵文润　拜根兴　三秦　1993 年
周世宗实录　缪荃孙　江阴缪氏烟鱼东堂小品本　1920 年
柴荣　韩国磐　上海人民　1956 年
周世宗　陈开树　王一川　中华书局　1981 年
周世宗柴荣　李小树　黄蒙岳　上海人民　1987 年
南唐先主李昪年谱　诸葛计　江苏古籍　1987 年
李后主　杨荫浮　商务　1935 年
窦建德和刘黑闼　高昭一　山东人民　1956 年
魏徵　吴枫　黑龙江人民　1979 年
魏徵　宋国柱　中华　1980 年
唐名相魏徵　申建国主编　中国社科　1993 年
薛仁贵　黄约瑟　西北大学　1995 年
文成公主与金成公主　黄次书　中华　1947 年
文成公主　万绳楠　中华　1959 年
郭子仪　孙毓修　商务　1926 年
郭子仪　尹慧如　香港中华　1958 年
郑虔研究　王晚霞主编　浙江古籍　1990 年
李德裕年谱　傅璇琮　齐鲁书社　1984 年
刘晏评传　鞠清远　商务印　1937 年
骆宾王研究论文集　浙江省古代文学研究会　杭州大学　1993 年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沈惠乐　钱伟康　上海古籍　1987 年
陈子昂评传　韩理洲　西北大学　1987 年
陈子昂研究　韩理洲　上海古籍　1988 年
陈子昂研究论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年
王维与孟浩然　王从仁　上海古籍　1983 年

王维研究(上) 庄申 香港万有图书公司 1971年
王维传 卢渝 山西人民 1989年
高适与岑参 周勋初 姚松 上海古籍 1994年
高适传论 左云霖 人民文学 1985年
张九龄研究论文选集 王镝非 广东高等教育
李白 王瑶 华东人民 1954年
李白研究 王运熙 作家 1962年
李白研究论文集 中华书局编 中华1964年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 人民文学 1972年
李白 王运熙 上海古籍 1979年
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林曼叔 九龙新源 1974年
杜甫传 冯至 人民文学 1952年
杜甫研究(上、下) 肖涤非 山东人民 1956—1957年
杜甫 缪钺 四川人民 1961年
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中华 1962年
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三辑) 中华 1963年
杜甫评传 陈贻焮 上海古籍 1982年
杜甫诗论 傅庚生 上海古籍 1985年
杜甫诗论丛 金启华 上海古籍 1985年
杜甫论集 傅庚生 傅光 黑龙江人民 1986年
杜甫传 万曼 河南大学 1993年
韩柳欧苏古文论 陈幼石 上海文艺 1983年
韩愈资料汇编 吴文治 中华 1953年
韩愈 刘国盈 北京 1979年
柳宗元评传 吴文治 中华 1962年
柳宗元简论 吴文治 中华 1979年
柳宗元传论 孙昌武 人民文学 1982年
张籍研究 作亮 黄山书社 1986年
白居易传 王拾遗 陕西人民 1983年
元稹传 王拾遗 宁夏人民 1985年
刘禹锡 卞孝萱等 上海古籍 1980年

刘禹锡及其作品　芦荻　朱帆　时代文艺　1985 年
刘禹锡传论　吴汝煜　陕西人民　1988 年
刘禹锡丛考　卞孝萱　巴蜀书社　1988 年
贾岛研究　章泰笙　正中书局　1947 年
李贺研究资料　陈治国　北京师大　1983 年
李贺　吴企明　上海古籍　1985 年
杜牧评传　王西平　张田　陕西人民　1987 年
杜牧论稿　吴在庆　厦门大学　1991 年
李商隐研究　吴调公　上海古籍　1982 年
李商隐　郁贤皓　李易安　上海古籍　1985 年
王通论　尹协理　中国社科　1984 年
玄奘　杨廷福　上海人民　1985 年
玄奘论集　杨廷福　齐鲁书社　1986 年
玄奘年谱　杨廷福　中华　1988 年
鉴真　王金林　上海人民　1979 年
鉴真　汪向荣　吉林人民　1979 年
鉴真　许凤仪　江苏人民　1979 年
鉴真和尚东渡记　孙慰民　上海古籍　1979 年
鉴真　吾间　文物　1980 年
博极医源的孙思邈　赵健雄　郭志　中国科技　1989 年
药王孙思邈　赵石麟主编　陕西科技　1990 年
唐代天文学家张遂　李迪　上海人民　1990 年
茶神陆羽　傅树勋　农业　1984 年
颜真卿　吴慧　中华　1979 年
颜真卿传　朱关田　上海书画社　1990 年
展子虔　王伯敏　上海人民美术　1958 年
阎立德与阎立本　何乐之　上海人民美术　1960 年
吴道子　王伯敏　上海人民　1981 年
韩幹·戴嵩·何乐之　上海人民美术　1960 年
徐熙和黄筌　邓白　上海人民美术　1958 年
张萱和周昉　徐邦达　人民美术　1959 年

周昉　王伯敏　上海人民美术　1958 年
王仙芝和黄巢　赵俪生　山东人民　1956 年

五、经　济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　李剑农　中华　1963 年
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　武金铭　人民　1994 年
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全二册)　王永兴　中华　1987 年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韩国磐　甘肃人民　1982 年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　唐耕耦　陆宏基　北京书目文献　1986—1990 年
敦煌经济文书导论　王永兴　台湾新文丰　1994 年
唐代经济史　陶希圣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隋唐五代财政史　蔡次薛　中国财经　1990 年
唐代财政史　鞠清远　长沙商务　1940 年
唐代财政史新编　陈明光　中国财经　1990 年
唐代财政史稿(上)(1—3 册)　李锦绣　北京大学　1995 年
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　谭英华　四川大学　1988 年
《旧唐书·食货志》笺证　潘镛　三秦　1990 年
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度和均田制　贺昌群　上海人民　1958 年
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　贺昌群　上海人民　1964 年
隋唐的均田制度　韩国磐　上海人民　1957 年
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　韩国磐　上海人民　1984 年
均田制度的研究　(日)崛敏一　韩国磐等译　福建人民　1984 年
均田制新探　杨际平　厦门大学　1991 年
均田制研究　武建国　云南人民　1992 年
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度的研究　宋家钰　中州古籍　1988 年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池田温(中译本)　中华　1987 年
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　周国林　华中师大　1993 年
唐五代赋役史草　张泽咸　中华　1986 年

中国赋役制度史　郑学檬主编　厦门大学　1994年
唐朝仓廪制度初探　张弓　中华　1986年
唐代国库制度　葛承雍　三秦　1990年
唐代盐政　陈衍德　杨权　三秦　1991年
唐宋官私工业　鞠清远　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4年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下)　(日)加藤繁　三联　1959年
唐代的工商业　张泽咸　中国社科　1995年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　卢华语　首都师大　1995年
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　冻国栋　武汉大学　1990年
唐宋贸易港研究　(日)桑原骘藏　杨炼译　商务印书馆　1925年
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　武育幹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　刊本　1935年
唐代之交通　鞠清远　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院　北京大学　1944年
唐宋帝国与运河　全汉升　重庆商务　1944年
大运河的变迁　绍华　江苏人民　1957年
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　潘镛　三秦　1987年
寺院经济　鞠清远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印　1993×年
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谢和耐著,耿升译　甘肃人民　1987年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北师大　1986年
唐代四川经济　李敬洵　四川社科　1988年
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武汉大学　1988年
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　牟发松　武汉大学　1989年
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　西南师范大学　1989年
古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　三秦　1989年
四时纂要校释　缪启愉　农业　1981年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李伯重　农业　1990年
隋唐五代货币　陈源、姚世泽、蒋其祥　上海古籍　1991年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　郭正忠　中国社科　1993年

六、社 会

唐代社会概略　黄现璠　商务　1935 年

唐初政区与人口　翁俊雄　北京师院　1990 年

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　翁俊雄　首都师大　1995 年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冻国栋　武汉大学　1993 年

唐人年寿研究　李燕捷　台北文津　1994 年

唐代奴婢制度　李季平　上海人民　1986 年

唐代敦煌寺户制度　姜伯勤　中华　1987 年

唐代文苑风尚　李志慧　陕西人民　1988 年

中古文人生活　王瑶　上海棠棣　1951 年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郭绍林　河南大学　1987 年

唐人行第考　岑仲勉　中华　1962 年

隋唐士族　田适柱　三秦　1990 年

唐人称谓　牛志平、姚兆女　三秦　1987 年

唐代妇女　高世瑜　三秦　1988 年

唐人风俗　王家广　陕西人民　1993 年

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　臧荣、王宏凯　人民　1994 年

敦煌婚姻文化　谭蝉雪　甘肃人民　1993 年

敦煌社会文书导论　姜伯勤　台北新文丰　1992 年

敦煌民俗学　高国藩　上海文艺　1989 年

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　高国藩　河海大学　1989 年

敦煌民俗研究　谢生保主编　甘肃人民　1995 年

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中国民俗探微　高国藩　河海大学　1993 年

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赵和平　台北新文丰　1993 年

唐五代书仪研究　周一良　赵和平　中国社科　1995 年

唐代游艺　王永平　西北大学　1995 年

唐代体育　潘孝伟　西北大学　1995 年

唐代酒令艺术　王昆吾　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1995 年

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　周峰　北京燕山　1987 年

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　李明伟　甘肃人民　1994年

七、民　族

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　丁谦　浙江图书馆　1915年

新唐书突厥、吐蕃、回纥、沙陀、北狄、东夷、南蛮地理考证·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丁谦　浙江图书馆　1915年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　丁谦　浙江图书馆　1915年

两汉迄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民族研究　苏庆彬　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7年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　三联　1957年

隋唐时西域人华化考　(日)桑原骘藏　何健民译　中华　1939年

吐鲁番的古代文明　王炳华　新疆人民　1990年

唐代蕃将　马弛　三秦　1990年

汉唐和亲研究　崔明德　青岛海洋大学　1991年

突厥集史　岑仲勉　中华　1958年

突厥史　林幹　内蒙古人民　1988年

突厥史　薛宗正　中国社科　1992年

西突厥史料　(法)沙畹著　冯承钧译　中华　1958年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岑仲勉　中华　1958年

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上下册)　林幹　中华　1987年

丁零、高车和铁勒　段连勤　三秦　1988年

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　耿世民　台湾新文丰　1994年

五代回鹘史料　(法)J·R·哈密顿　耿升、穆根来译　新疆人民　1986年

两唐书回纥传疏证　刘美崧　中央民族学院　1989年

唐宋回鹘史论集　程溯洛　人民　1994年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　冯家声、程溯洛、穆文广　民族　1981年

于阗史丛考　张广达、荣新江　上海书店　1993 年
隋唐时期的薛延陀　段连勤　三秦　1988 年
吐谷浑资米辑录　周伟洲主编　青海人民　1992 年
吐谷浑史　周伟洲　宁夏人民　1988 年
吐谷浑史入门　周伟洲　青海人民　1988 年
吐谷浑资料辑录　周伟洲主编　青海人民　1992 年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韩荫晟　宁夏人民　1983 年
唐代党项　周伟洲　三秦　1988 年
党项史研究　白滨　吉林教育　1990 年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王忠　科学　1958 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王尧、陈践　民族　1980 年
通鉴吐蕃史料　苏晋仁辑　四川民族　1981 年
《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　苏雷云编　四川民族　1981 年
吐蕃金石录　王尧、陈践　文物　1982 年
藏族史料集(一)　陈燮章等　四川民族　1982 年
敦煌吐蕃文献选　王尧、陈践　四川民族　1983 年
西藏王臣史　郭和卿译　民族　1983 年
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王尧主编　甘肃人民　1983 年
吐蕃僧诤记　(法)戴密微著　耿升译　甘肃人民　1984 年
青史　郭和卿译　甘肃人民　1985 年
新纪史　黄颢译注　西藏人民　1986 年
汉藏史集　陈庆英译　西藏人民　1986 年
吐蕃史　安应民　宁夏人民　1989 年
唐蕃古道　陈小平　三秦　1989 年
唐蕃古道考察记　卢耀光主编　陕西旅游　1989 年
吐蕃文化　王光　吉林教　1990
渤海国记三卷(附校录一卷)　黄维翰撰　金毓黻校录　辽海书社 1931 年
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　金毓黻　辽阳金氏千华山馆　1934 年
渤海史考　津田左右吉著　陈清泉译　长沙商务　1938 年
渤海简史　王承礼　黑龙江人民　1984 年

渤海国　李殿福、孙玉良　文物　1987年
渤海史入门　杨保隆　青海人民　1988年
渤海历史与文化　王承礼、刘振华主编　延边人民　1991年
渤海史料全编　孙玉良　吉林文史　1992年
契丹史略　张正明　中华　1979年
室韦史研究　孙秀仁等　1985年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尤中　云南人民　1979年
南诏史活　尤中　云南人民　1957年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马长寿　上海人民　1961年
蛮书校注　(唐)樊绰撰　向达校注　中华　1962年
新唐书南诏传笺注　王忠　中华　1963年
大理古文化史稿　徐嘉瑞　中华　1978年
南诏史论丛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　1986年
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　(美)查尔斯·迈克斯　林超民译　云南人民　1988年
西南民族史研究　尤中　云南人民　1987年
南诏大理国军事史略　邓承礼　云南人民　1988年
南诏文化论　杨仲录等　云南人民　1991年
唐人云南史料辑抄　袁任远　赵鸿昌　云南人民　1989年

八、中外关系

中外交通小史　向达　商务　1930年
中外交通史　陈佳荣　香港学津书店　1987年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　高等教育　1993年
天涯若彼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张广达　王小甫　香港中华　1988年
丝绸之路　杨建新　芦苇　甘肃人民　1981年
丝绸之路　(法)L·布尔努瓦　耿升译　新疆人民　1982年

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　赵丰　三秦　1992年
丝路文化·沙漠卷　黄新亚　浙江人民　1993年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法)玛海扎　中华　1993年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常任侠　上海文艺　1981年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中州古籍　1992年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王炳华　新疆人民　1994年
唐代的外来文明　(美)谢弗、吴玉贵译　中国社科　1995年
西域文化史　(日)羽田亨　耿世民译　新疆人民　1981年
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常任侠　海洋　1985年
日中文化交流史　木宫泰彦著　胡锡年译　商务　1980年
日中交流二千年　藤家礼之助著　张俊彦等译　北京大学　1982年
唐代日人来长安考　张鹏一　西安秦风周报社　1937年
遣唐史——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姚嶂剑　陕西人民　1984年
遣唐史　武安隆　黑龙江人民　1985年
日本遣唐使简史　池步洲　上海社科　1983年
奈良文化与唐代文化　王金林　日本东京六兴出版社　1988年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白化文　石家庄花山文艺　1992年
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　汪向荣　长沙岳麓书社　1985年
鉴真和尚东渡记　孙蔚民　上海古籍　1979年
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　罗香林　香港中国学社　1960年
大唐西域记　章巽校点　上海人民　1977年
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　向达辑　中华　1981年
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周连宽　中华　1984年
大唐西域记校注　季羡林等　中华 1985年
玄奘年谱　杨廷福　中华 1988年
大唐西域记导读　章巽　芮伟明　巴蜀书社　1990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孙毓堂　谢芳　中华 1983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王邦维　中华　1988年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　王邦维　中华 1995年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张毅　中华　1994年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劳费尔著　林筠因译　商务　1964年

经行记笺注　张一纯　中华书局　1963年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　北京大学　1992年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季羡林　台湾新文丰　1993年

九、文　化

汉唐文化史　熊铁基　湖南　1992年

唐代文化史研究　罗香林　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年

隋唐文化史　赵文润主编　陕西师大　1992年

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　台北文史哲　1991年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上海人民　1994年

隋唐五代的儒学　程方平　云南教育　1991年

唐代后期的儒学　张跃　上海人民　1994年

史通评　吕思勉　商务　1934年

刘知几之史学　傅振论　景山书社　1931年

史通笺记　程千帆　中华　1980年

隋唐五代史学　谢保成　厦门大学　1994年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牛致功　陕西师范大学　1989年

唐代史学论稿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　1990年

《史通》理论体系研究　赵俊　辽宁大学　1992年

唐代的州和道　程志、韩滨娜　三秦　1987年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郑炳林　甘肃教育　1989年

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王仲荦、郑宜秀　上海古籍　1993年

唐代的行政地理　(日)平冈武夫、市原考吉　上海古籍　1990年

唐代的长安和洛阳　平冈武夫　上海古籍　1990年

隋唐两京丛考　辛德勇　三秦　1991年

唐代扬州史考　李廷先　江苏古籍　1992年

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　(日)前田正名　中国藏学　1993 年

中国隋唐五代艺术史　刘士文　人民　1993 年

隋唐燕乐调研究　(日)林谦三著　郭沫若译　上海商务　1936 年、1955 年

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　岸边成雄著　梁在平、黄志炯译　台湾中华　1973 年

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　杨旻纬　台北文史哲　1993 年

郭煌曲　饶宗颐　法国科学研究院　1971 年

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　叶栋　人文丛刊编辑委员会　1985 年

唐戏弄(上、下册)　任半塘　作家　1958 年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　《新疆艺术》编辑部编　新疆人民　1985 年

郭煌琵琶曲谱　叶栋　上海文艺　1986 年

唐代绘画史　滕固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3 年

唐宋的绘画　金原省吾著　傅抱石译　商务　1935 年

唐五代宋元名迹　谢稚柳　古典文学　1957 年

唐宋绘画史(校订本)　滕固　中国古典艺术　1958 年

唐宋绘画谈丛　童书业　中国古典艺术　1958 年

唐宋元明清画选　上海人民美术　1960 年

敦煌书法艺术　沃兴华　上海人民　1994 年

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　张奎元　人民　1993 年

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　冯晓林　人民　1993 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　周祖漠　福建人民　1958 年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　史仲文　人民　1994 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　(上、下)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　高等教育　1994 年

唐代文学史　陈子展　重庆作家书屋　1944 年

五代文学　杨荫深　商务　1935 年

唐宋文学论集　王水照　齐鲁书社　1984 年

中古文学思想　王瑶　上海棠棣　1951 年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上海古籍　1986 年

隋唐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　重庆商务　1943 年　1947 年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　商务　1945 年

唐代的战争文学　胡云翼　商务　1927年
唐代底劳动文艺　孙俍工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2年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上海古籍　1980年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陕西人民　1986年
唐代文学与佛教　孙昌武　陕西人民　1985年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想　蒋述卓　江西人民　1990年
唐代幕府与文学　戴伟华　北京现代　1990年
唐代诗学　杨启高　重庆正中书局　1943年
唐诗通论　刘开杨　四川人民　1981年
唐诗学引论　陈伯海　知识　1988年
唐诗学引论　郭杨　广西人民　1989年
唐诗研究　胡云翼　商务　1930年
唐诗杂论　闻一多　北京古籍　1956年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年
唐诗小札　刘逸生　广东人民　1961年
唐诗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　1959年
唐诗论文集　刘开扬　中华　1961年
唐诗研究论集　存萃学社　香港崇文书店　1971年
唐诗论丛　陈贻焮　湖南人民　1980年
唐诗答客难　张天健　学苑　1990年
王梵志诗校辑　张锡厚　中华　1983年
王梵志诗研究汇录　张锡厚辑　上海古籍　1990年
王梵志诗校注　项楚　上海古籍　1992年
敦煌僧诗校辑　汪泛舟　甘肃人民　1994年
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　霍松林主编　陕西人民　1984年
唐诗风格美新探　王明居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年
唐绝句史　周啸天　重庆　1987年
秦妇吟研究汇录　颜廷亮　赵以武辑　上海古籍　1990年
敦煌歌辞编　任半塘　上海古籍　1987年
唐宋词论丛　夏承焘　中华　1962年
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　浙江古籍　1987年

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　殷光熹　云南教育　1993 年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　刘国勇　陕西人民　1988 年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孙昌武　百花文艺　1984 年
唐宋古文运动　钱冬父　中华　1962 年
韩愈及其古文运动　龚书炽　商务　1945 年
韩愈散文艺术论　孙昌武　南开大学　1986 年
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　张长弓　上海商务　1951 年
唐人传奇　李宗为　中华　1985 年
唐代小说研究　刘开荣　上海商务　1955 年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　李剑国　南开大学　1993 年
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　杨公骥　吉林人民　1962 年
敦煌文学　张锡厚　上海古籍　1980 年
敦煌文学论文集　王庆菽　吉林大学　1987 年
敦煌文学作品选　周绍良主编　中华　1987 年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　北京大学　1988 年
敦煌文学概论　颜廷亮主编　甘肃人民　1993 年
敦煌文学　颜宙主编　甘肃人民　1989 年
敦煌说唱学概论　张鸿勋　台北新文丰　1993 年
敦煌曲子词集　王重民辑　商务　1950 年
敦煌曲初探　任二北　上海文艺联合　1954 年
郭煌曲子词欣赏续集　高国藩　南京大学　1992 年
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　张鸿勋　台北新文丰　1993 年
敦煌变文集　王重民等　人民文学　1957 年
敦煌变文述论　邱镇京　台湾商务　1970 年
敦煌变文集补编　周绍良　白化文　李鼎霞　北京大学　1989 年
敦煌变文集校议　郭在贻　张涌泉　黄征　岳麓书社　1990 年
敦煌赋校注　伏俊连　甘肃人民　1994 年
瀛涯敦煌韵辑　姜亮夫　上海出版公司　1955 年
唐五代韵书集存　周祖漠　中华　1983 年
简明汉唐哲学史　孙实明　黑龙江人民　1981 年

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　任继愈　人民　1994年
文中子考信录　汪吟龙　商务　1926年
文中子真伪汇考　王立中　商务　1938年
玄奘论集　杨廷福　齐鲁书社　1986年
玄奘哲学研究　田光烈　学林　1986年
玄奘论集　杨廷福　齐鲁书社　1986年
柳宗元哲学选集　侯外庐等　中华　1964年
中国隋唐宗教史　深鸿飞　人民　1994年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任继愈　人民　1987年
汉唐佛史探真　谭世保　中山大学　1991年
汉唐佛教社会史论　谢重光　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0年
隋唐佛教　郭朋　齐鲁书社　1980年
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　中华　1982年
唐代佛教　范文澜　人民　1979年
唐音佛教辨思录　陈允吉　上海古籍　1988年
坛经校释　郭朋　中华　1983年
摩尼经残卷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　蒋斧　诵芬室敦煌石室遗书本　1907年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　商务　1931年
古代摩尼教　林悟殊　商务　1983年
摩尼教及其东渐　林悟殊　中华　1987年
古代摩尼教艺术　克里木凯特著　林悟殊译　台北淑馨　1995年
景教碑考　冯承钧　商务　1913年
唐代基督教之研究　龚天民　香港基督教辅侨　1960年
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　朱谦之　北京东方　1992年
唐元二代之景教　罗香林　香港中国学社　1966年

十、文物考古

隋唐考古　秦浩　南京大学　1992年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向达译　中华　1936年、1946年
亚洲腹地旅行记　(瑞典)斯文赫定　李述礼译　开明书店　1934年
中国西部考古记　(法)色伽兰　冯承钧译　中华　1955年
西域考古记举要　(法)郭鲁柏　冯承钧译　中华　1957年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黄文弼　科学　1958年
三门峡漕运遗迹　中科院考古所　科学　1959年
唐长安大明宫　中科院考古所　科学　1959年
西安郊区隋唐墓　中科院考古所　科学　1966年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　中科院考古所　文物　1980年
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三秦　1993年
隋唐东都含嘉城　余扶危　贺官保　文物　1983年
法门寺与地宫文物　雒长安　陕西人民　1988年
法门寺地宫珍宝　石兴邦　陕西人民　1988年
法门寺与佛教文化　柏明　陕西师大　1988年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　人民文学　1984年
唐李贤墓壁画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4年
唐李重润墓壁画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4年
佛光寺和大云院唐代壁画　山西省古建保护研究所　文物　1983年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　社科院考古所　辽宁美术　1990年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　新疆博物馆等　文物　1973年
唐宋铜镜　沈从文　中国古典艺术　1958年
唐代金银器　镇江市博物馆　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　1985年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韩伟　三秦　1989年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4)隋唐雕塑　史岩主编　人民美术　1988年
唐代雕塑选集　王子云　朝花美术　1955年
中国雕塑史册(第五卷)　唐陵石雕艺术　王鲁豫编　学苑　1989年
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　1958年
洛阳唐三彩　洛阳市博物馆编　文物　1980年
中国陶塑·唐三彩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　上海人民美术　1988年
千唐志斋藏志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文物　1984年
唐代墓志汇编附考(1—18)　毛汉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1991年
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 周绍良 上海古籍 1992年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共九卷) 张宁生等 天津古籍 1991年
龙门石窟 龙门文物保管所 文物 1980年
龙门石窟艺术 宫大中 上海人民 1981年
剑川石窟 陈兆夏 云南人民 1980年
表积山石窟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 甘肃人民 1981年
麦积山石窟 严文儒 甘肃人民 1984年
延安石窟艺术 靳之林 人民美术 1982年
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石窟 新疆博物馆 新疆人民 上海美术 1990年
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 甘肃省博物馆 庆阳北石窟保管所 文物 1984年
须弥山石窟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 文物 1988年
大足石窟艺术 黎方银 重庆 1990年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 日本平凡社 1981、1984,1987年
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炳灵寺文物保管所 文物 1989年
中国石窟·库木吐拉石窟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库车县文保所 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 日本平凡社 1985年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 日本平凡社 1989年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文物 1989年
中国石窟·龙门石窟(1—2),龙门文物保管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文物 日本平凡社 1991,1992年
安阳修定寺塔 湖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 1983年
宝山灵泉寺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河南人民 1991年
敦煌建筑研究 萧默 文物 1983年

十一、敦煌学

敦煌　向达等　学习书店编辑部编　北京　1951 年

敦煌掇琐　刘复　中科院考古所　1957 年

敦煌资料(第一辑)　中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　中华　1961 年

敦煌古籍叙录　王重民　中华　1979 年

敦煌宝藏(140 册)(该书为大型敦煌写本影印本)　黄永武　台湾新文丰　1982—1986 年

敦煌丛刊(初集)(16 册)　台湾新文丰　1985 年

敦煌学述论　刘进宝　甘肃教育　1991 年

中国敦煌学史　林宗平　宁强　罗华庆　北京语言学院　1992 年

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宁可　郝春文　新华　1993 年

敦煌学入门　胡同庆　罗华庆　甘肃人民　1994 年

敦煌史话　胡戟　傅玫　中华　1995 年

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文物研究所　甘肃人民　1982 年

敦煌学论文集(上集)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教研室　兰州大学图书馆　1983 年

敦煌遗书论文集　王重民　中华　1984 年

敦煌学论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甘肃人民　1985 年

敦煌学译文集　姜镇庆　那向芹　甘肃人民　1985 年

敦煌译丛(第一辑)　(法)戴密微著　耿升译　甘肃人民　1985 年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下))　敦煌文物研究所　甘肃人民　1987 年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　敦煌文物研究所　甘肃人民　1987 年

敦煌学论文集　姜亮夫　上海古籍　1987 年

敦煌学研究・胡同庆论文集　甘肃人民　1994 年

敦煌文献语言词典　蒋礼鸿主编　杭州大学　1994 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唐长孺主编　武汉大学　1983 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沙知　孔祥星　甘肃人民　1984 年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　中华 1982 年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二)(三)(四)(五)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1983,1986,1989,1992 年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王重民　台北明文书店　1986 年

敦煌吐鲁番文集　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编　1988 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唐长孺主编　武汉大学　1990 年

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　汉语大词典　1990 年

丝路访古　丝绸之路考察队　甘肃人民　1983 年

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　李明伟　甘肃人民　1994 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姜伯勤　文物　1994 年

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英)霍普科克　杨汉章译　甘肃人民　1983 年

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　杨建新　马曼丽　河南人民　1983 年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敦煌研究院　文物　1986 年

俄藏敦煌文献　上海古籍　1994 年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上海古籍　1994 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　国家文物局长文献研究室等　文物　1981—1991 年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　郭锋　甘肃人民　1993 年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　陈国灿　武汉大学　1995 年

英藏敦煌文献(15 卷)　四川人民　1990 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1—1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文物　1981—1991 年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版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　郭锋　甘肃人民　1993 年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　陈国灿　武汉大学　1995 年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中华书局　1983 年

敦煌学论著目录　刘进宝　甘肃人民　1985 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目录索引　卢焕善　师勤　陕西社科　1985 年

新疆吐鲁番论著目录初编(西文部分) 敦煌吐番学北京资料中心 1988年

敦煌学目录初探 白化文 杨宝玉 河北人民 1989年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荣新江 台湾新文丰 1994年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史岩 前敦煌艺术研究所 华西大学博物馆 1947年 台北新文丰 1988年

敦煌艺术叙录 谢稚柳 古典文学 1957年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敦煌文物研究所 文物 1982年

敦煌莫高窟艺术 潘絜兹 上海人民 1957年

郭煌壁画服装资料 潘絜兹 中国古典艺术 1959年

敦煌舞姿 吴曼英 李才秀 刘恩伯 上海文艺 1983年重版

敦煌莫高窟艺术论集 段文杰 甘肃人民 1988年

敦煌研究文集 石窟保护篇(上、下集) 郭煌研究院 甘肃民族 1993年

敦煌艺术大观 敦煌研究院 江苏美术 1993年

敦煌艺术之最 谢生保 凌元 甘肃美术 1993年

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 李正宇 李新 上海文化 1993年

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 段文杰 甘肃人民 1994年

（二）论文目录

一、政治

1. 隋的建立与隋朝的政治

周隋之际的“三方之乱”及其平定　胡如雷　河北学刊　1989年6期

隋文帝凭些什么条件统一中国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54年6期

论隋文帝及其统一事业　陈光崇　教学与科学研究集刊(沈阳师院)　1956年2期

隋文帝评价　胡如雷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2期

论隋文帝　沈庆生　四川师院学报　1980年2期

关于隋文帝的历史教训　魏国忠　求是学刊　1980年2期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　齐陈骏　兰州大学学报　1980年4期

隋文帝罢天下诸郡一事质疑　杨希义　中国史研究　1982年4期

隋文帝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刍议　杨希义　西北大学学报　1983年4期

“开皇之治”论述　张占斌　松辽学刊　1984年1期

“隋文帝并省州县说”辨误　张连生　扬州师院学报　1984年3期

隋文帝政治思想研究　赵云旗　天津师大学报　1984年4期

隋文帝吏治述评　沙宪知　辽宁师大学报　1984年4期

评隋文帝之用人　王士立　历史教学　1984年3期

略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竺培升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1期

隋文帝"后宫有子皆不育"考证　石向东　史学月刊　1985年5期
评隋文帝的改革　赵文润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85年6期
隋文帝施政方针的得与失　李笑梅　辽宁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隋文帝民族政策研究　赵云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1期
隋文帝废立太子刍议　汤勤福　上饶师专学报　1987年1期
试论隋文帝废立太子的原因　唐华全　河北学刊　1991年5期
略论隋文帝打击士族　李克玉　河南师大学报　1987年4期
隋初江南地区反叛的原因初探　高敏　中国史研究　1988年4期
隋文帝对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　何德章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2期
论开皇之治　赵云旗　兰州大学学报　1985年3期
论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廉政　乔延寿　赵云旗　山西大学学报　1991年4期
隋文帝死因质疑　郑显文　史学集刊　1992年2期
隋代开皇之治研究　赵云旗　学术论丛　1994年2期
试辨仁寿宫变之谜　胡戟　人文杂志　1992年5期
隋文帝之死述论　王光照　中国史研究　1993年2期
也说隋文帝杨坚之死　樊广平　文科教学　1994年1期
隋文帝评价中的问题商榷　赵云旗　学术月刊　1991年4期
关于隋文帝的历史教训　魏国忠　求是学刊　1980年2期
试论隋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杨蒲林　历史教学　1965年12期
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高敏　魏晋隋唐史论集　第2辑　1983年
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　魏承思　历史教学问题　1985年3期

2. **隋炀帝评价**

论隋炀帝　万绳楠　史学月刊　1959年　9期
试评隋炀帝　韩乐学　西北师院学报　1985年4期
评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赵云旗　晋阳学刊　1986年1期
论隋炀帝的历史作用　韩隆福　安徽史学　1986年3期
隋炀帝的再评价　赵克尧　温州师专学报　1986年4期

隋炀帝评价的再探索:对吴思强同志“异议”的质疑　赵克尧　温州师专学报　1990年2期

试论隋炀帝　刘勇　湖北师院学报　1989年1期

评炀帝之政的性质及成因　何灿浩　宁波师院学报　1989年1期

隋炀帝的个性特征及其社会后果　罗嗣忠　青海师大学报　1994年1期

隋炀帝为何营建东都洛阳　伯岳　西北大学学报　1987年2期

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高敏　魏晋隋唐史论集2辑　1983年

隋炀帝重视人才管理思想的初步研究　陈竟生　南开经济研究　1988年6期

隋之极盛到底是哪一年?　韩隆福　武陵学刊　1991年3期

隋炀帝营建东都与山东士族　童毅之　历史教学　1987年3期

隋宫帝位之争　沈淦　上海师大学报　1987年2期

隋朝的门阀小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论隋亡“起自高祖,成于炀帝”　晏金铭　学术月刊　1981年　2期

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　韩昇　厦门大学学报　1987年2期

略论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　解如智　社会科学　1989年6期

关于隋炀帝征辽的几个问题　韩隆福　武陵学刊　1993年1期

苏威略论　赵文润　张剑平　渭南师专学报　1992年1期

苏威在隋朝的历史地位　张克昌　殷都学刊　1992年

隋代名将杨素　张文才　文史知识　1993年2期

评隋朝短祚而亡的原因　罗嗣忠　青海师大学报　1984年4期

论隋代速亡的原因　赵云旗　晋阳学刊　1984年6期

略论隋炀帝之暴政　黄惠贤　武汉大学学报　1983年4期

浅谈铸成隋炀帝暴君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罗嗣忠　青海师大学报　1991年2期

略论隋炀帝及其葬地　武伯纶　文博　1992年5期

3. 隋末农民起义

隋代的社会阶级矛盾与隋末农民起义诸特点的关系　陈国灿　光明日报　1957年7月9日

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　赵俪生等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　1954年
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　漆侠　中国农民起义论集　1958年
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胡如雷　文史11辑　1981年
王薄事迹考　陶懋炳　湖南师范学院　1981年2期
论窦建德——兼论长乐王政权与大夏国　姜伯勤　1978年4期
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　马驰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78年4期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田久川　辽宁师院学报　1979年1期
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　陈建国　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1期
李密投机瓦岗辨　臧嵘　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3期
略论李密　胡如雷　河北师院学报　1980年4期
李密用人之失误　李宝通　西北师大学报　1991年2期
瓦岗军性质新论　刘玉峰　学术月刊　1991年11期
对隋唐之际王世充势力的几点剖析　胡如雷　厦门大学学报　1994年2期
关于隋末地主起兵的几个问题　高敏　光明日报　1959年8月6日
谈隋末农民战争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王仲荦　文史哲　1963年4期
隋末奴军起义试探　姜伯勤　历史研究　1963年4期
隋末农民起义与反佛浪潮　姜伯勤　历史研究　1980年2期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　王双怀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4期
关于刘黑闼的评价问题　孙祚民　历史教学　1956年2期
隋末杨玄感起兵性质再探讨　赵连稳、梁国楹　德州师专学报　1992年1期
杨玄感起兵和隋末农民战争　滕新才　文史杂志　1994年5期
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　孙达人　思想战线　1978年2期
徐世勣与瓦岗军　黄惠贤　江汉历史学丛刊　1979年1期
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　韩国磐　光明日报　1953年11月1日
论李密在历史上的作用　方若生　历史教学　1954年3期

应当怎样评价李密　田锡国　吉林师大学报　1963年4期

评隋末农民战争与反佛浪潮　杨讷　历史研究　198年6期

隋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少数民族　高敏　郑州大学学报　1978年4期

试论隋末知识份子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　臧嵘　光明日报　1980年2月

洛州降唐史释　黄惠贤　江汉论坛　1980年5期

对《洛州降唐史释》一文的商榷　王双怀　江汉论坛　1983年10期

关于隋亡后国内战争的性质问题　赵德贵　吉林师大学报　1960年2期

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刘学沛　光明日报　1961年9月13日

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赵文润　陕西师大学报　1979年4期

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　倪正泰　南京大学学报　1979年1期

八十年代隋唐农民战争研究述略　罗春雄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年6期

4. 唐的建立及初唐政治、唐高祖和唐太宗的评价

唐韩笠《壶关录》之史料价值　汤开建　暨南学报　1992年3期

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唐代政治　谢元鲁　学术研究　1992年4期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　牛致功　陕西师大学报　1981年3期

论晋阳起兵　许道勋、赵克尧　晋阳学刊　1981年4期

李渊与江都"弑逆事件"关系的探讨　韩乐学　华中师大学报　1992年1期

论李建成在建唐中的历史作用　贺润坤　陕西师大学报　1987年1期

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　徐连达　仲富兰等　复旦学报　1981年2期

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　牛致功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年

关于李渊集团入居关中的两个问题　方亚光　齐鲁学刊　1985年3期

试论李渊在大唐帝国创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李卫宏、王剑川　许昌师专学报　1994年1期

试论唐代建都关中的历史影响　魏道明　青海师大学报　1992年4期

试论隋旧官僚对建唐的作用　贺润坤　青海师大学报　1982年3期
试论唐高祖李渊　王士立　唐山教育学院学报　1985年2期
李渊用人小议　彭池　江汉论坛　1985年2期
论李渊的用人方略　王赛时　齐鲁学刊　1985年3期
李渊军事战略思想论述　宋大川　山西师大学报　1989年4期
薛举起兵考论　陆庆夫　兰州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薛刚何曾反唐王——薛家将本事考实　吕叔桐　牛丽红　福建学刊　1990年2期
唐王征东史实考略　于阜民　靳维勤　营口师专学报　1990年4期
唐初平定薛举、李轨政权述要　王永曾　西北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李世民柏壁屯兵与平定河东　张俊圭　张晓玲　文史研究　1990年2期
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　何敦铧　福建师大学报　1984年1期
唐代政策思想研究　姜林祥　齐鲁学刊　1993年2期
唐代政策决策的思想基础　姜林祥　中国行政管理　1993年3期
唐初政权与政治斗争性质问题　吴泽　袁英光　历史研究　1964年2期
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析　牛致功　人文杂志　1980年6期
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　宋家钰　学习与研究　1962年10期
关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评玄武门之变的是非　王炎平　四川大学学报　1994年2期
建成元吉何以必走玄武门　程宗才　新疆大学学报　1984年1期
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胡戟等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　郑宝畸　文史哲　1988年4期
李元吉其人　贺润坤　西北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关于唐高祖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问题　牛致功　学术界　1989年4期
“玄武门之变”新探　程宗才　人文杂志　1991年3期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　乔宗传　晋阳学刊　1993年2期
唐高祖与“贞观之治”　牛致功　学术界　1988年6期
近年来唐高祖研究综述　罗春雄　社会科学动态　1992年8期

略论裴寂　宁志新　安庆师院学报　1990年4期
略论唐将李靖的战略和武德　刘巨　社会科学战线　1994年6期
论唐初宰相封伦　贺润坤　青海师大学报　1994年1期
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季镗　光明日报　1953年5月30日
论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起义的关系　翁大草　历史教学问题　1958年2期
略论唐太宗　史苏苑　新史学通讯　1955年6期
论唐太宗　韩国磐　光明日报　1962年2月28日
唐太宗　汪籛　北京大学学报　1979年2期
唐太宗生年考　胡如雷　河北师院学报　1981年4期
论唐太宗　胡如雷　中国史研究　1982年2期
略论贞观之治　杨国宜　历史教学　1961年10期
论贞观之治　徐连达　学术月刊　1979年10期
试论唐代贞观之治(上、下)　陈克明　辽宁大学学报　1981年5、6期
评贞观之治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叶哲民　台州师专学报　1990年1期
论贞观之风　霍雨佳　海南大学学报　1993年1期
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　李斌城　魏晋隋唐史论集1辑　1981年
试论唐初贞观朝廷内部的民主空气　魏国忠　黑龙江大学学报　1979年4期
从唐太宗“群臣论治”论“贞观之治”的形成　王清杰　史学月刊　1994年4期
贞观之治和当时的社会安定政策　饶鑫贤　法学研究　1979年5期
论贞观时唐臣的民本思想　刘泽华　张分田　南开学报　1991年3期
略论唐太宗统治时期的法律思想　何汝泉　西南师院学报　1980年1期
论李世民对皇太子、诸王的教育　魏得良　杭州大学学报　1980年1期
漫谈贞观年间的政权机构和行政效率　翁俊雄　光明日报　1980年3月19日

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历史意义　王谡　历史研究　1979年4期

唐太宗处理阶级关系的思想　牛致功　史学月刊　1981年6期

唐太宗的“止盗”与贞观之治　曾立人　丽水师专学报　1982年2期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　沙宪如　烟台师范学院　1994年2期

李世民的省官与择官　杨德义　实践　1982年4期

唐太宗精简官员说考辨　杨希义　学术月刊　1984年5期

唐太宗善于结合“蕃”汉战术和正奇二兵说　史苏苑　史学月刊　1981年6期

论唐太宗的农本思想和重农政策　赵克尧　中国农史　1984年2期

论唐太宗“王者至公而无私”的战略决策　李金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5期

李世民的人事管理思想　姚宣新　锦州师院学报　1989年2期

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曹作之　江汉大学学报　1994年4期

唐太宗的经济政策　朱玉衡　江淮论坛　1986年3期

唐太宗“大阐文教”述论　周怀宇　安徽师大学报　1985年1期

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　刘季富　殷都学刊　1993年2期

试论唐太宗的用人方略　常洪　北京师大学报　1980年4期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方略散论　赵国权　河南大学学报　1986年6期

唐太宗与十八学士　王世莲　北方论丛　1987年2期

秦府十八学士评探　郑振卿　河北大学学报　1991年4期

唐太宗用人之道与唐初政治结构　衣福生　学习与探索　1992年4期

治世之本惟在得人——摭谈唐太宗选人用人的思想方法　曾惠民　决策借鉴　1992年4期

唐太宗用人刍议　王振芳　山西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论唐太宗用人政策的局限性　贺润坤　青海师大学报　1991年1期

刘洎之死真相考索　王元军　人文杂志　1992年5期

也谈唐太宗纳谏　牛致功　人文杂志　1982年3期

唐太宗为何竭诚纳谏　乔宗传　浙江学刊　1992年3期

论唐太宗以古为镜　陈瑞台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年3期

君明臣直别议——试辨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　黄伟　人文杂志　1993年3期

李世民和魏征君臣相知遇之探讨　叶哲明　台州师专学报　1992年4期

善纳忠谏邦兴国宁——读魏征谏言的启示　大川　渭南师专学报　1992年2期

唐太宗与贞观廉政　杨希义　学术月刊　1989年11期

唐太宗及其臣僚勤政廉政思想　王名虎、孙智萍　社科信息　1990年11期

贞观年间廉政举要　姜经文　安立志　山东师大学报　1991年增刊

从《贞观政要》看李世民的防腐倡廉兴邦利民的举措　王隆华　汉中师院学报　1994年3期

论唐太宗的心理品质与其历史功业关系——兼谈杰出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　王世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89年2期

论唐太宗的辅臣对贞观之治所起的作用　史力　河北师大学报　1986年4期

魏征——千古流芳的谏臣和一代著名的史臣　胡如雷　河北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略论魏证"无所营为"的思想　沈端民　邵阳师专学报　1993年1期

《魏文征公故事》与《魏郑公谏录》辨　杨志玖　文献　1993年1期

魏征以德治国之道　孙中信　孔子研究　1993年3期

魏征何以不视《七德舞》　牛致功　史学月刊　1994年4期

评所谓贤相房玄龄　王元军　争鸣　1992年4期

简评长孙无忌　罗春雄　晋阳学刊　1989年4期

试论初唐政治家马周　王大勇　四平教育学院学报　1994年1期

应重新评价长孙皇后　王盛恩　洛阳师专学报　1992年1期

试论"贞观之治"的衰落　孙宏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93年1期

近十年来唐太宗研究的回顾　宋强刚　四川教育学院　1990年2期

昭陵新出土墓志补正唐史举例　张汴　樊光春　人文杂志　1992年1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门阀政治的几个问题　郑欣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1年1辑

论唐代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阶级斗争　吴泽　新建设　1962年1期

李渊为首的唐初政权是“世族政权”吗？王应麟　文汇报　1962年8月28日

唐初政权性质及其他——答王应麟同志　韩国磐　文汇报　1962年9月11日

唐初政权与政治斗争性质问题　吴泽　袁英光　历史研究　1964年2期

关于唐初政权性质的几个问题　梁淼泰　历史研究　1965年6期

唐初政权非由关陇士族垄断　乌廷玉　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4期

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汪篯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9年1、2期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　王仲荦　文史9辑　1980年

唐代门阀政治初探　郑伟鹏　丽水师专学报　1991年3期

论隋唐时期东西地主集团之关系　王大华　史学月刊　1991年6期

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　赵克尧　复旦学报　1984年2期

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陈寅恪　历史研究　1954年1期

5. 武周政治及对武则天的评价

论武周的社会基础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55年1期

唐史“武周革命”试探　李国彦　人文杂志　1958年1期

略论武周政权的建立　梁淼泰　历史教学　1963年12期

武则天批判　罗元贞　光明日报　1951年9月22日

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吴泽　文汇报　1959年12月6日

从武则天想到唐高宗　袁英光　文汇报　1960年1月17日

武则天　敦沫若　人民文学　1960年5期

谈武则天　吴晗　人民文学　1960年7期

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　郭沫若　光明日报　1962年9月26日

论唐代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阶级斗争——再论武则天的历史作用　吴泽　新建设　1962年1期

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　缪鉞　四川日报　1961年5月8日

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　敦沫若　1961年5月29日

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根据　敬堂　天津日报　1961年9月6日

关于武则天　吕振羽　史论集　人民　1960年

关于武则天生年的几段史料杂记　胡守为　中山大学学报　1962年3

期

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　熊克　南充师院学报　1980年2期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李瑞科　学术月刊　1982年4期

评越剧《则天皇后》　翦伯赞　历史问题论丛　1962年

武则天的真面目　熊德基　社会科学战线　1978年创刊号

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何汝泉　历史研究　1978年8期

武则天评价问题答客难　熊德基　历史教学　1979年1期

论武则天　魏良弢　新疆大学学报　1979年1、2期

"高宗临朝不决事"说质疑　杨际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79年2期

也谈武则天　罗继祖　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1期

武则天　汪篯　汪篯隋唐史论稿　1981年

说李武政权　黄永年　人文杂志　1982年1期

历史上的畸形政权——李武政权　黄永年　文史知识　1993年3期

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　李必忠等　四川大学学报　1982年2期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郑宝琦　上海师院学报　1983年1期

武则天不是肯定的历史人物　高光晶等　求索　1983年1期

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　郭绍林　史学月刊　1985年3期

唐高宗武后东巡及其政治的转化　李鸿宾　梁民　理论学刊　1992年2期

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赵文润　人文杂志　1986年1期

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矛盾和斗争　秦川　甘肃社会科学　1993年2期

关于唐高宗永徽年间皇后的废立问题　赵克尧　阜阳师院学报　1986年4期

武则天是如何入高宗宫的？　崔曙庭　汉中师院学报　1994年2期

"二圣"史谓何人　贺润坤　西北大学学报　1985年4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王秀明　文史研究　1990年1期

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胡如雷　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1期

关于武则天"打击士族"的性质问题　高光晶　湖南师大社会科学报　1989年3期

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的奥秘　张瑞敏　领导科学　1989年6期

试论武则天的用人政策　王朝彬　荷泽师专学报　1989年4期

简析武则天的用人得失　胡殿文　驻马店师专学报　1994 年 3 期

武则天削发为尼一事考辨:与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商榷　宁志新　华中师大学报　1990 年 1 期

徐敬业扬州兵变新探　秦川　西北师大学报　1990 年 1 期

武则天与宗教　牛志平　社会科学战线　1990 年 1 期

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　陆庆夫　兰州大学学报　1990 年 3 期

武则天心态研究　王灵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90 年 3 期

武则天时代的天枢　梁恒唐　晋阳学刊　1990 年 3 期

浅谈武则天改元　梁桦　南都学坛　1990 年 4 期

武则天朝政治及其对官吏的影响　秦川　社会科学　1990 年 4 期

无字碑上岂无“字”:评以往人们对武则天的毁誉褒贬　何磊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0 年 4 期

女皇武则天施政特色及其政绩评析　叶哲明　台州师专学报　1991 年 1 期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马晓丽　烟台大学学报　1991 年 3 期

武则天朝的酷吏政治　孙彦　祁连学刊　1992 年 4 期

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　苏者聪　武汉大学学报　1991 年 5 期

武则天用人刍议　王振芳　洛阳师专学报　1992 年 2 期

“武后之忍”说的斟酌　沈显棣　江西大学学报　1992 年 3 期

武则天立周、继周成败论　赵克尧　学术月刊　1992 年 4 期

武则天新论　松楠　贵阳师专学报　1994 年 1 期

浅谈武则天的功过　姜同春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4 年 8、9 期

武周时期的民族关系初探　何磊　云南师大学报　1986 年 6 期

武则天朝宰相考　马俊民　天津师大学报　1987 年 4 期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陈硕贞有关问题稽考　卢华　沈阳师院学报　1992 年 2 期

张柬之何以不杀武三思　程宗才　新疆大学学报　1992 年 4 期

陈子昂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钟树梁　成都大学学报　1989 年 3 期

陈子昂政治思想浅论　刘致中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1993 年 1 期

骆宾王从军西域时间考——兼谈骆宾王生平　王增斌　山西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略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风云　唐华全　河北学刊　1993年2期

论睿宗朝的政治改革与开元之治的关系　周东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6. **唐玄宗与开元之治**

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　李必忠　唐史论丛第2辑　1987年

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　汪篯　汪篯隋唐史论稿　1981年

关于唐玄宗即位初年的几个问题　胡宝华　河北学刊　1987年5期

唐玄宗究竟实行了哪些改革措施　李赓序　历史教学　1956年1期

唐玄宗的经济改革　潘镛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3期

论唐玄宗的改革　徐达为　镇江师专学报　1992年4期

论唐代开元时期对地方吏治的重视与整饬　胡如雷　河北师院学报　1993年4期

"天下治乱、系于用人"——略论开元、天宝年间吏治之得失　张雄　光明日报　1980年7月22日

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　汪篯　汪篯隋唐史论稿　1981年

开元天宝盛世新探　吴枫　吉林师大社会科学丛刊　1979年1期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乌廷玉　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1期

论开元之治　谭英华　社会科学研究　1980年3期

论唐玄宗李隆基　华世欣　刘光曙　固原师专学报　1982年3期

开元盛世论　张仁才　江西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唐玄宗与开元盛世　阎守诚　晋阳学刊　1990年4期

盛世英主唐玄宗　黄永年　文史知识　1992年6期

论唐玄宗李隆基　潘镛　云南社会科学　1993年2期

唐玄宗盛衰史略　魏克明　社会科学　1980年4期

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　徐连达　文汇报　1980年10月20日

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　袁英光等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唐玄宗的道路　张国刚　文史知识　1983年8期

成于忧患、败于安乐的唐玄宗　高世瑜　历史知识　1984年3期

唐玄宗治国国策与唐朝的盛衰　吴宗国　北京日报　1993 年 6 月 23 日

唐玄宗立李亨为皇太子之因试析　赵永东　南开学报　1992 年 6 期

唐代名相姚崇　常少君　河洛春秋　1991 年 3 期

试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姚崇　阎新华　运城商专学报　1993 年 2 期

卢怀慎与“开元之治”　黄蕴华　殷都学刊　1991 年 1 期

开元俭相卢怀慎　张华腾　殷都学刊　1990 年 3 期

论张说与宇文融之争　阎守诚　晋阳学刊　1989 年 4 期

唐代洛阳籍政治家张说　郭绍林　河洛春秋　1991 年 3 期

张说斠议　魏明安　兰州学刊　1992 年 3、4 期

武纬文经的唐代名相张说　王新年　文史知识　1994 年 3 期

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　曹作之　江汉大学学报　1990 年 2 期

略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　王镝非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0 年 4 期

略论李林甫　李哲夫　李广福　人文杂志　1982 年 4 期

王毛仲与唐玄宗政权　王元军　文史知识　1993 年 5 期

唐朝前期的社会矛盾和反抗斗争　吉喜祥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91 年 2 期

唐玄宗杨贵妃五题　卞孝萱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 1 期

7. 安史之乱与藩镇的形成

“安禄山造反”的翻案　杨国宜　历史教学问题　1957 年 6 期

略谈安史之乱的性质　胡如雷　光明日报　1962 年 10 月 10 日

安禄山何时任平卢节度使　纪委　烟台大学学报　1990 年 2 期

安史之乱起因新探　孙永如　孙开萍　杨州师院学报　1990 年 3 期

试论安禄山势力的发展壮大　唐华全　中国史研究　1991 年 3 期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华全　河北师院学报　1993 年 4 期

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袁英光　王界云　新疆大学学报　1990 年 3 期

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　贾二强　陕西师大学报　1991 年 1 期

安史之乱持续之久原因新探　崔明德　历史教学　1991 年 5 期

安禄山的发迹条件评价及其他——《安禄山评传》前言　崔明德　烟台大学学报　1992年1期

简论《安禄山事迹》的史料价值　黎文选　四川师大学报　1991年11期

论盛唐极盛而衰过程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　张京华　理论学刊　1989年3期

唐玄宗西幸心态及相关问题探讨　史延廷　求是学刊　1993年1期

马嵬驿事件的真相　胡濈咸　安徽师大学报　1980年4期

说马嵬驿杨贵妃之死的真相　黄永年　学林漫录　第5集　1982年

杨玉环之死　中仁　启予　学术论坛　1983年1期

也谈杨贵妃之死　袁开济　湖北大学学报　1987年5期

高力士是马嵬兵变的后台吗——与黄永年先生商榷　司马严頣　河南师大学报　1988年4期

高力士是马嵬兵变的后台——代黄永年先生答司马严頣同志　贾宽保　河南师大学报　1988年4期

新论马嵬驿事变的历史真相　陆沉　湖北大学学报　1990年4期

杨贵妃原为寿王妃之说不可信　黄权才　广州师院学报　1992年1期

从马嵬事变看唐肃宗即位的背景　安彩凤　固原师专学报　1990年1期

杜甫与代宗朝政治　齐起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1期

唐代爱国名将张巡略论　杨富学　南都学坛　1988年4期

略论张巡领导的睢阳保卫战　陈建林　荆门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断指捐躯留美名的南霁云　聂玉海　殷都学刊　1989年3期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　黄新亚　学术月刊　1985年3期

“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　吴宗国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1年1期

试论“天宝之乱”的乱因　彭铁翔　湖北大学学报　1986年6期

浅谈“安史之乱”初期唐军的城市防御战　赵军　军事史林　1987年1期

杜甫两过昭陵与“安史之乱”　孙迟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版

潘镇与开元盛世之关系　黄新亚　社会科学辑刊　1987年3期

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　黄永年　中国古代史论丛 1 辑　1981 年

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　张国刚　南开学报　1982 年 6 期

谈唐代宗用人的局限性　焦杰　人文杂志　1992 年 4 期

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　李晓路　历史研究　1989 年 3 期

论李光弼　田廷柱　邹艳梅　辽宁大学学报　1994 年 3 期

李光弼太原保卫战　李裕民　城市研究　1994 年 2 期

李光弼军事领导艺术探析　庄治新　重庆师院学报　1992 年 3 期

略论李泌　卢华语　西南师大学报 1986 年 1 期

试论李泌在稳定中唐政局中的作用　何敦铧　历史教学　1986 年 2 期

难为中兴却能免祸全身的从政智慧——论唐中期政治家李泌　李向平　上海大学学报　1991 年 4 期

从仆固怀恩反唐看中唐的河朔政策　陈勇　文史杂志　1991 年 2 期

略论仆固怀恩　史秀莲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1 年 4 期

唐代建中时期的"泾原兵变"性质考辨　彭铁翔　武汉师院学报　1982 年 6 期

"泾师之变"发微　黄永年　唐史论丛　第 2 辑　1987 年

试论唐代"泾原兵变"的性质——与彭铁翔同志商榷　陈衍德　杨际平　历史教学问题　1989 年 3 期

郭子仪年表　李裕民　文史研究　1994 年 4 期

郭子仪汾阳平叛的历史功绩　郭忠义　文史研究　1994 年 4 期

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　胡如雷　光明日报　1963 年 7 月 3 日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　傅玫　历史教学　1965 年 2 期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80 年 6 期

论唐代的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　杨志玖　南开学报　1980 年 3 期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　袁英光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2 年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　黄新亚　青海师院学报　1983 年 2 期

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杨志玖　张国刚　学术月刊　1982 年 6 期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刘运承等　学术月刊　1983 年 6 期

唐代藩镇割据及其形成的政治原因　何敦铧　历史教学问题　1988年6期

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　张国刚　历史研究　1983年4期

唐代藩镇分类刍议　王援朝　唐史论丛5　1990年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　张国刚　文史知识　1986年9期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程志　东北师大学报　1986年6期

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　方积六　中国史研究　1984年1期

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　孙慧庆　北方文物　1991年4期

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的琐议　孙慧庆　北方文物　1992年4期

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　樊文礼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2期

唐代的淄青镇　王赛时　东岳论丛　1994年2期

唐淮西节度使略论　樊文礼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4年2期

唐京西北藩镇述略　黄利平　陕西师大学报　1991年1期

唐代藩镇研究述略　宋强刚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9年11期

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王赛时　人文杂志　1986年4期

略论唐代商人与割据势力的关系　魏承思　学术月刊　1984年5期

唐代中后期的军乱　王赛时　中国史研究　1989年3期

试析唐朝后期的兵变　徐嫩棠　贵州社会科学　1990年4期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祖大祥　人文杂志　1982年2期

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　韩国磐　历史教学　1958年8期

浅析唐未藩镇的特点　李宗保　唐都学刊　1992年3期

《新唐书·方镇表》考校记　吴泽　史学史研究　1992年1期

《新唐书·藩镇列传》考校记　吴泽　史学史研究　1991年4期

唐中叶的削藩措施及其作用　齐勇锋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1期

8. 宪宗、穆宗的政治和牛李党争

试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策略　卞师军　王瑞平　黄淮学刊　1991年2期

试论李绛谏唐宪宗　罗春雄　广西师大学报　1992年1期

试论唐宪宗削藩战争的策略失误　李怀生　晋阳学刊　1991年3期

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　刘玉峰　渭南师专学报　1992年4

期

唐代中后期的削藩名将李愬　张文才　文史知识　1990年7期

试论唐代永贞改革　唐建华　贵州社会科学　1992年4期

略论永贞革新　王素　文史知识　1994年4期

论唐宪宗的元和之治——兼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性质　孔祥君　郑州大学学报　1989年1期

宪宗政治和元和中兴　曹治怀　安庆师院学报　1992年3期

试论唐宪宗　罗春雄　广西社会科学　1992年3期

唐宪宗之死与唐代后期朝廷的内部斗争　刘范弟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3年1期

唐朝元和刺相案的始末　俞钢　上海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庆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刘玉峰　人文杂志　1993年5期

浅谈裴度的忠诚与择人　董克昌　求是学刊　1994年5期

杨炎的功过与悲惨结局　陈明光　文史知识　1989年11期

同遭冤狱的刘晏与杨炎　崔利波　辽宁大学学报　1991年5期

唐代奸相卢杞　祖大祥　历史教学　1991年6期

韩愈《三上宰相书》的价值　章亦辛　叶志恒　锦州师院学报　1989年4期

论韩愈　黄永年　陕西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再论韩愈和永贞革新的关系　刘国盈　北京社会科学　1989年4期

韩愈《平淮西碑》五议　史苏苑　郑州大学学报　1990年3期

陆贽家世考辨　刘家钰　张扬　文献　1990年3期

陆贽奏议及其理乱观初探　傅震杰　晋阳学刊　1993年2期

令狐陶的生卒年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90年8期

中唐时代天才的政治家文学家吕温　张伟　山西大学学报　1994年2期

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　吴伟斌　中州学刊　1989年2期

白居易治国方略简论　牛春生　学术月刊　1992年2期

白居易与中晚唐的党争　周建国　文献　1994年4期

元和对策案试探　何灿浩　南开学报　1984年3期

《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　唐长孺　唐史学会论文

集　1986年

《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　卞考萱　社会科学战线　1986年9期

长庆元年复试案浅析　胡国然　重庆师院学报　1987年2期

长庆党争初探　郑昱文　松辽学刊　1995年4期

唐代牛李之争的政治意义　刘尧庭　新史学通讯　1953年8期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韩国磐　厦门大学学报　1954年1期

唐代牛李党争研究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79年6期

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　傅璇琮　文史知识　1983年2期

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　赵吕甫　南充师院学报　1983年1期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　周建国　复旦学报　1983年6期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李中华　文史17辑　1983年

牛李党争和内廷之争的关系辨析　何灿浩　宁波师专学报　1984年3期

牛李党争始因辨析　王炎平　四川大学学报　1985年3期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刘智亭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4期

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倾向　王载源　中州学刊　1986年2期

杜牧与牛李党争　王西平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4期

试论杜牧的党派分野　吴在庆　人文杂志　1987年2期

辨牛李之争与士庶之争的关系　王炎平　四川大学学报　1987年2期

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　王炎平　四川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牛李党争"正名　卞孝萱　中国史研究　1993年3期

《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匡正　丁鼎　唐都学刊　1992年2期

《牛儒孺、李德裕史事辨误》辨正　丁鼎　烟台师院学报　1992年2期

李逢吉与牛僧孺关系考论——兼论牛李两党的划分标准　丁鼎　人文杂志　1993年3期

郑亚事绩考述　周建国　文史31辑　1988年

9. **唐代宦官**

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　田廷柱　辽宁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唐代宦官之祸始于开元——试说玄宗朝中宦官高力士　穆渭生　陕西

教育学院学报　1990年2期

重评高力士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84年1期

略论中唐前期宦官擅权及其祸害　何敦铧　学术月刊　1981年3期

唐代宦官述论　齐陈骏　陆庆夫　中国史研究　1984年1期

唐代宦官考述　马良怀　厦门大学学报　1989年4期

略论唐代宦官　牛志平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1期

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　陈仲安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唐宦官年表　牛志平　唐史论丛　第2辑　1987年

唐代的宦官　黄永年　文史知识　1987年4期

唐代的宦官与皇权　宋衍申　东北师大学报　1985年5期

唐代宦官与皇帝关系考论　马良怀　华中师大学报　1987年5期

论唐代的宦官政治　冯辉　求是学刊　1987年4期

唐代宦官集团势力及其在藩镇监军的影响　何敦铧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朝宦官内争浅论　刘范弟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1989年2期

略述唐代宦官监军之弊　张学军等　南都学坛　1989年3期

唐代翰林学士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　袁刚　山东大学学报　1984年2期

唐代宦官掌典禁军原因试探　樊文礼　烟台师院学报　1990年2期

唐代宦官擅政祸害的积重难返　何敦铧　历史教学问题　1990年2期

论唐前期内朝对相权的分割及影响　程宗才　山东社会科学　1992年7期

试论唐代中后期君主对宦官之策的特点及原因（兼析唐代宦官专权长期存续的原因）　何灿浩　宁波师院学报　1992年1期

唐代宦官干政及其影响　王定璋　文史杂志　1992年6期

10. **晚唐政治与李德裕**

晚唐政治家李德裕　田廷柱　文史知识　1989年1期

略论李德裕　邵金凯　淮阳教育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李德裕政风二题　陈建梁　史学月刊　1994年6期

会昌毁佛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　袁刚　中国史研究　1988年4期

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读《隋唐佛教史稿》札记　曹旋宁　青

海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李德裕与会昌灭佛　姜芊　兰州学刊　1991年6期

论韦皋镇蜀对唐室中兴的作用　段飈　华东师大学报　1982年1期

论中唐民族调整政策的支持者——韦皋　徐才安　四川师院学报　1991年4期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　李文才　晋阳学刊　1993年4期

范文澜唐末主要社会矛盾说商兑　周世范　洛阳师专学报　1991年4期

关于唐代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　王力平　河北学刊　1987年5期

试论唐末藩镇对昭宗朝政局的影响　李宗保　曾敏　史学月刊　1993年3期

试论唐后期南方相对稳定的原因　陈文和等　扬州师院学报　1987年2期

11．唐末农民起义

试论裘甫起义战略转移的原因以及心态变化的消极后果——唐代裘甫起义研究之二　何灿浩　宁波师专学报　1989年3期

裘甫起义史实考辨　桂心仪　宁波师专学报　1991年2期

试论裘甫获闻王式除书的时间及其他　何灿浩　宁波师专学报　1991年4期

试谈晚唐的农民起义　邓广铭　中国农民起义论集　1958年

唐末庞勋起义　傅举有　史学月刊　1959年8期

庞勋领导起义的戍卒发遣年代略考　胡如雷　历史教学　1964年7月

唐代末年四川阡能的起义　臧嵘　光明日报　1964年2月26日

袁晁农民起义发动地点辨析　叶哲明　张立道　东南文化　1990年6期

关于王仙芝起义的时间地点家乡和战死地点问题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55年2期

王仙芝起义的时间问题　王兴亚　史学月刊　1957年8期

王仙芝黄巢起义始年考　臧嵘　文史16辑　1982年

王仙芝攻蕲州的时间问题　王大华　陕西师大学报　1987年1期

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初探　吴泽　袁英光　文汇报　1961年5月21

日

关于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　徐德麟　文汇报　1961年6月23日

谈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　宁可　光明日报　1962年7月18日

对王仙芝黄巢"乞降"问题的两点意见　吴节　光明日报　1962年9月12日

黄巢大起义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54年2期

试论黄巢远征　李燕光　文史哲　1955年7期

黄巢起义事迹考　韩国磐　厦门大学学报　1956年5期

黄巢起义于乾符元年的一条考证　陈耀东　徐州师院学报　1980年3期

试论唐末黄巢起义的特点　关履权　中学历史教学　197年3期

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时间、地点　吴松泉　四川师院学报　1992年4期

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缪钺　历史研究　1958年2期

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　达人　光明日报　1961年4月12日

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　赖家度　历史教学　1964年9期

黄巢"乞降"问题考辨　吴泽　袁英光　学术月刊　1961年5期

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　宁可　光明日报　1962年7月18日

黄巢乞降经过考辨　杨善群　求是学刊　1980年1期

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的关系　周宝珠　史学月刊　1960年9期

关于黄巢农民军的一些史料的考辨　王永兴　文史5辑　1978年

流动作战不是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　张道贵等　杭州大学学报　1979年4期

论大齐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　王大华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4期

黄巢渡江南下考　方积六　中华文史论丛　1981年3期

黄巢爱儒考辨　卫文选　学术月刊　1981年10期

试论黄巢建立的大齐朝的性质　俞兆鹏　江西大学学报　1980年2期

黄巢遇害质疑　陈耀东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3期

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家钰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1978年

均平与黄巢起义　唐森　暨南大学学报　1981年1期

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　王大华　陕西师大学报　1982年2期

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白天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1978年

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略论　诸葛计　中国史研究　1980年2期

隋唐五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及儒家的关系　李斌城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年

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63年1期

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　侯外庐　新建设　1964年3期

《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和生平　谢重光　福建论坛　1989年5期

也谈《龙湖集》真伪——兼论《陈元光〈龙湖集〉校注与研究》　杨际平　福建学刊　1992年1期

陈元光及豫闽台关系散论　王大良　洛阳师院学报　1991年3期

陈元光家世考　周贤成　福建学刊　1991年5期

陈元光与闽南开发　俞兆鹏　陈智超　南昌大学学报　1993年6期

12. **五代政治**

试论唐代军事改革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郭绍林　史学月刊　1987年4期

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　任爽　历史研究　1987年2期

五代削藩制置初探　李昌宪　中国史研究　1982年3期

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设置　易图强　东北师大学报　1994年5期

五代初期的汴晋争衡　臧嵘　史学月刊　1984年3期

朱梁何以能代唐　周世范　山西大学学报　1987年2期

晋王李存勗灭梁之战及其军事谋略　方积六　南都学坛　1991年4期

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　郑学檬　厦门大学学报　1983年1期

石敬瑭的评价及有关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孙祚民　北方论丛

1987 年 4 期

简论周世宗　唐兆梅　文史哲　1981 年 3 期

论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徐明德　杭州大学学报　1983 年 1 期

后周皇帝郭威的一生　安淑珍　史学月刊　1989 年 5 期

郭威改革述论　刘永军　徐州师院学报　1992 年 1 期

后周高平之战述论　曾国富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 2 期

后周世宗柴荣出身商人考　孙继民　河北师院学报　1992 年 4 期

周世宗南征北战的军事谋略　方积六　湖北大学学报　1991 年 1 期

论周世宗改革成功的原因　张玉勤　张智传　山西大学学报　1991 年 4 期

周世宗改革的历史经验　赵永春　松辽学刊　1992 年 3 期

后周政治改革述论　王永平　扬州师院学报 1994 年 1 期

五代分合与南唐的历史地位　吴枫　任爽　中国史研究　1994 年 3 期

南唐党争试探　任爽　求是学刊　1985 年 5 期

南唐党争评述:与任爽同志商榷　王永平　扬州师院学报　1991 年 2 期

关于南唐的统一方略及其破产　王永平　扬州师院学报　1991 年 2 期

从沙弥到皇帝:李昪是怎样取代吴国的　盛文彬　南京史志　1989 年 1 期

南唐中宗李璟　盛文彬　南京史志　1989 年 1 期

英雄与富翁:吴越国王钱镠的心态分析　欧炀　东南文化　1993 年 2 期

略论杨吴开国的客观条件　孙永如　扬州师院学报　1989 年 4 期

韦庄与前蜀政权　何汝泉　西南师大学报　1990 年 2 期

后蜀孟昶死因试探　张执让　成都大学学报　1989 年 2 期

略论前后蜀的国情和国运　王炎平　四川大学学报　1991 年 1 期

前后蜀历史与文化研究述略　王瑛　社会科学研究　1992 年 6 期

论唐末五代的夏州政权　杜文玉　高长天　延安大学学报　1991 年 2 期

从南安之变到闽国的建立　向生榕　福建论坛　1992 年 5 期

马楚、王闽政权灭亡之原因初探　曾四清　湖湘论坛　1991 年 3 期

王闽政权与福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曾四清　福建论坛　1991年7期

王潮、王审知治闽策略初探　徐晓望　理论学习月刊　1991年3期

五代马楚羁縻政策剖析　彭武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2期

五代时期南平立国原因浅析　宋嗣军　湖北师院学报　1990年3期

论刘知远　曾国富　民族研究　1994年5期

风流自诩娱僭一方——南汉开国之君刘岩　张金锐　文史知识　1994年10期

五代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　靳润成　历史教学　1990年5期

略论冯道　任崇岳　史学月刊　1985年5期

论五代的冯道　陈忠信　历史教学问题　1986年1期

动荡的年代、幸运的文人：五代时的"不倒翁"冯道　安夫　文史知识　1991年5期

八十年代以来五代十国史研究述议　曾国富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9年4期

13. 唐五代西北地区的政治

唐代西域史上的几个问题　徐伯夫　西域史论丛第1辑　1985年

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赵龙西御吐蕃始末　朱雷　敦煌学辑刊　1985年2期

唐陇右道河源军经略大使考　米海平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1期

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史判集(P2942)研究　安家瑶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二)　1983年

唐代河西戍所城址考　李并成　敦煌学辑刊　1992年1期

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　史苇湘　敦煌研究　创刊号(总3期)　1983年12月

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　史苇湘　敦煌研究　创刊号(总3期)　1983年12月

关于P2942写卷的几个问题　马德　敦煌学研究　西北师院学报　增

刊 1984年10期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 陈守忠 西北师院学报 1983年4期

也谈敦煌陷蕃年代 李永宁 敦煌学研究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 1984年10月

沙州陷蕃年代再探 马德 敦煌研究 1985年3期

吐蕃攻陷沙州之我见 安忠义 敦煌学辑刊 1992年1期

唐末沙州(敦煌)张义潮起义 金启综 历史教学 1954年4期

唐末张议潮统一河西 贺世哲 甘肃师大学报 1976年2期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 齐陈骏 甘肃师大学报 1979年4期

瓜州史事述要 苏莹辉 汉学研究 4卷2期 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专号 1986年12月

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 唐长孺 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1962年

归义军及其政权始末述论 刘进宝 西北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张议潮传 罗振玉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9年印

补《唐书张义潮传》 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1922年印 敦煌学文选上 1983年

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年

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钩沉 邓文宽 北京大学学报 1986年5期

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辨 苏莹辉 敦煌学3辑 1976年香港

张淮深之死再议 孙修身 西北师院学报 1982年2期

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 李永宁 敦煌研究1986年2期

也说张淮深之死 邓文宽 敦煌研究 1988年1期

为索勋篡权翻案 钱伯泉 敦煌研究 1988年1期

论索勋张承奉节度归义军之起讫年 苏莹辉 敦煌学1辑 1974年香港

唐五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 芳干 申报 文史6期 1948年6月17日

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　姜亮夫　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3期
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　荣新江　文献　1989年3期
有关归义军前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周效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研究　钱伯泉　敦煌学辑刊　1987年1期
瓜沙曹氏年表　罗振玉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年　敦煌学文选(上)　1983年
瓜沙曹氏年表补正　姜亮夫　杭州大学学报　1979年1、2期　敦煌学文选(上)　1983年
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　贺世哲　孙修身　甘肃师大学报　1980年1期
瓜沙曹氏世谱　姜亮夫　浙江学刊　1983年1期
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　孙修身　社会科学　1983年5期
瓜沙曹氏卒立世次考　孙修身　郑州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和田文《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与西北史地问题　黄盛璋　西北史地　1984年3期
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　唐耕耦　敦煌研究　1987年2期
试论曹仁贵曹议金　贺世哲　西北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　荣新江　敦煌研究　1993年2期
从几种敦煌资料论张承奉、曹议金之称“帝”称“王”　苏莹辉　敦煌学11辑　1986年7月
伯3718《李府君邈真传》有关问题考　孙修身　敦煌研究　1991年1期
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　谭蝉雪　敦煌研究　1988年1期
金山国坠事零拾　王重民　敦煌遗书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4年4月
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　王冀青　敦煌学辑刊　1983年总3期
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　荣新江　敦煌学辑刊　1986年2期
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刘美崧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3期
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　李正宇　西北史地　1987年2期

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　荣新江　敦煌研究　1989年4期

关于唐末五代宋初凉州自立政权的几个问题　胡小鹏　西北师大学报　1989年1期

近年来瓜沙归义军研究综述　胡小鹏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1年16期

二、典章制度

1. 官制

(1)中央官制

初唐政治文化结构分析　凌家民　求是学刊　1990年1期

唐代行政制度论略　严耕望　(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69年11期

五代政治体制考略　董恩林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9年4期

发展变化中的隋唐五代官制　杨志玖等　文史知识　1985年1期

隋唐职官制度渊源小议　李光霁　中国史研究　1985年1期

有轨遗迹可循的唐代职官制度　韩国磐　江西社会科学　1988年6期

唐代官制考述　王毅文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唐朝皇帝制度的发展与完备　王超　南京大学学报　1985年4期

唐代皇帝的继承方式　对国势兴衰的影响　唐任伍　史学月刊　1995年5期

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　李晓路　学术月刊　1989年9期

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袁刚　社会科学家　1989年3期

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机构与活动　谢元鲁　文献　1988年4期

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　楼劲　敦煌学辑刊　1987年2期

唐朝前期权力机构设置的特点　陈颖　石油大学学报　1992年8期

唐初统治者的行政决策　许文惠　中国行政管理　1991年10期

贞观政务决策体制的若干特色　徐国宝　苏州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唐代御前决策会议初探　谢元鲁　中国史研究　1988年4期

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论　李孔怀　中国史研究　1993年4期
隋唐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　杨际平　浙江学刊　1988年3期
隋唐"三省宰相制度"辨　刘兆君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唐代宰相制度初探　刘希为　中国史研究　1984年3期
唐朝宰相制度简论　薛贻康　齐鲁学刊　1990年1期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薛贻康　山东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唐朝宰相制度流变略谈　暮白　文史杂志　1993年3期
论唐前期宰相制度的演变　程宗才　新疆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武周宰相数目考　王双怀　唐史论丛5辑　1990年
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94年1期
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郑强胜　河北学刊　1990年6期
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　俞钢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释"平章事"　黄利平　人文杂志　1994年4期
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　韩国磐　厦门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隋唐三省体制析论　袁刚　北京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隋代三省制度发展之研究　刘健民　(港)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　1980年5期
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　孙国栋　(港)新亚学报　1957年3卷1期
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　黄利平　唐史论丛2辑　1987年
唐贞观阙置尚书令辨析　刘磐修　荷泽　师专学报　1971年1期
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　杨友庭　厦门大学学报　1983年1期
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　罗永生　历史研究　1992年2期
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吴枫等　东北师大学报　1982年3期
中唐之际三省中枢体制的解体　袁刚　争鸣　1990年2期
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　姚澄宇　中国史研究　1982年3期
政事堂制度辨证　王超　中国史研究　1983年4期

《政事堂制度辨证》质疑　陈振　中国史研究　1985 年 1 期

也谈政事堂的创设时间　魏向东　苏州大学学报　1987 年 4 期

试论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　魏向东　苏州大学学报　1989 年 2、3 期

论唐玄宗时期的政事堂宰相独断制　魏向东　中国史研究　1992 年 4 期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构　楼劲　兰州大学学报 1988 年 2 期

贞观时期中央文官制度初探　陶六一　安徽师大学报　1994 年 3 期

唐代文官制度的发展　高凤林　文献　1990 年 3 期

唐尚书都省简论　郭锋　中国史研究　1989 年 3 期

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　孙国栋　（港）钱穆 80 岁纪念论文集 1974 年

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　张连城　文献　1992 年 2 期

唐二十六司郎中员外郎地位高低及迁转途径考释　孙国栋　（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75 年 17 期

比部职掌的演变和唐代的比部审计制度　张达聪　江汉论坛　1994 年 7 期

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　岑仲勉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9 年 8 卷 1 期

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　杜文玉　渭南师专学报　1993 年 2 期

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时间与任期的探讨　孙国栋　（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74 年 16 期

近十年来唐代人事管理制度研究评述　刘太祥　南都学坛　1990 年 2 期

封驳制度与唐初政治　吴枫等　历史教学　1982 年 11 期

补唐代翰林两记　岑仲勉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3 年 11 本

翰林学士壁记注补　岑仲勉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8 年 15 本

唐代的翰林学士　袁刚　文史哲　1985 年 6 期

唐代的翰林学士略论　杨友庭　厦门大学学报　1985 年 3 期

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　赵康　学术月刊　1986 年 10

期

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　王永平　晋阳学刊　1990年2期

唐代的翰林学士与宰相　程宗才　史学月刊　1991年5期

唐代翰林院与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徐茂明　苏州大学学报　1982年3期

简论唐代知制诰　方本新　芜湖师专学报1993年11期

唐代的学士　牛致功　社会科学战线　1987年4期

论北门学士　刘健明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　李方　文物　1992年9期

唐代学士官制考略　李湜　许昌师专学报　1989年2期

延英奏对制度初探　袁刚　北京大学学报　1989年5期

唐代集贤院殿书院考论　赵永东　南开学报　1986年4期

唐集贤院考　郑伟章　文史19辑　1983年

论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　刘健明　隋唐史论集(港)1993年

谈谈唐代的秘书省　赵永东　文献　1987年3期

唐太宗的秘书官员议政进谏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马培新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3期

唐代的谏官制度　蒲坚　人民日报　1981年10月12日

唐朝的谏官制度　姚澄宇　南京师大学报　1984年3期

论唐代谏官制度　李莉　行政管理研究　1991年2期

唐代的求言与上书制度　谢元鲁　天府新论　1988年6期

唐朝辍朝制度考述　夏晓臻　陕西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后期内外官轻重辨　李燕捷　社会科学战线　1992年4期

唐"符玺郎"初改"符宝郎"时间考　萧高洪　江西社会科学　1991年1期

试论唐代历史上的"简政省官"　杨希义　杨洪　西北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唐贞观统治集团行政管理思想及实践述论　邓元时　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1期

汉隋唐三代行政监察体制比较　李孔怀　陈永明　复旦学报　1994年4期

唐代监察制度述论　徐连达等　历史研究　1981年5期
“制临百司，纠绝不法”——唐代的监察机关　杨志玖　张国刚　文史知识　1985年8月
论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邹顺亮　中南政治学院学报　1993年7期
唐代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　何汝泉　中国史研究　1989年2期
唐代御史制度浅论　李俊恒　许昌师专学服　1982年2期
唐代御史制度的特色　胡沧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御史台与宰相的关系　胡沧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2期
唐代御史台与宦官的关系　胡沧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唐代御史台司法审判权的获得　胡沧泽　厦门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御史台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监督　胡沧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年4期
《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　胡留元　冯卓慧　人文杂志　1983年2期
唐代御史大夫考论　胡沧泽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年
唐代的御史台狱　王素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89年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关系初探　谢元鲁　社会科学家　1988年3期
试论勾官　王永兴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集　1983年
再论唐代勾检制　王永兴　北京大学学报　1986年2期
唐王朝保证行政效率的制度　谢元鲁　天府新论　1991年1期
论唐代秘书行政办事效率与吏治制度　潘林杉　秘书之友　1993年1期
唐勾检制与行政效率　秦建良　秘书之友　1993年7期
唐朝官吏管理体制述评　宁欣　光明日报　1994年4期
唐代甲库评述　左虹　成都档案　1986年4期
唐代的甲库考察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87年1期
论唐代的弹官及其地位升降　张连成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1991年5期
唐代的考课制度　高世瑜　东岳论丛　1983年2期
唐宋时期的考绩制度　何厚军　机构与编制　1988年8期
唐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刘钰　石油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唐代官吏考核制度评述　姜国华　实事求是　1991年5期

略述唐代的官吏考课制度　关保英　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3年7期

唐代官吏考核制度　宿志丕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唐代巡院试探　贾宪保　人文杂志　1984年3期

唐朝巡院及其在唐后期监察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　宁欣　北京师院学报　1989年6期

巡院与唐宋地方政体的转化　齐涛　文史哲　1991年5期

从财政体制的变革看唐代的历史地位　王三北　南都学坛　1991年4期

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　吴丽娱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代财政三司历史作用初探　陈丽菲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宋三司体制述论　杨倩描　河北师院学报　1990年4期

中唐后财政官制度变革刍议　吴丽娱　中国史研究　1989年4期

试论唐代经济审计监督制度　刘太祥　南都学坛　1989年1期

唐代上计报最制初探　罗亮畴　现代财经　1993年2期

度支使与支度使　齐勇锋　历史研究　1983年5期

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　卞孝萱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年1期

唐代户部使司与原户部司异同辨　杜桉　历史研究　1992年6期

唐代度支、盐运二使关系试析　何汝泉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年版

从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看唐后期户部的使职差遣　何汝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2期

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考　何汝泉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2年1期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何汝泉　西南师大学报　1986年1期

唐代盐铁转运使述论　董咸明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4期

关于唐代转运使设置的年代　徐庆全　社会科学辑刊　1992年4期

唐代专卖机构论略　陈衍德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　董恩林　湖北大学学报　1986年2期

唐代的使职差遣制　陈仲安　武汉大学学报　1963年1期

武则天时期的使职与唐代官制的变化　何汝泉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 1989年

论唐代使职的功能与作用　薛明扬　复旦学报　1990年1期

(2)地方官制

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林英男　深圳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隋代的地方制度　萨师炯　东方杂志　1945年11卷22期

论唐代地方行政区划　严耕望　(港)新亚生活双周刊　1965年8卷9期

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　杜文玉　渭南师专学报　1993年8期

唐代都护府之设置及其变迁　邝平章　禹贡　1936年5卷10期

唐代都护府述略　唐启淮　西南师院学报　1982年1期

唐代太原的总管与都督——北都研究之二　李裕民　城市研究　1989年4期

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及其性质　田尚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年3辑

唐代羁縻州府简论　程志　东北师大学报　1984年1期

括地志序略新诠　岑仲勉　史学专刊　1935年1卷1期

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　(港)1969年

关于隋朝改革地方机构问题的几点辨析　陆庆夫　兰州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刺史考》补遗·订正　郁贤皓　文教资料　1990年3期

《唐刺史考》补遗　荣新江　文献1990年2期

唐朝地方政府行政编制论要　张创新　史学集刊　1994年2期

论隋代州郡政区的整顿改革　许正文　陕西师大学报　1994年2期

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　岑仲勉　史学专刊　1936年1卷3期

唐朝地方政府行政编制论要　张创新　史学集刊　1994年2期

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　翁俊雄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91年1期

唐代府州僚佐考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港)　1969年

关于唐代晚期府、州上佐(长史、司马、别驾)的几点意见　李志生　河北学刊　1991年4期

论唐代的吏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唐代的“郎吏”小考　冻国栋　中国史研究　1990年1期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　赵吕甫　中国史研究　1989年2期
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　陈国灿　敦煌研究　1989年3期
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1期
乡官制　杨志玖等　文史知识　1985年5期
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　李晓路　历史研究　1989年3期
唐代藩镇研究述略　宋强刚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9年11期
藩镇制度沿革考　罗香林　社会科学季刊　1934年2卷9期
唐节度使建置分并考　吴翊寅　华国　1925年2卷9期
略论唐代的节度使制度　高凤林　山东师大学报　1984年6期
唐代节度使的再探讨　沙宪如　史学集刊　1994年2期
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　(港)1969年版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　杨志玖、张国刚　社会科学战线　1984年1期
唐代进奏院考略　张国刚　文史　18辑　1983年
唐建中五年孔目司文书研究　钱伯泉　新疆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3)选举制及其它
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制度的关系　刘海峰　厦门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汉唐科举异同　徐连达、楼劲　历史研究　1990年5期
隋唐的科举　陈东原　学风　1932年2卷8期
唐五代的岁贡科举　曾资生　东方杂志　1944年40期
支持官僚制度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王亚南　时与文　1947年2卷14期
唐代科举制度述论　任育才　(港)文史学报　1977年6期
唐代的科举制度　乌廷玉　社会科学战线　1987年1期
关于科举制度创制的两点小考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年版
科举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　何忠礼　历史研究　1983年

2期
《科举起源辨析》之商榷　金旭东　历史研究　1984年6期
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　周东平　历史研究　1984年6期
《千唐志斋藏志》中隋唐科举制度史料辑释　杨希义　中原文物　1992年1期
唐玄宗朝科举管理改革剖析　刘海峰　晋阳学刊　1989年5期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文集　1979年
试论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马炎心　许昌师专学报　1992年4期
科举制与衣冠户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年
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　吴宗国　北京大学学报　1982年1期
略论唐代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赵守俨　历史论丛　第3辑　1983年
唐代科举制的文化内涵初探　陈玄荣　理论学习月刊　1991年9期
论唐代进士的出身及唐代科举取士中寒士与子弟之争　傅璇琮　中华文史论丛　1984年2期
唐代的考试制度　陈森　世界月刊　1948年3卷3期
隋代的学校教育考述　夏雨　教育丛进　1986年3、4期
试论唐代教育的开放性　刘海峰　福建论丛　1987年5期
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以标准的变化　吴宗国　历史研究　1986年4期
进士科与唐代后期的官僚世袭　吴宗国　中国史研究　1982年1期
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　傅璇琮　文史23辑　1986年
唐代进士科举与唐代诗人　乔以钢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3年1期
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　任爽　中国史研究　1994年3期
唐代安徽进士考补　张宪华　学术界　1989年5期
唐朝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　乌廷玉　社会科学战线　1978年4期
唐代宾贡进士考　杨希义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年
武则天与进士新阶层　万绳楠　中国史研究　1994年3期
吐鲁番出土西凉《秀才对策文》考略——兼论汉晋隋唐时期策试制度的传承　陆庆夫　敦煌学辑刊　1989年1期
唐代秀才科存废才与秀才名目的演变　刘海峰　中国史研究　1990年

1期

唐代明经科考述　盛奇秀　东岳论丛　1985年2期

唐代明书科考述　盛奇秀　文史哲　1987年2期

唐代科举和铨选制度中的糊名暗考　杨希义　学术月刊　1991年3期

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　刘海峰　学术月刊　1991年11期

从唐代考试中的舞弊方式看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　易禾　文史知识　1994年2期

唐代制举初探　刘恩惠　松辽学刊　1984年3期

唐代制举述略　丁爱华　理论学刊　1989年5期

唐代武举述略　陈志学　四川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唐代武举初探　许友根　盐城师专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的武举　潘孝伟　安庆师专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吏部科目选　黄正建　史学月刊　1992年3期

略论唐前的铨选制度　高凤林　山东师大学报　1985年4期

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　宁欣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91年4期

唐后期铨选制度的演进　刘海峰　厦门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试论唐代举士与选官的分合　宁欣　晋阳学刊　1993年1期

唐代选官研究　宁欣　文献　1993年4期

唐代的选人与官阙　宁欣　人文杂志 1991年5期

唐代的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　张泽咸　文史22辑　1984年

唐代门荫制度考论　田廷柱　历史教学　1986年3期

唐代门荫制与选官　宁欣　中国史研究　1993年3期

唐代循资制度补正　胡宝华　河北学刊　1990年6期

论唐代荐举制度　刘太祥　许昌师专学报　1991年2期

试论唐代的左道斜封政治　任树民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4年1期

隋唐的封爵制度　徐连达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1984年1期

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　杨志玖　张国刚　文史知识　1985年12期

敦煌写本天宝官品令考释　金毓黻　说文月刊　1943年3卷10期

唐代流外官试探　郭锋　敦煌学辑刊　1986年2期

唐代流外官名例试释　任士英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89年4期

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唐流外官研究之二　王永兴　北京大

学学报　1990年2期

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　任士英　唐史论丛5辑1990年

唐代"流外出身人"叙职考　任士英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1期

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　杜文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　朱长义　荆州师专学报　1994年3期

试论唐代散官制度　马小红　晋阳学刊　1985年4期

唐代散官初论　黄正建　中华文史论丛　1989年2期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陈苏镇　北京大学学学报　1991年2期

唐代的斋郎与挽郎　黄正建　史学月刊　1989年1期

唐代的告身　白化文等　文物　1977年11期

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　朱雷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年3辑

唐代官吏休沐制度初探　尚平学　江西大学学报　1993年4期

汉唐时期的退休制度　潘镛　云南师大学报　1989年4期

唐代致仕制度初探　李翔　中国史研究　1991年1期

唐代致仕制度新论　侯仰军　历史教学　1992年6期

论唐代宣徽使　王永平　中国史研究　1995年1期

唐代枢密使考略　贾宪保　唐史论丛第2辑　1987年

唐代枢密使考略　李鸿宾　文献　1991年9期

唐末士人枢密使和后梁崇政使的设置及其影响　李郁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　王永平　史学月刊　1991年9期

论五代枢密使　杜文玉　中国史研究　1988年1期

五代枢密使(院)研究　李鸿宾　文献1989年2期

五代枢密使和枢密院初探　李郁　晋阳学刊　1990年1期

前后蜀的枢密使　贾大泉　周原孙　社会科学研究　1990年1期

内庄宅使考　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　吴杰译　1959年

唐代的内诸司使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983年5期、1984年6期

内请司使及其演变　唐长孺　山居存稿　1989年

2. 军事制度

唐代军事制度述要　郭绍林　洛阳师专学报　1993年1期

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　陈寅恪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7年7卷3期

隋文帝时的府兵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制度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54年11期

隋朝的骁果　袁起耀　文史杂志　1989年6期

隋领军府考补　李燕捷　文史32辑　1990年

唐代府兵考　杜洽　史学年报1939年3卷1期

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　张国刚　历史研究　1989年6期

唐府兵隋身七事辨　陈仲安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折冲府考校补　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　1937年

唐折冲府考补遗三条　王其祎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4期

唐折冲府增考　李方　文史36辑　1992年

弋壁滩上的唐代府兵　李方　文史知识　1992年4期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须章等名籍》考释　程喜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年3期

唐高宗永隆元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的研究　吴丽娱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

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　唐长孺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2年

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　唐长孺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　1948年9卷1期

唐初之骑兵　汪篯　汪篯隋唐史论稿　1981年

论唐代马政与边防的关系　马俊民　天津师大学报　1983年4期

唐代的健儿制　张国刚　中国史研究　1990年4期

唐代前期的兵募　唐耕耦　历史研究　1981年5期

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　南开学报　1988年1期

武则天时期边防及其与兵募的关系　秦川　社会科学　1989年4期

唐代募兵制度　杨鸿年　中国史研究　1985年3期

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　方积六　中国史研究　1988年3期

论唐初“元从禁军”　宁志新　河北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羽林军初探　宁志新　河北师院学报　1990年4期
说神策军　齐勇锋　陕西师大学报　1983年2期
中晚唐的防秋制度初探　齐勇锋　青海社会科学　1983年3期
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　齐勇锋　河北学刊　1989年2期
唐代防丁考述　张国刚　大陆杂志(台)83卷2期　1991年
神策中尉与神策军　贾宪保　唐史论丛5辑　1990年
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　方积六　文史25辑　1986年
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　张国刚　历史研究　1996年4期
唐代前期行军中押官一职的探讨　孙继民　河北学刊　1991年6期
行军在唐代军事力量体制中的地位　孙继民　河北师院学报　1994年4期
唐代的行军统帅　孙继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唐代监军制度考论　张国刚　中国史研究　1981年2期
唐代禁军组织的演变与宦官典军制度　巴新生　天津师专学报　1984年2期
后周的军制改革　齐勇锋　文史哲　1989年5期
五代后周军队的改革　万点　军事历史　1991年2期
五代禁军初探　齐勇烽　唐史论丛第3辑　1987年
五代后梁禁军探微　张其凡　安徽师大学报　1988年3期
五代后唐禁军考实——五代禁军再探　张其凡　暨南学报　1991年2期
五代后周禁军考述　张其凡　安徽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　戴显群　人文杂志　1989年6期
论唐末五代的义兵　王育民　北京师院学报　1987年2期
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　谷霁光　历史研究　1984年2期
论唐代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王赛时　人文杂志　1984年4期
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　王赛时　齐鲁学刊　1988年5期
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　张国刚　晋阳学刊　1991年3期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　张国刚　学术月刊　1989年5期

唐代军事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　孙继民　河北师院学报　1993年4期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一　程喜霖　敦煌鲁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二——唐代烽铺的管理　程喜霖　武汉大学学报　1983年5期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斷断　程喜霖　武汉大不宵报　1985年6期

3. **司法制度及律令格式**

唐代司法组织系统考　刘陆民　法学月刊　1947年3卷4期

唐代司法中的"三司"　王宏治　北大学报　1988年4期

唐代司法"三司"考析　刘后滨　北京大学学报　1991年2期

唐代司法监察得失谈　黄圭　文史杂志　1990年3期

论唐律与吏治　唐鸿儒　山西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论唐律与制敕　王立民　历史教学问题 1993年2期

律令格式　陈仲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4辑　1982年

论唐律令格式都是刑法　王立民　法学研究　1989年4期

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及东亚诸国之价值　徐道邻　图书月刊 1944年3卷2期

略论隋朝的法律　韩国磐　历史教学　1956年12期

唐律渊源辨　刘俊文　历史研究　1985年6期

北齐律对隋唐法律制度的影响初探　张丽梅　河北法学　1989年6期

略说唐初的"立法"与"守法"　宋家钰　光明日报　1978年10月24日

初唐法律论　丹尼斯·C·特威切特　张中秋译　比较法研究　1990年1期

初唐法律研究　(英)崔瑞德著　张中秋译　南京社会科学 1993年3期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　杨荫楼　齐鲁学刊　1994年5期

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本质　杨廷福　中国史研究　1979年1期

论《唐律》与唐初经济社会的协调性　张梓太　李仕安　学海　1991年3期

《唐律》"诸结合体"说质疑　姜永琳　烟台大学学服 1988 年 1 期
论《唐律》与唐初政治社会的协调性　张梓太　江海学刊　1991 年 3 期
略论唐律中的"中""平"性　张梓太　俞心慧　南京社会科学　1992 年 3 期
论大唐律令与唐代经济衰退之关系:以均田律令为中心　张中秋　江海学刊　1991 年 1 期
唐律实施问题辨析　马长林　学术月刊　1985 年 5 期
唐律实施问题探究　王立民　法学　1990 年 10 期
贞观法制初探　赵克尧　史学月刊　1981 年 4 期
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　王永兴　北京大学学报　1985 年 3 期
论唐后期法制的变化　刘俊文　北京大学学报　1986 年 2 期
唐后期对唐律的变革　王立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1 年 1 期
《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　杨廷福　文史 5 辑　1978 年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　蒋晓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 年 2 期
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　王永兴　文史 8 辑
谈《唐律疏议》三条律疏的修改问题　钱大群　南京大学学报　1989 年 5 期
论《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　王威宣　法林　1992 年 5 期
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　唐长孺　中华文史论丛　1964 年 5 期
吐鲁番新发现唐写本律疏残卷研究　刘俊文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2 集　1983 年
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　刘俊文　北京大学学报　1983 年 5 期
唐代刑事审判机关及其管辖制度　巩富文　西北大学学报　1989 年 4 期
试论唐朝司法审判的法律依据　张中秋　吉林　1987 年 3 期
浅谈唐代的刑罚制度　蒲硕棣　法制日报　1990 年 4 月
唐初的"用刑宽简"和"恤刑慎杀"　王国平　文史知识　1992 年 3 期
唐代审判制度考　刘陆民　法学月刊　1947 年 2 期
唐代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　巩富文　西北大学学报　1989 年 4 期

试谈唐律对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　陈炯　河南大学学报　1990年5卷1期

论唐律对官吏罪责追究的制度　钱大群　江苏社会科学　1992年3期

论唐律对封建官吏选任考核制度的维护　袁建勇　法学评论　1983年1期

唐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探析　巩富文　政治与法律　1993年1期

论唐律对官吏擅权行为的惩治　袁健勇　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3年2期

论唐代官吏的贪污罪　周东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年4期

简论唐律对官吏犯赃定罪量刑的规定　袁健勇　中国政法学院学报　1992年2期

论唐代惩治官吏罪的特点　周东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唐故事惯例性论略　霍存福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3年6期

唐律职务犯罪管见　包雯　河北法学　1993年5期

浅论唐前期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刑事法律　张少瑜　南京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唐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及其影响　曹贵乾、蔡东春　百科知识 1991年11期

唐代户婚律溯源　胡咏超　(港)新亚学院学术年刊　1961年3期

唐律户籍管理的特点　陈炯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　1989年1期

唐代民事法规缀要　王志刚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87年4期

唐律自首制度初探　明廷强等　齐鲁学刊　1990年5期

论唐代流放制度　齐涛　人文杂志　1990年3期

也谈李白流夜郎与唐律适用　张春生　全懋初　扬州师院学报　1994年2期

唐律中数罪并罚制度浅析　钟斌　山东法学　1992年2期

唐代俘虏政策述略　朱利民、冉万里　唐都学刊　1992.2

令式分辨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　霍存福　当代法学　1990年3期

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　霍存福　法学

研究 1990 年 4 期
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　刘俊文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 年
传世文献中所见唐式辑存　韩国磐　厦门大学学报　1994 年 1 期
唐式性质考论　霍存福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　1992 年 6 期
关于《大唐六典》的行用问题　韩长耕　中国史研究　1983 年 1 期
试论《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张弓　史学月刊　1983 年 3 期
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　王超　中国社会科学　1984 年 1 期
《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　宁志新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年 2 期
《唐六典》户部卷与《开元十道图》　牛来颖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 5 期
学林本《唐大诏令集》点校商兑　韩理洲　西北大学学报　1994 年 2 期
隋唐律令与日本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日）池田温　武汉大学学报 1989 年 3 期
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　李衡眉　人文杂志　1993 年 1 期
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　雷庆　郑显文　松辽学刊　1993 年 2 期
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　杜文玉等　思想战线　1986 年 4 期
五代刑法残酷说质疑　杜文卫　渭南师专学报　1992 年 1 期

三、经　济

1. 通论

隋唐五代经济史概论　吕振羽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1935 年 2 卷 4 期
隋唐经济史研究　叶企荪　中国经济　1936 年 2 卷 4 期、6 期
隋唐五代的生产力发展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 年
论隋代经济高涨的原因　梁方仲　历史教学　1956 年 12 期
绝非“竭泽而渔”而是“开源节流”，亦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吴建华　湖北师院学报　1990年2期

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　朱伯康　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1期

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　苏双碧　历史教学　1979年8期

唐太宗经济思想初探　李季实　殷都学刊　1994年4期

唐玄宗的经济政策　潘镛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3期

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　金宝祥　甘肃师大学报　1981年2期

论唐中叶第五琦的经济措施及影响　俞钢　上海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论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地位　黄冕堂　山东大学学报　1957年1期

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开发　梁勤　陕西师大学报　1982年4期

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　黄新亚　陕西师大学报　1984年1期

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　周殿杰　学术月刊　1982年9期

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　曹尔琴　历史地理2辑

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　董咸明　云南社会科学　1985年6期

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　史念海　扬州师院学报　1982年2期

论“扬一益二”　谢元鲁　唐史论丛第3辑　1987年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　郑学檬　陈衍德　光明日报　1988年6月15日

唐代江西道的经济和人文活动一瞥　韩国磐　江西社会科学　1982年4期

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杜文玉　江西社会科学　1989年4期

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　郑学檬　学术月刊　1983年2期

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　林立平　史学集刊　1984年2期

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启淮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年4期

唐代福建的经济开发　陈衍德　福建论坛　1987年5期

唐代江汉地区经济初探　王赛时　林立平　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1988年

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　郑学檬　厦门大学学报　1987年1期

唐代宣歙镇之雄富　韩国磐　江海学刊　1992年3期

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　韩国磐　厦门大学学报　1956年1期

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　郑学檬　历史研究　1985年4期

论前后蜀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武建国　四川大学学报　1983年1期

吐鲁番出土唐代经济文书札记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1期

2. **农业**

唐代实际耕地面积　汪篯　汪篯隋唐史论稿　1981年

唐代农民经济的初步考察　郑学檬　中国经济史论文集　1981年

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　陶希圣　食货4卷7期　1936年

唐代灌溉业的发达　韩国磐　光明日报　1954年6月24日

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　邹逸麟　历史教学　1959年12期

唐代的水利建设　宋锡民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　1981年2期

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　孙晓林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武大出版社1983年

唐代的农田水利建设　阎守诚　晋阳学刊　1986年2期

唐代敦煌地区农业水利问题初探　宁欣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集　1986年

唐代敦煌绿州水系考　李并成　中国史研究　1987年1期

由唐王朝之忽视农田水利评唐王朝的历史地位　傅筑夫　唐史论丛2辑　1987年

隋唐长安的水利工程　郭声波　唐史论丛4辑　1988年

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影响　钮海燕　历史地理　1992年总11期

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　屈弓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唐宋以前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梁向明　固原师专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曲辕犁研究　宋兆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1期

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　鲁全才　武汉大学学报　1980年6期

唐代水车的使用和推广　唐耕耦　文史哲　1978年4期

唐人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李伯重　中国农史 1986年2期

唐代关中农业经济的主要产品及其地理分布　杨希义　西北大学学报 1986年1期

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　史念海　唐史论丛2辑　1987年

唐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　史念海　唐史论丛3辑　1987年

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　于德源　中国农史　1992年2期

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　张泽咸　文史　18辑1983年

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　华林甫　中国农史　1992年2期

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　林立平　暨南学报　1984年1期

唐代粮食亩产量　胡戟　西北大学学报　1980年3期

唐代江南地区粮食亩产量与农户耕田数　李伯重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2期

李皋在江陵创造的唐代粮食单产记录　胡戟　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1988年

唐代植树造林述略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84年3期

唐代茶业　唐耕耦　张秉伦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4期

汉唐时期的茶叶　张泽咸　文史11辑　1981年

唐代的茶叶生产　王洪军　齐鲁学刊　1987年6期

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　贾大泉　天府新论　1987年4期

略论唐代花卉业的发展　黄满仙　农业考古　1987年2期

唐代的碾硙业　梁忠效　中国史研究　1987年2期

唐代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　韩茂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

唐宋时期的渔业生产　陈明伟　农业考古　1994年3期

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民副业生产的发展　李伯重　厦门大学学报 1982年4期

从《状江南》组诗看唐代江南生态环境　郑学檬　唐研究(1)　1995 年

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　汪籛　汪籛隋唐史论稿　1981 年

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　史念海　河山集　三集　1988 年

唐代关中无丝绢说质疑　杨希义　人文杂志　1987 年 4 期

唐代关中地区寡蚕桑的原因试探　徐庆全　辽宁大学学报　1989 年 2 期

唐代蚕桑事业的地理分布　赵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 年 2 期

唐代的蚕桑生产技术　赵丰　中国农史　1991 年 4 期

唐朝前期马牧业发达的原因　徐嫩棠　人文杂志　1994 年 6 期

3. **手工业**

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1959 年

吐鲁蕃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　冻国栋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 年

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　卞孝萱　文物　1977 年 9 期

唐代淮南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周东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 年 3 期

试论唐代纺织业的地区分布　王永兴　魏晋隋唐史论集 2 辑　1983 年

唐代江南和四川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孔祥星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唐宋前后长江中游地区纺织原料结构的变迁　赵丰　**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1988 年

敦煌遗书中的丝织物　王进玉　丝绸史研究　1987 年 1、2 期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纺织手工技术在西域的传播　唐长孺　出土文献研究　1985 年

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　杨希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 年 3 期

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　郑学檬　卢华语　社会科学战线　1994 年 1 期

浅谈唐代绢和锦的地方特色　卢华语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年 4 期

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　铁凡　文化批判 1 卷 4、5 期　1934 年

唐代矿物产地表　邓嗣禹　禹贡　1卷11期　1934年
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　陈衍德　盐业史研究　1988年4期
《新唐书·食货志》有关井盐记载释疑　吴天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年4期
唐代盐产地的研究　吉成名　温州师院学报　1989年1期
隋唐时代的造纸　王明　考古学报　1956年1期
隋代瓷器的发展　李知宴　文物　1977年2期
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分期　李知宴　文物　1972年3期
五代之瓷器　傅振伦　学术杂志　1卷1期　1943年
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陶瓷生产　林桂枝　福建史志　1990年5期
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及生产　任荣兴　史林　1994年3期
关于隋唐船舶的二三事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57年4期
技术进步:唐五代航运业发展的动力　郑学檬　中国史论集　1994年
一件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季羡林　历史研究　1982年1期
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　郑炳林　西北史地　1994年1期
中国烧酒起源探微　李华瑞　历史研究　1993年5期
中国烧酒名实考辨　王赛时　历史研究　1994年6期
唐代印纸考　杨希义　人文杂志　1990年4期

4. **商业**

唐代的商业与商品生产　李文海　历史教学　1956年4期
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　郑学檬　厦门大学学报 1980年4期
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　郑学檬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年
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　秦晖　陕西师大学报　1991年2期
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　薛平拴　陕西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关于唐宋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　孔经纬　新史学通讯　1956年3期
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傅筑夫　陕西师大学报　1979年1期
唐代封建政府对商的政策及其影响　张邻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年1期

论唐代中期以后商贾势力的膨胀　张邻　学术月刊　1985年1期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王林善　晋阳学刊　1989年3期

唐代官员经商问题浅析　王灵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　姜伯勤　历史研究　1990年3期

唐代都市中的邸店与牙人　傅安华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47期 1935年8月8日

唐代的邸店　梁中效　华中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唐五代时期的牙人　张弓　魏晋隋唐史论集1辑　1981年

唐代管理市的法令　陶希圣　食货4卷8期　1936年9月

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　武建国　思想战线　1988年3期

简述唐代的集市贸易及其管理　初德维　青海师大学报　1993年1期

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　全汉升　食货　1卷2期　1934年

唐代的庙市　谢重光　文史知识　1988年4期

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　鞠清远　食货3卷6期　1936年

唐代岭南的墟市　何格恩　食货　5卷2期　1937年1月

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初探　刘志坚　兰州学刊　1986年4期

唐代的夜市　张邻　中华文史论丛　1983年1期

唐代“宫市”之补证　李东　安徽史学　1986年3期

唐代“宫市”考　张艳云　陕西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我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　全汉升　现代史学2卷1、2期　1934年

唐宋时代“行”的观察　李冰若　暨大文学院集刊　2卷　1931年6月

我国帮行制度的发展　叶乐群　复兴月刊　3卷1期　1934年

略论唐代行会的形成　朱淑瑶　广西师院学报　1983年9期

中国行会源于唐代“行社”说　魏承思　华东师大学报　1989年6期

略论唐代的手工作坊与行会　魏明孔　西北师大学报　1989年2期

专制主义在唐代行会制度的表现　王永兴　光明日报　1956年2月16日

唐天宝以后范阳郡各行的题记　曾毅公　文物　1959年9期

隋唐时代都市与商业的盛衰　吴云瑞　中央日报　1946年10月5日

隋唐宋时代城市的发展　束世澂　历史教学问题　1959年3期

隋唐城址的类型　宿白　考古学论考　10辑　1984年

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　史念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4年4期

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　史念海　唐史论丛6辑　1995年

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　郭正忠　天津社会科学　1986年2期

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　林立平　暨南学报　1989年2期

五代的都市与商业　陶希圣　食货　1卷10期　1935年4月

隋代长安城和洛阳城　宿白　考古　1978年6期

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　曹尔琴　唐史论丛1辑　1987年

唐代都市商业的历史性变化与"行"的产生　傅筑夫　唐史论丛1辑　1987年

唐长安的商人与商业　曹尔琴　唐史论丛2辑　1987年

唐代长安的商业区　高林生　文史知识　1989年8期

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　武仙卿　食货5卷1期　1937年

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　全汉升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八本　1944年

唐代开放政策对扬州的影响　朱江　江苏商专学报　1990年1期

略论唐代扬州繁荣的社会基础　常振江等　扬州师院学报　1981年2期

唐代扬州商业探析　许万里　北京商学院学报　1992年2期

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　柴德赓　江苏师院学报　1979年1、2期

唐代南昌地方的繁荣情形　冯汉镛　光明日报　1958年3月31日

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李孝聪　北京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唐代剑南道的经济状况与李唐的兴亡　冯汉庸　中国史研究　1982年1期

唐朝的货币　黄君默　食货　4卷11期　1936年

五代货币制度　戴振辉　食货2卷1期　1935年

唐朝的钱荒　陶希圣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　6卷3期　1936年
略论唐代发生钱荒的主要原因　黄成　杭州大学学报　1989年4期
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　乔幼梅　历史研究　1990年2期
唐宋政府税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　全汉升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　1948年
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　李埏　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1集　1962年
唐代“除陌”释论　陈明光　中国史研究　1984年4期
唐代“除陌”商探　杜来梭　中国史研究　1991年2期
再论唐代的“除陌”　陈明光　中国史研究　1992年2期
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　王永兴　社会科学5卷2期　1949年
中晚唐之估法　刘淑珍　史学集刊　1950年6期
唐前期市估法研究　卢向前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
中晚唐钱重物轻问题和估法　赵和平　北京师院学报　1985年4期
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　薛平拴　陕西师大学报　1995年3期
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　李锦绣　北京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略论唐朝的虚钱和实钱　魏道明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　郭媛　中国史研究　1990年4期
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式初探　林友华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
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　卢向前　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1992年
唐代物价的变动　全汉升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　11本　1944年
由唐代的物价变动看唐王朝的兴衰　傅筑夫　唐史论丛3辑　1989年
唐代物价与物价管理　梁仲勋　西北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唐西陲物价考　王仲荦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5集　1992年
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　张勋燎　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3期
敦煌所出的唐沙州某市时价薄口马行时估考　朱雷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　郑学檬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7年

唐代的飞钱　胡如雷　光明日报　1956年6月7日

关于唐代飞钱的性质问题　李家寿　财经研究　1994年3期

唐代之高利贷事业　刘兴唐　食货1卷10期　1935年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　唐耕耦　敦煌学辑刊　1986年1期

唐代的民间借贷　陈国灿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唐前期西州地区高利贷盘剥下均田百姓的分化　卢开万　敦煌学辑刊 1984年2期

关于唐宋借贷利率的计算问题　黄向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4期

唐前期公廨本钱的管理制度　李锦绣　文献　1991年4期

略谈敦煌地志中的公廨本钱　薛英群　兰州大学学报　1980年2期

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　吴震　文史13、14辑　1982年

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　马世长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变　陈国灿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唐代农村的变换与借贷　傅安华　大公报·史地周刊　21期　1935年2月7日

跋天宝十三载便麦契　沙知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1994年

唐宋之际城市租赁业初探　林立平　中国史研究　1988年3期

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　乌廷玉　历史教学　1957年2期

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吴泰　海交史研究3期　1981年

唐代对外贸易及其成就　何敦烨　史学月刊　1989年6期

记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　沈福伟　海交史研究2期　1986年

唐宋两代广州之对外贸易　沧州　新民月刊2卷3期　1936年

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　李庆新　中国史研究　1992年4期

唐代广州市舶管理的几个问题　邓瑞本　岭南文史　1987年1期

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　陆韧　海交史研究　1988年1期

唐代扬州市舶司的机构及其职能　朱江　海交史研究　1988年1期

唐代南海贸易志　韩振华　福建文化2卷3期　1942年

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　林家劲　学术研究　1979年6期

五代福建对外贸易　韩振华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2期

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的唐人航线　岑仲勉　东方杂志4卷18期　1945年

5. **交通**

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　樊文礼　海交史研究　1994年2期

唐代交通　章群　香港浸礼会学院学报　4卷1期　1977年

唐两京馆驿考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　1969年

丝绸之路概述　孙培良　陕西师大学报　1978年3期

唐代两京驿路考　王文楚　历史研究　1983年6期

唐关内道驿馆考略　李之勤　唐史论丛1辑　1987年

唐五代岭南道交通线述略　陈伟明　学术研究　1987年1期

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　林家劲　学术研究　1979年6期

隋运河考　张崑河　禹贡7卷1、3期合刊　1936年

略论唐代的漕运　杨希义　中国史研究　1984年3期

隋唐汴河考　邹逸麟　光明日报　1962年7月4日

唐代的黄河与汴河　陈正祥　(港)新亚学报11卷下　1976年

唐王朝的生命线——漕运　傅筑夫　唐史论丛1辑　1987年

隋唐运河与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发展　何荣昌　古代长江中下游经济开发　1988年

唐代江淮至关中漕运路线考　周庚鑫　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　1987年

隋唐时期河北永济渠运输的兴衰　郑平　河北学刊　1988年6期

隋唐通济渠在交通上之功能　严耕望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辑　1990年

唐后期淮颍水运的利用与影响　王力平　河北学刊　1991年2期

唐代的官邮　史式　集邮　1963年5、6期

唐代驿制考　陈源远　史学年报1卷5期　1938年8月

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　鲁才全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辑　1984年

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　王宏治　敦煌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集

1986年

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　鲁才全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问题　鲁才全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1年总3期

试论唐代前期长行坊制度　孙晓林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传马坊文书研究　卢向前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唐代的"传"与"递"　黄正建　中国史研究　1994年4期

唐宋四川馆驿汇考　成都大学学报　1990年4期

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　孙晓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89年

唐代运纲研究　王力平　中国古史论丛

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　程喜霖　西域研究　1995年1期

护照与签证功能合一的过所　程喜霖　文史知识　1992年8期

入唐僧带来的公验和过所　(日)砺波护著　龚卫国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3辑　1991年

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与行马　王冀青　敦煌学辑刊　1986年2期

唐代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　王冀青　敦煌学辑刊　1985年2期

试析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　王仲荦　文物　1975年7期

唐代的公验与过所　程喜霖　中国史研究　1985年1期

6. **财政**

浅谈隋初财政充实的原因　孙文学　财政研究资料　25期　1981年

略论隋文帝的"国计之富"的原因　竺培升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1期

杨坚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富有"的关系　王士立　史学月刊　1985年9期

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　魏承思　历史教学问题　1985 年 3 期
唐代的财政与国运　姚徽元　文化先锋　5 卷 25 期　1946 年
中唐的财政危机及其对策　吴枫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试论安史之乱对唐朝前期国家财政体系崩坏的影响　陈明光　求是学刊　1990 年 1 期
唐宋地方财政特点初探　韩曙　财政研究　1986 年 1 期
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　董恩林　湖北大学学报　1986 年 5 期
我国唐代审计的特点　周树大　中国审计　1986 年 9 期
评陈寅恪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问题　宁可　光明日报　1959 年 1 月 22 日
唐代财政中心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　袁英光　李晓路　北京师院学报　1985 年 3 期
中晚唐赋入“止于江南八道”说辨疑　齐勇锋　唐史论丛　2 辑　1987 年
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　陈衍德　厦门大学学报　1987 年增刊
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　周殿杰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 年
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　1989 年 4 期
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陈明光　福建师大学报　1984 年 2 期
论刘晏的财政改革　王棣　晋阳学刊　1994 年 1 期
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唐任伍　河南师大学报　1994 年 5 期
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　秦永洲　山东师大学报　1994 年 4 期
唐宋政府税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　全汉升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　20 册上　1948 年
北周与隋代的租额　胡戟　兰州大学学报　1984 年 3 期
隋唐时代的地租制度　余也非　重庆师院学报　1990 年 1 期
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　李伯重　唐史论丛 2 辑　1987 年
论唐代租庸调制度　曹道安　财政评论　13 卷 5 期　1945 年
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　邓广铭　历史研究　1954 年 4 期
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　韩国磐　历史研究　1955 年 5 期

租庸调与均田制有无关系　岑仲勉　历史研究　1955年5期

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辨析　邢铁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2期

唐代租庸调的作用及意义　胡如雷　天津师院学报　1957年2期

唐代租庸调的数量问题　唐森　史学月刊　1958年5期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　王炳华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年

租庸调法的“庸”之制度化在于何时?冯尔康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年

唐代庸制刍论　邢铁　思想战线　1986年3期

唐代前期的户等与租庸调的关系　唐耕耦　魏晋隋唐史论集1辑　1981年

唐代的户税　鞠清远　食货1卷8期　1935年

关于唐代户税的几点意见　王珠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83年1期

关于唐中期户税的税额税率和计征　王珠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85年1期

唐代户税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卢开万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89年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杨际平　新疆社会科学　1989年1期

唐代“地子”考释　鲍晓娜　社会科学战线　1987年4期

试论唐代地税的渊源及其演变　游翔　中国农史　1993年1期

唐代的资课　唐耕耦　中国史研究　1980年3期

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　李春润　中国史研究　1983年3期

略论唐代的资课　李春润　中华文史论丛　1983年3期

唐代前期临时别差科问题的提出　唐耕耦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年3期

唐代前期仗身制的考察　黄惠贤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唐代长安的纳课户　唐刚卯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年

唐代的两税法　鞠清远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　1936年

支持官僚社会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王亚南　时与文2卷11期　1947年

怎样理解两税法　胡思庸　新史学通讯　1卷2期　1951年

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　岑仲勉　历史教学 2 卷 5、6 期　1951 年

唐代两税法的内容和产生背景是怎样的？　岑仲勉　历史教学　1956 年 3 期

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　束世澂　历史教学问题　1958 年 2 期

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　陈野　史学月刊　1958 年 7 期

唐代两税法研究　胡如雷　天津师院学报　1958 年 3 期

论唐代的两税法　金宝祥　甘肃师大学报　1962 年 3 期

对于两税法的考释　张维华　山东大学学报　1963 年 4 期

唐代两税法研究　王仲荦　历史研究　1963 年 6 期

唐代两税法杂考　黄永年　历史研究　1981 年 1 期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李之勤　人文杂志　1982 年 3 期

浅析两税法中"量出制入"的制税原则　魏明孔　中学历史　1983 年 4 期

唐代两税法征收内容辨析　丁柏传　陈作梁　河南师大学报　1984 年 1 期

"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陈明光　历史研究　1986 年 1 期

唐代两税法前的户税　朱睿根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 年 3 期

唐代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　赵和平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 年

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　张泽咸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 年 1 期

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　1987 年增刊

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　陈明光　中国史研究　1988 年 4 期

唐后期"租"、"租税"或租赋的含义　沈世培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年 2 期

唐代财政史两题平议　李晓路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年 1 期

也谈两税法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　吴丽娱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 年

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　郑学檬　历史研究　1992年4期
唐后期的民户大迁徙和两税法　翁俊雄　历史研究　1994年3期
近四十年来"两税法"研究综述　魏明孔　刘进宝　文史知识　1990年9期
五代两税述论　郑学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年4期
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体制　陈明光　中国史研究　1989年1期
中唐以后敦煌税法的变化　堀敏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年1期
五代十国的杂税　郑学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年4期
唐前期的附加税　李锦绣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年
唐前期"轻税"制变初探　李锦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年1期
唐代的商税　傅安华　华北日报　1935年7月11日
唐代商税辨析　张邻　周殿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1期
浅论唐代征商制变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李智　李茜　经济问题　1987年3期
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　陈衍德　学术月刊　1988年6期
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　陈衍德　厦门大学学报　1987年增刊
唐代专卖收入初探　陈衍德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1期
唐代的酒类专买　陈衍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1期
茶税始年辨析　鲍晓娜　中国史研究　1982年4期
唐代的茶法考略　陈衍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1期
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茶与榷茶——唐代茶业史研究之二　王洪军　齐鲁学刊　1989年2期
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　鲍晓娜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2期
论唐代榷盐制度　齐涛　山东大学学报　1989年4期
唐代的榷盐与刘晏的改革　朱睿根　平准学刊3辑下册
五代盐政初探　穆祥桐　平准学刊4辑下册
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　刘荣春　谢茂林　江西师大学报　1994年2期

试论唐代食盐专法的演变　陈衍德　历史教学　1988 年 2 期
唐代中央与地方分割盐利的斗争　陈衍德　江海学刊　1989 年 2 期
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　吴丽娱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 年 4 期
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其对五代盐政之影响　吴丽娱　唐研究(1)　1995 年
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失　王力平　盐业史研究　1989 年 4 期
五代盐法钩沉　郑学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 年 1 期
五代蚕盐考　郭正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年 4 期
五代的屋税蚕盐　吴丽娱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 年
唐代土贡资料系年　王永兴　北京大学学报　1982 年 4 期
唐代藩镇进奉试析　杨志玖　张国刚　文史 28 辑　1987 年
论唐朝方镇“进奉”　陈明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年 1 期
读《高力士传》释“变造”、“和籴”之法　俞大纲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 5 卷 1 期　1935 年
对唐代“和籴”的分析　徐寿坤　历史教学　1957 年 2 期
唐代和籴制度新探　卢开万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年 1 期
唐代和籴制度述论　李雪华　贵州大学学报　1985 年 2 期
试论唐后期的和籴制度　杨际平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 年
试论盛唐军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郭绍林　史学月刊 1987 年 4 期
论唐代和籴　魏道明　陕西师大学报　1987 年 4 期
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　赵文润　唐史论丛 5 辑　1990 年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　卢向前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5 辑　1990 年
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　卢向前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991 年
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考释　黄永年　新史学 4 卷 2 期　1993 年

唐宋时期和籴制度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袁一堂　人文杂志　1994年1期

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　王永兴　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　1990年

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年3期

论中唐以后官府粮食的市籴　袁一堂　中国史研究　1994年2期

唐代的左藏、右藏与内藏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95年5期

唐代义仓的赋税化　赵文润　陕西师大学报　1987年4期

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与常平义仓制度　陈明光　中国农史　1988年4期

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　王朝中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年3期

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的漕运和粮食　邹逸麟　文物　1974年2期

唐代太仓试探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85年4期

唐代天宝年间军费开支蠡测　胡宝华　文史33辑　1991年

武德年间内外官俸禄的考察　黄惠贤　江汉论坛　1983年6期

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陈寅恪　清华学报10卷4期　1935年

唐代官吏的俸料钱　阎守诚　晋阳学刊　1982年2期

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　刘海峰　晋阳学刊　1984年5期

唐代官吏的罚俸制变　马长林　历史教学　1984年6期

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　刘海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年2期

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　刘海峰　厦门大学学报　1985年2期

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的几点意见　王珠文　晋阳学刊　1985年4期

再析唐代官员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　刘海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4期

唐代户部使司开支京官俸料时限考　杜梭　晋阳学刊　1989年3期

唐安史兵兴后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　王振芳　山西大学学报　1990年3期

试论唐前期京官俸料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陈明光　史林　1992年1期

唐代官禄制度考略　高原　晋阳学刊　1993年4期

唐代给禄的依据　李燕捷　历史教学　1994年8期

唐代禄制与内外官之轻重　李燕捷　河北学刊　1994年5期

唐代的食封制度　韩国磐　中国史研究　1982年4期

关于唐代封户交纳封物的几个问题　黄正建　中国史研究　1983年4期

论唐玄宗对食封制度的改革　阎守诚　北京师院学报　1983年3期

唐朝的“食封家”与“封户”　马俊民　天津师大学报　1986年3期

论唐代职田经营及官吏对自耕农的地租剥削　李文润　江汉论坛　1988年7期

7. **人口、赋税**

隋代户数的增长　汪籛　光明日报　1962年6月6日

隋代户数是怎样增长的　熊铁基　江汉学报　1962年10期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　李德涛　学术月刊　1982年10期

隋朝人口增长考异　滕泽之　人口研究　1988年3期

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初步分析　洪廷彦　中国史研究　1987年3期

隋代人口若干问题管见　冻国栋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辑　1988年

隋代户数增长情况分析　李燕捷　河北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隋开皇大业间户口盛衰考实　陶文牛　北京师院学报　1992年4期

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　陶文牛　晋阳学刊　1993年2期

隋末唐初户口锐减的原因试探　刘进宝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9年3期

唐代的人口　易曼晖　食货　3卷6期　1936年

唐代的人口　杨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卷2期　1979年

唐代人口考　王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　黄盛璋　历史研究　1980年6期

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　林立平　江汉论坛　1983年9期

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　郑学檬　敦煌学辑刊　1984年1期

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　胡道修　中国史研究　1984年4期

唐《贞观十三年大簿》研究　翁俊雄　平准学刊5辑　1989年

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　卞孝萱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2期

《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户口考　黄约瑟　东方文化4卷2期　1986年

《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　翁俊雄　历史研究　1986年4期

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和系年校勘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87年3期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　刘海峰　厦门大学学报　1987年3期

关于唐代长江中游人口经济区的考察　孙继民　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1988年

唐代淮南道区划、人口考　周东平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8年

论唐代南北方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　王育民　上海师大学报　1992年4期

唐元和长庆年间户口考　陶文牛　首都师大学报　1993年3期

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4期

安史之乱后唐人口损耗原因论　周宏伟　青海师大学报　1987年3期

中晚唐买卖人口的原因是什么？（读《童区寄传》札记）　沈端民　零陵师专学报　1986年1期

唐代云南地区人口迁移问题初探　赵鸿昌　云南社会科学　1987年4期

渤海国人口考略　魏国忠　朱国忱　求是学刊　1983年3期

唐代人口的流转　黄谷仙　食货　2卷7期　1935年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组织的移民　冻国栋　河北学刊　1992年1期

唐五代移民入蜀考　谢元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4期

唐末五代时期光州人口的南徙入闽　刘梅生　信阳师院学报　1983年

五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杜文玉　高长天　延安大学学报　1989年2

期

关于唐代的逃户　黎仁凯　文史哲　1982年4期

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　傅安华　食货1卷4期　1935年

关于武周统治末年的浮逃户　唐长孺　历史研究　1961年6期

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　朱雷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问题　翁俊雄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开元天宝之际的逃户　翁俊雄　历史研究　1991年4期

唐后期民户迁徙与两税法　翁俊雄　历史研究　1994年3期

宇文融括户的评价问题　李春润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1期

唐代北人迁赣及其社会效果　萧高洪　江西社会科学　1992年6期

唐代人口死亡原因初探　李燕捷　河北师院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统治阶级年寿刍议　卢华语　贵州师大学报　1992年3期

唐代皇室人口平均寿命研究　李燕捷　中国史论集　1994年

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　王国维　观堂集林17册　1922年

唐代手实初探　宋家钰　魏晋隋唐史论集1辑　1981年

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　宋家钰　历史研究　1981年6期

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　唐长孺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王珠文　山西大学学报　1983年2期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户籍残卷研究　荣新江　西域研究　1995年1期

唐代户等与田产　杨际平　历史研究　1985年3期

唐代定户等赀中包括土地　李晓路　历史研究　1985年3期

隋唐五代户等制度研究　邢铁　文史40辑　1994年

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　宁可　光明日报　1959年9月3日

唐代计帐制度探索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88年3期

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王永兴　历史研究　1957年12期

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　王永兴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唐代的力役　张泽咸　魏晋隋唐史论集 1 辑　1981 年

略论唐代之杂徭役　辜燮高　新中华 4 卷 24 期　1946 年

试论唐代后期农民的赋税负担　陈仲安　武汉大学学报　1979 年 2 期

唐代前期的杂徭　唐耕耦　文史哲　1981 年 4 期

略论唐代中男的徭役负担　李春润　朱淑瑶　广西师院学报　1981 年 4 期

关于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　张泽咸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年 4 期

对吐鲁番所出四角萄役夫文书的考察　程喜霖　中国史研究　1986 年 1 期

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方对"差役"的分割　陈明光　社会科学家 1986 年 2 期

唐代色役管见　唐长孺　山居存稿　1989 年

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　张泽咸　中国史研究　1994 年 4 期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杨际平　历史研究　1994 年 3 期

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　陈明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年 3 期

麹氏高昌赋役制度考辨　谢重光　北京师大学报　1989 年 1 期

8. **土地制度**

唐代土地问题概况　武仙卿　食货 5 卷 4 期　1937 年

关于唐朝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变化问题　孔经纬　新史学通讯 1955 年 7 期

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　金宝祥　历史教学与研究　1959 年 3 期

有关北朝隋唐均田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杨际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89 年 3 期

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　金宝祥　甘肃师大学报　1978 年 3 期

北齐隋朝均田令补遗　武建国　思想战线　1990 年 6 期

隋唐之均田　曾了若　食货 4 卷 2 期　1936 年

隋代均田制研究　翁俊雄　历史研究　1984 年 4 期

论隋代均田令的改革及其原因与影响(隋代田令研究之二)　赵云旗 晋阳学刊　1991 年 2 期

隋代均田制实施探讨　赵云旗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年3期
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　李必忠　四川大学学报　1955年
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　乌廷玉　东北人民大学学报　1955年1期
唐代均田制研究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55年5期
均田制度产生及其破坏　唐长孺　历史研究　1956年6期
唐代均田为闲手耕弃地说　陈登原　历史研究　1958年3期
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　杨志玖　历史教学　1962年4期
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　韩国磐　历史研究　1962年4期
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　唐耕耦　山东大学学报　1963年1期
论唐代的均田制　王永兴　北京大学学报　1987年2期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田令颁行年代　徐庆全　北京师院学报　1988年4期
唐籍帐中残卷证明了唐代造籍均田之勤　韩国磐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
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之性质　武建国　历史研究　1981年3期
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辩析　赵俪生　文史哲　1981年3期
有关唐朝均田制内容的几个问题　宋家钰　光明日报　1985年3月20日
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　杨际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82年4期
从敦煌户籍看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年3期
唐代请田制度初探　唐刚卯　敦煌学辑刊　1984年1期
关于均田令中农民受田标准的依据问题　李伯重　历史教学　1982年2期
略论均田制中奴婢受田及其变化的原因　武建国　历史教学　1982年11期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奴婢、官吏的授田与限田　杨际平　厦门大学学报

1983年4期

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合受田"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期 1980年

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和丁中问题 唐长孺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 杨际平 唐史论丛1辑 1987年

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综述 武建国 云南社会科学 1984年2期

唐、日民户授田制度相异问题试释:均田制与班田制比较研究之一 宋家钰 晋阳学刊1988年6期

"自田"考释 侯绍庄 社会科学(甘肃) 1981年2期

唐代敦煌地区户籍和手实中的"自田"问题 张维训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1期

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均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 胡如雷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年2期

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年1期

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 黄永年 文史 19辑 1983年

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 赵吕甫 中国史研究 1984年4期

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与部田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期 1986年

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 韩国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年2期

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际授田标准考 鲍晓娜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年3期

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 王永兴 中国史研究 1986年1期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永业、口分田的区别及其性质 宋家钰 中国史研究 1986年1期

再论唐代西州的田制 韩国磐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

年

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补正　杨际平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 年

唐初中原地区均田制实行情况初探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89 年 6 期

唐代均田地段四至辨析　杜绍顺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1989 年

唐初西州土地管理方式　卢向前　唐研究(1)　1995 年

《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整理与断代　卢向前　学人 9 辑　1996 年

麴斌造寺碑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　马雍　文物　1972 年 12 期

高昌国的占田制度　陈国灿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1 辑　1989 年

麴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上、下)　杨际平　新疆社会科学　1987 年 3、4 期

唐田令研究　王永兴　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　1981 年

唐田令与“均田令”、“已受田”与“见营田”的关系　杨际平　历史教学问题　1990 年 5 期

论隋代均田令诸问题　赵云旗　中国史研究　1993 年 4 期

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　赵云旗　学术月刊　1993 年 10 期

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　杨际平　社会科学(甘肃)　1983 年 2 期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　杨际平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 年

吐蕃在敦煌计口授田的几个问题　杨铭　西北师大学报　1993 年 5 期

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　冷鹏飞　敦煌学辑刊　1984 年 1 期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杨际平　敦煌学辑刊　1988 年 1、2 期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试析　高敏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 年 3 期

唐玄宗朝土地关系的矛盾及其调整略论　牟发松　武汉大学学报　1992 年 3 期

武则天长安二年西州括田括户中官府勘田文书考释　王永兴　出土文献续集

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籍簿考释　陈国灿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　陈国灿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从均田制到庄园制经济的变化　韩国磐　历史研究　1959年5期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　杨志玖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集(上)　1962年

唐代庄园制问题　林天蔚　书月季刊　11卷3期　1927年12月

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　孙以坚　中法大学月刊　2卷3、4期　1933年

唐代庄园考　王辑五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　2卷3期　1943年

关于唐朝的"庄"　乌廷玉　光明日报　1957年12月19日

唐代的庄园　敦士浩　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1958年

唐代的田庄　胡节　历史教学　1958年12期

唐代庄园制说质疑　关通　山东大学学报　1963年4期

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与郭圣铭同志商榷之一　郑昌淦　历史研究　1964年2期

中唐以后的地方田庄经济　张维华　山东大学学报　1963年3期

唐宋庄园制度质疑　邓广铭　历史研究　1963年6期

五代的庄田　陶希圣　食货1卷11期　1935年

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　吴泰　历史学　1979年4期

唐宋官僚地主的庄宅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期　1934年11月15日

杜甫在夔州的瀼西与东屯庄　鞠清远　食货3卷8期　1936年

皇庄的起源　鞠清远　中国经济　2卷7期　1934年7月

唐代地主庄园雇佣劳动者的几个问题　陈良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4期

五代十国的若干土地政策述论　郑学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3期

试论隋唐的屯田和营田　郑学檬　厦门大学学报　1962年3期

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问题　乌廷玉　文史哲　1964年2期

唐代前期的屯田　黄正建　人文杂志　1985年3期

唐代后期的屯田　黄正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4期

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集　1983年

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　杨际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年2期

唐后期屯田的变质与败坏　张泽咸　平准学刊3辑上册

唐代职田的渊源及其演变　李文澜　中国古代史论丛　3辑　1982年

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桢职田案卷的考察　陈国灿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年

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　齐陈骏　中国史研究　1986年1期

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90年4期

对唐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　孙达人　历史研究　1962年6期

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　沙知　历史研究　1963年1期

近年出土高昌租佃契约研究　吴震　新疆历史论文续集　1982年

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2年4期

论唐代租佃关系的积极意义　潘镛　历史教学　1984年3期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夏田卷契来谈高昌租佃的几个问题　韩国磐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年

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　杨际平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年

试析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唐代雇佣契券的性质　程喜霖　中国古代史论丛3辑　1982年

关于唐代租佃制的若干问题　唐耕耦　历史论丛5辑　1985年

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　赵文润　陕西师大学报　1987年1期

中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前提　葛金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年3期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地租的性质及形态　赵文润　敦煌学辑刊

1989年1期

唐代寺院经济概说 陶希圣 食货5卷4期 1937年

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 鞠清远 中国经济2卷9期 1934年

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 金毓黻 考古学报 1957年2期

《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所表现的晚唐寺院经济情况 荆三林 学术研究 1980年3期

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 何兹全 中国史研究 1982年1期

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 何兹全 北京师大学报 1982年6期

敦煌寺院碾硙经营的两种形式 姜伯勤 历史论丛3辑 1983年

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 谢重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年1期

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 白文固 兰州大学学报 1983年4期

唐代僧尼道士受田问题的辨析 白文固 社会科学 1982年3期

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 谢重光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年

麹氏高昌寺院经济试探 谢重光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7年1期

五十年来国内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综述 谢重光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6年8期

唐代禅林经济简论 张弓 学术月刊 1987年9期

关于敦煌寺院水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 唐耕耦 文献 1988年1期

伯2032号甲辰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计会稿残卷试释 唐耕耦 敦煌吐鲁番文集 1988年

唐代道观经济 张泽洪 四川大学学报 1993年4期

四、社会生活史

1. 社会结构与等及身分

(1)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　汪征鲁　历史研究　1983年1期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　胡如雷　史学月刊　1966年7期
唐宋变革若干问题的质疑　张泽咸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略论咸通十哲诗中的唐末社会　吴在庆　贵州文史丛刊　1993年4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年
唐的门阀之争与关陇集团　徐清廉　西北大学学报　1981年1期
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　晏金铭　学术月刊　1981年2期
关于汉唐时士庶的几个问题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年
文治与中兴，唐代士族之再评论　颜晨华　学术月刊　1992年12期
唐代士族门阀与军人门阀的没落　曾资生　中央日报　1946年9月21日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陈寅恪　岭南学报12卷1期　1952年
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　乌廷玉　历史教学　1987年4期
唐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历史地位　乌廷玉　中国史研究　1980年1期
从士庶分别到士庶合流　侯力　湘潭师专学报　1984年2期
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　阎守诚　赵和平　历史研究　1984年4期
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　叶振华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
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　邓文宽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唐代士族志与姓氏录比较刍议　魏明孔　西北师院学报　1987年3期
唐代“孤寒”释　李晓路　中国史研究　1989年1期
唐代士族及其衰落　吴宗国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　李光霁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关于唐代门阀士族势力消长问题的考察　田廷柱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门阀制度瓦解原因新探　张邻　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6年
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　林立平　北京师大学报　1987年1期
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　胡如雷　唐史

论丛3辑 1987年

关于唐代士族问题的管见 何灿浩 宁波师院学报 1987年1期

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 孙国栋 新亚学报4卷11期 1959年

唐代的寄庄户 张泽咸 文史5辑 1978年

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 戴希震 大学艺文1卷1期 1936年

五代军阀官僚的财富及其享乐生活 戴希震 食货5卷10期 1937年

(2)自耕农与客户

关于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与唐代自耕农的性质 宋家钰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唐代的客户 张泽咸 历史论丛1辑 1964年

再论唐代的客户 张泽咸 中国古代史论丛3辑 1982年

唐代的客户 唐长孺 《山居存稿》 1989年

试论唐代中期以后佃客的社会地位问题 朱瑞熙 文学月刊 1965年6期

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讨 王士玄 河北师大学报 1983年1期

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年

一件反映唐初农民抗交"地子"的文书——《牛定相辞》 姜伯勤 考古 1978年3期

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 董家遵 现代史学1卷3、4期 1933年

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葛金芳 历史研究 1983年1期

(3)商人及工商业劳动者

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 傅安华 食货1卷6期 1935年

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 魏承思 学术月刊 1984年5期

论唐代商人经营内容的特点 薛平拴 唐史论丛6辑 1991年

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林立平 历史研究 1989年1期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 邹国慰 上海师大学报 1989年2期

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薛平拴 人文杂志 1991年6期

论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　王林善　山西师大学报　1992年4期

试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限度　理绥　中国社会经济史　1988年4期

论唐代的官商合流　王林善　晋阳学刊　1989年3期

唐代官员经商问题浅析　王林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试论唐代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　陈衍德　学术月刊　1988年6期

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　薛平拴　唐都学刊　1992年3期

唐代的中小商人与商品经济　薛平拴　晋阳学刊　1992年2期

论唐代后期的榷盐和盐商　王林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　郑海峰　盐业史研究　1989年4期

窦仪——杰出的唐代经商致富者　朱冠军　贵州文史丛刊　1994年5期

唐诗中描述的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　朱明尧　商业研究　1989年9期

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1959年

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　魏明孔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　1985年

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变化　魏明孔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年4期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　冻国栋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年

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　杨德泉　扬州师院学报　1959年3期

唐代市民生活的广阔画卷　词刊　1982年2期

(4)部曲、杂户、官户和奴婢

唐代之贱民阶级　黄现璠　师大月刊13期　1934年8月

唐代的贱民　杨中一　食货1卷4期　1935年1月

唐代贱民制度中的人口买卖　寒羽　华北商工1卷4期　1943年10月

唐代的贱民　武建国　贵州文史丛刊　1984 年 3 期
南北朝以后部曲的含义和身份　南炳文　汤纲　南开大学学报　1978 年 4、5 期
唐代的部曲与客　唐长孺　东方学 63 辑(东京)1985 年
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　李伯重　厦门大学学报　1985 年 1 期
唐代部曲、奴婢身份浅析　李伯重　文史 32 辑　1990 年
唐代的部曲　张泽咸　社会科学战线　1985 年 4 期
略论杂户的形成和演变(十六国北朝至隋唐时期)　张维训　中国史研究　1983 年 1 期
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　张维训　江西社会科学　1982 年 4 期
唐代的卤户　陈国灿　中国古代史论丛 3 期　1982 年
唐代的奴隶制度　关燕祥　社会科学论丛季刊 312 期　1937 年
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　敦煌文物研究资料室　文物 1972 年 12 期
从唐代官私奴婢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问题　李季平　破与立　1977 年 6 期
关于隋唐五代奴婢的性质问题——与韩国磐先生商榷　翁俊雄　北京师院学报　1980 年 4 期
唐代长安的奴婢　武伯纶　人文杂志　1981 年 1 期
略论均田制中的奴婢受田及变化原因　武建国　历史教学　1982 年 11 期
唐代的奴仆问题　孟昭庚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唐代昆仑奴考　李季平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唐代私奴婢初探　李军　敦煌学辑刊　1984 年 2 期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会意义　李季平　齐鲁学刊　1985 年 6 期
论隋唐时期的奴婢及其变化　赵云旗　学术月刊　1986 年 5 期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　李季平　齐鲁学刊　1987 年 1 期
唐代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李天石　兰州学刊　1988 年 3 期
论唐代的奴婢　马晓丽　烟台大学学报　1990 年 2 期

唐代“矮奴”考　吴水存　江西文物　1991 年 2 期

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　廖国强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2 年 4 期

贞观以后唐政府在北方的限奴措施　卢开万　唐史论丛 4 辑　1988 年

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　李天石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 年

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　李天石　历史研究　1993 年 3 期

唐代的雇佣——对唐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意见　文君　光明日报　1957 年 3 月 28 日

试论唐代的私人雇佣关系——兼评唐代资本主义萌芽说　林立平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 年

唐代“作人”考辨　李鸿宾　河北学刊　1989 年 2 期

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　程喜霖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990 年

隋唐五代的乐工乐户　卢开万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2 辑　1993 年

唐五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的问题　戴显群　福建师大学报　1993 年 2 期

(5)士人

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　王永平　历史研究　1995 年 1 期

唐代方伎之士与科学文化　许道勋　复旦学报　1986 年 2 期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之起源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　1969 年

唐人多读书山寺　严耕望　大陆杂志 2 卷 4 期　1951 年

唐代知识分子之观念变革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88 年 6 期

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　任爽　历史研究　1989 年 4 期

唐代文人入幕成风的原因　杨国宜　陈慧群　安徽师大学报　1991 年 3 期

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　程遂营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4 年 3 期

唐代文人政治思想的转变　程遂营　史学月刊　1994 年 6 期

唐代隐士流变略论　任爽　学习与探索　1991 年 6 期

唐代隐士略论　齐涛　山东大学学报　1992年1期

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　宋大川　史学月刊　1989年2期

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　王毅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唐代"孤寒"释　李晓路　中国史研究　1989年1期

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　郑学檬　春史卞　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韩国)　1995年

唐宋时期的文人会社　李修松　中国史研究　1995年3期

唐代的士风演变与时代迁易　董乃斌　程蔷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年1期

盛唐之音，一个时代的终结——略论唐代文人的精神状态　江水　赣南师院学报　1995年2期

唐代人才群体的特征及其局限　李岩　呼兰师专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幕府文人的境遇　杨国宜　陈慧群　天府新论　1991年5期

(6)寺观依附人户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　何兹全　食货3卷4期　1936年

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兼论贱口依附制演变)　张弓　中国史研究　1984年2期

唐代寺院奴婢阶层略说　张弓　社会科学战线　1986年3期

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　姜伯勤　中国史研究　1980年3期

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　姜伯勤　敦煌研究　1981年1期

唐西州寺院家人奴婢的的放良　姜伯勤　中国古代史论丛3辑　1982年

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　张弓　兰州学刊　1984年2期

净人新探　谢重光　科学战线　1991年2期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　郝春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年2期

敦煌所出〈索铁子牒〉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朱雷　武汉大学学报　1993年6期

(7)其他

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　王赛时　西南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吐鲁番所出文书所论唐代“译语人” 王欣 新疆文物 1993年1期
唐西州的译语人 李方 文物 1994年2期
论唐代艺僧 施光明 唐都学刊 1988年4期
唐代僧侣的游方与文化 张菁 江海学刊 1993年4期
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特点 郝春文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1990年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 冻国栋 河北学刊 1992年1期

2. **家庭与婚姻**

唐代家庭结构初探 魏承思 社会科学研究 1986年2期
略述家族主义对唐朝官制的影响 魏承思 历史教学问题 1987年1期
唐代李姓的构成及其社会意义 秦夫 肖凡 上饶师专学报 1992年4期
试论唐代封建家庭及其财产制度 魏承思 华东师大学报 1987年5期
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 杨莲生 食货1卷5期 1935年
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 陈鲲化 法律评论12卷1、2期 1934年11月
试论唐代的婚姻家庭制度 孙佳 兰州学刊 1989年3期
唐律继承法研究 陈鹏 法律评论15卷3、4期 1947年7、8月
略论唐判所见唐礼法中的继嗣问题 向群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 邢铁 河北师院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遗嘱继产问题 邢铁 人文杂志 1994年5期
晚唐五代义儿考——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讨论之一 傅衣凌 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 1981年增刊
唐人传统婚姻道德裂变溯源 渠长根 贺艳秋 社会科学(甘肃) 1994年4期
论汉唐时代的离婚 董家遵 社会研究季刊1卷1期 1935年

隋唐五代的收继婚　董家遵　现代史学 4 卷 4 期　1942 年 3 月

唐代婚姻礼俗考略　赵守俨　文史 3 辑　1963 年

罗马婚姻法与唐明律之比较　章寿昌　法学季刊 3 卷 7、8 期　1928 年

唐代婚姻制度　董家遵　现代史学 1 卷 1、2 期　1933 年 1、2 月

评布目潮沨氏关于唐初皇室婚姻关系的研究　梁太济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9 年 1、2 期

唐律"婚书"考　胡日武　法学研究　1982 年 2 期

妇女在法律上地位与婚姻法　杨廷福　唐律初探　1982 年

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周一良　文物　1985 年 7 期

唐代婚姻成立的条件　蒋维德　陈汉生　经济社会(呼和浩特)　1987 年 6 期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　牛志平　历史研究　1987 年 4 期

论唐代"惧内"之风　牛志平　史学月刊　1988 年 2 期

唐人畏尚公主习俗探析　雷巧玲　人文杂志　1992 年 6 期

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　牛志平　中国史研究　1989 年 3 期

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　金眉　史学月刊　1933 年 2 期

唐宋时七出研究　董家遵　文史汇刊 1 卷 1 期　1935 年 3 月

唐人的"离婚"刍议　牛致功　学术界　1994 年 2 期

唐代婚姻的"天命观"　牛志平　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 2 期

鲜卑婚俗在唐代的发展　姜观吾　盐城师专学报　1994 年 4 期

唐朝的异辈婚　张邦炜　成都大学学报　1989 年 2 期

唐代皇室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　李向群　陕西师大学报　1989 年 3 期

唐宋以来的冥婚　慨然　中央日报　1949 年 9 月 17 日

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方亚光　学海　1994 年 2 期

魏晋隋唐时期的门第婚姻　张涛　民俗研究　1992 年 4 期

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　宋晓梅　中国史研究　1994 年 2 期

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　傅永聚　山东大学学报　1992 年 3 期

唐代的民族混血及社会功能　汤勤福、傅永聚　北方论丛　1994 年 3 期

唐代的涉外婚姻　傅永聚　人文杂志　1994年3期

3. **社会组织与社区**

(1)寺院

中古佛教的慈善事业　全汉升　食货1卷4期　1935年

中古佛教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　谢重光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年

中国寺院的社会功能　谢重光　百科知识　1986年11期

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　谢重光　历史研究　1987年6期

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何兹全　中国经济2卷9期　1934年

南北朝隋唐僧官制度研究　白文固　世界宗教研究　1984年1期

晋一唐僧官制度考略　谢重光　世界宗教研究　1986年3期

僧统罢废、僧录命职——发展变化的唐宋僧官制度　白文固　中国史研究　1989年2期

略论唐代佛寺的儒家教育　宋大川　世界宗教研究　1989年4期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李德龙　山西大学学报　1995年2期

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　张弓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92年

(2)社会

隋唐地方自治制度　张觉人　地方自治1卷4期　1947年

敦煌的"社"及其活动　郭锋　敦煌学辑刊　1983年1期

述社邑　宁可　北京师院学报　1985年1期

敦煌私社的"义聚"　郝春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年4期

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　郝春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89年4期

敦煌的渠人与渠社　郝春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90年1期

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女人结社　宁可　郝春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90年5期

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　郝春文　敦煌学辑刊　1990年1期

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　郝春文　中国史研究　1991年2期

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　刘永华　敦煌研究　1991年3期

吐鲁番文书〈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与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动　郭锋　西域研究　1991年3期

中古时期儒佛文化对民间结社的影响及其变化　郝春文　唐文化研究论集　1994年

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　宁可　郝春文　首都师大学报　1995年6期

五十年来(1938—1990)敦煌写本社文书研究述评　诚逊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1年8期

4. 农村与城市

天宝乱后农村崩溃实况　黄谷仙　食货1卷1期　1934年

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　黄谷仙　食货1卷10—11期　1935年

唐代几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诗　武仙卿　天津益世报·食货22期　1937年

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　戴振辉　食货2卷2期　1935年

唐代的都市概况　鞠清远　天津益世报食货15期　1937年3月16日

唐五代时期之城都　严耕望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81年12期

朱梁的农村复兴热　嵇文甫　食货1卷5期　1935年

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　聂家裕　历史学报1期　1936年

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　郭正忠　史学月刊　1986年2期

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　张泽咸　社会科学战线　1991年2期

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　黄煌　华东师大学报　1992年3期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徐苹芳　考古　1982年6期

唐代长安城的里坊　曹尔琴　人文杂志　1981年2期

唐代长安城坊里的管理制度　张永禄　人文杂志　1981年3期

唐代长安城风景区的地理特征　马正林　陕西师大学报　1980年4期

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　武伯纶　文史3辑　1963年

唐代长安的居民区——坊　张庆　文史知识　1989年9期

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　郑显文　人文杂志　1991年2期

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　史念海　河山集5集　1990年

唐都长安的人文景观　徐君峰　陕西师大学报　1994年3期

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　林立平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 年

唐代京师长安的治安问题　郭绍林　人文杂志　1994 年 3 期

大唐长安与各族流寓人口　保新胜　丝绸之路　1995 年 1 期

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　吴涛　郑州大学学报　1992 年 6 期

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　吴涛　郑州大学学报　1988 年 5 期

从唐诗看唐代洛阳的生活画卷　丁毅华　文史知识　1994 年 11 期

唐代扬州的城市建设　李伯先　南京工学院学报　1979 年 3 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成都　李金彝　成都大学学报　1992 年 1 期

唐代太原的建置沿革:北都研究之一　李裕民　城市研究　1989 年 2 期

5. **社会救济慈善事业**

唐代水害史论　刘俊文　北京大学学报　1988 年 2 期

唐代自然灾害初步研究　陈国生　湖北大学学报　1995 年 1 期

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　潘孝伟　安庆师院学报　1993 年 3 期

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92 年 6 期

唐朝的侍老制度　陈明光　文史知识　1991 年 11 期

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高宗、玄宗东幸　石云涛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3 辑　1994 年

隋唐义仓制度研究　陈明光　上海保险　1992 年 6 期

义仓设置时间考辨　张先昌　史学月刊　1992 年 4 期

隋唐时代的仓储与关于民食的调节　林秉仁　大公报·史地周刊 122 期　1936 年

隋唐时代之义仓　一良　食货 2 卷 6 期　1935 年

隋代社仓制度与国家财政　谷霁光　天津益世报　1935 年 10 月 29 日

唐代义仓研究　潘孝伟　中国农史　1984 年 4 期

隋唐时期的义仓及其演变　朱睿根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 年 2 期

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　张学峰　中国农史　1993 年 1 期

隋唐时期消防概述　俞群福　消防通讯　1983 年 2 期

关于唐代对患病军士的处理与程粮等问题的探索　杨德炳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83 年

浙江宁波出土的唐宋医药用具　林士民　文物　1982年8期

6. **妇女**

唐宋时代妇女考　王桐龄　史学年报1卷1期　1929年

妇女在唐律上之地位　贺圣鼎　法学季刊4卷6期　1930年12月

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　杨廷福　法律史论丛　1983年总3期

杜诗中的唐代妇女　杜呈祥　妇女月刊1卷3期　1945年

武则天与唐代妇女　牛志平　武则天与乾陵　1986年

论唐代的妇女参政　罗春雄　江汉论坛　1989年5期

武则天心态研究　王灵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90年3期

唐代妇女的艺术形象　尚民杰　文博　1992年6期

试论武则天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冲击　谢忠明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虞晔如、王建新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80年2期

从离婚与再嫁看唐代妇女的贞节观　牛志平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4期

唐代女子生活谈薮　杨绚霄　文友3卷7期　1944年

唐代的两种妇女生活　傅安华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62、63期 1935年11月21、28日

论唐代宫女诗及宫女命运　苏者聪　武汉大学学报　1986年5期

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　关书敏　西南师院学报　1983年4期

唐妓称录事考　孙楷第　大中1卷3期　1946年

唐代的妓女　宋德熹　史原　1980年10期

论唐代妓女的才华、情操、命运　苏者聪　唐都学刊　1992年2期

唐代的官妓　高世瑜　史学月刊　1987年5期

唐代的女子体育　林思桐　体育史料　1982年1期

唐代妇女的体育活动　张维也　四川体育科学报　1982年1、2期

唐代男性生活之一斑　傅安华　北平华北日报　史学周刊78、79期 1936年3月19.26日

7. **风俗**

隋唐风俗的时代特征　万建中　文史知识　1995年6期

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代前期风俗　赵克尧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11 辑　1992 年

法国学者近年来对敦煌民俗文化史的研究　耿升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 年 6 期

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　陈衍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年 2 期

论晚唐五代世俗审美思潮　王新伟　南京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1992 年 1 期

(1)服饰

唐代女子服装考　贺昌群　大公报·艺术周刊 14—15 期　1935 年 1 月 5、12 日

唐代妇女服饰考　钱华　中国文学会集刊 3 期　1936 年 8 月

唐代妇女的围巾"帔帛"考　童书业　文物周刊 56 期　1947 年 10 月 15 日

唐代妇女的西装(胡服式半袖裙)考　童书业　文物周刊 57 期　1947 年 10 月 22 日

唐代妇女"红妆"考　童书业　文物周刊 59 期　1947 年 10 月 29 日

双髻(唐代妇女发髻谱)　徐家珍　文物周刊 65 期　1947 年 12 月 17 日

唐代的双鬟　枫野　光明日报　1957 年 7 月 21 日

唐代妇女的服饰　庄申　明报 8 卷 1 期　1923 年 11 月

"乌纱帽"小考　薛天纬　学林漫录 6 集　1982 年

从敦煌绢画《引路菩萨》看唐代的时妆　杨树云　敦煌学辑刊　1983 年 1 月

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孙机　文物　1984 年 4 期

唐代长安的妇女服饰　武复兴　人文杂志　1987 年 6 期

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　葛承雍　文博　1988 年 4 期

形象的历史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1988 年

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1988 年

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1988 年

唐代西域服饰考略　肖衍斌　新疆大学学报　1989 年 9 期

唐钗琐谈　张广立　文物天地　1991 年 6 期

吐鲁番考古资料所见唐代妇女时装　武敏　西域研究　1992年1期

唐代妇女的服饰与化妆　赵克尧　历史大观园　1992年7期

从小说〈游仙窟〉看唐人生活中的衣食住　黄正建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从敦煌服饰窥视唐代文化　王仲纯　社科纵横　1994年4期

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　李蓉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5年1期

(2)饮食

唐代的饮食文化　姚伟钧　华中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唐宋饮食观念与心理试探　陈伟明　未定稿　1989年8期

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主食部分)　黄正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92年

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　张萍　唐史论丛6辑　1991年

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　陈伟明　暨南学报　1990年3期

漫谈胡食　段塔丽　文史知识　1995年6期

唐代长安的饮食风尚　张庆　文史知识　1993年9期

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　黄正建　中国史研究　1992年2期

饮食与唐代官场　拜根兴　人文杂志　1994年1期

鉴真东渡所带食品考略　卞孝萱　中国烹饪　1980年1期

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　冯先铭　文物　1963年1期

唐代茶业　唐耕耦等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4期

唐代饮茶风气　马忠民　厦门大学学报　1980年6期

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　孙机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2年总4期

唐代饮茶风俗与中国茶文化之始　郭泮溪　东南文化　1989年3期

唐陆羽《茶经》与茶道　程喜霖　湖北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二　暨远志　敦煌研究　1991年2期

唐代的饮茶风习——唐代茶业史研究之三　王洪军　中国农史　1989年4期

从法门寺出土文物看茶文化与佛教　韩金科、梁子　国际法门寺佛教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

唐人的饮茶风俗　袁刚　民俗研究　1989年1期

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　韩伟　文物　1988年10期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看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张高举　文博　1993年4期

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　曹元宇　科学史集刊6期　1963年10月

唐代长安的酒　曹尔琴　唐都学刊　1990年2期

唐长安的酒　张萍、陆三强　中国史研究　1993年3期

唐代的露酒　张平　唐都学刊　1994年2期

(3)居住方式与家具

唐代建筑——高龄长寿的佛光寺大殿　侯幼彬　黑龙江日报　1961年12月24日

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　梁思成　现代佛学5期　1963年10月

唐代建筑风貌——从敦煌壁画看到和想到的　肖默　文艺研究　1983年4期

汉唐佛寺主体建筑之型制的演变　张弓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唐代芳香建筑的文化透视　葛承雍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麟德殿"三面"说试析　张十庆　考古　1992年5期

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　雷巧玲　陕西师大学报　1993年3期

唐代租宅初探　雷巧玲　晋阳学刊　1993年3期

唐朝人住房面积小考　黄正建　陕西师大学报　1994年3期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供器　李振甫　飞天　1982年12期

唐三彩生活用具　李知宴　文物　1986年6期

唐代的椅子与绳床　黄正建　文物　1990年7期

唐代蜡烛小考　冉万里　人文杂志　1994年1期

唐代的柜　贾宪保　文博　1988年1期

(4)节日与风俗

唐代节日略说　赵和平　百科知识　1986年1期

唐代的节日　张泽咸　文史37辑　1993年
唐代诗人笔下的长安节日风俗(上、下)　武复兴　人文杂志　1982年6期、1983年1期
唐代长安春节景象　党军　人民日报　1962年2月6日
敦煌春月节俗探论　张弓　中国史研究　1989年3期
唐代的"驱傩"　王赛时　历史知识　1986年1期
沙州傩礼考　姜伯勤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　1995年
唐帝诞辰祝贺考(附表)　叶德禄　辅仁学志9卷1期　1940年6月
唐代的诞节　张泽咸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辑　1992年
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　张弓　历史研究1991年1期
唐代的节令游乐　王赛时　唐都学刊　1994年2期
论隋唐时期庆生辰　敦绍林　陕西师大学报　1988年8月
隋代之民风　姚薇元　文讯5卷1期　1944年7月
《隋书·地理志》汲郡河内风俗质疑　魏青铓　禹贡5卷7期　1936年6月
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　贺梓城　文博　1984年2期
唐人赏牡丹花风气探略　王永平　吕梁教育师院学报　1989年2、3期
唐代的牡丹欣赏热　田志明　张剑光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5年3期
唐代长安的重牡丹风气　张艳云　唐都学刊　1995年5期
唐代花道　朱利民　人文杂志　1992年3期
唐代的开放与世风及国运之关系　王炎平　贵州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冯辉　求是学刊　1992年1期
论纳异心态与唐代气魄　林正根　中国史研究　1995年3期
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渊源　史念海　中华文史论丛　1983年3期
唐代尚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　任士英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论五代任侠之风　刘永济　思想与时代12期　1942年7月
记唐人干谒之风　钱穆　责善半月刊2卷19期　1941年12月

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　葛晓音　唐研究(1)　1995 年

唐咸通时代奢侈风气述论　贾宪保　河北学刊　1988 年 5 月

唐代的奢侈之风　王雪玲　唐都学刊　1995 年 5 期

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　陈衍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 年 1 期

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　陈衍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年 2 期

唐代的文身风气　张萍　晋阳学刊　1990 年 3 期

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　金宝祥　西北师院学报　1958 年 1 期

唐代的书仪　赵和平　文史知识　1983 年 8 期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孙机　文物　1981 年 10 期

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主要畜力交通工具　朱天舒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2 辑

(5)丧葬制度

唐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　邱礼文　自印 1979 年

《唐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提要　邱礼文　华学月刊 102 期　1980 年 6 月

唐代的厚葬之风　牛志平　文博　1993 年 5 期

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　任士英　烟台师院学报　1990 年 4 期

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　姜宝莲　考古与文物 1994 年 6 期

北宋与唐朝皇帝丧葬礼仪的关系及其对南宋的影响　叶春芳　深圳大学学报　1994 年 4 期

唐人卜葬邙洛之风俗　游寿　中央日报　1947 年 1 月 11、12 日

南唐二陵装饰艺术　纪思等　古建通讯 1 期　1956 年

西安、吐鲁番唐墓葬制葬俗比较　陈安利　文博　1991 年 1 期

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　武伯纶　文物　1961 年 6 期

复面、眼罩及其它　王澍　文物　1962 年 7、8 期

释敦煌写本《杂抄》中的面衣　黄永年　敦煌学辑刊　1983 年总 3 期

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　陈忠凯　文博　1995 年 4 期

唐末“蕃客”的丧葬习俗　姚蔚玲　固原师专学报　1995 年 2 期

中国古代舍利的瘗埋制度　戴俊英　人文杂志　1993年增刊

法门寺唐塔地宫及中国舍利瘗埋制度　韩金科、王焯　文博　1993年4期

(6)民间信仰

乌鸦、喜鹊与唐代的吉祥观念　郭绍林　洛阳师专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的"送穷"习俗　刘桂秋　文史知识　1988年12期

试论唐人梦境文化　葛承雍　云南社会科学　1991年1期

唐代民俗中的"鬼"——读《太平广记·鬼类》札记　牛志平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汉唐荆楚鬼神文化的时代特征　李文澜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唐前鬼魂信仰的特点及原因　李卫东　中国古史论丛　1995年

钟馗考　张锦城　北平晨报艺圃　1935年12月4日

唐人的宗教信仰与舍宅置寺观　雷巧玲　文史知识　1993年2期

传奇小说反映的唐中后期民间因果报应观及其与佛教净土信仰之关系　刘后滨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唐代文人的维摩信仰　孙昌武　唐研究(1)　1995年

敦煌祈赛风俗　谭蝉雪　敦煌研究　1993年4期

读《前定录》劄记——唐代社会思想一瞥　黄约瑟　隋唐史论集　1993年

唐代孝道研究　牛志平　隋唐史论集　1993年

唐人礼法习俗中的避讳行为及其社会效应　徐连达　史林　1993年2期

"拜新月"考　张传峰　湖州师专学报　1993年4期

唐代的著作权现象　郭绍林　人文杂志　1991年5期

论唐代文字狱的酝酿　郭绍林　唐都学刊　1995年1期

论唐代社会中的赌博浊流　葛承雍　社会科学战线　1991年4期

唐代的爱才风尚　刘恩惠　松辽学刊　1989年3期

8. **文娱体育活动**

(1)体育活动

论唐代的体育活动　黄中安　人文杂志　1990年5期

唐代体育与唐代社会开放风气　黄伟　晋阳学刊　1991年6期

唐代妇女体育浅析　刘懿　辽宁师大学报　1988 年 3 期

试论唐代专业运动团体出现的背景与意义　潘孝伟　学术界　1994 年 4 期

唐代波罗球戏考　罗香林　亚州文化论丛 1 期　1942 年 6 期

试考我国隋唐以前的马球　唐豪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2 辑　1957 年 12 期

新出土的唐代宫廷马球场碑刻　袁鸿寿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5 辑　1958 年 8 期

关于“波罗球”一词的商榷　若思　历史研究　1959 年 8 期

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　阴法鲁　历史研究　1959 年 6 期

唐代长安球场小考　师培业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0 年 2 期

唐含光殿球场考　刘秉果　体育教学与训练　1982 年 1 期

唐含光殿球场考　林思桐　体育资料　1981 年 1 期

唐代的马球场　张新清　文史知识　1994 年 8 期

唐代马球考略——藏族人民在体育上的贡献　徐寿彭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 年 2 期

敦煌发现唐朝的赛毬辞　刘念兹　四川体育学院学报　1982 年 3 期

唐代长安的球场　王增明　体育资料　1982 年 3 期

我国古代马球是唐初从波斯传来的吗？　李松福　体育文史　1983 年 1 期

前后蜀的击球游戏　胡文和　历史知识　1983 年 3 期

唐代打马球小考　赵康民　人文杂志　1983 年 3 期

唐代马球综考　王赛时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3 年

唐代打马球——张议潮出行图研究之三　暨远志　敦煌研究　1993 年 2 期

唐代的皮球　崔婕　历史知识　1985 年 4 期

从安阳出土的围棋盘谈围棋　邱百明　中原文物　1981 年 3 期

唐代围棋史话　李松福　北方棋艺　1981 年 5、6 期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围棋　梁金录　体育文史　1988 年 4 期

隋唐时代的围棋　陈志学　四川文物　1988 年 5 期

论唐代的围棋文化　王永平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 年

从唐诗看唐代的体育活动　谭汝吉　武汉体院学报　1981年1期

隋唐时代国民之体魄与智力(附表)　谷霁光　史学杂志1期　1985年12月

隋唐五代的角抵戏之复兴及专业化——中国古代摔跤史略　李季芳　成都体院学报　1979年1期

论唐代的游乐文化　王永平　山西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打令考　罗庸等　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　1938年12月

(2)文娱活动

唐代梨园遗址考　李尤白　戏剧学习　1983年2期

唐代的教坊与梨园——唐乐述要之六　李石根　音乐生活　1988年6期

唐代的舞蹈　罗时铭　贵州体育　1982年4期

隋唐五代的舞蹈　王克芬　舞蹈艺术　1982年4期

兼容并蓄大唐舞风　江东　舞蹈研究　1989年4期

试论唐代舞蹈的分期　晏新志　文博　1989年4期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　董锡玖　文博　1982年12期

敦煌唐舞的艺术成就及审美特征　王克芬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霓裳羽衣曲　阴法鲁　国文月刊77期　1949年

杨贵妃和《霓裳羽衣舞》　董锡玖　北京艺术　1982年3期

唐代新疆舞蹈　周青葆　新疆艺术　1982年5期

龙门唐窟中的舞姿　王克芬　舞蹈论丛　1982年3期

唐代传奇与后代戏剧　谭正壁等　文献　1982年13期

唐教坊舞曲《春莺啭》　王耕夫　舞蹈　1981年4期

唐代舞蹈《玉树后庭花》探新　王耕夫　舞蹈论丛　1981年2期

论隋唐间两歌舞剧之一——《文康乐》　董每戡　戏剧艺术　1983年2期

论隋唐间两歌舞剧之二——《踏谣娘》　董每戡　戏剧艺术　1984年3期

简论唐代私家乐舞　晏新志　文博　1991年1期

唐代"剑器"舞考　王永平　青海师大学报　1990 年 3 期

隋唐五代的四川戏剧初探　邓运佳　四川大学学报　1982 年 1 期

汉唐乐荣衰之回顾　程之　音乐研究　1988 年 2 期

唐代音乐的音高体系及其语境　姚盛昌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 年

唐代燕乐角调考释　陈应时　广州音乐学院学报　1983 年 1 期

唐代大酺宴乐　章群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　1995 年

试论唐代九部乐、十部乐与坐部伎、立部伎之间的关系　刘嫣嫣　齐鲁艺苑　1988 年 2 期

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　王小盾　中国音乐学　1988 年 2 期

唐代大曲曲式结构　叶栋　中国音乐学　1989 年 3 期

唐代长安与西域音乐一唐乐述要之八　李石根　音乐生活　1989 年 6 期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伎乐头饰　诸葛铠　实用美术　1982 年 8 期

唐戏述要　任二北　文学遗产增刊 1 辑　1955 年

唐代能有杂剧吗？任二北　四川大学学报　1956 年 2 期

唐代弄俑　田进　文物　1959 年 8 期

简论汉唐傀儡戏　王永平　山西师大学报　1992 年 1 期

张雄夫妇墓与初唐傀儡戏　金维诺等　文物　1976 年 12 期

康居泼寒胡戏传入中国考　刘铭恕　新亚细亚 13 卷 4 期　1937 年

龟兹乐舞初探　激川　舞蹈论丛　1983 年 1 期

龟兹乐在云南　杨德鋆　新疆艺术　1983 年 1 期

龟兹乐与木卡姆　周青葆　新疆大学学报　1983 年 3 期

龟兹乐舞史话(一)、(二)、(三)　霍旭初　新疆艺术　1983 年 1—3 期

骠国献乐与白居易〈骠歌乐〉诗　秦序　音乐研究　1989 年 4 期

读"唐代俗讲考"　周一良　大公报图书周刊 6 期　1947 年 2 月 28 日

、"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　关德栋　大公报(上海)图书周刊 18 期 1947 年 5 月 14 日

关于俗讲再说几句话　周一良　大公报(上海)　图书周刊 20 期　1947 年 6 月 11 日

论唐代佛曲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 年

唐代俗讲考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 年

唐代民间、宫廷、寺院中的说话　胡士莹　光明日报　1963年3月24日

敦煌讲唱伎艺搬演考略——唐代讲唱文学论丛之一　张鸿勋　敦煌学辑刊　1983年总3期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之花——"转变"　方南生　百科知识　1983年8期

论敦煌民间变文　高国藩　甘肃社科院文研所敦煌学论集　1985年

俗讲仪式考　王文才　甘肃社科院文研所敦煌学论集　1985年

讲唱文学的尝试和先导——敦煌俗赋的产生及其演变　何国栋　甘肃社科院文研所敦煌学论集　1985年

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　李骞　敦煌学辑刊　1985年2期

唐代变文及其它(上、下)　周绍良　文史知识　1985年12期、1986年1期

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　褚良才　杭州师院学报　1993年4期

五、民族史、边疆史

1. 总论

隋唐民族政策特点概论　徐杰舜　罗树杰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　崔明德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4年3期

从隋文帝的民族政策看隋初的经济繁荣　高凯军　北方论丛　1983年1期

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赵云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4期

唐代民族政策初探　熊德基　历史研究　1982年6期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魏国忠　北方论丛　1979年5期

唐太宗与少数民族　陈金陵　历史教学　1979年8期

唐太宗民族政策蠡测　邢凤麟　南宁师范学院学报　1982年1期

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胡如雷　历史研究　1982年6期

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边疆问题及民族政策　蒋辅义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5 年 3 期

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与胡如雷同志商榷）　熊德基　中国史研究　1985 年 3 期

论唐太宗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与熊德基同志商榷　孙祚民　社会科学评论　1986 年 9 期

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兼答熊德基先生）　胡如雷　中国史研究　1987 年 4 期

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　熊德基　中国史研究　1987 年 4 期

论贞观时期的民族政策　赵晶　晋阳学刊　1989 年 6 月

律和羁縻术是唐代调节民族关系的工具　王可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 年 1 期

试论唐太宗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金昌林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0 年 3 期

汉唐之和亲政策　王桐龄　史学年报　1929 年 1 期

唐代和亲公主考　邝平章　史学年报　1935 年 2 期

试论唐太宗的和亲政策　任崇岳　罗贤祐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1 年 1 期

唐代和亲热的由来和结果　杨雪芹　龙岩师专学报　1990 年 1 期

汉唐和亲与西域文明　崔明德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 年 3 期

论隋唐时期和亲的影响　崔明德　甘肃社会科学　1994 年 3 期

论隋唐和亲的特点　崔明德　天府新论　1995 年 2 期

近年来国内隋唐民族史研究述评（1981—1988）　周伟洲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 年

试论唐代的羁縻州府　唐启准　湘潭大学学报　1982 年 4 期

羁縻州府与唐代民族关系　林超民　思想战线　1985 年 5 期

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吴玉贵　新疆大学学报　1986 年 1 期

唐代华化蕃胡考　冯承钧　东方杂志　1930 年 17 期

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 年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1980 年
唐代蕃坊考略　范邦瑾　历史研究　1990 年 4 期
蕃将与蕃长制度初探　廖大珂　南洋问题研究　1991 年 4 期
蕃将与武则天政权　马弛　许昌师专学报 1991 年 4 期
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　傅永聚　山东大学学报　1992 年 3 期
唐代的民族混血及其社会功能　汤勤福　傅永聚　北方论丛 1994 年 3 期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　吕耀　古清尧　宁夏社会科学 1984 年 4 期
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周伟洲　西北大学学报 1990 年 2 期
唐代北方民族的大迁徙及其影响　张云　西北大学学报　1991 年 2 期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 1985 年 4 期
隋朝与西域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9 年 3 期
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　章伯锋　甘肃社会科学　1980 年 3 期
贞观之治与西域经营　陈思志　人文杂志　1989 年 6 期
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　王小甫　敦煌研究　1990 年 4 期
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　郭平梁　新疆历史论文集　1977 年
唐代都护府述略　唐启淮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2 年 1 期
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　林超民　文献　1986 年 3 期
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　吴玉贵　中亚学刊 2 辑　1987 年
碛西节度使的置废　薛宗正　历史研究　1993 年 6 期
试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　殷孟伦　文史哲　1974 年 4 期
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　吴震　文物　1975 年 8 期
碎叶城今地考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　1979 年 5 期
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　王小甫　北京大学学报　1991 年 6 期
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吴震　新疆社会科学　1989 年 2 期
龟兹都城研究　陈世良　新疆社会科学　1989 年 2 期
唐代西域“火烧城”辨误　吴玉贵　文史 31 辑　1989 年

闫立本《西域图》在宋元著作中的著录及其史料价值　汤开建　文史 31 辑　1989 年

六胡州初探　钮仲勋　西北史地　1984 年 4 期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　1986 年 2 期

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　周传洲　民族研究　1988 年 3 期

唐代河曲的“六胡州”　王兆辰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2 年 3 期

唐代的条枝和条枝海考　苏北海　文史 29 辑　1988 年

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从“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谈起　高自厚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2 年 4 期

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　陈国灿　西北民族研究　1988 年 1 期

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　李健超　西北历史研究　1988 年号

2. **高昌、丁零、铁勒**

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　王素　文物　1989 年 11 期

试论两件高昌供食文书　吴玉贵　中国史研究　1990 年 1 期

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王欣　西北民族研究　1991 年 2 期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之比较　崔明德　北方论丛　1992 年 4 期

高昌文书中所见的铁勒人　姜伯勤　文物　1986 年 12 期

铁勒国史钩沉　钱伯泉　西北民族研究　1992 年 1 期

丁零、铁勒的西迁及其所建西域政权　薛宗正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2 年 3 期

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渚族的关系　周连宽　中山大学学报　1957 年 2 期

丁零新证　朱伯隆　华东师大学报　1958 年 1 期

单于杂考　邱久荣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9 年 3 期

3. **突厥**

突厥初世史探幽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2 年 4 期　1983 年 1 期

突厥始祖传说发微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7 年 1 期

近六十余年国内突厥史研究述评　林干　民族研究　1985 年 6 期

突厥官号研究　韩儒林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1940年1号1卷

游牧的封建社会　张之毅　科学通报　1950年8月

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　马长寿　历史研究　1958年3、4期

试论突厥汗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兼与马长寿先生商榷　侯尚智　兰州大学学报　1959年1期

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　蔡鸿生　学术研究　1963年5期

突厥法初探　蔡鸿生　历史研究　1965年5期

突厥社会制度初探　林干　社会科学战线　1981年3期

突厥与奴隶制　张广志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2期

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　薛宗正　民族研究　1985年1期

阿史那贺鲁降唐诸说考异　吴玉贵　新疆大学学报　1989年1期

论西突厥　胡菊英　赵永复　新疆历史论文集　1977年

试论西突厥中的若干问题　林干　中华文史论丛　1982年1期

阿波可汗是西突厥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　王谡　历史研究　1982年2期

西突厥纪事　林干　新疆社会科学　1984年1期

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谡同志商榷　段连勤　新疆社会科学　1984年3期

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有关问题　杨建新　西北史地　1984年4期

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谡说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5年4期

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　华涛　新疆社会科学　1989年3期

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6年2期

后突厥末世诸汗考证　薛宗正　社会科学战线　1988年2期

突骑施汗国的兴亡　薛宗正　历史研究　1984年3期

突骑施苏禄传补阙　郭平梁　新疆社会科学　1988年4期

从《张无价告身》论高仙芝征讨石国和突骑施　钱伯泉　民族研究　1991年3期

突厥和隋王朝关系试探　藏嵘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1年4期

论隋与突厥关系的发展进程　赵云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隋王朝与突厥互使述论　李大龙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4年5期
试论隋和突厥的和亲　冉守祖　河南大学学报　1992年1期
唐和突厥和亲述论　崔明德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3期
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陈国灿　历史教学　1981年7期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陈寅恪　寒柳堂集　1986年
说李渊称属突厥事——兼述刘文静被杀原因　伍士英　烟台师范学院报　1991年4期
从突厥的内徒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张雄　民族研究　1980年3期
唐初的突厥问题与全国的民族关系　冯智　青海社会科学　1994年1期
唐代派往突厥的使者述评　李大龙　北方文物　1994年4期
突厥诸民族在中国的贸易活动　陈庆隆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2年9期
突厥的习俗和宗教　林干　民族研究　1981年6期
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　樊圃　文史19辑　1983年
古突厥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　薛宗正　世界宗教研究　1988年2期
突厥事火考　蔡鸿生　中亚学刊1辑　1983年
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　吴景山　兰州大学学报　1989年4期
突厥人的体育及音乐歌舞艺术　吴景山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4年5期

4. **吐谷浑与党项**

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　周伟洲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4期
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　胡小鹏　西北师大学报　1992年4期
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　钱伯泉　新疆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隋唐与吐谷浑关系述略　李存福　青海社会科学　1983年3期
炀帝西巡　胡戟　丝路访古　1983年
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　陆庆夫　兰州大学学报(中国古代史论文专辑)　1983年1月
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　周伟洲　西北历史资料　1982年2期
弘化公主和亲及蕃浑关系考述　李延恺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4年

1期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　胡小鹏　西北史地　1985年4期

吐谷浑亡国原因及其影响　周新会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4期

吐鲁番所出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史实考证　王素　文史29辑 1988年

吐谷浑之路　薄小莹　北京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论吐谷浑在唐蕃关系中的枢纽地位　任树民　西北民族研究　1992年1期

唐弘化公主墓志铭跋　慕寿祺　责善半月刊　1941年2卷14期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夏鼐　历史语言所集刊　第20本上 1948年

唐弘化公主及墓葬　党寿山　甘肃日报　1980年10月5日

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的大唐武氏墓志补考　周伟洲　丝路访古　1983年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　周伟洲　文物　1985年5期

八世纪中至十一世纪初吐谷浑在河东地区的分布及活动　周伟洲　秦晋豫访古　1986年

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　李文实　青海社会科学 1981年4期

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　吴天墀　西北史地　1986年1期

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　汤开建　中国史研究　1986年4期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　汤开建　暨南学报　1994年1期

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　张云　西北史地　1988年4期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郭锋　敦煌学辑刊　1989年1期

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　敦煌文化　1991年4期

5. **吐蕃**

汉藏同源论　王光璧　康导月刊　1940年2卷34期

吐蕃种族考源　蕲伯赞　中山文化季刊　1944年1卷4期

藏族考源　姚薇元　边政公论　1944年3卷1期

藏族族源探索　韦刚　西藏研究　1982年3期

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　唐嘉弘　中国藏学　1988 年 2 期

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析探　唐嘉弘　中国古代民族研究　1987 年

吐蕃之兴起　金应熙　岭南学报　1947 年 8 卷 1 期

评李有义先生研究西藏的论著中有关历史部分　汪钦　历史研究　1959 年 4 期

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　巴桑旺堆　西藏研究　1983 年 4 期

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　金宝祥　西北史地　1985 年 1、2 期

关于吐蕃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　王静如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 5 集

吐蕃的王族与宦族　韩儒林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1940 年 1 卷 1 期

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1980 年

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　陈庆英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2 年 4 期

吐蕃初期建制考释　安应民　西北史地　1986 年 3 期

吐蕃官制考　汶江　西藏研究　1987 年 3 期

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王忠　历史研究　1965 年 5 期

唐公元 650—820 年唐蕃关系述论　马大正　民族研究　1989 年 6 期

论唐初吐蕃与祖国关系的确立　李秉铨　青海社会科学　1982 年 3 期

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　马国荣　新疆社会科学　1985 年 5 期

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　杨建新　西北史地　1987 年 1 期

唐与吐蕃在西域的斗争　江戍疆　宋建伟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9 年 1 期

试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谢全堂　青海社会科学　1991 年 4 期

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　周伟洲　新疆历史论文集　1977 年

安西四镇考辨　李必忠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1983 年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弃置问题　吴宗国　丝路访古　1983 年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安西四镇的弃置　郭锋　敦煌学辑刊　1985 年 1 期

唐蕃对峙与维州之役的关系试评　黄新亚　汉中师院学报　1988年4期
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　马元　民族研究　1960年3期
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　翦伯赞　光明日报　1960年5月6日
刍议唐蕃联姻　罗桑开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3期
金城公主与汉藏关系　崔明德　历史教学　1990年8期
唐代入蕃使者李道宗事迹编年　顾吉辰　西藏研究　1991年4期
唐蕃交聘制度考述　关以宁　学术月刊　1994年10期
唐蕃聘使考　顾吉辰　西藏研究　1990年2期
唐蕃和盟关系研究　刘小兵　云南社会科学　1989年5期
唐蕃甥舅会盟碑考　任乃强　康导月刊　1943年5卷7、8期
唐蕃会盟碑疏释　王尧　历史研究　1980年1期
唐蕃长庆会盟辨考三题　尹伟先　西北师大学报　1992年5期
论"安史之乱"时期的唐蕃关系　朱迪光　青海社会科学　1992年3期
论墀松德赞时期唐蕃关系的曲折发展　安应民　西藏研究　1990年3期
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　饶宗颐　东方文化　1971年9卷1期
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　史苇湘　敦煌研究　1983年创刊号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陈国灿　敦煌学辑刊　1985年1期
唐吐蕃"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　姜伯勤　中华文史论丛　1981年1期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　齐陈骏　甘肃师大学报　1979年4期
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　杨铭　民族研究　1988年4月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　杨际平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986年
突地考　姜伯勤　敦煌学辑刊　1984年1期
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　杨铭　西北史地　1987年2期
河西吐蕃文书简述　黄文焕　文物　1978年12期
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　姜伯勤　中国史研究　1979年3期
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行人部落　张广达　敦煌吐鲁番

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吐蕃告身制度初探　陈楠　西藏研究　1987年1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苯教)——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译释　王尧、陈践　世界宗教研究　1985年3期

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任树民　西北民族研究　1991年1期

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　王尧　陈践　甘肃民族研究　1983年增刊号

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的族属诸问题　郭锋　兰州大学学报　1988年1期

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问题　黄盛璋　西北民族研究　1989年1期

敦煌文书中的Ln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　杨铭　敦煌研究　1993年3期

论璨微与仲云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　1988年6期

跙末考　周伟洲　西北历史资料　1980年2期

通颊考　杨铭　敦煌学辑刊　1987年1期

通颊考　荣新江　文史　33辑　1990年

萨毗考　高永久　西北史地　1993年3期

吐蕃饮馔与服饰　王尧　中亚学刊2辑　1987年

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　黄颢　藏族史论文集　1988年

6. 回鹘

与陈援庵先生论回纥、回回等名称　王日蔚　禹贡　1936年4卷10期

维吾尔民族名称演变考　王日蔚　禹贡　1937年7卷4期

新疆维吾尔族源新探　谷苞　中国社会科学　1980年6期

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　秦波　西北历史资料　1981年2期

关于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　1981年4期

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　张炼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82年3期

畏兀尔民族古代史　王日蔚　天山月刊　1935年6期

维吾尔族居新疆考　樊啸　光明日报　1955年9月29日

对于樊啸同志《维吾尔族居新疆考》的几点意见　冯家升　光明日报　1955年9月29日

试论公元七——十世纪回纥社会的发展　何应中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59年1期
回纥的兴起及其和唐朝的关系　程溯洛　历史教学　1979年7期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马俊民　中国史研究　1984年1期
唐朝与回纥汗国的关系　徐伯夫　喀什师院学报　1991年4期
回纥的初兴及其同突厥、唐朝的关系　薛宗正　西北民族研究　1992年1期
唐朝派往回纥的使者述论　李大龙　民族研究　1994年2期
试论安史之乱后的唐——回纥关系　王国华　钟福国　甘肃民族研究　1994年1期
唐朝与回纥和亲研究　王有德　新疆师大学报　1984年1期
唐与回纥和亲公主考述　崔明德　文史哲　1991年2期
鳌玉笄开锦车，题银牓羊毳幙——唐与回纥和亲述论　冉宋祖　史学月刊　1991年3月
回纥更名回鹘考　刘美崧　江西师院学报　1980年1期
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　林干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1期
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　1983年3月
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樊保良　西北史地　1985年2期
关于漠北回鹘汗国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　秦卫星　新疆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　李符桐　东北集刊1941年1、2期
关于回鹘的西迁　森安孝夫　民族译丛　1980年1期
回鹘南迁初探　艾尚连　民族研究　1982年4期
关于回鹘西迁若干问题的辨正　林干　高自厚　民族研究　1992年5期
九姓回鹘可汗碑跋　王国维　观堂集林4册　1984年
乌介可汗"走依和解室韦"考　高荣盛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　段连勤　西北大学学报　1978年4期
河西回鹘略论　林干　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3期
近年国内河西回鹘研究综述　杨富学　敦煌研究　1992年2期

甘州回鹘与东西贸易　高自厚　西北史地　1983年3期

庞特勤居甘州辨　汤开建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1期

甘州回鹘渊源考　高自厚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82年1期

甘州回鹘世系考　高自厚　西北史地　1983年1期

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　李萍　西北史地　1983年3期

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　邓文宽　北京大学学报　1986年5期

甘州回鹘世系考辨　苏北海　周美娟　敦煌学辑刊　1987年2期

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文献之佚存　李正宇　文献　1989年4期

甘州回鹘史略　李宝通　西北师大学报　1989年5期

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　荣新江　敦煌研究　1991年2期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　荣新江　西北民族研究　1993年2期

甘州回鹘成立史论　荣新江　历史研究　1993年5期

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　陆庆夫　敦煌学辑刊　1995年2期

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表　孙修身　敦煌研究　1990年3期

沙州回鹘研究　钱伯泉　甘肃社会科学　1989年6期

回鹘在敦煌的历史　钱伯泉　敦煌学辑刊　1989年1期

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　杨富学　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1992年

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　张广达　荣新江　北京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　钱伯泉　新疆大学学报　1991年4期

从车师到高昌回鹘　苏北海　西北史地　1983年1期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　1982年1期

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　程溯洛　西北史地　1984年4期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林悟殊　西北史地　1984年4期

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　程溯洛　新疆大学学报　1989年2期

高昌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迁居永昌始末　王宗维　新疆社会科学　1989年2期

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　士肥义和　西北民族研究　1989年2期

敦煌遗书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　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4年3期

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　樊保良　民族研究　1987年4期

回鹘与吐蕃的文化联系述论　石羊　明星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4年3期

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与鄂尔浑回鹘史　刘戈　新疆文物　1991年3期

9世纪中叶以后黠戛斯的南下活动　巴哈提依加汉　西域研究　1991年3期

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　汤开建　马明达　敦煌学辑刊　1983年创刊号

哈拉汗王朝历史简述　耿世民　新疆社会科学　1982年1期

把喀喇汗王朝写进中国通史　魏良弢　百科知识　1982年1期

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　魏良弢　历史研究　1982年2期

7. 于阗

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　荣新江　新疆社会科学　1987年4期

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　张广达　荣新江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1982年

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　殷晴　新疆社会科学　1983年2期

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　林梅村　新疆社会科学　1985年5期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巴桑旺堆　敦煌学辑刊　1986年1期

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　黄盛璋　敦煌学辑刊　1986年2期

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书析释　殷晴　新疆社会科学　1989年6期

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　饶宗颐　于阗史丛考　1993年

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　荣新江　西域研究　1992年9期

归义军及其周边民族关系初探　荣新江　敦煌学辑刊　1986年2期

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正　王尧　陈践　西北史地　1987年2期

再论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　1990 年 1 期

关于沙州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　黄盛璋　敦煌研究　1992 年 1 期

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　荣新江　敦煌研究　1994 年 2 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 P.T960 译解　王尧　陈践　西北史地　1982 年 3 期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辨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　1983 年 3 期

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　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二十　1984 年

一件新发现的于阗文书——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会经济状况　殷晴　民族研究　1987 年 6 期

敦煌于阗文 P2741、choo296、P2790 号文书疏证　黄盛璋　西北民族研究　1989 年 2 期

从吐鲁番文书看薛延陀前期的历史　钱伯泉　西域研究 1992 年 1 期

8. 渤海及东北地区各民族

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　姜守鹏　求是学刊　1980 年 3 期

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张泰湘　学习与探索　1980 年 5 期

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　刘振华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年 3 期

试论唐代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王成国　沈阳师院学报　1982 年 1 期

再论渤海王国的族属问题　朱国忱等　北方论丛　1983 年 1 期

渤海族属平议　张甫白　龙江社会科学　1993 年 2 期

渤海的族源　孙进己等　学习与探索　1982 年 5 期

渤海大氏的来源和迁徙　何光岳　求索　1990 年 2 期

渤海王国渊源丛考　李德山　民族研究　1993 年 1 期

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　李德山　东北师大学报　1995 年 4 期

渤海族的兴起和消亡　崔绍熹　辽宁师院学报　1979 年 4 期

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　孙秀仁　于志耿　学习与探索　1982 年 4 期

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　孙玉良　学习与探索　1982 年 4 期

渤海史识微　刘振华　学习与探索　1982 年 6 期

渤海历史地理研究情况述略　丹化沙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3 年 1 期

渤海疆域考　孙进己　北方论丛　1982 年 4 期

渤海国史概要　陈显昌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83年第2期
论渤海国的社会性质　张博泉等　学习与探索　1982年第5期
渤海国社会性质浅议　庄严　北方论丛　1983年2期
关于渤海国社会性质的商榷意见　兰永喜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88年2期
渤海国政治制度述略　魏国忠　朱国忱　求是学刊　1981年3月
渤海的政治制度　王承礼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期
渤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　王承礼　博物馆研究　1983年1期
渤海都督府长史小考　魏国忠　北方论丛　1982年2期
唐代渤海国官制概述　王成国　学习与探索　1982年5期
唐代渤海率宾府辨　张泰湘　历史地理　1983年2期
唐代渤海五京制度考　魏国忠　博物馆研究　1984年3期
渤海王权考察之一——以东宫制为中心　酒寄雅志著　博物馆研究　1990年4期
渤海通事研究(一、续)　酒寄雅志著　刘晓东　陈春霞等译　黑河学刊　1991年1、2期
车书本一家——订正一则有关唐代渤海史料的传讹　孙玉良　历史研究　1982年1期
渤海国历史研究的国际性　张高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90年2期
“渤海学”刍议　张高　北方文物　1990年1期
渤海的中京和朝贡道　李健才等　北方论丛　1982年1期
东牟山在哪里　刘忠义　学习与探索　1982年4期
渤海疆域考　孙进己　北方论丛　1982年4期
渤海疆域变迁考略　魏国忠　求是学刊　1984年6期
渤海上京城附郭县再考　刘晓东　北方文物　1990年2期
渤海契丹道吉林市的东区段假说　马德谦　博物馆研究　1990年3期
大祚荣亡国之地考辨　张昌熙　延边大学学报　1990年4期
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　刘晓东　魏存成　北方文物　1991年1期
渤海东京龙原府宫城址考　驹井和爱　北方文物　1992年4期
比较:渤海上京城与唐长安城　方学凤　延边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我国东北古代民族的海上活动　王侠　北方文物　1987年1期
关于渤海国的若干民族问题　金香　社会科学战线　1989年1期
渤海国时期形成过渤海民族吗？金香　北方文物　1990年4期
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兼与靺鞨新说商榷　童万伦　黑河学刊　1989年1期
靺鞨人国家产生的形成　张高　蒲峪学刊　1990年2期
渤海靺鞨考　陈显昌　学习与探索　1993年4期
论唐代渤海地区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张秦湘　黑龙江日报　1978年10月29日
论渤海与唐朝的关系　严圣钦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2年1期
渤海是我国唐王朝辖属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杨昭全　求是学刊　1982年第2期
渤海隶属于唐朝　姜守鹏　学习与探索　1982年4期
唐朝对渤海的经营与管辖　孙玉良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3年4期
渤海国与东北亚政治　张高　绥化师专学报　1989年4期
关于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初期交往　邓鹏　大庆师专学报　1990年1期
论渤海与日本的使臣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　徐琳　董振兴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商榷　阎万章　北方文物　1992年2期
古代渤海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孟东风　吉林师范学院学报　1994年4期
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陆路部分的研讨　侯莉闽　李强　北方文物　1994年4期
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　日野开三郎　唐华全摘泽　河北师院学报　1990年4期
唐朝对渤海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　林树山　黑河学刊　1991年4期
略论渤海与临族的关系　宋德胤　王海鹏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2年1期
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　宋玉祥　北方文物　1995年4期
甘滋芳润羁情——从渤海日本诗人唱和谈中日友好　徐琳　中日关系

史研究第1辑

沧波织路，义洽情深　王侠　天津师院学报　1980年4期

略谈渤海的农业生产发展　方学凤　1981年吉林省考古学年会讨论稿

渤海国经济试探　陈显昌　北方论丛　1982年3期

渤海国的造船业　白沫江　学习与探索　1982年4期

论渤海经济　魏国忠等　学习与探索　1984年2期

渤海国货币经济初探　刘晓东　杨志军　郝思德　历史研究　1991年2期

谈谈有关渤海货币的几个问题　王桂珠　博物馆研究　1995年2期

渤海"显州之布"、"沃州之锦"辨析　方学凤　延边大学学报　1982年4期

关于唐代渤海国的文学艺术　朱国忱等　求是学刊　1980年3期

从考古学上看唐代渤海文化　李殿福　学习与探索　1981年4期

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　魏存成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　1989年4期

论渤海文字　李强　学习与探索　1982年5期

渤海的儒学与佛教　王承礼　学术研究丛刊　1983年2期

关于渤海佛教和佛教遗迹　朱国忱　1980年黑龙江文博学会讨论稿

关于佛教在渤海国发展的原因及历史作用初探　关颖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90年3期

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　魏有成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　1989年4期

渤海的礼俗　赵长胜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90年2期

试谈渤海从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　方学凤　延边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渤海乐古今探微　徐达春　满族研究　1991年2期

试谈渤海多人葬　方学凤　延边大学学报　1991年3期

关于渤海上京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张高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93年4期

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建筑复原　张铁宁　文物　1994年6期

渤海婚俗考　王海鹏　黑龙江史志　1995年2期

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　金毓黻　考古学报　1956年2

期

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　王承礼　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1期

《渤海记》著者张建章暮志考　佟柱臣　黑龙江文物丛刊创4号

渤海纪年补订　孙玉良　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1期

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　刘晓东　北方文物　1990年4期

渤海"国书"价值论　宋德胤　王海鹏　北方文物　1992年4期

契丹名号考释　冯家升　燕京学报　1933年第13期

契丹源流说略　盛襄子　新亚细亚　1936年第11卷第3期

契丹国初探　艾生武　北方论丛　1983年2期

契丹的族源与族属　景爱　史学集刊　1984年第2期

东胡系各族族名研究及其存在问题　张久和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6年1期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朱泓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年2期

契丹先世的神话及其发生之时代　徐世勤　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　1935年第46期

契丹与回纥关系考　王日蔚　禹贡　1935年第4卷第8期

契丹汉化考略　尹克明　禹贡　1936年第6卷第3、4期

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与契丹的关系　卞孝萱　山西师院学报　1957年3期

契丹国家的形成　赵卫邦　四川大学学报　1958年第2期

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蔡美彪　历史研究　1964年5、6期

契丹"于越"考——与岛田正郎及威特夫先生商榷　唐统天　东北地方史研究　1988年1期

唐与契丹、奚和亲公主考述　崔明德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3期

"奇首可汗"小考　李德山　博物馆研究　1989年第3期

契丹祭黑山的考察　王承礼　社会科学战线　1990年2期

试析契丹族人的祖先崇拜活动　席岫峰　宋志发　社会科学辑刊　1994年3期

唐与契丹战争起因新探　崔明德　社会科学辑刊　1991 年 2 期

契丹、新罗与唐朝关系之比较研究　崔明德　烟台师院学报　1991 年 2 期

小议唐对契丹的政策　王成国　社会科学辑刊　1992 年 2 期

南唐·契丹之聘使及其目的　张国庆　江海学刊 1993 年 2 期

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变迁考论　孟广耀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3 年 1 期

奚族及其历史发展　杨若薇　历史教学　1983 年 2 期

有关奚族起源的两个问题　冯继钦　求是学刊　1984 年第 1 期

北魏以后的奚族　李德山　北方民族　1991 年 2 期

唐以后奚族诸部的对应关系及奚王府所属诸部剖析　孟广耀　北方文物　1987 年 4 期

萧干建国称帝及其失败琐议　孟古托力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 年第 3 期

奚族增考　李德山　民族研究　1989 年 5 期

唐朝对奚与契丹的和亲政策　林恩显　人文学报　1975 年 1 期

奚族文化刍议　冯继钦　社会科学辑刊　1993 年 1 期

黑车子室韦考　王国维　国学论丛　1928 年第 1 卷第 3 号

室韦考　方壮猷　辅仁学志　1931 年第 2 卷第 2 期

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源　郑英德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1980 年

室韦部落新探　郑英德　刘光胜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 年 2 期

对蒙兀室韦说质疑　赵展　学习与探索　1982 年 2 期

室韦民族共同体类型　冯继钦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3 年 1 期

室韦地理考述　于志耿等　社会科学战线　1983 年 3 期

室韦族琐谈　王金铲　辽宁大学学报　1983 年 4 期

室韦习俗初探　冯继钦　黑河学刊　1983 年 4 期

蒙古萨满教与唐王东征　程迅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88 年 4 期

东后贝加尔湖地区的室韦文化源流及其成份　林树山编译　北方文物　1989 年 4 期

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地域考（室韦史研究一）　张久和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1 年 5 期

隋唐时期阴山地区的室韦　高荣盛　南京大学学报　1992年1期

东魏至唐时期室韦与中原皇朝及毗邻民族的关系　王德厚　民族研究　1994年3期

9. **南诏与南方其他民族**

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　凌纯声　人类学集刊1期　1938年12月

试论白族族源出于南诏　陈碧笙　厦门大学学报　1956年5期

关于白族族源问题　王叔武　历史研究　1957年4期

《关于白族族源问题》质疑　王忠　历史研究　1958年8期

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杨堃　云南白族的起源及形成论文集　云南人民　1957年

略论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南诏大理国的社会性质　杨育才　云南白族的起源及形成论文集　1957年

略论白族的形成　方国瑜　云南白族的起源及形成论文集　1957年

夷族的主要源流——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沼麼些弥，罗作及仲牟由　刘尧汉　学术研究（云南）　1962年5期

唐宋时期的白蛮（白族）　尤中　思想战线　1982年3期

唐宋时期的乌蛮（彝族）　尤中　云南社会科学　1982年5期

试论唐代西南地区乌蛮、白蛮若干文化特质　林宗成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2期

关于东爨乌蛮诸部的族源问题　李绍明　余宏模　思想战线　1979年4期

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　方国瑜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年1期

南诏是否泰族国家　方国瑜　新动向8卷6期　1939年12月

南诏种属考　罗香林　中山学报1卷1期　1941年11月

哀牢与南诏　闻宥　边政公论1卷1期　1941年

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夷族之新证　刘尧汉　历史研究　1954年2期

南诏国主出于哀牢夷考　刘远东　云南白族的起源及形成论文集　1957年

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　江应梁　云南大学学报　1959年1期

从《蛮书》有关记载中论证南诏不是秦族　陈碧笙　中国古代史论集

1981年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杨永新　赵寅松　民族研究　1984年3期

南诏与素可泰的产生:20世纪对泰族起源问题的辨论　(泰)威奈·明杀边　路敏译　东南亚　1991年3期

南诏傣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　贺圣达　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3期

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　韩军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4年1期

南诏史略论　向达　历史研究　1954年2期

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　方国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2年6期

南诏史史料问题　静寰　历史研究　1962年6期

南诏大理史论　木芹　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　1982年2期

大理国史研究综述　赵鸿昌　云南社会科学　1988年6期

南诏史研究述略　赵鸿昌　云南社会科学　1990年4期

试论南诏的社会性质　李家瑞　学术研究(云南)　1962年3期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　尤中　学术研究　(云南)　1962年5期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　杜昆　西南师院学报　1984年1期

南诏社会性质的考察　范传贤　西南师大学报　1987年1期

南诏与奴隶制　张广志　青海师大学报　1984年1期

南诏奴隶制的发展及其特点　周廷贤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7年2期

南诏统治制度及其特点　杨卿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6年6期

南诏君长与彝族土地　张福　昆明社会科学　1994年3期

南诏村社农民和"佃人"析　周嘉珮　云南社会科学　1982年4期

试论南诏王族覆灭的原因　木芹　思想战线　1983年2期

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　林超民　思想战线　1984年3期

南诏归唐原因之探讨　单文　云南社会科学　1988年1期

唐天宝年间洱海地区战争的具体分析　方国瑜等　云南大学学报　1960年1期

天宝后期唐朝与南诏之间的二次战争　赵文润　史学集刊　1984年3期

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赵鸿昌　云南社会科学　1985年

2期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徐兴祥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4期
姚州都督府与天宝战争　钱赵　楚雄社科论坛　1991年2期
论唐未南诏战争之起因　余和祥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年2期
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　方国瑜　历史研究　1982年3期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王忠　历史教学　1960年2期
南诏与晚唐关系之研究　王吉林　华冈学报　1973年7期
南诏与唐朝关系研究　方素梅　甘肃民族研究　1986年1期
异牟寻与"点苍山会盟"　杨丽明　民族文化　1983年4期
贞元间唐诏苍洱会盟　木芹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2期
唐宋时期傣族的政治发展及其和南诏大理政权的关系　宋蜀华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3期
郑回与唐诏和盟　薛文　云南师大学报　1991年1期
试论南诏国王异牟寻的政绩　杨明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历史研究专号
南诏王异牟寻与贞元年间的南诏唐朝和盟　苏建灵　思想战线　1991年3期
南诏北臣吐蕃发微　赵橹　西藏研究　1990年4期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王丽珠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12期
关于唐代剑南道与吐蕃、南诏交通路线的几个问题　黄修明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2期
骠国与南诏的关系　徐兴祥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年4期
论云南南诏(乌蛮、白蛮)时期法律制度对当世社会经济的调整　聂秀娥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74年4期
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　李晓岑　思想战线　1995年1期
南诏疆域的发展和郡县的设置　尤中　历史地理　1988年6期
唐代南诏城镇散论　赵鸿昌　云南社会科学　1991年4期
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　陆韧　思想战线　1995年2期
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　张锡禄　云南社会科学　1990年1期

论南沼的建筑文化——兼与傣族的建筑风格相比较　胡华生　东南亚　1990年1期

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　管彦波　云南师大学报　1991年2期

南诏文化的特征　禹弛　云南社会科学　1990年3期

南诏宗教考　熊德基　新中华(复刊)6卷17期1948年9月

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与大理民俗　潘京京　昆明师专学报　1992年4期

南诏社会生活管窥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4期

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　管彦波　民族研究　1993年2期

从洱海国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　田怀清　东南文化　1993年2期

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年

纂录南诏大理军事诸书概说(上、下)　方国瑜　思想战线　1981年4、5期

南诏德化碑作者考　王叔武　思想战线　1978年2期

"《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上、下)　王宏道　云南社会科学　1985年4、5期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　王叔武　思想战线　1986年3期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　王宏道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7年1期

《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考释　汪宁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0年2期

樊绰《云南志》考说．方国瑜　思想战线　1981年1期

谈南诏写本《护国司南抄》　杨名铠　云南图书馆　1981年1期

《西洱河风土记》及其史料价值　林超民　云南社会科学　1982年3期

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　张增祺　思想战线　1984年2期

《南诏图传·文字卷》初探　李惠铨　王军　云南社会科学　1984年6期

《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2期

《蛮书》所载"承上"一辞含义的推测——兼论南诏前洱海地区地方政权

的建立　王宏道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年3期

茫施蛮并非傣族先民　桑维华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　1979年3期

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　桑维华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　1980年1期

浅谈茫蛮部的族属　刘稚　思想战线　1982年1期

㨨人的族属和迁徙　林超民　思想战线　1982年5期

㨨说　张增祺　云南社会科学　1987年4期

唐代西爨及昆明的族属问题　李绍明　思想战线　1983年2期

从唐代傣族的社会经济看茫蛮部落的族属　胡绍华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4期

唐宋时期的傣族　尤中　民族文化　1983年2期

从樊绰《云南志》论唐代傣族社会　宋蜀华　思想战线　1978年6期

从《帕萨坦》看西双版纳茫乃政权　王军　思想战线　1984年1期

唐宋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　彭武一　江汉论坛　1983年5期

古代的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土家族族源初探)　王承尧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年1期

土家族族源的几种看法　张二牧　向天喜　民族研究　1984年1期

论极楯蛮　彭武一　南充师院学报　1987年2期

隋代南方诸族概说　吴永章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2期

试论六世纪越族杰出的政治领袖冼夫人　陈凤贤　民族研究　1980年3期

关于冼夫人若干问题的考察　黄君萍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　1984年1期

试论冼夫人促进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　万利生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2期

开发岭南的先驱(六世纪岭南族的杰出领袖——冼夫人)　许宁英　学术研究　1985年4期

乱世巾国——冼夫人　罗惜珊　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1991年2期

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探　容观琼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4期

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　李默　广东社会科学　1984年2期

岭南少数民族与黄巢起义军　郭在忠　民族研究　1985 年 1 期

唐宋岭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陈伟明　岭南文史　1992 年 2 期

唐代岭南的开发及汉族与俚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 年 1 期

试论唐代岭南民族政策　雷学华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 年 2 期

唐代安南与内地的交通　思想战线　1992 年 5 期

支持黄巢起义军的桂州“溪洞蛮”族属小考　郭在忠　黄明光　民族研究　1989 年 1 期

思州田氏世系初考　黄透松　黔东南社会科学　1989 年 4 期

唐代中后期黔中地区诞生的罗殿国　贵州文史丛刊　1994 年 4 期

从古籍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　顾颉刚　社会科学战线　1980 年 1 期

唐代西山诸羌考略　李绍明　四川大学学报　1980 年 1 期

唐代白狗羌探考　史林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 年 3 期

六、中外关系

1. 总论

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　贺梓成　文博 1984 年 1 期

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通的影响　张广达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　1985 年

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　张广达　中国社会科学 1986 年 3 期

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田余庆　李孝聪　运河访古 1986 年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牛致功　唐史论丛 3 辑 1987 年

从中外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方亚光　社会科学战线　1990 年 1 期

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　史念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 年 2 期

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魏明孔　社会科学　1989年2期

谈谈唐王朝的对外开放　屈小强　文史杂志　1989年3期

浅析唐代扬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郭志燮　河北师院学报　1992年4期

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田廷柱　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1期

从唐诗看唐代的中外交往　方亚光　学海　1993年4期

试论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及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宋强刚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1994年4期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　余和祥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5期

唐代对外交流的小说　孙永如　扬州师院学报 1993年2期

外国人关于唐代中国的著述与唐文明的传播　方亚光　江海学刊　1994年3期

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　李金　南洋问题研究　1994年1期

唐代蕃坊考略　范邦瑾　历史研究　1990年4期

试论蕃人仕唐之盛及其姓名之汉化　马驰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年

国际交往与长安的繁荣　武伯纶　武复兴　理论导刊　1991年3期

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徐苹芳　燕京学报　新1期　1995年

2. **朝鲜**

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　韩升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　1995年

隋文帝征讨高丽的因由　刘健明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　1995年

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　刘健明　唐研究(1)　1995年

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来往　韩国磐　历史研究　1994年2期

试论隋与新罗的"佛教外交"　黄约瑟　韩国学报　1991年10期

论唐代初期的中·日·韩关系　夏应元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

史论丛　1995 年

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　韩升　东北史研究　1995 年 2 期

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　韩升　唐研究(1)　1995 年

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　黄约瑟　古代中日关系研究　1987 年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吴葆棠　文川　烟台大学学报　1990 年 3 期

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　周一良　进步日报　1950 年 12 月 26 日

新罗留学生与僧徒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港)　1969 年

唐朝新罗留学生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王周昆　西北大学学报　1994 年 2 期

唐代中国与朝鲜佛教渊源考　黄大年　抚顺师专学报　1991 年 3 期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　陈景富　人文杂志　1994 年 2 期

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　刘希为　中国史研究　1993 年 3 期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与日本、朝鲜之间的交流与往来　高凤林　山东师大学报　1994 年 1 期

论新罗入唐之宿卫与质子——兼论唐代宿卫与质子之性质　章群　韩国学报 1986 年 6 期

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　傅玫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　1995 年

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　金文经　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　1987 年

圆仁目睹的新罗人　牛致功　唐文化研究论文集　1994 年

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　高明士　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　1987 年

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　高明士　唐史论丛 6 辑　1995 年

略论高丽科举制度中的隋唐诸要素　高明士　韩国学报　1985 年 5 期

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关于唐宋官制对高丽官制影响的研究之一　龚延明　韩国研究　1994 年 1 期

仕高丽的后周官人双翼　黄约瑟　韩国学报　1993 年 12 期

3. 日本

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　吴廷璆、郑彭年　世界历史　1992 年 6 期

隋唐时期的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　李金明　南洋问题研究　1994年2期

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　贺昌群　文史杂志1卷12期　1941年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　胡如雷　河北师院学报　1987年4期

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日本的奈良文化　王金林　天津社会科学　1989年2期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　贺昌群　中华文史论丛　6辑　1965年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启示　崔永东　南都学坛　1988年4期

唐时期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入　史迪　史学月刊　1990年8期

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　黄约瑟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89年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仁波　考古与文物　1984年3期

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　杨泓　考古　1988年4期

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　周一良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2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1988年

唐代传入日本之音乐与舞蹈　常任侠　说文月刊4期　1944年

谈唐代书法与中日文化交流　张铁弦　文物　1959年8期

唐朝时期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　曹汾　人文杂志　1980年3期

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　周一良　历史研究　1984年1期

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1986年2期

有唐时期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简论　赵家骥　东北师大学报　1989年6期

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　王维坤　西北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文献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　羽离子　文献　1992年3期

隋唐律令与日本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池田温　武汉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印刷专著《龙树出印法》东传日本考　羽离子　人文杂志　1992年5期

唐代国库制度对日本的影响　葛承雍　中国史研究　1993年3期

唐代中日白江之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严佐之　华东师大学报　1986年1期
隋时日本遣华使僧及文化之东传　向达　亚洲文化论丛3期　1944年
中国唐朝遣日使小考　杨辄　北方论丛　1984年1期
中国唐朝遣日使考　杨辄　大庆社会科学　1990年4期
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　韩升　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6期
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唐事异同考　戴禾　张英莉　文史20辑　1983年
有关日本遣唐使的几个问题　李海镜　张令甫　日本问题研究　1990年2期
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　周一良　文物　1963年9期
鉴真到日本传授中国医药的始末　耿鉴庭　江苏中医　1963年5期
鉴真和尚与世界最早的印刷品　孙蔚民　扬州师院学报　1979年1期
鉴真在日本　汪向荣　社会科学战线　1978年2期
《唐大和上东征传》考　汪向荣　历史学　1979年2期
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作用　孙蔚民　扬州师院学报　1979年2期
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　汪向荣　世界历史　1979年4期
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考　许凤仪　扬州师院学报　1989年2期
鉴真东渡受阻来粤述略　李涵　岭南文史　1992年1期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　苏渊雷　学术月刊　1988年5期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荣睿与普照　张传杰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92年11期
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和日本灵仙三藏　王承礼　李亚良　北方文物　1993年4期
唐学东渡和吉备真备　李兆铭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91年4期
日本高僧圆仁与太原　李裕民　城市研究　1991年5期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艺交流　贾正中　西藏民族学院学刊　1980年
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冯兴盛　外国问题研究

1987年1期

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1986年2期

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1989年1期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　胡锡年　陕西师大学报　1981年1期

关于阿倍仲麻吕的几个史实问题　羽离子　南开史学　1991年2期

评《唐与日本》　黄约瑟　中国史研究　1994年1期

"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　黄约瑟　历史研究　1993年4期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顾承甫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84年3期

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与日本留学僧　王仁波　文博　1989年6期

入唐日僧圆珍与唐朝史料　周一良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13/14期 1989年

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　齐东方　张静　唐研究(1) 1995年

日本木简与中国典籍　大庭修　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1993年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　周一良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　1990年

4. **中亚、西亚**

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姜伯勤　季刊东西交涉　第5卷1、2、3号　1986年

七一二年的粟特　马小鹤　新疆大学学报　1986年1期

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　马小鹤　中亚学刊　1990年3期

李家营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　齐东方　北京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　程越　西北民族研究　1994年1期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　芮传明　史林　1992年3期

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论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　卢兆荫　考古　1986年9期

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　陈连庆　1985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篇(上)　1987年

唐代昭武九姓之宗教的东传　阎万钧　世界宗教研究　1988年1期

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　蔡鸿生　文史31辑　1988年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的关系辨证　曹旅宁　青海社会科学　1990年8期

“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　李志敏　西北史地1993年3期

西域粟特移民考　荣新江　西域研究　1993年2期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　芮传明　史林1992年3期

沙陀与昭武九姓　徐庭云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1993年

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　芮传明　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1期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纪宗安　暨南大学学报　1989年3期

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　蔡鸿生　文史35辑　1992年

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　程越　史学月刊　1994年1期

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　程越　西北民族研究　1994年1期

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　程越　新疆大学学报　1994年2期

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九姓诸国　卢兆荫　河洛春秋　1993年9期

《隋书》康国传探微　蔡鸿生　文史26辑　1986年

技悉密汗国及其相关的问题　陈良伟　新疆大学学报　1992年3期

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　朱杰勤　中外关系史译丛　1984年

唐代的中阿文化关系(续)　黄培嫣　阿拉伯世界　1992年4期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载　白寿彝　禹贡　5卷11期　1937年

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　武伯纶　西北大学学报　1978年1期

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　穆宝修　云南社会科学　1985年5期

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　赖存理　史学月刊　1988年2期

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阎宗临　山西师学院学报　1958年2期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朱杰勤　历史研究　1978年7期

古代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略论　叶奕良　中外关系史论丛　1994年4期

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　刘迎胜　考古学报　1990年3期

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　林梅村　学术集林　1995年4期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　姜伯勤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1991年

唐代岭南的波斯人与波斯文化　王承文　中山大学史学集　1992年1期

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　罗香林　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64年2期

敦煌与波斯　姜伯勤　敦煌研究　1990年3期

《经行记》考论　丁克家　回族研究　1991年1期

唐代扬州的大食商人　宋岘　中华文史论丛　1987年1期

扬州与波斯　蒋华　江苏商专学报　1990年1期

阿拉伯文古钱及其在中国的流传　宋岘　周素珍　西域研究　1993年3期

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　张广达　中外文化交流史　1987年

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和变化　卢苇　西域史论丛　第2辑　1985年1期

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　秦惠彬　世界宗教研究　1987年1期

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兼论唐与大食中亚对峙形势的演变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8年6期

唐代大食通中国之海道　伊本·库达特拔　宋岘节译　中外关系史译丛3　上海1986年

伊朗与中国　威廉·沃森　马小鹤译　中外关系史译丛 3　1986 年

唐宋文献缺乏有关波斯大食人入滇记载的原因　马兴东　思想战线 1991 年 2 期

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　沈福伟　世界历史　1980 年 6 期

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　张星烺　辅仁学志 1 卷 1 期　1928 年

从出土"唐三彩"看中原与西域及北非的文化交流　贾娥　文物春秋 1992 年 3 期

5. **南亚、东南亚**

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　范祥雍　中华文史论丛　1982 年 4 辑

大唐西域记阙文考辨　范祥雍　文史 13 辑　1982 年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1982 年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1982 年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1982 年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黄盛璋　历史研究　1980 年 1 期

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季羡林　历史研究　1982 年 1 期

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　周济　中华医学杂志 22 卷 11、12 期 1936 年

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季羡林　国学研究　1994 年 2 期

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　房定亚等　南亚研究 1984 年 2 期

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　江晓原　天学真原　1991 年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1982 年

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　季羡林　文献 1988 年 2、3 期

王玄策事辑　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香港　1976 年

龙门石窟新发现王玄策造像题记　李玉昆　文物 1976 年 11 期

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　陆庆夫　敦煌学辑刊　1984 年 1 期

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　阴松生　南亚研究　1990 年 2 期

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　莫任南　南亚研究　1991 年 3 期

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　孙修身　敦煌研究　1994 年 3 期

试论义净在唐朝和南海诸国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卓建明　世界历史　1992 年 6 期

《南海寄归内法传》佚文辑考　王邦维　清华汉学研究　1994 年 1 期

从《酉阳杂俎》看中印文化交流　薛克翘　南亚研究　1992 年

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　荣新江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　1991 年

唐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论略　薛桂芳　求是学刊　1993 年 3 期

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考古 1994 年 7 期

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　许道勋等　复旦学报　1980 年 6 期

唐宋时期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航路综考　高伟浓　海交史研究　1987 年 1 期

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王仲荦　唐史论丛 2　1987 年

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及经济文化交流　黄国安　东南亚纵横　1990 年 3 期

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叙录　向达　唐代长安与域文明　1957 年

七、文化史

1. 总论

魏晋——盛唐文化总体性论　周积明　河北学刊　1989 年 4 期

隋唐文化的特点　牛致功　洛阳师专学报　1992 年 1 期

唐代文化的发展趋势　李岩　社会科学战线　1991 年 1 期

隋唐人文化素质高度发展的原因　勾利军　江阔元　河南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唐代的开放与世风及国运之关系　王炎平　贵州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　赵文润　陕西师大学报　1994年4期

论唐文化政策与文化繁荣的关系　魏承思　学术月刊　1989年4期

唐代物质文化综观　傅玫　南开学报　1989年4期

论唐朝前期推行文化教育多元化及其作用　何敦烨　福建论坛　1994年2期

唐太宗文教方略简论　肖建彬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1990年2期

盛唐社会文化的社会学解释　李岩　社会科学家　1988年6期

唐明皇与盛唐文化　张振华　文艺理论家　1992年3期

论中唐时期文化特质的转移　孟二冬　烟台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隋唐历史文化与陈子昂的美学观　周清泉　成都大学学报　1991年1期

从张九龄"阿党"錐议开元间南北文化之碰撞　唐森　林立平　学术研究　1989年4期

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述略　李岩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1年4期

2. 宗教

(1)佛教

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方立天　世界宗教研究　1988年1期

隋唐佛学之特点　汤用彤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1983年

论中国佛教无"士宗"汤用彤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1983年

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　汤用彤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1983年

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　石峻　方立天　哲学研究　1981年2期

论隋唐佛教宗派的思想特点　石峻　方立天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2年4期

略论隋唐佛教的演变进程　苏渊雷　宁波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任继愈　五台山研究　1990年2期

唐代佛教与社会　雨昙　海潮音　17卷8期　1936年8月

《唐代佛教》引言　范文澜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1979 年
论唐代佛教　李斌城　北方论丛　1980 年 6 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81 年
天台宗的圆融哲学　潘楼明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2 期
性具与性起—天台、华严二宗佛性思想的比较研究　赖永海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2 期
天台宗的佛教哲学思想　曾其海　东南文化　1990 年 6 期
隋炀帝与天台宗　王光照　学术月刊　1994 年 9 期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　任林豪　东南文化　1994 年 2 期
唐宋时期天台山三教关系刍论　许尚枢　东南文化　1994 年 2 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81 年
唐玄奘法师年谱　刘汝霖　女师大学术季刊 1 卷 3 号、2 卷 1 期　1930 年 9 月——1931 年 4 月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梁启超　东方杂志 21 卷 7 号　1924 年
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法师年岁之商榷、本传甲子之伪误)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辑　1980 年
大唐西域记撰人辨机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　1980 年
玄奘对唯识学说的发展　张春波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年 1 期
唐玄奘晚年活动散论　葛承雍　人文杂志　1994 年 2 期
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81 年
华严金师子章评述　方立天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　1983 年
华严宗宗主法藏的生平及其思想　邱高兴　世界宗教研究　1992 年 3 期
禅学古史考　胡适　新月 1 卷 6 期　1928 年 8 月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附)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81 年
与胡适论禅宗史书　汤用彤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1983 年
唐代禅宗对我国佛教的改革　吴炎　社会科学(沪)　1984 年 2 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　任继愈　社会科学战线　1988 年 2 期

禅宗述评　罗炤　世界宗教研究　1986 年 3 期
光孝寺与六祖慧能　谢扶雅　岭南学报 4 卷 1 期　1935 年 4 月
唐代禅宗慧能学派　萧箑父　武汉大学学报　1962 年 1 期
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1980 年
慧能与禅宗——禅宗思想研究之一　郭朋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 1 辑　1979 年
禅宗五家——禅宗思想研究之二　郭朋　世界宗教研究　1981 年 1 期
论慧能的佛教伦理观　温金玉　五台山研究　1988 年 2 期
慧能南宗禅学思想辨义与新探　洪修平　世界宗教研究　1992 年 4 期
慧能散论：兼与施蛰存先生商榷　吴庭玉　张家口师专学报　1992 年 1 期
略论早期禅宗——南宗禅的背景问题探讨　邢东风　世界宗教研究　1993 年 1 期
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无法之法　邢东风　哲学研究　1991 年 6 期
性净自悟——慧能《坛经》的心性论　方立天　哲学研究　1994 年 5 期
禅宗北宗初探　温玉成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1 期
神秀北宗禅法任继愈　中国社会科学　1990 年 2 期
神会传　胡适　胡适论学近著　1935 年
略论神会及其佛教哲学思想　丁东风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7 年 3 期
神会思想简论　郭明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1 期
也谈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潘桂明　南京大学学报　1989 年 4 期
论神会的佛学思想　乐九波　世界宗教研究　1988 年 3 期
唐代禅宗对我国佛教的改革　吴炎　社会科学(上海)　1984 年 2 期
临济宗思想初探　潘桂明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3 期
临济宗心性论述评　方立天　北京社会科学　1994 年 2 期
禅宗与曹溪南华寺　罗香林　文史学研究所月刊 1 卷 4 期　1933 年 4 期
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　方立天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年 2 期
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　胡适　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册　1935 年
《坛经》考"质疑——读胡适《坛经考之一》　黄德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3 年 2 期

《坛经》引论　黄志辉　韶关大学学报　1993 年 4 期

读《禅宗大师法如碑》书后　温玉成　世界宗教研究　1981 年 1 期

宗密和他的禅学　李富华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1 期

宗密禅教合一思想论述　周群　南京师大学报　1991 年 4 期

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实质　张春波　李蛟曦　五台山研究　1991 年 1 期

马祖道一评传　何云先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1 期

石头希迁评传　何云先　佛学研究创刊号　1992 年

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　潘桂明　安徽大学学报　1990 年 1 期

唐代净众——保唐禅派概述　黄燕生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4 期

五代禅学钩沉　王新民　福建文化 2 卷 3 期　1945 年 6 月

唐宋时期的浙江禅学　黄平　浙江学刊　1993 年 1 期

禅宗思想对唐宋美学的影响　周春宇　宁夏教育学院学报　银川师专学报　1993 年 3 期

敦煌汉文禅籍特征概观　(丹麦)索仁森著　李吉和译　敦煌研究　1994 年 1 期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1985 年

信行大师及其学说　徐正英　殷都学刊　1992 年 1 期

评《唐中期净土教》　汤用彤　大公报　1934 年 3 月 17 日　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论慧远、昙鸾、善导三大师在净土宗的法迹　孙浮生　中国佛学论文集　1984 年

关于善导禅师卒年问题　温玉成　文物　1985 年 3 期

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　龙晦　世界宗教研究　1986 年 3 期

观世音信仰的传入和流行　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1985 年 3 期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杨廷福　鉴真研究论文集　1980 年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传衣说及其价值　杜斗城　社科纵横　1993 年 5 期

论一行的佛学思想　吕建福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5 期

谈隋唐时期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　涂晓红　史学月刊　1989 年 5 期

唐代的内道场和内道场僧团　张弓　世界宗教研究　1993年3期
唐代佛教政策简论　谢重光　世界宗教研究　1988年3期
论唐代宗教政策　施光明　陕西师大学报　1985年1期
试论唐代的宗教政策　李富华　董型武　世界宗教研究　1989年3期
唐太宗与佛教　汤用彤　学衡75期　1931年7月
唐太宗与佛教　李瑾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1期
李世民宗教政策嬗变的思考　顾自奋　上海大学学报　1994年3期
武曌与佛教　陈寅恪　史语所集刊　5卷2期　1935年12月
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释之争的关系——兼评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陈美林　南京师院学报　1977年1期
武则天与佛教　贺世哲　甘肃师大学报　1978年2期
武则天与唐代佛教　赵云旗　五台山研究　1990年2期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　杜斗城　河洛春秋　1993年4期
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　马德　敦煌学辑刊　1983年3期
从唐中叶以前的反佛斗争谈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巩绍英　中国哲学第1辑　1980年
〈广弘明集〉与隋唐初期的佛道儒论争　李明友　世界宗教研究　1992年2期
论唐代反佛　李斌城　人文杂志　1981年1期
唐代反佛理论　陆华柏　徐宏林　西北民族学报　1992年2期
唐会昌政教冲突史料　贾钟尧　食货4卷1期　1936年6月
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　于辅仁　烟台师院学报　1991年3期
试论唐武宗灭佛及其原因　薛超　学术论坛　1993年2期
李德裕与会昌禁佛　汤用彤　图书月刊3卷3、4期　1944年5月
李德裕和会昌禁佛　田廷柱　辽宁大学学报　1980年5期
会昌毁佛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　袁刚　中国史研究　1983年4期
李德裕与会昌毁佛　姜苹　兰州学刊　1991年6期
郎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周宏伟　西藏研究　1988年2期
唐宣宗兴佛原因新说　于辅仁　学术论坛　1993年2期

“衰象现前”崇禁失据——唐后期诸帝与佛教述论　张弓　中国史研究　1992年4期

晋至唐中叶门阀士族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从开业寺碑谈起　谢重光　北师大学报　1991年4期

论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李斌城　魏晋隋唐史论集2辑　1983年

唐代佛教对士大夫处世态度的影响　郭绍林　文史知识　1991年2期

略论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　徐洪兴　复旦学报　1994年4期

韩柳与佛老　王春庭　重庆师院学报　1982年1期

韩愈攘斥佛教的动机与效果　隗芾　汕头大学学报　1988年1期

信佛、辟佛、诋佛——兼谈《大藏经》对韩愈反佛的写述　李坤栋　四川师大学报　1993年3期

韩愈、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　孙以楷　中国哲学　1982年

关于佛学对柳宗元的影响及其“禅理”诗的评价问题　吴文治　文史哲　1981年6期

柳宗元与佛教　李传明　文史哲　1984年6期

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　王一民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8年3期

柳宗元佛论分析　郭绍明　周桂钿　世界宗教研究　1992年4期

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　杜寒民　社会科学　1994年1期

刘禹锡与佛教　杨鸣雁　贵州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李白与佛教　连登岗　庆阳师专学报　1993年3期

佛学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赵星　南通教育学院学报　1944年1期

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　姜光斗　南通师专学报　1991年4期

也谈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　袁志峰　东南文化　1992年4期

白居易的醉吟生涯及其佛教信仰　李意如　佛学月刊　1卷9、10期　1942年2、3月

白居易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洪海波　殷都学刊　1993年3期

唐代的史学与佛教　牛致功　陕西师大学报　1991年1期

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　孙昌武　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5期

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玄奘　马祖毅　翻译通讯　1980年2期

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81年

略论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　王亚荣　人文杂志　1994年2期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　陈景富　人文杂志　1994年2期

吐蕃佛教与西域　朵藏加　西藏研究　1993年1期

唐宋间之云南佛教　方国瑜　海潮音16卷3期　1935年3月

云南佛教源流及影响　吴棠　大理文化　1982年1期

唐代佛教密宗在云南的传播　杨铭锐　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 1982年1期

佛教中唐入滇考　黄惠焜　云南社会科学　1982年6期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　耿世民　新疆大学学报 1978年2期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　1982年1期

浅谈唐代渤海的佛教　何明　博物馆研究　1983年3期

吐蕃佛教述略　王尧　世界宗教研究　1981年2期

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　张广达　学林漫录3集 1981年

论赤松赞时期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阿沛·晋美　世界宗教研究　1983年4期

从敦煌写本看汉族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日文近作简析　(法)戴密微著　耿升译　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1983年

蕃占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 P.T.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　王尧 陈践　世界宗教研究　1988年2期

隋唐民间佛教浅议　郭天祥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1993年3期

唐宋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　杨曾文　五台山研究　1990年1期

唐代五台山佛教史　肖雨　五台山研究　1991年1、2、4期;1992年2、3;1993年2期

唐代五台山普通院　业露华　五台山研究　1992年1期

法门寺藏经史初探　柏明　文博　1991年3期

隋唐的佛舍利供养和法门寺　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1991年2期

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代佛教密宗文化　任新来　文博　1992年1期

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　韩金科　文博　1993年4期

法门寺始建年代与相关问题浅谈　韩金科等　文博　1993年4期

试谈法门寺真身宝塔之佛骨　淮建邦　文博　1993年4期

法门寺唐塔地宫及中国舍利瘗埋制度　韩金科等　文博　1993年4期

隋代凤泉寺与法门寺考　韩金科等　文博　1993年4期

中国佛教史与法门寺研究　李发良　文博　1993年4期

法门寺佛骨崇拜析　杨维中　西北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汉唐间洛阳佛教述略　程凯　史学月刊　1994年10期

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　辛德勇　文史知识　1992年6期

晚唐时期宣丰境内佛教兴盛原因探赜　辛增明　争鸣　1990年3期

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禅僧寺籍考辨　梅林　敦煌研究　1992年3期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　张捷尧　东北师大学报　1990年1期

唐代佛道之争研究　李斌城　世界宗教研究　1981年2期

唐前期的佛道势力与政治斗争　赵克尧　浙江学刊　1990年1期

唐初佛道之争的实质和影响　潘桂明　安徽师大学报　1990年1期

五代吴越国的佛教文化　倪士毅　东南文化　1989年6期

(2)道教

试论隋代道教　李刚　江西社会科学　1992年4期

隋文帝与道教　李刚　福建论坛　1992年1期

论唐代的道教　李斌城　山东师院学报　1978年6期

唐初佛道之争的实质和影响　潘桂明　安徽师大学报　1990年1期

唐太宗与道教　李刚　晋阳学刊　1994年5期

唐玄宗崇道浅论　高世瑜　历史研究　1985年4期

论唐玄宗与道教　薛平拴　陕西师大学报　1993年3期

吕洞宾神仙信仰溯源　马晓宏　世界宗教研究　1986年3期

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　李裕民　山西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籙”　黄烈　文物　1981年1期

论道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汤燕　江淮论坛　1982年6期

李白和道教　孔繁　世界宗教研究　1991年4期

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　刘长春　东南文化　1994年2期

华阳子施肩吾的丹道思想　丁培仁　社会科学研究　1990年4期

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　姜亮夫　兰州大学学报　1982 年 1 期

敦煌写本唐玄宗《道德经》注疏残卷研究　李斌城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1 期

唐玄宗〈道德经〉注诸问题　陈智超　世界宗教研究　1988 年 3 期

读〈唐玄宗〈道德经〉注诸问题——答陈智超同志　李斌城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4 期

李荣及其《老子注》考辨　黄海德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4 期

李荣〈老子注〉重玄思想初探　黄海德宗教学研究　1988 年 2、3 期

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　萧文　海南大学学报　1991 年 1 期

道教在唐代的兴盛及主要人物著述释略　彭清深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3 年 2 期

张果考　孟乃昌　宗教学研究 1 期

司马承桢、吴筠及期道德思想　冯可珠　上海道教　1992 年 4 期

唐代长安道教　张泽洪　唐都学刊　1993 年 3 期

唐代江西道教考略　李刚　世界宗教研究　1992 年 1 期

论敦煌道教文学　龙晦　世界宗教研究　1985 年 3 期

唐五代道教词简论　庆振轩　车安宁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3 年 2 期

两件反映道教内容的邛窑瓷碗　刘家琳　文物　1984 年 10 期

唐气功师百岁道人赴日考——以《金液还丹百问诀》为据　朱越利　世界宗教研究　1993 年 3 期

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及其影响　龚杰　西北大学学报　1993 年 3 期

试析张果内丹道的思想奥秘　卢国龙　中国道教　1989 年 4 期

(3)西亚宗教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　蒋斧　敦煌石室遗书　1909 年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王国维　亚洲学术杂志 2 期　1921 年 11 月，收入《观堂别集》1

摩尼教入中国考　陈垣　国学季刊 1 卷 2 期　1923 年　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1980 年

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　林悟殊　文史　18 辑 1983 年

摩尼教二宗三际论　许地山　燕京学报 3 期　1928 年 6 月
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　林悟殊　世界宗教研究　1982 年 3 期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　(英)刘南强著　林悟殊译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1 期
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产生　林悟殊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3 期
《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　林悟殊　文史 21 辑　1983 年
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　林悟殊　文史 22 辑　1984 年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　虞万里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一卷　1995 年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　耿世民　考古学报　1978 年 4 期
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　艾尚连　西北史地 1981 年 1 期
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　杨圣敏　西北史地　1985 年 3 期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杨富学　牛汝极　敦煌学辑刊　1987 年 2 期
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　牛汝极　杨富学　新疆大学学报　1993 年 4 期
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　林悟殊　世界宗教研究　1984 年 1 期
回鹘摩尼教研究综述　刘戈　西域研究　1991 年 3 期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林悟殊　西北史地　1984 年 4 期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　(英)刘南强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1 期
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　晁华山　考古与文物　1993 年 1 期
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　晁华山　中国文化　1993 年 8 期
被遗忘与被发现的历史古迹——谈摩尼教和吐鲁番摩尼教考古新发现　王玉东　文史知识　1994 年 11 期
泉州摩尼教初探　庄为玑　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 3 期
涵江又发现摩尼教残碑　程德鲁　海交史研究　1991 年 1 期

《老子化胡经》与摩尼教　林悟殊　西北史地　1984年4期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　林悟殊　文史23辑　1984年
有关摩尼教的两个问题　刘铭恕　世界宗教研究　1994年3期
祆教杂考　沈嵩华译　史学　中央大学2期　1933年2月
火祆教入中国考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辑　1980年
火祆教始通中国的再认识　林悟殊　世界宗教研究　1987年4期
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　荣新江　国学研究　1995年3期
高昌火祆教论稿　王素　历史研究　1986年3期
论高昌"俗事天神"　林悟殊　历史研究　1987年4期
也论高昌"俗事天神"王素　历史研究　1988年3期
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兼论其与王朝祭礼的关系　姜伯勤　世界宗教研究　1993年1期
唐人奉火祆教考辨　林悟殊　文史30辑　1988年
唐代长安火祆大秦寺考辨　林悟殊　西北史地　1987年1期
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　林梅村　中国史研究　1993年2期
火祆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　林悟殊　西北民族研究　1990年1期
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饶宗颐史学论文集　1993年
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　张乃翥　世界宗教研究　1992年3期
西域祆教文明　周菁葆　西北民族研究　1991年1期
敦煌遗书中所见之祆教　（敦煌遗书杂记四篇之一）　刘铭恕　敦煌学论集　1985年
基督教入华史略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　1980年
基督教入华史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　1980年
唐景教碑考　杨葆初　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2卷2期　1930年6月
唐景教论　徐宗泽　圣教杂志25卷7期　1936年7月
唐代景教史稿　方豪　东方杂志41卷8期　1945年4月
唐朝景教的神学思想点滴　朱万源　金陵神学志　1994年1期

南诏来袭与成都大秦景教之摧残　刘铭恕　边疆研究论丛　1945 年
唐元二代之景教　罗香林　香港中国学社　1966 年
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　龚方震　中华文史论丛　1983 年 1 期
考与景教碑有关的人和事　张伯龄　文博　1991 年 1 期
景教在唐朝衰落的原因　安希孟　社会科学报　1992 年 3 月 5 日
云南景教考　段玉明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3 年 4 期
西域景教文明　周菁葆　新疆师大学报　1994 年 2 期
西域景教考述　高乐久　西北史地　1994 年 3 期
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　李伯毅　文博　1994 年 4 期
从景教碑所鐫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周祯祥　文博 1993 年 5 期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林悟殊　荣新江　九州学刊 4 卷 4 期　1992 年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辑　1980 年
中国回教小史　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1982 年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1982 年
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　朱江　伊斯兰教在中国　1982 年
唐代的蕃客　杨怀中　伊斯兰教在中国　1982 年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高占福　甘肃民族研究　1994 年 4 期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才家瑞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3 年 1 期
也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和时间　许宪隆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7 年 4 期
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　秦惠彬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1 期
唐代的伊斯兰教　秦惠彬　世界宗教研究　1987 年 3 期
唐代穆护及其首次遭逢灭教　羽离子　海交史研究　1992 年 1 期
伊斯兰教在五代时期的发展　秦惠彬　世界宗教研究　1989 年 1 期

3. **哲学**

唐人之哲学　陋海　进步杂志4卷2期　1913年

汉唐学论　黄侃　哲学月刊1卷6、7期　1926年、1927年

唐代哲学评述　癯公　哲学月刊1卷8期　1927年

汉唐玄学论　黄侃　时代公论11期　1932年

唐代新文化运动　谭丕谟　读书与出版2卷2期　1947年2月

唐代文士学术思想　姚吉光　历史与文化2卷3期　1947年3月

唐学　任铭善　国文月刊5卷4期　1947年4月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论略　章权才　学术研究　1990年2期

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　尹协理　哲学研究　1985年5期

隋代禁纬与焚纬　李德勤　郑州大学学报　1986年2期

隋与唐初经学　牟钟鉴　孔子研究　1988年3期

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　赵云旗　孔子研究　1988年3期

隋唐儒学的发展及其地位　赵云旗　山西师大学报　1990年3期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周鼎初　江汉论坛　1995年6期

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　张弓　历史研究　1993年3期

隋唐儒学与自然科学　齐鲁学刊　1991年4期

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杨荫楼　齐鲁学刊　1990年3期

唐代后期儒学的新趋向　冯友兰　张跃　文献　1990年4期

唐代儒学盛衰概观　牛春生　宁夏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唐代经学论略　杨荫楼　求是学刊　1992年4期

唐代儒学复兴及学术史的研究　卢钟锋　广东社会科学　1990年4期

唐代学术文化发展述论　叶茂　南都学坛　1994年1期

三教争衡与唐代的学术发展　李岩　社会科学家　1994年5期

唐宋间儒释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孙实明　学术交流　1990年4期

唐代经学中的新思潮——评陆淳春秋学　刘光裕　河南大学学报　1990年3期

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　谢保成　中国史研究　1990年4期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杨荫楼　孔子研究　1990年4期

论唐太宗统一《五经》文字义疏及其对儒学的影响　康占杰　陈风华　固原师专学报　1995年3期

皮日休与晚唐儒学　王国轩　孔子研究　1989年1期
文中子书后　缅海　进步杂志4卷3期　1913年7月
文中子　蒙文通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9期　1935年8月
论王通的伦理思想　尹协理　浙江学刊　1986年3期
论王通的思想特质　刘宽亮　卢庆芳　晋阳学刊　1989年4期
论王通对三教的主张　朱越利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9年1期
管窥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　刘宽亮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9年1期
王通与《中说》　杨明　复旦学报　1989年1期
辨王通为隋代学者　张新民　贵州师大学报　1991年3期
王通的“通变”哲学　李邦国　湖北师院学报　1990年6期
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　邓小军　四川师大学报　1991年6期
王通思想简论　周庆义　齐鲁学刊　1992年6期
王通政治思想简论　刘宽亮　运城商专学报　1993年2期
《隋书》不载王通考　邓小军　四川师大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英儒第一家——经学大师孔颖达其人其学　李建国　文史知识　1990年12期
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　刘泽华　孔子研究　1991年3期
从傅奕到李炎——唐代中国文化之剑运作掠影　谢芳琳　文史杂志　1991年1期
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　侯外庐　历史研究　1959年9期
吕才与玄奘师徒的论争　罗炤　世界宗教研究　1991年2期
论柳宗元　王芸生　文汇报　1963年9月12日
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　李俊虎　学术通讯　1962年2期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　杨惠琴　江海学刊　1958年5期
关于柳宗元哲学思想的评价　汤一介　文汇报　1961年2月2日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兰同志商榷　钟来因　江汉论坛　1981年6期
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概述　岑贤安　国内哲学动态　1982年11期
从《天对》看柳宗元的哲学思想　李塞夫　广西大学学报　1986年1期
柳宗元哲学思想评述　吴文治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4年4期
略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魏宗禹　山西大学学报　1984年2

期

柳宗元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原因　刘兴邦　湘潭大学学报　1986年4期

从《贞符》看柳宗元哲学体系的矛盾　贾顺先　四川大学学报　1984年2期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孙以楷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4年2期

对柳宗元两个哲学观点的论析　张铁夫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9年4期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徐明　锦州师专学报　1993年2期

浅论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哲学贡献及其原因　朱光甫　湘潭大学学报　1991年3期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　侯外庐　新建设　1959年7期

柳宗元无神论思想初探　吴文治　新建设　1958年3期

浅谈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　张汉纲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2期

论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内容　张铁夫　中国哲学史　1993年1期

柳宗元《天对》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科学地位——兼看哲学党性原理的具体表现　侯外庐等　历史研究　1963年2期

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　丁宝兰　哲学研究　1979年2期

柳宗元世界观辨——与丁宝兰先生商榷　柯北利　哲学研究　1980年3期

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与丁宝兰先生商榷　潘富恩　陕西师大学报　1980年3期

略论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　丁宝兰　哲学研究　1980年11期

试论柳宗元世界观的宗教唯心主义实质　张铁夫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4年4期

柳宗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张润民、贾维经　昆明师专学报　1984年3期

略论柳宗元世界观的矛盾及其原因　岑贤安　晋阳学刊　1984年5期

试论柳宗元的天人观　杨达荣　广西师院学报　1983年3期

杰出的“元气”唯物论哲学家柳宗元　范阳　广西日报　1983年11月24日

柳宗元的自然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屠承先　杭州大学学报　1984年2期

论柳宗元的辨证法思想　孙以楷　安徽大学学报　1984年2期

柳宗元认识论特点初探　张汉纲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83年4期

柳宗元的《封建论》　师道刚　学术通讯　1963年6期

《封建论》的进步历史观及其写作背景　阎毅昭　昭乌达盟师专学报　1992年2期

柳宗元《封建论》论析　王彦有　大庆师专学报　1992年3期

柳宗元社会历史观“势”之初探　邬显林　南宁师院学报　1983年1期

试论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　王启鹏　惠阳师专学报　1983年1期

略论柳宗元的“制”、“政”思想　王秋实　郑州大学学报　1984年2期

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　王永兴　学术通讯　1963年3期

柳宗元的社会思想　侯外庐　光明日报　1963年2月26日

柳宗元的人性观点初探　袁永椿　新疆大学学报　1985年1期

柳宗元的顺人历史观　张礼勋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87年3期

柳宗元道论简析　蒙培元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4年4期

柳宗元民论研究　郭绍明　周桂钿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7年4期

柳宗元的治民思想　施开诚　居巢学刊　1993年3、4期

论柳宗元的生民史观(兼与瞿林东同志商榷)　张铁夫　求索　1993年5期

柳宗元伦理思想初探　王凯　求是学刊　1992年2期

柳宗元的人学思想　韦建军　驻马店师专学报　1994年1期

柳宗元人才观散论　杨达荣　晋阳学刊　1994年3期

论柳宗元“好佛”的两重性特征及其评价问题　张武　广西社会科学　1987年

柳宗元不主张“以神道设教”　王一民　晋阳学刊　1989年4期

论柳宗元的禅宗思想　孙昌武　文学遗产　1991年2期

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　李锦全　晋阳学刊　1990年6期
从柳宗元好佛看儒佛价值取向的认同　刘兴邦　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　1991年2期
柳宗元思想中的道家成分　黄蝶红　玉林师专学报　1994年2期，1995年1期
柳学结构及其运思特色　曹锡仁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4年2期
柳宗元与理学关系初探　尹协理　南宁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4期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张立文　学术论坛　1984年2期
柳宗元与宋明理学　杨达荣　江西社会科学　1993年10期
柳宗元的儒家风范　乔长路　孔子研究　1994年1期
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徐远和　哲学研究　1984年3期
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　尤骥　孔子研究　1994年2期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彭建　邢风麟　广西社会科学　1994年2期
柳宗元与儒学革新　刘光裕　孔子研究　1994年3期
柳宗元和王廷相哲学思想比较　葛荣晋　学术论坛　1984年2期
柳宗元的天论与刘禹锡的天论　黄钊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4年3期
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　王应常　南充师院学报　1984年4期
浅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论　汪益民　浙江大学学报　1993年7期
“天人之辨”的渊源及唐代刘柳的贡献　杨欣　广西大学学报　1995年2期
试论刘禹锡的宇宙观　纪作亮　学术界　1989年5期
试论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　吴兆华　中山大学学报　1990年2期
刘禹锡、柳宗元唯物主义自然观探胜　罗炽　武汉师院学报　1983年6期
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　赵纪彬　哲学研究　1957年5期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游钦赐　学习与研究　1958年1期
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　萧楚文　江汉学报　1962年7期
试论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阳自润　湖南教育学院院刊　1983年3期

论韩愈　陈寅恪　历史研究　1954年2期
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　黄云眉　文史哲　1955年8期
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　李镇淮　文学研究　1958年1期
韩愈思想批判　杨荣国　理论与实践　1958年11、12期
韩愈思想评价　鲍叔　哈尔滨师院学报　1963年2期
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　郭子卿　北师大学报　1978年3期
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　高聚德　河北大学学报　1979年1期
论韩柳哲学思想斗争　孙以楷　安徽大学学报　1979年3期
为韩愈一辨——韩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王启兴　西北大学学报　1979年4期
论韩愈维护三统的斗争　徐克文　辽宁大学学报　1979年6期
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　刘知渐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1982年1期
韩愈柳宗元的评价问题　刘知渐　重庆师院学报　1981年1期
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的问题　史苏苑　中原学刊　1982年1期
韩愈研究述评　吴文治　苏州大学学报　1982年2期
韩愈道学批判　陈守元　重庆师院学报　1983年2期
韩愈思想辨　许可　河北师院学报　1985年3期
韩柳异同新论　王一民　晋阳学刊　1985年6期
韩愈《原道》篇新证　蒋凡　学术月刊　1985年8期
简论韩愈柳宗元思想的异同　陈玄荣　学习月刊　1986年8期
论韩愈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兼及应如何评价古代作家　关四平、彭波　呼兰师专学报　1988年4期
读韩愈《原道》　孙昌武　南开学报　1989年1期
论韩愈　黄永年　陕西师大学报　1989年3期
韩愈与儒家道统　党天正　宝鸡师院学报　1989年3期
略论韩愈与杨雄　孙连琦　锦州师院学报　1989年4期
韩愈《三上宰相书》的价值　章亦辛　叶志恒　锦州师院学报　1989年4期
韩愈《天说》新论　汕头大学学报　1990年7期
韩愈领导统御思想简论　朱海风　李帮儒　郑州大学学报　1992年4

期

继承旧道统，创立新儒学　张清华　中州学刊　1992年4期

“将以有为”务实求新——韩愈思想特质新探　管仁福　蒲峪学刊　1992年1期

韩愈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州学刊　1992年4期

理学本体——人性论的建立，韩愈人性思想研究　邓小军　孔子研究　1993年2期

中唐儒学发展的机遇与迷误——对韩柳思想斗争的新观察　福建论坛　1993年3期

略论韩愈的“相生养之道”　宁夏学刊　1994年2期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杨翰卿　学习论坛　1994年4期

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　朱易安　文学遗产　1993年3期

论韩愈的易学思想　李保林　学习论坛　1993年7期

韩愈谏佛的历史评说　王瞻　文博　1993年4期

论韩愈李翱思想的历史位置　马良怀　华中师大学报　1995年1期

李翱思想的来源　孙道升　清华学刊41卷5期　1934年

李翱的复性说　黄开国　社会科学　1990年2期

杜甫儒家思想论　王亚民　河北学刊　1989年5期

略论成玄英的重玄思想　李则　四川大学学报　1992年4期

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　赵宗城　中国哲学11辑

简谈王玄览的道论　朱森溥　社会科学研究　1986年3期

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　步近智　历史教学　1980年12期

试论《无能子》　朱越利　世界宗教研究　1983年1期

无能子及其在唐末思想上的地位　李俊恒　许昌师专学报　1987年1期

唐代的一桩哲学和逻辑公案　周文英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1982年2期

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许苏民　江汉论坛　1987年6期

李德裕思想研究　侯愚　吕增良　河北师大学报　1985年2期
论张果的哲学思想　卢国龙　光明日报　1987年5月4日
谭峭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高令印　陈其芳　福建论坛　1984年4期
论谭峭《化书》　卢冀宁　江海学报　1983年1期
谭峭《化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丁彦祯　中国哲学史　1993年3期
司马承祯哲学思想初探　朱林　江西社会科学　1984年2期

4. **史学**

隋唐史学划时代的意义　张振佩　贵州大学报　1988年3期
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　丁鼎　云南师大学报　1993年6期
隋唐以前中国史官建置与沿革述略　柳维本　辽宁师大学报　1992年6期
隋代一大史学家——王劭　傅振伦　中国史学第1期　1946年5月
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　傅玉璋　安徽史学　1984年2期
隋代史学　张孟伦　史学史研究　1982年3期
隋代史学浅议　谢保成　晋阳学刊　1989年2期
隋唐史学划时期的意义　张振珮　贵州大学学报　1988年3期
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　说文月刊3卷8期　1942年9月
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　傅振伦　说文月刊4卷　1944年6月
唐代史馆考　赵冈　文化先锋8卷10期　1948年5月
唐初修史机构辨　赵俊　求索　1984年6期
唐初设馆修史制度的作用　李宗邺　教学与研究学刊(沈阳师院)1955年2期
唐初史馆略论　商慧明　人文杂志　1985年1期
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　孙永如　扬州师院学报　1986年4期
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　王林善　山西大学学报　1986年3期
唐代史馆建制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　房鑫亮　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6期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瞿林东　人文杂志　1982年1期

唐代典籍注释方法论初探　王勋敏　湖北大学学报　1994年4期
略谈《隋书》的史论　瞿林东　历史研究　1979年8期
论魏征与隋书的进步历史观　谢保成　华南师大学报　1986年1期
魏征的史学地位　牛致功　史学月刊　1988年2期
略谈唐修《晋书》　邓瑞　光明日报　1982年9月27日
《晋书》研究　李培栋　上海师院学报　1984年2、3期
唐修晋书时间考　赵俊　史学史研究　1984年3期
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　王天顺　固原师专这报　1995年1期
《梁书》略论　臧世俊　历史教学问题　1992年4期
梁书、陈书的编纂得失　赵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的实发　赵吕甫　南充师院学报　1981年1期
唐实录纂修考　陈光崇　辽宁大学学报　1978年3期
姚思廉的史学　赵俊　辽宁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韩愈与《顺宗实录》　瞿林东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3期
论《顺宗实录》的作者　卞孝萱　南开史学　1985年2期
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　张国光　殷都学刊　1985年3、4期
封建史学和封建政治　瞿林东　吉林大学学报　1978年5、6期
唐太宗和贞观史学　赵俊　辽宁大学学报　1985年1期
贞观年间史评探析　赵俊　社会科学家　1987年4期
唐太宗与贞观史学　李晓明　华中师院研究生学报　1985年1期
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侯外庐　历史研究　1961年2期
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　王玉哲　文史哲　1962年4期
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任继愈　文史哲　1964年1期
刘知几与《史通》　杨翼骧　历史教学　1963年7、8期
“史德”、“史识”辨　仓修良　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3辑
《史通》札记三则　陈光崇　史学史资料　1980年5期
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　卢山红　汕头大学学报　1988年4期
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　许凌云　史学史研究　1985年4期
《史通》新论　赵英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2年2期
史通方法论　赵俊　华东师大学报　1988年6期

刘知几的史学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论文集(二)1980年
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　许冠三　中华文史论丛　1982年8辑
《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　谢保成　中国史研究　1983年4期
《史通》编撰问题辨正　乔治忠　中国史文献研究(一)　1987年
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　许凌云　孔子研究　1989年3期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代继华　重庆师院学报　1991年2期
刘知几及其史学贡献　李惠珍　东方论坛　1993年1期
论刘知几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和影响　杨绪敏　徐州师院学报　1993年3期
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　江湄兰州大学学报　1994年1期
刘知几对史料编纂的论述　耿建军　档案学通讯　1993年2期
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兼为《焦氏笔录》二则纠谬》　吴荣政　湘潭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赵俊　江苏社会科学　1993年1期
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　杨绪敏　黄淮学刊　1989年4期
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　许凌云　齐鲁学刊　1992年1期
中唐史学发展的两种趋势　瞿林东　史学月刊　1989年
杜佑的历史进化论　李之勤　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1980年
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　陈光崇　中国史学论文集(二)　1980年
杜佑与中唐史学　葛兆光　史学史研究　1981年1期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　瞿林东　历史研究　1984年5期
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瞿林东　中国史研究　1985年2期
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　王锦贵　北京大学学报　1987年4期
论三通　朱维铮　复旦学报　1983年5期
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李之勤　西北大学学报　1978年3期
《通典》的撰述与流传　(日)玉井是博　史学史资料　1980年6期
杜佑与《通典》　廖晓晴　社会科学辑刊　1991年6期
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谢保成　中国史研究　1992年1期
评《贞观政要》　吴枫　吉林师大学报　1979年1期
吴兢与《贞观政要》　瞿林东　河南大学学报　1979年6期

以史为览，励精图治——读《贞观政要》　胡建良　学术交流　1990年2期

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　罗香林　史学集刊2期　1936年10期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牛致功　史学史研究　1983年1期

论盛唐史学　瞿林东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1987年1期

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　孙永如　扬州师院学报　1994年3期

唐代谱学简论　瞿林东　中国史研究　1981年1期

刘肃〈大唐新语〉及其史料价值　孙永如　扬州师院学报　1984年3期

许敬宗对唐代代史考的功过　牛致功　史学月刊　1987年3期

朱敬则的史学思想　王洪军　史学史研究　1987年4期

唐代史学的通史撰述　瞿林东　北京师大学报　1985年3期

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　瞿林东　历史研究　1988年4期

五代十国的史学　朱仲玉　史学史研究　1986年2期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朱仲玉　史学史资料　1980年5期

《旧唐书》史料来源论证　阎质杰　辽宁大学学报　1992年6期

新旧唐书《吴兢传》史实辨证(二则)　李万生　贵州师大学报　1992年2期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　朱玉龙　安徽史学　1989年4期

《北梦琐言》研究　庄学君　西南师大学报　1990年1期

《酉阳杂俎》点校质疑　郑慧生　河南大学学报　1993年4期

唐代在谱牒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杨小江　档案学通讯　1994年2期

对传统谱学在晚唐衰落的历史考察　彭清深　吴喜峰　图书与情报　1994年2期

唐代的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　史念海　史学史研究　1989年2期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　牛致功　人文杂志　1988年4期

史学家和政治　瞿林东　史学史研究　1991年4期

八、文物考古

1. 城址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宿白　考古　1978年第6期
唐代长安与洛阳　马得志　　1982年第6期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徐苹芳　考古　1982年第6期
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　王仲殊　考古　1983年第4期
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　王维坤　西北大学学报　1990年第1期
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　王维坤　文博　1992年第3期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学报　1958年第3期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考古　1961年第5期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　武伯纶　考古学报　1963年第2期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考古　1963年第11期
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　考古　1974年1期
唐华清宫调查记　赵康民　考古与文物　1983年1期
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　马得志　考古　1987年4期
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　马得志　考古　1987年5期
陕西唐大明宫含耀门遗址发掘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考古　1988年11期
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初探　陈忠凯　杨希义　文博　1991年4期
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二期发掘简报　唐华清宫考古队　文物　1991年9期
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　李健超　魏光　赵荣　考古与文物　1991年6期
麟德殿"三面"说浅析　张十庆　考古　1992年5期
唐长安里坊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　常腾蛟　吕家新　考古与文物　1992年5期
唐宋时期兴庆宫的变化　杨文秀　唐都学刊　1992年4期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化　史念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4年1期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与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考古　1961年3期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　河南省博物馆　文物　1972年3期

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漕运和粮仓　邹逸麟　文物　1974年2期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续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考古　1978年6期

洛阳隋唐东都皇城内的仓窖遗址　洛阳博物馆　考古　1981年4期

洛阳发现隋唐夹城城墙　洛阳博物馆　考古　1983年11期

洛阳附近的古代粮仓　方孝廉　中原文物　1984年1期

略谈隋唐时期的官仓制度　沧清　考古　1984年4期

唐代洛阳城坊补考　赵超　考古　1987年9期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考古　1988年3期

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考古　1994年1期

洛阳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考古队　考古　1994年8期

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　傅熹年　文物　1995年3期

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考古　1989年3期

洛阳含嘉仓1988年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文物　1992年3期

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窑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考古　1992年12期

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　王岩　考古　1993年10期

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　南京博物院等　文物　1977年9期

扬州城址变迁初探　纪仲庆　文物　1979年9期

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　南京博物院　文物　1979年9期

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　卞孝萱　文物　1979年9期

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　南京博物院　文物　1981年3期

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南京博物院　文物　1981年3期

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　罗宗真　文物　1981年3期

唐代扬州城区的规模　李廷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4期

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扬州城考古队　考古　1994年5期

扬州大东门街基建工地唐代排水沟等遗迹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王勤金　考古与文物　1995年3期

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分期　罗二虎　成都文物　1991年4期

江西赣州市古城墙试掘简报　余美栋　张文江等　南方文物　1995年1期

古代高昌城市建设中使用的陶管道　柳洪亮　新疆文物　1991年3期

楼兰故城址　侯灿　丝绸之路　1994年6期

唐代河西戍所城址考　李并成　敦煌学辑刊　1992年1期

渤海东京龙原府宫城址考　（日）驹井和爱著　宁波泽　北方文物　1992年4期

吉林省蛟河市七道河村渤海建筑遗址清理简报　吉林市博物馆　考古　1993年2期

吉林辽源市龙青山城内考古调查简报　辽源市文物管理所　考古　1994年3期

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建筑复原　张铁宁　文物　1994年6期

2. **墓葬**

唐乾陵勘察记　陕西省文管会　文物　1960年4期

唐顺陵勘察记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64年1期

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　陕西省文管会　文物　1965年7期

唐桥陵调查简报　陕西省文管会　文物　1966年1期

昭陵陪葬墓调查记　昭陵文物管理所　文物　1977年10期

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　王仁波　中国考古学第一次

年会论文集　文物　1980年
唐桥陵勘察记　王世和　楼宇栋　考古与文物　1980年4期
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　黄展岳　考古　1981年6期
唐恭陵调查纪要　若是　文物　1985年3期
隋文帝陵祠勘察记　罗西章　考古与文物　1985年6期
唐恭陵实测纪要　考古所河南二队　考古　1986年5期
唐贞陵调查记　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　文博　1986年6期
唐代建陵及其石刻　张崇德　考古与文物　1988年3期
昭陵古墓葬址遥感解译和定位的研究　宋德闻　姚思汗　秋维道　文物　1992年7期
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　周明　文博　1994年1期
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　唐金裕　考古　1959年9期
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　曾亿丹　考古　1978年3期
安阳隋墓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考古学报　1981年3期
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　山东省博物馆　文物　1981年4期
英山一号隋墓壁画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关天相　文物　1981年4期
山东嘉祥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　嘉祥县文物管理所　文物　1987年11期
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清理简报　武汉市博物馆　考古　1994年11期
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　林忠干　林存琪　陈孜　考古　1990年2期
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　权奎山　考古学报　1992年2期
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固原博物馆　文物　1992年10期
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　1992年10期
山西汾阳北关隋梅渊墓清理简报　山西省博物馆　汾阳县博物馆　文物　1992年10期

论中原地区隋墓的形制　申秦雁　文博　1993年2期
安阳市发现隋代大型家族墓地　贾玉俊　华夏考古　1994年2期
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简报　马得志　张正龄　考古通讯　1958年1期
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　陕西省文管会　文物　1959年3期
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洞墓发掘记　陕西省文管会　文物　1959年8期
唐墓壁画　贺梓城　文物　1959年8期
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　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　考古　1960年1期
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　广东省文管会　文物　1961年6期
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　1963年9期
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　1964年1期
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2年7期
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2年7期
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2年7期
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　李求是　文物　1972年7期
辽宁朝阳唐韩贞墓　朝阳地区博物馆　考古　1973年6期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　王仁波　考古　1973年6期
唐李寿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　文物　1974年9期
唐李寿墓壁画试探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　文物　1974年9期
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考古　1977年2期
唐李凤墓发掘简报　富平县文化馆等　考古　1977年5期
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　昭陵文物管理所　文物　1977年10期
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　陕西省文管会等　考古　1978年3期
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　昭陵文物管理所　文物　1978年5期
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　高仲达　江汉考古　1980年2期
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　明堂山考古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1981年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内容和布局　宿白　考古学报　1982年2期

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中原文物　1982年3期

安菩墓志初探　赵振华　朱亮　中原文物　1982年3期

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　孝感地区博物馆等　文物　1985年2期

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　宁夏固原博物馆　文物　1985年11期

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　湖北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87年8期

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　长治市博物馆　王进先　文物　1987年8期

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　昭陵博物馆　文物　1988年12期

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88年12期

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　齐东方　1990年9期

唐董僧利墓清理简报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考古与文物　1991年4期

唐琅琊郡王夫人墓志考　樊子林　刘友恒　秦造垣　考古与文物　1991年5期

安阳西郊刘家庄唐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考古　1991年8期

晋县唐墓的科学价值　高英民　文物春秋　1991年3期

西安三桥车辆厂工地发现唐裴利物夫妇墓　桑绍华　考古与文物　1991年6期

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　陈安利　马咏钟　文物　1991年9期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文物　1991年9期

陕西发掘修复长乐公主和韦贵妃墓　光明日报　1991年11月

唐张仲晖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泾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与文物　1992年1期

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文物　1992年3期

校勘新出土唐墓志铭札记　武复兴　西北大学学报　1992年3期

唐惠昭太子墓清理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　程学华执笔　考古与文物　1992年4期

陕西省第三印染厂两座唐墓清理简报　杨军凯　考古与文物　1992年

5期

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发掘记　呼林贵　侯宁彬　李恭　考古与文物　1992年5期

西安东郊清理的两座唐墓　张全民　王自力　考古与文物　1992年5期

巩义市孝南春秋与唐代墓葬清理简报　郑州市文物队等　中原文物　1992年4期

河北阳原金家庄唐墓　张家口地区文物管理所等　考古　1992年8期

北京近年发现的几座唐墓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文物　1992年9期

西安市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　王九刚　文物　1992年9期

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　偃师商城博物馆　考古　1992年11期

河南偃师唐柳凯墓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　文物　1992年12期

河南偃师唐严仁墓　樊有升　李献奇　文物　1992年12期

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　李秀兰　卢桂兰　文博　1993年1期

洛阳孟津西头山唐墓发掘报告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华夏考古　1993年1期

孟津唐岑氏夫人墓志及伎乐俑研究　刘海明　华夏考古　1993年2期

《杨素墓志初考》补正　周铮　考古与文物　1993年第2期

咸阳市渭城区出土的唐墓志　马先登　李朝阳　文博　1993年2期

蓝田县出土唐故忠武将军右卫率邓温墓志铭　李恩宇　樊维岳　文博　1993年第3期

福州康山唐墓清理简报　福建省博物馆　东南文化　1993年3期

项城发现一座唐代古墓　人民日报　1993年5月

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　辛明伟　李振奇　文物　1993年6期

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　李振奇　辛明伟　文物　1993年6期

云南安宁县小石庄唐墓清理简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安宁县文化局　文物　1993年6期

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　宁夏固原博物馆　文物　1993年6期

河北蔚县九宫山唐墓　蔚县博物馆　考古　1993年8期

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文安县文物管理所　文物

1994年1期

岐山郑家村唐元师奖墓清理简报　宝鸡市考古队　1994年2期

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清理简报　吴春　考古与文物　1994年2期

河北临城西瓷窑沟发现隋唐墓　樊书海　张志中　文物春秋　1994年3期

江西赣县梅林唐墓清理简报　赖斯清　南方文物　1994年4期

洛阳伊川出土的唐代墓志和神道碑　李献奇　中原文物　1994年3期

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　偃师商城博物馆　华夏考古　1995年1期

千阳坡头唐墓清理简报　宝鸡市考古队　考古与文物　1995年3期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文物　1995年8期

洛阳清理后晋墓一座　高祥发　文物参考资料　1957年11期

广州蕃禺石马村南汉墓发掘简报　高承祚　考古　1964年6期

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　福建省博物馆　文物　1975年1期

关于广州石马村南汉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　麦英豪　考古　1975年1期

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　浙江省文管会　文物　1975年8期

黑龙江省牡丹江桦林石场沟墓地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方文物　1991年4期

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考古　1992年2期

伊犁河流域的文物考古新发现　张玉忠　文博　1991年6期

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再发现（上）　吴震　文物天地　1992年4期

阿斯地古墓群的再发现（下）　吴震　文物天地　1992年5期

阿斯塔那古代墓地　E·H·曾伯——列斯尼契科著　李琪译　西域研究　1995年1期

3. **金银器**

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阎磊　文物　1959年8期

唐代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茶托子　马得志　考古　1959年12期

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　李长庆　黑光　文物　1963年10期

关于西安北郊所出唐代金花银盘　卢兆荫　考古　1964年3期

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　西安市文管会　文物　1964年6期
长安县发现唐丁课银铤　朱捷元　文物　1964年6期
西安北郊出土唐金花银盘铭文的校勘　朱捷元　文物　1964年7期
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　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　1966年1期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　陕西省博物馆等　文物　1972年1期
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　韩伟　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期
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　段鹏琦　考古　1980年6期
陕西兰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　樊维岳　考古与文物　1982年1期
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　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　文物　1982年11期
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试析　陆九皋　刘建国　文物　1982年11期
浙江长兴县发现一批唐代银器　长兴县博物馆　夏星南　文物　1982年11期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　卢兆阴　考古　1983年2期
西安东郊出土唐代金银器　保全　考古与文物　1984年4期
浙江淳安县宋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　浙江省博物馆　考古　1984年11期
唐代金银器、银铤与衡量制度的关系问题　朱捷元　文博　1986年2期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　文物　1988年10期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　宿白　文物　1988年10期
关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几点看法　卢兆荫　文物　1988年10期
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　孙机　文物　1988年10期
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　韩伟　文物　1988年10期
法门寺地宫的发现与唐代金银器研究　齐东方　文博　1991年4期

唐代金银器拾零　韩伟　文博　1991年6期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谈唐代衡制　王仓西　文博　1992年1期

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　张松柏　北方文物　1993年1期

湖南麻阳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　怀化地区博物馆　麻阳县博物馆　文博　1993年1期

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及其特征　冉万里　西北大学学报　1994年4期

喀喇沁旗唐代金银器考述　张松柏　北方文物　1994年4期

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齐东方　张静　考古学报　1994年2期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文考释　韩伟　考古与文物　1995年1期

略论互助县窖藏金银器的年代、族属与银盘曼荼罗图案　许新国　青海社会科学　1995年1期

4. **陶瓷器与窑址**

卜仁墓中的隋代瓷器　宋伯胤　文物参考资料　1958年8期

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　李知宴　文物　1972年3期

隋代瓷器的发展　智雁　文物　1977年2期

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研究　周世荣　考古学报　1982年4期

江西樟树发现隋唐窑址，樟树市博物馆　考古　1991年10期

江西赣州窑址调查　赣州市博物馆　考古　1993年8期

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　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　文物　1981年9期

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　李辉炳　文物　1981年9期

邢窑刍议　叶喆民　文物　1981年9期

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　文物　1987年9期

井陉发掘唐代瓷窑遗址——出土完整器物百余件　光明日报　1993年8月

浙江余姚古瓷窑址调查报告　金祖明　考古学报　1959年3期

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　1975年3期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　冯先铭　文物　1988年10期

青瓷工艺成熟的标志　李知宴　文物　1988年10期
略谈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　李辉炳　文物　1988年10期
浙江瑞安出土青瓷百戏堆塑罐　俞天舒　东南文化　1992年2期
上虞龙浦唐代窑址　章金焕　东南文化　1992年3期
关于唐代洪州窑问题　江恩清　文物参考资料　1958年2期
景德镇首次发现带纪年铭的唐代青瓷　黄云鹏　南方文物　1992年1期
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记要　冯先铭　文物　1959年3期
河南荥阳茹茵发现唐代瓷窑址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　考古　1991年7期
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　冯先铭　文物　1960年3期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　湖南省博物馆　文物　1963年3期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考古学报　1980年1期
论长沙窑釉下彩的突起　王莉英　考古与文物　1992年1期
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　马文宽　文物　1993年5期
武昌唐墓所见铜官窑瓷器及其相关问题　全锦云　考古　1986年12期
耀州窑作坊和窑炉遗址发掘简报　杜葆仁　禚振西　考古与文物　1987年1期
耀州窑唐五代陶瓷概论　禚振西　考古与文物　1988年5、6期
扬州出土一批唐代彩绘俑　李万　张亚　文物　1979年4期
唐三彩骑马狩猎俑　王仁波　文物　1979年1期
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　刘建洲　中原文物　1981年3期
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玩具的艺术特点　刘建洲　中原文物　1984年2期
巩县黄冶窑唐三彩器的造型与装饰　刘建洲　华夏考古　1995年3期
洛阳唐三彩纵横　韩于西　中原文物　1985年2期
谈唐三彩的艺术特色　魏俊　中原文物　1986年3期
唐三彩浅述　李正中　朱裕平　历史教学　1991年7期
试论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马、骆驼及其制作方法　李华锋　河洛春秋　1991年4期
从出土的“唐三彩”看中原与西域及北非的文化交流　贺峨　文物春秋

1992年3期

巩义市大小黄冶唐代三彩器窑址调查　巩义市文管所　中原文物 1992年4期

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　王维坤　考古　1992年12期

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　冯先铭　文物　1980年第4期

近几年中国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张浦生　东南文化　1993年3期

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　扬州博物馆　文物　1985年10期

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　顾风　徐良玉　文物　1985年10期

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　文物 1985年10期

扬州发现的一件唐青花瓷片　马富坤　文物　1985年10期

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　浙江省博物馆　文物　1979年12期

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　冯先铭　文物　1979年12期

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　高至喜　文物　1984年第1期

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　李辉炳　文物　1984年12期

论西安出土唐代"官"字款白瓷　王长启　文博　1991年6期

淮南市出土的寿州窑瓷器选介　徐孝忠　文物　1992年9期

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见证:泰国猜耶出土瓷碗和扬州出土背水壶上阿拉伯图案的鉴定　陈达生　海交史研究　1992年2期

唐代绞胎高脚盘:浅谈绞胎瓷　张先得　中国文物报　1993年7月

广东高明唐代窑址发掘简报　广东省博物馆　高明县文物普查办公室 考古　1993年9期

江西丰城龙雾洲瓷窑调查　万良田　万德强　考古　1993年10期

江西唐代洪州窑考古又有新发现　光明日报　1994年1月7日

试论唐代黄堡白瓷的发展——从黄堡白瓷与河南唐白瓷的比较中说起 王小蒙　考古与文物　1994年4期

罕见的五代定窑釉下褐彩白瓷碟　周世荣　南方文物　1994年3期
陆羽的《茶经》与洪州窑瓷器　权奎山　文物　1995年2期
5. **其他器物**
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壁墓志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　1964年第9期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鼐　考古学报　1974年1期
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　夏鼐　考古　1965年8期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　陈娟娟　文物　1979年2期
唐代的夹板印花——夹缬　武敏　文物 1979年8期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　王炳华　文物　1981年1期
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代音乐和礼仪制度　周伟州　文物　1981年7期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孙机　文物　1981年10期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　董锡玖　文物　1981年12期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　武敏　文物　1984年6期
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涓画　李域铮　关双喜　文物　1984年7期
麻札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侯灿　文物　1987年3期
法门寺地宫所出纺织品　王亚蓉　文物　1988年10期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与中西文化交流　韩金科　文史知识　1992年6期
近代武宁出土的唐代铜镜　闵正国　江西文物　1991年2期
"丝路"考古新收获　王炳华　新疆文物　1991年2期
新出现唐法门寺住持《惠恭禅师大德之碑》　韩金拉　王均显　文博　1991年4期
唐代铜镜的装饰艺术　关双喜　文博　1991年4期
唐玄宗泰陵的石雕　马文良　文博　1991年4期
沙河东户唐颜真卿撰并书《宋璟碑》察　范玉琪　文物春秋　1991年3期
福建省莆田市元妙观东岳殿彩绘内容的初步研究　程建军　何建琪

考古与文物　1991年5期

泰安旧县村出土隋代窑仓铭文砖　程继林　文物　1991年10期

中亚发现的唐镜　（日）冈崎敬　姚义田译　文博　1992年1期

析江西瑞昌出现的唐代佛具　张翊华　文物　1992年3期

西安西郊出土的唐代玉带　王自力　张全民　考古与文物　1992年5期

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文物的研究　李勇辉　韩汝玢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2年第3期

唐代玉册的重要发现:《唐惠昭太子发掘报告》评介　巩启明　王辉　考古与文物　1993年4期

阿拉伯文古钱及其在中国的流传　宋岘　周素珍　西域研究　1993年3期

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　韩志刚　文博　1994年3期

淄博征集两枚唐代铜镜　夏红　考古　1994年6期

武威出土的唐代乐器　黎大祥　中国文物报　1994年12月4日

凤翔出土的隋唐铜镜　昭明　文博　1995年4期

唐代玉器　曲石　华夏考古　1995年3期

6. 石窟寺、造像等

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　宿白　文物参考资料　1951年5期

我国北部的几处石窟艺术　温廷宽　文物参考资料　1955年1期

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　王子云　文物参考资料　1955年2期

敦煌石窟勘察报告　陈明达等　物参考资料　1955年2期

安西榆林窟勘查简报　敦煌文物研究所　文物参考资料　1956年10期

新疆天山川南的石窟　阎文儒　文物　1962年7、8期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　丁明夷　考古学报　1979年4期

炳灵寺石窟的分期　董玉祥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1980年

四川石窟杂识　丁明夷　文物　1988年8期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　古1961年6期

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泾川县文化馆　文物　1966年3期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　临潼县博物馆　文博　1985年8期

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　郑洪春　考古与文物　1988年1期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　文物　1988年10期

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　温玉成　敦煌学辑刊　1989年1期

四川广元千佛岩皇泽磐　阎文儒　江汉考古　1990年3期

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出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　张乃翥　考古　1991年2期

龟兹石窟综述　朱英荣　新疆文物　1991年2期

初论克孜朵哈石窟中的吐蕃洞　贾应逸　新疆文物　1991年2期

再识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　傅成金　四川文物　1991年6期

博爱县石佛滩隋代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　博爱县博物馆　中原文物　1992年1期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　王熙祥　曾德仁　文物　1992年2期

敦煌壁画文献史料价值管窥　倪怡中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2年2期

泾河流域的佛教石窟　霍勤斯H·F杰恩　梁心萍译　李崇峰校　敦煌学辑刊　1992年第1、2期

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文物　1992年3期

甘肃天水市发现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　莎 柳　考古与文物　1992年3期

蒲江关子门发现的唐代《观经变》造像　龙腾　四川文物　1992年3期

石佛滩隋代摩崖造像　牛宁　杭侃　中州今古　1992年3期

富平现存的造像碑　刘耀秦　王保东　文博　1992年3期

天台国清寺塔发现之隋代线刻菩萨像研究　徐三见　东南文化　1992年3期

四川剑阁武连横梁与摩崖造像　母学勇　考古1992年5期

洛川县寺家河唐代佛教密宗造像石窟　刘合心　段双印　文博　1992、

年5期

河北邯郸响堂山的塔形窟　丁明夷　文物天地　1992年6期

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　韩伟　文物　1992年8期

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的初步调查　常青　考古　1992年10期

佛顶尊胜陀罗尼造像经幢　田中华　中原文物　1993年1期

遂宁摩崖造像艺术简述　彭高泉　四川文物　1993年2期

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上限年代探讨　邓之金　四川文物　1993年2期

龙门石窟近期清理出的唐代窟龛造像及遗物　刘景龙　王振国　中原文物　1993年2期

蒲江县长秋乡鸡公树山隋唐摩崖造像　龙腾　四川文物　1993年4期

桂林唐代摩崖造像　蒋廷瑜　东南文化　1993年5期

西安附近的隋唐佛和菩萨像　李域峰　文博　1993年5期

司空禅师塔及其相关问题　刘随群　文博　1991年4期

绵阳唐代佛教造像初探　文齐图　四川文物　1991年5期

山西平陆圣人涧发现唐代鎏金铜像窟藏　考古　1991年12期

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代佛教密宗文化　任新来　文博　1992年1期

四川安岳卧佛沟唐代石刻造像和佛经　胡文和　文博　1992年2期

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　李学勤　文物　1992年3期

龙门石窟地藏菩萨及其有关问题　常青　中原文物　1993年4期

龙门石窟的"卫星窟"——万佛山石窟　宫大中　中原文物　1993年4期

艺术明珠、丝路瑰宝——须弥山石窟的称谓和开凿年代浅议　薛正昌　文博　1994年1期

大足尖子、圣水寺摩崖造像的调查简报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文物　1994年2期

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　彭金章　敦煌研究　1994年2期

陕西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张砚　王福民　中原文物　1994年2期

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八臂观音考　彭金章　敦煌研究　1994年3期

千佛洞石窟寺　杨廷福　敦煌学辑刊　1995年2期

南响堂山石窟唐代小龛初探　袁虹　华夏考古　1995年1期
巴中南龛摩崖造像考述　苟廷一　四川文物　1995年5期
“大像佛阁”研究　周俊麒　四川文物　1995年5期
杭州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龛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　文物　1995年10期
唐长安青龙寺密宗殿堂遗址复原研究　杨鸿勋　考古学报　1984年3期

中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台湾地区)

一、通论…… 1008
二、政治史…… 1008
三、社会、礼俗 …… 1016
四、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1021
五、典章制度(官制、兵制、法律)…… 1027
六、财政经济…… 1035
七、宗教、文化 …… 1037
八、历史地理…… 1055
九、传记、年谱 …… 1058
十、史料、文献 …… 1064

一、通论

傅乐成《隋唐五代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7)

章群《唐史》(全三册)(中国文化大学,1958、1980)

林瑞翰《五代史》(民智,1963)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东华,1978)

黎杰《隋唐五代史》(九思,1978)

傅乐成《隋唐五代史》(长桥,1979)

李唐《五代十国》(国家,1982)

姚大中《中国世界的全盛》(三民,1983)

王寿南《隋唐史》(三民,1989)

中国唐代学会《国际唐代论集 1》(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

淡江大学中文系《晚唐社会与文化》(学生,1990)

中国唐代学会《唐代文化论集》(文史哲,1991)

中国唐代学会《国际唐代论集 2》(文津,1993)

李树桐《隋唐史别裁》(台湾商务,1995)

二、政治史

李树桐〈论唐高祖之才略〉(《师大学报》2,1957)收入《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台大文史哲学报》8,1958—7)收入《汉唐史论集》,联经,1977)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台大文史哲学报》8,1958—7)

孙楷第〈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辅仁学志》15—1、2,1958—12)

李树桐〈唐杨文干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师大学报》4,1959)《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李树桐〈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师大学报》6,1961)《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李树桐〈初唐帝室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大陆杂志》22—4,1961—2)《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李树桐〈玄武门之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一、二(《大陆杂志》22—5、6,1961—9)

李树桐〈武则天入寺为尼考辨〉(一、二)(《大陆杂志》24—5、6,1962—3)

罗香林〈贞观政要述证〉(《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1963)

李树桐〈唐高祖称臣於突厥考辨〉(一、二)(《大陆杂志》26—1、2,1963—1、2)收入《唐史考辨》)

萨孟武〈晋隋之间南北形势〉(《社会科学论丛》3,1963—5)

傅乐成〈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大陆杂志》27—6,1963—9)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李树桐〈唐隐太子建成军功考〉(《师大学报》9,1964)《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林瑞翰〈南唐之经济与文化〉(《大陆杂志》29—6,1964—2)

王泳〈柳子厚党事之剖析〉(上、下)(《大陆杂志》29—5、6,1964—9)

林瑞翰〈五代君臣之义淡而政风多贪黩〉(《大陆杂志》29—10,1964—10)

李树桐〈李唐太原起义考实〉(收入《唐史考辨》,台湾中华,1965)

李树桐〈唐太宗的一件隐而未彰的功绩〉(《新时代》6—2,1965—2)

林瑞翰〈五代豪侈、暴虐、义养之风气〉(上、下)(《大陆杂志》30—3、4,1965—2)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军将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清华学报社,1965—9)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嘉新水泥,1966)

雷飞龙〈皇位继承与汉唐宋明的朋党〉(《政大学报》13,1966—5)

雷飞龙〈品性与汉唐宋明的朋党〉(《思与言》1—3,1966—9)

李树桐〈唐高祖才略的真象〉(《李氏文献》1—4,1966—10)

雷飞龙〈家世地域与汉唐宋明的朋党〉(《政大学报》14,1966—12)

汤承业《隋帝政治事功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汤承业〈简论隋文帝改良风俗〉(《大陆杂志》35—7,1967—10)

冯承基〈由文化阶层看李唐之朋党阉寺与藩镇〉(《思与言》5—4,1967—11)

王寿南〈论唐代河北三镇之独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1968—3)

汤承业〈论隋文帝勘平三方之乱与翦除六王之谋〉(《幼狮学志》7—2,1968—4)

李树桐〈再辨唐高祖称臣於突厥事〉(《大陆杂志》37—8,1968—10)收入《唐史新论》,台湾中华,1972)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宦官〉(《思与言》7—1,1969—5)

王寿南〈论晚唐裘甫之乱〉(《政大学报》19,1969—5)

任育才《唐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0)

施义胜《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台湾商务,1970)

李树桐〈开元盛世之研究〉(《师大历史学报》6,1970)收入《唐史研究》)

李树桐〈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对唐帝国的影响〉(《师大学报》15,1970)收入《唐史新论》)

罗龙治〈论唐初功利思想与武曌代唐的关系〉(《史原》1,1970—7)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正中,1971)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演变〉(《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10,1971—10)

王寿南〈唐代宦官得势的原因及其对当时政局的影响之研究〉(《中山学术文化集刊》9,1972—3)

李树桐〈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4,1972—5)收入《唐史研究》)

李树桐〈天宝之乱的本源及其影响〉(《师大历史学报》1,1973—1)收入《唐史研究》)

汤承业〈论李德裕裁抑阉寺的谋路〉(《食货》复刊 2—12,1973—3)

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1973—6)

廖日荣〈德宪二宗之宠任宦官与唐室之衰亡〉(《中国学人》5,1973—7)

汤承业〈晚唐党祸试释——论李德裕无党及其破除朋党〉(《中国学人》5,1973)

汤承业〈驳析所谓大中中兴——兼论唐宣宗是否小太宗〉(《国立编译馆馆刊》2,1973—9)

汤承业〈论李训所以败於仇士良——甘露之变的检讨〉(《食货》复刊 3—7,1973—10)

张怀义〈乡贤文中子之教对唐太宗施政之影响〉(《山西文献》3,1974—1)

汤承业〈唐代朋党的真像》(《食货》复刊 3—11,1974—2)

王寿南〈唐玄宗时代的政风〉(《政大学报》29,1974—5)

王吉林〈唐代初年政治集团的运用及其限制〉(《华冈学报》8,1974—7)
张达人〈唐代朱泚之乱的平定〉(《东方杂志》复刊8—10,1975—4)
萨孟武〈士族与五胡及隋唐二代的关系〉(《食货》复刊5—6,1975—9)
朱桂《牛僧孺研究》(正中,1976)
洪治〈略论安史之乱及其影响〉(《复兴冈学报》15,1976—6
林继平〈论唐代开国的条件〉(《甘肃文献》7,1976—12)
张荣芳〈黄巢之出对东南财赋区的破坏〉(《东海史学会会刊》6,1977—6)
雷家冀、黄淑梅〈唐代宦官的婚姻与收养关系〉(上、下)(《鹅湖》3—2、3,1977—8、9)
何启民〈唐代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之考察〉(《中古门第论集》,学生,1978)
罗龙治《唐代的后妃与外戚》(桂冠图书,1978)
刘淑芬〈炀帝的南方政策〉(《史原》8,1978—9)
黄启江〈从国史上中兴之意义谈 C. A. PETESON 的唐宪宗完全中兴说〉(《出版与研究》30,1978—9)
卓遵宏〈武则天用人研究〉(《淡江学报》16,1978—11)
李树桐〈唐太宗的的安唐策〉(《师大历史学报》7,1979—5)
毛汉光〈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史语所集刊》50—2,1979—6)《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余衍福《唐代藩镇之乱》(联邦,1980)
雷家骥〈论隋文帝之德与政〉(《鹅湖》6—1,1980—7)
雷家骥〈论武则天的革命〉(《鹅湖》6—2,1980—8)
毛汉光〈五代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史语所集刊》51—2,1980—9)《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刘淑芬〈隋代南方政策的影响〉(《史原》10,1980—10)
李树桐〈三辨唐高祖称臣於突厥事〉(《大陆杂志》61—4,1980—10)
赵雅书〈五代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台大历史学报》7,1980—12)
雷家冀《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联鸣,1981)
王霜媚〈隋朝前期政治的演变〉(《东海大学历史学报》4,1981—2)
傅壬锡〈《资治通鉴》中的唐代牛李党争〉(《中国国学》9,1981—8)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史语所集刊》52—3,

1981—9)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何启民〈柳芳氏族论中的一些问题〉(《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集》1981—10)

王吉林〈由唐玄宗时代的宰相看安史乱前的政局〉(《国际汉学会议历史考古组论文集》,1981—10)

王寿南〈从陆宣公《翰苑集》看唐德宗时代的政治〉(《国际汉学会议历史考古组论文集》,1981—10)

王寿南〈论甘露之变〉(《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1)

宋德熹〈唐史漫抄二则〉(《史原》11,1981—11)

吴光华〈唐代卢龙镇初期之政局〉(《史原》11,1981—12)

宋德熹〈唐武士彟事迹辨证——兼论家世对武则天册立为后的影响〉上、下(《食货》复刊11—11、12,12—1,1982—3、4)

王秀南〈五代闽国的兴亡史〉(《华学月刊》124,1982—4)

张肖梅〈刘禹锡与王韦集团〉(《国立编译馆馆刊》11—2,1982—12)

王寿南〈贞观时代的净谏风气〉(《政大历史学报》1,1983—3)

刘瑛〈略论隋初的封建〉(《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6—4,1983—4)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之建置与发展〉(《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5,1983—5)

傅壬锡〈李绅'的趋翰苑遭诬构三十六韵'诗的史实背景〉(《淡江学报》20,1983,5)

傅壬锡〈《两唐书》所论'牛李'党争歧异考〉(《淡江学报》20,1983—5)

黄乃隆〈从经济层面析论隋代的兴亡〉(《中兴文史学报》13,1983—6)

献依〈后周太祖的施政措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6—6,1983—6)

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唐代禁婚家与姓族谱〉(《史语所集刊》54—3,1983—9)

傅壬锡〈唐人笔记小说中'牛李'传闻的解析〉(《中国国学》11,1983—9)

傅壬锡《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1984)

黄约瑟〈武士彟事迹另探〉(《食货》复刊13—9、10,1984—1)

李树桐〈元和中兴之研究〉(《食货》复刊13—9、10,1984—1)收入氏著《唐史索引》,台湾中华,1987)

罗彤华《贞观之治与儒家思想》(师大史研所,1984—2)

王寿南〈论唐末桂林戍卒之乱(《政大历史学报》2,1984—3)

张荣芳〈'武士彟事迹另探'的几点商榷〉(《食货》复刊14—1,1984—4)

蒋君章〈魏徵与贞观之治〉(《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7—8,1984—8)

蒋君章〈唐宋间的后五代之乱与宋的历史地位〉(《东方杂志》18—6,1984—12)

高明士〈论汉武帝、武则天晚年的自救措施〉(收入《傅乐成教授记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1985)

王吉林〈从党派斗争看唐高宗武后时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收入《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1985)

李树桐〈论唐代魏博镇〉(《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1985)

王寿南〈隋平陈原因之分析〉(《政大历史学报》3,1985—3)

刘家驹〈论贞观之治的基本精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7,1985—5)

刘健明〈论韩愈和李绅——台参的争论〉(《大陆杂志》70—6,1985—6)

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五姓著房婚姻之研究〉(《史语所集刊》56—4,1985—12)

罗联添〈唐代牛李党争始因问题再探讨〉(《国立编译馆馆刊》14—2,1985—12)

章群〈仆固怀恩与李怀光的反叛〉(《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1986)

张荣芳〈牛李党争中史官与史学的论争〉(《中西史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系,1986)

毛汉光〈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肖氏〉(《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湾商务,1986)

李树桐〈玄武门之变的再认识唐史考辨补考之一〉(《大陆杂志》72—1,1986—1)

李树桐〈武则天出生时地考〉(《大陆杂志》73—1,1986—7)

李树桐〈唐太宗渭水之耻的研究〉(史学汇刊》14,1986—9)

毛汉光〈隋唐政权中的吴郡陆氏〉(《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1987)

宋德熹〈北魏姓族分定初探〉(《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1987)

黄乃隆〈武则天篡唐建周的试析〉(《中兴文史学报》17,1987—3)

刘健明〈论隋开皇年间的政争〉(《食货》复刊16—7.8,1987—7)

王世宗〈试论唐末民间变乱势力之聚成——以阡能之乱为中心〉(《史原》16,1987—11)

高明士〈隋文帝'不悦学'、'不知乐'质疑——有关隋代立国政策辨正〉(台大历史学报》14,1988—7)

王寿南〈从藩镇选任看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对地方之控制〉(《政大历史学报》,1988—9)

雷家骥〈唐代'元和中兴'的淮西会战〉(《历史月刊》9,1988—10)

李树桐〈论唐高祖成功与失败的关键〉(《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

毛汉光〈隋唐政权中南朝旧族之仕进凭藉与途径〉(《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

邱添生〈由世族盛衰看中国中世的社会变迁〉(《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

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

毛汉光〈唐朝后半期后妃之分析〉(《台大文史哲学报》37,1989)

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晚唐社会与文化》,1990)

郭启瑞〈唐末关中安全体系的破坏〉(《晚唐社会与文化》,1990)

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宦官之关系〉(《晚唐的社会与文化》,1990)

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政治史论》,1990)

黄清连〈高骈纵巢渡淮——唐代藩镇对黄巢叛乱的态度研究之一〉(《在陆杂志》80—1,1990—1)

黄永年〈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问题〉(《新史学》1—4,1990—12)

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

甘怀真〈隋文帝时代军权与'关陇集团'之关系〉(《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

易毅成〈隋唐之际关中安全的战略构想与施行〉(《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

黄约瑟〈试论垂拱四年李唐宗室反武之役〉(《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

刘健明〈韩愈对永贞改革的评价〉(《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

甘怀真〈中国中古士族与国家的关系〉(《新史学 2—3,1991—9)

王吉林〈唐玄宗时代将相关系的演变〉(《第二届华学会议研究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91—12)

王寿南〈论仆固怀恩之叛〉(《政大历史学报》9,1932—1)

宋德熹〈独孤氏兴衰史论——'关陇集团'政权中代北家族个案研究之一〉(《兴大历史学报》,2,1992—3)

宋德熹〈'关陇集团'政权中的河南窦氏——代北外戚家族个案研究之二〉(《中兴文史学报》22,1992—3)

毛汉光〈李渊崛起之分析——论隋末'李氏当王'与三李〉(《史语所集刊》59—4,1992—3)

严定暹〈《贞观政要》治略及时义刍探〉(《中兴法商学报》26,1992—6)

黄清连〈宋威与王、黄之乱——唐代藩镇对黄巢叛乱的态度研究之二〉(《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史语所,1992—6)

佐竹靖彦〈朱温集团の特性と后梁王朝の形成〉(《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史语所,1992—6)

宋德熹〈'关陇集团'政权中代北外戚家族的角色与地位〉(《大陆杂志》85—6,1993—1)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下降变动之研究〉(《国科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3—1,1993—1)

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史语所集刊》64—1,1993—3)

李美月〈论武周多佞臣《中山人文学报》1,1993—4)

黄清连〈王铎与晚唐政局——以讨伐黄巢之乱为中心〉(《史语所集刊》64—2,1993—5)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父子间官职类别之变动〉(《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4,1993—10)

黄清连〈两唐书酷吏传析论〉(《辅仁历史学报》5,1993—12)

毛汉光〈唐代帝王术之研究——论《贞观政要》中的君臣沟通文化〉('帝王统治术与文化变迁研讨会'宣读论文,1992—8)将发表于《台大文史哲学

报》41,1994)

三、社会、礼俗

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史语所集刊》30下,1959—10;亦收入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的关系〉(《大陆杂志》20—10、11,1960—5、6,亦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

傅乐成〈唐人夷夏观念之演变〉(《大陆杂志》25—8,1962—10;亦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

陈祚龙〈唐代军礼讲武仪式之梗概暨玄宗尚武立威之一般〉(《交艺复兴》53,1964—6)

潘维和《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5)

林瑞翰〈五代奢侈、暴虐、义养之风气〉(《大陆杂志》30—3、4,1965—2)

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学〉(《文史哲学报》14,1965—11,亦收入氏著《静农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汤承业〈简论隋文帝改入良民俗〉(《大陆杂志》35—7,1967—10;亦收入氏著《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卢威廉〈唐代传奇说中的社会思想〉(《社会导进》1—6,1968—5)

李树桐〈唐人喜爱牡丹考〉(《大陆杂志》39—1、2,1969—7;亦收入氏著《唐史新论》)

黄富三〈科举制度与唐代的社会流动〉(《东方杂志复刊》2—2,1968—8)

李树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士风《华冈学报》6,1970—6;亦收入氏著《唐史新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5)

罗龙治〈论唐初功利思想与武曌代唐的关系〉(《史原》11,1970—7)

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

李树桐〈唐代马的装备与装饰〉(《大陆杂志》43—2,1971—8;收入氏著《唐史新论》)

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普残卷之商榷〉(《史语所集刊》43—2,1971—9;亦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张翠娴〈唐代扬州繁荣之因素〉(《读史劄记》6,1972)

李树桐〈唐代妇女的婚姻〉(《师大学报》18,1973—6;亦收入氏著《唐史研

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

朱傅誉〈唐代舆论研究〉(《新闻学报》3,1974—6)

何启民〈唐代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之考察〉(《简牍学报》5,1975—1;亦收入氏著《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78)

石万寿〈唐代仕途的演变〉(《成功大学学报·人文篇》10,1975—5)

朴人《唐宋士大夫的妓乐〉(《自由谈》26—6,1975—6)

黄敏枝〈从开元天宝社会的积富看长安生活的奢华〉(《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1975—7)

萨孟武〈士族与五胡及隋唐两代之关系〉(《食货复刊》5—6,1975—9)

刘漫轻〈从传奇看唐代妇女〉(《中华文化复兴月刊》9—5,1976—5)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史语所集刊》47—3,1976—9;亦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傅乐成〈唐人的生活〉(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公司,1977)

李树桐〈唐代的马与交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5,1977—4;亦收入氏著唐史研究》)

卓遵宏〈唐代进士风气浮薄之成因及影响〉(《淡江学报》15,1977—4,亦收入氏著《唐代进士与政治》,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

雷家骥、黄梅淑〈唐代宦官的婚姻与收养关系〉(《鹅湖》3—2、3,1977—8、9)

毛汉光〈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史语所集刊》48—3,1977—9)

林耀曾〈唐宋丧礼礼数之比较研究〉(《高雄师院学报》6,1977—11)

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收入《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亦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王寿南〈唐代灾荒的救济政策〉(收入《朱济民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1978)

任育才〈唐代士族婚姻中的夷夏之辨〉(《幼狮》47—5,1978—5)

杨宗莹〈从白居易秦中吟看中唐的社会〉(《中国学术年刊》2,1978—6)

刘增贵〈唐代婚姻约论〉(《成功大学历史学报》5,1978—7)

黄清连〈唐代的雇佣劳动〉(《史语所集刊》49—3,1978—9)

刘翔飞〈论唐代的隐逸风气〉(《中国书目季刊》12—4,1979—3)

刘伯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社会风气〉(《陕西文献》40,1980—1;亦收入氏著《唐代政教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

朱重圣〈我国饮茶成风之原因及其对唐宋社会与官府之影响〉(《史学汇刊》10,1980—6;亦收入氏著《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台北,学生书局,1985)

张慎言〈唐人小说中透露出来的唐代文人生活〉(《中国文化月刊》8,1980—6)

宋德熹〈唐代的妓女〉(《史原》10,1980—10;亦收入《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高明士〈唐代释奠礼体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61—5,1980—11)

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台北,文史哲邮版社,1981)

何启民〈柳芳氏族论中的一些问题〉(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傅乐成〈唐人独特的精神〉(《陕西文献》44,1981—1)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史语所集刊》52—3,1981—9;亦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宋德熹〈唐史漫抄二则〉(《史原》11,1981—11)

林淑心〈唐代女装的特色〉(《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12,1981—12)

王寿南〈唐代公主之婚姻〉(收入《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2)

毛汉光〈中古官僚选制与士族权力的转变——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3)

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唐代禁婚家兴姓族谱〉(《史语所集刊》54—3,1989—9;亦收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邱衍文《唐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台北,郁氏印书及奖学基金会,1984)

施逢雨〈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论李白隐逸求仙活动的政治社会背景〉(《清华学报》16-1、2,1984)

龚鹏程〈唐代的侠与剑侠〉(《中国学术年刊》6,1984—6)

李树桐〈唐人的婚姻〉(《国学文献馆馆讯》11,1985—9;亦收入氏著《唐史索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毛汉光〈中古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史语所集刊》56—4,1985—12)

向淑云〈唐婚律与社会婚姻实态的研究》(《史原》15,1986—4;亦收入氏著《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邱添生〈由世族盛衰看中国中世的社会变迁〉(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唐代学者联谊会,1989)

陈捷先〈唐代族谱略说〉(收入前引《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牛志平〈唐代的姻缘天定说〉(《历史月刊》16,1989—5)

高光惠《唐宋人的星期天〉(《历史月刊》17,1989—6)

甘怀真〈试论唐代对于违礼的处分——以家庙礼为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1,1989—7;亦收入氏著《唐代家庭礼制研究》)

陈伟明〈唐宋样饮食心理中的美感〉(《历史月刊》18,1989—7)

郑俊彬〈从全唐诗看唐代文人的饮酒生活〉(《中华文化复兴月直》22—12,1989—12)

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

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1990)

陈伟明〈唐宋食馐的美食特色〉(《历史月刊》25,1990—2)

高国藩〈唐代敦煌的看相与算命〉(《历史月刊》27,1990—4)

毛汉光〈晚唐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台大历史学报》15,1990—12)

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关系之研究》(学生书局,1991)

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收入《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耿慧玲〈由墓志看唐代取佛教化名号的社会现象》(收入前引《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向淑云《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侯乃慧《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廖秀宝〈从考古出土饮器论唐代的饮茶文化〉(《故宫学术季刊》8—3,1991)

柯万成〈柳子厚墓志铭不书妻妾的问题〉(《静宜人文学报》3,1991—3)

高国藩《唐代人如何解梦〉(《历史月刊》39,1991—4)

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2,1991—7)

甘怀真〈中国中古士族与国家之关系〉(《新史学》2—3,1991—9)

葛承雍〈唐代金鸡风俗谈〉(《历史月刊》70,1991—11)

王国璎〈李白的名士形象〉(《汉学研究》9—12,1991—12)

王忠林〈敦煌歌辞对妇女主题写作之分析〉(《高雄师范大学 》3,1992—3)

庄申〈唐代的隐语〉(《国立编译馆馆刊》21—1,1992—6)

廖美云〈唐人服食风尚之研究〉(《台中商专学报》24,1992—6)

朱启新〈从李白诗中的酒具谈汉唐的饮酒方式〉(《历史月刊》53,1992—6)

朱启新〈唐代茶具与饮茶方式〉(《历史月刊》56,1992—9)

庄申〈唐代的骂人语〉(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傅锡壬〈儒侠与道侠——兼论汉、唐的社会变动〉(收入《侠与中国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3)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下降变动之研究〉(《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3—1,1993—1)

观者《唐代宫廷的新年〉(《历史月刊》60,1993—1)

沈冬〈隋代开皇乐议研究〉(《新史学》4—1,1993—3)

王国璎〈李白的侠客形象〉(《中国文哲研究集刊》3,1993—3)

陈葆文《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探析〉(《东吴文史学报》11,1993—3)

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史语所集刊》63—1,1993—4)

庄金德〈文献所见的自宫宦官——宋代以前〉(《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双月刊》3—6,1993—4)

张荣芳〈唐代长安刑场试析〉(《东海学报》34,1993—6)

王能杰〈醉吟先生饮酒乐〉(《国立台湾体专学报》3,1993—6)

王元军〈书法表演与唐人的好书之风《历史月刊》65,1993—6)

卢建荣〈唐代彭城刘氏宗族团体之研究〉(《史语集刊》63—3,1993—7)

章群〈宗庙与家庙〉(《中国唐史学会会刊》4,1993—11)

文美英〈唐人小说中的长安意象〉(《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集刊》1,1994—6)

四、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傅乐成〈回纥马与朔方兵——唐朝与回纥外交关系的讨论〉(《边疆文化论集》中,1953)收入《汉唐史论集》)

梁容若〈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陆杂志》6—6,1953—3)

梁嘉彬〈论隋唐时代的澎湖〉(《台北文物》2—2,1953—8)

赖永祥〈研究隋代流求是否台湾之有关书目〉(《台湾风物》4—1,1954—1)

李符桐〈回鹘部族考〉(《中国边疆》1—2,1954—4)

传乐成〈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边疆文化论集》,1954—7,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芮逸夫〈南诏史〉(《边疆文化论集》3,1954—7)

梁容若〈唐秘书监晁衡事辑〉(《中日文化论集》1,1955—4)

罗香林〈唐诗与中日文化交流之关系〉(《中日文化论集》1,1955—4)

梁容若〈日本最古之汉诗集〉(《大陆杂志》10—1,1955—5)

姚从吾〈唐客卿高丽高仙芝远征怛罗斯与中国造纸术的西入欧洲〉(《中韩文》1,1955—11)

严耕望〈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中国佛教史论集》1,1956)

沈枕农〈唐代利用外援及其影响〉上、下(《中兴评论》4—1、2,1957—1、2)

李符桐〈回鹘宗教演变考〉(《政大卅周年论集》,1957—5)

余又荪〈唐书所书日皇世系考〉(《中央日报》1957—6·4)

余又荪〈日王子入唐记〉(《中央日报》1957—9·10)

傅乐成〈突厥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土文化论集》,1957—10,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余又荪〈白江口之战〉(《大陆杂志》15—10,1957—11)

梁嘉彬〈论《书》流求与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现〉(《学术季刊》9—2,

1958—3)

王民信〈唐代吐谷浑余绪考〉上、下(《大陆杂志》16—7、8,1958—4、5)

陈固亭〈五代与两宋中日文化关系述要〉(《中日文化论集》续编,1958—5)

梁嘉彬〈论《隋书》流求与台湾琉球日本海行记录〉(《台湾文献》9—2,1958—7)

庄严〈正仓院及所藏唐宋古物〉(《文星》3—2,1958—12)

王民信〈隋唐对于吐谷浑之经营〉上、下(《大陆杂志》18—6、7,1959—3、4)

傅乐成〈突厥大事系年〉(《幼狮学报》1—2,1959—4,收入《汉唐史论集》)

梁嘉彬〈论《隋书》流求为台湾说的虚构过程及其影响〉(《东海学报》1—1,1959—6)

林鹤亭〈隋书流求传之研究〉1、2(《台南文化》6—4、7—1,1959—8、9)

梁嘉彬〈唐施肩吾事迹及其'岛夷行'诗考证〉(《大陆杂志》19—9,1959—11)

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西藏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0)

何健民〈隋时日本遣华使僧及文化之东传〉(《台大人文论丛》1,1960—6)

饶宗颐〈读罗香林先生新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兼论交广道佛教之传播问题〉(《大陆杂志》21—7,1960—10)

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史语所集刊》外编4下,1961—6;增补后收入《唐史研究丛稿》,香港,龙门,1969)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大陆杂志》25—8,1962—8)

罗香林〈唐诗与中日文化交流之关系〉(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1963)

李树桐〈唐高祖称臣於突厥考辨〉(《大陆杂志》26—1、2,1963—1,2)收入《唐史考辨》)

任遵时〈汉藏和亲与文成公主〉(《中国一周》695,1963—8)

周昆田〈隋唐时期的西域〉(《新疆研究论文集》,1964)

傅启学〈隋代对外关系〉(《社会科学论丛》14,1964—7)

徐先尧〈倭隋邦交新考〉(《中国与日本》11,1964—8)

李霖灿〈南诏的隆舜皇帝与'摩诃罗嵯'名号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

论文集》,1965)

刘义棠〈突厥的起源其兴起〉(《政大边政学报》4,1965—5)

卞麟锡〈唐玄宗时代与东夷关系之一瞥〉(《大际杂志》30—02,1965—6)

吴景宏〈南朝隋唐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上、中、下(《大陆杂志》31—3、4、1965—8、9)

陈水逢《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嘉新水泥,1966)

吴景宏〈五朝隋唐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上、中、下(《大陆杂志》32—2、3、1966—1、2)

李符桐〈两唐书回鹘可汗世系研究〉(《大陆杂志》32—9,1966—5)

卞麟锡〈中国唐代与新罗的关系——兼论《续日本纪》所载'古麻吕抗议'〉(《大陆杂志》32—9,1966—5)

罗香林〈唐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国文化论丛》,1967)

罗香林〈唐诗的传播与韩国〉(《东方杂志》1—4,1967—10)

韩道诚〈渤海国与唐文化〉(《东北论文集》2,1967—12)

李树桐〈再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大陆杂志》37—8,1968—10)收入《唐史新论》)

邱添生〈唐朝起用外族人士的研究〉(《大陆杂志》38—4,1969—2)

李则芬〈唐代与阿拉伯帝国的仅有冲突〉(《东西文化》26,1969—8)

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华佛教文化馆,1970)

栗原明信著、张良泽译〈日唐交涉史余话〉(《大陆杂志》40—5,1970—4)

邱添生〈唐代文化与外来文化〉(《师大学报》16,1971—6)

林天蔚〈隋谯国夫人事迹质疑及其向化与影响〉(《史语所集刊》43—2,1971—9)

王　仪《隋唐与后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台湾中华,1972)

侯伯林《唐代夷狄边患史略》(台湾商务,1972)

任育才〈突厥之文化形态及其对唐代之影响〉)《中兴文史学报》2,1972—5)

林文月〈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从日本遣唐使时代到白氏文集之东传(《文史哲学报》21,1972—6)

张建国〈唐代重用蕃人之研究〉(《女师专这报》2,1972—8)

林恩显〈突厥之文化形态及其对唐代之影响〉(《食货复刊》2—7,1972—10

王吉林〈南诏王室族属的研究〉(《史学汇刊》5,1973—3)

徐先尧〈倭国赠呈隋朝国书之商榷〉(《华学月刊》15,1973—3)

王吉林〈南诏与晚唐关系之研究〉(《华岗学报》7,1973—7)

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1974)

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湾中华,1974)第三章〈社会风俗〉

张日铭〈开元年间(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食货复刊》5—9,1975—12)

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6)

朱云影〈中国佛教对日、韩、越的影响〉(《历史学报》4,1976—4)

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学海,1977、1986)

刘义棠〈回鹘与唐朝和战之研究(《政大学报》29,1977—5)

刘义棠〈安史之乱与唐回联军之研讨〉(《政大民社系学报》15,1977—5)

石万寿〈回纥大事系年〉(《政大边政年报》8,1977—5)

刘义棠〈《新唐书·回鹘传》考注〉(《政大边政年报》8,1977—5)

石万寿〈唐回关系新论〉(《成大历史学报》4,1977—7)

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1978)

李树桐〈唐代四夷宾服的文化因素〉(《幼狮》47—5,1978—5)

刘崇稜〈空海与最澄——日本两位杰出的汉诗文作家〉(《日本研究》161,1978—6)

徐先尧《二王尺牍与日本书纪所占国书之研究——隋唐期中日关系史之一章》(华世,1979)

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文化复兴月刊》12—3,1979—3)

林恩显〈突厥对隋唐两代的分化政策研究〉(《民族社会学报》17,1979—5)

刘义棠〈回纥可汗汗地继承之研究〉(《政大边政年报 10,1979—7)

陈伯炼〈唐与大食关系初探〉(《思与言〉17—4,1979—11)

傅醒民〈鉴真和尚与日本佛教〉(《日本》1,1980—1)

王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台北商专学报》14,1980—6)

李树桐〈三辨唐高祖称臣於突厥事〉(《大陆杂志》61—4,1980—10,收入《唐史索隐》)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明文,1981)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黎明,1981)

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文史哲,1981)

陈庆隆〈突厥族的农耕〉(《国际汉学论集 1》,1981)

李方桂〈吐蕃大相禄东赞考〉(《国际汉学论集 1》1,1981)

王仪〈唐代中韩(后三韩)关系〉(《台北商专学报》16,1981—7)

刘义棠〈隋书·突厥传(殿本)考注〉(《政大边政年报》12,1981—7)

苏基朗〈伊本的 Djanfou 非泉州辨〉(《食货复刊》11—7,1981—10)

李霖灿《唐代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故宫博物院,1982)

黄约瑟〈试论唐倭之役与八世纪的东亚——评'白江村'〉(《食货复刊》12—4、5,1982—6)

林冠群〈唐代吐蕃形势之探讨——以墀松得赞(Khri-Srong-lde-Btsn)时期为中心〉(《人文学报》7,1982—10)

李东华〈唐末泉州的兴起及其背景〉(《台大历史学报》9,1982—12)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中国文化大学,1983),第三章

池田温〈东亚古代假宁制小考〉(《中韩日论集》,1983)

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论集》,1983)

高明士〈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中韩日论集》,1983)

徐先尧〈东天皇国书新考——隋书二王尺牍对该国之影响〉(《中韩日论集》,1983)

刘义棠〈隋书·西突厥傳考注〉(《政大边政年报》14,1983—10)

刘义棠〈新唐书·西突厥傳考注〉(《政大边政年报》14,1983—10)

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国立编译馆 1984)

陈庆隆〈突厥系族的兵器〉(《大陆杂志》68—5,1984—5)

高明士〈略论高丽科举制度中的隋唐诸要素〉(《韩国学报》5,1985)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史料研究〉(《大陆杂志》70—4,1985—4)

林恩显〈从民族主义观点看汉唐之和亲政策〉(《政治文化》3,1985—12)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联经,1986)

章群〈论新罗入唐之宿卫与质子——兼论唐代宿卫与质子之性质〉(《韩国学报》6,1986)

李树桐〈唐太宗渭水之耻的研究〉(《史学汇刊》14,1986—9,收入《唐史索隐》)

王吉林〈唐与吐蕃关系中的禄东赞家族〉(《汉学研究》4—2,1986—12)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收入《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中心,1987)

戴邦雄〈吐蕃王朝衰亡原因探讨〉(《大陆杂志》72—5,1987—5)

黄约瑟〈略论李唐起兵突厥关系〉(《食货复刊》16—11、12,1988—3)

黄辉阳〈略论唐代熊津都督府及高丽故土〉(《史学集刊》20,1988—5)

章群《关於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王吉林〈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西藏研究论集》2,1989—10)

林冠群《墀松得赞时期与李唐关系〉(《西藏研究论集》2,1989—10)

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治制度研究〉(《政大学报》60,1989—12)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续编)〉(联经,1990)

章群〈唐代之马匹贸易——兼论唐予回纥马价绢的性质〉(《晚唐的社会与文化〉,1990)

王吉林〈唐太宗对外经略及其困境〉(《史学汇刊》16,1990—7)

池田温〈唐令与日本令〉(《华学研究论集 2》,1991)

王民信〈薛仁贵北征九姓考〉(《唐代文化论集》,1991)

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唐代文化论集》,1991)

苏基朗〈九世纪阿剌伯文献所载 Djanfou 地望考辨〉(收入氏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1991)

黄约瑟〈试论隋与新罗的'佛教外交'〉(《韩国学报》10,1991)

郑梁生〈唐代学制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淡江史学》3,1991—6)

黄约瑟〈仕高丽朝的后周官人双冀〉(《韩国学报》12,1993)

高明士〈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件——兼释隋代的天下秩序〉(收入《中国与亚洲论集》,文史哲,1993)

黄约瑟〈日本留唐学生橘逸事迹考〉(《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章群〈唐代的胡僧〉(《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卞麟锡〈试论九世纪唐朝新罗坊的性质〉(《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刘茂才《东突厥史料》(新文丰,1993)

林冠群〈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西藏与中原论集》,蒙藏委,1993)

王吉林〈唐玄宗时代唐与吐蕃的战争〉(《西藏与中原论集》,1993)

汪幼绒〈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初传西藏的几个疑点〉(《西藏研究会讯》15,1993—3)

林冠群〈墀松得赞父子时期吐蕃政情之分析〉(《西藏研究论集》4,西藏研究会,1993—4)

五、典章制度

严耕望〈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之关系〉(《大陆杂志》2—11,1951—6)

侯绍文〈唐代科举放榜〉(《大陆杂志》2—2,1951—6)

侯绍文〈唐代进士曲江会〉(《大陆杂志》5—2,1952—7)

徐道邻〈唐律中的中国法律思想和制度》(《大陆杂志》5—1,1952—7),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论集》)

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史语所集刊》24,1953—6)收入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联经,1991)

章群《唐代考选制度考》(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

章群〈唐律中的铜与绢〉(《大陆杂志》8—12,1954—6)

章群〈唐代地方军权之扩张〉(《学术季刊》4—2,1955—12)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

张其成〈唐代官禄选才学制考绩之研究〉(《人事行政》10,1957)

陈贻麟〈隋代的俸制和吏治〉(《大陆杂志》16—6,1958—3)

臧广恩〈唐代教育对日本教育的影响〉(《中日文化论集》续编,1958—5)

郑世兴〈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1958—6)

傅乐成〈唐代的中央官学〉(收入《中国历代大学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亦收入《中国史论集》,学生书局,1985)

蔡墩铭〈论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数罪并罚之规定〉上、下(《法学经济》1—1、2,1958—9、10)

黄宝实〈唐代御史台与大理寺〉(《法学评论》25—6,1959—6)

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史语所集刊》30下，1959—10)
丁雨〈论五代变乱的直接因素及其与兵制的关系〉(《民主评论》11—21，1960—1)
牟润孙〈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民主评论》11—4，1960—2)收入氏著《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1987)
戴炎辉〈论唐律上身分与罪行〉1、2(《法学化》25—5、6，1960—5、6)
戴炎辉〈论唐律上犯罪竞合〉(《法学丛刊》19，1960—7)
伍振鷟〈唐国子监隶六学考〉(《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3，1960—9)
戴炎辉〈论唐律上刑之更正及补救〉(《法学评论》26—9，1960—9)
戴炎辉〈论唐律上'除免官当'〉(《法学丛刊》21，1961—1)
戴炎辉〈唐律各论(一)——卫禁律〉(《法学丛刊》23，1961—6)
戴炎辉〈论唐律上身分与罪行之关系〉(《台大社会科学论丛》11，1961—6)
黄显昌〈论唐律上刑之加减原因及方法〉(《刑事科学》4，1961—7)
戴炎辉〈唐律各论(二)——职制律〉(《法学丛刊》24，1961—10)
戴炎辉〈唐律各论(三)——户婚律〉(《法学丛刊》25，1962—1)
葛振纲〈汉唐政治制度之比较〉(《政治学术研究季刊》1—2，1962—3)
戴炎辉〈唐律各论(四)——库律〉(《法学丛刊》26，1962—4)
石垒〈五代的兵制》(上下)(《幼狮学志》1—2、3，1962—4、7)
戴炎辉〈唐律各论(五)——擅兴律〉(《法学丛刊》27，1962—7)
林咏荣〈唐明律的比较研究〉(《法学丛刊》28，1962—10)
戴炎辉〈论唐律贼盗律之贼律(《法学丛刊》28，1962—10)
戴炎辉〈论唐律贼盗律之盗律〉(《法学丛刊》29，1963—1)
侯绍文〈科举时代之避讳〉(《考政资料》5—7、8，1963—2)
戴炎辉〈论唐律斗讼律之斗律〉(《法学丛刊》30，1963—4)
陈阮雄〈唐代科举制度简述〉(《考政资料》5—11，1963—5)
戴炎辉〈论唐律斗讼律之讼律〉(《法学丛刊》31，1963—7)
张溯崇〈唐律上法官责任〉(《华冈学报》7，1963—7)
戴炎辉〈论唐律诈伪律〉(《法学丛刊》32，1963—10)
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嘉新水泥，1964)
戴炎辉《唐律通论》(国立编译馆，1964)

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史语所集刊》35 本,1964),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戴炎辉〈论唐律之杂律〉(《法学丛刊》33,1964—1)

戴炎辉〈论唐律之捕亡律〉(《法学丛刊》29—1、2,1964—7)

宋常廉〈唐代的马政〉(《大陆杂志》29－1、2,1964－7

戴炎辉〈论唐律之断狱律〉(《法学丛刊》36,1964—10)

戴炎辉《唐律各论》(自刊本,1965;后由成文出版社出版,1988)

潘维和《唐律家族主义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1965)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军将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清华学报社,1965)

杨树藩〈唐代的尚书省〉(《联合汇刊》,1965—5)

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史语所集刊》36,1965—12)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徐道邻《唐律通论》(台湾中华,1966)

戴炎辉〈唐律卫禁律之溯源〉(《萨武华诞论文集》1966—2)

严耕望〈谈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民主评论》17—3,1966—3)

杨树藩〈唐宋监察制度比较论略〉(《思与言》4—2,1966—7)

杨树藩〈唐宋地方制度的比较论略〉(《东方杂志复刊》1—6,1967—12)

潘维和《唐律家族主义论》(嘉新水泥,1968)

蔡墩铭《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较》(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8)

李华民〈唐代官制与人才选拔〉(《政治评论》20—5,1968—5)

黄富三〈科学制度与唐代的社会流动〉(《东方杂志复刊》2—2,1968—8)

高明士〈唐代的官学行政〉(《大陆杂志》37—11、12,1968—12)

杨树藩《唐代政制史》(正中,1969)

沈任远〈六部的起源与发展〉(《文复月刊》2—5,1969—5)

高明士〈唐代官学的发展与衰落〉(《幼狮学志》9—1,1970—3)

戴炎辉〈唐律上之保辜制〉(《文化复兴月刊》3—11,1970)

李树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士风《华冈学报》6,1970—6)《唐史新论》)

严耕望〈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事〉(《清华学报》8—1、2,1970—8)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文学社会》(台大文史丛刊,1971)

高明士〈唐代私学的发展〉(《文史哲学报》20,1971—6)

李树桐〈唐代马的装备与装饰〉(《大陆杂志》43—2,1971—8)《唐史新论》)

高明士〈五代的教育〉(《大陆杂志》43—6,1971—12)

陈德禹〈唐代考选制度之研究〉(《幼狮学志》10—1,1972—3)

王寿南〈论唐代的县令〉(《政大学报》25,1972—5)

罗正展〈唐律刑官发觉犯罪事实之方法〉(《文艺复兴》29,1972—5)

徐道邻〈中国唐宋时代的法律教育〉(《东方复刊》6—4,1972—10—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1975)

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北,台湾商务,1973)

高明士〈唐代贡举对后世儒学研究的影响〉(《国立编译馆馆刊》2—1,1973—6)

杨树藩、沈任远〈唐代宰相的权责与任免〉(《政大学报》8,1973—6)

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湾中华,1974)

薛作云《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台北,台湾商务,1974)

任育才〈唐代铨选制度略论〉(《中兴大学文史学报》4,1974—5)

陈祚龙〈唐代军礼讲式武式之梗概暨玄宗尚武立威之一斑〉(《文艺复兴》53,1974—6)

李甲孚〈唐律名例与现行法制的综合研究〉上下(《法学评论》10、12,1974—6、10)

石万寿〈唐代的门荫出身制度〉(《成大历史学报》1,1974—7)

李震〈唐代国防、军制沿革史略〉(《三军联合月刊》12—7,1974—9)

任育才〈唐代监察制度之研究〉(《唐史研究论集》,鼎文 1975)

李福登《唐代监察制度》(台南家专,1975,1977 再版)

张碧珠〈唐代御史台组织与职权之研究〉(《台大社会科学论丛》,1975—4)

石万寿〈唐代仕途的演变〉(《成大学报·人文篇》10,1975—5)

卓遵宏〈唐代的进士科〉(《淡江学报》14,1976—4)

黄良铭〈唐代神策军护军中尉及神策军之研究〉(《台东师专学报》4,1976—4)

李震〈唐代的马政与国防〉(《黄埔月刊》293,1976—9)

劳政武〈唐律官称考释〉(《法学评论》14,1976—10)

康乐〈唐代前期的边军〉(《史原》7,1976—10)

王寿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1977)

卓遵宏〈唐代进士风气浮薄之成因及影响〉(《淡江学报》15,1977—4)

李树桐〈唐代的军事与马〉(《师大历史学报》5,1977—4)《唐史研究》)

李树桐〈唐代的马与交通〉(《师大历史学报》5,1977—4)《唐史研究》)

高明士〈唐代学制渊源及其演变〉(《台大历史学报》4,1977—5)

任育才〈唐代科举制度述论〉(《中兴大学文史学报》9,1977—6)

任育才〈科举甄才——唐代的秀才举人与进士〉(《食货复刊》7—4,1977—7)

王寿南〈唐代的府制〉(《文复月刊》10—10,1977—10)

林耀曾〈唐宋丧礼礼数之比较研究〉(《高雄师院学报》6,1977—11)

鞠清远《唐代财政史》(上海,商务,1934;台湾食货重印,1978)

赵明义〈唐代科举考试述评〉(《复兴冈学报》18,1979—1)

高明士〈唐代教育的特色〉(《幼狮》41—5,1978—5)

曾一民《唐代考课制度研究》(台北,台湾商务,1979)

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大文史丛刊,1979)

潘维和《唐律学通义》(台北,汉林出版社,1979)

黄良铭〈唐代枢密使及监军使之研究〉(《台东师专学报》7,1979—4)

邓嗣禹〈唐代三省之沿革变迁考〉(《清华学报》12—1.2,1979—12)

沈任远〈三省六部〉(《铭传商专学报》17,1980—3)

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食货复刊》10—1、2,1980—5)

张荣芳〈隋唐秀才科存废问题之检讨〉(《食货复刊》10—12,1980—6)

汤承业〈隋唐时代帝王之师——皇帝与太子之辅导制度〉(《孔孟月刊》18—10,1980—6)

高明士〈唐代的释奠体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61—5,1980—11)

高明〈新旧唐书职官(百官)志所载官制异同的检讨——以学制为中心〉(《台大历史学系学报》7,1980—11)

毛汉光〈科举前后(西元600±300)清要官型之比较研究〉(《国际汉学论

集》,1981)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大史研所,1981)后由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1984)

戴炎辉〈唐律上议论减赎制之溯源〉(《国际汉学论集 1》,1981)

戴炎辉〈唐律十恶之溯源〉(《中国法制史论文集》,中国法制史学会,1981)

王霆南〈唐代的州制〉(《史学集刊》13,1981—5)

雷万来〈唐代刑罚执行之研究〉(《中兴法商学报》16,1981—6)

任育才〈唐代的医疗组织与医学教育〉(《中兴文史学报》11,1981—6)

张荣芳〈唐代官僚体系中的史官〉(《食货复刊》11—6,1981—9)

张荣芳〈唐代史馆的组织与演变——兼述起居郎舍人〉(《大陆杂志》64—4,1981—10)

陈光荣《唐代科举制度之研究》(文化政治研究所,1982)

林诒荣《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国立编译馆,1982—8)

张荣芳〈唐代史官入仕途径、地域与交游之分析〉(《大陆杂志》64—5,1982—10)

杨树藩〈从唐宋文官铨选叙阶论我国当前人事制度之趋向〉(收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研讨会论文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1982—12)

高明士〈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台大历史学报》9,1982—12)

陈炳天〈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台湾商务,1983)

卢建荣〈唐代通才型官僚体系之初步考察——太常卿、少卿人物的任官分析〉(《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1983)

卢建荣〈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史语所集刊 54—4,1983—1)

杨树藩〈汉唐官俸制度的比较〉(《史学集刊》15,1983—5)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之建置与发展〉(《史学集刊》15,1983—5)

卢建荣〈唐代后期(756—893)户部侍郎人物的任官分析〉(《史语所集刊》54—2,1983—6)

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南亚世界形成史的一侧面〉(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委员会,1984)

邱衍文《唐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郁氏印书及奖学基金会,1984)
王吉林〈从唐太宗的用人看贞观年间宰相制度的变动〉(上下)(《世界华学季刊》5—1.2,1984—3.6)
黄清连〈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史语所集刊》55—1,1984)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史语所集刊》55—3,1984—9)
高明士〈隋代贡举与教育〉(上下)(《大陆杂志》69—4、5,1984—10)
王吉林〈从党派斗争看唐高宗、武后时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收入《中国史新论》,1985)
苏基朗〈唐代前期的都督制度及其渊源〉(《食货复刊》14—11、12,1985—3)
卢建荣〈唐代前期财政决策权的转移及户尚选拔问题〉(《史语所集刊》56—2,1985—6)
王寿南〈唐代御史制度〉(《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1986)
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明文,1986)
刘健明〈唐代的翰林院〉(《食货复刊》15—7、8,1986—1)
向淑云〈唐婚律与社会婚姻实态的研究〉(《史原》15,1986—4)
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师大历史学报》14,1986—6)
周凤五〈太公家教重探〉(《汉学研究》4—2,1986—12)
朱凤玉〈太公家教研究〉(《汉学研究》4—2,1986—12)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4—2,1986—12)
刘健明〈隋代宰相制度述评〉(《国史释论》,1987)
卓遵宏《唐代的进士与政治》(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
黄清连〈唐代散官试论〉(《史语所集刊》58—1,1987—3)
王吉林〈唐代马嵬之变的政治意义及安史前后宰相制度变化的趋势——以肃宗朝为例〉(《史学汇刊》15,1987—7)
张荣芳〈唐代君主的史学教育〉(《食货复刊》16—7、8,1987—7)
甘怀真〈略论唐代百官家庙〉(《史原》16,1987—11)
王怡辰〈唐代中书令职任和地位的转变〉(《史学集刊》20,1988—5)
刘健明〈唐政事堂制度的建立〉(《国际唐代论集》1,1989)
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学生,1989)
张荣芳〈唐代京兆少尹研究〉(《国际唐代论集 I》1989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王德权〈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史学集刊》21,1989—7)

甘怀真〈试论唐代对于违礼的处分——以家庙礼为例〉(《史学集刊》21,1989—7)

章群〈唐代蕃将与其部落的关系〉(《汉学》7—2,1989—12)

林隆盛〈敦煌童蒙读物初探〉(《东吴文史学报》8,1990—3)

高明士〈隋唐的学官——以国子监为例〉(《台大历史学报》15,1990—12)

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的研究》(联经,1991)

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湾商务,1991)

郑志明〈敦煌写本家教类的庶民教育〉(《敦煌学国际论集 2》,汉学研究中心,1991)

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敦煌学国际论集 2》)

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华学研究论集 2》,1991)

高明士〈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民 1991—7)

张国刚〈唐代防丁考述〉(《大陆杂志》83—2,1991—8)

池田温〈唐令与日本令〉(《第三届华学会议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民 1991—12)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文津,1991)

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1992)

毛汉光〈论唐代之封驳〉(《中正学报·人文》3—1,1992—10)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三班官制之演变》(文史哲,1993)

张荣芳〈唐代中央的武器管制措施〉(《国际唐代论集》2,1993)

毛汉光〈唐代给事中的分析〉(《国际唐代论集》2,1993)

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以徐州节度区为例〉(《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高明士〈隋唐的帝王学〉(《国际汉学论集 2》,1993)

高明士〈隋代的制礼作乐〉(收入《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金子修一〈关于唐代后半的郊祀和帝室宗庙〉(《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沈冬〈隋代开皇乐议研究〉(《新史学》4—1,1993—3)

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史语所集刊》63—2,1993—3)

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律令制度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二〉(《汉学研究》11—1,1993—6)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文名哲学报》40,1993—6)

毛汉光〈中古府兵制总论〉(《师大史流》21,1993—7)

王诗伦〈唐代告身中的官人自称形式〉(《大陆杂志》87—2,1993—8)

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学报·人文》4—1,1993—10)

章群〈宗庙与家庙〉(《唐代会刊》4,1993—11)

六、财政经济

严耕望〈唐代江西造船业〉(《大公报》,1950—3.1)

潘照寰〈谈开元钱〉(《大陆杂志》4—7,1952—4)

大明〈开元钱余论〉(《大陆杂志》5—7,1952—10)

严耕望〈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大陆杂志》13—11,1956—12)

廖斗星〈唐代工商业之发展〉(《幼狮学报》4—1,1961—3)

林瑞翰〈南唐之经济与文化〉(《大陆杂志》29—6,1964)

邓世瑛〈五代钱币考〉(《新时代》6—12、7—1,1966—12,1967—1)

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上海,商务,1936;台湾商务重印,1968)

黄国枢〈刘晏的财政政策〉(《思与言》5—5,1968—1)

刘鸿喜〈黄河三门峡对古代漕运的影响〉(《大陆杂志》37—8,1968—10)

汤承业〈晚唐会昌间的财政经济政策〉(《逢甲学报》6,1973—5)

王恢〈隋通济渠直接入淮与会泗入淮说之探讨——兼论转移唐代经济与文化〉(《华学月刊》46,1975—10)

邱添生〈由田制与税法看唐宋间的历史演变〉(《师大历史学报》4,1976—4)

杨静贤〈唐代币制初探〉(《中兴法商学报》12,1976—10)

邱添生〈由货币经济看唐宋间的历史演变〉(《师大历史学报》5,1977—4)

林德政〈盛唐时期长安粮政之研究〉(《史化》8,1977—5)

洪德先〈五代吴越的水利建设及影响〉(《东海史学会刊》6,1977—6)

杨静贤〈唐代币制再探——盛唐钱币的购买力〉(《中兴法商学报》13,1977—12)

林天蔚〈唐代庄园制度问题〉(《书目季刊》11—3,1977—12)

赵冈〈唐代西州的布价——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绵纺织业〉(《幼狮》46—6,1977—12)

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1934;台湾食货重印本,1978)

陶希圣〈唐代私货与利息限制法〉(《食货复刊》7—11,1978—2)

黄亨俊〈晋至隋之货币发行〉(《今日中国》82,1978—2)

杨静贤〈唐代币制四探——德宗宪宗时的通货回缩〉(《经济研究》21,1978—5)

黄亨俊〈唐朝货币之发行〉1、2(《今日中国》85、86,1978—5、6)

黄亨俊〈五代十国货币之发行〉(《今日中国》87,1978—7)

黄清连〈唐代的雇佣劳动〉(《史语所集刊》49—3,1978—9)

杨静贤〈唐代币制五探——晚唐五代的币值〉(《中兴法商学报》14,1979—5)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台湾华世重印,1981)

赵冈、陈鍾毅合编《中国土地制度史》(联经,1982)

杨远《唐代的矿产》(学生,1982)

严耕望〈隋唐永济渠考〉(《史语所集刊》53—1,1982—3)

林天蔚〈试论自隋唐至清中叶的社会经济为农商放任时代〉(《思与言》19—6,1982—3)

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11)

卢建荣〈唐代前期非常支出的筹措及其回响〉(《史语所集刊》56—1,1985—3)

钱淑华〈唐两税法之研究〉(《中正岭学术研究集刊》4,1985—6)

张荣芳〈唐代茶税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东海学报》26,1985—6)

黄乃隆〈杨炎两税法的评析〉(《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6,1986—3)

侯家驹〈唐代飞钱考〉(《幼狮学志》19—3,1987—5)
曾贤熙〈由唐会要看唐代的盗铸钱币〉(《史学集刊》19,1987—5)
汤承业〈略论隋代之财政经济制度〉(《幼狮学志》19—4,1987—10)
陈钦育〈唐代茶的生产与运销〉(《故宫文物月刊》81,1989—12)
王怡辰〈唐代后期监务组织及崩坏〉(《晚唐的社会与文化》,1990)
曾贤熙〈唐代前期州县谷类租赋缴收程序初探〉(《简牍学报》13,1990—3)
陈伟明〈唐宋时期的屠宰加工与经营〉(《东方杂志复刊》23—12,1990—6)
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台湾商务,1991)
林伟洲〈政治冲突与中唐税制——以刘晏、杨炎为中心〉(《唐代文化论集》,1991)
陈伟明〈唐宋食糖消费与生产〉(《大陆杂志》83—1,1991—7)
侯家驹〈唐代每亩稻产量推估之商榷及实况〉(《大陆杂志》83—6,1991—12)
黄永年〈和籴以济京师之事初不始於盛唐〉(《大陆杂志》84—4,1992—4)
妹尾达彦〈河东盐池的池神庙与监专卖制度〉(《国际唐代论集 2》,1993)
黄永年〈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新史学》4—2,1993—6)
杨淑洪〈论唐代前期财政组织及其职权运作〉(《大陆杂志》86—3—4,1993—6)
郭正忠〈唐宋金元时期的秤斤制度〉(《新史学》4—2,1993—6)
任育才〈唐安史乱后之经济转变〉(《唐史研究论集》)
翁俊雄《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新文丰,1995)

七、宗教文化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大陆杂志》4—8,1952—4)
钱穆等〈唐宋时代文化〉(《大陆杂志》4—8,1952—4)
梁若容〈空海入唐求法记〉(《大陆杂志》6—6,1953—3)
宋越伦〈传戒大师鉴真的'东征'〉(《学术季刊》2—2,1953—12
罗香林〈唐相国房融笔受楞严经翻译考〉(《学术季刊》3—1,1954—9)
梁子涵〈冯承钧景教碑考里的一点错误〉(《大陆杂志》9—12,1954—12)
姚从吾〈唐客卿高仙芝远征怛罗斯与中国造纸术的西入欧洲〉《收入《中

韩文化论集》1，1955）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

罗香林〈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

罗香林〈大颠惟严与韩愈李翱关系考〉（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

梁若容〈空海入唐求法记〉（《大陆杂记》11－6，1955－9）

严耕望〈唐宋时中韩教文化之交流（收入章嘉等著《中国佛教史论集（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

罗香林〈玄奘法师年代考〉（《东方文化》3－1，1950，1

张君劢〈玄奘留学时之印度与西方玄奘著作目录〉（《大陆杂志》12—9，1956—5）

罗香林〈交广道之中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与艺术之新发现〉（《学术季刊》2—3，1956—5）

张秉权〈杜甫的体格与思想〉（《大陆杂志》13—3、4，1956—8）

李书华〈唐以前有无雕版印刷〉（《大陆杂志》14—4，1957—2）

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献〉（《大陆杂志》14—11，12，1957—6）

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1958）

李书华〈印刷术发明的时期问题〉（《大陆杂志》17—5、6，1958—9）

罗香林〈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管造颂德天枢考〉（《清华学报》新1—3，1958—9）

胡适〈新校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史语所集刊》29下，1958—11）

李书华〈再论印刷术发明的时期问题〉（《大陆杂志》18—10，1959—5）

董作宾〈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合璧〉（《史语所集刊》30下，1959—10）

龙运钧〈柳子厚的政治思想〉（《现代政治》6—2，1960—2）

李书华〈五代时期的印刷〉（《大陆杂志》21—3，1960—2）

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的关系〉（《大陆杂志》20—10、11，1960—5、6；亦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国立编译馆，1966—4）

尚逵斋〈古文运动的原委〉（《建设》8—12，1960—5）

胡适〈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敦煌写本——南阳和尚答湍义、刘澄集〉（《史语所集刊外编》4—1，1960—7）

饶宗颐〈读罗香林新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兼论交广道佛教傳播问题〉(《大陆杂志》21—7,1960—10)

李书华〈唐代后期的印刷〉(《清华学报》新 2—2,1961—6)

费海玑〈大唐'洛阳伽蓝记'〉(《大陆杂志》23—6,1961—9)

黄锦堂〈唐代的文学革命〉(《建设》10—8,1962—1)

许世瑛〈从唐玄宗改尚书洪范篇'颇'字为'陂'字中得到一个教训〉(《孔孟月刊》1—11,1963—7)

梁子涵〈唐代景教译经考〉(《大陆杂志》27—7,1963—10)

董作宾、王恒馀〈唐武后改字考〉(《史语所集刊》34,1963—12)

林瑞翰〈南唐之经济与文化〉(《大陆杂志》29—6,1964—2)

韦政通〈李翺'复性书'试解〉(《人生》27—6,1964—3)

翁同文〈近人引述毋昭裔刻书订补〉(《大陆杂志》37—9,1964—7)

昌彼得〈唐代图书形制的演变〉(《图书馆学报》6,1964—7)

詹栋梁〈李翺论性与情〉(《建设》13—4,1964—9)

李树桐〈武则天入寺为尼考辨〉(收入氏著《唐史考辨》,台湾中华书局,1965)

廖维藩〈南北朝经学及隋唐经学之统一〉(《学科》7—2,1965—2)

孙巧兰〈唐代景教流传考〉(《新时代》5—3、4,1965—3)

王泳〈柳子厚政治思想的探究〉(《大陆杂志》30—9、10,1965—6)

潘重规〈五经正义探源〉(《华冈学报》1,1965－6

罗香林〈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清华学报》1,1956－6

罗香林〈唐宋时代广州之回教〉(《清华学报》新 5—1,1965—7)

黄得时〈杜甫诗中的儒家思想〉(《孔孟学报》10,1965—9)

洪顺隆〈杜甫代表作品及其思想之探讨〉(《中国一周》809,1965—10)

易君左〈杜甫的宗教思想〉(《艺文志》1,1965—10)

石万寿〈五代的佛教〉(《慧炬》38,1965—12)

梁若容〈白居易与韩愈〉(《东海文学》10,1966—2)

东初〈大兹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场〉(《佛教文化》1—3,1966—3)

苏莹辉〈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为河西僧都统〉(《幼狮学志》5—1,1966—8)

庄申〈王维道家思想与生活〉(《大陆杂志》33—8,1966—10)

陈香〈从李白诗中褒贬人物分析李白的思想〉(《文坛》78,1966—12)

姚从吾〈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中国书目季刊》1—2、3、4,1966—12、1967—3、6)

李树桐〈唐代的政教关系〉(《师大学报》12,1967—6;亦收入氏著《唐史新论》

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生徒〉(氏著《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 1968)

陈成真〈文中子新考〉(《大陆杂志》36—1,1968—1)

吴任华〈中国禅宗第六代祖惠能概述〉(《东方杂志复刊》1—10,1968—4)

费海玑〈韩愈新论〉(《东方杂志》复刊 2—1,1968—7)

杨森富〈景教僧阿罗本其人其事〉(《现代学苑》5—7,1968—7)

梁子涵〈中国图书板刻起源於隋唐的一条伪证〉(《图书馆学报》8,1968—11)

钱穆〈六祖坛经〉(《大陆杂志》38—5,1969—3)

黄敏枝〈唐代寺领庄园的研究〉(《思与言》8—2,1970—7;收入氏著《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

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

印顺《中国禅宗史》(慧日讲堂,后改由正闻出版社出版 1971)

石万寿〈玄奘西游时间的探讨〉(《大陆杂志》42—6,1971—3)

黄敏枝〈唐代佛教与地方建设事业〉(《史原》3,1972—9)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1—4,1972—12;亦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黄敏枝〈唐代天竺僧侣东来译经考〉(《中国书目季刊》7—2,1972—12)

汪龙吟《文中子考信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5,1973—5)

陈祚龙〈中古敦煌仕女心目中的五台山〉(《山西文献》2,1973—7;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陈祚龙〈唐宋汴洛之名寺与高僧〉(《东方杂志复刊》7—4,1973—10;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罗葆善〈柳宗元生平及其思想研究〉(《台南师专学报》6,1973—12)

蓝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孙克宽〈唐以前老子的神话〉(《大陆杂志》48－1,1974－1;亦收入氏著《寒原道论》,联经出版公司,1977)

李蜀瀛〈唐初南北学术对立于史学的影响〉(《成大史学》1,1974－3)

甲凯〈刘知几与章学诚〉(《东方杂志》复刊 8－3,1974－3)

孙克宽〈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中兴文史学报》4,1974－5;亦收入氏著《寒原道论》)

陈祚龙〈唐代山西北宗两大禅法国师义福及普寂的生平研究资料〉(《山西文献》4,1974－7;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吴永猛《中国佛教经济发展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75)

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正中书局,1975)

马承骕〈吕温其人及其思想〉(《台北商专学报》6,1975－7)

金铄〈汉唐医史的研究〉(《成大历史学报》2,1975－7)

孙克宽〈唐代道教与政治〉(《大陆杂志》51－2,1975－8;亦收入氏著《寒原道论》)

曹作清〈李绛政治思想之研究〉(《黄埔月刊》281,1975－9)

卢明〈韩愈的生平及其思想〉(《中国国学》4,1975－12)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

陈祚龙〈关于李唐肃代二宗时期的禅学国师慧忠之行谊及其法语〉(收入《道安法师七十岁纪念论文集》,1976;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

东初〈丛林制度与禅宗教育〉(《佛光学报》1,1976－3)

陈祚龙《李唐苏州重玄寺之石壁佛经》(收入《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二)》,华世出版社,1976－9)

王熙元〈杜甫与禅学之因缘——兼论其思想归趋〉(《中国学术年刊》1,1976－12)

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

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变〉(《大陆杂志》54－1,1977－1)

章群〈王通之思想及其影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0－2,1977－2)

何泽恒〈韩愈与欧阳修〉(《中国书目季刊》10－4,1977－3)

甲凯〈史法与史意——论刘知几章学诚两家史学的差异〉(《辅大人文学

报》6,1977－6）

曹仁邦〈中国佛教求法史杂考〉（《佛光学报》2－1977－7）

陈祚龙〈刘禹锡与佛教〉（《佛光学报》2,1977－7;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12）

陈祚龙〈刘禹锡与佛教〉（《佛光学报》2,1977—7;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12）

苏文擢〈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大陆杂志》55—5,1977—12）

李树梓《唐玄庄新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钱穆《读王通中说〉（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东大图书公司,1978）

钱穆〈读六祖坛经〉（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1978）

钱穆〈六祖坛经大议〉（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1978）

钱穆《神会与坛经〉（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东大,1978）

陈祚龙〈关于研究李唐三藏法师玄奘的‘作为’及其影响之敦煌古抄参考资料〉（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郑骞〈古今之非韩考辨〉（《中国书目季刊》11—4,1978—3）

王寿南〈陆贽的事功及其政治思想〉（《幼狮》47—5,1978—5）

黄永武〈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书目书评》69、70,1979—1、2）

简添兴〈韩愈之思想及其文论〉（《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23,1979—6）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成大历史学报》6、7,1979—7,1980—9）

张特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2—8,1979—8）

沈秋雄〈隋末大儒王通〉（《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2—10,。1979—10）

张荣芳〈从《通典》看杜佑的史学〉（《史原》9,1979—12）

颜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

傅乐成〈李唐王室与道教〉（《食货复刊》9—10,1980—1）

叶鸿洒〈杜佑《通典》中民本思想的分析〉（《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2,1980—5）

段醒民〈由韩愈感看诗评骘韩愈人格型态的发展历程〉（《台北商专学报》14,1980—6）

逯耀东〈从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论魏晋史学转变的历程〉（《食货复刊》

10—4,1980—7)

汪国贞〈司空图思想研究〉(《台北商专学报》15,1980—10;亦收入氏著《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

冉云华〈宗密著'道俗答酬文集'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4,1980—10)

陈祚龙〈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华学月刊》106,1980—10;亦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明复《中国僧官制度研究》(明文书局,1981)

褚柏思《玄庄大师新传》(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

阎沁恒〈刘知几的疑古惑经与历史的本质〉(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中央研究院,1981)

郭为〈李翱之人性论及其与佛老及玄学之关系与对道学家之影响〉(《高雄师范学院学报》9,1981—1)

戴景贤〈试论陈子昂之立身行事与其家学之关系〉(《中国书目季刊》15—1,1981—6)

方介〈柳宗元的思想背景〉(《中国书目季刊》15—1,1981—6)

邱添生〈刘知几的史通与史学〉(《师大历史学报》9,1981—6)

方介〈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中国书目季刊》15—2,1981—9)

严耕望〈唐代成都寺观考略〉(《大陆杂志》63—3,1981—9)

杨惠南〈坛经的作者及其中心思想〉(《国立编译馆馆刊》10—2,1981—12;亦收入氏著《佛教思想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2)

韩廷一《韩昌黎思想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杨白衣〈新罗系的唯识宗〉(《中国佛教》26—4,1982—1)

明复〈唐代齐己禅师与其白莲宗〉(《中国佛教》26—5,1982—2)

陈琼玉〈唐代政教关系:一般因素的探讨〉(《中国佛教》26—7,1982—4)

方东美〈杜顺大师从缘起观之立场建立法界之观而展开为体大思精的哲学〉(《中国文化月刊》31,1982—5)

方介〈柳宗元的经、史、学思想〉(《国立编译馆馆刊》11—1,1982—6)

方东美〈检讨佛教在中国传续的困惑问题及华严宗对此问题之解决〉(《中国文化月刊》32,1982—6)

廖吉郎〈唐代纂修实录考〉(《师大国文学报》11,1982—6)

章群〈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之初步研究〉(《汉学研究》10—1,1982—6)

王国良〈唐五代书目考〉(《中国书目季刊》16—2,1982—9)

董金裕〈理学的先导——韩愈与李翱〉(《中国书目季刊》16—2,1982—9)

丁煌〈唐及五代道教宗派之研究(一)〉(《成大历史学报》9,1982—9)

赵雅博〈唐朝中国本有色彩的佛教思想〉(《中国文化月刊》36,1982—10)

严灵峰〈六祖坛经中神秀、惠能两偈辨异〉(《东方杂志复刊》16—4,1982—10)

刘健明〈一个转型的儒者——论王通的志向与政治思想〉(《大陆杂志》65—5,1982—11)

王昆华〈文中子研究〉(《复兴冈学报》28,1982—12)

严灵峰〈六祖坛经版本的流传〉(《东方杂志复刊》16—6,1982—12)

杨白衣〈玄奘一门的著书〉(《中国佛教〉27—4,1983—4)

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兼论其与史学成立的关系〉(《华学月刊》136—139、143—146,148—151,1983—4—7,11—1984—2,4—7;亦收入氏著《中古史学观念史》

刘健明〈论吕温的政治生涯及其政治思想〉(《食货复刊》13—2、3,1983—5)

王能杰〈韩昌黎辟佛之探微〉(《弘光护专学报》11,1983—6)

方介〈柳宗元的天人思想〉(《国立编译馆馆刊》12—1,1983—6)

颜尚文〈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师大历史学报》11,1983—6)

廖吉郎〈贞观撰敕正史考〉(《师大国文学报》12,1983—6)

曹仕邦〈中国僧史所载持午的实践和面对的难题〉(《华冈佛学学报》6,1983—7)

陈昱珍〈'法苑珠林'所引外典之研究〉(《中华佛学学报》6,1983—7)

杨政河〈宗密大师学风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6,1983—7)

童丽玲〈莲宗二祖善导大师得生平、著述及净土思想〉(《慧炬》229,1983—7)

李昌颐〈坛经思想的源流〉(《华冈佛学学报》6,1983—7)

徐芹庭〈隋唐五代之易学〉(《孔孟学报》46,1983—9;亦收入氏著《易学源流》,国立编译馆,1987—8)

方锡胤〈韩愈思想与文章之研究〉(《逢甲学报》16,1983—11)

童丽玲〈善导大师的生平及净土思想〉(《狮子吼》22—11,1983—11)

汪惠敏〈隋代经学概况〉(《中国书目季刊》17—3,1983—12)

方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国立编译馆馆刊》12—2,1983—12)

韩银庭《白居易诗与释道之关系》(作者自印,1984)

陈慧剑《寒山子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4)

释理光〈智颤大师的般若禅〉(《华梵佛学年刊》2—3,1984)

简添兴〈韩愈与欧阳修之辟佛思想〉(《嘉义农专学报》10,1984—5)

卢荷生〈隋代的图书馆事业〉(《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3,1984—6)

胡楚生〈韩愈《原人》与张战《西铭》(《中国书目季刊》18—1,1984—6;亦收入氏著《韩柳文新探》)

林时民〈刘知几的重要生平与史通〉(《弘光护专学报》12,1984—6)

甲凯〈刘知几的史学〉(《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3,1984—6)

林时民〈试论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本源〉(《史学评论》8,1984—7)

李威熊〈隋唐经籍及义疏之学的探讨〉(《孔孟学报》48,1984—9);亦收入氏著《中国经学发展史论》,文史哲出版社,1988)

郑志明〈唐代古文家的天命观念初探〉(《鹅湖》10—3,1984—9)

黑木哲夫〈从《六祖坛经》谈宗教与人性的发掘〉(《哲学年刊》3,1984—11)

施逢雨〈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论李白隐逸求仙活动的政治社会背景〉(《清华学报》新 16—1、2,1984—12)

廖明活《嘉祥吉藏学说》(学生书局,1985)

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艺文印书馆,1985)

李弘祺〈景教碑出土时的几个问题》(收入《中国史新论》,学生书局,1985)

张荣芳〈牛李党对史学的论争〉(收入《中国史新论》,同上)

黄运喜〈会昌法难中对各地区佛寺经像的破坏〉(《狮子吼》24—1,1985—1)

丁敏〈论唐诗僧产生的原因〉(《狮子吼》24—1,1985—1)

丁敏〈法苑珠林之研究〉(《狮子吼》24—2,1985—2)

黄博仁〈慧能对禅定之批判〉(《新竹师专学报》11,1985—2)

曹仕邦〈唐代的崇一法师是'景教僧'吗?〉(《幼狮学说》18—3,1985—5)

汪惠敏〈唐代经学思想变迁之趋势〉(《辅仁国文学报》1,1985—6)

杨宗莹〈白居易的思想与处世态度〉(《师大国文学报》14,1985—6)

邓克铭〈百丈清规之僧团规范意义的探讨〉(《狮子吼》24—7,1985—7)

郑志明〈史通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孔孟月刊》23—11,1985—7)

陈松柏〈两个伟大心灵的会通:从智者大师到六祖惠能〉(《中国佛教》29—8,1985—8)

释净薰、陈宗元〈窥基大师之净土思想〉(《狮子吼》24—8,1985—8)

戴朴庵〈隋唐之译经〉(《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8—3、4,1985—11)

郑志明〈唐代庞居士的诗偈及其宗教境界〉(《中国佛教》29—11,1985—11)

林丽真〈从隋志之著录看魏晋清谈及学术之迹象〉(《国立编译馆馆刊》14—2,1985—12)

黄博仁〈六祖慧能得法偈的分析〉(《新竹师专学报》12,1985—12)

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大陆杂志》71—6,1985—12)

雷家骥〈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收入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一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系,1986;亦收入氏著《中古史学观念史》)

张荣芳〈牛李党争中史官与史学的论争〉(收入《第一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1986)

叶庆春〈中国净土教的大成者:善导大师的净土教〉(《中国佛教》30—5,1986—5)

吴彩娥〈陈子昂与韩愈复古思想之比较〉(《辅仁国文学报》2,1986—6)

吴彩娥〈阵子昂与李白复古思想的比较〉(收入王静芝先生七十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王静芝先生七十寿庆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6—6)

陈祚龙〈关于李白与佛教的因缘〉(《中国语文化月刊》80,1986—6)

林时民〈近三年来有关刘知几的研究成果评价〉(《史学评论》12,1986—7)

李昌颐《六祖坛经顿教法门的建立与开展〉(《慧炬》265 267,1986—7—9)

包培元〈唐代官修前代史对后代的影响〉(《史化》16,1986—8)

方介〈柳子厚生平述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9,1986—9)

黄运喜〈唐代律令对僧侣游参行脚的限制〉(《狮子吼》25—8,1986

9)

张蓓蓓〈韩愈与孟子〉(《孔孟月刊》25—3,1986—11)

陈祚龙〈杨隋文帝奉佛崇法之一般〉(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五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林时民〈试论刘知几的史法〉(收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久洋出版社,1987)

曾一民〈唐两通之撰作及其关系〉(收入《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

逯耀东〈《史通》疑古、惑经篇形成的背景〉(《当代》10,1987—2)

王煜〈晚唐皮日休的哲思〉(《中国文化月刊》113,1987—3)

李玉珉〈隋唐之弥勒信仰与图像〉(《艺术学》1,1987—3)

陈重文〈天台大师的教相论:试论智顗的教相玄义与五时八教〉(《狮子吼》26－4～,1987－4～6)

赖建成〈吴越佛教对文学与艺术的贡献〉(《佛教艺术》3,1987－5;亦收入氏著《吴越佛教之发展》)

刘建明〈论皇甫湜与韩愈的交往及其影响〉(《中国书目季刊》21－1,1987－6)

李美煌〈隋唐净土思想的探讨〉(《慧炬》275,1987－6)

杨惠南〈惠能及其后禅宗之人性论的研究〉(《哲学与文化》14－6,1987－6)

雷家骥〈汉唐之间二体论与古今正史之争〉(《东吴文史学报》5,1987－6;亦收入氏著《中古史学观念史》)

雷家骥〈唐代官修史著的基本观念与意义〉(《师大历史学报》15,1987－6;亦收入氏著《中古史学观念史》)

庄万寿〈史通著录版本源流考〉(《中国学术年刊》9,1987－6)

林时民〈试论刘知几的时间观念及其历史撰述论〉(《大陆杂志》75－1,1987－7)

陈重文〈试论智顗的教育哲学体系:再谈天台大师的教相论〉(《狮子吼》26－7、8,1987－7、8)

黄运喜〈唐代祠部与功德使之设置及职权〉(《狮子吼)26－9,1987－9)

赖建成〈佛制与唐律令对佛教徒的制约力:以毁谤三宝及盗毁三宝物为

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1987－7;亦收入《狮子吼》26－10,1987－10)

林时民《刘知几史通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10)

李丰懋〈唐人葵花时与道教女冠:从道教史的观点说唐代咏葵花诗〉(《中外文学》16－6,1987－11)

张静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中外文学》16－7,1987－12)

胡楚生〈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孔孟月刊》26－4,1987－12;亦收入氏著《韩柳文新探》)

冉云华《宗密》(三民书局,1988)

黄运喜〈唐代宫廷佛教活动举隅〉(《狮子吼》27－1,1988－1)

杨惠南〈道信与神秀之禅法比较——兼论惠能所批判之看心、看净的禅法〉(《台大哲学评论》11,1988－1)

陈华〈王政与佛法:北朝至隋代帝王统治与弥勒下生信仰〉(《食货复刊》16－11、12、1988－3)

丁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成大历史学报》14,1988－3;亦收入《道教文化》4－9,1988－9,与《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叶程义〈王维老庄思想考述〉)《中华学苑》36,1988－4)

赖建成〈隋唐佛教之盛况〉(《狮子吼》27－4,1988－4)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道教文化》4－8、10、11,1988－4、1989－3)

赖建成〈会昌法难〉(《狮子吼》27－5,1988－5)

施忠贤〈宗密、法藏判教之比较〉(《鹅湖学杨》1,1988－5)

赖建成〈五代吴越佛教之发展〉(《狮子吼》27－7,1988－7;亦收入氏著《吴越佛教之发展》)

黄运喜〈旧唐书与佛教史事记载〉(《狮子吼》27－8,1988－8)

龚鹏程〈北朝最后的儒者——王通〉(《纪狮学志》20－2,1988－10)

陈祚龙〈李唐名相姚崇与佛教〉(《中华佛学学报》36,1988－12)

邬昆如〈隋唐社会哲学之研究〉(《台大文史哲学报》36,1988－12)

罗联添〈宋儒对韩愈原道篇批评及其回响〉(《中国书目季刊》23－3,1988－12)

王美惠〈善导大师:唐代净土宗的奠基者〉(《慧炬〉294,1988－12)

吴其昱〈荷泽神会传研究〉(《史语所集刊》59－4,1988－12)

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学生书局,1989)

杨惠南〈吉藏》(东大图书公司,1989)

罗联添〈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收入氏著《唐代文学论集》上册,学生书局,1989

何寄澎〈唐代古文家与佛教之关系〉(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华民国唐代学者联谊会,1989)

罗联添〈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亦收入氏著《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

车柱环〈金可记与道教〉(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论文集》)

翁同文〈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任育才〈王焘及其医学贡献〉(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Stephen W. Durrant(杜润德)〈刘知几论司马迁〉(收入《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杨惠南〈吉藏的佛性与心性论之研究〉(《台大哲学评论》12,1989－1)

叶阿月〈窥基的'心'与'行'之学说:比'心经幽赞'为中心〉(《台大哲学评论》12,1989－1)

胡楚生〈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评析〉(《中国学术年刊》10,1989－2)

庄万寿〈刘知几实录史学与孔子思想的关系之研究〉(《中国学术提刊》10,1989－2)

胡楚生〈柳宗元'论语辩'疏义——试析柳宗元心目中孔子的新形象〉(《孔孟学报》57,1989－3;亦收入氏著《韩柳文新探》)

古天英〈天台教观——以智者大师思想探讨〉(《慧炬》296、297、1989－3)

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兼论馆院学派的史学批评及其影响〉(《东吴文史学报》7,1989－3;亦收入氏著《中古史学观念史》)

吴天任〈刘知几与郑樵史学之探讨〉(《东方杂志复刊》22－9,1989－3)

黄运喜〈玄奘译心经价值初探——以梵文原典与罗什译本对照〉(《狮子吼》28－4,1989－4)

余崇生〈唐代民间歌谣佛教〉(《狮子吼》28－5、6,1989－5、6)

黄运喜〈从旧五代史看五代北方佛教〉(《狮子吼》28－6,1989－6)

胡顺萍〈六祖坛经思想之传承与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33,1989—6)

黄敏枝〈唐代民间的弥勒信仰及其活动〉(《大陆杂志》78—6,1989—6)

何丙郁〈唐代的科技发展〉,《历史月刊》17,1989—6)

能靖〈唐代以后禅宗的演进趋势〉(《狮子吼》28—9,1989—9)

龚鹏程〈'史通'析微〉(《幼狮学志》20—4,1989—10)

王幼华〈韩愈思想论析〉(《孔孟月刊》28—2、3,1989—10、11)

胡楚生〈柳宗元对于师道的看法〉(《孔孟月刊》28—4,1989—10、11)

何冠彪〈三国至隋唐占候云气之著作考略〉(《汉学研究》7—2,1989—12)

骆建人《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协助委员会,1990)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

程方平〈论林慎思对儒学的改造〉(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学生书局,1990)

周益忠〈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发微〉(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

苏莹辉〈晚唐五代间敦煌地区的佞佛情形〉(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

黄纬中〈中晚唐的草书僧〉(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

翁同文〈从史学考论唐人'模勒'一词不指印刷〉(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

傅伟勳〈坛经慧能顿悟禅教深层义蕴试探〉(收入氏著《从传统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东大图书公司,1990)

罗伯特·吉米罗(Robert N. Gimello)〈六祖坛经在北宗禅中的回响〉(收入《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1990)

保罗·葛罗能(Paul Groner)〈坛经的戒仪——以东亚佛教宗为观点〉(收入《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1990)

大卫·普特尼(David Putney)〈神秀、六祖坛经和道元的佛性论〉(收入《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1990)

方介〈从唐人小说看唐代士子的人生态度〉(《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3—1、2,1990—1、2)

章群〈通鉴唐纪引用笔记小说述论稿〉(《东吴文史学报》8,1990—3)

林庆彰〈唐代后期经学的新发展〉(《东吴文史学报》8,1990—2)

王熙元〈六祖坛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中国学术年刊》11,1990—3)

赖建成〈五代吴越国之佛教情势〉(《狮子吼》29－3、4、6、7,1990－3、4、6、7;亦收入氏著《吴越佛教之发展》)

冉云华〈从智𫖮的'摩诃止观'看中华佛教对印度禅学的吸收与改造模式〉(《中华佛学学报》3,1990－4)

释圣严〈六祖坛经的思想〉(《中华佛学学报》3,1990－4)

唐亦男〈神会在禅宗史上地位之批判与认定——别子为宗〉(《鹅湖》15,1990－6)

林时民〈'史通削繁'探析〉(《中国书目季刊》24－1,1990－6)

高柏园〈论六祖惠能的修养论——以'六祖坛经'为中心之讨论〉(《中国佛教 34－7,1990－7)

胡楚生〈韩愈'孔孟相用说'释疑〉(《孔孟学报》60,1990－9;亦收入氏著《韩柳文新探》,学生书局,1991)

方东美〈以西方方法学的'关系逻辑',来透视杜顺大师的法界观〉(《华冈佛学学报》4,1990－10)

华澜〈唐代道教易学初探〉(《东方宗教研究》1,1990－10)

蔡惠明〈唐代的天文学家、密宗学者——一行和尚的佛学思想〉(《菩提树》38－11,1990－11)

胡楚生〈试论韩愈《答李翊书》中'气'与'养气'的意义〉(《孔孟月刊》29—4,1990—12;亦收入氏著《韩愈文新探》)

翁同文〈唐初始刻古人墨迹于石两事及其影响考〉(收入《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

雷家骥〈刘知几'明镜说'析论稿〉(收入《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逯耀东〈刘知几史通与魏晋史学——从史通撰写过程所作的讨论〉(《中央研究院集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991)

胡楚生〈韩愈创作古文的心路历程——韩著〈答李翊书〉析义〉(收入氏著《韩柳文新探》,学生书局,1991)

邱添生〈唐代纂修前代正史析论〉(收入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青峰出版社,1991)

张荣芳〈魏晋至唐时期的《汉书》学〉(收入《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杨惠南〈吉藏的真理观与方法论〉(《台大哲学评论》14,1991－1)

何丙郁〈唐代之科技发展〉(《政大历史学报》8,1991－1)

任育才〈唐人的预防医学思想——以孙思邈为例〉(《中兴历史学报》1,1991－2)

雷家骥〈从刘知几'明镜说'析论传统史学理念的一个模式〉(《东吴文史学报》9,1991－3)

黄约瑟〈试论隋与新罗的'佛教外教'〉(《韩国学报》10,1991－5)

张荣芳〈唐代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以史学史专书为中心〉(《东海学报》32,1991－6)

郭纪青〈刘知几与史通〉(《台中师专学报》10,1991－6)

汪娟〈唐代弥勒信仰与政治关系的一侧面——唐代皇室对云南弥勒信仰的态度〉(《中华佛学学报》4,1991－7)

伊仁〈天台宗般若思想之研究〉(《中国佛教》35－7,1991－7)

宗玉微〈南北禅宗的融合〉(《谛观》66,1991－7)

胡顺萍〈坛经中心思想之源流〉(《崇佑学报》3,1991－9)

吴汝钧〈坛经的思想特质——无〉(《国际佛学研究年刊》1,1991－12)

曹淑娟〈柳宗元之史观与史笔析论〉(《鹅湖》17－6、7,1991－12、1992－1)

任育才〈论孙思邈之年寿及其医学思想〉(《中兴历史学报》2,1992－3)

赖建成〈义净大师的志行节操〉(《狮子吼》31－4,1992－4)

陈慧剑〈唐代王朝迎佛骨考——兼论法门寺与儒佛思想冲突之关系〉(《狮子吼》,同上)

汪娟〈唐代弥勒信仰与佛教诸宗派的关系〉(《中华佛学学报》5,1992—7)

陈昱珍〈道世与《法苑珠林》〉(《中华佛学学报》5,1992—7)

李刚〈唐代江西道教考略〉(《道教文化》5—6,1992—9)

邓国光〈道的本质与传承——辨韩愈的传道观与程朱道统论的分野〉(《孔孟月刊》31—2,1992—10)

吴汝钧〈神秀禅与慧能禅〉(《中国文化月刊》156,1992—10)

庄万寿〈刘知几的多元民族观〉(《中国唐代学会会刊》3,1992—10)

黄运喜〈国法与戒律之间——唐代僧团律令分析〉(《狮子吼》31—11,

1992—11）

辛旗〈简论智顗的天台宗思想〉（《中国文化月刊》157，1992—11）

王柏寿〈六祖坛经的哲学及其道德思想之研究〉（《嘉义师院学报》6，1992—11）

李刚〈唐玄宗崇道编年考论〉（《道教学探索》6，1992—12）

黄一农〈中国史历表朔润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10—2，1992—12）

江晓原〈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汉学研究》10—2，1992—12）

彭雅玲〈史通论历史褒贬〉（《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25—2，1992—12）

赖永海《湛然》（东大图书公司，1993）

杨惠南《惠能》（三民书局，1993）

彭雅玲《史通的历史叙述理论》（文史哲出版社，1993）

郑阿财〈从敦煌文献看唐代的三教合一〉（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文津出版社，1993）

吴文治〈关于韩愈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几点质疑〉（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方介〈柳宗元的圣人观〉（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何寄澎〈从山水游记看柳宗元贬谪以后的〈心境变迁〉（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巴宙〈论唐诗中之民间宗教信仰及佛教思想〉（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洪顺隆〈沈佺期、宋之问作品中的宗教面貌——初唐佛道思想对沈宋作品的渗透〉（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颜尚文〈隋'龙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区与国家佛教政策关系之背景〉（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

王能杰〈韩昌黎之原性与原道先后论〉（《国立台湾体专学报》2，1993—1）

黄连忠〈从宗宝本六祖坛经论六祖惠能的生活实践哲学〉（《菩提树》41—2、3，1993—1、2）

陈伟明〈唐宋时期的酿酒工艺与生产〉（《大陆杂志》86—2，1993—2；亦收入氏著《唐宋饮食文化发展史》，学生书局，1995）

辛旗〈玄奘行状及思想综论〉（《中国文化月刊》162，1993—4）

王纬甄〈唐人小说中的婚姻命定观〉(《问学集》3,1993—5)

方介〈韩愈的圣人观〉(《国立编译馆馆刊》22—1,1993—6)

方介〈韩愈'对禹问'析义——兼论韩愈与孟子政治理念的歧异〉(《汉学研究》11—1,1993—6)

陈祚龙〈唐代敦煌佛寺讲经之真象〉(《大陆杂志》86—6,1993—6,亦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林时民〈'史学三书'之史学思想及其比较〉(《师大历史学报》21,1993—6)

庄万寿〈史通分篇提要〉(《教学与研究》15,1993—6)

杨曾文〈净觉及其《'注'般若波蜜多心经》与其校本〉(《中华佛学学报》6,1993—7)

余崇生〈悲能禅与'坛经'版本〉(《狮子吼》32—7,1993—7)

余崇生〈吉藏《中观论疏》之结构及其思想内容〉(《狮子吼》32—7,1993—7)

方介〈陈子昂的圣人观〉(《中国书目季刊》27—2,1993—9)

辛旗〈简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思想流脉〉(《中国文化月刊》168,1993—10)

邓国光〈明道与为戏——韩愈文心表微〉(《九州学刊》6—1,1993—10)

赖姿蓉〈天台智顗之大乘中道戒〉(《谛观》75,1993—10)

赖建成〈唐朝的政教关系——会昌法难前的王法与佛法〉(《狮子吼》32—10～12,1993—10、11)

朱维焕〈'六祖坛经'之禅机大旨〉(《中兴文史学报》6,1993—11)

徐洪兴〈论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孔孟月刊》32—3、4,1993—11、12)

牟钟鉴〈从儒佛关系看韩愈柳宗元与李翱(《圆光佛学学报》1,1993—12)

苏荣焜〈天台思想的渊源〉(《慧炬》354,1993—12)

方立天《法藏》(三民书局,1994)

杨惠南《吉藏》(三民书局,1994)

蓝日昌〈论隋唐禅教之争〉(《弘光护专学报》23,1994—1)

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新史学》5—1,1994—3)

何隽〈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孔孟月刊》33—3,1994—11)

八、历史地理：

高良佐〈石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考〉(《大陆杂志》4—8,1952—4)

石璋如〈汉唐的国都陵墓与疆域〉(《大陆杂志》6—8,1953—4)

梁嘉彬〈论隋唐时代之'澎湖'〉(《台北文物》2—2,1953—8)

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第二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第二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严耕望《五代十国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第二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严耕望〈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2)

梁嘉彬〈论隋书'流求'与流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现〉(《学术季刊》6—3,1958—3)

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史语所集刊》35,1963—9)

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史语所集刊》36上,1965—5)

严耕望〈唐上津道考〉(《史语所集刊》38,1968—1)

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大陆杂志》36—11,1968—6)

黄麟书〈唐代碎叶城考〉上、中、下(《反攻》321—323,1968—12、1969—1、2)

苏莹辉〈略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领州沿革〉(收入氏著《郭煌论集》,学生,1969)

严耕望〈唐骆谷道考〉(《史语所集刊》39上,1969—1)

严耕望〈唐金牛成都道驿程考〉(《史语所集刊》40上,1969—10)

龚煦春〈隋唐五代疆域沿革考〉(《四川文献》120,1972—8)

王恢〈从唐代广西郡县设置沿革谈两唐志及其他〉(《文化复兴月刊》140,1973—3)

王恢《括地志新辑》(世界书局,1974)

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大唐西域记》之译撰问题〉(《东方杂志(复刊)》8—2,1974—8)

王恢〈隋通济渠直接入淮与会泗入淮说之探讨〉(《华学月刊》46,1975—10)

幻生〈《大唐西域记》译撰问题之我见〉(《东方杂志(复刊)》8—5,1974—11)

王恢〈《括地志新辑》序〉(《华学月刊》35,1974—11)

王仲孚〈初唐的西域经营与安西都护府〉(师大)《历史学报》3,1975—2)

苏莹辉〈五代迄宋初沙州归义军节度使领州沿革考〉(《宋史研究论集》8,国立编译馆,1976)

刘孝炎《唐代岭南之区域研究》(华世,1977)

苏莹辉〈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跋李明振碑末张淮深兄弟名衔二则〉(《史学汇刊》9,1978—10)

幻生〈读《大唐西域记》〉(《内明》86,1979—5)

严耕望〈北朝隋唐滏口壶关道考——兼论其南北诸谷道〉(《史语所集刊》51—1,1980—3)

李锡甫〈历代秦州治所上邽成纪两县考〉(《编译馆馆刊》9—1,1980—6)

严耕望〈唐代成都寺观考略〉(《大陆杂志》63—3,1981—9)

李锡甫〈五代霸州与永清文安雨时沿革关系考〉(《国立编译馆馆刊》10—2,1981—12)

李东华〈唐末泉州的兴起及其背景〉(《台大历史学报》9,1982—12)

宋肃懿《唐代长安之研究》(大立出版社,1983)

张荣芳〈试论隋唐的山东与关东〉(《食货复刊》13—1,1983—5)

李锡甫〈新旧唐书地理志考异〉(《国立编译馆馆刊》12—1,1983—12)

李东华〈五代北宋时期泉州海上交通之发展〉(《台大历史学报》10、11,1983—12,1984—12)

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华学季刊》5—4,1984—12)

严耕望〈中古时代几部重要地理书——第二讲:元和志与寰宇记〉(《汉学研究通讯》4—4,1985—1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二、三、四、五(台北,中央研究院,1985—86)

蔡寿美〈泉州县邑之设置与唐宋时期人口之成长及其农田水利设施〉(《史学集刊》19,1987—5)

黄敏枝〈唐代成都的经济景观〉(《史学集刊》19,1987—5)

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1988)

罗素娟〈隋代突厥政策之探讨〉(中华民国人文科学研究会,《人文学报》

13,1988)

吕莉玲〈唐太宗对突厥政策之探讨〉(《中国边疆》101,1988－3)

黄约瑟〈略论李唐起兵与突厥关系〉(《食货复刊》16－11、12 合刊,1988－3)

严耕望〈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途程〉(《历史月刊》10,1988－11)

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台湾商务,1989)

严耕望〈唐代北疆直接领辖之境界〉(《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全汉升〈略论大唐帝国与运河〉(《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苏莹辉〈'墨离'、'墨离川'、'墨离海'、'墨离军'考略〉(《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刘义棠《突回研究》(经世书局,1990)

严耕望〈唐代盛时与西南邻国之疆界〉(《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1990)

严耕望〈中古时代桐柏山脉诸关道〉(《国际汉学论集 2》,中研院,1991)

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学生,1991)

廖幼华〈正史与地理书中隋唐时期漳河之分流与断流〉(《唐代文化论集》,1991)

戴俭《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明文,1991)

董鉴泓〈隋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汴梁)城的比较研究〉(《建筑城乡学报》6,1991－9)

苏莹辉〈敦煌谈往——瓜沙二州史事丛考〉(《中央图书馆馆刊》24－2,1991－12)

石尔琪〈大唐长安皇城〉(《西北杂志》27、28 合刊,1991－12)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第五章第七节)(台湾商务,1992)

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唐代研究论集》3,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赵冈〈历代都城与漕运〉(隋唐部分)(《大陆杂志》84－6,1992－6)

王颋〈大氏渤海国行政地理考〉(《汉学研究》10－1,1992－6)

汉德宝〈唐代文人的园林观〉(《陕西文献》5,1992－6)

林树山〈唐代东北的主要水系〉(《大陆杂志》85－2,1992－8)

文美英〈唐人小说中的长安意象〉(《中央文学集刊》创刊号,1994－6)

九、人物：

傅乐成〈杜甫的死〉(《大陆杂志》6－4，1953－2；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傅乐成〈杜甫与政治〉(《思与言》1－4，1954－6，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

苏莹辉〈张义潮〉(《中国学术季刊》2－4，1954－6)

杜呈祥〈读杜甫传记〉上、中、下(《幼狮》3－2、3、4，1955－2、3、4)

严耕望〈杜黄裳拜相前之官历〉(《史语所集刊》26，1955－6)

佘又荪〈唐代名将刘仁轨〉(《中国一周》272，1955－7)

阮廷卓〈李后主之死〉(《大陆杂志》14－1，1957－1)

阮廷瑜〈高适年谱〉(《学术季刊》5－3，1957－3)

费海玑〈白居易的私生活〉(《大陆杂志》16－3，1958－2)

田中克己著、李振华译〈杨贵妃传〉1－8(《畅流》16－12、17－1、2、3、4、5、6，1958－2、3、4、5)

杜呈祥〈司空图〉(《中国文学史论集》2，1958－4)

倪抟九〈儿童帝石敬瑭〉(《中国一周》415，1958－4)

秦孝仪〈白居易〉(《中国文学史论集》1，1958－4)

夏济安〈韦应物〉(《中国文学史论集》1，1958－4)

刘宗烈〈刘禹锡〉(《中国文学史论集》1，1958－4)

苏莹辉〈补唐书岑参传〉(《大陆杂志》17－1，1958－7)

冯承基〈关于王无功的几项考证〉(《幼狮学报》2－1，1958－10)

费海玑〈白居易的政治经济及宗教生活〉(《大陆杂志》17－11，1958－12)

蒋君章〈儿皇帝石敬瑭〉(《政治评论》5—1，1960—9)

黄雪村〈唐陆贽的政治见解〉(《文星》6—5，1960—9)

杨承祖〈元结年谱〉(《淡江学报》2，1961—2)

周钧源〈钱塘江潮与武肃王〉(《浙江月刊》4—7，1961—7)等

罗联添〈张籍年谱〉(《大陆杂志》25—4、5、6，1962—8、9、11)

孙克宽〈韩偓简谱初稿〉(《图书馆学报》5，1963—8)

苏莹辉〈补唐书张淮深傅〉(《大陆杂志》27—5，1963—9)

杨承祖《张九龄年谱(附论五种)》(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二集之一，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

陈晓蔷〈刘长卿生平事迹考〉上、中、下(《大陆杂志》29—3、4、5，1964－7、8、9)

梁容若〈韩愈评传〉(《大陆杂志》28—5,1964—3)

傅振伦《史通作者刘知儿研究》(文星书店,1965)

许弘义〈读郭祟韬传〉(《史绎》2,1965—5)

田宗尧〈王勃年谱〉(《大陆杂志》30—12,1965—6)

罗联添〈白香山年谱考辨〉(《大陆杂志》31—3,1965—8)

李树桐〈唐代父子中兴名将——李晟和李愬〉(《李氏文献》1—4,1966—10)

王泳〈诗歌和史册中杨贵妃的事迹〉(《思与言》3—3,1966—10)

庄申〈王维道家思想与生活〉(《大陆杂志》33—8,1966—10)

王民信〈杨国忠兼职考(附小传)〉(《大陆杂志》34—3,1967—2)

庄申〈王维交游考〉1—5(《大陆杂志》34—4、5、6、7、8,19687—2、3、4)

芮和蒸〈论唐太宗〉(《思与言》5—3,1967—9)

陈芳草〈陆宣公平议〉(《现代学苑》4—12,‘1967—12)

刘维崇《杜甫评傅》(台湾商务,1968)

唐锡椽〈李长吉年谱〉(《幼狮学志》7—2,1968—4)

罗联添〈白居易作品系年〉(《大陆杂志》38—3,1969—2)等

罗联添〈韦应物事迹系年〉(《幼狮学志〉8—1,1969—3)

罗联添〈柳子厚年谱〉(《学术季刊》6—4,1969—6)

姚垚〈皎然年谱稿〉(《书目季刊》13—2,1969—9)

罗联添〈唐司空图事迹系年〉(《大陆杂志》39—11,1969—12)

游信利〈王绩疑年录〉(《中华学苑》8,1971—9)

罗维崇《王维评传》(正中书局,1972)

刘维崇《李白评传》(台湾商务,1972)

游信利〈王绩及其作品〉(《中华学苑》9,1972—3)

汤承业〈论李德裕的‘双轨’取士——既主张科举,又祟尚门第〉(《政大学报》26,1972—12)

王梦鸥〈沈既济生平及其作品补叙〉(《政大学报》26,1972—12)

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1973)

王梦鸥《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艺文印书馆,1973)

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台湾商务,1973)

汤承业〈隋文帝对文化复兴的贡献〉(《文化复兴月刊》6—2,1973—2)

汤承业〈论李德裕裁抑阉寺的谋路〉(《食货复刊》2—12,1973—3)
刘维崇《白居易评传》(台湾商务,1974)
苏莹辉〈唐宣宗尚书左丞崔璪及其先后任左丞诸人之除官年月考〉(《华冈学报》8,1974—7)
谢武雄《陆宣公之言论及其文学》(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5)
杨巾英《李林甫与杨国忠之比较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5)
严一萍《陆宣公年谱》(艺文印书馆,1975)
李书坪《杜甫年谱新编》(西南,1975)
戚维翰《李白研究》(华世,1975)
和铭益《骆宾王研究》(格致教育出版社,1975)
杨承祖〈杨炯年谱〉(《东方文化》13—1,1975—1)
李树桐〈补两唐书李大恩传并序〉(《师大历史学报》3,1975—2,收入氏著《唐史研究》)
李学纲〈李德裕在四川〉(《国立编译馆馆刊》4—1,1975—6)
马承骕〈吕温其人及其思想〉(《台北商专学报》6,1975—7)
雷家骥〈冯道评传〉(《鹅湖》1—10,1976—4)
钟玉莲〈李邕任官年月考略〉(《大陆杂志》52—4,1976—4)
汤承业〈李德裕与唐代十五名相比较论〉(《国立编译馆馆刊》5—1,1976—6)
薛凤生〈元微之年谱〉(《书目季刊》10—3,1976—12)
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1977、1988)
朱桂《牛僧孺研究》(正中,1977)
马承骕《吕和叔年谱》(洪氏,1977)
薛凤生《元微之年谱》(学生,1977)
张达人《刘禹锡年谱》(台湾商务,1977)
林天蔚〈唐末岭南状元莫宣卿考〉(《食货复刊》7—5,1977—8)
徐亮之《一代雄才李世民》(河洛图书,1978)
李唐《隋炀帝》(河洛图书,1978)
刘维崇《元稹评传》(黎明文化公司,1978)
刘维崇《李商隐评传》(黎明文化公司,1978)
刘维崇《骆宾王评传》(黎明文化公司,1978)

魏汝霖〈隋朝名将——长孙晟〉(《军事杂志》46—4,1978—1)

刘昭仁〈陆宣公(贽)研究〉(《实践学报》9、10,1978—3、1979—3)

魏汝霖〈唐朝的开国名将李孝恭〉(《军事杂志》46—7,1978—4)

王寿南〈陆贽的事功及其政治思想〉(《幼狮月刊》47—5,1978—5)

魏汝霖〈唐初的第一名将李靖评傅〉(《军事杂志》46—9,1978—6)

王杰谋〈猛将李世民〉(《畅流》58—3,1978—9)

魏汝霖〈唐室中兴战功最多名将——李光弼〉(《军事杂志》47—1,1978—10)

程义《杜甫》(星光出版社,1979)

刘昭仁《陆宣公评议》(学海,1979)

刘本栋《白居易》(林白出版社,1979)

何美玲《旷世谪仙李太白》(庄严出版社,1979)

周宪文〈杜甫年谱〉(《铭传学报》16,1979—3)

黄大受〈郭子仪〉(《畅流》59—5,1979—6)

袁宙宗〈李卫公靖与红拂女轶闻考〉(《文化复兴月刊》12—8,1979—8)

沈秋雄〈隋末大儒王通〉(《文化复兴月刊》12—10,1979—10)

夏瞿禅《五代南唐冯延已先生正中年谱》(台湾商务,1980)

朱偰《杜少陵先生传》(东升,1980)

孙述山《岑文本思想与年谱》(文津,1980)

雷家骥《李靖(联鸣文化,1980)

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学海,1980)

陈香《李白与杜甫》(凤凰城图书公司,1980)

徐小芬《唐太宗》(名人,1980)

颜昆阳《杜牧》(国家,1980)

于华峰〈唐代魏徵宋代赵普〉(《河北平津文献》6,1980—2)

王玥民〈武则天——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性〉(《史铎》10,1980—5)

杨文雄〈李贺生平及其交游考〉(《成大学报》15,1980—5)

王定华〈巾帼英雄南疆屏障——记述隋代谯国夫人冼氏的事迹〉(《丘海学术研究汇编》3,1980—6)

王梦鸥〈唐诗人王昌龄生平及其诗论〉(上、下)《《文化复兴月刊》13—7、8,1980—7、8)

廖应伯〈房玄龄评述〉(《逢甲学报 13,1980—10)

张金鉴〈首败倭寇的民族英雄刘仁轨传略〉(《中原文献》12—11,1980—11)

赵雅书〈五代吴越的创造者——钱镠〉(《台大历史学报》7,1980—12)

雷家骥《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联鸣文化,1981)

留元刚《唐颜鲁公真卿年谱》(台湾商务,1981)

陈香《杜甫评传》(国家,1981)

鞠清远《唐刘吏部晏年谱》(台湾商务 1981)

王先恭《唐魏文贞公徵年谱》(台湾商务,1981)

褚柏思《玄奘大师新传》(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

戴景贤〈试论陈子昂之立身行事与其家学之关系〉(《书目季刊》15—1,1981—6)

马起华《唐韩文公愈年谱》(台湾商务,1982)

李唐《唐太宗》(国家,1982)

李唐《唐明皇》(国家,1982)

李唐《武则天》(国家,1982)

陈敦贞《唐韩学士偓年谱》(台湾商务,1982)

林冠群〈仆固怀恩〉(《中国边政》78,1982—6)

蒋君章〈高颎的时代贡献——结束南北对抗与创造开皇之治的伟人〉)《东方复刊》16—9,1983—3)

蒋君章〈苏威——隋初建立制度的名宰相〉(《东方复刊》16—11,1983—5)

蒋君章〈李靖——唐初的常胜将军和兵学大家〉(《东方复刊》17—1,1983—7)

霍必烈《武则天传》(国际文化,1984、1991)

国艺谋《李白传》(国际文化,1984)

李树桐〈郭子仪的为人处世〉(《史学汇刊》13,1984—10,收入氏著《唐史索隐》)

白晓林《唐太宗传》(国际文化,1985)

汪禔义《白居易传》(国际文化,1985)

董明钧《李商隐传》(国际文化,1985)

邱慈容〈论高力士〉(《史苑》41,1985—6)
黄锦珠《白居易》(幼狮,1988)
萧丽华《杜甫》(幼狮,1988)
王秀《玄奘》(幼狮,1988)
萧丽华《王维》(幼狮,1988)
罗联添《白乐天年谱》(国立编译馆,1989)
前野直彬、斋藤茂著,文君妃译《韩愈传》(国际文化,1989)
光中法师《唐玄奘三藏传史汇编》(东大,1989)
任育才〈王焘及其医学贡献〉(《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黄约瑟〈两唐书薛仁贵传〉(《国际唐代论集 1》,1989)
霍必烈《杨贵妃传》(国际文化,1990)
谢重光《唐三藏传》(国际文化,1990)
谢重光《柳宗元传》(国际文化,1990)
谢重光《李后主传》国际文化,1990)
吴法《黄巢传》(国际文化,1990)
黄约瑟〈唐太宗与同性恋〉(《历史月刊》32,1990—9)
谢重光《唐高祖传》(国际文化,1991)
李韩林、李新富《骆宾王传》(国际文化,1991)
康才媛《狐媚明主——武则天》(久大,1991)
王运贤、李宝钧《李白》(国文天地,1991)
沈惠乐、钱伟康《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国文天地,1991)
王从仁《王维和孟浩然》(国文天地,1991)
刘开扬《杜甫》(国文天地 1991)
郁贤皓、张启超《谪仙诗豪李白》(云龙,1991)
吴企明《李贺》(国文天地,1992)
陈友琴《白居易》(国文天地,1992)
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国文天地,1992)
吴企明《李贺》(国文天地,1992)
顾易生《柳宗元》(国文天地,1992)
杨承祖〈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讨〉(《唐代研究论集 1》,新文丰,1992)
杨承祖〈李华系年考证〉(《东海学报》33,1992—6)

卢顺点〈'髯客'与高句丽名将'渊盖苏文'〉(《书目季刊》27—1,1992—12)

刁抱石《唐张文昌先生籍年谱》(台湾商务,1993)

胡沧泽《隋炀帝传》(国际文化,1993)

杨惠南《惠能》(东大,1993)

郁贤皓、朱易安《李商隐》(国文天地,1993)

谢慧贤〈武则天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关於女性统治者与权力承继的政治学、以及性别与性关系的个案比较研究〉(《国际唐代论集2》,1993)

何根海〈魏徵的谏诤艺术〉(《历史月刊》61,1993—2)

黄清连〈王铎与晚唐政局——以讨伐黄巢之乱为中心〉(《史语所集刊》63—2,1993—5)

李炳泉《朱温》(文津,1994)

赵映林〈唐太宗的人才观和用人术〉(《历史月刊》74,1994—3)

王寿南〈唐代的太上皇〉(《历史月刊》79,1994—8)

陈飞《李世民》(知书房,1995)

陈飞《唐太宗》(知书房,1995)

郭祝崧〈武则天与女儿节〉(《历史月刊》85,1995—2)

王其祎、周晓薇〈唐太宗与琵琶曲〉(《历史月刊》95,1995—12)

十、史料整理

童寿〈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大陆杂志》3—10,1951—11)

严耕望〈通鉴作者误句旧唐书之一例〉(《大陆杂志》6—2,1953—1)

罗联添〈刘宾客嘉话录(顾文本)校补及考证〉上下(《幼狮学志》2—1、2,1953—1、4)

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文史哲学报》5,1953—12)

严耕望〈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五年条夺文〉(《大陆杂志》13—4,1956—8)

严耕望〈旧唐书食货志盐铁节夺文伪误〉(《大陆杂志》13—3,1956—8)

严耕望〈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条夺文〉(《大陆杂志》13—5,1956—9)

严耕望〈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八年条书事多误〉(《大陆杂志》13—7,1956—10)

严耕望〈旧唐书夺文拾补〉(《史语所集刊》28,1956—12)

简又文〈南汉马廿四娘墓券考〉(《大陆杂志》17—12,1958—12)
苏莹辉〈补唐书张淮深传〉(《大陆杂志》27—5,1963—9)
阮廷瑜〈旧唐书职官志校记〉1—4(《大陆杂志》31—12、33—1　3,1965—12、1966—7、8)
苏莹辉《敦煌论集》(学生,1969)
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嘉新水泥 1969)
昌彼德〈跋宋十二行本五代史记〉(《故宫季刊》1—2,1966—10)
童鹰九〈新唐书列传遣词指瑕〉(《嘉义师专学报》1,1970—5)
陈铁凡〈唐本草考〉(《大陆杂志》40—10,1970—5)
梁嘉彬〈隋书流求国传逐句考证〉(《大陆杂志》45—6,1972—12)
林瑞翰〈资治通鉴五代纪补注〉上下(《幼狮学志》11—1、2,1973—3、6)
罗联添〈毗陵集及其伪文〉(《书目季刊》7—4,1974—3)
李树桐〈补两唐书李大恩传并序〉(《师大历史学报》3,1975—2)
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台湾商务,1976)
陈祚龙〈唐史散策〉(《大陆杂志》53—4,1976—10)
郭武雄〈太平御览所引五代史出处考〉(《食货复刊》8—3、4,1978—6)
陈祚龙《敦煌文物随笔》(台湾商务,1979)
陈祚龙《敦煌学海探珠》(台湾商务,1979)
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台湾商务,1979)
王国良〈明皇杂录的作者与版本问题〉(《书目季刊》12—4,1979—3)
陈祚龙〈新校重订李唐墓志铭文七种〉(《华学月刊》98,1980—2)
封思毅〈唐与五代蜀本〉(《四川文献》176,1980—9)
高明士〈新旧唐书百官(职官)志所载官制异同的检讨——以学制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7,1980—12)
高明士〈敦煌学与隋唐史研究——兼介绍日本新刊两种有关敦煌学的著作〉(《食货复刊》10—6,1980—9)
幻生《敦煌佛经卷小巡礼》(自刊本,1981)
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国立编译馆,1981)
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大陆杂志》63—4,1981—10)
陈祚龙《敦煌学要编》(新文丰,1982)
陈祚龙《敦煌古抄文献会最》(新文丰,1982)

苏莹辉〈近三十年来国际研究'敦煌学'之回顾与前瞻〉(《书目季刊》16—2,1982—9)
王国良〈唐五代书目考〉(《书目季刊》16—2,1982—9)
陈祚龙〈敦煌学散简〉(《大陆杂志》65—4,1982—10)
苏莹辉《敦煌论集续编》(学生,1983)
苏莹辉《瓜州史事丛考》(台湾商务,1983)
陈祚龙〈敦煌学散记〉(《大陆杂志》66—3,1983—3)
李锡甫〈新旧唐书地理志考异〉(《国立编译馆馆刊》12—1,1983—6)
蔡涵墨〈禅宗'祖堂集'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书目季刊》17—1,1983—6)
罗联添〈唐代诗文集的校刊问题〉(《国立编译馆馆刊》12—2,1983—12)
罗联添〈李文公集流、佚文及伪文〉(《书目季刊》17—3,1983—12)
罗联添〈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代与地点〉(《书目季刊》17—3,1983—12)
潘重〈敦煌变文集新书〉(中国文化大学,1984)
林聪明〈敦煌本李翔涉道诗考释〉(《敦煌学》7,1984—1)
毛汉光整理《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5)
毛汉光《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中研院史语所,1985)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新文丰,1985)
岑仲勉《唐史余沛》(北京,中华,1960,弘文馆重印,1985)
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1986)
李则芬〈漫谈新旧唐书〉(《东方复刊》20—3,1986—9)
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湾商务,1987)
吴哲夫〈垂代立教——谈'贞观政要'及其版本〉(《故宫文物月刊》86,1990—5)
陈祚龙〈法国的敦煌吐鲁番学教研之回顾与前瞻》(《书目季刊》24—1,1990—6)
白化文〈《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释〉(《敦煌学》16,1990—9)
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16,1990—9)

王三庆〈敦煌本《类林》校笺及其研究〉上下(《敦煌学》16、17,1990—9、1991—9)

李德超〈敦煌本孝经考〉(《敦煌学国际论集 2》,1991)

潘重规〈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敦煌学国际论集 2》,1991)

黄永武〈敦煌曲'斗百草词'试释〉(《敦煌学国际论集 2》,1991)等)

庄万寿〈唐代史料学述(二则)——武则天史料及日本唐代研究指引〉(《教学与研究》13,1991—6)

杨雄〈《目连变文》校勘拾遗〉(《敦煌学》17,1991—9)

戴应新〈唐卢绶夫妇墓志铭考〉(《故宫学术季刊》9—3,1992)

郑阿财〈敦煌写卷《御注孝经并进表》初探〉(《敦煌学》18,1992—3)

王三庆〈敦煌研究院藏张大千题署的《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敦煌学》18,1992—3)

林平和〈敦煌斯二〇四九号毛诗故训传残卷书后〉(《孔孟月刊》359,1992—7)

林平和〈敦煌伯二六一九、三八七二号唐写本周易王弼注残卷书后〉(《中央大学人文学报》11,1993—6)

日文隋唐五代史论著索引

(一)著作 …… 1069
(二)论文 …… 1078
一、政治 …… 1078
二、典章制度 …… 1081
三、经济、财政 …… 1088
四、社会 …… 1103
五、民族 …… 1107
六、对外关系 …… 1110
七、文化 …… 1111
八、考古与文物 …… 1115

(一)著作

秦汉隋唐史的研究　滨口重国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1

六朝和隋唐帝国　布目潮讯、山口修　社会思想社　1974

隋唐的盛世　石田斡之助等　新光社　1934　《世界文化史大系》7卷

隋唐世界帝国　外山军治　人物往来社　1967　《东洋的历史》5卷

隋唐帝国　布目潮沨、栗原益男　讲谈社　1974　《中国的历史》4卷

华丽的隋唐帝国　日野比丈夫　讲谈社　1977　《图说中国历史》4卷

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权的形成　布目潮沨　东洋史研究会　1968

隋唐的兴亡　陈舜臣　平凡社　1981

东洋中世纪史　和田清、守屋美都雄、村上正二　有斐阁　1953

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与文化　中国中世纪史研究会编　东海大学出版会　1970

中国中世纪的社会与共同体　谷川道雄，国书刊行会　1976

东亚世界的形成　西嶋定生等　岩波书店　1971　岩波讲座《世界史》之5.6卷，内含多篇有关隋唐史的专题论述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谷川道雄　筑摩书房　1971

大唐帝国　宫崎市定　河出书房　1964

大唐之春　石田干之助　田中克己　文艺春秋社　1967

唐史丛钞　石田干之助　要书房　1948

五代史　日野开三郎　明德出版社　1971

五代史的基调　日野开三郎　三一书房　1980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之第2卷。

五代·宋　周藤吉之、中嶋敏　讲谈社　1974　《中国的历史》第5卷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池田温　吉川弘文馆　1992

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　砺波护　同朋舍　1986

唐代政治制度之研究　筑山治三郎　创文社　1967

中国法制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52

唐宋法律文书的研究　仁井田升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究所　1959

唐令拾遗　仁井田升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4

唐代制敕研究　中村裕一　汲古书院　1991
唐代官文书研究　中村裕一　中文出版社　1991
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　池田温　东方书店　1992
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　汲古书院　1990
唐宋变革的地域研究　佐竹靖彦　同朋舍　1990
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　刀水书房　1990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池田温　大藏出版　1990
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汲古学院　1992
支那中世纪的军阀　日野开三郎　三省堂　1942
唐代藩镇的支配体系　日野开三郎　三一书房　1980
唐末五代自卫义军考　日野开三郎　汲古书院　1984
长安之春　石田干之助　创元社 1941；平凡社　1961
长安春秋　驹田信仁　集英社　1981
隋炀帝　宫崎市定　人物往来社　1965
唐太宗　谷川道雄　人物往来社　1967
隋炀帝和唐太宗　布目潮沨　清水书院　1975
唐太宗和隋唐文化　清家莹三郎　光风馆　1942
则天武后——女性与权力　外山军治　中央公论社　1966
颜真卿——刚直的一生　外山军治　创元社　1964
安禄山　藤善真澄　人物往来社　1966
安禄山与杨贵妃——安史之乱前后　藤善真澄清水书院 1972
杨贵妃·安禄山　旺文社编　旺文社　1985
五代群雄传　村松暎　中央公论社　1972
冯道　砺波护　人物往来社　1966
乱世的皇帝——周世宗及其时代　栗原益男　桃源社　1968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玉井是博　岩波书店　1942
支那经济史考证(上、下)　加藤繁　东洋文库　1952、1953
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　周藤吉之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5
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　曾我部静雄　讲谈社　1953
中国经济史研究　西嶋定生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6
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元佑　东洋史研究会　1968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　池田温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79

均田制·租庸调制研究　铃木俊　刀水书房　1980

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　堀敏一　岩波书店　1975

唐代租税的研究　吉田虎雄　汲古书院　1973

唐代租庸调研究　日野开三郎　汲古书院　1974—1977　按:本书共分三册,第一册为《色额篇》;第二册为《课输篇上》;第三册为《课输篇下》。

唐代两税法研究　日野开三郎　三一书房　1981、1982　按:该书分前篇、本篇两册,为《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之3、4卷

唐代两税法研究　船越泰次　汲古丛书7　汲古书院 1996

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研究　大泽正昭　汲古丛书9　汲古书院 1996

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　宫崎市定　星野书店　1943

唐五代的货币与金融　日野开三郎　三一书房　1982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5卷

唐代邸店之研究　日野开三郎　福岗自版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7　1992

续唐代邸店之研究　日野开三郎　福岗自版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8　1992

大运河——中国之漕运　星斌夫　近藤出版社　1971

唐代先进地区的庄园　日野开三郎　汲古书院　1985

中国的地主经济　草野靖　汲古书院

唐·新罗·日本　江上波夫、川畸庸之、西嶋定凡编　平凡社　1980

隋唐帝国的出现和日本　井上光贞等　学生社　1981

遣唐使　森克己　至文堂　1956

最后的遣唐使　佐伯有清　讲谈社　1978

遣唐使时代的日本和中国　江上波夫　小学馆　1982

遣唐使研究与史料　茂石寅男等　东海大学出版社　1987

日中交流两千年　藤家礼之助　东海大学出版社　1977

唐与日本　池田温　吉川弘一馆　1992

白江村　鬼头清明　教育社　1981

遣唐使之研究　增村忍　同朋舍　1988

遣唐使与正仓院　东野治之　岩波书店　1992

鉴真大和上之研究　安藤更生　平凡社　1960

波斯与唐　山田信夫　平凡社　1971

唐与印度　塚本隆善　中央公论社　1974　按：本书为《世界历史》第4卷

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　高桑驹吉　国书刊行社　1974

中国的律令制及其开展——包括对周边各国的影响　唐代史研究会　刀水书房　1976

中国律令制的开展及其它国家、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研究会　刀水书房　1984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唐代史研究会　吉川弘文馆　1986

西域与伊斯兰　岩村忍　中央公论社　1961年

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　伊濑仙太郎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55年

西域文化研究　西域文化研究会编　法藏馆　1953—1961年出版

按：该书共六册：第一册为《敦煌佛教资料》；第二、三册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第四册为《中亚细亚古代语文献》；第五册为《中央亚细亚佛教学术》；第六册为《历史和美术的诸问题》。

西回鹘国史的研究　安部健夫　汇文堂　1955年

西域史研究(上、下)　白鸟库吉　岩波书店　1947年

隋唐时代东土耳其斯坦研究——以高昌国史研究为中心　嶋崎昌　东大出版社　1977年

中世纪西藏史研究　佐藤长　同朋舍　1986

西藏历史地理研究　佐藤长　岩波书店　1978

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　山口瑞凤　岩波书店　1983

中国学考论　石滨纯太郎　全国书房　1943

东洋学的话题　石滨纯太郎　创元社　1943　按：这是一部论敦煌学的书。

敦煌　长泽和俊　第三文明社　1974

敦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　金凤照光　评论社　1972

讲座敦煌(1—9册) 大东出版社 1980—1992

西南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南诏国史研究 藤泽义美 大安书店 1969

内陆亚细亚史论集 内陆亚细亚史学史编 大安书店 1964 按:论集内收有多篇有关隋唐与高昌、回纥关系的论文

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内田吟风 同朋舍 1975

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 护雅夫 山川出版社 1967

渤海史诸问题 岛山喜一 风间书房 1968

渤海文化 朱荣宪 雄山阁 1979

唐代的社会与文艺 有高岩 讲谈社 1949

中国中世纪文学评论史 休田慎之助 创文社 1979

唐代的诗和散文 吉川幸次郎 弘文堂 1948

唐诗研究 丰田穰 养德社 1948

唐诗概说 小川环树 岩波书店 1958

唐才子传之研究 布目潮 中村乔 汲古书院 1982

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 渡部忠 樱井由躬雄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84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 加藤繁 和记印书局 1944(中译本)

唐宋贸易港研究 桑源骘藏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35

唐宋史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研究 青山定雄 吉川弘文馆 1963

古代驿制的研究 坂本太郎 至文堂 1928

敦煌和吐鲁番文献Ⅱ契约 山本达郎、池田温 东洋文库 1986—1987

唐五代的贱人制度 滨口重国 东洋史研究会 1966

唐代的诗人们 前野直彬 东京堂书店 1971

唐代的诗人 小川环树 大修馆 1975

唐诗旅情 葵子民 东方书店 1985

唐代的女诗人 乐恕人 每日新闻社 1980

唐诗岁时记——四季与风俗 植木井行 明治书院 1980

唐诗的风土 植木井行 研文社 1983

全唐诗札记 小川昭一 汇文堂 1969

王维的生涯和艺术 小林太市郎 全国书房 1944 按:此书为《小林

太市郎著作集》之 4 卷　1974 年谈交社出版
王维　小林太市郎　集英社　1964
审美诗人王维　伊藤正文　集英社　1983
李太白　田中克己　日本评论社　1963
李太白研究　大野富之助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59
李白　青木正儿　集英社　1965
李白　武部利男　筑摩书房　1973
李白　小尾郊一　集英社　1982
李白的梦　武部利男　筑摩书房　1982
李白——心象与诗　松浦友久　社会思想社　1982
杜甫——其人其诗　斋藤勇　研究社　1952
杜甫随笔　吉川幸次郎　创元社　1952
杜甫传　桥川时雄　岩波书店　1952
杜甫——中国的思想家　目加田诚　劲草书房　1963
杜诗讲义　吉川幸次郎　筑摩书房　1963
杜甫门前记　土岐善麿　书籍文物交流会　1965
杜甫——他的诗和人生　桥川时雄　筑摩书房　1964
杜甫　目加田诚　集英社　1966
杜甫的遗产　吉川利一　春韭庵　1965
杜甫私记　吉川幸次郎　筑摩书房　1965
敦煌的文学文献　讲座敦煌 9　大东出版社　金冈照光　1990
唐代中期的文学和思想　户崎哲彦　滋贺大学经济学部研究丛书
1992
杜甫周边记　土岐善磨　春秋社　1967
杜甫　森野繁夫　集英社　1982
和杜诗在一起　吉川洋一　创文社　1982
寒山拾得(上、下)　久须本文雄　讲谈社　1985
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　花房英树　汇文堂　1960
白乐天——东洋的诗和精神　片山哲　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出版部
1960
白乐天文学的再评价及其文献　堤留吉　东京　1961

白乐天　横山裕男　人物往来社　1967
白乐天　堤留吉　春秋社　1969
白乐天　田中克己　集英社　1966
讽谕诗人白乐天　太田次男　集英社　1983
按:本书为《中国的诗人》第四册
游仙窟新考　波多野太郎　樱枫社　1963
游仙窟全讲　八木泽元　明治书院　1967
韩愈——中国的思想家　清水浩　劲草书房　1968
韩愈　原田宪雄　集英社　1965
豪放诗人韩退之　前野直彬·斋藤茂　集英社　1983
枯淡诗人柳宗元　林田慎之助　集英社　1983
李贺——中国的思想家　八木泽元　劲草书房　1964
李贺　斋藤晌　集英社　1967
杜牧　市野泽寅雄　集英社　1972
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那波利贞　创文社　1974
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与文化　福永光司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2
中国中世纪佛教的发展　山崎宏　清水书店　1942;法藏馆　1971
隋唐佛教史的研究　山崎宏　法藏馆　1967 增订版
大唐求法行历研究(上、下)　小野胜年　法藏馆　1982—1983
隋唐佛教史的研究　道端良秀　法藏馆　1957、1980
慈觉大师传之研究　佐伯有清　吉川弘文馆　1986
道教的基础研究　福井康顺　理想社　1952
唐代佛教史论　滋野井恬　平乐寺书店　1973
五代宗教史研究　牧田谛亮　平乐寺书店　1971
唐五代禅宗史　铃木哲雄　山喜房佛书林　1985
唐五代的禅宗——江西·湖南篇　铃木哲雄　大东出版社　1985
唐中期的净土教　塚本善隆　法藏馆　1980
唐天台学绪论　日比正宣　山喜房佛书林　1966
唐代天台学研究　日比正宣　山喜房佛书林　1975
天台实相论的研究　石津照玺　弘文堂书店　1947

敦煌佛教资料　西域文化研究会　法藏馆　1959
敦煌和中国佛教　牧田谛亮等　大东出版社　1984
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　镜岛元隆　大东出版社　1983
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　田中亮昭　大东出版社　1983
续高僧传考——净土三祖传　野上俊静　安居事务所　1959
大唐西域记研究　足立喜六　法藏馆　1963
智顗　田林芳朗　新田雅章　大藏出版　1982
一行禅师的研究　长命和雄　神户商科大学经济研究所　1963
玄奘　桒山正进　袴田正昭　大藏出版　1981
慧能　古田绍钦　田中良昭　大藏出版　1982
三藏法师的旅行　杉木茂春　大阪编集二房　1986
玄奘三藏　前岛信次　岩皮书房　1952
玄奘三藏　兼子秀利　人物往来社　1967
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　杉本直弘郎　育芳社　1946
唐代文化的考察——阿倍仲麻吕研究　今枝二郎　高文堂　1979
鉴真大和尚传的研究　安藤更生　平凡社　1960
鉴真和尚　安藤更生　弘文馆　1967
唐大和尚东征传的研究　藏中进　樱枫社　197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四卷）　小野胜年　铃木学术财团　1964—1969
圆珍　人物丛书　佐伯有清　吉川弘文馆　1990
大乘佛典（中国日本篇）最澄　圆珍　木材　尧央译　中央公论社　1990
入唐求法行历研究（上、下）　小野胜年　法藏馆　1982—1983
入唐巡礼行记　深谷宪一译　中央文库　1990
中国佛教制度史的研究　诸户立雄　平河出版社　1990
隋唐道教史的研究　砂山稔　平河出版社　1990
道教与隋唐的历史·社会　砂山稔　平河出版社　1986
唐代教育史的研究　多贺秋五郎　不昧堂书店　1953
隋书经籍志详考　兴善宏　川合康三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的史学思想　金井之忠　弘文堂　1940

中国·历史·命运——史记与永通　大滨浩　劲草书房　1975
史通——唐代的历史观　增井经夫　平凡社　1966
贞观政要研究　原田种成　吉川弘文馆　1965
唐代音乐史研究(上、下)　岸边成雄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0、1961
唐代音乐的国际性　岸边成雄　东洋音乐会　1968
中国画论的开展——晋唐宋元篇　中时茂夫　中山文华堂　1965
隋唐美术　水野清一等　平凡社　1954　本书为《世界美术大系》第20卷
隋·唐——世界美术全集15　中国4　小野胜年　角川书店　1961
敦煌画之研究　松木荣一　同朋舍　1985
敦煌舞蹈的解读研究　水源渭井　朋友书店　1985
龙门石窟的研究　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　座右室刊行会　1941
唐代字音的研究　大岛正二　汲古书院　1982
唐宋俗字谱　太田辰夫　汲古书院　1982
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天野元之助　角川书店　1963
汉唐古俗与明器土偶　小林太市郎　一条书房 1947
唐代的服饰　原田淑人　东洋文库　1970
唐宋的青瓷　小山富士夫　平凡社　1957
唐宋的白瓷　小林太市郎　平凡社　1959
唐三彩　水野清一　平凡社　1961
唐昭提市　安藤更生　美术出版社　1969
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　青山定雄　弘文馆　1969
唐镜大观　梅原末治　同朋社　1984
中国的考古学·隋唐　风崎敬　同朋舍　1987
贸易陶瓷——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瓷　京都　同朋舍,1993
正仓院文书和木简之研究。东野冶之　东京　书房　1979

（二）论文

一、政 治

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　渡边信一郎　历史评论 504　1992

隋末动乱中的官僚群　小笠原正治　史潮 43　1950

隋末之乱和唐朝的成立　铃木俊　史渊 53　1952

七世纪初中国的内乱　横田滋　东洋史研究 12—4.5　1953

隋代江南的动向　气贺泽保规　鹰陵史学 2　1976

高颖和隋的政界　谷川道雄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　1968

炀帝的第一次高句丽远征军　浅见直一郎　东洋史研究　44—1　1985

窦建德集团和河北——关于隋唐帝国的性格　气贺泽保规　东洋史研究　31—4　1973

关于隋末唐初诸反乱的评价　气贺泽保规　东洋史苑 13　1978

隋唐革命管见　布目潮沨　镰田博士还历纪念历史学论丛　1967

关于隋唐政治史的二三问题　谷川道雄　东洋史研究 34—3　1975

唐朝创立期的一考察　布目潮沨　东洋史研究　25—1　1966

玄武门之变　布目潮沨　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16　1968

武德、开元年间的谋反和谋大逆事件　浜口重国　山梨大学学艺部研究报告 15　1965

贞观政风的一研究　谷川道雄　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诸问题　1987

武周政权成立的前提　横田滋　东洋史研究　14—4　1956

武周政权论　松浦千春　集刊东洋学 64　1990

从武后朝末年到玄宗朝初年的政争　谷川道雄　东洋史研究 14—4　1956

则天武后的拥立　松井秀一　北大史学 11　1966

则天武后的基本政治策略和科学出身宰相的活跃　西村元佑　龙谷史坛 72　1977

协助武周革命的佛教宗派　任大熙　纪要　（茨城大学人文系）23

1990

则天武后肃清皇族的一例　田村孝弘　龙谷史坛 98　1991

安史之乱的性格　谷川道雄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 8　1954

安史之乱后的政治以及官僚的对立抗争　筑山治三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9　1967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　松井秀一　史学杂志 66—2　1957

唐中期江南的农民反乱——以袁晁之乱为中心　西川素治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4　1974

甘露之变始末——唐代政治史的一段　横山裕男　长野大学纪要 5　1975

唐代后半期的诸问题　中川学　社会经济史学 31——1、2、3、4、5　1966

庞勋之乱　谷川道雄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 4　1956

黄巢之乱　善峰宪雄　东洋史研究 14—4　1956

黄巢之乱　堀敏一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　1957

唐末诸叛乱的性格　谷川道雄　历史教育 11—4　1963

唐末五代的农民斗争——对唐末农民战争的评价　西川素治　骏台史学 33　1973

唐末藩镇的跋扈和镇将(1—4)　日野开三郎　东洋学报 26—4　1939；27—1.2　1940

唐代的藩镇　谷川道雄　史林 35—3　1952

对唐末五代政治史研究的一视点　大泽正昭　东洋史研究 31—4　1973

关于唐末五代政治史的诸问题——以藩镇研究为重点　伊藤宏明　研究论集(名大·文)史学 29　1983

唐朝对藩镇的政策——河南顺地化的过程　辻正博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诸问题　1987

唐朝后期对江淮的统治　中砂德明　东洋史研究　47—1　1988

唐末淮南高骈的藩镇体制和黄巢徒党的关系——以新罗末的崔致远的《桂苑笔耕记》为中心　周藤吉之　东洋学报　68—3.4　1987

唐末的藩镇和中央权力——以德宗、宪宗朝为中心　大泽正昭　东洋史研究 33—2　1973

河朔三镇节度使权力的性格　谷川道雄　研究论集(名大·文)74　1978

唐末的政治和民众叛乱　筑山治三郎　洒井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历史上的民众和文化　1982

魏博天雄军的历史——唐五代武人势力的形态之一　崛敏一　历史教育 6—6　1958

安西四镇的创建　伊濑仙太郎　史潮 11—4　1941

咸亨长寿年间的安西四镇　伊濑仙太郎　史学杂志 54—7　1945

金山都护府　伊濑仙太郎　东洋学报 30—3　1943

第一代碛西节度使的始末(上、下)　佐藤长　东洋史研究 7—6,8—2　1948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4)　藤枝晃　东方学报(京都)12—3、4;13—1、2;1942、1943

关于碛西节度使(1、2)　伊濑仙太郎　历史学研究 14—12　1944

河西史的基础结构　前田正名　东京教育大学　东洋史研究室东洋史学论集　1953

从铁卷授受现象看君臣关系——以唐、五代为中心　栗原益男　史学杂志 65—6、7　1956

关于君臣之间铁卷誓约的内容——以唐、五代为中心　栗原益男　史学杂志 71—7　1962

唐末五代小史　田中整治　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第一部 B)15—1　1964;16—1　1964

五代宋初节镇表——以同州节镇为例　栗原益男　史学杂志 68—1　1959

五代宋初藩镇年表　栗原益男

——曹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10　1965

——澶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12　1967

——贝州陈州二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13　1968

——宋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15　1970

——安州随州二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18　1973
——晋州金州宿州三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20　1975
——邓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21　1976
——兖州藩镇的情况　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历史篇) 1977
——邢州藩州的情况　上智史学 22　1977
——青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23　1978
——泾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24　1979
——耀州(崇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26　1981
——相州藩镇的情况　上智史学 30　1985
华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和武臣　西川正夫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 1 卷　1967
吴越国的建国过程　渡边道夫　史观 56 册　1959
吴南唐两王朝的国家权力的性质——宋代国制史研究之一　西川正夫　法制史研究 9 号　1959
淮南藩镇的成立过程——吴南唐政权的前提　伊藤宏明　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 4　1976

二、典章制度

关于隋代乡官的废止　浜口重国　史学杂志　51—7　1940
对隋代乡里制的一考察　气贺泽保规　史林　58—4　1975
唐代的地方行政与地方官　筑山治三郎　古代文化 29—8　1977
唐代后半期的地方行政体系　郑炳俊　东洋史研究 51—3　1992
唐代京兆尹及其统治　筑山治三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7　1965
唐代的县尉　砺波护　史林 57—5　1974
唐代的乡——从元和郡县图志来看　中村治兵卫　铃木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64
再论唐代的乡——望乡与耆老　中村治兵卫　史渊 96　1966
唐代的邻保制度　仁井田升　历史学研究 6—10　1936
唐代邻保制度释疑　那波利贞　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　1950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的邻保制　松木善海　西域文化研究 6　1963

唐代乡党制的研究　志田不动麿　社会经济史学　5—11　1936
唐代均田制下的佐史里正　船越泰次　文化　31—3　1968
唐代地方官僚的迁转和考课　筑山治三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3　1961
唐代的胥吏　筑山治三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5,1963
唐代州刺史研究　长部悦弘　奈良史学 9　1991
五代的知州　清木场东　东方学 45　1973
五代地方行政的军队　烟地正宪　东方学 43　1972
"使"制的产生　矢野主税　史学研究 12—2　1940
三司使的成立——唐宋的变革和使职　砺波护　史林 44—4　1959
唐代使院的僚佐和辟召制　砺波护　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 2　1973
关于唐代"使"的本官　松岛才次郎　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 19　1968
五代租庸使的设立及其性质　室永芳三　东洋学报 53—3、4　1971
藩镇亲卫军的组织与性质　矢野主税　长崎大学学艺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3　1953
藩镇亲卫军的权力构造　堀敏一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20　1960
五代节度使的统治体制(上、下)　周藤吉之　史学杂志 61—4、6　1952
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　矢野主税　史学杂志 63—10　1954
唐代枢密使制的发展　矢野主税　长崎大学学艺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4　1954
唐代监军使制的确立　矢野主税　西日本史学 4　1953
唐末监军使制　矢野主税　社会科学论丛 7　1957
唐代内侍省的宦官组织——高品层和品官、白身层　室永芳三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　1987
对隋炀帝时期府兵制的一点考察　气贺泽保规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1986
唐府兵制国家和府兵制　谷川道雄　同上
府兵制度的起源　浜口重国　史学杂志 46—7　1935
唐折冲府和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　菊池英夫　史渊 68　1953
唐代府兵制中府兵的地位　气贺泽保规　中国中世史研究京都大学术学出版会 1995

关于唐折冲府的分布问题的一点解释　菊池英夫　东洋史研究27—2　1968

唐代折冲府等级与西州折冲府等级的记录(一)、(二)、(三)　白须净真　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　67、68、69

唐代卫士番上的负担　布目潮沨　山本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72

唐府兵制的成立过程和北衙禁军的起源　菊池英夫　东洋史学13　1955

唐府兵负担考——从律令法规来看　石田勇作　上智史学24　1979

再论唐代卫士番上的负担——石田勇作"唐府兵负责考"一文读后　布目潮沨　立命馆文学418、421　1980

唐均田法时代的兵士的身份与特权　曾我部静雄　历史教育86—6　1960

唐代翊卫考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28　1965

唐代防丁考　玉井是博　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40

大唐府兵制时代的团结兵　日野开三郎　法制史研究5号　1955

唐代兵募的性质和名称　菊池英夫　史渊67、68　1956

关于彍骑　粟原益男　上智史学10　1965

长征健儿制成立的前提　粟原益男　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72

府兵制的崩坏与新兵种——兼论唐朝前期统治崩坏的若干问题　粟原益男　史学杂志73—2、3　1964

神策军的成立　小畑龙雄　东洋史研究18—2　1959

神策军的发展　小畑龙雄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　1968

神策军的二面性　西川恭司　东洋史苑16　1980

神策禁军的发展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论集(三一书房)　1980

唐的防秋兵和防冬兵　曾我部静雄　东洋学42、43　1978、1980

唐代边防机构中的守捉、城、镇等的建立过程　菊池英夫　东洋史学(九大文学部)27　1964

唐天宝时期的边军兵马数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31—2　1990

唐天宝初期的边军资料(三)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

31—4 1991

唐天宝初期的边军资料(四) 清木场东 同上 33—3 1992

唐天宝初期的边军资料(五) 清木场东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对敦煌发现〈算书〉中所记载的军制模式的考察研究 菊池英夫 纪要(中央大学文学系·史学)35 1990

唐军防令和烽燧制度 仁井田升 法制史研究 4 1953

唐代蒲昌府文书的研究 日比野丈夫 东方学报(京都)33 1963

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代府兵制的运用 菊池英夫 东洋学报 52—3、4 1969 1970

节度使制度确立之前"军"制度的展开 菊池英夫 东洋学报 44—2、45—1 1961 1962

新出吐鲁番唐代军制关系文书试释——开元三年四月西州营诸队火别请受马料帐 菊池英夫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 27—1 1979

关于西域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军制关系的用语"团"菊池英夫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五代禁军中侍卫亲军司的成立 菊池英夫 史渊 70 1956

五代后周禁军改革的背景——世宗军制改革前史 菊池英夫 东方学 16 1958

唐五代藩镇的押衙(上) 波边孝 社会文化史学 28 1991

唐五代的衙前称号 渡 边孝 东洋史论 6 1988

关于唐五代都将的记录(上) 伊藤宏明 研究论集(名古屋大学文学系)113 1992

试论隋唐律令法体系的历史地位 菊池英夫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吉川弘文馆 1986

隋代的奏抄式与奏授告身式 史学研究室报告 5 1986

关于隋代的露布式 中村裕一 史学研究室报告 5 1986

《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 仁井田升 东方学报 1—2 1931

唐律中刑法总则的规定 小野清一郎 国家学会杂志 54—2 1938

唐律的刑罚 奥村郁三 大阪市立大学法学杂志 8—2

唐代裁判手续法 奥村郁三 法制史研究 10 1960

建中三年重杖 处死法考 川村康 池田论集 1992

唐五代杖杀考　川村康　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17　1982

关于唐职制律中"上书奏事犯讳之条"　布目潮沨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吉川弘文馆　1986

唐代婚律立嫡违法案　冈野诚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唐律和日本律的比较研究　曾我部静雄　历史教育11—5　1963

根据缘坐对日本和中国的法进行的对比研究(一)、(二)、完　松田惠美子　法学论丛　127—2、6　1990

唐令复原研究序说——以户令和田令为重点　菊池英夫　东洋史研究31—4　1973

对逸文中所见令的若干考察　栗原益男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吉川弘文馆　1986

唐令逸文拾遗——以太平御览所引的唐令为中心　中村裕一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关于〈令集解〉中引用的唐令　坂上康俊　九州史学85　1986

〈令集解〉所引用的唐的格、格后敕　坂上康俊　史渊128　1991

唐永徽职员会的复原——斯1144b的剥离结果冈野诚　东洋法史1987

敦煌发现唐公式令残卷的制作年代　中村裕一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敦煌发现的唐公式令残卷的错字和漏字　中村裕一　汲古19　1991

唐令和养老令　汤浅幸孙　中国——社会与文化6　1991

僧尼令杂考(一)　秋月观瑛　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学)4　1990

关于唐户令中有关乡里　坊村、邻保条文的复原　堀敏一　中村论丛1986

律令制与乡里制　中村治兵卫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1986

关于律令里制的特性　佐佐木惠介　史学杂志95—2,1986

唐令和日本令　池田温　池田论集　1992

唐律令和日本　大津透　思考古代——唐和日本　1992

仪制令和律令国家　大隅清阳　池田论集1992

唐代制书式的起源　中村裕一　史学研究室报告5　1986

关于唐代的墨勅　中村裕一　同上
关于唐代的墨勅　除官　中村裕一　同上
关于唐代制书的用途　中村裕一　同上
唐代的诏书和制书　中村裕一　同上
唐乾封二年诏授告身二种　中村裕一　同上
关于隋唐五代的“致书”文书　中村裕一　同上
关于唐代的慰劳制书　中村裕一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1986
日本僧园珍带来的唐公文书　菊池英夫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唐代〈议〉的文书考察研究　中村裕一　布目论集　1990
唐官制的叙任与行、守　滋贺秀三　法制史研究 39　1990
唐代官僚的犯赃与行罚　筑山治三郎　社会文化史学 14　1977
唐代诏狱的存在情况(上、下)　室永芳三　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 26、27，1977、1978
唐末内侍省鞠狱的性质与机能　室永芳三　长崎大学教育部社会科学论丛 28　1979
敦煌吐鲁番发见唐代法制文献　池田温　冈野诚　法制史研究 27 1978
敦煌资料和唐代法典研究　冈野诚　敦煌汉文文献　大东出版社 1992
唐代的鸿胪寺和鸿胪客馆　石见清裕　古代文化 42—8　1990
唐代外国使的皇帝谒见仪式复原　石见清裕　史滴　12　1991
唐诸帝号考(上)　户崎哲彦　彦根论丛 264　1990
古代中国的君主号和“尊号”　户崎哲彦　彦根论丛 269　1991
来源于唐代君主名号制度的“尊号”及其别称　户崎哲彦　彦根论丛 270、271　1991
唐代帝祫论争及其意义　户崎哲彦　东方学 80　1990
中国古代大丧中的“大行”之称　户崎哲彦　史学杂志 100—9　1991
唐太宗——睿宗的郊庙亲祭　金子修一　中国的都市和农村　1992
玄宗朝的皇帝亲祭　金子修一　池田论集 1992

唐玄宗的谒庙之礼　金子修一　山梨大学教育系研究报告 42　1992

关于唐朝皇家的谒庙——皇帝·皇太子·皇后　金子修一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唐长安的礼仪空间　妹尾达彦　东洋文化 72　1992

仪式中唐礼的祭受　古濑奈津子　池田论集　1992

盐池中的国家祭祀　妹尾达彦　中国史学 2　1992

唐的礼制和日本　大隅清阳　思考古代——唐和日本　1992

中国的郊祀和日本的大尝祭　佐野公治　中国——社会与文化 7　1992

唐和日本的一年例行活动　丸山裕美子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隋代废止辟召制与都市　长部悦弘　东洋史研究 44—3　1985

唐代官僚的仕官与选授　筑山治三郎　人文(京都府立大)12　1960

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为中心　爱宕元　东洋史研究 35—2　1976 年

唐代"选"的构造和机能　根本诚　史观 79　1969

唐代选举制的诸问题——以吏部科目选为中心　松本明　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　1975

关于唐开元二十四年礼部贡举　七野敏光　关西大学法学论集 362　1986

唐代科举制度与长安的及第礼仪　妹尾达彦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1986

唐代早期的选举　P·A·贺伯特　阪大语言文化研究 7　1986

唐代的吏部科目选　乌谷弘明　立正史学 71　1992

唐代进士试的考试时间　大野仁　布目论集 1990

唐代御史制度　八重津洋平　法和政治 21 卷 3 号、22 卷 3 号　1970 年、1971 年

关于唐代的赐(一)——语义用法——　清木场东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　仁井田升　东方学报(东京)10 册 1 号　1939 年

唐的封爵　松岛才次郎　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 20 号　1969 年

唐代封爵制拾遗　今堀诚二　社会经济史学 12—4　1942
唐的食封　松岛才次郎　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 21 号　1969 年
唐朝前半期的食封制　山根清志　史学研究 505 号　1982 年
唐代食封制再考　砺波护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汲古书院 1986
唐代的勋官　松永雅生　西日本史学 12 号　1962
唐代前半期勋官的相对价值的消长与绝对价值　西村元佑　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 8 号　1979
唐代的衔的发展　根本诚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 8 辑 1963
唐代官僚的免官和除名　筑山治三郎　园田学园女子大学论文集 3 号 1968
唐代官僚的旬假　根本诚　史观 59 册　1960
唐代量移考　岛善高　岛田正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　1987
唐代的给事中和封驳　筑山治三郎　镰田博士　还历纪念历史学论丛 1969
唐代内侍省内养小论　室永芳三　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 43 1991
唐内侍省知内侍省事　室永芳三　同上 40　1990
唐代内诸司的结构　赵雨尔　东洋史研究 50—4　1992
唐代的飞龙厩和飞龙使　赵雨尔　史林 74—4　1991
唐代后半期延英殿的机能　松本保宣　立命馆文学 516　1991
借位的起源及其机能　加藤顺一　法学研究 64—1　1991
唐代贬官考　辻正博　东方学报(京都)63　1991

三、经济

唐陆龟蒙耒耜经和曲辕犁的成立　渡部武　东洋史研究 48—3　1989
〈耒耜〉管窥　大泽正昭　堀敏一先生　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华北的谷物生产和经营　大泽正昭　史林 64—2　1981
唐代的蔬菜生产和经营　大泽正昭　东洋史研究　42—4　1984
唐宋畬田考　大泽正昭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

度文化史的诸问题　1987
六—七纪记吐鲁番盆地的谷物生产——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农业生产的一侧面　野田隆吉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江南的水稻生产和经营　大泽正昭　中国史像　1983
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　北田英人　历史中的自然　岩波书店　1989
中国江南的潮汐灌溉　北田英人　史朋 24　1991
新唐书地理志中有关农业水利的记事——唐代水利史料研究之一　佐藤武敏　中国水利史研究 1　1965
唐代的水利灌溉设施及其管理——谦论关中的农业生产　西冈弘晃　中村学园研究纪要 6　1973
关于农田水利的规章　那波利贞　史学杂志　54—1、2、3　1943
唐宋时代的水利权　仁井田升　史学杂志 43—7　1932
敦煌发现唐水部式的研究　仁井田升　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1937
敦煌发现唐水部式残卷译注　佐藤武敏　中国水利史研究 2　1967
唐代地方水利设施的管理　佐藤武敏　中国水利史研究 3　1967
敦煌发现的唐水部残卷　佐藤武敏　东洋研究（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73　1985
唐代的渔业政策和鱼类流通　中村治兵卫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史学科 20　1975
唐代的渔法和渔具　中村治兵卫　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　山川出版社　1975
唐宋时代绢织物的规格　佐藤武敏　东洋学 31　1974
唐代绢织物的产地　佐藤武敏　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25—10　1973
唐代的木棉生产　日野开三郎　佐贺龙谷学会纪要 18、19　1973，收入日野论集 9　1984
朝霞锦考　东野治之　遣唐使与正仓院　岩波书店　1992
唐代井盐考　古贺登　史观 53　1958

续唐代井盐考——新唐书食货志中的记载　古贺登　史观 57、58　1959
唐宋时代的铜钱　桑原骘藏　东洋文明史论丛　弘文堂　1934，收入桑原全集 2。
唐代的钱货问题　金井之忠　文化 4—3　1937
唐五代的货币和金融　日野开三郎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 5　三一书房　1983
开元通宝的读法　曾我部静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日本·中国古代的汇兑制度　宫崎道三郎　宫崎先生法制史论集　岩波书店　1929
唐宋时代的短陌和货币经济的特质　宫泽知之　史林 71—2　1988
对短陌惯行的重新探讨　井上泰也　立命馆文学 475、476、477　198.5
唐代的柜坊　曾我部静雄　文化 10—12　1943
唐宋时代的草市　曾我部静雄　社会经济史学 24—1　1958
唐代的市制和行　以长安为中心　佐藤武敏　东洋史研究 25—3　1966
唐代堰埭草市的发展　日野开三郎　东方学 33　1967
唐代商业的一考察——关于高利贷　佐藤圭田郎　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论集　1979
中国古代物价的一考察——以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层为中心　池田温　史学杂志 77—1、2　1968
唐代的名茶及其流通　布目潮沨　小野论集　1982
唐代的茶商和飞钱　宫崎道三郎　宫崎先生法制史论集　岩波书店　1929
唐代的盐商　横山裕男史林 43—4　1960
唐宋时代南北经济交通及南下兑票类　幸彻　九州大学教养部历史学地理学年报 11　1987
唐宋时代南北商业流通和证券类　幸彻　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中国书店　1993
唐宋时代的保证和抵押制度　仁井田升　中川法制史研究 2
唐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地主制　草野靖　历史学研究 292　1964

唐代河北藩镇下的商业发展　畑地正宪　田崎论集　1987
唐牙人考　林高郎　史学8—1　1929
唐宋牙人考补正　林高四郎　史学8—3　1929
论唐代的捉钱户　横山裕男　东洋史研究17—2　1958
唐宋间消费文书之我见　堀敏一　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
敦煌的便谷历　池田温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的诸问题　中国书店　1987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　仁井田升　西域文化研究3　1957
吐鲁番出土举钱契杂考　石田勇作　骏台史学78　1990
论唐宋时代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　石桥五郎　史学杂志　12—8、9、11　1901
大谷·吐鲁番文书复原二题　大津透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7)　1990
唐宋汴河考　青山定雄　东方学报(东京)2　1931
唐代的输送法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9—2　1988
唐代的东南漕路(一)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9—3　1988
(二)黄河渭水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30—1　1989
唐代的水陆运费　清木场东　东洋史研究50—3,1991
首都长安食粮调达中的陆运　清木场东　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
唐宋的陆运　清木场东　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中国书店　1993
唐代对西域运输布帛与客商的活动　荒川正晴　东洋学报73—3、4　1992
唐代的驿和邮　青山定雄　史学杂志55—6、7　1944
长行马文书　藤枝晃　墨美　60、1956
吐鲁番出土北馆文书　大庭修　西域文化研究6法藏馆1959
唐河西以西的传马坊和长行坊　荒川正晴　东洋学报70—3、4　1989
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　荒川正晴　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　79—83
隋的统一和运河的开凿　小岛市太郎　史学研究4　1950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　青山定雄　历史教育 2—6　1954
唐代交通发达的历史地理之考察　小关尚志　地理学 9—9、12　1940
对黄巢入广州路线的一考察　原胜己　山下先生还历祝贺纪念东洋史论丛
唐代的泥婆罗道　足立喜六　支那佛教史学 3 卷 1 号　1939
帕米尔的交通路线　酒井敏明　史林 45—5　1962
唐代的水路工事　青山定雄　东亚论丛 5　1941
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路线　日野开三郎　历史学研究 11—6　1941
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路线　佐藤长　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 01977
唐代青海——拉萨之间的道程　佐藤长　东洋史研究 34—1　1975
吐蕃统治时期的东西交通——关陇朝贡道的断绝及西域朝贡使　白须净真　东洋史苑 6 号　1973
唐刘元鼎的入藏路　佐藤长　佛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 8　1980
日唐交通和江浙的港浦、海岛　安藤更已　史观 37　1952
唐宋时代都市的发展和镇　日野开三郎　史学杂志 49—7　1938
唐代的畿内和京城四关　砺波护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唐代京兆府的户口变迁　爱宕元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1986
国际都市长安　池田温　遣唐使与正仓院　1986
日唐都城比较制度试论　北村优季　池田论集　1992
唐的长安城　平冈武夫　东洋史研究 11—4　1952
唐长安城的东南部　福山敏男　古代学 2—4　1953
唐代两京乡里村考　爱宕元　东洋史研究 40—3　1981
唐代长安的街西　妹尾达彦　史流 25　1984
唐长安的闹市　妹尾达彦　史流 27、30　1986、1989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　妹尾达彦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的诸问题　中国书店　1987
唐长安店铺选择地点与街西的致富潭　妹尾达彦　布目潮沨　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　汲古书院　1990

中晚唐时代华清宫的零落　竹村则行　文学研究(九州大学)87　1990

唐代长安城的沙堤丸山茂　沼尻博士退休纪念中国学论文集　汲古书院　1990

唐代的洛阳和洛水　伊藤武敏　中国史研究(天野元之助先生追悼号)　1980

关于则天武后的明堂　金子修一　律令制一中国朝鲜的法和国家　1986

隋的东都洛阳与《大业杂记》中村裕一　布目论集　1990

东都洛阳宫明福门附近的情况　松本保宣　立命馆文学 519　1991

关于武则天的〈神都〉充实政策的几个问题　山根清志　中国古代的都市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　爱宕元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唐代的扬州城及其郊区　爱岩元　中国近世四都市和文化　1984

唐宋时代的苏州　砺波护　中国近世四都市和文化　1984

汉代的里制和唐代的坊制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 21—3　1962

泉州刺桐城考　爱宕松男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集　1968

唐代泉州城沿革小考——Zuitun(刺桐)的起源问题　川越泰博　古代文化 25—10　1973

唐宋时代的浙江都市变迁　伊原弘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委史学科 24　1979

江南都市形态的变迁　伊原弘　宋代的社会与文化　汲古书院　1983

唐代的广东　中村久四郎　史学杂志 28—3、4、5、6　1917

广东——商胡和沟通广东长安的水路航运交通　中村久四郎　东洋学报　10—2　1920

唐代四川地域社会的变化及其特点　佐竹靖彦　东洋史研究 44—2　1985

唐末五代时期城郭的大型化　爱岩元　东洋史研究 51—1　1992

庭州的位置　长泽和俊　史学杂志 65—12　1956

唐代的伊州　前田正名　历史教育 11—4　1963

唐代沙州敦煌县城的位置　菊池英夫　史朋 13　1981

新出敦煌石室遗书——关于寿昌地境　森鹿三　东洋史研究 10—2

1948

唐都长安的王室庭园　村上嘉实　人文论究　6—6　1955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地的第三次发掘　三上次男　历史学研究 3—1 1934

石刻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之研究　何士骥　考古学报 1—1　1935

唐长安都城的起源小考　骑井和爱　人类学杂志 57—3　1942

裴垍的税制改革　松井秀一　史学杂志 76—7　1967

唐后半期的中央财政　渡边信一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 40 1988

唐后半期的地方财政　渡边信一郎　中国专制国家和社会的统合　京都文理阁　1990

唐日律令地方财政管见　大津透　笹山晴先生还历纪念·日本律令制论集(上)吉川弘文馆　1993

唐律令国家的预算　大津透　史学杂志 95—12　1986

唐代前期仓的管理和运算　宫园和禧　九州共立大学纪要 8—2　9—1 1974

唐水部式中的北太仓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史大学)29—3 1988

唐含嘉仓砖的分类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30—3 1989

唐仓砖的机能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30—3　1989

从砖铭探讨唐太仓的构造　清木场东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　刀水书房　1990

唐代的东渭桥和东渭桥仓　爱宕元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2 1986

三司使的成立　砺波护　史林 44—4　1961;收入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　同朋舍　1986

三司使考补说　室永芳三　史渊 82　1960

再论第五琦就任盐铁使和榷盐的开始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 26 1963;日野论集 3　三一书房　1981

两税法成立期的财务行政制度　日野开三郎　日野论集 3　1981

唐代盐铁转运使中使职的继承　铃木正弘　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 5　1992

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　青山定雄　史学杂志 44—9　1933

五代租庸使的成立及其性质　室永芳三　东洋学报 53—3、4　1971

五代节度使府的粮料使　室永芳三　东方学 21　1961

五代的北面转运使　室永芳三　史渊　89　1962

关于巡院的设立　高桥继男　集刊东洋学 28　1972

唐代后期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系统的巡院设置　高桥继男　集刊东洋学 30　1972

唐代的地方盐政机构　高桥继男　历史 49　1976

唐代后半期巡院的地方行政监察业务　高桥继男　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　1978

唐后半期的巡院和漕运　高桥继男　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36—8　1982

唐后半期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系统巡院名增补考高桥继男　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39—11　1986

唐后半期官界中知院官的位置　高桥继男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中期巡院和盐政的考察　小西高弘　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 16—2、3、4　1972

敦煌的土地税役制　池田温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 7）　1990

唐代丁中制的研究　铃木俊　史学杂志　46—9　1935

唐代的计帐　铃木俊　史渊 45　1950

唐代差役考　松永雅生　东洋史学 15　1956

徭役制的成立（1、2）　青木和夫　史学杂志　67—3、4　1958

敦煌差科簿的研究　西村元祐　西域文化研究 3

均田法中女子的力役　曾我部静雄　文化 33—4　1970

唐代赋役制度新考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　14—4，1956

唐代赋役制度探讨备忘录　古贺登　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

会的关系　刀水书局　1984
唐代赋役制度的再检讨——品子、荫免子注、勋官、散官的负担　古贺登　律令制 1986
唐代赋役制下官贱民的负担　古贺登　中村论丛　1986
唐代赋役制度的再检讨——白丁、中男、残疾、丁匠、散乐的负担　古贺登　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　中国书店　1987
唐律令制下的力役制度——日唐赋役令管见　大津透　东洋文化(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68　1988
唐代籍帐制度试考　樋口知志　研究年报(北大学附属图书馆)20　1987
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庸调布与租布　仁井田升　东方学报(东京)11—1　1940
论唐代的税制　丰崎卓　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 4　1954
论唐代的户税与青苗钱的关系　铃木俊　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东京座右宝刊行会　1940
唐代的户税与均田制　铃木俊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1　1955
唐代的户税、地头钱和青苗钱的本质　曾我部静雄　文化 19—1　1955
均田制下户等的意义　松永雅生　东洋史学 12　1955
唐中期户税的研究　周藤吉之　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
论唐代赋役令中的岭南税米　日野开三郎　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寿纪念论集·律令制的诸问题　1984
《通典》所载天宝某载户税收入的再探讨　古贺登　东方学会创立 40 周年东方学论集　东方学会　1987
唐代的地税　滨口重国　东洋学报 20—1　1932
唐玄宗朝的江淮上供米和地税的关系　浜口重国　史学杂志 45—1、2　1934　以上两文均收入《秦汉隋唐史研究》下卷　东大出版社　1966
唐地税的展开　古贺登　东方学会创立 35 周年纪念　东方学会　1972
两税法前的唐代资课　松永雅生　东方学 14　1957
唐代租庸调制度下的勾征　日野开三郎　东洋学报 45—2　1962
唐代两税法的地域性　古贺登　东方学 17　1958

唐代两税法的系谱　日野开三郎　历史教育　12—5　1964

两税法研究史(一)、(二)　船越泰次　史学论集(山形大学)3、9　1983、1989

杨炎两税法的税额问题　日野开三郎　东洋学报 38—4　1956

唐代两税法的分收制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 16、17　1956

唐代的夏税秋税　铃木俊　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　富山房 1941

夏秋税的源流　古贺登　东洋史研究 19—3　1960

论两税法与户税地租的关系　曾我部静雄　集刊东洋学 2　1959

唐代两税法下的对象资产与赋税系列　日野开三郎　东洋学报 41—4 1959　日野论集 4

从户税一词看大历的夏秋税和两税的关系　日野开三郎　东方学 25 1963

两税法成立的由来和大历的夏秋税　日野开三郎　九州大学文学部创立 40 周年纪念论文集　1966　以上两文均收入日野论集 3

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　日野开三郎　史学杂志 65—7　1956　收入日野论集 4

唐末两税法的课税体系——以其变迁为中心　船越泰次　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 1　1984

建中初年的年支两税和两税解斗、两税钱　古贺登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汲古书院　1988

唐代两税法成立的诸问题　小西高弘　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 32—3、4 1988

唐代两税法的考察　同上　33—3、4　1989

元稹"同州奏均田状"浅释　船越泰次　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 5　1992

唐代商税考　日野开三郎　社会经济史学 30—6　1965

唐代的客商和杂税——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　小西弘高　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 24—2、3　1979

唐代埭程考　日野开三郎　史渊 100　1968;日野论集 12

唐的盐法　全井之忠　文化 5—5

唐的榷酤　金井之忠　文化 5—8

两税法以前的榷盐法　日野开三郎　社会经济史学 26—3　1960
唐的茶法　金井之忠　文化 7—6
唐代盐专实法的内容及其效果　妹尾达彦　立命馆文学　418—421　1980
唐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地点选定与机能　妹尾达彦　史学杂志 91—2　1982
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所在地的选定与机能　妹尾达彦　史林 65—6　1982
唐代贡品的分布状况　宫园和禧　九州共立大学纪要 17—1、2　1982
唐代的酒专卖制度　西冈弘晃　中村学园研究纪要 3　1970
唐后期的茶税制度和商业发展　西冈弘晃　中村学园纪要 4　1971
论唐代的和籴　铃木正　历史学研究 77、78　1940
唐代和籴　菊野恭子　御茶水史学 1　1958
唐天宝中的财政收支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7—4　1987
唐开元天宝中的转运米额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8—1　1988
唐律令时代的钱物支出体制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8—2　1988
唐律令时代的财政支出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7—2　1986
大谷吐鲁番文书复原二题　大津透　东亚古文书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 7)　1990
论唐律令国家的预算——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　大津透　史学杂志 95—12　1986
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补考　大津透　东洋史研究　49—2　1990
有关唐天宝时代河西边防军的经济史料　那波利贞　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 1　1952
唐代藩镇的出界粮　末田修一　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三阳社　1964

唐天宝初期的边军资料四　清木场东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34—3　1992

唐代月俸制的成立　横山裕男　东洋史研究　27—3　1968

官僚的俸禄和生活　筑山治三郎　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　风间书房1967

隋唐禄俸制研究(一)、(二)、(三)、(四)　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6—1、2、3　27—1　1985　1986;

唐代俸料制的诸原则　清木场东　东方学 72

《新唐书·食货志》内外官禄、月俸记事辨正　古贺登　中国正史的基础研究　早稻田　1985

唐前期料钱的调达　小西高弘　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　19—2、3　1974

唐律令制时代的常食料制　清木场东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　汲古书院　1986

隋唐禄高考　清木场东　法制史研究 37　1986

隋的貌阅与唐初食封　砺波护　东方学报 37　1966

唐朝租庸调时代食封制的财政史考察　日野开三郎　东洋学报 49—2　1966　收入《唐代租调庸的研究》Ⅲ　课输篇下

唐代食封制中的所谓七丁封户问题　山根清志　中嶋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上卷　汲古书院 1982

唐代食封制的一问题——关于七丁封户的争论　冈野诚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正史记载的唐天宝时代户数口数的关系　那波利贞　历史与地理 33—1、2、3、4　1934

唐贞观十三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 24　1961

隋唐宋三代户数的地域考察　青山定雄　历史学研究 30、31　1936

大唐天宝元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　日野开三郎　史林　42—4　1959

唐长安人口论　妹尾达彦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1995

唐代编户移动图　古贺登　中国的都市和农村　1992

敦煌等处发现唐宋户籍的研究　仁井田升　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关于唐代户籍与税制的关系　铃木俊　东亚 7—9

关于以玄宗时代为中心所见的唐代北方禾田地域之八九等户　日野开三郎　社会经济史学 21—5、6　1955

关于敦煌户籍的一男十女　古贺登　古代史 12—3　1966

貌阅考　曾我部静雄　东洋史研究 1—3　1945

宇文融的括户　铃木俊　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讲谈社 1951

唐朝的律令制与宇文融括户　砺波护　东方学报 41　1970

唐代均田法租庸调的反复公布和括户政策　中川学　一桥研究 9 1962

关于唐代逃户、浮客和客户的备忘录　中川学　一桥论丛 50—3　1963

关于唐宋客户的研究　中川学　一桥论丛 46—2　1963

唐代实行括户方式的变化　中川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 2　吉川弘文馆 1965

唐代前半期的括户政策中关于乐迁的规定　山根清志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古代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大唐玄宗的户口充实与课丁析出　松永雅生　史渊 73　1973

唐代剑南道山南西道的光火　榊良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1988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转换期制度上客户的租税负担　中川学　一桥研究 10　1966

走进中国客民的世界　中川学　一桥论丛 73—4　1975

唐代客户逃弃田的保留　中川学　一桥论丛 53—1　1965

论唐代的流庸　中川学　东洋史研究 26—2　1967

两税法制定以前客户的税负担　砺波护　东洋学报 43　1972

户籍制作年代与唐令　铃木俊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9　1957

现存开元年间籍帐之考察　池田温　东洋史研究 35—1　1976

从唐令看现存户籍的基础性研究　土肥义和　东洋学报 52—1，2 1969

唐末宋初敦煌地区户籍制度的演变　佐竹靖彦　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 30　1970

我对计帐户籍的看法　堀敏一　中国律令制　1984

唐代籍帐制度试考　榊口知志　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年报 20　1987

租庸调制与户等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 11　1954

均田制下唐代户等的意义　松永雅生　东洋史学 12　1955

西魏的户籍与唐差科簿之间的关系和课之意义的变化　曾我部静雄　东洋史研究 17—4　1958

唐律上的课役制度　仁井田升　中国法制史研究 2

课役的意义及沿革　滋秀贺三　国家学会杂志 63　1949

论唐代的课　松永雅生　史渊 55　1953

关于唐律令中课役一词　浜口重国　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纪念东洋学论丛　1974

唐代敦煌差科薄研究　西村元佑　西域文化研究 3

两税法以前唐代的差科　松永雅生　重松先生古稀纪念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　1957

唐代徭役制度考　小笠原宣秀　西村元佑　西域文化研究 3

唐律令制下的力役制度　大津透　东洋文化 68　1988

课役制和差科制　大津透　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　东方书店　1992

唐的白直及杂徭和各种特定的役务　浜口重国　史学杂志 78—2　1969

唐代的杂徭和番役　善峰宪雄　龙谷大学论集 404　1974

唐代差役考　松永雅生　东洋史学 15　1956

唐代均田制度　冈田巧　经济史研究 14—3　1935

唐代均田制度的地域性　古贺登　史观 46　1956

唐令中所反映的均田租庸制的关系　铃木俊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 2)6　1956

唐代均田制的施行文书——给田文书、退田文书、欠田文书的发现及其内容　西嶋定生　历史学研究　233　1959

唐代均田法、租庸调法的反复公布及括户政策　中川学　一桥研究 9　1962

关于均田制实行情况的问题　堀敏一　东洋学报　44—4　1962

均田制的成立　堀敏一　东洋史研究 21—1、2　1965

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简中“自田” 西川正夫 史学杂志 64—10 1955

敦煌籍帐上的自田 山本达郎 东方学 53 1977

敦煌大历四年手实中关于地段的记载 山本达郎 东方学 60 1980

唐天宝年间的户等及受田、垦田——从杜佑《通典·食货典·赋税》中的户租地租记事及其自注来看 西村元佑 龙谷史坛 79 1981

对敦煌地区均田制末期田上四至记载的考察 山本达郎 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 东方学论集 1972;东方学 46、48 1973 1974

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 土肥义和 坂本太郎博士颂寿纪念日本史论集 吉川弘文馆 1983

关于唐代敦煌均田制的考察研究 池田温 东洋学报 66—1、2、3、4 1985

敦煌发现唐代籍帐中所见的已受田的增减 山本达郎 东方学 70 1985

吐鲁番携来的唐代田制文书的理解 关尾史郎 集刊东洋学 61 1989

唐代敦煌均田制的田土给授文书 土肥义和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7 1990

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见 池田温 史滴 5 1984

《唐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的考察研究 竹浪隆良 骏台史学 78 1990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土地问题 小西高弘 福冈大学研究所报 16 1972

关于唐代两州租佃关系的一侧面 大金富雄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人 汲古书院 1995

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一考察 池田温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 山根清志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敦煌地区均田制之外的土地的存在 山本达郎 东方学 65 1983

从西域文书看唐代的租佃制——兼论均田制及其破坏过程 堀敏一 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 5 1967

吐鲁番佃人制中的二、三个问题 堀敏一 历史学研究 242 1960

吐鲁番发现的唐代租佃文书的二种形态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23　1961

唐代租佃文书私见　堀敏一　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　1963

佃人文书的一考察　小田义久　龙谷史坛 79　1981

中国古代的租佃契(上)(中)(下)　池田温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60、65、117　1973、1975、1992

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券的一考察　池田温　西嶋定生博士还历纪念·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　山川出版社　1984

中国古代契约文书整理　池田温　中国朝鲜文书史料研究　1986

吐鲁番敦煌契卷概观　池田温　汉学研究 4—2　1986

唐代土地的赁借与抵押、质入的关系——从租佃契约到典地契约的各种形态　堀敏一　东洋史研究 39—3　1980

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等文书记录　船越次泰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 7)　1990

对唐代屯田经营的一考察——以直接耕作者为中心　中村笃二郎　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　东洋史论丛　1953

唐代的屯田和营田　青山定雄　史学杂志 63—1　1954

天宝末年以前唐朝的军粮田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研究 21—1　1962

唐宋时代农田的存在形态(上、中、下)　草野靖　法文论丛 31、33　1972、1974;论丛 1985

唐前期的公田(职田、公廨田)　小西高弘　福冈大学研究所报 28　1977

唐朝庄园制的背景　中村笃二郎　历史教育　4—6　1956

唐末五代的庄园制　周藤吉之　东洋文化 12　1953

四、社　会

对于唐宋时代所谓的“雇佣劳动”的诸研究　菊池英夫　东洋学报 43—3　1961

唐末土豪的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　栗原益男　历史学研究 243　1960

唐代官僚的俸禄与生活　筑山治三郎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 14　1662

隋唐前期的统治阶层　吉冈真　史学研究 155　1982
隋唐时代的上层乡邑社会　矢野主税　第一经大论集 7—3、4　8—4　1978　1979
唐代前半期的乡望　杉井一层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唐代前期的贵族　松井秀一　历史教育 14—5　1966
唐朝氏族志的一考察——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　池田温　北海道大学　文学部纪要 13 卷 2 号　1965
唐后期的土豪　伊藤正彦　史潮 97　1966
唐代乐安孙氏研究　高桥彻　学习院史学 29　1991
唐末的变革与农民阶层的分化　堀敏一　历史评论 88　1957
白居易的惭愧　渡边信一郎　学术报告(京都府立大学)人文 36　1985
唐后期商人的入仕　高桥继男　东北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 17　1981
唐代两税法下农民的生活　筑山治三郎　社会文化史学 10　1974
唐代贱民、部曲的形成过程　浜口重国　山梨大学学艺部研究报告 3　1952
唐代的部曲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　越智重明　东方古代研究 11　1963
从部曲、客女到人力、女使　高桥芳郎　变革期亚洲的法与经济　1986
再论唐代法律中奴婢的地位　仁井田升　史学杂志 74—1　1965
唐代的奴婢买卖与市券　山根清志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中国古代的奴婢观　池田温　中村论丛　1986
对杂户制的一考察　新井喜久夫　日本历史 233、234　1967
从部曲到佃客——唐宋社会变革的一方面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 29—4　30—1　1971
关于唐代良贱制的几个问题　山根清志　历史评论 392　1982
唐律中的部曲　大泽正昭　奈良大学纪要 7　1978
关于唐代的逃户、浮客、客户的若干研究　中川学　一桥论丛 46—2　1963
“苔”、“仆”、“家族关系”　大泽正昭　中国专制 1990
律令贱民制的结构与特点　榎本淳一　池田论集　1992

唐的太常音声人和乐户——以杂徭与散乐的关系为重点　浜口重国　山梨大学学艺部研究报告 13　1962

唐代乐户的由来——兼论“部曲妻”、“客户”　浜口重国　山梨大学学艺部研究报告 14　1964

梁户考　那波利贞　支那佛教史学 2 卷 1、2、4　1938

敦煌的寺户　竺沙雅章　史林 44—5　1961

关于唐制陵户的考察研究　利光三津夫　长谷山彰　法学研究(庆应大学)65—5　1992

唐代行人考　那波利贞　东亚人文学报 3—4　1944

唐代的假子制　矢野主税　史学研究纪念论丛　1980

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以其和藩帅统治权力的关系为主　栗原益男　史学杂志 62—16　1953

唐玄宗的后宫妃嫔　那波利贞　古代文化 12—2　1964

唐室的后妃　松岛才次郎　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 23　1970

唐代的和蕃公主　日野开三郎　久留米大学论丛 27　1978

唐代和蕃公主的真假制与资装费　日野开三郎　隋唐帝国和东亚世界　1979

北朝隋唐时代胡族的通婚关系　长部悦弘　史林 73—4　1990

唐代家族制度概论　富木坚实　日本大学文学科研年报 6　1939

唐代法律中关于别籍异财的禁律　大冢胜美　北九州大学法政论集 8、3、4　1981

汉唐间的“家人之礼”　尾形勇　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系 23　1973

敦煌发现的唐宋婚烟法关系资料　仁井田升　史学杂志 49—7　1938

唐代聘财考　冈本午一　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　1950

敦煌发现的唐宋时代的离婚状　仁井田升　东方学报(京都)11—4　1941

唐代女训书“女论语”、“女孝经”考　山畸纯一　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 7　1979

唐代前半期长安公主宅的道观化　布目潮沨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有关执行“流”的若干问题　梅村惠子　池田论集　1992

目唐诏敕中对于节妇的旌赏　曾我部静雄　史林 57—2

唐代的葬制——唐代墓葬考序说　杉本宪司　末永先生古稀纪念古代学论丛　1967

唐代的陵寝和丧葬　筑山治三郎　古代文化 25—10　1973

唐代葬俗研究序说——以埋葬法为重点　西胁常记　东洋学术研究 18—3　1979

六朝唐代的幽婚讳　黑田真美子　竹田晃先生　退官纪念东亚文化论丛　汲古学院　1991

唐代的服饰及其美的意识——样式的形成　武内和子　帝塚山短期大学　纪要 4　1967

唐代的蹀躞带　吉村苣子　美术史 93—96　1976

唐代妇女的化妆法　志田不动麿　支那文化谈丛　1942

唐代美术中所显示的妇女的发型——以开元天宝年间为重点　五味充子　美术史 28　1958

唐代茶道的成立　布目潮沨　立命馆文学 200　1962

唐宋时代饮茶的普及　布目潮　历史教育 14—8　1966

唐诗所见唐代的茶与佛教　高桥忠彦　东洋文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70　1990

唐代胡食的流行及其影响　古贺登　东洋学术研究 8—4　1970

隋唐风俗志(1)(2)　守屋美都雄　桃源创刊号、2—1　1946

器物的妖怪　户仑英美　竹田晃先生退官纪念东亚文化论丛　汲古学院　1991

六朝隋唐时代的报应信仰　山崎宏　史林 40—6　1957

唐五代岁时资料的研究　守屋美都雄　大孤大学文学部纪要 9　1962

唐代的鹰狩　今村与志雄　人文学报 36　1963

从敦煌文献看唐五代民间信仰的一个侧面　游佐昇　东方宗教 57　1981

唐宋拜月考　吉田隆英　日本中国学会报 34　1982

唐代马球考　铃木圆藏　神奈川县立外语短期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篇)2　1969

《千唐志斋藏志》中反映的唐代习俗二、三点　西胁常记　中国思想史研究 8　1986

突厥风俗对唐代长安城内居民生活影响考　那波利贞　甲南大学文学会论集 27　1965

唐代的寒食与清明　西冈弘　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　19　1974

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善峰宪雄　龙谷大学论集 389、290　1969

唐朝政府的医疗机构和对庶民疾病的救济方法小考　那波利贞　史窗 17、18　1960

唐前期华北村落的一类型——河南修武县周村的情况　爱宕元　人文(京都大学教养部)25　1979

唐代的社邑　那波利贞　史林 23—2,3,4　1938

唐代的义邑、法社和俗讲　山崎宏　史学杂志 49—7　1938

敦煌出土"社"文书的研究　竺沙雅章　东方学报(京都)35　1964

敦煌社文书研究序说——以转贴为中心　石田勇作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关于唐・北宋间的"社"的组织形态的一考察——以敦煌为中心　土肥义和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代的社会组织　福泽与九郎　历史教育 2——5　1954

唐代妓馆的组织　岸边成雄　东京大学教养部人文学科纪要第五古代研究 2　1955

长安北里的性质与活动　岸边成雄　历史和文化 4　历史学研究报告 7　1959

唐代的巫　中村治兵卫　史渊 105、106　1971

五代的巫　中村治兵卫　东洋文化(东京大学)55　1975

唐代拔河的一试考　铃木圆藏　神奈川县立外国语短期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篇)7　1978

五、民　族

唐对西域诸国的羁縻政策　伊濑仙太郎　东洋史学论集 4　1956

西域的唐文化　伊濑仙太郎　历史教育 5—5　1957

关于麴氏高昌国郡县制的性质　荒川正晴　史学杂志　95—3　1984

高昌国的侍郎　关尾史郎　史林 74—5　1991

唐朝的远征高昌　长泽和俊　史观 102　1980
唐代河西的吐谷浑与墨离　荒川正晴　内陆亚细亚历史研究 3　1986
突厥初期可汗的系谱　护雅夫　东洋学报 3—1　1956
西突厥初世史的研究　内田吟风　研究 36、46　1965 年　1970 年
突厥佛教　山崎宏　史潮 11—34　1941
初期葛逻禄族史的研究　内田吟风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　1968
薛延陀统治的建立——其背叛突厥的年代问题　荒船淑子　史观 77　1968
突骑施的抬头与唐朝放弃碎叶　齐藤达　史滴 12　1991
沙陀部族考——1. 吐鲁番发现的朱邪部落文书　2. 唐代沙陀部落的兴起　室永芳三　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 10、11　1974　1975
五代时期契丹与中国的海上贸易　日野开三郎　史学杂志 52—7、8、9　1941
唐末五代契丹和奚的关系　平岛贵义　史渊 45　1956
契丹君长权的史的考察——序说　加藤修弘　亚细亚文化研究 1　1968
靺七部的前身及其种属　日野开三郎　史渊 38、39　1948
鞨七部考(1—5)　日野开三部　史渊 41—45　1949　1950
渤海文化史上的二个问题　驹井和爱　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　1965
有关渤海建国的记载的再检讨——中国方面史料的基础研究　古畑徹　朝鲜学报 113　1984
关于唐代异民族的郡王号　金子修一　山梨大研究报告 36　1986
唐代关于内附异民族的规定　石见清裕　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　汲古书院　1995
唐渤纠纷的发展与国际形势　古畑彻　集刊东洋学 55　1986
唐代党项的迁徙　山本澄子　史观 26—7　1941
唐代党项的发展　冈崎精郎　东方史论丛 1　1947
唐代吐蕃的内部结构　佐藤长　史学杂志 52—7　1941
唐蕃会盟的研究　佐藤长　东洋史研究 10—4　1949
唐蕃和河西九曲　前田正名　东洋学论集 1　1954

吐蕃的河西进出和东西交通　长泽和俊　史观 47　1956
吐蕃的入侵长安　佐藤长　京都大学文学部 50 周年纪念论集　1956
金城公主的入藏(上、中、下)　佐藤长　史林 39 卷 1,2,3　1956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藤枝晃　东方学报(京都)31　1961
文成公主的入藏及其对西藏佛教的影响　矢崎正见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2—2　1954
古代西藏史考异　山口瑞凤　东洋学报 49—1　1966
唐蕃交涉史的研究　伊濑仙太郎　东京学大报告 6—3　1955
吐蕃向中亚的进出　森安孝夫　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　1984
唐代回鹘史的研究　羽田亨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　1957
对回纥人口和社会结构的一些考察　田坂兴道　历史学研究 16—8　1940
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　藤枝晃　东洋史研究 7、2、3　1942
河西六胡州的沿革　小野川秀美　东亚人文学报 1—4　1942
对甘州回鹘集团形成的论考　前田正名　史学杂志 71—10　1962
关于绢马交易的史料　松畴男　内陆亚洲史论集 1　1964
新乐府所见唐与回鹘的关系　根本诚　同上
敦煌发现唐回鹘间交易关系的汉文文书断简考　土肥义和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汲古书院　1988
南诏国的汉文化　藤泽义美　岩手大学学艺部研究年报 3　1950
南诏国的统治阶层　藤泽义美　史学杂志 65—12　1956
唐朝云南经营史的研究　藤泽义美　岩手大学学艺部研究年报 10—1　1956
唐朝经营云南的目的——以开拓交通路的问题为中心　藤泽义美　岩手史学研究 31　1959
南诏的民族系统和哀牢传统　藤泽义美　岩手史学研究 38　1961
南诏国的成立和吐蕃的关系　藤泽义美　东洋史研究 25—2　21960
南诏国家的构成和白蛮文化　藤泽义美　历史教育 15—5、6　1967
南诏国的建立　林谦一郎　南洋史研究 49—1　1990
关于南诏、大理国国家构造的考察研究　武内刚　立命馆史学 11

1990

南诏国后半期的对外远征和国家结构　林谦一郎　史林75—4　1992

隋代岭南的猷领甯氏　河原正博　法政史学33　1981

南越君主名号小考　栗原朋信　史观50、51　1957

唐代西原蛮的叛乱——南中国少数民族史的一幕　小川博　历史教育11—4　1963

唐代的莫徭　伊藤宏明　名古屋大学文学系研究论集　史学31　1985

六、对外关系

中国的皇帝和周边各国的秩序　金子修一　从亚洲观看的古代日本 1992

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涉　护雅夫　东洋学术研究8—4　1970

唐代流寓敦煌地方的朝鲜人(上、中、下)　那波利贞　文化史学8、9、10　1954—1956

新罗末三国的鼎立和对大陆的海上交通贸易(1—4)　日野开三郎　朝鲜学报16、17、19、20　1961

隋的远征高丽和佛教　山崎宏　史潮49　1953

唐朝对朝鲜的经营和日本　北山康夫　历史研究(大阪教育大学)7、8 1971

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朝鲜诸国文化　井上秀雄　隋唐帝国和东亚世界　东京　1979

八世纪新罗、渤海关系的一视角　李成市　国学院杂志90—4　1991

国际交流史上所见的满鲜织物　日野开三郎　朝鲜学报　48、65、82　1968　1972　1977;又见日野论集9　1984

七世纪东亚的争乱和变革　铃木靖民　从亚洲观看的古代日本　1992

六四○年的东亚和大和国家　山尾幸久　青立学术论集2　1992

隋朝对高句丽战争的起因　菊池英夫　亚洲史研究　中央大学16 1992

围绕朝鲜半岛的唐和倭　森公章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隋唐交替与东亚　金子修一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所谓"小高句丽国"的存在问题　古畑徹　东洋史研究51—2　1992

隋唐世界和日本　池田温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遣唐使和国书　西嶋定生　史学论丛(就实女大)1　1986

由唐所见八世纪的国际秩序与日本地位的再探讨　山内晋次　续日本记研究 245　1986

遣隋史和遣唐史　森克已　东洋学术研究 9—1　1970

裴世清和高表仁——隋唐和倭交涉的一个方面　池田温　日本历史 280　1971

遣唐使船在唐的靠岸地、出发地及道昭归国的时间　长岛健　海事史研究 20　1970

遣唐使的停废——1:菅家文章的史料;2.遣唐使停废的诸说——早期的诸说;3.遣唐使停废的诸说——后期的诸说　增村宏　鹿儿岛经大论集 16--3　1975;鹿大史学 23　1975,鹿儿岛经大论集 17—1　1970

"国风文化"与中国文化　榎本淳一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王梵志诗集与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　菊池英夫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2　1990

八世纪日本送唐的国书　奥尚田　年报(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系东洋文化学科)6　1991

外交关系　石井正敏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唐代陶磁贸易的开展和商人　龟井明德　海上之路·亚洲中的日本史 3　1992

唐代文物和正仓院　杉本一树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唐和日本的佛教交流　佐伯有清　思考古代——唐与日本　1992

唐文人萧颖士的邀请　东野治之　遣唐使和正仓院　岩波书店　1992

关于大食和唐交涉的一史料　田坂兴道　史学杂志 52—7　1941

唐末中国、大食间的印度洋通商路　家岛彦一历史教育 15—5、6　1967

唐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前嶋信次　东洋学术研究 8—4　1970

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　池田温　欧亚文化研究 1　1965

七、文化

从接触论考察接收容纳佛教的问题　丸山宏　乱之构图　1986

隋朝佛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大野雅弘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34—1　1990

中国佛教的通史意识　大内文雄　佛教史学研究　33—2　1990

隋唐时代舌不烧的信仰　諏访义纯　佳藤匡玄　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学论集　朋友书店　1990

唐代佛教制度管见　滨田真也　佛教史学研究 34—1　1991

则天皇后和内道场　直海玄哲　佛教史学研究 34—2　1991

中国净土教和庶民　小田义久　真宗研究 16　1971

中国佛教史上的善导和净土教　水谷幸正　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学论集　1979

初期禅宗形成史的一个侧面　小川隆　论集(驹泽大学佛教系)20　1990

白居易诗中的老庄与佛教　下定雅弘　纪要(神文化研究所)16　1990

北宗禅研究序说　田中良昭　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 25　1967

马祖禅的诸问题　柳田圣山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17—1　1968

唐代三阶教徒的信仰崇拜　早川道雄　研究论集(大正大学研究纪要)15　1991

道昱的前半生　藤善真澄　诸户论集 1991

王维和佛教——唐代士大夫崇佛之一瞥　藤善真澄　东洋史研究 24—1　1965

韩愈的排佛和对宋学的影响　太田悌藏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15—1　1966

王昌龄与佛教　金井德幸　山崎先生退官纪念　东洋史学论集　1967

引起会昌法难的白居易　杨鸿飞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17—1　1968

唐代后期的居士裴休　山崎宏　佛教史学 14—4　1969

唐代文人的宗教观　藤善真澄　历史教育 17—3　1969

李翱和南宗禅——和于岫的比较　金井德幸　立正史学 34　1970

刘禹锡对佛教的接受　河内昭国　大谷学报　50—3　1971

初唐名臣杜正伦和佛教　山崎宏　国学院杂志 77—3　1976

唐初的僧官十大德制　诸户立雄　秋大史学 16　1968

唐初十大德　小田义久　鹰陵史学 5　1979

五代的功德使　滋野井恬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18—2　1970

唐代安的左右街功德使和左右街功德巡院　室永芳三　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 30　1981

敦煌吐鲁番期的僧官制度　竺沙雅章　市目论集　1990

日本·唐·新罗的授戒制度　坂上早鱼　史论 44　1991

唐玄宗和道德　宫川尚志　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30　1979

关于唐紊宗御注《道德经》和疏撰述的几个问题　麦谷邦夫　东方学报(京都)62　1990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疏校本　藤原高男　研究纪要(德岛文理科大学)41、42　1991

玄宗的三教齐一志向　千岛一真　东洋史论集(立正大学)4　1991

道士张万福与唐代前半期的道教界　丸山宏　社会文化史学 22　1986

隋的玄教观及其系谱　山崎宏　东洋史学论集 7　中国的宗教和社会 1965

祆庙祭祀学考　那波利贞　史窗 10　1956

敦煌祆教庙的祭祀　小川阳一　东方宗教 27　1966

火祆教和中国文化　石田干之助、松木清张　中央公论 91—6　1976

唐代长安的祆教寺院　青木和子　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 17　1978

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对以往观点的二三点补遗　石田干之助　日本学士院纪要 29—1　1971;30—1　197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　塚田康信　福冈　教育大学纪要(艺术、保健体育、宗教、技术科)22、23　1973、1974

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三教　镰田茂雄　历史教育 17—3　1969

唐代儒教的一考察　若槻俊秀　大谷大学研究年报 31　1979

中唐时期新儒学运动的一考察——刘知几的经书批判和啖、赵、陆氏的春秋学　稻叶一郎　中国中世纪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　1970

刘禹锡的天论　金谷治　日本中国学会报 21　1969

对柳宗元天道观的分析　田中利明　大阪教育大学纪要(工、人文科学)24—2　1976

唐王室的创业与图谶——兼论“道僧格”中对妖言惑众的规定　诸户立雄　道教和宗教文化　1987　3号

唐代中期的文学和思想　户崎哲彦　滋贺大学　经济学部研究丛书 1990

白乐天　花房英树　人与思想(清水书院)　1990
李娃传的结构　小南一郎　东方学报(京教)62　1990
唐代作家新疑年录(三)　植木久行　文经论丛(弘前大学人文学系)25—3　1990
陆龟蒙　私田英信　集刊东洋学 64　1990
关于韩愈的(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的研究　三上英司　人文论究(北海道教养大学)50　1990
唐代诗人生卒年论据考三题　中国文学研究　(早稻田大学)16　1990
从梁肃到柳宗元　小野四平　集刊东洋学 66　1991
同时代人对杨贵妃的看法　户崎哲彦　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43　1991
关于隋代教育制度的几个问题　五十岚正一　新潟大学教育学部纪要 10—1　1969
北朝隋唐时代汉族士大夫的教育结构　长部悦弘　东洋史研究 49—3　1990
五代教育史概说　寺田刚　亚细亚大学教养部纪要 1　1966
隋唐至宋的总志及地方志　青山定雄　东洋学报 28—1、2　1941
旧唐书食货志的史料系统　铃木俊　史渊 45 辑　1950
文苑英华的编纂　花房英树　东方学报(京都)　19 册　1950
新唐书食货志的史料考察　铃木俊　典籍论集　1963
〈新唐书食货志〉记事的典据史料记录(一)、(三)　高桥继男　纪要(东洋大学文学系史学科)12、14　1987、1991
〈新唐书食货志〉记事的典据史料记录(二)　高桥继男　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　汲古书院　1988
日本书记和隋书　坂本太郎　国学院杂志 77—3　1976
对新旧唐书艺文志、经籍志的史料的考察　铃木俊　中央大学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75
新五代史撰述的经纬　石田肇　东洋文化(无穷会)41、42　1977
唐高宗敕撰西域志校录　内田吟风　研究 35　1965
沙州图经略考　池田温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75
"通典"中杜佑的议论——以食货、选举、职官为中心　岛一　立命馆文

学 500 号　1987

唐开元占经中的星经　薮内清　东方学报(京都)8　1937

大衍历考　加地哲定　密教文化 33、34、35　1956

敦煌古历　中村清二　学澄 53—1　1956

再论敦煌古历　中村清二　学澄 53—3　1956

隋书天文志中关于漏刻的记事　广濑秀雄　东洋的科学和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纪念论文集　1982

唐代史的医　出本德子　布目论集　1990

十部使的形成及其变迁　岸边成雄　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 1940

唐代教坊的创设及变迁　岸边成雄　东洋学报 28—2　1941

唐的梨园　岸边成雄　史学杂志 51—11　1940

霓裳羽衣曲考　村上哲见　日本中国学会报 14　1962

唐朝画院的源流　米泽嘉圃　国华 47—1　1937

唐集贤殿书院的作画机能及其画家　米泽嘉圃　东方学报(东京)11—1 1940

韩琬的《御史台记》　池田温　布目论集　1990

马永易的《元和录》　杉井一臣　汲古 17　1990

文馆词林六百十三卷佚文的卷次　汲古 16　1990

《唐六典》在日本的行用　利光三津夫　法学研究　庆应大学 63—5 1990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疏校本(壹)(贰)　藤原高男　研究纪要（德岛文理大学)39、40　1990

《永乐大典》所引《唐会要》记事一览　古畑彻　论集(金泽大学教养学系、人文科学)29—1　1991

唐两京城坊考收载人物拾遗稿　中岛比　东洋史苑 26、27　1986

八、考古与文物

有关吐鲁番出土文物的论著目录(1959—1985　中文篇)　关尾史郎　内陆亚细亚史研究 5—4　1986

大业杂记和元河南志　中村浴一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从隋李静训墓出土遗物看西域文化的要素　原田淑人　圣心女子大学

论丛 28　1966

隋唐时代的穴仓和帝陵——从洛阳到西安　布目潮沨　东洋学术研究 18—1　1979

近年出土的唐三彩——唐、新罗、奈良时代的日本　冈奇敬　博物馆 291　1975

唐墓壁画浅析　洞口正史　纪要(群马县立历史博物馆)11　1990

唐代金银器始原　桑山正进　博物馆 337　1979

唐代社会的金银　砺波护　东方学报(京都)62,1990

关于《御史台精舍碑》的研究　田村孝弘　东洋史苑(龙谷大学)34、35、37　1990、1991

唐玄宗《御制御书》碑文的刻字　竹中爱语　史窗 47　1990

《阿史那施墓志》试释　石见清裕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译试稿　石见清裕　内陆亚细亚言语研究　Ⅶ 1992

唐代后期的解府君墓志和殷府君墓志　高桥继男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京都大学所藏的唐墓志　砺波护　东亚古文书的史学研究　1990

关于中国法门寺的考察研究　气贺泽保规　纪要(富山大学教育系,人文,社会)23—1　1990

单于都护府与都城子遗迹　石见清裕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敦煌隋代石窟的特征　小山满　剑大亚洲研究 13　1992

支持九、十世纪敦煌莫高窟的人们　土肥和义　中国的都市与农村 1992

西文隋唐五代史研究论著索引

一、社会、经济 …… 1118
二、政治、人物 …… 1124
三、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 1132
四、佛教 …… 1138
五、道教 …… 1150
六、史学 …… 1157
七、文学与艺术 …… 1160
八、敦煌学 …… 1177

一、社会、经济

Balazs, Stefan [Etienne]: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34(1931), pp. 1—92; 35(1932), pp. 1—73; 36(1933), pp. 1—62

《唐代经济史论》

Bielenstein, Hans: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D.,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1947), pp. 125—163

《公元2—742年间中国的户口普查》

Schafer, Edward H.: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i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 II (1951), pp. 403—422

《唐传奇中的伊朗商人》

Wang Yi-t'ung: Slaves and other Comparable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368 — 618),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6 (1953), pp. 293—364

《北朝(368—618)时期的奴隶及其他贱民阶层》

Sun, E-tu Zen/De Francis, Joh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 Washington, D. C. 1956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hinesische Studien zwischen 1930 und 1947)

《中国社会史:研究译文选》

Gernet, Jacques: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s, Saigon 1956

《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状况》

Twitchett, Denis: Monastic Estates in T'ang china, in: Asia Major 5(1955/1956), pp. 123—146

《唐代中国的寺院庄园》

Ch'en. Kenneth: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Hui-ch'angg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1956), pp. 67—105

《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

Gernet, Jacques: La Vente en Chine d'après les contrats de Touen-houang, IXe-Xe siècles, in: T'oung Pao 45(1957), pp. 295—391

《九至十世纪敦煌契约所反映的买卖关系》

Twitchett, Denis: The 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Time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Vol. XIX(1957), pp. 526—549

《中世纪的寺院与中国经济》

Twitchett, Denis: The Fragment of the T'ang Ordinan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Waterways Discovered at Tun-huang, in: Asia Major N. S., 6(1957), pp. 23—97

《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残卷》

Pulleyblank, E. G.: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attel Slavery in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1957/1958), pp. 185—220

《中国动产奴隶的起源与性质》

Twitchett, Denis: Lands under State Cultivation under the T'ang,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1959), pp. 162—203

《唐代的国有耕地》

Twitchett, Denis: The Salt Commissioners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in: Asia Major, N. S. IV, pt. 1(1959), pp. 60—89

《安禄山之乱后的盐务使》

Twitchett, Denis: 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 in: T'oung Pao 48(1960), pp. 175—194

《略论唐代水利事业》

Pulleyblank, E. G.: Regis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n the Sui and T'ang Periods,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V, pt. 3(1961), pp. 289—301

《隋唐时期的人口登记》

Twitchett, Denis: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 1962(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唐宋时期的土地占有与社会秩序》

Twitchett, Denis: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唐代的财政》

Twitchett, Denis: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 in Late T'ang, in: Asia Major XI(1965), pp. 211—232

《晚唐的藩镇割据与中央财政》

Twitchett, Denis: The T'ang Market System, in: Asia Major XII(1966), pp. 202—284

《唐代的市场制度》

Twitchett, Deni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 in: Past and Present 35(Dezember 1966), pp. 28—53

《七世纪至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史》

Hartwell, Robert: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X(July 1967), pp. 102—159

《中华帝国经济变动的周期:750—1350年中国东北的煤和铁》

Twitchett, Denis: Merchant, 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 in: Asia Major XIV. 1(1968), pp. 63—95

《晚唐的商人、贸易与政府》

Twitchett, Denis: Local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T'ang Times, in: Asia major xv(1969)pp. 82—114

《唐初的地方财政管理》

Twitchett, Denis: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ey, Cambridge, 2 ed, 197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唐代的财政管理》

Twitchett, Den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nag,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47—85

《唐代统治阶级的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

Ikeda on: T'ang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Related Document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121—150

《唐代户口登记及有关文书》

Herbert, Penny A.: Agricultural Colonies in T'ang China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1(März 1975), pp. 37—77

《八世纪初期唐代的屯田》

Herbert, Penny A.: A Debate in T'ang China on the State Monopoly on Casting Coin, in: TP 62(1977), pp. 253－292

《唐代关于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

Ebrey, Patricia: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i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

Dalby, Michael: High Society in Medieval China. A Review of Patricia Ebrey's The Po-lin Ts'ui'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1980), pp. 249－263

《中国中古上层社会:评帕特里夏·埃布利之博陵崔氏研究》

Chen, C.: Trading Activities of the Turkic Peoples in China,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5(1981), pp. 38－53

《突厥人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Tanigawa, Michio: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国中古社会与地方"共同体"》

Ebrey, Patricia: T'ang Guides to Verbal Etiquette,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1985), pp. 581－613

《唐代的书仪》

Liu, James T. C.: Polo and Cultural Change: From T'ang to Sung China. Harve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5, No1(1985), Vol. 46, No. 1(1986)

《波罗与文化转变:从唐代到宋代》

Holzma, Donald: The image of 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in: Ptak, Roderich/Englert, Siegfried, (eds.) Ganz allm ählich, Festschrift für Günther Debon, Heidelberg. 1986, pp. 92－108

《中国中古诗歌中的商人形象》

Teiser, Stephen F: Having Once Died and Returned to Life': Representations of Hell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2 (1988), pp. 433－464

《"死而复生":中国中古时期地狱的描写》

Kohn, Livia. : Medicine and Immortality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8. 3(1988), pp. 465－469.

《唐代中国的医学与长生不老术》

Teiser, Stephen F. :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8

《中国中古时代的鬼节》

Morgan, Carole. : T'ang Geomancy: The Wu-hsing('Five Names') Theory and Its Legacy, T'ang Studies 8－9(1990－91), pp. 45－76

《唐代的土卜：五姓理论及其遗存》

Lally, James J. : An Unusual Group of Early T'ang Painted Pottery Figures, T'ang Studies 8－9(1990－91), pp. 77－81

《一批奇特的唐前期彩陶制品》

Clark, Hugh R. : Rural Tax Stations of the Late T'ang and Ten Kingdoms, Asia Major 3rd ser., 5. 1(1992), pp. 57－84

《后唐与十国的乡村税场》

Eliasberg, Danielle. : Pratiques funéraires animales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Journal Asiatique 280(1992), pp. 115－44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为动物举行的丧葬活动》

Chang Hsiang-wen. : Chinese Textile Art Viewed through Figure Paintings of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Asian Culture 20. 3(1992), pp. 97－110.

《从唐宋人物画中看中国的丝织技术》

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3

《中国唐宋时期的宗教与社会》

So, Kee Long. : Davelopments in Fukien under the T'ang and the M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riental Society Vol. 115, No. 3(1995)

《唐至明福建的发展》

Rybakova, V. M. : T'ang Legislation Concerning Crimes Involving Property (Tanskoe zakonodatel'stvo o prestupleniiakh protiv imushchestva), in The Nations of Asia and Africa, 6(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1985), pp. 96－

《唐代有关涉及财产犯罪的立法》

Kychanov, Ye I. : Foundations of Medieval Chinese Law, 7th to 13th Centuries (Osnovy srednevekovo kitaiskovo prava, VII-XIII veka).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1986.

《中国中古时期(7—13 世纪)法律的基础》

Delusin, L. P. and L. N. Borokh, eds. : Chinese Socialist Utopias(Kitaiskie sotsial'nye utopii).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1987.

《中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Otagi Hajime. : Eastern Wei Bridge and western Wei Bridge Granary during the T'ang Period, in Viewpoints on T'ang China, pp. 1—26

《唐代东渭桥与西渭桥的粮仓》

Xiong, Victor Cunrui: Daxingcheng of the Sui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8)

《隋代的大兴城》

Schafer, Edward H. : T'ang Fireflies, Monumenta Serica 39(1990—91), pp. 169—98.

《唐代的萤火虫》

Schafer, EdwardH. : The Chinese Dhole, Asia Major 3rd ser., 4. 1(1991), pp. 1—6

《中国豺狗》

Wang Zhenping. : T'ang Maritime Trade Administration, Asia Major 3rd ser., 4. 1(1991), pp. 7—38

《唐代海洋贸易管理》

Cahill, Suzanne. : Marriages Made in Heaven, T'ang Studies 10/11(1992—93), pp. 111—122.

《天国的婚姻缔结》

Yen, Chuan-ying. : The Sculpture from the Tower of Seven Jewels: The Style, Patronage and Iconography of the Monument. Harvard Univ., 1986. pp. 369.

《七宝寺的石雕:纪念物的式样、捐助人以及肖像画》

Jang, Ju-yu Scarlett. : Issues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Themes of Chinese Court Painting.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9. Advisor: James Cahill. pp. 534.

《中国宫廷画主题中的公众服务问题》

Chin-bing, Noreen Mei-lan. : Back to the Future: Prophecy and the worlds ofT'ui-pei-t'u. Harvard Univ. , 1990. pp. 325.

《推测未来:预言与〈推背图〉的世界》

Clark, Hugh. : The Fu of Minnan: A Local Clan in late Tang and Sung China(gth-13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l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XXⅥ, 1991

《闽南府:晚唐至宋的地方家族》

二、政治与人物

Fitzgerald, C. P. : Son of Heaven: 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天子:唐朝开国者李世民传》

Bingham, Woodbridge: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41

《唐朝的建立》

Pulleyblank, Edwin: The Ban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Rideout, J. K. : The Rise of the Eunuch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NS]1. (1949—50)and 2/3 (1953)

《唐代宦官的兴起》

Schafer, Edward Heteel: The Empire of Min. ToKyo: Tuttle, 1954

《五代时期的闽帝国》

Wong, :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e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

《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

Levy, Howard S. :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Yang Kuei-fei, in: Sinologica 5. 2(1957)

《杨贵妃的家世背景》

Lin Yutang: Lady Wu. A True Story, London: Heinemann, 1957

《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

Levy, Howard S.: Wu Hui-Fui—A favoured consort of the Emperor, T'ang Hsüan-tsung, in: T'oung Pao 46 (1958), pp. 49—80

《武惠妃:唐玄宗的宠妃》

Wright, Arthur F.: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Wright, Arthur F.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76

《隋炀帝:个性与形象丑化》

Levy, Howard S.: Biography of Huang ch'ao, 2. Auf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新唐书·黄巢传〉英译》

Levy, Howard S.: Biography of An Lu-sh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旧唐书·安禄山传〉英译》

DesRotoars, Robert: Histoire de Ngan Lou-chan,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62

《安禄山事迹(法译本)》

Levy, Howard S.: T'ang Women of Pleasure, in: Sinologica 8. 2 1964, pp. 89—113

《唐代的女伎》

Fitzgerald, C. P.: The Empress Wu,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ulumbia 1968

《武皇后传》

Herbert, Penny A.: The Life and Works of Chang Chiu-ling, Ph. D. Diss., Cambridge 1973

《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

Wright, Arthur F.: T'ang T'ai-tsung and Buddhism,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239—263

《唐太宗与佛教》

Peterson, Charles A.: 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151—191

《大中之治:宣宗与藩镇》

Twitchett, Denis: Lu Chih (754—805): Imperial Advisor and Court Official, in: Confuican Personalities, pp. 84—122

《陆贽《954—805):皇帝的顾问与朝廷官员》

Wechsler, Howard J.: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天子之镜: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

Herbert, Penny A.: Under the Brilliant Emperor: Imperial Authority in T'ang China as Seen in the Writings of Chang Chiuling,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明皇之下:张九龄笔下的唐代中国皇权》

DesRotours, Robert: Le règne de I'empereur Hiuan-tsong (713—756),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supplemented translation of Lin Lüchih: Tang Minghuang Pingzhuan, Taibei 1959)

《唐玄宗的统治(713—756)》

Dyer,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T'ang T'ai-tsung's dream: A Soviet Dungan Version of a Legend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uslims, in: 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 pp. 545—570

《唐太宗的愿望:关于中国穆斯林之起源另一传说》

Hwa, Lily: Yüan Chen (A. D. 779—831): The poet-Statesman, Hi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areer,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4

《元稹(779—831):诗人兼官员,他的政治与文学生涯》

Chen, Fan Pen W.: Yang Kuei-fei: Changing Images of a Historical Beau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4

《杨贵妃:中国文学中变化的历史美人形象》

Drège, Pierre: Les Caracteres de I'imperatrice Wu Zetian dans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Turfan,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 d'Extreme Orient 73(1984), pp. 339—354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武则天的个性》

Wilhelm, Hellmut/Knechtges, David R. : T'ang T'ai-tsung's poetry, in: T'ang Studies, 5(1987), pp. 1—23

《唐太宗的诗》

Popova, I. F. : "Essays by the T'ang Emperor T'ai Tsung(627—649): Rules for Emperors,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Imperial Power" (Pravila diia imperatorov["difan"]o sushchnosti imperatorskoy vlasti), in Written Memorials and Problem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stern Nations, U. S. S. R. Academy of Sciences. Leningrad Institute for Eastern Studies, Twentyfirst Annual Scientific Conference(Leningrad, 1987), pp. 139—142

《唐朝皇帝太宗所写的文章:〈帝范〉,关于皇权的本质》

Popova, I. F. : T'ang T'ai-tsung on the Attitude of a Monarch to His People(Tanskii imperator Tai-zun 627—649)o metodakh vozdeistviia pravitelia Kaitaia n narod), Leningrad University Messenger(Vestnik Leningradskova Universiteta)2. 2(1988), pp. 18—24.

《唐太宗论君主对待臣民的态度》

Twitchett, Denis. : The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 Yü Ti and His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 , 1. 2(1988), pp. 29—63

《晚唐政治生活的阴暗面:于頔及其家族》

Martynov. A. S. : The Confucian Utopia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Ages (Konfutsianskaia utopiia v dv. drevnostiivsrednevekov'e), in Chinese Socialist Utopias, pp. 10—57

《上古及中古时期的儒家乌托邦》

Kobzev, A. I. :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Fundamentals of the Confucian Social Utopia (Poniatino-teoreticheskie osnovy Konfutsianskoi sotsial'noi utopii), in Chinese Socialist Utopias, pp. 68—103

《儒家社会乌托邦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McMullen, David. L. : Han Yü: An Alternative Pic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 2(1989), pp. 603—657

《韩愈:另一幅图像》

Momullen, David. L. : 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 T'ang Studies 7(1989),pp. 59—103

《齐太公崇拜与唐代对军事的态度》

Jay,Jennifer W.:The Li Hsün Faction and the Sweet Dew Incident of 835,T'ang Studies 7(1989),pp. 39—58

《李训集团与835年的甘露之变》

Fracasso,Ricardo:The Nine Tripods of Empress Wu,in Tang China and Beyond,pp. 85—96

《武后的九鼎》

McMullen,David L.:The Death of Chou Li-chen:Imperially Ordered Suicide or Natural Causes?Asia Major 3rd ser.,2.2(1989),pp. 23—82

《周利贞之死:皇帝赐死还是自然死亡》

Herbert,P. A.:Perceptions of Provincial Officialdom in Early T'ang China,Asia Major 3rd ser.,2.1(1989),pp. 25—57

《唐前期道级官员的观念》

Eichenbaum-Karetsky,Patricia:Iconographical Patterns of a Spiritual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Caves at Dunhuang,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0 (1992),pp. 103—16.

《早期敦煌洞窟宗教氛围的图案》

Graff,David A.:The Battle of Huo-i Asia Major 3rd ser. 5.1(1992),pp. 33—55.

《霍邑之战》

Shiga Shūzō:A Basic History of T'ang Legislative Forms,Asia Major 3rd ser.,5.2(1992),pp. 97—110

《唐代法律形成简述》

Liu, Mau-Tsai: Gh'en-kuei, Richtschnur für Wurdenträger, von Wu Tset'ien (reg. 684 — 704). Eine philosophische Vorstellung von idealen Beamten,in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pp. 467—476.

《武则天的〈臣轨〉,理想官员的哲学思考》

Pearce,Scott Anthony:"The Yü-wen Regime in Sixth-Century China. Princeton Univ.,1987. pp. 835.

《中国六世纪时期的宇文氏政权》

Pan:Yihong. :Sui-Tang Foreign Policy:Four Case Studies. Ph,D. Diss.,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1990.

《隋唐外交 政策:四个实例研究》

Chiu-Duke,Josephine:To Rebuild the Empire:Lu Chih(754—805) and his Response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 Ph,D. Diss.,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1992.

《重建帝国:陆贽(754—805)及其对中唐社会情况的对策》

Lu,Chien-lun. :Hsü-chou's Struggle for Autonomy in Late T'ang China. Ph,D. Diss.,Univ. of Washington,1993. pp. 307.

《晚唐徐州争取自治的斗争》

Herbert,P. A.:Curriculum and Content of Doctoral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Studi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Osaka Univ)13(1987),pp. 149—163

《唐代中国士科考试的科目与内容》

Xiong,Victor Cunrui. :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the First Sui Capital,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7)

《再论那波利贞—陈寅恪关于隋代第一个都城大兴城的胡化问题》

Herbert,P. A. :Recording and Processing Data on Candidates in the T'ang Examination System,Studi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14(1988),pp. 143—156

《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资料》

Herbert,P. A. :Creators of the T'ang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System,Papers on Far Eastem History 38(1988),pp. 25—44.

《唐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创建者》

Chan,marie:The Life of Li Yi(748?—827). Monumenta Serica XXXⅧ (1988—1989)

《李益的生平》

Herbert,P. A. :Examine the Honest,Appraise the Able:Contemporary Assessments of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in Early T'ang China.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New Series,no. 10. 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Press,1988.

《选贤举能:时人对唐前期文官选拔制度的评价》

McMullen,David L.: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McMullen, David L.: The Real Judge Dee: 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VI, Part 1, (1993)

《狄仁杰与705年唐朝的复辟》

Chang, Saehyang P.: Hsing-ch'ing kung: Some New Findings on the Plan of Emperor Hsüan-tsung's Private Palace, Archives of Asian Art 44(1991), pp. 51—67

《兴庆宫:有关玄宗皇帝私人宫殿规划的一些新发现》

Nienhauser, William H.: Han Yü, Liu Tsung-yuan, and Boundaries of Literati Piety,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19(1991), pp, 75—104

《韩愈,柳宗元,与知识界虔诚的界限》

Chen, Jo-shui. The Dawn of Neo-Confucianism: Liu Tsung-yüan and the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T'ang China, 773—819, Ph, D. Diss., Yale Univ., 1987. Pp. 294.

《理学的曙光:柳宗元与唐代中国(773—819)知识界的变革》

Nienhauser, William H.: The Reception of Han Yü in America, 1936—1992, A Preliminary Study, Asian Culture 21.1(1993), pp. 18—48

《韩愈研究在美国(1936—1992)》

Xiong, Victor Cunrui.: Sui Yangdi and The Building of Sui-Tang Loy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1(1993), pp. 66—89

《隋炀帝和隋唐洛阳的建筑》

Herbert, P. A.: Decree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 T'ang Studies 10/11 (1992—93), pp. 1—40

《唐代中国的政令审查》

Chen Jo-shui: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柳宗元与唐代知识界的变化:773—819》

Bol, Peter K. :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2.

《唐宋时代的思想转变》

L'Age d'or de la Chine(618—907). Historia, special 22(March-aprill1993)

《中国的黄金时代(618—907)》

Spring, Madeline K. : Animal Allegories in T'ang China.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3.

《唐代中国的动物寓言》

Diether Kuhn. Chinas Goldenes Zeitalter: Die Tang-Dynastie(618—907) und das kulturelle Erbe der Seidenstraβe. Heidelberg: Braus, 1993. [For the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fü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Stadt Dortmund, 22 Aug. —21 Nov. 1993]

《中国的黄金时代:唐代(618—907)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

Stahl, Helga. : Der Aristokrat der Tang-Zeit in seinen Grabinschriften, Goldenes Zeitalter, pp. 199—211.

《唐代墓志中的贵族阶级》

Elisseeff, Danielle: La Splendeur des Tang, L'Age d'or, pp. 27—34.

《唐代的辉煌》

Elisseeff, Daniele: Wu Hou devient 'Imperatrice du Ciel L'Age d'or, pp. 51—57

《武皇后》

Naundorf, Gert: Sicherung des Lebensstils und Sicherheit des Toten: Grabbeigaben und Grabwächter, Goldenes Zeitalter, pp. 211—219.

《陪葬品与守墓者》

Kramer, Martin: Aristokratisches Leben in der Hauptstadt, Goldenes Zeitalter, pp. 81—108

《京城的贵族生活》

Asim, Ina: Die Aristokratische Grabkultur des 7 und 8 Jahrhunderts, Goldenes Zeitalter, pp. 173—178

《7—8世纪的贵族墓葬文化》

Asim, Ina: Das Grab des Li Shou, Goldenes Zeitalter, pp. 178—199.

《李寿之墓》

Lévy, André: Chang'an, la capitale des fils du Ciel, L'Age d'or, pp. 36—41.

《长安——天子之都》

Levy, André: Rêve du millet jaune et autres romans chinois, L'Age d'or, pp. 67—74.

《中国小说中黄粱梦的故事》

Eisenberg, Andrew: Kingship, Power and the Hsuan-wu Men Incident of the T'ang, T'oung Pao Vol LXXXX(1994)

《皇位、权力与玄武门之奕》

三、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Chavannes. Éduard: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

《西突厥史料》

Chavannes Édouard: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 in: T'oung Pao 5(1904), pp. 1—110

《西突厥史料补注》

Maspero, Henri: Le Protectorat General d'Annam sous les T'ang. Essai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 10 (1910), pp. 539—584, pp. 665—682

《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历史地理考论》

Reischauer, Edwin O.: Notes on T'ang Dynasty Sea Routes, in: HJAS, V. 2(1940/1941), pp. 142—164

《论唐朝的海路》

Chang Hsinglang: The Cause which Induced the Monk I-szu, The Nestorian Archbishop of Ch'ang-An, to Come to chin and the Exact Date of His Arrival, i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3 (1948), pp. 69—88

《促使长安景教大主教伊斯(耶质蒲吉)来到中国的原因及其抵达的确切时间》

Reischauer, Edwin o: Ennin's Diary: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T'ang

in Search of the Law, New York 1955(Ronald Press)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译文)

Reischauer, Edwin o. :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1955 (Ronald Press)

《圆仁在唐代中国的游记》

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T'u-küe), 2 Vols., Wiesbaden 1958

《汉文中的东突厥史史料》

Bielenstein, Hans: 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 in: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 1959(Ejna Munksgaard), pp. 98－122

《唐末以前汉人对福建的开发》

Mahler, Jane Gaston: Westerners Among the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61

《唐朝雕塑中的西方人》

Pelliot, Paul: 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Posthumous Works of Paul Pelliot,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1961 (Kapitel 196 aus JTS und Kap. 216 aus XTS)

《西藏古史:两唐书吐蕃传译注》

Stott, Wilfred: The Expansion of the Nan-chao Kingdom between the Years A. D. 750－860 and the Causes that Lay Behind it as Shown in the T'ai-ho Inscription and the Man Shu, in: T'oung Pao 50(1963), pp. 190－220

《从太和碑和蛮书看南诏750－860年间的扩张原因》

Schafer, Edward H. :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的研究》

Sinor, Denis: Introduction à L'è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3

《欧亚大陆中部研究导论》

Ecsedy, Hilda: Uighurs and Tibetans in Pei-t'ing(790－791A. D.), in: Acta Orientalia(Budapest), XVII. 1(1964), pp. 83－104

《回鹘人与吐蕃人的北庭(790—791)之战》

Kolmas,Josef:Four Letters of Po Ch'ü-i to the Tibetan Authorities(808—810,A.D.),in:Archiv Orientalni,34(1966),pp. 375—410

《白居易致吐蕃赞普(808—810)的四封信》

Schafer,Edward H.: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朱雀:唐朝南方的形象》

Ecsedy,Hilda:Trade and War between the Turks and Chin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in: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1968)

《六世纪后半叶唐与突厥之间的贸易与战争》

Mackerras,Colin P.:Sino-Uighur Diplomatic and Trade Contacts(744—840),in: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3. 3(1969),pp. 117—139

《唐与回鹘之间的外交与贸易往来(744—840)》

Mackerras,Colin P.:The Uighur Empire: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

《唐代正史中的回鹘帝国》

Fitzgerald,C. P.: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72

《中国人在南方的扩展》

Sperling,Elliot: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arriage of the Tibetan King Srong-btsan sgam-po to the Chinese Princess Wen Ch'eng,in:The Tibet Society Bulletin 10(1976),pp. 29—47

《关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的几点看法》

Ecsedy,Ildiko:Tribe and Empire,Tribe and Society in the Turk Age,in: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31(1977),pp. 3—15

《突厥时代的部落与帝国、部落与社会》

Nagai-Berthrong,Evelyn:Iconographic Innovations in Kuchean Buddhist Art,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龟兹佛教艺术中肖像画法的革新》

Herbert,Penny A.:Japanese Envoys and Students in T'ang China,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Occasional Papers

4(1979)

《日本遣唐使及留学生》

Beckwith, Christopher I.: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9(1979), pp. 297—313

《公元七、八世纪希腊医学在吐蕃的传播》

Sperling, Elliot: A Captivity in Ninth Century Tibet, in: The Tibet Journal 4.4(1979), pp. 17—67

《九世纪一名在吐蕃的俘虏》

Uray, Géza: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in: Harmatta, J.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275—304

《有关公元751年以前的中亚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见《伊斯兰化前中亚史史料序》

Uray, Géza: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 — 9th Centuries, 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Warminster, England 1980, pp. 310—318

《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Khrom》

Ecsedy, Ildiko: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Karluks in the T'ang Period, in: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34(1980), pp. 23—37

《唐代葛逻禄小考》

Tryjarski, E.: Zur Frage einiger Parallelen zwischen den Bestattungsritualen der Alt-Türken und chinesen,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5 (1981), pp. 147—158

《关于古代突厥与中国葬礼部分类似的问题》

Uray, Géza: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E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a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in: JA 269(1981), pp. 81—90(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吐蕃统治以后甘州与于阗诸国政府中的藏文应用》

Esin, Emel: Le thème de l'inthronisation dans les inscriptions et la littérature turques de VIIe au VIe siècle,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299

—316

《公元六至七世纪突厥铭文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王位继承问题》

Aalto, Pentti: Central Asiatic Epigraphic and Manuscript Material in Finland, in: Manucrits et Inscrptions, pp. 3—10

《芬兰所藏的中亚碑文及写本资料》

Azarpay, G.: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粟特绘画：东方艺术中的绘画史诗》

Backus, Charle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南诏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

Bazin, L.: Notes de toponymie turque ancienne,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ium Hungaricae 36(1982), pp. 57—60

《古代突厥地名考》

Sertkaya, O.: Der Name "Groβ-Rom = Byzanz" in den kȍktürkischen Inschriften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6(1982), pp. 122—130

《东突厥铭文中"大拂林=拜占庭"的名称》

Leslie, Donald: "Persian Temples in Ta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XXXXV (1981—1983)

《唐代的波斯寺》

Szerb, J.: A Note on the Tibetan-Uighur Treaty of 822/823 A. D., in: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10(1983), pp. 375—387

《论822—823年吐蕃与回鹘的盟约》

Beckwith, Christopher: The Revolt of 755 in Tibet, in: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10(1983), pp. 1—16

《吐蕃755年的叛乱》

Ecsedy, Ildiko: Nanchao: An Archaic Stat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in: L. Ligeti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n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ōrōs, ed. (Budapest: Akademiai Kiadó 1981), I, pp. 165—189

《南诏：唐与吐蕃之间的一个古国》

Ferenczy, M. : The Formation of Tangut Statehood as seen by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in: L. Ligeti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e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 I, pp. 241—249

《中国史家记载的西夏国家的形成》

Karetzky, Patricia Eichenbaum: Foreigners in Tang and Pre-Tang Painting, in: Oriental Art 30. 2(1984), pp. 160—166

《唐及唐以前绘画中的外国人》

Uray, Géza: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the Use of the Chinese Sexagenary Cycle in Tibetan, in: L. Ligeti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n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e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 II, pp. 341—360

《吐蕃使用汉地甲子纪年法的最早证据》

Czeglédy, K. : The Foundation of the Turfan Uyghur Kingdom, in: L. Ligeti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n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ed. (Budapest: Akaemiai Kiadó 1984), I, pp. 159—163

《西州回鹘王国的建立》

Drompp, Michael Robert: the Writings of Li Teyü as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Inner Asian Relations, Ph, D. Diss. , Indiana University 1986

《作为唐朝中亚关系史资料的李德裕的著作》

Beckwith, Christopher: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吐蕃帝国在中亚:中世纪初期吐蕃人、突厥人、大食人和唐朝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史》

Herbert, P. A: Early T'ang China and her Neighbours, Chinese Culture 28 (1987), pp. 31—39

《唐初中国及其邻邦》

Kaneko Shūichi: T'a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Viewpoints on T'ang China, pp. 75—101, 1988

《唐代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文书》

Antonino Forte. :Tang China and Beyond:Studies on East Asi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y.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Essays, volume 1. Kyoto: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di sull'Asia Orientale, 1988

《唐代中国及周边地区:7-10世纪的东亚》

Schafer, Edward H:Fusang and Beyond:The Haunted Seas to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 3(1989), pp. 379-399

《扶桑及周边地区》

Beckwith, Christopher I. :The Impact of Horse and Silk Trade On the Economics of T'ang China and the Uighur Empire: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XXⅣ (1991)

《绢马贸易对唐与回鹘经济的影响:论中古早期国际商业的重要性》

Pan Yiheng:The Sino-Tibetan Treaties in the T'ang Dynasty, T'oung Pao 78(1992), pp. 116-61.

《唐代的唐蕃会盟》

Chiu, Peter Chung-hang. :A Historical Stud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between A. D. 635-845. Ph, D. Diss. ,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pp. 333.

《唐代景教(635-845)的历史研究》

Larre, R. P. Claude:Les Nestoriens en Chine, L'Age d'or, 75-78.

《中国的景教徒》

四、佛教

Legge, James:The Travels of Fa Hien, Oxford:Clarendon Press, 1886

《法显传》(译文)

Chavannes, Édouard: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e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Paris1894

《大唐西域求法传》(译文)

Watters, Thoma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0－645. D., 2 Bde., London 1904/1905 (Royal Asiatic Society)

《玄奘620－645年在印度的旅行》

Gernet, Jacques: 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ynāna Chen-hhouei (668－760), Hanoi 1949

《荷泽神会(669－760)大师语录》

Yang Lien-sheng: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Four Money Raising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950), pp. 174－191

《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Wright, Arthur F.: Fu I and the Rejection of Buddh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2(1951), pp. 33－47

《傅奕与反佛》

Wrigth, Arthur F.: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Ch'en Kenneth: Bud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国佛教历史的概览》

Grousset, René: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71

《沿着佛的足迹》(依据玄奘的记载)

Wechsler, Howard J.: 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87－120

《唐初政府中的朋党》

Weinstein, Stanley: 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ang Buddhism,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265－306

《唐代佛教形成过程中帝王的庇护》

Birnbaum, Raoul: The Healing Buddha. Boulder, Col: Shambhala 1979

《药师佛》

Pachow, W.: A Study of the Twenty-two Dialogues on Mahayana Bud-

dhism, The Buddhist Studies Circle, University of Iowa 1979

《大乘二十二问本》

Pachow, W.: A Buddhist Discourse on Meditation from Tun-huang, in: Pachow, W.: Chinese Buddhism: Aspects of Intera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Lanham, Maryland 1980(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敦煌出土的有关坐禅的佛教讲道文书》

Despeux, Catherine: Les entretines de Mazu, maître chan du VIII siècle, intruduction et traduction, Paris: Ed. Le Deux Océans 1980

《八世纪禅宗大师马祖语录介绍与翻译》

Birnbaum, Raou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ang Buddhist Astrology: Research Notes on Primary Sources and Basic Principles, i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Bulletin 8(1980)

《唐代佛教占星术研究导论:原始材料和基本原理的研究笔记》

Lancaster, Lewis: The Bodhisattva Concept: A Study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m, ed. L. S. Kawamura (Waterloo, Ontario, Wilfri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3—164

《菩萨概念:中国佛教经典研究》

Jan Yün-hua: The Boddhisattva Ideal in Chinese Literature: Typology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Bod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m, ed. L. S. Kawamura (Waterloo, Ontario 1981, Wilfri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pp. 125—152

《中国文学中的菩萨形象:类型与意味》

Howard, Angela Fallo: The Imagery of the "Cosmological Buddha" (Iconographic Study from Six Dynasties to post T'ang), Ph, D. Diss.,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1981

《大日佛的形象:六朝至晚唐图像的研究》

Gregory, Peter Nielsen; Tsung-mi's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Man: A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Hermeneutics, Ph, D. Diss., Harvard 1981

《密宗对人的本原的探索:中国佛教解释学研究》

Orlando, Raffaello: A Study of Chinese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Life of the Tantric Buddhist Patriarch Amoghvajra (A. D. 705—774),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1

《有关密宗的创始人不空(705—774)生平的中国文书研究》

Dzo Ching-chuan:Un fragment du Fo-chouo cheng king-Le manuscrit P. 2963,in:Nouvelles contributions,pp. 129—136

《P. 2963〈佛说生经〉写本研究》

Imaeda Yoshiro: Un extrait tibétain du Manjusrimulakalpa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in;Nouvelles Contributions,pp. 303—320

《敦煌文书中文殊师利经吐蕃文译本》

Kimura Ryûtoku:Le dhyâna chinois au Tibet ancien apès Mahcâyâna,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183—192

《以大乘佛教为依据的古代西藏的汉地禅法》

Ueyama Daishun:Études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Dunhuang relatifs au bouddhisme de dhyana;bilan et perspectives,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287—295

《有关禅宗的敦煌吐蕃文书之研究总结与展望》

Tanaka Ryôshô:Relations between the Buddhist Sects in the T'ang Dynasty,Through the MS. P. 3913,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163—169

《P. 3913号写本看唐朝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关系》

Rhie,Marylin N.:Late Sui Buddhist Sculpture:A Chronology and Regional Analysis,in:Achives of Asian Art 35(1982),pp. 27—54

《隋朝晚期的佛教雕刻:年代学及地区分析》

Boulton,Nancy Elizabeth: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vel Records as a Literary Genre,Ph,D. Diss. ,Georgetown Univ. 1982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早期中国佛教徒游记》

Koseki,Aaron K.:Later Madhyamika in China:Some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ajnaparamita Thought,in: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ation of Budhist Studies 5(1982),pp. 53—62

《中国晚期的大乘空宗:当前对中国般若思想史的一些观点》

Lai,Whalen/Lancaster,Lewis R.: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1983

《汉地和吐蕃的早期禅宗》

Gimello,Robert M./Gregory,Peter M.: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3
《禅宗与华严宗研究》
Mair,Victor H.:The Narrative R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Ontological Presuppsitions,in:Clear 5.1(1983),pp.1—27
《中国文学中的叙事革命:本体论假想》
Cleary,Thomas:Entry into the Inconceivable:An Introduction to Hua-yen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3
《步入玄奥:华严宗导论》
Broughton,Jeffrey:Early Ch'an Schools in Tibet, in: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n (ed.Gimello),pp.1—68
《吐蕃的早期禅宗学派》
McRae,John R.:The Ox-head School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From Early Ch'an to the Golden Age,in: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n,pp.169—252
《中国禅宗的牛头派:从早期禅宗到其黄金时期》
Gregory,Peter N.:The Teaching of Men and Gods:the Doctrinal and Social Basis of Lay Buddhist Practice in the Hua-Yen Tradition,in: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pp.253—319
《人与神的教义:华严传统中居士行为的教义和社会基础》
Burr,Ronald L.:Lin-chi on "Language Dependence",an interpretive Analysis,in:Early Ch'an,pp.207—227
《临济论“语言依赖”,一种解释分析》
Chapell,David,W.:The Teachings of the Fourth Ch'an Patriarch Tao-hsin(580—651),in:Early Ch'an,pp.89—129
《禅宗四祖道信(580—651)的学说》
Gimello,Robert M.:Early Hua-yen,Meditation,and Early Ch'an: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in:Early Ch'an,pp.149—164
《早期华严宗、坐禅与早期禅宗:一些初步的思考》
Gomez,Luis O.:Indian Materials on the Doctrine of Sudden Enligtenment,in:Early Ch'an,pp.394—434
《有关“顿悟”学说的印度资料》
Guenther,Herbert V.:"Meditation" Trends in Early Tibet,in:Early

Ch'an, pp. 351—366

《早期吐蕃的"禅坐"倾向》

Birnbaum, Raoul: Studies on the Mysteries of Manjusri: A Group of East Asian Mandalas and their Traditional Symbolism. Boulder: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3

《文殊师利的玄义研究:东亚的一批坛场及其传统的象征意义》

Birnbaum, Raoul: Thoughts on T'ang Buddhist Mountain Traditions and their Context, in: T'ang Studies 2 1984, pp. 5—23

《关于唐代佛教山岳传统及其背景的思考》

Pal, Pratapaditya u. a. (ed.) Light of Asia: Buddha Sakyamuni in Asian Art,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4

《亚洲之光:亚洲艺术中的佛祖释加牟尼》

Shih, Heng-ching: The Ch'an-Pure Land Syncretism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Yung-ming Yen-shou,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on 1984

《中国禅宗与净土宗的调和》

Dalia, Albert A.: Social Change and the New Buddhism in South China: Fa-jung (A. D. 594—65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5

《中国南方的社会变迁与新兴佛教:法融》

Teiser, S. F.: T'ang Buddhist Encyclopedias: An Introduction to Fa-yüan chu-lin and Chu-ching yao-chi, in: T'ang Studies 3(1985), pp. 109—128

《唐代佛家百科全书:〈法苑珠林〉与〈诸经要集〉导论》

Birnbaum, Raoul: Seeking Longevity in Chinese Buddhism: Long Life Deities and their Symbolism,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1985/1986), pp. 143—176

《中国佛教对长生不老的追求:长生的神及其象征》

Mair, Victor B.: The Origins of an Iconographical Form of the Pilgrim Hsüan-tsang, in: T'ang Studies 4(1986), pp. 29—41

《玄奘求法的肖像的出处》

Birnbaum, Raoul: The Manifestation of a Monastery: Shen-ying's Experiences on Mount Wu-t'ai in T'ang Context, in: Sinological Studies, pp. 119—137

《一个寺院的揭示：唐代神英在五台山的经历》

Cleary, J. C. : Zen Dawn: Early Zen Texts from Tun Huang, Boston: Shambala, 1986

《禅的萌芽：敦煌出土的早期禅宗经卷》

Foulk, Theodore Griffith: The"Ch'an School"and Its Place in the Buddhist Monastic Tradition,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

《禅宗及其在佛教隐修传统中所处的地位》

Cahill, Suzanne. : A White Clouds Áppointiment with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6(1988), pp. 43—53.

《与西王母的白云之会》

Kychanov, Ye I. : State Control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ies'Activity in China in the T'ang-Sung Epoch, 7th-13th Centuries" (Gosudarstvennyi kontrol'v period Tan-Sun, VII-XVII v. v.), in Buddhism and Government, pp. 71—90.

《唐宋时期(7—13世纪)的中国政府对佛教团体活动的控制》

Martynov, A. S. : The State and Religions in the Far East, in Buddhism and Government, pp. 3—46.

《远东的国家与宗教》

Martynov, A. S. : Buddhism and the Court in the Early T'ang Epoch, 7th—8th Centuries(Buddizm i dvorv nachale dinastii Tan, VII-VIII v. v.), in Buddhism and Government, pp. 91—108.

《初唐(7—8世纪)佛教与宫廷》

Chappell, David W. : From Dispute to Dual Cultivation: Pure Land Responses to Ch'an Critics, in Traditions, pp. 163—197

《从争论到合流：净土宗对禅宗批判的反响》

Howard, Angela Falco. : 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 Forgotten, Bulletin of the Musen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0(1988), pp. 1—164.

《唐代四川的佛教雕像：未知的与遗忘的》

Magnin, Paul: Dépassement de l'experience noëtique selon trois courts traités de Mādhyamika chinois, in Contributions III, pp. 263—303

《中国中观学派的一个问题》

Stevenson, Daniel: The Four Kinds of Samādhi in Early T'ien-t'ai Buddhism, in Traditions, pp. 45—97.

《早期天台宗的四种正定》

Stein, Rolf A.: Avalokiteśvara/Kouan-yin, un example de transfromation d'un dieu endéesse, Cahiers d'Extrême-Asie 2(1986), pp. 17—80.

《观音: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

Shim, Jae-ryong: Faith and Practice in Hua-yen Buddhism: A Critique of Fa-tsang(643—712) by Li T'ung-hsüan(646—740), in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pp. 109—124

《华严宗的信仰与实践:李洞玄(646—740)对法藏(634—712)的批判》

Sponberg, Alan: Meditation in Fa-hsiang Buddhism, in Traditions, pp. 15—43

《法相宗的坐禅》

Lai, Whalen: The Chan-ch'a ching: Religion and Magic in Medieval China,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pp. 175—206

《占察经: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魔术》

Tonami Mamoru: Policy towards the Buddhist Church in the Reign of T'ang Hsüan-tsung, in Viewpoints on T'ang China, pp. 27—47

《唐玄宗时期有关佛教寺院的政策》

Buswell, Robert E., Jr: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Buddhist Apocryphal Scriptures,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pp. 1—30

《佛教伪经研究序说》

Forte, Antonino: Un gioiello della rete di Indra: La lettera che della Cina Fazang inviò a Uisang in Corea, in Tang China and Beyond, pp. 35—83

《帝纲主珠:唐法藏致新罗义湘书》

Kuwayama Shōshin: How Xuanzang Learned about Nalanda, in Tang China and Beyond, 1—33

《玄奘如何得知那烂陀寺》

Strickmann, Michel: The Consecration Sutra: 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pp. 75—118.

《献祭箴言集:佛教符咒书》

Vita,Silvio:"Li Hua and Buddhism,"in Tang China and Beyond,pp. 97—124

《李华与佛教》

Zürcher,Erik:Buddhism and Education in T'ang Times,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The Formative Stage,ed. Chaffee and de Bary (Berkeley: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19—56

《唐代的佛教与教育》

Orzech,Charles D:Puns on the Humane King:Analogy and Aplication in an East Asian Apocryph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 1 (1989),pp. 17—24.

《仁慈之王的双重含义:东亚佛经中的类推与应用》

Howard ,Angela Falco: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A Mirror of the Direct Link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India in High Tang,Archives of Asian Art 42(1989),pp. 49—61.

《四川的佛经:盛唐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直接联系的一面镜子》

Howard,Angeld Falco:Tang and Post-Tang Images of Guanyin from Sichuan,Orientations(Jan. 1990),pp. 49—57.

《唐及唐以后四川观音的形象》

Dieter Kuhn. :Funde aus dem'Unterirdischen Palast'des Tempels Famen-si,Goldenes Zeitaler,pp. 157—71.

《法门寺地宫的宝藏》

von Eschenbach,Silvia Freiin Ebner:Religiöse Vielfacht durch Toleranz und Kontrolle,Goldenes Zeitalter,pp. 45—51

《宽容与控制下的宗教多元化》

Von Eschenbach,Silvia Freiin Ebner:Entfaltung und Blüte des Buddhismus:Illusion und Vision des Buddhismus,Goldenes Zeitalter,pp. 221—232.

《佛教的发展与兴盛》

Wong, Yuk:The Conversion of Lu Chao-lin from Confucianism to Taoism and Buddhism,Chinese Culture 34. 2(1993),53—62.

《卢照邻从儒家向道教佛教的转变》

Lee, John: Early T'ang Buddhism and the Observance Tradition, in Sui T'ang shih lun-chi(Studies o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ed. Joseph Wong and Lau Kin-ming(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 of Hong Kong, 1993), pp. 242—54.

《初唐佛教与习惯传统》

Faure, Bernard: Relics and Flesh Bodies: The Creation of Ch'an Pilgrimage Sites, in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ed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50—89.

《舍利与肉身:禅宗朝圣地的创造》

Hansen, Valerie: Gods on Walls: A Case of Indian Influence on Chinese Lay Religion?in Religion and Society, pp. 75—113.

《墙上的神:印度对中国世俗信仰存在影响的一个例证》

Liu, Ming-Wood: A Chinese Madhyamaka Theory of Truth: The Case of Chitsang, Philospohy East and West 43. 4(1993), pp. 649—674.

《中国中观学派的真如理论:以吉藏为例》

Girmond, Sybille: Die Einfaltung der Pracht im Alltag, Goldenes Zeitalter, pp. 110—155.

《日常生活中的辉煌》

Kuhn, Dieter: Chinas Goldenes Zeitalter(618—907), Goldenes Zeitalter, pp. 18—44.

《中国的黄金时代》(618—907)

Scheid, Hildegard and Sybille Girmond: Die Vergegenwärtigung der Vision: Buddhas, Bodhisatvas and Reliquien, Goldenes Zeitalter, pp. 233—271.

《幻想的现实:佛陀、菩萨与佛骨》

Powell, William F., trans.: The Record of Tung-shan. Kuroda Institute, Classics in East Asian Buddhism.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6.

《洞山语录》

Peter N. Gregory.: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in Chinese Buddhis. Kuroda Institute, Studies in East Asian Buddhism, 4.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6.

《中国佛教的坐禅传统》

Zeuschner, Robert B: Awakening in Northern Ch'an in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pp. 85—108

《北宗禅之觉醒》

David W. Chappell. :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Buddhist and Taoist Studies. II. Asian Studies at Hawaii, 34.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1987.

《中国中古佛教徒与道教徒之活动:佛教徒与道教徒研究之二》

Weinstein, Stanley: Buddhi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7.

《唐代佛教》

McRae, John R: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Kuroda Institute, Studies in East Asian Buddhism, 3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7.

《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

L. P. Delusin. : Buddhism and Government in the Far East: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Buddizm i gosudarstvo na dal'nem vostoke, sbornik statei). Moscow: Izdate'stvo Nauka, 1987.

《远东佛教与政府:论文集》

Schneider, Richard: Un moine indien au Wou-t'ai chan, Cahiers d'Extreme-Asie 3(1987), pp. 27—40.

《五台山的印度僧侣》

Pas, Julian: Dimensions in he Life and Thought of Shan-to(613—681), in B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pp. 65—84.

《善导(613—681)的生平及其思想》

Faure, Bernard: La Volonté d'orthodoxie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88.

《中国佛教的正统意愿》

Forte, Antonino: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e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59 and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s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145. Rome and Paris: Lstituto L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and Ecole Franζaise d'Extrême-Orient, 1988.
《明堂与天文钟史上的佛教乌托邦:武后建造的塔、雕像以及浑天仪》
Faure, Bernard: Le Bouddhisme Ch'an en mal d'histoire: Genèse d'une tradition religieuse dans la Chine des T'ang · Paris: Ecole Franζaise d'Extrême-Orient, 1989.
《历史上的禅宗:唐代宗教传统的产生》
Mair, Victor H: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urve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28.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 1989.
《唐代变文:论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剧兴起的贡献》
Buswell, Robert E., Jr: The Formn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 The Vajrasamādhi-Su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9.
《中国和朝鲜禅宗思想的形成》
Robert E. Buswell, Jr: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0.
《汉文佛教伪经》
Ogata Sohaku, tran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Early Masters. Wolfeboro, N. H. Longwood Academic, 1990.
《传灯:早期的大师们》
Tonami Mamoru: The Shaolin Monastery Stele on Mount Song. Tr. P. A. Herbert.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Epigraphical Series1.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90.
《嵩山少林寺碑考》
Gregory, Peter N.: 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1.
《密宗与佛教的中国化》
Barrett, T. H.: Li Ao: 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2.
《李翱:佛教徒,道教徒抑或道学家》

Watson, Burton, trans: The Zen Teachings of Master Lin-chi: A Translation of the Lin-chi lu. Boston: Shambhala, 1993.

《临济录》(译文)

Mayer, Alexander Leonhard: Xuanzang: Übersetzer und Heiliger. Xuanzangs Leben und Werk, Teil 1. Wiesbaden: Otto Harassowitz, 1992.

《玄奘的生平与著作》

Stevenson, Daniel Bruce. : The T'ien-t'ai Four Forms of Samadhi and Late North-South Dynasties, Sui, and Early T'ang Buddhist Devotionalism. New Yovk Columbia Univ., 1987. pp. 745.

《天台宗的四种正定及南北朝后期隋和唐初佛教的虔诚化》

Ch'en, Mei-chin. : The Eminent Chinese Monk Hsüan-tsang: His Contributions to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and to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Ph, D. Diss., Univ. of Wisconsin, 1993. pp. 425.

《中国高僧玄奘:他对于佛经翻译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Penkower, Linda L. T'ien-t'a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n-jan and the Sinfication of Buddhism.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sity, 1993. pp. 611.

《唐朝的天台宗:湛然与佛教的中国化》

五、道教

Schipper, Kristofer: L'Empeeur Wou des Han dans la legende taoiste: Han Wou-ti nei-tchouan, Paris 1965

《传说中的道士汉武帝:汉武帝内传》

Schipper, Kristofer: Concordance du Tao-tsang: titres des ouvrages, Paris 1975

《道藏索引:作品名称》

Schafer, Edward H. : A Tang Taoist Mirror, in: Early China 4(1978—1979), pp. 56—59

《一方唐道教铜镜》

Schafer, Edward H. : Three Divine Women of South China, in: Clear 1 (1979), pp. 31—42

《中国南方的三位神女》

Schafer, Edward H. : Wu Yün's Cantos on Pacing the Void, in: HJAS 41

(1981),pp.377－416

《吴筠的步虚词》

Schafer,Edward H.:Two Taoist Bagatelles,in: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Bulletin 9(1981),pp.1－18

《两件道教琐事》

Kroll,Paul W.:Notes on Three Taoist Figures of the T'ang Dynasty,in: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Bulletin 9(1981),pp.19－41

《论唐代三位道教人物》

Morgan,Carole:Les"neuf palais"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Nouvelles Contribution,pp.251－260

《敦煌文书中的"九宫图"》

Cahill,Suzanne:The Image of the Goddess Hsi Wang Mu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ur,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82

《中国中古文学中的西王母形象》

Schafer,Edwad,H.:Blue-green Clouds,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02.1(1982),pp.91－92

《蓝绿色的云》

Schafer,Edward H.:The Grand Aurora,in:Chinese Science 6(1983),pp.21－32

《神奇的极光》

Schafer,Edward H.:The Cranes of Mao Shan,in: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Stein,Vol.2(Mélanges chinois et bounddhiques,Brüssel 1983),pp.373－393

《茅山的鹤》

Pontynen,Athur John: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aoist Art,ph,D.Diss.,University of Iowa 1983

《道教艺术的初期发展》

Schafer,Edward H.:Wu Yun's Stanzas on"Saunters in Sylphdom",in: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pp.309－345.

《吴筠的〈游仙诗〉》

Cahill,Suzanne:Beside the Turquoise Pond:The Shrine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2(1984), pp. 19—32

《在天池之边:中国中古诗歌及宗教活动中的西王母神庙彩》

Kirkland, J. Russell: Chang Kao-Noteworthy T'ang Taoist?, in: T'ang Studies 2(1984), pp. 31—35

《张杲——唐朝著名的道士?》

Cahill, Suzanne: Sex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Medieval China: Cantos on "the Transcendent Who Presides Over the River",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5.2(1985), pp. 197—220

《中国中古的性与超自然现象:有关"河神"的诗篇》

Schipper, Kristofer: Taoist Ordination Ranks in the Tun-huang-Manuscripts, in: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Würzburg 1985, pp. 127—149

《敦煌文书中的道士受戒等级》

Schafer, Edward, H.: The Princess Realized in Jade, in: T'ang Studies 3 (1985), pp. 1—23

《玉仙公主》

Kroll, Paul W.: In the Halls of the Azure Lad,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5.1(1985), pp. 75—94

《在碧空少年的宫殿里》

Kroll, Paul W.: Spreading Open the Barrier of Heaven, in: Asiatische Studien 40.1(1986), pp. 22—39

《突破天界》

Kirkland, J. Russell: Taoists of the High T'ang: An Inquiry into the Perceived Significance of Eminent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Ph. 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86

《盛唐的道士:中世纪中国社会名道士意义探微》

Kirkland, J. Russell: The Last Taoist Grand Master at the T'ang Imperial Court: Li Han-Kuang and T'ang Hsüan-tsung, in: T'ang Studies 4(1986), pp. 43—67

《唐宫廷最后的道教大师:李含光与唐玄宗》

Despeux, Catherine: L'ordination des femmes taoistes sous les Tang, in: etudes Chinoises, Vol. V. 1/2(1986), pp. 53—100

、《唐代女道士的戒度》

Kirkland, Russell J.: The Roots of Altruism in the Taoist Tradit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54. 1(1986), pp. 59—77

《道教传统中利他主义的根源》

Teiser, Stephen F.: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 The Yü-lan p'en Festival as Mortuary Ritual, in: History of Religions 26. 1 (1986), pp. 47—67

《中世纪中国宗教中的鬼与祖先:作为丧葬礼仪的盂兰盆节》

Schafer, Edward H.: The Snow of Mao Shan: A Cluster of Taoist Images,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1985/1986), pp. 107—126

《茅山的雪:道教的形象》

Schipper, Kristofer: Taoist Ritual and the Local Cult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Strickman, Michel: Tantric and Taoist Stu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Bd. 3, Bruxelles 1986, pp. 812—834

《唐朝的道教礼仪与地方信仰》

Teiser, Stephen F.: The Yü-lan-p'en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中世纪中国宗教中的盂兰盆节》

Cahill, Suzanne: Performers and Female Taoist Adepts: Hsi Wang Mu as the Patron Deity of Women in Medieval China, in: Sinological Studies, pp. 155—169

《履行者与女道士行家:中世纪中国妇女的庇护神西王母》

Cahill, Suzanne: Reflections of a Metal Mother: Tu Kuang-t'ing's Biography of Hsi WangMu,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1986/1986), pp. 127—142

《勇气的写照:杜光庭的〈西王母传〉》

Cahill, Suzanne: Night-Shining White: Traces of a T'ang Dynasty Horse in Two Media, in: T'an Studies 4(1986), pp. 91—94

《陆龟蒙的〈照夜白〉与韩干的马》

Lagerwey, John: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1987 (Macmillan)

《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礼》

Schafer, Edward H.: The Dance of the Purple Culmen, in: T'ang Studies 5 (1987), pp. 45—68

《紫极舞》

Teiser, Stephen F.: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世纪中国的鬼节》

Schafer, Edward H.: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Univ. Calif 1977

《步虚:唐代对星相的研究》

Schafer, Edward H.: Mao Shan in T'ang Times. Univ. Calif. Press, 1980

《唐代的茅山》

Reiter, Florian C.: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s Taoismus zur frühen T'ang-Zeit in der Darstellung Wang Hsüan-ho's, Saeculum 33. 3—4(1982), pp. 240—257

《王玄和笔下初唐道家的自我理解》

Pas, Julian: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aoist Found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3. 2 (1983), pp. 361—376.

《对传统中国道教基础的一些观察》

Verellen, Franciscus.: Luo Gongyuan: Légende et culte d'un saint taoïste, Journal Asiatique 275. 3—4(1987), pp. 283—332.

《罗公远:传说与一位道家圣人的宗教信仰》

Reiter, Florian C: Kategorien und Realien in Shang-ch'ing Taoismus (SHang-ch'ing tao lei-shih hsiang); Arbeitsmaterialien zum Taoismus der frühen T'ang Z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2.

《上清道类世相:初唐道教资料》

Reiter, Florian C.: Der Perlenbeutel aus den drei Hohlen: Arbeitsmaterialen zum Taoismus der frühen T'ang-Zeit. Wiesbaden: Otto Harassowitz, 1990

《三洞珠囊:初唐时代的道教资料》

Ed. Gert Naundorf, Karl-Heinz Pohl, Hans-Hermann Schmidt. :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zum 65. Geburtstag.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85.

《东亚宗教与哲学:汉斯·施泰宁格65岁寿辰纪念文集》

Herbert, PA: Taoism and the T'ang State,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mational Symposium on Church and State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1987), pp. 59—68

《道教与唐代国家》

Benn, Charles. : Religious Aspects of Emperor Hsüan-tsung's Taoist Ideology, in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ice, pp. 127—145.

《玄宗皇帝道家思想的宗教方面》

Torchinov, Ye. A: The Taoist Utopia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Ages, 2nd—6th Centuries (Daosskaia utopiia v Kitae na rubezhe drevnosti isrednevekov'ia, II-VIv. v.), in Chinese Socialst Utopias, pp. 104—124

《上古与中古之交(2—6世纪)中国道教乌托邦》

Engelhardt, Ute: Qi for Life: Longevity in the Tang, in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pp. 263—296.

《生命之气:唐代的长生不老术》

Kohn, Livia: Guarding the One: Concentrative Meditation in Taoism in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pp. 125—158.

《道教的凝神沉思》

Kohn, livia: Taoist Insight Meditation, in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pp. 193—224

《道家的顿悟》

Russell, Terence: The Taoist Elegies of Ku K'uang T'ang Studies 7 (1989), pp. 169—195.

《顾况的道教哀歌》

Malek, Roman: Das Chai-chieh lu: Matenialen zur Liturgie im Taoismus. Würzburger Sino-Japonica, 14.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85.

《斋戒录：关于道教礼拜仪式的文献》

Engelhardt, Ute: Die klassische Tradition der Qi-übungen(Qigong): Eine Darstellung anhand des Tang-zeitlichen Textes Fuqi jingyi lun von Sima Chengzhen. Münchener Ostasiatiche Studien, 44.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7.

《气功的古代传统：唐代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中的描述》

Kohn, Livia: Seven Steps to the Tao: Sima ChengZhens Zuowanglun, Mo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0, Nettetal: Steyler Verlag-word und werk, 1987

《七步入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

Verellen, Franciscus. Du Guangting(850—933): Taoï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 30.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Etudes Chinoises, 1989.

《杜光庭：中国中古时期最后的一位宫廷道士》

Livia Kohn. Ann Arbor: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ides, 1980.

《道教的修炼与长生不老术》

Robinet, Isabelle: Histoire du Taoïsme, des origines au XIV^{e} siècle. Paris: Cerf, 1991.

《道教史：从起源到十四世纪》

Kohn, Livia: Taoist Mystical Philosophy: The Scripture of Western Ascension. Albany: Sta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1.

《道教的神秘哲学：西升经》

Benn, Charles D: 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 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 D. 711.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1.

《711年道家授予教职的仪式》

Verellen, Franciscus: 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7—925)Asia Major 3rd ser2. 1(1989), pp. 59—78.

《宗教仪式与君权：道教仪式在蜀国(907—925)建立中的作用》

Dudbridge, Glen: Yü-ch'ih Chiung at An-yang: An Eighth-Century Cult

and Its Myths, Asia Major 3rd ser. ,3. 1(1990),pp. 27—49

《尉迟青在安阳：一位八世纪的偶像及其故事》

Bokenkamp, Stephen R: Taoism and Literature: The Pi-lo Question, Taoist Resources 3. 1(1991),pp. 57—72.

《道教与文学》

Kirkland, Russell: Huang Ling-wei: A Taoist Priestess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9(1991),pp. 47—73.

《黄临微(音译)：一位唐代女道士》

Verellen, Franciscus: Evidential Miracles in Support of Taoism: the Inversion of a Buddhist Apologetic Tradition in Late T'ang China, T'oung Pao 78 (1992)k, pp. 217—63.

《支持道家的奇迹：唐后期佛教思辨传统的转变》

Cahill, Suzanne: Sublimation in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the Mysterious Woman of the Nine Heavens,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tions 20(1992),pp. 91—102.

《中国中古时期的升遐：以神秘的九天仙女为例》

DeMeyer, Ja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Luo Yin, T'ang Studies 10/11(1992—93),pp. 67—80.

《罗隐政治思想中的儒、道学说》

六、史学

Bingham, Woodbridge: Wen Ta-ya: The First Recorder of T'ang History,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VII(1937),pp. 368—374

《温大雅：最早记录唐代历史的人》

Twitchett, Denis: The Deriv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Chiu T'ang Shu,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III(1956),pp. 48—62

《〈旧唐书〉一书的史源》

Hung, William: 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 D. 719, in: HJAS 20(1957),pp. 74—134

《719年唐朝朝廷中关于文献编纂的一场争论》

Frankel, Hans H. : Catalogu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for the Period 220—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公元220至960年间中国正史的译文目录》

Hung, William: 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XIII(1960/1961), pp. 93—107

《708年前的唐朝史馆》

Pulleyblank, E. G.: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Beasley, W. G. /Pulleyblank, E. 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35—166

《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

Balazs, Étienne; 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les monographies, les Encyclopedies, les recueils de status), in: Beasley, W. G. /Pulleyblank, E. 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8—94

《历史:官僚的行为指南》

Dull, Jack L.: Han Yu: A Problem in T'ang Dynasty Historiography,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Taipei 1963, pp. 71—99

《韩愈:唐朝史学修撰的难题》

McMullen, D. L.: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Eighth Centur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1973

《八世纪中叶的历史和文学理论》

Twitchett, Denis: the Inner Palace Diary(Nei ch'i-chüchu), in: T'ang Studies 4(1986), pp. 1—9

《内起居注》

Cutter, Robert Joe: History and "The Old Man of the Eastern Wall",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3(1986), pp. 503—528

《历史与"东墙的老人"》

Katz-Biletzky, Benjamin: Jiu Wu Dai Shi und Xin Wu Dai Shi, ein inhaltsanalytischer Vergleich der biographischen Teile der Alten und der Neuen Offiziellen Dynastiegeschichte der Fünf Dynastien (907 — 960), Ph, D. Diss., Hamburg 1986

《〈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

Lu Hiao-peng: The Fictional Discourse of Pien-Wen: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clear9. 1,2(1987), pp. 49—70

《变文的小说式讲道:中国小说与史学编纂的关系》

McMullen, D. L.: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Solomon, Bernard S.: The Veritable Record of the T'ang Emperor Shun-tsung(February 28, 805—August 31, 805)

《唐顺宗(805年2月—805年8月31日)实录译文》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唐代官方史学的修撰》

Ikeda On: A Review of T'ang Studies in Japan in Recent Years, in Viewpoints on T'ang China, 102—133

《近年来日本唐研究的回顾》

Honey, David B: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n the Sixteen States; Some T'ang topoi on the Nomad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4. 2(1990)161—218

《关于十六国时期的历史与历史编纂学:唐代对游牧民族的若干类分》

Chen Fan-pen: Probelm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Seen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on Yang Kuei-fei, T'ang Studies 8—9(1990—91), pp. 83—96.

《官方有关杨贵妃的记载中所见的中国历史编纂的问题》

Kirkland, Russell: Draft Entries for a T'a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Wang Hsi-i, Hunag Ling-wei, Ho Chih-chang, T'ang Studies 10/11(1992—93), pp. 153—165

《唐人传记辞典条目释例:贺知章》

McNair, Amy: Draft Entry for a T'a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Yen Chenching, T'ang Studies 10/11(1992—93), pp. 123—151.

《唐人传记辞典条目释例:颜真卿》

Naundorf, Gert: Die Seidenstraßen und ihre historische Dimension, Goldenes Zeitalter, 55—79.

《丝绸之道路与它们的历史背景》

七、文学与艺术

Hightower, J. R. : Han Yü as Humorist, in: HJAS, 44. 1(1934), pp. 5—27
《幽默的韩愈》
Edwards, E. D. :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 A. D. 618—906, 2 Bde., London: A. Probsthain, 1937—1938
《中国唐代(618—906)的散文》(翻译)
Waley, Arthur: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772—846A. 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imited, 1949
《白居易(722—846)的生活与时代》
Waley, Arthur: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762A. 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imited, 1950
《李白(701—762)的诗歌与事业》
Frankel, Hans H. : Biographies of Meng Hao-j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
《孟浩然传》
Feifel, Eugene: Biography of Po Chü-i, in: MS17(1958), pp. 255—311
《〈新唐书·白居易传〉英译》
Waley, Arthur: 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An Anthology, New York 1960(macmillan)
《敦煌的民歌与故事集》
Feifel, Eugene: Po Chü-i as a Censor. His Memorial Presented to Emperor Hsien-tsung during the Years 808—810,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1
《拾遗白居易:808—810年间给宪宗的奏章》(翻译)
Gentzler, J. Mason: A Literary Biography of Liu Tsung-yuan,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6
《柳宗元的文学生涯》
South, Margaret Tudor: Li Ho. A Scholar-Offical of the Yuanho Period (806—821), Adelaide: Libraries Board of South Australia, 1967
《李贺:元和(806—821)年间的一位文人兼小吏》
McMullen, D. L. : Yüan Chieh and The Early Ku-Wen Movement, Ph, D.

D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元稹与早期古文运动》

Hawkes,David:A Little Primer of Tu Fu,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

《杜甫小传》

Hung,William:China's Greatest Poet,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69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Liu,James J. Y.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

《李商隐的诗》

Levy,Howard S. :Translations from Po Chü-i's Collected Works,2 Vols, 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1971

《〈白居易文集〉翻译》

Wu,John C. H. :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Rutland,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1971

《唐诗中的四季》

Nienhauser,William H. :Liu Tsung-Yüan,New York:Mitautor,1973

《柳宗元》

Mcleod,Russell:Poetry of Meng Chiao in the Chinese Baroque Tradition, Ph,D. Diss. ,Stanford 1973

《中国"巴罗克"传统中的孟郊诗作》

Fish,MichaelB. :Mythological Themes in the Poetry of LiHo(791—817)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1973

《李贺(791—871)诗作中的神话主题》

Owen,Stephen: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

《孟郊与韩愈的诗》

Yu,Pauline:The World of Wang Wei's Poetry:An Illumination of Symbolist Poetics,Stanford 1976

《王维诗歌的境界: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

McLeod,Russell E. :The Baroque as a Period Concept in Chinese Literature,in:Tamkang Review 7. 2(October 1976)

《中国文学的"巴罗克"时期概念》

Fish, Michael B.: Yang Kuei-fei as the Hsi Wang Mu: Secondary Narrative in Two T'ang Poems in: MS 32(1976), pp. 337—354

《杨贵妃作为西王母:两首唐诗中的传说》

Hartman, Charles; Bibliographic Notes on the Sung Editions of Han Yü's Collected Works, in: Nienhauser, William H. (ed.):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ongkong 1976, pp. 89—100

《对〈韩愈选集〉宋版本的书目注释》

Yu, Pauline: Wang Wei's Journeys in Ignorance, in: Tamkang Review 8.1 (April 1977), pp. 73—87

《鲜为人知的王维之旅》

Yu, Pauline: Ssu-K'ung T'u's Shih p'in: Poetic Theory in Poetic Form, in: Miao, Ronald (Hrsg.):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San Francisco 1978, pp. 81—108

《司空图的〈诗品〉:诗歌形式的诗学理论》

Bryant, Daniel: The High T'ang Poet Meng Hao—jan: Studies in Biography and Textual Histo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ch Columbia 1978

《盛唐诗人孟浩然:传说与历史研究》

Fish, Michael B.: Tu Mu's Poems on the Vermilion Slope: Laments on a meager Career, in: OE 25.2(December 1978), pp. 190—205

《杜牧关于官场等级的诗:对事业不济的哀叹》

Yu, Pauline: Wang Wei: Recent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in: Clear 1.2 (Juli 1979), pp. 219—240

《王维:最新研究与翻译》

Nienhauser, William H.: P'i Jih—hsiu, Boston 1979

《皮日休》

Tu Kuo—ch'ing: Li Ho, Boston: Twayne, 1979

《李贺》

Yu, Pauline: The Poetry of Wang Wei: New Translations & Commentary, Indiana 1980

《王维诗新译与评注》

Upton, Beth Ann: The Poetry of Han Wo(844—92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韩偓的诗》

Lin, James Kuo—chiang: The Versification of chin t'i shih,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0

《近体诗的诗体》

Kroll, Paul W.: Wang Shiyuan's Preface to the Poems of Meng Hao—jan, in: Monumenta Serica 34(1980/1981), pp. 349—369

《王士元的〈孟浩然诗集〉序》

Wallacker, Benjamin E.: The Poet as Jurist: Po Chü—i and a Case of Conjugal Homicide, in: HJAS 41. 2(1981), pp. 507—526

《法官诗人：白居易和一对夫妇之间的残杀案》

Wagner, Marsha L.: Wang Wei, Boston: G. K. Hall & Co. 1981

《王维》

Fish, Michael B.: Besprechung von Li Ho von Kuo—ch'ing Tu(Boston 1979), in: Clear 3. 1(January 1981), pp. 167—176

《评杜国庆论李贺》

Bryant, Daniel: A Note on Concordances to Chinese Poetry, in: Clear 3. 1 (January 1981), pp. 121—129

《中国诗歌索引注》

Bodman, Richard Wainwright: Besprechung von Wong Yoon—wah: 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f the T'ang, in: Clear 3. 2(Juli 1981), pp. 266—267

《评王永华的司空图：唐朝诗学批评家一文》

Hsu, C. 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z'u(Part I), in: Asian Culture. 9. 4(1981), pp. 30—59

《词的起源与发展(1)》

Nienhauser, William H.: Liu Tsung—Yüan: Recent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in: Clear 3. 2(Juli 1981), pp. 251—261

《柳宗元：最新的研究与翻译》

Nienhauser, William H.: Tied up at Maple Bridge Once Again, in: Tamkang Review 11. 4(Sommer 1981), pp. 421—429

《再泊枫桥》

Luo Tzong－tao: Au sujet de terme bian: les procédés d'adaptation des textes bouddhiques aux bianwen,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151－157

《"变文":佛经的改编方式》

Kroll, Paul W.: Meng Hao－jan, Boston 1981(G. K. Hall & Co.)

《孟浩然》

Kroll, Paul W.: The Dancing Horses of T'ang, in: TP 67. 3/5(1981), pp. 240－268

《唐朝的舞马》

Kroll, Paul W./Kroll, Joyce Wong: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Meng Haoja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孟浩然诗作索引》

Yu, Gail Sukys Yu: Formerly in the Service of Emperor Wen, 32 Rhymes, by Tu Mu(803－852),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Oregon, Sept. 1982

《杜牧(803－852)〈昔事文皇帝〉32韵的翻译与注释》

Tang, Raymond Nai－Wen: The Poetry of Wei Chuang(836－910),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

《韦庄(836－910)的诗》

Protopappas, Frederic Pet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 Po, 701－762 A. 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hronology of his Life Taken from his Collected Works, Ph. D. Di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2

《李白的一生与时代:对其选集中的年谱注释性的翻译与分析》

Nienhauser, William H.: Thrice－Told Tales: Translating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in: Translation Review 10(1982), pp. 27－33

《陈旧的故事:日译中国诗转译为英文》

Moore, Paul Douglas: Stories and Poems about the T'ang Poet Li Po, Ph. 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2

《唐朝诗人李白的故事与诗作》

Hsu, C. 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z'u (Part II), in: Asian

Culture 10. 1(1982),pp. 32—59

《词的起源与发展(2)》

Cahill,Suzanne:The Image of the Goddess Hsi Wang Mu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82

《中国中古文学中的西王母形象》

Hartman,Charles:Alieniloquiuum:Liu Tsung—yuan's Other Voice,in:Clear 4. 1. (Januar 1982),pp. 23—73

《柳宗元的别声》

Liu,James J. Y. :A Note on Po Chü—yi's "Tu Lao Tzu"(On Reading the Lao Tzu),in:Clear 4. 2(1982),pp. 243—244

《白居易的〈读老子〉注》

Boulton,Nancy Elizabeth: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vel Records as a Literary Genre,Ph,D. Diss. ,Georgetown Univ. 1982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早期中国佛教徒的游记》

Bryant,Daniel:Lyric Poets of the Southern T'ang,Victoria: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2

《南唐的抒情诗人》

Chou Shan:Beginning with Images in the Nature Poetry of Wang Wei,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ides 42. 1(1982),pp. 117—138

《从王维山水诗中的形象谈起》

Shin,Feng—yu:Li Po:A Biographical Stud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83

《李白:生平研究》

Mair,Victor H. :The Narrative R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in:Clear 5. 1(1983),pp. 1—27

《中国文学上的叙事文革命:本体论假设》

Frodsham,J. D. :Goddesses,Ghosts,and Demons:The Collected Poems of Li He(790—816),San Francisco 1983(North Point Press)

《神、灵魂与魔鬼:李贺(790—816)诗集》

Eide,Elling O. :Li Po's Riddle Naming Cloud—Ritual Hsü in Relation to the Feng Sacrifice of 742 and the Great Heavenly Treasure Scandal,to Which

is appended a Note on the Stamping Songs and Sino－Turkish Name for the Huns,in:T'ang Studies 1(1983),pp.8－20

《李白对许云封命名之谜(与742年东封和天宝改元有关)谈匈奴特征性歌曲和汉突厥名字》

Mair,Victor B.: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敦煌通俗文学》

Dudbridge,Glen: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London:Ithaca Press,1983

《李娃的故事:9世纪中国故事的研究及评论》

Hervouet,Yves:Quelques Poẽmes de Li Shangyin,in:La Revue Francaise de Pékin,No.2(1983),pp.130－149

《李商隐的几首诗》

Kroll,Paul W.:The Image of the Halcyon Kingfisher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4.2(1984),pp.237－251

《中国中古诗歌中的青鸟形象》

Wagner,Marsha L.:The Lotus Boat:The Origins of Chinese Tz'u Poetry in T'ang Popular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荷船:唐代俗文化中词的起源》

Tafel－Kehren,Dorotheé:Einige Gedichte von Wang Fan－chih:übersetzungen von Texten aus Fonds Pelliot chinois Ms.3833,Ph,D.Diss.,Bonn 1984

《王梵志的几首诗:伯希和文书3833号译文》

Mair,Victor H.:Li Po's Letters of Political Patronage,in:HJAS 44.1(1984),pp.123－153

《李白的干谒信》

Hsu,Wan－hua W.Tung:A Study of Four Historical Pien－wen Stories,Ph,D.Diss.,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4

《四篇变文历史故事研究》

Eide,Elling:Poems by Li Po,Lexington:Anvil Press,1984

《李白的诗》(翻译)

Kroll, Paul W. : Li Po's Rhapsody on the Great P'eng－bird,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2(1984), pp. 1－17

《李白大鹏鸟狂想曲》

Chou Shan: Tu Fu's "Eight Laments": Allusion and Imagery as Modes of Poetry,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杜甫"八哀"诗中的明喻与暗喻手法》

Chou shan: Allusions and Periphrasis as Moded of Poetry in Tu Fu's "Eight Lament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 1(1985), S. 77ff

《杜甫"八哀"诗中的比喻与用词手法》

Schafer, Edward H. : 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海市蜃楼:曹唐的道家诗》

Jacob, Paul: Li Bai, Florilege, Paris: Gallimard, 1985

《李白诗选》

Goat, Koei Lang－tan: Der unauffindbare Einsiedler: eine Untersuchung zu einem Topos der Tang－Lyrik(618－906), Frankfurt 1985

《难觅的隐士:唐诗的研究》

Carré, Patrick: Le Mangeur de brumes: l'oeuvre de Han－shan, poète et vagabond, Paris: Phebus, 1985

《诗人兼流浪汉寒山的作品》

Hsiao, Ching－song Gene: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u Mu's Poetry as exampl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5

《中国诗歌中符号的诠释作用:以杜牧的诗为例》

Spaar, Wilfried: liu Yuxi(772－842).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ditions,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in: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86, pp. 1－81

《刘禹锡(772—842)作品译文及研究的注释目录》

Spring, Madeleine K. : Han Yü's Chin－hsüeh chieh: A Rhapsody on Higher Learning, in: T'ang Studies 4(1986), pp. 11－27

《韩愈的进学解》

Schafer, Edward H. : Empyreal Powers and Chthonian Edens: Two Notes on T'ang Taoist Literature,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4 (1986), pp. 667－677

《唐代道教文学的两点札记》

Ptak, Roderich/Englert, Siegfried (Hrsg.): Ganz allmählich. Aufsätze zur ostasiatischen Literatur, insbesondere zur chinesischen Lyrik. Festschrift für Günther Debon, Heidelberg 1986 (Heidelberger Verlagsanstalt und Druckerei)

《渐渐集：东亚文学及中国抒情诗论集》

Manley, Victor Eugene: A Conservative Reformer in T'a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 Yu (768—824),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6

《中国唐代的保守派和改革家：韩愈(768—824)的生平及其思想》

Lin Shuen－fu/Owen, Stephen (Hrsg.):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抒情之声的活力：东汉至唐代的诗歌》

Bokenkamp, Stephen Robert: The Ledger on the Rhapsody: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T'ang fu,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6

《狂想曲的类型：唐赋艺术研究》

Lee, Oscar: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Poetry of Wei Ying－wu (737－792): The Creation of a Poetic Reputation,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韦应物诗评创造诗歌的声誉》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Floating Clouds and Dreams in Liu Tsung－Yuan's yüan's Yung－chou Exile Writings, in: Sinological Studies, pp. 169－181

《柳宗元贬逐永州作品中的浮云与梦》

Harper, Donald: Flowers in T'ang Poetry: Pomegranate, Sea Pomegranate, and Mountain Pomegranate, in: Sinological Studies, pp. 139－153

《唐诗中的花：石榴树、海石榴树和山石榴树》

Wagner, Lothar: Zu Li Yang－pin (ca. 713－785), in: Ganz allmahlich,

pp. 281—299

《致李阳冰(约713—785)》

Unger, Ulrich: Grundsätzliches zur formalen Struktur von Gedichten der T'ang—Zeit, in: Ganz allmählich, pp. 270—280

《唐诗的形式构成的基本原则》

Kubin, Wolfgang: Der Empfindsame und der Leidvolle. Bemerkungen zu Liu Yu—hsi's "Bambuszweigliedern" (822), in: Ganz allmählich, pp. 120—131

《感伤与痛苦—评刘禹锡822年所作〈竹枝词〉》

Goat, Koei Lang—Tan: Traditionelles und Individuelles in der Bild—und Versgestaltung des T'ang—Dichters Li Ho (791—817), in: Ganz allmählich, pp. 132—145

《唐代诗人李贺诗歌形像中的传统性个性》

Wilhelm, Hellmut/Knechtges, David R.: T'ang T'ai—tsung's Poetry, in: T'ang Studies, 5 (1987), pp. 1—23

《唐太宗的诗》

Lu Hsiao—peng: The Fictional Discourse of Pien—Wen: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Clear, 9. 1, 2 (1987), pp. 49—70

《变文的小说式讲道:中国小说与史学编纂的关系》

Lau, Joseph S. M.: Love and Friendship in T'ang Ch'uan—ch'i, in: MS 37 (1987/1987), pp. 155—168

《唐代传奇中的爱情与友谊》

Cahill, Suzanne: Reflections, Disputes, and Warnings: Three Medieval Chinese Poems about Paintings of the Eight Horses of King Mu, in: T'ang Studies 5 (1987), pp. 87—94

《唐代三首论周穆三八骑图的诗》

Hammond, Charles Edwad: Tang Stories in the T'ai—p'ing Kuang—chi, Ph, D. Diss., Columbia 1987

《〈太平广记〉中的唐代故事》

Kao Yu—kung: The Aesthetics of Regulated Verse, in: Vitality, pp. 332—385

《格律诗的美》

Lin Shuen－fu:The Nature of the Quatrain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High T'ang,in:Vitality,pp. 296－331

《东汉至盛唐间四行诗的性质》

Lin Wen－yüeh: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Feng－ku(Wind and Bone): On the Changing Poetic Styles from the Chien－an Era through the High T'ang Period,in:Vitality,pp. 130－166

《风骨的衰落与复兴:建安时期至盛唐期间诗歌风格的变化》

Liu,James J. Y. :The Paradox of Poetics and the Poetics of paradox,in: Vitality,pp. 49－70

《诗学的矛盾与矛盾的诗学》

Owen,Stephen:The Self's Perfect Mirror:Poetry as Autobiography,in: Vitality,pp. 71－102

《反映自我的绝好镜子:自传诗》

Wang Ching－hsien:The Nature of Narrative in T'ang Poetry,in:Vitality,pp. 217－252

《唐诗的叙事性质》

Hou Zhenfu:The Legacy of the Han,Wei,and Six Dynasties Yüeh-fu Tradition an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ang poetry,in:Vitality,pp. 287－295

《汉魏六朝乐府的遗产及其在唐诗中的进一步发展》

Frankel,Hans H. :T'ang Literati:A Composite Biography,in:Confucian Personalities,pp. 65－83

《唐代士人综传》

Schafer,Edward H. :The Divine Woman: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神》

Kroll,Paul W.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Edward H. Schafer,Special Isu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1(1986)

《汉学研究——献给 E·H·薛爱华》

Lin Shuen－fu/Owen,Stephen: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Princeton 1986(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后汉至唐代的诗歌》

Knechtges, David R. and Taiping Chang: Notes on a Recent Handbook for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7. 2(1987), pp. 293－304

《最新中国文学手册评注》

Piliere, Marie － Christine Verniau: Du Mu: Comment rendre justice à l'homee et à l'oeuvre? Etudes Chinoises 6. 2(1987), pp. 47－71

《杜牧》

Hu－Sterk, Florence: Miroir et connaissance dans la poésie des Tang, Etudes Chinoises 6. 1(1987), pp. 29－58.

《唐诗的借鉴与知识》

Twitchett, Denis: Po Chü－i's Government Ox, T'ang Studies 7(1989), pp. 23－38

《白居易的"官牛"》

Sutton, Donald S.: A Case of Literati Piety; The Ma Yuan Cult from High － Tang to High － q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1 (1989), pp79－114

《文人信仰的例证:从盛唐到清朝盛世时期的马援崇拜》

Dieny, Jean－Pierre.: La Vitalité de la poésie chinoise médiéva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08. 3(1988), pp. 449－455.

《中国中古时期的生命力》

Bokenkamp, Stephen R.: Chinese Metaphor Again: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 2(1989), pp. 211－221.

《再论汉语隐喻:阅读并理解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

Bryant, Daniel.: On the Autheticity of the Tz'u Attributed to Li Po, T'ang Studies 7(1989), pp. 105－136

《论李白词的真实性》

Emmerich, Reinhard: Li Ao (ca. 772 － ca. 841): Ein chinesisches Gelehrtenleb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7.

《李翱(约772—约841):一位中国学者的生平》

Yu,Pauline: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 Press,1987

《解读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

Mair,Victor H. :Four Introspective Poets:A Concordance to Selected Poems by Roan Jyi,Chern Tzyy—arng,Jang Jeouling,and Lii Bo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Monograph No. 2. Temple:Center for Asian Studies,Arizona State Univ. ,1987

《四位反省型的诗人:阮籍、陈子昂、张九龄与李白诗选索引》

Larsen,Jeanne,trans. Brocade River Poems:Selected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Courtesan Xue Tao. Lockert Library of Poetry in Transl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 Press,1987

《唐代名妓薛涛著作选译》

Seaton,J. P. and James Cryer,eds. and trs. :Li Po and Tu Fu:Bright Moon,Perching Bird. 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 Press,1987

《李白与杜甫:明月,栖鸟》

Mair,Victor H. :Mei Cherng's"Seven Stimuli"and Wang Bor's "Pavilion of King Teng."Lewiston,Maine:Edwin Mellen,1988.

《枚乘的〈七发〉与王勃的〈滕王阁〉》

Yates,Robin D. S. :"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834?—910).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26. Cambridge,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1988.

《浣花集:韦庄(834?—910)的生平及诗选》

Rouzer,Paul:Watching the Voyeurs:Palace Poetry and Yuefu,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11(1989),pp. 13—34.

《窥探者:宫廷诗与乐府》

Kroll,Paul W. :The Memories of Lu Chao—li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 4(1989),pp. 581—592.

《卢照邻的回忆》

Schmidt,J. D. :Disorder and the Irrational in the Poetry of Han Yü,T'ang Studies 7(1989),pp. 137—167

《韩愈诗关于混乱与非理性的看法》

Yu,Pauline. :Poems in Their Place: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1(1990),pp.163—196

《早期中国文学的总集与经典》

Nienhauser,William H.,Jr.: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Traditional History:the Case for Ou—yang Cha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12(1990),pp.1—14

《文学为传统历史资料的一个来源:欧阳詹的例子》

Twitchett,Denis: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in Chiu T'ang shu, Asia Major 3rd ser.,3.1(1990),pp.51—62

《〈旧唐书〉"音乐志"注》

Coblin,W.South:Comparative Studies on Some Tang—time Dialect of Shazhou,Monumenta Serica 40(1992),pp.269—361.

《唐代沙州方言的比较研究》

Cdolin,W.Sarth: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parts I and I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2(1991),pp.303—22; and 111.3(1991),523—39

《古藏文〈尚书〉片断研究》(一)(二)

Chou Shan.:Tu Fu's Social Conscience:Compassion and Topicality in his Poetry.Harvea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1(1991),PP.5—53

《杜甫的社会良心:他的诗歌中哀悯苍生、反映时局的内容》

Coblin,W.South:Thoughts on Dentilabialization in the Tang—time Dialect of Shazhou,T'oung pao 77(1991),pp88—107.

《唐代沙州方言中的唇齿音考》

Kroll,Paul W.:Po Chü—i's Song of Lasting Regret':A New Translation, T'ang Studies8—9(1990—91),pp.97—105.

《白居易的〈长恨歌〉:新译本》

Roosters,Horses,and Phoenixes:A Look at Three Fables by Li Ao,Monumenta Serica 39(1990—91),pp.199—208

《公鸡,马与长生鸟:李翱的三个寓言》

Mair,Victor H. and Tsu—lin Mei: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 2(1991),pp. 275—470
《近体诗中的梵文来源》
Kibirova, S. N.: Kultura vostoccnogo Turkesetana v Kitae: Muzika Kučara,Period Han—Tang,Obaes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 3(1991),pp. 101—5.
《中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汉唐时代的龟兹音乐》
Smolin,G. A.: Poet Pi Rixiu: učastnik krest'ânskoj vojny(874—901), Obsses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 3(1991),pp. 132—38.
《诗人皮日休》
Mair,Victor H.:Script and Word in Medieval Vernacular Sinitic,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2. 2(1992),pp. 69—78.
《中古中国白话中的文字与言词》
Varsano,Paula M.:Immediacy and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Li Bo,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 1(1992). pp. 225—61.
《李白诗歌中的直观性与引喻性》
Hu—Sterk,Florence: Les'poèmes de lamentation du palais'sous les Tang: La vie recluse des dames de la cour,Etudes Chinoises 11. 2(1992),pp. 7—33
《唐代的宫怨诗:宫廷妇女的禁闭生活》
Chen Yu—shih.: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1988
《中国古典散文中的形象与思想:四杰的研究》
Liu,James J. Y.: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Ed. Richard John Ly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1988.
《语言——悖论——诗学:中文透视》
Gjertson,Donald E.:Miraculous Retribution: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ang Lin's Ming—pao chi. Berkeley: Centers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Univ. of California,1989.
《不可思议的因果报应:唐临〈冥报记〉研究与翻译》
Gottheiner,Klaus:"Licht und Dunkel in der Dichung der T'ang—Zeit: eine Untersuchung zur Bildlichkeit chinesischer Lyrik. Frankfurt: Haar und Herchen,1990.

《唐代诗歌中的"明"与"暗"：中国诗歌的形象性探讨》

Kung, Wen－kai: Tu Mu(803－852): His Life and Poetry.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90.

《杜牧(803—852)：其生平及诗作》

Henricks, Robert G.: 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 SUNY Series in Buddhist Studies.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0.

《寒山的诗：寒山集全译及注释》

Pullyblank, Edwin G.: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古汉语(中古前期、后期和早期官话)发音拟音辞典》

Ho, Richard M. W.: Ch'en Tzu－ang, Innovator in T'ang Poet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 Press, 1993.

《陈子昂，唐代诗歌的革新者》

Wang, Ernestine H. Po Chü－i: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in Chinese Poetry. Ph, D. Diss., Georgetown Univ., 1987. pp. 207.

《白居易：其人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Graham, Masako Nakagawa: The Yang Kuei－fei Legend in Japa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 Univ. of Pennsylvania, 1987.

《日本文学中的杨贵妃传说》

Teng, Young－sheng: Tu Mu as a Literary Critic: Gleanings from the Villa on Fan Stream. Ph, D. Diss., Indiana Univ., 1987.

《文学评论家杜牧：樊川山庄拾遗》

Monahan, Mark Chang. Han Yü and his Literary Contribution. Ph. D. Diss., Georgetown Univ., 1987. pp. 185.

《韩愈及其文学上的贡献》

Cherniack, Susan: Three Great Poems by Du Fu: 'Five Hundred Words: A Song of My Thoughts on Traveling from the Capital to Fengxian', 'Journey North', and 'One Hundred Rhymes: A Song of my Thoughts on an Autumn Day in Kuifu, Respectfully Sent to Director Zheng and Adviser to the Heir－A-

parent Li'. Ph. D. Diss. ,Yale Univ. ,1988. pp. 359.

《杜甫的三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和〈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Takata Tokio:Note sur le dialect choinois de la région du Hexi aux IX^{e}—X^{e} siècles,Cahiers d'Extrême—Asie 3(1987),pp. 93—102.

《九至十一世纪河西地区中国方言考》

Hildebrand,Joachim. :Das Ausländerbild in der Kunst Chinas als Spiegel kultureller Beziehungen(Han — Tang).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46. Wieshbaden:Franz Steiner,1987.

《中国(汉—唐)艺术中作为文化关系镜子的外国画》

Cutter,Robert Joe. :The Mizong Hall of Qinglong Si:Space,Ritual,and Classicism inTang Architecture,"Archives of Asian Art 44(1991),pp. 27—50.

《青龙寺的密宗大殿:唐代建筑艺术中的空间,仪式及古典主义》

Shi Weixiang:High Tang Art in the Mogao Caves,Orientations 23. 1 (1992),pp. 49—51.

《莫高窟的盛唐艺术》

Kirkland,Russell:Tales of Thaumaturgy:T'ang Accounts of the Wonder—Worker Yeh Fa—shan,Monumenta Serica 40(1992),pp. 47—86.

《魔术师的故事:唐代有关幻人叶法善的描叙》

Borgen,Robert:The Legend of Hanshan:A Neglected Sour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 3(1991),pp. 575—79.

《寒山的故事:遗漏的资料》

Varsano,Paula Manette. :Transformation and Imitation:The Poetry of Li Bai.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 ,1988. pp. 255.

《创新与继承:李白的诗歌》

Chen,Zu—Yan. :Impregnable Phalanx and Splendid Chamber:Chang Yüeh's Contributions to the Poetry of the High T'ang. Ph. D. Diss. ,Univ. of Wisconsin,1989. pp. 265.

《坚不可摧的方阵与辉煌的楼阁:张说对于盛唐诗歌的贡献》

Rouzer,Paul Frederick. :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812?—866?)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Tang Aestheticism. Ph. D. Diss. ,Harvard Univ,

1989. pp. 309.

《温庭筠(812?—866?)的诗与晚唐美学的发展》

Wong, Peter Kim—hung. :Cultural Influences on Danc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 Dance of the Period. Ph. D. Diss. , Univ. of Wisconsin, 1989. pp. 398.

《唐朝舞蹈所受的文化影响以及当时舞蹈的舞姿特征》

Ye, Yang, :Beyond the Last Image: Poetic Endings in Chinese Tradition. Ph. D. Diss. , Harvard Univ. , 1989. pp. 217.

《意味深长:中国传统诗歌的结尾》

Hsieh, Daniel. :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jueju verse." Ph. D. Diss. , Univ of Washington, 1991. pp. 639.

《绝句体的起源与发展》

Cheung, Suk—hong. : A Grammar of the T'ang Poetic Journey. Ph. D. Di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唐诗的历程》

Eide, Elling O. : Another Go at the Mao Ying chunan, T'ang Studies 8—9 (1990—91), pp. 107—11.

《〈毛颖传〉别说》

Chou Shan: Literary Reputations in Context, T'ang Studies 10/11 (1992—93), pp. 41—66.

《论文学声望》

Kong, Haili: The Point of View: Narrativity in Wang Wei's Poems, Chinese Culture 34. 4(1993), pp. 27—42.

《王维诗中的叙事性》

八、敦煌学

Waley, Arthur: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931.

《斯坦因爵士发现的敦煌绘画目录》

Giles, Lionel: A Short Account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China Society, 1944

《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搜集的汉文写本简记》

Giles, Lionel: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a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57.

《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

Gernet, Jacques: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de Touen－houang, tome 1(en collaboration avec M. Wu Chiyu), Paris 1970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Soymie, Michel: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Genf 1979

《敦煌研究论文集》

Soymie, Michel: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Genf 1981(Librairie Droz)(＝Nouvelles Contributions)

《敦煌研究论文集续编》

Mair, Victor B.: Lay Students and the Making of Written Vernacular Narrative: An Inventory of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Chinoperl 10(1981), pp. 5－96

《世俗学生与白话叙事文的写作：敦煌写本目录》

Journal Asiatique: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de Haute Asie de Ve au XIe siècle, in: Journal Asiatique 269. 1/2(1981)(＝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高地亚洲五至十世纪的写本与铭文》

Huie, Chee Mee: A Study of the Chro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ves at Tun－Huang Executed from Northern Liang to T'ang, Ph, 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81.

《北凉至唐朝时期敦煌石窟的演变与年代研究》

Drège, Jean－Pierre: Papiers de Dunhuang; 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 in: T'oung Pao 67. 3/5(1981), pp. 305－360

《敦煌的纸：有纪年的汉文写本研究》

Vetch, Hélène: Lieou Sa－ho et les grotes de Mo－Kao,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137－148

《刘萨诃与莫高窟》

Mala, Guilaine and Kimura Ryutoku: Additif a l'introduction au Tibet du

Bouddhisme sinisé d'aprè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 — Houang, de Paul Demiéville, Bibligoraphie corrigée et complétée,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321—327

《载密微:由敦煌文书看佛教之传入吐蕃补正——目录提要补正》

Morgan, Carole: Les"neuf palais"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251—260

《敦煌文书中的"九宫图"》

Hou Chinglang: Trésors du monasté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Une étude sur le manuscrit p. 3432,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149—168

《敦煌龙兴寺的什物历:伯希和3432号文书研究》

Hamilton, James: Les nombres chinois de un à trente en transcription sogdienne,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295—301

《粟特文抄本中的1至30汉文数字》

Cuguevskii, L. L.: Touen—houang du VIIe au Xe siècle,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1—56

《七至十世纪的敦煌》

Drège, Jean—Pierre: Clefs des songes de Touen—houang,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205—249

《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

Wu Chiyu: Quatorze poètes du tchou—ying tsi, in: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p. 273—294

《敦煌本〈珠英集〉中的十四位诗人》

Sims—Williams, Nicholas: Sogdian Manuscript Collections: A Brief Report,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31—33.

《粟特文写本集:一篇简短的报告》

Sims—Williams, Nicholas: The Sogdian Sound—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yghur Script,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347—360

《粟特文的语言系统与回鹘文字的起源》

Esin, Emel: Le thème de l'inthronisation dans les inscriptions et la littérature turques de VIIe au VIe siècle,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299—316.

年

Hamilton, James: Les manuscrits turcs anciens de la grotte murée de Touen－houang,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15－17

《敦煌藏经洞的古代突厥人写本》

Hazai, Georg: Editon des textes ouigours de Tourfan à Berlin,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19－20

《柏林藏吐鲁番回鹘文献的刊布》

Hirano Kensho: Tseng Jen's San Chiao hui shang lun as Described in Stein No. 528,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93－100

《从斯坦因敦煌528号写本看僧忍的三教毁伤论》

Ikeda On: Les marchands sogdiens dans les documen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77－79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商人》

Yamada Nobuo: An Uighur Docu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a Slave, Revised,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373－383

《一份回鹘释奴文书》

Yamamoto Tatsurô: Deux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juntianfa (méthode de repartition égale des terres),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171－179

《均田法的两个问题》

Zieme, Peter: Research on Uigur Documents since 1975 in Germany,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55－61

《1975年以来德国的回鹘文书研究》

Zieme, Peter: Bemerkungen Zur Datierung uigurischer Blockdrucke,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pp. 386－399

《回鹘文印本年代考》

Ishizuka Harumichi: The Text of Lun Yu with Commentaries by Cheng Hsüan, Discovered in Tunhuang and Turfan, in: Manuscrits et inscrptions, pp. 101－108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郑玄注〈论语〉写本》

Jao Tsung－i: 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daté (471)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chinois de Dunhuang,P. 4506,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109—118

《伯希和收集品中最早之敦煌汉文写本:P. 4506》

Kanaoka Shȏkȏ:Les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au Japon,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21—24

《日本的敦煌研究》

Kara,György:L'ancien ouigour dans le lexique mongol,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317—323

《蒙古词汇中的古代回鹘语》

Kikuchi,Hideo:On Documents of the T'ang Military System Discovered in Central Asia,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119—150

《论中亚发现的唐代军制文书》

Kudara Kȏgi: A Fragment of an Uigur Version of the **Abhidnar-**makosakarȋka,in:Manuscrits et Inscrptions,pp. 325—346

《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回鹘文本残卷》

Soymié, Michel: Recherches sur les manuscrits en chinois à Paris, in: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35—36

《巴黎藏中文写本研究》

Tanaka Pyoshȏ:Relations between the Buddhist Sects in the T'ang Dynasty,Through the MS. P. 3913,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163—169

《从伯3913号文书看——唐朝佛教宗派之间的关系》

Twitchett,Denis: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in: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pp. 47—85

《唐代统治阶级的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

Ueyama Daishun:Études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Dunhuang relatifs au bouddhisme de dhyana;hilan et perspectives,in: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pp. 287—295

《与佛教禅宗有关的敦煌吐蕃文书之研究总结与展望》

Mair,Victor B. :Tun—huang Pogular Narrativ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敦煌通俗叙述文学作品》

Ueyama,Daishun:The Study of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A Review of the Field and its Prospects,in:Early Ch'an,pp. 327－349

《敦煌出土的吐蕃禅宗写本研究与该领域的回顾及其展望》

Soymie,Michel:Catlogue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Vol. III,Paris 1983(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文书目录》

Soymie,Michel:Contrio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eun－houang,Vol. III, Paris 1984

《敦煌研究论集(三)》

Soymie,Michel:Quelques representations de statues miraculeuses dans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in: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Paris 1984

《关于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图》

Soymie,Michel:Quelques inscriptions de peintures murales recueilli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in: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Paris 1984,pp. 35－39

《敦煌写本中的某些壁画题记》

Savitsky,L. S. :T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in: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v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ōrōs,de. L. Ligti;(Budapest:Akademiai Kiadó 1984),II,pp. 281－290

《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吐蕃文书》

Drège,Pierre:Eléments méthodologiques pour l'étude des documents de Dunhuang,in:Peintres murales et manuscrits de Dunhuang,Paris:pp. 53－59 Fondation Singer Polignac,1984.

《敦煌文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Drège,Jean-Pierre: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in:Soymie,Michel (ed.):Contribh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Vol. III,Paris 1984,pp. 195－204

《敦煌的经折装写本文书》

Drège,Jean-Pierre: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 74(1985), pp. 485—504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断代研究》

Drège, Jean-Pierre: Étude formell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conservés à Taipei: datation et authenticité, in: Bulletin delEcole Francaise de'Extreme Orient 74(1985), pp. 477—484

《台北藏敦煌文书的研究:年代与真伪》

Ho Judy Chungwa: Tunhuang Cave 249: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nirdesa, Ph. D. Diss., Yale 1985

《敦煌石窟249号:维摩诘经变》

Ho Peng Yoke: A Long Lost Astrological Work: the Dunhuang MS of the Zhan yunqi shu, 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1(1985), pp. 1—7

《一份久佚的长篇星相学著作:敦煌〈占云气书〉写本》

Huntington, John C.: A Note on Dunhuang Cave 17, "The Library", or Hong Bian's Reliquary Chamber, in: Ars Orientalis 16(1986), pp. 93—101

《敦煌17号石窟——"藏经洞"或洪䛒影窟》

Drège, Jean-Pierre: L'analyse fibreuse des papiers et la datation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in: Journal Asiatique 274.3/4(1986), pp. 403—415

《纸纤维分析与敦煌文书的日期》

Drège, Jean-Pierre: A propos de quelques collections "nouvelles" de manuscrits de Cunhuang, in: Cahiers d'Extreme Asie 3 (1987), pp. 113—129

《关于敦煌文书的几个"新"收集品》

Drège, Jean-Pierre: Note sur les couleurs des papiers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in: Cahiers d'Extreme-Asie 3(1987), pp. 147—150

《敦煌写本用纸颜色考》

Soymie, Michel: Les Documents d'Asie centrale dans l'oeuvre de Maspero, in: Hommage à Henri Maspero, Paris, pp. 61—67

《马伯乐的西域文献研究》

Cadonna, Alfredo, ed.: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Florence: Leo S. Olschki, 1992.

《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丝路文明的交汇》

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VI;grottes 146a,A182,et dovers. Paris:Collège de France, 1992

《伯希和敦煌石窟题记与壁画的记注》(四)

Jackson,David:A Group of Young Tun-huang Scholars in the Kyoto－Osaka Area,Cahiers d'Extrême-Asie 3(1987),pp. 55－76

《京都一大阪地区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学者》

Wu Chi-yu(Wu Ch'i-yü):Quatre manuscrits sanskrit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in Contrbutions Ⅲ,pp. 55－75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4件敦煌梵文写本》

Eliasberg,Danielle:Quelques aspects du grand exorcisme no à Touen－houang,in Contributions III,pp. 237－253

《敦煌大傩的几个问题》

Hou,Ching-lang:La cérémonie du Yin-cha-fo d'aprè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 Contributions III,pp. 205－235

《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印沙佛仪轨》

Drège,Jean-Pierre: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in Contributions III,pp. 195－204

《敦煌的蝴蝶装》

Schipper, Kristofer M.: Taoist Ordination Ranks in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in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pp. 127－148

《敦煌文书中的道教教职等级》

Morgan,Carol.:L'École des Cinq Nom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 Contributions III,pp. 255－261

《敦煌文书中的五姓阴阳学》

Vetch,Hélène:En marge de l'oeuvre de Wang le Xélateur:deux manuscrits inédits(P. 3724et S. 6032)du volume sans titre,in Contributions III,pp. 155－193

《未注录的两件有五梵志作品的文书》

Hamilton,James:Sur la chronologie khotanaose au IX^{e}－X^{e} siècle,in Contributions III,pp. 47－53

《9－10世纪于阗纪年》

Hori Toshikazu:Social Change in Tun-huang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in Riewpoints on T'ang China,pp. 48－74

《唐后期敦煌的社会变迁》

Hrdličkova,Vena: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jiangjing wen for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Archiv Orientalni 59. 2(1991),pp. 173－80

《敦煌讲经文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Wu Hung:What is Bianxiang?-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nhuang Art and Dunhuang Literat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 1(1992),pp. 111－192

《变相是什么?——关于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

WuHung:Rebron in paradise: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Sutra painting and its Religious,Ritual,and Artistic context. Orientation 23. 5(1992),pp. 52－60

《敦煌佛经绘画及其宗教礼俗与美学背景》

Meyer,Charles:Le Trésor caché de Dunhuang,L'Age d'or,pp. 80－85

《敦煌宝藏》

Meyer,Charles:Les Senteurs enivrantes de Canton,L'Age d'or,pp. 113－121

《远方的异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作者＝张国刚主编
页数＝１１８５
ＳＳ号＝１０４５３３４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０９月第１版